

十六国史新编 全6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十六国史新编 全6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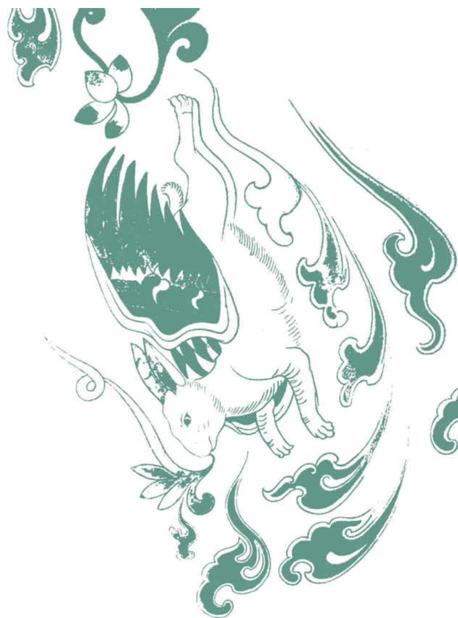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总目录

- 南凉与西秦
- 前秦史
- 成汉国史
- 五凉史
- 汉赵国史
- 合为一家：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





十六国史新编

丛书主编 周伟洲

南凉与西秦

周伟洲 著

勇士城

乞伏乾归 陇西鲜卑

阳武之败

秃发傉檀 河西鲜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周伟洲

1940年生，广东开平人。196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65年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67年分配至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3年调到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国民族史的科研和教学工作。1986年破格提升为教授。1992年至1998年曾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并兼西北历史研究室主任。2001年7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被评为『陕西省首届社会科学名家』等。

主要著作有《汉赵国史》、《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等。



十六国史新编

丛书主编／周伟洲



南凉与西秦

周伟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总序

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316～439）[1]，虽然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就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如在唐代魏徵等撰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列遗存的“霸史”共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中，就有二十六部十六国国别史。其中，最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可惜以上诸书均先后散佚，只是在唐宋时期编纂的各种类书及其他史书中，有上述霸史的一些辑文。[2]

由于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隋唐以后的历代史家，认为十六国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十六国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中国历史，对十六国也着墨不多。加之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及隋以前有关十六国的史书，均先后散佚，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极为困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创了中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更加深入，十六国史论著也不断问世。加之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十六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古籍，重新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十六国的国别史。

我们这套“十六国史新编”丛书，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或正在撰写的一批十六国国别史中，选出其中学术水平较高、大致符合国别史体例的著作编辑而成。主要包括下列著作：

1.《成汉国史》，高然、范双双著；2.《汉赵国史》，周

伟洲著；3.《后赵史》，尹波涛、温拓著；4.《五燕史》，赵红梅著；5.《前秦史》，蒋福亚著；6.《后秦史》，尹波涛著；7.《赫连夏国史》，吴洪琳著；8.《南凉与西秦》，周伟洲著；9.《五凉史》，赵向群著。

以上九部著作大致涵盖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十六个国家（政权）。之所以称之为“新编”，则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以上九部著作均是在尽可能收集整理有关史料及参考古今有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完全摈弃了过去封建史家的正统论及民族歧视和不平等等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评述十六国历史。

第二，从前封建史家所撰十六国史，仅注重该国的政治、军事及与邻近各族所建政权的关系史，而“十六国史新编”还加强了对十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包括宗教信仰）及民族的认同、迁徙及融合等方面的论述。

第三，“十六国史新编”还特别注意汲取文物考古的新资料，以及中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四，“十六国史新编”采取现代通行的专著体例和形式，用章节目的体例撰写并详加引文注释，最后附有大事年表、索引等。

关于“十六国史新编”有几点说明。

首先，由于“十六国史新编”有的撰写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如《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前秦史》），距今已过去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国内外有关十六国史的研究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众多的新成果问世。如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三崎良章撰《五胡十六国的基础研究》（汲古书院，2006）及氏撰《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东方书店，2015年第三版）、日本学者编纂的《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等等。中国学者赵丕承编著《五胡史纲》（艺轩图书出版社，2000）、刘学铫撰《五胡史纲》（南天书局，2001）、陈勇撰《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贾小军撰《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及氏撰《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陈琳国撰《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商务印书馆，2010）及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咸阳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郭永利撰《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民族出版社，2012）等。而这些研究成果，上述十六国国别史则已不能参考引用，只能保持其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成果及特征了。

其次，新编的九部十六国国别史，是由近十位作者撰写的，因此各书在体例、文字、着重点上，均与各个作者的专业、学养、经历等有关，故各书体例、内容的取舍、文字等各方面不尽相同，各具特色。

再次，有关十六国的历史，近二十余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一些与“十六国史新编”相左，甚至有相反的观点。[3]这应是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正常现象。我们保留“十六国史新编”中的观点和结论，以期引起中外学者的讨论和争鸣。

最后，感谢“十六国史新编”的各位作者，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欣然决定出版此套丛书。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2019年1月30日

[1] 大致相当于西晋灭亡至北魏灭北凉，统一整个北方的时期，即公元316年至439年。

[2] 参见[日]五胡之会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

[3] 比如仅关于最基本的“五胡”“屠各”“羯胡”“拓跋”“护军制”“汉化”“胡化”等概念，学界均有不同的解析。

- 前言
- 南凉篇
  - 第一章 秃发鲜卑与河西鲜卑
    - 一 秃发鲜卑的来源及其向河西的迁徙
    - 二 晋初秃发树机能的反晋斗争
    - 三 西晋末至十六国初期的河西鲜卑
  - 第二章 南凉政权的建立
    - 一 南凉建国前河西的形势
    - 二 秃发乌孤的建国及其发展
  - 第三章 南凉的兴盛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 一 后凉的衰落与南凉的兴盛
    - 二 极盛时期的南凉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 第四章 南凉的衰落与灭亡
    - 一 由盛转衰的南凉
    - 二 南凉的灭亡及其原因
    - 三 南凉灭亡后秃发鲜卑的分散及汉化
  - 第五章 南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 一 南凉的政治制度
    - 二 南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性质
    - 三 南凉的文化及其对河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 西秦篇
  - 第一章 乞伏鲜卑与陇西鲜卑
    - 一 乞伏鲜卑的来源和迁徙
    - 二 陇西鲜卑及其部落
  - 第二章 西秦的建立及其与邻近政权的关系
    - 一 西秦建立前陇右的形势
    - 二 西秦政权的建立
    - 三 西秦政权的发展及其与邻近政权的关系
  - 第三章 西秦的亡国和复兴
    - 一 后秦的西进和西秦的亡国
    - 二 复兴和极盛时期的西秦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 第四章 西秦的衰亡及其原因
    - 一 西秦的衰亡
    - 二 西秦衰亡的原因及乞伏鲜卑的分散和汉化
  - 第五章 西秦的社会制度
    - 一 西秦的政治制度及其特点
    - 二 西秦的社会形态
    - 三 西秦的意识形态
  - 第六章 西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 附录篇
  - 附录一 南凉秃发氏世系表
  - 附录二 西秦乞伏氏世系表
  - 附录三 南凉大事年表

- 附录四 西秦大事年表
- 附录五 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
- 附录六 周伟洲著《南凉与西秦》评介
- 索引
- 后记

前言

本书主要是叙述十六国时在西北建立的南凉、西秦两个政权的历史。为什么要将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呢？第一，是这两个政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由在曹魏末至晋初从大漠南北迁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鲜卑族所建立；而建立这两个政权的鲜卑族都不是纯粹的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匈奴族的秃发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高车人的乞伏鲜卑。两个政权建立时间相差十二年，南凉建立时间晚，存在时间也短，最后亡于西秦。因此，它们所处的时代、整个西北地区的形势大致相同，甚至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亦有相似之处。第二，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关系密切，几乎难以分割。它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陇右，相距不远，而且乞伏鲜卑最早臣属于秃发鲜卑，乞伏鲜卑建立西秦政权后，一度为后秦所灭，乞伏氏王族投奔南凉。西秦复国后，又灭了南凉，原南凉领有的河湟之地遂为西秦所有，一直到西秦灭亡前夕。第三，有关两国史料大都散佚，要单独叙述它们的历史比较困难。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们将南凉与西秦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南凉秃发鲜卑迁入河西较早，而亡国在前，故先叙述南凉史，再讲西秦史。

撰写南凉、西秦历史，最大的困难是史料问题。十六国前后有关南凉、西秦的史书，即《托跋凉录》《西秦记》《十六国春秋》等，均先后散佚。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两国的史料，主要是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和《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乞伏国仁传》，以及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此外，还有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所录崔鸿《十六国春秋》的一些片断。而现存的三种《十六国春秋》均为后人所撰，只能作参考之用。同时，因两国建国时间短，存留和发掘的地上地下文物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撰写两国历史，只好利用现存的《晋书》《魏书》《资治通鉴》及北宋类书所引的《十六国春秋》了。《晋书》载记三十卷，是“兼引伪史十六国书”，故在十六国史书散佚的情况下，此书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料。北宋司马光等修《资治通

鉴》时，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及《纂录》可能还存在，故《资治通鉴》保存了许多《晋书》载记中没有的资料，也可作信史引用。至于《太平御览》等类书引《十六国春秋》的资料，除个别字句有错讹外，均系《十六国春秋》或《纂录》原文，它们也是本书所据的主要资料之一。

由于南凉、西秦两政权是由我国古代鲜卑族所建，故我们首先从民族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秃发、乞伏鲜卑的来源、迁徙及融合情况；叙述了他们建立政权的背景和经过，两国与邻近各政权的关系，以及它们盛衰的历史。最后，对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也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资料缺乏，作者水平所限，本书存在问题很多，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周伟洲

一九八四年五月

南凉篇

第一章 秃发鲜卑与河西鲜卑

一 秃发鲜卑的来源及其向河西的迁徙

公元4世纪初至5世纪2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处于分裂割据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在北方，由匈奴、羯、鲜卑、氐、羌（即所谓“五胡”）等少数民族及汉族，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最主要的有十六国。所以，人们又称当时中国北方是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这十六国当中，就有由秃发鲜卑族在西北河湟等地建立的“南凉”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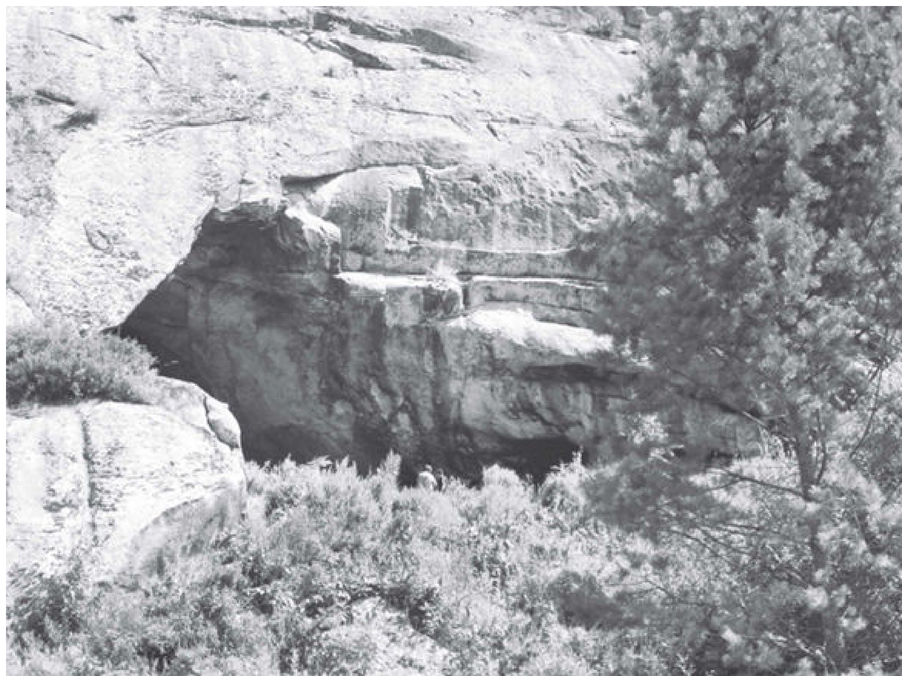
秃发鲜卑是中国鲜卑族的一种，是从鲜卑族中的拓跋鲜卑分出来的一支。《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及《太平御览》卷一二六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1]等记载甚明，云：

>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2]

既云秃发氏祖先是“与后魏同出”，则其源当与建立北魏（后魏）的拓跋鲜卑同源。又南凉最后一个君主秃发傉檀的少子秃发破羌，在南凉亡后投北魏。《魏书·源贺传》记：“源贺，自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磐所灭，贺自乐都来奔。……世祖素闻其名，及见，器其机辩，赐爵西平侯，加龙骧将军。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贺本名破羌……赐名贺焉。”据此，知秃发破羌投魏后，太武帝拓跋焘因秃发氏与拓跋氏同源，赐姓源氏，名贺。既然秃发氏与拓跋鲜卑同源，那么秃发鲜卑又是何时由何地从拓跋鲜卑中分离出来，迁至今甘肃河西一带的呢？上引《晋书》等云，乌孤八世祖匹孤[3]，“自塞北迁于河西”。据《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源氏

条载："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七世孙秃发傉檀，据南凉，子贺降后魏，太武见之曰：'与卿同源，可改为源氏。'"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一○亦记：秃发氏"河西鲜卑也。与后魏同出，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神元时率部众徙河西"。疋孤，即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他既为拓跋鲜卑诘汾长子，故秃发氏原为拓跋鲜卑无疑。

至于秃发氏迁徙的时间，大致在拓跋鲜卑神元帝力微之时。据《魏书》卷一《序纪》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内云拓跋鲜卑的远祖系华夏族祖先黄帝子昌意少子，这显然是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有意杜撰的。但所记其原始居地"大鲜卑山"，则是可信的。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石室"，这就确定了拓跋鲜卑原始居地——大鲜卑山的确切位置，即在今内蒙古大兴安岭北段，以阿里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西北十公里的嘎仙洞（即拓跋鲜卑旧墟石室）为中心。[4]以后"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又经五世，"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昬冥沮洳"。拓跋鲜卑由大鲜卑山南迁所至的"大泽"，据学者们研究，应即内蒙古呼伦池。[5]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呼伦池北面的完工、扎赉诺尔等地发现了一批早期拓跋鲜卑的墓葬。这些墓葬应为南迁至大泽附近，过着游牧生活的拓跋鲜卑的遗存。[6]从宣皇帝推寅后八世，传至"圣武皇帝讳诘汾"，其父献帝邻命诘汾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7]。即是说，大约在圣武帝诘汾时，诘汾在父邻的指导下，又从大泽南迁，遭遇重重困难，始迁到匈奴故地。此"匈奴故地"，当为匈奴冒顿单于发迹的阴山一带（今内蒙古阴山山脉）。正因为拓跋鲜卑的迁徙，宣、献二帝谋划最多，故部人并称为"推寅"（钻研之意）。



图一 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遗址（周伟洲摄）

秃发鲜卑的祖先匹孤是拓跋鲜卑圣武帝诘汾长子，时拓跋部已迁至漠南阴山一带。诘汾死后，《序纪》记其子“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关于力微，《序纪》记载了他出生的传说，云其为诘汾与“天女”所生，有神异，故得立为首领。而作为长子的匹孤却不能继立，仅分有部众，后即率所部从拓跋部中分出。这种情况，恰与东部鲜卑慕容部吐谷浑的迁徙相似。《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慕容廆庶长兄，“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因此发生矛盾，吐谷浑即率部西迁阴山。所谓“二部马斗”所引起的纠纷，应是因牲畜的发展，双方争夺牧场斗争的反映。[8]史籍未记拓跋部匹孤迁徙的原因，可能大致与吐谷浑迁徙原因相同，因此这种因畜牧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争夺牧场的斗争，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迁徙的重要原因之一。

匹孤迁徙的时间，上引《元和姓纂》云在“神元时”，即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之时。按《序纪》云力微“凡飨国五十八年，年一百四岁”；又云其在位四十二年，时是“魏景元二年（261）也”。则力微当死于晋咸宁三年（277），生于东汉熹平三年（174）。又据《晋书》卷四七《傅玄传》等记：三国曹魏的邓艾曾迁数万鲜卑于雍、凉间，其中当包括秃

发部鲜卑，时在邓艾任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与蜀争战之时，即曹魏甘露元年（256）至景元四年（263）之间。[9]即是说，秃发匹孤之由塞北（即阴山一带）迁徙，当在神元帝继立之时（219）至曹魏甘露元年（256）之间。这段时间正是拓跋部神元力微在位之时。

匹孤率部从阴山一带向西迁徙，据一些史籍所载，最初可能在今甘肃河西的北面，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至宁夏的北部，以后才进一步向南迁入甘肃河西，与当地汉、羌各族杂处错居的。上引《晋书·傅玄传》记傅玄于泰始四年（268）上疏："其五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动。"又《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武帝泰始五年（269）二月条记："先是，邓艾纳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朝廷恐其久而为患，以（胡）烈素著名于西方，故使镇抚之。"下胡注："此河西鲜卑也。"关于三国曹魏时邓艾纳降鲜卑，使之迁于雍、凉二州间，与民杂处之事，《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邓艾传》未见记载。但因邓艾镇陇右，距晋泰始四年傅玄上疏不过十数年，故此事当可信。按邓艾之迁鲜卑，只有在其都督陇右诸军事任内才可行，而邓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是在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10]至元帝景元四年（263）艾破蜀，旋被杀。故邓艾迁鲜卑应在甘露元年至景元四年（256～263）之间。邓艾所迁的数万鲜卑，胡三省注为"河西鲜卑"（主要指秃发鲜卑），而晋泰始年间在秦、凉等地掀起反晋斗争的秃发树机能，即匹孤之曾孙。故艾所迁鲜卑中，当有匹孤所率的秃发鲜卑部。这样，匹孤所率的秃发鲜卑迁入雍、凉间之前，应在河西、陇右之北。邓艾都督陇右诸军事时，又将他们南迁入河西、陇右一带，与当地汉、羌各族杂居。

关于"秃发"一词的语源及含义，《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

> 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11]

据此，知"秃发"是鲜卑语"被"之义，因寿阗产于被，故用秃发为姓。"秃发"一词的原义可能有"被"之义[12]，但此词的原义不一定由上述的传说而来。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秃发"即"拓跋"，译写不同之故。清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云："案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读轻唇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即勃勃，发从犮得

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钱氏之说，阐明了秃发与拓跋为同一词，之所以译写不同，是因魏收撰《魏书》时，尊魏（拓跋氏所建北魏）抑凉（秃发氏所建南凉）。故分别用不同的汉字译写，唐代所撰《晋书》又从《魏书》。又《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记有“《托跋凉录》十卷”（书已佚），此托跋，即建南凉的秃发。此亦秃发即拓跋之一证。

那么“拓跋”或“秃发”是什么意思呢？按《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北人”当指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称胡（匈奴）父与鲜卑母所生的后代为“铁弗”。反过来，如果是鲜卑父与胡（匈奴）母所生的后代，又称什么呢？有的学者认为，就应称为“拓跋”（秃发），也就是说，拓跋的含义就是鲜卑父、胡母所生的后代。[13]除了上引《晋书》云匹孤之妻、寿阗之母为匈奴胡掖氏（即呼延氏）外，《元和姓纂》卷三胡掖氏条云：“秃发思复犍娶胡掖氏，生乌孤。”以上二例均证明“拓跋”（秃发）系鲜卑父胡母所生子之意。

综上所述，十六国时建立南凉的秃发鲜卑，应源于拓跋鲜卑，其祖先匹孤为拓跋部首领诘汾之长子，约于神元帝继立之时至曹魏甘露元年之间（219～256）由塞北阴山一带向西迁至今甘肃河西、陇西以北游牧。到曹魏甘露元年至景元四年（256～263）之间，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的邓艾，迁秃发等部鲜卑至河西、陇西，与汉、羌等族杂处。

二 晋初秃发树机能的反晋斗争

曹魏甘露元年至景元四年（256～263）之间，邓艾迁数万鲜卑于雍、凉两州，其中秃发鲜卑主要分布在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其居地，据《晋书·秃发乌孤载记》所记，大致是“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按《水经注》卷二《河水》记：“河水东北流，径安定祖厉县故城西北……又东北祖厉川水注之。水出祖厉南山，北流径祖厉县，而西北流注于河水。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城西，又北与麦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祖厉川即今甘肃靖远县南之祖厉河，此河入黄河后，黄河又东北流，即至麦田城，则地当在今靖远北、宁夏中卫县南。牵屯山，同书记：高平川（今宁夏苦水河）“又北径三水县（今甘肃平凉东北）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县西北二百里牵条山西”。按牵条山即牵屯山，又曰笄头山，地当在高平县（今甘肃平

凉）西北二百里之地。湿罗，又作“汁罗”，据《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三年（422）正月条记：“秦征西将军孔子等大破契汗秃真，获男女二万口，牛羊五十余万头。秃真帅骑数千西走，其别部树奚帅户五千降秦。”同年四月条又记：“秦王炽磐以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筑列浑城于汁罗以镇之。”下胡注：“汁罗盖即罗川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六○河州（治今甘肃临夏）条云：“列浑城，在州西南百八十里。”即今临夏西南百八十里。按罗川系契汗部所居，此部与居于青海湖北的鲜卑乙弗部相近，[14]《读史方舆纪要》所记不确，罗川应在今青海湖东。至于浇河，即今青海贵德；大漠，当指凉、雍二州北面的沙碛和草原，即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根据以上分析，知秃发鲜卑自迁入河西后，其主要游牧地区大致在东起今甘肃平凉西北的牵屯山、靖远北的麦田城，西至今青海湖东，南到今青海贵德，北接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秃发鲜卑自迁入上述河西一带之后，曹魏及晋初统治者是怎样统治他们的呢？史籍没有记载。但从《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等记汉、魏以来，对入居内地的匈奴等各部落的管理情况，可以大略推知。内云：汉代对入居内地的匈奴，“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至建安（196～220）中，曹操曾将入居山西北部一带的匈奴分成五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到晋初，还有一部分入居关中的氐、羌、卢水胡等，由晋朝设置“护军”进行管理，基本上保存了他们原部落的组织。[15]

曹魏及晋朝统治者对居于河西的羌、胡，则设“护羌校尉”加以领护，而羌、胡各部仍自有部帅。《三国志·魏书》卷二七《徐邈传》记：邈在正始元年（240）以前任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至于魏末迁入河西的秃发鲜卑部，统治者对其的统治，大致同于凉州的羌、胡。

到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以河西秃发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为首的西北各族，掀起了反对晋朝的斗争。树机能系匹孤曾孙，祖寿阗死后，即统率部众，史称其“壮果多谋略”[16]。树机能等为什么要反对晋朝统治者呢？原来自曹魏甘露元年（256）司马炎夺魏政权，建立晋朝后，加重了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比如，晋初对一般农民的剥削较曹魏初更为繁重。据《晋书》

卷二六《食货志》记，曹操初定邺都（今河北临漳），“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到晋初泰始三年（267），则“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17]，田租增加近一倍，户调增加二分之一。晋初以来，兵役、徭役之征也日益繁重。泰始初傅玄上疏中就说：“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18]咸宁元年（275）傅玄子咸上言亦说：“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所以，他大声疾呼：“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19]。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一遇有灾荒饥馑，农民必然起来反抗。

同时，晋初统治者对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使国内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魏、晋统治者对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的政策：一是加以利用，使之屯田或服兵役、劳役，有时甚至剥夺他们的牲畜和财物；二是歧视压迫，视之为野蛮人，处处加以防范，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前引《晋书·傅玄传》记泰始四年玄上疏中就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事实真如傅玄所说的那样，迁入河西的鲜卑“必为害之势也”吗？《晋书》卷五二《阮种传》回答了这个问题。阮种说：

> 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障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

从阮种这番议论，知曹魏以来，北方和东北一些少数民族迁入内地，是“鲜有桀悍侵渔之患”，即与当地汉族相处得较好，很少有恃其强悍而侵夺他族、反叛朝廷之事。故傅玄所谓“胡夷兽心，不与华同”“必为害之势也”之类的话，不过是汉族统治阶级的歧视和污蔑之词。而河西秃发部之所以起来反抗晋朝，主要原因正如阮种所说，是边疆官吏（所谓“受方任者”）“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的结果。

事实正是如此。泰始四年至五年，时“颇有水旱之灾”，“比年不登”，引起河西、陇右地区羌、胡（包括鲜卑）的骚乱。[20]晋朝统治者

如能采取一些赈济和安抚的措施，是完全可以安定局势的。可是，晋朝统治者却采取了高压的政策，激化了河陇一带羌、胡等少数民族与统治阶级的矛盾，终于酿成了长达十年、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西北各族反晋战争。

泰始五年二月，晋朝统治阶级从河陇少数民族“必为害之势”的前提出发，为了镇压因灾荒而引起的骚动，采取了一些措施：即以雍州的陇右五郡（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及凉州的金城（治今甘肃兰州西）、梁州之阴平（治今甘肃文县）置秦州（治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以胡烈为秦州刺史。[21]其目的正如《资治通鉴》卷七九所说，是害怕河陇鲜卑各部“久而为患”，“以烈素著名于西方，故使镇抚之”。胡烈，字武玄，曾为魏锺会护军，参加伐蜀之役，[22]后为晋之荆州刺史，多年征战，是一个“勇而无谋，强于自用”的武夫，上任后即“失羌戎之和”[23]。也就是说，胡烈上任后采取高压手段，“妄加讨戮”，终于激发了以树机能为首的西北各族的反晋斗争。

泰始六年六月，胡烈率军攻秃发树机能部于万斛堆（今甘肃祖厉河支流北河河口），兵败被杀。[24]时任都督雍、凉州诸军事的扶风王司马亮，遣将军刘旗救之，旗观望不进。后晋武帝一怒之下，贬亮为平西将军，将斩旗，因亮讲情，才免死。[25]晋朝改派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杜预代胡烈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率军镇压树机能。时树机能击杀胡烈，势转盛，石鉴命杜预出兵击之，预以为“虏（指树机能等）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本与杜预有私怨，于是借此遣御史用槛车送杜预于廷尉。后因杜预尚主，故“以侯赎论”[26]。石鉴后也为树机能所击败，因“坐论功虚伪，免官”[27]。七月，晋廷一方面以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另一方面免陇右五郡所谓“遇寇害者”租赋，以收买人心。[28]

树机能先后击败了胡烈和石鉴，影响所及，陇右、河西其他各族也纷纷响应。据《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四月记：

> 北地胡[29]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

所谓“北地胡”，乃是从汉代以来入居当时北地郡的匈奴、屠各、卢水胡和羯胡等，到晋时形成了一些部落集团。泰始七年，北地胡响应树机能

的起兵，进攻金城郡。其首领，据《宋书》卷三三《五行志》所记：为“药兰泥、白虎文”。晋凉州刺史牵弘率军镇压，被围于青山（今甘肃环县西）。牵弘与胡烈一样，是一个专事武力，“失羌、戎之和”的武夫，[30]于是引起“群虏内叛”，“群虏”中当包括秃发鲜卑部。[31]弘最后战败而死。

秦、凉二州刺史的败亡，震动了晋王朝，晋武帝在同年七月“乃下诏曰：‘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每虑斯难，忘寝与食’”。可见，晋朝统治者对以树机能为首的反晋斗争是十分头疼的。诏令接着说：“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弘高，达见明远……其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发兵击树机能。[32]贾充害怕出征，计无所从，并深恨推荐他出征的侍中任恺。十一月，贾充女与太子订婚，又京师大雪，军不得发，遂未西行，留居本职。[33]

从秃发树机能与胡烈、牵弘的交战地区来看，当时秃发部主要集中在金城郡的西北一带。至泰始十年（274）底至咸宁元年（275）初，秃发部鲜卑的势力开始向凉州、金城以西发展。[34]《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八月云：“凉州虏寇金城诸郡，镇西将军、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内云之“凉州虏”，当指秃发鲜卑部。又同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亦记：“咸宁初，羌虏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此记与上述《武帝纪》所记似为一事，但时间相差数月，且云树机能为“羌虏”，误。《扶风王骏传》接着又记：武帝又令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欲先劫佃兵，骏命平虏护军文俶督凉、秦、雍诸军各进屯以威之。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关于树机能送质请降，《晋书·武帝纪》记于咸宁元年二月；《资治通鉴》卷八○“文俶”作“文鸯”[35]，且记此事于咸宁三年（277）三月。按以上三处记载，《武帝纪》记载较确，即咸宁元年二月树机能见文俶等军云集，遂降。不久又反晋，故至咸宁三年三月，又有“平虏将军文俶讨叛树机能等，并破之”的记载，与《资治通鉴》所记相合。而《扶风王骏传》将以上事均记于“咸宁初”之下，引起混乱，但内记归降的二十万口中有“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则可补上述记载之阙。

除此而外，在咸宁元年至二年间，远在河西之西，靠近晋西域戊己

校尉治所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以东，也有一些鲜卑部落反抗晋朝统治。如咸宁元年六月，晋“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次年七月，“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36]。这部分鲜卑可能是公元2世纪中漠北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西部的一支。[37]总之，自咸宁三年后，河陇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表面上趋于平息，实际是在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果然，咸宁四年（278）六月，树机能之党若罗拔能在武威起事，与晋凉州刺史杨欣展开了激战，杨欣战败，死于丹岭（今甘肃武威西）。[38]晋廷大震，仆射李憙请发兵“征讨”，朝廷其他官员以“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竟不从之”[39]。次年正月，树机能就攻陷凉州，尽取凉州之地。所谓取凉州之地，仅是取凉州的主要城镇，阻断了晋与河西的交通。河西汉族官吏、豪门则多拥兵于坞堡，与树机能等对抗。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记：“艾在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泰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内云“羌虏”即指树机能等，艾时所筑坞堡，由豪门、官吏督部曲、民众拒守，树机能等一时是难以攻破的。尽管如此，这对晋朝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晋武帝即筹咨将帅，李憙主张借自魏以来迁居于今山西的匈奴五部之众，假其首领刘元海（刘渊）以将军之号，令其率众入河西，击树机能。这是封建统治者一贯采用的“以夷制夷”的方针。可是，当即遭到另一名大臣孔恂的反对，恂对武帝说：“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40]武帝才打消了用匈奴刘元海击树机能的念头。但是，河西的断绝，使武帝焦忧不安，无计可施，只好“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乎？’朝臣莫对”。只有司马督马隆应声说，只要武帝能听任他选募武士三千人，即可击灭树机能，收复凉州。武帝即任马隆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精选武士三千五百人，给三军军资，令其西进。

同年十一月，马隆率军渡温水（即温围水，在今甘肃武威东）。树机能即遣众数万，“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马隆做偏箱车，转战而前；或夹道累磁石，树机能军披铁铠甲，过时为磁石所吸，不得前；而隆军披犀甲，无所留碍，树机能军以为神助。这样，隆军且战且进，转战千余里，杀伤数千人，至武威。[41]又《太平御览》卷三○一引王隐《晋书》亦云：“马隆击凉州，恶虏断道，隆作八阵图，车营并追，狭则木屋施轮并前，智谋纵横，出其不意，故能成功。”

马隆军至武威后，树机能部猝跋韩、且万能等率众万余落归降，马隆“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十二月，隆遣归降的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树机能兵败被杀。[42]至此，以树机能为首的反晋斗争终于失败，凉州复为晋所有。

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反晋斗争从泰始六年起，至咸宁五年失败，前后共十年。从树机能反晋的起因看，他们的斗争性质最初是反抗晋朝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随着树机能实力的增强，逐渐控制了河西后，反晋斗争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变为秃发鲜卑贵族割据一方，与晋朝对立的性质。

树机能等的反晋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它冲击了晋朝在秦、凉地区的统治，迫使统治者减轻了对秦、凉地区各族人民的压榨，注意选派良吏镇守该地区等。如晋朝在镇压树机能等的期间，先后于泰始六年七月、八年四月两次减免陇右五郡或四郡“遇寇害者”田租。[43]收复凉州后，晋朝于太康初（280）以马隆为平虏护军、西平太守，屯据西平。马隆在西平十余年“威信震于陇右”[44]。特别应提出的是，晋在击平树机能后，令“诸为奴婢亦皆复籍”[45]，即解放奴婢为一般百姓。这一措施，固然是晋武帝依汉魏成规而行，目的是增加给国家交纳租赋的编民，但对河西地区经济的恢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反晋斗争的失败使原来入居河西、陇右等地的鲜卑各部，势力衰弱，分处于河西各地，与当地汉、羌人民的接触、交往更为频繁，有利于各部鲜卑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到4世纪90年代秃发鲜卑建立南凉，多吸收汉族豪门及俊杰之士为羽翼，统治者基本采取汉族的礼仪制度等，均与其长期与当地汉族杂居、交往日益频繁有关。

三 西晋末至十六国初期的河西鲜卑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十六国春秋·南凉录》等首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什么是“河西鲜卑”，它与秃发鲜卑又有什么关系？这是人们首先会提出的疑问。要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现存的较早文献中，“河西鲜卑”一词出现不多，除上云乌孤为“河西鲜卑人也”一句外，《秃发乌孤载记》还记乌孤立后，后凉吕光“遣使署为假节、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史籍关

于河西鲜卑的明确记载仅此两条，我们只能根据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参照上述记载，加以诠释。河西鲜卑，顾名思义，应为居住在河西地区的鲜卑。此河西，是指今甘肃河西走廊的河西，也就是金城黄河之西，包括今青海湟水流域；而非指山陕黄河河套之西的河西。因为在晋末至十六国初期，与河西鲜卑同时存在的，还有所谓的“陇西鲜卑”[46]。秃发鲜卑主要居于河西，因此它应是河西鲜卑之一部，而且是其中最主要、最强大的一部。这也就是乌孤继立后，后凉封其为“河西鲜卑大都统”的原因。

河西鲜卑之名出现于何时？晋初，秃发树机能反晋前后，史籍中未见有称树机能等为河西鲜卑。时树机能先活动于陇西、安定一带，后才向金城、凉州一带发展。树机能被杀后，秃发部势力衰弱，始散处于河西。除秃发部鲜卑外，在河西还有许多其他的鲜卑部落。河西鲜卑之名，大约就在西晋末至十六国初开始出现，故秃发乌孤带领部众，重新强盛后（约在394年），后凉封其为“河西鲜卑大都统”，而乌孤也就成为河西鲜卑人了。

河西鲜卑中，除了主要的秃发鲜卑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鲜卑部落，可考的有：

乙弗鲜卑 亦称卑和虏。《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乌孤继立后，曾“讨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记有“乙弗鲜卑乌地延”；故知乙弗为鲜卑部落。[47]其居地，据《资治通鉴》卷一一一胡注云：“乙弗，亦鲜卑种，居西海（今青海）。”又《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后附有“乙弗勿敌国”，云在“吐谷浑北”，“国有屈海（今青海），海周回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乙弗勿敌国显然即是乙弗鲜卑，其部有万落，一落指一帐房，相当于一户。

此部亦系由塞北迁来，《魏书》卷二《太祖纪》曾记：登国元年（386）五月，“护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题叛走”。七月，“代题复以部落来降，旬有数日，亡奔刘显”。拓跋珪即代王位，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一带，则乙弗部代题当在漠南，且与青海乙弗鲜卑原为同一部。代题可能为留于漠南而未迁青海者。乙弗部迁入青海的时间，可能与秃发鲜卑一样，是在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至元帝景元四年（263）由魏邓艾招降，而迁于青海的。乙弗部迁入青海湖一带后，征服了该地的羌族，故史载其部众有万落之众。又因汉代称青海为卑和羌海，故史籍又称其为“卑和虏”[48]。乙弗鲜卑先后臣属于南凉、西秦、

北凉，最后为吐谷浑所并。[49]

契翰 亦作契汗、唾契汗。《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乌孤正式建立政权之前曾说："但我祖宗以德怀远，殊俗惮威，卢陵、契汗万里委顺。"《晋书·秃发傉檀载记》云傉檀西征乙弗，有告西秦攻其都城乐都，傉檀对部众说："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者，是所望也。"又《北史·吐谷浑传》附乙弗勿敌国后，亦记："有契翰一部，风俗亦同，特多狼。"卢陵部无考。契汗早在乌孤之前就臣属于秃发鲜卑，故亦为较早迁入河西的部落之一。其居地当与乙弗为邻，前引《资治通鉴》记契汗秃真在罗川，则此部当居今青海湖东。唯其是否为鲜卑部落，史无记载，但其与乙弗居地、风俗相近，可能也是邓艾时迁入河西的鲜卑部落之一。

折掘 一作叠掘。前引《秃发乌孤载记》云乌孤"讨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将石亦干筑廉川堡以都之"。同书又记有"右卫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以叛"，秃发傉檀王后亦为折掘氏。据《晋书》卷九五《郭黁传》记："鲜卑折掘送马于（赵）凝（前凉西平太守）。"《晋书·乞伏乾归载记》亦记："鲜卑叠掘河内率户五千，自魏降乾归"[50]，叠掘即折掘，叠、折一音之转，译写不同之故。据此，知折掘亦为鲜卑部落，且原居漠南、河套一带，其中一部分早迁入河西。乌孤击乙弗、折掘二部后，始能筑廉川堡。《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七月条胡注："乙弗、折掘二部，皆在秃发氏之西。廉川在湟中。"乙弗既在青海，则折掘当在廉川一带。廉川在湟中，即在今青海乐都东北连城一带。石驴山，在今西宁北川西北。[51]

意云鲜卑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后凉吕光封乌孤为广武郡公，乌孤"又讨意云鲜卑，大破之"。时乌孤中心在广武（今甘肃永昌东南），意云鲜卑当离广武不远，此部亦应为邓艾迁入雍、凉的鲜卑部落之一。

鲜卑思磐部 《晋书》卷一二二《吕纂载记》云："纂番禾太守吕超擅伐鲜卑思磐，思磐遣弟乞珍诉超于纂，纂召超将磐入朝。"《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亦记："蒙逊率骑二万东征，次于丹岭，北虏大人思磐率部落三千降之。"内云"北虏大人思磐"，当即鲜卑思磐，居地在丹岭（今甘肃山丹南燕支山）一带，部众有三千。

车盖鲜卑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云："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于显

美方亭，破车盖鲜卑而还。”则此部鲜卑居显美一带，显美时属南凉武威郡，在今甘肃武威西北。

麦田鲜卑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云：“蒙逊进围姑臧（今甘肃武威），百姓惩东苑之戮，悉皆惊散。叠掘、麦田、车盖诸部尽降于蒙逊。”麦田系地名，如上述，在今甘肃靖远北。此部鲜卑当因居于麦田而得名。

北山鲜卑 《晋书》卷八七《李玄盛传》云：“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文既东迁，玄盛从姑梁褒之母养之。其后秃发傉檀假道于北山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并通和好。”[52]此事《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三《西凉录》记于西凉建初二年（406），时傉檀已据有姑臧。如此，则傉檀送玄盛女敬爱应由姑臧至酒泉，其所经之北山，即今张掖以北的合黎山及北大山。从此知当时在今合黎山、北大山一带有一些鲜卑部落，名“北山鲜卑”。又《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记：姚兴取后凉姑臧后，以王尚行凉州刺史，镇姑臧。“王尚绥抚遗黎，导以信义，百姓怀其惠化，翕然归之。北部鲜卑并遣使贡款。”内云之“北部鲜卑”当在姑臧之北，疑即北山鲜卑。

以上是可考的河西鲜卑部落，他们在秃发氏建立南凉政权的前后，大都为秃发部所役属，散居在河西。

自晋咸宁五年秃发树机能为晋马隆击杀后，秃发部复降晋，部众拥立树机能从弟务丸为首领。务丸卒，其孙推斤立。务丸卒年不详，《资治通鉴》卷一○一“推斤”作“椎斤”，且云其卒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一百一十，子思复鞬代统其众”。在务丸或推斤时，秃发部鲜卑在河西仍有一定的势力。《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记：轨于晋“永宁初（301），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从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轨任凉州刺史，反叛的鲜卑当为河西鲜卑各部，其中也包括秃发部鲜卑在内。到“永兴中（304～305），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若罗拔能，即是咸宁四年六月在武威击杀晋凉州刺史杨欣之鲜卑首领，《资治通鉴》卷八○称其为“树机能之党”。树机能死后，拔能率部降晋，至是起兵反晋，张轨遣宋配杀之。从所“俘十余万口”这个数字来看，当时河西鲜卑人数是相当多的。

至此以后，在张氏据河西、建前凉的时期，史籍再未见记载有关河

西鲜卑的活动。仅于上引《晋书·张轨传》内，记张骏曾观兵新乡（今甘肃安西东南），“狩于北野，因讨轲没虏，破之”。又记：张重华遣谢艾“军次神鸟（在今甘肃武威境），王擢与前锋战，败，遁还河南。还讨叛虏斯骨真万余落，破之”。内云之“轲没虏”“虏斯骨真”均有可能是属秃发部的其他河西鲜卑部落。因为魏晋以来的史籍，一般称鲜卑为“虏”或“白虏”，而且其名也类似鲜卑人的姓氏。

[1] 崔鸿系北魏时人，曾撰《十六国春秋》一书，今佚。现传世有三种不同的《十六国春秋》，均非原书。宋代《太平御览》等书引有此书，故一般引用崔鸿书均转引自《太平御览》等书。

[2] 此段引自《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余二书记载大同小异。

[3] 上引《太平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匹孤”作“疋孤”。

[4]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2期；干志耿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5]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243页。

[6]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载《文物》1977年第5期。

[7] 《魏书》卷一《序纪》。

[8] 见拙作《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9] 说见后。

[10] 见《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邓艾传》。

[11] 《太平御览》卷三六一引《三十国春秋》曰：“秃发乌孤七世祖寿阗之在孕也，母梦一老父被发在（左）衽，乘白马谓曰：‘尔夫虽西移，终当东返，至京必生贵男，长为人主。’言终，胎动而寤。后因寝，生寿阗被中，因以秃发为号，寿阗为名。”

[12] 白鸟库吉用历史语言比较学的方法研究“秃发”一词，认为“秃发”一词的语源，即今蒙古语debel，为皮外套之意。（见白鸟库吉著《东胡民族考》上编，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1934，第115～116页）

[13]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31页。

[14] 见《北史》卷九六《吐谷浑附乙弗勿敌国传》。

[15] 见《邓太尉祠碑》及《广武将军□产碑》等。

[16]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17] 《初学记》卷二七《绢第九》引“晋故事”。

[18]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

[19]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附子咸传》。

[20]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

[21] 《晋书》卷三《武帝纪》；《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武帝泰始五年二月条。

[22] 见《三国志·魏志》卷二八《锺会传》。

[23] 《晋书》卷三五《陈骞传》中骞与武帝语。

[24] 按《晋书》卷五七《胡奋附弟烈传》“万斛堆”作“万[illegible]塠”，且云“烈屯于万[illegible]塠，为虏所围，无援，遇害”。按，《晋书》卷三《武帝纪》，《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武帝泰始六年六月条皆云，烈击树机能于万斛堆，“力战，死之”。从《晋书》卷三《武帝纪》。

[25] 《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

[26] 《晋书》卷三四《杜预传》。

[27] 《晋书》卷四四《石鉴传》。

[28] 《晋书》卷三《武帝纪》。

[29] “北地胡”不是指晋初所置北地郡（治今陕西耀县）内的胡人，而是指早在汉代就入居当时北地郡（治今宁夏吴忠附近）的胡人，晋初主要聚居在安定郡（治今甘肃镇原西南），与树机能部邻近。

[30] 《晋书》卷三五《陈骞传》。

[31] 《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武帝泰始七年四月条云：“众胡皆内叛，与树机能共围弘于青山。”下胡注引《考异》云：“或北地胡即树机能也。”误。

[32] 见《晋书》卷四○《贾充传》。

[33] 见《晋书》卷四○《贾充传》。

[34] 《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南凉录》及《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树机能还“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今甘肃山丹南）”。此事不见他书记载，从整个形势来分析，此事应发生在泰始九、十年间。

[35] 《晋书》卷三《武帝纪》、《晋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作“文俶”或“文淑”。《三国志·魏书》卷二八《诸葛诞传》作“文鸯”，注引《晋诸公赞》又作“文俶”。裴松之云鸯一名俶（见《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

[36] 均见《晋书》卷三《武帝纪》。

[37] 见拙作《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38] 《晋书》卷三《武帝纪》、《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等。

[39] 《晋书》卷四一《李憙传》。

[40] 《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

[41] 《晋书》卷五七《马隆传》；《资治通鉴》卷八○，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条。

[42] 《晋书》卷五七《马隆传》；《资治通鉴》卷八○，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二月条。

[43] 《晋书》卷三《武帝纪》。

[44] 《晋书》卷五七《马隆传》。

[45] 《晋书》卷六《元帝纪》条。

[46]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

[47] 《元和姓纂》卷一○乙弗条云：“前燕有高丽王乙弗利。《后魏书》云：代统部落，太武时乙弗足随魏南迁，遂为河南人，孝文改为乙氏。”按前燕曾征服高丽，乙弗利为高丽王名，非乙弗氏为高丽人也。

[48] 《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49] 见拙作《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第32～33页。

[50] 又见于《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四月条。

[51] 见《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四。

[52] 197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此段从“北山”处点断，于是成了“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误。

第二章 南凉政权的建立

一 南凉建国前河西的形势

前秦建元十二年（376），据河西的前凉张氏政权为前秦苻坚所灭。前秦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于河西之地置凉州，以梁熙为刺史，镇姑臧。建元十九年（383），苻坚在淝水为东晋所败，北方各族纷纷反秦，先后由慕容鲜卑建立后燕（384年，都中山）、西燕（384年，都长子），乞伏鲜卑建西秦（385年，都勇士城），羌族姚氏建后秦（386年，都长安），氐族吕氏建后凉（386年，都姑臧）等政权。其中氐族吕氏所建的后凉，即统有河西之地。

吕光，略阳（今甘肃天水东）氐族人，原为苻坚将，多有战功。前秦建元十八年，苻坚以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征西域。次年一月，吕光发长安，渡流沙，攻降焉耆，下龟兹，“王侯降者三十余国”[1]。此时苻坚淝水大败，返回长安，闻光平西域，遂封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前秦太安元年（385），吕光率众东返，击溃了原秦、凉州刺史梁熙，“于是四山胡夷皆来款附”，“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2]这样，吕光就基本上控制了河西，而居河西的鲜卑各部当也降于光。但吕光在河西最初的统治还不稳定，同年九月，首先发生了主簿尉祐的叛乱，兵败后据兴城（今青海循化东），“扇动百姓，夷夏多从之”[3]。次年（386），又爆发了原前凉张氏后代与秃发鲜卑联合进攻姑臧的事件。

自前秦建元元年（365）秃发推斤死后，子思复鞬领其部众。《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思复鞬立后，“部众稍盛”，其活动中心，据思复鞬子乌孤被吕光封为“广武县侯”看，大致在武威东南的广武郡。此郡系前凉张寔时，分金城郡置，统令居、枝阳、永登三县。[4]至前秦，仍置广武郡，统令居、枝阳、永登、广武、振武五县。[5]郡地大致在今甘肃兰州至武威之间。建元十九年，原前凉末代主张天锡随苻坚军攻东晋，淝水战败后，天锡奔东晋，其世子张大豫为秦长水校尉王穆所匿。苻坚还长安时，王穆、大豫奔河西，投靠在广武的秃发思复鞬，思复鞬送之于魏安（今甘肃武威东）。大豫等奔回河西，是企图借助秃发部的力量，攻占凉州，重建前凉。前秦太初元年（386）二月，魏安人焦松、

齐肃、张济起兵数千，迎大豫于揟次（今甘肃古浪附近），进而攻占吕光昌松郡（治今甘肃古浪北），执太守王世强。吕光遣辅国将军杜进击之，为大豫所败。大豫进逼姑臧，准备与吕光决战。王穆对大豫说："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厉兵积粟，东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这个策略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大豫不从，自号抚军将军、凉州牧，改元凤凰，以王穆为长史，传檄郡县。又遣王穆说降凉州以西诸郡，于是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起兵应之。大豫集结三万人保据杨坞（在武威西）。四月，大豫自杨坞进屯姑臧城西，王穆及思复鞬子奚于帅众三万屯于城南。吕光从城内出击，杀奚于等二万余人。大豫、王穆退至西郡（治今甘肃永昌西）。十一月，大豫掠民五千余户自西郡入临洮（今甘肃岷县），保俱城（在临洮境）。吕光遣将彭晃、徐灵攻破俱城，大豫奔广武，广武人执之，送于姑臧，为吕光所杀。王穆奔建康（治今甘肃酒泉东）。[6]

吕光在击溃了张大豫、王穆与秃发鲜卑联盟的进攻之后，于同年十二月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安[7]，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8]。中国历史上，即以此年作为后凉正式建立之年。后凉所统地区，大致包括今甘肃兰州、临夏以西，直至今新疆东部地区。后凉统治地区虽然较为广阔，但其政权极不稳定，这一点在十六国政权中是较为突出的。自前秦太初元年吕光建立政权时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次年（387）即有逃至建康的王穆袭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吕光西平太守康宁亦自称匈奴王，杀湟河太守强禧以叛；接着，张掖太守彭晃亦叛吕光，"东结康宁，西通王穆"。吕光花了很大力气，才平定了上述反乱。[9]

对后凉威胁较大的，还是前秦太安元年（385）乞伏鲜卑在陇西建立的西秦政权。西秦太初元年（388），西秦主乞伏乾归迁都金城，直接威胁后凉。因此，在后凉麟嘉四年（392），吕光遣弟吕宝率军，攻金城乞伏乾归，为乾归所杀，死者万余人；又遣子吕纂攻附于西秦的南羌彭奚念，大败而归。后吕光虽击溃了彭奚念，攻占了枹罕（今甘肃临夏），但损失巨大。[10]以上情况，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一○七的注中所说："吕光新得河西，党叛于内，敌攻于外，虽数战数胜，而根本不固，宜不足以贻子孙也。"

后凉建国后，内忧外患，国力衰弱，自有其原因，在此不拟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即河西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

居的地区，主要有匈奴、丁零、西域胡人、卢水胡、氐、羌、月氏（小月氏）、屠各等。魏晋以后，又有大批的鲜卑部落迁入河西，势力颇为强大。而吕氏的后凉对各族人民实行了压迫和掠夺的政策，加之后凉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内讧不断。这一切为河西各族的首领、贵族割据一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北凉、西凉及秃发鲜卑所建的南凉，都可以说是由后凉政权中分裂出去的。

二 秃发乌孤的建国及其发展

自前秦太初元年（386）思复鞬与张大豫进攻姑臧失败后不久，思复鞬死，子乌孤立。[11]《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乌孤继立后，“务农桑，修邻好”。《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此句作“养民务农，循结邻好”。这句话十分重要，可惜过于简约。《资治通鉴》卷一○八，晋武帝太元十九年正月条记载稍详，云：“初，秃发思复鞬卒，子乌孤立。乌孤雄勇有大志，与大将纷陁谋取凉州。纷陁曰：‘公必欲得凉州，宜先务农讲武，礼俊贤，修政刑，然后可也。’乌孤从之。”按秃发鲜卑原出于塞北的拓跋鲜卑，当其向西迁徙时，部内与拓跋鲜卑一样，主要从事游牧。但秃发鲜卑从3世纪60年代邓艾将其迁入雍、凉二州之后，与汉、羌等族杂居，一直到乌孤时，共一百三十多年。其间，秃发鲜卑在河西的势力几起几落，与当地汉、羌人民关系日益密切。汉、羌人民从事的农业经济对其必然产生影响，促使他们由游牧生活转化为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当然，也不排除秃发部内一部分人仍保留着游牧经济的可能。因此，到乌孤时，秃发部内农业经济开始发展，乌孤采取的“养民务农”的经济政策，就是其部内经济转化的反映。乌孤接受纷陁的建议，在政治上，礼俊贤，修政刑，对外“循结邻好”，不事争战，为部内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样，十数年间，秃发部在后凉东南的广武一带，开始强盛起来。

后凉对日益强盛的秃发部，自然不能熟视无睹，可是一时又无力消灭它。因此，采取了羁縻、笼络的政策。后凉麟嘉六年（394），吕光遣使署乌孤“为假节、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乌孤召集部内首领说：“吕氏远来假授，当可受不？”众皆云：“吾士众不少，何故属人！”不同意接受吕光封号，臣属于吕光。乌孤准备从众议，其将石真若留说：“今本根未固，理宜随时。光德刑修明，境内无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敌，后虽悔之，无所及也。不如受而遵养之，以待其衅耳。”乌孤最后采纳了石真若留的建议，接受了吕光给予的封号。[12]

后凉吕光麟嘉七年（395），乌孤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遣军击青海湖及湟水流域的乙弗和折掘二部鲜卑，皆破之。又遣将石亦干筑廉川堡以都之。廉川堡，如上引胡三省注，在湟中，今青海乐都东北连城[13]，这是乌孤在建立政权之前的政治中心。《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乌孤都廉川后，曾登廉川大山（指今湟水北达坂山），泣而不言。其将石亦干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为不乐者，将非吕光乎？光年已衰老，师徒屡败。今我以士马之盛，保据大川，乃可以一击百，光何足惧也。"其实，石亦干并不了解乌孤伤心的原因，以为他是因臣属于吕光而流泪。乌孤回答说："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怀远，殊俗惮威，卢陵、契汗万里委顺。及吾承业，诸部背叛，迩既乖违，远何以附，所以泣耳。"在这里乌孤追述了他的祖先树机能曾经据有凉州，河西各部均"委顺"于秃发部的历史。内中提到的卢陵部无考，契汗，如前述，是与乙弗部在一起游牧于青海湖东的鲜卑部落。这些部落在乌孤时，纷纷叛离，乌孤想到此，才伤心而泣。其将苻浑（从姓氏上看，似为氐族苻氏）对乌孤说："大王何不振旅誓众，以讨其罪。""乌孤从之，大破诸部。"《晋书》未明言大破哪些部落，但至少包括以上所说的卢陵、契汗等部。

乌孤都廉川堡，征服周围其他各部，震动了河西。当时，河西一些汉族豪门士族纷纷投靠乌孤，为其谋士。如广武的赵振，即其中之一。《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七月条记："广武赵振，少好奇略。闻乌孤在廉川，弃家从之。乌孤喜曰：'吾得赵生，大事济矣！'拜左司马。"而后凉吕光，见乌孤势力又有所增长，遣使拜之为"广武郡公"。乌孤又大破河西的意云鲜卑。

后凉麟嘉八年（396），吕光即天王位，改国号大凉，改元龙飞，大封百官，并遣使拜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主"。乌孤对使者说："吕王昔以专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远，惠安黎庶。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吾安可违天下之心，受不义之爵！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于是"留其鼓吹羽仪，谢其使而遣之"[14]。乌孤所云后凉吕光"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是当时后凉的真实写照。吕光年老，诸子如吕纂、吕弘、吕绍、吕覆等大多贪暴淫逸。[15]光甥石聪曾进谗言，使光杀后凉建国功臣杜进，导致郡县相继叛离，大有土崩瓦解之势。这种情况，使乌孤决心完全摆脱后凉的控制，取无道之后凉吕光的地位而代之。这一行动，正是乌孤独立称王、建立政权的

先声。

次年（397年，晋隆安元年）正月，秃发乌孤即“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正式建立政权，史称南凉。乌孤以弟秃发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傉檀为车骑大将军。[16]又以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17]接着，乌孤治兵广武，并攻占后凉之金城郡（治今甘肃兰州西）。[18]吕光遣将军窦苟击乌孤，双方大战于街亭（在今甘肃永登乌鞘岭），窦苟大败而还。[19]

正当乌孤建立政权之时，河西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同年五月，居张掖的卢水胡沮渠蒙逊因其伯父沮渠罗仇为吕光所杀，煽动部人，据有临松郡（治今甘肃民乐西），屯兵金山（今甘肃山丹南）。六月，蒙逊从兄沮渠男成在酒泉响应，推后凉建康太守段业为盟主，起兵反后凉。段业自称“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改吕光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以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以蒙逊为张掖太守。后凉吕光遣吕纂击段业，不克。[20]沮渠氏拥段业所建之政权，史称北凉。北凉的建立，无疑给后凉以沉重的打击，使之失去了对张掖以西地区的控制，势力更加衰弱。这一形势，对刚建国于后凉东南的南凉秃发乌孤是十分有利的。同年八月，后凉统治阶级内部又发生了郭黁、杨轨的叛乱事件。郭黁，西平人，为后凉散骑常侍、太常，善天文数术，国人信重之。他见后凉政权衰败，据姑臧东苑城反，光遣使命正与段业对峙的吕纂返姑臧击黁。纂军从张掖回至番禾（今甘肃永昌）时，纂司马杨统又叛归郭黁。后纂大破郭黁，得入姑臧。此时，姑臧城以北的休屠城又有张捷、宋生招集汉、胡三千余人响应郭黁，共推后凉后将军、略阳氐人杨轨为盟主。杨轨于是“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纂又破郭黁于姑臧城西，黁势衰，遣使向秃发乌孤求援。乌孤遣弟骠骑将军利鹿孤率骑五千赴之。[21]乌孤在广武、金城一带的崛起，也吸引了金城以南一些其他部落投归南凉。《资治通鉴》卷一○九，晋安帝隆安元年条记，此年底有“河南鲜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附于秃发乌孤”。下胡注：“此金城河南也。”即今甘肃兰州黄河以南的鲜卑十二部，而非指南朝史籍中所记之“河南（吐谷浑）”。在对外方面，乌孤采取了联合西边的北凉和东边西秦的策略，先后向两国遣使通好，并要求与西秦和亲。[22]

南凉太初二年（398），杨轨率步骑二万与在姑臧城西的郭黁会合，秃发乌孤又遣弟傉檀率骑一万助轨。轨军至姑臧，屯于城北，吕纂攻之，郭黁来救，败吕纂军。六月，杨轨自恃其众，又见后凉遭到西边

的北凉、东面的西秦的进攻，企图一举攻夺姑臧。于是与利鹿孤共邀击吕纂，为纂击败。轨奔廉川，投附南凉的田胡王乞基，郭黁东投西秦，[23]杨统归南凉。九月，杨轨屯廉川，收集汉、胡，众至万余。王乞基劝轨投乌孤，说：“秃发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归之。”杨轨于是遣使降于乌孤。正在此时，杨轨、王乞基为附近羌族首领梁饥击败，“西奔[illegible]海（即西海，今青海湖），袭乙弗鲜卑而据其地”。乌孤因此事而大为惋惜，对群臣说：“杨轨、王乞基归诚于我，卿等不速救，使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其平西将军浑屯曰：“梁饥无经远大略，可一战擒也。”事实正如浑屯所料，羌酋梁饥乘胜攻后凉西平郡（治今青海西宁），西平人田玄明执太守郭倖而代之，拒饥，并遣子为质于乌孤，求援。乌孤即准备发兵救西平，可是群臣害怕梁饥势盛，不主张出兵。左司马广武赵振则主张乘机出兵击梁饥，以取姑臧以南之地为根本。他说：“杨轨新败，吕氏方强，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岭南五郡，庶几可取。大王若无开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经营四方，此机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华、夷震动，非我之利也。”[24]赵振这番话，是使乌孤得以割据河湟，巩固政权的基本方针。内云之“洪池”，指洪池岭。《资治通鉴》卷一一○，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条胡注：“洪池，岭名，在凉州姑臧之南。唐凉州有洪池府。”所谓“岭南五郡”，即指洪池岭以南后凉所置五郡（广武、西平、乐都、浇河、湟河），赵振用上述的话劝乌孤乘梁饥攻西平之机，取后凉岭南五郡做根本，得到乌孤的赞许。他说：“吾亦欲乘时立功，安能坐守穷谷（指廉川）乎！”又对群臣说：“梁饥若得西平，保据山河，不可复制。饥虽骁猛，军令不整，易破也。”于是率军击梁饥，破之。饥退屯龙支堡（今青海西宁东南黄河北岸），又为乌孤击败，单骑逃至浇河（今青海贵德）。是役，乌孤俘斩数万，取西平，以田玄明为西平内史。接着，后凉乐都太守田瑶、湟河太守张稠、浇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于乌孤”。不久，又有后凉建武将军李鸾以兴城（在龙支堡东）降于乌孤。[25]而在青海乙弗部的杨轨、王乞基等亦率部众数千户归于南凉。[26]

这样，乌孤乘后凉衰弱之机，借郭黁、杨轨反后凉的变乱，取得了姑臧洪池岭南五郡之地。同年底，乌孤改称“武威王”，其目的是要夺取姑臧，取后凉而代之。

太初三年（399）正月，乌孤从廉川堡迁都至乐都，专力经营河湟地区，以为根本，[27]并以弟骠骑大将军、西平公利鹿孤镇安夷（今青海平安），车骑大将军、广武公傉檀镇西平，叔父素渥镇湟河（今青海

化隆南），若留镇浇河，从弟替引镇洪池岭南，洛回镇廉川，从叔吐若留镇浩亹（今青海大通）。此外，还以杨轨为宾客，其余汉族和其他族的豪门、俊杰之士，皆“随才授任，内居显位，外典郡县，咸得其宜”[28]。《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记载了一些所谓“夷、夏俊杰”之士：如“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赵振、郭韶、杨统前已叙及，其余容后再论。

乌孤迁都乐都和任命子弟、族人分镇各地，又量才叙用汉、夷各族豪门及俊杰之士，使南凉政权逐渐完善和巩固起来。乌孤召集群臣，商讨大计，说：“陇右区区数郡地耳！因其兵乱，分裂遂至十余。乾归擅命河南，段业阻兵张掖，虐氐假息，偷据姑臧。吾藉父兄遗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乌孤所云之“陇右区区数郡”，如《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正月条胡注所云：“汉时河西置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陇右置陇西、金城二郡。”“分裂至十余国”，已不可全考[29]，其中除南凉外，最大的割据政权有三，即西秦、后凉和北凉。此三国分处南凉的东、西、北三方，南凉欲据有河陇，则非灭此三国不可，故乌孤有此问。

杨统向乌孤献策，他首先分析了三国的现状，认为西秦乞伏乾归“本我所部，终必归服”[30]。北凉段业系一儒生，大权掌握在权臣（指沮渠男成、蒙逊）手中，政不由己，攻之路遥，粮运不济，且“与我邻好，许以分灾共患，乘其危弊，非义举也”。至于后凉，杨统认为，“吕光衰老，嗣绍（吕绍）冲暗，二子纂、弘，虽颇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临之，必应锋瓦解。宜遣车骑（即车骑大将军傉檀）镇浩亹，镇北（即镇北将军俱延）据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误之，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纂疲于奔命，人不得安其农业。兼弱攻昧，于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31]。杨统这番议论，不仅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而且指明了南凉的前途，得到乌孤的赞许，并以此为国策，以后继立的南凉统治者也基本执行了这一方针。

同年二月，段业称凉王，改元天玺，旋即遭后凉太子吕绍和吕纂的进攻。段业求救于乌孤，乌孤按既定的国策行事，遣弟利鹿孤、杨轨救

之。段业按兵不动，纂烧氐池（今甘肃山丹西南）、张掖谷麦而返。[32]六月，乌孤置凉州，以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征傉檀入录府国事。接着，乌孤因酒醉骑马受伤，笑曰："几使吕光父子大喜。"旋病重，遗命"方难未静，宜立长君"。国人立其弟利鹿孤。八月，利鹿孤即武威王位，迁都西平。他谨守乌孤所定国策，使南凉逐渐进入了兴盛的时期。

[1]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等。

[2]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等。

[3] 《晋书》卷一二三《吕光载记》。

[4]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5]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四《前秦》。

[6] 以上关于张大豫事，均见《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及《资治通鉴》卷一○六，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二月条。

[7]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校勘记［五］云："《御览》一二五引《后凉录》、《通鉴》一○六'太'作'大'。按，'太安'乃苻丕年号，此时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当是用丕年号，非自建元。故《魏书·吕光传》称光纪年始于麟嘉，不记建元太安事。"

[8] 均见《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及《资治通鉴》卷一○六，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十二月条。

[9] 均见《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及《资治通鉴》卷一○六，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十二月条。

[10] 《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八月条。

[11] 关于思复鞬的卒年，诸书未记，大约在公元386～397年之间。

[12]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13]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四云：廉川城"在镇（西宁）西南百二十里，汉破羌县地"。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廉川城下云："在甘肃碾伯县（今乐都）东。"考其方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述近似。

[14]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15] 见《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16]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南凉

录》。

[17] 见《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

[18] 金城在晋太元十三年（388）时为西秦乞伏乾归所据，并以为都城。可是，就在乌孤称西平王的前夕，吕光遣子吕纂攻拔西秦的金城，乌孤乘后凉在金城立脚未稳，一举攻夺金城。

[19]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20] 《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21] 以上见《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九，晋安帝隆安元年九月条。

[22]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23] 田胡，系胡之一种，属何族不详。又关于郭黁事，可参见《晋书》卷九五《郭黁传》。

[24] 《资治通鉴》卷一一○，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条。

[25] 以上所引均见《资治通鉴》卷一一○，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条。

[26] 见《资治通鉴》卷一一○，晋安帝隆安二年十一月条。

[27]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云："乌孤更称武威王。后三岁，徙于乐都"。此"后三岁"指乌孤称王后三年，即太初三年，非承上称武威王后三年。《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正月条记此事于太初三年正月，从之。

[28]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正月条。

[29] 吴士鉴《晋书斠注》卷一二六引《晋略》曰："其时称王者凉及西秦凡四，此言十余，盖统休官、掘叠、吐谷浑、乙弗、折掘诸部而言。"内掘叠应为叠掘，即折掘，《晋略》误。

[30] 杨统所说乞伏部原臣属秃发部，以后傉檀也曾提及（见《晋书·秃发傉檀载记》）。此事不见记载，估计当在秃发树机能统有凉州之时，威服各部，乞伏恰从漠北迁至高平川一带，归服于树机能，故杨统、傉檀有此说。

[31] 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32] 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第三章 南凉的兴盛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一 后凉的衰落与南凉的兴盛

秃发利鹿孤继立后，迁都西平，并遣记室监麴梁明[1]聘于段业，进一步加强与北凉的联盟，以对付后凉。而此时，后凉吕光病重，立太子吕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旋卒。吕纂与吕弘遂引兵入宫，吕绍自杀，纂即天王位，改元咸宁，以吕弘为大司马、录尚书事，改封番禾郡公。利鹿孤闻吕光之死和吕纂夺位，遣其将金树、苏翘[2]率骑五千屯于昌松郡的漠口（今甘肃武威西）[3]，以观后凉之变。

南凉太初四年（400）正月，秃发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延耆老，访政治”[4]。三月，后凉国内果然又发生变乱。吕纂忌弘功高势强，弘亦自疑，遂以东苑之兵攻纂，失败后欲投南凉利鹿孤，道经后凉广武时，为太守吕方所杀。至此，吕光死后，诸子争夺权力的斗争才暂告结束。

吕纂地位确立后，为了用建立军功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先后发动对南凉和北凉的战争。同年三月，吕纂将伐利鹿孤，其尚书令杨颖谏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国未有衅，不可伐也。”纂不听，于是率精锐士卒，进渡浩亹河（今青海大通河），至于三堆（今大通河南）。利鹿孤遣傉檀率军迎敌，军至三堆，见后凉军精锐，有惧色。傉檀下马据胡床而坐，士众稍安。后大败纂军，斩首二千余级。[5]就在后凉兴师动众进攻南凉的同时，南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次事变。原降乌孤的杨轨及西平内史田玄明，于西平密谋欲杀死利鹿孤，发动政变。五月，利鹿孤知杨轨等谋反，将两人处死。[6]到六月，吕纂又发动了对北凉的战争。出师前，后凉姜纪对纂说：“盛夏农事方殷，且宜息兵。今远出岭西，秃发氏乘虚袭京师，将若之何？”纂仍不听，率军进围张掖，西掠建康（今甘肃酒泉东）。果然，南凉秃发傉檀乘机率骑一万，袭姑臧。纂弟吕纬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朱明门（姑臧南门）上，鸣钟鼓，飨将士，又曜兵于青阳门（姑臧东门），俘八千余户而还。吕纂得报后，急返姑臧，傉檀已退兵。[7]总之，自吕光死后，诸子争立，加之吕纂两次战争的失败，使后凉更加衰弱；而南凉在这两次战争中均获得胜利，逐渐成为河西最强大的势力。

就在南凉建和元年，整个河陇的形势又发生了有利于南凉的变化。东晋太元九年（384），氐族姚氏建后秦（又称“东秦”），两年后建都长安。其后一直与据陇东的前秦苻登（苻坚族孙）争战，到后秦姚兴皇初元年（394）终于灭亡苻登。从此，后秦的势力开始进入陇右、河西，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后秦白雀二年（385）在陇西建西秦的乞伏鲜卑。南凉建和元年（400）五月，后秦姚兴遣征西大将军、陇西公姚硕德率军五万伐西秦，乞伏乾归溃败，西秦亡。乾归及其子炽磐率百骑至允吾（今甘肃皋兰西北），投南凉，利鹿孤遣傉檀迎之，处乾归于允吾西四十里的晋兴城，待以上宾之礼。西秦的灭亡自然对南凉的发展有利，但后秦势力的西进，对南凉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故南凉遣使后秦，表示臣属，以避其军锋。[8]后秦的西进，也打击了衰落的后凉。同年九月，后凉广武太守吕方降后秦，广武民无主，有三千余户投奔南凉利鹿孤。[9]不久，南凉的盟国北凉内部又发生动乱：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反，推李暠为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领敦煌太守，改元庚子。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凉，应李暠。史称李暠所建政权为西凉。北凉的分裂，无疑减少了南凉对日益强盛之北凉的畏惧。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南凉的对外、对内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对外方面，首先是在处置归降的原西秦王乞伏乾归父子的问题上，南凉镇北将军秃发俱延认为，“乾归本吾之属国，因乱自尊，今势穷归命，非其诚款，若逃归姚氏，必为国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间，使不得去。”可是，利鹿孤为了厚待乾归，以招降其他部落，不从。果然后秦兵退后，南羌梁戈等密招乾归，乾归将应之。其臣屋引阿洛密告南凉晋兴太守阴畅，畅驰告利鹿孤，利鹿孤遣弟吐雷率骑三千屯扪天岭（在允吾东南）。乾归即送子炽磐于西平，南奔枹罕，遂降姚兴。[10]

其次，对于西进的后秦，南凉君臣因其强盛，又远在关中，故表面臣属，企图借助其力，攻灭后凉，夺取姑臧。至于北凉，虽发生了分裂，但是同南凉一样，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日益衰落的后凉姑臧。随着形势的发展，它即与南凉发生冲突，由盟国变成了死敌。总之，南凉总的目标是占领姑臧，取河西之地，而它的对外政策也始终服从于这一总的目标，集中力量对付后凉。

在内政方面，利鹿孤也做了一些新的调整。建和二年（401）正月，由于整个形势变得对南凉有利，利鹿孤有些得意忘形，准备称帝，

群臣也皆劝进。独安国将军输勿崘力劝利鹿孤勿先称帝，以免成为众矢之的。他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11]输勿崘鉴于河陇诸政权未有一个称帝的，故曰“首兵始号，事必无成”；他建议采取“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的政策，就是将从事农业的晋人（即汉族）[12]安置在城市内外，督其务农，征其赋税，以供国家之用，而秃发部人则专从事征战。这种政策，十六国时期的许多少数民族所建政权都不同程度地采用着。利鹿孤采纳了输勿崘的建议，去武威王号，更称“河西王”，它表明利鹿孤有兼并整个河西之志。同时，利鹿孤还以弟傉檀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凉州牧、录尚书事。[13]

南凉内部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力图改变过去那种专以攻城掠地、不知绥抚的政策，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同年六月，利鹿孤接受祠部郎中史暠的建议，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4]上述利鹿孤的改革，对南凉政权的强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南凉内部进行改革的前后，后凉、北凉又先后发生内乱，两国臣僚、百姓多有投南凉者。先是南凉建和二年二月，后凉吕纂为弟番禾太守吕超所刺杀，超立从弟吕隆即天王位，国内乱。后凉右仆射杨桓（杨统从兄）投利鹿孤，利鹿孤以其为左司马；后凉将军姜纪亦降南凉。三月，利鹿孤乘机击后凉，败吕隆，徙二千余户而归。[15]后秦姚兴闻杨桓名，征其入长安，利鹿孤畏后秦之强，遣桓至长安。[16]北凉于同年四月，发生政变：沮渠蒙逊诬从兄沮渠男成谋反，假段业之手杀男成。五月，蒙逊杀段业自立。男成弟富占、将军俱傫率户五百降南凉利鹿孤。[17]

七月，在后凉魏安人焦朗的招引下，后秦姚兴遣硕德率骑六万向后凉进攻，南凉河西王利鹿孤摄广武守军以避之。后秦军队自金城渡过黄河，遂围姑臧。西凉、南凉、北凉各遣使奉表入贡于西秦。[18]八月，甚为傉檀所重的后凉降将姜纪，率数十骑叛南凉，投后秦硕德。[19]并说服硕德力取姑臧，“不然，今秃发在南，兵强国富，若兼姑臧而据之，

威势益盛”。硕德乃表姜纪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据晏然（在姑臧西北）。九月，姑臧城内的后凉王吕隆，资储皆竭，全城饥馑，终于降后秦，遣子弟及重臣为质于长安。硕德表隆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遂返长安。[20]

后凉吕隆虽降后秦，势力衰落，但并未亡国，仍留驻于姑臧。这种情况，使觊觎河西中心姑臧的南凉、北凉相继向姑臧进攻，都企图抢先占领姑臧。可是，北凉此时又发生内乱，沮渠蒙逊所领酒泉、凉宁二郡叛降西凉，蒙逊又见后秦攻占姑臧，于是遣使见硕德，请求率部东迁降后秦，后为部下所劝阻。为了自固，蒙逊遣子奚念为质于利鹿孤，以求援。利鹿孤以奚念年幼不接受，要蒙逊遣弟沮渠挐为质。十月，蒙逊遣使上疏利鹿孤，仍请求以奚念为质。利鹿孤怒，遣弟俱延、文支等率骑一万袭北凉，至万岁临松（今甘肃张掖南），执蒙逊从弟鄯善苟子，虏其民六千余户。后蒙逊遣从叔孔遮至利鹿孤处，许以挐为质。利鹿孤乃归所掠，召俱延等还。[21]这一事件是南凉与北凉由盟国变为敌国的开始，这是由于后凉衰落，双方争夺河西这一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两国交恶后，南凉处于绝对的优势，这就为它首先夺取姑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年十二月，后凉吕超攻后秦武威太守姜纪于晏然，不克；遂又攻魏安的焦朗。朗遣其弟之子焦嵩为质于利鹿孤，以请南凉派兵迎护。利鹿孤遣傉檀率军迎之，将至，吕超兵已退，焦朗闭门拒傉檀。傉檀怒，将攻城，为镇北将军俱延所劝阻。于是与焦朗连和，曜兵姑臧，屯于胡阬（在姑臧西）。傉檀知吕超必夜来偷袭大营，蓄火以待之。果然，城内吕超入夜遣将军王集率精兵二千偷营，深入营垒后，傉檀方内外举火，光照如白昼，杀王集及甲士三百余人。吕隆惧，遂伪与傉檀通好，请之于城内苑内结盟。傉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有埋伏，毁墙而入；吕超伏兵四起，俱延失马步走，赖凌江将军郭祖力战，方逃回大营。傉檀大怒，率军攻后凉昌松太守孟祎于显美（今甘肃武威东南），吕隆遣广武将军荀安国、宁远将军石可率骑五百救援，安国等惧傉檀兵强，遁还。[22]

南凉建和三年（402）正月，傉檀攻克显美，执昌松太守孟祎，并责其何不早降。孟祎以世受吕氏厚恩作答，傉檀即释之，拜为左司马，孟祎求速死，傉檀义而归之。[23]“徙显美、丽軒（今甘肃永昌西南）二千余户而归”。此时，姑臧城内大饥，斗米值钱五千，“人相食，饿死者

十余万口，城门昼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吕隆害怕人心浮动，尽坑杀之。[24]二月，北凉沮渠蒙逊企图抢先，发兵攻围姑臧，吕隆遣使求救于利鹿孤。南凉统治阶级内部意见不一致，尚书左丞婆衍崘说：“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野无青草，资食无取。蒙逊千里行师，粮运不属，使二寇相残，以乘其衅。若蒙逊拔姑臧，亦不能守，适可为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说：“崘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虽虚弊，地居形胜，河西一都之会，不可使蒙逊据之，宜在速救。”因此，利鹿孤即遣傉檀率骑一万救姑臧，军至，蒙逊已退兵。傉檀徙凉泽（即汉代的休屠泽，今甘肃民勤一带）段冢五百余家而还。[25]接着，利鹿孤采纳了中散骑常侍张融的意见，遣傉檀率军击潜通后秦的魏安焦朗兄弟，朗降，送于西平，徙其民于乐都。[26]这样，南凉基本上从三个方面控制了姑臧，等待时机以便一举占领该地。

同年三月，河西王利鹿孤病重，传令由弟傉檀继位，旋卒，葬于西平之东南。

二 极盛时期的南凉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秃发傉檀是南凉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位时期南凉政权达到了鼎盛的阶段，成为河西、陇右地区的霸主，但南凉的衰落和灭亡，也同样发生在他在位时期。他大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礼贤下士，史称他“少机警，有才略”，为父兄所器重。利鹿孤在位时，仅“垂拱而已，军国大事皆以委之”[27]。就是在十六国当中，傉檀也可算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可是，历史上封建史家对他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于《秃发傉檀载记》后评论说：“傉檀……武略雄图，比踪前烈”，“傉檀杰出，腾驾时英”，仅批评他“穷兵黩武，丧国颓声”。而元代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却认为，“秃发兄弟皆推傉檀之明略，余究观傉檀始末，未敢许也。又究观姜纪自凉入秦始末（见前述），则纪盖反覆诡谲之士，而傉檀爱重之，则傉檀盖以才辨为诸兄所重，而智略不能济，此其所以亡国也”[28]。到底应如何评价他？待我们叙述了南凉由鼎盛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历史之后，再加以讨论。

南凉建和三年三月，傉檀即位后，更河西王号为凉王，史称秃发氏政权为“南凉”，即由此而来。傉檀还由西平迁还都城于乐都，改元弘昌。时原西秦乾归子炽磐逃离南凉，至允街，傉檀归其妻子，放虎归山，遗患无穷，傉檀最后终为炽磐所杀。是年十月，傉檀曾攻后凉吕隆

于姑臧。[29]十二月，后秦姚兴遣使拜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北凉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西凉李暠为安西将军、高昌侯。[30]从后秦对三个臣属于它的河西政权首领的封号中，知南凉傉檀的地位和势力均在其他两个政权之上。因为傉檀为“公”，蒙逊、李暠均为“侯”。为此，蒙逊不悦，并对后秦使臣梁斐说：“傉檀上公之位，而身为侯者何也？”后在梁斐等的劝说之下，才受拜。[31]当时，河西三国仍深畏后秦之强，南凉、北凉虽急欲占据河西中心姑臧，可是仍不敢贸然出兵。南凉傉檀于此时修大城乐都，示无取姑臧之意。年底，后秦镇远将军赵曜率众二万西屯金城，建节将军王松匆率骑助吕隆守姑臧。松匆至魏安时，傉檀弟文真乘机击之，俘松匆等。傉檀大怒，送松匆等还长安，归罪文真，深自陈谢。[32]这一事件表明，南凉对后秦仍有畏惧，不敢贸然行事。同时，这件事也给后秦朝廷以震动，使之对南凉的势力及野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准备采取加强和巩固河西的措施。

南凉弘昌二年（403）七月，后秦谋臣对姚兴说：“（吕）隆藉先世之资，专制河外，今虽饥窘，尚能自支，若将来丰赡，终不为吾有。凉州险绝，土田饶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这时，南凉、北凉均积极图谋姑臧，促使姚兴采取了行动：遣使征吕隆弟超入侍长安。吕隆惧傉檀、蒙逊之逼，知于姑臧终无以自存，乃因吕超入侍，亦请入长安。姚兴遣尚书左仆射齐难率军四万迎吕隆于河西。傉檀则摄昌松、魏安二戍以避后秦军。八月，齐难等至姑臧，吕隆素车白马迎于道旁，后凉至此亡国。齐难以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以将军阎松为仓松太守、郭将为番禾太守，分戍两城；徙吕隆及其宗室、僚属及民万余家于长安。姚兴以吕隆为散骑常侍，吕超为安定太守。[33]

后秦军队撤回后，史称镇守姑臧的王尚“绥抚遗黎，导以信义，百姓怀其惠化，翕然归之。北部鲜卑并遣使贡款”[34]。这虽然是史家的溢美之词，但说明王尚比吕氏父子对百姓要好一些。这一切对于早已窥伺姑臧的南凉来说，自然是一个打击。但后秦中心远在关中，王尚孤军困守姑臧，外有强邻，也不是安稳太平的。为此，王尚采取结好南凉的策略，于同年遣主簿宗敞至南凉聘礼。宗敞是西州望族，有文才，西州人评论其才在杨桓之上。[35]敞父燮，原为后凉吕光湟河太守，后调任尚书郎，经广武时曾见傉檀，奇之，以“命世之杰”称誉，并托傉檀今后照顾其子敞等。至是，敞至南凉，与傉檀相处密切，傉檀视之为三国吴之鲁肃，极望宗敞助其完成河西的霸业。[36]

弘昌三年（404）二月，傉檀为了讨好后秦统治者，以密图姑臧，乃去年号，罢尚书丞郎官，遣参军关尚聘于后秦。据《晋书·秃发傉檀载记》的记载，姚兴见关尚责问道：“车骑投诚献款，为国藩屏，擅兴兵众，辄造大城，为臣之道固若是乎？”车骑，指傉檀，因其降后秦，被封为车骑将军；“辄造大城”，指上述傉檀修大城乐都事。关尚回答说：“王侯设险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卫众，预备不虞。车骑僻在遐藩，密迩勍寇，南则逆羌未宾，西则蒙逊跋扈，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姚兴听了关尚这一番巧言辩解，乃笑着说：“卿言是也。”关尚的言论，故然是向姚兴表白傉檀忠于后秦，设险造城均是为了守“国家重门之防”，以麻痹后秦统治者，但也说明南凉所处的地位并不巩固。接着，傉檀遣弟文支击南羌、北凉，破之。然后，傉檀上表姚兴，求凉州。姚兴不许，只是加傉檀散骑常侍，增邑二千户。[37]

过了两年（406），后秦因连年征战，势力渐衰，傉檀则加紧密图姑臧。六月，傉檀击北凉沮渠蒙逊，次于氐池（今甘肃民乐），蒙逊婴城固守。傉檀芟其禾苗，至于赤泉（在氐池北）而返。接着，傉檀即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头于姚兴，以邀功请赏。姚兴以为傉檀忠于自己，遂封之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姑臧”。即是说，后秦将凉州五郡之地（武威、番禾、西郡、昌松、武兴），付与南凉傉檀，征原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38]时有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见姚兴，请留王尚，兴不许。胡威痛哭流涕地说：“臣州奉国五年，王威不接，衔胆栖冰、孤城独守者，仰恃陛下威灵，俯杖良牧惠化。……今陛下方布政玉门，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资之𤞤狁，忠诚华族弃之虐虏！非但臣州里涂炭，惧方为圣朝旰食之忧。”[39]胡威这番话很有意思，它首先说明后秦之任王尚镇凉州，确是“孤城独守”，外临强敌，姚兴将凉州付与傉檀，有迫不得已的一面；其次，在胡威等凉州汉族的眼里，秃发氏一族仍然是“𤞤狁”（异族）、“虐虏”，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也正因为如此，凉州汉人不愿秃发傉檀占有凉州。姚兴听了胡威的话后，有些后悔，即遣西平人车普驰止王尚返长安，又遣使谕傉檀，但为时已晚。

傉檀此时已率军将抵姑臧，车普又先告傉檀。于是，傉檀急率骑三万至五涧（姑臧南），逼遣王尚。尚遣辛晁、孟祎、彭敏出迎，遂出姑臧清阳门（东门），傉檀镇南将军文支入凉风门（南门）。时王尚别驾

宗敞送尚还长安，傉檀对宗敞说，他得凉州三千余家，情之所寄，唯宗敞一人而已，为何又随尚返长安？宗敞回答说："今送旧君，所以忠于殿下。"傉檀又问"怀远安迩之略"，宗敞说："凉土虽弊，形胜之地，道由人弘，实在殿下。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陇之冠冕；裴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梁崧、赵昌，武同飞（张飞）、羽（关羽）。以大王之神略，抚之以威信，农战并修，文教兼设，可以从横于天下，河右岂足定乎！"对于宗敞推荐上述"贤俊之士"，傉檀嘉纳之，赐宗敞马二十匹。于是大飨群臣于谦光殿，班赐有差。[40]同年八月，傉檀还乐都，以弟兴城侯文真镇姑臧。至此，傉檀虽名义上臣属于后秦，"然车服礼章一如王者"[41]。为了联合与北凉对立的西凉，傉檀于九月遣使求好于西凉李暠，暠许之。十一月，傉檀即由乐都迁都至姑臧。[42]

从表面上看，傉檀自弘昌三年去年号，臣属于后秦，似乎南凉政权已不复存在，但事实上，南凉不仅借归降后秦保存了实力，而且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取姑臧"兵不血刃"，扩五郡之地，一时成为河西的霸主。然而，傉檀之取姑臧又成为他由盛转衰的起点。因为河西地区还有北凉、西凉和原西秦的割据势力，傉檀取姑臧无疑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加之南凉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逐渐尖锐，所以取姑臧后不到一年时间，南凉就很快走向衰弱。

[1] 按此麹梁明，疑即前述"文武之秀杰"的麹丞明。

[2] 此苏翘，即前述"秦雍之世门"的薛翘。

[3] 以上均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4] 《太平御览》卷一二六引《十六国春秋·南凉录》。

[5]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四年四月条。

[6] 见《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条。

[7]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四年六月条。

[8]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云："时利鹿孤虽僭位，尚臣姚兴。"

[9]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四年七月条。

[10]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四年七月条。

[11]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12]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十年（414）五月条胡注云："夷人谓华人为晋人。"

[13]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正月条。

[14]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六月条，"祠部郎中"作"西曹从事"。

[15]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三月条。

[16]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17]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五月条。

[18]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七月条。

[19]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七月条："初，凉将姜纪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广武公傉檀与论兵略，甚爱重之，坐则连席，出则同车，每谈论，以夜继昼。利鹿孤谓傉檀曰：'姜纪信有美才，然视侯非常，必不久留于此，不如杀之。纪若入秦，必为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纪，纪必不相负也。'"后纪果叛投后秦。

[20] 《晋书》卷一二二《吕隆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九月条。

[21]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十月条。

[22]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二月条。按《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仅记傉檀攻孟祎，未记傉檀援焦朗及吕隆偷营、会盟事，赖《资治通鉴》存之。

[23] 按《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云孟祎求死，"傉檀义而许之"，好像将孟处死。其实，应如《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元兴二年正月条所记是"义而归之"。

[24] 见《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等。

[25]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26]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元兴元年二月条。

[27]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28]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七月条胡注。

[29]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元兴元年十月条。

[30]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元兴元年十月条。又《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云：姚兴封蒙逊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判史、西海侯”，内“大”字疑误。

[31] 见《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32]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元兴元年十二月条；《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

[33]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二年七月条。

[34]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

[35]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文祖对姚兴语。

[36]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37]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38]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39]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等。

[40]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41]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42] 《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二年十一月条。

第四章 南凉的衰落与灭亡

一 由盛转衰的南凉

南凉弘昌五年（406），秃发傉檀取姑臧后，以宗敞为太府主簿、录记室事，进一步图谋达到据有河陇、扩展势力的目的。为此，他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前述结好西凉，以对付北凉就是其中之一。

后秦弘始九年（407），傉檀又遣使煽动已被后秦封为建武将军、行西夷校尉的原西秦乞伏炽磐叛后秦，炽磐斩其使送长安。[1]这样，傉檀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引起后秦的不满，树敌更多。八月，南凉开始集中力量向北凉进攻。傉檀首先袭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新得的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今甘肃武威西），遂入西陕（今甘肃山丹西），击北凉。沮渠蒙逊率军来迎，双方激战于均石（今甘肃张掖东），傉檀大败。蒙逊乘胜攻南凉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今甘肃山丹东南），傉檀率骑二万，运谷四万石以援西郡。蒙逊攻陷西郡，太守杨统降北凉。[2]十月，虽有后秦河州刺史羌族彭奚念降傉檀，但这种降附只是名义上的。

总之，傉檀自都姑臧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弊多利少。与远在敦煌立国的西凉结好，对北凉影响不大，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而过早地同后秦决裂及进攻北凉更是得不偿失了。

接着在十一月，南凉又“外有阳武之败，内有边、梁之乱”，逐渐由盛转衰。

所谓“阳武之败”，是指傉檀为夏国赫连勃勃击败于阳武下峡（在今甘肃靖远），损失惨重。战争经过大致如下：南凉弘昌六年（407）十月，据有今陕北、宁夏的铁弗匈奴赫连勃勃兴起，袭杀后秦高平公没奕于，据高平（今宁夏固原），自称大夏天王，建夏国。勃勃求婚于傉檀，遭到拒绝。十一月，勃勃即率骑二万向南凉发动进攻，至南凉广武郡的支阳（今甘肃永登南），杀伤万余人，驱掠民二万七千口、牛羊马数十万头而还。傉檀率大军追击，其下焦朗对傉檀说：“勃勃天姿雄骜，御军齐肃，未可轻也。今因抄掠之资，率思归之士，人自为战，难与争锋。不如从温围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

也。”傉檀另一将贺连发怒道：“勃勃以死亡之余，率乌合之众，犯顺结祸，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财宝若山，窘弊之余，人怀贪竞，不能督厉士众以抗我也。我以大军临之，必土崩鱼溃。今引军避之，示敌以弱。我众气锐，宜在速追。”傉檀盛气轻敌，不采取焦朗较为稳妥的必胜之策，反从贺连之计，并下令：“吾追计决矣，敢谏者斩！”勃勃见傉檀率军追击，遂于阳武下峡凿冰埋车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中勃勃右臂。勃勃返军逆击，大败傉檀，追奔八十余里，杀伤万计，斩其大将十余人，以为京观，号“髑髅台”，还于岭北。[3]傉檀仅率数骑奔南山（枝阳之南山），几为追骑所俘获。

傉檀败还姑臧后，据《晋书·秃发傉檀载记》云：“傉檀惧东（指夏国赫连勃勃）西（指北凉沮渠蒙逊）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国中骇怨。”城内屠各成七儿乘机率其所属三百人反于北城，推梁贵为盟主，贵闭门不应，但得到不少群众的支持，一夜之间众至数千。后在殿中都尉张猛的威胁之下，众奔散，成七儿逃奔晏然。此时，军谘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等七人也乘机反傉檀，皆为傉檀所杀。[4]这就是南凉史上所谓的“边、梁之乱”，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约，详情已不得而知。

南凉经阳武之败和边、梁之乱后，内外受困，势力渐衰。这正如元代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三年十一月条注中所说：“自是之后，秃发氏之势日以衰矣。”因此，我们把此年十一月作为南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至次年（408）五月，后秦姚兴见南凉内外多难，有乘机取傉檀之意，遂先遣尚书郎韦宗至姑臧以观虚实。韦宗为傉檀的才辩所折服，推之为“神机秀发”“一代之伟人”，比之于由余、日磾。[5]返长安后，韦宗对姚兴说：“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华未颓；傉檀权诈多方，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姚兴不信，说道：“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韦宗答曰：“形移势变，终始殊途，陵人者易败，自守者难攻。阳武之役，傉檀以轻勃勃致败。今以大军临之，必自固求全，臣窃料群臣无傉檀匹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其利。”姚兴不从，乃遣子广平公姚弼、后将军敛成、镇远将军乞伏乾归等率步骑三万击傉檀，左仆射齐难率骑二万攻赫连勃勃。吏部尚书尹昭复谏兴曰：“傉檀恃其险远，故敢违慢；不若诏沮渠蒙逊及李暠讨之，使自相困毙，不必烦中国之兵也。”姚兴亦不听。

在进攻南凉之前，姚兴先给傉檀一信，内云：“遣尚书左仆射齐难讨勃勃，惧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这是后秦用防止勃勃西逃为口实，以掩护其进攻凉州傉檀之计。傉檀中计，遂不设备。姚弼大军济自金城，姜纪向弼献策说：“今王师声言讨勃勃，傉檀犹豫，守备未严，愿给轻骑五千，掩其城门，则山泽之民皆为吾有，孤城无援，可坐克也。”弼不从，率大军先至漠口（在昌松郡），南凉昌松太守苏霸闭城扼守，弼劝降不果，攻拔昌松城，杀苏霸，然后长驱直至姑臧。傉檀婴城固守，出奇兵击败姚弼，后秦军退据西苑。此时，城中人王钟、宋钟、王娥等密为后秦军内应，为傉檀所执。在前军将军伊力延侯的劝说下，傉檀尽杀内应者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又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后秦敛成纵兵虏掠，傉檀乘机遣镇北将军俱延、镇军将军敬归等击之，大破后秦军，斩首七千余级。姚弼固垒不出，傉檀攻之不克，乃断水上流，欲困死后秦军。会天降大雨，弼军乃复振。七月，姚兴闻弼败，遣卫大将军姚显率骑二万赴援，至高平（今宁夏固原），闻弼被困，倍道赴姑臧，遣射将五人挑战于凉风门，为傉檀材官将军宋益所击斩。姚显乃委罪于敛成，遣使谢傉檀，引兵还。傉檀也遣使者徐宿至长安谢罪。[6]与此同时，后秦齐难军也为夏国赫连勃勃所击溃，难被俘，“于是岭北（指今礼泉县九嵕山以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万数，勃勃皆置守军以抚之”[7]。

后秦对南凉的战争，傉檀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损失较大；而后秦的失败，对其本国的损失和影响，则远不及齐难为勃勃败后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后秦在河陇地区势力的衰弱，为陇西原西秦乞伏氏的复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乞伏氏的复起，无疑对南凉更为不利。可是傉檀君臣因这次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同年十一月复称凉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为王后，世子武台（虎台）为太子，录尚书事，“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倖为尚书左、右仆射，镇北俱延为太尉，镇军敬归为司隶校尉，自余封署各有差”[8]。这样，坐守姑臧的南凉复称王建号，四面树敌，遂成为四周邻国攻击之目标。

南凉嘉平二年（409）二月，因后秦的衰弱，原西秦乞伏炽磐克枹罕，遣人告乾归，乾归即从后秦逃还苑川。七月，乾归复国，号秦王，改元更始。在西秦复国的最初几年里，因为忙于巩固内部和扩展地盘，还无力与南凉争雄，但它的强大无疑对南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南凉对复国的西秦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对策，而是不顾国内的经济实力，不断与西边的北凉争战，把国家的强盛寄托在对邻国的掠夺之上。大约在此

年底，傉檀即遣左将军枯木、驸马都尉胡康击北凉，掠临松人千余户而还。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显美方亭，破属南凉的河西鲜卑车盖部，徙数千户而去。[9]

嘉平三年（410）初，傉檀又遣太尉俱延率军击蒙逊，大败而还。三月，傉檀不听左仆射赵晁及太史令景保的劝谏，率骑五万击蒙逊，双方大战于穷泉（在昌松郡西），结果被蒙逊打得大败，单骑奔还。蒙逊进围姑臧，城内外百姓鉴于前年后秦军围姑臧，王钟等五千人悉被杀的教训，皆惊散，各族人众万余户降蒙逊，其中包括属河西鲜卑的叠掘、麦田、车盖等部。[10]傉檀惧，遣使请和，蒙逊要求人质，傉檀遣司隶校尉敬归及子秃发他为质，蒙逊许之。后敬归逃还，秃发他为追兵所执，蒙逊徙南凉八千余户而归。[11]接着，南凉祸不单行，国内又发生叛乱：傉檀右卫将军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今青海西宁北川西北）以叛。[12]傉檀外惧蒙逊所逼，内虑奇镇克洪池岭南，于是从姑臧迁回乐都，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傉檀一离姑臧，城内焦谌、王侯等即闭城反，收合三千余户，保姑臧南城。推焦朗为大都督、龙骧将军，谌为凉州刺史，降于北凉。而此时镇军将军敬归击奇镇于石驴山，战败而死。[13]自南凉弘昌五年（406）傉檀据有姑臧，并以为国都，仅隔五年，就因北凉的进攻和内部变乱而放弃姑臧，复都乐都。

嘉平四年（411）二月，北凉沮渠蒙逊攻姑臧之焦朗，拔其城，执朗而释之，以弟沮渠挐为秦州刺史，镇姑臧。[14]接着，蒙逊即以克姑臧之威，进攻乐都。傉檀遣安北将军段苟、左将军云连乘虚出番禾袭北凉军后，徙三千余家于西平。蒙逊围乐都三旬不克，遣使至城内，说若以宠子为质，即退兵。傉檀不愿，但在群臣的固请下，方以子安周为质，蒙逊始退兵。[15]这时，南凉南边的吐谷浑树洛干部的势力有所发展，树洛干乘北凉围乐都之际，率众进攻南凉浇河郡地，傉檀遣太子武台拒战，为树洛干击败，浇河之地旋为吐谷浑所夺取。[16]

傉檀连遭失败，但并不吸取教训，仍欲集大军进攻北凉，邯川（今青海尖札附近）护军孟恺竭力劝谏，不听。于是，分军五道俱进，至番禾、苕藋（今甘肃永昌附近），掠五千余户。将军屈右对傉檀说：“陛下转战千里，前无完阵，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师，早度峻险。蒙逊善于用兵，士众习战，若轻军卒至，出吾虑表，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之道也。”傉檀听不进屈右的劝告，却轻信卫尉伊力延所谓“若倍道旋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的意见，结果为蒙逊追兵所及，时昏雾

风雨，傉檀大败而还。蒙逊再次围攻乐都，傉檀以子染干为质，蒙逊乃率军返。[17]

这时，日益强盛的西秦乞伏氏逐渐占据了陇西地区，也开始向南凉进攻。同年七月，河南王乞伏乾归遣子炽磐及中军将军审虔进攻南凉。八月，炽磐率军从金城渡过黄河，与南凉太子武台逆战于洪池岭南，南凉兵败，炽磐掠牛马十余万而还。[18]至嘉平五年（412）四月，乞伏炽磐又攻破南凉三河太守吴阴于白土（今青海循化），以乞伏出累代之。[19]六月，西秦发生变乱，乾归为其兄子乞伏公府所杀，炽磐追杀公府，于八月自称河南王，稳定了局势。至此，南凉西北的北凉、东边的西秦和南边的吐谷浑，先后夺取南凉武威、番禾、武兴、西郡、昌松、三河、兴晋（治枹罕）、浇河等郡地，南凉仅余湟水流域的西平、乐都、湟河、晋兴、广武五郡之地，艰难地挣扎着。

到嘉平六年（413），衰弱的南凉政权仍然兴师动众，力图解除来自西北方的北凉的侵逼。年初，傉檀遣安西将军纥勃耀兵西境。蒙逊率军进至西平，徙户掠牛羊而还。[20]此时，傉檀弟、湟河太守文支日益腐化，不恤政事，邯川护军孟恺上表诉之，傉檀召文支责训，于是文支有叛离之心。接着，邯川人卫章等欲谋杀护军孟恺，投西秦。后孟恺杀卫章等四十余人，文支亦遣将军匹珍赴援邯川，西秦军见匹珍军至，旋引去。[21]四月，傉檀又率军攻北凉，蒙逊败之于若厚坞（在乐都附近），再败之若凉，乘胜第三次围乐都，攻二旬，不克。此时，南凉湟河太守文支及护军成宜侯等率众降蒙逊，蒙逊封文支为镇东大将军、广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为振威将军、湟川太守，以殿中将军王建为湟河太守，[22]徙五千余户于姑臧。接着，蒙逊又攻围乐都，傉檀以其弟太尉俱延为质，蒙逊乃退。[23]北凉取湟河郡后，南凉的国土被强邻分割，仅余下西平、乐都二郡及晋兴、广武部分地区，面临着灭亡的危险。

二 南凉的灭亡及其原因

南凉嘉平七年（414）四月，仅保有湟水流域一隅之地的南凉，面临着“连年不收，上下饥弊，南逼炽磐，北迫蒙逊，百姓骚动，下不安业”的困境。[24]适逢聚居青海湖一带的乙弗、契汗等部叛南凉，傉檀即欲击乙弗、契汗等部，掠牲畜以解国内饥馑。孟恺劝谏说：“今远征虽克，后患必深，不如结盟炽磐，通籴济难，慰喻杂部，以广军资，畜力

缮兵，相时而动。”傉檀不听，谓太子武台说：“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逊近去，不能卒来，旦夕所虑，唯在炽磐。彼名微众寡，易以讨御，吾不过一月，自足周旋。汝谨守乐都，无使失坠。”傉檀虽然也认识到远征乙弗，“旦夕所虑，唯有炽磐”，然而他却过低地估计了西秦的实力，所以执意要行。他率骑七千袭乙弗，大破其部，获马牛羊四十余万。就在这时，炽磐果然率骑二万乘虚袭乐都。武台凭城固守，炽磐四面围攻。

乐都城内，抚军从事中郎尉肃向武台建议：“今外城广大，难以固守，宜聚国人（指秃发氏部族）于内城，肃等率诸晋人（指汉人）距战于外，如或不捷，犹有万全。”武台说：“小贼（指炽磐）蕞尔，旦夕当走，卿何虑之过也。”武台既有这种轻敌的思想，又害怕晋人有二心，乃召汉族豪望有勇谋者闭于内城，其中甚至包括忠于南凉的邯川护军孟恺在内。孟恺哭着向武台说：“炽磐不道，人神同愤。恺等进则荷恩重迁，退顾妻子之累，岂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台不听，结果只一旬城即溃，乐都以西至西平诸城皆降于炽磐。炽磐又遣平远将军犍虔率五千骑追傉檀，徙武台及其文武、百姓万余户于枹罕。[25]

六月，南凉安西将军樊尼（乌孤子）从西平逃奔傉檀。傉檀自知无力回救乐都，只好对部众说：“今乐都为炽磐所陷，男夫尽杀，妇女赏军，虽欲归还，无所赴也。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者，是所望也。不尔，归炽磐便为奴仆矣，岂忍见妻子在他（人）怀抱中！”遂率军而西，途中部众多逃散。傉檀遣镇北将军段苟追逃众，苟去而不返。于是将士皆散，唯余樊尼及中军将军纥勃、后军将军洛肱、散骑侍郎阴利鹿等人。傉檀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叹息道：“蒙逊、炽磐昔皆委质于吾，今而归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广，匹夫无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逊与吾名齐年比，炽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势皆不济。与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一万，蒙逊方招怀遐迩，存亡继绝，汝其西也。纥勃、洛肱亦与尼俱。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此时，傉檀把希望寄托在樊尼身上，要他领纥勃、洛肱西降蒙逊，自己则降西秦。时跟随傉檀者，仅阴利鹿一人。傉檀至西平，炽磐遣使郊迎，待以上宾之礼。[26]

乐都城溃后，南凉诸城皆降于西秦，唯浩亹城守将尉贤政固守不下。炽磐采取各种方式，甚至叫武台以手书招降，也无济于事。后尉贤政闻傉檀降，已至左南（今青海循化），才降。七月，炽磐以傉檀为骠

骑大将军，封左南公，年底，即为炽磐所毒杀，时年五十一岁，在位十三年。其子武台，后也为炽磐所杀。[27]现青海西宁城西杨家寨还留存传为秃发傉檀出兵誓师处，取其子虎台为名，台九层，高九丈八尺（见图二）。[28]



图二 青海西宁虎台遗址

（摘自芈一之主编《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图版16）

南凉自秃发乌孤于公元397年建国，至414年灭于西秦，共历三主，十八年。其中傉檀在位就有十三年，其兄利鹿孤在位的三年中，军国大事皆委之于傉檀，所以傉檀主南凉军政至少十五年，南凉政权的兴衰与傉檀的关系至为密切。

综观秃发傉檀一生的政绩，我们认为他在十六国时还是一个比较杰出的人物，前引《晋书》撰者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史称他“少机警，有才略”，“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以致使后秦使臣韦宗发出了“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的感慨。这一切都说明傉檀的汉族文化修养之深。他能够网罗和重用汉族俊杰之士，思贤如渴，这在十六国各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中，是十分突出的。如《晋书·秃发傉檀载记》所记，他对姜纪、孟祎、宗敞等汉族俊杰之士的态度，就是明证。《晋书》撰者称赞他“武略雄图，比踪前烈”，虽有些过誉，但从其制定的对内、对外的政策及历经的战役来看，确可以算是十六国时一个较杰出的人物。

南凉建国后，主要活动的地区在湟水流域，这里与陇西、河西走廊比较起来，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以后，南凉虽取得姑臧等地，可是当时凉州武威等郡也因后凉的覆亡而凋弊。傉檀即位后，以湟水流域为基地，利用邻国之间的矛盾，采取较为正确的策略，“摧吕氏算无遗策，取姑臧兵不血刃”，[29]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在军事上，傉檀亲自指挥的战役很多，除后期与夏国的阳武之战，与北凉的均石、穷泉之战失败之外，其余战役皆胜。特别是对后凉吕隆及后秦姚弼之战，表现了他的军事才干。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军事家都不是常胜将军，总有失误之处。傉檀因轻敌和不接受臣下正确的意见，多次遭到失败，这固然与他本人有关，也与南凉后期力量衰弱，后方不稳有关。胡三省抓住傉檀“礼贤下士”后出现的乾归父子、姜纪等的反叛，以及多次战役的失败，说“傉檀之才辩，内足以欺其父兄，外足以欺敌人之觇国者，而卒以败亡者，轻用兵也”[30]。这种全盘否定傉檀的说法，是有失公允的。

过去封建史家均一致指出：南凉傉檀由盛转衰，以致最后丧身亡国，是由于他“穷兵以逞其心，纵慝自怡其弊”，是“轻用兵”之过。《晋书》卷九五《艺术·昙霍传》还记载一则故事，云沙门昙霍曾对傉檀讲：“若能安坐无为，则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穷兵好杀，祸将及己。”傉檀不从，以致亡国丧身。总之，封建史家皆把南凉的衰亡原因，归结为傉檀的“穷兵黩武”。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南凉的邻国北凉、西秦同南凉一样，也是连年征战，不亚于穷兵黩武的南凉，可是它们的政权为什么能比同时的南凉长久得多呢？可见，南凉衰亡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傉檀的“穷兵黩武”。

那么，南凉衰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在于南凉本身的社会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又因南凉统治者对外的战争而更加尖锐，以致在南凉灭亡前几年，形成多年不种、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的危局。最后终于众叛亲离，迅速走向灭亡。

南凉建国后不久，利鹿孤采纳鍮勿崘的建议，强迫晋人（汉族）在诸城内外进行农业生产，以供整个国家开支，而秃发部人则专从事征战，开疆拓土，以掠夺更多的人口，为其奴役。这样，南凉社会上形成了以秃发氏军事贵族为首的统治阶级和广大晋人及被役属的其他部落的被统治阶级，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南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既是阶级矛盾，也带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两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由

于秃发氏贵族的连年征战，日益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必然引起他们的反抗。史籍所载姑臧城内屠各成七儿及汉族王钟、宋钟、王娥等先后反南凉就是最好的例证。秃发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反抗采取极为残酷的镇压手段，曾一次尽杀起义群众五千余人。以后，当蒙逊再次进攻姑臧时，城内外百姓鉴于秃发统治者的暴虐，皆惊散，最后使南凉统治者不得不退出了姑臧。南凉后期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战争的失败，反过来又使南凉领土日削，人口减少，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于是南凉统治者又企图以战争去掠夺更多的人口，增加剥削的对象，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一直到南凉灭亡为止。

除了社会制度本身决定南凉统治者要不断发动掠夺战争之外，当时河西的客观形势也迫使南凉不断进行战争。南凉占领姑臧之后，先后与北凉、夏、后秦、西秦等发生战争，除南凉为摆脱北凉侵逼，主动向北凉进攻而外，其余战争都是邻国统治者率先向南凉进攻，南凉即便不想打仗，也不可得。所以，把南凉衰亡的主要原因完全归于南凉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是不够确当的。

三 南凉灭亡后秃发鲜卑的分散及汉化

南凉为西秦灭亡后，傉檀及其子武台等降西秦，原秃发氏部众大部分也当为西秦所统治。后傉檀、武台虽然先后为西秦所杀，但在西秦仍有不少的秃发氏部众，如后凉麟嘉四年（392），率二万户降乞伏乾归的秃发如苟，乾归以宗女妻之，[31]还有炽磐的王后秃发氏，西秦西平太守秃发赴单（乌孤子）[32]等。至西秦永弘元年（428），西秦为夏赫连定所灭，赫连定又为吐谷浑所亡，西秦领土大部分入于吐谷浑，以后又为北魏所占有。在陇西、河湟的乞伏鲜卑、秃发鲜卑最终与北魏拓跋鲜卑一起汉化了。至今在青海西宁还留存有秃发氏的后代。[33]

秃发鲜卑另一部分贵族和部民投归了河西的北凉。如前述的傉檀弟、南凉湟河太守文支，傉檀兄子樊尼等。傉檀子保周、破羌（即源贺），俱延子覆龙，利鹿孤孙副周，乌孤孙承钵等，在南凉亡后，亦皆奔北凉。后北凉亡于北魏，故在河西的秃发氏先后又归北魏统治。魏封保周为张掖王、覆龙为酒泉公、破羌为西平公、副周为永平公、承钵为昌松公。[34]其中破羌，魏太武帝因见之而赐姓名，曰源贺。《魏书》卷四一有《源贺传》，云太武帝谓“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后源贺从太武帝击灭北凉，有功进号西平公，拥戴文成帝拓跋濬即

位，进爵西平王，死后“赠侍中、太尉、陇西王印授”。源氏一族在北魏十分显赫，其族也随拓跋鲜卑贵族一起汉化了。至唐代，源贺的后代源乾曜曾相玄宗，[35]此时的源氏已与汉族官僚没有丝毫差别了。源贺一族的汉化过程，也代表了一般先投北凉、西秦，后又归北魏的秃发氏贵族汉化的情况。

此外，在中国史籍上还有两种关于秃发氏下落的说法。

一是《新唐书·吐蕃传上》在记吐蕃来源时，说：“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为乞佛（伏）炽磐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依此说，中国西南西藏高原上的藏族，或藏族历史上的吐蕃王族，原是由秃发樊尼率众渡过黄河，逾积石山（大积石山），征服当地羌族，最后成为唐代的吐蕃。这仅是《新唐书》的编纂者所记吐蕃来源的一种传说。其实，编纂者自己也不同意这一说法。该书一开始就较为肯定地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即是说，吐蕃源于西羌中的发羌、唐旄，这才是《新唐书》编纂者的看法。近现代中外有关的论著，多据《新唐书》，认为吐蕃源于发羌（发，读作bō）。对于吐蕃源于秃发樊尼说，中外学者均不赞同，甚至根本没有提及。秃发樊尼在北凉亡后，有可能南奔青海一带的羌族之中，但不可能远到今西藏地区为王，形成为唐代的吐蕃。因为藏族在体型、语言、风俗习惯上皆与秃发鲜卑相异，这是显而易见的。[36]之所以产生这种传说，可能是“秃发”与“吐蕃”的名称读音相近而附会的。如前所述，“秃发”即“拓跋”，鲜卑语，有鲜卑父胡母所生子的含义，而“吐蕃”，系藏语，即“大蕃”之意，蕃（bod）是藏人自称，与“秃发”毫无关系。

二是《新唐书·党项传》内云，党项“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故有细封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强”。目前，国内许多有关西夏和党项的论著中，认为党项中的“拓拔氏”，就是建立北魏的拓跋氏鲜卑。他们的论据之一，就是说与北魏拓跋氏同源的秃发樊尼，在北凉亡后，率部进入今青海、甘南一带的羌族聚居地，同化于羌，形成党项羌中的拓拔氏。关于党项拓拔氏是否源于鲜卑拓跋氏的问题，是近代中外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上所述，秃发樊尼后来进入羌族聚居之地是可能的，但其是否形成党项羌中的拓拔氏，

则史籍中还未找到证明。党项拓拔氏后来建立西夏政权，自称自己祖先源于北魏拓跋氏，并未提到秃发樊尼之事。何况西夏统治者的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一种伪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37]总之，迄今为止，尚无较为确凿的史籍可以证明党项拓拔氏源于北魏拓跋氏或南凉秃发氏，故此说难以成立。

[1] 《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三年七月条。

[2]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三年九月条。

[3] 见《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4]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等。

[5]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由余，西戎人，因为秦出谋划策，使秦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金日磾，匈奴休屠王之后代，归汉朝后，为汉名臣。

[6] 关于这次战争所引资料，均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四年条等。

[7] 《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四年七月条。

[8]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据《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四年十一月条胡注："武台，本名虎台，唐人作晋书，避唐祖讳，改'虎'为'武'，通鉴因之。"

[9]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按《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三月条记："初，南凉王傉檀遣左将军枯木等伐沮渠蒙逊……"据此知此事大约发生在义熙五年末六年初。

[10]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11]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12]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13]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14] 《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二月条。

[15]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二月条。

[16]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内仅云武台为树洛干所败，从同书《乞

伏炽磐载记》记后二年（413）西秦破树洛干于浇河看，此役树洛干败武台后，即取南凉之浇河。

[17]《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又《太平御览》卷三二六引《十六国春秋》“屈右”作“窟古”。

[18]《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八年条。

[19]《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八年条。

[20] 此事仅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但未记时间，按其所记推算，此事当发生在嘉平六年初。

[21]《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22]《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23]《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24]《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孟恺对傉檀语。

[25] 以上均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等。

[26] 以上均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等。

[27]《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等。

[28] 见芈一之主编《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重庆出版社，1995，第170页。

[29] 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附史臣言。

[30]《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四年五月条胡注。

[31]《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32]《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十年五月条。

[33] 见《南凉王墓——小圆山儿》，《青海日报》1983年6月14日。

[34]《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十年七月条。

[35]《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源氏条。

[36] 关于藏族族源的问题，因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故略而不论。

[37] 关于党项拓拔氏的来源及族属问题，当另文论述，此不赘。

第五章 南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 南凉的政治制度

南凉政权是由塞外迁入河西地区的秃发鲜卑所建立，从秃发鲜卑在曹魏末年迁入河西，与汉、羌等族杂处，直到建立政权，共一百三十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秃发部虽然保存了自己民族的共同体，没有被他族所融合、同化，但是他们仍终深受河西汉族文化的影响。南凉建国的地区在河西（主要是河湟地区），这里的居民自秦汉以来，主要是汉、羌等族，秃发氏要统治这些民族，以解决汉、羌等族先进的封建制度与本族落后的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制度的矛盾，就必然逐渐采取与之相应的政权形式。这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此外，南凉政权是从氐族吕氏所建后凉政权中分裂出来的，因此后凉以及西秦、后秦等政权的政治制度，也必然对它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些政权基本上沿袭了汉魏以来汉族所建政权的形式。因此，南凉政权也基本上是一个汉化了的封建政权，其政治制度是承袭了汉魏以来的旧制，而略有损益。

在晋泰始年间，秃发树机能反晋，据有凉州之地，史籍未记其建立什么政权机构，仍然是鲜卑旧俗，称首领为“大人”，或译作“部帅”等。到4世纪90年代秃发乌孤时，采取“养民务农，循结邻好”的政策，接受后凉吕光封号，史籍称其部下为“将”或“帅”，有“左司马”（赵振）官号的出现，说明乌孤接受后凉“广武侯”的封爵，设置属吏长史、司马之属。后凉龙飞二年（397）乌孤正式建立政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从这些称号看，基本上为汉魏以来的官号，唯其中“大单于”之号仍是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说明在乌孤建立政权初，官制中还残留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称号。可是，到了南凉后期，“大单于”之号不复见，而其政治制度也日趋完善。

清代缪荃孙曾撰《南凉百官表》（见《二十五史补编》），对南凉官制作了一番整理、排比的工作，但该表系按年代排列，不易窥其全貌，且有一些错误和遗漏之处。为了便于探讨南凉官制的渊源及全貌，下面我们根据史籍所载南凉职官的特点，分中枢、军事、地方三个方

面，加以探讨。

（一）中枢之官

太尉 此官见于南凉后期，嘉平元年（408）傉檀以原镇北将军俱延（傉檀弟）为太尉。太尉，最早设置于秦、汉，魏、晋因之。《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云：“太尉、司徒、司空，并古官也。自汉历魏，置以为三公。及晋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主要掌四方之兵事。

录尚书事 利鹿孤曾于南凉建和二年（401）任弟傉檀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凉州牧、录尚书事”；南凉嘉平元年（408）傉檀以世子武台录尚书事。“录尚书，案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每少帝立则置太傅录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己之义，薨辄罢之。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2]

尚书左、右仆射 傉檀曾以赵晁为左仆射，郭倖为右仆射。仆射，秦始置，汉置一人，至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始分置左、右仆射，魏、晋因之。晋仆射服秩印绶与尚书令同，秩千石，假铜印墨绶。东汉尚书仆射为尚书令助手，职权渐重。[3]

尚书左丞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记有“尚书左丞婆衍崘”。《晋书·职官志》云：尚书“左右丞，自汉武（应为‘成’——作者）帝建始四年（前29）置尚书，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减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盖自此始也。自此至晋不改。晋左丞主台内禁令，宗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急假（《御览》卷二一三引《晋书·百官表志注》作‘给假’）”。

祠部郎中 南凉有“祠部郎中史暠”。按，祠部为魏晋以来尚书省列曹尚书之一。“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恒置，以右仆射摄之，若右仆射阙，则以祠部尚书摄知右事。”[4]郎中，在魏晋南北朝，为尚书曹司的长官。

以上从录尚书事至祠部郎中，是属汉魏以来中枢的尚书省（尚书台），史籍中虽然只见南凉有尚书省个别的职官，但《晋书·秃发傉檀载记》云傉檀密图姑臧，去年号，“罢尚书丞郎官”，可见南凉是置有汉魏以来尚书省职官的。

中散骑常侍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记南凉有“中散骑常侍张融”。据《晋书·职官志》记：“散骑常侍，本秦官也。……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南凉中散骑常侍即魏晋之中常侍。

散骑侍郎 南凉有“散骑侍郎阴利鹿”。《晋书·职官志》云：“散骑侍郎四人，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

以上两员，属汉魏以来中枢的“门下省”职官，掌奏事，值侍左右，应对献替，主要官员是侍中。不见南凉有侍中之职，其是否设有门下省，则不得而知。

卫尉 南凉有“卫尉伊力延”[5]。《晋书·职官志》记：“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皆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员”，“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

大司农 南凉有“大司农成公绪”。据上引《晋书》，大司农为列卿之一，“统太仓、籍田、导官三令，襄国都水长，东西南北部护漕掾”，即主要是管理农业、水利、漕运的官员。

博士祭酒 南凉建和二年（401）利鹿孤从祠部郎中史暠之请，“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晋书·职官志》记：“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278），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而南凉所置博士祭酒，可能系仿晋初“国子祭酒、博士”之职官，并称为博士祭酒，掌职同。

国纪祭酒 前引《史通·史官篇》云：“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按晋以前历代史官之名，如秦汉时的“太史”或“太史公（令）”，东汉时的“兰台令史”，魏晋时的“著作郎”“秘书监著作郎”等，均无“国纪祭酒”之名。此名乃南凉所始置。[6]

太史令 南凉嘉平三年（410）傉檀欲征北凉，有“太史令景保”用天文星象劝谏，傉檀不听，结果大败而还，后封景保为安亭侯。[7]按太史令一职，秦汉均置，主要是编写史书的史官。魏晋以后，以编写史书之任专属“著作郎”，太史令则专掌历法、天文。南凉太史令当同魏晋同名

官职之掌职。

记室监 南凉有“记室监麹梁明”。《晋书·职官志》载：“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秩千石；从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记室督各一人。”疑南凉初期的记室监，即仿魏晋位至主公等下所置之“记室督”。

军谘祭酒、辅国司马 傉檀取姑臧后，仍臣属后秦，阳武败后，姑臧城内有军谘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之乱。时傉檀被后秦封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如此，则上引《晋书·职官志》所云诸公及开府领兵加兵者，增置有司马、祭酒等员，南凉军谘祭酒、辅国司马当为时傉檀下属官。

太府主簿、录记室事 傉檀取姑臧后，以宗敞为“太府主簿、录记室事”。按《周礼》：“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人，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唐六典》卷二○太府寺卿职曰：“秦汉已下，不置其官，其职并于司农少府。梁天监七年，始置太府卿，掌金帛府帑。”太府有主簿，《通典》卷二六太府卿条云：“主簿，亦周官太府下士之任，自后无闻。梁置一人，陈因之，后魏亦然，隋置四人，大唐因之，减一人。”则南凉宗敞所任太府主簿当源于周官。所谓“录记室事”，当为总领公下“记室督”；录，即总领之意。

西曹从事 南凉有“西曹从事史暠”。《晋书·职官志》云：“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置长史一人，秩一千石；西东閤祭酒、西东曹掾、户仓贼曹令史属各一人……西曹称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数如旧令。”而“从事”是汉以后王公及州郡长的属僚。故疑南凉西曹从事为时称王、公的秃发氏之属吏。

参军 南凉有参军郭韶、关尚。按，参军一职范围极广，东汉末曹操以丞相总揽朝政，僚属往往用“参丞相军事”的名义办事。以后诸王、公、将军开府者皆置参军。《晋书·职官志》亦云：“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军为六人。”郭韶、关尚当为南凉利鹿孤及傉檀之参军。

左司马 南凉此号较多，见于记载的有左司马赵振、杨桓、孟祎等。此三人均为南凉统治者推崇的汉族豪门俊杰之士。按司马一职，西周始

设，后代沿用，但地位高低、掌职大小，均有不同。魏晋至宋，司马为军府之官，在将军之下，综管军府，参与军事谋划之事。上述南凉三个参军，性质同此。

左、右长史 南凉嘉平元年（408）傉檀复称凉王，以“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倖为尚书左右仆射”[8]。按长史原为秦官，汉魏以后因之。晋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皆置长史，边郡亦置。南凉上述左右长史为傉檀任后秦“车骑大将军、广武公”时所署，为其辅佐。傉檀复称凉王后，即改封为左右仆射。

宾客 南凉曾封杨轨为宾客。按宾客一职在唐以前未见，[9]或云唐时始置，全称为“太子宾客”，是太子属官中之最高级者。南凉此时未立太子，所设宾客一职当为参赞军务一类的闲职。杨轨原为后凉后将军，降南凉后仅为宾客，故引起他的不满，后叛，被杀。

以上为史籍中所见南凉中枢之官，官名共二十三个，牵涉人物共二十四人。其中属秃发氏王族三人（俱延、傉檀、虎台）、汉族十八人（赵晁、郭倖、史暠、张融、阴利鹿、成公绪、田玄冲、赵诞、郭韶、景保、麹梁明、梁裒、边宪、宗敞、关尚、赵振、杨桓、孟祎）、氐族一人（杨轨）、不明族属二人（婆衍崘、伊力延）。

（二）军事之官

南凉自建国始，即是以秃发部人（即“国人”）为主，组成军队，四处征战，虏掠人口，以增加服役纳贡之人民。因此，南凉政权内军事之官掌握着军国大权，而且多以秃发氏任之。其军事之官见于史籍的有：

骠骑将军、骠骑大将军 乌孤建立政权时，以弟利鹿孤为骠骑将军；后又改封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按《通典》卷三四骠骑将军条云：“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始用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光武中兴，以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魏、晋、齐并有之。”

车骑将军、车骑大将军 乌孤建立政权时，以弟傉檀为车骑将军；后又改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镇西平。《通典》卷二九车骑将军条云：“汉文帝元年（前179）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和帝即位，以舅窦

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始赐金紫，次司空。”晋时，骠骑、车骑大将军，“开府者皆为位从公”[10]。

左将军 史籍中见南凉此官有二：左将军枯木、云连。《通典》卷二九前后左右将军条云：“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魏以来复置。晋武初，又置前军、左军、右军，泰始八年（272）又置后军，是为四军。”

前军将军、后军将军 南凉有前军将军伊力延侯（即前卫尉伊力延），后军将军洛肱。此二员将军系晋初置，为“四军”将军的一部分，说见前。

镇军将军 南凉有“镇军将军敬归”。《通典》卷三四镇军大将军条云：“镇军大将军，魏置，文帝以陈群为之。晋则杨骏、胡奋并领镇军将军。”

中军将军 南凉有中军将军纥勃。《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云：“中军将军，一人。汉武帝以公孙敖为之，时为杂号。”“中、镇、抚三号比四镇。”南凉中军将军，非杂号，应比“四镇”将军。

右卫将军 南凉有右卫将军折掘奇镇。《晋书·职官志》云：“左右卫将军，案文帝初置中卫及卫，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卫，以羊琇为左，赵序为右。”

“四镇”将军 南凉仅见有镇南将军文支和镇北将军俱延、段苟。按，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四将军，为“四镇”，始于东汉末，魏晋因之。魏“四镇”为第二品，仅次于“四征”将军。

“四安”将军 南凉有安西将军纥勃、樊尼，安北将军段苟。《宋书·百官志上》云：“安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陶谦为之。安南将军，一人。安西将军，一人。后汉末，段煨为之。安北将军，一人。鱼豢曰：‘镇北、四安，魏黄初、太和中置。’”

“四平”将军 南凉有平西将军浑屯。按四平（平东、平南、平西、平北）将军，“魏世置”[11]。

护军将军 南凉有“护军成宜侯”，应即护军将军成宜侯。《晋书·职官

志》云："护军将军，案本秦护军都尉官也。汉因之，高祖以陈平为护军中尉，武帝复以为护军都尉，属大司马。……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

抚军从事中郎 南凉有抚军从事中郎尉肃。按中郎即中郎将之省称，秦置，为近侍之官。晋至南北朝又有"从事中郎"，为将帅的幕僚。南凉此官，可能系抚军将军属下之幕僚。

安国将军、凌江将军、材官将军 史籍所见，南凉还有一些"杂号将军"，如安国将军鍮勿崘、凌江将军郭祖、材官将军宋益及将军屈右等。按《晋书·职官志》云："四征兴于汉代，四安起于魏初，四镇通于柔远，四平止于丧乱，其渡辽、凌江，轻车、强弩，式扬遐外，用表攻伐，兴而复毁，厥号弥繁。"《通典》卷二九杂号将军注云："历代杂号将军凡有数百，不可俱载。"

驸马都尉 南凉有驸马都尉胡康。《晋书·职官志》云："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元帝为晋王，以参军为奉车都尉，掾属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皆奉朝请。后罢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诸尚公主者刘惔、桓温皆为之。"南凉驸马都尉，因晋制而来，胡康当为尚公主之驸马，胡人。

殿中都尉、殿中骑将 南凉弘昌六年（407）姑臧屠各成七儿反，有殿中都尉张猛及殿中骑将白路镇压事。按都尉一职，战国始置，西汉沿用，设有关都尉，如农都尉、属国都尉，后又改都尉为郡尉，掌一郡之军事，又与各种专职都尉并存。南凉殿中都尉及殿中骑将，则专为保卫王室而设，故称殿中都尉，仿汉制而来。

南中郎将 《太平御览》卷一二六引《十六国春秋·南凉录》云：嘉平"二年正月，以子明德归为南中郎将，领昌松太守"。按东、南、西、北"四中郎将，并后汉置，历魏及晋，并有其职，江左弥重"[12]。史籍中仅见南凉有南中郎将，其余三中郎将阙载。

除上述军事之官外，还有一些史籍仅称为"将"者，计有纷陁、石真若留、石奕干、苻浑、金树、苏（薛）翘、贺连、匹珍、尉贤政等。另有降南凉的后凉、北凉的将军，如后凉建武将军李鸾、魏安焦朗，北凉沮渠男成弟富占、将军俱傫等，南凉对他们如何处置，封何官爵，因史籍阙载，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南凉军事之官，较中枢之官完整和庞大，这与南凉政权军事掠夺的性质是相适应的。可考的军事之官官号（不包括仅称为“将”者）共二十四个，供职官员（重名只记一个）共二十四人。其中秃发氏王族六人（利鹿孤、傉檀、俱延、文支、樊尼、明德归），与秃发氏联姻的外戚二人（胡康、折掘奇镇），从姓氏上可断为少数民族首领的有八人（洛肱、纥勃、伊力延侯、枯木、云连、成宜侯、𫔬勿崘、浑屯），汉族八人（敬归、郭祖、宋益、段荀、张猛、屈右、尉肃、白路）。而秃发氏王族皆任高级军事职务，汉族仅为中低级官吏，说明南凉的军事大权一直掌握在秃发氏王族手中。

（三）地方之官

司隶校尉 南凉曾以镇军将军敬归为司隶校尉。《晋书·职官志》云：“司隶校尉，案汉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隶校尉，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历汉东京及魏晋，其官不替。”南凉司隶校尉可能系视察姑臧周围武威等郡之官员，仿汉魏司隶校尉而置。

凉州牧 南凉太初三年（399）乌孤曾以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利鹿孤即位后，又以弟傉檀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凉州牧、录尚书事。据《通典》卷三二州牧刺史条云：“秦置监察御史……（汉）文帝十三年（前167）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御史止不复监。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诏六条察州，凡十二州焉……哀帝建平二年（前5），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前1），复为牧……魏、晋为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皆铜印墨绶……”南凉仅有凉州一地，设牧，加“都督”，盖仿魏晋制也。

郡太守、内史 太守为州一级以下地方行政“郡”之长官。《宋书·百官志下》云：“郡守，秦官。秦灭诸侯，随以其地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更名守曰太守，尉为都尉。”又“三国时有郡守、国相、内史……晋宋守、相、内史，并银章青绶，进贤两梁冠”。[13]南凉所见郡太守、内史有晋兴太守阴训，西郡太守杨统，昌松太守苏霸、明德归，三河太守吴阴，湟河太守文支，湟河、浇河太守张兴宗，[14]西平内史田玄明等。还有一些原为后凉郡太守降南凉者，如乐都太守田瑶、湟河太守张稠、浇河太守王

稚等，不知南凉统治者是否保留了他们的郡太守之职？另有秃发氏王族分镇各地，无具体名号，如南凉太初三年（399），利鹿孤即位后，以叔父素渥镇湟河、若留镇浇河，从弟替引镇岭南、洛回镇廉川，从叔吐若真镇浩亹等，内可能有任太守者。

邯川护军 南凉也有护军制，有邯川护军孟恺。此护军与上述护军将军异，是魏晋以来一种领护少数民族杂居地区的军事长官，掌郡、县一方军事及行政，而废郡县官吏。如此制始于曹魏时所设的安夷、抚夷二护军，十六国许多政权都设有这种机构，前凉就曾置武卫（街）、石门、侯和、漒川、甘松五部护军。[15]南凉邯川护军同此。

自秦汉以来，郡一级下设县，有县令或宰。南凉郡下是否设县，未见记载。

以上是南凉地方一级的建置与职官，见于记载的有十个，共十二人。其中秃发氏王族四人（利鹿孤、傉檀、文支、明德归），汉族八人（敬归、阴训[16]、杨统、苏霸、吴阴、张兴宗、田玄明、孟恺）。作为地方最高级的州牧为秃发氏，而郡太守、护军一级则绝大多数为当时河西豪族或俊杰之士。由此可知，南凉政权与河西汉族豪门的结合情况，在郡一级官吏中，汉族豪族占了很大的比例。

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凉自乌孤建国始，即采取了汉魏以来内地汉族政权建立年号的制度。南凉共建四个年号：乌孤太初（397～399），凡三年；利鹿孤建和（400～402），凡三年；傉檀弘昌（402～404），凡三年；嘉平（408～414），凡七年。其间弘昌三年二月，傉檀为密图姑臧，去年号，降后秦，至后于东晋义熙四年十一月复年号，曰嘉平。

通过上述对南凉官制的分析，可得出南凉政治制度的第一个特点，即南凉的政权机构和职官，基本上与汉魏以来汉族所建封建政权相合，而略有损益，说明南凉政权是一个基本上汉化了的封建政权。这个汉化了的封建政权又有自己的特性。如南凉政权机构虽仿照魏晋以来汉族封建机构而设，但并不完全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有选择地设置。其中枢之官有三公中的太尉及尚书省、门下省、列卿的官职，但就是没有汉魏以来的御史台，即主管刑狱部门的职官，说明南凉政权对法律、刑狱这方面是较为忽视的。这与秃发鲜卑部直接由部落联盟进入封建社会，仍带有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有关。又如南凉军事之官，较为完整和突出，这与南凉崇尚武力、经常掠夺土地和人口有关，也是秃发部原来

落后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其州郡一级地方之官，郡太守以上往往还有秃发氏在地方上坐镇，以统各郡军政。前述利鹿孤即位后，即以其叔、兄弟等镇守各个重要的地区。

南凉政治制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大量吸收了河陇等地的汉族豪族和俊杰之士参与政权，并委以各级官职。因为南凉政权要在河湟等地存在下去，作为统治者的秃发氏就必然大力吸取历代汉族统治者统治河湟广大汉、羌等族的经验，与当地汉族豪门士族相结合。反映在南凉政权中，汉族豪门及俊杰之士做官为吏者不少，特别是在中枢、地方之官中，汉族官吏占一半以上。《晋书》秃发乌孤、傉檀载记中，明确记载了两批汉族豪右望族及俊杰之士参加了南凉政权：一是南凉太初三年乌孤迁都乐都后，时有：

> 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麹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苏）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

一是南凉傉檀取姑臧后，宗敞向傉檀推荐了一批汉族豪族和俊杰之士，有：

> 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陇之冠冕；裴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梁崧、赵昌，武同飞、羽。

两批人士共三十四人（内张昶重复），除金石生、时连珍为“四夷之豪隽”，即少数民族外，其余三十二人均为汉族（见表一）。

表一 南凉汉族豪门及俊杰之士任职情况

人名	族属	籍贯	在南凉任职	事　迹	资料出处
金石生	胡人			原为后凉将，后降南凉。	《晋书・吕光载记》
时连珍	胡人				
阴训	汉	西州望族	晋兴太守	公元400年曾驰告利鹿孤：乾归与南羌勾结，阴谋反叛。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
郭倖	汉	西州望族	先任右长史，后为尚书右仆射	原为后凉西平太守，为田玄明所执，降南凉。	《资治通鉴》卷一一〇等
杨统	汉		西郡太守	原为后凉吕纂司马，参与郭黁反，后投南凉。公元407年以西郡降北凉。	《晋书・吕光载记》《晋书・沮渠蒙逊载记》等
杨贞	汉				
卫殷	汉				
麹丞明又作麹梁明	汉	金城或西平人	记室监	利鹿孤即位，遣其使北凉段业。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
郭黄	汉				
郭奋	汉				

表一 南凉汉族豪门及俊杰之士任职情况-续表1

人名	族属	籍贯	在南凉任职	事　迹	资料出处
史暠	汉		初任祠部郎中，后任西曹从事	曾劝利鹿孤建学校，开庠序等。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
鹿嵩	汉				
梁昶	汉	中州之才令			
韩疋	汉	中州之才令			
张昶	汉	前凉张轨之后代			
郭韶	汉	中州之才令	国纪祭酒	乌孤时，任国纪祭酒，撰录国事。	《史通・史官篇》
金树	汉	秦雍之世门	将	公元400年利鹿孤遣其屯于昌松漠口。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苏（薛）翘	汉	秦雍之世门	将	与金树屯昌松漠口。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赵振	汉	秦雍之世门	左司马	公元397年即投南凉，劝乌孤取岭南五郡。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王忠	汉	秦雍之世门			
赵晁	汉	秦雍之世门	初任左长史，后改任尚书左仆射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
苏霸	汉	秦雍之世门	昌松太守	公元408年为后秦姚弼所杀。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

表一 南凉汉族豪门及俊杰之士任职情况-续表2

人名	族属	籍贯	在南凉任职	事　迹	资料出处
段懿	汉	武威人			
孟祎	汉	武威人	左司马	原为后凉昌松太守，后降南凉。曾劝傉檀行仁义以永固。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
辛晁	汉	秦陇之冠冕			
彭敏	汉	秦陇之冠冕			
裴敏	汉	中州之令族			
马辅	汉	中州之令族			
张穆	汉			沮渠蒙逊取姑臧后，降北凉，为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	《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边宪	汉		辅国司马	公元407年与梁裒反。为傉檀所杀。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
文齐	汉				
杨班	汉				
梁崧	汉				
赵昌	汉				

除表一所列汉族豪门及俊杰之士外，南凉政权内还有一大批汉族或汉化了的氐、羌等族的豪族或谋士，见于记载的有：张融（中散骑常侍）、阴利鹿（散骑常侍）、成公绪（大司农）、田玄冲和赵诞（博士祭酒）、景保（太史令）、梁裒（军咨祭酒）、宗敞（太府主簿、录记室事）、关尚（参军）、杨桓（左司马）、杨轨（汉化了的氐族，宾客）、敬归[17]（镇军将军、司隶校尉）、段苟（镇北将军、安北将军）、尉肃（抚军从事中郎）、郭祖（凌江将军）、宋益（材官将军）、屈右（将军）、张猛（殿中都尉）、白路（殿中骑将）、苻浑（氐族，将）、尉贤政（将）、李鸾（原为后凉建武将军，降南凉）、焦朗（广武豪族）、吴阴（三河太守）、张举宗（湟河、浇河太寺）、田玄明（西平内史）、田瑶（原后凉乐都太守）、张稠（原后凉湟河太守）、王稚（原后凉浇河太守）、孟恺（邯川护军），共三十人。如加上表一中所列汉族三十二人，总共有六十二人。

在南凉这个政权之中，汉族豪门和俊杰之士（包括汉化了的氐、羌族）见于记载的，就达六十二人，这的确是不容易的事。它说明南凉秃发氏统治者对汉族豪族和俊杰之士的网罗面之广，以及其政权汉化程度之深。这些汉族豪族和俊杰之士原来大部分为后凉政权的官吏或支持者，也是河陇地区的豪门地主，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见后凉衰败，于是纷纷投靠日益强盛的南凉秃发氏；而当南凉衰落后，又转附于河西的北凉、陇右的西秦。如表一中的杨统、张穆即是最好的例证。

既然南凉秃发氏统治者大肆网罗汉族豪门、俊杰之士，并加以利

用，与之结合，其政权应该是较为巩固的，何以南凉仅存十八年就灭亡了呢？关于南凉衰亡的主要原因前已叙述，如从与河陇汉族豪族结合这方面来看，那就是在南凉据姑臧之后，统治者秃发傉檀滋长了骄傲自大的情绪，对汉族人士也日益不信任，因而，对汉族官吏的劝谏多不听从。如阳武之败，是傉檀不听广武豪族焦朗的计谋；穷泉大败于北凉，是不听景保、赵晁等人的劝谏；乙弗之征，以至灭亡，乃不听孟恺之谏的结果。而乐都的失陷，也是由于秃发武台不信任晋人，将其豪望有勇谋者闭于内城之中，结果一旬城溃。以上的情况，促使原来支持南凉的汉族豪门、俊杰之士对秃发氏失望，为了保住自身的利益，于是转而投向河西的北凉、陇西的西秦，加速了南凉的崩溃。

最后，再探讨一下南凉的地方郡县制度及疆域问题。关于此，清代洪亮吉撰有《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内卷十一即南凉。洪氏广征博引，考证颇精，基本上再现了南凉所置郡县及疆域，但也有一些错讹和不实之处。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洪氏书的基础上，作简约的叙述和辨证。

南凉于太初三年置凉州，乌孤以弟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建和二年，利鹿孤以弟傉檀为凉州牧，录尚书事，镇都城西平。以后再未见史籍载有凉州牧，不知是否废置，存疑。

关于郡县，洪氏《十六国疆域志》内《十六国春秋·南凉》云：“案南凉郡县次第，亦无可考，除武威、西平、乐都三郡曾经建都，余先后亦如后凉之例焉。凡统旧郡十三，增置郡一，护军一，县可考者五十。”按南凉设置郡县次第，因史籍阙载，故难于准确记述，但其各郡大都因夺取后凉诸郡而来，故其设置情况，还是可以找出大约年代。关于此，前文已述，此从略。洪氏所云南凉“凡统旧郡十三，增置郡一，护军一”，即是武威、西平、乐都、武兴、晋兴、昌松、番禾、金城、西郡、晋昌、三河、湟河、浇河、广武十四郡，邯川护军一。内“晋昌郡”误。按洪氏书于“晋昌郡”下云：“南凉领县七。有石驴山。”下注：“右卫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以叛，镇军敬归，讨奇镇于石驴山，战败死之。胡三省云：石驴山在姑臧西南，长宁川西北，属晋昌郡界。”“长宁川”，包括有“伊吾、冥安、渊泉、广至、沙头、会稽、新乡”七县。考《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三月条胡三省注原文是：“石驴山在姑臧西南长宁川西北，属晋昌郡界。张寔讨曹袪于晋昌，自姑臧西逾石驴，据长宁。”胡氏所注石驴山的位置是正确的，但其云“属晋昌郡界”则误。

按《晋书·张轨传》记张寔讨曹祛，“别遣从事田迥、王丰率骑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驴，据长宁。祛遣麹晁距战于黄阪。寔诡道出浩亹，战于破羌。轨斩祛及牙门田嚣。”显然，张寔与曹祛的战争是发生在湟水流域，最后杀曹祛是在破羌（今西宁西南）。这一带在前凉或前凉前后各政权时，均不属晋昌郡（治今甘肃安西东南），而属凉州西平郡。洪氏不查胡注之误，竟因胡氏以石驴山属晋昌郡，而以晋昌为南凉所置郡之一。另外，洪氏所列晋昌六县之名，均在今甘肃敦煌一带，南凉势力从未到达那里，当时正是西凉李氏的领地，云南凉有晋昌郡县于情理相悖。故洪氏以南凉置郡十四中，晋昌郡误，可考的南凉郡只有十三。

此外，洪氏所考南凉诸郡下的县名，仅有一小部分见于史籍，其余皆系以晋、前凉、后凉所置县推出，故不可尽信。

洪氏书尽管有一些不足和错讹之处，但瑕不掩瑜，仍然是一本研究十六国地方行政设置和疆域的重要著作。

南凉最盛时的疆域，大致是在东晋义熙二年（406）傉檀取姑臧之后，时领有凉州五郡（武威、武兴、番禾、西郡、昌松）、岭南五郡（乐都、西平、浇河、湟河、广武）及晋兴、三河，共十二郡，仅金城郡时在后秦手中。约包括今天甘肃兰州以西，永昌西水泉子之东，北抵今甘肃腾格里沙漠，南至今青海以南同仁一带，东南到今青海循化，西南到青海湖东北。

二 南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性质

秃发部鲜卑原是从塞北（漠南）拓跋鲜卑分出来的一支，公元3世纪60年代，当他们迁徙到河西地区之后，仍然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阶段。他们游牧的地区，大致“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这正如《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记其将鍮勿崘所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到晋泰始六年至咸宁五年，秃发部首领树机能与河陇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晋的斗争，一度据有凉州，后为马隆所败，部众分散于河西。这一事件对于打破原秃发部内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氏族制，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他们与河西汉、羌等族的接近和相互影响。

公元4世纪末，秃发乌孤统领部众后，史称其“养民务农，循结邻好”[18]，说明秃发部及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已由游牧逐渐向农业定居转化。而东晋太元二十年（395）乌孤征服青海乙弗及折掘二部鲜卑后，筑廉川堡为都，标志着他们由游牧逐渐转向了定居农业。但也不排除仍有部分秃发部人保持原有的游牧经济，而从事农业的绝大多数是秃发部统治下的晋人和羌人。[19]东晋隆安元年（397），乌孤正式建立政权后，先后取金城、广武、西平、浇河、湟河、乐都、三河、晋兴等郡，统治的地域日渐扩大，征服的民众也就更多。这些地区自汉代以来，就为内地汉族政权所统治，盛行着封建的生产方式。那么，秃发氏的南凉征服这些地区之后，其经济制度是否有相应的变革呢？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史料做一些推测和探讨。按，《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记载了南凉建和二年安国将军鍮勿崘的言论，内云秃发部先世还是“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20]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即是说，秃发部在建立政权前后，游牧经济已向定居农业转化，因此，鍮勿崘以为这种“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而且居乐土，必有仓府粟帛，易启敌人攻掠之心。这就充分反映出当时处于转变时期的南凉内部原来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与原河西汉族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相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鍮勿崘认为：“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利鹿孤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后这一方针就成为南凉的基本国策。

按照这一国策，南凉社会形成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作为统治民族的秃发鲜卑，即所谓“国人”（也包括一部分河西鲜卑人），其上层就是南凉统治阶级中掌握权力的部分，从凉王到中枢、军事、地方各级官吏，均以秃发氏贵族为主，最后形成专门从事军事征战，掠夺人口、财物的封建军事贵族阶层；而一般秃发部民绝大多数也脱离了农牧业生产，由部落兵变为南凉国家的士兵。在南凉建国初，利鹿孤、傉檀一次出兵就是“五千”“万骑”，在仅据有河湟数郡之地的南凉国内，能征调如此数量的军队，可见秃发部国人，基本上变成了兵士。到南凉后期，军队中才逐渐增加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人。[21]另一部分则是被统治民族，主要是晋人（即汉族），还有氐、羌、屠各及其他鲜卑部落等。南凉统治下的河西豪门和俊杰之士与南凉秃发氏统治者结合，成为统治阶

级的组成部分。广大的汉族人民，则被固定在城市周围，从事农业生产，以供军国之用。

此外，南凉境内还有许多从事畜牧的其他族部落，如南边一些羌族部落，及属河西鲜卑的麦田、意云、折掘、乙弗、契汗等。这些部落的首领大都任南凉的官吏，有的与秃发氏王族通婚（如折掘氏），并有质子在南凉的都城。这些部落可能要向南凉政权纳贡赋，或率部落兵助南凉征战。他们基本上保持原来的部落形式和生活习惯，故南凉嘉平元年（408）北凉围南凉姑臧时，原属南凉的折掘、麦田、车盖等整个部落降北凉。当南凉境内缺乏劳动力时，统治者就袭击这些部落，掠徙人口。如傉檀就曾袭徙西平、湟河一带羌族三万余户，置新取的凉州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这些臣属于南凉的部落，其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整个南凉社会中占次要的地位，加之文献资料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姑且论至此。

在南凉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是那些分布在城镇周围、从事农业的晋人，他们与南凉统治阶级的关系，是确定南凉社会性质的主要因素。可惜史籍于此也基本上失载，我们只能做一些推测。首先，河湟地区的汉族及从事农业的羌族，自汉代以来就早已纳入了东汉、魏、晋、前凉、后凉等政权实行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轨道，比较落后的秃发氏鲜卑征服河湟地区之后，不可能继续采取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对该地区汉、羌人民进行统治，而必然逐渐采取、承继先进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其次，前引《晋书》鍮勿崘所说，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这是汉魏以来，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封建剥削方式的常用语。因此，可以想见秃发氏统治者对晋人是采取了封建制的。

可是，南凉统治者实行的封建制的具体情况，诸如土地占有、赋役制度、汉族豪门地主与南凉国家的关系等等，我们知道得很少。以军事封建贵族秃发氏为首的统治集团，从不断的战争中占领城镇，掠夺人口，将城镇内外的土地分给征服或掠夺来的晋人耕种，这些土地具有国有的性质，还有一部分原汉族豪族的地主庄园、坞堡，有的可能被没收，属于国有，或分给秃发氏贵族所有；有的因汉族豪族的归附而保存下来，成为南凉另一种土地所有制——豪族地主所有制。不论国有的或豪族、贵族所有的土地，名义上均属南凉最高统治者所有，他们都控制了一批晋人进行耕种。这些晋人按期向国家或豪族、贵族交纳租赋，服役（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这样，南凉社会基本上形成以秃发氏为首的

军事贵族和汉族豪族地主相结合的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以汉族广大人民为主的农民阶级，前者对后者的压迫和剥削，则不断引起后者的反抗。[22]

早在前凉初期，河陇地区农民阶级的反抗主要以逃亡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经济较为落后、人口较少的河湟地区，掠夺和控制农业劳动力，就成了南凉政权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南凉的军事封建贵族集团的南征北战，主要目的就是掠夺人口，扩大他们的剥削对象，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供军国之用。这一点不仅是南凉政权，在整个十六国分裂割据时期，各割据政权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依赖着对邻国人口的掠夺。[23]早在利鹿孤在位时，祠部郎中史暠就对利鹿孤说："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这里，史暠指出了南凉初期唯以战争为手段，以"徙户为务"，民不乐迁徙，多有叛离，故国家不能扩土、强盛。可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仅是"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即吸收汉族传统的封建儒学，来改变这种状态。这种办法从根本上是不能解决上述问题的。利鹿孤虽然采纳了史暠的建议，以田玄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24]但对整个南凉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丝毫触动，掠夺劳动力，仍然是南凉军事封建贵族不断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在南凉短短的十八年中，见于记载的掠迁人户就达十次之多[25]，情况如表二所示。

表二 南凉掠迁人户（**400～411**）

年份（公元）	掠迁对象	数量	迁徙地点	资料出处
400	后凉姑臧城周围各族	八千余户	傉檀掳而归之。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
401	后凉	二千余户	利鹿孤与吕隆战，破之，徙户而归。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表二 南凉掠迁人户（**400～411**）-续表

年份（公元）	掠迁对象	数量	迁徙地点	资料出处
401	北凉万岁临松民户	六千余户	后蒙逊许以弟挐为质，利鹿孤还其所掠。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402	后凉显美、丽軒民户	二千余家	傉檀克后凉昌松，徙而归之。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402	后凉凉泽段冢民户	五百余家	傉檀援后凉，至昌松，蒙逊退兵，掠户而归。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402	魏安焦朗部民		傉檀攻魏安焦朗，朗降，徙其民于乐都。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406	西平、湟河羌族	三万余户	傉檀据姑臧后，袭西平、湟河诸羌，徙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
409	北凉临松民户	千余家	傉檀遣左将军枯木、驸马都尉胡康击北凉，掠户而还。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四
411	北凉番禾民户	三千余家	蒙逊围乐都，傉檀遣将袭番禾，徙户至西平。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
411	北凉番禾、苕藋民户	五千余户	后傉檀于途中为北凉所败。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六

从表二可知，南凉通过战争掠迁人户的次数及人口数都是相当大的，这些被掠的人户中，以汉族农民为主，他们迁入南凉城镇附近，为统治阶级耕种、奴役或服兵役等，成为南凉政权下被统治的农民阶级（晋人）的一部分。

南凉统治下的晋人，无论是原居于城镇的，还是从战争中掠迁来的，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身份，根据以上的分析，应是农民，而不是奴隶。这种农民与自东汉末年以来兴起的地主阶级坞堡内的部曲相同，即他们被固定在地主坞堡内进行生产，不能随意迁徙，人身依附

关系加强。可是，南凉农民的这种依附，不是如坞堡的部曲一样，以宗族、乡党或自愿投靠为前提，而更多地是被国家军事力量所胁迫。由于南凉政权用军事力量将晋人固定在城镇周围，使晋人处于自由农民与奴隶之间的农奴地位上。

南凉社会中有无奴隶存在呢？答复是肯定的。但这些奴隶区别于从事生产的晋人，他们大多是贵族和地主豪门的家内奴隶。如《晋书·吕隆载记》记后凉吕隆灭亡前夕，因姑臧城内饥馑，饿死者十余万口，“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此夷虏即指姑臧城外各少数民族的贵族，其中包括围逼姑臧的南凉秃发氏贵族。

综上所述，知南凉社会经济的主要构成、它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是承袭了原来河西地区封建的生产关系，而且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以秃发氏为首的军事封建贵族采用军事征伐手段，不断扩大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晋人的压迫和剥削，而广大的晋人则处于南凉军事贵族的控制下，处于近似于农奴的地位。以秃发氏为首的军事封建贵族及与之结合的汉族豪门地主，与广大的晋人及被奴役的其他民族部落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南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可以说南凉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农奴制社会。

三 南凉的文化及其对河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如前所述，秃发鲜卑所建南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均继承了原河西汉族的传统，在文化习俗方面，自然也深受汉族的影响。在秃发鲜卑迁到河西至建立政权的一百三十多年时间内，秃发部虽然保存着自己原有的部落形式和习俗，但由于与河西汉族杂处，仍不断吸收汉族的文化。乌孤建立政权后，秃发部原部落组织开始解体，大批汉族豪门士族和俊杰之士加入了南凉政权，汉族文化和习俗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如利鹿孤在位时，接受史暠的建议，以汉族硕儒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这一措施，虽然比不上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前秦、后秦等在国内采取的勤于劝学、选派儒生、教授生徒等办法），但是对秃发氏吸收汉族文化仍有积极的作用。又如统治南凉达十三年之久的秃发傉檀，对于汉族的文化就有很高的修养。后秦韦宗会晤傉檀后，曾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磾岂足为多也！”也就是说，傉檀对汉族传统文化十分精通，韦宗比之于“经纶名教者”。《太平御览》卷一

二六引《十六国春秋·南凉录》记：傉檀曾在嘉平“二年正月，以子明德归为南中郎将，领昌松太守。归隽爽聪悟，檀甚宠之，年始十三，命为昌高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檀览而善之，拟之曹子建”。此事说明傉檀下一代如明德归之流，可以说完全是在汉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明德归作“昌高殿赋”，竟“援笔即成，影不移漏”，可见其汉文水平是相当高的。

南凉秃发氏如此热心学习汉族文化，并且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其他秃发氏国人及河西鲜卑贵族自然也不同程度地吸取汉族文化，仿效汉族的习俗。因此，南凉国内盛行的是汉语文，流行的是汉族的风习服饰。《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记载了他们的大量言论，有许多地方引经据典，完全像是汉族士大夫的口吻。如傉檀取姑臧后，宴群臣于宣德堂，仰视而叹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又如乞伏炽磐逃归，傉檀对利鹿孤说：“臣子逃归君父，振古通义，故魏武善关羽之奔，秦昭恕顷襄之逝。炽磐虽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傉檀以上言论，虽然经过《晋书》撰者的加工，但也可窥见傉檀对于汉族历史典籍的熟悉及对儒家学说的遵从。

至于秃发氏的习俗，因文献阙如，我们只能间接推知。今甘肃永靖县著名的炳灵寺石窟，内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左右开凿的石窟（编号一六九），窟内北壁壁画中供养人行列有一姓“乞佛□罗使之像”[26]。乞佛，即建西秦的乞伏鲜卑，此人应即西秦乞伏氏贵族，其服饰与当地汉族相同。乞伏鲜卑迁入陇西，较秃发鲜卑迁入河西晚，他们贵族的服饰已汉化，那么与之邻近，并且在其他方面皆汉化的秃发氏贵族，想必也同乞伏氏贵族一样，在风俗服饰方面基本汉化了。

南凉文化的特点，除了上述秃发氏大量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其语言、文字及风习、服饰基本汉化外，还应提及的是其国内佛教之流行。按十六国时，北方各割据政权（包括五胡所建政权）的统治者普遍利用佛教来麻痹各族人民，以缓和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各族人民在战争频繁、动荡不安的十六国时期，也希望从佛教中找到精神上的寄托。因而，佛教就普遍地传播和发展起来。南凉也不例外，梁代释慧皎撰《高僧传》卷一○《释昙霍传》，记载了南凉兴佛的故事，内云：

> 释昙霍者，未详何许人……时河西鲜卑偷发（即秃发之异译）利鹿孤僭据西平，自称为王，号年建和。建和二年

（401）十一月，霍从河南来，至自西平，持一锡杖……并奇其神异，终莫能测。然因之事佛者甚众。鹿孤有弟耨（傉）檀，假署车骑，权倾伪国。性猜忌，多所贼害。霍每谓檀曰："当修善行道，为后世桥梁。"檀曰："仆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违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颜色如常，是为佛道神明，仆当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无饥渴之色。檀遣沙门智行密持饼遗霍，霍曰："吾尝谁欺，欺国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节杀兴慈。国人既蒙其祐，咸称曰大师，出入街巷，百姓并迎为之礼……至晋义熙三年（407），傉檀为勃勃所破（指阳武之败——作者），凉土兵乱，不知所之。

内云建和二年霍从河南来，此河南当指西秦，因时西秦据黄河以南之地，且号河南王。傉檀当时"权倾伪国"，可与前述利鹿孤时，军国大事皆委傉檀相印证。作为秃发鲜卑的傉檀要改信佛教，是比较困难的。傉檀所说，"仆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乃是鲜卑之旧俗。[27]后改信佛教的原因，上文所述不过是传说，其真实原因，应如前所述，系欲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各族人民的工具而已。自建和二年后，佛教开始在南凉流行，百姓称昙霍为大师，顶礼膜拜，一直到义熙三年南凉转衰之时。

又僧佑《出三藏记》录著名的《佛游天竺记》（或云《佛国记》）内记：隆安三年（399）有僧人法显及同学慧景等，从长安出发，赴天竺游学，"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度陇"之"陇"，即今陕西陇县西之陇山，乾归国指西秦，时都苑川（今甘肃榆中东北），经苑川过凤林关渡黄河，西北至乐都，又溯湟水而至"耨檀国"国都西平。按当时南凉系利鹿孤在位，非傉檀，此称"耨檀国"，系因利鹿孤将军国大事皆委傉檀，"当日凉人只知有耨檀，不复知有利鹿孤，显师从俗记载"之故。[28]然后，法显一行从西平北过养楼山（今养女山），过浩亹水（今大通河），从扁都口越祁连山，到张掖。[29]法显一行不走传统的河西路，由兰州至武威、张掖，而先行到乐都、西平，然后越祁连山直至张掖，其原因可能是因据河湟的南凉强盛，他们到南凉弘法或与那里的佛教徒会聚。此事亦说明南凉境内佛教之流行。

南凉在河湟地区建国的时间虽很短（十八年），但秃发部鲜卑在此

生活的时间却很长（一百三十多年），因此他们对于河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是有贡献的。南凉所领十三郡中，除属凉州的五郡之外，余皆为河湟之地，基本上是沿袭后凉的建置。从人口户数及地理条件看，河湟之地不如河西、陇右地区，但在利鹿孤和傉檀在位时期，这里成为河陇整个地区最为繁荣的地方。这说明南凉对河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南凉政权还在河湟地区修筑和扩建城镇。如乌孤就曾遣将石亦干筑廉川堡以为都，傉檀曾“大城乐都”。乐都是南凉的政治中心，其为国都的时间最长：乌孤于太初三年（399）正月由廉川迁至乐都，到八月利鹿孤即位，又由乐都迁至西平；建和三年（402）三月傉檀即位后，由西平又迁都乐都，一直到东晋义熙二年（406）十一月傉檀迁都姑臧；南凉嘉平三年（410）三月傉檀又迁回乐都，一直到南凉灭亡为止。乐都为南凉国都前后共九年零九个月。《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记乐都城，有内外二城，外城广大。此城遗址，据1982年青海省文物工作普查结果，确定在今乐都县城西五华里的大古城村北。在湟水北岸一片开阔的台地上，现仍保留着“大古城”的名字，还有“北门壕子”“北城角落”“十字”“营门”等名称。估计这些名称当是沿原乐都古城遗址而来。1984年，笔者亲自到此遗址调查，台地上已种满了庄稼，没有发现任何古城遗址的痕迹。据当地群众讲，在民国初年还有古城城墙等遗迹，后逐渐开为农田，但保留一些古城的名称，如上述“营门”“北城角落”等。此外，过去还在平整土地时挖出很多砖瓦、柱基石等（见图三）。所以，大古城村北台地很有可能系南凉都城乐都的遗址。要最后下结论，还需青海考古工作者对此地做进一步地调查、发掘。



图三 南凉乐都城遗址（周伟洲摄）

最后，还必须提及的是，南凉在中西陆路交通上所起的作用。前述在隆安三年（399）法显一行至天竺，就曾从苑川至南凉的乐都、西平，再由西平北上，经扁都口到张掖。然后由传统的河西路，入西域，至天竺。这条路线应是河西路的一条支线，在南凉灭亡之后，仍然是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重要路线之一。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也基本上是走这条支线到张掖的。南凉存在时间虽短，但由于它一度强盛和繁荣，必然招来当时许多中外商人，往来于南凉控制下的河湟之地。还有一些中外僧人，像法显一样，往来其间。南凉在中西交通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0页。

[2]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3]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4]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5] 缪荃孙《南凉百官表》作“卫尉将军伊力延”，误。因《晋书·秃发傉檀载记》

明记为“卫尉伊力延”，卫尉为魏晋以来列卿之一，非杂号将军。

[6] 见《史通》卷一一《吏官建置》。

[7]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8] 《南凉百官表》作“左司马赵晁、右司马郭倖”，误。

[9] 《太平御览》卷二四五引《汉书》曰：“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张良计，致商山四皓以为宾客。又孝武帝为太子立博望苑以通宾客，则其义也。”查《汉书》卷四○《张良传》只云吕后从良计，请来商山四皓，“以为客”，未云是“宾客”。但宾客之义，似即由此来。

[10]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11] 《宋书》卷三九《百官上》。

[12]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13] 《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郡太守条。

[14] 见《张猛龙碑》，内“湟河”作“黄河”，“浇”作“饶”，误。

[15] 《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16]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一九阴氏条云：“南凉散骑常侍阴利鹿……又阴驯（应作训），乌孤以为西州之德望，擢为股肱。”阴训，亦当为阴氏一族。

[17] 《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三月条胡注：“何承天姓苑：敬姓，黄帝孙敬康之后；风俗通：陈敬仲之后。”

[18] 见前述“第二章 二 秃发乌孤的建国及其发展”。

[19] 羌人，特别是河湟一带的羌人，早在汉代就有部分从事农业。见《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20] 贻，作遗留给讲；厥，犹“其”。贻厥，后又作子孙的代称。贻厥之规，即留给子孙的规矩之意。

[21] 如《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云：“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戎指少数民族；夏指汉族。

[22] 见前述“第四章 二 南凉的灭亡及其原因”。

[23] 参见关尾史郎《南凉政权（三九七～四一四）和徙民政策》，载《史学杂志》第89编第1号。

[24]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25] 前引关尾史郎《南凉政权（三九七~四一四）和徙民政策》一文，表五南凉政权徙民措施，共列南凉徙民十二次，一次是南凉国内徙民，一次记载不确（即四一四年击乙弗部），故不能统计在因战争掠徙的范围内。

[26] 甘肃省博物馆等编《炳灵寺石窟》，文物出版社，1982，第5页。

[27] 《三国志·魏志》卷三○《乌桓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记东胡乌桓习俗云："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鲜卑"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28] 见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商务印书馆，1934，第10页。

[29] 法显一行此段路线考证，参见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

西秦篇

第一章 乞伏鲜卑与陇西鲜卑

一 乞伏鲜卑的来源和迁徙

西秦也是十六国时期由鲜卑族在西北建立的政权之一。史称建立西秦的鲜卑为乞伏部鲜卑。据《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云：

> 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在昔有如弗（与）斯（引）、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阴山，遇一巨虫于路，状若神龟，大如陵阜，乃杀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开路；恶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儿在焉。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凭，字之曰纥干。纥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岁，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

这是乞伏鲜卑来源最详细的记载，虽然带有一些传说的色彩，但从中仍可窥其来源。上引括号内的"与""引"二字，原书无，此据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晋书》卷一二五校勘记［一］改。校勘记引《古今姓氏书辩证》三引《西秦录》云："有乞伏氏与斯引氏自漠北出阴山。"《元和姓纂》引《西秦录》同，但"斯"作"期"。"《通志·氏族略》引《西秦录》作'乞伏国仁之先如弗与出连、斯引、叱灵二（当作三）部自漠北出阴山'。按：《魏书·乞伏国仁传》但云'其先如弗'，无'斯'字，亦不举三部名，知'斯'字不与上'如弗'连读。据上引诸书，知《西秦录》所记与如弗同出阴山者有'斯引'，据下文国仁初据苑川，即以'斯引乌埿'为左辅将军，与出连高胡、叱卢那胡并列，当即斯引、出连、叱卢三部之长。此处原文当作'在昔有如弗与斯引、出连、叱卢三部'，脱

去‘与”引’二字。”校勘记考述精确，原《晋书》脱二字。这样对《晋书》下文出现的一系列疑问，均可迎刃而解了。

据上引文可知，原漠北有四个部落：如弗（乞伏）、斯引、出连、叱卢，从漠北南出大阴山（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乞伏部一老人收留一个小儿，名之为纥干。此乃鲜卑语，所谓“夏言依倚也”，夏言指华夏（汉族）语，意为依倚。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姓有“纥干氏，后改为干氏”，北周时大将田弘，曾赐姓纥干氏。[1]说明也有以纥干为氏的部落，降魏后，改姓干氏。纥干十岁时，骁勇善骑射，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此时，四个部落已结成部落联盟，以纥干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沿东胡鲜卑的旧习，号之为“乞伏可汗讬铎莫何”。讬铎，为鲜卑语“非神非人”之意。按，“可汗”一词，乃东胡鲜卑对首领或“官家”的称号[2]，只有到了东晋元兴元年（402），柔然社崘自号“丘豆伐可汗”后，“可汗”一词才成为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最高首领（相当于内地政权“皇帝”）的称号。[3]莫何，或译作莫弗、莫贺弗等，亦为东胡的名号和官号，有“勇健者”的意思。[4]如此，则“乞伏可汗讬铎莫何”，意为乞伏部（指上述四部组成的部落联盟）首领、非神非人的勇健者。

史既称以乞伏部为首的部落联盟为乞伏鲜卑或陇西鲜卑，其中为首的乞伏（如弗）部当原为鲜卑族。[5]其余三部则不能肯定属鲜卑。如其中的叱卢部，就不是鲜卑。按《魏书》卷一○三《高车传》云“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内有“吐卢氏”，《通典》卷一九七、《通志》卷二○○的《高车传》，写作“叱卢氏”。上引《魏书·官氏志》亦作“叱卢氏”。叱、吐乃一音之转，译写不同之故。因此，与乞伏部同出阴山的叱卢部原为高车族。这样，乞伏氏的部落联盟至少包括了一些鲜卑、高车部落，而所谓的“乞伏鲜卑”，也可视为鲜卑与高车融合后的一种鲜卑部族。这种融合在北匈奴西迁之后，漠北草原出现各游牧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形势下，是不足为奇的。漠北草原各游牧民族的迁徙与融合，出现了以鲜卑父胡母融合的“拓跋鲜卑”，有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还有匈奴贵族融合于鲜卑部落的“宇文鲜卑”。而“乞伏鲜卑”则是原居于今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南北朝时称为“高车”），南下与鲜卑族融合后形成的。这一结论也为乞伏鲜卑建立西秦政权后，其上层多有高车人（如屋引氏、翟氏、叱卢氏等）所证实。

关于乞伏鲜卑的来源，国内学者还有一些看法。如唐长孺先生就认为：乞伏鲜卑，“这样一个包含高车或丁零及鲜卑、羌族的部落（或部

族），我以为可能是赀虏”。并引《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魏略·西戎传》有关赀虏的一段记载，说“赀虏种族不一，有大胡、丁令与羌，这与西秦乞伏氏的情况相同，《魏略》说赀虏分布虽在凉州，而金城、苑川（兰州与靖远）一带恰是乞伏氏活动之地；乞伏氏从姓氏上、地域上皆与赀虏相合，因此我们的推测也许不致与事实太远”[6]。

按，此说问题很多。第一，《十六国春秋·西秦录》（《太平御览》卷一二七引）、《晋书》等记乞伏部鲜卑来源，均未有一字提及其源于匈奴的奴婢“赀”。第二，赀虏的组成首先是“大胡”。大胡，有学者认为是指匈奴[7]，有学者认为是指西域胡（羯胡）。据《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记，曜指石勒为大胡；勒为羯胡，故后一说较确。此外，赀虏还有丁零（高车）与羌。而乞伏部鲜卑内主要有鲜卑和高车，无大胡，羌也是乞伏氏迁到陇西之后，统治该地羌族始有。因此，赀虏与乞伏氏内族的组成情况并不相同。第三，东汉建武时（25～56）匈奴衰弱，漠北一部分匈奴奴婢（赀）逃到今甘肃兰州、武威、酒泉北，河套以西之地，内有大胡、丁零，杂有羌，当时人称这部分人为“赀虏”。而由漠北南出大阴山的乞伏氏等四部的迁徙及活动地域，与赀虏并不完全相同。因为乞伏等四部由阴山南下，一直在陇西活动，并未达凉州、酒泉以北地区。同时，“赀虏”一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已变成了对河西地区杂夷部落的贱称，如吐谷浑，《晋书》等就称之为“阿赀虏”或“赀虏”。[8]第四，不能因《魏略·西戎传》云赀虏“不与东部鲜卑同也”一句，就判定赀虏为鲜卑。赀虏成分里，可能杂有鲜卑，但文中并未有一言提及，何况迁入河陇的鲜卑部落众多，见于记载者也不少[9]，文献均未提及他们原是赀虏，或与赀虏有什么关系。总之，我们认为，说乞伏氏所建西秦统治下有原来匈奴奴婢赀虏则可，云乞伏氏就是赀虏是难以成立的。

至于乞伏等四部南出大阴山的时间，已不可考。《晋书·乞伏国仁载记》记述了乞伏可汗讬铎莫何后，接着说：

> 其后有祐邻者，即国仁五世祖也。泰始初（265年左右），率户五千迁于夏，缘部众稍盛。鲜卑鹿结七万余落，屯于高平川，与祐邻迭相攻击。鹿结败，南奔略阳，祐邻尽并其众，因居高平川。祐邻死，子结权立，徙于牵屯。结权死，子利那立，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讨尉迟渴权于大非川，收众三万余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讨鲜卑

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众二万余落，因居苑川。

这一段基本上将乞伏等四部由阴山南迁至陇西苑川的路线、过程讲清楚了。下面我们对此段文字略加诠释。

祐邻，《太平御览》卷一二七引《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下简称《西秦录》）作“拓邻”，且记：“五世祖拓邻，晋太始初，率户五万迁居高平川。”此云“率户五万”，与《晋书》“率户五千”异。《西秦录》所云之五万，仍是祐邻经夏，部众稍盛后之数，故比其迁夏时部众多。关于《晋书》中祐邻“迁于夏，缘部众稍盛”一句，有两种断法，一如上断自“夏”，一断自“夏缘”，且将“夏缘”作为一个地名。[10]按，“夏缘”一地在何处？从未见史籍记载。如断自“夏”，则可释为汉朔方之地，赫连勃勃曾于此地建夏国，北魏改夏州，故这种断法较胜。即是说，乞伏等四部南出大阴山至河套北，祐邻时率户五千，又南迁至夏（今河套南），缘部众稍盛，约达五万。又《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州保静县贺兰山条云：“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又东北抵河（黄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在黄河西，从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约长五百余里，真边城之巨防。”贺兰山东北抵黄河之处（大致在今银川西）亦名“乞伏山”，有学者认为，此处名乞伏山，是与乞伏鲜卑曾迁此居住过有关，[11]此说可信。这样，所谓“迁于夏”，当指赫连夏之地，然后又由此向西迁至乞伏山，即今贺兰山东北抵黄河的银川一带。在此地乞伏等四部活动了多少时间已不可确考，但应在祐邻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初期，也就是西晋初。后祐邻又率部向南迁徙，与居于高平川（今宁夏清水河流域）的鲜卑鹿结部“迭相攻击”。最后鹿结败，南奔略阳（今甘肃天水东），于是祐邻率部居高平川。《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云“五代祖祐邻并兼诸部，部众渐盛”，可能即指其兼并鲜卑鹿结等部。

“祐邻死，子结权（《西秦录》作‘诘权’）立，徙于牵屯。”如前所述，牵屯是秃发鲜卑于3世纪60年代迁于河西的极东之地，故祐邻后期或结权时，乞伏氏部落联盟当臣属于晋泰始六年至咸宁五年在凉州有很大势力的秃发树机能。结权死，子利那立，“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讨尉迟渴权于大非川，收众三万余落”。鲜卑吐赖部所居之乌树山无考，大致在陇西之地。尉迟渴权，原为尉迟部人，以部名为氏。《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云：“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姓焉。”又赞宁《宋高僧传》卷四记唐高僧窥基，俗姓尉迟，“尉迟之先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国”。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据上引尉迟渴权

在大非川的记载，认为尉迟部原居大非川，本西部鲜卑，属吐谷浑。[12]此说也有问题，首先是大非川的位置，姚先生是以唐代大非川的位置来考订二百多年前乞伏氏所讨尉迟渴权所在的大非川，故定为青海布喀河。而目前中外学者大都认为唐代大非川在今青海湖南惠渠或此川之南的切吉旷原，此其一。无论唐代大非川在青海何处，它与二百多年前尉迟渴权所居之大非川是否同一？根据当时的形势，乞伏利那在牵屯山，只是一个势力并不十分强大的部落联盟，他所讨之尉迟渴权所在的大非川，如果与唐代大非川同一，则远在青海，其间他必须经过秃发鲜卑、乙弗、契汗等部及汉族聚居之地，这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尉迟渴权所居之大非川绝不会在今青海湖南或湖西，而必在陇西或朔方一带。《魏书》卷二《太祖纪》曾记：北魏天兴“六年（403）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则尉迟渴权可能原为朔方尉迟部迁入陇西地区者，其所居大非川，也当在朔方或陇西一带，此其二。如此，云尉迟部原居青海大非川，乃西部鲜卑族的说法，就难以成立。那么尉迟部属何族？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它又牵涉于阗王族尉迟氏的族属问题。曾有人写文章，认为尉迟氏源于月氏，公元前2世纪月氏人为匈奴攻破于敦煌、祁连间，月氏人仓惶四奔，除大规模的西迁外，肯定还有向其他方向（如往朔方）奔走的。[13]此说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有一些问题，还应进一步研究。

“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讨鲜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众二万余落。”苑川，据《水经注》卷二河水云：“苑川水出勇士县之子城南山，东北流，历此城川，世谓之子城川。”注云：“又曰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有东西二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唐杜佑《通典》卷一七四兰州条云：“苑川在今五泉县。”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引上述二书后，说“以下文乞伏吐雷为勇士护军观之，则《水经注》为是”。按苑川应指今甘肃兰州东、流入黄河的苑川，那里地土肥沃，乞伏部鲜卑击莫侯部当于此川一带。而唐代五泉县即金城郡治，在今甘肃兰州，其所辖区当包括今苑川河流域，故《通典》云苑川在五泉县。

以乞伏部为首的部落联盟自迁到苑川之后，部众从高平川时的五万余落，又先后增五万余落，一共十万余落，一落如按五口计，则有五十余万人。而苑川之地，又是“龙马之沃土”，因此，乞伏等四部的部落联盟得以迅速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在记述了述延居苑川后，又云：“以叔父轲埿为师傅，委以国政，斯引乌埿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这段记载表明，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由于内部游牧经济的发展和受到邻近封建国家的影响，开始向国家政权过渡，建立了一些简单的官制。“师傅”，管理联盟内部事务，此职相当于魏晋以来“丞相”一职，其余“左、右辅”将军，“率义”将军等号，则完全仿自汉魏政权的官号。这种官制虽然还极不完善，但说明在以乞伏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内部，由于不断迁徙和征服其他鲜卑部落，私有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原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发生了变化，逐渐被以地域为基础的氏族所替代。这样，部落联盟内就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管理整个联盟的事务，开始向国家政权的形式过渡。

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讲，当时的乞伏等四部仍然还是部落联盟，各部落分镇一方：乞伏部据苑川；斯引部首领乌埿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此川具体所在不详，乌埿为“左辅”，当在苑川之南；出连部首领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当在苑川之北；叱卢部首领那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在今平凉西，苑川东北。而联盟的首领，则一直为乞伏部首领所世袭。据上引《晋书》推断，述延在位时间，大致相当于十六国初前赵雄踞中原、张轨初据河西之时。北方当时处于分裂割据之中，所以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才有可能据牵屯至苑川一带，得以迅速发展。

二 陇西鲜卑及其部落

与河西鲜卑一样，所谓陇西鲜卑也就是指活动于陇西的鲜卑各部，其中包括最有势力的以乞伏部为首的部落联盟。《晋书·乞伏国仁载记》《西秦录》等开首就说：“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晋书》卷一一五《苻登载记》亦明言“陇西鲜卑乞伏乾归”。此外，文献中还有称乞伏部之外的鲜卑部落为陇西鲜卑者，如《晋书·苻丕载记》记苻丕益州刺史王广为“陇西鲜卑匹兰所执”，送于后秦。[14]陇西鲜卑之名，大约与河西鲜卑一名一样，是在晋末十六国初开始出现的。其中除主要的乞伏等四部的部落联盟之外，可考的还有：

（一）鲜卑鹿结部

此部原居高平川，泰始初为乞伏部所击并，其中一部分奔略阳，后降西秦。

（二）鲜卑吐赖部

原居乌树山，后为乞伏部所并。

（三）鲜卑莫侯部

原居苑川，后并入乞伏部。

（四）勃寒部

《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云，乞伏部至司繁时，降前秦，“俄而鲜卑勃寒侵斥陇右”，苻坚命司繁击之，“勃寒惧而请降，司繁遂镇勇士川”。据此知勃寒部原居勇士川（在苑川东），后并入乞伏鲜卑。

（五）匹兰部

如上述，陇西鲜卑匹兰曾擒苻丕益州刺史王广于秦州，送后秦。据此，知此部在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而在此前一年（晋太元十年），匹兰部曾有五千人降于刚建立西秦政权的乞伏国仁。[15]

（六）密贵、裕苟、提伦三部鲜卑

《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云：“国仁率骑三万袭鲜卑大人密贵、裕苟、提伦等三部于六泉。高平鲜卑没奕于、东胡金熙连兵来袭，相遇于渴浑川，大战败之，斩级三千，获马五千匹。没奕于及熙奔还，三部震惧，率众迎降。署密贵建义将军、六泉侯，裕苟建忠将军、兰泉侯，提伦建节将军、鸣泉侯。”此三部所居之“六泉”，《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六月条胡注：“六泉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渭州襄武县（今甘肃陇西附近）条云：“六泉水，在县东北原上。泉源有六，因以为名。”胡三省系因国仁与高平的鲜卑破多罗部首领没奕于大战，败之，三部惧而降，故断六泉在高平，恐

不确。应以《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为是。

（七）越质部

《晋书·乞伏国仁载记》记：国仁“因讨鲜卑越质叱黎于平襄，大破之，获其子诘归、弟子复半及部落五千余人而还”。《资治通鉴》卷一○七系此事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388）四月，下胡注曰：“平襄县，汉属天水郡，晋属略阳郡。越质盖鲜卑部落之号，后以为氏。”平襄，在今甘肃通渭西南，越质部降西秦后，首领诘归后为西秦陇西太守。

（八）鲜卑豆留[革奇]、叱豆浑等部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记，晋太元十四年（389）“鲜卑豆留[革奇]、叱豆浑及南丘鹿结并休官曷呼奴、卢水尉地跋并率众降于乾归，皆署其官爵”。内鲜卑豆留[革奇]、叱豆浑等部在陇西何地不详；南丘鹿结，疑即先居高平川后逃至略阳的鲜卑鹿结，故南丘可能在略阳。休官，据《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十二月条胡注：“休官，杂夷部落之名。”唐长孺先生以休官多氐族吕氏，以为“休官是氐族”[16]。卢水，即卢水胡。

（九）大兜国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云：“苻登将没奕于（即前述高平破多罗部鲜卑首领）遣使结好，以二子为质，请讨鲜卑大兜国。乾归乃与没奕于攻大兜于安阳城，大兜退固鸣蝉堡，乾归攻陷之，遂还金城。”《资治通鉴》卷一○七系此事于晋太元十六年（391），且云“乾归收其部众而还”。大兜所居之安阳城，上引《资治通鉴》胡注：“安阳城在唐秦州陇城县界；鸣蝉堡亦当在其地。”则安阳城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

（十）叠掘部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云：“鲜卑疊（《资治通鉴》作‘叠’）掘河内

率户五千，自魏降乾归。”《资治通鉴》卷一一一系此事于晋隆安三年（399），且记“西秦主乾归以河内为叠掘都统，以宗女妻之”。胡注云：“叠掘亦鲜卑之一种也。”按叠掘即折掘，如前所述，其部主要在湟水流域，为南凉所统治。河内自魏来降，时魏西界仅达河套一带，则河内原居河套朔方，至是降西秦。

（十一）鲜卑悦大坚部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云：“炽磐攻克枹罕，遣使告之，乾归奔还苑川。鲜卑悦大坚有众五千，自龙马苑降乾归。”《资治通鉴》卷一一五系炽磐克枹罕在晋义熙五年（409），未记鲜卑悦大坚事。悦大坚原居地龙马苑，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渭州鄣县（今甘肃漳县）条云：“龙马山，在县西四十里。”疑悦大坚部所居之龙马苑，即在鄣县西四十里龙马山一带。

（十二）仆浑部

《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十月条记：“鲜卑仆浑、羌句岂、输报、邓若等帅户二万降于西秦。”次年，西秦将仆浑部徙于度坚城（在度坚山）。仆浑部原居地无考。

以上十二部均为“陇西鲜卑”部落，其中除叠掘、悦大坚、仆浑三部迁徙至陇西的时间较乞伏部晚，或者不清外，余九部皆比乞伏部徙入陇西为早。迁徙的时间大约与秃发鲜卑进入河西的时间相同。如前所述，曹魏末邓艾主陇右军事，曾“纳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魏时的雍州包括广魏、天水、南安、陇西诸郡，即包括今陇山以西、兰州以东所谓“陇西（或陇右）”地区。因此，我们推测上述九部迁入陇西，也是邓艾时徙鲜卑各部至雍州的一部分。因其居陇西，故自晋末以来称为“陇西鲜卑”。

建立西秦的乞伏鲜卑，在陇西鲜卑中的地位，也和秃发鲜卑在河西鲜卑中的地位一样，不同的是乞伏鲜卑迁入陇西较秃发鲜卑迁入河西的时间要晚一些。在迁徙过程中，乞伏部鲜卑就不断兼并、征服早已迁入陇西的其他鲜卑部落，势力发展很快，因此比秃发鲜卑建立政权时间要早。

[1] 《周书》卷二七《田弘传》。

[2] 见《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等。

[3] 参见拙作《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96页。

[4] 参见拙作《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6页。

[5] 按《隋书》卷五五《乞伏慧传》云："乞伏意字令和，马邑鲜卑人。"但《魏书》卷八六《乞伏保传》记："乞伏保，高车部人"，似乞伏氏为高车人。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302～303页）云，乞伏保非姓"乞伏"，而姓"乞"，为高车乞袁氏之改称。乞伏氏应为鲜卑。

[6] 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第438～439页。又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5～6页）云：赀虏即东汉檀石槐部落大联盟的"鲜卑西部"（内包括拓跋鲜卑）。

[7] 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载《史学杂志》第48编11号。

[8] 见拙作《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9] 见拙作《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10] 见197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

[11] 见王俊杰《西秦史钩沉》，载《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又《太平御览》卷四四引《泾阳图经》曰："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鲜卑等类多依山谷为氏族。今贺兰姓名，皆因此山。"内云鲜卑等类多依贺兰山谷为氏族，亦证乞伏部早曾居此山。

[12]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193～196页。

[13] 殷晴：《于阗尉迟王家世系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14] 《资治通鉴》卷一○六，系此事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月。

[15]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

[16] 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第391页。

第二章 西秦的建立及其与邻近政权的关系

一 西秦建立前陇右的形势

以乞伏部为首的部落联盟迁至苑川后，势力增强，据有苑川、勇士川及牵屯山一带。不久述延死，祁渠子傉大寒立。[1]《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云：傉大寒立后，“会石勒灭刘曜，惧而迁于麦田无孤山”[2]。按，后赵石勒灭前赵刘曜是在晋咸和三年（328）。次年，石勒遣石虎（季龙）等从长安西攻刘曜子熙等于上邽（今甘肃天水），克之，又进攻集木且羌于河西，“俘获数万，秦陇悉平”。“凉州牧张骏大惧，遣使称藩，贡方物于勒。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3]后赵势力伸入秦陇，对据苑川的乞伏等四部联盟来说，也是一个威胁，故其部首领傉大寒惧而向北迁至麦田无孤山（今甘肃靖远北）。

《西秦录》记：“太寒卒，子司繁立。秦始皇中，迁于度坚山。建元七年，秦将王统来伐，司繁率骑三万拒统于苑川。统潜袭度坚山，部民五万余落悉降于统。繁乃诣统归降，苻坚拜南单于，留之长安。”[4]文内“秦始皇中”，应为前秦“皇始中”，“皇始”为苻健年号，《西秦录》误。也就是说在皇始中（351～354），司繁率部由麦田无孤山迁至度坚山。《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云，度坚山在靖远卫西，即今甘肃靖远县西。又据《晋书》卷一一二《苻健载记》记：“其年（354年，晋永和十年），西虏乞没军邪遣子入侍……”乞没，疑即乞伏之异译，也就是说“西虏乞没军邪”很有可能即乞伏部鲜卑，此时向苻健遣质子、称臣，但关系并不密切，时断时续。至前秦建元七年（371），苻坚遣将王统击司繁，司繁率骑三万拒统于苑川，后因诸部叛降，司繁也降，苻坚以其为南单于，留于长安；又“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5]。按，建元七年，正是前秦势力伸入陇右的时候，三月苻坚遣苻雅、王统等伐仇池（今甘肃西和西南）氐主杨纂，纂降。据河西的张天锡，也遣使向前秦谢罪称藩，甚至远在今甘南、青海的吐谷浑碎奚也遣使献马于前秦。故有王统击乞伏司繁部之事。王统系秦州屠各族首领，屠各王氏一族在陇西颇有势力，拥有自己的部曲，历仕晋、前赵、后赵、前凉。[6]晋永和十年（354），王统父王擢从前凉叛归前秦，其子统初任前秦扶风内史，后转益州刺史（治扶风）。晋太和六年（371），统随苻雅等击杨纂，后又击乞伏司繁。

至前秦建元九年（373），有陇西鲜卑勃寒掠陇右，苻坚以司繁为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击之，勃寒降。于是，苻坚令司繁回镇勇士川，甚有威惠。[7]

从晋末至十六国初，陇右地区民族关系十分复杂，而乞伏氏部落联盟何以成为陇右地区最为强大的势力，终至建立西秦政权呢？这主要与这一时期陇右地区各民族的兴衰有关。陇右地区的民族，除上述陇西鲜卑各部之外，主要还有汉、氐、羌、匈奴屠各、休官、丁零、卢水胡等。下面我们对居于陇右各族的情况，略加叙述。

（一）汉族

汉族分布于陇右各地，自魏晋以来，形成了一些豪门大族，如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8]，还有南安的秘氏等。这些豪门大姓自晋末以来，大都受到前、后赵政权的打击，有的东徙，势力衰落。留于陇右的豪族，拥有自己的坞堡和部曲，且依附于占领陇右的政权，不论这些政权是否汉族所建。

（二）羌族

陇右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是羌族聚居之地，羌人众多。最著名者为南安赤亭羌姚氏（汉烧当羌之后），首领姚弋仲于后赵时率众东迁于清河（今山东清平南）。后赵亡，又属前秦。至弋仲子苌时，杀苻坚，建后秦。此外，还有南安羌雷氏、秦州羌莫折氏，以及彊川羌、枹罕羌彭氏等。

（三）氐族

此族汉化较早，在陇右主要聚居于仇池，以杨姓为首，十六国以来处于依附中原地区政权的半独立状态。其中一部分早迁于略阳等地的氐族，如蒲（苻）氏、吕氏等。蒲氏，后改苻氏，后赵时首领蒲洪率部东迁枋头（今河南汲县北）。后赵亡后，洪子健率部入关中，建前秦。吕氏，也是略阳氐族，首领吕婆楼为前秦太尉，苻坚时曾命婆楼子吕光征西域，后据河西，建后凉。

（四）屠各

此族原是匈奴休屠王所领部众，汉初居河西，后降汉，分置秦陇各地。[9]秦州略阳屠各王氏一族，于晋时迁至略阳，颇有势力。至王擢子统时，降前秦，为益州刺史，曾击降乞伏部。其后擢孙伏仁为西秦祁连、汉阳二郡太守。[10]

（五）休官

如前所述，休官为陇西杂夷部落，主要分布在今天水、陇西一带。

（六）丁零（高车）

陇右的丁零，主要是东汉建武时逃至武威、酒泉北的匈奴奴婢赀虏中的丁零。曹魏时，有的赀虏已东迁至广魏郡（治今甘肃天水东），南下到今成县一带。[11]

（七）卢水胡

主要指在河西张掖，以沮渠氏为首的临松卢水胡，其中可能有一部分迁入陇右地区。前述的“卢水尉地拔”即是。

以上七族之中，势力最大的是汉、氐、羌三族。汉族自东汉末年以来，元气大丧，许多豪门大族被迫东迁，有的随苻氏、姚氏入关中。氐族苻氏虽建前秦，但中心在关中长安。吕氏在前秦时，也主要活动于关中、中原等地，后又入西域。羌族姚氏，前秦时也主要活动在关中，其余羌族分散于陇右南部较为偏僻的地区，势分力弱。屠各王氏，于前秦初为陇右势力较强者，苻坚曾以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后又为凉州刺史[12]，不在陇右。总之，在前秦建元初，陇右各族势力或东迁，或衰弱，这就给漠北等地的鲜卑深入陇右、势力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其次，自东汉末年，历魏、晋，陇右地区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乱，及历代统治者强迫的迁徙，人口减少。这也就使徙入陇右的鲜卑各部得以立足，并且迅速发展起来（见表三）。

表三 汉至晋时陇右地区户口升降

郡名	时代	包括的县名	人户数		资料出处
			户数	人数	
武都郡	西汉	武都、上禄、故道、平乐道、沮、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河池	51376	235560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东汉	下辨、武都道、上禄、故道、河池、沮、羌道	20102	81728	《后汉书》卷第二三《郡国志五》
	西晋	下辨、河池、沮、武都、故道	3000	—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陇西郡	西汉	狄道、上邽、安故、氐道、首阳、予道、大夏、羌道、襄武、临洮、西	53964	236824	《汉书·地理志下》
	东汉	狄道、安故、氐道、首阳、大夏、襄武、临洮、枹罕、白石、鄣县、河关	53964	236824	《后汉书·郡国志五》
	西晋	襄武、首阳、临洮、狄道	5628	29637	《汉书·地理志下》

表三 汉至晋时陇右地区户口升降-续表

郡名	时代	包括的县名	人户数		资料出处
			户数	人数	
天水郡	西汉	平襄、街泉、戎邑道、罕开、绵诸道、冀、勇士、成纪、清水、奉捷、陇、豲道、兰干、望垣	60370	261348	《汉书·地理志下》
	东汉（改名汉阳郡）	冀、望垣、阿阳、略阳、勇士、成纪、陇、豲道、兰干、平襄、显亲、上邽	27423	130138	《后汉书·郡国志五》
	西晋（应包括天水、南安、略阳三郡）	上邽、冀、始昌、新阳、成纪；豲道、新兴、中陶；临渭、平襄、略阳、清水	22120	—	《晋书·地理志上》
金城郡	西汉	允吾、浩亹、令居、枝阳、金城、榆中、枹罕、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街、临羌	38470	149648	《汉书·地理志下》
	东汉	允吾、浩亹、令居、枝阳、金城、榆中、临羌、破羌、安夷、允街	3858	18947	《后汉书·郡国志五》
	西晋（应包括金城、西平两郡）	榆中、允街、金城、白石、浩亹；西都、临羌、长宁、安夷	6000	—	《晋书·地理志上》

表三所列数字是不完整的，西汉、东汉和晋时郡县区划、辖县的多少并不相同，我们虽然尽量把各郡人口的统计限制在同一地区之内，但历代终究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将以上陇右四郡各时代的总人数、户数相比较，则其误差又会小一些，试见下列数字：

西汉时上述四郡总户数204180 总人数883380

东汉时上述四郡总户数57011 总人数260450

西晋时上述四郡总户数34120 总人数（缺）

再次，从西汉到西晋历代封建政权所统计的人口数，一般是国家能够控制，并向国家纳赋税、服徭役的人户，而自东汉以后，豪门士族多有自己的坞堡和部曲。这些部曲多不直接向国家缴纳贡赋，故未统计在内。因此，表内东汉至晋陇右四郡的人口数大量减少。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表内所列数字只能作为参考。尽管如此，从表中不完全的统计来看，从西汉至晋，陇右的户口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其中武都、陇西、金城三郡更甚。

总之，从陇右各民族的分析及从西汉以来户口下降的趋势来看，都有利于鲜卑族大量迁入陇右地区，并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以乞伏氏为首的鲜卑部落大联盟能逐渐成为陇右的霸主，最终于陇右地区建立西秦政权，绝不是偶然的。

二 西秦政权的建立

前秦建元十二年（376），苻坚遣梁熙、王统、姚苌等击灭前凉张氏，以梁熙为凉州刺史，“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13]。于是，河西、陇右之地全为前秦所有，《资治通鉴》卷一○四，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十二月条记：“是岁（376），乞伏司繁卒，子国仁立。”乞伏国仁继承父业，仍为前秦镇西将军，假前秦之强盛，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

建元十九年（383），苻坚一面遣吕光率兵七万从长安出发，西征西域；一面征集全国丁壮，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南击东晋，欲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陇西乞伏部亦在征调之列，苻坚以乞伏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淝水之战前夕，国仁叔父步颓反于陇西，苻坚即遣国仁率军还击之。步颓乃迎国仁于路。国仁置酒高会，大言曰：“当与诸君成一方之业。”[14]不久传来苻坚淝水大败的消息，国仁“乃招集诸部，有不附者，讨而并之，众至十余万”。此时，前秦境内其他鲜卑、羌、丁零等纷纷反秦自立，原前燕贵族慕容垂和丁零翟斌合兵攻洛阳，慕容冲起兵攻围长安，羌姚苌反于渭北。建元二十一年（385），苻坚被姚苌杀于新平。乞伏国仁在陇西对部帅说：“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于乌合之众，可谓天也。夫守常迷运，先达耻之；见机而作，英豪之举。吾虽薄德，藉累世之资，岂可睹时来之运而不作乎！”内所云之“藉累世之资”，是指国仁以前几代在陇西积聚了实力，故国仁要乘前秦即将瓦解之机，称王独立。同年九月，国仁即“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

牧，建元曰建义。以其将乙旃音埿（《资治通鉴》作'乙旃童埿'）为左相，屋引出支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郡勇士为右辅，弟乾归为上将军，自余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漒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十二郡，筑勇士城以居之"[15]。

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及改元建义，标志着以乞伏部为首的部落联盟从此建立了国家，历史上也以此年作为西秦建国之始。西秦建国初的官制显然是受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影响，但仍保留了"大单于"的称号，这与南凉建国的情况相同。此时原组成乞伏部部落联盟的斯引、出连、叱卢三部首领，在新建的西秦政权中已退居次要地位。在政权中任要职的，皆为少数民族。乙旃氏、屋引氏为高车人的姓氏[16]；独孤氏，《北朝胡姓考》以为原为匈奴屠各[17]；武群氏不详，但绝非汉族。其所置十二郡，《西秦录》及《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等均记为十一郡，误。此十二郡皆在陇西地区，其建置沿革及位置容后再考。国仁所筑的勇士城当在勇士川，为西秦第一个都城。

如前所述，西晋末至十六国初陇右地区的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刚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的西秦还是极不稳固的。乞伏氏建国前，势力主要在陇西郡（治今甘肃陇西），陇西郡以东势力较弱。据《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国仁建立政权后，有"鲜卑匹兰率众五千降"，此匹兰应即前述秦州陇西鲜卑匹兰，故国仁所置十二郡中有"天水""略阳"等郡。而事实上，国仁所置天水、略阳等郡只是名义上或侨置在他处的。其余如漒川、甘松、匡朋、白马等郡大抵均如此。因为当时在陇右还有一些割据势力存在。

首先，是前秦苻坚亡后，其子丕于晋阳（今山西太原）继位，时"左将军窦冲、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壁、卫将军杨定，并据陇右"，丕均加以敕封。其中，王广在前秦苻丕太安元年（385）长安陷于慕容冲后，即从成都奔至秦州，与兄王统会合。次年四月，王广袭河州牧毛兴于枹罕（今甘肃临夏），失败后奔还秦州，为陇西鲜卑匹兰所执，送于后秦姚苌。九月，王统即以秦州降后秦，姚苌以姚硕德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秦州刺史，镇上邽（今甘肃天水）。[18]如此，今甘肃天水一带为后秦所有，西秦所设置之天水、略阳诸郡是侨治在其他地区的。

其次，西秦对天水以西的南安郡（治今甘肃陇西东）的控制也是极

不稳固的。就在西秦建立后第二年（386）初，南安的豪族秘宜[19]率羌、胡五万多人攻乞伏国仁，四面而至。国仁率精骑五千，袭其不意，大破之，秘宜逃回南安。七月，河州枹罕诸氐废卫平而拥立苻丕族子苻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抚军大将军，雍、河二州牧，略阳公”。登帅众五万，东下陇，攻拔南安。秘宜与莫侯悌眷率其众三万余户降于国仁，国仁以宜为东秦州刺史，悌眷为梁州刺史。[20]国仁所置东秦州、梁州当在南安之西，南安为苻登所据有。苻丕封登为征西大将军、南安王，登则积极准备东攻后秦。九月，姚硕德镇秦州，为苻登所败。十月，登闻丕死，即前秦帝位于陇东，改元太初。以后，苻登与后秦姚苌、姚兴在秦州、陇东和关中西部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拉锯战。

在刚建立的西秦西边的河西地区自苻坚死后，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征西域的吕光于前秦苻丕太安元年（385）自龟兹（今新疆库车）返回河西，杀前秦凉州刺史梁熙，据姑臧。次年光闻坚死，改元太初（一作太安），正式建立政权，史称后凉。由于后凉初建，主要力量放在巩固政权之上，一时还无力向东扩张，故暂时与西秦相安无事。

西秦的南边主要是较为分散的羌族部落，以强川羌最强。强川，据《资治通鉴》卷一一四胡注引段国《沙州记》云：“洮水出强台山东北，径吐谷浑中。自洮、强南北三百里中，地草皆是龙须，而无樵柴，谓之强川。”强台山即西倾山（今甘南西倾山）。则强川之地当在今甘南西倾山东北、洮水中上游一带。国仁初置十二郡中有强川，说明此地羌族首领至少在名义上是臣属于西秦的。强川以西、以南就是在永嘉末（312～313）由阴山一带迁至陇右的慕容吐谷浑部。吐谷浑原居辽东，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首领吐谷浑为慕容廆庶兄，因与廆部争夺牧场，而西迁阴山，永嘉末又度过陇山至枹罕西北罕开原。后向西向南扩展，领有今四川西北部、甘南和青海等地。东晋建武元年（317）吐谷浑死，子吐延立。吐延死，子叶延立，始建政权，以祖父吐谷浑名为姓氏、部族名，亦为国号。前秦建元七年（371），叶延子碎奚曾向前秦献马、黄金，苻坚封之为“安远将军、强川侯”[21]。在乞伏国仁建立政权前后，正是碎奚子视连在位时（376～390）。[22]由于南边有吐谷浑政权，刚建立的西秦也不可能向南扩张。

从以上的分析知西秦建立初，自南安以东先后为后秦姚苌和前秦苻登所据，双方不断争战；西边自兰州、黄河以西，为后凉吕光所有；南边是吐谷浑政权。这一形势对刚建立的西秦是不利的，限制了它向东、

西、南三个方向的发展，这一形势也就决定了西秦对外、对内的政策。

在对外方面，西秦周围的政权，除吐谷浑建国较早外，其余均是在苻坚死后先后兴起的，他们都有一个巩固自己政权的过程；除前、后秦之外，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十分尖锐，处于暂时和平相处的阶段。因而，西秦采取与邻近的三个政权（前秦苻登、后凉吕光、吐谷浑视连）和好的政策。在对前秦苻登方面，国仁还有进一步的考虑，即因后秦雄踞关中，势力最强，苻登与后秦的连年战争，将会削弱双方的力量，而苻登的存在对于抵挡后秦势力的西进，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国仁于前秦太初二年（387）三月，接受了苻登给予的“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的封号[23]，明显站在苻登一边。

在对内方面，国仁则以全力巩固自己的政权。西秦建义三年（387），国仁率骑先攻苑川东北六泉的鲜卑密贵、裕苟、提伦三部，击败由高平南下的鲜卑没奕于等于渴浑川（在勇士县东北）[24]，以上三部降；封密贵为建义将军、六泉侯，裕苟为建忠将军、兰泉侯，提伦为建节将军、鸣泉侯。次年（388）初，西秦建威将军叱卢乌孤跋拥众反，保牵屯山。按，叱卢乌孤跋应为原以乞伏部为首的部落联盟中叱卢部首领，一直守牵屯山，此时叛保牵屯山。国仁率骑七千击之，斩其部将叱罗侯，降者千余户。乌孤跋降，国仁复其官位。[25]四月，国仁以平乌孤跋之威，击居平襄的鲜卑越质部首领越质叱黎，俘获其子诘归、弟子复半及部落五千余人而还。后又以诘归为陇西太守，镇平襄。

同年六月，国仁卒，群臣以国仁子公府年幼，推国仁弟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改元太初。乾归立其妻边氏为王后，“置百官，仿汉制，以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26]，金城边芮为左长史，东秦州刺史秘宜为右长史[27]，武始翟勍为左司马，略阳王松寿为主簿，从弟轲弹（《晋书》作轲殚）为梁州牧，弟益州为秦州牧，屈眷为河州牧”。九月，乾归由勇士城迁都至金城（今甘肃兰州西）。[28]乾归所置的这些州牧，正如胡三省注所云，“不过分居河、陇之间”，带有名义上的侨治性质。尽管如此，乾归继立后所采取的措施仍然促进了西秦政权的建设和发展。如从上述所记职官及任职官吏的人名，可知西秦政权进一步汉化，而且摆脱了国仁时基本上任命少数民族上层为官吏的情况。内左、右长史金城边芮、南安秘宜系陇右豪族，左司马武始翟勍是汉化了的丁零大姓，主簿略阳王松寿，似为汉族。即是说，乾归继立后，开始了西秦王族乞伏氏与陇右一些汉族豪

族结合的过程。这是十六国时少数民族所建政权能够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对外、对内政策方面，乾归即位初期仍承袭兄国仁的方针，以巩固政权为主。西秦太初二年（389）正月，前秦苻登以乾归新立，即封之为大将军、大单于、金城王。接着，有南羌独如率众七千降乾归。五月，乾归又击盘据在牵屯山的休官阿敦、侯年二部，破之，二部众五千余落悉降，于是“声振边服”。“鲜卑豆留䩭、叱豆浑及南丘鹿结并休官曷呼奴、卢水尉地跋并率众降于乾归，皆署其官爵。”[29]这正如《资治通鉴》卷一○七所记：“于是秦、凉鲜卑、羌，胡多附乾归。”同年十一月，枹罕羌族首领彭奚念附于乾归，以奚念为北河州刺史。[30]按，枹罕原为河州刺史治所，乾归既先以弟屈眷为河州牧，置河州（治所不详），后又置北河州，以奚念为刺史，治枹罕。这样，西秦政权在西至金城、苑川，东到南安、平襄，北抵牵屯，南达枹罕的广大地区，开始巩固和发展起来。

三 西秦政权的发展及其与邻近政权的关系

西秦太初三年（390），由于四周一些鲜卑、羌、休官等部的归附，西秦政权日益巩固，影响所及，甚至南边的吐谷浑政权也向西秦称臣纳贡。同年四月，吐谷浑视连遣使向西秦贡方物，乾归拜视连为“沙州牧、白兰王”[31]。按，吐谷浑中心在沙州（今青海贵南北穆格塘），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32]也为吐谷浑重要根据地，故有此封号。九月，视连卒，子视罴立。十月，乾归遣使拜视罴沙州牧、白兰王。视罴有大志，不愿向西秦称臣，不接受封号，从此两国交恶。[33]年底，西秦陇西太守越质诘归据平襄叛西秦，自称建国将军、右贤王。乾归于次年（391）元月，率军击之，诘归东奔陇山，后又率众降，乾归妻以宗女，署立义将军。[34]同年七月，在高平的前秦苻登骠骑将军没奕于（即前述鲜卑破多罗部首领）以二子为质，请与乾归共击鲜卑大兜国，于是乾归等攻陷安阳城及鸣蝉堡，收其部众而还，并归没奕于二子。八月，乾归率骑一万击没奕于于高平，没奕于奔他楼城（在高平东），乾归射之，中其目。[35]这样，西秦的势力从东北方向，一直扩展到平襄、高平一带。

西秦的巩固和扩展，引起其西边后凉吕光的注意。吕光此时基本上平息了内乱，开始准备向东扩展。因此，当乾归击败高平没奕于时，吕

光乘虚向西秦进攻，乾归闻信，引兵还金城，光兵亦退。[36]这是后凉与西秦的第一次冲突。由于河西、陇右相接，是内地与西方交通必经之地，后凉欲东，西秦欲西，皆相互有碍，故两个政权均欲吞并对方，一开始交往就处于敌对状态。至太初四年（391）八月，吕光遣弟吕宝等攻乾归，败之于鸣雀峡，乾归退屯青岸（在金城郡），反击，杀吕宝等。光又遣子吕纂等率骑五千南击西秦彭奚念，亦败。吕光大怒，亲自率军击奚念于枹罕，奚念惧，于白土津（在今青海尖札附近）累石为堤，以水自固，遣精骑一万距守河津（今青海循化东黄河岸）。光遣将军王宝潜赴上津，夜渡湟河，自率大军攻克枹罕，奚念单骑奔甘松（今白龙江上游甘松山），光引军还。[37]后凉吕光虽然两次败于乾归，但是最后攻克了西秦的枹罕，成了西秦西边的劲敌和威胁。

这时，西秦东面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前秦苻登因进攻后秦，势力东进至陇东，而据仇池一百二十里的历城氐族杨定，乘机于太初三年（390）北上，取陇城、冀城（今甘肃甘谷南）、略阳，遂领有秦州之地，自称秦州牧、陇西王。[38]太初四年底，又有休官首领权千成据秦州显亲（今甘肃天水西北），自称秦州牧。[39]次年（西秦太初五年，392）初，权千成为前秦所逼，降西秦，乾归以其为“东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统、显亲公”[40]。乾归势力东进至显亲一带。而此时前秦苻登也因与后秦连年战争，势渐衰。后秦姚苌多次击败苻登，太初四年高平的没奕于又转降后秦，姚苌封其为车骑将军、高平公。太初六年，姚苌死，子姚兴立。苻登乘机准备大举向后秦进攻。次年初，登遣使拜乾归为“假黄钺、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左丞相、大将军、河南王，领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锡之礼”[41]，欲借西秦之力以攻后秦，故有是封。四月，苻登为姚兴击败，与太子苻崇奔平凉（今甘肃华亭附近）。六月，登遣子汝阴王苻宗为质于乾归，晋封乾归为梁王，纳其妹东平长公主为梁王后。乾归即遣前将军益州、冠军将军翟瑥率骑二万救之。七月，苻登即为姚兴所击杀，太子苻崇奔湟中，即帝位[42]，前秦已名存实亡。益州等率军回。

同年十月，乾归因苻崇残余势力不利于己，遂遣军逐之，崇奔据有秦州的氐族陇西王杨定。苻崇与杨定势力的结合，对西秦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见东边后秦强盛，欲西进取乾归，率骑四万攻西秦。[43]乾归遣凉州牧轲弹、秦州牧益州、立义将军诘归[44]率骑三万拒之。杨定先击败益州于平川（今甘肃陇西与天水间），轲弹、诘归惧而退兵。轲弹司马翟瑥奋剑而曰：“吾王以神武之姿，开基陇右，东征西讨……将军以

维城之重，受阃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辅宁家国。秦州虽败，二军犹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败，何面目以见王乎！”轲弹于是率骑赴前，益州、诘归亦勒众而进，遂反败为胜，杀杨定及苻崇，斩首万七千级。这次战争对于西秦的巩固和发展是十分关键的一仗。至此，乾归“尽有陇西之地”[45]。

十二月，乾归改河南王号为“秦王”[46]，史称乞伏氏所建政权为“西秦”，即由此而来。接着，乾归大赦，“署其长子炽磐领尚书令，左长史边芮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翟瑥为吏部尚书，翟勍为主客尚书，杜宣为兵部尚书，王松寿为民部尚书，樊谦为三公尚书，方弘、麹景为侍中，自余拜授一如魏武、晋文故事。犹称大单于、大将军”[47]。乾归采取的这一政权建设的措施，基本上是“一如魏武、晋文故事”，即仿魏晋的官制，正式在中央机构中置尚书省、门下省，进一步汉化。从参政的人名中可见，汉族豪门士族增多，表明乞伏氏政权进一步与陇右汉族豪门大族结合起来了。此外，乾归还保留“大单于、大将军”之号，一方面说明其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故存“大单于”号以便于统治；另一方面保存“大将军”号，则反映西秦统治者崇尚武力，掌握兵权，以利于争战。

西秦虽然破杨定、苻崇，取秦州之地，但秦州重镇上邽（今甘肃天水）却为天水姜乳所袭据。[48]太初八年（395）四月，乾归遣乞伏益州率骑六千击姜乳，左仆射边芮、民部尚书王松寿言于乾归，说益州屡胜而骄，不宜专征。乾归以益州骁勇，又恐其专擅误事，遂以平北将军韦虔为长史、散骑常侍乞伏务和为司马[49]，辅益州出征。军至大寒岭（在上邽西），益州轻姜乳为乌合之众，不为部阵，命战士解甲游猎、纵饮。韦虔等劝谏不听，遂为姜乳所败。乾归赦益州等战败之罪。[50]这样，西秦仅占有秦州大部，上邽仍为姜乳所据，留下了隐患。六月，乾归迫于后凉的势力，由金城迁都于苑川西城。[51]时又有河西秃发如苟率户二万降西秦，乾归妻以宗女。[52]

同年七月，西秦西边后凉吕光率众十万将击西秦。西秦左辅将军密贵周、左卫将军莫者羖羝劝乾归遣子为质，称藩于后凉。乾归即以子敕勃（《西秦录》作“勃勃”）为质，既而悔之，杀密贵周、莫者羖羝。[53]按，莫者，又译作莫折，为秦州羌族大姓，北魏末于秦州起义的羌族莫折念生，即此族莫折氏。

西秦太初九年（396）正月，有休官权万世率众降西秦。[54]权万

世，与前述显亲休官权千成同族姓，当亦在秦州。十月，西秦乾归弟秦州牧益州与从弟凉州牧轲弹发生矛盾，轲弹叛投后凉。[55]接着，西秦立义将军越质诘归率户二万又叛西秦，降后秦，姚兴以其为镇西将军、平襄公，处之于成纪（今甘肃秦安北）。姚兴即以成纪为据点，遣陇西王姚硕德攻上邽姜乳，乳率众降。后秦即以姚硕德为秦州牧，镇上邽，征姜乳为尚书。时西秦的东秦州刺史权千成联合原后秦安南将军强熙（氐族强氏）率众三万共围上邽，为硕德击败。强熙奔仇池，后投东晋。硕德又进攻权千成于略阳，千成降后秦。[56]以上这些事件说明：后秦的势力遂渐西进，威胁着西秦，而后凉吕光因得乞伏轲弹，也有东击西秦之意。[57]

果然，在西秦太初十年（397）正月，吕光遣弟吕纂率步骑三万攻西秦金城，乾归率众二万救之。光遣其将王宝等邀击，乾归惧而不进。光又遣将梁恭、金石生等以甲卒万余出阳武下峡，与秦州刺史没奕于攻乾归之东；令弟吕延以枹罕之众攻西秦之西，克临洮（今甘肃岷县）、武始（今甘肃临洮）、河关（今临夏西）。吕纂一路，攻克金城，执西秦太守卫鞬。乾归四面受敌，处于困境之中，泣谓群下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于是纵反间之计，遣人诣吕延，称乾归众溃，东奔成纪。吕延欲率轻骑追之，其司马耿稚谏曰：“乾归雄勇过人，权略难测，破王广，克杨定，皆羸师以诱之[58]，虽蕞尔小国，亦不可轻也。因兽犹斗，况乾归而可望风自散乎！且告者视高而色动，必为奸计。而今宜部阵而前，步骑相接，徐待诸军大集，可一举灭之。”延不从，遂率轻骑追击，为乾归所杀，稚等收散卒，还屯枹罕。吕光闻延死，退军。[59]

吕光虽退军，但仍然据金城，恰好此时秃发乌孤据廉川，自称西平王，治兵广武，攻吕纂于金城，拔之。接着，又击败后凉将军窦苟于街亭。乌孤初建政权，遣使与西秦和亲[60]，西秦为了联络南凉以抗后凉，双方暂时结成了联盟，炽磐王后秃发氏即此次和亲入西秦的。不久，后凉境内发生沮渠氏之变，段业被拥立。六月，西秦可能乘机从后凉手中夺回了枹罕，因为《资治通鉴》卷一○九于此年六月记：“西秦王乾归征北河州刺史彭奚念为镇卫将军；以镇西将军屋弘（引）破光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为兴晋太守，镇枹罕。”年底，又有后秦长水校尉姚珍奔降西秦，乾归以女妻之。[61]

西秦太初十一年（398）初，西秦乘后凉郭黁、杨轨之乱，遣益州攻克后凉支阳（今甘肃兰州西北）、允吾（今甘肃永登南）、鹯武（在

支阳、允吾之间），虏万余人而去。[62]六月，郭麘、杨轨为吕纂所败，轨奔南凉秃发乌孤，郭麘则投西秦，乾归以为建忠将军、散骑常侍。至此，因后凉的衰弱，无力进攻西秦，双方处于相持的阶段。

这时，西秦则将注意力转向南边的吐谷浑政权。如前所述，吐谷浑视罴立后，拒绝了乾归所加之封号，“乾归大怒，然惮其强，初犹结好”[63]，等待时机。至西秦太初十一年（398），乾归遣乞伏益州与武卫将军慕兀[64]、冠军将军翟瑥率骑二万击视罴，至度周川（今甘肃岷县西）。视罴战败后，退保白兰，遣子宕岂为质，降西秦，乾归以宗女妻之。[65]

太初十二年（399），对西秦来说，此年是较为平静的一年。四月，有鲜卑叠掘河内率户五千降于西秦，乾归以其为叠掘都统，妻以宗女。六月，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十一月以金城太守辛静为右丞相。[66]在这平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西秦这几年全力对付西边的后凉和南边的吐谷浑，而忽略了逐渐西进的后秦。

[1] 《太平御览》卷一二七引《十六国春秋·西秦录》。又《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以傉大寒为述延子，从《西秦录》。

[2] 按《资治通鉴》卷九四，晋成帝咸和四年条云：“初，陇西鲜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及赵亡，述延惧，迁于麦田。”此云系述延于赵亡时迁麦田，与《晋书》《西秦录》不合，从后书。

[3] 见《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

[4] 此事亦见《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

[5]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

[6] 见拙作《甘肃张家川出土北魏〈王真保墓志〉试析》，载《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7]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三，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十一月条等。

[8] 《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云：“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所列姓氏是秦州、雍州大姓，其中包括陇右大姓。

[9] 见《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等。

[10] 见上引拙作《甘肃张家川出土北魏〈王真保墓志〉试析》。

[11] 见拙作《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6页。

[12]《资治通鉴》卷一○三，晋简文帝咸安元年二月条；卷一○四，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五月条。

[13]《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14]《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

[15]《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

[16]《魏书·高车传》记高车十二氏，内有乞旃氏。屋引氏为高车，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158页。

[17]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44～47页。

[18]《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载记》；《资治通鉴》卷一○六，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条。

[19]《资治通鉴》卷一○六，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条，胡注："秘，姓也。前汉书功臣表有戴侯秘彭。时秘氏为南安豪族。"

[20]《资治通鉴》卷一○六，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七月条；按《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云：秘宜"与其弟莫侯悌率众三万余户降于国仁"。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此卷校勘记[三]云："通鉴一○六'悌'下有'眷'字。广韵十九铎亦作'莫侯悌眷'，下乾归载记称'南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即其人。'莫侯'当即'莫何'之异译，乃官名。此处单作'悌'当是省称。"按，作"莫侯悌眷"是，但云"莫侯"即官号"莫何"之异译，误；"莫侯"应为少数民族姓氏，胡注已指明。

[2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内"坚拜纂安远将军、溉川侯"的"纂"为"奚"之误。

[22] 以上关于吐谷浑早期历史，参见上引拙作《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

[23]《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三月条。

[24] 见《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

[25]《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

[26]《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作"南梁州刺史悌眷"。

[27]《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七月条胡注云："乞伏氏置东秦州于南安。"按，当时南安在苻登控制之下，西秦所设东秦州不过是名义上的侨治州而已。

[28]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七月、九月条。

[29]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30] 《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一月条。

[31] 《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四月条。

[32] 关于沙州、白兰地理位置的考证，见拙作《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周伟洲、黄颢：《白兰考》，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33] 《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34]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条。

[35] 《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八月条。

[36] 《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十月条。

[37] 见《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同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等。

[38] 《宋书》卷九八《氐胡传》。按《资治通鉴》卷一○七系此事于晋太元十四年（389）九月，从《宋书》。

[39] 《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十二月条、太元十八年正月条。又《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权千成”作“权干城”。

[40] 《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十二月条、太元十八年正月条。

[41]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正月条。

[42]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43]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云定率骑二万，《晋书》作“四万”，盖《通鉴》未记苻崇二万之故，从《晋书》。

[44] 《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十月条胡注：“轲弹、益州、诘归皆乞伏氏也”，按其中诘归为鲜卑越质部，非乞伏氏，胡三省误。

[45] 以上均见《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十月条。

[46] 按，此事见《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十二月条。《西秦录》也有记载，独《晋书·乞伏乾归载记》缺记。

[47]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按，《载记》系此事于晋“太元十七年”，误。考《资治通鉴》卷一○八及《西秦录》，此事应在晋太元十九年底至二十年初。

[48]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按，姜乳袭据上邽，在杨定败死之时，即晋太元十九年十月。

[49] 按，《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四月条云：务和为“左禁将军”。胡注：“务，姓也。古有务光。”务和应为《晋书·乞伏乾归载记》后记之“乞伏务和”，非务氏，胡误。

[50]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等。

[51] 均见《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六月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52]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等。

[53]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等。

[54] 《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正月条。

[55] 《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条。

[56] 《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条。

[57]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记：“乾归从弟轲弹来奔，光下书曰：‘乾归狼子野心，前后反复。朕方东清秦、赵，勒铭会稽，岂令竖子鸱峙洮南！且其兄弟内相离间，可乘之机，勿过今也。其敕中外戎严，朕当亲讨。’”

[58] 按，《资治通鉴》卷一○九晋安帝隆安元年正月条胡注云：“太元十一年，王广为鲜卑匹兰所执，送于后秦；此时乾归未统国事也。乾归破广当在乞伏国仁之时。”乾归以羸师诱敌，败王广一事，不见史籍记载，具体情况不知。

[59] 关于这次战争，见《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同书《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九，晋安帝隆安元年条正月条等。

[60]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61] 《资治通鉴》卷一○九，晋安帝隆安元年十月条。

[62] 《资治通鉴》卷一一○，晋安帝隆安二年正月条。

[63] 《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64] 《资治通鉴》卷一一○，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条；又《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作“慕容兀”；据《资治通鉴》胡注：“慕兀，晋书载记作慕容兀。慕兀盖亦乞伏氏，载记误也。”

[65] 见《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资治通鉴》卷一一○，晋安帝隆安二年十月条。

[66] 均见《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条。

第三章 西秦的亡国和复兴

一 后秦的西进和西秦的亡国

西秦太初十三年（400）正月，乾归因所居金城南景门崩，恶之，遂迁都还于苑川。[1]这时，后秦的势力进一步西进，直接威胁着西秦。自太初九年后秦取上邽，原西秦越质诘归、休官权千成等先后降后秦，姚兴以姚硕德为秦州牧，积极准备西击乾归。是年五月，姚兴与硕德率军五万，从南安峡（今甘肃张家川西）向西进攻西秦。乾归帅诸将拒之于陇西。姚兴则潜军走绝道深入，乾归闻姚兴军将至，对诸将说："吾自开建以来，屡摧勍敌，乘机藉算，举无遗策。今姚兴尽中国之师，军势甚盛。山川阻狭，无纵骑之地，宜引师平川，伺其怠而击之。存亡之机，在斯一举，卿等勠力勉之。若枭翦姚兴，关中之地尽吾有也。"从乾归这番话，可知后秦这次西进，是尽全国之力，军势甚盛，而乾归虽然因屡胜而有骄色，但也知此役乃决定西秦存亡的关键一仗。为了实现引师平川的作战方针，乾归令其卫军将军慕兀（《晋书》作"慕容兀"）率中军二万屯于柏阳（今甘肃清水西南）[2]，镇军将军罗敦将外军四万迁于侯辰谷（在柏阳附近），自率轻骑数千以候姚兴军至。会大风昏雾，与中军慕兀相失，为姚兴军所逼，走投外军罗敦。第二日晨，乾归整军与后秦军大战，为姚兴击败，走还苑川，其部众三万六千皆降于后秦。姚兴进军枹罕。时乾归又由苑川奔金城，谓诸将曰："吾才非命世……叨窃名器，年逾一纪，负乘致寇，倾丧若斯！今人众已散，势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今青海乐都西南），以避其锋。若方轨西迈，理难俱济，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部众不愿，乾归说："吾今将寄食于人，若天未亡我，庶几异日克复旧业，复与卿等相见，今相随而死，无益也。"于是乾归独引数百骑奔允吾，降南凉秃发利鹿孤。[3]利鹿孤待以上宾之礼，处之于晋兴城。后乾归与南羌叛，为利鹿孤所知，乾归乃送子炽磐于西平。八月，南奔枹罕，降后秦。十一月，乾归至长安，姚兴署其为"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4]。

这样，西秦从东晋太元十年（385）建国，至东晋隆安四年（400）为后秦所灭，前后经十五年。西秦虽然灭亡，但其在陇右的实力，即以陇西鲜卑为主的势力，仍然存在。我们之所以说西秦此时已亡于后秦，是因为西秦与南凉、北凉和西凉之降于后秦不同，他确为后秦用军事力

量所击灭，原国土为后秦所据，分设郡县，任命官吏；西秦国主乾归也真正投降，为后秦一方之州牧（河州刺史）。而南凉、北凉和西凉等向后秦称臣纳贡，只是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其国内一切内政、外交均自主，与西秦亡于后秦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由于后秦姚兴还想利用乾归父子在陇右的潜在势力巩固和扩大他在河陇的统治，故对乾归父子及原西秦的势力采取笼络的政策，保存了他们的实力，“复以其部众配之”。这就为以后乾归父子复国创造了条件。

西秦之亡于后秦，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首先，乞伏氏建立的西秦政权主要依靠陇西鲜卑各部贵族，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合并各地方实力派所组成，故其内部经常发生各地地方实力派叛服不常的情况，政权还不十分巩固。乞伏氏虽然也注意了与陇右汉族豪门士族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才刚开始。同时，其内部的经济状况，处于各鲜卑部落由游牧向农业定居的转化过程之中，经济实力远比不上据有关中的后秦。无怪乎《晋书·姚兴载记上》多次提到，后秦占领陇右后，“军无私掠，百姓怀之”；取后凉姑臧后，“祭先贤，礼儒哲，西土悦之”。此中多有溢美之处，但也反映汉化较早的后秦，进入河陇是颇得该地区广大汉族豪门及人民支持的。其次，西秦仅据陇右西部，四面强敌压境，西有后凉、南凉，南有吐谷浑，东有后秦。而乞伏氏统治者，又专与后凉、吐谷浑连年征战，忽略了西进的后秦。故其在后秦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一战溃散，终至灭亡。从此开始了其作为后秦统治下一部分的历史。

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为借乞伏氏势力统治陇右，并继续向河西深入，遣乾归还镇苑川，尽以部众配之。乾归还苑川后，“以边芮为长史，王松寿为司马，公卿大将已下悉降号为偏裨”[5]。姚兴采取的这一措施，使乞伏氏死灰复燃，有了立足之地。乾归表面上为后秦河州刺史，但暗中积聚力量，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自立复国。五月，姚兴命硕德进围姑臧，乾归领骑七千从征。九月，吕隆降后秦，河西的南凉、北凉及西凉等皆畏后秦之强，遣使入贡于姚兴。

弘始四年（402），在南凉西平的乞伏炽磐自西平逃归苑川，投其父乾归。南凉王秃发傉檀归其妻子，乾归使炽磐入朝后秦。姚兴以炽磐为“振忠将军、兴晋太守”[6]，镇枹罕；又遣使加乾归散骑常侍、左贤王[7]。这样，乾归父子就领有苑川、枹罕等旧地，原部众多附之，势力复振。

弘始五年（403）五月，乾归随后秦左仆射齐难等至姑臧，迎后凉王吕隆至长安，后凉亡。又讨叛羌党龙头于滋川（不详），攻据仇池的氐王杨盛将苻帛于皮氏堡（今甘肃天水南），并克之。[8]六年（404）八月，乾归随硕德等伐仇池杨盛，与杨盛战于竹岭（在今甘肃天水西南），为盛所败[9]，后硕德等击败杨盛，盛弟寿等惧，请降。

七年（405）正月，乾归因吐谷浑乌纥堤（视罴弟）在西秦败亡时，“屡抄其境”，至是率骑击吐谷浑，乌纥堤大败，失万余口，走保南凉而卒。[10]这是乾归为扩展自己势力而采取的行动，说明后秦对乾归父子的控制已开始动摇。接着，乾归至长安。[11]同年九月，乾归又向仇池杨盛进攻，先攻杨盛将杨玉于西阳堡（今甘肃天水西南），克之，后为杨盛所败。[12]八年（406）五月，苑川地震，十一月乾归朝于长安。九年（407）正月，姚兴见乾归父子势力逐渐扩张，终为其西方之心腹大患，乃因其入朝，留为主客尚书，以炽磐为建武将军、行西夷校尉，监抚其众。[13]十月，因后秦河州刺史彭奚念降于南凉，姚兴即以炽磐为河州刺史。[14]

从以上西秦亡后七年中乞伏乾归父子的活动可知，乾归父子仍作为后秦的臣僚，或随之征战，或定期入朝觐见，但也乘机积聚力量，准备自立复国。至后秦弘始十年（408），后秦也因连年战争，数败于东边的北魏和北方的赫连夏国，而势力中衰。加之后秦统治者广事兴佛，“事佛者十室而九矣”[15]，国内用度不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内乱将起。因此之故，乞伏炽磐遂于此年十月，召结诸部二万七千余人，筑城于嵻峎山，以抗后秦。嵻峎山，据《资治通鉴》卷一一四胡注：“丁度曰：嵻峎山在西羌。予据乞伏氏据苑川，其地西至枹罕，东极陇坻，北限赫连，南界吐谷浑。嵻峎山当在苑川西南。宋朝西境尽秦、渭，嵻峎山始在西羌中。”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兰州五泉县（今甘肃兰州）有“康狼山，亦名热薄汗山，在县南一百四十里。西秦乞伏乾归太子炽磐，招结诸部二万七千，筑城于康狼山以据之，即此山也”。则嵻峎山在今甘肃兰州南一百四十里之地。十二月，炽磐攻羌彭奚念于枹罕，这是他以后秦河州刺史的名义，企图夺取枹罕作根本的尝试，但为奚念所败，还于嵻峎城。

次年（409）二月，乞伏炽磐至上邽见后秦太原公姚懿，彭奚念乘虚攻之。炽磐闻讯后，不告懿而返，击奚念，破之，遂围枹罕。时乾归正从秦王姚兴至平凉，炽磐攻克枹罕，即遣人告乾归，乾归遂逃回苑川。姚兴因弟姚冲反叛，又欲伐夏国赫连勃勃，无暇顾及，乾归遂于四月至枹罕与炽磐会合。[16]时又有鲜卑悦大坚部自龙马苑降乾归。于是，乾归以炽磐留守枹罕，收众三万迁于坚度山。[17]此地原是乞伏司繁时的根据地，鲜卑部众较多，是乞伏氏复国的最好基地。从此，乞伏氏与后秦决裂，积极准备复国。

二 复兴和极盛时期的西秦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后秦弘始十一年（409）七月，乾归父子分据度坚、枹罕后，部众皆劝乾归自立称王，乾归以寡弱，不许。部下固请说："姚数将终，否极斯泰，乘机抚运，实系圣人。今见众三万，足可以疆理秦、陇，清荡洮、河。陛下应运再兴，四海鹄望，岂宜固守谦冲，不以社稷为本！愿时即大位，允副群心。"乾归从之。于是重新称"秦王"，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复本位。[18]乾归所置百官的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五年十月有简约的记载，云："西秦王乾归立夫人边氏为皇（应为'王'）后，世子炽磐为太子，仍命炽磐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屋引破光为河州刺史，镇枹罕；以南安焦遗为太子太师，与参军国大谋。"最有意思的是，乾归复国后，更为注意对陇右汉族豪门、名儒的拉拢，进一步汉化，这也许是乾归总结亡国教训及在长安吸取的经验吧。他不仅以南安名儒焦遗为太子太师，参与军国大谋，而且还说"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要求炽磐："汝事之当如事吾。"炽磐拜焦遗于床下。遗有子名华，至孝，乾归欲以女妻之，遗辞。乾归说："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强卿。"乃以华为尚书民部郎。[19]

乞伏氏经过九年之后，又重新复国，其之所以能够复国，主要是后秦灭其国时，仍保留了他们在陇西的势力，欲借之巩固自己对陇西地区的统治。同时，后秦的逐渐衰弱，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也为乞伏氏的复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九年而终于复国的西秦，从此进入了复兴和强盛的时期。

西秦更始元年（409），河西、陇右的形势对西秦的发展是有利的：东面的后秦日益衰弱；西边的南凉也因与北凉连年征战，而元气大伤；南边的吐谷浑树洛干（视罴子，继乌纥堤立）虽然少年有为，但一

时还不能构成对它的威胁。因此，乾归父子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在短短的两年中，西秦不仅恢复了原有的疆域，而且向四周扩张。

据《晋书·乞伏乾归载记》云，乾归复国后，“遣炽磐讨谕薄地延，师次烦于，地延率众出降，署为尚书，徙其部落于苑川”。按薄地延族属不明，从姓氏上看与慕利延、勿地延等鲜卑姓氏同，疑其为鲜卑部落。烦于，地名，疑即后述之“番夷”（番，古音读“盘”），在今青海西宁东北。接着，乾归遣陇西羌昌何攻克后秦金城郡，以骁骑将军乞伏务和为东金城太守。[20]《资治通鉴》卷一一五，系此事于晋安帝义熙六年（410）三月，仅云乾归攻拔秦金城郡。《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五《西秦》对“东金城太守”有考证，云：“案疑是时后秦、西秦并有金城郡，故乾归攻克姚秦金城后，遂以为东金城也。”此说可信。

此外，《资治通鉴》卷一一五还记载了更始二年（410）西秦对邻近一些鲜卑、羌族部落的征服及对后秦的战争。此年七月，“西秦王乾归讨越质屈机等十余部，降其众二万五千，徙于苑川”。越质部系鲜卑部落，其首领诘归于后秦皇初三年（396）叛西秦，降后秦。胡三省注云：“屈机即诘归也，语稍讹耳。”此部居平襄，至是被徙至苑川。八月，乾归从度坚山再次迁都苑川。这正如胡三省注所云：乾归“今部众浸盛，不畏秦，复都苑川”。接着，乾归又攻后秦略阳、南安、陇西诸郡，皆克之，“徙二万五千户于苑川、枹罕”[21]。时又有鲜卑仆浑部，羌句岂、输报、邓若等率户二万降于乾归。

西秦更始三年（411）正月，后秦姚兴见乾归势力增强，欲命重臣镇抚西北，陇东太守郭播请权臣姚弼出镇，姚兴不从，以太常索棱为太尉，领陇西内史，使招抚西秦。乾归遂遣使向后秦遣还去年所掠南安、略阳、陇西诸郡的守宰，谢罪请降。乾归所作出的这些妥协，只不过是以这种名义上的臣属，来换取后秦对他在陇右地位的承认，并减少对他的猜忌，便于他的扩张。而姚兴也明知“力未能西讨，恐更为边害”，遂遣使拜乾归“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以太子炽磐为镇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乾归方图河右，权宜受之，遂称藩于后秦。[22]这种臣属关系，正如南凉、北凉臣属于后秦的关系一样，丝毫不会妨碍乾归的扩张。

同年二月，乾归将去年降服的鲜卑仆浑部三千余户徙于度坚城，以子敕勃为秦兴太守以镇之。接着，又徙羌句岂等部众五千余户于叠兰

城，以兄子阿柴为兴国太守以镇之，复以子没奕于为武威太守，镇嵻峎城。[23]按，叠兰城的位置，据《资治通鉴》卷一一六胡注：“叠兰城在大夏（今甘肃临夏东）西南，嵻峎东北。”又《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秦安县兴国城条云：“晋太元中，乞伏乾归西徙羌众，以兄子阿柴为兴国太守，盖即故城置郡也，后魏废。”以上两说，均有疑问。胡注所云叠兰城在大夏西南较确，此地当枹罕东南，西秦徙羌于此，便于控制也。但又云在嵻峎东北则误。按嵻峎城，如前述在今兰州南一百四十里，胡三省也注在苑川西南，此城东北与大夏西南的叠兰城的方位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至于《读史方舆纪要》则因西秦于叠兰城置兴国郡，而与汉时兴国氐所据之兴国城（在今甘肃秦安西北）混而为一，显然是错误的。乞伏乾归于度坚城置“秦兴郡”，在叠兰城置“兴国郡”，意思相同，即兴复西秦之意，而兴国郡治叠兰城，并不同于在汉时的兴国城置兴国郡，西秦只不过是“因其地名置郡”而已。另外，《纪要》所记“晋太元中”，也误，应为“晋义熙中”。总之，西秦的叠兰城应在大夏西南，为其所置兴国郡治所。

同年七月，乾归即向西边日益衰弱的南凉进攻，遣太子炽磐、次子中军将军审虔率骑一万，渡过金城黄河，大败傉檀太子武台于洪池岭南，获牛马十余万而还。[24]十月，乾归又攻后秦略阳太守姚龙于柏阳堡（即柏阳），克之；十一月，攻后秦南平太守王憬于水洛城（今甘肃庄浪附近），又克之，徙四千余户于苑川，三千余户于谭郊（今甘肃临夏西北）[25]；十二月，西羌彭利发袭据枹罕，自称大将军、河州牧，乾归率军击之，不克。[26]按，彭利发与前据枹罕之彭奚念同姓同族，疑为奚念子弟，至是从西秦手中夺回枹罕。

西秦更始四年（412）正月，乾归率军三万攻彭利发于枹罕，至奴葵谷（今甘肃临夏东），利发弃众南奔。乾归遣振威将军公府（国仁子）追至清水（今甘肃清水西），杀利发。乾归入枹罕，收羌户一万三千[27]，以乞伏审虔为河州刺史，镇枹罕[28]。二月，乾归由苑川徙都谭郊，命炽磐镇苑川。[29]时西秦南边的吐谷浑树洛干败南凉太子武台，夺得浇河之地，势力北上，于是乾归率军击之。《晋书·吐谷浑传》记此事云：“乞伏乾归甚忌之，率骑二万攻之于赤水。树洛干大败，遂降乾归，乾归拜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又以其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层城都尉。”而同书《乞伏乾归载记》却记：乾归率骑二万，“讨吐谷浑支统

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据考证，《晋书·吐谷浑传》所记乾归击吐谷浑“树洛干”，因与“阿若干”形近而讹，乾归所击应为树洛干“支统”（即别部首领意）阿若干。赤水，即《水经注》卷二河水所记之“赤水城”，“亦曰临洮东城”，在今甘肃岷县东北。层城在今岷县西、临潭附近。吐护真，当为阿若干弟，非树洛干弟。[30]四月，乾归遣炽磐攻南凉三河太守吴阴于白土，克之，以乞伏出累为太守。[31]

总之，从乾归复国（409）至西秦更始四年（412），短短的四年时间，西秦先后与后秦、南凉、吐谷浑发生战争，每战皆胜，其疆域东扩至平襄、略阳，西至金城、白土，南抵层城、赤水，北达度坚山以北。值得注意的是，乾归每攻占一地之后，大多迁该地人民于其中心苑川、枹罕、谭郊一带。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劳动力的掠夺，说明复国后的西秦国内严重地缺乏劳动力和兵员，故掠夺人口成为复国的西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就在更始四年六月，西秦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次大的内乱。乾归及其诸子十余人为国仁子乞伏公府所杀[32]，公府走保大夏。公府之所以要杀乾归，是因国仁死时，其年幼，故乾归继立，至是长大，不得立而刺杀乾归。但是，乾归长子炽磐已掌握了西秦政权的权力，驻守苑川，未被刺杀。因此，炽磐遣其弟广武将军智达、扬武将军没奕于率骑三千追击公府，以其叔昙达为镇京将军，镇谭郊，以骁骑将军娄机镇苑川。炽磐率文武及民二万余户迁都枹罕。[33]西秦的内乱，自然引起邻国的注意，后秦国内及夏国赫连勃勃均有乘机伐西秦之意[34]，但见炽磐在其国威望甚高，并及时采取了平息内乱的措施，故未采取行动。七月，乞伏智达等击破公府于大夏，公府奔其弟阿柴，智达攻拔叠兰城，杀阿柴父子五人。公府逃至嵻峎南山，智达追获公府父子四人，杀之于谭郊。[35]

炽磐平息内乱后，即于同年八月袭位，改元永康，自称“大将军、河南王”，葬乾归于枹罕，谥曰武元王，庙号高祖。[36]同时对政权机构作了一些调整：“署翟勍为相国，麹景为御史大夫，段晖为中尉，弟延祚为禁中录事，樊谦为司直。罢尚书令、仆射、尚书、六卿、侍中、散骑常侍、黄门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37]史称炽磐“性勇果英毅，临机能断，权略过人”[38]，“勇略明决，过于其父”[39]。炽磐继承父业，东征西讨，使西秦进入了极盛的时期。

西秦永康二年（413）初，炽磐遣龙骧将军乞伏智达、平东将军王松寿将兵击吐谷浑树洛干于浇河，大破之，俘获其将呼那乌提，虏三千余户而还。[40]又遣镇东将军昙达与王松寿率骑一万，东击破休官权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虏其男女万余口，进据白石城（今甘肃清水西），休官降者万余人。后显亲休官权小成、吕奴迦等二万余户据保白坑（在显亲境）反，昙达攻斩之，于是陇右休官悉降[41]。此时，为后秦镇守陇西的太尉索棱，以陇西郡降炽磐。[42]这样，就使西秦的势力向东扩展到显亲、陇西一带。四月，炽磐遣安北将军乌地延、冠军将军翟绍击吐谷浑别统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获甚众；六月，炽磐击吐谷浑支旁于长柳川，虏旁及民五千余户而还；九月，又击吐谷浑别统掘逵（《晋书》作“掘达”）于渴浑川，虏男女二万三千[43]；十月，掘逵即率其余众降于西秦[44]。泣勤川、长柳川，《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云均在洮州卫（今甘肃临潭）西南，渴浑川不详。则炽磐击吐谷浑的一系列战争，大致发生在洮河中上游的“强川”之地。经过对陇西休官和吐谷浑的多次战争，西秦在东部和南部的势力大为扩张。

永康三年（414）正月，时有五色云起于枹罕南山，炽磐以为是一个好兆头，对群臣说：“吾今年应有所定，王业成矣。”于是缮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45]五月，炽磐闻南凉傉檀西征乙弗，欲乘机袭之，群臣皆言不可。独太府主簿焦袭说：“傉檀不顾近患而贪远利，我今伐之，绝其西路（指回救乐都之路），使不得还救，则虎台独守穷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时，必不可失。”炽磐遂率骑二万袭乐都，一旬城溃，入乐都；遣平远将军犍虔率骑五千追击傉檀，徙武台与其文武及百姓万余户于枹罕。“以镇南将军谦屯为都督河右诸军事、凉州刺史，镇乐都；秃发赴单为西平太守，镇西平；以赵恢为广武太守，镇广武；曜武将军王基为晋兴太守，镇浩亹。”[46]由此可知，炽磐攻下乐都后，南凉余下的乐都、西平、广武、晋兴等郡均为西秦所有。炽磐分遣众将驻守各地，其中仅浩亹仍为南凉尉贤政固守。六月，傉檀势穷，率众降西秦，至左南，尉贤政闻之，乃降；七月，炽磐以傉檀为骠骑大将军、左南公。不久即使人毒死傉檀，南凉亡。《晋书·乞伏炽磐载记》说：“炽磐既兼傉檀，兵强地广，置百官，立其妻秃发氏（傉檀女）为王后。”《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十年亦记，此年“冬，十月，河南王炽磐复称秦王，置百官”[47]。即是说，炽磐于此时又恢复“秦王”名号，而且复其即位时所罢之尚书令、仆射、侍中、九卿等职官。这可从次年炽磐子元基自后秦长安逃归后，炽磐以其为“尚书左仆射”可证。[48]

西秦乘南凉与北凉连年征战、南凉衰弱之机，没费多大的力气，就灭南凉而据有其地，这一切自然引起早已企图兼并南凉的北凉沮渠氏的不满。因此，在南凉亡后一年（415）的二月，沮渠蒙逊遣其将运粮于湟河[49]，自率军攻占西秦广武郡。因运粮不继，蒙逊遂渡浩亹河（今青海大通河）到湟河，炽磐即遣将军乞伏魋尼寅击蒙逊，为蒙逊所杀；炽磐又遣将王衡、折斐、麹景等率骑一万据勒姐岭（今青海平安境内），蒙逊且战且进，擒折斐等七百余人，麹景逃还。蒙逊以弟汉平为折冲将军、湟河太守，遂引军还。[50]接着，炽磐自率众三万袭北凉湟河郡，太守沮渠汉平遣司马隗仁夜袭炽磐营，杀数百人。炽磐将撤兵时，汉平长史焦昶、将军段景潜召炽磐。于是，炽磐复攻，昶、景劝汉平出降于西秦。仅隗仁据守，力屈被擒，炽磐欲杀之，为散骑常侍段晖劝止。炽磐以左卫将军匹达（《晋书》作“匹逵”）为湟河太守；匹达西击乙弗部的乙弗窟乾，降其三千余户而归。[51]炽磐又“以尚书右仆射出连虔为都督岭北（洪池岭北）诸军事、凉州刺史；以凉州刺史谦屯为镇军大将军、河州牧”；“以秦州刺史昙达为尚书令，光禄勋王松寿为秦州刺史”[52]。

在将北凉势力逐出湟河后，炽磐把注意力转向东面，欲乘后秦衰弱之机，扩展东边的势力。同年底，炽磐遣昙达等率骑一万击降南羌弥姐康薄于赤水。此赤水，据《资治通鉴》卷一一七胡注：“《水经注》：赤亭水出南安郡东山赤谷，西流，径城北，南入渭水。”则弥姐康薄所据之赤水在今甘肃渭水上游陇西东北。炽磐以王孟保为略阳太守，镇赤水。[53]至永康五年（416）正月，炽磐再攻后秦洮阳公彭利和于漒川。此彭利和似与原据枹罕的西羌彭利发同族，利发为炽磐击杀，利和降后秦，守漒川。正在此时，北凉沮渠蒙逊乘虚进攻西秦石泉（在今甘肃临夏西北），以救之。炽磐遂至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引还。二月，炽磐遣昙达救石泉，蒙逊也引退。[54]后蒙逊遣使与西秦和亲，双方暂时处于和平时期。这就解除了西秦进一步向东扩张的后顾之忧。

而此时，后秦姚兴病死，长子泓立，兴兄弟、诸子争权，加之国内又发生了李润镇（今陕西澄城境）羌的变乱，势力更加衰弱。炽磐于是于此年四月遣昙达、王松寿等率一万骑击后秦秦州刺史姚艾于上邽，进据蒲水（今甘肃天水西），艾拒战，大败而还。昙达进至大利，破黄石、大羌二戍（皆在今甘肃天水西北），徙五千余户于枹罕。[55]接着，仇池氐王杨盛攻拔后秦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围秦州；夏国赫连勃勃又率骑四万袭上邽，杀后秦秦州刺史姚军都，克之，毁其城。杨

盛、勃勃虽然最后为后秦击退，但是后秦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同年八月，东晋太尉刘裕乘后秦的衰弱，开始北伐关中，一路所向皆捷，连下徐州、兖州。十月，攻占洛阳。时西秦炽磐乘机使秦州刺史王松寿镇马头（今甘肃天水西），以逼后秦之上邽。十二月，炽磐又遣使至刘裕处，求击后秦以自救。刘裕拜炽磐为平西将军、河南公。[56]这是西秦与南方汉族政权建立关系之始。

永康六年（417）初，西秦又开始进攻南边日益兴盛的吐谷浑树洛干，炽磐遣安东将军没奕于（《资治通鉴》作“木弈干”）率骑七千击树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于尧杆川[57]，俘虏五千余口而还。树洛干走保白兰山（今青海布尔汗布达山），惭愤发疾而死，阿柴立。炽磐闻树洛干死，喜谓群下曰：“此虏矫矫，所谓有豕白蹢。往岁昙达东征，姚艾败走；今木弈于西讨，黠虏远逃。境宇稍清，奸凶方殄，股肱惟良，吾无患矣。”[58]七月，西秦相国翟勍卒。八月，炽磐“以尚书令昙达为左丞相，左仆射元基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为尚书令，侍中翟绍为左仆射”[59]。

九月，东晋刘裕入长安，灭后秦，送姚泓于建康，斩于市，后秦亡。十月，炽磐乘机遣昙达、元基等击后秦故将姚艾于上邽，艾遣使称藩，炽磐以姚艾为征东大将军、秦州牧，征原秦州刺史王松寿为尚书左仆射。[60]后刘裕还建康，留刘义真等守关中，而关中北面的夏国赫连勃勃虎视眈眈，欲取关中。在这种形势下，西秦继续东进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西秦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整顿内部和向西扩展自己的势力之上。

永康七年（418）初，炽磐置沙州，以乞伏没奕于为刺史，镇乐都。[61]按沙州原系吐谷浑之地，乾归曾封吐谷浑视连为沙州牧、白兰王。《水经注》卷二河水引段国《沙州记》云：“浇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阳川，望黄沙犹若人委乾糒于地，都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则此沙州在今青海贵德西南百二十里之地，即今贵南北穆格塘一带。此地当时仍为吐谷浑阿柴所据有，故西秦所置沙州，治乐都，后又治西平。二月，在青海湖一带游牧的乙弗鲜卑部惧西秦势强，首领乙弗乌地延率户二万降于炽磐，署为建义将军。乌地延不久死，弟他子立，以子轲兰为质于西平。他子从弟提孤等率户五千西迁，叛西秦。凉州刺史出连虔遣使招谕，提孤复降。“炽磐以提孤奸猾，终为边患，税其部中戎马六万

匹。”过了两年（420），提孤果然煽动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户五千入居西平。[62]

而降附西秦的上邽姚艾于永康七年十月叛西秦后，降北凉，蒙逊遣兵迎之。艾叔父姚儁对部众说：“秦主宽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为从凉主西迁？”部众乃与之逐艾，推儁为主，复降于西秦。炽磐征儁为侍中、中书监、征南将军，封陇西公，邑一千户。[63]又以左丞相昙达为都督洮、罕（临洮、枹罕）以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秦州牧，镇南安。[64]这一措施，乃是炽磐为削弱姚氏在上邽的势力而采取的。同年十一月，夏赫连勃勃逐刘义真，据有关中，即皇帝位，改元昌武，以长安为南都。为了防御夏国乘胜西进，炽磐遂东巡，并徙上邽民五千余户于枹罕[65]，以进一步削弱原后秦姚氏的势力，加强东部的防御力量。

永康八年（419）四月，西秦遣征西将军孔子[66]率骑五千击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觅地率众六千降，西秦以其为弱水护军。[67]《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恭帝元熙元年四月条胡注：“地志云弱水出删丹县，亦谓之张掖河。合黎在酒泉会水县东北。流沙，张掖居延县东北之居延泽是也。曾氏曰：弱水出穷谷”。则弱水当即今流经张掖之黑河，其南之地应在今青海鄂博河以南。西秦发动这次战争虽然指向吐谷浑的西北境，实际上有扼制北凉势力南下的意图。九月，炽磐又遣左卫将军匹达、建威将军梯君等击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单骑奔仇池，获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漒川羌三万余户皆安堵如故”[68]。按，利和曾于永康五年为西秦所进攻，因北凉攻石泉，炽磐退兵，至是炽磐攻灭之，重据漒川之地。

次年（420）正月，炽磐立第二子慕末为太子，仍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改元曰建弘。[69]此年中国南北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月，南方东晋政权正式为刘裕所夺取，建国号宋，改元永初。北方据有中原的北魏逐渐强大，有西灭夏国之志；而夏国新得关中，正努力巩固自己在关中的地位；北凉则与西凉连年争战。这一形势对强盛的西秦是很有利的，因此炽磐一方面继续与刘宋联络，以对付夏国；另一面则乘北凉和西凉的战争，向河西扩张势力。同年七月，刘裕遣使拜炽磐为“安西大将军”。[70]此时，北凉沮渠蒙逊欲击西凉，先引兵攻西秦浩亹，既至，又潜师返。西凉公李歆中计，率军三万乘虚东出，为蒙逊击溃，歆被杀。蒙逊取酒泉、敦煌，分置太守。后歆弟李恂复取敦煌，称凉州刺史，改元永建。九月，炽磐乘李恂欲取敦煌时，遣振武将军王

基等袭北凉胡园戍（在张掖西南），俘二千余人而归。[71]

西秦建弘二年（421）初，“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木弈干、辅国将军元基攻上邽，遇霖雨而还”[72]。上邽之地，永康七年姚儁降西秦后，已附西秦。此云征上邽，可能上邽又叛之故，史籍阙载，详情不知。五月，吐谷浑阿柴为保存实力，遣使降西秦，炽磐以阿柴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州牧、白兰王。[73]安州，《资治通鉴》卷一一九胡注：“秦盖以吐谷浑之地为安州。”事实上，阿柴时据沙州之地，因西秦已置沙州（治乐都），故不用沙州牧之号封阿柴。此时，北凉沮渠蒙逊已于三月攻陷敦煌，李恂自杀，西凉亡，故对西秦采取报复措施。七月，蒙逊遣右卫将军沮渠鄯善、建节将军沮渠苟生率众七千击西秦。炽磐遣征北将军没奕于率步骑五千拒战，败沮渠鄯善于五涧（今甘肃武威东北），俘虏苟生，斩首二千而还。[74]从此，西秦与北凉又重启战端，两者的战争断断续续一直到西秦灭亡为止。十二月，炽磐还遣征西将军孔子等率骑二万击契汗部首领契汗秃真于罗川。次年（422）一月，孔子大破秃真，获男女二万口，牛羊五十余万头。秃真率骑数千西走，其别部树奚等五千户降西秦。[75]与此同时，炽磐遣骑七千袭北凉姑臧，因蒙逊屯兵东苑，炽磐见有备，引还。[76]四月，西秦以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筑列浑城于汁罗（即罗川）以镇之。[77]七月，北凉沮渠蒙逊遣前将军沮渠成都率众一万，耀兵洪池岭南，还屯于五涧；九月，炽磐遣征北将军出连虔率骑六千击之；十月擒沮渠成都。[78]十二月，“炽磐征秦州牧昙达为左丞相、征东大将军”[79]。

西秦建弘四年至六年（423～425），西秦仍然保持着强盛的势头，向西、向南扩展，并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联络北魏，以抗夏国。建弘四年四月，北魏败刘宋，取许昌，围洛阳；炽磐见北魏势强，对群臣说：“今宋虽奄有江南，夏人雄据关中，皆不足与也。独魏主奕世英武，贤能为用，且谶云，‘恒、代之北当有真人’，吾将举国而事之。”于是遣尚书郎莫者阿胡、积射将军乞伏又寅等贡黄金二百斤，请伐赫连夏，并陈伐夏方略。[80]这是史籍所载，西秦向北魏第二次遣使。[81]同年十月，西秦统治阶级内部又发生一次事变，操纵这次事变的幕后者即北凉沮渠蒙逊。原来蒙逊曾多次遣人诱原南凉太子秃发武台叛西秦，为父报仇，许以借给军队，以番禾、西安二郡处之。武台暗许，后事泄而止。因炽磐王后秃发氏系武台妹，故炽磐待武台如初，没有深究此事。武台后又与秃发氏密谋，联络武卫将军越质洛城谋杀炽磐。王后妹为炽磐左夫人，知武台等谋，告炽磐。于是炽磐遂杀武台、王后等十余人，事变

平息。[82]

五年（424）四月，“炽磐遣镇南将军吉毗等帅步骑一万南伐白苟、车孚、崔提、旁为四国，皆降之”[83]。《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元年四月条胡注：“白狗国至唐犹存，盖生羌也；其地与东会州接。车孚、崔提、旁为无所考。”按白苟即隋唐时之白狗羌，《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维州条云：“武德七年（624），白狗羌首领内附，于姜维城置雍州以统之。”则白苟当在今四川理县东北一带。车孚，疑即隋唐时的“左封”羌，在今四川黑水附近。崔提、旁为无考。这样西秦的势力从漒川一直向南，深入今四川西北诸羌的居地。

七月，西秦与北凉重起战端。首先是炽磐遣太子慕末（《资治通鉴》作“暮末”）率征北将军没奕于等步骑三万出貂渠谷（不详），攻北凉白草岭、临松郡，皆破之，徙民二万余口而还。[84]《水经注》卷二河水云，浩亹河（今青海大通河）“出西塞外，东入塞，径敦煌、酒泉、张掖南，东南径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又东南与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岭下，东源发于白岸谷”。内白岭即白草岭，位于今青海西宁西北。六年（425）四月，炽磐遣平远将军叱卢犍等又袭北凉河西镇将沮渠白蹄于临松（今甘肃张掖南），擒之，徙其民五千余户而还。[85]七月，西秦遣镇南将军吉毗等深入羌族聚居地区，击黑水（今四川白水江上游）羌酋丘檐，大破其众。丘檐降，炽磐以其为归善将军，拜折冲将军乞伏信帝为平羌校尉以镇之。[86]

总之，永康元年炽磐即位后，西秦进入极盛阶段。在西部，炽磐灭南凉，逐北凉势力出湟河，并不时向河西进攻，虏掠人口；在南部，西秦多次击败吐谷浑，树洛干自杀，又取漒川，将势力伸入今四川西部羌族之地；在东部，于后秦灭亡前后，将势力扩展至上邽一带。但是，西秦政权的强盛只是表面上的，到建弘七年（426），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骤尖锐起来，北凉、吐谷浑、夏国等外敌不断进攻，西秦丢地丧师，很快就衰落了。

[1]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隆安四年正月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按，《资治通鉴》卷一○八记乾归已于太元二十年（395）六月，由金城迁都于苑川西城，后金城先后落入后凉、南凉手中，隆安二年西秦又夺回金城，复都金城，至是又迁于苑川。

[2] 《水经注》卷一七渭水条云：“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水出刑马之山伯阳

谷，北流，白水出东南白溪水，西北注伯阳水。伯阳水又西北历谷，引控带流，北注渭水。”则伯（柏）阳当在今清水县西南。

[3] 关于后秦灭西秦的战争，见《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四年七月条等。

[4]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

[5]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6]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7]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8]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9] 《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九月条。

[10] 《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11] 《西秦录》。

[12]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元年九月条。

[13]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14]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15]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

[16]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五年四月条；《西秦录》等。

[17]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又《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隆安五年四月条云“收其众得二万”。

[18]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内云“义熙三年，僭称秦王”，误，应为义熙五年（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卷一二五校勘记）。

[19] 《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五年十月条。内胡注云：“魏尚书郎有民曹，晋初分置左民、右民，江左以后，省右民郎，有左民郎。民部郎至是始见于《通鉴》。”

[20]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21]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22]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正月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

乾归载记》。

[23]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五月条。

[24]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八月条。

[25]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十一月条。《晋书·乞伏乾归载记》“柏阳堡”作“伯阳堡”；“水洛城”作“永洛城”，误。

[26]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十二月条。

[27]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28]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正月条。

[29]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正月条。

[30] 详细考证见拙作《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第21~22页。

[31]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四月条。

[32]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云：“乾归畋于五谿（在今甘肃陇西东），有枭集于其手，甚恶之。六年（应为八年），为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诸子十余人。”

[33] 均见《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六月条。

[34] 均见《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六月条。

[35]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七月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西秦录》。

[36]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八月条等。

[37]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按，“麹景”，《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十二月条作“赵景”，误。

[38]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39] 《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六月条。

[40]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41]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九年三月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42]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三月条等。

[43] 见《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九年二月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44]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九年十月条。

[45] 《西秦录》；又《晋书·乞伏炽磐载记》亦记其事，时间作“僭立十年”，应为“僭立三年”之讹。

[46]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十年五月条等。

[47] 关于炽磐于是年十月复称秦王事，又见《西秦录》。

[48]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四月条等。

[49] 按湟河郡为北凉所据，是在413年南凉湟河太守文支降蒙逊之时。

[50] 见《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51]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安帝义熙十一年五月条。

[52] 《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安帝义熙十一年七月条。

[53] 《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十一月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54]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55]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56] 《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十二月条。

[57]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二月条胡注：“尧杆川在塞外。”所谓“塞外”，当指西秦边塞之外，即今洮水上游一带。

[58]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59]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十四年条。

[60]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十四年条。

[61]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十四年条。

[62]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63]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64]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十月条。

[65]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十二月条。

[66]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卷一二五校勘记［十七］云："孔子，各本'孔子'作'他子'，张元济校勘记云，所见另一宋本作'孔子'。按《册府》二三一、《通鉴》一一八、《通志》一九一并作'孔子'，今从之。"又《资治通鉴》胡注："孔子，亦乞伏氏也。"

[67]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恭帝元熙元年四月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68]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恭帝元熙元年九月条；《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69]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元年正月条。又《晋书·乞伏炽磐载记》系此事于元熙元年（419），误（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卷一二五校勘记［一八］）。

[70]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条。

[71]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元年九月条。

[72]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条。

[73]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二年五月条。又《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七《西秦》记此事，但从《晋书》系于宋永初元年，误。

[74]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二年七月条。

[75]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三年正月条。

[76] 《太平御览》卷八七七引《十六国春秋·西秦录》。

[77]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三年四月条。

[78]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三年条。又《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六《北凉》系此事于北凉玄始十二年（423），从《通鉴》。

[79]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三年十二月条；《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

[80] 按，《魏书·乞伏国仁传》记：乾归复国后，曾"遣使请援，太宗许之"。此为西秦向北魏第一次遣使。

[81]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营阳王景平元年四月条。

[82]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营阳王景平元年十月条。

[83]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元年四月条。

[84]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条。又《十六国春秋辑补·北

凉》系此事于北凉玄始十二年（423），从《通鉴》。

[85] 《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文帝元嘉二年四月条。

[86] 《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文帝元嘉二年条。

第四章 西秦的衰亡及其原因

一 西秦的衰亡

建弘七年（426），西秦国内外的形势逐渐恶化：东边的夏国，自前一年赫连勃勃死后，其子赫连昌继立，进一步巩固了对关中的统治，并窥伺西边的西秦。而西边北凉灭西凉后，从对西秦的防御转入进攻。最严重的是，西秦东、西的两个强敌夏和北凉有联合夹击西秦之势。南边的吐谷浑阿柴已于宋元嘉元年（424）卒，弟慕璝立。慕璝即位后，势力渐强，史称“慕璝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指刘宋），北交凉州（指北凉）、赫连（指夏国），部众转盛”[1]。夏、北凉和吐谷浑形成了对西秦的包围，使西秦处于困境之中。在西秦国内，被征服的各族部落及直接受西秦统治阶级压迫的汉、羌等族人民，也相继起来反抗西秦的统治，长期潜伏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西秦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仍然采取东联北魏，以牵制夏国，并不断压迫河西，争取主动的策略，但是也无济于事。

正月，炽磐复遣使北魏，请魏出兵击夏。[2]八月，炽磐率大军击北凉，至廉川，命太子慕末等步骑三万攻西安郡（治今甘肃张掖东），不克，又攻番禾郡。沮渠蒙逊一面发兵抗御，一面遣使说夏国出兵，乘机击西秦国都枹罕。夏主赫连昌遣征南大将军呼卢古为一路，出高平，攻苑川；又以车骑大将军韦伐为一路，出安定，指向南安。炽磐闻讯，迅即撤回进攻北凉的军队，可是为时已晚。九月，在夏国两路大军的进逼之下，炽磐徙国都枹罕一带老弱、畜产于浇河及莫何仍寒川[3]，留左丞相昙达守枹罕。夏韦伐所率的一路军队，攻拔南安，执西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4]

正当夏军进逼枹罕之时，西秦国内又发生了原吐谷浑降将握逵等叛回吐谷浑的事件。握逵，应即前述永康二年率众降西秦的吐谷浑别统掘逵（或作“掘达”），他见西秦渐衰，乘夏军进逼之机，“帅部众二万落叛秦，奔昂川（今四川阿坝），附于吐谷浑王慕璝”[5]。这是史籍所载西秦国内被征服部落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握逵等的叛走，竟率部众二万落，对西秦自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严重的是，握逵等的叛走正是在

夏军进攻西秦之时，这就为夏军继续深入西秦境内创造了条件。

十月，呼卢古所率的一支夏军与西秦左丞相昙达大战于苑川南之嵻峎山，昙达兵败退走。接着，呼卢古军与攻占了南安的韦伐军会合，进逼西秦的国都枹罕。炽磐迁保定连（今甘肃临夏东南）[6]，呼卢古遂进枹罕南城，西秦镇京将军赵寿生率死士三百人力战，击退夏军。韦伐、呼卢古又合攻沙州刺史出连虔于湟河，出连虔遣后将军乞伏万年出战，击败夏军。夏军又转攻西平，执安西将军库洛干，坑杀士卒五千余人，掠民二万余户而还。[7]这次夏军深入西秦境内，连下南安、苑川，攻围枹罕、湟河、西平，掠民二万余户，使西秦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迅速由盛转衰。因此，可将这次夏、秦战争视为西秦衰落的起点。

西秦对夏战争的惨败，又使长期潜伏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公开爆发，被征服的部落和各族人民相继起兵反秦。同年底，驻守在南漒（漒川之南）的西秦征南将军吉毗，为城内陇西人辛澹所逐，辛澹率户三千据城，毗走还枹罕。辛澹率众投仇池氐王杨玄。[8]

次年（427）正月，居于西秦武始（治今甘肃临洮）、洮阳（今甘肃临潭北）南山的山羌掀起了反抗西秦的斗争。二月，炽磐遣左丞相昙达招慰武始诸羌，征南将军吉毗招慰洮阳诸羌。羌人执昙达，送于夏国；吉毗则为羌人所击，奔还，士马死伤者十之八九。[9]昙达为西秦左丞相，系西秦股肱之臣，竟然为山羌所执，送于夏国，可见当时西秦统治下羌族的反抗是十分激烈的。西秦政权经过内外的冲击，损兵折将，统治者感到有必要对内部进行一番调整。于是在三月，炽磐“以辅国将军段晖为凉州刺史，镇乐都；平西将军麹景为沙州刺史，镇西平；宁朔将军出连辅政为梁州刺史，镇赤水（今甘肃岷县东之赤水）”[10]。段晖、麹景的任命，是为了加强西部和西南部的防御，主要是抵御北凉和吐谷浑；出连辅政的任命，则主要是镇压漒川以南羌族的反抗。

同年四月至六月，北魏太武帝攻拔夏国都城统万城，夏主赫连昌亡保上邽，夏国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对西秦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因此，炽磐于六月还都于枹罕。七月，炽磐甚至对群臣说：“孤知赫连氏必无成，冒险归魏，今果如孤言。”[11]八月，炽磐遣其叔平远将军泥头（《资治通鉴》作“渥头”）、弟安远将军度（《十六国春秋辑补》作“安度”）质于魏，又遣中书侍郎王恺、丞相从事中郎乌讷阗奉表贡方物。[12]可是，西秦的局势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姑且不论北魏取统

万，逼使赫连氏向西发展，对西秦有致命的威胁；就是西秦的邻国北凉、吐谷浑和东南的仇池等国的进攻，以及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抗，均使西秦统治者疲于奔命。这一切使西秦没有得到一点儿喘息的时机，迅速走向衰亡。

九月，仇池氏王杨玄遣将军苻白作攻围西秦梁州刺史出连辅政于赤水，城中粮尽，民执辅政降。后辅政逃还枹罕。十月，炽磐以骁骑将军吴汉为平南将军、梁州刺史，镇南强。十二月，吴汉即为群羌所攻，只好“帅户二千还于枹罕”[13]。

建弘九年（428）正月，西秦商州刺史领浇河太守姚濬叛降北凉。按，西秦商州，据《资治通鉴》卷一二一胡注：“晋时，张祚以敦煌郡为商州。时敦煌属河西，炽磐盖以濬遥领商州而守浇河也。”炽磐见姚濬叛，即以尚书焦嵩代濬，率骑三千追击。二月，焦嵩为吐谷浑慕璝子元绪所执[14]，浇河之地即为吐谷浑所据。

同年五月，西秦王炽磐卒，太子慕末即位，改元永弘。慕末，或译作暮末，字安石跋[15]，史称其“幼而好学，有文才”[16]。他即位后，对西秦统治机构作了调整，《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条记载较详，云：“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为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镇军大将军、河州牧谦屯为骠骑大将军，征安北将军、凉州刺史段晖为辅国大将军、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将军千年为镇北将军、凉州牧，镇湟河，以征北将军木弈干为尚书令、车骑大将军，以征南将军吉毗为尚书仆射、卫大将军。”这份西秦主要大臣、将军名单中共有六人，其中除段晖为武威汉族[17]、吉毗亦似为汉族外，其余四人均为乞伏氏王族子弟。这与炽磐即位时多用汉族豪门和俊杰之士的情况不同，说明西秦统治者越来越不相信其他民族的人，而逐渐把权力集中到本族子弟手中。

慕末刚继位，北凉即率军击西秦之西平，西平太守麴承对蒙逊说，“殿下若先取乐都，则西平必为殿下之有”，蒙逊于是转攻乐都。西秦相国元基自枹罕率骑三千救乐都，刚入城，蒙逊即攻拔乐都外城，绝水道，城中居民饥渴，死者甚众。元基所率援军中有东羌乞提部，阴与蒙逊通谋，从城内下绳引北凉兵入城，有数百人，元基率左右奋战，蒙逊乃退兵。自南凉亡后，北凉一直是西秦的劲敌，炽磐临终时，曾对慕末明言：“吾死之后，汝能保境则善矣。沮渠成都为蒙逊所亲重，汝宜归之。”沮渠成都前为西秦所擒，炽磐预料自己死后，北凉将不断进攻，因

而告诫慕末，以成都作为求和的“厚礼”，以与北凉通好。慕末想起其父的话，于是遣使蒙逊，许归成都以求和。蒙逊引兵还，遣使入西秦祭吊炽磐。慕末遣将军王伐送成都还北凉，厚资以遣之。但是，蒙逊怀疑西秦无诚意，使恢武将军沮渠奇珍伏兵于扪天岭，执王伐及骑士三百人而归；后遣尚书郎王杼送王伐还西秦，并赠慕末马千匹、锦罽银缯。七月，慕末又遣记室郎中马艾至北凉报聘。[18]

西秦与北凉的和好只是暂时的，因为衰落的西秦虽然多方与北凉和好，安定其西部，但是强盛的北凉早欲占有西秦的河湟地区，把势力伸向陇右，双方的和好只是西秦一厢情愿，注定是不能长久的。同年十月，西秦镇守湟河的凉州牧乞伏千年因嗜酒残虐，不恤政事，为慕末所责，惧而奔降北凉。慕末以叔父光禄大夫沃陵为凉州牧，镇湟河。十一月，蒙逊就撕下了和好的面纱，率军向西秦进攻，至番夷（今青海西宁东北）。西秦相国元基率骑一万五千拒战，蒙逊还攻西平，征虏将军出连辅政领二千骑救西平。

次年（429）正月，出连辅政率军还未赶到西平时，蒙逊已攻拔西平，执太守麴承。[19]这样，北凉就掩有河湟之地，占据了重镇西平。二月，慕末立妃梁氏为王后，子万载为太子。三月，西秦统治阶级内部又产生了更大的裂痕。慕末的尚书、陇西豪族辛进，曾随炽磐游陵霄观，弹飞鸟，误伤慕末母之面，留下伤痕。慕末即位后，问明原委，遂借故杀辛进及其五族二十七人。[20]按，陇西辛氏，是陇西的汉族大姓，慕末杀辛氏五族，必然使原支持西秦政权的汉族豪门大姓寒心，造成西秦乞伏氏与汉族地主豪族联盟逐渐瓦解的恶果。

至五月，北凉沮渠蒙逊再次向西秦进攻，慕末无力抵御，只好留相国元基守枹罕，自己迁保定连。时西秦国内相继有叛降北凉者，如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据罕幵谷（今甘肃临夏西），以应蒙逊。慕末率军击破承伯，进至治城（在今甘肃临夏西北、黄河南岸）。同时，西秦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据汧川（在枹罕附近）叛，慕末击之，为幼眷所击败，还于定连。蒙逊乘机至枹罕，遣子沮渠兴国进攻定连。六月，慕末在治城大败兴国，擒之，追击蒙逊至谭郊。此时，吐谷浑慕璝遣弟慕利延率骑五千，与蒙逊合军，又攻西秦，为西秦辅国大将军段晖击走。七月，蒙逊遣使送谷三十万斛以赎世子兴国，慕末不许。蒙逊乃立兴国母弟菩提为世子。慕末之所以不许，是鉴于上次送沮渠成都返北凉求和，蒙逊很快即挑起战端的教训，因而留兴国，以其为“散骑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

之”[21]。

同年十月，西秦统治集团内乱又起：慕末之弟轲殊罗按鲜卑父死妻其后母的旧俗，烝炽磐左夫人秃发氏，慕末知而禁之。轲殊罗惧，与叔父什寅密谋杀慕末，投北凉。秃发氏盗门钥，钥误，门不开，守门侍卫知而告发。慕末怒，收轲殊罗党杀之，赦轲殊罗，鞭打什寅。什寅求死，慕末遂刳其腹，投尸于河，秃发氏自杀。[22]

永弘三年（430）三月，什寅母弟前将军白养、镇卫将军去列，以什寅惨死，有怨言，慕末皆杀之。[23]这是西秦统治者乞伏氏的纷争，慕末用严刑峻法，致使众叛亲离，亡国之日不远矣。同年六月，吐谷浑慕璝率众万八千袭西秦定连，为辅国大将军段晖击走。[24]西秦自去年底以来，境内地震，“野草皆自反”，“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众”[25]。西秦处于内外崩析的境地，特别是北凉、吐谷浑的进逼，最后迫使西秦统治者投靠北魏。[26]

同年十月，慕末遣王恺、乌纳阗使北魏，请求投归于魏，魏太武帝许以平凉、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毁宝器，帅户万五千，东如上邽。”[27]至高田谷（在南安郡内）时，西秦给事黄门侍郎郭恒谋劫沮渠兴国投北凉，事觉，为慕末所杀。北魏封慕末于安定以西、平凉以东，这一地区乃是夏国赫连定的领地，显然魏太武帝是企图使西秦与夏国互相争夺这一地区，以坐收渔人之利。果然，当慕末君臣临近上邽时，夏主赫连定就发兵拒之[28]，慕末只好退保南安。原西秦故地“皆入于吐谷浑”[29]。

十一月，北魏大军攻围夏国平凉，赫连定由安定率步骑二万北救平凉，为魏军击败，定收其余众，西保上邽。魏军取安定，围平凉，夏陇西守将降魏。这时，太武帝即遣尚书库结帅骑五千迎秦王慕末。西秦卫将军吉毗劝慕末不可内徙，慕末从之，库结引还。接着，慕末所据南安诸羌万余人叛西秦，他们推西秦安南将军、督八郡诸军事、广宁太守焦遗为主，遗不从；众羌劫遗族子长城护军焦亮为主，率众攻南安。慕末求救于仇池氐王杨难当，难当遣将军苻献帅骑三千救之，慕末与之合军，击溃诸羌。焦亮奔还广宁（治今甘肃漳县）。十二月，焦遗擒杀焦亮，慕末进遗号镇国将军。时又有西秦略阳太守弘农杨显以郡降于夏国。[30]辅国大将军段晖父子，可能也在此前后降于吐谷浑。[31]这样，西秦仅保有南安、广宁二地，朝不保夕。

永弘四年（431）正月，在上邽的夏主赫连定见平凉为魏攻占，决定避魏军之锋，而向陇右、河西扩展；先击败西秦将姚献，再遣叔父北平公韦伐率众一万攻南安。时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西秦侍中、征虏将军出连辅政，侍中、右卫将军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等逾城降于夏。慕末山穷水尽，只好率宗族五百余人舆榇出降。韦伐将慕末及沮渠兴国等送于上邽。[32]原西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广宁，说其父焦遗，准备择乞伏氏王族贤者为王，复建西秦。焦楷乃筑坛誓众，二旬之间，赴者万余人。后焦遗死去，楷奔降北凉。六月，夏主赫连定杀乞伏慕末及其宗族五百人[33]，西秦灭亡。

西秦自乞伏国仁于东晋太元十年（385）建国，至刘宋元嘉八年（431）亡于夏国，共历四主，四十七年。其间东晋隆安四年（400）至东晋义熙五年（409），西秦曾为后秦击灭，国主只作为后秦一个驻守陇右的一州之长而存在，但中国历史家仍然将这十年时间，算在西秦政权存在的时间之内。从时间上看，西秦在十六国时河西、陇右所建的六个政权（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南凉、西秦）中，建国时间之长，仅次于前凉和北凉。在乞伏炽磐在位的十七年（412～428）中，西秦经历了兴盛及由盛转衰的阶段，因此在西秦史上，炽磐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晋书》撰者对炽磐的评论是：“炽磐叱咤风云，见机而动，牢笼俊杰，决胜多奇，故能命将掩浇河之酋，临戎袭乐都之地，不盈数载，遂隆伪业。览其遗迹，盗亦有道乎！”[34]尽管《晋书》撰者站在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少数民族乞伏鲜卑所建的西秦存有民族偏见，视之为非正统的华夏之国，但从字里行间也透露了对炽磐的赞赏。炽磐能继承父乾归的遗策，笼络陇右汉、羌等豪族，重用汉族豪门、俊杰之士，巩固了政权；在对外方面，能采取较为有利于西秦发展的策略，纵横捭阖，使处于强邻包围之中的西秦，立国达四十七年；在对外战争中，他“决胜多奇”，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总之，西秦的存在及其兴盛，对于陇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都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乞伏炽磐与南凉的秃发傉檀一样，作为十六国时期的杰出人物是当之无愧的。

二 西秦衰亡的原因及乞伏鲜卑的分散和汉化

为什么西秦自炽磐即位后开始兴盛，至其死前二年突然走向衰落，又迅即灭亡了呢？从上述西秦历史看，西秦的衰落显得有些突然，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种突然其实是可理解的。西秦的衰亡有内因，也有

外因，而内因是其衰亡的根据。

西秦衰亡的内因，主要是其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这些基本矛盾在西秦建弘七年（426）以前，并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西秦是一个由乞伏部为主的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政权，其统治的陇右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西秦统治下的民族极为复杂，主要有汉、羌、氐、鲜卑、休官、吐谷浑、屠各、丁零、卢水胡等。而每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又有所不同：有的是封建的坞堡，有的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有的汉化较早，有的则僻远在山区，与外界接触不多。而这些民族大多是西秦乞伏氏统治者以武力征服的，它们的上层投靠西秦统治者，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广大的各族人民却深受西秦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统治者通过战争强迫迁徙至西秦境内，为统治阶级从事农牧业生产。这样，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一旦有了时机，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形成摧毁西秦政权的主要力量。西秦建弘七年，西秦在北凉、夏国的夹击下，损失惨重，各地被统治的民族则相继爆发反西秦统治者的斗争，如吐谷浑掘逵，陇西人辛澹，武始、洮阳的山羌，赤水城民，以及东羌乞提等。这些斗争，正是使西秦自盛转衰的主要内因。而这一主要的内因，又是通过外因，即北凉、夏、吐谷浑、仇池等多次进攻西秦，使之遭到失败，而发生作用的。

同时，西秦衰亡还有一些内因，如在乞伏乾归、炽磐统治时期，作为西秦统治者的乞伏氏还能够极力拉拢陇右等地汉族豪门和俊杰之士，建立以鲜卑为主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故其统治基础较为巩固。可是慕末即位后，逐渐对汉族豪门、俊杰之士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其所重用的大臣中，汉族只有段晖、吉毗二人，这与乾归、炽磐重用汉族上层人士形成鲜明对照。更有甚者，慕末还因一些小事滥杀有势力的汉族豪门，如陇西辛进五族二十七人就惨遭杀害，造成了陇右汉族豪门大族离心的倾向。这一切无疑大大削弱了西秦的统治力量。又如，西秦最后一个统治者慕末，政刑酷滥，因弟轲殊罗按鲜卑旧俗烝父炽磐左夫人秃发氏，遂杀叔什寅及什寅母弟白养、去列等，以致众叛亲离；在夏军围南安时，乞伏氏族人先后投夏国。此外，西秦所据的陇右地区虽然较河湟地区开发早，但山地多，平原少，自然条件不如河西、关中，同时西秦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实力本来就很薄弱，加上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国内用度不足，最终使其战争接连失败，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慕末再也无法维持其统治，终于率部投归北魏。

至于西秦衰亡的外因是比较清楚的。在西秦后期，西边的北凉已兼并了西凉，占据了整个河西及新疆东部地区，成为西秦的劲敌；东面的夏国，虽遭到北魏的打击，势力日衰，但由于北魏的进逼，使之必然向西发展，与西秦争夺陇右。这对西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势力，而慕末君臣恰好对此估计不足。更为危险的是，北凉、夏国结成联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使西秦防不胜防，而最终丧师失地，加速了它的崩溃。此外，南边的吐谷浑国，自慕璝即位后，招纳秦、凉亡业之人，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势力增强。为了收复过去为西秦占据的领土和掳掠的人民，它死死咬住西秦不放，乘虚从南面进攻。当西秦君臣向陇西上邽迁徙后，吐谷浑立即占领了原西秦大部分领土，领有沙州、河州、秦州的大部分，凉州的一小部分。[35]

综上所述，知西秦的衰亡绝不是偶然的。《魏书·乞伏国仁传》对西秦衰亡的原因作了概括的说明，云慕末时“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人思乱矣”。其中也明确指出，西秦衰亡的根本原因还主要是内因，而西秦正是在“部民多叛，人思乱矣”的情况下，为夏国灭亡了。

最后，叙述一下西秦亡后乞伏鲜卑的分散和汉化问题。

西秦永弘四年（431）初，夏围南安，乞伏慕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后为赫连定所杀。这是西秦乞伏氏王族主要一支的下落。还有一批乞伏氏族人先后投归了北凉、夏国，见于记载的有乞伏轲弹、乞伏千年（投北凉）、昙达（为羌执送夏）、跋跋、延祚（投夏）等。夏国赫连定灭西秦后，欲渡黄河夺北凉河西之地，在治城渡河时，为吐谷浑慕璝击灭，其所率西秦降户（包括乞伏鲜卑人）及赫连部人均为吐谷浑所虏。因此，乞伏鲜卑有一部分后来融合到吐谷浑之中。《周书》卷五〇《吐谷浑传》记有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而北凉于北魏太延五年（439）为北魏所灭，河西之地归魏所有，后北魏又逐吐谷浑出陇右，尽有黄河以北之地。这样，散处在河、陇地区的乞伏鲜卑均为北魏所统治，不论居于该地区的一般乞伏鲜卑部人，或是在北魏政权中做官为吏的上层，以后均通过不同途径融合、同化到汉族之中。

乞伏氏及乞伏氏部落联盟中的出连氏、叱卢氏等，在《魏书》卷一一三《官志氏》中有著录，其中“内入诸姓”中有“乞扶（伏）氏，后改为扶氏”，“出连氏，后改为毕氏”。“四方诸姓”中西方有“叱卢氏，后改为祝氏”。此三种姓氏的人可能大部分是在北魏统治河、陇之后，归属北魏的。原西秦上层贵族有许多人在北朝政府中任职，如魏有并州刺史乞佛

成龙[36]，金城伯乞伏凤，泾州刺史乞伏悦[37]，沙州刺史、宁国伯乞伏宝（字菩萨）[38]，还有第一领民酋长乞伏周、乞伏纂[39]，叛胡乞扶莫于，乞步落[40]。东魏有齐州长史乞伏锐[41]，北齐有骠骑将军乞伏保达[42]，北周有大将军乞伏令和乞伏慧[43]。到宋时还有此姓者，如宋端拱登科的有乞伏矩[44]等。

以上这些原乞伏鲜卑部落联盟的氏族，经过西秦、北魏等的长期统治，均已汉化。乞伏氏贵族在北魏时，他们的籍贯大都变为“金城”或“金城榆中”、“马邑”等，与汉族士大夫、官僚没有什么区别了。

[1] 《魏书》卷一○一《吐谷浑传》。

[2]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三年正月条。

[3] 按莫何仍寒川应即《北史·吐谷浑传》所云树洛干所奔之“莫何川”，地在今青海贵德西莫渠沟河一带（见拙作《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第20页）。

[4]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三年九月条。

[5]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三年九月条。

[6] 见《读史方舆纪要》卷六○河州定连城条。

[7]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三年十一月条。

[8]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三年十二月条。

[9]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四年正月条。

[10]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条。

[11]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四年七月条。

[12] 《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

[13]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二月条。

[14]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五年二月条。

[15] 《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又《西秦录》“安石跋”作“安石”。

[16] 《西秦录》。

[17] 按《魏书》卷五二《段承根传》云：承根“武威姑臧人……父晖……乞伏炽磐以晖为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

[18]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五年条。

[19]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六年正月条。

[20] 《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六年三月条。

[21]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六年条。

[22] 《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六年十月条。

[23]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七年条。

[24]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七年条。

[25]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七年条。

[26] 按，慕末决定投魏，诸书记其原因有异，《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七年十月条云："为河西所逼"；《魏书·乞伏国仁传》云："后为赫连定所逼"；《宋书·吐谷浑传》又云因"慕璝前后屡遣军击"。以当时形势论，应为北凉、吐谷浑的进逼，迫使慕末东投北魏。

[27]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七年十月条。

[28] 原夏国主赫连昌于宋元嘉五年（428）为魏军所擒，弟赫连定继立于平凉，改元胜光。

[29]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七年十月条。又《宋书》卷九六《吐谷浑传》亦云："慕璝前后屡遣军击，茂蔓（即慕末）率部落东奔陇右，慕璝据有其地。"

[30]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条；《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31] 《魏书·段承根传》云："磐子暮末袭位，国政衰乱，晖父子奔吐谷浑暮璝，暮璝内附，晖与承根归国（北魏）。"

[32] 《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八年正月条。

[33] 《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八年六月条；《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

[34]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35] 见拙作《吐谷浑史》。

[36] 《魏书》卷五《高宗纪》。

[37] 见《陶斋戎石》录《乞伏保达墓志》。

[38] 《故持节都督沙凉二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宁国伯乞伏君墓志铭》，转见《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1959，第109页。

[39] 《隋书》卷五五《乞伏慧传》。

[40]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41] 《东魏齐州长史乞伏锐题记》，转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108页。

[42] 见《陶斋藏石》录《乞伏保达墓志》。

[43] 《隋书》卷五五《乞伏慧传》。

[44] 《通志·氏族略五》。

第五章 西秦的社会制度

一 西秦的政治制度及其特点

乞伏鲜卑在向陇西迁徙过程中，其部落联盟组织逐渐巩固和发展，后期虽出现了师傅、左辅和右辅将军、率义将军等名号，但这只是乞伏等四部由部落联盟向国家政权的过渡形式。到乞伏国仁率部在苑川一带居住后，由于受陇右及邻近政权的影响，迅速向国家政权过渡。东晋太元十年（385），国仁正式建立政权，置官，设州郡，自号“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其中有原匈奴的“大单于”之号，这一称号一直保持到西秦太初七年（394）乞伏乾归之时，但自此以后，此号即不复见。尽管西秦政权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政治制度时有变化，但总的说来，是日趋完善[1]，而且“一如魏武、晋文故事”。即是说，西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仿照内地曹魏和西晋政权的。

西秦最高统治者一般称“王”。国仁建立政权时，仅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以后，前秦苻登封国仁为“苑川王”。乾归即位后，始自称“河南王”，苻登先后又封乾归为“金城王”“河南王”“梁王”。西秦太初七年，乾归自称“秦王”，后世史家据此号统称乞伏氏政权为“西秦”。西秦太初十三年（400）西秦为后秦击灭，至后秦弘始十一年（409）乾归复国，复称“秦王”。西秦永康元年（412）炽磐即位，又改称“河南王”，三年复称“秦王”，一直到西秦灭亡。可见，乞伏氏所建政权称“秦王”的时间最长，且其所在地区主要在汉魏以来的秦州，所以史称其为“西秦”，以别于在关中立国的东秦（即后秦）和前秦。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探讨西秦的政治制度，只能从其官制中加以分析，从而找出一些特点来，这与南凉的情况相似。关于西秦的官制，清代练恕曾撰《西秦百官表》（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内对西秦的官制作了一番整理，按年排列史籍中所见的西秦职官名，有一些错讹和遗漏之处。下面我们按前述南凉官制的方法，将西秦职官分为中枢、军事、地方三个方面，加以探讨。[2]

（一）中枢之官

丞相 有时又作“相国”，或分为“左相、右相”，“左丞相”“右丞相”。此官系百官之首，始于战国，秦汉因之。《晋书·职官志》云：“丞相、相国，并秦官也。晋受魏禅，并不置，自惠帝之后，省置无恒。”西秦自建立政权始，即置左、右相。任过西秦丞相（相国）的有出连乞都、翟勍、元基（炽磐子）；左丞相（左相）有乙旃音埿、乞伏昙达；右丞相（右相）有屋引出支、辛静、元基等。

丞相从事中郎 《晋书·职官志》云：“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军为六人，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如常加兵公制。”则丞相从事中郎为丞相属官，故附丞相之后。西秦任此职者有乌纳阗。

太傅 西秦有太傅索棱。按“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晋皆有之，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3]。

御史大夫 西秦设此官职，见于记载的有悌眷、麹景、段晖等。《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云：“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东汉不设，置“司空”，晋以后亦多不设此官。

以上是中枢之官中职位最崇，为秦汉以来所谓“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官职。西秦也有仿汉魏以来中枢的“三台”，即隋以后的“三省”制，设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三部职官。

（1）尚书省

录尚书事 此为尚书省最高官职，总领尚书事。任西秦录尚书事的有：乞伏炽磐、元基，均为当时西秦王之子弟。

尚书令 此官始于秦，汉以后沿置，权渐重。西秦任此职的有：炽磐、翟勍、昙达、麹景、没奕于（干）等。

尚书左、右仆射 西秦任此职的有：边芮、元基、翟绍（以上左仆射），秘宜、出连虔、王松寿（以上右仆射），吉毗（仆射）。

尚书 《晋书·职官志》云：“列曹尚书，案尚书本汉承秦置。……至成帝建始四年（前29），罢中书宦者，又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而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各有其任。”西秦任尚书一职者甚多，有尚书薄地延、辛进、焦嵩；也有具体任何曹尚书者，如有吏部尚书翟瑥、主客尚书翟勍、民部尚书王松寿、三公尚书樊谦、吏部尚书

乞伏跋跋、兵部尚书杜宣等。

尚书郎 《晋书·职官志》云："尚书郎，西汉旧置四人，以分掌尚书。……及光武分尚书为六曹之后，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为三十六人。"西秦有尚书郎莫者阿胡、尚书民部郎焦华等。

（2）门下省

侍中 《晋书·职官志》云："侍中，案黄帝时风后为侍中，于周为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汉因之。秦汉俱无定员，以功高者一人为仆射。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者则非数。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西秦置侍中，员额不清，任侍中的有方弘、麴景、翟绍、姚儁、元基、出连辅政、乞伏延祚等。

给事黄门侍郎 "给事黄门侍郎，秦官也，汉已后并因之，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员。及晋，置员四人。"[4]西秦置此官，有"给事黄门侍郎郭恒"。

散骑常侍 《晋书·职官志》云："散骑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骑……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西秦任此职的有：乞伏务和、郭馨、段晖、沮渠兴国等。

（3）中书省

中书监 《晋书·职官志》云："中书监及令，案汉武帝游宴后庭，始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罢仆射。……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监、令盖自此始也。及晋因之，并置员一人。"西秦任此职者为姚儁。

中书侍郎 "中书侍郎，魏黄初初，中书既置监、令，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及晋，改曰中书侍郎，员四人。中书侍郎盖此始也"[5]。西秦有中书侍郎王恺。

除"三省"外，西秦也置"六卿"。《晋书·乞伏炽磐载记》云，炽磐即

位后，曾“罢尚书令、仆射、尚书、六卿、侍中、散骑常侍、黄门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内“六卿”见于记载的有：

光禄勋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晋列卿中也有此职。西秦有光禄勋王松寿。

光禄大夫 上引《汉书》云光禄勋有属官“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西秦有光禄大夫乞伏沃陵。

太府主簿 “太府”之设始于梁，梁以前与“六卿”中的少府相对而言。西秦所置“太府”应相当于魏晋的“少府”，主管皇室用度。太府主簿，为太府内的官员。西秦有太府主簿焦袭。

为了吸收汉族先进文化，西秦统治者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在政权机构中仿汉魏以来为太子所设诸官，见于记载的有：

太子太师、太子詹事 《晋书·职官志》云：“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及愍怀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讳师，故改太师为太保，通省尚书事，詹事文书关由六傅。然自元康之后，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复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来置詹事，终孝怀之世。”西秦有太子太师焦遗，太子詹事赵（应为“麹”）景。

太子司直 按汉置“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太子司直，唐代始见设置，掌弹劾官僚，纠举职事。[6]西秦任此职者有焦楷。

此外，西秦政权中中枢之官还有：

中尉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西秦有中尉段晖。

司直 如前述，司直系汉置，掌佐丞相收举不法。西秦有司直樊谦。

主簿 汉代以来中枢及州郡官署均有此职，以典领文书，办理事务。西秦主簿王松寿，应为中枢一级主簿。

禁中录事 按“录事”是晋代骠骑大将军及诸大将军属官[7]，掌管文

书。西秦的禁中录事，可能是管禁中的录事官，有乞伏延祚任此职。

记室郎中 郎中，是古代对皇帝侍从的通称。西汉有郎中、侍郎等。东汉时尚书省下设侍郎三十六人，在诸曹尚书之下。西秦所设记室郎中，不知设于何职之下，可能为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之下所置属吏——纪室督。任此职者有马艾。

左、右长史 如前所述，秦汉以来丞相、三公等均有长史。西秦长史也有各种类型：有西秦王下属之左、右长史的，即在西秦建立初期及乾归降后秦之后，如左长史边芮、右长史秘宜、长史边芮等，也有一方将帅出征所领长史，如乞伏益州征天水姜乳时，有长史韦虔。

左、右司马 与长史同。有秦王下属司马，如左司马翟勍、司马王松寿，也有为一方州牧的司马，如司马翟瑥（为凉州牧轲弹司马）、司马乞伏务和（为益州司马）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甘肃永靖炳灵寺西秦所造的编号一六九窟，北壁（完成时间大约在西秦永康、建弘间）的供养人行列图中，有国师、博士、侍军等题名。

国师 西秦统治阶级信奉佛教，任命高僧为国师。可考的有释玄高（说见后）。

博士 《晋书·职官志》云：“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278），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壁画上的人名已残缺。

侍军，系为带军者之侍从、参谋之类的人物，不属中枢之官，故略去。

以上是史载或文物中所见西秦中枢之官的情况，官号共三十四个，任职官员共四十五人（重名者只记一人）。如按任职官员的族属来划分，大致是乞伏氏王族八人，原乞伏氏为首部落联盟出连部三人，高车族五人，鲜卑族二人，羌族二人，匈奴沮渠氏一人，汉族二十三人，不明族属者一人。

（二）军事之官

西秦与南凉一样，以乞伏氏为首的军事贵族掌握着国家权力，四处征战，对外掠夺邻近国家的人民与财物，并防止他国的进攻；对内则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因此，他们需要较为完整和庞大的军事机器，表现在政权内的军事之官，则更为健全，而且基本上按魏晋以来汉族政权的军事体制而设置。现据史籍分叙如下。

大将军或上将军 乞伏国仁、乾归即位时，均自称“大将军”。“大将军，古官也。汉武帝置，冠以大司马名，为崇重之职。”[8]国仁建政权后，自称大将军，封弟乾归为“上将军”，此名不见汉魏以来职官名，想必是因国仁称大将军，故命弟乾归为“上将军”，其掌职、地位均应与汉魏以来大将军同。

骠骑大将军 炽磐曾以南凉王秃发傉檀为骠骑大将军、左南公。慕末以乞伏谦屯为骠骑大将军。

车骑大将军 西秦任此职者为乞伏没奕于（干）。

卫大将军 《晋书·职官志》云：“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内卫大将军，西秦亦置，有吉毗任之。

抚军大将军 见上。西秦炽磐曾封太子慕末为抚军大将军。

冠军大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冠军将军，楚怀王以宋义为卿子冠军。冠军之名，自此始也。”冠军将军加“大”字，魏晋均有。西秦乾归曾封子炽磐为冠军大将军。

镇军大将军 见前引《晋书·职官志》。西秦有此号者为乞伏谦屯。

“四征”大将军 西秦有征东大将军姚艾、乞伏昙达，征西大将军吐谷浑阿柴等。

“四镇”大将军 西秦有镇东大将军谦屯。

辅国大将军 西秦有辅国大将军段晖。

前将军 东汉时有前、后、左、右将军。[9]西秦有前将军乞伏益州、白养。

后将军 西秦有乞伏万年。

“四征”将军 西秦置征南将军，有吉毗、姚儁任之；征西将军乞伏孔子；征北将军没奕于（干）、出连虔。

“四镇”将军 镇东将军秘宜、昙达，镇南将军梯眷、谦屯、吉毗，镇西将军屋引破光，镇北将军乞伏千年。

“四安”将军 安东将军乞伏没奕于，安南将军焦遗，安西将军库洛干，安北将军段晖、乌地延等。

“四平”将军 平东将军王松寿、平西将军麹景、平南将军吴汉、平北将军韦虔。

中军将军 西秦任此职者为乞伏审虔。

征虏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征虏将军，汉光武建武中，始以祭遵居之。”西秦有征虏将军出连辅政。

镇军将军 西秦有镇军将军罗敦。

冠军将军 西秦有冠军将军翟瑥、翟绍。

辅国将军 《通典》卷三四云：“后汉献帝置辅国将军，以伏完为之。”西秦有此号者，为元基、段晖。

镇京将军 西秦有镇京将军赵寿生、昙达。

镇国将军 西秦有镇国将军焦遗。

镇卫将军 西秦有此号者为彭奚念、去列。

左、右辅将军 西秦有左辅将军独孤匹蹄、密贵周；右辅将军武群勇士。

左、右禁军将军 西秦有左禁军将军乞伏务和、匹达，右禁军将军乞伏千年。

左、右卫将军 西秦有左卫将军莫者羖羝、右卫将军乞伏延祚。

龙骧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龙骧将军，晋武帝始以王濬居

之。”西秦任此职者为乞伏智达。

建威将军 同上书云：“建威将军，汉光武建武中，以耿弇为建威大将军。”西秦有建威将军叱卢乌孤跋、梯君。

振威将军 同上书云：“振威将军，后汉初，宋登为之。”西秦有振威将军乞伏公府。

振武将军 同上书云：“振武将军，前汉末，王况为之。”西秦有振武将军王基。

广武将军 西秦任此职者有乞伏智达。

骁骑将军 《晋书·职官志》云：“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并杂号将军也。”西秦有此号者为乞伏务和、娄机、吴汉。

武卫将军 西秦有武卫将军慕兀、越质洛城。

卫军将军 西秦有卫军将军慕兀。

曜武将军 西秦有此号者为王基。

折冲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折冲将军，汉建安中，魏武以乐进居之。”西秦有折冲将军乞伏信帝、乞伏是辰。

安远将军 西秦有安远将军乞伏安度。

平远将军 西秦任此职者为捷虔、叱卢犍、渥头。

宁朔将军 西秦有宁朔将军出连辅政。

镇远将军、大夏镇将 《北史》卷四二《常爽传》记：爽“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

积射将军 西秦有积射将军乞伏又寅。

建义将军 西秦有此号者为密贵、乌地延。

建忠将军 西秦有建忠将军裕苟、郭磨。

建节将军 西秦有建节将军提伦。

平狄将军 吐谷浑别统阿若干降西秦，乾归以其为平狄将军。

捕虏将军 乾归以阿若干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

立义将军 西秦封越质部首领越质诘归为立义将军。

归善将军 炽磐以羌酋丘檐为归善将军。

以上自安远将军以下，大多为魏晋以来“杂号将军”。还有一些史籍只记作“将军”或“将”，如有将军乞伏魑尼寅、折斐、王伐，将姚献等。

西秦也仿照汉代以来内地汉族政权所设之校尉、都护、都尉等职，以统治境内少数民族。见于记载的有：

西胡校尉 炽磐曾以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筑列浑城于汁罗以镇之，主要是统治青海湖一带的乙弗、契汗等部。

赤水都护 乾归击降吐谷浑别统阿若干于赤水，以其为赤水都护。

层城都尉 乾归又以阿若干弟吐护真为层城都尉。

平羌校尉 因黑水羌丘檐等降，炽磐以折冲将军乞伏信帝为平羌校尉以镇之。

休官大都统 乾归曾封显亲休官首领权千成为休官大都统。

叠掘都统 鲜卑叠掘河内率五千户降西秦，乾归以其为“叠掘都统”。

以上是西秦军事之官设置情况，其完备程度远远超过南凉。共见官号七十三个（内包括将军、将各一），任职官员名（重复的不计）计七十四人，内有乞伏氏王族二十六人、汉族十五人、陇西鲜卑十四人、羌族六人、高车族三人、原乞伏氏为首部落联盟叱卢部二人、出连部二人、不明族属五人、休官一人。

（三）地方之官

西秦仿秦汉以来郡县制度，置刺史（牧）、郡太守，且名目繁多。见于记载的有：

秦州刺史（牧） 西秦任此职的有乞伏益州、乞伏昙达、王松寿、姚艾、翟爽等。

河州刺史（牧） 西秦任此职的有屈眷、屋引破光、乞伏审虔、谦屯。

东秦州刺史 西秦设东秦州，曾以秘宜、权千成为刺史。

南梁州刺史 西秦曾设此州，以悌眷为刺史。

梁州刺史 西秦设此州，曾以轲弹、出连辅政、吴汉等为刺史。

北河州刺史 西秦曾以枹罕羌彭奚念为北河州刺史。

沙州刺史（牧） 西秦曾以吐谷浑视连为沙州刺史，后又以乞伏没奕于（干）、出连虔、麹景为沙州刺史。

凉州刺史（牧） 西秦设凉州，先后以轲弹、谦屯、出连虔、段晖、乞伏沃陵、乞伏千年等为刺史。

定州刺史 西秦曾以翟瑥为定州刺史。

益州刺史 西秦设益州，以王松寿为刺史。

安州牧 西秦曾以吐谷浑阿柴为安州牧。

商州刺史 西秦曾以姚儁、焦嵩为商州刺史。

西秦郡太守有：

陇西太守越质诘归、王润[10]，金城太守辛静、卫犍，秦兴太守乞伏敕勃，兴国太守乞伏阿柴，武威太守没奕于，三河太守乞伏出累，东金城太守乞伏务和，兴晋太守翟瑥，西平太守秃发赴单、麹承，广武太守赵恢，晋兴太守王基，湟河太守匹达，略阳太守王孟保、杨显，南安太守李亮、翟承伯，祁连、汉阳二郡太守王伏仁[11]，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浇河太守姚濬，广宁太守焦遗等。

此外，西秦还有弱水护军吐谷浑觅地、长城护军焦亮。

以上是史籍中所见西秦地方之官号，共三十二个，其中州牧十二、

郡太守十八、护军二。任职官吏共四十七人，其中乞伏氏王族十三人、汉族十四人、鲜卑（包括吐谷浑、秃发氏）五人、高车族四人、羌族四人、出连部二人、屠各二人、休官一人、不明族属二人。

西秦与南凉一样，还有仿汉魏以来的封爵，史籍所载大致有王、公、侯等。如白兰王吐谷浑视连、阿柴；陇西公姚儁、显亲公权千成；南川侯出连乞都、六泉侯密贵、兰泉侯裕苟、鸣泉侯提伦、显美侯常坦、西海侯段晖等。

西秦自乞伏国仁建国始，也建立了年号制度，共建六个年号：即国仁建义（385～388），凡四年；乾归太初（388～400），凡十三年；乾归更始（409～412），凡四年；炽磐永康（412～419），凡八年；炽磐建弘（《魏书》作“建洪”）（420～428），凡九年；慕末永弘（《魏书》作“永洪”）（428～431），凡四年。其间太初十三年（400）七月西秦为后秦所灭，至东晋义熙五年（409）乾归复国，年号为更始。

至于西秦国家的法律及有关政治措施，因文献记载阙如，我们已无从查考。所以，在探讨西秦政治制度及其特点时，只能通过对上述西秦官制等的分析，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国家机器，即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12]由西秦官制所反映出来的特点，是它的国家政治制度基本上仿照汉魏以来内地汉族封建政权的形式，中枢、军事和地方的建置和职官，几乎全部与内地政权相同。因此，西秦与南凉一样，可以说是一个汉化了的封建政权。可是，西秦这个汉化了的封建政权的政治制度，又有别于南凉及其他十六国时少数民族所建的汉化封建政权：它的政治制度较南凉更为完备，而较之汉化较深的氐、羌族所建的前秦、后凉、后秦等政权，又更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比如，西秦军事之官的完备程度，远胜于南凉、北凉和西凉等河陇地区政权，它不仅设有魏晋以来的所谓“四大将军”（上将军和骠骑、车骑、卫大将军），而且“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将军齐全，杂号将军名号更为众多。其军事之官名号也多，有七十三个，任职官员达七十四人。其中乞伏氏王族就占二十六人，而且大都为军事之官之首。如果再加上

原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及鲜卑族官员十八人，则鲜卑族贵族就占军事之官总数的59%以上。这一切反映了西秦政权残存着早期军事民主时期军事部落联盟的特点，具有军事封建政权的性质。西秦从建立后，就四处征伐，掠夺邻国土地和人口，与四邻争战不休，因此政权中军事之官最为完整和庞大，而且主要掌握在乞伏氏军事贵族之手，就不足为怪了。

西秦政治制度第二个特点是，大量吸收河、陇地区汉族士族豪门和俊杰之士，形成以乞伏氏鲜卑贵族为主，联合汉族豪门地主的政权。这一特点与上述西秦为汉化的封建政权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大批汉族士族豪门加入了西秦政权，必然使其政权的形式具有魏晋以来汉族政权的特征。但是，西秦乞伏氏与汉族士族豪门的结合，又有其特点，与南凉有所区别。乞伏氏鲜卑部落联盟进入陇西地区，时间较秃发鲜卑入河西晚，汉化程度最初也不如秃发鲜卑。可是，自他们进入陇西后，汉化过程急剧加快。其原因一方面是陇右地区汉族较多，靠近关中汉族的中心，汉族文化较河湟之地发达；另一方面乞伏鲜卑最初势力较小，当他们进入陇西之后，最早依靠征服的陇西鲜卑各部的力量，以后逐渐又依靠陇右的汉族士族豪门，只有这样，乞伏鲜卑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在陇右站住脚跟。西秦政权不仅像南凉一样网罗一批汉族豪门和俊杰之士，而且能真正重用和依靠他们。特别是乾归复国之后，统治者痛切地感到必须依靠汉族士族豪门，大力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故重用焦遗，以为太子太师，参与军国大谋。前述南凉政权中汉族豪门与俊杰之士人数不少，但其任职绝大多数为低级官吏，故有相当一部分人史籍根本未提其官职名。到南凉后期，统治者秃发氏对汉族官吏越来越不信任，加速了南凉的崩溃。而西秦与南凉则有所不同，在中枢之官内，汉族不仅占了优势，为总数的52%以上，而且丞相、尚书令、左右仆射、侍中、中书监等高级官吏中汉族所占的比例也不少。在军事之官中，汉族所占比例不大，但也有十五人之多，占总数的20%左右。在地方之官中，汉族共有十四人，占总数的29%以上，其中州牧一级达七人（次）之多。在西秦政权中，如王松寿、麹景、边芮、秘宜、焦遗，还有后期西秦政权的支柱——武威段晖等，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并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而西秦政权之所以存在时间较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乞伏氏鲜卑与汉族豪门结合得较为紧密。

西秦政治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其所设置的地方一级州、郡较多，且有侨置的情况。西秦最盛时，也不过领有汉魏以来区区数郡之地，但

其所置州一级行政单位，达十二个，其中除在吐谷浑境所设安州是名义上属西秦之外，其余十一州皆在西秦境内设置。于是就产生了两三个州同治一处的现象，如秦州、东秦州和定州曾一度同治或寄治于南安，河州与北河州一度同治于枹罕。即是说，西秦所置州郡名目繁多，大多名不副实。其侨治州郡的情况也有，如商州，本应领敦煌而置，但却侨治于浇河。以上情况说明，西秦统治者企图用这种多分州郡的办法，来笼络被征服的各族上层，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力量。如东秦州的设置，系国仁因南安汉族豪族秘宜降后而设，以秘宜为刺史，后又因休官权千成降，以其为东秦州刺史。北河州的设置，系因枹罕羌酋彭奚念降后而置，以奚念为刺史；沙州原系因吐谷浑视连遣使称臣而置，后才令乞伏没奕于（干）为刺史，治乐都等。

有人认为，西秦“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首要措施是实行胡汉分治”，如早期“犹称大单于”，“这就是西秦实行民族分治政策的具体表现。以民族为区别实行分治，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普遍采取的办法”。下举前、后赵等设置“单于台”主六夷十万落的情况为例，说明“乞伏氏建立政权后，仿效他们保持单于名义，固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当时民族尚未融合的现实，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实行分治，以达到依靠鲜卑来控制其他各族的目的”[13]。

前、后赵，甚至后燕、北燕均设置“单于台”，主管境内以部落为主的各少数民族（所谓“六夷”），与采取汉族封建官制并行，进行“胡汉分治”，但是作为西秦、南凉政权是在十六国后期才建立起来的，他们是否也同前、后赵一样设有“单于台”，进行“胡汉分治”呢？对此，则应作具体分析和考察。如前所述，南凉、西秦等建国初，其王号前多有“大单于”之号。此号原是匈奴单于的称号，从漠北迁入西北的鲜卑（如秃发、乞伏、吐谷浑等）自然首先深受匈奴的影响，故其建国初，有“大单于”之号是不足为奇的。有“大单于”之号是否就一定设立“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呢？那就不一定了。

首先史籍并未载南凉、西秦等有“单于台”之设置，其次“大单于”号在他们建立政权以后，均于无形中取消。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南凉、西秦等政权最高首领称“大单于”，只是一种名号，他们并未实行单于台制。更重要的是，从上述对西秦官制的分析中，知它的政权机构基本上是仿照魏晋以来内地汉族封建政权，无“单于台”之类的制度。而对其境内少数民族部落的统治方式：一是对居陇右等地较久、汉化较深的

民族，如屠各、休官、羌族姚氏等，西秦统治者在他们聚居之地设置州郡，以其首领为州刺史、郡太守，与汉族聚居之地完全一样。二是对较为僻远的乙弗、契汗、吐谷浑、湿川以南的羌族部落，则实行汉魏以来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办法，设置“西胡校尉”“平羌校尉”“赤水都护”“层城都尉”“弱水护军”等进行统治。因此，那种认为西秦曾设“单于台”，以实行“胡汉分治”的说法是欠妥的。

关于西秦的疆域及州郡设置问题，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五西秦一节内，有详细的论述，不赘言。我们仅想对《十六国疆域志·西秦》（下简称《疆域志》）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1.《疆域志》共列西秦十一州，但无安州。按，安州系西秦以吐谷浑之地设置，以吐谷浑阿柴为安州牧，吐谷浑仅是名义上臣属于西秦，故其置安州也是名义上的，可以不计在西秦疆域之内。

西秦所置的南梁州，见于《晋书·乞伏乾归载记》，内记乾归即位后，以“镇南将军、南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疆域志》也引《西秦录》说：“建义二年，国仁以悌眷为南梁州刺史……建弘八年，南梁州刺史出连虔镇赤水。氐王杨玄遣将苻白作围之，执辅伯以归，至骆谷逃回。”《资治通鉴》卷一○六记国仁拜“悌眷为梁州刺史”；同书卷一二○宋文帝元嘉四年（即建弘八年）三月记炽磐以“宁朔将军出连辅政为梁州刺史，镇赤水”。九月“氐王杨玄遣将军苻白作围秦梁州刺史出连辅政于赤水，城中粮尽，民执辅政以降。辅政至骆谷，逃还”。显然，《疆域志》所引《西秦录》一段，与《资治通鉴》所记为一事。《资治通鉴》作“梁州刺史出连辅政”，而不作“南梁州刺史出连虔”，当可信。而《疆域志》所引《西秦录》中的“出连虔”似有误，后苻白作所执之“辅伯”，显系“辅政”之讹。这样看来，似乎西秦并未置“南梁州”。可是，上引《载记》明言，国仁以悌眷为南梁州刺史，又《通志·氏族略五》莫侯氏下云：“《西秦录》：有南凉（梁）州刺史莫侯弟眷。”所以，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西秦在国仁建义二年以悌眷为南梁州刺史是可信的。此州的设置，不过与悌眷同时降西秦的秘宜为东秦州刺史一样，只是名义上的。而到乾归时，以悌眷为御史大夫后，此州可能即废，而炽磐时的“南梁州刺史出连虔”中的南梁州，应如《资治通鉴》所记，为“梁州刺史出连辅政”。

2.《疆域志》共列西秦郡三十二个，其中十八个见前地方之官郡太守，又国仁建立政权时设郡十二（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

水、略阳、强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内除汉阳、略阳已见地方之官部分外，则又有十郡。此外，上引1972年在今甘肃张家川出土的《王真保墓志》内，云真保“列祖伏仁，乞伏世，祁连、汉阳二郡太守。父润，陇西太守”。内汉阳、陇西二郡见前，祁连郡则不见史载。按，祁连郡前凉、后凉均置，在今甘肃张掖之东。西秦势力未达于此，且见伏仁为汉阳、祁连二郡太守，则西秦祁连郡当也寄治在汉阳郡（治今甘肃天水西南）内。这样，见于记载和文物的西秦所设郡，共二十九个。此外，《疆域志》所列四郡（大夏、永晋、乐都、建昌）是有疑问的。

（1）大夏郡、永晋郡。《疆域志》引西秦更始四年公府刺杀乾归后，奔大夏，又引《北史·常爽传》爽父坦，乞伏世为大夏镇将。故云西秦曾置大夏郡。按，此二条资料均不能说明西秦曾设大夏郡。至于永晋郡之设，《疆域志》更未引所据资料。以上二郡，《疆域志》均列于河州之下，云“河州凡统旧郡一（金城），前凉增置郡二（大夏、永晋），新置郡一（东金城）”。则《疆域志》是把前凉增置永晋、大夏二郡，列入西秦河州之内。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前凉在西秦建国前十年已亡，西秦建国后是否依前凉旧制，设大夏、永晋两郡，是大有疑问的。在无任何资料证明的情况下，以不将此二郡列入西秦所置郡内较为妥当。

（2）建昌郡。《疆域志》列入凉州所属郡内，下又云：“西秦领县三（榆中、治城、蒙水）。案郡县并据《地形志》列入。”按，《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下》凉州有“建昌郡。领县三：榆中、治城、蒙水”。这是北魏时所置郡，前、后凉均未见设此郡，故西秦是否设此郡，是大有疑问的。

（3）乐都郡。《疆域志》列此郡入凉州，下云：“《西秦录》：永康五年五月，炽磐闻傉檀西征，率步骑二万袭乐都，傉檀降，遂并南凉。《通鉴》：蒙逊攻乐都，乞伏元基救之，蒙逊师退，领县可考者一（苕藋）。”按，乐都郡原为南凉所置，且为其国都。据《资治通鉴》卷一一六记，炽磐取乐都后，“以镇南将军谦屯为都督河右诸军事、凉州刺史，镇乐都”。则时乐都为西秦凉州治所，以后又是沙州的治所。可是，史籍并未载西秦曾设乐都郡，故暂不列入西秦郡数之内为妥。

总之，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西秦共置郡二十九，即有苑川、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祁连、天水、略阳、强川、甘松、匡朋、白马、陇西、金城、秦兴、兴国、武威、三河、东金城、兴晋、西平、广武、晋兴、湟河、南安、西安、浇河、广宁等郡。

3.《疆域志》仅记西秦所置护军一：弱水护军，遗漏一个“长城护军”。《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元嘉七年十一月条记：“南安诸羌万余人叛秦，推安南将军、督八郡诸军事、广宁太守焦遗为主，遗不从；乃劫遗族子长城护军亮为主……”西秦广宁郡治今甘肃漳县。长城，胡三省注云：“五代志：平凉郡百泉县，后魏置长城郡。”又《魏书·地形志下》原州（治高平）下有“长城郡。领县二：黄石、白池”。黄石，曾为西秦所攻占，于此设长城护军完全可能，治所当在今甘肃平凉西北。

4.西秦与南凉一样，史籍均未载其置县及县令（宰）。西秦是否设置有县一级行政机构，目前还难于判断。《疆域志》所列县名，大都是因前凉旧制，故仅能作参考，不可尽信。

西秦最盛时的疆域，是在西秦建弘七年（426）夏国进攻西秦前，时统有十一州、二十余郡。大致疆域的走向是：北从麦田、度坚（秦兴郡）往西南至武威东，西南至青海湖东之汁罗，又东南至浇河南，东南至西倾山、甘松山，又南下到今白龙江上游，然后又东北至今天水西、平凉北，再西北至度坚山。

二 西秦的社会形态

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在向陇西迁徙的过程中，还是处于氏族社会末期，以游牧经济为主。迁到陇西之后，乞伏氏部落联盟则迅速向阶级社会过渡。由于陇右地区自秦汉以来很早就确立了封建生产方式，到东汉末年后，地主的坞堡经济在陇西也盛行起来。当时陇右地区不仅有许多占有庄园、领有部曲的汉族豪强地主，而且还有一些早已汉化的其他民族的豪强地主。如前述秦州略阳匈奴屠各族王擢、王统父子，王统曾为前秦益州刺史，击败乞伏司繁于度坚山。屠各王氏一族在晋末已汉化，成为略阳有势力的豪族大姓，“皆有部曲”[14]。王统的兄弟王陵，即王真保曾祖，陵子伏仁后为西秦祁连、汉阳二郡太守[15]。迁至陇西的乞伏氏部落联盟必然在陇西原有的农业经济和封建制度的影响下，逐渐由游牧转向定居农业，由原始社会末期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个过程与拓跋鲜卑入主中原，采取“分散诸部”“计田授田”等一系列措施，直接封建化的过程相似。可惜文献于乞伏鲜卑封建化的过程，无一语道及，我们只能从一些有关的资料中加以推测。

首先，在乞伏国仁建立政权前后，已大致有了较为固定的中心——苑川，说明他们原有的游牧经济发生了变化。乞伏国仁建立政权后，设

秦、河二州，统十二郡之地。从其所置主要官吏为少数民族来看，他主要是依靠鲜卑、高车等族的首领来维持其统治。到乾归即位后，所任官吏就有了一批陇右汉族豪门和汉化了的其他族的地主豪强，如南安秘宜、略阳王松寿、武始翟勍等。这一事实标志着乞伏氏统治了陇西大部分地区之后，开始与该地豪门地主相结合。随着西秦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这一结合日益广泛和密切。下面我们将在西秦任职中的汉族或早已汉化的各族豪强地主及俊杰之士作一统计（见表四）。

表四 西秦汉族或汉化的各族豪强、俊杰任职情况

姓名	族属	籍贯	任职官名	资料出处
秘宜	汉	南安	东秦州刺史、右长史、尚书右仆射、镇东将军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六等
边芮	汉	金城	左长史、尚书左仆射、长史	同上
王松寿	汉	略阳	主簿、民部尚书、光禄勋、秦州刺史、尚书右仆射、平东将军、益州刺史、司马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七、一一七、一一八等
杜宣	汉		兵部尚书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麴景	汉	金城	侍中、御史大夫、尚书令、太子詹事、沙州刺史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八、一二〇等
方弘	汉		侍中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韦虔	汉（？）		平北将军、长史	同上

表四 西秦汉族或汉化的各族豪强、俊杰任职情况-续表1

姓名	族属	籍贯	任职官名	资料出处
郭麐	汉		建忠将军、散骑常侍	《资治通鉴》卷一一〇
樊谦	汉		三公尚书、司直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晋书·炽磐载记》
辛静	汉	陇西	金城太守、右丞相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
罗敦	汉		镇军将军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焦遗	汉	陇西	太子太师、广宁太守、镇国将军	《资治通鉴》卷一一五、一二一
焦华	汉	陇西	尚书民部郎	《资治通鉴》卷一一五
娄机	汉（？）		骁骑将军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
段晖	汉	武威	中尉、散骑常侍、辅国将军、凉州刺史、安北将军、辅国大将军、御史大夫	《晋书·乞伏炽磐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七、一二〇、一二一等
索棱	汉	河西	太傅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
焦袭	汉	陇西	太府主簿	同上
王基	汉		曜武将军、晋兴太守、振武将军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一一九
赵恢	汉	广武	广武太守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
王孟保	汉（？）		略阳太守	《资治通鉴》卷一一七
吉毗	汉（？）		镇南将军、征南将军、尚书仆射、卫大将军	《资治通鉴》卷一二〇

表四 西秦汉族或汉化的各族豪强、俊杰任职情况-续表2

姓名	族属	籍贯	任职官名	资料出处
李亮	汉		南安太守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赵寿生	汉		镇京将军	同上
王恺	汉		中书侍郎	《魏书·乞伏国仁传》
王伐	汉		将军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吴汉	汉		骁骑将军、平南将军、梁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一二〇
马艾	汉		记室郎中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麹承	汉	金城	西平太守	同上
辛进	汉	陇西	尚书	同上
郭恒	汉		给事黄门侍郎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魏书·乞伏国仁传》
杨显	汉	弘农	略阳太守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焦亮	汉	陇西	长城护军	同上
焦楷	汉	陇西	太子司直	同上
焦嵩	汉		尚书、商州刺史	同上
王伏仁	屠各	略阳	祁连、汉阳二郡太守	《王真保墓志》
王润	屠各	略阳	陇西太守	同上
姚儁	羌		侍中、中书监、征南将军、陇西公	《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姚艾	羌	南安赤亭	征东大将军、秦州牧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
莫者阿胡	羌	秦州	尚书郎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
莫者幼眷	羌	秦州	西安太守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表四 西秦汉族或汉化的各族豪强、俊杰任职情况-续表3

姓名	族属	籍贯	任职官名	资料出处
姚献	羌	南安赤亭	将	同上
姚潽	羌	南安赤亭	浇河太守	同上
姚珍	羌	南安赤亭	降西秦，乾归妻以宗女	《资治通鉴》卷一一〇
莫者羖羝	羌	秦州	左卫将军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翟勍	丁零（高车）	武始	左司马、主客尚书、尚书令、相国	《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翟瑥	丁零	武始	冠军将军、司马、吏部尚书、定州刺史、兴晋太守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七、一〇九
翟绍	丁零	武始	冠军将军、尚书左仆射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一一八
翟爽	丁零	武始	秦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一二〇
翟承伯	丁零	武始	南安太守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以上四十九人，绝大多数是陇右地区的豪强地主，主要是汉族，也有汉化了的屠各、羌、丁零等族。这仅是见于记载的，不见记载的肯定还有。他们与乞伏氏共同治理国家，在国内施行的各项政策，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自然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乞伏鲜卑进入陇西、建立政权后，与陇西地区封建豪门地主阶级结合，开始了他们封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他们汉化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国仁时，最后完成于乾归复国之后。

乞伏鲜卑及其所建西秦政权的封建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乞伏鲜卑，征服陇西地区处于先进的封建制度下的汉族等各族之后，必然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封建社会转化。我们从史籍中还可找到个别的例证，如《晋书·乞伏炽磐载记》记姚儁降西秦后，炽磐“征儁为侍中、中书监、征南将军，封陇西公，邑一千户”。这是采用汉魏以来封建生产关系的“食邑制”，“一千户”是作为农民（部曲）以封建地租的形式，交纳给邑主。可见，西秦国内已采用了封建的生产方式。

其次，如前所述，西秦基本上采取了汉魏以来内地汉族封建政权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建筑在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对西秦社会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等无法搞清，但是反过来从其封建的政治制度来推测它的经济基础，是与之相适应的封建生产关系，想来也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乞伏鲜卑原是以游牧为主的部落联盟，迁入陇西并建立政权后，与秃发鲜卑一样，其中一部分必然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其中，乞伏氏贵族逐渐汉化，成为陇西地区最有势力的地主阶级的代表，而广大的人民则转为部曲，或外出打仗，或耕种田地。这个过程，与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也是一致的。拓跋鲜卑的统治者曾采用“息众课农”“散诸部落，始同于编民”等措施，从而拓跋鲜卑部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部落氏族解散后，成了“编民”（即一般农民）。只因史籍缺乏，我们对乞伏鲜卑诸部的这个转化过程不很清楚罢了。

在西秦国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主要还不是上述由游牧转化为农业定居的乞伏部人，而是原陇西地区广大的汉族及汉化了的羌、屠各、丁零等族人民。这些人民就构成了西秦封建社会内的农民阶级的主体。

除了农业之外，游牧经济仍然是西秦社会经济中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西秦统治下麦田、度坚一带的鲜卑部落，漒川及白龙江上游的羌族部落，青海湖一带的乙弗、契汗部落等，大多还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以游牧为生。这些部落为西秦征服后，首领大多被封为将军之类的名号，如六泉地区三部鲜卑首领、南羌丘檐、吐谷浑别统阿若干和吐护真等。西秦怎样统治他们呢？文献记载很少。仅从一些资料推测，西秦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主要表现在经常征调他们出外打仗和征收一些贡赋之上。如《资治通鉴》卷一三一，宋文帝元嘉五年（428）记：沮渠蒙逊攻围西秦乐都，相国元基率军三千救乐都，此三千人马中，就有东羌乞提部。又《晋书·乞伏乾归载记》记乾归曾遣陇西羌昌何，攻姚兴金城郡等。西秦统治者还向这些部落索取人质，不时抽取税马或其他贡赋。如《晋书·乞伏炽磐载记》云：居青海一带的乙弗鲜卑乌地延降西秦，其弟他子立，以子轲兰为质于西秦的西平。后他子从弟提孤叛而复降，“炽磐以提孤奸滑，终为边患，税其部中戎马六万匹”。此虽带有偶然的性质，但是经常以上述税马的形式，向这些部落收取贡赋是完全可能的。西秦与这些部落的关系，是否就是封建的剥削关系呢？那倒不一定。因为漠

北的匈奴、柔然等奴隶制政权，对一些被征服的部落同样是这种关系。问题是在西秦统治的区域内，一些边远的其他民族的部落本身的社会发展情况，事实上与陇西汉族聚居之地是有区别的。后者早已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前者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不过，前者在西秦社会中不占主要地位，改变不了西秦封建社会的性质。

乞伏鲜卑由部落联盟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与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相似。那么，西秦社会中有无奴隶呢？有关西秦的史籍中，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奴隶的记载。但是，西秦统治阶级通过战争或其他方式得到了一批奴隶，主要作为家内奴婢或官奴，在西秦社会中不占主要地位。

西秦既然是一个封建社会，国内乞伏氏军事贵族及汉、羌、丁零等族的豪门地主就构成了社会上的封建地主阶级，而地主坞堡、庄园内的部曲及被征服部落的人民，则组成被统治的农民阶级。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西秦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又是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随着西秦社会的发展，以乞伏氏为首的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加之对外战争接连失败，潜伏着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就爆发出来，最终导致了西秦的衰亡（见前文）。

西秦封建政权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经常发动对邻近国家或部落的战争，俘获大批人口，将其迁徙到国内中心或其他地方。见于记载的大致如表五所示。

表五 西秦掠迁人口情况

时间（公元）	掠迁对象	人 数	迁徙地点	资料出处
388	平襄鲜卑越质部	获越质诘归及部落五千余人	还于苑川	《晋书·乞伏国仁载记》
391	安阳鲜卑大兜国	大兜败走，收其部众	还于金城	《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398	后凉支阳、允吾鹯武民	虏万人	还于金城	《资治通鉴》卷一一〇等
405	吐谷浑乌纥堤	虏万余人	还于苑川	《资治通鉴》卷一一四

表五 西秦掠迁人口情况-续表1

时间（公元）	掠迁对象	人 数	迁徙地点	资料出处
409	薄地延部	徙其部落	于苑川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410	越质屈机等十部	降其众二万五千	徙于苑川	《资治通鉴》卷一一五
410	后秦略阳、南安、陇西诸郡民	徙民二万五千户	于苑川及枹罕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等
411	鲜卑仆浑部	徙三千余户	于度坚城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
411	羌句岂、输报、邓若三部	徙五千余户	于叠兰城	同上
411	后秦柏阳堡、水洛城民	徙四千户，又徙三千余户	于苑川、谭郊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412	羌彭利发部	收羌户一万三千	于枹罕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
413	击吐谷浑树洛干于浇河	虏树洛干将呼那乌提等三千余户	还于枹罕	《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413	击吐谷浑别统支旁于长柳川	虏支旁及民五千余户	还于枹罕	《晋书·乞伏炽磐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六
413	击吐谷浑别统掘达于渴浑川	虏男女二万三千	还于枹罕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表五 西秦掠迁人口情况-续表2

时间（公元）	掠迁对象	人 数	迁徙地点	资料出处
414	攻克南凉乐都	徙虎台及文武百姓万余户	于枹罕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
415	乙弗窟乾部	降其三千余户	还于湟河	《资治通鉴》卷一一七
416	破后秦黄石、大羌二戍	徙五千余户	于枹罕	《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417	破吐谷浑阿柴于尧杆川	俘五千余口	还于枹罕	《晋书·乞伏炽磐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八
418	炽磐东巡上邽	徙民五千余户	于枹罕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
419	击漒川羌彭利和部	徙羌豪三千余户	于枹罕	《资治通鉴》一一九,《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420	击北凉胡园戍	俘二千余人	还于枹罕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
421	大破契汗秃真部	获男女二万	不明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
424	击北凉白草岭、临松郡	徙民二万余口	还于枹罕	《资治通鉴》卷一二〇
425	击北凉临松郡	徙民五千余户	还于枹罕	同上

注：表中仅列西秦在战争中掠迁的人口，其余因战争降附但未迁徙以及一般的迁徙人口不计在内。

从表五中可以看出，大约平均两年西秦就有一次掠迁人口的事，与南凉情况大致相同，但无论是从掠迁的人数还是规模来看，远超过了南凉。为什么西秦要不断通过战争掠迁人口呢？有学者认为：“脱胎于游牧经济的乞伏鲜卑统治者，对农业经济是陌生的，他们不设想如何推进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由部落联盟而迅速建立国家政权的乞伏鲜卑统治者，对管理国家毫无经验，他们不懂得如何开辟财政经济的来源，只知道推动战争机器运转，应用‘野蛮民族’惯用的办法掠夺财富和人力资

源。”[16]即是说，西秦统治阶级不知发展本国经济，而用战争掠夺财富和人口来开辟财政的来源。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和不够妥当的。如前所述，以乞伏氏为首的鲜卑部落联盟进入陇西建立政权后，其游牧经济已逐渐向农业定居转化，其统治的大部分地区是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区，对农业地区及其他被征服的游牧部落的封建剥削，是西秦国家主要的经济财政来源。其次，乞伏氏统治者汉化后，最后也变成了陇西地区最有势力的封建统治阶级成员，说他们惯用“野蛮民族”的手段掠夺财物和人口，的确是有点冤枉。何况乞伏氏还重用了大批汉族豪门及俊杰之士，这些人是不会助长和赞同乞伏氏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来维持西秦政权的。

那么，西秦统治者频繁进行的掠迁人口是什么性质，其目的何在呢？正如南凉掠迁人口一样，在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争不断，北方的人口大量减少，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经常以武力掠夺土地和人口，攻下一个地区或城镇后，先进行洗劫，然后将大量人口迁徙到自己易于控制的地区，使徙民们供劳役、兵役或耕种田地等。所以，这种掠徙人口的现象，几乎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十六国之中，甚至汉族及汉化的氐、羌等族所建的前凉、前秦、后凉、西凉等政权也不例外。[17]这种掠迁人口的性质，不是对奴隶的掠夺，而是在五胡十六国这一特定的割据分争的局势之下，各族封建统治者为掠夺、占有劳动力，增加兵役来源的行为。那种以西秦统治者因不事内部农业生产，依靠掠夺人口、财物来增加国家财源的说法，是不够妥当的。相反，掠迁人口正是在当时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为了发展本身经济而采取的措施。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表五中，西秦复国之前掠迁人口仅四次，而复国后达二十次的疑问了。因为乾归复国后，仅据枹罕、苑川、度坚一带，劳动力、兵员均十分缺乏，但是一时又无力开疆拓土，因此只好加紧对邻国和邻近地区各族人口的掠迁。

三 西秦的意识形态

在迁徙陇西和建立政权之前，乞伏氏鲜卑基本保持着鲜卑族的习俗，过着游牧生活，以肉酪为粮；信仰原始的巫术，崇拜山川、日、月、星等；盛行子娶母（非生母）、弟纳嫂的婚俗等。[18]可是，乞伏鲜卑建立西秦之后，逐渐汉化，大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和意识形态。因此，西秦的意识形态大多是与陇西地区汉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乾归复国之后，乞伏氏汉化的过程更为迅速。据《资治通鉴》

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五年（409）十月记，乾归复称秦王后，以南安焦遗为太子太师，参与军国大谋，并令太子炽磐拜焦遗于床下，欲以女妻遗子焦华，与之联姻。焦遗系汉族名儒，他对炽磐的教育内容，自然是传统的汉族儒学。西秦还设置博士等职，教授乞伏氏贵族子弟，推广汉族文化。史称炽磐子慕末，“幼而好学，有文才”，与汉族士大夫几乎没有多大差别了。

又前述甘肃永靖炳灵寺内西秦时期的第一六九窟壁画中，有个供养人身着长袍，完全是汉族士大夫的装束，题名为“乞佛□罗使之像”，这是西秦乞伏氏族人，已完全着汉魏以来汉族宽衣大袖的服饰，与鲜卑人传统的窄袖细腰衣饰相异。从这一现存的实例中，知乞伏鲜卑的上层基本上采取了汉族的服饰。一个民族的服饰、习俗是比较保守，轻易不会改变的，从乞伏氏供养人的汉化，可推知乞伏鲜卑的汉化还是比较彻底的。正因为乞伏鲜卑的汉化较为彻底，故我们推测其风俗及所用的语言文字，也大抵与汉族相同。炳灵寺第一六九窟内的西秦“建弘元年题记”及供养人题名等全为汉文即是明证。

西秦意识形态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佛教在国内的传播和流行了。如前所述，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盛行于北方，是与当时各族统治者企图利用佛教来麻痹人民，而广大的各族人民在战乱中希望从事佛中找到精神的寄托有关。乞伏鲜卑所建的西秦也不例外。佛教可能早已传入陇右地区，到西秦炽磐在位时（412～428），达到了兴盛的阶段。至今在甘肃陇西地区存有两个著名的石窟，即天水的麦积山、永靖炳灵寺石窟，这两个石窟均与西秦有关。



图五 天水麦积山石窟（周伟洲摄）

天水麦积山石窟，距今天水45公里，形如堆积之麦垛，故有此名（见图五）。至今石窟内所见最早的墨迹，是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九月张元伯造石室一区发愿文[19]。但此处作为佛教胜地，还早在此之前。据梁代慧皎撰《高僧传》卷一一《释玄高传》记：玄高曾“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还有“秦（后秦）地高僧”昙弘在麦积山，与玄高为同业友。可见，当时西秦麦积山佛教之盛。而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原称唐述窟，唐述是羌语“鬼”的意思（见图六）。[20]

此地石窟可能开凿于晋初，到十六国西秦时，炳灵寺遂成为另一佛教胜地。至今该寺最有代表性的第一六九窟内，还保存着西秦建弘元年（420）的墨书题记。陇西这两个最有名的石窟的兴盛与西秦大力兴佛是有直接关系的。



图六 甘肃永靖炳灵寺（周伟洲摄）

西秦统治者，特别是乞伏炽磐在位之时，崇信佛教，曾聘请名僧讲经。[21]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曾列三国以来译经数，内有西秦译经人数一，译经五六部，共一一○卷。当时著名的禅宗宗师玄高、秦地高僧昙弘在天水麦积山修行，有徒百余人。还有一个外国著名僧人昙无毗也到了西秦，领徒立众，训以禅道。玄高率弟子们也“从毗受法”。在炳灵寺第一六九窟北壁、建弘元年题记下方，画有两排供养人，上排导引僧两名，一人题为“□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另一人题为“比丘道融之像”。昙摩毗，即昙无毗，译写不同之故，时在西秦传法，被奉为大禅师（见图七）。



图七 炳灵寺第一六九窟北壁昙摩毗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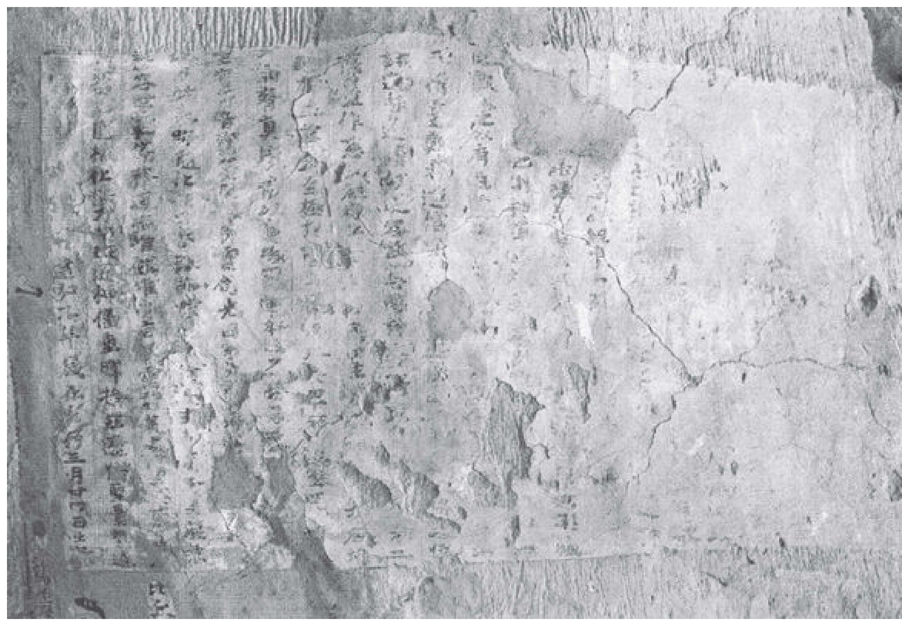
（摘自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1989，图25）

关于玄高，《高僧传》卷一一记载了他在西秦的活动，内云：

时乞佛炽槃跨有陇西，西接凉土。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玄）高乃欲以己率众，即从毗受法……时河南（指西秦）有二僧，虽形为沙门，而权侔伪相……昙无毗既西返舍夷。一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谗构玄高，云蓄聚徒众，将为国灾。曼信谗便欲加害，其父不许，乃摈高往河北林阳堂山……昔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闻高被摈，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顾栈道之艰，冒险从命。既达河南，宾主仪毕……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即遣使诣高，卑辞逊谢，请高还邑。……渐还到国，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为国师。河南化毕，进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

内云“河南王”即指西秦乞伏炽磐，其于西秦永康元年（412）称河南王，后两年复称秦王。“河南王世子曼”，曼即乞伏茂蔓之省称，茂蔓即乞伏慕末，南朝史籍均记慕末为茂蔓。玄高虽然经过一番波折，但后来为炽磐父子所崇信，西秦王及臣民近道迎候，“内外敬奉，崇为国师”。以后，玄高又到北凉传法，北凉亡后又转至北魏。由于玄高是西北佛教禅宗宗师，故吸引了内地一些僧人到西秦或北凉，如释僧隐、释道汪等。[22]西秦佛教兴盛的原因，还有其东西两邻国（后秦、北凉）佛教特盛，对其有深刻的影响，同时它处于中西交通必经之道。佛教文化的传播和盛行，必然对西秦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下面我们想通过对炳灵寺第一六九窟的分析，看一看佛教对西秦文化的影响。[23]

炳灵寺的位置在今甘肃临夏西北约40公里，临夏即西秦国都枹罕所在地，此处也是古代中西交通的枢纽之一。该寺第一六九窟，洞口在高30余米的崖面上，洞深19米，洞广27米，高14米。正壁（西壁）上下均有造像，“这批造像时代较早，大体在公元四○九年西秦更始复国以前，可上溯至四世纪末，也许还要更早一些”[24]。北壁是该窟的精华，主要是造像和壁画，完成于西秦炽磐永康元年（412）迁都枹罕以后的永康、建弘年间。从北壁北侧上方的“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的题记，基本可以确定此龛的创建年代（见图八）。



图八 炳灵寺一六九窟西秦建弘元年题记

（摘自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永靖炳灵寺》，图28）

北壁内容我们大致在前面已做过介绍，这里着重从雕塑、绘画的角度来谈一谈。北壁有题记的佛龛内，有造像“一佛二菩萨”，题名为“无量寿佛”，右胁侍题名“观世音菩萨”，左胁侍题名“得大势志菩萨”。“佛及菩萨的颜面和肢体涂白色，眼、眉、须、发以墨线描画，再以浓墨点睛。衣服红色，饰以绿色边缘，鲜艳华丽，色彩对比强烈。佛身后壁画背光，绘持长鼓、箜篌、阮、排箫、筝等各种乐器的伎乐天，飘带、披巾萦绕，给人以飘飞之感，并和外缘的联珠纹及火焰纹构成和谐的图案。”[25]在北壁的显著位置还有一高2.5米的立佛，北壁下侧，还有另外三尊立佛塑像（见图九）。“这些佛像都表现了和建弘元年龛中造像相同的特征。它们是依崖面塑出的高浮雕，面相方圆，仪态庄重，着通肩或半披肩大衣，衣纹线条流畅，使人看去有薄纱透体之感。这几尊造像动态自然，应是这一时期中比较成功的作品。”[26]北壁正中还存有两幅完整的壁画，一幅上方为说法图，绘有一佛土菩萨，说法图下居中一坐佛，题“无量寿佛”，右侧画文殊菩萨，左侧画维摩诘。这些画以传统的线描刻画人物，线条遒劲，设色明快，以青绿色为主调，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南壁造像主要有位于高处的五尊坐佛和其下的一佛二菩萨（右菩萨已失）等，估计它们的绘制年代晚于西、北壁的主要造像。

总之，第一六九窟是炳灵寺的精华所在，每当人们进入窟内，立即会被那些栩栩如生的造像和壁画所吸引。这些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艺术作品显示了古代陇西各族人民的智慧和文化水平，对于探讨中国石窟艺术的源流和发展，对于中国雕塑史和绘画史，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而这些高水平的艺术作品不是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汉唐的盛世，而是在十六国割据时期乞伏鲜卑所建的西秦之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它说明乞伏鲜卑所建的西秦并不是像过去封建史家所说的那样：一味破坏文化和经济，而是积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是对陇西地区的文化有所建树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之一。



图九 炳灵寺第一六九窟北壁立佛像

（摘自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永靖炳灵寺》，图18）

[1] 关于西秦政治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在前述西秦历史中已叙及，不赘述。

[2] 以下所列西秦职官，因前已叙及，故不再引出处；如有与南凉篇南凉职官相

同，也不再加以考述。

[3]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4]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5]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6]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

[7]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8]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9] 《后汉书》卷一一四《百官一》。

[10] 见秦明智等《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载《文物》1975年第6期。

[11] 见秦明智等《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载《文物》1975年第6期。

[12]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13] 见前引王俊杰《西秦史钩沉》。

[14] 《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三月条，记后秦征南将军姚方成对姚兴语。

[15] 见前引《王真保墓志》。

[16] 见前引王俊杰《西秦史钩沉》。

[17] 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前引关尾史郎《南凉政权（三九七~四一四）和徙民政策》。

[18] 见《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传》及注引王沈《魏书》。

[19] 见原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麦积山石窟》，文物出版社，1954。

[20] 《水经注》卷二《河水》。

[21] 见《历代三宝记》卷九。

[22] 见《高僧传》卷一一、七等。

[23] 以下所叙据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文物保管所编《炳灵寺石窟》，文物

出版社，1982。

[24] 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文物保管所编《炳灵寺石窟》，文物出版社，1982，第2页。

[25] 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文物保管所编《炳灵寺石窟》，文物出版社，1982，第5页。

[26] 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文物保管所编《炳灵寺石窟》，文物出版社，1982，第5页。

第六章 西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秦是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割据分裂时期在陇西地区建立的政权，共存在四十七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西秦的存在可以说是十分短暂的。过去汉族封建史家出于封建正统思想和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对十六国中由非汉族所建的政权总是贬之过甚，视之为“伪僭”，斥之为“野蛮”。就是近现代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在像西秦这样的政权统治下，战火不息，人民痛苦，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文化陷于停滞不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不够公允的。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西秦的历史资料已经很少，而且都是出自汉族封建史家的手笔，对像乞伏鲜卑所建的西秦，他们看到的自然是黑暗多于光明，尽污蔑之能事。不过，透过这些言词，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乞伏鲜卑所建的西秦政权无论在对陇右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在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上，还是在中西交通等方面，都起过积极的作用；西秦政权还在建设中国西北的陇西地区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西秦统一陇右地区，乞伏鲜卑的迅速封建化，有利于该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具体的事物应作具体的分析，不能脱离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用抽象的理论去探讨问题。西秦的建国是在五胡十六国分裂割据的时期，统治地区大致包括陇西及河湟地区（灭南凉后领有）。这里自前凉后期以来，先有前凉与后赵争夺陇右的战争，后有前秦苻登与后秦姚氏的战争、后秦与后凉的战争等。一系列的战争严重破坏了陇西地区的农业生产，人民流离失所。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秦崛起于陇西，建立一个较为统一的政权，使陇西地区获得了暂时的、相对的安定，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西秦统治者虽然原是处于落后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但是他们能够较为迅速地汉化，与当地汉族豪门士族相结合，逐渐维护和发展了当地封建的生产关系。正因为乞伏氏与汉族豪门的联合统治较为巩固，所以西秦亡国九年之后，能够

重新复国，并日益强盛起来。这正如《晋书》撰者所说，炽磐即位后，“不盈数载，遂隆伪业”。同时，在西秦建弘七年以前，基本上没见史籍记载西秦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说明西秦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曾经一度有所缓和，国内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这种情况，与拓跋鲜卑入主中原，满族入关建立清朝的初期是颇为相似的，只不过西秦统一的地域及建国的时间不如北魏、清朝长久，因而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功绩，远不及这两个政权罢了。至于在西秦统治下，战火不息、民不聊生，自然对其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也应了解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的产物，在四周强邻的进攻之下，西秦如欲和平，岂可得乎？总之，那种认为在西秦统治下，陇西地区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西秦的建立有利于陇西各族人民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

陇西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以乞伏氏为首的陇西鲜卑各部自曹魏末先后进入陇西各地，与各族杂处。乞伏氏建立西秦后，乞伏鲜卑成为陇西地区的统治民族，随着乞伏氏鲜卑的汉化，各族也不同程度地汉化了。他们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汉语文，风俗习惯也随之汉化。因此可以说，在西秦统治时期陇西各族的汉化趋势更为显著。这一趋势有利于各民族的相互接近、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汉族的先进文化对各族的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秦掠迁了一部分僻远的羌族、吐谷浑、乙弗等入苑川、枹罕等地。这种掠迁本身对被掠迁的各族人民是一场灾难，许多人在迁徙过程中死亡，但是这种用武力强迫迁徙的结果，在客观上改变了陇西地区各族分布的格局，有利于民族融合。

（三）西秦统治者的汉化政策及佛教信仰，有利于陇西地区文化的发展

如前所述，西秦统治者设置“博士”“太子太师”“太子詹事”等职官，教育鲜卑贵族子弟，传播汉族文化。这些措施，对陇西地区先进的汉族文化的传播及各族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从仅存的炳灵寺石窟所展示出的西秦时的雕塑、绘画的艺术水平可以断言，在西秦统治之下，陇右地区并非文化陷于停滞不前的状况，而是有所发展。

当然，由于西秦存在时间较短，文献记载缺乏，其文化建树自然不能与魏晋时相比。

（四）西秦在中西陆路交通上的作用

西秦统治的陇右地区正处于中国内地与西方（中亚、欧洲、印度）的交通要道上，无论由河西走廊入西域、欧洲的道路，还是由青海经柴达木盆地至西域的道路，一般都要首先经过陇西地区。在西秦存在的四十七年时间里，西秦承担了这一时间中西交通陇西段的重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往来于陇西西秦的中外僧人，见于文献记载的就不少。如前述的法显等，就是从长安出发，“度陇呈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又有释昙无竭，于宋永初元年（420），“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西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1]。内云“河南国”即指西秦。[2]还有在后秦弘始六年（404）有释智猛等十五人从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3]一直到印度。其时西秦虽已亡于后秦，但乾归仍为后秦守陇西之地。总之，自法显至法勇（即释昙无竭）西行求法者无虑数十人[4]，其中大多经过陇西西秦领地，也有一小部分由凉州（今甘肃武威）启程的。而由西方或西域入内地弘法的僧人，经河西的北凉、陇西的西秦至内地者，人数更多，如著名的鸠摩罗什、昙无毗等。以上仅是文献所载来往于中西方的佛教徒，至于一般商人往来贸易想必也很多，只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罢了。

（五）西秦对陇西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西秦建国时间不长，但其对陇西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功绩，还是不能磨灭的。现存史籍表明，西秦仅在陇西地区城镇的建设及交通道路的改良方面，就做出了不少的成绩。

西秦自建立后，于陇西之地先后建设了一些新的城镇，见于记载的有：

1.勇士城

晋太元十年乞伏国仁建立政权，“筑勇士都城以居之”[5]。此城为西秦开国第一个国都。按，汉代于天水郡设勇士县，《水经注》卷二多次

提到黄河过金城（今甘肃兰州西），“东过天水北界”，“又东北过天水勇士县北”。又说：“苑川水出勇士县之子城南山”，又谓之“子城川”。1984年，作者沿苑川两岸做了一些调查。在今夏官营火车站西一里许、紧靠铁轨南有一古城遗址，城四周城墙犹存，城北即苑川河。城内已完全种上庄稼，内外发现许多魏晋以来的砖瓦、陶器碎片及北宋、元代的瓷片。城中有榆中县所立县文物保护标志，上云“勇士城遗址”（见图十）。此地当榆中县东北，亦即近现代地志著作中所记勇士城之位置。《水经注》既然说“苑川水出勇士县之子城南山”，苑川又云子城川，则勇士县之子城应在苑川（子城川），而汉代勇士县城亦当在子城附近。而所谓“子城”应即乞伏国仁所筑，并第一次作为国都的勇士城，也就是在今夏官营火车站西一里许的古城遗址。



图十 甘肃榆中西秦勇士城遗址（周伟洲摄）

2.苑川城

苑川是乞伏鲜卑进入陇西后定居的地区，“为龙马之沃土”，汉马援曾请于此与当地田户中分（即对半分收获的农产品）以自给。有东、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西城即乞伏所都也。[6]按东、西二苑城当均在苑

川，颇疑上云之勇士城（子城）即苑川东城。至于西城的遗址，作者在调查时，从夏官营沿苑川西行，在离上述古城二十里许，川水北岸有名为“上古城”之地，有两个不大的寨堡，当地人即指为“上古城”得名之由。观其寨堡墙垣及整个布局，似为明清以来修建的村堡之类的建筑，绝不会是十六国时苑川西城的遗址。按《水经注》的说法，东西二苑城相距七十里，那么从上述勇士城遗址向西沿苑川七十里，约当在今桑园峡一带，靠近苑川入黄河之处。但这一带早已辟为农田，找不到任何古城的遗迹了。

3.度坚城

西秦更始三年（411）西秦曾迁降附的鲜卑仆浑部三千余户于此城，以敕勃为秦兴太守以镇之。则此城为西秦秦兴郡治所。地当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北的度坚山。

4.叠兰城

西秦曾迁降羌句岂等部五千余户于此城，以兄子阿柴为兴国太守以镇之。则城为西秦兴国郡治，地在今甘肃临夏东南。

5.嵻㟲城

炽磐于东晋义熙四年（408），“招结诸部二万七千，筑城于嵻㟲山以据之”。后又以没奕于（干）为武威太守，镇嵻㟲城。此城当在今兰州东南之兴隆山一带。

6.谭郊

据《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十一月条记：乾归攻克后秦水洛城后，“徙民三千余户于谭郊。遣乞伏审虔帅众二万城谭郊”。此城曾一度作为西秦的国都，地当在今甘肃临夏西北。

7.列浑城

西秦建弘三年（422），炽磐以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筑列浑城于汁罗以镇之”。汁罗即罗川之地，在今青海湖东。

8.南强城

《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十月条云："秦以骁骑将军吴汉为平南将军、梁州刺史，镇南漒。"此城在漒川之南，即今甘肃岷县南。

此外，在西秦后期地位日趋重要的定连（今甘肃临夏西北）及早期的麦田城（在麦田山），都有可能系西秦时所修筑或改筑的。

在改良境内交通道路方面，西秦政权也做出了成绩。可惜现有的文献保留得不多，我们仅从《水经注》卷二河水引《秦州记》知一鳞半爪。此书云：

> 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

据此，知晋义熙中（405～418），乞佛（伏）氏的西秦曾在黄河上做飞桥。此桥的位置，据《水经注》说在枹罕东"河夹岸也"，则桥当架在今甘肃临夏东北大夏河和洮河入黄河河口之间。此云飞桥，且高达五十丈，必定是十分宏伟、壮观的。此处是由陇西临洮、临夏过黄河入河西或青海的交通要冲之一。故西秦于此做飞桥，以利行人。

总之，西秦是我国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之一，它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我们伟大的祖国灿烂光辉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乞伏鲜卑所建的西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十分渺小，但毕竟留下了它的历史功绩，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1] 《高僧传》卷三《释昙无竭传》。

[2] 考证见拙作《古青海路考》，载《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3] 《高僧传》卷三《释智猛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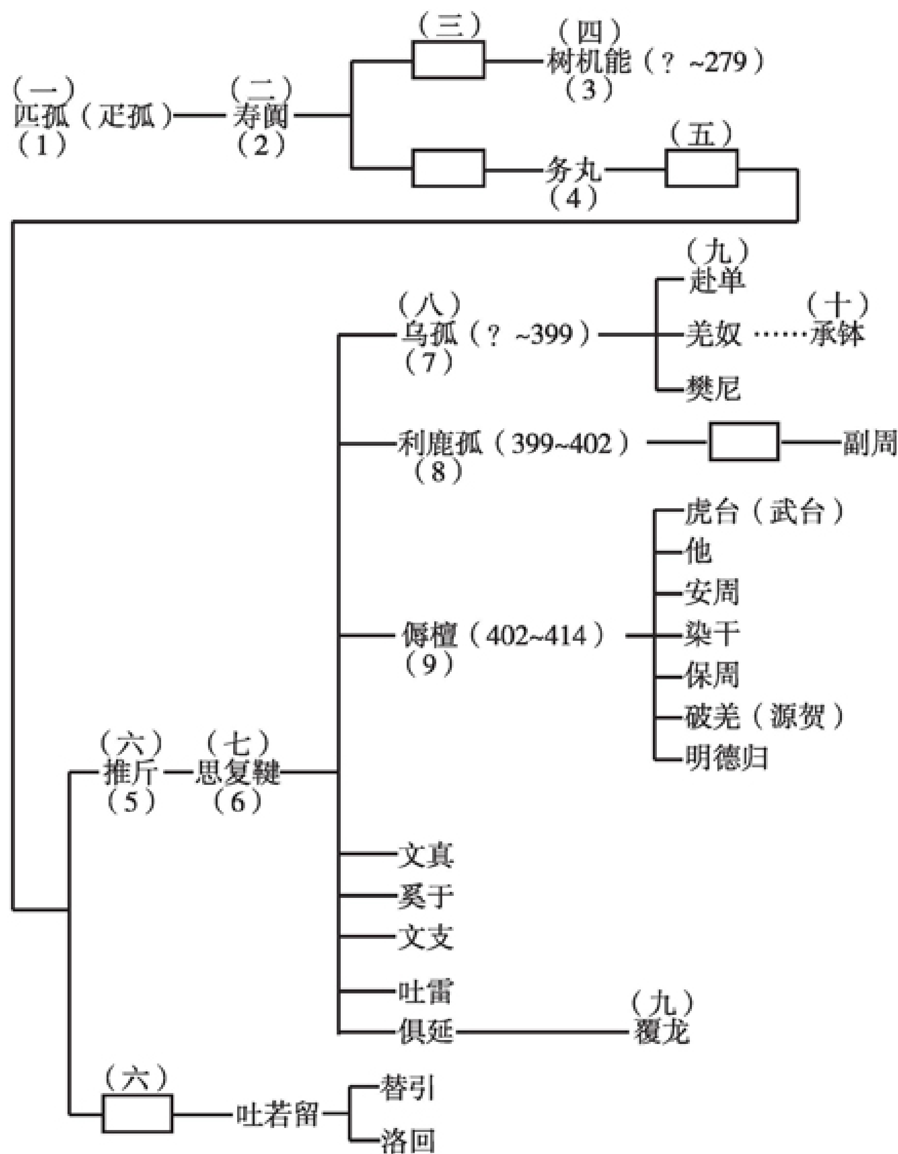
[4] 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63，第380～387页。

[5] 《太平御览》卷一二七引《十六国春秋·西秦录》。

[6] 见《水经注》卷二《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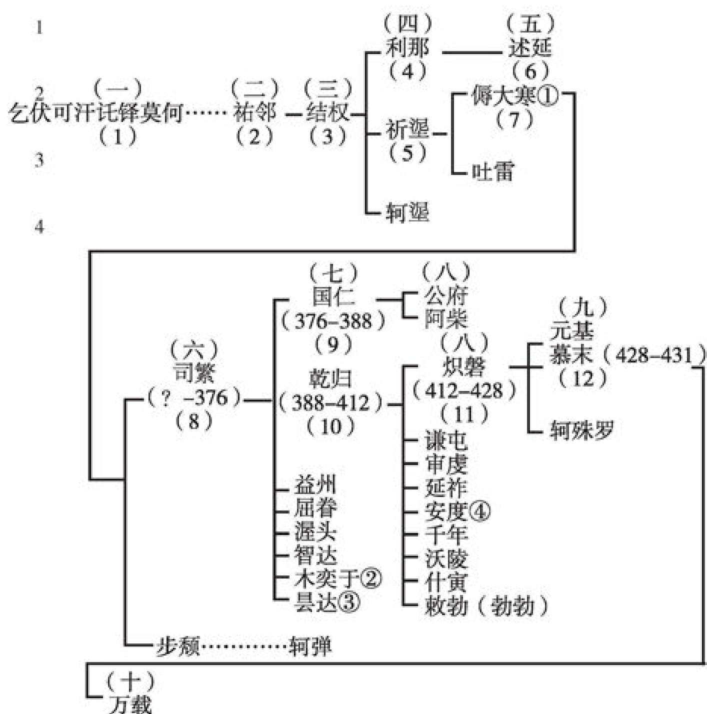
附录篇

附录一 南凉秃发氏世系表[1]



[1] 此表根据《晋书》《资治通鉴》等资料制成。表内横线表示父子相承，竖线表示兄弟并列，关系不明确者用虚线表示。人名上括号数字，表示世代先后，下括号数字表示王位传承顺序，人名后括号表示在位年代，均采用公元纪年。

附录二 西秦乞伏氏世系表



1 《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云傉大寒为述延子，而《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西秦录》记大寒为祁泥子，从《十六国春秋》。

2 《晋书》《册府元龟》均云昙达、没奕于（干）为乾归弟，《资治通鉴》以为炽磐弟，从《晋书》。

3 同上所引。

4 《魏书·乞伏国仁传》“安度”作“度”。

附录三 南凉大事年表

年代（公元）	南凉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219~256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至魏甘露元年	拓跋鲜卑诘汾长子匹孤率部从塞北（漠南），迁徙到今甘肃、宁夏北部一带游牧。
256~263		魏甘露元年至景元四年	曹魏邓艾主陇右军事，迁鲜卑万余户（包括秃发鲜卑）于雍、凉间，与民杂处。
269		晋泰始五年	晋河西、陇右一带有水旱之灾，引起该地区羌、胡起事。晋置秦州，以胡烈为刺史，以镇压之。
270		晋泰始六年	六月，胡烈攻秃发树机能（匹孤曾孙）于万斛堆，兵败被杀，树机能又击败晋石鉴军。
271		晋泰始七年	四月，树机能与北地胡联合攻金城，晋泰始七年击杀晋凉州刺史牵弘于青山。
274		晋泰始十年	树机能又击败晋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八月，攻金城诸郡，为晋汝阴王骏击败，树机能部帅乞文泥等被杀。
275		晋咸宁元年	二月，树机能见晋军云集，遂遣质子请降。
278		晋咸宁四年	六月，树机能党若罗拔能与晋凉州刺史杨欣激战于武威，欣兵败，死于甘岭。
279		晋咸宁五年	正月，树机能攻陷凉州，尽有晋凉州之地。晋遣马隆击树机能。十二月，马隆击杀树机能，凉州复为晋所有。
301		晋永宁初	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击河西各地反晋的鲜卑，平之。
304~305		晋永兴中	原树机能党若罗拔能反晋，张轨遣司马宋配击杀拔能，俘十余万口。

南凉大事年表-续表1

年代（公元）	南凉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365		晋兴宁三年	秃发推斤死，子思复鞬领秃发部众，其中心在广武。
383		前秦建元十九年、晋太元八年	前秦苻坚淝水大败，原前凉张天锡子大豫奔还河西，投秃发思复鞬，思复鞬送之于魏安。
385		前秦太安元年、晋太元十年、西秦建义元年	乞伏鲜卑首领乞伏国仁建立政权，都勇士城。
386		前秦太初元年、晋太元十一年、后凉太安元年	氐族吕光据河西，建后凉政权。秃发思复鞬遣子奚于助张大豫攻后凉姑臧，吕光从城内出击，杀奚于等二万人，后大豫为吕光擒杀。同年，思复鞬死，子乌孤立。乌孤务农桑，修邻好，势力渐强。
394		后凉麟嘉六年、晋太元十九年	吕光遣使拜乌孤“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乌孤接受封号，名义上臣属于后凉。
395		后凉麟嘉七年、晋太元二十年	乌孤击乙弗、折掘两部鲜卑，筑廉川堡以都之，又征服相邻各部。吕光遣使封乌孤为“广武郡公”。乌孤又破意云鲜卑部。
396		后凉龙飞元年、晋太元二十一年	吕光遣使拜乌孤“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不受。
397	太初元年	后凉龙飞二年、晋隆安元年、北凉神玺元年、西秦太初十年	正月，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建立政权。又治兵广武，攻占金城，败后凉将军窦苟。八月，后凉郭麐、杨轨反乱，向乌孤求援。乌孤遣弟利鹿孤救之，又遣使与北凉、西秦通好。
398	太初二年	后凉龙飞二年、北凉神玺二年、西秦太初十一年、晋隆安二年	六月，利鹿孤助杨轨攻后凉姑臧，为吕纂所败。后乌孤击败羌梁饥，取洪池岭南五郡之地，杨轨等降乌孤。年底，乌孤改称武威王。

南凉大事年表-续表2

年代（公元）	南凉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399	太初三年	后凉承康元年、北凉天玺元年、西秦太初十二年、晋隆安三年	正月，乌孤迁都乐都，遣子弟分镇各地；二月，乌孤遣弟利鹿孤援北凉，以抗吕光。六月，乌孤因酒醉坠马受伤死，立弟利鹿孤。八月，利鹿孤即武威王位，迁都西平。
400	建和元年	后凉咸宁二年、北凉天玺二年、西秦太初十三年、晋隆安四年	三月，后凉吕纂向南凉进攻，为傉檀所败。五月，后秦灭西秦，乾归父子奔南凉。六月，吕纂攻北凉，傉檀乘机攻姑臧，俘八千余户而还。年底，乾归又逃奔后秦。
401	建和二年	后凉神鼎元年、北凉永安元年、后秦弘始三年、晋隆安五年	正月，利鹿孤更称河西王，并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三月，南凉攻后凉，败吕隆，徙二千余户而归。七月，后秦军围姑臧，南凉、北凉等遣使奉表入贡于后秦；九月，后凉吕隆出降后秦，势衰。北凉内乱，蒙逊遣子奚念为质于南凉，求援，利鹿孤不受，遣军攻临松，虏六千余户。后蒙逊遣质请和，利鹿孤还所掠，召军还。十二月，南凉攻围后凉姑臧，后又攻昌松郡。
402	建和三年、弘昌元年	后凉神鼎二年、北凉永安二年、后秦弘始四年、晋元兴元年	正月，南凉军攻拔昌松，执后凉太守孟祎。二月，北凉攻围姑臧，吕隆向南凉救援，傉檀率军救之，北凉退兵。傉檀遂徙凉泽段冢五百户而还。后，南凉又取魏安。三月，利鹿孤卒，弟傉檀立，更号为凉王，迁都乐都。十月，傉檀攻后凉姑臧。十二月，后秦拜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傉檀大城乐都。
403	弘昌二年	后凉神鼎三年、北凉永安三年、后秦弘始五年、晋元兴二年	八月，后秦灭后凉，以王尚为凉州刺史，镇姑臧，王尚遣使与南凉通好。

南凉大事年表-续表3

年代（公元）	南凉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404	弘昌三年（三月去年号，臣属后秦）	北凉永安四年、后秦弘始六年、晋元兴三年	三月，傉檀密图姑臧，去年号，臣属后秦；后遣弟文支击破南羌、西虏，上表求凉州，姚兴不许，加傉檀散骑常侍，增邑二千户。
406		北凉永安六年、后秦弘始八年、晋义熙二年	六月，傉檀击北凉，次于氐池，蒙逊固守，退兵。后傉檀向后秦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姚兴遂封之为凉州刺史，镇姑臧，召王尚返长安；既而悔之，为时已晚，傉檀据姑臧。八月，傉檀返乐都，以弟文真守姑臧。十一月，迁都姑臧。
407		北凉永安七年、后秦弘始九年、晋义熙三年	八月，傉檀向北凉进攻，双方激战于均石，大败而还。蒙逊夺取南凉西郡，太守杨统降。十月，后秦河州刺史彭奚念降南凉。十一月，南凉为夏赫连勃勃大败于阳武下峡，损失惨重。接着，姑臧城内民变，又发生“边、梁之乱”。南凉从此由盛转衰。
408	嘉平元年	北凉永安八年、后秦弘始十年、晋义熙四年	六月至七月，后秦军击南凉，为傉檀所败，双方约和。十一月，傉檀复称凉王，改元嘉平，置百官。
409	嘉平二年	北凉永安九年、后秦弘始十一年、晋义熙五年	七月，乾归复国，号秦王。年底，傉檀遣军击北凉，掠临松千余户而还。蒙逊大怒，又率军至显美方亭，破车盖鲜卑，掠数千户而去。
410	嘉平三年	北凉永安十年、后秦弘始十二年、西秦更始二年、晋义熙六年	一月，傉檀遣军击蒙逊，大败而还。三月，傉檀率军击北凉，大战于穷泉，大败奔还。蒙逊围姑臧。附近鲜卑各部降北凉。傉檀送质请和，蒙逊退兵。接着，南凉右卫将军折掘奇镇反于石驴山，傉檀从姑臧迁还乐都。

南凉大事年表-续表4

年代（公元）	南凉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411	嘉平四年	北凉永安十一年、后秦弘始十三年、西秦更始三年、晋义熙七年	一月，蒙逊取姑臧，二月进攻南凉，围乐都，三旬不克。傉檀遣子安周为质，蒙逊退兵。吐谷浑树洛于（干）大败南凉太子武台，取浇河之地。六月，傉檀伐北凉，俘获甚众，途中为蒙逊击败，蒙逊遂围乐都，傉檀遣子为质，北凉退兵。七月，西秦炽磐败武台于岭南，掠牛马十余万而返。
412	嘉平五年	北凉玄始元年、西秦永康元年、晋义熙八年	四月，西秦攻拔南凉三河郡，以乞伏出累为太守。
413	嘉平六年	北凉玄始二年、西秦永康二年、晋义熙九年	一月，傉檀遣军至北凉，蒙逊率军至西平，掠牛马而还。四月，傉檀率军攻北凉，兵败，乐都被围。南凉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北凉。傉檀送质于北凉，蒙逊退兵。
414	嘉平七年	北凉玄始三年、西秦永康三年、晋义熙十年	四月，南凉连年不收，上下饥弊，傉檀率军西击乙弗，留太子武台守乐都。西秦炽磐乘机袭取乐都，俘武台等，迁其及百姓万余户于枹罕。傉檀降西秦，年底被毒杀，南凉亡。

附录四 西秦大事年表

年代（公元）	西秦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265		晋泰始初	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由漠北南迁出大阴山后，首领祐邻于此时率户五千迁于夏。又击并鲜卑鹿结部，因居高平川。
约 307 ~ 317		西晋末至十六国初	祐邻死后，乞伏等四部先后又由高平川迁至牵屯，最后居于苑川。沿途击并鲜卑各部，众十余万。
328		晋咸和三年	后赵灭前赵，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首领傉大寒惧而迁于麦田无孤山。
351 ~ 354		前秦皇始中	傉大寒子司繁迁于度坚山。
371		前秦建元七年、晋咸安元年	苻坚将王统击司繁，司繁降，苻坚以其为南单于，留于长安，以其叔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
373		前秦建元九年、晋宁康元年	苻坚以司繁为镇西将军，击陇右鲜卑勃寒，勃寒降；苻坚令司繁回镇勇士川。
376		前秦建元十二年、晋太元元年	前秦灭前凉，领有河陇之地。是岁，司繁卒，子国仁立。
383		前秦建元十九年、晋太元八年	前秦击东晋，征国仁为前将军从行。国仁叔步颓反于陇西，坚令国仁返讨。苻坚淝水大败后，国仁招集诸部，众至十余万。
385	建义元年	前秦太安元年、晋太元十年	九月，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建义，都勇士城。时有鲜卑匹兰部降国仁。
386	建义二年	前秦太初元年、后秦建初元年、后凉太安元年、晋太元十一年	一月，南安豪族秘宜率羌胡五万攻西秦，为国仁击败。七月，苻登攻拔南安，秘宜、莫侯悌眷等三万余户降西秦，国仁以宜为东秦州刺史，莫侯悌眷为梁州刺史。

西秦大事年表-续表1

年代（公元）	西秦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387	建义三年	前秦太初二年、后秦建初二年、后凉太安二年、晋太元十二年	三月，苻登遣使拜国仁为“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国仁击六泉密贵、裕苟、提伦三部鲜卑，降之。
388	建义四年、太初元年	前秦太初三年、后秦建初三年、后凉太安三年、晋太元十三年	一月，西秦建威将军叱卢乌孤跋反于牵屯山，为国仁击破，复降；四月，国仁击平襄越质鲜卑部，俘诘归等五千余人而还；六月，国仁卒，弟乾归立，改元太初，称河南王，迁都金城。
389	太初二年	前秦太初四年、后秦建初四年、后凉麟嘉元年、晋太元十四年	元月，苻登封乾归为大将军、大单于、金城王。有南羌独如等七千降乾归。五月，乾归击降牵屯一带休官阿敦、侯年二部，于是陇右鲜卑、羌、胡多附西秦。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降，乾归以其为北河州刺史。
390	太初三年	前秦太初五年、后秦建初五年、后凉麟嘉二年、晋太元十五年	四月，吐谷浑视连遣使入贡，乾归封之为沙州牧、白兰王。十月，视连卒，子视罴立，乾归复封之，视罴不受。年底，西秦陇西太守越质诘归叛。
391	太初四年	后秦建初六年、后凉麟嘉三年、晋太元十六年	元月，乾归击败诘归，诘归复降。七月，乾归与高平没奕于合军攻安阳鲜卑大兜国，收其部众而还。八月，乾归击败没奕于。后凉吕光趁虚袭西秦，乾归还军，吕光退走。
392	太初五年	后秦建初七年、后凉麟嘉四年、晋太元十七年	八月，吕光攻西秦金城、枹罕，为乾归所败，吕光亲自领军攻克枹罕后，还军。年底，休官权千成据显亲，自称秦州牧。
393	太初六年	后秦建初八年、后凉麟嘉五年、前秦太初八年、晋太元十八年	元月，权千成为前秦苻登所逼，降西秦，乾归以其为东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统。

西秦大事年表-续表2

年代（公元）	西秦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394	太初七年	前秦延初元年、后凉麟嘉六年、后秦皇初元年、晋太元十九年	元月，苻登遣使拜乾归河南王，加九锡之礼。四月，登为姚兴所败。六月，登遣子为质于西秦，进乾归为梁王，乾归遣军救苻登。七月，登为姚兴所杀，子崇奔湟中即帝位，改元延初。十月，乾归逐苻崇，崇奔仇池氐王杨定，共率军击西秦。乾归遣军击之，先败后胜，杀杨定、苻崇，尽有陇西之地。十二月，乾归称“秦王”。
395	太初八年	后秦皇初二年、后凉麟嘉七年、晋太元二十年	四月，乾归遣乞伏益州攻上邽姜乳，益州败还。六月，乾归由金城迁至苑川西城；有河西秃发如苟率户二万降西秦。七月，后凉率众十万将击西秦，乾归惧，称藩于后凉，既而悔之，杀劝降后凉大臣密贵周、莫者羖羝。
396	太初九年	后秦皇初三年、后凉龙飞元年、晋太元二十一年	元月，休官权万世率众降西秦。十月，乾归从弟轲弹因与益州不和，投后凉。接着，越质诘归又叛降后秦，姚兴处之于成纪，又遣军击上邽姜乳、略阳权千成，皆降之。后秦势力西进至陇西。
397	太初十年	后秦皇初四年、后凉龙飞二年、南凉太初元年、晋隆安元年	元月，后凉遣军三万攻西秦金城，乾归纵反间计，先败后胜，吕光退兵。年底，后秦长水校尉姚珍降西秦，乾归妻以宗女。
398	太初十一年	后秦皇初五年、后凉龙飞三年、南凉太初二年、晋隆安二年	元月，乾归攻取后凉支阳、允吾、鹯武，虏万余人而去。六月，后凉郭麐、杨轨反乱失败后，麐奔西秦，乾归以其为散骑常侍。乾归又遣军击吐谷浑视罴，视罴降，以宗女妻之。

西秦大事年表-续表3

年代（公元）	西秦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399	太初十二年	后秦弘始元年、后凉咸宁元年、北凉天玺元年、南凉太初三年、晋隆安三年	四月，有鲜卑叠掘河内自魏降西秦，乾归以其为叠掘都统。六月，西秦丞相出连乞都卒，以辛静为右丞相。
400	太初十三年	后秦弘始二年、南凉建和元年、晋隆安四年	正月，乾归迁还苑川。五月，后秦军五万击西秦，乾归兵溃，父子走投南凉，西秦亡。十一月，乾归又由南凉奔长安，降后秦，姚兴以其为河州刺史，复以部众配之。
401		后秦弘始三年、晋隆安五年	姚兴遣乾归还镇苑川。五月，乾归从后秦军击后凉。
402		后秦弘始四年、南凉弘昌元年、晋元兴二年	乾归子炽磐从南凉逃奔其父，后秦以炽磐为兴晋太守，镇枹罕，又加乾归散骑常侍、左贤王。
403		后秦弘始五年、南凉弘昌二年、晋元兴二年	五月，乾归随后秦齐难等至姑臧，迎后凉吕隆至长安。又讨羌党龙头于兹川，攻氐王杨盛将苻帛于皮氏堡。
404		后秦弘始六年、晋元兴三年	八月，乾归随后秦姚硕德伐仇池氐王杨盛，战于竹岭，为盛所败。
405		后秦弘始七年、晋义熙元年	正月，乾归击吐谷浑乌纥提（视罴弟），大破之，乌纥提走保南凉而卒。乾归至长安。九月，乾归攻仇池杨盛，为盛所败。
406		后秦弘始八年、晋义熙二年	五月，苑川地震。十一月，乾归朝于长安。
407		后秦弘始九年、晋义熙三年	正月，姚兴因乾归入朝，留为主客尚书，以炽磐监抚其众。十月，以炽磐为河州刺史。

西秦大事年表-续表4

年代（公元）	西秦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408		后秦弘始十年、南凉嘉平元年、晋义熙四年	十月，炽磐招结诸部，筑嵻崀城以自固。十二月，炽磐攻枹罕彭奚念，为奚念所败。
409	更始元年	后秦弘始十一年、南凉嘉平二年、晋义熙五年	二月，炽磐击走彭奚念，据有枹罕，遣人告乾归，乾归遂逃回苑川。四月，乾归至枹罕。时有鲜卑悦大坚部自龙马苑降乾归。乾归收众三万迁于度坚山。七月，乾归复国，称秦王，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复本位。
410	更始二年	后秦弘始十二年、南凉嘉平三年、晋义熙六年	三月，乾归遣炽磐击薄地延于烦于，破之，以薄地延为尚书。又遣羌昌何攻后秦金城，克之，以乞伏务和为东金城太守。七月，击降鲜卑越质部，迁其部众于苑川。八月，乾归复都苑川，又攻后秦略阳、南安、陇西诸郡，徙民二万五千于苑川、枹罕，又有鲜卑仆浑、羌句岂等降乾归。
411	更始三年	后秦弘始十三年、南凉嘉平四年、晋义熙七年	正月，乾归还其所掠守宰，向后秦谢罪，姚兴拜乾归为河州牧、河南王，炽磐为左贤王、平昌公。二月，乾归迁仆浑部于度坚城，迁羌句岂等部于叠兰城。七月，炽磐攻南凉，败武台于岭南。十月，又攻后秦柏阳堡、水洛城，徙户七千于苑川、谭郊。十二月，彭利发据枹罕。
412	更始四年、永康元年	后秦弘始十四年、南凉嘉平五年、晋义熙八年	正月，乾归击杀彭利发，复取枹罕。二月，乾归迁都谭郊，率骑二万击败吐谷浑别统阿若干于赤水，以其为赤水都护；又攻夺南凉三河郡，以乞伏出累为太守。六月，乾归为兄子公府所刺杀，子炽磐迁都枹罕。七月，炽磐遣军击杀公府。八月，炽磐即位，改元永康，称河南王。

西秦大事年表-续表5

年代（公元）	西秦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413	永康二年	后秦弘始十五年、南凉嘉平六年、晋义熙九年	正月，炽磐遣军击吐谷浑树洛干于浇河，获三千余户而还。又遣军东破休官于白石川，于是陇右休官悉降。时后秦镇守陇西的太尉索棱以郡降西秦。四月，西秦先后击吐谷浑别部，俘虏其众。十月，吐谷浑别统掘达降西秦。
414	永康三年	后秦弘始十六年、南凉嘉平七年、晋义熙十年	五月，炽磐闻傉檀西征乙弗，遂袭取南凉乐都，南凉亡。十月，炽磐复称秦王。
415	永康四年	后秦弘始十七年、北凉玄始四年、晋义熙十一年	二月，北凉攻取西秦广武郡，炽磐遣将击之于浩亹，兵败；又遣军击之，复为蒙逊所击败。炽磐遂率众三万攻北凉湟河郡，拔之。又西击乙弗窟乾，降其众三千余户而归。年底，炽磐又击南羌弥姐康薄于赤水，降之。
416	永康五年	后秦永和元年、北凉玄始五年、晋义熙十二年	正月，炽磐攻漒川羌彭利和，蒙逊乘机攻石泉以救之。炽磐还军，于二月遣将救石泉，北凉退兵。以后，双方和亲。四月，炽磐遣军东攻后秦上邽姚艾，进破黄石、大羌二戍，徙五千余户于枹罕。十月，东晋刘裕攻占后秦略阳。十一月，炽磐遣使东晋，裕拜其为平西将军、河南公。
417	永康六年	后秦永和二年、北凉玄始六年、晋义熙十三年	正月，西秦击败吐谷浑树洛干，树洛干走保白兰，发疾而死。九月，刘裕入长安，后秦亡。十月，炽磐乘机攻上邽姚艾，艾降，以其为征东大将军、秦州牧。
418	永康七年	北凉玄始七年、夏昌武元年、晋义熙十四年	正月，西秦置沙州，以没奕于为刺史，镇乐都。二月，乙弗部首领降西秦。十月，姚艾叛投北凉，其叔儁率众降西秦，炽磐以其为侍中、中书监，封陇西公。十一月，炽磐东巡，徙户五千于枹罕。

西秦大事年表-续表6

年代（公元）	西秦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419	永康八年	北凉玄始八年、夏真兴元年、晋元熙元年	四月，炽磐遣军击降吐谷浑觅地，以其为弱水护军。九月，西秦又击羌彭利和于漒川，利和奔仇池，徙羌豪三千于枹罕。
420	建弘元年	北凉玄始九年、夏真兴二年、宋永初元年	正月，炽磐以二子慕末为太子，改元建弘。七月，刘宋遣使拜炽磐为安西大将军。九月，炽磐乘北凉攻西凉之机，遣军袭胡园戍，俘二千余人而归。
421	建弘二年	北凉玄始十年、夏真兴三年、宋永初二年	正月，炽磐攻上邽，遇霖雨而还。五月，吐谷浑阿柴入贡于西秦，炽磐以其为安州牧、白兰王。七月，北凉击西秦，战败而还。十二月，炽磐率军袭契汗秃真于罗川。
422	建弘三年	北凉玄始十一年、夏真兴四年、宋永初三年	正月，西秦破契汗秃真，其部树奚等五千降。又遣军击北凉姑臧，见有备，退军。四月置列浑城于罗川。十月，擒北凉沮渠成都。
423	建弘四年	北凉玄始十二年、夏真兴五年、北魏泰常八年、宋景平元年	四月，西秦向魏纳贡称臣。十月，炽磐王后秃发氏与武台谋杀炽磐，事泄被杀。
424	建弘五年	北凉玄始十三年、夏真兴六年、北魏始光元年、宋景平二年	四月，炽磐遣吉毗南击白苟诸羌，降之。七月，又遣军击北凉白草岭、临松郡，徙民二万余口而还。
425	建弘六年	北凉玄始十四年、夏承光元年、北魏始光二年、宋元嘉二年	四月，西秦攻北凉临松，掠民五千余户而还。七月，吉毗击降黑水羌，炽磐以乞伏信帝为平羌校尉以镇之。

西秦大事年表-续表7

年代（公元）	西秦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426	建弘七年	北凉玄始十五年、夏承光二年、北魏始光三年、宋元嘉三年	正月，炽磐遣使北魏，请出兵击夏。八月，炽磐率大军击北凉，分攻西安、番禾两郡。北凉说夏国出兵，赫连昌遣将分两路攻入西秦境内，连下上邽、苑川，围枹罕、西平，后大掠而去。其间原降西秦的吐谷浑掘达率众二万，还吐谷浑。年底，驻南漒的吉毗，为城民所逐。西秦由盛转衰。
427	建弘八年	北凉玄始十六年、夏承光三年、北魏始光四年、宋元嘉四年	正月，武始、洮阳山羌反抗西秦统治，执左丞相昙达送于夏，逐吉毗还枹罕。六月，炽磐迁还枹罕。八月质子及使者至北魏。九月，仇池氐王杨玄遣苻白作攻围西秦赤水，民执守将降。十二月，西秦梁州刺史吴汉为羌逐出南漒。
428	建弘九年、永弘元年	北凉承玄元年、夏胜光元年、魏神䴥元年、宋元嘉五年	正月，西秦商州刺史、领浇河太守姚濬叛走北凉，炽磐以焦嵩代为浇河太守，旋为吐谷浑所执。五月，炽磐卒，子慕末即位，改元永弘。北凉乘机攻西平、乐都，慕末送还沮渠成都，蒙逊退兵。七月，慕末遣使至北凉报聘。十月，西秦凉州牧乞伏千年降北凉。十一月，北凉攻西秦西平。
429	永弘二年	北凉承玄二年、夏胜光二年、北魏神䴥二年、宋元嘉六年	正月，蒙逊攻拔西平。二月，慕末以万载为太子。三月，慕末杀尚书辛进五族二十七人。五月，北凉攻西秦，慕末迁保定连，其下多有叛北凉者。六月，慕末在治城败北凉军，擒世子沮渠兴国。北凉与吐谷浑合军击西秦，为西秦辅国大将军段晖击走。十月，慕末杀其叔什寅。

西秦大事年表-续表8

年代（公元）	西秦年号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430	永弘三年	北凉承玄三年、夏胜光三年、北魏神䴥三年、宋元嘉七年	三月，慕末又杀什寅母弟白养、去列。六月，吐谷浑慕利延击定连，为段晖击走。十月，慕末遣使北魏，请归魏，北魏许以平凉、安定封之。慕末从定连，东入上邽，为夏赫连定拒之，慕末退保南安。时南安羌族发生变乱，慕末求助于氐王杨难当，击溃诸羌。
431	永弘四年	北凉义和元年、夏胜光四年、北魏神䴥四年、宋元嘉八年	正月，赫连定遣军围南安，西秦多有叛夏者，慕末只好出降，不久被杀，西秦亡。

附录五 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

2006年8月至10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及河南新乡县文物局、卫辉市文物局等发掘了位于卫辉市唐庄镇大司马村北的隋代乞伏（也作“乞扶”）令和夫妻墓。2015年由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及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署名的发掘简报《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隋唐乞伏令和夫妇墓》（以下简称《简报》），正式在《考古》杂志2015年第2期上发表。其间，已见有多篇关于乞伏令和墓出土墓志及文物的研究论文发表，如2009年付兵兵撰《唐乞伏令和墓志铭考释》（以下简称《付文》）及党志豪撰《唐乞伏令和夫妇合葬墓出土小五铢考》等。[1]以上《简报》及《付文》对出土的乞伏令和夫妇墓墓志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考释，多有新见，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故撰此文，以期引起学界对墓志的兴趣及研究的深入。

（一）乞伏令和的族属及家世再探

关于乞伏令和夫妇合葬墓发掘情况、墓室结构、出土文物及墓志等，上引《简报》记述甚详。为讨论方便，对《简报》所记两志基本情况，兹引如下：“郁久闾氏墓志出土时盖、石分离，志盖出自墓室中部偏北处，志石出自墓室南部……志石保存较完整。青石质……边长69、厚11厘米。志文阴刻楷书29行，满行28字，共804字。”“乞伏令和墓志出自甬道西北端，已断为两截。青石质，打磨较平整。方形，边缘素面无纹。边长57、厚14厘米。志文阴刻楷书20行，满行25字，共470字。”[2]（见图一）可见，此墓已经盗扰。

如上述诸文所指出，墓主乞伏令和在《隋书》卷五五、《北史》卷七三有专传（《乞伏慧传》），另有《北齐书》卷一九《张保洛传》、同书卷一一《广宁王孝珩传》中也提到乞伏令和。乞伏令和志文中，虽仅提及“其先出自夏后”，但《隋书》《北史》两专传中均云：“乞伏慧，字令和，马邑鲜卑人也”。事实上，关于乞伏令和及鲜卑乞伏氏的族属及迁徙诸问题，前辈学者如姚薇元、马长寿、唐长孺等先生，早有论述。



图一 乞伏令和墓志拓片

（摘自《考古》2015年第2期第68页图七八）

诸前辈学者及《付文》，在探究鲜卑乞伏氏（包括乞伏令和）的来源时，均引证《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开首一段：

> 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在昔有如弗（与）斯（引）、出连、叱卢三（四）部，自漠北南出大阴山，遇一巨虫于路……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儿在焉。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年十岁，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讬铎莫何。讬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

这是乞伏鲜卑来源最详细的记载，虽然带有一些传说的色彩，但从中仍可窥其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括号内的“与”“引”二字，原书

无，此据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晋书》卷一二五校勘记［一］改补。校勘记考述精确，原《晋书》脱二字。据上引文可知，原漠北有四个部落：如弗（乞伏）、斯引、出连、叱卢，从漠北南出大阴山（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乞伏部一老人收留一个小儿，后为乞伏鲜卑部之首领。

马长寿先生引《北史》卷八四《乞伏保传》记“乞伏保，高车部人也”等史籍，以为乞伏部原为高车部，在迁徙过程中，将一鲜卑小儿收养，此子遂以乞伏为氏。“此鲜卑中的乞伏氏，论其原始当是高车和鲜卑二族在养父养子关系中的产物。”[3]《付文》引《晋书》上文后，对马先生的论点提出质疑。他引用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所论，乞伏保，非姓乞伏，而姓乞，为高车乞袁氏[4]，而认为马先生所论难以成立。此说可信。但是，马先生所论后之乞伏部杂有或融入了部分高车部（如迁徙过程中四部中的“叱卢”部即高车部）则应是正确的。[5]

《付文》还引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6]认为，“‘乞扶’之名称则可能是源于河套地区保静县的乞伏山（今甘肃银川一带）”。此说不妥，云乞伏等四部迁徙中，在此山居留过，故名“乞伏山”可，说以乞伏部名源于此山则欠妥，此早为学者所指出。[7]又乞伏山系在今宁夏银川西，而云在“今甘肃银川一带”则有误，可能系笔误也。

唐长孺先生对鲜卑乞伏部的来源，还有一种推测，认为乞伏鲜卑，“这样一个包含高车或丁零及鲜卑、羌族的部落（或部族），我以为可能是赀虏”[8]。此说问题很多：第一，《十六国春秋·西秦录》（《太平御览》卷一二七引）、《晋书》等记乞伏部鲜卑来源，均未有一字提及其源于匈奴的奴婢“赀”。第二，赀虏的组成首先是“大胡”。大胡，有学者认为是指匈奴[9]，有学者认为是“西域胡”（羯胡）。据《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记，曜指石勒为大胡；勒为羯胡，故后一说较确。此外，还有丁零（高车）与羌。而乞伏部鲜卑内主要有鲜卑和高车，无大胡，羌也是乞伏氏迁到陇西之后，统治该地羌族始有。因此，赀虏与乞伏氏内族的构成并不相同。第三，东汉建武时（25～56）匈奴衰弱，漠北一部分匈奴奴婢（赀）逃到今甘肃兰州、武威、酒泉北，河套以西之地，内有大胡、丁零，还杂有羌，当时人称这部分人为“赀虏”。而由漠北南出大阴山的乞伏氏等四部迁徙及活动地域，与赀虏并不完全相同。因为乞伏等四部由阴山南下，一直活动在陇西，并未达凉州、酒泉以北地区。同时，“赀虏”一名，到了西晋十六国时，又变成了对河西地

区杂夷部落的贱称，如吐谷浑，《晋书》等就称之为“阿赀虏”或“赀虏”。[10]第四，不能因《魏略·西戎传》云赀虏“不与东部鲜卑同也”一句，就判定赀虏为鲜卑。赀虏成分里，可能杂有鲜卑，但文中并没有一言提及，何况迁入河陇的鲜卑部落众多，见于记载的不少[11]，但文献均未提及他们原是赀虏，或与赀虏有什么关系。总之，说乞伏氏所建西秦统治下有原来匈奴奴婢赀虏则可，云乞伏氏就是赀虏，是难以成立的。[12]

作为西迁至陇西、十六国时曾建西秦政奴的“陇西鲜卑”乞伏部，又如何到北魏时作官为吏？如乞伏令和祖、父等。《付文》引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关于马邑鲜卑来历的论述：“按《十六国春秋·西秦录》永弘四年（431），夏国赫连定遣将‘攻南安（治今甘肃陇西），城内大饥，人相食。传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逾城奔代（北魏），（暮）末乃衔壁出降’……此为西秦乞伏氏入魏之始。《魏书·高宗纪》并州刺史有乞佛成龙。马邑之乞伏慧当系其后裔。”[13]马先生首先注意到较早投北魏的原西秦乞伏氏，证明他们与马邑鲜卑的乞伏令和的关系。

事实上，西秦永弘四年夏赫连定灭西秦后，乞伏氏流散的情况十分复杂。[14]但过了八年，即北魏太延五年（439），北魏灭河西北凉，统治了陇西、河西之后，又有一批乞伏氏贵族入魏，在北朝做官为吏，文献及墓志记载颇多。[15]其中有魏《乞伏宝墓志》，内云其为“金城郡榆中县（今甘肃兰州榆中，有苑川西秦勇士城遗址）人也”；北齐《乞伏保达墓志》，内云其为“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固）人也”；又云其“祖风，耻居关外，率众来王，魏朝嘉之，授金城伯”。[16]为何同为乞伏氏，入魏后，籍贯有所不同？金城及金城榆中均为西秦都城苑川所在地；而马邑（今山西朔县）鲜卑则是北魏统辖郡县。这种差别只能用作为马邑鲜卑的乞伏令和祖、父系较早投归北魏的陇西鲜卑乞伏氏，是在西秦灭亡时，或在此之前，因居马邑，故名；而乞伏宝、乞伏保达系在西秦亡后投魏，故籍贯作金城。

据乞伏令和传、志记，其祖周、父纂均曾为北魏第一领民酋长[17]，父曾任“魏金紫光禄大夫、瀛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即其祖、父均曾任职于北魏。然而，《简报》却云“其祖父乞伏周在西魏时曾为银青光禄大夫，其父乞伏纂曾任金紫光禄大夫，并为第一领民酋长”。显然“西魏”为“北魏”之笔误。令和卒于隋大业六年（610），年八十七，则其生于北魏正光五年（524），其父必任职于北魏；但过了十年（534），北

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因此，需要补充的是，其父纂后还任职于东魏，后北齐取代东魏，令和才能“世袭衣缨，冠冕蝉联”，“生此高门，长兹庆绪”，任北齐武卫大将军，“别封瀛州永宁县开国公”（志文），此爵名之“瀛州”（治今河北河间），显然与其父曾任瀛州刺史有关。

（二）乞伏令和墓志与传的相互证补

关于乞伏令和志、传的相互证补及令和生平、任职官名的考释等，《简报》及《付文》均有精到之论述。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简报》引乞伏令和传与志相比较，发现志漏记或错记之处甚多，如乞伏令和在隋初的任职漏记“齐州刺史”等四个官名及一些具体的事绩，且志记其任寿州总管年代有误等。这说明传所记大致可信，而志所记则多有阙误。此中原因，除《付文》所论志与传“行文特色”及体例不同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乞伏令和墓志系其卒后十三年，于唐贞观元年祔葬时所镌刻，且令和在隋大业五年征吐谷浑，因过“除名为民”，于次年“卒于家”（传文）。因此，志文之规格及志文之疏漏、错讹则在所难免；甚至按一般墓志的程式，漏记其籍贯“马邑鲜卑人”。

其次，除《简报》《付文》所论传文记令和籍贯、官职的补证，对志文云其“受三洞法，持菩萨戒；常饵玄霜，恒餐绛雪”的考释之外，志、传相互证补之处尚多。如传文记令和有兄贵和，且云北齐时，“其兄贵和，又以军功为王，一门二王，称为贵显”。《北齐书》卷一九《张保洛传》记有：“贵和及令和兄弟，武平末，并开府仪同三司”；又《北史》卷五三《綦连猛传》《独孤永业传》均提到乞伏贵和。传文较为具体地记载了令和在北周杨坚为丞相时，先后征尉迟惇、尉迟迥的事绩，遂进爵西河公。传文还记述了令和任荆州刺史，又领潭、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时，“其俗轻剽，慧躬特朴素以矫之，风化大洽。曾见人以簺捕鱼者，出绢买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号其处曰西河公簺”。而志文仅用“德闰（润）生民，道迈伦伍”而概括之。此外，传文记述了大业五年令和随隋炀帝西巡，征吐谷浑，“坐为道不整，献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斩之。见其无发，乃释，除名为民。卒于家”。这在志中，是为死者讳的内容，故不记。

志文则补述了令和卒于隋大业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在雍州大兴县宣

阳坊薨于露寝（寝室之外），春秋八十有七”，以及在唐贞观元年八月五日祔葬夫人墓的史实。关于令和卒地“雍州大兴县宣阳坊”，据《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记，隋开皇三年（583）置雍州，始置大兴等二十二县，大业三年（607）改雍州为京兆郡，令和卒于大业六年，不应出现雍州之名，考虑到此志撰于唐贞观元年，时又改隋京兆郡为雍州，大兴县改万年县，故志仍用雍州。隋大兴县（即今西安市区东）理所即宣阳坊，在隋唐长安城东市之西南，今西安市兴庆公园西南。已除名为民的令和即卒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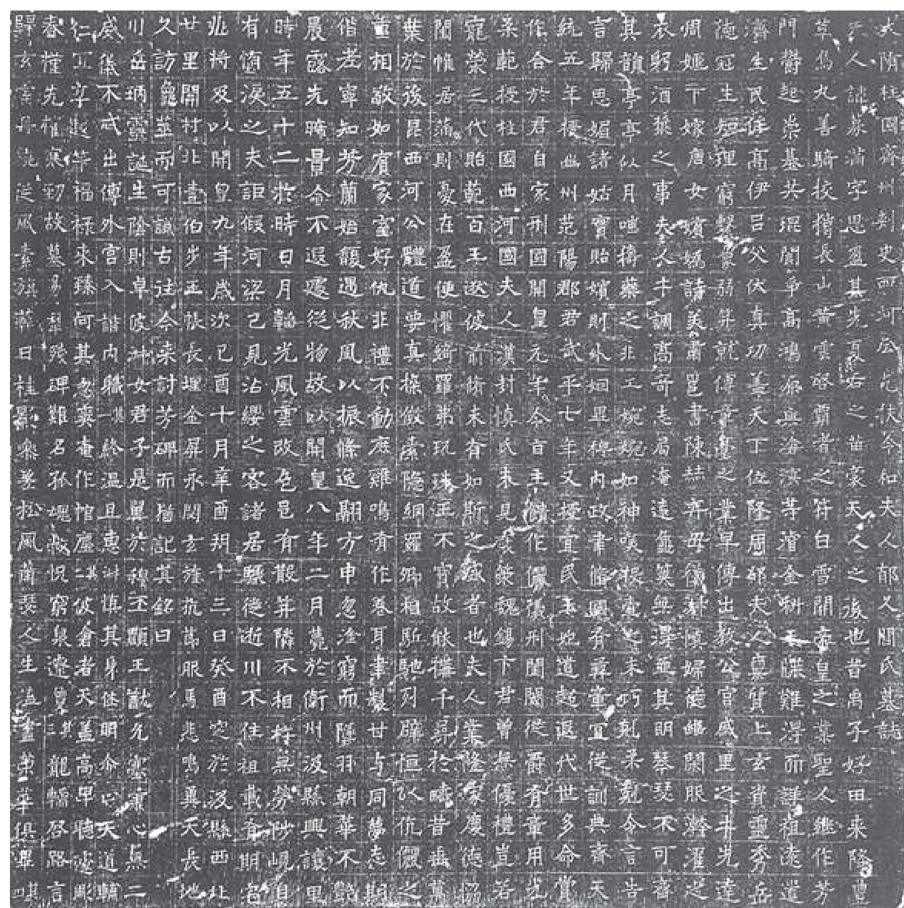
至于令和为何卒后十三年才远祔葬于夫人墓地的问题，笔者认为，并非与其夫人原为鲜卑、柔然的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习俗有关，而是属于个别的特殊情况所致。笔者发现，令和及夫人墓志及传文，均未记其有子嗣，且令和卒时，已获罪为民；其卒时已八十七岁，其兄贵和想已早卒。在这种情况下，其卒后十三年，才为人（不是朝廷官方，可能是不愿透露姓名之亲朋好友）祔葬于唯一亲人，即早逝的夫人墓地。当然，这也是一种推测。

（三）乞伏令和夫人郁久闾氏墓志释证

《简报》及《付文》涉及令和夫人郁久闾氏墓志不多，据《魏书》卷一○三《蠕蠕传》记：“蠕蠕（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可知令和夫人郁久闾氏族属是漠北游牧民族柔然。柔然自北魏天兴五年（402）正式建国，至西魏恭帝二年（555）为突厥所灭，一百多年间与北魏及东魏、西魏、北齐诸政权关系密切，有战争，也有和平交往及和亲。其间，柔然王族郁久闾氏投归北朝的人也甚多，见于史传及出土墓志。[18]正如北魏时崔浩所说：“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19]总之，柔然郁久闾氏在北朝可算是名门著姓，乞伏令和能娶郁久闾氏，有高攀之意味。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太和改姓中无“郁久闾氏”，但确已有改为“闾氏”者，如《魏书》卷八三《闾毗传》所记；但也有未改单姓或东、西魏时复旧姓的情况，令和夫人志即一例。郁久闾夫人墓志（见图二）的规格，显然比其夫令和祔葬墓志要高，且整个墓葬及出土文物也皆为郁久闾氏葬时所设置，故志撰写时间大致在其卒后安葬的隋开皇九年（589），时乞伏令和任隋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刺史。志文多为对墓主人高贵品格、严守妇德、相助夫君之溢美、华丽词藻。但也有一

些具体的内容，如记墓主郁久闾氏“讳募满，字思盈，其先夏后之苗裔”；记其祖远、父伏真之名（无考），而未记他们具体任职官名，也未记其何时下嫁于乞伏令和。



图二 郁久闾氏墓志拓片

（摘自《考古》2015年第2期第67页图七七）

志文还记，北齐后主高纬“天统五年（569），授幽州范阳郡君。武平七年（576），又授宜民王妃”。郡君、王妃，均为命妇封号，一般随夫或子封爵而定。天统五年乞伏令和时封“瀛州永宁县开国公”，正二品[20]，按魏晋时惯例（时未有定制），其夫人封“郡君”；武平七年，令和已封“宜民王”，正一品，按例封“王妃”。由此也可补传、志记令和封上述两职官的时间。志文后又记，隋“开皇元年……授柱国、西河国夫人”，时其夫令和爵为柱国、西河郡开国公。隋柱国，正二品；西河国

公，从一品，依相近之唐制，“武官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之例[21]，封郁久闾氏为“西河国夫人”。此为夫人最后之名号，故其墓志盖上阳刻篆书“大隋西河国夫人墓铭”九字。

志文后还记其卒葬时间及地点：“以开皇八年（588）二月薨于卫州汲县兴让里，时年五十二……以开皇九年岁次己酉十月辛酉朔十三日癸酉窆于汲县西北廿里鬧村北壹伯（百）步。”据此，知夫人生于东魏天平四年（537），而其夫生于北魏正光五年（524），年龄相差十三岁。夫人卒于“卫州汲县兴让里”，据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卫州》条记，“周武帝改义州为卫州，隋大业三年改为汲郡”，“隋开皇六年改伍城县为汲县，大业三年改属汲郡”。[22]志云夫人卒于开皇八年，此时伍城县已改汲县，故志记正确。此地应即在今河南卫辉市。夫人葬地“汲县西北廿里鬧村北”，当即发掘墓地之处，也即令和祔葬之处，此地在太行山余脉谷驼岭南麓，故令和志云“厝于山之伤（阴）”也。

最后，正如《简报》及《付文》所提及：从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特别是出土的两方墓志看，原为乞伏鲜卑、柔然的乞伏令和夫妇，其原民族的属性，经过北朝数百年与内地汉族的杂居、交往已逐渐汉化。两志开始记其先世出自“夏后”，即华夏族祖黄帝之苗裔；说明到北朝、隋初入居内地的鲜卑、柔然等族已基本完成了汉化的过程，认同于汉族了。

（原载于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 两文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

[2]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隋唐乞伏令和夫妇墓》，《考古》2015年第2期。

[3]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本，2006，第29页（原书系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4]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第327~328页。

[5] 详细考证见拙著《南凉与西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本，2006，第95页（原书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6] 上引《北朝胡姓考》（修订本），第116页。

[7] 见王俊杰《西秦史钩沉》，《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上引拙著《南凉与西秦》，第97～98页。

[8] 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第438～439页。

[9] 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史学杂志》第48编11号。

[10] 见拙作《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11] 见拙作《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12] 见拙著《南凉与西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本，2006，第95页（原书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3] 上引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30页。

[14] 见上引拙著《南凉与西秦》，第154～155页。

[15] 上引《北朝胡姓考》（修订本），第117页；上引拙著《南凉与西秦》，第115～116页。

[16] 此两志过去著录甚多，此据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304～305、450页。

[17] 传、志记载稍异。关于北魏领民酋长，《付文》有考释，不赘述。

[18] 参见上引拙著《敕勒与柔然》，第148～155页。

[19]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20] 见《通典》卷三八《职官二十》。

[21] 见《通典》卷三八《职官二十》，卷三四《职官十六》。

[22] 参见《隋书》卷三○《地理志中》汲县条。

附录六 周伟洲著《南凉与西秦》评介[1]

[日] 关尾史郎撰，王含章译[2]

一

该书如其书名所示，是以“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及其建立者鲜卑族的发展动向为中心，对两政权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地位等方面展开概述的一部学术研究著作。[3]南凉与西秦主要统治着当时西北边境地区（即今甘肃、青海一带），基本的史料对其记载并不丰富，因为诸如此类的理由，直至今日，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有关南凉与西秦的专门性研究都是屈指可数的。由此可见，像该书这样的学术专著能够作为“西北历史丛书”的其中一册正式出版，其意义可以说极其重大。

该书的作者周伟洲先生，隶属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北历史研究室。[4]此前他已出版《敕勒与柔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吐谷浑史》（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及《吐谷浑史入门》（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民族史入门丛书，1988年。关于本书，可参考荒川正晴氏发表在《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13号上的书评文章）等著作。此外，他还在其所属单位编辑发行的《西北历史资料》《西北历史研究》等各类期刊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周伟洲先生在古代西北地区，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方面，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人。因此，毫不为过地说，除了南凉、西秦及其建立者鲜卑族的动向之外，本书关于两政权对整个西北地区发展所起作用的论述也极其深刻。

该书虽然并非所谓的内部发行，但公开发行的数量确实不能算多，因此据说日本国内很难获得此书。有鉴于此，作为“五胡十六国”研究的兴趣者之一，我将在此介绍该书的内容，并陈述一些个人的看法。

二

该书在开篇《序言》中指出了以南凉、西秦为代表的“五胡十六国”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交代了史料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和该书的论述范围。之后的正文中，第一编（全五章）为南凉、第二编（全六章）为西秦，卷末以两政权的王室系谱和年表作为附录。以下简要概括该书的大致内容。

南凉政权从公元397年河西鲜卑秃发乌孤于廉川堡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开始，到公元414年乌孤之弟、三代首领秃发傉檀被西秦所俘为止，共历18年，主要势力范围集中在青海省湟水流域。

著者认为，南凉政权的创建者鲜卑族秃发部（秃发氏）与北魏拓跋部乃是同族。秃发乌孤的八世祖匹孤是鲜卑首领拓跋诘汾的长子，也是后继首领拓跋力微的兄长。与鲜卑慕容部慕容廆和吐谷浑的旧例一样，乌孤与其弟（拓跋力微）因牧场纠纷日渐对立，遂放弃故地率部西迁，约于3世纪中期的魏末将河西作为其据点。因此，有关南凉的“霸史”，记录为《托跋凉录》便是当然之事，而魏收的《魏书》编纂之时，为了将南凉与北魏这两个政权进行明确区分而有意识地采用了“秃发”这一名称。另外，“秃发”（拓跋）的原意是指鲜卑族父亲与胡族（匈奴系）母亲所生之子（顺带一提，胡父与鲜卑母所生之子则称之为“铁弗”）。

公元270年，在秃发树机能[5]与西晋的对立斗争中，秃发部之外的鲜卑族自不必说，西北边境的诸少数民族也都被集结起来共同反晋，严重打击了西晋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后因树机能的败北，鲜卑各部开始分散于河西各地。这一集结与分散的过程，对于促进鲜卑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具有重大意义。公元4世纪，秃发部等分布于河西各地的鲜卑族开始被统称为“河西鲜卑”。

此后，秃发部联合前凉的残余势力抵抗前秦，乌孤成为部落首领后又从后凉处授封官爵，同时有意识地推动秃发部内的农业生产并逐渐固定化。公元397年南凉自立后，虽然在后秦势力之下迅速实现了对凉州中心姑臧的占领，但终究也仅作为青海一带的局部地方政权而终结。

有关南凉的权力结构，从官制方面看是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形式，自立当初自称的大单于名号在政权后期也不再见到。不过，考察其就职官员后发现，南凉政权虽然也采用了不少汉族人士，但将军的名号却只授予以秃发氏为首的少数民族，军事权仅仅掌握在秃发氏一族手中。此外，出身汉族或已汉化的氐羌族的就职官员皆是河西、陇西两地区的那

些被称为豪族或名流的人士，其中大部分都曾归属于后凉政权。这些人在地方社会拥有很大的势力，不过南凉第三代首领秃发傉檀并不信任他们，这导致南凉政权失去了汉族的支持，也成为南凉在仅仅18年后便致灭亡的间接原因。

从社会构造方面看，南凉政权对“国人”（以秃发部为中心的河西鲜卑，主要担任军事要员）和“晋人”（汉族、氐羌族、匈奴族及其他鲜卑族，主要负责农业生产）进行了严格区分，后者等同于农奴一般的存在。而与北凉、西秦及后秦等诸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造成了长期的战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对应的军需生产无法实现平衡，社会体制的矛盾便一涌而出，这一点作为南凉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也值得注意。

此外，著者认为，南凉政权灭亡后，傉檀的后代投于北魏，在此后历代王朝的统治之下日趋走向汉化（这是符合史实的）。但“秃发部对吐蕃和党项的形成亦有贡献”这种说法则难以成立。

另一方面，西秦政权从公元385年陇西鲜卑乞伏国仁在勇士城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等名号开始，经历400年到409年二代首领乞伏乾归一度舍弃名号臣服后秦，终至公元431年四代首领乞伏暮末为大夏所捕而灭国，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甘肃省黄河的河湾地带。

著者认为，乞伏部（乞伏氏）迁入陇西的时间比秃发部以河西为据点的时间稍迟，约在西晋初期。不过，在此之前，乞伏鲜卑业已与高车族的叱卢部等鲜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结成了联盟关系。公元4世纪以来，以鲜卑族为首的这一部落联盟开始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征服。陇西鲜卑虽然是对这个部落联盟的统称，其中必然包含了鲜卑族之外的族群，但应当不包含胡族或羌族，因此将之与所谓“赀虏”同等视之是不可取的。

陇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关中与河西的战略要地，长期的战乱造成汉族人口日趋减少，这对乞伏部的强大起到了促进作用。前秦政权在关中建立之后，授予与之毗连的陇西地区的乞伏司繁（国仁之父）以官爵。不过这种关系仅仅持续到前秦大败于淝水之战后、乞伏国仁自立为止。这主要是由于西秦政权位于关中政权与河西走廊的政权两相胁迫的狭窄空间中。也正因为这样，西秦在击败前秦残党自称秦王之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不得不降于后秦；而在迫使南凉灭亡之后不久的公元

420年，便面临被直接对峙的北凉和进出关中的夏国所夹击的局面。为了摆脱这种局面，西秦尝试与夏背后的北魏结盟，但这一战略并未奏效，更为讽刺的是，被北魏从故地驱逐出去的夏反过来进攻了西秦，导致其政权命脉的断绝。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官制方面能够确认的如中央官制在三省六卿中有太子府，军事官职中有四征将军等。这表明，即使未能达到前秦、后秦、后凉等氐羌系政权的程度，但比起南凉来，西秦政权确实更具体系地承袭了汉魏以来的形式。从就职官员的身份来看也是如此。获封将军号的官员以乞伏氏一族为首的少数民族出身者居多，军事权无疑也是被乞伏氏一族所掌控，除此之外的官职则有许多以豪族和名士阶层为主的汉族人担任，这一点比起南凉更为突出，三省长官和各州刺史中也不乏汉人官员。也就是说，西秦并不是仅仅像南凉那样网罗汉族的豪族或名士，而且能够适当地重用他们。特别是乞伏乾归复兴西秦之后，这种倾向又一度得到强化。此外，侨置州郡县[6]用以安置多数被征服的民众也是西秦政权的特征之一。中原地区的五胡十六国诸政权[7]设置单于台用以统治境内的少数民族，但西秦政权却没有这样的迹象。著者指出，西秦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上述特征的背景在于：乞伏鲜卑所处的陇西地区比之秃发鲜卑占据的湟水流域，自古以来便是汉族人口居多的地区。因此，乞伏鲜卑有更多机会与此发达文化接触而受其影响。

有关西秦统治下的社会构造，引人注目的是，后汉末期以来，地主阶级的坞堡经济开始在陇西地区盛行。这些豪强地主包括汉族和一些早已汉化的匈奴族，他们在经营大片庄园的同时还领有名为部曲的私兵。西秦政权的地方官员主要就是由上述这样的人士所占据，乞伏鲜卑自身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其生计模式由游牧逐步向农耕转变。此外，西秦以周边的诸势力为对象，断然施行了20次以上的徙民措施，其目的也是为了扩充开发所需的劳动力和兵力。

关于西秦的文化状况，可以说它受到汉族很大的影响。例如，炳灵寺石窟及其壁画中所描绘的乞伏氏王族身着的服装已经完全是汉族式的。这表明，在汉族和匈奴族等已汉化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之下，乞伏氏一族的汉化也得到了彻底实行。

综合考虑以上诸方面，西秦政权借助在陇西地区的政治统一，不仅恢复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且建设了以勇士城、苑川城为首的新城镇，对陇西地区的开发做出了贡献；更促进了多民族之间的交流，普及

了佛教，保护了交通要道。

以上便是这本书的内容梗概。

三

该书的最大贡献，可以说是对以往关注较少的南凉、西秦两政权及其建立者鲜卑族的相关史实进行了阐明，并加以证实。因此，此处想对该书所采用的基于史料的实证方法以及从所介绍的史实中归纳出上述两政权的特性两方面进行审视。

与五胡十六国研究相关的基本史料是《晋书·载记》、《魏书》和《资治通鉴》等，这已无须再进行说明。但要指出的是，该书并非是对上述史料中相关记述的简单照搬，而是对诸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等史料进行逐次批判，并指出其中的错误（如140页、146页等处）[8]，这一点值得特别提出。不过，最应当得到高度评价的是，该书著者对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的佚文也加以重视。有关这一点，正如《序言》中所述的那样，考虑到现行本《十六国春秋》均为明代编纂，史料价值较低，著者的方法是从以《太平御览》为首的类书中引用原本《十六国春秋》的佚文。与这种方法正好形成对照的是，同为《西北历史丛书》所收录的齐陈骏、陆庆夫、郭锋的《五凉史略》（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关于本书，可参考《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36号上的书评文章），所依据的主要是清代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具体来说，著者逐次标注了《晋书》以下的记述与《十六国春秋》的佚文之间的异同。此外，还对诸如秃发利鹿孤的老人政策[9]、乞伏炽磐对北凉的袭击[10]等仅见于《十六国春秋》佚文的记载进行了介绍。除此之外，虽然数量不算多，但著者还积极援引了包括炳灵寺石窟在内的许多考古学的挖掘和调查成果，这一点更加提高了该书的价值。

著者之所以将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的历史合起来撰写，据《序言》所说，首要的理由是二者之间有许多类似之处。这种类似性不仅表现在二者存在的历史时段和地理位置相近；而且两者都是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且都是在魏晋交替期前后迁入此地的鲜卑部族（在此过程中也与鲜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交往和融合）；因此，二者更是在权力结构、社会构造乃至意识形态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以上诸点无一例外都深化了著述中的论点，下面再加以详细说明。

秃发部、乞伏部都是在不断迁移之后陆续定居河西地区和陇西地区的鲜卑族，不过从那时开始到其政权成立，之间仅仅经过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一史实表明，他们虽然同属鲜卑族，但与慕容部、拓跋部等各部还是存在差异；与中原王朝在政治上的交涉又尚乏经验；而且未能完全克服此前的游牧生计模式。另外，如果着眼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则可以看到，此处位于关中地区与河西走廊之间，很难说汉族已经对这里进行了充分的开发；而且，五胡十六国时期，处在这个位置又特别容易被关中地区的政权与河西走廊的政权夹击。关于这一点，正如著者所述，南凉的灭亡正是受到西秦和北凉这两个邻近政权的压迫所致，而西秦的灭亡则无疑是卷入了北凉、夏乃至北魏之间的复杂纷争的结果。一般来说，对于极其局部的政权，对外政策或军事行动的微小过失也有可能左右其存亡，南凉和西秦两政权的情况正是这样的例子。

另外，有关地区开发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郡县设置状况的问题。当然，在这两个地区设置郡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但在作为南凉政权据点的河西地区的湟水流域，大量郡县得以设置则是公元4世纪以后，也就是南凉政权即将建立之前的事；而西秦据有的陇西地区所建立的武都、陇西及天水等郡，其人口数据著者所说是一直在不断减少的。除此之外，秃发、乞伏两个部族都没有能够完全脱离原有的游牧生产方式（也未必完全熟习了农业的生产方式），这成为他们不得不采取频繁的徙民措施的最主要原因。正如著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五胡十六国的所有政权当中，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徙民措施的频繁程度都是同等突出的，不仅如此，南凉政权还有意识地将“徙户”作为其军事行动的目的。这些徙民措施原则上讲无疑是为了获得和补充城镇开发及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

如此，南凉和西秦所处的历史时段和地理位置限定了这两个政权的政策、发展轨迹，乃至其特性。著者在《序言》中所述的意图可以说在正文中完成得非常精彩。

四

对著者来说，主张南凉、西秦两个政权具有类似性本非其论述的目的，而是立足于此，对其相异之处加以充分考虑。不过，有关作者对官制及其任职官员等相关问题的理解，我有如下疑问。确实诚如著者所论证的那样，南凉的官制缺乏体系性，对汉族的录用在民族比例上要低于

西秦。但或许应该考虑，这到底是政权自身的意图还是河西地区本土社会现实的局限所造成的？或许有必要注意到，从后凉时代开始就位于湟水流域的侨置郡县大多数都得到了南凉的继承，而从政权成立初期开始，南凉就积极录用汉族，特别是被称作“中州之才令”“中州之令族”的人才。不难想象，这些人士必定是从中原迁入的流民集团中选拔出来的。如作者已经阐明的那样，秃发氏部族长的权力并未大大超出其出身部族的范围，考虑到这一事实，对这些汉族的流民集团或其统帅者的依赖程度就不得不高于西秦，不如说，他们在南凉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有可能超过了西秦，这样的考虑也未必就是不合理的。

著者在该书中呈现了丰富的史料，评论者本人并没有比此更多的史料依据，只是对于如何将编纂史料的片段性记述进行整合且体系化地解释这一问题，我认为在著者所提出的方法之外，或许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立足于该书所取得的成果，期待今后会有更多的研究进一步去讨论南凉与西秦两政权在古代西北地区、鲜卑族在其少数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兴亡于中原的诸政权存在明显差异的这两个政权，在五胡十六国史上所占据的地位。

[1] 此文原载于日本《东洋学报》，第72卷3·4号，1991年3月。

[2] 作者关尾史郎，现为新潟大学教授；译者王含章，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讲师，博士。

[3] 译者注：周伟洲著《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263页。以下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不再说明。

[4] 现所属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5] 秃发乌孤为秃发树机能的玄孙。

[6] 关尾史郎在文中作“州郡县”，而周伟洲原书仅说“西秦设置的地方一级州、郡较多，且有侨置的情况”，至于是否设置有县一级行政机构目前还难于判断。

[7] 这里主要是指前赵、后赵等五胡十六国早期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

[8] 原书140页，著者指出，《资治通鉴》卷一〇七胡注云：“乞伏鲜卑置东秦州于南安”，但按当时南安在苻登控制之下，西秦所设东秦州不过是名义上的侨治州而已。原书146页，著者指出，《晋书·乞伏乾归载记》所载乞伏乾归复国后大赦境内、授封百官之事系“太元十七年”有误，考《资治通鉴》卷一〇八《西秦录》此事应在太元十九年底至二十年初。同146页载，公元395年，乞伏乾归封务和为司马，辅助乞伏益州出征上邽，《资治通鉴》卷一〇八胡注认为此“务和”之“务”为“姓也，古有务光”，

但著者指出，“务和”应为《晋书·乞伏乾归载记》后记之“乞伏务和”，非务氏，胡误。

[9] 原书41页，据《太平御览》卷一二六引《十六国春秋·南凉录》作“公元400年正月，秃发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延耆老，访政治’”。

[10] 原书173页，据《太平御览》卷八七七引《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作“公元422年乞伏炽磐遣骑七千袭北凉姑臧，因沮渠蒙逊屯兵东苑，炽磐见有备，引还。”

索引

A

阿柴 188，189，192，198，200，203，208，237，242，243，249，264，285，303

阿敦 166，298

阿里河 004

阿罗多 021

阿若干 191，240，260，301

安国将军 053，099，115

安阳城 146，147，168

安周 074，296

昂川 210

B

白草 139，206，264，303

白苟 205，303

白狗羌 205

白虎文 018

白兰 167，176，198，199，203，243，298，302，303

白石城 193

白土津 169

白养 217，223，237，305

柏阳 179，190，263，301

柏阳堡 190，263，301

博士 054，093，110，120，123，235，267，281，294，321

步颓 158，297

薄地延 187，230，263，301

卑和虏 026，027

卑和羌海 027

北地胡 018，292

北山鲜卑 029，030

边、梁之乱 067，069，295

边芮 165，166，171，172，181，230，234，246，255

边宪 065，069，094，096，106，109

扁都口 128，129

炳灵寺 125，235，267，268，269，270，271，273，274，275，276，281，328，330

勃寒 144，151，297

勃寒部 144

发羌 085，086

C

材官将军 071，099，110

蔡园川 142，143

曹操 012，014，095

曹袪 113

层城都尉 191，240，249

昌何 187，260，301

昌意 004

车孚 205，206

车盖鲜卑 029，295

车普 064

成公绪 073，092，096，110

成七儿 068，069，083，100

成宜侯 076，099，101

叱豆浑 146，166

叱卢 132，133，135，142，143，160，165，206，225，239，241，298，308，309，310，325

叱卢犍 206，239

叱卢那胡 133，142

叱卢乌孤跋 165，239，298

叱罗侯 165

赤水 191，197，211，212，222，240，249，250，301，302，304

赤水城 191，222

赤水都护 191，240，249，301

敕勃 173，188，242，285

出连 132，133，142，143，160，165，177，196，200，204，210，211，212，215，219，225，229，230，231，235，237，238，239，241，242，243，249，250，300，308，309

出连辅政 211，212，215，219，231，238，239，242，250

出连高胡 133，142

出连乞都 165，177，229，243，300

出连虔 196，200，204，210，230，237，242，249，250

猝跋韩 023

崔鸿 002，068，329

崔提 205，206

D

大兜国 146，168，262，298

大非川 138，140，141

大古城 129

大寒岭 173

大胡 135，136，311

大鲜卑山 004

大阴山 132，133，136，137，138，297，308，309，311

代题 027

丹岭 021，029

党龙头 182，300

宕岂 176

道融 270

邓艾 007，008，011，021，027，028，029，037，148，292

邓若 147，188，263

貂渠谷 206

叠掘都统 147，177，241，300

叠兰城 188，189，192，263，285，301

叠掘河内 028，177，241，300

翟斌 159

翟承伯 216，242，258

翟勍 165，166，171，193，199，229，230，235，255，258

翟绍 194，199，230，231，238，258

翟氏 135

翟爽 209，241，258

翟瑥 170，171，176，230，235，238，242，258

丁零 036，135，136，152，153，159，166，221，258，260，261，310，311

定连 210，216，217，286，304，305

东部鲜卑 006，137，311

东胡 009，127，134，145，317

东平长公主 170

东羌校尉 017

豆留䩭 146，166

窦冲 161

窦苟 041，175，293

独孤匹蹄 159，238

杜进 034，040

杜宣 171，255

杜预 017

度坚城 147，188，189，263，285，301

度周川 176

段苟 073，078，098，099，101，110

段国 162，199

段晖 193，196，211，213，214，216，217，219，222，229，231，234，237，238，242，243，246，256，304，305

段景 196

段业 041，042，046，047，049，055，107，175

段懿 064，106，109

D

单于台 247，248，249，327

F

法显 127，128，129，130，282

烦于 187，301

樊尼 078，084，085，086，087，099，101

樊谦 171，193，230，234，256

方弘 171，231，255

枋头 153

飞桥 287

纷陁 037，038，101

苻白作 212，249，250，304

苻帛 182，300

苻崇 170，171，172，299

苻登 051，143，146，161，162，163，164，165，166，168，169，170，228，279，297，298，299，329

苻浑 039，101，110

苻坚 032，033，034，051，144，150，151，152，153，154，158，159，160，162，163，164，293，297

苻健 150

苻丕 035，143，144，161，162

苻献 218

苻雅 151

苻宗为 170

枹罕 036，053，072，075，078，147，152，155，156，161，163，166，167，169，174，175，176，179，180，182，184，185，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7，198，

200，201，209，210，211，212，213，214，216，242，247，263，264，266，273，274，281，287，296，298，300，301，302，303，304

复半 145，165

傅玄 007，008，014，015，016

富占 055，101

G

嘎仙洞 004，005

甘松 103，159，160，169，250，252，253

高平 011，047，067，071，137，138，139，142，144，145，146，164，168，170，209，253，297，298

高平川 011，047，137，138，139，142，144，146，297

高田谷 218

纥勃 075，078，098，099，101

纥干 132，133，134

耿稚 175

更始 072，185，186，187，188，190，191，192，243，251，273，285，295，296，301

关尚 062，063，095，096，110

郭播 188

郭奋 046，106，107

郭恒 218，231，257

郭黄 046，106，107

郭将 061

郭黁 028，042，043，045，176，231，240，256，293，299

郭韶 041，046，093，095，096，106，108

郭倖 043，045，071，090，096，106，107

郭祖 057，099，101，110

国人 042，048，077，097，116，117，119，124，126，324

国师 235，272，273

H

海西郡 282

邯川 074，075，076，077，103，110，112

韩疋 046，106，108

罕幵谷 216

罕开原 163

浩亹 045，047，050，079，103，113，128，195，196，202，206，302

河南国 282

河西鲜卑 002，003，008，025，026，030，031，038，072，073，116，117，124，126，143，144，148，293，323，324，325

曷呼奴 146，166

贺连 068，101

赫连勃勃 067，068，070，071，138，184，192，198，199，201，208，295

赫连昌 208，209，212，218，3048

赫连定 084，217，218，219，224，305，312

弘昌 060，061，062，065，066，067，073，100，104，294，295，300

洪池岭 044，045，073，075，190，196，204，293

侯辰 027，179

侯弹勃 020

侯金多 020

侯年 166，298

呼卢古 209，210

呼伦池 004，005

呼那乌提 193，263

胡康 072，100，101，121

胡烈 016，017，018，019，292

胡威 063，064

胡园戍 203，264，303

护军 013，016，020，022，024，074，075，076，077，099，103，104，110，112，142，150，201，218，243，249，252，253，257，297，303，337

护羌校尉 013，030，033

慧皎 126，269

慧景 127

浑屯 043，099，101

J

吉轲罗 020

吉毗 205，206，211，213，214，218，222，230，237，238，256，303，304

集木且羌 149

嘉平 071，072，073，075，076，090，093，095，100，104，117，124，129，295，296，301，302

贾充 019

犍虔 077，195

建和 050，051，053，054，057，060，090，093，104，112，115，126，127，129，294，300，330

建义 145，159，164，200，240，243，249，250，293，297，298，338

姜纪 050，055，057，059，070，080，081

姜乳 172，173，174，235，299

彊台山 162，163

浇河 011，012，044，045，074，075，103，110，112，114，115，190，193，199，209，213，220，243，247，252，253，258，263，296，302，304

焦袓 196

焦谌 073

焦华 231，256，267

焦楷 219，234，257

焦朗 055，057，058，068，073，101，110，111，121

焦亮 218，219，243，257

焦松 034

焦嵩 057，213，230，242，257，304

焦遗 185，186，218，219，233，238，243，246，252，256，267，338

街亭 041，175

诘汾 003，004，005，006，010，292，323

结权 138，139，140

羯胡 018，136，311

金石生 045，106，107，174

金树 046，049，101，106，108

金熙 145

晋人 053，054，077，082，111，115，116，117，118，119，122，123，325，339

景保 072，093，096，110，111

敬爱 029，030

鸠摩罗什 283

沮渠白蹄 206

沮渠成都 204，214，216，304

沮渠苟生 203

沮渠汉平 196

沮渠罗仇 041

沮渠蒙逊 027，029，041，055，056，058，060，063，067，068，070，072，073，085，107，109，196，197，202，203，

204，205，209，216，260，272，330

沮渠挐 056，073

沮渠男成 041，047，055，101

沮渠奇珍 214

沮渠鄯善 203

沮渠兴国 216，218，219，231，304，

句旁 194

句岂 147，188，263，285，301

俱城 034

俱傫 055，101

俱延 047，052，056，057，070，071，072，076，084，090，096，098，101

掘逵 194，210，222

K

康宁 035

嵻崀城 184，189，286，301

嵻崀山 184，210，286

轲弹 165，171，173，174，224，235，242，299

轲兰 200，261

轲没虏 031

轲埿 142

轲殊罗 216，217，223

渴浑川 145，164，194，263

孔恂 022

孔遮 056

孔子 012，201，203，204，237

枯木 072，097，101，121

库结 218

库洛干 210，238

L

勒姐岭 196

李暠 052，060，065，070

李亮 209，242，257

李润镇 197

李憙 021，022

李隰 034

李歆 202

李恂 202，203

利那 138，140，141

廉川堡 028，038，039，045，115，128，293，323

敛成 070，071

练恕 228

梁昶 046，106，108

梁斐 060

梁戈 052

梁恭 174

梁贵 068

梁饥 043，044，293

梁裒 069，094，096，109，110

梁崧 065，106，109

梁熙 032，033，158，162

列浑城 012，204，240，286，303

林宝 003

临松 041，056，072，085，121，154，206，264，294，295，303

凌江将军 057，099，110

岭北 004，068，071，188，196

刘旗 017

刘显 027

刘曜 136，149，311

刘义真 199，201

刘裕 198，199，202，302

刘元海 022

六泉 145，164，165，243，260，298

龙马山 147

龙马苑 147，184，301

娄机 192，239，256

卢陵 027，039

卢水胡 013，018，036，041，146，152，154，221

鹿结 137，139，144，146，166，297

鹿结部 139，144，297

鹿嵩 046，106，108

罗川 012，028，203，204，286，303

罗敦 179，238，256

洛肱 078，098，101

吕宝 036，168

吕超 029，054，057，061

吕方 050，052

吕覆 040

吕光 025，028，032，033，034，035，036，038，039，040，041，042，047，048，049，050，051，058，062，089，107，153，158，162，164，168，169，173，174，175，293，294，298，299

吕弘 040，049

吕隆 055，056，057，058，060，061，081，120，122，182，294，300

吕奴迦 193

吕婆楼 153

吕破胡 193

吕绍 040，047，049

吕纬 051

吕延 174

吕纂 029，036，040，041，042，043，047，049，050，051，054，107，169，174，175，176，293，294

M

马艾 215，234，257

马辅 065，106，109

马隆 022，023，024，030，114，292

马循 021

麦积山石窟 268，269

麦田 011，012，029，073，114，117，149，150，253，260，286，297

毛兴 161

冒顿单于 006

没骨能 023

没奕于 067，145，146，164，168，170，174，189，192，198，199，203，206，230，236，237，238，242，247，286，291，298，302

扪天岭 052，214

孟恺 074，075，076，077，103，104，110，111

孟祎 057，058，064，080，095，096，106，109，294

弥姐康薄 197，302

觅地 201，243，303

秘宜 161，162，165，166，171，230，234，238，241，246，247，250，255，297

密贵 145，164，240，243，298

密贵周 173，238，299

缪荃孙 089，092

莫侯 138，141，142，144

莫侯悌眷 161，250，297

莫者阿胡 204，231，257

莫者羖羝 173，238，258，299

慕璝 208，210，213，216，217，218，223，224

慕利延 187，216，305

慕容部 006，163，323，331

慕容冲 159，161

慕容垂 159

慕容廆 006，163，323

慕容鲜卑 032

慕兀 176，179，239

N

南溟 211，212，286，304

讷阗 212

耨檀国 127，282

傉大寒 149，150，291，297

P

番禾 029，042，049，054，061，063，066，073，074，075，112，114，118，121，205，209，304

旁为 205，206

裴敏 064，106，109

彭晃 034，035

彭利发 190，197，263，301

彭敏 064，106，109

彭奚念 036，067，167，169，175，183，184，190，238，242，247，295，298，301

皮氏堡 182，300

匹达 196，201，238，242

匹孤（疋孤） 003，004，006，007，008，009，010，013，292，323

匹兰 144，160，161，175，297

匹珍 076，101

平昌公主 216

平羌校尉 206，241，249，303

平襄 145，146，156，165，167，168，174，187，191，262，298

婆衍崘 058，091，096

破多罗部 145，146，168

仆浑 147，148，188，263，285，301

菩提 216

蒲洪 153

Q

齐难 061，070，071，182，300

齐肃 034，068

祁埿 138，141，149

乞步落 225

乞佛□罗使之像 125，268

乞佛成龙 225，312

乞伏跛跛 219，230，312

乞伏宝 225，313

乞伏保达 225，313

乞伏炽磐 003，026，066，072，074，075，078，124，182，184，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14，220，221，230，232，256，257，259，261，263，264，270，272，330

乞伏出累 075，191，242，296，301

乞伏触扳 224

乞伏凤 225

乞伏公府 075，192，239

乞伏矩 226

乞伏可汗讬铎莫何 132，134，137，309

乞伏令和 226，306，307，308，312，313，314，317，318，319，320

乞伏千年 215，224，238，242，304

乞伏乾归 028，036，041，043，047，051，052，070，075，084，143，146，147，165，166，168，169，170，171，172，173，175，176，178，180，181，182，183，184，185，187，188，189，190，191，192，222，227，249，255，256，258，260，262，263，325，327，329

乞伏锐 225

乞伏山 139，310

乞伏审虔 190，238，241，286

乞伏是辰 012，204，239，240，286

乞伏吐雷 142

乞伏魋尼寅 196

乞伏万年 210，237

乞伏务和 172，187，231，235，238，239，242，301，329

乞伏信帝 206，239，241，303

乞伏延祚 219，231，234，238，312

乞伏益州 172，176，235，237，241，299，329

乞伏又寅 204，240

乞伏悦 225

乞伏智达 192，193，239

乞伏周 225，313

乞伏纂 225，314

乞扶莫于 225

乞没军邪 150

乞提部 214，260

乞文泥 019，292

乞珍 029

泣勤川 194

契汗部 012，203，260

契汗秃真 012，028，203，303

牵弘 018，019，292

牵屯 011，012，114，138，139，140，142，143，149，165，166，167，297，298

谦屯 195，196，213，236，237，238，241，242，252

钱大昕 009

强熙 174

强禧 035

漒川 103，152，159，160，162，163，194，197，201，202，206，207，211，249，250，252，260，264，286，302，303

漒川羌 152，162，201，264，302

且万能 023

清河 152

穷泉 072，081，111，295

丘豆伐可汗 134

丘檐 206，240，241，260

屈海 026

屈眷 165，167，241

屈右 074，099，101，110

麹晁 113

麹丞明 046，049，106，107

麹承 214，215，242，257

麹景 171，193，196，199，211，229，230，231，238，242，246，255

去列 217，223，238，305

权千成 169，173，174，178，241，243，247，298，299

权万世 173，299

权小成 193

权小郎 193

R

染干 074

热冏 020

任恺 019

仍寒川 209

如弗 132，133，134，308，309

阮种 015

若厚坞 076

若留 038，045，101，103

若罗拔能 021，030，031，292

弱水护军 201，243，249，252，303

S

三公尚书 171，230，256

僧猛 282

鄯善苟子 056

社崘 134

申屠英 063

什寅 217，223，304，305

审虔 075，189，190，238，241，286，342

盛乐 027

湿罗（汁罗） 011，114

石鉴 017，018，292

石可 057

石勒 136，149，150，311

石驴山 028，073，112，113，295

石亦干 028，038，039，128

石真若留 038，101

时连珍 045，106，107

史暠 046，054，091，093，095，096，106，108，119，120，123

侍军 235

视连 163，164，167，199，242，243，247，298

视罴 167，176，182，186，298，299，300

释道汪 273

释僧隐 273

释智猛 282

寿阗 009，010，013

述延 138，141，142，143，149，291

树洛干 074，186，190，191，193，198，207，209，263，302

树奚 012，204，303

水洛城 190，263，286，301

司繁 144，150，151，158，185，254，297，326

司马骏 017

司马亮 017

思复鞬 030，033，034，037，293

思磐 029

斯骨真 031

斯引 133，142，143，160，309

宋配 031，292

宋生 042

宋益 071，099，101，110

宋钟 070，083

苏霸 046，070，103，104，106，108

素渥 045，103

碎奚 151，163

索棱 188，193，229，256，302

T

他子 200，201，261

太初 034，035，036，037，040，043，045，049，102，103，104，106，112，128，162，164，165，166，167，168，169，170，172，173，174，176，177，178，227，228，232，233，243，293，294，297，298，299，300

昙达 192，193，197，198，199，200，204，209，210，211，224，229，230，237，238，241，291，304

昙弘 269，270，272

昙霍 081，126，127

昙朗 282

昙摩毗 270，271

昙无毗 270，272，283

谭郊 190，191，192，216，263，286，301

檀石槐 021，136

唐旌 085，086

唐述窟 269

唐瑶 052

唐长孺 135，136，146，266，307，310

梯君 201，239

提孤 200，261

提伦 145，164，165，240，243，298

替引 045，103

田迥 113

田嚣 113

田玄明 043，044，050，103，104，107，110

苕藋 074，121，252

铁弗 010，067，135，323

统万城 212

鍮勿崘 053，054，082，099，101，114，115，116，118

秃发赴单 084，195，242

秃发俱延 052

秃发利鹿孤 041，049，050，051，052，053，054，055，057，058，085，091，107，108，114，115，120，121，179，330

秃发傉檀 003，027，028，029，047，051，059，062，063，064，065，066，067，068，069，071，072，073，074，075，076，078，079，080，081，091，092，093，108，109，111，117，121，124，129，182，221，236，323，324

秃发如苟 084，173，299

秃发氐 003，004，010，028，030，043，050，060，064，069，077，082，083，084，085，087，088，095，096，097，101，103，104，105，110，111，115，116，117，118，119，122，123，124，125，175，195，205，217，223，243，246，290，303，323，324，333

秃发树机能 008，011，013，016，017，019，023，025，030，047，089，140，292，323

秃发他 073

秃发乌孤 002，003，004，009，011，013，019，021，025，026，027，028，033，037，038，039，040，041，042，043，045，047，048，080，089，105，108，115，175，176，323

秃发鲜卑 002，003，006，008，010，011，012，013，018，019，023，024，025，026，027，033，035，036，037，083，084，086，088，105，116，123，125，127，139，140，148，245，259，292，327

屠各 018，036，068，083，100，117，151，153，154，160，221，243，248，254，257，258，260

吐蕃 085，086，325

吐谷浑 006，012，026，027，042，046，074，075，084，134，136，137，140，151，162，163，164，167，176，177，181，182，183，184，186，190，191，193，194，198，199，200，201，203，207，208，209，210，211，212，213，216，217，218，219，221，222，223，224，225，237，240，242，243，247，248，249，260，262，263，264，281，296，298，299，300，301，302，303，304，305，311，314，315，322，323

吐护真 191，240，260

吐赖 138，140，144

吐雷 052，142，150，297，342

吐秣 042

吐若 045，103

吐延 163

推斤 030，033，293

推寅 004，005，006

托跋凉录 010，323

拓拔氏 086，087

拓跋珪 027

拓跋濬 085

拓跋鲜卑 002，003，004，005，006，010，037，084，085，114，135，136，254，260，261，280，292

W

万斛堆 017，068，292

万载 215，304

王宝 169，174

王德 052

王娥 070，083

王伐 214，215，240，257

王丰 113

王广 144，161，175

王衡 196

王侯 033，062，073

王基 195，202，239，242，256

王集 057

王建 072，076

王憬 190

王恺 212，217，232，257

王孟保 197，242，256

王穆 034，035

王乞基 043，045

王尚 030，061，062，063，064，294，295

王世强 034

王松忽 060

王松寿 165，166，171，172，181，193，197，198，199，230，232，234，235，238，241，242，246，255

王统 150，151，154，158，161，254，297

王隐 023

王真保 151，153，251，254，257

王忠 046，106，108

王钟 070，072，083

王杼 215

王擢 031，151，152，153，254

韦伐 209，210，219

韦虔 172，173，235，238，255

韦宗 069，080，124

隗仁 196

卫鞬 174

卫殷 046，106，107

卫章 076

尉地拔 154

尉肃 077，099，101，110

尉贤政 079，101，110，195

尉祐 033

文俶 020

文齐 065，106，109

文鸯 020

文支 056，063，064，075，076，084，098，101，103，104，196，295，296

沃陵 215，233，242

握逵 210

乌地延 026，194，200，238，240，261

乌纥堤 182，186，262

乌纳阗 217，229

乌树山 138，140，144

鸣蝉堡 146，147，168

屋引阿洛 052

屋引出支 159，229

屋引破光 185，238，241

屋引氏 135，160

无孤山 149，150，297

吴汉 212，238，239，242，257，286，304

吴阴 075，103，104，110，191

武郡勇士 159

武台（虎台）071

务丸 030

坞堡 021，022，119，122，152，157，221，253，262，327

X

西海 026，043，060，214，243

西胡校尉 012，204，240，249，286

西平 003，024，028，035，040，041，042，043，044，045，048，049，050，053，058，059，060，064，066，074，075，076，077，078，084，085，089，097，102，103，107，110，112，113，114，115，117，121，126，127，128，129，156，175，180，182，195，200，206，210，211，214，215，242，252，257，261，293，294，296，304，323

奚念 036，056，067，167，169，175，183，184，190，238，242，247，294，295，298，301，341

奚于 034，293

献帝邻 005

小月氏 036

谢艾 031

辛澹 211，222

辛进 215，216，222，230，257，304

辛静 177，229，242，256，300

兴国城 189

休官 046，146，151，153，166，167，169，173，178，193，194，221，241，243，247，249，298，299，302

休官大都统 169，241，298

揟次 034

徐灵 034

徐邈 013

徐宿 071

玄高 235，269，270，272，273

薛翘 046，049

荀安国 057

Y

尉迟渴权 138，140，141

延祚 193，219，224，231，234，238，312，342

严纯 034

阎松 061

阳武下峡 067，068，174，295

杨班 065，106，109

杨壁 161

杨定 161，169，170，171，172，175，299

杨轨 042，043，044，045，047，050，096，110，176，293，299

杨桓 055，062，095，096，110

杨难当 218，305

杨盛 182，183，198，300

杨统 042，043，045，046，047，055，067，103，104，106，107，111，295

杨显 219，242，257

杨欣 021，031，292

杨玄 211，212，249，250，304

杨颖 050

杨玉 183

杨贞 045，106，107

杨纂 151

养楼山 127，128

姚艾 198，199，200，237，241，257，302

姚弼 070，081，108，188

姚苌 158，159，161，162，163，170

姚冲 184

姚泓 199

姚军都 198

姚儁 200，203，231，232，237，242，243，257，259，348

姚濬 213，243，258，304

姚龙 190

姚硕德 051，161，162，174，178，300

姚显 071

姚兴 030，051，052，053，055，060，061，062，063，064，069，070，071，162，169，170，174，178，179，180，181，182，183，184，188，197，254，260，295，299，300，301

姚濬 213，243，258，304

姚弋仲 152

姚懿 184

姚珍 176，258，299

药兰泥 018

叶延 163

伊力延侯 070，098，101

乙弗 012，026，027，028，038，039，043，045，046，052，076，077，078，111，115，117，120，140，194，196，200，240，249，260，261，264，281，293，296，302

乙弗部 012，027，039，045，120，196，302

乙弗窟乾 196，264，302

乙弗乌地延 200

乙弗勿敌国 012，026，027

乙旃音埿 159，229

意云鲜卑 028，029，040，293

阴利鹿 078，092，096，104，110

阴山 006，007，011，132，133，135，136，137，138，163，297，308，309，311，336

阴训 045，103，104，106，107

尹文 029

尹昭 070

永康 192，193，194，197，198，199，200，201，202，203，206，210，228，233，235，243，252，272，273，296，301，302，303

勇士城 032，159，160，165，283，284，285，293，297，313，325，328

勇士川 144，149，151，160，297

勇士护军 142，150，297

祐邻 137，138，139，297

裕苟 145，164，165，240，243，298

元基 195，199，203，213，214，215，216，229，230，231，238，252，260

元绪 213

源乾曜 085

苑川 072，127，129，133，136，138，141，142，143，144，147，149，150，159，164，167，173，178，179，181，182，183，184，187，188，189，190，191，192，209，210，227，228，250，252，254，262，263，266，281，283，284，285，

297，298，299，300，301，304，313，328

悦大坚 147，148，184，301

越质部 145，146，165，171，187，240，301

越质叱黎 145，165

越质洛城 205，239

越质屈机 187，263

云连 073，097，101

允吾 051，052，156，176，179，262，299

Z

扎赉诺尔 005

张昶 046，065，106，108

张大豫 034，035，037，293

张济 034

张捷 042

张骏 031，149

张猛 069，100，101，103，110

张穆 065，106，109，111

张融 058，092，096，110

张寔 033，113

张天锡 034，151，293

张元伯 269

张重华 031

长城护军 218，243，252，253，257

长柳川 194，263

赵昌 065，106，109

赵晁 046，071，072，090，096，106，108，111

赵恢 195，242，256

赵寿生 210，238，257

赵曜 060

赵振 039，044，046，089，095，096，106，108

折斐 196，240

折掘奇镇 028，073，098，101，112，295

折掘氏 028，071，117

支旁 194，263

至便川 142，143

治城 216，224，251，252，304

赀虏 135，136，137，153，310，311，312，326，334

祖厉川 011

后记

此书完稿于1984年5月，1987年列入“西北历史”丛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鉴于当时形势，只印了2000册，发行不广。然而，却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兴趣，日本新潟大学关尾史郎教授特撰文介绍此书，文载日本《东洋学报》第72卷（1991年）3·4号“批评与介绍”栏（第265-271页）。至2006年5月，此书又列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今由笔者发起、主编之“十六国史新编”丛书，此书忝列其中。此次再版，除了改正一些字句错讹，增加几幅图版之外，基本保持原书的观点和内容，按丛书要求，增加了索引，并将本人在2016年发表在《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三辑的《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一文及上述关尾史郎教授的书评（汉译文），作为附录。

周伟洲

2019年12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凉与西秦/周伟洲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9

（十六国史新编）

ISBN 978-7-5201-8676-6

I.①南… II.①周… III.①中国历史-南凉②中国历史-西秦 IV.①K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36141号

·十六国史新编·

南凉与西秦

著者/周伟洲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高振华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1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1.625 字数：203千字

版次/2021年9月第1版 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676-6

定价/7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十六国史新编

【汉赵国史】周伟洲 著

【五凉史】赵向群 著

【前秦史】蒋福亚 著

【后秦史】尹波涛 著

【南凉与西秦】周伟洲 著

【成汉国史】高然 范双双 著

【后赵史】尹波涛 温拓 著

【五燕史】赵红梅 著

【赫连夏国史】吴洪琳 著

本书叙述十六国时期在西北建立的南凉、西秦两个政权的历史。首先从民族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秃发、乞伏鲜卑的来源、迁徙及融合情况；其次，叙述了他们建立政权的背景和经过，两国与邻近各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盛衰的历史；最后，对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等也作了一些探索。除了南凉、西秦及其建立者鲜卑族的动向之外，本书关于两个政权对整个西北地区发展所起作用的论述也极其深刻。

该书的最大贡献，可以说是对以往关注较少的南凉、西秦两政权及其建立者鲜卑族的相关史实进行了阐明，并加以证实。最应当得到高度评价的是，该书著者对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的佚文也加以重视；还积极援引了包括炳灵寺石窟在内的许多考古学的挖掘和调查成果，这一点更加提高了该书的价值。

关尾史郎（日本新潟大学教授）





出版社官方微信



世间之盐品牌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8676-6

9 787520 186766 >

定价：7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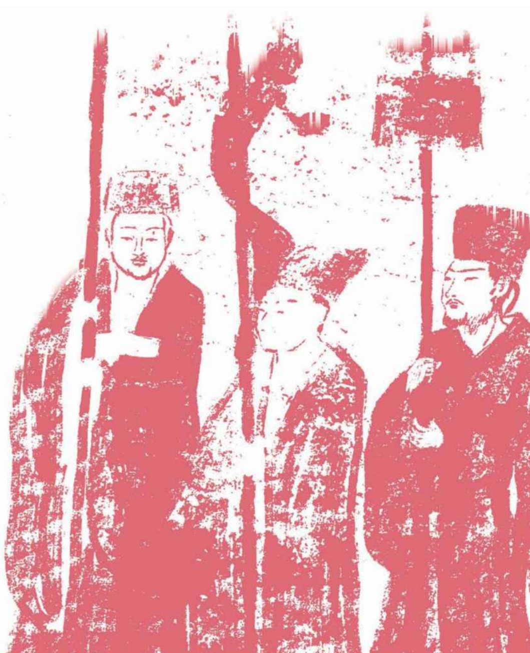
前秦史

蒋福亚 著



丛书主编 周伟洲

吕光西征 氐族 淝水之战 桓温北伐 苻坚政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蒋福亚

1938年生，江苏武进人，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生毕业，师承王仲荦等。历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顾问等。著有《前秦史》《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管豹集——魏晋南北朝史散论》等，合著《中国古代史》《六朝经济史》《中国历史辞典》《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等。





十六国史新编

丛书主编 周伟洲

前秦史

蒋福亚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总序

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316～439）[1]，虽然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就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如在唐代魏徵等撰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列遗存的“霸史”共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中，就有二十六部十六国国别史。其中，最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可惜以上诸书均先后散佚，只是在唐宋时期编纂的各种类书及其他史书中，有上述霸史的一些辑文。[2]

由于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隋唐以后的历代史家，认为十六国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十六国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中国历史，对十六国也着墨不多。加之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及隋以前有关十六国的史书，均先后散佚，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极为困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创了中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更加深入，十六国史论著也不断问世。加之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十六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古籍，重新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十六国的国别史。

我们这套“十六国史新编”丛书，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或正在撰写的一批十六国国别史中，选出其中学术水平较高、大致符合国别史体例的著作编辑而成。主要包括下列著作：

1.《成汉国史》，高然、范双双著；2.《汉赵国史》，周伟洲著；3.《后赵史》，李圳著；4.《五燕史》，赵红梅著；5.《前秦史》，蒋福亚著；6.

《后秦史》，尹波涛著；7.《赫连夏国史》，吴洪琳著；8.《南凉与西秦》，周伟洲著；9.《五凉史》，赵向群著。

以上九部著作大致涵盖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十六个国家（政权）。之所以称之为“新编”，则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以上九部著作均是在尽可能收集整理有关史料及参考古今有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完全摈弃了过去封建史家的正统论及民族歧视和不平等等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评述十六国历史。

第二，从前封建史家所撰十六国史，仅注重该国的政治、军事及与邻近各族所建政权的关系史，而“十六国史新编”还加强了对十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包括宗教信仰）及民族的认同、迁徙及融合等方面的论述。

第三，“十六国史新编”还特别注意吸取文物考古的新资料，以及中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四，“十六国史新编”采取现代通行的专著体例和形式，用章节目的体例撰写并详加引文注释，最后附有大事年表、索引等。

关于“十六国史新编”有几点说明。

首先，由于“十六国史新编”有的撰写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如《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前秦史》），距今已过去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国内外有关十六国史的研究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众多的新成果问世。如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三崎良章撰《五胡十六国的基础研究》（汲古书院，2006）及氏撰《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东方书店，2015年第三版）、日本学者编纂的《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等等。中国学者赵丕承编著《五胡史纲》（艺轩图书出版社，2000）、刘学铫撰《五胡史纲》（南天书局，2001）、陈勇撰《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贾小军撰《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及氏撰《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陈琳国撰《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商务印书馆，2010）及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咸阳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郭永利撰《河西魏晋十六

国壁画墓》（民族出版社，2012）等。而这些研究成果，上述十六国国别史则已不能参考引用，只能保持其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成果及特征了。

其次，新编的九部十六国国别史，是由近十位作者撰写的，因此各书在体例、文字、着重点上，均与各个作者的专业、学养、经历等有关，故各书体例、内容的取舍、文字等各方面不尽相同，各具特色。

再次，有关十六国的历史，近二十余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一些与“十六国史新编”相左，甚至有相反的观点。[3]这应是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正常现象。我们保留“十六国史新编”中的观点和结论，以期引起中外学者的讨论和争鸣。

最后，感谢“十六国史新编”的各位作者，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欣然决定出版此套丛书。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2019年1月30日

[1] 大致相当于西晋灭亡至北魏灭北凉，统一整个北方的时期，即公元316年至439年。

[2] 参见[日]五胡之会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

[3] 比如仅关于最基本的“五胡”“屠各”“羯胡”“拓跋”“护军制”“汉化”“胡化”等概念，学界均有不同的解析。

前言

氐族是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相继建立过前仇池国、前秦、后凉、后仇池国等政权，后来逐渐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前秦的建立及北方的统一，无疑是氐族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

与汉族相比，魏晋南北朝时内徙的诸少数民族，在生产和社会制度方面虽然较为落后，但他们同汉族一样，都各有自己的优点，勤劳勇敢并富于进取精神，所以当他们内徙并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时，统治者的治绩有了很大进步，有的甚至不比一些汉族政权明君圣主的统治逊色多少，以至于后世史学家赞叹说："古之为国，曷以加诸！"尤其是前秦，这个在十六国时期唯一统一了北方的政权，前期的几个统治者，特别是苻坚，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苻坚统治前期，"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亭，四十里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呈现出东汉后期以来少有的兴旺发达景象。保存至今的苻坚时关陇民谣，以欢快的情调歌颂了当时的盛景："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苻坚是内迁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倡导汉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先行者之一。他使前秦成为当时中国境内经济文化恢复发展最迅速、政治较清明、行政效率最高、最有规模气度、最富生气的政权。前秦的文物礼仪，甚至连以正统自居的东晋也望尘莫及。他的举措不仅对十六国后期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有巨大的影响，即使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也能见到某些影子。

氐族苻氏集团怎样由偏居西北一隅的小部落，历经迁徙，建立前秦，发展壮大，进而统一北方的？前秦在这一时期民族融合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所处的地位如何？庞大的前秦帝国何以淝水惨败并顷刻瓦解？诸多疑问，是本书在叙述前秦兴衰存亡全过程中重点探讨的问题。本书"汉晋之际的氐族""道安本无宗"的介绍，主要归纳了目前史学界的学术成果，自己的心得体会甚少，只是在个别地方进行了一些浅尝辄止的

探讨，或者稍做补充而已。书中在汉魏之际氐族内迁对关陇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对苻生的评价特别是目前史学界争议颇大的前秦政权及淝水之战的性质诸问题上，我都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许，我的观点很难站住脚，但我希望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同人交换意见。

本书是在师友们的一再鼓励下写就的，限于功力和水平，挂一漏万，错误之处想必很多，在此，我恳切地希望得到历史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们的教正。

1989年12月

- 〖第一章〗 汉晋之际的氐族
  - 第一节 氐族
  - 第二节 氐族的迁徙
- 〖第二章〗 前秦建国
  - 第一节 枋头起兵
  - 第二节 前秦建国
  - 第三节 苻生的统治
- 〖第三章〗 前秦的政治与经济
  - 第一节 封建制的政权及仪制
  - 第二节 苻坚统治前期的政治
  - 第三节 关陇经济的恢复
- 〖第四章〗 苻坚统一北方
  - 第一节 王猛灭燕
  - 第二节 击灭仇池和取有梁、益
  - 第三节 灭凉
  - 第四节 灭代
  - 第五节 吕光西征
- 〖第五章〗 淝水之战
  - 第一节 夺取襄阳和兵败淮南
  - 第二节 军事殖民
  - 第三节 淝水之战
  - 第五节 淝水之战的性质及南胜北败的原因
- 〖第六章〗 前秦败亡
  - 第一节 淝水之战后北方的形势
  - 第二节 前秦败亡
- 〖第七章〗 前秦的文化
  - 第一节 经学、玄学和文学
  - 第二节 宗教
- 〖附录〗 前秦大事年纪
- 索引

〖第一章〗 汉晋之际的氐族

第一节 氐族

一、汉代氐族活动地域

氐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自殷商时期就活跃于中国的历史舞台。《诗经·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其他先秦史籍，诸如《竹书纪年》《逸周书》《山海经》等也曾提及。其中个别史籍还涉及氐人的个别民族特征，《荀子·大略》可谓其中一例：“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吕氏春秋·义赏》的意思相同，措辞更明确：“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死不焚也。”那么较原始的氐人和羌人一样，有火葬的习俗。

最早指出氐人活动地域的无疑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1]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开通西南夷，在居住区设置了许多郡县：“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犁郡（治今四川汉源东北），冉駹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西和西南）。”越嶲、沈犁、汶山等郡的设置，都与西南夷中各支有关，武都郡当无例外。因此，“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的正确诠释应为：以居住在广汉西部的白马氐设置武都郡。《通典·边防·氐》中有关氐人原始居地的记载就更直截了当：“氐者，西戎之别种。在冉駹东北，广汉之西。君长数十而白马最大。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为武都郡。”按当时的政区建置，武都郡东接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南连广汉（治今四川金堂东），西接汶山，北邻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南）和天水（治今甘肃通渭西北）。

白马氐名称的由来与白马水密切相关。《水经·漾水注》曰：“白水又东南径阴平〔道〕（甘肃汶县西北）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虏矣，即广

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分广汉蛮夷置。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而白马溪。”生活在这里的氐人因水得名，曰白马氐。此时这里仍属广汉郡，直到安帝时才设置广汉属国。东汉建安年间，曹操西征张鲁，在此建阴平郡。这里应是白马氐人最早的活动场所。随着氐族的繁衍生息，其活动地域有所扩大，这里仍是白马氐人较集中的地方。

既然如此，汉武帝又是怎样以白马氐人为主开置武都郡的呢？《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为解此疑点提供了线索：“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北史·氐传》则曰：“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和越嶲郡、沈犁郡的设置一样，武都郡的设置也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征服战争，迫使氐人奔窜四周，其中一部分进入冉駹夷的区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冉駹生息的山区情况：“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继残酷的征战杀伐而来的是强制性逼迁，被迁者不仅有白马氐人，还有其他各支氐人。因此，武都郡的设置应是见诸史籍的氐人的第一次大规模逼迁。此举导致氐人的强烈反抗，“元封三年（前108），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治今甘肃酒泉）”[2]。《魏略》所说的福禄，实际上是酒泉的禄福。这里距氐人最早的活动地域足有千里之遥了，较近的则被逼迁至汧水和陇山之间。也就是说在汉武帝开置武都郡不久，氐人又遭到了第二次逼迁。由于这两次逼迁的时间极近，《魏略》便误以为是一次了。

《史记》说氐人有十余支，《通典》说有数十支，究竟有多少支，今天已无从考辨。氐人部落较多，白马氐是其中最大、最著名的一支，大体上不会有什么疑问。除白马氐人外，其余各支的情况又如何呢？

西汉县级建置有县、道、国、邑的区分。《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颜师古注释《汉书·地理志》陇西郡的“氐道”曰：“氐，夷种名也。氐人所居，故曰氐道。”可见，凡该志中冠有“氐”字的道，都是氐人生息活动的场所。据此，西汉时期的氐道，计有广汉郡的刚氐道（四川武平东）和甸氐道（甘肃文县西）、蜀郡的湔氐道（四川松潘）、陇西郡的氐道（甘肃清水）等。武都郡是氐人较集中的地方，但其下辖武都（甘肃西和西南）、上禄（甘肃西和东南）、故道（陕西凤县东北）、河池（甘肃成县）、嘉陵道（甘肃成县西北）、平乐道（甘肃武都东北）、

循成道（陕西略阳西北）、下辩道（甘肃成县西）等几个县道，均无冠有“氐”字者，这又何解？马长寿先生据《汉书补注》指出，武都郡的故道，实际上是“故氐道”的简称。[3]此说可信。至于其他县道，根据史实，亦可断定是氐人较集中的地方。如河池又名仇池，有氐人万余落，为氐人聚居的一大据点，其后杨氏据此建立仇池国，是氐人所建的第一个政权。曹操平定张鲁时，命苏则“绥定下辩诸氐”[4]。《三国志·魏志·杨阜传》载，下辩亦有氐人“万余落”。此外，天水郡的略阳（甘肃秦安东南）及兴国（甘肃秦安东北）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兴国在汉魏之际有氐人万余落[5]，西晋初年，略阳氐、羌“聚结”[6]。这些地方昔日应有氐人生息，因此才能发展到如此规模。

总体来看，两汉时期广汉郡和蜀郡的北部，汶山郡的东南部，以及武都郡、陇西郡、天水郡、酒泉郡等地，都是氐人生息活动的地区，无怪乎江统在其《徙戎论》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徙扶风（治今陕西泾阳西北）、始平（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7]

二、氐族的经济生活及若干特征

《史记》谈及西南夷时，对其较大各支大都夹叙相关经济生活及特征，唯独氐人例外，除记载其地外，别无他言。最早涉及氐人经济生活及若干特征的史籍首推《魏略·西戎传》：

>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号曰盍雅，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

氐人何时开始农业定居生活的，现在不清楚[8]。秦汉时氐人已是农业民族，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风俗通义》曰氐人“乐在田溪”，“乐”倒不见得，在汉族统治阶级的排抑下，氐人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地区难以生存，只有选择山溪两岸居住。山溪多水，证明他们已在从事农业。如前所述，白马氐人最初活跃在白马河两岸，下面再看看《汉书·地理志》有关氐道的文字，可以发现情况大体类似：甸氐道，“白水出徼外，东至葭萌入汉”；刚氐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垫江入

汉”；湔氐道，“涪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等等。总之，氐人所选择的定居场所，正是西汉水、白龙江、涪江上游的河谷地带。在山区，也只有这种河谷台地，才最利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农耕生活。氐人被逼迁酒泉后，能在禄福定居，也是由于这里水源充足，利于农耕：“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在日后数百年的历史中，仇池虽历经变迁，但始终是氐人的一大据点，这与仇池水源充足、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开垦、地产盐土、是战乱时期避难的理想桃源密不可分。“仇池山上有百顷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东西绝壁百仞……一人守道，万夫莫向。山势自然有楼橹却敌之状……上有岗阜泉源。”[9]

氐人农业生产的水平相当高。《南史·西戎传》曰氐人“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紬绢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大体当时北方种植的各种谷物，氐人都有生产。

氐人积累了大家畜饲养的丰富经验。牛马驴骡除用于运输外，更多的是用于农业生产。“善田种”的“善”字，含义相当广泛，农耕使用畜力，应为其内容之一。在大家畜饲养中，氐人更善养马，因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氐人“出名马”。

直到魏晋之际，南方汉族人民仅止“饭稻羹鱼”，粮食品种单一，而且较长时间内停留在“火耕水耨”的低水平上。两相比较，氐人农业生产的水平甚至高于南方汉族人民。汉魏之际，粮荒严重，曹操的屯田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关中屯田较晚，先经李傕、郭汜之乱，又遭韩遂、马超之害，破坏之残酷，前所未见。粮荒极难解决。于是，掠夺氐人的粮食就成了曹操大军西出的经常之举。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亲征张鲁，派遣张既“别从散关（陕西宝鸡西南）入讨叛氐，收其麦以给军食”[10]。次年，夏侯渊进击下辩，又收“氐谷十余万斛”[11]。下辩氐人只有万余落，平均每户被掠十余斛，由此可见氐人农业生产的水平。

与所有农耕民族一样，家庭手工业是氐人手工业中首先发展起来的部门。《说文》曰：“絣，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罽也。”这类纺织品为汉人所知，并保留氐人对其的称谓，当时有部分产品行销汉人地区，并以质量见佳为前提。《魏略》说氐人“俗能织布”，估计氐人也以男耕女织为经济生活的主体。

氐人衣服的颜色有白、青、绛多种，它表明，随着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氐人已掌握了染色技术。

氐人是一个善于进取并吸收其他各族优秀文明的民族。《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就说氐人“有麻田”。估计至迟在南朝初年，氐人已种植桑麻，出产䌷绢等丝织品了。冶铜铸铁这时也有所发展。

氐人的副业生产丰富多彩，除养猪外，还养蜂取蜜、割漆、刮蜡、种椒等，有的可以调味，有的用于建筑，有的为了照明。[12]

氐人很早就和外界保持着商业往来。《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曰：“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氐人相当精明，除了换取其经济生活的必需品外，更多的是为了谋利。《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西晋时，“（武都氐王杨茂搜）子难敌遣养子适贾梁州，私买良人子一人。（张）光怒，鞭杀之”。《资治通鉴》卷88说得更清楚：“难敌遣养子贩易于梁州。”看来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可以成为商品。氐人豪贵参与战争，也往往以夺取财货为目的。如梁州刺史张光在镇压汉沔流民起义时，亟盼杨难敌助战，杨难敌乘机提出了财货的要求。当流民领袖杨武给予大量财货，声言流民的珍宝均为张光所掠时，杨难敌立刻倒戈，导致张光惨败。

上述情况虽极难判断氐人的社会发展阶段，但私有制观念早已植根于氐人社会生活中，氐人贫富分化及阶级对立已相当明显，当无任何疑问。氐人中已不乏家富“千金”[13]的大财主了。

氐人服色尚白、青、绛，妇女皆编发。“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其嫁娶有似于羌。”氐人平时的穿戴也很有特色：“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靴。”[14]服式、仪制、习俗虽然承袭传统，但往往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就丧葬而言，过去氐人火葬，魏晋时转向土葬。婚嫁过去类似羌，南朝初年“婚姻备六礼”，[15]更类似于汉。尽管如此，《魏略》的记载毕竟说明氐人有共同的爱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共同心理状态。《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杨难敌抱怨张光鞭杀其养子时说：“使君初来，大荒之后，兵民之命，仰我氐活……”寥寥数语，强烈的民族意识已溢于言表。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氐人政治首领出现得较早。这些首领大都得到了中原王朝的认可，并享有一定的特权：“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

者，（马）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光武）帝悉从之。”[16]从苻洪祖先“世为西戎酋长”[17]、吕光祖先“世为酋豪”[18]等来看，氐人政治首领的世袭制早已确立。由于自汉武帝开通西南夷以来，氐人就“都统于郡国”，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成为封建政府的编户，所以氐人始终没有统一的“王”。这类情况既说明氐人有较强的凝聚力，也说明其氏族制度的残余较严重，汉魏之际，称王的氐族豪酋之多是其他各族望尘莫及的。如此，当时的统治者便力图利用酋长们的威望，加强对氐人的控制，造成氏族制残余的逆转。

氐人相互间称“盍雅”，在部落内说氐语。但《魏略·西戎传》却说其语言“及羌、杂胡同”。氐人有无自己的语言便有疑问，《通典·边防·氐》中“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的记载解决了这一争议。尽管在唐代氐人已不多见，但唐代所存有关氐人的资料及见闻远比今日丰富，杜佑治史历来以严谨著称，他这样的记叙当有所本。他证明《魏略》“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的前一个“同”字是衍文。大多数学者指氐人有独立的语言，我是同意的。

总之，历经先秦以来数百年的发展，氐人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居住区域，长期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习俗和爱好，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民族感情，凡此，都说明至迟在秦汉时期，氐人就以一个独立民族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了。

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氐羌和氐汉之间的关系。

氐族和羌族自古以来就十分密切，因而史籍中往往将氐、羌并称，直到魏晋时还是如此，原因在于他们同属“西戎”系统。在氐人的生活区，几乎都有羌人混杂其间。武都、阴平是较原始的氐人发源地，《汉书·地理志》：“武都地杂氐、羌。”《华阳国志·汉中志》谈及武都时并无变更，而是说该地“多羌戎之民”。汉代统治者逼迁氐人至酒泉，同样“分徙其羌远至酒泉、敦煌”。阴平“多氐傁”，可又是黑羌、白水羌和紫羌生育繁息地所在，因此“胡虏风俗、所出，与武都略同”。既然如此，氐族深受羌族影响乃是势所必然，但这两族毕竟有明显的区别。相关论述很多，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点。

第一，有各自独立的语言。

第二，经济生活不同。氐族早就是农业民族，羌族则是游牧民族。

直到魏晋时，转向农耕的羌族数量仍然有限。经济生活的差异，决定了彼此居住状况。《南齐书·氐传》曰：“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北史·宕昌羌传》曰：“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党项羌的屋室同于宕昌羌：“织牦牛尾及羊毛为屋。”据《南齐书·河南传》，以游牧为生的羌人，则大都“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

第三，习俗爱好不同。氐人服色尚青、绛、白。史籍中不见羌人崇尚什么颜色，氐羌关系密切，如羌人服色和氐人所尚一致，文中该当氐羌并提，所以虽不知羌人服饰崇尚何色，但和氐人崇尚的服色不同，则是无疑问的。氐人服式已如前述，氐人大都“衣裘褐”[19]。氐族妇女编发，出嫁时穿衽露；羌人妇女“被发覆面”[20]，出嫁时披“大华毡为盛饰”[21]。羌人有烝母报嫂的风习，“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故国无鳏寡”[22]，北朝后期还是如此：“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23]史籍未见氐人有此类记载。人伦是汉族极为重视的内容，史籍只字未及，可以断定氐族没有。

氐汉两族都是农耕民族，自汉武帝开置武都郡后，氐族便都置于郡县之下，和汉族杂居。汉族是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民族，落后者向先进者看齐，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氐族受汉族的影响更甚于羌族。氐人“姓如中国（即汉族）之姓”，是一个很突出的表现。

史籍所见氐人的姓有齐、苻、蒲、杨、雷、窦、吕、毛、王、鱼、苟、樊、隗、啖、屠、单等，都是单音节汉字，确实和汉族相同。《魏略》说氐人“各自有姓”，恐怕未必尽然。魏晋时拥众万余落的兴国氐王阿贵姓什么，史籍中就较难寻觅。在上述姓氏中，齐、杨、苻、吕等较早见，其余大都为后出之姓。至于蒲氏，在苻洪改“浦”为“苻”后，就消失了。氐族中最常见的姓有苻、姜、梁、杨、齐、吕、强、樊等，这些可以说是氐族中的大姓。

氐族姓氏的由来，大体有从羌、汉两族移植和以名号为姓或自取等多种。

雷、鄄、窦等姓可能与羌族有更密切的关系。齐、杨、吕、王等姓大体上从汉族移植。《晋书·吕光载记》：“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今属江苏）避难徙矣。”吕光绝非汉人，汉代沛县没有氐人，均无须论证。沛县吕氏在汉初名望极大，吕光生拉硬扯，说自己的祖先源出沛

县吕氏，无非是说自己的姓氏源远流长，是名门望族，有称王称帝的缘分。虽然荒唐，却证明吕姓是从汉姓中移植过来的。

以名号为姓的事例见于《晋书·刘渊载记》和《晋书·刘聪载记》。刘渊起兵平阳后，“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这里，征没有姓，名位是大单于。他的女儿后来是刘渊的皇后，史称“单后”。那么征应该姓单了。所以《资治通鉴》卷86记作“氐酋单征”。胡三省特意诠释曰：“时戎狄酋长皆谓之‘大’，征即光文（刘渊谥光文皇帝）单后之父。‘于’衍字也。”但假如氐族早有“单”姓的话，史籍中不可能仅此一见。最大的可能是征自称大单于或归刘渊后被封为单于，其女贵为皇后，便取单于之意，以单为姓了。

自己起姓，以蒲洪最典型。《晋书·苻洪载记》曰：“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父怀归，部落小帅。”永和六年（350），蒲洪“以谶文有‘艸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

历史上的各族都很重视姓氏，何况汉魏之际俗尚姓氏，氐人当然也无例外。他们之所以那样随意频繁地变动自己的姓氏，着眼点无非是以姓汉族之大姓为荣，以及更有利于自己家族和部落的发展。这只是重视姓氏的一个曲折的反映，由此也可以看到氐人受汉族的影响有多大了。此外，氐人“多知中国语”“衽露有似中国袍”等，均反映了此类现象。即便其土屋板墙，也为西部汉人的风格。《汉书·地理志》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故《秦诗》曰：‘在其板屋’。”

总之，氐族是此时内迁各族中受汉族影响最深的一个，其发展变化都与汉文化密不可分。

第二节 氐族的迁徙

一、汉魏之际氐族的迁徙

在前秦建立以前，氐族的迁徙虽远不如游牧民族，但亦较为频繁，原因有两点。其一，因人口增殖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开拓新的地区，这类迁徙一般距离较近。两汉时期，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及阴平（甘肃文县西北）两郡周围诸郡逐步成为氐人的聚居区，这固然有汉族统治阶级排抑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人口和经济原因。其二，被征服后的强制性迁徙。这类迁徙往往较远，而且给氐族带来极大的损害。从后者来说，以汉武帝统治时期、汉魏之际、十六国前期这三个阶段的规模为大。此外，西晋后期亦有少量的迁徙。汉武帝时期前已叙述，这里主要谈后者。

汉魏之际氐族迁徙的次数较多、时间较长，现分次述之。

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后，无力南下，乃倾全力于北方，经营关陇，由此激起关陇军阀的强烈反抗。建安十六年（211），韩遂、马超联合关陇军阀起兵，本来置身事外的氐族豪酋在军阀们的唆使下，卷进了军阀混战的旋涡："近去建安中，兴国（今甘肃秦安东北）氐王阿贵、白项（应为百顷，笔者注，今甘肃成县境内）氐王（杨）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211），从马超为乱。"[24]这一次，与曹操为敌的还有汧县（陕西陇县南）和隃麋（陕西千阳东）等地的氐人。

氐人支持马超是有历史渊源的。马超先祖马援和氐族豪酋关系不错，氐族豪酋受封为王，享受蠲免租税的特权，皆出自马援的奏请，马氏在氐人中有相当大的号召力。马超之父马腾又是羌女所生。灵帝末年，在黄巾起义的激荡下，凉州爆发了王国领导的起义，得到氐、羌各族人民的支持，况马腾镇压这次起义后，便以镇西将军衔长期屯驻汧、陇（甘肃张家川），直到初平年间才因饥荒而就谷池阳（陕西泾阳西北），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汧、陇等氐族聚居区实质上是马腾的割据区，这就使马氏和氐羌两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马超兵败，退据陇上，建安十八年（213）再起，所部基本由氐羌两族丁壮组成，史称"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对陇右构成巨大的威胁。曹操方面有人惊呼："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

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25]在杨阜等人的打击下，马超又败。不久，马超再度纠集“氐、羌数千”[26]兵出陇上，在夏侯渊和张郃的阻击下退归汉中。杨千万转而支持韩遂，失败后只身投奔马超，随马超入蜀，其部投降了曹操。阿贵则在建安十九年（214）为夏侯渊击杀。曹操“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陕西泾阳西北）、美阳（陕西武功西北），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抚军所典是也。其（太）[本]守善，分留天水（郡治今甘肃通渭西北）、南安（郡治今甘肃陇西渭水东岸）界，今之（广平魏郡）[广魏郡]所守是也”[27]。也就是说反抗较激烈者被逼迁关中，归降的则迁于天水、南安一带。从日后杨茂搜统部自略阳打回仇池来看，迁到天水、南安的是杨千万这一支。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兵进汉中（郡治今陕西汉中东），割据汉中的张鲁投降。汉中是益州的门户，曹操据有汉中，刘备方面将其比作“家门之祸”，势在必争。但汉中在曹操心目中不过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因此，刘备兵发汉中，曹操便展开了大规模的逼迁。建安二十二年（217），“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甘肃成县西北），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杨）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今陕西西安）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陕西武功东北），百姓襁负而随之”[28]。“徙郡小槐里”指的是在小槐里侨置武都郡，可见主要集中在今武功一带。曹刘在汉中鏖战一年有余。建安二十四年（219），黄忠击杀曹操骁将夏侯渊，曹操亲临南郑（陕西南郑东），拨出汉中曹军，退守长安、陈仓（陕西宝鸡东）一线。撤退前，曹操命张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29]。

表面上看，建安二十二年（217）的逼迁是利用杨阜在氐人中的威望，建安二十四年（219）则是按张既的计谋：“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30]，似乎相当平和。其实，这两次逼迁都十分残酷。曹操兵进汉中，就大肆屠杀抢掠。这几年中，氐族聚居区并无天灾，氐人陷入饥荒，完全是曹军抢掠的结果。张既由散关（陕西宝鸡西南）打入氐人居住区后，到处“收其麦以给军食”。夏侯渊仅在下辩一地就抢得粟十余万斛。正是这种野蛮的屠杀和抢光政策，才使两次逼迁得以成功。

经过上述大规模逼迁后，武都、阴平等地的氐人仍很多。《魏略·西戎传》曰：“汉故武都阴平街左右，亦有万余落。”延康元年（220），

武都氐王杨仆在曹魏的引诱下，“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即天水郡）”[31]。这次迁居天水的人数不明，留居武都阴平的氐人依然可观。所以蜀汉建兴七年（229）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夺取武都和阴平后，刘禅颂扬诸葛亮的策文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32]相当数量的氐人被逼迁巴、蜀，此后，魏、蜀间展开了激烈的逼迁氐人的斗争。建兴十四年（236），蜀汉好不容易争取到武都氐王苻健的归附，曹魏镇守关陇的统帅司马懿立刻采取对策，“与氐、羌破铁券，约不役使”[33]。在司马懿的分化下，该部内讧，苻健只统四百余户奔蜀，被安置于广都（四川成都东南），有六千余人，也就是说该部的绝大部分在苻双和强端的统领下奔魏，被安置于略阳一带。

一些学者认为，苻健只身奔蜀，所部四百余户降魏。这一事件史籍中有四处记载。

其一，《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建兴）十四年，夏……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

其二，同书《张嶷传》：“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请降，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大将军蒋琬深以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素闻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将有乖离，是以稽留耳。’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户就魏，独健来从。”

其三，《华阳国志·后主志》的前半部分同于《张嶷传》，最后一句则曰：“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

其四，《晋书·宣帝纪》：“（青龙）三年（应为四年，笔者注）……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

“蒲”即“苻”，前秦建立以前，此姓并不多见，《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载有苻洪生子健时命名的一段故事，说明居住略阳的苻氏就是在这次由武都迁徙而来，因此《晋书》所载与《三国志》及《华阳国志》所载虽然误差一年，实为同一事件。该部绝非四百户，所谓“四百户者”，只是指奔蜀者，奔魏者则有六千余人。再说，苻健果系一人奔蜀，蜀汉也没必要辟出广都予以安置。

正始元年（240），蜀将姜维兵出陇右，在郭淮的阻击下退走，郭淮“遂讨羌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34]。史籍所见汉魏之际大规模的掠徙于此而止，但蜀、魏争夺氐人的活动并未就此终

止，在日后的战争中，可能还有小规模的掠徙。

汉魏之际，被曹操及其后继者掠徙的氐人，大都安置在扶风、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始平（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三郡。江统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所谓“戎狄”，主要是指氐、羌两族。可见关中至少有1/4是氐族人。江统还说：“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35]这一议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道出了曹魏掠徙氐人的根由。

东汉末年以来的军阀混战使黄河中下游人口骤减，十不存一。此时，士族地主阶层形成，依附人口激增，封建政府户口大减，土地有余、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各军阀间、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间对人口的争夺相当激烈，大量少数民族被逼迁内地，就是由此造成。氐族的内迁不过是其中一环。李傕、郭汜之乱使昔日繁华的长安“死者狼籍”，男女老少被“杀之略尽”，战乱造成的饥荒又使三辅“人民……相啖食略尽”[36]。关中地区人口问题已十分严重。乱事平息后，流入荆州的十余万户回返关中，历经艰难曲折，方始安居，又遭韩遂、马超之乱，再度大量死亡流散。曹操占有关中，首先考虑的不是恢复关中经济，而是将关中人民逼迁河北，充实邺城（河北临漳西南）周围的劳动人手，此举引起了关陇一带不大不小的骚乱。当曹操决定放弃汉中，退据陈仓、长安一线时，关中就成了他对付蜀汉的后方基地。关中经济决定了对蜀防御能否成功，仅仅逼迁汉中人民于关中，依然不能解决关中空虚的现实问题。曹操绝对不能把逼迁河北的人再迁回来，掠徙氐人由此被提上日程。

曹操之所以要掠迁氐人，还因为氐族豪酋在大规模逼迁以前，始终没有归附和支持过曹操，而且成了曹操的敌对势力。马超、韩遂起兵时，氐酋们支持韩、马二人。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进军汉中，真正的战争并非发生在他和张鲁间，而是和氐族残酷地展开。“公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37]同时，徐晃等将领又另统一军攻杀枹椟及仇夷山区的氐人，直到次年，夏侯渊和武都、下辩氐人的战争还继续进行着。

此外，还因为蜀汉方面早在《隆中对》中就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定为基本国策之一。所谓“西和诸戎”，基本含义是尽量结好和利用西

北地区以氐、羌为主的各少数民族，煽动他们与曹操为敌。马超备受刘备重视，蜀汉建国后一直坐镇汉中，个中原因就在于刘备要利用他在氐、羌中的影响和号召力，此举确有成效。建安二十二年（217），蜀军由沮道进逼下辩，氐酋雷定等即统七部万余落响应。其后，无论诸葛亮还是姜维，当他们用兵曹魏时，都寄希望于陇右的氐羌。

很显然，让氐人留居原地对曹操是很不利的。反之，逼迁氐人，既充实了关中的劳动人口，有利于关中经济的恢复，又削弱了蜀汉可以利用的力量。

西晋时，阮种谈及少数民族内迁后的状况："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38]内迁各族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和睦相处，对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谈及关中经济的恢复，就更离不开氐人了。

《晋书·食货志》曰："京兆自马超之乱，百姓不专农植，乃无车牛。"仅仅数年，在曹丕统治的黄初年间（220-226），关中面貌大变："编户皆有牛，于田役省赡。"这固然是京兆太守颜斐重视农桑、督课有方的结果，更与大量善于田耕的氐人的迁入密不可分。《三国志·魏志·郭淮传》载："（太和）五年（231），蜀出卤城（甘肃天水境内）。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证明关中确实复苏起来，至少封建政府已有较多的粮食储备，可以吹嘘关中"军国有余"[39]了。曹魏之所以能顶住蜀汉的频频进攻，关键在于有关中丰足的粮草做后盾。自曹魏中后期起，长安之所以成为全国三大粮站和兵站之一，关键也在于有粮草做后盾，其中，有一大半的功劳应该归氐人。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载，正始五年（244），曹爽发兵六七万攻蜀，"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同传注引《汉晋春秋》更曰："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所谓"羌、胡"，实质就是"氐、羌"。它说明，在关中地区，承担军国开支的主要是氐、羌。如若他们的正常生产无法进行，关中就"悉虚耗矣"。事实上，氐人所居的京兆、扶风、始平三郡正是关中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羌人所居的冯翊、北地、安定、新平四郡，除冯翊可和前者相当外，其余三郡的农业发展情况是比不上的，何况羌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远不如氐人。因此所谓氐羌不能生产，造成关右虚耗，主要指的是氐人，而不是羌人。在关中农业生产中，只有氐人才和汉人一样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西晋时期氐族的迁徙

魏晋之际，内迁各少数民族的生活相当悲苦，其出路只有：成为封建政府的编户齐民；沦落为依附农民；沦落为与依附农民身份类似的士家；沦落为奴婢。此外，还要承受民族压迫。这个时候，“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40]，“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41]等议论不一而足。在统治者心目中，少数民族是丧尽廉耻、不从教化、居心叵测的祸胎，千方百计地对其排挤和压制。更有甚者调动军队征讨杀伐无辜，借以邀功请赏，或掠卖少数民族人民为奴。因此内迁各族对中原王朝“怨恨之气毒于骨髓”[42]，即使是少数民族上层，亦愤愤不平地叫喊“晋为无道，奴隶御我”[43]。内迁氐族的处境当然没有例外，今略举数例。

其一，景元三年（262），曹魏筹划大举伐蜀，关陇地区首当其冲，镇守雍、凉的邓艾许诺，凡应募者皆予重赏，得羌、氐从军者五千余人。泰始六年（270），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西晋统治者惊呼秦、雍不保，又许诺重赏，在雍、凉招募羌、氐健儿。但在这两次大战中，从军汉人立功者大都受赏，而羌、氐健儿立有上功，即使功居第一，亦都无赏。这种对氐、羌等族健儿的排挤和压制，连稍有良知的汉族官僚也看不过去，议郎段灼为此上奏：“法令赏罚，莫大乎信……晋文犹不贪原而失信，齐桓不惜地而背盟，况圣主乎！”[44]在魏末晋初腐朽的统治下，如此奏议只能石沉大海。

其二，《晋书·扶风王骏传》曰：“徙封扶风王，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文选》卷20潘岳《上关中诗表》曰：“齐万年（西晋氐人起义领袖）编户隶属，为日久矣。”内迁氐人大都是编户当无疑问，随之而来的便是繁重的赋役。曹魏镇守关陇的郭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45]，可以证明在郭淮以前，封建政府对羌氐兵役的征发极不公平。除了这种所谓正常的不公平以外，临时性的征发总是以内迁氐、羌为先，直至他们倾家荡产，前述正始五年（244）曹爽的征发，就是极好的例证。

其三，西晋时赵王司马伦坐镇关中，这是西晋宗室中以贪婪凶狠著称的一个。其心腹孙秀协助他搜刮钱财，搜刮的对象也是以氐、羌为先，由此无辜诛杀“羌大酋数十人”[46]。《晋书·赵王伦传》则曰：“镇关中，刑赏失中，氐、羌反叛。”那么勒索和诛杀的就绝非羌酋，还有氐

族。

邓艾的不赏羌、氐，政府的赋役繁重以及赵王伦对氐、羌的诛杀只是魏晋腐朽统治的缩影。自西晋建立起，统治集团便以骄奢淫逸、敲剥人民为务，极少关心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秦、雍一带水利失修，连年干旱，“米斛万钱”，饿死者甚众。瘟疫乘隙猖獗，“饥疫荐臻，戎晋并困”[47]，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元康六年（296），以氐帅齐万年为首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阴平等六郡氐羌的大起义爆发了。这次起义冲决了西晋在关中的严密统治，相当数量的氐人乘机向其原先的居住地回流，其中最大的一支约4000家在氐酋杨茂搜的统领下回到仇池，不久便建立了氐人的第一个政权——前仇池国。

差不多同时，前述六郡十多万流民挺进梁、益二州。西晋广汉太守辛冉为驱逐这支流民，发布檄文“购募特兄弟，许以重赏”，到处张贴。为激起众怒，李特遣人收回全部檄文，改为“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48]，然后张贴。《华阳国志·大同志》更具体：“能送大姓阎、赵、任、杨、李、上官及氐、叟梁、窦、苻、隗、董、费等，首百匹。”梁、窦、苻、隗都是氐人大姓，不乏“侯王”在内，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部众。我们知道，李特起义后，氐酋苻成、隗文等都是义军中颇有名望的将领，他们对李特时背时从，李特却无可奈何。由此不难推断，这支流民队伍中，氐人的数量大概不少。由于史籍缺载，到底有多少人，入蜀后定居何处，今日已难以考辨了。

三、汉及前、后赵时期氐族的迁徙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在各地流民起义风云的激荡下，一向称臣于晋的匈奴贵族刘渊加入了反晋斗争的行列，建立汉国，拉开了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帷幕。

刘渊起兵得到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支持，其中就有氐族。当刘渊攻下蒲子（山西隰县）、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东北）和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等地后，氐酋单征就投奔而来。并州地区过去极少见到氐人的踪迹。估计单征是率部来奔，人数颇多，势力较大，为此刘渊纳其女为后，用联姻的手段笼络氐族。

汉国是十六国时期胡、汉分治政策的首创者，迁都平阳后，在平阳

周围设置左右司隶，统治四十三万余户汉族，在平阳西设单于台，下辖“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49]，所谓“六夷”，胡三省指出：“盖胡、羯、鲜卑、氐、羌、巴蛮；或曰乌丸，非巴蛮也。”[50]无论哪一种解释，氐族都是其中之一。汉国末期统治集团内讧，刘聪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阁，烧铁灼目……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51]。平阳到底有多少氐人，难举确数，人数不少，则是相当明显的。

如果说单征是统部投奔汉国的话，那么平阳周围众多的氐人主要是从关中掠徙来的。汉国攻克洛阳后的三四年中，汉晋双方的角逐主要在关中，大规模的掠徙也从此开始。仅永嘉六年（312），刘曜在西晋残余势力的反击下撤离长安，便驱掠了“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其中肯定有不少氐人。因为刘曜进入长安后，关中氐、羌“皆送质任”[52]，撤离时当然会席卷而去。其后各次战争，同样掠徙了不少氐人。

刘曜夺取汉国最高统治权后，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他把平阳单于台所属六夷中的一部分逼迁到了长安，在渭城（陕西咸阳东北）设置了单于台，“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53]，这里成了氐羌的主要场所。据《晋书·刘曜载记》，前赵对氐人的掠徙，主要有以下几次。

其一，大兴二年（319）[54]，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郡治今陕西彬县）、扶风，得到晋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的支持，“秦、陇氐、羌多归之”。次年，刘曜亲征，司马保及路松多败退，“曜振旅归于长安”。这次未见驱掠人口的具体记载。但第一，自汉国起，每有征战，必定掠夺人口，已经成为传统。第二，此时前赵初建，政权尚不巩固，统治地域极不稳定，更有驱掠人口的必要。因此，尽管史籍记载一部分氐羌随司马保退据桑城（甘肃岷县东北），但“振旅”二字表明，人口驱掠在所难绝。

其二，大兴三年（320），长水校尉尹车勾结巴酋句徐、库彭[55]谋反，事发被诛，陈尸街巷十日，投尸于水，“于是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刘曜以游子远为车骑大将军统军征讨。游子远兵进雍城，“降者十余万”，又下安定（甘肃泾川北），“氐、羌悉下”；挥师陇右，击降拥有“氐、羌十余万落”，割据上郡（郡治今陕西韩城南），自号秦王的虚

除权渠。是役，“分徙（虚除）伊余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

其三，刘曜击退司马保时，司马保的部将杨曼“奔于南氐”[56]。此时杨茂搜已死，子杨难敌立，与其弟杨坚头自号左、右贤王。杨难敌领下辩氐人，杨坚头领仇池氐人。为消除后患，刘曜亲征，“仇池诸氐多降于曜”。大兴四年（321），杨难敌起兵失败，称藩于前赵，不久投奔成汉。刘曜以田崧镇仇池，被杨难敌袭杀，刘曜再次亲征。咸和三年（328），“曜遣其武卫率骑三万袭杨难敌于仇池，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

其四，大兴三年（320），刘曜兵出南安（郡治今陇西渭水东岸），西讨司马保别将杨韬。南安也是三国以来氐人较多的地方，杨韬极可能是氐人，和陇西太守梁勋投降前赵，刘曜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

其五，永昌元年（322），前赵秦州刺史陈安起兵叛赵，相继占有上邽（甘肃天水）、汧城（陕西陇县南）等地，“西州氐、羌悉从安”，部众扩大到十余万。太宁元年（323），前赵击杀陈安，“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氐、羌悉下，并送质任”，秦州杨、姜是氐人大姓，因此，这次掠徙亦以氐人为主。

前、后赵对峙时，关东地区的氐人也骤然增多，这是后赵招诱和掠徙的结果。石勒名义上称臣汉国，实质是一股独立的势力，与汉国的争夺十分激烈。建兴四年（316），河东飞蝗成灾，饥荒严重，流民成群。石勒乘机招诱，“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57]。奔于冀州的似乎都是司隶所辖的汉人，但在饿殍载道之时，单于台所辖各族肯定也成了流民，因此《资治通鉴》卷89对流入冀州者究竟属于哪一个系统，说得十分含混：“河东平阳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将石越帅骑二万屯并州，招纳流民，民归之者二十万户。”刘聪死后，汉国大乱，石勒也参加了平乱。史称石勒攻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58]。这十余万落是昔日单于台所统之六夷，包括氐人是不难理解的。在此基础上，石勒在襄国（河北邢台）也建立起单于台，之后，后赵又不断掠徙氐人。据《晋书·刘曜载记》、《石勒载记》和《石季龙载记》，主要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在太宁四年（326），前、后赵为争夺洛阳大动干戈。是

役，前赵全军覆没，石虎俘押“氐、羌三千余人，送于襄国，坑士卒一万六千”。

第二次在咸和四年（329），前、后赵决战洛西，石勒生俘刘曜，关中大乱。曜子刘熙、刘胤、刘咸等奔上邽，纠集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等地氐、羌反击长安，为石虎歼灭。“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接着，石虎兵进陇右，“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

第三次在咸和五年（330），秦州休屠王羌起兵，“陇右大拢，氐、羌悉叛”。石勒遣石生进据陇城，王羌兵败，奔窜凉州。石生“徙秦州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

第四次则是在石勒死后，石虎控制大权。咸和八年（333），镇守关中的石生和洛阳的石朗联兵作乱。石虎击杀石朗，兵进关中。石生败奔鸡头山（陕西鄠邑区东南）。石虎“分遣诸将屯于汧，徙雍、秦州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东”。这次逼迁的氐人中，就有后来建立前秦的苻氏那一支。

第五次在石生被石虎击杀后，其部将郭权盘踞上邽（甘肃天水），讨得“东晋征西将军”“秦州刺史”名号，得到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等郡氐、羌的响应。石虎遣石斌等讨伐。郭权为上邽豪族所杀，石斌“徙秦州三万余户于青、并二州诸郡”。

第六次在永和二年（346），石虎命王擢等进攻前凉，前凉部署抵抗，“河、湟间氐、羌十余万落与张琚相首尾”。前凉兵败，王擢攻克武街（甘肃成县西），“徙七千余户于雍州”[59]。

汉武帝排抑和逼迁氐族，开边的含义比较明显；汉魏之际对氐族的掠徙，目的是掠夺劳动人口，经济意义胜于政治意义；十六国时期汉及前后赵对氐人的掠徙，军事意义又远胜于经济意义。单于台的设置和胡汉分治政策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刘渊起兵之际，民族矛盾虽然相当尖锐，但阶级矛盾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刘渊之所以反对其他匈奴贵族打出匈奴单于的旗号，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这样“晋人未必同我”，他认为只有自称“汉”的外甥，定国号为“汉”，才能“以怀人望”，号召汉族，利用汉族人民反晋，为自己一统天下或占有半壁江山效劳。刘渊起兵初期，胆气甚豪，“鼓行

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但随着汉国对胡汉各族人民的残酷掠夺和屠杀，到刘渊晚年，民族矛盾终于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汉族人民也由反晋到逐渐拥晋，甚至匈奴贵族也感到“晋气犹盛”[60]了。这时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认识到反晋只能造成自己的孤立，拥晋则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利益。其中最典型的是活跃于辽东的慕容鲜卑，它就力图通过“勤王”的策略来实现争霸中原的目的。[61]此时，汉族人民显然已成为匈奴贵族的敌对力量，刘渊只有寄希望于利用内迁各族和汉族的矛盾，它的军事力量也逐步转向在少数民族中征发。单于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刘聪进一步完善，胡汉分治政策确立起来了。有的学者认为，单于台和胡汉分治政策的确立是胡、汉各族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生活不同的结果，这难以令人信服。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才是这个制度出现的根本原因。从内迁各族来说，鲜卑是最落后的一支，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远不如匈奴、羯、氐、羌。内迁较早的匈奴（南匈奴，即刘渊那一支）、羯、氐等族此时已大都成为农耕民族，他们和汉族的差异虽然甚大，但鲜卑同汉族的差异更大。慕容鲜卑建立前燕仅晚于汉国数年，而在十六国政权中，它的统治时间最长，始终没有搞什么胡汉分治。这就充分说明胡汉分治并非由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生活的差异造成，完全是统治者对待民族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随着单于台的设置，大单于成了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首脑，单于台所主六夷成为军事主力。如果说，汉国由27000余落南匈奴组成其军队核心，被驱掠的各少数民族，特别是氐族在军事上的地位尚不十分明显的话，在前赵，氐人是其军队的主要力量之一，已不容置疑了。因为迭经杀伐，特别是汉国内讧，南匈奴的伤亡极大，刘曜在长安建立前赵，所统南匈奴部众甚少。关东地区此时已为石勒占有，作为兵役来源之一的其他少数民族数量急剧减少。这样单于台名义上仍统六夷，实际主要统辖关陇一带掠徙来的氐、羌：“（刘）曜兵虽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乌合之众。”[62]咸和三年（328），石虎统兵4万进击河东，刘曜被迫亲自迎战，为了防备凉州的张骏和仇池的杨难敌乘机发难，使他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他先期发兵防御，也只能“遣其河间王述发氐、羌之众屯于秦州”[63]。所以，后赵每次击败前赵都能得到大量氐、羌俘虏。刘曜善于用兵，修撰《晋书》的唐初诸公把他和秦始皇的名将王翦并论，但刘曜和石勒、石虎对阵，几乎每次都吃大亏，最后为石勒生擒。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就在于他的军队主要是由氐、羌组成。这些被俘虏来的氐、羌丁壮，厌战情绪严重，经常无敌自惊。以太宁四年（326）洛西之战为例，本来刘曜已胜券在握，只是由于军队“夜无故大

惊，军中溃散”，被迫退屯渑池（河南渑池县西）才驻扎下来，“夜中又惊，士众奔溃”[64]，刘曜被迫退守长安。

后赵占据的区域广阔，单于台所主六夷远多于汉国和前赵。六夷同样是后赵军队的主要成分，但氐人所占比重下降。不过石虎迁氐酋苻洪于枋头（河南浚县西南）、羌酋姚弋仲于滠头（河北枣强东北），目的在于由他们拱卫京师邺城，军事意义十分明显。后赵末年，石虎之所以能镇压梁犊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苻洪和姚弋仲所统的氐、羌军队。

[1] 有些学者认为氐是西南夷的总称，我同意马长寿及黄烈先生的意见：氐是西南夷中的一支。

[2] 《后汉书》卷86《氐传》。

[3] 《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 《三国志·魏志》卷16《苏则传》。

[5] 《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魏略·西戎传》。

[6] 《晋书》卷57《马隆传》。

[7] 《晋书》卷56《江统传》。

[8] 指1993年第1版出版时，还不清楚氐人何时开始农业定居。

[9] 《太平御览》卷44引《三秦记》。

[10] 《三国志·魏志》卷15《张既传》。

[11] 《三国志·魏志》卷9《夏侯渊传》。

[12] 参见黄烈先生《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

[13]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

[14] 《南史》卷79《西戎传》。

[15] 《南史》卷79《西戎传》。

[16] 《后汉书》卷24《马援传》。

[17]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

[18]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19] 《南齐书》卷49《宕昌羌传》。

[2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1] 《通典》卷189《边防·西戎·总叙》。

[22]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3] 《北史》卷96《宕昌羌传》。

[24] 《三国志·魏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25] 《三国志·魏志》卷25《杨阜传》。

[26] 《三国志·魏志》卷9《夏侯渊传》。

[27] 《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魏略·西戎传》。

[28] 《三国志·魏志》卷25《杨阜传》。

[29] 《三国志·魏志》卷15《张既传》。

[30] 《三国志·魏志》卷15《张既传》。

[31] 《三国志·魏志》卷2《文帝纪》。

[32] 《三国志·蜀志》卷5《诸葛亮传》。

[33] 《北堂书钞》卷104引《晋中兴书》。《御览·铁券》亦有此记载，但误为晋愍帝时事。

[34] 《三国志·魏志》卷26《郭淮传》。

[35] 《晋书》卷56《江统传》。

[36] 《三国志·魏志》卷6《李傕、郭汜传》。

[37] 《三国志·魏志》卷1《武帝纪》。

[38] 《晋书》卷25《阮种传》。

[39] 《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

[40] 《三国志·魏志》卷28《邓艾传》。

[41] 《晋书》卷56《江统传》。

[42] 《晋书》卷56《江统传》。

[43]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44] 《晋书》卷48《段灼传》。

[45] 《三国志·魏志》卷26《郭淮传》。

[46] 《文选》卷20。

[47] 《晋书》卷28《五行志》。

[48] 《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49]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50] 《资治通鉴》卷89。

[51]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52]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53]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54] 汉、赵等都有年号。前秦建立前，此处仿《资治通鉴》，一律使用东晋年号。

[55] 《资治通鉴》卷91作“与巴酋句徐、库彭等相结”。胡注曰：“句、库皆为姓，故句徐、库彭为两人，非一人。”

[56] 即仇池氐杨氏。

[57]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58]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

[59] 《资治通鉴》卷97。

[60]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61] 参见拙文《刘渊的“汉”旗号和慕容廆的“晋”旗号》，《北京师院学报》1974年第4期。

[62] 《资治通鉴》卷92；《晋书》卷86《张茂传》。

[63]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64]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第二章〗 前秦建国

第一节 枋头起兵

一、氐族苻氏的迁徙

前秦是由氐族中居住在略阳临渭（甘肃秦安东南）苻氏那一支建立的，它的奠基人是苻洪。

苻洪，亦名蒲洪，字广世，生于晋武帝太康六年（285），死于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史称“苻洪……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父怀归，部落小帅”[1]。《艺文类聚》卷82引《秦记》曰：“苻洪之先居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那么苻氏应该是由武都迁居略阳的。

苻氏何时迁居略阳临渭，史文不明。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所载苻洪第三子苻健出生时的若干细节，为猜测这一支迁徙的时间提供了线索：“（健）生之夜，洪梦族曾氏王苻建（健）谓之曰：‘是儿兴家门，可以吾名字之。’于是名罴，字世健。”[2]史籍所见叫作苻建（健）的氐王只有青龙四年（236）奔蜀的一个。如果他确实是苻洪的族曾祖，那么苻氏这一支应是青龙四年（236）由武都迁到临渭的。与苻氏同迁的还有强氏和吕氏。至苻洪出生时，这一支在临渭已有50年了。

苻洪是个善于观察和利用形势、很有才干的氐族豪酋。12岁时父亡，他继任部落小帅，开始磨炼统率部落的能力。“好施，多权略，骁武善骑射。”《太平御览》卷121还说他“好学”。他青年时代正值永嘉之乱的混乱时局，瞬息万变的形势，苻洪不甘寂寞，“乃散千金，召英杰之士访安危变通之术”，被宗人蒲光、蒲突及周围氐豪们推为盟主，“戎晋襁员奔之”[3]，成为当地一股不小的势力。

汉国大乱，刘曜称帝于长安，立足未稳，苻洪便想利用这支力量纵

横驰骋，为此拒绝了刘曜的册封，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氐人虽以“勇憨抵冒”著称于世，但他们的大部分在汉魏以来就被逼迁关中，此时落入刘曜的股掌，在历史上氐人也没有过统一的“王”。所以苻洪在略阳虽有一定的势力，想和刘曜较量，力量之悬殊又为人皆知。在蒲光等人的逼迫下，苻洪只好归顺刘曜，受封宁西将军、归义侯。大兴二年（319），苻洪及其所属被刘曜移置于长安西南方的高陆（陕西高陵），进位氐王。

咸和三年（328），刘曜在洛西为石勒生俘，其将军蒋英、辛恕等拥众十余万投降石勒，关中大乱，苻洪乘机统部西保陇山。次年，石虎在上邽（甘肃天水）歼灭前赵残余势力，苻洪和羌酋姚弋仲同时归降。石虎以苻洪为冠军将军，监六夷诸军事、泾阳伯，“委以西方之事”。

石勒死后，后赵内讧，镇守关中的石生和洛阳的石朗联兵反对石虎，关中空虚。苻洪以为时机到来，拥众两万余户，自称晋平北将军、雍州刺史，西结据有凉州的张骏，起兵自立。孰料石生、石朗不堪石虎一击，苻洪兴风作浪的打算顷刻破灭，只好偃旗息鼓，再次投降石虎。在这次政治投机中，苻洪捞到了极大的好处：“虎迎拜洪光烈将军，护氐校尉。”苻洪取得了监护氐族的权力，成了氐族名义上的首领，所以当他献计石虎逼迁关中氐羌时，就敢于自诩：“诸氐皆洪家部曲，洪帅以从，谁敢违者！”[4]

关陇氐、羌时叛时降，石虎颇以为念。姚弋仲看中了这一点，进言“明公握兵十万，功高一时，正是行权立策之日。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洿先叛，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5]。对于石虎想逼迁秦陇氐、羌以加强控制的心理，苻洪揣摩得十分透彻，他比姚弋仲更积极，亲自赶到长安，建议大规模逼迁。此说正中石虎下怀，包括氐、羌在内的秦雍地区十余万户被逼迁关东。苻洪大得石虎宠信，加官龙骧将军、流民都督，率部居于枋头（河南浚县西南）。从日后苻洪枋头起兵时，手下有南安、安定、冯翊、京兆、天水等地的氐、羌来看，此时苻洪所统已不只略阳一地的氐、汉人民，他确实是一个受后赵册封的氐族最高首领了。

苻氏这一支在枋头一住就是18年，直到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才在苻健的统领下打回关中。

氐、羌迁居关东后，后赵始终把他们当作主要军事力量使用。咸康

四年（338），石虎击溃辽东鲜卑段部，随即大规模用兵前燕。苻洪参与是役，以功拜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冠军大将军，封西平郡公。下属受封为关内侯者达20余人[6]。永和四年（348），苻洪第三子苻健又受命攻打东晋的竟陵（郡治今湖北潜江西南）。可以肯定的是，在镇压梁犊起义以前，苻氏所参与的战争绝非这几次，否则苻洪绝对不能成为后赵统治集团中手握“强兵五万”[7]的主要将领。

永和五年（349），雍城（陕西凤翔）爆发了梁犊领导的起义，在关中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起义军斩将破关，鼓行而东，后赵亲王纷纷溃散，石虎只有依靠姚弋仲和苻洪这两支力量了。在镇压梁犊起义中，苻洪因功擢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秦雍诸军事、雍州刺史，晋爵略阳郡公，势力又有所发展。与此同时，苻洪和后赵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了。

二、枋头起兵

永和五年（349）四月，暴君石虎在梁犊起义的震慑下，在内部的权势之争中惊怖而死。石虎晚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荡下十分激烈，政变时有发生，石虎太子石邃和石宣都因政变未遂而被杀。石虎一死，斗争更激烈，短短的七个月便三易其主。在位最短的是石世，仅33天，时间最长的石遵也仅183天，最后石鉴登上帝位，大权落入石虎养孙大将军冉闵之手。次年初，冉闵杀石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

冉闵是利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仇杀上台的。石虎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已十分尖锐，冉闵的民族仇杀使中原民族矛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后赵的残余势力虽然拥石虎之子石祗称帝于襄国（河北邢台）、但在这种激烈的震荡下，庞大的后赵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了。当时，后赵汝阴王石琨据冀州（治今河北衡水冀州区），抚军将军张沈据滏口（河北临漳），建义将军段勤据黎阳（河南浚县东南），刘国据阳城（河南内黄西北），段龛据陈留（河南开封东），姚弋仲据滠头（河北枣强东北），苻洪据枋头，杨群据桑南（桑干河南）。他们各自拥众数万，互相角逐，联此攻彼，或自立，或称臣于晋，中原又是群雄割据，混战不已。自永嘉之乱以来就有据辽东的前燕，乘机打着晋旗号推进中原，偏安南方的东晋也试图利用这个形势北伐。当时的中原，正如《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所言：“自季龙末年而（冉）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

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在这场大混乱中，首先从营垒中分裂出来称臣东晋，利用东晋的影响捞到最大好处的便是苻洪。

永和五年（349）五月，石虎死后不到两个月，苻洪就在枋头起兵反赵了。苻洪起兵的导火线是石遵罢免苻洪秦、雍都督，雍州刺史的官职，不许他到关中赴任。

当石鉴由河内（河南沁阳）起兵扑向邺城（河北临漳西南）争夺帝位时，恰值姚弋仲、苻洪等镇压了梁犊起义之后东返。他们途中相遇，苻洪等立刻表示：“殿下长且贤，先帝亦有意以殿下为嗣。正以末年惽惑，为张豺所误。今女主临朝，奸臣用事，上白（今河北威县境内）相持未下（时乞活军数万与后赵太尉张举相持于上白），京师宿卫空虚。殿下若声张豺之罪，鼓行而讨之，其谁不开门倒戈而迎殿下者！”苻洪本意是想借拥戴之功进一步扩张权势，没有料到，石遵杀了石世，登上皇位，便接受了冉闵的建议：“蒲洪，人杰也；今以洪镇关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国家之有，此虽先帝临终之命，然陛下践阼，自宜改图。”[8]回到关中是苻洪梦寐以求的夙愿，如此结局，难免怒火中烧，苻洪赶回枋头，起兵反赵了。其实，苻洪之所以如此，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从苻洪对前、后赵时降时叛的经历不难看出，他归附石虎，实出无奈。在梁犊起义的打击下，后赵飘摇欲坠，空虚已极，他的实力则有较大增长。现在内乱又起，无疑是自立的极好时机，苻洪岂能轻易放过。

其次，石虎的统治十分残暴，敲骨吸髓地压榨各族人民，大兴宫室，掳掠民妇，大规模的徭役无休无止，又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等。苻洪对此大为不满，强硬地对石虎说：“臣闻圣主之驭天下也，土阶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驭海内也，倾宫琼榭，象箸玉杯，截胫剖心，脯贤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国、邺宫，足康帝宇，长安、洛阳何为者哉？盘于游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为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尚书朱轨，纳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将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阴阳灾沴，暴降霖雨七旬，霁方二日，纵有鬼兵百万，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笔何！其如四海何！”[9]苻、石之间在统治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分歧。很显然，在苻洪的心目中，石虎只是一个残酷的亡国之君。道

不同，不相与谋，苻洪绝对不愿成为这个行将覆灭的政权的殉葬品。

最后，苻洪才识不凡，几个儿子大都与他类似。三子苻健“勇果便弓马，好施，善事人”；少子苻雄“善兵书而多谋略，好施下士，便弓马，有政术”。其他几个儿子怎样，史文不明，不敢妄言，但冉闵对他们有一个总的评价：“其诸子皆有非常之才。”苻氏父子文武全才，有着笼络人心的家风，大概是时人公认的。随着苻洪实力的增强，石虎的猜忌也与日俱增：“季龙虽外礼苻氏，心实忌之。”[10]在石虎周围，想除掉苻洪的人实在不少。深受石虎宠信、野心勃勃的冉闵更是把苻洪看成眼中钉，非除之而后快，早在咸康四年（338）就建议石虎：“蒲洪雄俊，得将士死力，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强兵五万，屯据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11]极受石虎崇敬的大和尚佛图澄也说“苻氏有王气”，劝石虎早日除之。《晋书·苻洪载记》及《资治通鉴》卷96说石虎听了这些话后，对苻洪“愈厚”。其实这仅是石虎的伪装，《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的记载比较贴近实际：“虎阴欲杀之！”之所以没有下手，原因有二：一是“惮其强”。二是在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后赵军事力量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少数民族豪酋的向背，与后赵的存亡休戚相关，处置不慎，不仅氐族难以控制，还会激起其他少数民族豪酋的连锁反应，前赵就不乏这类实例。

石虎的心态，苻洪早就有所察觉，为免意外，他往往“称疾不朝”[12]，不过几个儿子仍相继为石虎所暗害。三子苻健是因为“善事人”，博得石虎父子的欢心，才被作为人质留居邺城。少子苻雄则因为年幼，才保住了性命。苻洪的死对头冉闵在石虎死后扶摇直上，位居辅政，拥有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头衔，手操生杀大权，早晚要拿苻洪开刀。既然如此，苻洪岂能不反。

苻洪起兵，无疑是对后赵的一大威胁。但石虎诸子忙于争夺帝位，无暇外顾。当石鉴登位后，立刻发布苻洪为关中都督、征西将军、雍州牧，想利用苻洪贪恋关中的心理，促使苻洪离开枋头，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但此时苻洪对关中已不感兴趣，只想利用后赵内乱争王争帝。因此，当其主簿程朴提出“与赵连和，如列国分境而治”的建议时，苻洪勃然大怒：“吾不堪为天子邪，而云列国乎！”[13]斩杀了程朴。可是善于揆度形势的苻洪并没有贸然称帝，而是遣使东晋，讨得了东晋给予的氐王、使持节、征西大将军、冀州刺史、广川郡公等一大堆头衔。之所以如此，是与下述情况密不可分的。

其一，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汉族人民的反抗相当强烈。后赵末年，连僧侣胡进也感叹“胡运将衰，晋当复兴”[14]了。所谓“晋当复兴”，并非指东晋真能一统天下，它仅是表明人心思晋的情绪炽烈而已。一些野心家都想利用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这种情绪扩张实力，甚至连冉闵也想利用东晋的政治影响。精于打算的苻洪岂能不知个中利弊。苻洪的枋头旧部虽以氐人为主，却是一个戎晋混合集团。在实力尚欠时，只有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本集团中汉人的心态，才能裹胁他们共同反赵。

其二，在梁犊起义的打击和内乱的冲击下，后赵衰弱下去了，但其残余势力仍不可小视。当时能置后赵及冉闵于死地的是东晋和前燕。东晋方面发布殷浩为扬州刺史，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摆出北伐的架势；前燕则打着东晋的旗号筹措由辽东推进河北。晋军真的出动，枋头是扑向邺城的必由之路。若苻洪自立，势必成为东晋和后赵残余势力夹击的对象，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接受东晋的封号，既能解除来自东晋的威胁，集中力量对付后赵，又能利用晋的政治影响，名正言顺地蛊惑汉族人民，扩张实力。一箭双雕，苻洪何乐而不为。

苻洪此举果有成效。被后赵掳掠到司、冀二州的数百万各族人民，纷纷向故土回奔。枋头是秦雍人民西归的通道，苻洪又有晋旗帜作为号召，实力迅速扩大到十万人左右。此时，后赵石苞的部将麻秋在冉闵的命令下统部支援邺城，途经枋头，投降了苻洪，苻洪的实力又有所增强。[15]

苻洪想打回关中，姚弋仲也想打回关中。姚弋仲是一个以“英毅”著称，“唯以收恤为务，众皆畏而亲之”[16]的很有才干的羌族豪酋，实力与苻洪不相上下。他也知道称臣于晋利多弊少，可是苻洪已捷足先登，他若效尤，再出兵攻打，便师出无名，于是干脆以后赵忠臣自居，企图在歼灭苻洪后再作打算。[17]永和六年（350）正月，姚弋仲命其子姚襄统众五万扑击苻洪，双方鏖战的结局是姚襄大败，三万余众被击杀。

苻洪早有称王称帝之心。他在西征梁犊时，司马、号称“博学有雄才，明天文图谶”的京兆霸城人王堕就建议：“谶言苻氏应王，公其人也。”[18]所谓谶言，指的是当时流传甚广的“艸付应王”。苻洪对王堕的建议“深然之”。击败姚襄，姚弋仲实力大伤，后赵残余势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已被摧垮，其余各支便不在话下，苻洪飘飘然了，认为“中州可

指时而定”，对博士胡文说：“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枋头旧部为了争当佐命元勋，纷纷劝进：“今胡运已终，中原丧乱，明公神武自天，必继踪周、汉，宜称尊号，以副四海之望。”[19]苻洪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宣布改姓氏为“苻”，以应天命。他以南安羌酋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安定梁楞为前将军领左司马，天水赵俱、陇西牛夷、北地辛牢为从事中郎，氐酋毛贵为单于辅相，抛开了西进的打算，决心在中原建立政权了。

麻秋是一个颇具野心的军阀，自诩“用兵于五都之间，攻城略地，往无不捷”[20]。他之所以归顺苻洪，不过是伺隙夺取这支军队的权宜之计。苻洪称王后，进展并不顺利，麻秋抓住时机进言：“冉闵、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乱未可平也。不如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然后东争天下，谁敢敌之。”[21]此话颇有道理，当时苻洪强敌环伺，或分或合，个个欲置他于死地。没有牢固的后方，要想消灭他们谈何容易。一语惊醒梦中人，苻洪对麻秋信任有加，亲赴麻秋营帐宴饮。这年三月，也就是苻洪称三秦王不到两个月的时候，被麻秋酒中下毒杀害，终年66岁。临死前，遗言苻健：“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苻健在关中立国后，追尊苻洪为惠武帝，庙号太祖。

第二节 前秦建国

一、苻健开国

苻健，字建业。生于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死于前秦皇始五年（355）。健本名罴，初字世健，因避石虎外祖父张罴之讳，遂改名健，改字建业。在后赵，他历任翼军校尉、镇军将军，实际上是作为人质留居邺城（河北临漳西南）的。苻洪于枋头（河南浚县西南）起兵，他斩关夺路，奔归枋头。苻洪归晋，东晋亦发布苻健为假节、右将军、监河北征讨前锋诸军事、襄国公。苻健是苻洪幸存诸子中最年长者。苻洪死后，苻健成了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他击杀麻秋，遵照苻洪遗言，积极筹措入关。

后赵末年，关中形势瞬息万变，十分复杂。

石虎死时，关中是其子乐平王石苞的天下。石虎诸子为争夺帝位纷争不已，石苞亦想染指，计划统军东下邺城。不料行事欠妥，消息外流，关中人民闻讯，纷纷暗结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要他乘机收复关中。司马勋闻风而动，连破赵军，推进到距长安只有二百来里的悬钩，命将军刘焕为前锋，直趋长安，“于是关中皆杀季龙太守令长以应勋”[22]。石苞只得暂时收起东归的打算，部署反击。其实司马勋是个胆小鬼，他的进攻完全是虚张声势，得知石苞反击，便在悬钩观望不前。此时石遵刚登上皇位，正想控制石苞，消灭竞争对手，便以此为借口，命车骑将军王朗统精骑两万入关，劫持石苞，押送邺城。司马勋误认为王朗是冲他而来的，立刻兵退梁州，于是关中落入王朗之手。永和六年（350），王朗奉冉闵之命，开赴洛阳。王朗司马杜洪留镇长安。

杜洪早有自立之意，王朗一撤，他便自称晋征北将军、雍州刺史，以冯翊、张琚为司马。杜氏自魏晋以来就是关中的名门大族，有相当大的影响，张琚又以“勇侠”知名。他们占领关中政治中心长安，又用东晋的名义相号召，一时间“戎夏多归之”[23]，一跃成为关中地区“因赵之成资，据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锐，藉陆海之饶”[24]的割据势力，成了苻健入关的障碍。

苻健是一个很有头脑、富于谋略的氐族首领，为确保入关的成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首先，苻健深知，他若入关，必能得到关中氐、羌

的支持，但汉族人民的向背难以预料。此时此刻，人心思晋，关中亦无例外。只有利用晋的名义，才能号召各族人民，减少入关的阻力。为此，他“去大都督、大将军、三秦王之号，称晋官爵，遣其叔父（苻）安来告丧，且请朝命”[25]。此举关键是“且请朝命”，用意在于揭露杜洪是一个冒牌货，只有他才是东晋正式授命的地方军政大员，从而在政治上完全压倒杜洪。其次，冉闵杀死石鉴称帝于邺后，后赵残余势力姚弋仲、石琨、张贺度等又支持石祗称帝于襄国，“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26]，势力仍然很大。为了笼络苻健，石祗发布苻健为都督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兖州牧、略阳郡公。苻健欣然接受，“伪受石祗官”，以石祗所授名义任命赵俱为河内太守，戍温（河南温县）；牛夷为安集将军，戍怀（河南武陟西北），负责招集流民事宜，并且下令“缮宫室于枋头，课所部种麦”，“有知而不种者，健杀之以徇”。对于后者，苻健用心甚深，可谓大张旗鼓。此举用意有三：借此缓解后赵残余势力的挤迫。借助后赵残余势力牵制冉闵，使冉闵不敢贸然进攻，从而争取时间，从容部署入关。表明自己无入关之意，麻痹杜洪，以便突然袭击关中。

永和六年（350）八月，苻健准备就绪，发布武威贾玄硕为左长史，略阳梁安为右长史，段纯为左司马，辛牢为右司马，京兆王鱼、安定程肱、胡文等为军谘祭酒，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倾巢出动，鼓行而西。苻健以鱼遵为先锋，先期到达孟津（河南孟津东北），在黄河上搭起浮桥。全军安然渡过黄河后，苻健便兵分两路：偏师七千由其兄子扬武将军苻菁统领，自轵关（河南济源西北）打向河东，沿轵道进逼关中；一路由其弟苻雄为先锋，领兵五千，直扣潼关，自率主力，继苻雄推进。

苻健此行，矢志必得。他破釜沉舟，大军一渡河，即刻焚毁河桥，悲壮地激励苻菁：“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杜洪闻讯，即以张先为征虏将军，率众一万三千奔赴潼关。两军激战于潼关北面，张先兵败，退还长安，关中门户大开。

苻健夺取潼关后，遣使修笺，携带名马珍宝，向杜洪表示，此行是为劝进而来。杜洪岂能再次上当，“币重言甘，诱我也”，尽发关中之众拒敌，“劲士风集，骁骑如云”[27]。

面对如此强敌，能否取胜，苻健亦颇犹豫。他寄希望于上苍的保佑，战前搞了一次占卜，得到的是“遇泰之临”。这是一个吉兆，苻健胆气大壮，对众宣布：“小往大来，吉亨。昔往东而小，今还西而大，吉孰大焉，诸君知不？此则汉祖屠秦之机也。”[28]士气也被激励起来了，苻健挥军进击，杜洪大败，退据长安，内部发生了分裂，其弟杜郁率部投降了苻健。

苻健为求稳扎稳打，没有直接对长安发动攻击，先遣苻雄略定渭北，屯据高陵（今属陕西）的氐酋毛受、好畤（陕西乾县东）的徐磋、黄白（陕西三原北）的羌酋白犊等纷纷斩杀杜洪使节，起兵响应。渭北阴槃（陕西临潼北）一战，生擒杜洪大将张先。苻菁、鱼遵一路也相当顺利，“所至无不降者”。三辅尽数为苻健所有，长安成了孤城。杜洪、张琚估计不敌，弃城逃奔司竹（陕西周至东南），关中首府终于为苻健所有。为表示效忠晋室，苻健遣使报捷东晋，修好东晋征西大将军、荆州都督桓温，收得“秦、雍夷夏皆附之”[29]的效果。这年十二月，苻雄又兵出上邽（甘肃天水），斩杀后赵凉州刺史石宁。

关陇已经在手，称臣于晋的目的已达到，再无利用的必要。永和七年（351）正月，在属下的拥戴下，苻健南面称尊，自立为天王、大单于，建国号为“大秦”，年号为皇始，奠都长安。[30]为区别历史上其他以“秦”为号的朝代和政权，史称“前秦”。苻健立妻强氏为天王后，子苌为太子，余子皆封为公；“以苻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领车骑大将军、雍州牧、东海公；苻菁为卫大将军、平昌公，宿卫二宫；雷弱儿为太尉，毛贵为司空，略阳姜伯周为尚书令，梁楞为左仆射，王堕为右仆射，鱼遵为太子太师，强平为太傅，段纯为太保，吕婆楼为散骑常侍”[31]。在这一张名单中，氐羌豪酋，特别是氐族豪酋占有绝对的优势。苻雄等并不满足于公的封号，更反对苻健模仿后赵称天王的做法，一再建议应该称皇帝。皇始二年（352）正月，苻健又在太极殿举行了称帝大典。为了表示皇帝是一统天下之主，大单于只是统帅百蛮之主，苻健把大单于的称号让给了太子苻苌。

前秦建国了，在其影响下，后赵残余势力中盘踞并州的张平、荥阳（河南荥阳东北）的高昌和李历、许昌（河南许昌东）的张遇等相继归附。前秦的势力拓展到了并州和河南的许、洛之间，但苻健在关陇的政局却不甚稳定。

杜洪和张琚退避司竹后，便向晋梁州刺史司马勋求救。皇始元年

（351）四月，司马勋乘苻健立足未稳之机，提兵三万，扑向秦川，擒杀前秦尚书赵琨。

司马勋来势汹汹，苻健被迫御驾亲征，驻扎五丈原（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屡次摧败司马勋，迫使司马勋退还汉中。

司马勋一退，杜洪、张琚势孤力单，退屯宜秋（陕西泾阳境内）。皇始二年（352）正月，张琚击杀杜洪，自称秦王，建元建昌，署置百官。苻健乘其内讧，提兵两万，一举消灭了这个心腹之患。但不久，前凉将军张弘和宋修会同王擢，统步骑一万五千，杀向了前秦西境。苻雄和苻菁被迫统军抵御。

王擢本是后赵西中郎将，屯驻秦陇，后赵末年投降东晋，盘踞陇西郡（郡治今甘肃临洮西南）。皇始二年（352）王擢被苻雄击败后投奔了前凉的张重华，被张重华任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专门用来袭扰前秦。龙黎一战，苻雄生俘张弘和宋修，王擢逃归姑臧（甘肃武威）。是年五月，他又统领两万步骑扑向上邽（甘肃天水），前秦陇右郡县大都响应，秦州刺史苻愿兵败，退回长安。苻雄、苻菁只好统兵四万驻防陇西。双方尚未交手，一场更大的祸乱却因苻健对张遇的处置不慎在长安周围爆发了，苻雄匆匆回师。

张遇本是后赵豫州刺史，后赵末年称臣东晋，实质上是割据许、洛的一个军阀。皇始元年（351），东晋殷浩和谢尚北伐，张遇眼看难以维持割据，背晋降秦，被苻健拜为征东大将军、豫州牧。皇始二年（352），谢尚兵进许、洛，张遇告急长安，苻雄、苻菁统兵两万驰救，乘机略地关东。许昌附近诫桥一战，晋兵损折一万五千有余，退向淮南。苻雄等估计许、洛一带难以巩固，张遇又桀骜难驯，乃迁张遇和河南五万余户于关中。给了张遇一个司空的名号。张遇后母韩氏相当娇美，苻健一见，心动难止，收为昭仪，并“每于众中谓遇曰：卿，吾子也”。张遇本来是想仰仗前秦维持半独立的状态，没想到有此下场，便在次年暗中结纳黄门侍郎刘晃和关中豪杰，商定在夜晚由刘晃打开宫门，张遇率领亲信突进，一举诛杀苻氏，假借东晋的名义割据关中。事有凑巧，就在他们密定举事的那天，刘晃被苻健支出公干，张遇扑空，事发被杀，与张遇勾结的关中豪强见事已暴露，干脆举兵，硬干一场。一时间，孔特据池阳（陕西三原西）、刘珍和夏侯显据鄠（陕西西安鄠邑区）、乔景（《资治通鉴》卷99作“乔秉”）据雍城（陕西凤翔西）、胡阳赤据司竹、呼延毒据霸城（陕西西安东），拥众数万，遣使东晋，向

桓温和殷浩呼救，把苻健闹了个手忙脚乱。

这年十一月，苻雄镇压了池阳的孔特。十二月，苻法斩杀鄠县的刘珍和夏侯显。次年初，胡阳赤兵败后投奔了呼延毒，坚守霸城，等待东晋的援兵。此事尚未了结，危及前秦生存的战事又扑过来了，这就是东晋桓温的北伐。

二、苻健击退桓温

桓温，谯国龙亢（安徽怀远西龙亢集）人，性格豪爽，慷慨有志，体态魁伟，民族意识强烈。他的才干在东晋权贵中数一数二，此时任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司雍益梁宁六州都督、荆州刺史。永和三年（347），他曾溯江而上，一举击灭了割据益州四十六年的成汉政权。后赵末年，北方大乱，他数次奏请北伐。东晋权贵害怕桓温功高难制，千方百计予以阻拦，把北伐大权交给了外戚褚裒和书生殷浩。褚裒才短智浅，胆小如鼠，永和五年（349）代陂一战，丧师两万，狼狈退据广陵（江苏扬州）。殷浩是一个热衷于吹枯嘘生的玄学名士，既乏政治才干，又无实战经验，只会搞些挑拨离间、行刺暗杀之类的小动作，结果众叛亲离，前锋倒戈，落得仓皇逃窜的下场。桓温乘机上奏弹劾，列数殷浩罪状，东晋被迫罢黜殷浩，把经略司州的任务即北伐的重任交给了桓温。[32]就在这一年，关中爆发了孔特、刘珍等人的祸乱，对桓温来说，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皇始四年（354）二月，桓温总兵四万，杀奔关中。

桓温自江陵出发，水陆齐进。水军在襄阳入均口（湖北光化），在淅川（河南淅川县均水）与其步兵会合，循陆路急行一百七十里，仅在是年三月，就扣开了通向关中的门户武关（陕西丹凤东南），随即又分偏师袭击上洛（郡治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擒获前秦荆州刺史郭敬。主力则由桓温亲领，直趋青泥城（陕西蓝田东南，前秦蓝田县治），命其将顺阳太守薛珍统部急攻，一举摧垮前秦守军，夺下青泥。

桓温出动，考虑相当周详。当他在江陵调兵时，便下令司马勋兵出汉中，又遣使前凉，希望张重华出兵配合。

司马勋受命而动，兵出汉中，沿子午道推进，屯驻子午谷口（位于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距长安仅一百余里。

张重华不愿关陇有强敌存在，自前秦建立后，就视前秦为眼中钉，不断袭扰，并遣使东晋："长安膏腴，宜速平荡。臣守任西荒，山川悠远，大誓六军，不及听受之末；猛将鹰扬，不豫告成之次。瞻云望日，孤愤义伤，弹剑慷慨，中情蕴结。"[33]现在桓温兵进关中，他当然乐意配合。王擢率部再出，进攻陈仓（陕西宝鸡东），和桓温遥相呼应。

前秦三面受敌，形势十分危急。

这三支来军中，桓温显然是魁首，也是最大的威胁，阻止或击垮桓温，其余两路便可迎刃而解。所以，苻健暂时撇下司马勋和王擢，尽锐而出，由丞相苻雄统太子苻苌、淮南王苻生、平昌王苻菁和北平王苻硕等五万兵马，布防峣关（青泥城北七里），阻击晋军。四月，双方激战于峣关，苻生单骑突阵，来回冲杀，击斩应诞、刘泓等晋将十余人，晋军伤亡以千数。桓温有备而来，亲自督战，志在必得，终于压住了苻生的气焰。秦军不支，后撤白鹿原（青泥城西六里）。桓温弟桓冲紧追不舍，双方又激战于白鹿原。

桓温这次北伐，秦晋双方在白鹿原有两次激战。第一次是在挺进长安时，第二次在撤离关中时。第一次是苻雄和桓冲交战，第二次则发生在苻雄和桓温之间。有关第二次战局，诸史记载一致：苻雄胜。有关第一次战局，《晋书》各传记载甚多抵牾。《晋书·桓温传》曰："（苻）雄又与将军桓冲战于白鹿原，又为冲所破。"《资治通鉴》卷99与此同："将军桓冲又败秦丞相雄于白鹿原。"但《晋书·苻健载记》与此截然相反："健别使雄领骑七千，与桓冲战于白鹿原，王师败绩，又破司马勋于子午谷。"《晋书·桓石虔传》则曰："从温入关。冲为苻健所围，垂没，石虔跃马赴之，拔冲于数万之众而还，莫敢抗者。"这里前秦方面的兵力显然被夸大了，但可以看到，桓冲在白鹿原陷入了秦军包围之中，幸赖骁勇善战的桓石虔救援，才幸免于难。因此这一次白鹿原之战，应以《晋书·苻健载记》为准。

白鹿原之战虽没有重创晋军，却暂时阻遏了桓温的攻势。苻健抓住时机，调整了部署：苻苌退屯长安城南；苻健亲率老弱病残六千坚守长安小城，深沟高垒，作持久计；精兵三万划归雷弱儿等指挥，作为游军，配合苻苌，不断袭扰桓温，延缓晋军推进长安的速度。精骑七千则在苻雄的指挥下突袭子午谷口。司马勋大败，退避女娲堡，长安南面的威胁解除。但桓温还是节节推进，屯驻距长安只有二十里左右的灞上。

桓温这次进兵，所带粮草不多。他估计，进入关中恰值麦收时节，可“取以为军资”[34]。不料苻健老谋深算，内乱未平，又闻桓温整军杀来，先期“收麦清野以待之”。一旦桓温野无所掠，粮运不济，必然军心瓦解，不堪一击。桓温恰恰坠入苻健算计之中。

就桓温来说，本来是力求速战速决，谁知他推进灞上后反而犹豫起来。部将薛珍建议渡过灞水，直捣长安，桓温拒绝了。薛珍“以偏师独济，颇有所获”[35]，依然打消不了桓温的疑虑。

从军事上来看，桓温的犹豫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双方虽激战过数次，但桓温并没有消灭对方的主力，连重创都谈不上。前秦仍然游刃有余，既有力量阻击桓温主力，又可腾出手来南击司马勋。苻雄所部，忽来忽去，战斗力相当强。何况前秦占有地利之便，以逸待劳。晋军长途奔袭，连续作战，甚为疲惫，需要休整。此时河北、河南已为敌国前燕所得，桓温是孤军深入。冒险渡过灞水，万一有所闪失，后果不堪设想。但造成桓温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还是他这次进兵的目的和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东晋自建国起就苟于偏安，无心北伐。当朝权贵把维持皇族和各大士族以及各大士族彼此间的势力平衡作为基本国策。他们害怕北伐会打破这种平衡，因而不是反对，就是掣肘或破坏。东晋初年的历次北伐大都以失败告终，祖逖的北伐被迫在大好形势面前终止，就是这一国策的产物。桓温之所以能坐镇荆州，也是皇室和各大士族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在桓温出任荆州前，荆州本是颍川庾氏的天下，庾翼一死，以琅邪王氏为首的其他大士族为了阻遏庾氏，才商定以桓温为荆州刺史。不料桓温的野心极大，以“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到荆州，就把荆州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东晋朝廷的关系搞得极僵：“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他行事自专，往往是“拜表便行”[36]，根本就不待朝廷批准。他力主北伐，目的是借此立功立德，提高自己的声望，以便取晋而代之。所以东晋权贵们不愿把北伐的大权交给他。随着褚裒和殷浩北伐的失败，权贵们更不愿进行北伐了。划江自守的声浪高唱入云：“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37]他们当然更不愿意桓温在北伐中获胜。此等情状，桓温岂能不知。他远离汛地，万一有失，变生肘腋，就很可能会后退无路，怎能不瞻前顾后、虑之再三呢。

从政治上来说，桓温的犹豫不决应该说是最大的失策。关中人民对

东晋可谓一往情深，桓温屡战有胜，和关中人民的支持密不可分，“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38]晋军屯驻灞上，霸城的呼延毒和胡阳赤率万余人投奔而来，“三辅郡县多降于温”。日后在前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王猛，也“被褐而诣之”[39]。桓温迟迟不渡灞水，冷了关中父老的心。桓温有无决心击灭前秦？关中人民必须考虑。万一桓温掉头而去，积极支持者必将遭到酷烈的报复。久经战乱的关中人民对此深有体察，他们由支持转向观望了。

时日迁延，晋军粮草行将告罄，桓温焦虑万分，探询王猛的意见：“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仗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回答：“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40]此话可谓剔肉见骨，既触及了桓温的隐私，又道出了关中人民的心态。

时至六月，桓温再也支持不住了，为求万全，挥军后撤。苻雄衔尾紧追，比及潼关，九战九捷。桓温损兵一万有余，狼狈退回荆州。所得成果，只是裹胁到了三千余户人民而已。前秦方面损失较小，只有太子苻苌为流矢所中，身负重伤。

晋军一退，苻健全力对付司马勋和王擢。在苻雄的追击下，司马勋败窜汉中，王擢退避略阳（甘肃秦安东南）。接着，苻雄移兵雍城（陕西凤翔西），镇压在皇始三年（353）七月起事的乔景。苻雄这位在前秦建国及东征西讨中立有殊勋的丞相和统帅、苻健的左右手，在军中一病不起，死于前线。苻健为之哀痛欲绝，痛哭呕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夺元才（苻雄字）之速也。”直到八月，苻苌才镇压了乔景，关中暴乱全部平息。不过这年十月，苻苌也因伤势复发而死。

张重华虽屡遣王擢袭扰前秦，对王擢却戒心重重，特别害怕王擢反戈。在派人暗杀王擢失败后，干脆兴师问罪。王擢兵败，投降前秦。苻健以啖铁为秦州刺史，秦州又为前秦所得。

初建的前秦终于度过了一场大危机。

前秦之所以能逐步稳定下来，除了战略运用得当，有苻雄这样颇具才干的人才外，更与苻健入关后的各项措施有关。

苻健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统治者。如果说入关头一年局面稍稳是天公作美的话（“是年野蚕成茧，野禾被原，百姓采野茧而衣，收野粟而食，

关西家给人足”[41]），其后的屡摧强敌、平定内乱，则完全是他施政的结果。《资治通鉴》卷99载：苻健一入关便“分遣使者问民疾苦，搜罗俊异，宽重敛之税，弛离宫之禁，罢无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赵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苻健善于纳谏，对搜罗人才、保持较为清明的政治十分关切。皇始三年（353）十月，他特意下诏：“其令公卿已下岁举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秀才、异行各一人；或献书规谏，或面陈朕过，其速以闻，勿惧（拘）贵贱。”[42]初建的前秦呈现出人才济济的景象。《晋书·苻生载记》有一张前秦官员名单，除宗室外，大都是苻健从枋头旧部中提拔或入关后延请来的：“其耆年硕德，德侔尚父者，则太师、录尚书事、广宁公鱼遵；其清素刚严，骨鲠贞亮，则左光禄大夫强平，金紫光禄程肱、牛夷；博闻强识、探赜索幽，则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黄门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权智元方，则左卫将军李威，右卫将军苻雅；才识明达，令行禁止，则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特进、光禄大夫强汪，侍中、尚书吕婆楼；文史富赡，郁为文宗，则尚书右仆射董荣，秘书监王飏，著作郎梁谠；骁勇多权略，攻必取，战必胜，关张之流，万人之敌者，则前将军、新兴王飞，建节将军邓羌，立忠将军彭越，安远将军范俱难，建武将军徐盛；常伯纳言，卿校牧守，则人皆文武，莫非才贤……济济多士，焉可罄言！”这一名单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苻坚治秦及统一北方的得力助手。苻健统治时，吏治是较为清明的。

对于恢复经济，安定民生，苻健尤为注意。他倡导节俭，减轻人民负担，遇有灾荒，就“蠲百姓租税”。自己“减膳彻悬，素服避正殿”，表达了愿与百姓共度灾荒的意愿。前秦初建，百废待兴，军国开支巨大。与前、后赵肆意掠夺和征发百姓不同，苻健不搞大规模的宫殿建筑，减轻赋役，力图通过边境贸易来增加收入。皇始三年（353），苻菁攻占上洛（郡治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苻健利用其位处秦晋交界、有丹水和洛河之便的区位优势，在丰阳（陕西山阳）设置荆州，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为刺史，专门“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不久又在长安平朔门设置来宾馆“以怀远人”，效果极佳，“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

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是没有疑义的，但这绝不是说各地之间没有经济往来。秦汉统一国家的出现，固然得益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但纽带和基础却是各地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东汉中叶以来，自然经济色彩更为浓郁，但各地经济的联系仍是各地区经

济发展和各割据政权赖以自存不可或缺的条件。三国时，蜀汉急需南中的军用物资，仰仗蜀锦与魏、吴进行过境贸易，解决军国开支，是众所周知的。即使在魏、吴之间，边境贸易也相当频繁，并不因政权敌对而中止：“初，吴之未平也，（周）俊在弋阳，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弋阳如此，沔中也不例外，蔡珪给其弟蔡敏的信曰：“闻疆场之上，往往有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43]乃至西晋时吴方主将陆抗和晋方主将羊祜也只好在“增修德信”“怀柔初附”的幌子下，听凭“二境交和”及“使命交通”[44]。十六国时期亦无例外，连远在河西走廊的前凉，也利用朝贡的名义，保持与中原和东晋的经济往来。较为明智的人士则利用互市筹措军国开支，祖逖就曾这样做过。《晋书·祖逖传》曰：“石勒……求通使互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苻健走的也是这样的道路，而且政策要宽得多，不但互市，还鼓励商人的往来。他这样做，显然与氐族有“贪货死利”的传统、深知商业的重要性有关。自战国以来，封建政论家及政治家大都提倡重农抑商，并且两汉以此作为经济领域中的基本国策。作为一国之君的苻健，能突破这个传统的藩篱，把“通关市，来远商”作为恢复关中经济、解决军国所需的重要国策，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在这一点上，一代名主苻坚亦颇为不如。

饱经后赵剥掠之苦的关中人民遇上这样的政策，当然会感触良深。他们在民族意识的支配下，对东晋一往情深，回到现实，又不难做出比较。《晋书·苻健载记》收录了这样一段神话：“新平有长人见，语百姓张靖曰：‘苻氏应天受命，今当太平，外面者归中而安泰。’问姓名，弗答，俄而不见。新平令以闻，健以为妖，下靖狱。会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监寇登得一屐于河，长七尺三寸，人迹称之，指长尺余，文深一寸。健叹曰：‘覆载之中何所不有，张靖所见定不虚也。’赦之。”所谓长人之类，显然荒唐虚诞，但关中人民在苻健的统治下看到了“太平”“安泰”，又是显而易见的。桓温发出“三秦豪杰未有至者”的感叹，看来是有其深刻根源的。

击退桓温以后，苻健又与关陇“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进一步整治关陇。在苻健的治理下，“关右称来苏焉”。就在前秦蒸蒸日上、生机盎然的时候，皇始五年（355）六月，苻健病死于太极前殿，终年39岁[45]。其子苻生即位，谥苻健为明皇帝，庙号世宗，后改为高祖。

第三节 苻生的统治

一、击灭姚襄

苻生，字长生，苻健第三子，生于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死于前秦寿光三年（357），生下来就只有一只眼睛，长大以后“力举千钧，雄勇好杀，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46]。这位勇冠三军的猛将，在击退桓温的进攻中立有殊勋。鉴于生理缺陷，不为其母所爱。苻苌死后，其母强氏主张立少子晋王苻柳为太子，苻健以“谶言三羊五眼应符”，遂立为太子。健死，生即位，改元寿光（355）。以母强氏为皇太后，妻梁氏为皇后，吕婆楼为侍中、左大将军，苻安为太尉，苻柳为征东大将军，苻廋为镇东大将军。擢升嬖宠太子门大夫赵韶为右仆射，太子舍人赵诲为中护军，著作郎董荣为尚书。往日与他交好的卫大将军苻黄眉晋封广平王，前将军苻飞为新兴王。

寿光二年（356）二月，苻生遣使者阎负和梁殊到前凉，经过一场舌战，迫使凉王张玄靓称藩，封张玄靓为大都督、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

寿光三年（357），苻氏的死对头、羌酋姚襄统五万余户杀进关中，前秦又面临了一次外来的威胁。

姚襄是姚弋仲的第五子，史称他“雄武多才艺，明察善抚纳，士众爱敬之”，“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其长史王亮吹嘘姚襄“英略盖天下”[47]，其父姚弋仲则认为他才略“十倍于（冉）闵”[48]。其实，这都是夸大其词，姚襄的军事才干相当平庸，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胜仗。有一点较实在，姚襄善于抚纳，推诚对待部下，极受士卒爱戴，甚至连刺客也为其真诚感动，不忍下手，告实而去。因此姚襄虽然屡战屡败，部属却散而复来。他之所以能成为姚弋仲的嗣子，也是属下一再请求才确定的。

永和六年（350），姚襄为苻洪击溃，父子两人纠集部众，仍然支持后赵残余势力石祗。皇始元年（351），冉闵击灭石祗，姚弋仲仿照苻洪，称臣于晋，姚襄亦蒙加官晋爵的殊荣。皇始二年（352），姚弋仲死，姚襄统部六万余户由滠头（河北枣强北）向南转移，屯于碻磝津（河南兰考东），与前秦军队相遇，一场激战，损折三万有余。继而在

荥阳（河南荥阳东北）和洛阳之间的麻田又为秦将高昌和李历所败，几乎全军覆没。幸赖其弟姚苌以马相授，后援续至，才统余部窜到谯城（安徽亳县）。是年六月，他在晋安西将军谢尚的节制下进攻许昌，又为苻雄和苻菁大败，两万人马，丧亡一万五千，辎重尽失。姚襄窜回淮南，在芍陂（安徽寿县南）屯田积谷，训练士卒，扩张实力，与晋扬州刺史、中军将军殷浩不断发生摩擦。皇始三年（353）十月，殷浩以姚襄为先锋，进军洛阳。行至山桑（安徽蒙城东北），姚襄突然倒戈。殷浩损军万余，辎重仪仗尽为姚襄夺取。自此，姚襄在盱眙（安徽盱眙北）招徕流民，部众扩展到七万余。

江淮地区羌族的势力极小，姚襄在此无发展的可能。姚氏集团是以陇西羌酋及汉族豪门为核心组成的，他们期盼打回老家重振雄风，裂土称霸。皇始五年（355）五月，姚襄尽众北向，占有许昌。寿光二年（356）又挺进洛阳。七月，当姚襄与冉闵残余势力在洛阳相持时，桓温开始了第二次北伐。洛阳城南伊水一战，姚襄崩溃，率余部万余人由北芒山西窜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在匈奴堡击溃前秦平阳太守苻产。姚襄乘胜挑战，击杀苻产，尽坑其众，占领了号称襟带黄河、汾水，翼蔽潼关、洛阳的晋南重镇平阳。姚襄势力略有恢复，便遣使苻生，声称借道，实质是企图偷袭关中。苻生想稳住姚襄，遣使封拜。姚襄不为所算，斩杀使者，兵进河东，镇守并州的前秦大将军张平受命讨伐。姚襄打了一个大败仗，却利用张平急欲自立称王的野心，卑辞厚礼，和张平握手言欢，结为兄弟，取得了休整和进一步扩张的时机。

寿光三年（357）四月，姚襄全力西进，“遣姚兰、王钦卢等招动鄜城、定阳、北地、芹川诸羌胡”[49]。一时间，部众又恢复到五万余户，精兵两万七千余人，推进到了黄洛（陕西三原东北），长安又蒙受威胁。

苻生令卫大将军苻黄眉统带平北将军苻道、龙骧将军苻坚、建节将军邓羌等一万七千余人阻击。姚襄声势虽大，却是乌合之众，屡屡败北，士气不振。为此深沟高垒，避免决战。邓羌向苻黄眉建议：“伤弓之鸟，落于虚发。襄频为桓温、张平所败，锐气丧矣。今谋固垒不战，是穷寇也。襄性刚很，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直压其垒，襄必忿而出师，可一战擒也。”[50]苻黄眉即令邓羌以骑兵三千在寨外百般挑战，当时有个叫智通的和尚力劝姚襄保存实力，厉兵收众，等待时机。但自视颇高的姚襄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又想一战而有关中，声言“二雄不俱立，

冀天不弃德以济黎元，吾计决矣”[51]，尽锐出击。邓羌佯败，引诱姚襄追杀。到达三原（陕西三原东北），邓羌回战，苻黄眉及苻坚率伏兵四起，击杀姚襄，全歼其众。姚襄弟姚苌、谋士权翼统余部投降了前秦。

二、苻坚政变

苻生虽然勇冠三军，但在被立为太子前，只是一个普通亲王，权势和地位都不高。先天的生理缺陷使他在幼年时便饱受讥刺和嘲弄，祖父苻洪甚至要杀他。幸赖叔父苻雄救援："儿长成自当修改，何至便可如此！"[52]把他保全下来，成年后处境并无多大改变。在前秦上层统治集团中，苻生既无威信，又无党羽。他之所以能成为太子，纯属偶然，后族方面并没同意，时间又极短。这些情况凑在一起，注定他即位以后面临着十分艰难复杂的局面。

在我国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病危时或死亡后，政局往往不稳，甚至出现巨大的动荡，这几乎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不可避免的弊病。十六国时期诸少数民族政权都是这样的政体，且立足未稳，动荡也就更大。苻生即位前后，政变屡屡发生。

皇始五年（355）六月，苻健病危，在前秦开国过程中功勋显赫、经常独当一面且此时位居都督中外诸军事高位的苻菁以为苻健已死，提兵进攻东宫，想杀苻生自立。幸赖苻健尚有一口气在，强自支撑，登上端门，惊散苻菁部众，政变才告流产。时过数日，苻健便死了。

寿光三年（357）五月，又发生了苻黄眉的未遂政变。苻黄眉是击灭姚襄的统帅，号称"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厘百工，出能折冲万里"[53]的卫大将军，本是苻生密友，但不满苻生的封赏，乃密结王公亲贵，欲取苻生而代之。奈何机密泄露，苻生先发制人，苻黄眉被杀灭族。

苻黄眉的政变被镇压了，薛瓒和权翼又极力敦促苻坚早日发动政变："今主上昏虐，天下离心，有德者昌，无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业重，不可令他人取之，愿君王行汤武之事，以顺天人之心。"[54]这段话表明，这时密谋政变的集团相当多，不过苻坚得以成功，夺得了帝位。

苻坚，字永固，又字文玉，小名坚头，生于东晋成帝咸康四年（338），死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苻雄的嫡长子。苻健入关

时，拜苻坚为龙骧将军。苻雄死后，苻坚袭爵东海王。史书称苻坚幼年时聪明机灵，极善应对，“每侍洪侧，辄量洪举措，取与不失机候”[55]，极得其祖欢心，逢人便夸耀：“此儿姿貌瑰伟，质性过人，非常相也。”苻坚的胆子相当大，敢于戏石虎于宫前天街。后赵光禄大夫、司隶校尉徐统以“知人之鉴”闻名于世，见此亦颇惊异：“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儿敢戏于此，不畏司隶缚邪？”苻坚答曰：“司隶缚罪人，不缚小儿戏也。”所以徐统也不得不说“此儿有霸王之相”。过后不久，徐统又密对苻坚曰：“苻郎骨相不恒，后当大贵，但仆不见，如何！”从日后苻坚亲祭徐统墓来看，此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大概就在这时，苻坚心中开始种下了问鼎九五的种子。据说苻坚八岁时向其祖提出“请师就家学”，长大后“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56]苻坚是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富有才气和谋略的一个人。

苻坚之所以成功政变，关键是有李威等人为其筹划。“侍中太尉李威……字伯龙，汉阳人。苟太后姑子，少与苻雄结刎颈之交。苻生屡欲诛坚，赖威之免，坚深德之，事威如父，诛苻生及（苻）法，皆威与太后潜决大谋。”[57]苻生怎样“屡欲诛坚”，史文不明，李威则被时人称作“雄毅厚重，权智无方”。苻坚生母苟氏也非等闲妇女，她为苻坚即位编造了一系列的神话，诸如她是在漳水旁西门豹祠中祈子，梦与神交才怀孕的，苻坚出生时“有神光自天烛其庭”，苻坚小时“背有赤文，隐起成字”[58]等，借以蛊惑人心，邀结党羽。在他们的指使下，苻坚曲意结交了御史中丞梁平老，侍中、尚书吕婆楼，特进、光禄大夫强汪等。击灭姚襄后，又收罗了薛瓒和权翼。这两个失意的汉族士大夫既蒙抬爱，当然甘效犬马之劳，成为苻坚政变的出谋划策者，力促苻坚早日发动。梁平老等也急于充当佐命元勋，进言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怀异志，燕、晋二方，伺隙而动，恐祸发之日，家国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图之！”[59]但苻坚羽翼未丰，又怕苻生勇猛，不敢贸然行事。

苻坚处事虽密，迁延不决，难免泄露。长安城中歌谣四起：“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苻坚爵居东海王，官居龙骧将军，府第在洛门东面，这支歌谣暗示苻坚即将发动政变。苻生只是从“鱼”字考虑，鱼能食蒲，误认为侍中、太师、录尚书事鱼遵要政变，诛其全家。长安城中又流行起一支讥刺苻生判事不明的歌谣：“百里望空城，郁郁何青青。瞎儿不知法，仰不见天星。”太史令康权也借天象警告苻生：“将有下人谋上之祸。”[60]即便如此，苻生也没有悟到苻坚兄弟要发动政变。但在这些歌谣面前，苻坚已是如坐针毡了。他求计于吕

婆楼。吕婆楼守成有余，应急无能，闻言心惊肉跳，不过却推荐了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仆，刀镮上人耳，不足以办大事。仆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谋略不世出，殿下宜请而咨之。”苻坚急求吕婆楼引见，两人一见，宛若生平，“语及时事，坚大悦，自谓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也”。[61]极有可能他们在这一次便商定了收买苻生左右侍婢、随从，抓住苻生嗜酒如命的特点，利用他昏醉不醒的机会下手等计划。寿光三年（357）六月夜晚，苻坚得到宫女密报，命其兄苻法及梁平老、强汪统领死士数百人潜入皇宫正南的云龙门，苻坚和吕婆楼则统三百余人鼓噪直进，里应外合，杀进苻生寝殿，苻生犹酣醉未醒。

苻坚废苻生为越王，旋即杀之，谥厉王；苻坚自称秦天王，即位于太极殿，改元永兴（357）；调整了统治班底，命其亲信掌握了军、政、机要部门及京师治安大权；发布大赦令，追尊被苻生杀死的公卿大臣，以礼改葬，优叙其子孙，借以安定人心；遣使巡行州郡，宣扬其威德。

苻坚政变成功了，盘踞并州的张平却借机闹起事来。

张平，原后赵大将，并州刺史，后赵末年据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六郡之地，拥众十余万户，在当地三百余坞堡的支持下，成为一方割据势力。皇始元年（351），张平归顺苻健，拜大将军、冀州牧，摇摆于前秦和前燕间，从中渔利。他本想借姚襄入关扩张，没想到姚襄很快就全军覆没。苻坚政变，他认为时机已到，是年七月遣使降晋，借东晋的名头拜置征、镇，署置百官，想与燕、秦对峙北方。十月，张平进攻前秦。此时苻坚政变未久，内部亟待整顿，故命晋公苻柳为并州刺史、都督并冀诸军，据蒲坂（山西永济西蒲州镇）有利地形坚守。永兴二年（358）二月，苻坚亲征，以邓羌统精骑五千为先锋，屯军于汾河之西。张平养子张蚝统军挑战，双方相持十余天，不分胜负。张平企图一举击垮苻坚，尽众出击。张蚝“多力矫捷，能曳牛却走；城无高下，皆可超越”[62]。其一马当先，突入秦阵四五次，勇不可当。苻坚爱才，下令能活捉张蚝者，必予重赏。鹰扬将军吕光奋勇冲击，枪伤张蚝；邓羌跃马追杀，生擒以献。张蚝被捉，张平军队士气一落千丈。张平见大势已去，宣布投降。这年秋末，张平又叛秦降燕，直到甘露三年（361），前秦才彻底解决张平，稳定了河东及平阳一带的统治。

三、历史冤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学论著中，凡涉及苻生，都认为他是十六国时期的著名暴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淝水之战的性质展开争论，持苻坚发动淝水之战是统一战争或正义战争论点的一些同志，更把苻生说成死有余辜的罪人。应该说，这些学者并非绝无根据，今存有关苻生的资料，如《十六国春秋·前秦录》《魏书》《晋书》《资治通鉴》等莫不把苻生说成暴君，其中尤以《晋书·苻生载记》为最。概括起来，内容如下。

第一，喜怒无常，嗜杀成性。苻生“幼而无赖”，长大后“雄勇好杀”，即位后“杀戮无道，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临朝辄怒，惟行杀戮。”“左右或言陛下圣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斩之。或言陛下刑罚微过。曰：‘汝谤我也。’亦斩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杀之，流其尸于渭水。”“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手段之酷烈，前所未有，“至于截胫、刳胎、拉胁、锯颈者动有千数”。

第二，不孝，不敬天地祖宗，不从礼教，蔑视人伦。“虽在谅暗，游饮自若”。对天老爷的谴告置若罔闻。杀戮舅氏，气死生母。“遣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甚至路遇“兄与妹俱行者”，也“逼令为非礼”，为此天怒人怨。[63]

第三，嗜酒误事。苻生“耽湎于酒，无复昼夜。群臣朔望朝谒，罕有见者，或至暮方出……动连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寝。纳奸佞之言，赏罚失中”。更有甚者，苻生竟以杀戮逼迫与宴群臣“无不引满昏醉，污服失冠，蓬头僵仆，生以为乐”。

结果可想而知，“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情危骇，道路以目”[64]。前秦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最后，撰修《晋书》的唐初诸公对苻生下了这样的结论：“长生惨虐，禀自率由。睹辰象之灾，谓法星之夜饮；忍生灵之命，疑猛兽之朝饥。但肆毒于刑残，曾无心于戒惧。招乱速祸，不亦宜乎！”[65]前述诸史大体与此类似，情节、用语不如《晋书》强烈而已。

但是苻生虽死，却难盖棺定论。他是否暴君，历来就有争论。现今所见最早提出疑义的是东魏史学家及文学家杨衒之，在其传世名作《洛

阳伽蓝记》卷2《城东》中，借一个自称生于晋武帝在位年间、已经二百余岁、名叫赵逸的隐士之口曰：

> 自永嘉以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符（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符（苻）坚自是贤主，贼取君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亦有同感，在其《史通》卷7《曲笔》中曰：

> 昔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厚诬！

此时有关前秦的资料及传闻尚多，刘知几之言，当有所据。可惜《史通》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写作体例决定他不能对具体事例一一进行驳辩，所以只有结论而不见实例。上述言论，足以发人深省。说苻生是暴君，恐难令人信服，理由如下。

其一，今存有关苻生的资料是在苻坚大检史官篡改历史，经过极度扭曲后才保存下来的。关于这件事，《魏书》和《晋书》都有记载。《魏书·苻健传》较简单："坚观其史书，见母苟氏通李威之事，惭怒，乃焚其书。"《晋书·苻坚载记》则较具体："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似乎这是偶然的，其实是苻坚蓄谋已久的一件事。众所周知，苻坚好名，处处想与历史上的明君圣主相媲美，为此不惜沽名钓誉。最典型的是建元十四年（378）退还大宛所献汗血马那件事。退马时，苻坚自诩可与汉文帝并论，下令群臣大作《止马诗》。一时间，群臣献诗者不下四百余人。胡三省不无讥刺地说："反（返）则反之，何以作诗为哉！此亦好名之过也。"[66]他弑主篡位，在封建社会是罪不容诛，国人皆可讨之。时人如何评说，史家如何书写，事件能否流芳百世，苻坚岂能不煞费苦心检查呢？但即位之初，他不能。因为政变虽然成功，能否登上皇位还未定。《晋书·苻坚上》曰："坚及母苟氏并虑众心未服，难居大位。"苻坚惺惺作态，请其庶兄苻法出来做皇帝。苻法无此胆量，又是庶出，坚决推让："汝嫡嗣，且贤，宜立。"苟氏乘机"泣谓群臣曰：'社稷事重，小儿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诸君。'群臣皆顿首请立坚"[67]。明明早有野心，蓄谋已久，偏偏演这么一出戏，根本原因在于苻坚即位并非人心所向。正由于此，苻坚即位，不敢称帝，而是降号"天王"。苻

法的话透露出如果他不是庶出，也是要做皇帝的，何况他又“长而贤，且得众心”[68]。这就引起苻坚的疑忌，所以政变不久，苻坚就杀了苻法。这真是一场鲜血淋淋的最高统治权的争夺战。建元十年（374），苻坚的处境已今非昔比。在此期间，前秦国势蒸蒸日上，统治已经巩固，先后击灭了前燕，取得了东晋的梁、益二州，声望犹如日至中天。这时，苻坚有恃无恐，兴师动众，重修的起居注、实录、国史之类，能不竭力丑化苻生，把苻坚的政变描绘成扶大厦于将倾、救生灵于水火的壮举和义举吗？

今天，有关前秦初期，特别是苻生那时的史料，稀少得可怜。但在今存诸史及若干资料残片中还能找到一些美化苻坚、丑化苻生或矛盾抵牾的实例。这正是篡改历史所留下的遗痕，不妨略举数例。

第一，苻雄长得极丑：“雄丑形貌，头大足短，故军中称之为‘大头龙骧’。”苻坚酷似乃父：“头大重……身长……足短……”他小名坚头，就是由此而来的。车频《秦书》直率地说“此儿状貌甚丑”[69]。《太平御览》的编纂者们干脆把这父子二人归入“丑丈夫”的行列。能被《太平御览》这个栏目收录的人物相当少，苻坚父子能荣列其中，相貌如何当可知。但在《晋书》里，这个丑丈夫却成了“骨相不恒”“姿貌瑰伟，质性过人，非常相”的人物了。

第二，《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都说苻生把杀人武器、刑具备置左右。《晋中兴书》却说这是苻健的特点：“苻健凶暴，露刃张弓，锥、钳、锯、凿，杀人之具备置左右。”[70]一经篡改，这件事便张冠李戴了。哪怕诸史记载无误，苻生也只是继承了其父的衣钵。

第三，《魏书·苻健传》载，前秦初年的核心人物之一贾玄硕被苻生所杀。《资治通鉴》卷99说是苻健杀的。究竟谁杀，别无佐证。《资治通鉴》记叙有根有源、合情合理，似乎应以《资治通鉴》为准。

第四，《资治通鉴》卷100对苻生即位就改元持肯定的态度，并引群臣奏议曰：“未逾年而改元，非礼也。”议主段纯也由此被杀。《晋书》却说“改年寿光，时永和十二年（356）也”。尽管仅差一年，苻生的这一罪名就难以成立，至少成了疑案。这正是篡改历史时在细枝末节上的疏漏，极可能苻生没有即位就立刻改元。

第五，皇始四年（354），全国性天灾，三麦颗粒无收。《宋书·五

行志》曰："至关西亦然。"次年，灾害更重，"蝗虫大起，自华泽至陇山，食百草无遗。牛马相啖毛，猛兽及狼食人，行路断绝"[71]，诸史所载略同。按天命思想，这笔账应该算在苻健头上，妙就妙在笔锋一转，全成了苻生之罪，而且离奇古怪："时猛兽及狼大暴，昼则断道，夜则发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兽杀七百余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为害滋甚，遂废农桑，内外凶惧。"这成为苻生毫无敬天保民思想的一大罪证。

上述内容不足以说明苻生的本来面目，但它却说明今存有关苻生的资料，是经过极度扭曲后保存下来的，不可深信。

其二，苻生杀人，事出有因。被苻生杀死的亲贵权臣确实不少，粗略统计，有毛贵、王堕、梁楞、梁安、段纯、辛牢、雷弱儿、鱼遵、强平、康权、程延、程肱等，还有他的皇后梁氏。这些亲贵权臣可分为两类：一是后族，《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后，（梁）安之女孙。"梁楞亦应属后族。《资治通鉴》卷100曰："（毛）贵，后之舅也。"《晋书·苻生载记》曰："平即生母强氏之弟也。"一是强宗，如羌酋雷弱儿和氐酋鱼遵等。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其中，前八人是苻健临死前任命的辅政大臣："（皇始五年）六月……甲申，健引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受遗诏辅政。"同时苻健又嘱咐苻生："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看来苻生杀这些人，是遵循了其父的遗命。司马光对此大惑不解，议论曰："顾命大臣，所以辅导嗣子，为之羽翼也。为之羽翼而教使剪之，能无毙乎！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72]其实也容易理解，只要看一看下面所述汉国以来直至前秦建国的历史，就不难明白个中奥秘了。

前已阐明，自汉国建立单于台起，单于台所统六夷就是汉赵等国军事力量的核心。六夷酋帅大都手握兵权。苻洪、苻健称过大单于，并以"氐酋毛贵为单于辅相"[73]。苻健称帝后，因皇帝是一统天下之主，"单于所以统一百蛮，非天子所宜领"[74]，把这个名号授给了太子苻苌。因此，前秦初期同样是实行胡汉分治的，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既要利用六夷酋帅，又对他们抱有巨大的戒心。因为这一时期时局的动荡，大都和六夷酋帅的向背有关。苻洪和苻健就是以六夷酋帅的身份保存实力，积聚力量，最后打回关中，建立前秦的。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不对此留个心眼呢。

苻洪、苻健虽然野心勃勃，但对称帝华夏，心理上是怯懦的。如当苻坚“请师就家学”时，苻洪就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75]他们在建立政权、巩固统治上更缺乏经验，遇到对其称王称帝持有异议者，处置十分简单：杀！

苻洪杀程朴前已叙述，苻健杀贾玄硕同样相当典型。苻健入关后，官任左长史的贾玄硕建议仿照刘备故事，先称大单于及秦王，暂缓称帝，苻健闻言，怒火中烧：“岂堪为秦王邪！”[76]所说的话和乃父苻洪一模一样，不久借故杀了贾玄硕。程朴和贾玄硕对苻氏绝无二心，在苻氏集团中地位十分显要。[77]他们的建议不乏合理的因素，这两个人万万没有料到会有如此下场。苻健父子也不认为是错杀，还把它看成宝贵的经验，临终前的遗言，实质就是向苻生传授这个经验。

《资治通鉴》卷100记述苻坚政变冲入苻生寝殿时，“生犹醉寐，坚兵至，生惊问左右曰：‘此辈何人？’左右曰：‘贼也！’生曰：‘何不拜之！’坚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斩之！’”生动地描绘出苻生酣醉若痴的情状，又透露出苻生自视至高无上的心态。苻生固然不知道怎样才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却醉心于这一政体，但是他面临的情况却又相当复杂。

首先，苻健入关，虽然致力于治，但因忙于对付内乱外患，无暇顾及政权建设。前秦初期，机构、体制及各项制度极不健全。纲纪不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就难以确立。枋头旧部居功自傲，强宗豪右肆意妄为，氐族亲贵横行不法，“二天子”[78]处处可见。也就是说，这个政体并没有确立起来。

其次，先天的生理缺陷使苻生自小就饱受嘲弄，其祖父也曾当众嘲笑他：“吾闻瞎儿一泪，信乎？”左右哄然而应：“然。”即位后并无多大改变。为了说明苻生残暴，《晋书·苻生载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既自有目疾，其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亲贵权臣们不断嘲弄苻生的状况。亲贵权臣对苻生做皇帝非常不服，有的“大言于朝”，有的以“国士”自居，视苻生的亲信如“鸡狗”，根本不把苻生放在眼里，苻生和他们的关系也极僵。苻生即位伊始，中书令王鱼就借口天象，预言三年中“国有大丧”，直截了当地向苻生提出了“惠和群臣”的要求。时过半年，强太后之弟强平又对苻生进行了人身攻击，要苻生“务养元元”“爱礼公卿”“弃纤介之嫌，含山岳之过”“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

泽”。说白了，就是要苻生尸位素餐，听凭公卿大臣攻击谩骂，横行不法。这和苻生唯我独尊的心态是多大的反差。

几种情况凑在一起，政变便接连发生，密谋政变的集团之多，连苻坚都感到非得捷足先登不可。

在国无法纪的时刻，苻生要巩固权位，除了祭起其父传授的法宝外，是别无选择的。至于梁、雷等辅政大臣之死，更是别有原因。《晋书·殷浩传》载其北伐时，“潜诱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儿等，使杀健，许以关右之任……会苻健杀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阳西奔，浩以为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请进屯洛阳”。既有通敌之嫌，那是非死不可的了。梁后是梁安之孙，毛贵是梁后之舅，株连岂可避免。谈及气死生母，杀戮妻媵之类，则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皇后且然，更有何于妾媵？于是谓其所幸妻妾，少有忤旨便杀之，流尸于渭水矣。舅氏既诛，自可谓其母系忧恨而死……他如怠荒、淫秽，自更易诬。[79]

平心而论，苻生的业绩确实比不上苻健和苻坚。前者创业，使关中初安；后者堪称一代雄主。苻生在位仅两年，能耐再大，也干不出惊天动地的事来。但说他是暴君，未免有失偏颇。

《晋书·苻生载记》记述，面对祖父的嘲弄，苻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为尔不已，吾将以汝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惧……”众所周知，石勒是十六国时期杰出的羯族统治者，出身贫寒，早年曾被人掠卖为奴，起事初期，虽然杀掠过甚，日后却极善用兵。石勒军纪严明，所过之处，“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纵横驰骋，几乎统一了北方。在内迁少数民族统治者中，石勒首先采用封建制剥削方式统治汉族人民，剥削量比西晋减少了二分之一。石勒厘定户籍，重视农桑，招抚流亡，减轻人民负担，倡导节俭，禁止酿酒，使河北一带经济有所恢复，乃至“租入殷广”。石勒倡导汉文化，首先恢复九品中正制，局部调整了羯汉贵族间的关系，为少数民族和汉族权贵的勾结开了先例；石勒首先仿照汉族，改变羯族烝母报嫂的落后风俗，可以说是倡导汉化的先行者。鉴此，撰修《晋书》的唐初诸公也不得不承认石勒是“一时杰也”，发出“古之为国，曷以加诸”[80]的赞叹。苻生的言行表明，他自小就有强烈的自尊心，抱负甚大，以石勒为其效法的榜样。在讥刺和嘲弄面前，他没有气馁，没有虚度时光，青年时代就成了勇冠三军的猛将。

苻生登位后，既没有搞过大规模的巡行，也没有搞过一些以勇武见称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喜爱的狩猎活动，更没有主动挑起过战端。他和东晋、前燕及羌酋姚襄的战争，都是被迫应战的，而且都取得了胜利。如果说东晋耀武于河南，前燕称威于河北，对前秦尚不足以构成致命威胁的话，姚襄直逼畿甸，屯驻黄洛（陕西铜川南），距长安已经不远，应是一次致命的威胁。姚襄军事上虽然平庸，在民间却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资治通鉴》卷100说他被桓温打败后，“民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温军中传言襄病创已死，许、洛士女为温所得者，无不北望而泣”。姚襄并没有占领过洛阳，对许、洛士女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可见非同寻常。如此深得民心的一个人物，尽众入关，打回老家，志在必得，竟在苻生部署的一个反击下土崩瓦解，被消灭殆尽。这不是苻生登位初期，恰恰是苻黄眉和苻坚等发动政变的前夕，如果史籍所载前秦已到崩溃的边缘，岂能如此！

翻开东汉末年以来，特别是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到，军阀及各种割据势力的杀俘坑降可谓数不胜数，苻坚也这么干过。姚氏是苻氏争夺关中的死对头，双方已有多次较量。但苻生击灭姚襄后，既未杀俘，亦未坑降，相反以王礼埋葬姚弋仲，公礼埋葬姚襄，姚襄诸弟也成了前秦的臣民。如此举动，无非是为了维系人心。死敌尚且如此，岂能对侍从左右、自己的臣民动辄以杀呢？除了历史被篡改外，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事实说明，杨衒之所言苻生“仁而不煞”，绝非子虚乌有。

今存有关苻生的资料罗列了他大量罪状，却没有见过他大兴土木、穷奢极欲，更无片言只字涉及苻生改变了苻健哪些政策。也就是说苻生继续推行苻健安定民生、恢复经济、致力于治的各项措施。唯一作为苻生害民扰民的罪证只有一条：“生发三辅人营渭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以妨农害时，上疏极谏，生怒，杀之。”这样一个工程，非但不能和他同时代的刘粲、刘曜、石虎同日而语，就是和历史上的明君圣主，包括以仁恕爱民自诩的苻坚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更不用说渭桥的修建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有无积极作用的问题了。无怪乎苻生要对那些攻击愤愤不平了：“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业，君临万邦，子育百姓，嗣统已来，有何不善，而谤讟之音扇满天下！”阎负和梁殊在前凉权臣面前宣称“今上道合二仪，慈弘山海，信符阴阳，御物无际”，“主上钦明，道必隆世”，并非单纯的外交说辞。只是外交说辞，前凉也不会乖乖地称藩。因此，杨衒之所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也绝非毫无根据。尽管苻生的治典早就湮没无闻，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胡汉分治政策在苻生时被

废除了。因为自苻生起，就见不到大单于、单于左右辅、单于辅相之类的名号了。不管现今人们怎样评论胡汉分治，取消单于台，具有对胡汉一视同仁、密切胡汉关系的意味，符合民族融合的潮流，具有进步作用，则是没有疑问的。

毋庸讳言，苻生嗜酒，甚至临死前还要求苻坚在他醉后下刀。可酒又是氐族的共同爱好，苻洪、苻健、苻坚哪一个不是如此？苻坚也干过令群臣“极醉为限”[81]的傻事，何以独独成了苻生的一大罪状呢？

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苻生不重视人才。王猛声名早著，对于这样一个待价而沽、希遇明主的“一时奇士”，苻生听其“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夺”。开国元老吕婆楼、梁平老和强汪等都是王佐之才，苻生均未重用，都被苻坚拉了过去。苻生只信用赵韶、赵诲和董荣之类的东宫旧人。前二人不知怎样，董荣的特点是“文史富赡，郁为文宗”，没有济世之才，大概是个心胸狭窄、性高气傲的文人。他们专权弄势，挟私报复，所起作用，无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总之，苻生是一个自尊心极强、“仁而不煞”的氐族统治者，虽有不重视人才等问题，但绝不是暴君。

[1]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本节引述史料，凡不注出处者，皆引自该载记。

[2] 《太平御览》卷121。

[3] 《太平御览》卷121。

[4] 《资治通鉴》卷95。

[5] 《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6] 《晋书·苻洪载记》曰受封为关内侯者“二千余人”。此时后赵封赏不可能如此之滥，疑“千”为“十”之误。

[7] 《资治通鉴》卷96。

[8] 《资治通鉴》卷98。

[9]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10]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及附《苻雄传》。

[11] 《资治通鉴》卷96。

[12] 《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13] 《资治通鉴》卷98。

[14]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

[15] 《晋书·石季龙载记》曰："麻秋率众奔于苻洪。"《苻洪载记》则曰："冉闵之乱，秋归邺，洪使子雄击而获之，以秋为军师将军。"两说何者为是，不可考辩。这里是据苻洪甚信任麻秋做出的推论。

[16] 《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17] 姚弋仲对姚襄曰："我死，汝便归晋。"可见姚弋仲早有称臣于晋的打算。

[18]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附《王堕传》。

[19] 《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20] 《晋书》卷86《张重华传》。

[21] 《资治通鉴》卷98。

[22] 《晋书》卷37《济南王遂附曾孙勋传》。

[23]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本节所引史料，凡不注出处者，皆出于此。

[24]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25] 《资治通鉴》卷93。

[26]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

[27]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28] 《魏书》卷95《苻健传》。

[29] 《资治通鉴》卷98。

[30] 自此始，本书一律采前秦年号纪年。

[31] 《资治通鉴》卷99。

[32]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33] 《晋书》卷86《张重华传》。

[34] 《晋书》卷98《桓温传》。

[35] 《资治通鉴》卷99。

[36] 《晋书》卷98《桓温传》。

[37] 《晋书》卷80《王羲之传》。

[38] 《晋书》卷98《桓温传》。

[39]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40]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41] 《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42] 《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43] 《晋书》卷61《周俊传》。

[44] 《三国志·吴志》卷13《陆抗传》；《晋书》卷34《羊祜传》。

[45] 《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认为是49岁。若此说可信，苻健应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惜无佐证，故其生年从《晋书》。

[46]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本节引文凡不注出处者，皆出此卷。

[47] 《晋书》卷116《姚襄载记》。

[48] 《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49]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50]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51] 《晋书》卷116《姚襄载记》。

[52]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53]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54]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55]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56]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57] 《太平御览》卷122。

[58]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59] 《资治通鉴》卷100。

[60]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61] 《资治通鉴》卷100。

[62] 《资治通鉴》卷100。

[63]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64]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65] 《晋书》卷115史臣曰。

[66] 《资治通鉴》卷104胡注。

[67] 《资治通鉴》卷100。

[68] 《资治通鉴》卷100。

[69] 《太平御览》卷364、122、382。

[70] 《太平御览》卷347。

[71]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72] 《资治通鉴》卷100。

[73] 《资治通鉴》卷98。

[74] 《资治通鉴》卷99。

[75]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76] 《资治通鉴》卷99。

[77] 参见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78]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79]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10页。

[80] 《晋书》卷104、105《石勒载记》及卷107传论。

[81] 《资治通鉴》卷104。

〖第三章〗 前秦的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封建制的政权及仪制

一、中央机构

前秦的政权建设从一开始就模仿魏晋，但前秦是从后赵分裂出来的，又是在冉闵制造民族仇杀后不久建立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时刻。因此，前秦初建时，必然带有十六国初期的一些特色，最显著的一点是在最高统治者皇帝之下，除了设丞相、司空、太尉、太师、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监、中书令、太保、太傅之类的汉官外，还设立了大单于及单于辅相等，即实行胡汉分治。不过，前秦胡汉分治的时间相当短，在苻生统治时，大单于、单于辅相等名号就不见了。苻坚时，前秦的政权建设进一步发展，各级政权机构及职官承袭了汉魏以来的制度。

和魏晋一样，前秦的实权部门是尚书省和中书省。苻坚仿照西晋，并秘书省于中书省，位至开府的高级官员均设主簿、记室督之类的僚佐等。苻坚还仿照西晋实行五等爵制作为达官贵人功劳报偿的手段，甚至王国的僚佐亦和西晋一样，设郎中令、中尉、大农三卿，除郎中令由中央任命外，其余属官皆由亲王（苻坚降号为天王后，亲王皆降号为公）自行采辟。

前秦的职官和魏晋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自汉武帝设置内朝以来，丞相的权力被分割了，相权逐步削弱。东汉时，三公形同虚设，充其量只是荣誉职衔，尚书台成了大权独揽的部门。曹魏时设置的中书监、令，分割了尚书台的机要权，尚书省呈现出向行政机构转化的趋势，尚书令、仆和中书监、令都相当于宰相。因此，自东汉起就不再设置宰相。宰相、相国之类的名号只是在汉献帝时才一度恢复。魏晋时，宰相也非常设官职，时置时废，废的时候多，置

的时候少。史称："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其相国、丞相，或为赠官，或则不置，自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职。"[1]前秦的丞相基本上是常设官职，自前秦开国时苻雄为丞相起，先后有雷弱儿、王堕、苻法、王猛等出任丞相。苻丕和苻登时又有左、右丞相之分。如王永为苻丕的右丞相，窦冲为苻登的左丞相之类。他们的权力都相当大。苻雄"权侔人主"[2]；王猛"权倾内外""朝政莫不由之""专管大任""公卿以下无不惮猛焉"[3]。其他如司空、太尉，也都有相应的实权。

二、地方行政机构

前秦全盛时，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唯建康一隅未能抗也。苻坚分国内为司隶、雍、秦、南秦、洛、豫、东豫、并、冀等州。前秦的地方行政亦仿照魏晋，分为州、郡、县三级。除司隶设校尉外，州设刺史或州牧，郡设太守，县设令、长。秦汉以来，人户多的县设令，少的设长，估计前秦也不会例外。据清人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所载，前秦全盛时，分其统治区为二十二州、一百三十五个郡、八个护军、七百三十四个县。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又设置中郎将或校尉等分别治理。这类建置计有：

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辽宁朝阳），抚循鲜卑族。

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山西太原南），抚循匈奴等并州少数民族。

护赤沙中郎将，镇平城（山西大同），抚循乌丸及鲜卑等族。

西蛮校尉，镇五城（四川中江），抚循巴地少数民族。

护西羌校尉，镇姑臧（甘肃武威），抚循河西走廊少数民族及羌族。

护西夷校尉，镇成都（今属四川），抚循蜀地少数民族。

南蛮校尉，镇襄阳（湖北襄阳），抚循该地少数民族。

南巴校尉，镇垫江（四川合川），抚循南中少数民族。

西域校尉，镇高昌（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故城），抚循西域诸国。

西戎校尉，镇长安，抚循关中地区的少数民族。

上述中郎将或校尉，一般由刺史或州牧兼领，偶或有以太守兼领者，如《晋书·苻坚载记》曰："以谏议大夫裴元略为陵江将军、西夷校

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这个太守的官阶及地位高于一般郡守，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有必要就护军说几句。清人洪亮吉在《十六国疆域志》中，共罗列了八个护军，基本集中在司隶校尉部，它们是抚夷（陕西泾阳北）、铜官（陕西铜川南）、宜君（陕西榆林）、土门（陕西富平西北）和三原（陕西三原东北）；此外，在秦州（治今甘肃甘谷东）有勇士护军，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有云中护军，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有中田护军。实际上前秦的护军不止八个，《晋书·苻坚载记》中记有甘松护军（甘肃迭部县东），《资治通鉴》卷100中谈到略阳（甘肃秦安东南）有平羌护军等。由于资料残缺，前秦究竟设有多少护军，现今难有确数。

洪亮吉将护军作为县级建置看待，质诸史实，前秦的护军应比县级高。《晋书·苻坚载记上》及《晋书·乞伏国仁载记》有一些关于云中护军及勇士护军的记载，虽不足说明护军的全貌，多少可做参考。

云中护军：“时匈奴左贤王（刘）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云中护军贾雍遣其司马徐斌率骑袭之，因纵兵掠夺。坚怒……免雍官，以白衣领护军”。

勇士护军：“（乞伏）大寒死，子司繁立，始迁于度坚山（甘肃靖远境内）。寻为苻坚将王统所袭，部众叛降于统。司繁……乃诣统降于坚。坚大悦，署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

云中护军领户多少，我们不清楚。勇士护军领户相当多。《晋书·乞伏国仁载记》载，鲜卑乞伏部在西晋初年有“户五千”，后“部众稍盛”，吞并了“鲜卑鹿结七万余落”，其后击败鲜卑吐赖部及尉迟渴权部，“收众三万余落”。乞伏祁逕时，又击败鲜卑莫侯部，“降其众二万余落”。那么到乞伏司繁时，乞伏部该有十三万落左右。《资治通鉴》卷103对乞伏部的人数估计较低：司繁部落五万余皆降于坚。众所周知，魏晋以来，统户万数以上的县极少，即便在两汉，万户县的数量也不是很多。这里即使以《资治通鉴》为准，勇士护军也统五万余落，既然如此，封建政府恐怕不便设置县级机构或类似县级的机构进行治理。如果说勇士护军是以乞伏部为基础设置的，不足为凭，那么我们看一下关中地区。据《邓太尉祠碑》，冯翊护军治下，不算其他民户，仅“杂户”就有“七

千”[4]，所统民户应多于“七千”，当无疑问。《广武将军□产碑》则曰：“（抚夷抚军）统户三万，领吏千人。”仅就其所统人户而言，护军的地位也应高于县。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比一下魏晋以来郡县僚属的建置。《晋书·职官志》载，郡太守的僚佐有“主簿、主记室、门下贼曹、议生、门下史、记室史、录事史、书佐、循行、干、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书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员（重复处皆系原文，笔者不敢妄改）。郡国户不满五千者，置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则职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万户以上，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国皆置文学掾一人”。县的令、长的僚佐有“主簿、录事史、主记室史、门下书佐、干、游徼、议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书佐干、户曹掾史干、法曹门干、金仓贼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狱小史、狱门亭长、都亭长、贼捕掾等员。户不满三百以下，职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职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职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

这就表明：第一，魏晋时期万户以上的县非但极少，即使万户以上的郡也不普遍。第二，郡县的吏额大体在一百二十人以下，与护军的“领吏千人”，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第三，郡县均无资格设置司马为僚属。只有“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者，“骠骑已下及诸大将军不开府非持节都督者”，“三品将军秩中二千石者”，以及领军将军、中领军将军、抚军将军、中抚军将军才有资格设置司马为僚佐。魏晋之际，抚军将军“主武官选举，隶领军”，地位相当高。其中资深者称抚军，资浅者称中抚军，分别为三品或四品，其司马分别为六品或七品。云中护军贾雍的僚佐有司马，《邓太尉祠碑》和《广武将军□产碑》中冯翊护军及抚夷护军属下司马则有三人，护军普遍设置司马于此可见。前秦官制一切模仿汉魏，因此可以推断，各护军的长官应是类同于抚军将军或中抚军将军职级的官员，地位之高与州牧刺史无多大区别。所以一旦有军事行动，就可以给予“使持节、都督”[5]之类的名号。

较为清晰地判断前秦护军的建置，必须依据《邓太尉祠碑》及《广武将军□产碑》。[6]从这两块碑中，可以看到前秦的护军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有实际的辖地。

《广武将军□产碑》立于苻坚建元四年（368）。它是抚夷护军□产会同冯翊护军苟辅勘定双方治理的地界后立的。所以碑文中有“刊石（下缺四字）山为（下缺八字）方，西至洛水东齐定阳，南北七百（里），东西二百（里）”等语。该碑的碑额更有“立界山石祠”的题字，从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因而马长寿先生认为这块碑应按照《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1，命名为《立界山石祠碑》，才较为确切，马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第二，是军政合一的特有建置。

两块碑石中题名人数非常多，除去文字脱落无法辨认者外，可以确认冯翊及抚夷两护军的下属总计253人。按其官职，分属军事、行政及少数民族部落酋帅三个系统。

在军事系统内，计有将军22人。其中广威将军2人、建威将军4人、立义将军1人、宁远将军2人、鹰扬将军人数不明、无名号将军9人。其他为都统1人、司马3人、参军5人、蕇督1人、军监1人，此外还有军参事、军门下督、军功曹、军主簿、军录事、军功曹书佐等46人。《通典》晋官品记载，广威、建威、建节将军均为四品，立义、宁远、立节和鹰扬将军则是五品，扬威将军品级不明。军监若是“抚军监军”的话，也是四品。它反映了两位护军下属的将军中，均有品位较高者，无怪抚夷护军□产可以自诩统“大将三□”。如果四品可以号称大将的话，其余四个四品将军应属冯翊护军所统。前秦军事系统中，设有抚军将军及中抚军将军，但出任护军的主管长官则可以有别的名号，如冯翊护军的名号是建威将军，先后任抚夷抚军的则是广武将军和建忠将军。他们属下位至四品者不少，他们当然不可能低于四品。因此，他们的职级高于郡守、县令，当无什么疑问。

在地方行政系统内，有户曹3人、租曹2人、兵曹3人、法曹1人、主簿7人、贼曹3人、金曹2人、功曹4人、录事5人、参事5人、行事5人、里禁2人、书佐4人、功曹书佐4人、干4人、寺门3人等。

从护军所统的班底来看，完全可以确定，护军是军政合一的特有建置。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建置，又不同于地方行政建置。

第三，护军所辖主要是少数民族。

勇士护军专为治理乞伏鲜卑而设，这是没有疑义的。据《邓太尉祠碑》，冯翊护军下辖“军府吏属一百五十人，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鲜卑慕容部）、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可以断定，其辖治的主要是从各地逼迁来的少数民族。抚夷护军的记载没有冯翊护军那样具体，但《广武将军□产碑》的题名中，涉及属于少数民族“部大”“酋大”“大人”之类名号之多，非常惊人，可以确定为部大者计31人、酋大者25人、大人者4人。两位护军部属题名，据马长寿先生考证或推测后统计，少数民族超过题名总人数的84%。抚夷护军所辖与冯翊护军相同，于此可以确证。

需要注意，前秦在关陇以外设置护军均较晚，是随其统治地域的扩大而逐步设立的。如云中护军设于甘露元年（359），勇士护军设立于建元七年（371），中田及甘松护军设于击灭前凉之后。那么前秦初年的护军均设于关中。据今所知，冯翊有4个，北地有1个，距长安都相当近。初期护军集中于关中并具有上述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和前秦初年的胡汉分治密不可分了。自汉国实行胡汉分治后，六夷酋帅们都是有实地的。如后赵时苻洪之于枋头（河南浚县西南），姚弋仲之于滠头（河北枣强东北）。六夷酋帅治下的少数民族均保有原先的部落组织，既是当时汉、赵等国的军事主力，又从事生产，苻健“课所部种麦”便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它又是军政合一的特有建置。前秦初年同样掠徙少数民族（冯翊护军所统各少数民族均注明其原先的居住地便证实了这一点），置于单于台的统辖之下，当作主要军事力量来使用。曹魏时期曾在冯翊郡设立过抚夷护军，前秦废止胡汉分治后，就仿照曹魏的名称，设置护军统辖单于台所属的六夷。这样，大单于、单于辅相之类的名号虽然不见了，但其原有的特征都在汉魏官制的名称下保留了下来，这也表明前秦并没有放弃以少数民族丁壮为军队核心，这几乎可以说是十六国时期诸少数民族政权共有的特点，因此，才会出现“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7]的现象。这些被逼迁畿甸的鲜卑、羌、羯，保有其原先的部落组织，并分属长安周围的护军辖治。

前秦的护军制对后世颇有影响。众所周知，后秦等有军镇制，北魏初年则设镇都大将，后来又有捍卫平城的六镇。《魏书·官氏志》曰：“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但不治。”它的滥觞便是军坊制。这类建置的出现，与前秦的护军制有着渊源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它的演变和发展。

前秦地方行政最大的变动是在建元十六年（380）分遣宗人坐镇各方。伴随这一变化而来的是“新券主”及“世卿”之类的官职。有关于此，将在“淝水之战”一章中专门论及，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礼乐仪制

前秦的礼仪也都模仿魏晋。苻健称天王时，先在长安城南渭水之阳修筑祝告天地的祭坛，在城东修建宗庙社稷。称帝大典要在太极殿举行，为此稍违“卑宫”的意愿，修建了太极殿。苻坚即登位的首要大事是“礼神祇”，不久又起“明堂，缮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亲耕藉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永兴二年（358）苻坚巡视雍地（陕西凤翔南），仿照汉礼祀五畤，巡视河东，又祠后土。击灭前燕，苻坚特意赶到枋头（河南浚县西南），改枋头为永昌，“复之终世。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回到长安，又“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他要仿照汉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封禅泰山。淝水之战惨败后，苻坚又特意“告罪于其太庙”等。

前秦，特别是在苻坚统治时期，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仿照汉晋，标榜以孝治天下。史称苻坚及其弟融都“性至孝”[8]，苻坚一再下诏表彰“孝友忠义”。清河人崔悦在后赵末年任新平（治今陕西彬县）相时，为新平人所杀。苻坚灭燕，征崔悦子崔掖为尚书郎，崔掖表称父仇不共戴天，坚决不到关中做官，要求回到故乡冀州去。这正符合苻坚倡导的封建伦理纲常，为此他不惜颁布禁锢新平人、缺新平城角以示耻辱之类的诏令来表彰崔掖。百姓中凡犯有不孝罪者，必遭严惩。《太平御览》卷645收录了前秦的两则案例。其一为某百姓偷盗了母亲的钱财后逃窜，按刑律，罪不至死。可是当有司条奏上闻，太后大怒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当弃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方外岂无父母之乡乎！”遭到“轘而杀之”的惩处。其二为池阳县（陕西三原西）百姓惑于其妻之言，欲杀其母，未果，自己为刀伤而死。其母在邻居的协助下告官，官收其媳，条奏上闻，苻坚曰：“宇宙之内，乃有此事，将非怪乎！”判刑“轘而杀之”。

前秦从一开始就承袭了汉武帝以来的年号制。凡遇重大变故及祥瑞，都有改年号的举措，伴随改元，必有大赦。如永兴三年（359）六月，天降“甘露”，苻坚即改元，大赦天下。甘露三年（361）九月，“凤凰集于东阙，大赦境内，百僚进位一级”[9]，苻坚亲撰赦文。前秦统治

期间，计有8个年号：

皇始，苻健年号，公元351年至355年，凡五年，实际四年半。

寿光，苻生年号，公元355年至357年，凡三年，实际两年。

永兴，苻坚年号，公元357年至359年，凡三年，实际两年。

甘露，苻坚年号，公元359年至364年，凡七年，实际六年半。

建元，苻坚年号，公元365年至385年，凡二十一年。

太安，苻丕年号，公元385年至386年，凡二年，实际一年。

太初，苻登年号，公元386年至394年，凡九年。

延初，苻崇年号，公元394年，仅数月。

前秦礼乐文物之齐备，非但在十六国中堪称翘楚，即使以正统自居的东晋也望尘莫及。如皇帝乘坐的各种辇、舆及云母车之类，以及作为皇帝出巡使用的司南车、记里车等仪仗，东晋都不具备。东晋是在淝水之战后才在战利品中得到辇及云母车，东晋有指南车及记里车则在更后了。《晋书·舆服志》曰：“指南车，过江亡失，及义熙五年（409），刘裕屠广固，始复获焉，乃使工人张纲补辑周用。十三年（417），裕定关中，又获司南、记里诸车，制度始备。其辇，过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谢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坚于淮上，获京都旧辇，形制无差，大小如一，时人服其精记。”南燕及后秦之有上述仪仗，则也都获自前秦。

典礼所用的各部大乐，东晋更为阙如。《晋书·乐志下》曰：“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东晋建立太庙，筹备祭祀大典，尚书省指令太常条奏所用乐名。职居太常的贺循绞尽脑汁也交不了差，最后只有据实呈报：“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东晋无奈，下令“省太乐并鼓吹令”。这一大典，冷清至极，之后千方百计支撑场面，实际是“尚未有金石也”，“食举之乐，犹有未备”。东晋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弄到了一些乐器，因为无人懂得演奏，只能堆在库房里任其朽坏，皇家体面，扫地以尽。前秦则十分齐全，淝水之战，东晋虏获了前秦的乐工乐器，才把这一套涉及声誉体面的太乐建立起来。“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

四、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苻氏集团

前秦的政权建设之所以全部仿照汉魏，礼乐文物堪称当时之冠，与苻氏集团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如前所述，氐族是内迁诸少数民族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他们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互相往来，早就掌握了汉族的语言，与汉族大致相似的经济生活又决定了氐族较易接受先进的汉族文明。这一时期，内迁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过排斥汉文化的事件，但在氐族中极少见到。也就是说，氐族对吸收汉族先进文明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其中尤以苻氏集团为最。

前秦的奠基人苻洪说："吾年十三，方欲求师，时人犹以为速成。"[10]"时人"当是同居于略阳（甘肃秦安东南）的氐族豪贵。因此，这不但表明苻洪积极主动地接受汉文化，即便周围的氐族豪贵对此亦持赞赏的态度。应该说，这正是苻洪由一个部落小帅发展成拥有戎晋两万余户的一方势力，进而成为氐族政治领袖的基本原因之一。

苻洪到了枋头以后，设置"家学"抚育其子弟。《晋书·吕光载记》曰："光生于枋头……不乐读书，唯好鹰马。"吕婆楼是否亦设置家学教育其儿子吕光，这里并不明确，吕光幼年同样就学则相当明显。这应是枋头大多数豪贵们共有的行为，所以才会在后族中出现文才堪称时人之冠的梁谠和梁熙这样的兄弟。《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梁谠，字伯言。博学有俊才，与弟熙俱以文藻清丽，见重一时。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瑰文绮章。'"[11]

苻洪子孙汉文化的素养都相当高，史称其少子苻雄"少善兵书……有政术"[12]；苻坚弟弟苻融"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等推其妙速"[13]，苻融甚至能用《周易》中的一些辩证原理来断狱；苻坚的庶长子苻丕"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14]，《资治通鉴》卷100说他"有文武才干，但治民断狱，皆亚于融"；苻坚第五子苻琳"有文武才艺……至于山水文咏，皆绮藻清丽"[15]；苻坚的侄儿苻朗"有若素士，耽玩经籍，手不释卷"[16]；苻坚的族孙苻登同样是一个"颇览书传"[17]的统治者。

前秦开国之君苻健汉文化素养如何似乎不大明确，可是从苻融坚辞安乐王的封号时，苻健能说出"且成吾儿箕山之操"[18]这样的话来看，苻健对历史及典故也是相当熟悉的。

在苻氏家族中，汉文化素养之高，当首推苻坚。他八岁就请师读书，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博学多才艺”。他爱好诗赋，每遇吉庆盛典，几乎都要吟诗作赋，并令群臣唱和，亲自评判。《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苻坚宴群臣于逍遥园，将军讲武，文官赋诗。有洛阳年少者，长不满四尺而聪博善属文，因朱彤上《逍遥戏马赋》一篇，坚览而奇之，曰：‘此文绮藻清丽，长卿俦也。’”[19]苻坚熟悉经史，每有大的举动，必然引经据典，列举历史上的明君圣主自况。他倡导儒学，自诩追寻汉武帝和汉光武帝，要与他们相媲美。他力主吕光西征，说是效法两汉通西域的故事。他分遣宗人坐镇各地，说是效法西周。他发动淝水之战，说是仿照武王伐纣。即使是发动政变，也说是为了效法汤武革命。对于臣下违背其意愿的活动，苻坚同样引证历史典故给予解释和惩处。甘露二年（360），云中护军贾雍突然袭击匈奴刘卫辰部，纵兵抢掠，苻坚惩处贾雍时说：“朕方修魏绛和戎之术，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吴之战，事兴蚕妇；浇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扰边动众，非国之利也。所获资产，其悉以归之。”[20]翻开《晋书·苻坚载记》可以看到，前秦君臣之际的对话，几乎充满了历史典故，因此大多数语言都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

苻坚的历史知识相当丰富。永兴二年（358），苻坚为其用人制造舆论，借南游灞陵之机，对随从群臣出了一个历史题目：“汉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为首乎？”汉族士人权翼回答：“《汉书》以萧曹为功臣之冠。”苻坚指出：“汉祖与项羽争天下，困于京索之间，身被七十余创，通中六七，父母妻子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赖陈平之谋，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祸。二相何得独高也！虽有人狗之喻，岂黄中之言乎！”[21]在这里，可以看到苻坚的史识非同一般，也反映了他渴望罗致英豪为他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苻坚的经学造诣相当深。他曾“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君臣之际，也经常借助经义来评论时政得失。在上层集团中，对苻坚重用鲜卑慕容贵族普遍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建元九年（373），苻融借天象上奏苻坚：“臣闻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夏，跨有六州，南面称帝。陛下爰命六师，大举征讨，劳卒频年，勤而后获，本非慕义怀德归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劳旧，陛下亲而幸之。臣愚以为猛兽不可养，狼子野心。往年星异，灾起于燕，愿少留意，以思天戒。……《诗》曰：‘兄弟急难’，‘朋友好合’。昔刘向以肺腑之亲，尚能极言，况于臣乎！”苻坚答：“汝为德未充而怀是非，立善未

称而名过其实。《诗》云：‘德輶如毛，人鲜克举。’君子处高，戒惧倾败，可不务乎！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夫天道助顺，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22]

可以说，苻坚对于汉文化已达醉心的地步，正由于此，前秦政权建设及礼乐仪制才一仿汉魏。苻坚重用王猛整顿朝纲，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恢复经济等，也就成了必然之举。

总之，前秦政权固然有其自身的一些特色，但它是一个封建政权，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第二节 苻坚统治前期的政治

一、澄清吏治，强化中央集权

前秦在苻坚统治前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都达到鼎盛，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有规模气度、最富生气的一个政权。这与苻坚富有才干、胸怀“混合六一，以济苍生”的大志有关，更与他能信用王猛，放手让王猛施政有关。王猛对前秦走向鼎盛所起的作用，可以在他死后苻坚所下的诏书中得到反映。

> 朕闻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验也。往得丞相，常谓帝王易为。自丞相违世，须发中白，每一念之，不觉酸恸。今天下既无丞相，或政教沦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县，问民疾苦。[23]

这里有必要对王猛的情况及其政绩做一介绍。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山东昌乐西）人。生于东晋明帝太宁三年（325），死于苻坚建元十一年（375），终年51岁。他出身贫寒，曾“以鬻畚为业”。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后赵司隶校尉徐统引荐他为功曹，其时后赵已气息奄奄，日暮途穷，王猛当然不愿做这个行将灭亡的残暴政权的殉葬品。他逃避入关，隐居华阴（陕西华阴东南），“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桓温入关，封王猛为高官督护。王猛考虑到东晋门第森严，难展胸中抱负，同样拒绝了。王猛与吕婆楼交好，因吕婆楼的关系结识了苻坚。两人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对苻坚来说，固然是得到了和诸葛亮一样的“谋略不世出”的盖世奇才；对王猛来说，则是碰上了一位和刘备一样的明主。所以二人都把这一次见面看作“若玄德之遇孔明也”[24]。王猛积极参与了苻坚的政变，一出仕就位至中书侍郎，一年之中，连升五次，官至丞相、尚书令、中书监、太子太傅、司隶校尉、持节、常侍、将军，后又加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苻坚之下“权倾内外”的人，是苻坚改革整顿的积极有力的推行者。

当时，中国境内主要是东晋、前燕、前秦和前凉四个政权并立。桓温自进兵关中失败后，致力于在东晋争权夺利；前燕占有关东后，已不图进取；前凉则忙于应付内乱。客观环境为苻坚和王猛的改革整顿、致

力内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前秦初期最大的弊端是法制不明、纲纪不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没有真正确立起来。针对这类现象，王猛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建立各种典章制度，整顿纲纪。

王猛力主“治乱邦以法”，并以“肃清轨法”[25]自许，史称王猛执权后，前秦“典章法物靡不悉备”[26]。可以肯定，王猛执权期间为前秦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他任始平（陕西兴平东北）令时，“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豪强”，上任不久，就鞭杀了一个违法乱纪的官吏。王猛受任为京兆尹，下车伊始，收斩了以豪横著称、公然掠人子女财货的强太后的弟弟强德，史称“奏未及报，已陈尸于市；坚驰使赦之，不及”[27]。没过多久，王猛便诛杀和刑免了贵戚权臣二十余人。

王猛执法之严，连亲贵如苻融这样的人物也胆栗不已。苻融继王猛为冀州牧、都督六州诸军事后，在邺城（河北临漳西南）违纪建立学舍，相关部门据实弹纠，追查责任。苻融无奈，命其主簿李綦到长安代为申理。李綦估计此事难以善了，他没有能力完成苻融所交付的使命，半途忧惧而死。苻融只有苦苦敦请“清辩有智胆”、曾出仕过前燕尚书郎的高泰赴京说项。高泰声名鹊噪一时，王猛屡次征辟均为所拒。此时一见，王猛大喜过望：“高子伯（高泰字子伯）于今乃来，何其迟也！”殊不料高泰劈头一句竟是：“罪人来就刑，何问迟速！”王猛动容了，高泰侃侃而言：“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齐宣王以稷下垂声，今阳平公（苻融封爵）开建学宫，追踪齐、鲁，未闻明诏褒美，乃更烦有司举劾。明公阿衡圣朝，惩劝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28]一番说辞逼住了王猛，苻融违制事件才得以冰释。

第二，效法曹操“整齐风俗”。

有关它的具体内容，今存史籍中已无踪影，只留下了“整齐风俗”四个字。但下列情况表明，当时浮华交会，党同伐异，不切实际横发议论、讥评时政的现象一定非常严重。其一，苻生在位时讥刺嘲弄的事件层出无穷，密谋政变的集团相当多，这当然要以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为前提。其二，王猛在始平才一行动，立刻出现了“百姓上书讼之，有司劾奏”的事情，乃至苻坚都不得不“槛车征（猛）下廷尉诏狱”，借以平息众怒。此类状况听其自然，结局当然是有法不依、政令不一、朝纲混乱不

堪，所以必须整顿禁绝。

第三，严禁“老”“庄”及图谶。

两汉以来，谶纬迷信思想盛极一时，十六国时期更是泛滥成灾，苻氏家族对此深信不疑。前秦统治者能利用图谶，他人亦能利用，因此这是惑乱政局的一大祸患。苻坚即位之初，新平人王雕为邀功请赏，又呈上了一套图谶，恭维苻氏应王天下，针对当时民族观念强烈的情况，提出了逼迁汉族的建议：“谨案谶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讳也。又曰：‘当有艸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案图谶之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愿徙汧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之于边地，以应图谶之言。”苻坚十分高兴，拜王雕为太史令。王猛坚决反对，认为王雕“为左道惑众，劝坚诛之”。在王猛的一再坚持下，苻坚不得已杀了王雕，下达了禁止图谶的诏令。可是不久又发生了尚书郎王佩读谶的事件，苻坚杀了王佩，学谶之风才稍有遏止。

所谓“老”“庄”，是指魏晋以来的玄学。清谈误国，人所共知。苻坚、王猛力求务实，禁止玄学清谈，应该说是与整齐风俗、严禁浮华交会相辅相成的，有利于各项政令的贯彻。

总之，王猛是从制度、纲纪、刑律、舆论、风俗等诸方面同时入手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于王猛的举措，开始时苻坚颇不理解，责问王猛：“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王猛的回答十分干脆。

> 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剪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镬，以谢孤负。酷政之刑，臣实未敢受之。

两人的看法统一了，苻坚十分满意，当众宣布：“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29]下诏曰：“咸阳内史猛声彰出纳，所在著绩，有卧龙之才，宜入赞百揆，丝纶王言，可征拜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30]前燕黄门侍郎梁琛说“苻坚机敏好断”[31]，信不虚矣。但是对于图谶迷信，坚始终没有多大改变，以致日后深受其害。

在王猛的大力整顿下，没过多久，前秦出现了“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的状况，苻坚也不由得感叹：“吾今始知天下

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所加强，王猛治秦取得了初步成效。

王猛治秦之所以能有成效，原因如下。

第一，用人策略正确。王猛没有单枪匹马地蛮干，他既与“疾恶纠案，无所顾忌”[32]“鲠直不挠”的御史中丞邓羌“协规齐志”，又积极联合氐族权贵中与他志同道合的右仆射梁平老、领军将军强汪、司隶校尉吕婆楼等，更“兄事”李威，力争李威的理解和支持。李威虽然只是左仆射领抚军将军，却与苟太后有着特殊的关系，是苻坚政变的实际肇始人和操纵者，被苻坚视之“如父”的人物。争得了李威的支持，实际上也就争得了苟太后的支持，也有助于取得苻坚的支持。王猛成功了，他极得李威的赞赏，史称李威“雅重王猛，劝坚以国事任之。坚常谓猛曰：‘李公知卿，犹鲍叔之于夷吾，罕虎之于子产’”[33]。这样，在当权者中不但形成了一支致力于整顿的骨干队伍，而且得到了足以影响政局的有力人物的支持，保证了各项措施的推行。

第二，选择的突破口是正确的。十六国时期，统治民族的权贵高人一等，横行不法是司空见惯的。始平是枋头旧部的集中地，贵戚勋臣比比皆是，王猛首先在这里论法施刑。到了京师，又拿官居特进、光禄大夫的外戚强德开刀。统治民族的权贵，甚至皇亲国戚也遭严惩，其他各族的权贵当然只有忍气吞声、善自收敛这条路好走。

第三，“法简政宽”，处事严肃公正。王猛坚持“治乱邦以法”，但并非单纯依靠立法施刑，他为政的特点是“法简政宽”[34]和处事严肃公正。他“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35]。“法简”便于推行贯彻，“政宽”有利于休养生息。用人得当、善恶分明，保证了军令政令的整齐划一，因此史称他的治秦是“政理称举”。王猛是公正的，律己极严，不谋私利。尽管对于前秦来说，堪称丰功伟绩，但他并不因此为子孙求官求财，临终前只要求苻坚给其子“十具牛为田”，乃致其子王皮“不免贫馁”。这样做的结局，当然是“人思劝励”了。

第四，苻坚的支持。王猛有胆有识，务实而不求虚名，洁身自好，堪称我国历史上的一流相才。但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下，涉及军政的任何举措，若无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无法实施的。王猛之所以能施展其宏才伟略，最根本的还在于苻坚的大力支持。

对于王猛执权，氐族豪贵极端不满。“大勋于苻氏”的氐族强豪樊世代表权贵中的保守势力首先发难，他当众折辱王猛：“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王猛针锋相对：“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樊世怒火中烧，威胁王猛：“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苻坚得知后，态度非常鲜明：“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抓住樊世狂傲的特点，乘其入朝言事之机，故意问王猛：“吾欲以杨璧尚主，璧何如人也？”樊世忍不住了：“杨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王猛立刻火上浇油：“陛下帝有海内，而君敢竞婚，是为二天子，安有上下！”樊世何曾受过这样的闲气，当场发作，“丑言大骂”，大闹朝堂，追击王猛。借口到手，苻坚下令斩樊世于西厩。杀一个樊世，并不能完全抑制氐族权贵们的气焰。“诸氐纷纭，竞陈猛短”，“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对此，苻坚“恚甚，慢（谩）骂，或有鞭挞于殿庭（廷）者”，有的还遭到免官或贬黜的惩处。经过一番较量，才形成“公卿已下无不惮猛焉”的局面。

王猛指责樊世的言辞表明，他整顿改革的核心是要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王猛和氐族权贵们的矛盾，实质在于要不要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因如此，苻坚才给予大力支持。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民族仇杀发生后不过六七年的背景下，能这样支持一个异族政治家，并以打击本族中贵戚勋臣为突破口，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毕竟是不多见的。

整顿朝纲初见成效后，苻坚又采纳了京兆民王攸的建议，以十略为施政要点：“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贵孝养，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无偏党，六曰养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贤，八曰惩恶显善，九曰伐叛柔服，十曰易简弘大。”[36]前秦的施政更趋完善。同时苻坚和王猛又把施政的重点转向了地方。甘露元年（359），苻坚遣使巡察四方，中心内容是“州郡……长吏刑罚失中，为百姓所苦，清修疾恶，劝课农桑，有便于俗，笃学至孝，义烈力田者，皆令具条以闻”。灭燕后，遣绣衣使者循行关东郡县，观省风俗，“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变除之”[37]。取得东晋的梁、益二州后，又遣使巡行各地，罢黜贪官污吏，表彰和提拔勤于职守、清正廉洁的官员。王猛死后，苻坚特意在未央宫设置听讼观，处理各地政务。

上述措施，整饬了吏治，提高了行政效率。《晋书·苻坚载记》附

《王猛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广平麻思流寄关右，因母亡归葬，请还冀州。猛谓思曰：‘便可速装，是暮已符卿发遣。’及始出关，郡县已被符管摄。其令行禁整，事无留滞，皆此类也。”这样的行政效率，在苻坚后期还保持着，最典型的是淝水之战前夕的大征发。为发动灭晋之役，建元十九年（383）七月，苻坚发布了总动员令，下令十丁出一兵。八月，即距总动员令不到两个月，百万大军便出动了。如此高的行政效率，应该说是罕见的，即便在淝水之战后，此种余风犹在，边缘地区也不例外。《吐鲁番文书》收录了一条《前秦建元廿年（384）韩瓮自期召弟应身辞》，内云：“建元廿年三月廿三日，韩瓮自期，二日召弟应身。逋违，受马鞭一百，期具。”这既说明前秦的征发相当严酷，逃亡及违限要罪及家属，也说明各级职能机构仍然在运转，行政效率非同一般。史称前秦在苻坚前期“垂及升平”，《资治通鉴》卷103曰“秦国大治”，此虽溢美之词，但在苻坚前期，特别是王猛在世时，前秦吏治较为清明，是当时中国境内行政效率最高、吏治最好的一个政权。

学术界普遍认为，苻坚统治前期曾大力打击豪强。如此评价，是否偏高了一点？汉魏以来，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其一，随着士族地主阶层的形成，士族的政治特权及经济特权确立起来，他们在政治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其二，由于战乱频仍，各地坞堡林立，地方豪右凭借坞堡作威作福、欺压良善，奴役众多的依附农民，北方地区更严重。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依靠其强劲的军事实力在中原建立了政权，但徐、兖、司、豫等地，基本上是汉族坞堡控制的地区，冀、齐、秦、雍、凉等州，各族坞堡主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这是一股十分顽固的地方势力，也是惑乱地方行政的祸胎。少数民族统治者没有力量消灭各地坞堡，随着其封建化的加深，又需要利用坞堡主特别是汉族士族地主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因此自石勒起就开始顾及士族及坞堡主们的利益。他攻陷魏郡，署坞堡主们为将军、都尉等名号；他“讳胡尤峻”，但又下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38]；他始则令张宾清定五品，后来干脆恢复了九品中正制等。前秦也无例外，苻健的“约法三章”实质上是确认了各地坞堡主们的权益。王猛执权期间，并没有清理户籍、核实人口的举措。苻坚对于建议和主持前燕清查隐户的悦绾极为赞赏，史称“坚闻悦绾之忠，恨不及见，拜其子为郎中”[39]，但也始终没有把清查人户和抑制豪强侵凌作为整治地方的重点。所谓“禁勒豪强”，只是禁止他们公然违法横行而已，他们的权益并未受到损害。《魏书·薛辨传》的记载证实了这种状况：“（薛）强……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薛氏始终是称霸乡里的一方势力。此外，关中地区坞堡林立的局面

丝毫没有改变，甚至还有所发展，关中“堡壁三千余所”[40]。前秦统治腹地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应更严重。

对于士族，苻坚和王猛更是照顾有加。苻坚即位伊始，就“修废职，继绝世”，搜罗已经衰落的士族子弟，给以官职。为时不久，又“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按照黄门侍郎程宪的建议，“肃明典法，使清浊显分”，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给士族崇高的待遇。击灭前凉后，又特意下诏：“雍州士族先因乱流寓河西者，皆听还本。”[41]

“士籍”并非指为士族建立单独的户籍，而是指姓氏谱。此举表明前秦同样进行了区别士庶的活动，恢复了九品中正制。所谓“清浊显分”是在选官任职上，凡属清显的官职只能由士族充任。如宗室诸公的主要僚属，若非士族出身，辟署者是要受惩处的。仅甘露六年（364）因此而降公为侯的，就有平阳、平昌、九江、陈留和安乐五位。王猛坐镇邺城，手操选举大权，“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征旷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皆关东士望”。苻融继王猛为冀州牧，“高选纲纪，以尚书郎房默、河间相申绍为治中别驾，清河崔宏为州从事，管记室”[42]。这两张名单是极不全面的，但“皆关东士望”及“高选纲纪”表明，前秦的选官任职，士族优先。

众所周知，西晋通过荫客制确认了士族有奴役一定数量的佃客及亲属的特权，“役闻有常”指的就是这类经济特权。

应该说，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治阶级的勾结和联合，减少了人为地利用和挑唆民族矛盾的事件，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融合，但两者的勾结又带来不可避免的祸害。在政治清明时，它不甚显著，吏治淆乱，政局动荡，坞堡主们便是四分五裂的阶级基础。他们势力的急剧发展，又必然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前秦灭亡不久，后燕人户隐匿的现象便十分严重，南燕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迭相隐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讬城社，不惧燻烧，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损风毁宪，法所不容。”此时诸燕都立国未久，特别是南燕，建国还不到四年，把这类状况完全归于南燕维护士族地主的利益恐怕不大合适，它不过是继承了前秦的摊子而已，所以慕容德的尚书韩焯在其奏议中明确指出，这类现象肇源于前秦，“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隐冒”[43]。

总之，上述情况表明，对苻坚和王猛打击豪强的举措固然应该肯定，但不能估计过高。

二、苻坚的用人和纳谏

怎样才能在根本上求得治平，是苻坚最关切的问题。高泰进言：“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苻坚十分赞赏：“可谓辞简而理博矣。”[44]不难想象，苻坚相当重视用人及求才。政变之前，苻坚“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倾身结交了王猛、强汪、梁平老、吕婆楼、权翼、薛瓒等人，而政变后，这些王佐之才都得到了重用。苻坚统治前期，下令求才的次数相当多。

永兴元年（357），诏令各级官吏举荐“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

甘露元年（359），苻坚遣使巡察各地，具条奏报“清修疾恶、劝课农桑、有便于俗，笃学至孝、义烈力田者”。

甘露三年（361），“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45]，诏求“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

灭燕后，命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补六州守令”[46]。

建元八年（372），诏令“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郡县以礼送之”[47]。

对于知名人士，苻坚总是千方百计罗致，常以安车蒲轮礼请，甚至不惜大动干戈。他攻陷襄阳，得到释道安和习凿齿二人后，高兴地书谕诸镇曰：“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陆机和陆云）；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习凿齿有蹇疾，故称为半）。”[48]苻坚求才之心，至死未泯。《晋书·姚兴载记》附《尹纬传》曰：“（姚）苌既败苻坚，遣纬说坚，求禅代之事。坚问纬曰：‘卿于朕何官？’纬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苻坚把失败归于身边有王猛一样的人才而没有发现，这种对人才的认识，可谓相当深刻。

苻坚在恢复九品中正制后，虽然给士族仕进的优先权，但在统治前期，基本上能做到不问出身、不问民族。汉族士人他会用，少数民族他

会用，降将降士他也用。王猛出身贫寒，薛瓒和权翼原先是姚襄的谋士，号称“万人敌”的名将张蚝本是刑余之人，邓羌是汉人，姚苌是羌人，慕容垂是鲜卑人等。他击灭代国，并不因拓跋部落后而放弃求才之念。《苻坚载记上》中有一段他与拓跋什翼犍之间十分有趣的对话：“召涉（什）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如此求才，在我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苻坚求才，多而不滥，特别是王猛在世期间，更是如此。他规定：“察其所举，得人者赏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举，而请托不行，士皆自励；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而不用。”因此，史称苻坚前期非但“号称多士”“英儒毕集”，同时又“内外之官，率皆称职”[49]。这虽难免言过其实，但也绝非毫无根据。王猛自不待言，苻融坐镇关东，“所在盗贼止息，路不拾遗”。他颇善谋略，“专方征伐，必有殊功”。王猛死后，苻融接替王猛的职权，并非因为他是苻坚的弟弟，关键是他“铨综内外，刑政修理，进才理滞，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断狱，奸无所容，故为坚所委任”[50]。苻丕之所以能代替苻融坐镇邺城，也是因为“文武才干亚于苻融，为将善收士卒情”[51]。坐镇朔方的梁平老，“在镇十余年，鲜卑，匈奴惮而爱之”[52]。坐镇凉州的梁熙，“清俭爱民，河右安之”[53]。梁熙的别驾索泮“执法御掾，州府肃然，郡县改迹……政务宽和，戎夏怀其惠”。前秦进入鼎盛，与这些人才是密切相关的。

苻坚基本上是知人善任的，除王猛外，对邓羌的处置相当典型。伐燕之役，邓羌要挟王猛许以司隶校尉重任。王猛无奈，答应了。苻坚权衡后没有同意，特此下诏：“司隶校尉，董牧皇畿，吏责甚重，非所以优礼名将。光武不以吏事处功臣，实贵之也。羌有廉（颇）、李（牧）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荡扬、越，羌之任也，司隶何足以婴之！其进号镇军将军，位特进。”[54]邓羌虽有许多优点，但更以善于用兵及勇猛见称，这一诏令既顾及了将相之间的关系，又确实用了邓羌之长。

战国时的名将白起说过：“非得贤之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信之难。”[55]这确实是求才用人方面的至理名言。苻坚对于人才，基本上能做到用而信之。他与王猛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双方有多次冲突，有时还相当尖锐，但并没有影响他对王猛的信任。王猛出将入相，“军国内外

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56]。王猛看中的人便可任用，所谓呈报有司不过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贵戚勋臣对王猛攻击越烈，苻坚对王猛的信任弥坚。鉴于灭燕时苻坚在王猛行将成功之际突然领兵赶到安阳，暴露出他对王猛的疑虑，所以王猛对任命他为冀州牧、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重任一直惴惴不安，一再要求苻坚“改授亲贤”。苻坚亦觉此举有些过分，颇为抱愧，为解除王猛的疑虑，特意报书曰：“朕之于卿，义则君臣，亲逾骨肉，虽复（齐）桓（公）、（燕）昭（王）之有管（仲）、乐（毅），玄德之有孔明，自谓逾之。夫人主劳于求才，逸于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则朕无东顾之忧，非所以为优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难，苟任非其人，患生虑表，岂独朕之忧，亦卿之责也，故虚位台鼎而以分陕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铨补；俟东方化洽，当衮衣西归。”[57]并特意派遣中书令梁说到邺城安抚王猛。当王猛保有过去一切头衔回到长安，苻坚又加王猛都督中外诸军事，集军政大权于王猛一身。王猛数次上奏：“元相之重，储傅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总督戎机，出纳帝命，文武两寄，巨细并关，以伊（尹）、吕（望）、萧（何）、邓（禹）之贤，尚不能兼，况臣猛之无似！”对此，苻坚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朕方混一四海，非卿无可委者？卿之不得辞宰相，犹朕之不得解天下也。”还命令诸子：“汝事王公，如事我也。”[58]君臣之际，如此际遇，在历史上是极鲜见的，无怪乎前燕的使臣梁琛回到邺城后，评论这两个人的关系时说：“观其君臣相得，自谓千载一时。”[59]

用人和纳谏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善于采纳臣属的合理建议，才能人尽其才，各使其能。苻坚前期是颇能纳谏的。

其一，为支持王猛，苻坚在殿廷上鞭挞或谩骂氐族权贵。给事黄门侍郎权翼进言：“陛下宏达大度，善驭英豪，神武卓荦，录功舍过，有汉祖之风。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这实际上是要苻坚恩威并施，慑服权贵。苻坚立刻笑纳：“朕之过也。”

其二，苻坚登临龙门，对据有关中十分自得，顾谓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娄敬有言，‘关中四塞之国’，真不虚也。”权翼及中书侍郎薛瓒进言：“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于身窜南巢，首悬白旗，躯残于犬戎，国分于项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险。’深愿陛下追踪唐虞，怀远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这是君臣之间就治国总纲的一场讨论，苻坚闻言，“大悦”。

其三，苻坚好酒，灭凉以后，欢宴群臣，以秘书监朱肜为酒正，监劝大家“以极醉为限”[60]。秘书侍郎赵整为此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苻坚闻后，命赵整写下来，自此以后，“宴群臣，礼饮而已”[61]。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接受大臣及亲近侍从的进谏外，苻坚还能接受身份地位低下的伶人的进谏。苻坚喜欢围猎，灭燕以后，他围猎于邺城的西山，伶人王洛拦马进谏：“陛下为百姓父母，苍生所系，何可盘于游田，以玷圣德。若祸起须臾，变在不测者，其如宗庙何！其如太后何！”苻坚的回答是：“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闻罪于王洛，吾过也。”自此不再围猎。

王猛死后，苻坚的骄侈本性大发，奢华之风日长，悬珠帘于正殿，用奇珍异宝装饰宫宇器物。尚书郎裴元略进谏：“臣闻尧舜茅茨，周卑宫室，故致和平，庆隆八百。始皇穷极奢丽，嗣不及孙。愿陛下则采椽之不琢，鄙琼室而不居，敷纯风于天下，流休范于无穷，贱金玉，珍谷帛，勤恤人隐，劝课农桑，捐无用之器，弃难得之货，敦至道以厉薄俗，修文德以怀远人。然后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刑措既登，告成东岳，踪轩皇以齐美，哂二汉之徙封，臣之愿也。”此时苻坚虽然难以做到，但还是撤除了珠帘，擢迁裴元略为谏议大夫。

对于苻坚的纳谏，前燕的梁琛也深有体会。建元五年（369），梁琛出使前秦，正值苻坚在万年（陕西富平东北）围猎，随即便想接见。梁琛反对，指出前燕用极隆重的礼节迎接前秦的使臣，前秦也应给予相应的礼遇。前秦尚书郎辛劲摆出大国的架势，抬出《春秋》斥责梁琛：“宾客入境，惟主人所以处之，君焉得专制其礼！且天子称乘舆，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礼，何为不可乎！”梁琛为不辱国命，据理抗争：“晋室不纲，灵祚归德，二方承运，俱受明命。而桓温猖狂，窥我王略，燕危秦孤，势不独立，是以秦主同恤时患，要结好援，东朝君臣，引领西望，愧其不竞，以为邻忧，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强寇既退，交聘方始，谓宜崇礼笃义以固二国之欢；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岂修好之义乎！夫天子以四海为家，故行曰乘舆，止曰行在。今海县分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舆、行在为言哉！礼，不期而见曰遇；盖因事权行，其礼简略，岂平居客与之所为哉！客使单行，诚势屈于主人；然苟不以礼，亦不敢从也。”[62]苻坚知道后，特设行宫，

令百官排班陪位，接待梁琛。苻坚又令太子苻宏邀见梁琛，事先暗谕，要梁琛行跪拜之礼。梁琛据理拒绝，苻坚同意了。梁琛深有感慨，回国后对苻坚下了这样的断语："机明好断，纳善如流。"[63]

需要说明的是，苻坚的善于用人和纳谏，主要在其前期，尤其是纳谏。随着前秦达到鼎盛，苻坚逐步为骄侈本性所支配，乃至发兵西域和领兵东下时，拒绝了一切不同的意见，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了淝水惨败。

三、重视儒学教育

汉魏以来，内迁各少数民族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在其汉化的道路上都采用汉族的语言、文字。随着其封建化的加深，均以儒家经典及汉族的传统培育子弟及统治人才，如苻健入关后就"修尚儒学"。苻坚一即位，更对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下令中央及郡国设置各级学校，并表示"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在他统治前期，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其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礼聘及崇尚儒学名士。

乐陵人王欢，安贫乐道，专精好学，尤善《诗经》，是名闻关东的"通儒"[64]，历任前燕博士、国子祭酒。苻坚灭燕后，以安车蒲轮征王欢为国子祭酒。襄平人公孙永，"少而好学恬虚"，"吟咏岩间，欣然自得"，闻名于世。苻坚想"备礼征之"，考虑到他年高路远，改为遣使致意。公孙永死后，苻坚特谥"崇虚先生"的称号[65]。

永嘉之乱以来，凉州偏居一隅，是较为安定的所在。这里又是汉人张轨的天下，士人纷纷避乱而来。张氏重视文教，受学人数之多，与当时中国境内各地相比，堪称首屈一指，凉州经学成为当时之冠。苻坚灭凉后，尤为重视礼聘凉州名儒。敦煌人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66]，曾著《春秋墨说》及《孝经错纬》等书，著录弟子达千余人。苻坚特备安车蒲轮礼聘郭瑀进京，协助参定各种礼乐文物。恰值郭瑀父死，苻坚无奈，只好命令太守辛章选送生员300人到郭瑀处就学。前秦礼乐文物日趋完备，与凉州儒学密不可分。《晋书·姚兴载记》曰："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

赴之请业。”可以想见，被礼聘或迫迁关中和关东的凉州名儒，人数不会太少。

与此同时，苻坚又下令：“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颇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味。

第二，广立学校。

苻坚妙选生员，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得入太学受业。他还特意在后宫设置了学校，置典学、立内史，选择太监及女奴中“有聪识者”为博士，讲授经学。

苻坚对设置学校已达醉心的地步，他下令“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67]。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读，后来又在渭城（陕西咸阳）设立了教武堂，选择懂得阴阳兵法的太学生去教授各级将领。乃至汉族士人秘书监朱彤也感到此举未免过分，进言：“陛下东征西伐，所向无敌，四海之地，什得其八，虽江南未服，盖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学舍，教人战斗之术，殆非所以驯致升平也。且诸将皆百战之余，何患不习于兵，而更使受教于书生，非所以强其志气也。此无益于实而有损于名，惟陛下图之！”[68]如此普及经学，在我国历史上的明君圣主中，也属鲜见，苻坚这样做，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战争经验更多地应在实践中取得，让只有书本知识的经生教身经百战的将领用兵，未免有些削足适履，所以苻坚还是接受了朱彤的建议。

第三，学而优则仕。

为了激励生员读经，苻坚大力推行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措施。他“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开始时一月三临，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月一临。建元元年（365），孝廉通经者十余人拜令长；建元八年（372），苻坚又主持太学考测诸生经义，83个位列上等的生员均得优叙。苻坚还下令，“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69]，由此“诸生竞劝焉”。

在苻坚的统治下，入太学的不止氐、汉两族的官僚子弟，各族上层分子也得入太学受业。灭代以后，苻坚就令拓跋什翼犍入学。事后，苻坚问什翼犍：“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苻坚对此回答十分满意。[70]

苻坚的举措不由得使人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位力主汉化的杰出人物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曾对拓跋权贵们讲过这样一句话："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71]苻坚和孝文帝言语不同，意旨却是一致的，无怪乎当时人这样评论苻坚："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这又和魏孝文帝时人评论魏孝文帝的措辞几乎一模一样。确实，像苻坚这样振兴儒学、重视文教的统治者，非但在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即使在我国历史上，亦不多见。

《晋书》前秦诸君传论中谈及苻坚时，还说苻坚"变夷从夏"。前述各项当是其主要内容，此外，当还应有改变氐族落后旧习的措施。只是史文缺载，于此不敢妄言，只得存疑。

苻坚是倡导汉化的先行者，他的举措虽不如魏孝文帝那样彻底，结局也不如魏孝文帝那样幸运，但这不能苛责于苻坚，那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在民族仇杀的悲剧发生后不过十余年的时候，苻坚能这样做，胆识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措施，对于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所起的积极作用，应予以肯定，至少，对于民族汉化的促进作用是有史可证的。我们知道，苻坚在统一北方过程中，是尽力把氐族集中到关中地区的，在前秦崩溃后，其中有一部分打回了仇池，他们"婚姻备六礼，知书疏"[72]，这应该是上述措施所留下的成果。

四、优遇各族上层分子

苻坚一再宣称"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对于各族上层分子来说，苻坚确实是这样做的。击灭姚襄，他收编了姚襄余部，授姚襄弟姚苌为扬武将军。终苻坚之世，姚苌历官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等郡太守，擢任宁、幽、兖三州刺史，后为步兵校尉，封益都侯，进龙骧将军，为一方统帅。灭燕后，封燕主慕容暐新兴侯、慕容评给事中、慕容德张掖太守、慕容冲平阳太守、慕容泓北地长史、平睿宜威将军、悉罗腾三署郎。"燕之诸王悉补边郡。"[73]用苻坚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慕容氏的处置是"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将、纳言，虽曰破灭，其实若归"。前秦勋戚旧臣都感不平，甚至连苻融也说慕容氏"父子兄弟列官满朝，执权履职，

势倾劳旧”，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对于各族上层分子，苻坚不但竭力笼络，甚至可以说是宽大无边。慕容垂对苻坚重用慕容评也相当不满：“臣叔父评，燕之恶来辈也，不宜复污圣朝，愿陛下为燕戮之。”苻坚没有接受，只是出慕容评为范阳太守。为此，司马光说：“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何哉？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评者，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其国，国亡不死，逃遁见禽。秦王坚不以为诛首，又从而宠秩之，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卒于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其道故也。”[74]淝水之败后，慕容氏反心毕露，大乱关中，苻坚仍然对慕容暐说：“父子兄弟无相及也。卿之忠诚，实简朕心，此自三竖之罪，非卿之过。”

苻坚对汉族上层分子亦是如此。

周虓原是东晋西夷校尉、梓橦太守。被俘后，拒绝尚书郎的册封，仍极受礼遇。他每见苻坚“辄箕踞而坐，呼之为氐贼”。元会之时，苻坚问周虓东晋元会与之相比如何，周虓攘袂厉言：“戎狄集聚，譬犹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灭代之役，苻坚饯行，请周虓参加，问：“朕众力如何？”周虓又出言不逊：“戎狄已来，未之有也。”所以群臣都想杀掉他，苻坚始终没有同意。直到周虓参与政变，苻坚才不得已将他流放太原。周虓死后，苻坚还赞叹不已：“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彦远洁己于后，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75]毫无疑问，苻坚这样做，是为了笼络人心，为其巩固统治和统一天下服务的。但此类气度，非但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中极为少见，应该说，历史上的明君圣主也非都能具有。

但是，如果结合对各族上层分子的任用而言，苻坚倾向于少数民族，特别是鲜卑和羌族，王猛则偏重于关东士族。二人在选官用人方面的差别很大，直到临死前，王猛还念念不忘地告诫苻坚：“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76]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慕容垂的态度了。

慕容垂，字道明，燕主慕容皝第五子，爵封吴王。其兄，前燕名相慕容恪说他“天资英杰，经略超时”[77]，“文武兼才，管（仲）萧（何）之亚”，才略十倍于己。建元五年（369），东晋桓温第三次北伐，驻兵枋头（河南浚县西南），前燕万分危急，慕容垂挺身请缨，在襄邑（河南睢县西）歼灭桓温五分之三的军队，使前燕转危为安。这是一个连苻

坚亦颇为畏惧的人物。慕容垂因前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在这一年带着儿子慕容令及慕容楷等投奔了苻坚。苻坚大喜过望，亲自郊迎，赞美备至："天生贤杰，必相与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数也。要当与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后还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国不失为子之孝，归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78]拜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封宾徒侯，慕容楷为积弩将军，"皆厚礼之，赏赐巨万，每进见，属目观之"。对此，王猛非常不满："慕容垂，燕之戚属，世雄东夏，宽仁惠下，恩结士庶，燕赵之间咸有奉戴之意。观其才略，权智无方，兼其诸子明毅有干艺，人之杰也。"苻坚答曰："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

为了除掉慕容垂，建元六年（370），王猛受命伐燕时，故意礼请慕容令为参军，作为向导；行前，又特意造访慕容垂："今当远别，何以赠我？使我睹物思人。"慕容垂无奈，只好解下佩刀送给王猛。王猛拿到信物，进至洛阳，便以重金收买了慕容垂的亲信金熙，叫他以佩刀为信，伪装慕容垂的密使，向慕容令传达慕容垂的密令："吾父子来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仇，谗毁日深；秦王虽外相厚善，其心难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将为天下笑。吾闻东朝（前燕）比来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还东，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发。"慕容令迟疑不决，但王猛想除掉他们父子，是千真万确的，不由不信。洛阳、长安，路远遥遥，难以核实。此时此刻，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所以犹豫再三，才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家将诈称打猎，逃奔前燕镇守石门（即汴口，今河南荥阳境内）的安乐王慕容臧去了。王猛要的就是他走这一招，立刻奏报慕容令叛逃。慕容垂闻讯，犹如惊弓之鸟，亦潜逃蓝田（今属陕西），为追骑所获。此事本可了结，殊不料慕容垂被押回长安后，苻坚亲自接见于东堂，慰抚有加："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心不忘本，犹怀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将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为过惧而狼狈如是乎！"[79]信用如旧。

表面上看，苻坚气度宽厚，目光远大；王猛是为争宠，嫉贤妒能，甚至不惜耍弄阴谋诡计。为此，司马光也大发了一通议论。

> 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难信，独不念燕尚未灭，垂以材高功盛，无罪见疑，穷困归秦，未有异心，遽以猜忌杀之，是助燕为无道而塞来者之门也，

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坚礼之以收燕望，亲之以尽燕情，宠之以倾燕众，信之以结燕心，未为过矣。猛何汲汲于杀垂，乃为市井鬻卖之行，有如嫉其宠而谗之者，岂雅德君子所宜为哉！[80]

王猛并非嫉贤妒能、贪恋权势之辈，前述言行已说明了这一点，这里不妨再举两例。

其一，甘露元年（359），苻坚在王猛原有官职之上，加司隶校尉。王猛上疏力辞："伏见阳平公融，明德懿亲；光禄西河任群，忠贞淑慎；处士朱彤，博识清辩，并宜左右弥纶，晖赞九棘，愚臣庸鄙，请避贤路。"[81]苻坚没有同意："机务俟才，允属明哲，朝野所望，岂容致辞。"[82]但允王猛所荐，拜上述数人高官重任。

其二，建元六年（370），王猛受命伐燕，攻克洛阳，苻坚加其司徒、录尚书事，封阳平侯。王猛坚辞："今燕、吴未平，戎车方驾，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赏，若克殄二寇，将何以加之！"又是苻坚说了下面一席话，他才接受："苟不暂抑朕心，何以显卿谦光之美！已诏有司权听所守，封爵酬庸，其勉从朕命！"[83]

王猛知人善任，时人及后来的史家异口同声。他对慕容垂的判断，几乎是当时稍有政治头脑的人的共同看法。苻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乃至其贴身侍者光祚也极为明白："陛下颇疑慕容垂乎？垂非久为人下者也。"[84]

王猛固然有民族意识未泯的一面，他代表了汉族地主阶级与鲜卑、羌族豪贵在前秦政权中争夺地位，但更多的是出于阻遏一切可能导致分裂的因素，加强中央集权，进而寻求更大的统一的考虑。所以他不但主张并力求剪除慕容垂，甚至甘冒大不韪，借汝南公苻腾谋反的契机，提出剪除淮南公苻幼、晋公苻柳、魏公苻廋、燕公苻武、赵公苻双的建议，一再强调"不去五公，终必为患"[85]。

苻坚又为什么如此对待慕容垂，从而招致"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顾天下大计"[86]的讥评呢？在这方面，胡三省的议论颇能发人深省："石虎之不能杀蒲洪，犹苻坚之不能杀慕容垂、姚苌也。"[87]在这里，胡三省多少窥探到了苻坚和石虎的共同之处，也就是说这两人都继承了汉国以来拉拢和依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巩固统治的传统。苻坚在拉拢和任用汉族上层分子上，比石勒和石虎迈进了一大步，但并没有完全摆脱"戎狄"和"夷夏之分"的观念。因此，他和王猛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一场传

统思想，即是依靠汉族地主还是依靠少数民族权贵巩固统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王猛失败了，苻坚胜利了。但这是落后传统的胜利。王猛死后，苻坚的这一心态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权贵在前秦政权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结局是前秦的四分五裂，苻坚本人也成了这一传统的受害者。

第三节 关陇经济的恢复

苻坚和王猛十分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此，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88]为基本国策，人民终于得到了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在施政中，“劝课农桑”和褒奖“孝悌力田”是他们派遣使者巡行各地的重要内容。甘露元年（359），苻坚亲耕籍田，皇后苟氏亲蚕近郊，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重视农桑耕织的心态。

和苻健一样，苻坚统治前期，卑宫薄赋，倡导节俭，厉禁奢侈。他不搞大规模的宫殿苑囿建筑，每有巡行，总要减免些所过地区的租赋。如他登临龙门，即减“所过田租之半”，到河东祀后土、雍地祀五畤时也是如此。其后，以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灭代以后，优抚恒代，使“三年无税租”等。他还进行了一些“恤困穷”[89]，赐“鳏寡孤独高年不能自存者”谷帛之类的救济活动。

为了倡导节俭，苻坚登位不久，借大旱之机下令：“减膳彻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他因水旱不时，“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官、后宫减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随着经济的恢复，奢侈之风有所抬头，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苻氏宗室竞相辟署富商大贾为国卿。黄门侍郎程宪特此进言：“赵掇等皆商贩丑竖、市郭小人，车马衣服僭同王者，官齐君子，为藩国列卿，伤风败俗，有尘圣化，宜肃明典法，使清浊显分。”苻坚特意下诏：“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此令对禁止商人干政、澄清吏治、倡导节俭，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但从政治上打击及歧视工商，又有不利于各地的交往和经济发展的一面，而且必然因此促使商人将其收入从消费领域转向土地，从而加速土地兼并的进程。在这方面，苻坚和苻健相比，可以说是后退了。但这又不能苛责于苻坚，两汉以来，重农抑商已经成了封建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传统思想与决策。苻坚既然一切仿效汉晋，当然会受这些传统思想的束缚，因而他歧视工商的诏令，又几乎和《晋令》一样。《太平御览》卷774引《晋令》曰：“百工不得服大绛紫襈，假髻真珠、珰珥、文犀、玳瑁，越叠以饰路张，乘犊车。”同书卷697引《晋令》又曰：“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白，婢履色无过红、青，古、侩卖者皆当着巾贴，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黑履，一足着白履。”据《晋书·李重

传》，西晋规定，官吏若对违制工商不加纠察，要受免官惩处：“（泰始）八年（272）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既然工商违制要惩处官长，那么对违制工商的惩处一定更重。所以苻坚的上述处置应是继承了西晋的律令。

遇有灾荒年景，苻坚不仅“惧而愈修德政”，进行一般性的赈济，而且积极引导抗灾救灾，效果相当显著，这里有两个实例。

其一，永兴二年（358）秋，大旱，苻坚下令“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秦汉以来，山林川泽在律令上属皇帝所有，山泽的收入由少府管理，是天子的经费，因而禁止百姓樵采渔猎。开放山林川泽，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便于人民抗灾自救，结果是“旱不为灾”[90]。今天不知道苻坚开放山林川泽是权宜之计，还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如果是后者，它的积极意义就远不止此，需要给予较高的评价。

其二，建元十八年（382），幽州蝗灾，“广袤千里”[91]。苻坚派遣散骑常侍刘兰为使持节，调发青、冀、幽、并诸州百姓扑杀蝗虫。这次蝗灾来势极猛，“经秋冬不能灭”。有司奏劾刘兰，苻坚则说：“灾降自天，殆非人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违所致，兰何罪焉！”与一些昏君庸主不思扑击，任凭蝗虫肆虐，或者诿过臣僚相比，确实判然不同。幽州蝗虫虽然没有被扑灭，但有刘兰节度主持，与幽州毗邻的州郡严密防御，所以“蝗不出幽州之境”[92]，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

苻坚很重视屯田。《晋书·苻坚载记下》曰：“晋将军朱绰焚践沔北屯田，掠六百余户而还。”表明苻坚确实曾量地制宜，仿照曹魏实行过屯田。

在苻坚重视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中，有两项措施值得一提。

第一，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

关中号称百六山河，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缺憾在于降水量小，气温又较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干旱成了关中农业生产经常性的威胁。针对这一情况，苻坚下令“课百姓区种”，也就是推广西汉成帝时氾胜之总结出来的区种法。

区种法的具体内容见于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谷第三》引《氾胜之

书》：“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所谓伊尹之类，不过是伪托，但它是对当时北方劳动人民耕作经验的总结。据《齐民要术》，区种农田管理的要求特别严格，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其一，区种是“尽地力”的一种耕作方法。其二，讲究选种、上好粪肥和泥土拌匀后播种，充分发挥肥效。其三，不同的作物、土质，行距和株距的要求不同。一般应做到等距、全苗。其四，“负水浇稼”，“天旱常溉之”，这样既节约用水，又充分发挥水的效用。其五，经常除草，苗禾长高以前可用锄，苗长不能耕耘时，则用“刬镰比地刈其草矣”。区种既不要求土质，又不苛求农具，只是投入的劳动量特别多。氾胜之估计，“丁男长女治十亩”，也即说一夫一妇之家全力以赴，只能种十亩地。但亩产量相当高，据说可达“百石”。氾胜之试种，则达“四十石”[93]。这显然是一种适合干旱地区、畜力不充足、农具不齐备的穷困小农的较为先进的集约化耕作方法。[94]

关陇地区过去有区种的传统。邓艾屯田上邽（甘肃天水）时，“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95]，这为苻坚推广区种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随着这一较为先进的耕作方法的推广，前秦曾获得过好收成。建元十八年（382），“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麻、豆“上田亩收百石（约当今二十九石），下者五十石”，胡三省认为这有悖常理，是妖异之状。他说：“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则州县相与诬饰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96]胡三省的分析是对的。如果把上述产量作为平均亩产或普遍现象，这确实是吏治大坏、诬饰以罔上的表现。但区种使亩产有所提高，却是不可否认的。个别特殊地段，因条件优越，收成较高，折算起来也可达到百石左右。贾思勰说：“谚曰：‘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谓余言曰：‘昔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则一亩之收，有过百石矣。少地之家，所宜遵用之。”[97]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高产试验田，在当时，大面积推广肯定达不到，一般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就更没有刘仁之那样的条件了。

第二，兴修水利。

关中是战国以来我国古代兴修水利最多和水利最发达的地区。两汉

时期，这里除战国时兴修的郑国渠外，还兴修了渭水和黄河间的漕渠、泾水和洛水间的白渠，此外还有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等，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水利网。曹魏时又修复了成国渠，建筑了临晋陂等。魏晋之际，只是因为政治腐败、战乱不已，关中水利工程才年久失修、丧失效用，干旱为烈不已。苻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既然如此，对过去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苻坚也可能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较为清明的吏治、重视农桑、推广先进的耕作方法及水利的兴修，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98]与此相应，工商业也有发展，苻坚还铸钱来适应这一需要。《水经注》卷4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谓之金狄……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于是金狄灭。”一次铸钱四十八万斤，数量可谓不小。《晋书·苻坚载记上》总叙当时的经济情况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不管怎样溢美，这无论如何也是一幅自魏晋以来十六国时期仅见的兴旺图象。苻坚和王猛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其功绩是应该肯定的。正是在这种“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的基础上，苻坚才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里个体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技术进步缓慢，生活条件极端艰苦，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成了封建社会发展生产的最主要途径，因此，经济的发展常和人口的增加成正比。在这里，且就前秦的人口略说几句。

今存史籍没有前秦人户的统计数。搞清前秦人户十分艰难，所幸史籍中留下了两个数字，可供我们进行极粗略的估算。

其一，前燕尚书申绍曾曰：“中州丰实，户兼二寇。”[99]这里的“二寇”，指的是东晋和前秦。前燕灭亡后，苻坚收其图籍，有“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南方人户最多的时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计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100]。我们知道，刘宋统治地域比东晋要大，

其间又经过宋文帝元嘉之治的休养生息，户口比东晋要多，只怕没有疑问，如果把这时的户口数算作东晋的，那么前秦统治区的人户虽然达不到150万户550万人左右，但与南方相差无几，或者略有超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二，淝水之战前夕，苻坚估计，“人十丁遣一兵”，“略计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万”[101]。他的估计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淝水之战中，苻坚倾国而动，所出兵马为“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加上吕光所统西征的七万五千人，总兵力在九十五万左右。淝水之战中，苻融所统前锋为二十五万，加上淮淝地区原有的守军，合起来为三十万左右。[102]从军事角度来看，苻坚绝对不可能把刚征发来的乌合之众作为先锋，这应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苻坚在统一北方时，动用兵力最大的一次是灭代，也是三十万。两个数字恰好一样。这绝非偶然，应该说，这正是苻坚在正常情况下所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加上驻防京师和各地的兵马，苻坚在发动淝水之战前，总兵力大概在五十万到六十万之间。那么淝水之战中，苻坚的兵力有三十五万到四十五万是按十丁抽一的办法临时征集起来的。如果这一估计大致可以的话，此时苻坚境内应有三百五十万到四百五十万丁，以每户一丁计，则在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户，扣除前燕境内的人户，关陇及河东一带应有一百一十万至二百一十万户。取其低数，与申绍所做出的估计大致相同。我们从前述抚夷护军领户三万，而集中在关中三原、九嵕、武都、汧、雍五地的氐户就有“十五万户”之类的情况看，前秦在灭燕前拥有一百一十万户人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若按高数，前秦的人户与前燕大体持平，申绍的奏议就成了自吹自擂，这又绝无可能。因为申绍的奏议是针对前燕弊政、痛心疾首地说出来的。

西晋全盛时，雍、秦两地有户近十三万。[103]前秦灭燕前，其人户为西晋时该地的八倍到十倍，这当然不可能是自然增殖，应包括前秦在各次战争中掠徙及从各地流徙而来的在内。这种情况在十六国时期并非绝无先例。前燕统治辽东时，就出现过“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104]的现象。退一步讲，上述估算纯属臆断，前秦统治境内的人户远远超过西晋时该地的人户数，也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仅关中氐户及抚夷护军所统人户已达十八万，河东有胡晋十余万户，[105]西州仅拥戴姚苌的就达“五万余家”，北地、新平、安定还有“羌胡十余万户”[106]，等等。这几个数字加起来已超过四十三万户了，更何况还有在数量上超过少数民族于关陇地区生生不息的汉族人民呢。

[1] 《文献通考》卷49。

[2]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附《苻雄传》。

[3]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卷114《苻坚载记下》。

[4] 北魏的杂户是封建政府直接控制的依附民。这里的杂户，身份地位和北魏的不同，是指族属难辨的少数民族民户，或者是部落组织已被打破的少数民族民户。

[5] 《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

[6] 《邓太尉祠碑》见于《金石续编》卷1《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0、《关中金石文字逸考》卷9。《广武将军囗产碑》见于《金石萃编》卷25。上述著录均有讹误，且《广武将军□产碑》录文不全。马长寿先生广事寻觅，据其所得两碑拓片，详细校正，补足了后碑，收录于所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中（中华书局，1986），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里引文以马长寿先生的校正为准，且相应吸收了马长寿先生的研究成果。

[7]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8] 以上引文均见《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卷114《苻坚载记下》。

[9] 《十六国春秋》卷36《前秦录四》。

[10] 《太平御览》卷122。

[11] 《太平御览》卷495。

[12]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附《苻雄传》。

[13]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融传》。

[14] 《晋书》卷115《苻丕载记》。

[15] 《太平御览》卷744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16]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朗传》。

[17]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18]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融传》。

[19] 《太平御览》卷587。

[20]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21]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22]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23] 《资治通鉴》卷104。

[24]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25]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26]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本节引文，凡引自卷113《苻坚载记上》、卷114《苻坚载记下》者，皆不再注出处。

[27] 《资治通鉴》卷100。

[28] 《资治通鉴》卷103。

[29]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30] 《太平御览》卷122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31]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32] 《资治通鉴》卷100。

[33] 《太平御览》卷122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34] 《资治通鉴》卷102。

[35] 《资治通鉴》卷103。

[36] 《太平御览》卷122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37] 《资治通鉴》卷102。

[38]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

[39] 《资治通鉴》卷102。

[40] 数字恐有误，详见第六章第二节。

[41] 《资治通鉴》卷104。

[42] 《资治通鉴》卷103。

[43]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44] 《资治通鉴》卷103。

[45] 《资治通鉴》卷101。

[46] 《资治通鉴》卷103。

[47] 《资治通鉴》卷103。

[48] 《晋书》卷82《习凿齿传》。

[49] 《资治通鉴》卷101。

[50]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融传》。

[51] 《晋书》卷115《苻丕载记》

[52] 《资治通鉴》卷103。

[53] 《资治通鉴》卷104。

[54] 《资治通鉴》卷103。

[55] 转引自《晋书》卷52《华谭传》。

[56]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57] 《资治通鉴》卷103。

[58] 《资治通鉴》卷103。

[59]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60] 此据《资治通鉴》卷104。《太平御览》497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当以落地为限。"

[61] 此据《资治通鉴》卷104。《太平御览》卷842引赵整《酒德之歌》曰："获黍西秦，采麦东齐，春封夏发，鼻纳心迷。"

[62] 《资治通鉴》卷102。

[63]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64] 《晋书》卷93《儒林·王欢传》。

[65] 《晋书》卷94《隐逸·公孙永传》。

[66] 《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

[67] 前秦有中军、外军将军；前禁、后禁、左禁、右禁将军为四禁；左卫、右卫将军为二卫；卫军、抚军、镇军、冠军将军为四军。长上者系指长上宿卫将士。

[68] 《资治通鉴》卷104。

[69] 《资治通鉴》卷103。

[70] 实际上前秦并未俘获什翼犍，此处仅引此说明少数民族豪酋亦入学而已。

[71] 《魏书》卷21《广陵王羽传》。

[72] 《南史》卷79《氐胡传》。

[73] 《资治通鉴》卷103。

[74] 《资治通鉴》卷103。

[75] 《晋书》卷58《周虓传》。周虓字孟威；吉挹字祖冲，晋魏兴太守；丁穆字彦远，晋梁州刺史。三人被俘后，均守节而死。

[76]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77]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78] 《资治通鉴》卷102。

[79] 《资治通鉴》卷102。

[80] 《资治通鉴》卷102。

[81]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3《前秦·苻坚》。

[82] 《太平御览》卷122。

[83] 《资治通鉴》卷102。

[84] 《资治通鉴》卷107。

[85] 《资治通鉴》卷101。

[86] 《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

[87] 《资治通鉴》卷96。

[88]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本节史料凡属该卷者，不再注出处。

[89] 《资治通鉴》卷100。

[90] 《资治通鉴》卷100。

[91]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92] 《资治通鉴》卷104。

[93] 《北堂书钞》卷39《兴利》。

[94] 参见黄惠贤《魏晋南北朝时期农耕方式及农业生产水平初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95] 《三国志·魏书》卷26《邓艾传》。

[96] 《资治通鉴》卷104。

[97] 《齐民要术》卷1《种谷第三》。

[98] 《资治通鉴》卷101。

[99]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100]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101]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102] 《资治通鉴》卷105。

[103] 《晋书》卷14《地理志》。

[104]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105] 《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

[106] 《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第四章〗 苻坚统一北方

第一节 王猛灭燕

一、前燕概述

前燕由鲜卑慕容部建立，开国于晋武帝太康六年（285），灭亡于前秦建元六年（370），开国之君是慕容廆。

慕容部曾先后参加过檀石槐领导的鲜卑部落联盟和小种鲜卑轲比能领导的部落联盟。曹魏初年，轲比能部落联盟瓦解，慕容部迁徙辽东。晋惠帝元康四年（294），慕容部在其酋长慕容廆的率领下，数经迁徙，始定居于大棘城（辽宁锦州附近），“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1]，自此，慕容部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并逐步模仿西晋建立国家制度。

慕容部人数较少，力量薄弱。西晋末年，它面临的形势相当复杂，西有强敌鲜卑段部和宇文部，东有强邻高句丽，大棘城周围又经常受到附塞鲜卑素连及木津部[2]的骚扰。宇文部、段部和高句丽这三股势力曾在西晋东夷校尉崔毖的策动之下联合起来，围剿慕容部。慕容部常有危如累卵之感，不得不卑辞厚礼以事宇文部和段部。

慕容廆是一个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富有才干的人物。为谋出路，他力图搞好和汉族的关系，利用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人心思晋的形势，接受其子慕容翰的建议，称臣于晋，借“拥晋”和“勤王”号召汉族人民，直到慕容氏称帝中原前，慕容廆及其后继者始终坚持这一策略。慕容部虽比匈奴、羯族落后，但在此策略影响下，它没有搞汉、赵以来的“胡汉分治”。在慕容部建国的历史上，大量、残酷地屠杀和掠徙汉族人民的事例比较少见。前燕是十六国前期与汉族关系较好，主动、积极地吸收汉文化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招徕流民，劝课农桑。

西晋永嘉以后，中原丧乱，锋镝余生的汉族人民到处流徙。他们为安身立命，有的结聚坞堡，有的远徙江南，有的北投幽、冀，相当一部分拥进了辽东。慕容廆时，流徙辽东的已达数万家；慕容皝时，流入人数已超过辽东土居十有余倍，大概当时汉族人民除乔迁江南最多外，其次要数辽东了。

辽东比较安定，慕容部又打着晋室旗号，这都是前燕能吸引流民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慕容氏制定了一条对流民极有吸引力的招徕政策，其内容：一是来去自由，史称“民失业，归慕容廆者甚众，廆禀给遣还，愿留者即抚存之”[3]。二是设立侨郡县安置流民。《资治通鉴》卷89曰：“是时中国流民归廆者数万家。廆以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资治通鉴》系此事于西晋建兴二年（314），可见前燕设置侨州郡比东晋还早。在东晋，籍注侨州郡的民户享有免除赋役的权益，前燕情况不明。可是《晋书·慕容德载记》曰：“矜迁氓之失土，假长复而不役。”南燕对流民实施“长复不役”的优惠政策，应该是继承了前燕的措施。当然这种优惠不会长期维持下去，《晋书·慕容皝载记》曰：“罢成周、冀阳、营丘等郡。以渤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国。”侨郡县的取消，目的显然是征收租赋，估计其内容大概和东晋的土断相差无几。不管怎样说，在当时北方诸少数民族政权中，前燕对汉族流民的政策是最好的。

劝课农桑和招徕流民相辅相成。如果不把流民用于农业，就无法解决其流亡问题，也不能保证前燕对他们的剥削。为此，慕容廆特意从东晋引来桑种。慕容皝时，针对大量流民的涌入、“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4]的状况，开放苑囿牧场，模仿曹魏，实施屯田。采用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的剥削方法，对一些贫困无力的人，还分赐粮种和耕牛一头，扶植他们从事生产。同时，前燕还设置了专职机构管理和兴修水利。

第二，提倡儒学。

慕容廆是一个醉心于汉文化、染上重文慕儒之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占有辽东后，设置学校培养子弟及汉族地主阶级的子孙，有时还亲至学校听讲。慕容皝的汉文化修养高于乃父，定都龙城（辽宁朝阳）

后，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的规模，生徒达千余人。在辽东的历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慕容皝亲自撰写了汉文课本《太上章》，代替了汉文帝时编写的课本《急就篇》，又著《典诫》十五篇作为贵族子弟的政治课本。他经常到学校去讲授或主持考试，选拔生员中优异者为官。其子慕容儁继位后，又设立小学教育慕容权贵子弟，而后进入太学深造，学校建置更趋完备。史称慕容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5]前燕最后一个统治者慕容暐也是“好学”“多艺”[6]的人物。前燕统治者热心提倡儒学，无疑是为了巩固统治，但却有力地促进了慕容部和汉族的融合。

第三，拉拢世家大族。

慕容廆说：“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7]他十分重视人才，竭力笼络汉族世家大族。凡汉族士人来归者，慕容廆都量才录用。汉族士族阳骛“母李氏，博学有母仪，慕容皝常升堂拜敬”[8]。这样对待士族，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中也不多见。在前燕文武大臣中，有大量汉族士人，而且都有实权。《资治通鉴》卷88曰：“段氏兄弟专尚武勇，不礼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之。”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的例子俯拾即是，有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士人也十分信任，但就总的情况来看，选用汉族地主之广泛、关系相处之融洽，恐怕还要首推慕容氏政权。正由于此，前燕灭亡后，原先臣属前燕的汉族世家大族们对慕容氏一往情深，处心积虑地为慕容氏的复国奔走呼号，竭尽犬马之力。

前燕对我国辽东地区的开发和促进民族融合是有贡献的。在上述一系列措施下，前燕由弱转强，击灭了鲜卑段部和宇文部，一度击灭了高句丽，并且吞并了幽冀一带的其他鲜卑部落，顶住了后赵的频频进攻。

后赵末年，中原大乱，前燕乘机推进。前秦皇始二年（352）魏昌（河北定州和深泽间）一战，前燕生擒了冉闵。不久，前燕又攻克了邺城（河北临漳西南）。迁都中原，初都蓟城（今北京），后都于邺。此时，晋旗号对前燕已毫无作用，慕容儁坦率地对东晋的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9]前燕全盛时，其疆域“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10]，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的广大地区及辽宁的一部分，成为与前秦据大河对峙的劲敌。

二、前秦和前燕的对峙

前燕所占地盘大于前秦。关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所在，秦、燕双方比较，燕的实力远强于秦，用前燕尚书左丞申绍的话来说，叫作“中州丰实，户兼二寇，弓马之劲，秦、晋所惮”[11]。如果说苻健、苻生在位时，前燕正忙于关东地区的征战杀伐，还不足以威胁前秦的话，那么苻坚在位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建元元年（365），前燕太宰、大都督、录尚书事慕容恪领兵攻占洛阳，生俘东晋扬武将军沈劲，前锋推进到崤谷和渑池（河南渑池西），“秦中大震”[12]。苻坚被迫亲临潼关，布防陕城（河南三门峡市），直到慕容恪奏凯班师，苻坚才松下一口气来，回到长安。

前燕始终没有兵击前秦的愿望。永兴二年（358）苻坚政变未久，前燕主慕容儁下令各州查核户口，户留一丁，余悉为兵，力求凑一百五十万兵马，“复图入寇（东晋），兼欲经略关西”，当有人力陈“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13]，慕容儁才改为三五占兵，以备来年大举。

前燕进攻前秦的机会相当多，以建元四年（368）前秦魏公苻廋[14]、晋公苻柳、燕公苻武、赵公苻双四人联合作乱的这个机会为最佳。叛乱一起，举国震动，人心惶惶。当时图谶中又有“燕马当饮渭水”之说。苻坚为此焦虑万分，他最害怕前燕乘势而动，支持据有陕城的苻廋和蒲坂（山西永济蒲州镇）的苻柳，从这两地打入其腹心。前燕绝大部分文臣武将主张乘机发兵，范阳王慕容德更为积极，一再上奏，指出前秦“自相疑戮，衅起萧墙”，正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大好时机，真可谓“时来运集，天赞我也”，如果不乘机而动，那就悔之晚矣，“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力主兵发两路，进援陕城和蒲坂，倾国而动作为后援，一举荡平前秦。不料执政慕容评在收受了苻坚的贿赂后却说：“秦虽有难，未易可图。朝廷虽明，岂如先帝，吾等经略，又非大宰（慕容恪）之匹，终不能平秦也。但可闭关息旅，保宁疆埸足矣。”坐失了大好时机，前燕智能之士只有无可奈何地悲叹：“谋之不从可如何！”[15]

“闭关息旅，保宁疆埸”，这实际上是前燕进入中原后的基本国策。如果说在慕容儁时尚不明确的话，慕容恪辅佐慕容暐时就十分明朗了。慕容恪曾对慕容暐的弟弟安乐王慕容臧说过：“今劲秦跋扈，强吴未宾，

二寇并怀进取，但患事之无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国兴在贤辅……吴王天资英杰，经略超时，司马职统兵权，不可以失人。吾终之后，必以授之。……国家安危，实在于此，不可昧利忘忧，以致大悔也。”临死前又对慕容暐说：“吴王文武兼才，管、萧之亚，陛下若任之以政，国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窥阏之计。”[16]

慕容恪是文武才略皆臻于一流的人物，史称“雄毅严重”，“沈深有大度”。他善于用兵，“临机多奇策”，“推锋而进，所向辄溃”。他治军“不事威严，专用恩信；抚士卒务综大要，不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时营中宽纵，似若可犯；然警备严密，敌至莫能近者，故未尝负败”[17]。在前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愈演愈烈的时刻，慕容恪是稳定时局的中流砥柱。军国大谋，慕容恪决不自专，遇事必和慕容评等商议。慕容恪“虚襟待物，咨询善道，量才处任，使人不逾位，朝廷谨肃，进止有常度”[18]。他很会团结人，“官属、朝臣或有过失，不显其状，随宜他叙，不令失伦，唯以此为贬。时人以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过，自相责曰：‘尔复欲望宰公迁官邪！’”[19]慕容恪亦曾以灭秦为己任：“每欲扫平关陇，荡一瓯吴，庶嗣成先帝遗志，谢忧责于当年。”[20]可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只好改变策略。

慕容贵族崛起于辽东时，生气勃勃，进取心极强。进入中原前夕，前燕统治集团已日趋腐朽了。慕容皝统治后期，前燕已“官司猥多”“游食数万”，他本人又追求宫室园苑。参军王宪、大夫刘敏切谏时弊，竟遭“削黜禁锢”的惩处。对屯田民的剥削也残酷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用官牛者，“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私牛而无地者……公收其七，三分入私”[21]。进入中原后，慕容权贵安富尊荣，进取心丧失殆尽，征调的繁重，造成“人不堪命”。仅刘贵的上疏开列的时弊就达十三件之多。明察之士，已预感到前燕“土崩”[22]的危机即将来临。

慕容儁死前，遗命慕容恪、慕容评和慕舆根共同辅政。慕舆根阴险狠毒，他为篡夺帝位，在拉拢党羽的同时，先是煽动慕容恪废慕容暐自立，继则利用太后可足浑氏干政的野心，力促太后控制慕容暐，杀死慕容恪和慕容评。当这些阴谋一一破灭后，他又诱慕容暐还都龙城。一时间飞短流长，谣言四起，人心惶乱，慕容恪无奈，杀了慕舆根。参与慕舆根密谋的人相当多，“诛夷狼籍，内外恟惧”[23]。慕容恪好不容易把政局稳定下来，可足浑氏、慕容评和慕容垂之间的矛盾又激化了。慕容恪认定慕容垂是皇室中继他之后唯一有才干稳定政局的人物，可足浑氏和

慕容评却非排挤慕容垂不可。慕容恪的精力完全浪费在权贵争权夺利之中了。

慕容暐本性“庸弱”，对朝政毫无兴趣，沉湎于淫逸享乐，却又自命不凡，报复之心极强。慕容儁也认为这个儿子难当重任，有意让慕容恪继位。但慕容恪决心以周公自居。慕容儁对慕容暐仍不放心，征询太子中庶子李绩的看法。这是一个老于世故，却颇为老实、满腹经纶的官僚。他知道，据实陈奏，慕容暐一旦即位，后果不堪设想，昧心而论，又于心不甘，搜索枯肠，终于罗列了慕容暐八大优点，最后期期艾艾地说出了慕容暐有“雅好游田，娱心丝竹”[24]的两件缺憾。慕容暐记恨在心，即位后便图报复。慕容恪屡次举荐李绩，慕容暐坚决不用，被追无奈，说出了这样的话：“万机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阳（李绩字伯阳）一人，请独裁。”[25]李绩被贬逐出京，忧郁而死。

慕容暐“后宫四千有余，僮侍厮养通兼十倍，日费之重，价盈万金，绮縠罗纨，岁增常调，戎器弗营，奢玩是务”。上行下效，达官贵人，将相侯王，莫不“侈丽相尚，风靡之化，积习成俗”。吏治腐败已极，各级官吏专权弄势，朋比为奸，擢升罢黜均凭各自所好，举荐征辟大都是亲朋好友，“非但无闻于州闾，亦不经于朝廷”。地方大员只讲究贪污敲剥，每有征发，“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百姓穷弊，侵赇无已。”军纪松弛败坏，士兵厌战情绪与日俱增，逃亡现象根本无法遏止。逃亡士兵“相招为盗贼”，社会治安已无从谈及。如此腐败的统治使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急剧衰落，国库空虚，赋役激增，即便如此，百官的俸禄和士兵的粮饷还是发不出来。结果是“人无聊生”，“进阙供国之饶，退离蚕农之要”。达官贵人和地方豪右乘机兼并鲸吞，前燕人户隐匿现象非常严重，尚书左仆射悦绾奏言：

> 太宰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传》曰：唯有德者可以宽临众，其次莫如猛。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26]

“营户”是指前燕继承了曹魏以来的士家制度，士兵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家属随军或集中居住，身份地位低下，亦耕亦战，是封建政府控制的依附民。“军封”是“军营封荫之户”[27]的简称。西晋时实行过给兵制度，作为皇帝对立有军功的将相大臣的一种功劳报偿，受封者有权役使所给之兵，但调度权仍属封建政府。前燕继承了这项制度，把一部分世袭兵户（或称军户、营户等）分赐给公卿大臣，听凭他们役

使。权贵们借政治腐败之机，大肆侵吞，“三分共贯”讲的就是军户中有三分之一被他们占荫为依附人口了。前燕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晋书·慕容暐载记》只谈军营封荫之户，是极不全面的，《资治通鉴》卷101所载的情况，远比它严重得多：

> 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尚书左仆射广信公悦绾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并之心。而国家政法不立，豪贵恣横，至使民户殚尽，委输无人，吏断常俸，战士绝廪，官贷粟帛以自赡给，既不可闻于邻敌，且非所以为治，宜一切罢断诸荫户，尽还郡县。”

可见除了军营封荫户外，原先属于郡县的人户亦被大量荫占，依附人口之多已超过了封建政府控制的户口数。

慕容暐同意了悦绾清查隐附的建议，悦绾稍一查检，便搜括出了二十余万户。悦绾的清查极不彻底，却在达官贵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举朝怨怒”[28]，悦绾被暗杀了，清查隐漏人户的活动不了了之。[29]

“颓风弊俗亦革变靡途，中兴之歌无以轸之弦咏。”[30]这是前燕有识之士面对现实所发出的哀鸣。前燕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了。

如此状况，守成已是不易，还谈何进取。前燕和前秦，能称得上战争的，只有前燕挺进中原时的一次，即苻生寿光二年（356），东晋派遣将军刘度攻略前秦的青州（寄治弘农郡的卢氏，今属河南），前燕乘机派将军慕舆长卿打入轵关（河南济源西北）。前秦令建节将军邓羌御敌，轵关附近裴氏堡一战，慕舆长卿损兵两千有余，龟缩回去了。自此前燕再无大举。苻坚即位后，既以息兵养民为基本国策，双方也就相安无事，充其量只是接境地带，诸如今天的山西、河南两地有一些小摩擦。这些小摩擦又主要是前赵的残余势力张平、李历、高昌等人依违于秦、燕之间，时背时顺引起的。这三股势力覆灭后，这类小摩擦也极少见了。

三、周密的战前准备

前燕不图进取，给了前秦十年生聚的时间。

前秦国富兵强，苻坚和王猛急于逐鹿中原了。只是慕容恪还在，他

们稍有担忧。慕容恪死了，慕容评辅政，这是一个目光短浅，既无统军之能，又无治政之才，贪鄙成性，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权势欲旺盛的家伙。他和太后可足浑氏狼狈为奸，肆意妄为，“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31]。

对苻坚和王猛来说，这是初试锋芒，是和貌似强大的前燕为敌，稍有不慎，必然兵结连年，后患无穷。为求把握，建元三年（367），前秦西戎主簿郭辩假扮成游牧于杏城（陕西杏城西南）一带的匈奴酋帅曹毂的副使，借朝贡之名，混进了邺城。郭辩编造公卿，刺探虚实，只是在太尉皇甫真那儿才碰了一次壁。他奏报苻坚：“燕朝无纲纪，实可图之。鉴机识变，唯皇甫真耳。”苻坚放心了，正确地判断：“以六州之地，岂无智识士一人哉！”[32]前燕可灭，苻坚积极准备，调集大量粮草，储藏于陕城，以备不时之需。

一切准备就绪，不料祸起萧墙，苻生的四个弟弟联兵造反了。桓温亦在窥探时机，为抬高声望，取晋而代之，他急需辉煌的战绩。前燕无人，前秦忙于内乱，桓温抓住良机，在建元五年（369）提兵五万，捷足先行，水陆并进，扑向前燕。

前秦内乱甫平，一时无力，只有坐观时局。

桓温破关斩将，势如破竹，短短的三个月，推进到了枋头（河南浚县西南），距燕都邺城只有二百来里。保持原有势头，前燕唾手可得。

前燕惊恐万状，慕容暐和慕容评计划窜回龙城。慕容垂挺身请缨，被授命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统军五万迎敌。散骑常侍李凤和散骑侍郎乐嵩先后奉使前秦，呼请前秦兵出洛阳，侧击晋军，牵制桓温。

是否发兵，前秦朝廷内意见纷纭。绝大部分大臣提出，昔日前燕坐视桓温兵进关中，今天何必救他，这叫一报还一报。有人建议，借此胁迫前燕称藩。王猛不愧高人一筹，密报苻坚：“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33]于是命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统兵两万，驰援前燕。他们兵经洛阳，进屯许昌。

桓温的老毛病又犯了，和上次兵进关中一样，在大好形势面前犹豫不决，观望止步。时及秋冬，河水枯竭，粮草告罄，晋军被迫舍舟登

陆，由黄河南岸的东芜（河南延津东北）经仓垣（河南开封东北），步行七百余里，撤向襄邑（河南睢县西）。桓温归心似箭，斗志全消。七百里的行军，晋军精疲力竭。襄邑在望了，慕容垂也跟踪而至，他早就命令慕容德在襄邑设伏。时机终于来临，燕军前后夹击，一天之中，桓温损兵三万，夺路逃命，向谯城（安徽亳州）奔窜。苟池和邓羌亦已等得极不耐烦，遥见晋军败退而来，一个冲杀，又歼灭桓温军士一万有余。

此举对前秦太有利了：第一，桓温遭受重创，淮南等地尽陷敌手，内部议论纷纷，他再也无力窥视北方了。第二，前燕大受削弱，军政方面的弊病暴露无遗。第三，昔日郭辩要假借他人的名义混入邺城，见人还得说上几句“辩家为秦所诛，故寄命曹王”[34]，骗取人家的信任。现今前秦有恩于前燕，散骑侍郎姜抚和黄门侍郎石越等使节频繁出入燕境，他们负有和郭辩同样的使命。但他们是上宾，堂而皇之，登堂入室，谈笑风生，这还是瞧得起前燕的那些公卿！王猛也不清闲，殷勤接待前燕来使，曲意结交愿意吐露实情的郝晷等人，把前燕的内幕摸了个一清二楚。第四，苟池和邓羌出入河南，前燕在这一线的军防部署，他们亦已了如指掌。

慕容垂确实非同小可，襄邑一战，才干毕露，声誉日隆，已是众望所归，苻坚和王猛又多了一个劲敌。慕容评和可足浑氏更加坐卧不安，过去他们只是排挤慕容垂，现在是非置之死地不可了。慕容垂走投无路，这年十一月，带着儿子投奔了苻坚，一块石头也落地了。

慕容垂奔秦，一石激起千重浪，前燕朝廷内外人言汹汹。有人建议慕容评：请一个素孚众望的人物出来，给他个官做，消一消大家的怨气。与慕容垂关系不错、才被免官的关东士族首领高泰被请出来做了尚书郎，但没有实权，这就是慕容评治政的唯一妙法。

前燕不是没有明白人，尚书左丞申绍针对时弊，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奏议，呼吁整顿、改革。慕容暐看都没有看，扔到一边去了。梁琛多次奉使前秦，对前秦的意图了解甚深，警告慕容评：“秦扬兵讲武，运粟陕东，以琛观之，无久和之理。兼吴王西奔，必有观衅之计，宜深备之。”慕容评不以为然：“秦岂可受吾叛臣而不怀和好哉！”梁琛书呆子气发作：“邻国相并，有自来矣。况今并称大号，理无俱存！苻坚机敏好断，纳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锐于进取……桓温不足为虑，终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这居然被认为是颂扬敌国君臣，有通敌之嫌，梁琛

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皇甫真憋不住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早作防范，建议增兵洛阳、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壶关（山西壶关县东南），挡住前秦进兵的必经之路，有备无患嘛。慕容暐心动了，慕容评立刻反对：“秦国小力弱，杖我为援，且苻坚庶几善道，终不纳叛臣之言。不宜轻自扰惧，以动寇心也。”[35]一切安然如常。

前秦的使臣石越又来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慕容评的接待穷极奢侈豪华，歌舞声色，莫不俱备。“越言诞而视远，非求好也，乃观衅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谋。今乃示之以奢，益为其所轻矣。”[36]这是高泰和太傅参军刘靖在万不得已之际所献的计策。慕容评置之不理，依然故我。高泰愤然不已，称病辞职归家，不愿做这个腐朽至极的政权的殉葬品了。至此，“吾属今兹将为秦虏（矣）”[37]已成为前燕官员的普遍看法。

机不可失，时不待我，此时不举，更待何时！苻坚和王猛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借口。

四、王猛灭燕

我们把虎牢关（亦称武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西的土地割让给你们，这是慕容暐及慕容评在桓温驻兵枋头，急欲向前秦救助时许下的诺言。现在忧患已除，他们后悔了：“顷者割地，行人失辞，有国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38]这是他们对前秦索地使节的回答。

背信弃义，还有比这更好的借口吗？确实再没有比慕容暐和慕容评“大方慷慨”的政治人物了。他们把唯一能与苻坚、王猛抗衡的人才排挤给了前秦，又及时送去了前秦足以兴兵的理由。

建元五年（369）十一月，王猛为帅，建威将军梁成和洛州刺史邓羌为副，前秦的三万步骑杀出陕城（河南三门峡），如入无人之境，十二月便包围了洛阳。王猛致书燕荆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前燕以东汉南阳郡为荆州，刺史驻节洛阳）：“国家今已塞成皋（即虎牢关）之险，杜盟津（黄河渡口，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州西南）之路，大驾虎旅百万，自轵关（河南济源西北）取邺都，金墉（洛阳西北军防重地，城小，但十分坚固）穷戍，外无救援，城下之师，将军所监，岂三百弊卒所能支也！”[39]慕容筑惶急无计，开城出降。王猛兵不血刃，据有了关东名城洛阳。

小小的战斗还是难以避免的。驻守新乐（河南荥阳境内）的燕卫大将军安乐王慕容臧在石门（即汴口，河南荥阳境内，古代战略要地）一战，小挫秦师，俘获秦将杨猛，进据荥阳。梁成、邓羌立刻率精锐万人猛扑而来，慕容臧狼狈败退。

河南终于为前秦所有，王猛部署守备后，奏凯班师，准备集结更大的兵力，一举击灭前燕。

建元六年（370）六月，王猛统杨安、邓羌、张蚝、苟苌等战将十员，精兵六万，再击前燕。苻坚亲至灞上饯行："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从壶关、上党（郡治壶关）出潞川（浊漳河），此捷济之机，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吾当躬自率众以继卿后，于邺相见。已敕运漕相继，但忧贼，不烦后虑也。"王猛成竹在胸，视灭燕如摧枯拉朽，以宗庙社稷为理由婉言谢绝了苻坚亲临的一片美意："臣庸劣孤生，操无豪介，蒙陛下恩荣，内侍帷幄，出总戎旅，藉宗庙之灵，禀陛下神算，残胡不足平也。愿不烦銮轸，冒犯霜露。臣虽不武，望克不淹时。但愿速敕有司，部置鲜卑之所。"[40]

王猛兵分两路，令镇南将军杨安攻晋阳，他亲统主力挺进壶关，想乘前燕无备，迅速打开通向邺城的大门。

大敌压境，前燕倾国而动，慕容评领精兵四十余万驰援晋阳和壶关。[41]

王猛一路相当顺利，所过之处，前燕郡县望风披靡。七月，秦军攻克壶关。

晋阳雄踞天下之肩背，东阻太行山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和高壁岭，北扼东陉和西陉两关，号称四塞之地，易守难攻，是通向中原的北门，自古以来就是并州首屈一指的军事重镇。前燕在此兵精粮足，守城将士的家属全被扣留邺城为质，因此只有拼命死守。杨安久攻不下。八月，王猛移师晋阳，地面强攻不成，改挖地道。虎牙将军张蚝领精兵数百由地道冲入，大呼斩关，秦军一拥而入，活捉了燕并州刺史东海王慕容庄。

慕容评畏敌如虎，进至潞川，驻兵不动，坐视两城陷落。他依恃人多，妄图与王猛作持久之计，迫使王猛知难而退。能否击败慕容评部，成了灭燕的关键。十月，王猛集中兵力而来，未及安营扎寨，将军徐成

便受命侦察燕军虚实，规定日中回来，徐成却在黄昏时才汇报敌情。王猛决定以军法论处，骁将邓羌赶来求情。“若不杀成，军法不立。”这是王猛的回答。邓羌火起，回营勒兵，要和王猛拼个死活。强敌当前，岂容内乱，王猛让步了。邓羌致谢。王猛乘机安抚：“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郡将（徐成曾为邓羌故乡太守）尚尔，况国家乎，吾不复忧贼矣！”[42]一场祸乱消弭于无形。

慕容评爱财如命，潞川附近水源极少，他将此看成搜刮钱财的大好时机，所有山、泉都被严格看管起来，军民用水，一律缴钱纳绢，绢一匹，水两石；樵采柴草，现钱交易。[43]慕容评大发其财，“积钱绢如丘陵”[44]，将士们怨声载道。王猛得知欣喜过望：“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45]夜晚，游击将军郭庆统精骑五千，由小路绕到燕军后方，一把火把慕容评的辎重粮草烧个精光。大火烛天，夜照邺城。慕容暐才知危急，特命钦使刘兰连夜持节赶到了前线：“王，高祖（慕容廆庙号）之子也，宜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务抚养勋劳，专以聚敛为心乎！府藏之珍货，朕岂与王爱之！若寇军冒进，王持钱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将安傅！钱帛可散之三军，以平寇凯旋为先也。”[46]慕容评终于害怕了，心存侥幸，决定黎明挥军一击。

王猛岂能放过敌方“三军莫有斗志”[47]的大好时机。他慷慨誓师：“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宜各勉进，不可退也。愿勠力行间，以报恩顾，受爵明君之朝，庆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48]秦军个个奋勇，士气倍增。

一比七，燕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强将精兵，绝大部分是邓羌的部下。此部不动，胜利无望。“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成败之机，在斯一举，将军其勉之！”邓羌乘机要挟：“若以司隶见与者，公无以为忧。”王猛作难了，“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49]，邓羌不悦而退。

燕军尽数出动，人山人海，逼杀过来。秦军破釜沉舟，丢弃粮包，轻装迎战，奋勇冲杀。众寡悬殊，秦军颇现不支。王猛数次催令邓羌出击。邓羌高卧不动，置若罔闻。事态十分危急，王猛驰骑邓羌营帐，许其所求。邓羌一跃而起，大呼拿酒来，与张蚝、徐成等猛饮一通，跨马操矛，直插敌阵，来回冲杀，搴旗斩将，所向披靡。日中，燕军溃散。慕容评损军五万，弃军逃窜邺城。王猛挥军追杀，又俘斩十万。

奉命增援慕容评的宜都王慕容桓听说前线溃败，率部龟缩内黄（河南内黄西）。

崔鸿评论潞川之役曰：

> 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豫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猛之谓矣！[50]

恰如崔鸿所言，统率骄横跋扈之将，若不随机应变，从权从宜，岂能独收大功，王猛不愧为人杰。

秦军长驱而东，包围了邺城。王猛军纪严明，令出必行，法简政宽，所过之处，一无所犯。邺城周围，远近帖然，奔走相告：“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慕容恪）！”[51]前燕已完全解体，君臣成了釜中之鱼，邺城唾手可得。

王猛报捷苻坚，请求授予权宜处置之权：“顺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觉易主，自非守迷违命，一无所害。”[52]苻坚的命令来了：休养将士，待他亲临，再部署攻城。十一月，李威受命辅佐太子苻宏留居长安，处理军国要务；苻融镇守洛阳；苻坚亲统十万精锐，急如星火，七天之内，赶到了安阳。君臣相会，决策：邓羌追歼慕容桓，王猛攻邺。慕容桓闻讯，统部逃窜龙城。

邺城混乱不堪，惶惶不可终日。燕散骑侍郎扶余人余蔚集结扶余、高句丽等人质五百余人，夜开邺城北门，迎接秦军。秦军蜂拥而入，慕容暐、慕容评在千数卫士保护下，计划逃奔龙城。比及出城，侍从只剩下了十余骑。

元凶漏网，后患无穷，游击将军郭庆统部追擒。慕容暐狼狈已极，途中又遭强盗抢劫，身旁只剩下了安乐王慕容臧和定襄王慕容渊两人，窜到高阳，即为郭庆部将巨虎所缚，押送给苻坚。

慕容评逃得最快，窜回龙城，立脚不住，又窜至高句丽。喘息未定，被高句丽缚送苻坚，慕容桓被郭庆部将朱嶷击杀。

此役战绩辉煌，前燕君臣要人无一漏网，版图悉为前秦所有，王公已下鲜卑四万余户被逼迁长安。不久，苻坚下令：“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郡治陕西大荔）、北地（郡治陕西

耀州区）、丁零，翟斌于新安（今属河南），徙陈留（河南开封东）、东阿（山东阳谷东北）万户实青州（州治山东益都西北）。”恩许“诸因乱流移，避仇远徙，欲还旧业者，悉听之”[53]。

为庆贺胜利，苻坚诏令大赦：“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怀远以德，柔服四维，至使戎车屡驾，有害斯民，虽百姓之过，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54]

王猛受权处置善后，除各州刺史外，其余守令一切照旧，废除了前燕一些弊政，关东地区初步安定下来。

立国八十五年、传主四代的前燕灭亡了。

第二节 击灭仇池和取有梁、益

一、苻雅击灭前仇池国

前仇池国是由略阳清水（甘肃清水西北）氐人杨氏集团建立的。开国于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亡于前秦苻坚建元七年（371）。开国之君是杨茂搜。

汉末，清水氐杨氏中“勇健多计略”[55]的杨驹率部据有仇池（甘肃成县）。其孙杨千万为酋帅时，发展到万余户，受汉献帝封为百顷氐王。[56]建安十六年（211），杨千万全力支持马超与曹操为敌。马超溃败奔蜀，杨千万只身追随，部众被逼迁天水（甘肃天水）、南安（甘肃陇西渭水东岸）等地。

西晋初年，杨千万孙杨飞龙纠集部众，势力渐强，率部返回略阳。晋武帝拜杨飞龙为假平西将军。[57]

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关陇地区爆发了以氐帅齐万年为首的起义，杨飞龙养子杨茂搜乘机率氐族四千户打回仇池，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晋愍帝为引诱这支势力抗御匈奴汉国，进杨茂搜为骠骑将军、左贤王。杨茂搜表面上接受晋封，实际是一方割据势力，故史称其控制的地域为前仇池国。

仇池地处偏远，形势险峻，易守难攻，水源充足，利于农耕。在各股势力互相争逐之际，这一小块地盘都不大引起注意。仇池成为战乱时期较好的避难场所，这里历来为氐族的生息之地，杨茂搜在此立国，必然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况且杨茂搜又推行了一些较好的措施。

第一，安抚流亡。“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戊（即茂）搜延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58]永嘉六年（312），阴平郡（治甘肃文县西北）人民反晋，归顺成汉，氐、羌等族纷纷外迁，杨茂搜乘机招诱抚纳，扩张势力。其时梁州（治今陕西汉中）灾荒，他又放粮赈济。杨茂搜之子杨难敌自豪地对晋梁州刺史张光说：“使君初来，大荒之后，兵民之命，仰我氐活。”[59]

第二，积极与周围贸易往来，解决军国费用（此在第一章中已有叙

述）。

永嘉四年（310），汉、沔地区流民起义余部进入梁州。张光向杨茂搜求助，茂搜遣难敌支援，难敌却与流民领袖李运等联手，张光败死，难敌自称梁州刺史。

前仇池国鼎盛时，“种众强盛，东破梁州，南连李雄，威服羌戎”[60]。南与成汉接界，西与吐谷浑为邻，北与前赵毗连，统治地域相当于今天的陇南、四川的西北边地及陕西南部的部分地区。

仇池国小力薄，再图拓展，十分困难；力求自保，四周的一些强邻又不允许。吐谷浑固然没有威胁仇池，成汉及前赵却时刻虎视眈眈。

建兴二年（314），流民起义将领之一杨武投奔了成汉，梁州人张威等又起兵反抗，杨茂搜兵败，“于是汉嘉、涪陵、汉中之地，皆为成有”[61]。仇池仅存武都（甘肃成县西）及阴平二郡之地。[62]

对仇池威胁最大的是前赵。东晋大兴三年（320），刘曜击溃西晋残余势力南阳王司马保，乘胜耀武仇池。迫于前赵声威，杨难敌遣使称藩，接受前赵的官爵封号。次年，前赵再次兴兵而来，杨难敌大败，与其弟杨坚头潜逃汉中，归顺成汉。前赵占有仇池，命镇南大将军田崧留守。刘曜大军一退，杨难敌便统部回到武都。不久，击杀成汉镇守汉中的安北将军李稚和中领军李琀。太宁三年（325），杨难敌突然袭击仇池，俘杀了田崧，夺回了这块根据地。自此，杨难敌或顺或叛于成汉和前赵之间。前赵灭亡后，杨难敌又或顺或叛于成汉和后赵之间。

杨初统治前仇池国时，既称臣于后赵，又称藩于东晋，受晋封为征南将军、雍州刺史、仇池公，旋改封为天水公。仇池在杨初时一度中兴，乘后赵内乱，突然袭取了西城（陕西安康西北），并于苻健皇始三年（353）击败了前秦苻飞的来犯。

杨初是在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杀死杨难敌之子杨毅后夺取统治权的，此举导致了仇池内部连绵不绝的内乱和政变。苻健皇始五年（355）正月，杨毅姑子梁式王政变，杀杨初。杨初子杨国又勒兵杀梁式王。杨国在位未及一年，其从叔杨俊又杀杨国自立；杨国子杨安投奔了前秦。建元六年（370），杨俊子杨纂继兄杨世统治仇池，其弟武都太守杨统不服，起兵争权，兄弟间又出现了一场火拼。杨纂兄杨世在位时，苻坚对其既称臣于秦，又称臣于晋已极端不满，因忙于灭燕，只好

暂时搁置一旁。杨纂既立，内部有火拼，加上宣布与秦绝交，苻坚再也忍耐不住了。

建元七年（371）三月，苻坚命西县侯苻雅统益州刺史王统、射声校尉徐成、羽林左监朱彤、扬武将军姚苌等步骑七万[63]讨伐杨纂，以杨安为向导。

杨纂倾国而动，提兵五万，击秦兵于鹫峡（仇池北面），并向东晋呼救。晋梁州刺史杨亮遣督护郭宝、卜靖领骑千余助战。鹫峡一战，杨纂损兵近两万，郭宝和卜靖均为秦军击杀。杨纂退守仇池，杨统据武都投降了前秦。苻雅乘胜进逼，包围了仇池。杨纂部将杨他密遣儿子降秦，约定里应外合。杨纂走投无路，面缚请降。立国七十六年，传主九人的前仇池国灭亡了。苻坚“徙其民于关中，空百顷地”[64]，任杨统为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仇池。

二、吐谷浑及鲜卑乞伏部的降秦

吐谷浑，魏晋之际游牧于今辽宁阜新、义县、锦州一带，因始祖吐谷浑而得名。史称：“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65]因此，吐谷浑应是慕容鲜卑的分支。慕容部在迁居辽河流域时，嫡长子世袭制已确立，吐谷浑所统应是慕容部的一小部分。

慕容涉归死后，慕容廆和吐谷浑两部“马斗相伤”[66]，实质是因争夺牧场失和。吐谷浑势小力薄，周围又有其他鲜卑部落的挤迫，乃率部西迁，经阴山、河套，度陇而西，在东晋太宁年间（323—326）达于枹罕（甘肃临夏东北）。这一带是前凉和前赵争夺的战略要地，你来我往，吐谷浑两面受敌，难以立足，只能向西、向南谋取生存之地。前秦开国前后，吐谷浑部终于据有“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甘肃迭部县东）西至河南，南界昂城（四川阿坝）、龙涸（四川松潘）。自洮水西南，极白兰（青海柴达木盆地都兰一带）”数千里之地[67]，过着有“城廓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68]的游牧生活。

吐谷浑在迁徙之中，吸收了匈奴、羌族等零星部落，当它游牧于今青海西南部至四川西北部这一片广大地区时，已发展成为一个与鲜卑慕容部略有不同，具有自己特色的新的游牧部族了。《晋书·西戎·吐谷浑传》曰：“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

戴幂䍦。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财，窃女而去。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诸嫂。丧服制，葬讫而除。国无常税，调用不给，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他犯则征物以赎。地宜大麦，而多蔓菁，颇有菽粟，出蜀马、牦牛。”据此可知：

（1）无论服饰、婚丧嫁娶等习俗，吐谷浑均有自己的特色。

（2）吐谷浑已有少量的农业生产，产品是以饲养大牲畜的大麦、蔓菁为主。菽、粟的产量极少，蜀马、牦牛是其主要的畜产品。吐谷浑经济生活的主体是游牧。

（3）社会上已有“富家”和“富室”，商业交往已发展起来。贫富分化已十分明显，并有简单的律令保护私有财产。

（4）作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的捐税已经出现，尽管十分原始，尚未形成定制，但已和部落氏族组织难以相容。

（5）早在汉魏之际，鲜卑各部便“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69]。吐谷浑之父慕容涉归已开始模仿汉族改变其落后旧习，这对吐谷浑必然留有深刻影响，其上层“颇识文字”便是反映。这有力地促使吐谷浑上层建筑的变革，凌驾于公众之上的长史、司马、将军之类的官职及政府部门出现了。

总之，在前秦建国前后，吐谷浑已走到了原始社会的尽头，快要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了。苻坚时，碎奚[70]统领吐谷浑部。他好学但懦弱，前秦击灭仇池，碎奚胆栗，主动归顺，史称“碎奚以杨纂既降，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坚拜奚安远将军、漒川侯”[71]，前秦声威远布青海高原。前秦虽然没有对吐谷浑直接行使行政职权，但这是吐谷浑首次与中原王朝交往，对吐谷浑自身的发展，还是有积极影响的。

乞伏部是鲜卑的一支。汉魏之际，它自漠北南出大阴山，向陇西迁徙，与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联合，共推乞伏部以雄武著称、“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的纥干为首领，尊纥干为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鲜卑语，意为“非神非人”[72]。自此，这四部便以乞伏为号。西晋初年，乞伏祐邻时，乞伏部逐渐强盛起来，拥众五千余户，进至高平川（宁夏南部清水河），数度鏖战，击败拥众七万余落的鲜卑鹿结部，鹿结南奔略阳，祐邻尽并其众。高平川是有名的苦水之地，不宜放牧，乞

伏部又翻越牵屯山（宁夏固县西），进入苑川水（甘肃榆中东北）一带，先后击溃鲜卑吐赖部及尉迟权数部，收其众三万余落。继后又讨灭鲜卑莫侯部，降其众两万余落。乞伏部以苑川为中心，游牧于北起麦坚山（甘肃靖远东北）和度坚山（靖县境内），南达勇士川（甘肃榆中东北）[73]这一狭长地带。这里水草肥美，既宜放牧，又利农耕，乞伏部在此定居下来，势力大有发展。

乞伏祐邻三传至乞伏述延时，乞伏部逐步摆脱了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飞跃，初步建立国家。述延以叔父乞伏轲埿为师，委以国政；斯引乌泥为左辅将军，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这仍是一个以部落为核心的、军政合一的原始组织。

东晋咸和四年（329）乞伏述延死，子乞伏傉大寒立。时值石勒击灭前赵，威镇关陇，傉大寒慑于后赵声势，率部迁于麦田无孤山（甘肃泾川北）。这次迁徙使乞伏部大受损失，至傉大寒子乞伏司繁统领乞伏部时，仅止五万余落了。前秦击灭仇池不久，乞伏司繁统部迁至度坚山。前秦早就有意吞并前凉，当然不允许有一个强敌横亘其间。建元七年（371），仇池战火才熄，益州刺史王统便移师陇西，进攻乞伏司繁。

乞伏司繁尽锐而出，帅骑三万拒王统于苑川。王统颇有军事头脑，他正面佯攻，吸引住乞伏司繁的主力，暗遣一军突然袭击乞伏司繁的大本营度坚山，尽俘乞伏部五万余落。前线不战自溃，纷纷叛降前秦。乞伏司繁归无所投，叹谓左右曰："智不拒敌，德不抚众，剑骑未交而本根已败，见众分散，势亦难全。若奔诸部，必不容我。吾将为呼韩邪之计矣。"[74]诣王统军门请降。苻坚拜乞伏司繁为南单于，留居长安为质，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统领乞伏部。不久，鲜卑勃寒部打入陇右，苻坚放回乞伏司繁，授予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镇西将军名号，讨伐勃寒。勃寒请降，司繁留镇勇士川，发展成一方势力。

三、取有梁、益二州

前秦在取得东晋的梁（州治今陕西汉中）、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二州前，与东晋也时有战争，计其大者如下。

其一，王猛兵略汉阳。

建元二年（366），王猛统前将军杨安、扬武将军姚苌等步骑两万，进攻东晋荆州北部，兵达南乡（河南淅川南，湖北均县北）。这次出动，目的在于观衅。晋右将军、监荆扬雍三州军事、荆州刺史桓豁领兵赶到新野（今属河南），王猛便后撤，掳掠汉阳民万余户而归[75]。

其二，援助据寿春（安徽寿县）叛晋的袁瑾和朱辅。

建元五年（369），桓温北伐前燕，兵驻枋头时，特命西中郎将、豫州刺史袁真领兵直扑荥阳（河南荥阳东北），任务是打开荥阳石门，引黄济汴，沟通淮、泗水运，解决粮草问题。不料慕容垂老谋深算，一接掌兵权，便令其弟范阳王慕容德领精骑一万五千严守石门，导致桓温粮尽兵撤、舍舟陆行的一系列惨败。桓温怒气难消，决定以袁真为替罪羊，回到山阳（江苏淮安）后，迫不及待地奏免袁真为庶人。袁真老奸巨猾，早就料到桓温会来这手，立即上奏自理，遭到拒绝后，便据寿春降燕，遣使燕、秦呼救。前燕发布袁真为使持节、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宣城公。不久，袁真死，陈郡太守朱辅拥袁瑾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前燕发布袁瑾为扬州刺史，朱辅为荆州刺史，同时，命左卫将军孟高领骑兵驰援寿春。

寿春“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76]，是淮、淝间的军事要冲，建康的一大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桓温当然不能坐视，亲统精兵两万讨伐。恰值前秦大举伐燕，孟高奉命回援邺城，桓温轻易地包围了寿春。

前燕灭亡，袁瑾和朱辅立刻称臣于秦，吁请救助。过去苻坚忙于灭燕，虽然对这块战略要地垂涎三尺，但鉴于远隔一方，只能派遣小量部队虚张声势。现今前燕已灭，苻坚的触角即将伸向南方，当然不愿坐失良机。因此苻坚在发布袁瑾为扬州刺史、朱辅为交州刺史后，在建元七年（371）即命武卫将军王鉴、前将军张蚝统步骑两万驰救。

对于桓温来说，此役非同小可。寿春若失，非独建康寝食难安，他自己也必然声名大损，为此他精选良将，以其侄宁远将军、南顿太守桓石虔为主，统建威将军、淮南太守桓伊、谢玄[77]等迎战。石桥（淝水北岸）一役，王鉴、张蚝大败，士卒、战马损丧甚多，只有后撤。

寿春之役虽然损兵折将，对前秦来说，不过是一次小挫折，无害大

局。淮淝一线历来是东晋军防重地，既然这里难以得手，苻坚便掉转兵锋，去夺取东晋统治薄弱的梁、益二州了。

西晋末年以来，益州一直为成汉据有。东晋永和三年（347）初，桓温初试锋芒，一举击灭成汉，益州并入了东晋的版图。成汉后期，统治十分腐朽。李寿晚年“广修宫室”，“务于奢侈”，“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后继者李势变本加厉，“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国事。夷僚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加之荒俭，性多忌害，诛残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亲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78]。桓温灭了成汉，对成汉的弊政丝毫未加厘革，只是任命汝南名门望族周氏之后镇西将军周抚为益州刺史。自此，直到前秦攻占梁、益二州，益州一直是周抚及其子周楚、侄周仲孙的天下，这三人为益州刺史相继达四十一年之久。

周抚在益州的时间最久，计三十余年。这是一个善于攀附权势、昧于财货的人物。曾参与王敦之乱，与王敦谋主沈充、钱凤等狼狈为奸，“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异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79]。官任益州后当然好不了多少。周楚是否酷似其父，史文缺载，周仲孙则是“在州贪暴，人不堪命”[80]。因此，益州地区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其间以邓定和隗文、李金根和李弘这两次起义的规模较大。

永和三年（347），邓定和隗文起义，一度占有成都，拥范贲为帝，至永和五年（349）才被扑灭。

苻坚建元六年（370），广汉（甘肃文县西北）人李金根又聚众起义，众达万余，拥李弘为圣王，建年号凤凰，进攻樟槿（今属四川），后被血腥镇压。

自成帝咸康三年（337）起，梁州就是晋济南王司马遂之后司马勋的天下，他以征虏将军、监关中军事、梁州刺史衔据有汉中达二十九年之久。他“为政暴酷，至于治中、别驾及州之豪右，言语忤意，即于坐枭斩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81]。他之所以能够长期据有汉中，得益于汉中占有地理形势之利，更重要的是鉴于民族矛盾尖锐，有汉族人民的支持。此人野心勃勃，常想据益州自雄。苻坚建元元年（365），司马勋乘周抚刚死，自号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拥众打入剑阁（四川剑阁东北），过涪城（四川绵阳东），兵次成都，为周楚及

江夏相朱序擒获，传首建康。自后杨亮为梁州刺史，此人亦无治才，阶级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建元六年（370），爆发了陇西（甘肃陇西南）人李高的起义。李高诈称李雄子，攻破涪城，杨亮狼狈逃入益州。李高起义后为周楚血腥镇压。

桓温在击退王鉴和张蚝，攻下寿春后，紧锣密鼓地部署代晋。建元七年（371），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简文帝。东晋君巨，惶惶不可终日。苻坚评论此事曰："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谚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桓温之谓乎！"[82]东晋朝廷的此种状态，当然更无力关顾梁、益，形势对前秦十分有利。

建元九年（373），桓温死，东晋统治集团忙于权力的再分配，而此时苻坚已击灭仇池，打开了通向汉中的大门，正欲进兵，偏偏晋梁州刺史杨亮不识进退，竟于是年八月袭击仇池。秦梁州刺史杨安反击，杨亮一败涂地，各地守戍纷纷弃城而逃。杨安乘胜推进汉中。

机不可失，时不待我，苻坚当机立断，兵分两路，猛攻梁、益。益州刺史王统、秘书监朱彤率军两万兵出汉川；前禁将军毛当、鹰扬将军徐成率军三万直扑剑阁。

杨亮兵力不济，纠集当地少数民族巴僚万余人拒守。青谷（陕西南郑南）一战，王统和朱彤大败杨亮。杨亮东奔西城（陕西安康西），丢掉了这块"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邓、襄，西扼秦、陇"[83]的战略要地。汉中为前秦所得，通往成都的喉隘打通了。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蜀道难》中的名句。大剑山和小剑山峰峦重叠，峭壁直插汉霄，隘路如门，历来为蜀地巨防。昔年姜维失去汉中，退据于此，守天险而阻钟会，迫使邓艾只有间道阴平（甘肃文县西北）偷袭成都。孰料面对前秦的进攻，晋梓橦太守周虓（周楚之孙）竟然只是防守涪城，置剑阁于不顾，这一天险又为徐成轻取。

前秦兵进梓橦（郡治四川绵阳东），周虓所思竟是合家的安危。他的兵力本来不足，现在又分遣步骑数千护送母、妻循西汉水前往江陵（今属湖北）。朱彤闻讯而动，俘获周虓家小。周虓便在孝的名义下，

打开城门，投降了杨安。

晋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桓豁得知前秦兵进梁、益，派遣江夏相竺瑶率军救援。竺瑶是个胆小鬼，听到广汉太守赵长战死，立刻丧气而退。

益州刺史周仲孙企图在绵竹（四川绵竹东南）阻拦秦军。不料他刚与朱肜对阵，毛当所部三万已逼近成都。周仲孙无心恋战，率骑五千逃窜南中，成都亦为前秦轻取。

不到两个月，前秦就夺得了东晋的梁、益二州。西南少数民族邛、莋、夜郎等部酋帅纷纷遣使归附，前秦声播南中。

接替桓温执权的桓冲（桓温弟）还想挣扎一下，他罢免了周仲孙，以冠军将军毛虎生为益州刺史，虎生子毛球为梓橦太守，统部去收复益州。毛虎生虚与委蛇，进达巴西（郡治阆中，今属四川），借口粮草匮乏，退屯巴东（郡治鱼腹，今四川奉节）。东晋对梁、益二州已无能为力了。

和灭燕不同，灭燕后，在王猛的主持下，苻坚还关心一下关东六州百姓的疾苦，遣使巡行燕境，废除了前燕过于明显的酷政。这次除了赏赐有功将士，任命杨安为益州牧（镇成都）、毛当为梁州刺史（镇汉中）、姚苌为宁州刺史（屯垫江，今四川合川）、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外，别无其他措施，而是一心一意地去笼络失守之士周虓。在接连不断的军事胜利面前，苻坚的政策亦变化了。对前秦来说，这实在是个不祥之兆。

益州地区的阶级矛盾并没有因换了主人而变化。建元十年（374）五月，爆发了张育和杨光领导的起义，众达两万，遣使东晋呼救。

晋益州刺史竺瑶见有机可乘，会同威远将军桓石虔，合兵三万，杀向垫江（四川合川）。姚苌战败，退守五城（四川中江）。

少数民族之一的巴僚酋帅张重、尹万起而响应，会合张育，义军人数激增达五万有余[84]。张育自号蜀王，建元黑龙，浩浩荡荡杀向成都。

成都被围，益州告急。镇军将军邓羌奉命统精兵甲士五万配合益州牧杨安镇压。张育与张重因分权不匀而内讧，杨安、邓羌乘机反击，张

育和杨光退屯绵竹，张重和尹万屯集于成都南郊。

成都威胁初解，邓羌便统部支援姚苌。竺瑶和桓石虔兵败后撤，足以震动巴蜀人心、激起更大反抗情绪的东晋的威胁解除了。杨安和邓羌重新做出了部署：杨安镇压张重、尹万，邓羌镇压张育、杨光。九月，这四位起义的领袖相继牺牲，秦军在益州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仅张重、尹万部，便有二万三千余人牺牲。

第三节 灭凉

一、前凉概述

前凉是十六国时期汉人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开国于晋惠帝永宁元年（301），亡于前秦苻坚建元十二年（376）。开国之君是张轨。

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甘肃平凉西北）人。晋惠帝前期，历官太子舍人、散骑常侍等。时值八王之乱，中原战乱频起，洛阳政局动荡不定。凉州地处边远，西晋中央各派政治势力无力顾及，“秦中川，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85]。河西走廊确实是避乱趋福的理想场所。张轨深谋远虑，积极活动，力图官任凉州。永宁元年（301），终于如愿，被晋廷发布为凉州刺史。自此，凉州成了张氏的天下。

十六国初期，占据关陇的前赵和统一中原的后赵曾频频加兵前凉，迫于对方强盛，前凉先后称藩于前赵、后赵。其间，对前凉威胁较大的有三次。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前赵主刘曜在击灭陇右大患陈安后，借得胜之余威，亲统戎卒28.5万，西击前凉。刘曜沿黄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前凉“临河诸戍，皆望风奔退”[86]。这是张氏据有凉州以来碰到的第一次大危机，刘曜扬言将百道渡河，直捣前凉首府姑臧（甘肃武威）。张茂（张轨子，继其兄张寔之后在320年即位）在参军马岌和陈珍的建议下，亲统士兵，屯石头（姑臧城东），坚壁抗战，利用有利地形坚守。刘曜深知自己“军势虽盛，然畏威而来者（指被裹胁参战的氐、羌等族）三分有二，中军疲困，其实难用”[87]，背后有石勒伺隙而动，他不宜在这里久持，所以目的只是胁迫前凉归附。双方对峙十余天，张茂遣使称藩，贡献大量珍宝及牛羊，刘曜满足而退。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后赵凉州刺史麻秋借张骏（张寔子，325年张茂死后即位）新死，子张重华即位之机，统兵杀来，或陷金城（甘肃兰州西北），凉州震动。张重华以“资兼文武，明识兵略”[88]的谢艾为中坚将军，统五千步骑，一举得胜，斩首五千级。

次年四月，麻秋在后赵主石虎的严命下拥众八万猛攻前凉。镇守枹

罕（甘肃临夏）的前凉晋昌[89]太守郎坦拟弃外城，退守内城。武威太守张悛及宁戎校尉张琚反对，全力固守。麻秋围城数重，百道俱攻，云梯地道，无所不用，士兵死伤数万，毫无进展。后赵将军刘浑又率步骑两万配合麻秋攻城。郎坦畏敌而降，张悛赖张琚力战，终于使麻秋失利而退。

不久，麻秋又会合征西将军石宁再次进攻前凉。前凉将军宋泰等望风披靡，帅户两万有余投降。事态危急，张重华召回被排挤出去的谢艾，授予使持节、军师将军衔，统兵三万，临河阻击。谢艾计激麻秋。麻秋躁动，谢艾猛攻，斩敌一万三千有余，麻秋匹马而逃。

七月，麻秋、石宁纠集步骑十二万有余，长驱渡河，直逼姑臧。谢艾督军再战，又获大胜。麻秋退屯金城，哀叹："我用兵于五都之间，攻城略地，往无不捷。及登秦陇，谓有征无战。岂悟南袭仇池，破军杀将；筑城长最，匹马不归；及攻此城，伤兵挫锐。殆天所赞，非人力也。"暴君石虎也为之气沮："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真所谓彼有人焉，未可图也。"[90]

前凉之所以能以偏僻之乡、一州之地，顶住强敌的频频进攻，绝非偶然，这是张轨及其后继者们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结果。

其一，始终以晋室思臣自居，借以招徕汉族人民。

张轨及前凉初期的几个统治者都很有政治头脑。张氏到达凉州后，先后剪除了"势倾西土"、足以左右政局的大豪族张越、曹祛、麴佩、麴儒、贾摹等辈，吸收声望卓著、富有才干的宋配、阴充、汜援、阴澹等参加政权，尽力护佑统治基础。在"豪右屏迹"[91]的同时，颁令有司"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临危殉义，杀身为君；忠谏而婴祸，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谄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92]。一句话，在舆论及措施上压抑奸邪，弘扬正气，借以巩固统治。

永嘉之乱中，张轨是各地方镇中勤王最得力的一个。一首歌谣盛传于京师洛阳："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93]凉州声威远播中原。西晋灭亡后，张轨后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94]，前凉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却始终称臣于晋。晋元帝即位，张氏积极劝进，讨取晋室的封号，对东晋贡使

不绝。前凉除了不用东晋的正朔外，俨然一个矢志不渝的晋室忠臣。张骏的一举一动皆模仿王者，可是当群僚请他仿照曹操故事称王时，他却坚决拒绝，颁令“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95]。

在民族矛盾尖锐复杂，成为十六国前期北方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晋室是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张氏这一手对汉族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加上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96]，凉州成为西晋崩溃后汉族人民流迁的又一个主要场所。前凉除置武兴郡及晋兴郡等侨郡县安置流民外，又兴学校，提倡经学，凉州成为当时中国经学最兴盛的地方，直到隋唐，凉州经学对中原仍有巨大影响。

其二，恩威并施，慑服少数民族。

河西走廊历来是我国西部、北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主要干道，值此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之际，这里的民族成分更为复杂。其时，活动于河西走廊的少数民族除氐、羌外，还有匈奴、鲜卑及卢水胡沮渠部等。张轨入凉，讨伐了恃众不服的鲜卑，后又一举压服拥众十余万的鲜卑若罗拔能部，威名大震。对于归顺的少数民族，张氏又妥为安置。前凉军队的主力，绝大部分由“氐、羌之锐”[97]组成。1972年嘉峪关市新城乡发掘的魏晋墓葬中，有大量画像砖，其中不少是短衣窄袖、宽裤、编发的少数民族套牛耕地的画面，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少数民族安居乐业并逐步向农耕定居转变的情况。

其三，省简刑狱，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张氏据有河西，相当重视刑狱，一度获得“刑清”[98]的美称。剥削亦较轻，“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99]。每遇灾荒，必然开仓赈济。张氏对河西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兴修了一些高质量的水利工程。

河西走廊降水量极小，近年统计，东端武威年降水量为河西走廊之冠，为一百七十余毫米。西端敦煌仅有二三十毫米；蒸发量却十倍或数十倍于降水量。所幸祁连山冰川贮水量异常丰富，合理开发和利用冰雪融化下泄的流水，成为河西地区农业发展的关键。张氏统治前期，重视农田水利事业，仅在敦煌便开凿了阳开渠、北府渠、阴安渠等。其中北府渠全长四十五里，工程浩大，质量上乘。敦煌石室本《沙州图经》曰：“前凉时，刺史杨宣以家粟万斛买石修理，于今不坏，其斗门垒石作，长四十步，阔三丈，高三丈。”直到盛唐还充分发挥着作用。敦煌并

非前凉的心脏地区，这里的水利工程尚且如此，其他地区也必然会有水利事业在兴修。

前凉是继汉武帝在河西走廊军垦民屯以后的第二个开发期，对其贡献应该予以肯定。

其四，打通丝绸之路，发展中西贸易。

在海运尚未发展起来以前，丝绸之路是世界各文明古国和中国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唯一孔道。河西走廊位于丝绸之路的主线上，是中外经济文化往来的必由之路。张氏利用这一地域上的优势，加强西城长史（驻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的兵力，改戊己校尉为高昌郡（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前凉西越流沙，兵伐称雄于丝绸之路、阻碍中西贸易往来的鄯善和龟兹，“于是西域并降”[100]，纷纷遣使前凉，姑臧成了当时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为使西来的珍宝能进入中原，换取更多丝绸满足西来商旅使臣的需要，解决前凉的军国开支，前凉又采取了下列行动：遣使后赵，借“朝贡”之名打开通向中原的道路；结好成汉，假道成汉和仇池（时仇池称藩于东晋），与东晋频繁地交往。这些措施不但有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前凉也从中获取了厚利。

在上述措施下，前凉“民富兵强”[101]，经济有所发展，一改汉魏以来荒凉不堪、钱币不行的旧貌，商品经济稍呈活跃的趋势。为适应这一需要，前凉铸五铢钱，“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102]。

前凉全盛时，精兵甲士十万有余，其疆域“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苞葱岭，北暨居延”[103]，相当于今天的甘肃和宁夏的西部、新疆的东部及内蒙古的南部一角。

二、前秦和前凉的和战

前秦初建，立足未稳，前凉一反往日保境自守的姿态，频频袭扰陇右，虽不足以致前秦于死地，却也曾迫使前秦忙于应付。不过，此时前凉已日趋腐朽，自苻健皇始三年（353）起，前凉就内乱频作。

皇始三年（353），张重华尸骨未寒，其兄张祚便排挤了谢艾、马岌等才干出众的臣僚，废重华子张耀灵（不久被杀）自立。次年，张祚称凉王，建元和平。此人“淫虐无道，上下怨愤”[104]，其族人河州刺史

（镇枹罕）张瓘兵力颇盛，成了张祚的眼中钉。张祚遣兵三万偷袭枹罕，张瓘起而反抗，大败来军，乘胜推进姑臧。敦煌人宋混、宋澄兄弟在姑臧西合兵万余，配合张瓘。姑臧城破，张祚被杀，张耀灵弟张玄靓被立为凉王，张瓘自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控制大权，以宋混为尚书仆射。张瓘猜忌苛虐，专以个人爱憎为赏罚，前凉政治大坏，与宋混的矛盾也激化起来。甘露元年（359），宋混起兵，诛杀张瓘，自己执权。在宋混的劝说下，张玄靓去凉王号，降称凉州牧。甘露三年（361），宋混死，张玄靓族人张邕乘机起兵，诛灭宋混一族。张玄靓叔父张天锡与张邕共同执政。张邕骄矜淫纵，任用私人，大肆刑杀，人心离散。同年，张天锡起兵攻杀张邕，灭其一族。甘露五年（363），张天锡贼杀张玄靓，自立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

十年之内，前凉四易其主，四度火拼，迅速衰落下去。苻坚正是利用前凉内乱方作的有利时机，迫使前凉称藩的。苻坚即位，一时无力外顾，亦曾封赠前凉。自寿光二年（356）起，前凉对前秦贡使不绝，秦、凉间保持了将近十年的和平。建元二年（366），张天锡宣布与秦绝交，双方关系恶化。年底，略阳羌酋敛岐拥众四千余家叛秦，自称益州刺史，投降据有枹罕的李俨，由此导致了秦、凉之间一场较为严重的冲突。

李俨，陇西（甘肃临洮南）人。寿光元年（355）借前凉内乱之机据枹罕自立，打起东晋的年号，一时间“百姓悦之”[105]，势力有所壮大。李俨野心勃勃，初起之时，为求自存，时而附秦，时而降凉，取巧于秦、凉之间。敛岐投降而来，李俨势力有所壮大，自度凭借有利地形及手中实力足可自立，乃与秦、凉绝交，封拜牧守，居然以一国之君自居，招致了秦、凉同时发兵讨伐。

苻坚当然决不容许敛岐逍遥法外，何况略阳（甘肃秦安东南）又是陇右重镇，关陇门户。建元三年（367）二月，王猛统率陇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扬武将军姚苌、立忠将军彭越等步骑一万七千余人讨伐。秦军甫动，张天锡也兵分三路，自领三万余人马，杀向枹罕。

敛岐所部本是昔日姚弋仲的部下，王猛指令姚苌参战，目的就在于利用这一关系瓦解敛岐部众。此举果然有效，敛岐部属全部归降，王猛轻取略阳。敛岐逃窜至白马（甘肃西和西南），为邵羌所擒。

张天锡进军亦十分顺利，李俨迅速败北，退守枹罕，遣使前秦谢

罪，吁请前秦救助。苻坚早就垂涎这一河湟间的战略要地，乃命前将军杨安、建威将军王抚统骑兵两万，均由王猛节制，驰救李俨。枹罕城东一战，王猛俘斩张天锡甲士一万七千有余，双方对峙于枹罕城下。

王猛虽胜，据此兵力灭凉，殊无把握；何况前燕声势正盛，威慑关西，苻坚颇为担忧，双方若久耗下去，势必授前燕可乘之机。鉴此，王猛致书张天锡："吾受诏救俨，不令与凉州战，今当深壁高垒，以听后诏。旷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将军退舍，吾执俨而东，将军徙民西旋，不亦可乎！"[106]张天锡吃过王猛的苦头，此时审时度势，夺回枹罕绝无可能，既然王猛已给了台阶，也就引兵后撤了。

张天锡已去，李俨松了一口气。将领谋士们建议乘王猛无备，突然袭击。李俨考虑再三，认为不是上策，决定凭坚固守，拒绝秦师入城，幻想王猛师老兵疲，主动退兵。

王猛成算在胸，决定计取。他书生打扮，轻车简从，招李俨开城相见。李俨中计，请王猛入城。车至城门，精选出来的勇士们突然发难，劫持城门，埋伏在附近的秦兵一拥而入，活捉了李俨，押送长安。昔日石虎费尽心机想要夺取的这个山川险要，号称犄角河西、肘腋陇右的军事重镇，轻易落入了前秦之手。苻坚任李俨为光禄勋，封归安侯；升彭越为平西将军、凉州刺史，镇枹罕，河、湟一带已为前秦所有，前秦的西部防线更巩固了。

内乱、外患削弱了前凉，张天锡龟缩河西，不图振作，纵欲享乐，置政事于不顾。贪官污吏横行，内部争权夺利进一步加剧，"人情怨惧"[107]，前凉政局江河日下。

三、苟苌击灭前凉

两汉以来的历史表明："欲保秦陇，必固河西。"[108]前秦奠都长安，出于秦陇安全考虑，河西志在必得。只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苻坚忙于东线和西线的战事，才使前凉又苟延残喘了十来年。

建元七年（371），苻坚击灭仇池，兵进梁、益，为防张天锡从中作梗，乘机兵进陇右，特意派遣梁殊和阎负出使前凉，严厉警告张天锡："昔贵先公称藩刘、石者，惟审于强弱也。今论凉土之力，则损于往时；语大秦之德，则非二赵之匹；而将军翻然自绝，无乃非宗庙之福也

欤！以秦之威，旁振无外，可以回弱水使东流，返江、河使西注，关东既平，将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刘表谓汉南可保，将军谓河西可全，吉凶在身，元龟不远，宜深算妙虑，自求多福，无使六世之业一旦而坠地也。”[109]

慑于前秦声威，张天锡被迫遣使，谢罪称藩。苻坚因关东地区尚未巩固，牵扯精力甚多，进取梁、益的战争又将爆发，一时难以分兵前凉，只有权且拜张天锡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平公，等待时机。但前秦对前凉的小规模袭扰年年都有，西线兵力也时有增加。当此大厦将倾的时刻，张天锡虽然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却依然故我。他寄希望于东晋，频频遣使，乞求东晋发兵前秦，使苻坚不敢贸然进攻。

苻坚被激怒了，梁、益战事已经结束，前秦再无他忧，乃借口张天锡“臣道未纯”，决心对前凉大动干戈了。

建元十二年（376）八月，使持节、武卫将军苟苌受命统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步骑十三万伐凉。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辨、凉州刺史王统等率三州之众为后继。苻坚亲至长安城西饯行，颁赏从征将士。秦军兵马雄壮，装备精良，“戎狄以来，未之有也”[110]。此战必胜，苻坚绝无疑问。兵马才动，他已在长安造好了安置张天锡的房舍。

梁殊、阎负奉诏先行，征张天锡入朝。前凉君臣议论纷纷，主战主降争吵不休。主战者强调：“吾世事晋朝，忠节著于海内。今一旦委身贼庭，辱及祖宗，丑莫大焉！且河西天险，百年无虞，若悉境内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张天锡为群情所动，攘袂大言曰：“孤计决矣，言降者斩！”[111]乱箭射杀前秦使者，倾国而动，遣龙骧将军马建带精兵两万先行，征东将军掌据[112]带兵三万扼守洪池（甘肃武威洪池岭谷口），自统五万人马屯金昌（武威附近）。

秦军三道并进：梁熙、姚苌、李辨、王统在清石津（黄河与湟水交汇处）渡过黄河，兵击河会城（黄河与湟水交汇处），凉骁烈将军梁济据城降秦；苟苌统中军在石城津（甘肃兰州西北）渡河，攻拔缠缩城（甘肃永登南）；扬武将军马晖、建武将军杜周统骑兵八千西出恩宿（甘肃永昌南），截断张天锡西逃之路，防备西域方面的来兵。

马建是主战的，气壮如牛，却畏敌如虎，不战自退。姚苌带三千精兵追击，马建率万余人临阵投降，余部四散。洪池一仗，掌据兵败自杀。赤岸（枹罕东南）再战，前凉又损兵三万八千名，司兵（相当于五兵尚书）赵充哲当场丧命。张天锡整兵再出，驻扎赤岸，士兵哗变，只剩数千骑窜回姑臧。秦军兵临城下，张天锡图穷，只有投降。苻坚封张天锡为归义侯，拜比部尚书。

前秦兵出前凉，东晋调集兵马千方百计掣肘。兖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游军汉、沔，豫州刺史桓伊兵出寿阳（即寿春），淮南太守刘波泛舟淮、泗[113]。三道齐出，声势颇为浩大。桓冲又上奏晋廷，要求会同征西大将军桓豁“观兵伺衅，更议进取”[114]，亦即乘机展开北伐，晋廷立即批准。无奈秦军进兵神速，前凉之腐败无能大出东晋所料，仅仅一个月，立国76年的前凉就被击灭了。东晋只有徒呼奈何。

是役，前秦尽有河西走廊，掠徙凉州豪右七千户于关中。梁熙被任命为西中郎将、凉州刺史，坐镇姑臧。

第四节 灭代

一、拓跋部曲折的建国历程

代国是由鲜卑中的拓跋部建立的。灭亡于前秦建元十二年（376）。严格说来，代并不是一个割据政权，只是即将跨进阶级社会的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

拓跋部发源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余公里的嘎仙洞周围，活跃于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游一带，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生活。传说在拓跋毛时，拓跋部组成了一个“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的部落联盟。拓跋毛五传至拓跋推寅，正是东汉初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大漠草原出现了势力真空，拓跋推寅乘机统部“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如”[115]，即进入了呼伦湖周围，成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主人。拓跋推寅又七传至拓跋邻，决定再次南迁，未果而卒。其子拓跋诘汾继承父志，历经“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终于据有匈奴故地。这两次大迁徙使拓跋部离开了山高林密的大兴安岭，在呼伦贝尔和漠北大草原的抚育下，经济飞速发展，原始的猎人终于成了大草原上的牧民，拓跋部迅速壮大起来，为日后南下、逐鹿中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鉴于第二次迁徙由拓跋邻倡导，所以族人亦尊称拓跋邻为“推寅”。[116]

拓跋诘汾死后，部落联盟一度内乱，其子拓跋力微依附没鹿迴部，收拾余众，北居长川（内蒙古兴和一带），“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十余年后，力微吞并了没鹿迴部，东讨西伐，发展成“控弦上马二十余万”的一支势力。曹魏甘露三年（258），力微迁至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四月，召集“祭天”大会，杀了“观望不至”的白部大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自此，拓跋部在部落联盟中大酋长的地位确立起来了，拓跋部终于摆脱了它的传说时代。

拓跋力微死后，“诸部离散，国内纷扰”，至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力微少子拓跋禄官又统一诸部。禄官仿照匈奴旧制，将联盟一分为三：自率东部，游牧于上谷（郡治今河北张家口怀来东南）之北、濡源以西（河北沽源东北）；力微孙拓跋猗㐌率中部，游牧于代郡的参合陂（山西阳高东北）以北；猗㐌弟弟拓跋猗卢率西部游牧于盛

乐。禄官、猗㐌相继病死后，猗卢总摄三部，“控弦骑士四十余万”，成了塞上劲旅。时值永嘉之乱，中原动荡，据有晋阳（山西太原南）的西晋残余势力并州刺史刘琨为求取猗卢的支持，与汉国刘渊为敌，在永嘉四年（310）奏请晋怀帝封猗卢为代公；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又进封猗卢为代王，并割陉岭以北（山西代县西勾注山以北）马邑（山西朔县）、阴馆（山西代县西北）、楼烦（山西宁武附近）、繁峙（山西浑源西）、崞（山西浑源西）五县为其封地。尽管猗卢控制的地方还称不上是一个政权，旧史中却以代国名之了。

自力微至猗卢，拓跋部有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过去这个部落联盟的酋长是不能世袭的，自力微起，联盟大酋长为拓跋部垄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才开始确立起来。《魏书·序纪》详细记载了力微以后的世系。

其次，往日部落内部事务由各部落自行解决，既无法律，更无刑狱。自力微起，联盟酋长及四部大人会议成了最高权力机构，“国俗宽简，民未知禁”的状况逐渐改变。猗㐌（桓帝）和猗卢（穆帝）共领拓跋部时，已经是“治国御众，威禁大行”[117]了。猗卢后期，进一步发展，乃至“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魏书·刑罚志》进一步明确记载了猗卢的“刑”、“法”及“命”：“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虽然猗卢的刑法只是以军令从事，但拓跋部原始的刑律毕竟是出现了。

最后，过去联盟内部只有部落大人的名称，猗卢后期“备置官属”[118]，出现了各种将军、侯爵之类的名号，居于他们之上的是“左右辅相”[119]。这些名号虽然是由西晋移植过来的，极不完善，甚至其职权和西晋的官名也可能大相径庭，拓跋部毕竟有了原始的职官。

概言之，自力微至猗卢，随着军事活动和掠夺战争的频繁展开，部落权贵逐渐成了凌驾一般成员之上的人物，联盟酋长更具备了向皇帝转化的可能，拓跋部已走到了文明时代的门口。这个变化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拓跋部迁移漠北后，逐步吞并了残留于大草原上的乌丸及匈奴的余部。

其二，拓跋部和中原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力微长子沙漠汗曾作为质子长期留居洛阳，拓跋部与曹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聘问”“奉遗”当然不可信，但拓跋部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却于此可见。西晋时，这种往来有增无减。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汉族人民苦于战乱，大量流徙四边，其中亦有进入拓跋部者。代郡名门望族卫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卫操劝说猗㐌和猗卢“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120]。今天，难以统计此时流入拓跋部的汉族人口，《魏书·卫操附从子雄传》载，猗卢死后，拓跋部大乱，卫雄等“率乌丸、晋人等数万众”投奔了刘琨。《资治通鉴》卷89记载的数字更具体一点：“晋人及乌桓三万家，马牛羊十万头。”需要说明的是，这仅是随卫雄等投奔刘琨的乌丸及汉族人民，可以断言，还有相当数量的汉族人民仍然留居在拓跋部。那么，投奔拓跋部的汉人肯定超过上述数字。

匈奴、乌丸和汉族人民的文明程度远高于拓跋部，特别是汉族，他们与拓跋部的结合，毫无疑问，必然给拓跋部带来积极的影响。最明显的一点是拓跋部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经济繁荣，剩余产品的积累日益增加，史称“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乂安，财畜富实”。与此俱来的便是私有财产的出现，部落权贵占有财富的欲望与日俱增。沙漠汗就是在部落权贵们接受了西晋征北将军卫瓘的贿赂后，被权贵们谗害而死的。同时，拓跋部和四周的贸易往来也日趋频繁。《水经·河水注》曰：“皇魏桓帝十一年（305），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雁门繁峙地区“家世货殖，赀累巨万”的大商人莫含亦“常来国中”。部落权贵们财富积累的速度加快了，拓跋部内部贫富分化日益明显。正是这个变化，才促使拓跋部迅速向阶级社会迈进。在这方面，汉族士大夫起了较大的作用，莫含就是猗卢请求刘琨一再说项，留居拓跋部，成了猗卢的左右手，“常参军国大谋”[121]的。

激烈的变化必然引起拓跋部内部新旧势力的冲突；猗卢协助刘琨不断与刘聪、石勒进行的战争，加深了一般部民的苦难。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内乱爆发，猗卢被杀，部落离散。拓跋部建国的历程首次受挫。

代国瓦解了，拓跋部仍然是草原上的强劲势力，“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经过二十三年的你争我夺，沙漠汗的曾孙拓跋什翼犍在东晋咸康四年（338）即代王位，拓跋部的建国历

程加速了。

什翼犍“雄勇有智略，能修祖业，国人附之”[122]。即位后，他通好前燕，缔结婚姻，仰仗前燕力求扩张，又采取了下列措施。

第一，置百官，分掌众职。《魏书·官氏志》较详细地记载了什翼犍时的职官建置：“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这些左右近侍由各部落的权贵子弟组成，既是代王的亲信，又是代王控制各部落的人质，代王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第二，制定了一些律令。规定“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属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123]。和猗卢的“以军令从事”不同，这些律令的核心是：维护代王的最高统治权，保护私有财产，相应改革了血族复仇及自由两性关系的旧习。

第三，咸康六年（340），定都云中盛乐宫，次年，在盛乐故城南八里修建了盛乐新城，代有了较固定的政治中心。

第四，咸康七年（341），召集诸部“设坛埒，讲武骑射，因以为常”，建立起由代王控制的常备军，被什翼犍叫作“六军”。它和昔日部落武装已完全不同，成为代王平定内部和对外扩张的工具。

总之，什翼犍时，拓跋部朝着建立国家的方向跨进了一大步，拓跋部的势力进一步壮大，“东自秽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率皆归服”[124]。就在文明时代的曙光即将照临之时，苻坚挟其雷霆万钧之力杀向代北，拓跋部的建国历程再次受挫。

二、苻洛灭代

建元十二年（376）十月，河西走廊的战火才熄灭，苻坚又立刻任命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统兵伐代，发动了灭代之役。

有关这次军事行动，诸史记载有所出入。《晋书·苻坚载记》曰：“坚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

州兵十万讨代王涉（什，笔者注）翼犍。又遣后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与洛会于涉翼犍庭。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封赏有差。”《魏书·序纪》则曰：“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冬十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王师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时年五十七。”《北史·魏本纪第一》叙事同于《魏书》，对什翼犍死因稍做补充：“皇子寔君作乱，帝暴崩。”诸史相同处在于：这次灭代的统帅是苻洛，前秦是数道并进的。不同在于：前秦动用的兵力究竟有多少？什翼犍是否被俘？

从相同点可以看到，苻洛具有节制诸路的权力，但他直接控制的只是幽州兵马。建元十六年（380），苻洛据幽州叛乱，倾城而出，全部兵马仅有“十万”[125]，这就证实《晋书》的记载较为可信。所以《资治通鉴》卷104曰：“秦王坚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为北讨大都督，帅幽、冀兵十万击代；使并州刺史俱难、镇军将军邓羌、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彤、前将军张蚝、右军将军郭庆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皆与洛会……”也就是说，这次动用的兵力是三十万。此外，尚需补充的是，除此数道兵力外，苻坚还命扬武将军马晖和建武将军杜周统精骑八千，由居延海（内蒙古额吉纳旗）奔赴代北。总之，这是苻坚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动用兵力最大的一次。

苻坚所以动用如许兵力，原因有二。

其一，拓跋部力量强大。苻坚诏书有具体的说明：“索头[126]世跨朔北，中分区域，东宾秽貊，西引乌孙，控弦百万，虎视云中。”[127]控弦百万过于夸大，经过苻坚认真订正，“控弦之士数十万”[128]是较可信的。这确实是不可轻视的实力。

其二，拓跋部是游牧部族，迁徙无常，活动地域相当辽阔。苻坚早就有意灭代，一再借秦代通使之机侦察代国的虚实。《魏书·燕凤传》载：“坚曰：‘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敌强退走，安能兼并？’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杖，驱驰若飞。主人雄隽，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炊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胜也。’”对付如此来去无常、擅长骑

射、专门以掠夺他人财物作为后勤补给的游牧部族，兵力少了显然不行。只有出其不意，抓住其集结或基本集结的时刻，数道包抄，扼其咽喉，方能奏效。什翼犍有每年七月召集诸部大会云中讲武驰射的习俗。胡天八月即飞雪，云中一带的自然条件优于大漠草原其他地区，七月大会后，云中基本上成为拓跋部的越冬地。苻坚正是抓住这个时机进兵的。可见灭代之役，苻坚的考虑相当周密。

代国回旋于大漠草原，前秦称雄于中原，表面上看，秦代通使往还，相安无事，史籍所载秦代间的战争极为鲜见，何以苻坚击灭前凉后，如此迫不及待地兵进代北呢？关键在于拓跋部力求南进，严重威胁着前秦。每遇中原大乱，时机有利，拓跋部便想推进中原。汉国后期，国力衰竭，乱象一现，拓跋部酋长郁律便宣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向中原推进的意图溢于言表。后赵崩溃，中原涂炭，什翼犍认为时机已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只是他即位未久，在联盟中的地位尚不稳定，未能成行。但什翼犍始终没有放弃推进中原的目标，代国的使臣在苻坚面前也决不讳言什翼犍是“一时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129]。既然如此，苻坚岂能不防。燕凤所言“此南方之所以疲弊，北方之所以常胜”，表明双方在边界地带的掠夺和反掠夺的战争相当频繁，拓跋部似乎占了不少便宜，而前秦则是防不胜防。建元元年（365），拓跋部部落联盟中的一员铁弗部的内侵，曾造成前秦巨大的恐慌。这一年，铁弗酋长刘卫辰和匈奴曹毂联手，在联盟中另一成员乌延部的支持下举众深入，大肆掳掠杏城（陕西黄陵西南）以南郡县，苻坚被迫御驾亲征。《晋书·苻坚载记》曰：“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以其前将军杨安、镇军毛盛等为前锋都督。毂遣弟活距战于同官川（陕西铜川一带），安大败之，斩活并四千余人，毂惧而降。坚徙其酋豪六千余户于长安。进击乌延，斩之。邓羌讨卫辰，擒之于木根山。”在苻坚前期的军事活动史上，因解除外来威胁而被迫御驾亲征的事件只有两次，都发生在这一年。第一次是前面讲到的慕容恪兵占洛阳，耀武崤渑；再一次就是刘卫辰的内侵。两者比较，后一次威胁更大，以致苻坚倾国而动。需要注意的是，铁弗仅是拓跋联盟中的一员，如果什翼犍冒险倾巢而出，那对前秦威胁就更为严重了。面对什翼犍的威胁，苻坚的对策如下。

首先，利用代国内部矛盾，分化瓦解，在秦、代间培植第三势力，建立缓冲地带。具体做法是支持刘卫辰。刘卫辰是南匈奴北部帅的后裔，该部在西晋初年叛出塞外，加入了拓跋部的部落联盟，与拓跋部世

通婚姻，“北人谓胡父鲜卑母谓铁弗”[130]，该部自此以铁弗为号，实际上是南匈奴与拓跋鲜卑混合而成的一个新的部落。在联盟内部，各部酋长的地位最初是平等的，都可角逐联盟的领导权。铁弗部强大起来后，成为与拓跋部争夺联盟领导权的劲敌。双方数度兵戎相见，铁弗部屡告败北，曾先后投降过汉国和后赵，想借助外力来争权。前秦初年，什翼犍利用铁弗部酋长刚死的机会突然兵临，迫使铁弗部屈服。但铁弗酋长刘卫辰却在甘露二年（360）潜通苻坚，“请田内地，坚许之”。其时苻坚政变未久，内部有待巩固，国力亟须增强，且外受强敌前燕和东晋的威胁，无力过问大漠草原的风云变幻，而且对刘卫辰的归附疑虑重重，所以当苻融提出“匈奴为患，其兴自古。比虏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处之于内地，见其弱矣，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义”[131]，苻坚欣然同意，处刘卫辰于朔方。刘卫辰目的难以达到，次年掠夺边民五十口作为奴婢送给苻坚，借以邀赏，又遭苻坚斥责。一怒之下，背秦附代。尽管刘卫辰对前秦时叛时降，并勾结曹毂等内侵，但苻坚毕竟认为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势力，擒获以后，仍封刘卫辰为阳夏公，护送朔方，帮助其恢复势力。由于什翼犍是前燕的外甥，此时刘卫辰也只有依靠前秦才能与什翼犍争权，所以更加依赖前秦。由此，什翼犍视刘卫辰为眼中钉，非除之而后快。双方数次对垒，刘卫辰均告失利，其间以建元三年（367）损失尤为惨重，数十万头牲畜及大部分部落成员为什翼犍俘获。刘卫辰每次失败，都是在苻坚的保护下回到朔方重整旗鼓的。苻坚此招可谓高明，他把秦、代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拓跋部落联盟的内部矛盾，极大地牵制了什翼犍，使他无暇南进。代国灭亡后，燕凤建议将代国一分为二，由刘卫辰和刘库仁分别统领。苻坚欣然接受。表面上看，这是燕凤建言之功，实质是苻坚对付拓跋部传统政策的继续。

其次，派遣亲信，统率重兵，布防边地，谨防什翼犍乘虚而入。永兴三年（359），苻坚政变不到两年，即任命参与其政变的核心人物之一、具有统兵治军之才的梁平老为使持节、都督北垂诸军事、镇北大将军，屯朔方之西，职责就是对付代国。与此同时，苻坚还建置了云中护军，以丞相长史贾雍为长官，屯云中南，和梁平老合力防御北线。前燕灭亡后，苻坚又在和龙（辽宁朝阳）、蓟城（北京西南）、晋阳（山西太原南）等重镇屯驻重兵，统治该地，兼防什翼犍的突然袭击。此外，他还在和龙设护鲜卑中郎将，晋阳设护匈奴中郎将，平城（山西大同西北）设护赤沙中郎将，协助上述三镇防务。苻坚用以防卫东晋的兵力经常维持在六万左右，用以防卫北边的兵力，仅幽州（州治今北京西南）

和蓟城，就达十三万，梁平老、贾雍及三个中郎将手控多少兵马，史文不明，仅从幽、燕两地兵力，即可推知什翼犍统率下的代国牵制前秦多少兵力了。

苻坚的志向在于一统中国，在相继击灭前燕、前凉，夺取了梁、益二州后，苻坚即将调转兵锋去夺取南下的前哨阵地。苻坚深知，与东晋交锋，绝非轻而易举，那么在此之前，他必须扫除腹背之患。值得注意的是，拓跋部和晋室的关系一直不错。西晋末年，刘琨在晋阳坚持甚久，是因为有拓跋猗卢的支持。代王名号亦来自晋室。东晋后期，姚兴谋夺洛阳，晋雍州刺史杨佺期向北魏呼救，对北魏的使者说："晋、魏通和，非唯今日……与君便为一家。"在他看来，与其让后秦夺取洛阳，还不如"宁使魏取"[132]的好。可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晋统治者是把拓跋部当作"一家"人看待的。什翼犍统治拓跋部时，晋代间有无交往，史文缺载，也许他并没有把东晋当作一国看待，但一直称代王，这多少是一种姿态。苻坚精通历史，对此岂能没有疑虑？何况以什翼犍之雄俊，当然会明白秦晋对峙，他可坐收渔利的道理。一旦苻坚重兵南进，他可挟其骑兵的优势长驱直进，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奔袭幽、冀、并三州，席卷河北，造成中土倒悬之势；突破前秦朔方防线，直指关中，袭击前秦腹心；西引乌孙，横扫凉州，威逼关陇。这些用兵策略，在历史上既不乏先例，就苻坚本人来说，也深有体察。以苻坚之明，当然会顾忌这种种可能。三种方案中任何一种，都会使苻坚南进的意图成为泡影，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只有击灭代国，苻坚才能真正筹措南进，这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具有极大威慑力的兵种。大漠草原的良马早就名闻海内，无疑对苻坚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不厌其烦地询问燕凤，代国到底有多少战马，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态："坚曰：'彼国人马，实为多少？'凤曰：'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坚曰：'卿言人众可尔，说马太多，是虚辞耳。'凤曰：'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犹当未尽。'"[133]有战马，还需要彪悍勇敢的骑士，才能组建强劲的骑兵。终年生活在马背上的拓跋丁壮，娴熟骑术固不待言，他们又和乌丸一样，有"贵兵死"[134]的传统，无疑是组建骑兵的最佳人选。昔年，曹操征服乌桓，征发其丁壮，组成了天下名骑，此时苻坚亦想效仿之。灭代后，苻坚不但在拓跋部中求将，更主要的是在其中求兵，下令"三五取丁"[135]，即三丁取二、五丁取三。这种措施在

苻坚统一北方过程中是极罕见的。这些被征发的丁壮可能是最早进入中原和汉族融合的一批。求取战马，征发拓跋丁壮，组建骑兵，也是苻坚急于灭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建元十一年（375），刘卫辰在什翼犍追击下南逃，于次年向苻坚求救。此时苻坚正集中兵力灭凉，无暇他顾。击灭前凉，北方再无其他势力可以掣肘前秦，灭代的时机已经成熟。秦军有刘卫辰做向导，进军神速。十月出动，十一月便扑近盛乐南郊，什翼犍措手不及，屡告败北，逃窜阴山。秦军追击不及，退驻君子津（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二百余里的黄河渡口），以待后举。什翼犍在阴山又遭高车等部抗击，放牧无所，在十二月返回云中。什翼犍晚年，内部继承权的斗争已在酝酿，军事上的惨败加速了事变的爆发。什翼犍回到云中才十二天，其庶长子拓跋寔君勾结拓跋斤（什翼犍之侄）突然发难，什翼犍被害，其余诸子大都被杀。苻洛得报，命李柔、张蚝连夜出动，尽俘拓跋部。寔君及斤被送往长安，车裂而死。

苻坚灭代后，采取的措施是“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136]。此外，将代国分为二，黄河以东归刘库仁，以西归刘卫辰管辖。其中“散其部落”、设官统治和征收赋役之类，对拓跋部日后的历史有巨大的影响。稍隔不久，拓跋珪复国，建立北魏，实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137]，并最终取得成功，正是直接继承了苻坚的上述措施。它对拓跋部由部落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跨进阶级社会有积极的作用。

最后就前秦是否俘执什翼犍略说几句。有关于此，历来有两说。其一是《晋书·苻坚载记》，持俘执之说：“其子翼圭缚父请降”，甚至还有苻坚与什翼犍之间问学、求将的对话。其二是《魏书》《北史》持什翼犍被寔君杀害之说。唐长孺先生认为后者可信：“于是内乱发生，什翼犍被儿子所杀，部落被前秦征服。”[138]笔者采唐先生之说。

首先，诚如唐先生所言，《魏书·昭成子孙传》虽然基本上据《北史·魏诸宗室传》补足，但未必尽出《北史》。两者略有不同，此种不同系出自《高氏小史》。它们记载一致，并与本纪相吻合，当非纯出偶然。

其次，《晋书》所本，是《宋书》《南齐书》。《宋书·索虏传》曰：什翼犍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鞬（即什翼犍）死，子

开即涉珪代立”。《南齐书·魏虏传》曰：苻坚遣将“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子珪，字涉圭……”，其间翼圭是个关键人物。什翼犍有九子，“庶长曰寔君，次曰献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阏婆，次曰寿鸣，次曰纥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139]，并无翼圭其人。所谓翼圭者，当系《宋书》中的涉珪及《南齐书》中的涉圭之误。涉珪即拓跋珪，北魏开国君主，什翼犍之孙，苻坚灭代时仅六岁，没有缚送什翼犍的可能。

最后，苻坚虽然崇尚儒学，但把重病染身、年近六旬的老翁送入太学，之后还有问学等语，方之情理，实难讲通。苻坚灭代后被当作人质留居长安并入学的倒确有其人，这就是什翼犍诸子中唯一幸存的少子窟咄。《魏书·太祖纪》曰：“初，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北史·魏诸宗室传》更曰：“窟咄，昭成崩后，苻洛以其年长，逼徙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学。”因此所谓求将、问学，应是苻坚与窟咄间的对话。

就在击灭代国的那一年底，苻坚又命庭中将军魏曷飞统骑兵两万七千人，配合殿中将军张旬招抚凉州西部尚未臣服的氐羌各部。魏曷飞纵兵大掠恃险不服的部落，遭到苻坚的怒斥，先锋储安问斩，所掠悉数归还。凉州西部八万三千余落氐羌在恩威并济之下，尽皆归附。

北方强大的势力和苻坚认为会引起动乱的祸苗已全数扫平，苻坚可以考虑放手南下，一统中国了。

第五节 吕光西征

一、吕光西征的原因

十六国时期，因为北方割据政权林立，战乱频仍，杀伐正酣，各政权统治地域极不稳定，所以各个政权极少考虑与周边各地，特别是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只有前凉、后凉和前秦等例外。

前凉和后凉虽然占有地理上的优势，注意和西域的交往，使其都城姑臧（甘肃武威）一度成为西域和中原及南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西来商旅使臣荟萃，但他们毕竟只是偏居一隅的割据政权，与统一了北方的前秦相比，不啻有天渊之别。

前秦前期的几个统治者对发展与周边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都相当重视。早在皇始二年（352），也就是前秦建国的第二年，苻健就留意“通关市，来远商”了。次年，苻健借“西虏”乞没军邪遣子入侍的机会，又在长安平朔门外设置了来宾馆，“以怀远人”[140]。苻生遣使胁迫前凉称藩，恐怕也有假道前凉、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意图。前秦和四周交往的全面展开及进入全盛，无疑是在苻坚统治时期，特别是统一北方以后。此时，长安成为和周边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来到关中，居住在长安的商旅使臣相当多。《太平御览》卷362《人事部·形体》引车频《秦书》曰：“苻坚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晋人为之题目：谓胡人为侧鼻，东夷为广面阔頞，北狄为匡脚面，南蛮为腫蹄，方方以类名。”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前秦与西域的交往。见于史籍记载，西域各地大规模的“朝贡”就有建元十四年（378）、十七年（381）、十九年（383）三次。十七年那次规模尤大。《晋书·苻坚载记上》曰：“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西来使臣带来的主要是名马、宝玉、土特产及珍禽异兽。苻坚的回赠非常丰厚，其中最主要的是深受西域各地人民喜爱的缯彩锦帛之类的丝绸。西域各国切盼与中原王朝扩大往来，建元十八年（382），苻坚在西堂接见车师前部（王廷交河，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王弥寘和鄯善（王廷婼羌，今新疆若羌附近）王休密驮，赐予朝服时，他们提出了“年年贡献”的要求。苻坚以“西域路远，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141]。但这个规定仅限于西域诸王及使臣，商旅不在此

限。不过，此时西域诸国中的绝大多数固然切盼与中原王朝扩大交往，但也有一些势力较大的城邦国家则抱有敌对情绪。为进一步经营西域，确保丝绸之路的通畅，建元十九年（383）正月，苻坚毅然命令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发动了对不从命者的征讨。

苻坚之所以要用兵西域，首先是顺应了西域各国的要求。建元十三年（377），车师前部王弥寘和龟兹（王廷延城，今新疆库车）王白纯[142]的弟弟来朝时，明确地提了“请兵往定，以求内附”的要求。[143]建元十八年（382），车师前部王弥寘和鄯善王休密驮进一步提出：“大宛（今俄罗斯费尔干那盆地）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144]

请求前秦出兵的诸国，情况和目的各不相同。白纯的弟弟是为了借助前秦的力量夺取王位，车师前部王及鄯善王则希望“按汉置都护故事”。众所周知，西汉设置西域都护，职责是宣扬和推行中原王朝的政令，协调西域各城邦国家的关系，保护各国的利益，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二人之所以要求前秦出兵，关键是此时丝绸之路上阻隔甚多，影响了他们的利益。

自东汉中后期至三国，由于中西间频繁交往，由敦煌（今属甘肃）出玉门关（敦煌西）进入西域的丝绸之路中段，已由原来的南、北两道，发展成南、中（以前的北道）、新（新北道）三道。《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

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新疆若羌附近）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新疆东端，在居卢仓东南，今已淹没在沙漠之中），回三陇沙（都护井北方）北头，经居卢仓（都护井西北方，已为沙漠淹没），从沙西井（居卢仓与白龙堆之间，已为沙漠淹没）转西北，过龙堆（即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东），到故楼兰（在古鄯善境内，今新疆罗布泊，已为沙漠淹没），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故城遗址），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曹魏及西晋时期，对西城经营颇为尽心，“西域流通，无烽燧之警”[145]。随着西晋王朝的衰落和崩溃，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相对削弱，西域各国势力消长变化很大。十六国初期，鄯善、焉耆（王廷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龟兹等称雄西域，互相争夺，影响了中

西间的交流往来。为打通丝绸之路，东晋永和元年（345），前凉主张骏"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146]。这里没有涉及焉耆，其实这次西征的重点却是焉耆，因此《晋书·穆帝纪》曰："冬十二月……凉州张骏伐焉耆，降之。"张骏在这次西征后又加强了西域长史的兵力，丝绸之路中段畅通了，姑臧一度成为西来使臣商旅的终点站。

经过张骏那一次经营，鄯善与中原的交往相当频繁，关系亦好，但焉耆和龟兹则不同，前秦时关系更坏。

鄯善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大国，此时，南道畅通。焉耆和龟兹是中道和新道上的大国，由于他们从中作梗，中道和新道受阻。大宛和康居（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等更西一些国家虽然可以借行南道，但以中道最为简捷。因为中道也得经过鄯善国境，新道则经过车师前王国，中道和新道受阻，这就使鄯善和车师前王国的过境贸易受到了损害。他们深知，如果直截了当指责焉耆和龟兹，万一前秦不同意出兵，必然使双方结怨更深，招来兵祸。所谓大宛等国"诚节未纯"仅仅是一个借口，真正所指却是焉耆和龟兹。

焉耆位于高昌和龟兹之间，占地方四百里，地理形势十分显要。《晋书·四夷·焉耆国》曰："四面有大山，道险隘，百人守之，千人不过……其俗……好货利，任奸诡。"焉耆力图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及在丝绸之路上的有利位置，谋取更大的利益，曾一度"霸西胡，葱岭以东莫不率服"。它先遭张骏打击，后又为龟兹所败，势力削弱，但前秦时仍控制其周围的尉犁国（焉耆南）、危须国（焉耆东北）、山王国等为数较多的小城邦，有相当大的影响。前秦时，西域来使虽多，却未见有焉耆使节的记载，说明双方关系很不好。

龟兹（新疆库车）位于焉耆之西，塔里木河流经境内，自然条件优越，既宜农耕，又宜放牧，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尤其是冶铸业，"恒充三十六国之用"[147]。王廷延城修得十分坚固，"城有三重，广轮与长安地等，城中塔庙千数。（龟兹王）帛纯宫室壮丽，焕若神居。胡人奢侈，富于生养，家有葡萄酒至千斛，经十年不败"[148]，用吕光的话来说，"龟兹据三十六国之中，制彼王侯之命"[149]，是比焉耆影响更大的国家。前秦时，龟兹使者亦曾到过长安，但自建元十三年（377）苻坚遣使索要鸠摩罗什后，双方的关系便恶化了。

其次是前秦发展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及自身战略和政治上的需要。

前秦早就关注西域，苻坚击灭前凉后，对于经营西域更为关注。建元十三年（377），即苻坚击灭前凉的第二年，就派遣使臣前往西域，直达龟兹。次年，其凉州刺史梁熙又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150]。前引《魏略·西戎传》表明，丝绸之路南、中、新三道的东端，实际均以玉门关为终点，由此经凉州才能进入中原。按照前秦的政区建置，玉门关属酒泉郡（治今甘肃酒泉），但从地理位置看，它距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更近。要充分发挥玉门关的作用，确保丝绸之路中段，威震西域，显然必须加强对敦煌的经营和开发。鉴于此，苻坚曾先后大量徙民敦煌郡：“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151]若以每户五口计，徙置敦煌的人口达八万五千余人，加上原有土著，敦煌的人户一下高达两万三千余户，共十一万五千余人。这在敦煌前期的历史上，可谓空前。《晋书·地理志》载，西晋全盛时敦煌有“户六千三百”，就是整个河西走廊，亦仅有两万四千七百户左右。现在敦煌聚集的人户几乎与西晋全盛时河西走廊人户相等，而达昔日敦煌人户的四倍左右。即此一事，也不难窥见苻坚经营西域的迫切心理。

重视西域的经营是一回事，是否直接出兵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前秦内部的争论很大。《晋书·苻坚载记》曰：“苻融以虚耗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谏以为不可。坚曰：‘二汉力不能制匈奴，犹出师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虽劳师远役，可传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朝臣又屡谏，皆不纳。”可见是反对者居多，赞同者极少。仅从这一段话来看，苻融的言论和西汉盐铁会议中贤良方正们的言论如出一辙，不可取。他们不明白，古往今来，经济文化交流既是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各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而苻坚则明显出于好大喜功、扬威异域的欲望，同样不可取。其实，结合当时的形势及苻坚即将发动淝水之战的决心，可以看到双方都有合理的成分。

吕光西征前夕，苻坚已经统一了北方，取得了进击东晋的前哨阵地，平定了内部叛乱，表面上，前秦正处在极盛时期。苻坚踌躇满志，正在盘算倾全国兵力消灭东晋。他没有看到，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潜在的政敌正盼望着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苻融对此却有较清醒的认识，“虚耗中国”虽不足以表明

此时他内心的忧虑，此后不久，坚决反对发动淝水之战，则把他的忧虑和盘托出了。

灭燕后，苻坚的骄侈性急剧发展，吕光西征前夕，已达到顶点，非但不能清醒地估计形势，甚至连任何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了。在生活上，他追求美女和宫室器玩，乐而不疲。陇右河西虽然盛产玉石珍宝，但璆琳和琅玕等玉石中的上品，据《魏略·西戎传》，此时主要来源于大秦（东罗马帝国）。这当然只有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才能取得。苻坚求取这类奢侈品的心情如此迫切，西来使节们一眼就能看穿，以致龟兹王白纯的弟弟就以“西域多产珍奇”[152]为理由，敦促苻坚发兵。但除了好大喜功和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求外，苻坚之所以在淝水之战前夕力排众议，命令吕光西征，还是有其战略及政治上的考虑的。

第一，确保后方安全，集中全力伐晋。苻坚深知东晋是劲敌，消灭东晋并非轻而易举，因此一再召集群臣，筹划倾国而动。这样，确保后方的安全就至关重要。两汉以来的历史证明：“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153]前秦奠都长安，陇右河西的安危无疑是和长安唇齿相依的。尽管苻坚灭掉了盘踞凉州数十年的张氏及游牧于代北的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又收服了陇右河西的氐族和羌族，但前秦在凉州的统治并不十分稳固。这里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除了汉、氐、羌三族外，还有鲜卑秃发部、乞伏部、卢水胡沮渠部和匈奴等。如果这些少数民族的酋帅和西域联合起来，就会在侧背威胁关中。这在历史上既不乏先例，在前秦的征战杀伐中，亦有轨迹可寻。建元十二年（376），前秦发兵灭凉，张天锡就企图联合西域抗击。苻坚灭燕，实际用兵七万，灭凉，用兵十三万，灭代则达三十万，原因之一，是凉想联合西域，代则有乌孙（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等国的支持，苻坚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因此，在即将倾国而动前夕，加强陇右河西的统治，制伏西域，势必提上日程。

第二，确保河西战马供应，进一步取得西域的战马。《太平御览·地部》转引《凉州记》载，张掖及酒泉二郡间的祁连山脉，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冬暖夏凉”，是一个十分优良的天然大牧场。而焉支山东西亦达百余里，南北二十余里，“水草茂美”，自然景观及气候与祁连山相同。除此之外，敦煌附近也有优良的天然牧场。据传，汉武帝所得的天马，其中有一种就产于今敦煌南湖一带。[154]所以《汉书·地理志》曰：“自武威以西……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苻

坚取得凉州后，在这里同样设置了一些官牧场。在当时来说，骑兵是机动力和战斗力极强的战略部队，在筹划大举南下时，确保战马来源，是理所当然的。淝水之战前夕，苻坚下令公私马匹一律充作军用，不难看出，前秦马匹并不富余，凉州战马显然不敷所需。西域地区的汗血马等优良品种，历来为中原称道，获有“天马”的美称。建元十三年（377），“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但苻坚却说“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155]，并下令群臣作《止马诗》以示大宛使者，好像无意于西域名马。其实，这不过是故作姿态，笼络西域罢了。因此当建元十七年（381）大宛再献汗血马时，苻坚就不再退还了。吕光西征龟兹后上奏给苻坚的奏疏曰：“入其国城，天骥龙麟，腰袅丹髦，万计盈厩，虽伯乐更生，卫赐复出，不能辨也。”[156]在这里，吕光是把马当作头等重要事项向苻坚奏报的。吕光班师之日，又带回龟兹战马万余匹。这就说明，取得西域名马，是吕光西征的重要任务。

第三，罗致高僧，借助佛教，为其做一统天下之主打强心针（详见第七章）。

二、吕光西征

吕光是在建元十九年（383）正月由长安出发的。行前，苻坚亲自在建章宫饯送，并授以方略曰：“西域荒俗，非礼仪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157]对此，《高僧传》卷2的记载更浅显：“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表明此行不在于取地掠人，而是威服西域。

这次西征所动用的兵力，《太平御览》卷125引《十六国春秋·后凉录》曰：“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步骑七万讨西域。”《晋书·吕光载记》在吕光所统的将军中多了一个康盛，谈及兵力则为“总兵七万，铁骑五千”。《苻坚载记》亦曰：“配兵七万。”据此，铁骑五千应在七万之内，西征兵力似乎可以断言。但是《晋书·周虓传》里却突然冒出了一个“二十万”的数字：“及吕光征西域，坚出饯之。戎士二十万，旌旗数百里，又问虓曰：‘朕众力如何？’虓曰：‘戎狄以来，未之有也。’”《建康实录·晋烈宗孝武皇帝》完全抄录了《周虓传》中的记载。那么究竟动用了多少兵力呢？

《晋书·苻坚载记》载，建元十八年（382），“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皆赦不诛，徙阳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参加这次谋反的还有周虓，《晋书》本传曰：“后又与坚兄子苞（《晋书》校点本校勘记指出‘苞’为‘阳’之误。）谋袭坚，事泄，坚引虓问其状……遂挞之，徙于太原。”因此《资治通鉴》卷104太元七年（秦建元十八年，382）条曰：“秦大司农东海公阳、员外散骑侍郎王皮、尚书郎周虓谋反，事觉，收下廷尉……皆赦，不诛，徙阳于凉州之高昌郡，皮、虓于朔方之北。虓卒于朔方。”这里有关周虓发配的地方虽有龃龉，但他在建元十八年已被发配他地，不在京师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是说周虓根本就不能参与饯行西征军的盛会，所谓“二十万”云云，完全是张冠李戴。吕光西征所统兵力，只可能是七万。

吕光西征的路线及战争过程，史文记载十分简略，《晋书·吕光载记》曰：“行至高昌，闻坚寇晋，光欲更须后命。部将杜进曰：‘节下受任金方，赴机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进及流沙，三百余里无水，将士失色。光曰：‘吾闻李广利精诚玄感，飞泉涌出，吾等岂独无感致乎！皇天必将有济，诸君不足忧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进兵至焉耆，其王泥流（《晋书·四夷·焉耆传》作‘龙熙’）率其旁国请降。”当时，河西走廊已为前秦据有，吕光又有陇西董方、冯翊郭抱、武威贾虔、弘农杨颖为“佐将”，因此，他是经由河西走廊，由敦煌出玉门关西进，估计不会出多大的问题。疑难在于大军出玉门关以后，经什么路线到达高昌的。对此，胡三省认为：“自玉门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车师。”[158]这一判断很有见地。

自鄯善到车师前王国（王庭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交河故城遗址）是历来西行的必经路线。延光二年（123），班勇就是由楼兰（后改名鄯善）到达车师前王庭的。前引《魏略·西戎传》指出，当时丝绸之路中道必须经过鄯善更说明了这一点。为确保这一通道，在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边的海头设西域长史府，西晋、前凉继之。苻坚既有经略西域的意图，当沿袭不变。

吕光从长安出发前，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寘请求为向导。苻坚如其所请，加鄯善王休密驮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寘为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率其国兵为光向导”[159]。这种安排显然与吕光进军路线有关。

由玉门关至焉耆王庭，最大的险阻是玉门关以西的三百里流沙，寸

草不生。幸赖天公作美，有惊无险。焉耆国王面临前秦大军压境，不战自降，这一路可谓顺利。真正的战斗是在龟兹王庭延城南面展开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后凉录》摭拾史乘，进行了很有条理的叙述，激烈的场景清晰可见。

> （建元）十九年（383）……十二月，至龟兹。龟兹王帛纯捍命不降。光军其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上，以为持久之计。帛纯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婴城自守……光有喜色，又进攻龟兹城……光攻城益急。将军窦苟，洛阳人，以壮勇知名，从吕光攻龟兹，每登云梯、入地道，或时坠落，苏而复上，光深奇之。
>
> 二十年（384）五月，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于狯胡。[160]狯胡遣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国王及诸胡，内外合七十余万人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乃以草索为羂，策马掷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案兵以距之。光曰："彼众我寡，众营又相远，势力分散，非良策也。"于是迁营相接，案阵为勾锁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秋七月，战于城西，大败之，斩万余级。帛纯收其珍宝逃弃。王侯降者三十余国。

吕光胜利了，前秦军队的军纪也荡然无存。氐族本来好酒，在这葡萄酒遍地的龟兹王城，"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

经此一战，过去被龟兹控制的三十六国全被击溃，都归顺了吕光。吕光可谓收得了全功。此战使前秦威名大震，"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161]。吕光因功被苻坚拜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

吕光西征，往返时间为两年九个月，可以说十分顺利。原因是：当时从东北到西北塞外，没有一支强大的势力掣肘；西域各国都是城邦国家，各自为政，这就难以和吕光强大的军队抗衡；最主要的一点是西域各国的欢迎和支持。鄯善、车师姑不待言，即使是龟兹王国，也有许多上层分子愿意归附，白纯的弟弟早就企图勾结秦兵；鸠摩罗什也早蓄东来之意，预见到白纯称雄必然会招来兵祸，反对白纯的所作所为，主张若敌兵来犯，应以归顺为好。鸠摩罗什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的一个人物，"西域诸国咸伏什神俊。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162]。一个精神领袖的态度，当然会对各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否则七十余万兵力，又占地理之利，怎至于对吕光的军队无可奈何呢？

吕光有心霸据西域，考虑到这里情况复杂，难以割据，在鸠摩罗什

的劝说下，于建元二十一年（385）三月奏凯班师。行前，吕光立白纯之弟白震为龟兹王，劝他不要像其兄一样奢侈靡丽，为此特意令其参军段业写了一篇《龟兹宫赋》以示警诫。同时又“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163]东返，于是年九月进入姑臧（甘肃武威）。当然，鸠摩罗什亦为他所罗致。

自张骞通西域以来，动用七万兵力经营西域，是史无前例的，而返回时拥有两万余头的驼队，更是蔚为壮观。由“致”字可以看出，这样庞大的驼队，并非掠夺所得，是丝绸之路通畅后，在吕光抚循西域、“威恩甚著”的情况下蜂拥而来的商旅使者队伍。他们想在吕光大军的庇护下进入中原。《洛阳伽蓝记·城北》曰：“（神龟元年即518年）宋云与惠生……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罗布泊西部）……（城）中国（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这就说明吕光西征并非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他还把中原的文化传到了西域。因此吕光西征既是一次庞大的军事行动，又是一次规模盛大的经济文化交流。

吕光西征以胜利告终，珍宝、名马及鸠摩罗什为其罗致，还引来了西域的大商队，但苻坚的目的并未达到，原因是在吕光出发后不久，苻坚大败于淝水，庞大的前秦帝国迅速瓦解，中原又陷入了分裂割据，以至于吕光只有在歼灭梁熙后才能进入姑臧。这样，丝绸之路又只好以姑臧为其东端暂时的终点站了。吕光所率的队伍及其西征所得，成了他割据河西、建立后凉的基础。淝水之战苻坚的失败，关键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吕光西征也是造成这种激化的一环。

苻坚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吕光西征却仍有其巨大的意义及影响。

鸠摩罗什的东来，对中原的佛经翻译起了巨大的作用，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我国佛教史上值得大书的一件大事。

名马珍宝，犹如过眼浮云，“奇伎异戏”实乃西域文化珍品，它对我国古代精神文明具有巨大而又长远的影响。《隋书·音乐志》中有数段记载，证明了“奇伎异戏”的作用。

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

西凉（乐）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

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令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竖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

龟兹（乐）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

鄯善王及车师前部王要求苻坚“依汉置都护故事”经营西域，特别是经历了两个多世纪，西域各国，甚至是遥远的地区都完好地保存着两汉所给的节传，在吕光打败龟兹后，不远万里向吕光“上汉所赐节传”[164]，要求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和新的任命，充分说明两汉以来对西域的经营，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及和西域的交往，在西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使西域各国十分重视和中原王朝的联系。这是一种强大的向心力，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原和西域的联系更为广泛和深入，这种向心力也向前发展，广大的西域终于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吕光西征既得力于这种向心力，又加强了这一向心力。西域诸国，经吕光西征后，和后凉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焉耆、龟兹等使臣来往不绝，焉耆王还令其子到姑臧学习汉文化等等，便是有力的例证。

[1]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2] 此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资治通鉴》卷97“素连”作“素喜连”，“木津”作“木丸津”。

[3] 《资治通鉴》卷87。

[4]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5] 《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

[6] 《资治通鉴》卷100。

[7]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8] 《太平御览》卷431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9] 《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

[10] 《读史方舆纪要》卷3。

[11]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及附《慕容恪传》。

[12]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及附《慕容恪传》。

[13] 《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

[14] 《资治通鉴》卷101作“苻廋”。

[15]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16]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及附《慕容恪传》。

[17] 《资治通鉴》卷101。

[18]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及附《慕容恪传》。

[19] 《资治通鉴》卷101。

[20]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21]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22] 《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

[23] 《资治通鉴》卷101。

[24] 《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

[25] 《资治通鉴》卷101。

[26]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27] 《资治通鉴》卷108。

[28] 《资治通鉴》卷101。

[29] 清查隐漏人户及悦绾被暗杀，均在慕容恪死后，但这些弊政在他生前已十分严重是不言而喻的，故书于慕容恪死前。

[30]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31]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32]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附《皇甫真传》。

[33] 《资治通鉴》卷102。

[34]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附《皇甫真传》。

[35]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36] 《资治通鉴》卷102。

[37] 《资治通鉴》卷102。

[38]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39] 《资治通鉴》卷102。

[40]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41] 此据《苻坚载记》及《慕容暐载记》，《资治通鉴》卷102曰“三十万”。

[42] 《资治通鉴》卷102。

[43] 《水经注》卷10《浊漳水》。

[44]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45] 《资治通鉴》卷102。

[46]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47]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

[48]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49]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50] 《资治通鉴》卷102。

[51] 《资治通鉴》卷102。

[52] 《资治通鉴》卷102。

[53]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资治通鉴》卷108“十万户”作“十五万户”。

[54] 《资治通鉴》卷103。

[55] 《宋书》卷98《氏胡传》。

[56] 《魏书》卷101《氏传》曰：“仇池地方百顷，因以为号。”

[57] 据《魏书·氏传》。《宋书·氏胡传》曰：“假征西将军。”

[58] 《宋书》卷98《氏胡传》。

[59] 《资治通鉴》卷88。

[60] 《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

[61] 《资治通鉴》卷89。

[62] 杨茂搜死，杨难敌继立，自号左贤王，屯下辩，以杨坚头为右贤王，屯河池，兄弟二人分领仇池之众。

[63] 此据《晋书·苻坚载记上》。《资治通鉴》卷103与此同，《魏书·司马睿传》曰“五万”。

[64] 《宋书》卷98《氐胡传》。

[65] 《晋书》卷97《西戎·吐谷浑传》。《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曰“分七百户与浑”。

[66]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

[67]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68] 《晋书》卷97《西戎·吐谷浑传》。

[69] 《三国志·魏书》卷30《鲜卑传》。

[70] 此据《晋书·苻坚载记》。但同书《吐谷浑传》“碎奚”作“辟奚”。

[71]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但同书《吐谷浑传》“马五千匹”作“五十匹”。

[72] 《晋书》卷125《乞伏国仁传》。

[73]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

[74] 《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

[75] 《资治通鉴》卷101曰“掠安阳民万余户而归”。此从《晋书·苻坚载记》。

[76] 《晋书》卷92《文苑·伏滔传》。

[77] 《晋书·桓温传》及《资治通鉴》卷103谈及此役，将领并无谢玄，《桓伊传》曰：“与谢玄共破别将王鉴、张蚝，以功封宜城县子。”证实谢玄参与此役。

[78] 《晋书》卷121《李寿、李势载记》。

[79] 《晋书》卷98《王敦传》。

[80] 《晋书》卷58《周仲孙传》。

[81] 《晋书》卷37《司马勋传》。

[82]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83] 《读史方舆纪要》卷56。

[84] 此据《晋书·苻坚载记》。《资治通鉴》卷103曰万余人。

[85] 《晋书》卷86《张轨传》。

[86]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87] 《资治通鉴》卷92。

[88] 《晋书》卷86《张重华传》。

[89] 此据《资治通鉴》卷97。《晋书·张重华传》作“晋阳”，误。

[90] 《晋书》卷86《张重华传》。

[91] 《晋书》卷86《张茂传》。

[92] 《晋书》卷86《张轨传》。

[93] 《晋书》卷86《张轨传》。

[94] 《晋书》卷86《张骏传》。

[95] 《晋书》卷86《张骏传》。

[96] 《晋书》卷86《张轨传》。

[97] 《晋书》卷86《张骏传》。

[98] 《晋书》卷86《张骏传》。

[99] 《晋书》卷86《张重华传》。

[100] 《晋书》卷86《张骏传》。

[101] 《资治通鉴》卷95。

[102] 《晋书》卷86《张轨传》。

[103] 《读史方舆纪要》卷3。

[104] 《资治通鉴》卷100。

[105] 《晋书》卷86《张玄靓传》。

[106] 《资治通鉴》卷101。

[107] 《晋书》卷86《张天锡传》。

[108] 《读史方舆纪要》卷63。

[109] 《资治通鉴》卷103。

[110] 《资治通鉴》卷104。

[111] 《资治通鉴》卷104。

[112] 此据《晋书·苻坚载记》。《张天锡传》“掌据”作“常据”。

[113] 此据《资治通鉴》卷104。《晋书·桓冲传》曰：“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众向寿阳。”

[114] 《晋书》卷74《桓冲传》。

[115] 《魏书》卷1《序纪》。本节引文凡不注出处者，皆出自该卷。

[116] “推寅”，鲜卑语，意为聪明有武略，善于钻研问题的人。所以在拓跋部传说中有两个推寅。

[117] 《魏书》卷23《卫操传》。

[118] 《魏书》卷23《莫含传》。

[119] 《魏书》卷23《卫操附从子雄传》。

[120] 《魏书》卷23《卫操传》。

[121] 《魏书》卷23《莫含传》。

[122] 《资治通鉴》卷96。

[123] 《魏书》卷111《刑罚志》。

[124] 《资治通鉴》卷96。

[125]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26] 和鲜卑其余各部剃去部分头发不同，拓跋部有留发结辫的习俗，故时人称拓跋部为“索头鲜卑”，简称“索头”或斥为“索虏”。

[127] 《资治通鉴》卷104。

[128] 《魏书》卷24《燕凤传》。

[129] 《魏书》卷24《燕凤传》。

[130]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

[131]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32] 《魏书》卷33《张济传》。

[133] 《魏书》卷25《燕凤传》。

[134] 《三国志》卷30《乌丸传》注引《魏书》。同卷《鲜卑传》曰，鲜卑习俗同于乌丸。

[135]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36]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37] 《北史》卷80《外戚贺讷传》。

[138] 唐长孺：《魏晋南北史论丛》，三联书店，1959，第203页。

[139] 《北史》卷15《魏诸宗室传》。

[140]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141]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142] 此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太平御览》卷125“白纯”作“帛纯”。

[143]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144]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145] 《晋书》卷94《隐逸·范粲传》。

[146] 《晋书》卷86《张骏传》。

[147] 《水经·河水注》。

[148] 《太平御览》卷125引《十六国春秋·后凉录》。

[149] 《太平御览》卷895引《十六国春秋》。

[150]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51]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152]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153] 《读史方舆纪要》卷63。

[154] 笔者有幸在1981年参加了唐史研究会举办的丝绸之路考察，在上述诸地逗留考察甚久，确如史籍所载。

[155]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56] 《太平御览》卷895引《十六国春秋》。

[157]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158] 《资治通鉴》卷105。

[159]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160] 周一良先生认为狯胡即羯胡，今从。参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狯胡条》，中华书局，1985。

[161] 均见《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162]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163]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164]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第五章〗 淝水之战

第一节 夺取襄阳和兵败淮南

一、夺取襄阳

苻坚久有一统中国之心，在统一北方后，为实现这个目的，便在建元十四年（378，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春二月任命苻丕为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守尚书令，总兵十七万有余，发动了夺取襄阳（湖北襄阳）的战役。苻坚做此决策，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军事需要。

就历史渊源而言，苻坚是借鉴了晋武帝灭吴之役。西晋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五道俱进，只用了四个多月，就击灭东吴，统一了中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的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军事行动，对以后历史上类似的军事行动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五道俱进”，实际是以巴蜀、荆襄和淮南作为进击基地，其中襄阳最为关键。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1]，在地理形势上对晋武帝的灭吴能否成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羊祜和杜预对襄阳的苦心经营和建议，才促成了晋武帝灭吴的战略部署。下述史实表明，苻坚最初确有效仿晋武帝的设想。

其一，苻坚屯田沔北（汉水以北），早怀经略汉沔的意图。

其二，淝水之战前一年，苻坚命巴西、梓橦太守裴元略打造战舰，以便顺流东下。

其三，在襄阳攻城战展开不久，苻坚又调集重兵，在淮南展开了攻势（详见下文）。

其四，襄阳久攻不下，苻坚便欲御驾亲征，苻融和梁熙上疏谏阻，其中梁熙的奏议可谓和盘托出了苻坚整个战略意图：“晋主之暴，未如孙

皓，江山险固，易守难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又何必亲屈鸾驾，远幸沮泽乎！”[2]

其五，淝水之战中，慕容暐及慕容垂各率一支兵马，耀武江汉，伺隙东下。

就现实军事态势而言，襄阳“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域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扫荡秦、赵，退可保据上流”[3]。东晋占有襄阳，无疑像一支引弓待发的利箭，时刻威胁着前秦的安全。事实上，东晋立国后，有许多次北伐便是将襄阳作为桥头堡的。前秦立国不久，桓温北伐，迅速兵临长安附近，就是由襄阳出发的。此等历史教训，苻坚岂能一刻或忘。前秦若夺取了襄阳，一可解除东晋对河、洛，特别是其腹心关陇地区的威胁；二可腰斩东晋，直逼建康（江苏南京），至少也能凭借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牵制东晋一半兵力，大大减少日后从淮南进击东晋的阻力。

总之，前秦若取有襄阳，秦、晋间的攻防态势将有巨大改变。因此，夺取襄阳，对于苻坚来说，是在他酝酿发动灭晋战争前必然采取的军事行动。

苻丕受命后，兵分四路：亲统武卫将军苟苌和尚书慕容暐等主力七万直扑襄阳，以荆州刺史杨安统邓、樊之众为先锋；征虏将军石越统率精骑一万为东路，兵出鲁阳关（河南鲁山县西南边境）；京兆尹慕容垂和扬武将军姚苌统步骑五万，兵出南乡（湖北均县东南）；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领众四万，兵出武当（湖北均县北）。约期会师汉水北岸，合击襄阳。同时又遣偏师一支由梁州刺史韦钟统领进攻魏兴（郡治今陕西安康西北），迫使晋军数处应敌。

四月，秦军进抵沔北。

东晋镇守襄阳的是朱序。他出身世代将门，通晓军事，能守善战，积军功为使持节、监沔中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秦军来攻时，他出镇襄阳未及一年，此时兵力不足两万，双方实力悬殊，无力沿线布防，乃收缴全部船只，集中襄阳城内，企图依靠汉水做屏障，迫使秦军知难而退。不料石越彪悍绝伦，富于智计，抓住时机，挑选精骑五千泅渡汉水，直扑襄阳城下，打了朱序一个措手不及。朱序惶迫无计，退守

中城待援。

石越攻破襄阳外城，缴获船只百余艘，秦军主力全数渡过汉水，围攻中城。不久，慕容垂攻克南阳，与苻丕会师。秦军声威更盛。

时东晋荆州刺史，江、荆、宁、梁、益、交、广七州都督桓冲拥众七万，闻讯后移节上明（湖北松滋西北），声援襄阳，但迫于秦军声威，不敢轻动。次年正月，在诏命的逼迫下，桓冲才令南郡相刘波帅师八千援襄阳。刘波胆小如鼠，接令后按兵不动。襄阳在前秦重兵包围下，成了一座孤城。

朱序母韩夫人久经战阵，“深识兵势”[4]。秦军来攻，韩夫人协助朱序守御，亲自巡察防务，发现城西北角年久失修。当时城中丁男已全数出动，人力极为不足，韩夫人当机立断，丈度地势，亲自统率府中婢女百余人构筑新城。城中百姓闻讯，群起支援，依靠妇女的力量，长二十余丈、坚固宽厚的一堵新城墙拔地而起，堵住了这一漏洞。时人称此为“夫人城”。

襄阳城有两重，东北背汉水而城，城墙便是汉水大堤，苻丕的兵力只有在其他几面展开。中城高，城坚，外城和中城间又筑有许多堡砦，可以逐次阻击来敌。城中军民同仇敌忾，朱序防守又颇为得宜。苻丕日夜猛攻，没有得到什么便宜。朱序时刻度势组织小部队不断偷袭秦军，秦军伤亡惨重。好不容易攻塌了西北角，秦军奋勇冲进时，又被夫人城挡住，寸步难进。苟苌建议：“今以十倍之众，积粟如山，但掠徙荆楚之人内于许洛，绝其粮运，使外援不接，粮尽无人，不攻自溃，何为促攻以伤将士之命？”[5]苻丕采纳，在掠徙襄阳周围居民的同时，分遣步骑五万，由苟池、石越、毛当等统领，扬威于江陵，迫使桓冲不敢轻举妄动。

挥师十七万有余，自春及冬，居然一无所成，在苻坚即位后的军事征服中，可谓史无前例。朝野为之震动，巴西人赵宝乘机在凉州发动了起义，自称晋西蛮校尉、巴郡太守。虽然被迅速镇压，但襄阳攻坚战已对前秦造成了不利的政治影响。御史中丞李柔为此上章弹劾：“长乐公丕等拥众十万，攻围小城，日费万金，久而无效，请征下廷尉。”[6]苻坚恼怒万分，不得不亲自出来打圆场：“丕等广费无成，实宜贬戮。但师已淹时，不可虚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赎罪。”在平息朝议后，苻坚命黄门侍郎韦华持节钺及尚方宝剑奔赴襄阳监战，手诏苻丕：“来春不捷

者，汝可自裁，不足复持面见吾也！”[7]同时又命令苻融引关东之师，梁熙统河西之众，为御驾亲征做准备。

苻丕惊惶万分，再度挥师猛攻，其主簿王施进言：“以大将军英秀，诸将勇锐，以攻小城，何异洪炉燎羽毛。所以缓攻，欲以计制之。若决一旦之机，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阳，上明自遁，复何所疑！愿请一旬之期，以展三军之势。如其不捷，施请为戮首。”[8]苻丕接受，挥军后撤，麻痹朱序。

襄阳军民鏖战经年，疲惫已极，亟待休整。苻丕后撤，朱序误认为对方损失过重，师老兵疲，粮饷将尽，不可能再来，戒备为之一松。孰料其督护李伯护早有降秦之心，暗送其子至秦营，约为内应。苻丕得报，乘朱序防守稍懈，在建元十五年（379）二月突然卷土重来，全力猛攻。秦军使用苟苌监制的飞云车翻越城墙，又有李伯护在内配合，襄阳终于为前秦所得。苻坚任梁成为荆州刺史，留兵一万，镇守襄阳，不久，改任都贵为荆州刺史。为收罗人心，苻坚起用和礼请了一些襄阳名流，迫使朱序为度支尚书，以“不忠”的罪名杀了李伯护。

偏师韦钟对魏兴郡的进攻同样极不顺利。晋魏兴太守吉挹在城南九里的峻山上筑寨防御，韦钟猛攻三个月，损兵折将，毫无进展，乃决定移师襄阳，会合苻丕。不料吉挹颇富智计，设伏半道，袭杀韦钟部五千余人，死死咬住韦钟不放。韦钟被迫再次回师。双方对峙了整整三年，直到建元十六年（380）四月，韦钟在重创东晋右将军毛虎生所统的三万援军，魏兴城中兵尽粮绝后，才得以破城而入。吉挹被俘后，闭口不言，绝食而死。

襄阳失陷，长江中游南部地区袒裸于前秦军前，建康亦蒙受威胁，桓冲当然于心不甘。但迫于前秦防守甚严，一时难以进攻。建元十七年（381）冬，都贵为扩大襄阳外围，从东面威逼江陵，令其司马阎振、中兵参军吴仲统步骑两万进攻竟陵（湖北潜江西北）。阎振、吴仲留辎重于管城（澉水北岸），水陆两路轻装奔袭。晋南平太守桓石虔、卫军将军参军桓石民统陆军水师两万据澉水阻击。相持月余，桓石虔夜渡澉水，偷袭秦营，阎振、吴仲败退管城。桓石虔乘胜追击，攻拔管城，俘斩秦军一万七千人有余，阎振、吴仲丧生，军资辎重尽为晋军所得，此战促发了桓冲收复襄阳的欲望。次年十月，桓冲命扬威将军朱绰进逼襄阳，目的在于刺探秦方虚实，焚烧了前秦沔北的屯田，掠徙六百余户而回。建元十九年（383）五月，桓冲纠集十万兵力亲攻襄阳，仿前秦数

道并进之计，令前将军刘波攻沔北诸城，辅国将军杨亮攻蜀，连克五城后，推进涪城（四川绵阳东北）；鹰扬将军郭铨攻武当；遣偏师一支攻筑阳（湖北谷城）。配合长江中游的攻击，龙骧将军胡彬由淮南兵击下蔡（故寿春城北三十里）。

苻坚分路抵挡，征南将军苻睿、冠军将军慕容垂和左卫将军毛当率步骑五万救襄阳，兖州刺史、扬武将军张崇救武当，后将军张蚝和步兵校尉姚苌救涪城。苻睿和慕容垂一路以石越为先锋，进次沔水，苻睿屯新野（今属河南），慕容垂屯邓城（湖北襄樊北），互为犄角。桓冲退守沔南。入夜，慕容垂和石越“命三军人持十炬火，系炬于树枝，光照数十里中，冲惧退还上明”[9]。此役，东晋方面仅郭铨掠得两千户而归。

桓冲的这次进攻虽然没有得手，但破坏了苻坚原先数道灭晋的设想。苻坚只有集中全力于淮南，在那里发动了灭晋之役，这就是淝水之战。

二、兵败淮南

建元十四年（378）七月，襄阳战事正酣，兖州刺史彭超上奏苻坚：“晋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数千戍彭城（江苏徐州），臣请率精锐五万攻之，愿更遣重将讨淮南诸城。”[10]“为镇南棋劫之势，东西并进，丹阳（建康）不足平也。”[11]此奏正中苻坚下怀，苻坚随即发布彭超为都督东讨诸军事，命后将军俱难统后禁将军[12]毛盛、洛州刺史陵江将军邵保等步骑七万扑向淮阴（江苏靖江西南）和盱眙（江苏盱眙东北）。八月，秦军数道并进。

秦军出动，晋右将军毛虎生受命统军五万，布防姑孰（安徽当涂），准备阻击。

秦军进展颇速，包围了彭城。

彭城要兼水陆，“南届大淮，左右清汴，表里京甸（建康），捍接边境”[13]。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对南北的盛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作用。东晋当然不能坐视不管，急令建武将军、兖州刺史、监江北诸州军事谢玄统北府兵数万及三州人马驰援，并命彭城内史、后军将军何谦之游军淮、泗，声援谢玄。谢玄兵次泗口（江苏清江北），即遭秦军阻击。在秦军猛烈进攻下，谢玄深知保住彭城已无可能，于是计划接出彭

城驻军，退守淮南。彭超估计晋军可能会出此对策，防范极严，谢玄信使难至彭城。值此时刻，小将田泓自告奋勇，免冠请缨，潜水泅渡泗水，进抵彭城城下，也为秦军俘虏。秦军厚赂田泓，要他告知戴逯，南军已败，迫使戴逯开城投降。田泓伪装接受，入城后即曰："南军垂至，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勉之！"[14]

彭超进围彭城时，留辎重于留城（江苏沛县东南五十里）。谢玄设计，命何谦之佯攻留城。彭超被迫释围，还保辎重。何谦之却突然中途折向彭城，戴逯乘机与其会合，与谢玄会师于泗口。彭超虽然夺得了彭城，所获战利品却极少。

俱难一路颇为顺利，攻克淮阴，生俘晋建威将军、高密内史毛璪之，留邵保镇守，移军淮南，会合彭超，向盱眙推进。秦、晋双方对峙于淮南。

襄阳战事结束后，苻坚又从这里调遣毛当和王显统兵两万，加强淮南攻势。

建元十五年（379）五月，彭超总兵六万强行推进，包围晋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江苏宝应）。三阿距江防重镇广陵（江苏扬州）仅一百余里。三阿被围，东晋朝野震恐，沿江布防。晋录尚书事谢安急调其弟谢石统领水师进屯涂中（安徽涂县及全椒一带）；右卫将军毛安之、游击将军王昙之、淮南太守杨广、宣城内史丘准等统部三万进屯堂邑（江苏六合）。彭超分精骑两万，由毛当、毛盛、王显率领驰袭堂邑。毛安之不战自惊，诸军溃散。晋方态势进一步恶化，不得不再次起用谢玄所统的北府兵。

谢玄受命，驰援三阿，进次白马塘（江苏高邮西南七十里），即遭俱难部下都颜的拦击。塘西一战，晋军大胜，斩杀都颜。谢玄乘胜推进，移师三阿，城下一战，三阿围解，彭超和俱难退守盱眙。谢玄会合何谦之、田洛等部追踪而至，盱眙城北六里君川河北一场激战，彭超、俱难又败，退屯淮阴。谢玄分遣何谦之、刘牢之等统水军溯流而上，夜焚河上大桥，烧尽秦军运粮船舰，击杀邵保，秦军退路被截断。晋军乘机四面围攻，秦军全部覆灭，彭超、俱难只身逃免，军械辎重丧失殆尽。

这是苻坚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彭超和俱难为推诿责任，互相

指责。俱难归罪彭超，斩杀彭超司马柳浑。败讯传来，苻坚勃然大怒，槛车征彭超下廷尉候审，俱难削职为民。彭超羞愧难当，自杀身亡。为赏堂邑之功，苻坚以毛当为平南将军、徐州刺史，镇彭城；毛盛为平东将军、兖州刺史，镇胡陆（山东鱼台西南）；王显为平吴校尉、扬州刺史，戍下邳（江苏睢宁西北）。秦晋双方相持于徐州以南、淮水以北一线。至此，前秦版图“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15]。东晋偏居东南一隅与秦相抗。

第二节 军事殖民

一、四公联兵及苻洛作乱

前秦初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和措施极不完备，因此苻生统治时期密谋政变的集团相当多，苻坚不过捷足先登而已。苻坚即位后，信用王猛整顿改革，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所成效。但如若没有足够的时日，这一政体也难以巩固，政变也就难免。其中，苻健诸子最活跃，其他宗室亲贵在权势难以满足时，亦欲一逞。王猛对此是有所觉察的。甘露六年（364）苻生胞弟谋反伏诛，涉案者甚多，王猛借机发作，建议尽诛苻生诸弟，解除隐患。苻坚害怕诛夷太多，引起政局动荡，没有接受。他一方面想通过优容和宽大的措施满足宗室亲贵的欲望，泯灭其篡夺阴谋；另一方面则大索史官，大造舆论，宣扬自己的政变是“汤武革命”。这显然于事无补，宗室亲贵们觊觎皇位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见于史籍，自甘露六年（364）至建元十九年（383），短短的二十年中，以宗室亲贵为核心的谋反作乱事件便有六起，平均三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其中，对前秦政局影响最大的是四公联兵和苻洛作乱。

建元元年（365），苻生胞弟淮南公苻幼乘苻坚北巡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长安空虚的机会，自杏城（陕西黄陵西南）兴兵，奔袭长安。得到镇守蒲坂（山西永济蒲州镇）的镇东大将军、并州刺史、晋公苻柳和镇守上邽（甘肃天水）的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赵公苻双的支持。苻幼叛乱迅速为李威扑灭，三人密谋由此泄露。苻坚因苻双是苻生同母胞弟，苻柳是苻健爱子，宥而不问。但是苻法无罪，且参与苻坚政变有功，尚且赐死，这二人既有谋逆，此时又何能心安。正如镇守陕城（河南三门峡）的镇东将军、洛州刺史魏公苻廋日后所言：“弟兄屡谋逆乱（苻幼和在甘露六年谋反的苻腾均为其亲兄弟），臣惧并死，故谋反耳。”[16]他们暗中推苻廋为首，联络镇守安定（甘肃平凉）的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燕公苻武，共谋兴兵作乱。此事为苻廋主簿姚眺发觉，他正告苻廋：“明公以周、邵之亲，受方面之任，国家有难，当竭力除之，况自为难乎！”[17]苻廋拒绝，姚眺当即告密，苻坚征四公入朝。密谋已经暴露，四公岂能乖乖送死，建元三年（367）十月，四公同时举兵，进逼长安。一时间，前秦“国分为五”，形势万分危急。

苻坚分遣使者劝喻四镇：“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

征，卿宜罢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18]为苻廋等拒绝。

从地理形势来看，秦、雍二州连成一片，上邽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向有“关陇喉舌”之称；安定更是战略要冲，“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19]，但是苻坚更担忧的却是蒲坂和陕城。

并、洛二州同样紧紧相连。蒲坂位处“河中之地……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有羊肠砥柱之险，浊河孟门之限，以轘辕为襟带，与关中为表里”[20]，距长安三百余里，是并州直扑关中的必由之道。陕城“内屏关中，外维河洛，履崤坂而戴华山，负大河而肘幽谷”[21]，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更重要的是：其一，与秦州紧邻的前凉内乱频作，国力较弱，仅足自保；而与并、洛相邻的前燕却有雄兵数十万，洛阳和晋阳又是前燕重兵云集之所，乘此推进，和叛乱势力联手，前秦势难抵挡。其二，为灭燕计，苻坚在陕城集中了大量的粮草。苻廋、苻柳据地理之便，粮草丰足，外引前燕，长安岌岌可危。

针对此种形势，苻坚作了下述部署：第一，东西两线同时应敌，四线兵分两路，后将军杨成世进攻苻双，左将军毛嵩进攻苻武；集中主力于东线，由王猛节度，王猛亲统建军将军邓羌阻击苻柳，前将军杨安统广武将军张蚝布防陕城以西。借以分割四公，迫使他们各自为战，收逐个击破之效。第二，东线以守为主，西线先行进攻，击灭苻双和苻武后再集中全力结束东线战事。如此，既可解腹背受敌之患，又可免除因进逼太快，苻廋和苻柳狗急跳墙，投降前燕或引狼入室。第三，遣使潜入邺城，厚赂前燕执政慕容评，力争前燕对这次前秦大叛乱隔岸观火。

苻坚和苻廋各有自己的打算。苻廋深知，单靠四镇之力难以成功，决心求得前燕的支持。次年春，苻廋据陕城投降前燕，他知道慕容评是一个贪财好利、鼠目寸光的庸才，乃致书军政才干俱佳的慕容垂和皇甫真：“苻坚、王猛皆人杰也，谋为燕患久矣，今不乘机取之，恐异日燕之君臣，将有甬东之悔矣！”[22]苻廋降燕，关中大震，人情惶急，苻坚再也坐不住了，尽锐而出，屯驻华阴（陕城西），凭借天险潼关，部署了第二道防线。慕容评在收取了大量贿赂后，置苻廋的呼吁及慕容垂等建议于不顾，按兵不动。苻坚取得了从容镇压的时机。

西线战事颇不顺手。建元四年（368）三月，杨成世为苻双大将苟兴打败，毛嵩亦被苻武击溃，双双奔还。苻双、苻武合兵一起，以苟兴

为先锋，乘胜向东推进。苻坚调整部署，命武卫将军王鉴、宁朔将军吕光、将军郭将统步骑三万赶赴西线。王鉴计划速战速决，吕光衡量利弊，指出："兴初破成世，奸气渐张，宜持重以待其弊。兴乘胜轻来，粮竭必退，退而击之，可以破也。"[23]不出吕光所料，双方相持二十余天后，苟兴粮尽，士气日渐低落，挥军后撤，拟抢占榆眉（陕西汧阳东三十里），打通粮道，整军再出。王鉴、吕光不待苟兴有喘息之机，衔尾追击。苟兴兵败，苻双、苻武大营受冲，损兵一万五千余人，被迫放弃安定，退居上邽。王鉴等跟进，于建元四年七月攻拔上邽，斩杀苻双和苻武。苻坚任命左卫将军苻雅为秦州刺史，长乐公苻丕为雍州刺史，西线战事结束。

王猛和杨安统军进抵距蒲坂和陕城三十余里后，便各自安营扎寨，深沟高垒，静观其变。苻柳屡出挑战，王猛闭营不应。苻柳判断失误，认定王猛怯阵。建元四年（368）五月，他命儿子苻良镇守蒲坂，自统两万余兵马西进。为歼敌于坚城之外，王猛听其推进百有余里，随即令邓羌统精骑七千突然夜袭，苻柳狼狈后撤，又遭王猛攻击，只剩下数百骑退回蒲坂。西线战事一结束，东线的猛攻开始。九月，王猛击杀苻柳，攻克蒲坂。不久，王鉴由西线赶来，围攻陕城的战役打响。十二月，王猛攻拔陕城，坐俘苻廋。东线战争亦告结束。

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四公联兵被镇压了。时隔十二年后，在幽州又爆发了苻洛的叛乱。苻洛是苻健的兄子，官居征北将军、幽州刺史，爵封行唐公，镇守和龙（辽宁朝阳）。他"雄勇多力，猛气绝人，坐制奔牛，射洞犁耳"[24]，既是力敌万夫的猛将，又是颇知用兵之道的帅才。建元十二年（376），他曾为统帅，一举灭代。苻洛屡立战功，由此深受苻坚疑忌，历任边镇，连京师都进不得。灭代以后，苻洛居功求为开府仪同三司，为苻坚拒绝，由此满腔怒火，萌发异志。建元十六年（380）苻坚发布苻重为镇北大将军，镇蓟城（今北京），又调苻洛前往益州，诱发了这场叛乱。

苻重是苻洛的兄长，爵封北海公，官拜豫州刺史，坐镇洛阳。建元十四年（378）据镇谋反，为其长史拘押。他并没有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仍然伺机行动。建元十六年（380），他出镇蓟城，辖地与幽州相连，无疑更有利于苻洛的行动。兄弟俩合在一起，互通声气，决定孤注一掷了。恰值苻坚认为苻洛长期坐镇幽州，跨有全燕，控扼鲜卑、乌丸，遥制高句丽和百济等，势力过大，乃于是年三月调苻洛为使持节、

都督宁益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为防意外，苻坚特意下令苻洛接旨后不得进京，必须由伊阙（河南伊川西南）直趋襄阳，溯汉水而上，赴成都上任。苻洛亦非傻子，接旨后怒火中烧，召集属下，宣称："孤于帝室，至亲也，主上不能以将相任孤，常摈孤于外，既投之西裔，复不听过京师，此必有伏计，令梁成沈孤于汉水矣。为宜束手就命，为追晋阳之事，以匡社稷邪？诸君意如何？"[25]其治中平规[26]进言："逆取顺守，汤、武是也；因祸为福，（齐）桓（公）、（晋）文（公）是也。主上虽不为昏暴，然穷兵黩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云从。今跨据全燕，地尽东海，北总乌桓、鲜卑，东引句丽、百济，控弦之士不减五十余万，奈何束手就征，蹈不测之祸乎！"[27]计议一决，苻洛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秦王，署置百官，拜平规为幽州刺史，吉贞为左长史，赵赞为左司马，王蕴为右司马等，派遣使者赴鲜卑、乌桓、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征兵。又分兵三万协助苻重镇守蓟城。苻洛计划合两镇之力，南出中山（河北定州）和常山（河北正定），推进邺城，逼降苻融，进据冀州，然后总关东之兵，西向夺取长安。

四月，苻洛留平规守和龙，统兵七万，向西南推进。

幽州叛乱，"关中骚动，盗贼并起"。苻坚屡屡遣使，要求苻洛兄弟罢兵："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也，何为而反？可还和龙，当以幽州永为世封。"苻洛的回答狂傲已极："汝还白东海王，幽州褊陋，不足容万乘，须还王咸阳，以承高祖之业。若能候驾潼关者，立为上公，爵归本国。"[28]苻坚无奈，任命苻融为征讨大都督，节度讨伐事宜；以右将军都贵为先锋，统冀州兵三万先行迎敌；左将军窦冲及吕光统关中步骑四万配合镇压；又分遣屯骑校尉石越帅骑兵一万，自东莱（山东莱州）渡海袭击和龙，阻断苻洛归路。

苻洛和苻重会合后，总兵力达到十万有余，进屯中山。

五月，窦冲和都贵会师，全力反攻，一举摧垮叛军，生擒苻洛，械送长安。苻重逃回蓟城，被吕光追杀。

石越顺利渡海，攻克和龙，击杀平规。

苻洛叛乱前后只有三个月就烟消云散了。

"兵赋全资"，据有东北的苻洛和苻重为什么失败得如此之快，究其

原因，在于前秦接连不断的军事征伐，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军民厌战情绪十分严重。他们反对战乱，更不支持苻洛挑起内战。中原如此，边境各地也是如此。苻洛遣使到鲜卑、乌桓等地征兵，吁请他们支持，得到的回答是“吾等为天子守藩，不能从行唐公为逆”即为最好的证明。即便苻洛赖以叛乱的核心集团，除平规等少数人外，绝大部分也不同意举兵。王蕴、王琳、皇甫杰和魏敷等人因反对甚烈，被苻洛诛杀。吉贞、赵赞等人本来模棱两可，见苻坚使者一到，鲜卑等少数民族又不支持，立刻唱起了罢兵求饶的论调：“今诸国不从，事乖本图，明公若惮益州之行者，当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虑不从。”[29]哪怕苻洛、苻重控制的军队，也如吕光所料：“彼众迫于凶威，一时蚁聚耳。若以大军临之，势必瓦解，不足忧也。”[30]正由于此，叛军一触即溃，苻重身首异处，苻洛落得发配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的下场。

二、军事殖民

镇压苻洛叛乱后的两个月，即建元十六年（380）七月，苻坚采取了一项新的措施：分遣宗室亲贵统领一定数量的氐户分镇各地。

今存资料中有关这一措施的具体内容十分稀少，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仲荦先生首创军事殖民说，可惜没有展开论述。[31]黄烈先生反对军事殖民说，认为主要目的是巩固中央集权及镇抚少数民族，并且对分遣的氐户总数也提出质疑，认为不是十五万户，而是一万五千余户。[32]我同意王先生之说，现先引述资料，再据以申论。《晋书·苻坚载记上》曰：

> 洛既平，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镇邺，如世封诸侯，为新券主。坚送丕于灞上，流涕而别……于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领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书梁谠为安远将军、幽州刺史，镇蓟城；毛兴为镇西将军、河州刺史，镇枹罕；王腾为鹰扬将军、并州刺史，领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二州各配支（氐字之误，据晋书校勘记）户三千；苻晖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苻睿为安东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

《资治通鉴》卷104的记载可与此互为补充：

> 秦王坚……以征南大将军、守尚书令、长乐公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

东大将军、冀州牧。坚以诸氐种类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长乐公丕领氐三千户，以仇池氐酋射声校尉杨膺为征东左司马，九嵕氐酋长水校尉齐午为右司马，各领一千五百户，为长乐世卿。长乐郎中令略阳垣敞为录事参军，侍讲扶风韦干为参军事，申绍为别驾。膺，丕之妻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镇龙城。中书令梁谠为幽州刺史，镇蓟城。抚军将军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河州刺史，镇枹罕。长水校尉王腾为并州刺史，镇晋阳。河、并二州各配氐户三千。兴、腾并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晖为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移洛州刺史治丰阳。钜鹿公睿为雍州刺史，各配氐户三千二百。

众所周知，西周的分封制有两大特点。其一，诸侯世有其国，卿大夫世有其官。故清人赵翼曰："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33]其二，以血缘关系为分封的准则。《荀子·儒孝》谈到西周的分封制时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和苻坚分遣宗亲坐镇各方相比较，两者的差异并不太大。苻坚虽没有采用诸侯的名称，只是把分镇各地的宗室亲贵叫作"新券主"，但这些新券主如"世封诸侯"，或者"如古诸侯"，具有世袭的特权。新券主们都是身兼方镇和刺史，集军、政、民大权于一身，俨然是一方之主。他们还可配置世卿，世卿同样享有世袭的特权。这个制度和西晋的宗王出镇是不同的。西晋的近支亲王虽然往往兼任封地就近的方镇，集军、政、民大权于一身，却没有世袭方镇的特权。他们也没有配置世卿，其主要僚属均由中央直接任命，或自行辟署后经中央认可，僚属也无世袭的特权。毫无疑问，统领氐户分镇各地的新券主们都是氐族权贵："凡我族类。"其间以苻氏为核心，其他则是苻氏的姻亲。梁谠出身后族，毛兴、王腾"并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即使是世卿，也同样受血缘姻亲关系的制约："（杨）膺，丕之妻兄也；（齐）午，膺之妻父也。"所以并非氐族成员就能充任新券主们的世卿的。如长乐郎中令垣敞，是略阳氐族[34]，郎中令虽然是高级僚属，因与苻氏无婚姻关系，就难以位处世卿之列。

新券主们出镇，有许多高级僚属是汉族士族，如长乐侍讲韦干、别驾申绍之类，他们都没有配领氐户的特权，这个特权只有苻氏宗室或亲贵，以及与新券主们有姻亲关系者才能享有，这就表明，氐族豪贵是凌驾于各族上层分子之上的。《晋书·慕容垂载记》提供了佐证。

会坚将苻晖告丁零翟斌聚众谋逼洛阳，（苻）丕谓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师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军，殆难为敌，非冠军英略，莫可以灭也。欲相烦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鹰犬，敢不惟命是听。"于是……配垂兵二千，遣其将苻飞龙率氐骑一千为垂之副。丕戒飞龙曰："卿王室肺腑，年秩虽卑，其实师也。垂为三军之统，卿为谋垂之主，用兵制胜之权，防微杜贰之略，委之于卿，卿其勉之。"

所配氐户，无疑有一定的义务，即提供兵役。但他们所充任的只是新劵主们的亲兵，是新劵主们控制各族上层分子的威慑力量。由于资料残缺，这些氐户是否享有特权，难以具体描述。不过，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尚且在政治和经济上赋予代迁户若干特权，就可知这些号称"磐石之宗"的氐户，享有一定特权是在所难免的。至于新劵主们对中央承担何种义务，由于史料阙如，就难以置言了。

正因为苻坚的这一措施和西周的分封制有许多类似之处，这就无怪乎当朝权要们都认为"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了。总之，就其本质而言，是与西周初年军事殖民颇相类似的一项措施。

苻丕领氐户三千，杨膺和齐午各领一千五百户，石越、梁谠、毛兴、王腾、韩胤各领三千户，苻晖、苻睿各领三千二百户，总计为两万四千四百户，这和分"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的差距实在太大。那么，十五万户这个数字是否可信？笔者认为是较为可信的。

首先，在军事殖民之后，苻融强调："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35]赵整的《琴歌》亦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36]这就表明苻坚确实是把绝大部分氐户配置分给各地的氐族豪贵了，由此导致了关中地区民族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苻融等头脑较清醒者不得不为此而忧心忡忡。

汉魏之际，仅被曹操逼迁到关中的氐户就不下六七万，其他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氐族在活动。苻坚统一北方，关中成了氐族集中的场所，加上"支胤弥繁"，虽然今天难有一个具体或近似的统计数字，超过十五万户应当没有什么疑问。

其次，分镇各地的氐族亲贵配有氐户，他们的世卿也配有氐户，总数与新劵主们的大体相等。尽管资料只叙述了苻丕一人的世卿，其余亲贵们当亦不会有太大的例外。譬如，毛兴的长史便由苻坚族曾孙苻同成

充任，亦该配有氐户。

最后，配合这一措施，苻坚对刺史、州牧和方镇的人选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诸方要镇”就有这个意思。因此，分镇各地的宗室亲贵绝非史料中明确提到的八个，确切地说，这八个仅是其中最重要者。此时，前秦计有二十二州，关东诸州分属苻丕、苻晖两人节度，史料所见都是受苻丕节度者，如石越、梁谠、王腾、韩胤等，他们均配有氐户，受苻晖节度的按理类推，当无例外。

苻坚之所以采取军事殖民的措施，其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权势的再分配，满足宗室亲贵的权势欲，稳定其核心统治集团；二是震慑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这两者又是为其即将发动的灭晋之役服务的。

应该说，实行军事殖民是苻坚酝酿已久之举，并非突然提出来的措施。

对于谋反作乱的宗室亲贵，除阵斩者外，凡被擒获，苻坚的惩处都相当宽容。苻柳、苻双参与苻幼密谋，苻坚宥而不问。苻重谋反被押，时隔不久，苻坚又委以重任。四公联兵以苻廋为首，但苻廋七子依然被封为县公。苻洛兴兵叛乱，被捉后不过是发配西海郡，这还是受惩处最重的一个。对此，司马光也认为苻坚的处置极端不当，发表议论曰：“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于为逆，行险徼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能无亡乎！”[37]

司马光仅是从封建统治政治的一般道理来评述苻坚的措置，虽有合理的一面，却忽略了其特殊性。必须看到，苻坚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极端尖锐复杂的十六国前期。自永嘉之乱以来，内迁中原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无一例外地以本族为核心，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强化和巩固其统治，这已成为一种传统。苻坚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比之前的内迁诸少数民族统治者要好，在他统治前期，民族矛盾相对有所缓和。但在当时，这些民族的融合正处在初期阶段，各民族的分野仍然相当清晰，特别是他们和汉族的矛盾远没有泯灭。各民族的力量对比虽有很大的变化，却没有达到根本性转变的地步。氐、羌和鲜卑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之下。在这种条件下，要苻坚摆脱上述传统很不现实。苻坚未见得不明白宗室亲贵连绵不断的叛乱所带来的祸害，但他认为，无论怎样，本族成员，特别是宗室亲贵远比其他各族上层分

子可信，只有他们才是前秦真正的“磐石之宗”。他认为只要满足他们的权势欲，确保他们世世代代富贵荣华，便可遏止谋反作乱。因此四公联兵时，苻坚“各啮梨以为信”，分遣使者送给四公，叫他们息兵。胡三省正确地解释苻坚这一举动的含义曰：“梨肉脆而啮之易入，比喻亲戚离叛，则国力脆弱，将为敌人所乘，故啮梨付使者，赐柳等以为信也。”[38]同时许以“各定其位，一切如故”的诺言，这里已多少流露出苻坚的意愿。苻洛和苻重叛乱时，苻坚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当以幽州永为世封。”叛乱一平息，苻坚就将此付诸实施了。

随着北方的统一，兴兵南下、一统中华即将提上日程。苻坚深知，荡平东晋和统一北方不可同日而语，非得倾国而动、御驾亲征不可。如若此时祸起萧墙，后果不堪设想。解决宗室亲贵们的谋反作乱，显然已成为倾国南下的前提。军事殖民既满足了宗室亲贵的权势欲，又可震慑关东，在他看来，是十分有利的。

军事殖民无疑有震慑各地少数民族的含义，但把它说成主要为了震慑少数民族，就未免稍偏了一点。笔者认为震慑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较为切合实际些。

前引资料涉及的重镇有邺（河北临漳西南）、龙城（辽宁朝阳）、蓟城（北京）、枹罕（甘肃临夏东北）、晋阳（山西太原南）、蒲坂（山西永济蒲州镇）、平城（山西大同东北）和洛阳八个。这些都是历来兵家必争的要冲，有的还是一方政治、经济的中心，如邺城、洛阳和晋阳。这八个重镇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关东。即以这八个重镇来说，指明震慑少数民族的只有龙城、晋阳和平城三个，这三地虽然重要，却非苻坚要震慑的重点，重点是“地广人殷”的关东。在这里，邺城和洛阳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非子弟难以收其效。所以苻坚命苻丕镇邺城，苻晖镇洛阳，分别委以都督关东诸军事及都督豫洛等六州诸军事重任。关东昔日确实是一些内迁少数民族驰骋之地，但从永嘉之乱到苻坚统一北方，这一带各少数民族的力量对比已有了巨大的变化。汉国、前赵和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大地衰落了。西北边缘地区有匈奴的势力在活动，但已非刘渊一支，主要是北匈奴系统，彼此也不统一，此时不具备争强斗胜的实力。羯族经冉闵屠杀后，只有一些幸存者散居各地，已构不成一股政治势力。这时真正对前秦构成威胁的少数民族是羌族和鲜卑慕容部，所以王猛及氐族权贵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以此两族为念。

羌族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关陇一带。前燕都邺，一时间慕容权贵云集邺城，慕容部人遍布邺城四周。苻坚灭燕后，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把四万余户慕容部人及深受慕容部影响的十余万户杂夷迁至关中，对这里的民族力量做了大幅度的调整。慕容鲜卑人数本来就不太多，经过这次逼迁，关东地区的慕容部人已是很少了。淝水之战后，慕容垂在关东独树一帜，靠的不是内迁关东的鲜卑慕容部的力量，主要是利用了丁零、乌桓、匈奴屠各和原先留居辽东没有内迁的鲜卑势力。《晋书·苻坚载记下》曰：

垂子农亡奔列人（河北肥乡东北）招集群盗，众至万数千……垂引丁零、乌丸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城。

与慕容垂起兵相配合，慕容泓亡奔关东，招引牧马鲜卑，所得仅有数千，而慕容冲起兵河东，与慕容泓合兵冲入关中，势力便一下扩张到“十余万”[39]。这说明慕容部人主要被逼迁到关中了，这则记载和《资治通鉴》卷105更具体的叙述是一致的，今将有关部分抄录如下。

慕容垂济河焚桥，有众三万，留辽东鲜卑可足浑谭集兵于河内之沙城。……

慕容农之奔列人也，止于乌桓鲁利家……农谓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图兴复，卿能从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从。”农乃诣乌桓张骧，说之曰：“家王已举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远近响应，故来相告耳。”骧再拜曰：“得旧主而奉之，敢不尽死！”于是农……使赵秋说屠各毕聪。聪与屠各卜胜、张延、李白、郭超及东夷余和、敕勃、易阳乌桓刘大各帅部里众数千赴之……于是步骑云集，众至数万，骧等共推农为使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监统诸将……农间招库傉长官伟于上党，东引乞特归于东阿，北召光烈将军平睿及睿兄汝阳太守幼于燕国，伟等皆应之……

燕王垂引丁零、乌桓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不拔；乃筑长围守之……

东胡王晏据馆陶，为邺中声援，鲜卑、乌桓及郡县民据坞壁不从燕者尚众：燕王垂遣……（慕容）绍帅骑数百往说王晏，为陈祸福，晏随绍诣（慕容）楷降，于是鲜卑、乌桓及坞民降者数十万口。

我们并不想否认慕容权贵在关东留有政治影响。只要慕容贵族还没有打回关东，政治影响的作用就有限，上引馆陶附近的乌桓及汉族人民，甚至鲜卑族人也“为邺中声援”，“不从燕者尚众”。既然如此，苻坚在关东所要震慑的重点当然是以汉族为主了。

昔日，苻健打着晋的旗号打入关中，前燕打着晋的旗号占有关东，现在苻坚即将去消灭汉族人民认为正朔所在的东晋，何况作为淝水之战的前哨战——夺取襄阳和鏖兵淮南已经展开，汉族人民的意向如何，苻坚又岂能不加防范。

但是，实际结果非但使苻坚目的难达，还潜伏下了严重的危机。首先，前秦境内的民族矛盾相当复杂，征服一个地区，征服一个民族，就使这种复杂性增加一分。军事殖民则使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受到了进一步的刺激。特别是汉族，更是如此。其次，这实质上是往日苻坚在王猛辅佐下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措施的反动。结局正如赵整所言，“尾长翼短”之势逐渐形成。淝水之战后，各地方镇对前秦的安危关切甚少，大都力求自保，有的更想借机自立，如梁熙、吕光之流，正是这一措施的结果。再次，随着大部分氐户分镇各地，关中地区的民族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隐伏下无限的危机。最后，《晋书·苻坚载记上》曰：“诸戎子弟离其父兄者，皆悲号哀恸，酸感行人，识者以为丧乱流离之象。”原来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势之争，经此一举，向下转移，激化了氐族内部的阶级矛盾。

第三节 淝水之战

一、战前大争论

建元十一年（375）七月，王猛弥留之际，因苻坚的一再要求，不无忧心地说出了两件事：第一，千万不要伐晋；第二，逐步剪除羌族和鲜卑慕容权贵的势力。说完溘然而逝。这些意见苻坚最初大概是接受了，前秦的亲贵大臣们都知道。时过境迁，现在北方已经统一，襄阳及彭城已夺取在手，军事殖民又解决了宗室亲贵们叛乱谋反的问题，苻坚就把王猛的告诫抛之脑后了。建元十八年（382）冬，苻坚召集群臣于太极殿，把独运于心好久的打算公之于众。

> 吾统承大业垂二十（应作三十，笔者注）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

此语一出，秘书监朱彤立刻奉承：“陛下应天顺时，恭行天罚，啸咤则五岳摧覆，呼吸则江海绝流，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晋主自当衔璧舆榇，启颡军门，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将追之，即可赐命南巢。中州之人，还之桑梓。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这无疑道出了苻坚的心曲，听后焉有不喜：“吾之志也。”[40]不料尚书左仆射权翼首倡异议：“臣以为晋未可伐。夫以纣之无道，天下离心，八百诸侯不谋而至，武王犹曰彼有人焉，回师止旆。三仁诛放，然后奋戈牧野。今晋道虽微，未闻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江表伟才，可谓晋有人焉。臣闻师克在和，今晋和焉，未可图也。”苻坚沉默良久后说：“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卫率石越支持权翼，补充了几条理由：“今岁镇星守斗牛，福德在吴。悬象无差，弗可犯也。”“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昌明，其孙也。”东晋“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贰之衅”。在石越看来，东晋是应该讨灭的，但现在不是时候，为此他建议苻坚“利用修德”，“保境养兵，伺其虚隙”，“厉兵积粟以待天时”。

长江天险，人所共知。东晋立国，颇赖这一地理之利，这里毋庸多言。

星象之说，当然纯属无稽之谈，但在天命迷信思想盛行之时，对于民心士气，有巨大的影响，苻坚对此亦是深信不疑的。建元八年（372），苻坚命其弟苻融代王猛镇邺，其母苟太后酷爱苻融，数次前往灞上惜别，太史令魏延据天象奏言：“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阍寺不见，后妃移动之象。”苻坚推问，始知其母之行，惊叹“天道与人何其不远！”[41]更加重视星象之说，无怪石越要据此慷慨陈词了。

取乱侮亡，古来使然，这是击灭敌国的必要条件，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从晋元帝到晋孝武帝，东晋已经八传，时间相隔亦有半个世纪左右，石越忽然拉出晋元帝来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颇为令人费解。联系当时的民族关系，就不难理解了。石越所谓晋元帝“遗爱犹在于人”，实质上不过是“人心思晋”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他参加过襄阳攻坚战，襄阳军民拼命抵抗的情况他历历在目，体会尤深，苻坚在当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否则他决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何晋氏之多忠臣也！”其实，江左世族无忠臣，早就成了定评，周虓、丁穆和吉挹者流，并非忠于晋室，更多的是出于民族的考虑，襄阳军民的同仇敌忾，也是如此。

权翼、石越的意见显然是相当有道理的，可惜所谈都是东晋方面的情况，石越的建议虽然涉及了前秦自身的问题，但言辞闪烁，又岂能引起苻坚的重视。“混合六一，以济苍生”是苻坚“内断于心久矣”的大事，当然不会因这两人的反对而罢休。他针锋相对，依据历史，否定了石越和权翼的意见：“吾闻武王伐纣，逆岁犯星。天道幽远，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仲谋泽洽全吴，孙皓因三代之业，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42]尽管如此，反对派们在朝臣中还是占优势，朝议久久难决。苻坚相当气愤：“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群议纷纭，徒乱人意。”为此留下阳平公苻融单独商议。孰料苻融反对更烈，他归纳了反对派们的意见，偏重于前秦自身的问题，指出：“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认为“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愿陛下纳之”。苻坚勃然大怒：“汝复如此，天下之事，吾当与谁言之！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称令主，亦不为暗劣。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终不以贼遗子孙，为宗庙社稷之忧也。”至此苻融不得不痛心疾首，泪流满面，和盘托出了最难出口的理由：“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43]接着又进一步陈述了他内

心的忧患：“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返。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无奈苻坚心意已决，断然拒绝：“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大运。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吾将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坏大谋！汝尚如此，况于众乎！”[44]

为谏阻苻坚发动灭晋之役，反对派们请出深受苻坚宠信、言听计从、出则同辇的道安说项，亦为苻坚所拒：“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天生蒸庶，树之君者，所以除烦去乱，安得惮劳！朕既大运所钟，将简天心以行天罚。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尧有丹水之师，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后王。诚如公言，帝王无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义举耳，使流渡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止为济难铨才，不欲穷兵极武。”甚至对于只是求他不要亲征的意见，也遭到苻坚的拒绝。以后，太子苻宏及石越、原绍等书奏面谏不下数十次，苻坚就是听不进去。

争论是如此激烈，甚至连后宫也参加进来。深受苻坚宠爱的少子中山公苻铣反对伐晋，遭到苻坚的斥责：“国有元龟，可以决大谋；朝有公卿，可以定进否。孺子言焉，将为戮也！”姿压群芳、宠冠后宫的张夫人亦反对，恳请苻坚多考虑群臣的谏阻，亦被苻坚用“军旅之事非妇人所豫也”[45]给堵了回去。

对于“朝臣上下，皆言不可”[46]，苻坚没有拒绝了之，又进行了说服。他借南游灞上之便，再次晓谕群臣：“往年车骑灭燕，亦犯岁而捷之，……昔始皇之灭六国，其王岂皆暴乎？吾内断于心久矣，举必克之，何为无功！”“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今天下垂平，惟东南未殄。朕忝荷大业，巨责攸归，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每思桓温之寇也，江东不可不灭。今有劲卒百万，文武如林，鼓行而擢遗晋，若商风之殒秋箨。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实未解所由。晋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吴者，天下何由一轨！吾计决矣，不复与诸卿议也。”这就使他在伐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早蓄复国异谋的冠军

将军慕容垂眼看时机已到，立刻进言：“陛下德侔轩唐，功高汤武，威泽被于八表，远夷重译而归。司马昌明因余烬之资，敢距王命，是而不诛，法将安措！孙氏跨僭江东，终并于晋，其势然也。臣闻小不敌大，弱不御强，况大秦之应符，陛下之圣武，强兵百万，韩、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号，以贼虏遗子孙哉！……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张、杜数贤而已，若采群臣之言，岂能建不世之功！谚云凭天俟时，时已至矣，其可已乎！”苻坚终于找到了一个知心者，欣喜异常：“与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慕容垂和姚苌又积极提出了进军的方略。

二、淝水之战

建元十九年（383，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七月，苻坚发布了总动员令：“吴人敢恃江山，（僭称大号，轻率犬羊，）屡寇王境，宜时进讨，以清宇内。便可戒严，速修戒备。发州民则十丁遣一兵，若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朕将（巡狩省方，）登会稽（而朝诸侯），复禹绩（而定九州。今王师所拟，必有征无战），伐国存君，义同三王。”[47]各州公私马匹悉充军用，每十丁征兵一人，士族子弟从军者悉拜崇文义从；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艺骁勇、富室才雄者，皆拜御林郎。中小地主大都认为这是发迹求官的大好时机，应募者达三万余人，为苻坚的主张积极鼓噪。苻坚任秦州主簿赵盛为少年都统，率领这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御林军。苻坚还命令先在长安城中建造安置东晋君臣的府第，预先封拜晋孝武帝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等。苻融再次面谏上奏：“鲜卑、羌虏，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48]苻坚已是蓄势待发，当然更听不进去了。八月二十六日，苻坚发布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前锋都督，统领能征善战或富有智计的将领张蚝、苻方、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先行；拜兖州刺史姚苌督梁、益二州诸军事，率领水师由巴蜀顺流而下。

苻坚兵分两路，西路水军既能牵制荆州晋军，又能顺流胁迫建康，姚苌使命甚重，苻坚慰勉有加：“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49]

是役，苻坚征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总兵力八十七万有

余。大河南北，旌旗相望，鼓声震耳，尘土飞扬。

百万大军岂能一朝而集。九月二日，苻坚自长安出发，车驾抵达项城（河南沈丘）时，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河南荥阳石门，由此入浪荡渠、汴水），达于汝、颍。为防御驾亲征时昔日灭国之君及降臣降将蠢动，苻坚命太子苻宏守国，张天锡、朱序等悉数随驾出动。

苻坚驻跸项城，致书东晋君臣："已为晋君于长安城中建广夏之室，故今大举相迎，克日入宅也。"[50]

苻融进军甚速。九月初，会合汝、颍驻军，前锋兵力增达三十余万，达于颍上（安徽颍上）。

秦军甫动，执掌东晋朝权的宰相谢安立刻调度全局，诏命征虏将军谢石以将军衔假节征讨大都督（元帅），冠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前敌总指挥），统辅国将军谢琰（谢安子）、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建威将军戴熙、扬武将军陶隐、广陵相刘牢之等北府兵八万[51]迎敌。

北府兵组建于建元十三年（377，东晋太元二年）。时谢玄任南兖州刺史，徙军府于京口（江苏镇江），在昔日郗鉴以北来流民为主体建成的一支军队的基础上，利用桓温庚戌土断的有利条件，再度招募北来流民中的"劲勇"和整编流民武装而成，目的在于改变荆、扬两地的军事态势和抵御北来的侵扰。此军彪悍善战，主要将领刘牢之、何谦之、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孙无终等都是不拘一格从中下层军官中提拔出来的，均以"骁猛"闻名当世。在对北方的战事中，此军"百战百胜"，由此获得"北府兵"[52]的美称。

晋方参战将帅中，谢玄长于"经国才略"[53]，尤善用人，"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54]，确实是前锋都督的最佳人选。谢琰年轻时即以"贞干称"，"有军国才用"[55]。桓伊"有武干，慓悟简率"，"性谦素，虽有大功，而始终不替"，是朝野共知的"能距捍疆场者"[56]。刘牢之"世以壮勇称"，"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沉毅多计画"[57]。谢安用人得当，连其政敌亦颇为叹服。

谢安所控精兵强将，可谓尽数出动。

百万大军压境，东晋朝野震动。谢安深知，惊慌失措，必然瓦解斗志，只有临危不惧、镇之以静，才能从容应敌。他内心紧张，却外示闲暇。谢玄职责攸关，惶急万分，叩见谢安，求取退敌之策。谢安了无惧色，徐徐回答“已别有旨”，再无他言。谢玄碰壁，派张玄再请锦囊妙计。谢安置若罔闻，命驾出游别墅，召集全部亲朋，摆下围棋，以别墅为赌注，逼迫谢玄对弈。往日谢安棋艺远不如谢玄，这次居然棋逢敌手。谢玄重压在心，魂不守舍，疏漏迭出，推盘认输。谢安赢了别墅，随口赏给了外甥羊昙，拉着谢玄在别墅作终日游。谢玄的心情逐渐松弛下来了。入夜，谢安策划部署，井然有序，谢玄放下心头重压，奔赴前线。

桓冲深以建康为忧，焦躁不安，荆州重地，又不得不守，乃挑选精兵三千来援。谢安为稳定人心，亦命退回，报书桓冲：“朝廷处分已定，兵革无阙，西藩宜以为防。”[58]

谢安从容镇定、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度，收到了朝野镇静的效果。

苻融进至颍上后，亲统主力直扑淮南，分兵慕容暐及慕容垂西出江夏（湖北云梦）。

十月，苻融挥军渡过淮水，攻克淮南重镇寿阳（安徽寿县西南），生擒晋平虏将军徐元喜和安丰太守王先，令其参军郭褒为淮南太守，镇寿阳，自己推进淝水。

慕容垂攻克郧城（湖北安陆），阵斩晋将王太丘，待慕容暐所部来到，郧城无虞后，移师漳口（湖北当阳）。

晋龙骧将军胡彬奉命进援寿阳，途中，闻寿阳失陷，统水师五千守硖石城。

硖石城位于寿阳西北二十五里的硖石山上，淮水流经山峡，两岸山壁高矗，各有城寨一座，自三国以来便是屏障淮南的军事要塞。为拔除障碍，苻融命卫将军梁成等率众五万进屯洛涧（淮河支流，今日洛河，安徽淮南东），树栅截流，隔断淮水，拦截胡彬后撤之路。谢石、谢玄所统主力，慑于梁成军威，不敢轻进，在距洛涧二十五里处安营扎寨。

胡彬困守硖石山，军粮将尽，扬沙唱筹，伪示粮草丰足。但自度难

免，决心殉职。挑选勇健精细士卒为使者，密驰晋营，通告谢石："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59]不料使者为秦军所俘。本来力主稳健的苻融得知胡彬虚实后，一反常态，寄希望于侥幸一击，遣使驰告苻坚："贼少易得，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掎禽贼帅。"

长江天险，苻坚亦深以为难，若能在淮南全歼晋军主力，实乃求之不得。苻坚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急欲亲统前锋，一展才略了。他留大军于项城，仅带轻骑八千，昼夜兼程，奔赴寿阳，喜谓苻融曰："晋人若知朕来，便一时还南，固守长江，虽百万之众无所用。今秘吾来，令彼不知，彼顾江东，在此必当战，若其溃败，求守长江不复可得，则吾事济矣！"[60]严令诸军："敢言吾之寿春者拔舌。"

苻坚到达寿阳，即遣朱序为使者胁迫谢石等投降。朱序被俘后，一直心念故国，秘密潜逃，又告失败，只有赧颜事敌。值此机遇，便将秦军虚实悉数告知谢石，建议晋军先敌而动："若坚百万之众悉到，莫可与敌。及其未会，击之，可以得志。"[61]谢石犹豫不决，企图坚守，"谋不战以疲之"。谢玄和谢琰力主接受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命广陵相刘牢之统领参军刘袭及诸葛侃等五千精锐进击洛涧。晋军距洛涧尚有十里，梁成便严阵以待。晋军慷慨赴敌，高呼竞渡，猛扑敌阵。秦军士气低落，无心恋战，刘牢之等斩杀梁成及其弟梁云、弋阳太守王泳等秦将，分兵截断秦军退路。秦军阵脚大乱，争渡准水逃命。刘牢之纵兵追击，生俘秦扬州刺史王显、将军梁他、梁悌、慕容屈氏等。是战，秦军伤亡一万五千有余，五万大军土崩瓦解，军械辎重悉数为晋军所得。晋军主力乘胜水陆齐进，扎营淝水东岸。苻融逼淝水而阵。双方隔淝水对峙。

洛涧一战，晋军初试锋芒，意气昂扬，求战心切。秦军厌战情绪本来严重，值此损兵折将，更加惊悸不已，畏敌之心陡增，士气一落千丈。

大军出动之前，苻坚豪言壮话虽然说了不少，但亦深知灭晋不同一般。《太平御览》卷400引《异苑》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苻坚将欲南师也，梦葵生城内，明以问妇，妇曰：'若军远行，难为将也。'坚又梦地东南倾覆，复以问，云：'江左不可平也，君无南行，必败之应也。'"此虽不足为凭，但兴师灭晋，魂牵梦萦，群臣又坚决反对，苻坚内心忐忑不安，也在情理之中。此时此刻，苻坚的心绪更为紊乱，登上城头，察看敌我态势，"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位于寿阳城东北五里）上

草木，皆以为晋兵”。回顾苻融，若有所失，忧形于色，喟然而叹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62]

谢玄利用苻坚速战速决的心理，遣使苻融：“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小却，（使晋兵得渡，）令将士得周旋，（以决胜负。）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63]

让晋军渡河后一决胜负，利弊如何？苻坚颇费斟酌。在军事会议上，绝大多数将领反对后撤：“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64]苻融提议埋伏骑兵，乘晋军半渡，未及列阵，发起冲击，以收全功。苻坚想利用北兵擅长步战的优势，歼敌于一役，拒绝了苻融的建议：“我长于步，彼便于水。今舍步入水，是以所短击其所长，非良策矣。可须彼过水，一时击之，彼既背水，进退无术，乃可尽杀。然后船舫渡江，直指会稽，观禹朝万国之处，不亦乐乎！”[65]

晋军周密部署，谢石统部一支，死死缠住手握精兵、屯驻淝南、号称“万人敌”的苻坚猛将张蚝，使其在决战时刻不得发挥作用。谢玄挑选八千精锐，由谢琰和桓伊统领，严密注意秦军动静。

苻融挥军后撤，部队移动，部署未定，谢琰和桓伊便挥军渡河。苻坚计划待晋军渡河后迫其背水而战，使晋军取得了安全渡河的良机。晋军前锋甫一登岸，便发起猛攻，锐不可当。而秦军却一退不可复止，诸部错乱。苻融率亲军驰骑略阵，企图稳定阵脚，战马被乱军冲倒，为晋军所杀。

主帅身死，群龙无首，诸部更为惶恐。朱序乘机在阵后高呼：“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军心混乱，秦军土崩瓦解。晋军乘胜追击，直杀到寿阳城西三十余里的青冈才鸣金收兵。

是役，秦军“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晋军缴获苻坚“乘舆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珍宝山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余”[66]。朱序、张天锡、徐天喜等乘乱投奔了晋营。晋军收复寿阳，生俘秦淮南太守郭褒。

苻坚身中流矢，狼狈万分，单骑夺路，奔窜淮北，饥疲已极，人有献食者，他特赐帛十匹、绵十斤。孰料为献食者所拒，反唇相讥曰：“臣闻自龙厌天池之乐而见困豫且，陛下目所睹也，耳所闻也。今蒙尘之

难，岂自天乎！且妄施不为惠，妄受不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养而求报哉！”苻坚羞愧莫名，后悔莫迭，对张夫人曰：“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

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对日后的历史有深远的影响。战后不久，前秦土崩瓦解，北方又长期陷入分裂割据之中，混战不已。各政权自顾不暇，谈不上用兵南方。长期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北魏统一北方后，一时还难以扭转南强北弱的局面。东晋在淝水大胜后，又苟延残喘了数十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刘裕取晋而代之，国号宋，南朝的历史开始了。刘宋政权虽然一度相当强大，同样无心于北伐。南北对峙的局面终于形成，绵延又及两个世纪之久。

第五节 淝水之战的性质及南胜北败的原因

一、淝水之战的性质

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是民族征服战争，还是兼并统一战争？自1979年以来，史学界展开了相当热烈的争论。目前，争论还在进一步深入。

兼并统一战争论者的论据主要有两个：第一，苻坚统治时期，北方的经济有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可与西汉的“文景之治”及唐朝的“贞观之治”相媲美；第二，前秦政权已经“封建汉化”，民族性已不突出，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在阶级矛盾极端尖锐时，民族矛盾的因素才起作用。[67]民族征服战争论者的主要论据：一是从总体上看，十六国时期，尤其是十六国前期，民族矛盾非但尖锐、激烈，而且相当复杂，民族融合才起步，民族界线分明，矛盾难以泯灭。二是苻坚治秦确有成效，但不能估计过高。其统治前期，由于政策较好，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但后期随着政策的转变，特别是战争的连绵不断，民族矛盾又日趋尖锐。三是前秦政权的民族性相当鲜明。[68]笔者持民族征服战争的观点。退一步讲，淝水之战即便带有统一战争的成分，就其本质而言，也是民族征服战争。[69]本部分只从民族矛盾及前秦政权的民族性进行分析，在下一部分中涉及这个问题时再从经济等方面进行分析。

从总体来说，十六国是魏晋南北朝民族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时期，尽管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不同，对民族矛盾尖锐的程度有所影响，民族矛盾却始终贯穿十六国时期的全过程。前秦是十六国前期的一个政权，要摆脱民族矛盾的纠缠，是不可能的。

魏晋南北朝是民族融合的时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经济是基础，是纽带。历史上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飞速发展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并不能促使他们融合在一起。民族融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打破各民族较为固定的居住区域，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在一起；落后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达到先进民族的水平，具体到这个时代来说，即内迁各族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并实现封建化。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还不等于民族融合，它仅是民族融合的开始。在封建时代生产力及经济条件下，各民族间、各地区间的交往相当艰难，这就

决定民族融合必须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反复颇多。苻坚在位只有27年，如果灭燕算是基本统一北方，到淝水之战亦仅13年，在13年中解决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课题，使那么多内迁少数民族和汉族基本融合，绝无可能。

由汉国到前秦，北方的民族关系确实有所变化，最主要的有两点。

首先，自汉国到前秦，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其政权建立的前后，都一无例外地进行了野蛮的人口掠夺，力图把劳动人手和兵源掠徙到其控制较为严密的腹心地区，在此过程中，各族人民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但是和汉、晋相比，各民族较为固定的居住区域被打乱了，交错杂居的情况有所发展，有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族属已难分辨，“杂夷”的名称出现了。

其次，随着西晋王朝的崩溃，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鉴于本族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各族人民的反抗，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反抗、内迁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联合斗争的日渐萌发，迫切需要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巩固和扩张其统治。汉族地主阶级由于保护其利益的西晋王朝崩溃，迫切需要投靠强有力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军事集团以确保其利益。少数民族与汉族统治者在阶级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逐步联合起来。石勒设置君子营、恢复九品中正制等措施，可以看作这类转变的契机。前秦时有所发展，具体表现在苻生时废除了胡汉分治政策。苻坚继承了这个趋势，在其统治前期，为了进一步联合汉族地主阶级，非但没有利用和挑唆民族矛盾，还相应地采取措施，缓和民族矛盾。事实上，鉴于汉族地主阶级富于封建统治经验，随着内迁少数民族封建化的日益加深，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依赖的程度总是在加深的，这也是这个历史时期不可逆转的趋势。另外，各民族被统治阶级基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而逐步突破民族的界限，走向联合斗争的道路，梁犊起义标志着各族人民联合斗争的萌发。[70]

众所周知，民族融合是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部分进行的。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的联合虽然使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力量有所加强，但在客观上还是有利于民族融合的。各族人民的斗争，特别是各族人民联合斗争的萌发，有力地推进着民族融合。

不过，与此并存的下述几种情况在分析淝水之战的性质时也不容忽视。

第一，少数民族统治者野蛮的人口掠夺以及他们建立政权后把本民族作为征服民族凌驾于各族之上等，导致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冉闵之所以能挑动民族仇杀，与这样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这场民族仇杀不仅发生于汉、羯之间，在后赵末年尖锐的民族矛盾激荡下，中原地区各个民族都被卷了进去，其后果与影响相当复杂。它不仅深刻地教训了各族人民，教训了后起的、较为明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使他们感到利用民族矛盾、挑唆民族矛盾，并非巩固统治的有效措施，只会引来无穷祸患，迫使他们不敢露骨地挑唆民族矛盾，轻易走上民族仇杀的道路；另外使各民族，特别是他们的上层统治集团感到，只有本民族才是可靠的力量，民族界限更为清楚，民族意识由此加强。尽管随着时日的推移和民族融合的发展，它会日渐淡薄，最终消失，但又绝非短时期可以奏效，因此，它的反动作用决不能低估。前秦建立在这场民族仇杀进行之时，苻坚即位距这场民族仇杀也不过七年，不受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下述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一是苻坚登位初期，王雕呈献了“氐在中，华在表”的图谶，建议将氐族集中到关中，把“三秦大户”逼迁到边地。对此，苻坚是赞赏的，特意就此征询王猛的意见。王猛坚决反对。在王猛的坚持下，苻坚虽然杀了王雕，但对其建议却始终念念在怀，过后又认为“雕言有征”[71]，追赠王雕为光禄大夫。二是统一北方后，苻坚推行了军事殖民的措施。三是前秦灭亡前夜，苻坚同样祭起了民族仇杀的法宝，下令杀尽长安城内的鲜卑人（详见第六章第二节）。

第二，自汉国到前秦，各民族较为固定的居住区域虽被打乱，交错杂居的状况有所发展，但在胡汉分治政策及汉、赵等国优遇和依赖其余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传统下，内迁各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并未彻底打破，各族上层分子对本民族的控制有所扩大或加强。如苻洪由控制一方氐族一跃而为后赵境内氐族之首，可以吹嘘“诸氐皆洪家部曲”等。前秦虽然废除了胡汉分治，但护军制却保留了胡汉分治的主要内容，各族酋帅对本民族、本部落依然有着控制权。《邓太尉祠碑》及《广武将军□产碑》中刻名的“部大”“酋大”“大人”之多，《邓太尉祠碑》能开列冯翊护军统领的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居地等情况，便是最好的佐证。

第三，各地区、各民族，甚至同一民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此时更难避免。不要说别的，以氐族而论，因居住地区的不同，其发展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西部边境的氐族就远不如关中的氐族，乃至苻坚也把他们视作少数民族：“彼种落杂居，不相统一，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喻，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72]

第四，各族上层分子都想割地称雄或独树一帜，即使在被征服期间，也力图扩张势力。在少数民族权贵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下，拉拢汉族地主阶级成了其扩张势力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权贵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固然以统治民族和汉族的权贵的联合为主体，鉴于历史的渊源和各地区民族力量的对比及影响极不平衡，使少数民族权贵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关东的汉族地主对慕容权贵一往情深，不断为其复国奔走呼号；西州的汉族地主倾向羌族权贵；关中的汉族地主倾向氐族权贵；雁、代的汉族地主寄希望于拓跋权贵；等等。此类状况预示着一旦风云突变，便可出现一个个胡汉军事集团。

第五，赵整的《琴歌》及淝水之战前夕前秦朝廷内外激烈的争论表明，此时前秦境内各民族的界限泾渭分明，彼此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魏太武帝拓跋焘统兵南下，致书盱眙（今属江苏）宋将臧质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郡治今河北正定南）、赵郡（治今河北赵县）贼；胡死，正减并州（山西省）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73]此时距淝水之战已近70年，族别的区分尚这样鲜明，更何况淝水之战前夕。氐族虽然早就是农耕民族，是内迁诸族中最先进、受汉族影响最深的一个，但要和汉族融合在一起，尚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苻洪以"戎狄夷类"自居；淝水之战前，苻融被迫说出"国家，戎族也"那番话来，岂非表明他们十分清楚氐族和汉族的区分吗？苻洪和苻融在接受汉文化和对待氐、汉关系上都是开明人物，尤其是苻融，汉文化的素养并不亚于苻坚，是继王猛之后辅佐苻坚推行封建化措施最有力的助手，他们尚然如此，更何况其他氐族成员。苻坚确实想以一统天下之主自居，竭力回避"戎族"的字眼，但他个人的状况及意愿仍然掩盖不住当时氐族和汉族的区分。事实上，在内心深处，苻坚也是深知氐、汉之间的区别的。否则他岂能对王雕的建议那么感兴趣，岂能认为只有本族人才是他维护和巩固统治的"磐石之宗"呢！因此在他行将灭亡之时，不得不从梦幻中回到现实里来，直率地承认氐族是"胡"、是"戎族"："小羌乃敢干逼天子……五胡次序，无汝羌名！"[74]

汉族怎样呢？有关汉族的民族意识及民族感情，在苻健入关及桓温兵进关中时均已谈及，这里不再重复。50余年后，刘裕撤离关中，三秦父老竭力挽留，哭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

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75]此事发生在后秦灭亡之后，后秦封建化的程度及姚兴统治时期的各项措施，并不比苻坚差多少，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随着时日的推移，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向前推进了一步，此时尚且如此，不能想象介于两者之间的淝水之战前夕，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会变得十分淡薄。苻坚即位以后，有两则歌谣盛传不休：

阿坚连牵三十年，后若欲败时，当在江湖边。

河水清复清，苻坚死新城。[76]

这是诅咒，亦是汉族人民寄希望于东晋的心理反映。《法苑珠林》卷82记载，淝水之战后，关中千余户汉族人民乘前秦衰落之机，长途跋涉，来到东晋，达者千余户，未达及翘首以待者当然更多。众所周知，永嘉之乱后，汉族人民蜂拥南渡，大体可以分为7个时期，其中淝水之战后便是不容忽视的时期之一[77]。这不正是汉族人民民族意识和感情的写照吗？

有的学者以秦军在淝水惨败后只是逃跑，没有归降或投奔东晋，证明汉族和前秦没有民族隔阂。这是十分奇怪的逻辑，民族意识和民族隔阂岂能以此为准呢？！如果行得通，岂不是说十六国时期凡是生活在北方的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政权均无民族隔阂了吗？更何况，人所熟知，封建社会中土地有强大的束缚力，农民安土重迁，非到生死抉择关头，是不会背井离乡、漂泊异地的。至于被征发为兵的汉族人民，情况就更复杂了。

毫无疑问，氐族封建化的速度相当快，前秦是一个封建政权，甚至治国思想都模仿魏晋。之所以如此，诚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7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指出：“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79]经典作家在这里非但揭示了氐族模仿汉族建立封建政权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启示我们，民族融合的范围要比封建化宽广得多，包括语言、习俗、心理素质等各个方面，需要“长时期”才能完成。因此，政权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并不能画等号。苻坚前期的政策较好，只是给民

族融合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而已。看看魏孝文帝在文化、习俗、语言甚至服饰等诸方面全盘推行汉化政策，尚须经过漫长的历程和反复才能实现民族融合，不难想见此时民族融合的状况，何况苻坚在这方面的措施也远不如魏孝文帝彻底。

以上说明，直到淝水之战前夕，北方的民族关系仍然极端复杂，民族融合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所以直到北魏基本统一北方时，人们还说："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欲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譬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走，不可得也。"[80]即使是少数民族权贵和汉族权贵的联合，也还有待于发展，前秦政权和汉族地主阶级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的。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苻坚统治时期前秦政权的民族性问题。有的同志依据苻坚说过"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为一家，同有形于赤子"等话，前秦灭燕后关东州郡牧守大都是汉族士人，苻坚不断辟召汉族士人任职，前秦政权中汉族官员数量巨大等，论证前秦政权的民族性并不强烈。和汉、赵等国相比，苻坚统治下的前秦在这方面确实要远胜一筹，可以说苻坚顺应了他所处时代的民族融合的趋向，这是苻坚之所以能统一北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对此也不应该做过高的估计。

第一，苻坚确实说过那段话，与此意思相似的话也有很多。但这主要是对各族上层分子（详见第三章第三节及下文）。

第二，综观十六国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政权中，中央文职官员（包括高级官员）及郡守县令，大都由汉族士人充任，汉人在官员队伍中的人数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官员队伍中汉人所占的比重不足以否定该政权的民族性。汉、赵等国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尖锐，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性十分强烈，这是史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史籍所见，在汉及前赵政权中有名有姓，可以判断族别的官员总计219人，其中皇室40人（有3人后来为帝，实际仅37人），匈奴族30人，其他少数民族18人，汉族131人。[81]这131个汉族官员，大都是在中央任职或为刺史者，郡守县令绝大部分未见到名姓。即便如此，在上述数字中，汉族官员已达59.8%，如果把皇室排除在外，比重可以上升到73.18%。淝水之战后，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也是民族性较为强烈的一个政权。《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中有一张南凉初建时的任官名单："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傉檀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镇西平。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俊；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

统、杨贞、卫殷、麹丞明、郭黄、郭奋、史蒿、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族地主阶级。

第三，灭燕后，苻坚任命王猛为冀州牧，镇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郭庆为幽州刺史，镇蓟城（北京）；以京兆韦钟为魏郡（治河北临漳西南）太守，彭豹为阳平（郡治河北馆陶）太守，“其余州县牧、守、令、长，皆因旧以授之”。对此，胡三省有一个正确的诠释：“尽易州县牧、守、令、长，既骇观听，且人情新旧不相安，故皆因旧。”[82]也就是说，这是安民的权宜之计。局面稍稳，这类状况就不允许了。不到三个月，苻坚就在关东地区动了一次大手术：逼迁慕容部人和关东大族于关中；将前燕的十三州改为六州；派遣亲信及族人为州刺史，除王猛和郭庆外，又以“魏郡太守韦钟为青州（治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刺史，中垒将军梁成为兖州（治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刺史，射声校尉徐成为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刺史，武卫将军王鉴为豫州（治洛阳，今属河南）刺史……以关东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补六州守令，授讫，言台除正”[83]。最后一句话表明，除了州牧刺史外，郡守县令也大都换了人。

苻坚内心深处，民族观念相当强烈。不过，在创业初期，他较能克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深“达变通大运”。功成名就，他再也克制不住了，日渐暴露，乃至恶性发展，实施军事殖民等措施。其实，苻坚统治前期的前秦，同样是一个以氐族为主体的、民族性相当强烈的政权。下面将要涉及的内容，除前已阐述者在此简单一提外，有的则需具体叙述。

其一，苻坚继承了汉、赵以来把少数民族当作主要军事力量使用的传统。护军主要集中在关中的原因就在于此。即使在灭晋问题上，这位自诩以德服人的人物，也不是寄希望于南方的汉族人民，而是少数民族：“吾方命蛮夷以攻其内，精甲劲兵以攻其外，内外如此，安有不克！”[84]

其二，苻坚继承了自汉国以来优遇被征服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传统，对他们的信赖及使用，远过于汉族地主阶级，乃至苻融也为之忧心忡忡，称诉鲜卑、羌、羯的权贵们“执权履职，势倾劳旧”，“贵盛莫二”。但对汉族士人则往往疑虑重重，哪怕王猛，也无例外。

苻坚和王猛，总体上是君臣际遇、如鱼得水，时人也评为“千载一时”。仔细观察，两人之间并非尽然如此。苻坚和王猛之间的冲突，前面已有叙述，这里再看看灭燕前后一系列戏剧性的场面。一是王猛名为统帅，精兵猛将却在邓羌手中，王猛指挥不了邓羌。事后也未见到苻坚对邓羌的行为有任何指责。此等部署，岂属偶然。二是灭燕之役，王猛坚决反对苻坚殿后，苻坚是同意的。最终还是苻坚违背了约定，在得到秦军已包围燕都邺城的捷报后，立刻亲统十万精兵（超过王猛兵力四万）来到安阳（河南安阳西南），君臣见面之际的对话虽然不露痕迹，却耐人寻味。

> 猛潜如安阳谒坚，坚曰：“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今将军临敌而弃军，何也？”猛曰：“亚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窃少之。且臣奉陛下威灵，击垂亡之虏，譬如釜中之鱼，何足虑也！监国冲幼，鸾驾远临，脱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85]

潞川（浊漳水）之战，前燕兵力大于王猛将近七倍，此时苻坚没有动心，偏偏在王猛击灭了前燕主力，兵围邺城，前燕真正成了“釜中之鱼”“垂亡之虏”时出动，而且迫不及待，“星言电赴”[86]。很显然，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王猛岂有不知，赶紧前往安阳以明忠心，借“监国冲幼”“脱有不虞”及批评历史人物周亚夫来稍示不满。三是灭燕以后，苻坚授命王猛全权处置关东，但未及数月，王猛却上了这样一道奏章：“臣前所以朝闻夕拜，不顾艰虞者，正以方难未夷，军机权速，庶竭命戎行，甘驱驰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僶（原为僶）勉从事，叨据负乘，可谓恭命于济时，俟太平于今日。今圣德格于皇天，威灵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窃敢披贡丹诚，请避贤路。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岂应孤任愚臣，以速倾败！东夏之事，非臣区区所能康理，愿徙授亲贤，济臣颠坠。若以臣有鹰犬微勤，未忍损弃者，乞待罪一州，效尽力命。徐方始宾，淮、汝防重，六州处分，府选便宜，辄以悉停。督任弗可虚旷，深愿时降神规。”[87]一句话，王猛安定关东、防范东晋、分官任职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均难以推行，他已进行不下去了，只好请求辞官，否则决不会说出“待罪”、“济臣颠坠”及“徙授亲贤”这样的话来。凡此种种，说明苻坚之放手王猛是有限度的。当王猛在其身边，他可以让王猛大展才华，甚至不惜以打击本族豪贵为突破口，支持王猛整顿纲纪，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无疑是苻坚的杰出之处。可是王猛一旦领军出征或外任，鞭长莫及之感便像阴魂一样死死缠住了苻坚，由此事事小心，处处设防了。王猛对此岂有不知，所以在外任冀州、都督关东时，绝不敢越雷池一步，尽管“督任弗可虚旷”，也事事奏报，并“深

愿”苻坚“时降神规”。对王猛尚且如此，其他汉族士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苻坚起用了大量汉族士人，但其中真正的人才除王猛外，其他人很少。在这方面高泰和燕凤是有代表性的。高泰是关东士族的首领，在关东有巨大的影响，既富舌辩之能，又确有治政之才。王猛对他心仪已久，灭燕后屡次征辟，均为其所拒。当高泰应苻融之请，来到长安后，王猛高兴至极，推荐给了苻坚。当苻坚询问高泰“为治之本”时，对其回答也极为赞赏。结果却听其回归冀州，最后辞官而去。燕凤名闻代北，是拓跋什翼犍的长史，在代国屡有事功，后来是北魏的开国元勋。他曾数次出使前秦，苻坚对其才识也甚为了解。灭代以后，如何善后，是他提出了方案。苻坚采纳了他的方案，却没有起用这样的人才。之所以如此，是苻坚对于包括王猛在内的汉族士人非但戒心甚重，甚至在选用汉族士人时，还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地域观念。因此较受重用的汉族士人大体属于这三种人：枋头旧部、关中士人、前秦建立前就到了关中的士人。有关于此，在灭燕前苻坚就有所流露。灭燕前，郭辩到邺城刺探虚实后呈报了前燕的状况，指出皇甫真的机鉴识变优于常人。苻坚的反应是：“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关西多君子矣。”[88]灭燕以后，苻坚确实诏求过关东人才，但终其世，又何曾见到过上述三种情况以外的汉族士人在其手下崭露过头角呢？

对于曾经为敌国出力和敌国统治区的汉族士人，苻坚不仅是有戒心，甚至是可以说抱有敌对情绪。这方面，尹纬的遭遇具有典型性。这样一个连苻坚也认为和王猛相同的王佐之才，直到苻坚晚年才做到一个小小的吏部令史，仅仅是因为其族人尹赤曾投降过姚襄。苻坚可以重用姚襄的弟弟姚苌，但对尹氏却决不轻饶，下令“诸尹皆禁锢不仕”[89]，并祸及西州人士。这种状况，前秦岂能得到其他地区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

其三，众所周知，在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年代，军事活动优于一切，军权才是一切权力的核心。汉人在前秦可以做文职高官，进入军事领域的仅王猛、邓羌[90]数人而已。王猛出将入相，一般所统兵马只有两万左右，而且每次都有氐族将领为其副手。王猛领兵最多的是灭燕之役，为数六万，与以宗室和氐族亲贵为帅时领兵数相比，差距相当大。苟苌灭凉，领兵十三万；苻洛灭代，领兵三十万；苻丕夺取襄阳，领兵十七万；即使是苻雅击灭小小的仇池，也领兵七万。前燕是前秦在北方最强大的敌国，灭燕既是前秦统一北方的第一战，也是最关键的一战。

按理兵力配备应大于其后各役。是当时前秦兵力不足吗？非也！在前燕灭亡已成定局时，苻坚能统精兵十万殿后，表明此时兵力不成问题。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王猛是汉人，苟苌、苻洛、苻丕、苻雅都是氐族亲贵。其中，苻洛是深受苻坚“疑忌”的人物，调动的时候苻坚还特意下诏不准他经过京师。尽管如此，苻坚还是任命苻洛为三十万大军的统帅。这岂非表明，在苻坚的心目中，哪怕像苻洛这样的氐族亲贵，也比王猛可靠吗？因此苻坚统治前期，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只有氐族才是其统治的“磐石之宗”的话来，但在其内心深处，这个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而王猛奏章中“徙授亲贤”的含义，当然也就是指宗室亲贵了。王猛、邓羌死后，更无汉人在中央掌有军权。相反，慕容垂、慕容暐、慕容德、姚苌等人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或为一方统帅，或为一军主将。

就军权而言，方镇的人选应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自苻坚即位到淝水之战前夕，拥有使持节、持节、都督、大都督或大将军之类头衔坐镇地方的，计有张平、苻柳、梁平老、苻双、王猛、郭庆、邓羌、杨安、苻融、梁熙、苻洛、苻雅、梁成、苻丕、苻朗、吕光、苻晖、姚苌、乞伏司繁、乞伏国仁、石越、梁谠、王腾、苻睿、毛兴等25人次。其中，宗室和氐族亲贵占72%，汉人占12%，其他少数民族占12%，族属不明者占4%（有关族属详见下文）。在汉人中，张平是个特例，他是拥军据地归顺，在苻健时就拥有那些头衔的，苻坚不便轻易变动，而且为时不久，就被苻坚歼灭。因此在方镇中，汉人所占比例实际只有8%，可谓微乎其微。这就表明，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苻坚统治时期，军权是牢牢掌握在宗室或氐族亲贵之手的。

其四，除军权外，即使是地方行政权，也大都集中在氐族权贵之手。众所周知，魏晋以降，除单州刺史外，州牧刺史的地位上升，集军、政、财于一身，俨然是一方之主，是官员队伍中最有实权的一部分。苻坚仿照汉魏完善政权机构，同样继承了这一状况。今据《晋书》《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辑补》《十六国疆域志》等史乘，将苻坚统治时期州牧刺史的名单列表如下。

表1 州名、治所、官名、前后任职者

州名	治所	历任者
司隶	长安（陕西西安西北）	校尉吕婆楼、王猛、苻融、苻睿、苻晖
雍州	蒲坂（山西永济蒲州镇）	刺史苻双、苻武、苻柳、苻丕、苻睿、苻熙
秦州	上邽（甘肃天水）	州牧苻雅、窦滔、啖铁、毛兴、苟池、杨璧、苻双、杨统
南秦州	仇池（甘肃清水西北）	刺史杨世、杨统、王统、杨璧
洛州	陕城（河南三门峡）或丰阳（陕西山阳）	刺史苻廋、赵迁、邓羌、张五虎、邵保
豫州	洛阳（今属河南）	刺史或州牧王鉴、毛当、苻重、苻晖
东豫州	许昌（今属河南）	刺史毛当
并州	晋阳（山西太原南）	州牧或刺史苻柳、苻抑、徐成、俱难、邓羌、张蚝、王腾
冀州	邺城（河北临漳西南）	州牧或刺史王猛、苻融、苻丕、苻定
幽州	蓟城（北京）	刺史郭庆、苻重、苻洛、梁谠、王永
平州	龙城（辽宁朝阳）	刺史石越、苻冲
凉州	枹罕（甘肃临夏东北）或姑臧（甘肃武威）	刺史彭越、姜宇、王统、梁熙
河州	枹罕（甘肃临夏东北）	刺史李俨、李辩、毛兴
梁州	汉中（陕西汉中东）	刺史杨安、毛当、韦钟、潘猛
益州	成都（今属四川）	刺史或州牧王统、杨安、苻洛（未之镇）、王广、李丕
宁州	垫江（四川合川）	刺史姚苌、姜宇
兖州	仓垣（河南开封西北）或鄄城（山东鄄城北）	刺史梁成、彭超、姚苌、张崇
南兖州	湖陆（江苏邳州北）	刺史毛盛
青州	广固（山东益都西北）	刺史韦钟、苻朗
荆州	襄阳（湖北襄樊）	刺史皇甫覆、梁成、都贵、王显、杨安
徐州	彭城（江苏徐州）	刺史彭越、毛当、赵迁
扬州	下邳（江苏睢宁西北）	刺史王显

凉州在灭凉以前无实地，灭凉后一直是梁熙任刺史。宁、荆、扬、徐四州前秦仅占有一两个郡或数县，是遥制州，此外诸州都有实地。

在表1中，凡两次或两次以上出任一地刺史或州牧者，均作一人次计算，总计为85人次，实际是58人。其中，苻姓15人肯定是宗室。石越、梁谠、毛兴、王腾见于苻坚军事殖民名单，是氐族权贵且是苻氏姻亲。杨统、杨世、杨安是仇池氐，杨璧尚公主，也是仇池氐。吕婆楼和梁平老是略阳氐。毛盛、毛当和毛兴是同族，梁谠和梁熙是兄弟，苟池是后族。吕光是吕婆楼之子，梁成是梁平老之子。王鉴和王显是武都氐。《资治通鉴》卷99胡注曰："啖，氐姓也。"啖铁是氐人可以无疑。姜氏历来为氐中大姓，且与苻氏世通婚姻，估计姜宇也是氐人。这样，若以人数计，氐人在州牧刺史中所占比重为59%；以人次计，则上升为64%。王猛、邓羌、赵迁、邵保、徐成、王永、李俨、李辩、韦钟、王广、李丕、潘猛、张崇、皇甫覆、王统15人为汉人，以人数计，在州牧刺史中所占比重是26%；以人次计，则下降为18%左右。余为少数民族或族属不明者，占州牧刺史的15%左右。鉴于史乘缺漏，以上名单肯定

不全，而且极难断定其任期及时间排列。族属虽力求有史可证，也难免有所疏忽。尽管如此，表1名单还是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实际情况的，至少在前秦军政活动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大都在内了。

统计数字表明，氐族人在州牧刺史中占有绝对优势。此外，有些情况也值得注意：一是司隶、秦州、南秦州和雍州，即关陇地区，除王猛为特例外，非苻氏宗室或氐人莫属，他族人一般不能染指。甚至这些地方的郡守、县令也大都由氐人或少数民族权贵担任，汉人在此任职者极少。二是苻氏宗室及氐人所任的州，均属关键地区，且大都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某些州原先不重要，可以任用汉人，一旦重要性显示出来，即以氐人取代。如毛兴取代李辩后，即兼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三是汉人虽占一定比重，但除王猛外，所任均非要州重镇，地位一般均较低，颇类单州刺史。如赵迁、邓羌和邵保出任的洛州，地位大体只相当于关陇的安定（甘肃泾川北）太守，王广是淝水之战后苻坚即将放弃益州时任命的，李丕更是王广逃跑前未经苻坚同意擅自委任的，等等。

总之，上述情况说明，苻坚统治前期，民族矛盾激化的根源依然存在，而下述原因则又必然促使民族矛盾的激化。

第一，灭燕以后，苻坚连年用兵，穷兵黩武，破坏了北方的经济（详见后文）。

第二，对异民族的残酷掠夺和屠杀。吕光受命西征时，苻坚指示："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91]这就证明，前秦在征服各地过程中，屠杀和掠夺是一贯的，只要不"过深"，苻坚就满意了。而野蛮的人口掠夺，又几乎是征服战争后的必然之举，规模之大，往往以十万或数十万口计。这给生产造成的破坏及被掠徙者留下的苦难绝非短时期可以磨灭。汉、魏以来，人口掠夺数不胜数，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治阶级同是掠夺，如果对象不同，矛盾的性质也截然不同。同一民族内部的掠夺，其性质和表现形式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异民族之间的掠夺，尽管在同一国家内部，但必然蒙上民族分野的光环，以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形式表现出来。何况还有为数众多的异族人民被征服和逼迁后，沦落为奴隶和牧士之类呢。淝水之战后，苻坚指责慕容冲起兵反叛："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慕容冲回敬曰："奴则奴矣，既厌奴苦，复欲取汝见代。"[92]王永讨姚苌的檄文也曰："羌贼姚苌，我之牧士。"[93]慕容冲的队伍主要是由逼迁于关中沦落为牧士的鲜卑人组成的，人数之多，连苻

坚也颇为吃惊。可见，沦落为牧士的为数不少。

众所周知，汉魏以来，官牧场上的牧士一般由奴隶或刑徒充任，身份地位十分低下。[94]鲜卑慕容部在其建国前便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建国后，农业生产发展得相当迅速。[95]内迁较早的羌族，尤其是姚氏所属的烧当羌，在汉、魏之际也逐步以农业生产作为其经济生活的主体，所以姚襄在淮南才会大搞屯田，积蓄力量。他们被征服后，居然沦落为牧士，这就不单是身份地位的低落，而是民族融合的一种反动了。因此，无怪乎那么腐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权势之争那么激烈的慕容泓和慕容冲集团在与苻坚对垒时，其部下大都作拼死斗，打得苻坚只有招架之功了。

苻坚宣称，他发动淝水之战，是要使“中州之人”“流渡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也就是说，一旦灭晋，他同样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口掠徙。至于在淝水之战以前被掠徙的汉族人民，也难免有沦落为奴婢者，即使他们大都保持了编户齐民的身份地位，但其经济上的损失和生活上的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以征服民族的姿态凌驾于被征服的各民族之上（详见第五章第二节军事殖民等）。

既然如此，民族矛盾岂能不尖锐！

总之，从汉国到淝水之战前夕，北方的民族关系确有变化，民族融合也在进行，但不能估计过高。前秦境内民族成分复杂、民族界限清晰，各民族甚至各集团间矛盾重重。苻坚的政策固然有缓和民族矛盾的一面，也有激化民族矛盾的一面，前秦政权的民族性仍然相当明显。连绵不断的征服战争，对各民族的野蛮屠杀和掠夺，征服一地后的人口逼迁等等，又必然导致民族矛盾的尖锐。这些情况决定了淝水之战的性质，而且正是淝水之战中苻坚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前秦在战败后顷刻间土崩瓦解的根源。

二、淝水之战南胜北败的原因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经济力量和人心向背的角逐。淝水之战前夕，秦、晋双方在这三个方面的情况怎样呢？

东晋之所以能够立国，主要凭借了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地理上的优

势。长江自古以来是区分南北的天然屏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兵力，北方政权难以逾越这一天险。二是经济上的优势。东吴时期，南方经济便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原涂炭，这里经济占有相对的优势，足以支撑一个政权。三是东晋是西晋的延续，自诩正朔之所在，在民族矛盾尖锐激烈之时，对汉族人民甚至少数民族也有号召力，处置得当，可以转化为政治优势。北方人民盼望东晋收复失地，南方人民则依靠东晋保障其安全，免受异族的蹂躏。南北人民的共同支持，使东晋几度转危为安，在风雨飘摇中长期苟延残喘。即便少数民族统治者，一碰到正朔之类的问题，也不免为之气馁。

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自然环境在百余年，甚至千余年中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但经济实力则可能会有明显的消长。梁人沈约对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充满了赞叹之情："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惊，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96]史料中的"鄠"，是指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鄠邑区，"杜"在今天西安附近，这两地是西汉时农业最发达、地价最高之处，此时，三吴地区的农业生产及地价，已超过了西汉时的鄠、杜二县，加上人口的繁育生息，难免使人有"将曩时一"的感叹。总之，自永嘉之乱至刘宋大明年间，南方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已是焕然一新了。沈约所谈的是刘宋中后期时江南的状况。可是如此巨变，并非一蹴而就，是将近一个半世纪日积月累的结果。按沈约的意见，其间有两个较为显著的发展时期：一是东晋建立到孙恩起义，一是刘裕掌权到宋末战乱。沈约生活在刘宋末年战乱后不久的梁代，乱后思定，对南方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分析，当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显然，自东晋建立到孙恩起义前夕，是南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淝水之战在孙恩起义以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南方的经济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

东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二是北方人民的大量南下。北来流民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初步改变了南方地广人稀的状况，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工具。这两个原因的出现，和民族矛盾密不可分。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东晋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象征，正朔所在，人民的希望。这是南方统治者赖以建立政权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驱使汉族人民支持其腐朽统治的有力武器，是苻坚梦寐以求却又难以得到的政治优势。直到北魏后期，它对汉族人民的影响仍然不能低估。《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记载陈庆之到达洛阳后，醉中傲然四顾，声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至于南方人民，则仍“号洛阳为荒土”，“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正是这一条，吸引着北方人民蜂拥南下，促使北方人民支持东晋的每次北伐，造成居住在大江上下的南北人民支持东晋平息内部的叛乱。

东晋基本上是一个相当腐朽的政权，土地兼并激烈，人户隐匿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时刻表面化。东晋建立后，先后爆发了王敦的两次起兵和苏峻、祖约的叛乱。这几次内乱的迅速扑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北来流民奋力而为的结果。[97]

东晋一代，皇权相对削弱，权臣擅政。先是王与司马氏共天下，继则庾、桓、谢与司马氏共天下。这些权臣大都有擅自废立的历史，谢安没有搞废立，却搞了褚太后临朝称制。有些权臣前进一步便可登上皇帝宝座，但他们即使如野心勃勃的王敦和桓温也不敢轻易跨出这一步，而是期待禅位，名正言顺地即位。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民族矛盾。在民族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权臣们的功业若未到足以稳定民心的程度，舍弃晋室，另立新朝，必然人心尽失，导致军民的反对，统治集团内部亦将爆发难以收拾的祸乱。对他们来说，既然司马氏承认了共天下的局面，那么拥有晋室名号，推奉晋室正朔，就成了他们保全自身及家族利益的最佳选择。

可见，自东晋建立到淝水之战前后，南方将近百年的安定环境，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确实密不可分。

南方人民，特别是北来流民，并没有蒙受过苻坚的雨露阳光，他们有的只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背井离乡、长途跋涉、流离异地的辛酸

和血泪，好不容易来到东晋，岂堪再度忍受前秦的铁蹄。大量北来流民的涌入，对南方土著的心理影响，足以引起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的恐怖，“谈虎色变”四个字恐怕不算过分。襄阳和淮南的保卫战，特别是襄阳的保卫战已经显示了南方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心态，百万大军压境，南方人民岂能不为心动。以北方流民为主体的北府兵，在对北方的战争中，尤其是在淝水之战中个个奋勇，以一当十，绝非偶然。

应该说，东晋统治集团在对付前秦上，早就有着心理准备。《晋书·桓豁传》曰：“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谢石传》中说桓豁这样做，目的在于“以邀功”矣，显然桓豁是以灭秦为己任了。桓温死后，谢安当国，形势更为严峻，史称“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98]。所谓“御以长算，德政既行”包含了调整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及采取相应对策两部分的内容。

东晋在苏峻、祖约之乱时，宫室被毁，一直未加修缮。谢安当政，头一件大事便是力排众议，决定修缮宫室，并费尽心机，制造出皇室乘坐的各种辇。表面上看，这是兴师动众、靡费财物的无益之举，实质上，谢安是祭起了春秋五霸所使用的尊王攘夷的法宝，是在调整皇室和诸大族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尊重皇室，蓄意用东晋的正朔号召人心，对各大士族不仅有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民心，所以收到了“役无劳怨”[99]的积极效果。同时，在权势分配上，谢安力图照顾各大士族的利益，恢复王导以来维持各大士族间势力平衡的决策。

晋室南渡后，随司马睿南渡的一批士族扶摇直上，晚来的则遭到歧视和排挤，此一矛盾悬久未决。谢安“兴灭继绝，求晋初佐命功臣后而封之”[100]，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早渡和晚渡士族间的矛盾。在用人上，谢安比较重视才干实学。其婿王国宝，虽门第高贵，却利欲熏心，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谢安斥而不用；北府兵将领不论门第，均以勇猛应选；其弟谢万轻贱将领，“未尝抚众”，谢安“深忧之”，严厉地批评了谢万，“自队主将帅已下……无不慰勉”[101]。谢安身居宰辅，在门阀统治森严、鄙薄武人成为社会风气的背景下，此类举动，确实颇为不易。谢安的苦心，得到了东晋其他权势人物的支持和响应。桓、谢两族矛盾重重，此时此刻，桓氏势力的代表人物桓冲居然主动让出了扬州，这是对时局影响颇大的一个让步。正是这个让步，才使谢安可以任用谢玄在京口组建北府

兵。至于用人，连对谢氏私怨甚深的郗超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违众举亲，明也！”[102]这就无怪乎前秦的一些大臣要在苻坚面前赞扬谢安和桓冲是“江表伟才”了。

在相应的对策中，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要数组建北府兵，这在本章第三节中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此外，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经济。

一是建元九年（373，东晋宁康元年），诏除丹阳、竹格等四桁税。

二是建元十一年（375，东晋宁康三年），三吴水旱成灾，百姓失业，诏令开仓赈贷，免除义兴、晋陵、会稽三郡一年租布，其余各郡免除半年。

三是建元十二年（376，东晋太元元年），将淮北人民徙于淮南。废除度田收租之制[103]，规定王公以下每口税米三斛，免除士兵全部赋役。

四是建元十五年（379，东晋太元四年），诏令御用供奉一律俭约，皇亲国戚及百官俸禄全部减半，劳役及其他开支，非军国所需者，暂时停省。

五是建元十六年（380，东晋太元五年），大赦，蠲除太元三年（378）以来百姓所拖欠的赋税徭役及债务，赈济鳏寡孤独及穷苦人民。

六是建元十七年（381，东晋太元六年），改革制度，裁减烦费冗员。

七是针对“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的状况，“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104]。

这些措施显然是为节约财政开支、集中军国所需及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其中尤以第七项的作用为大。所谓“搜简民实”等，实质就是整顿户籍，搜括隐漏，强化基层组织。三吴是南北士族集中的地区，也是东晋主要的财赋之区，在这里推行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实行的确切年代虽然不明，

但“太元中，外御强氏”表明，这完全是为了对付前秦而采取的措施。

上述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收到了举国上下一致对敌的效果，和前秦内部群起反对，只有苻坚一人力主伐晋，慕容垂及姚苌等少数人赞成恰成鲜明的对比。

苻坚治秦，确有成效，境内经济大有发展。可是仔细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到，从地域来说，主要是关陇地区；从时间来说，主要是王猛生前，即苻坚统治前期。

北方经济是否恢复或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东地区，因为这里历来为北方的经济区，地域大，人口相当于关陇和南方的总和。关东在后赵崩溃、冉闵作祟时就被破坏得疮痍满目、尸骨如山。前燕占有关东后，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经济，后期的腐朽统治更给关东经济雪上加霜，结果是农桑俱废，“天下萧条”[105]。前秦灭燕后，除了逼迁人户和分派使者巡行一次州郡劝课农桑，革除弊政外，亦无切实的举措。前燕的王公贵族被逼迁关中，客观上有利于关东人民，至于使者巡行一次就很难说有多大的实际作用了。因为弊政并非使者们走马观花就能革除，劝课农桑则因苻坚政策的变化及穷兵黩武而遭到破坏。此种情况下，关东经济的恢复谈何容易。

灭燕以后，苻坚的骄侈之心滋生起来，王猛是有所察觉的。他在病榻上上疏苻坚：

> 臣闻报德莫如尽言，谨以垂没之命，窃献遗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声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
>
> 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106]

这一告诫丝毫没有产生作用。王猛死后，苻坚的骄侈之心急剧膨胀，一改昔日节俭之风，力求奢侈豪华的淫逸生活。史称苻坚“好色”[107]，既有女宠，又有男宠。他听到后赵将作功曹熊邈吹嘘石虎宫室器玩后，任命熊邈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大修舟舰、兵器，饰以金银，颇及精巧”[108]。他的佩刀，用工五千铸就，用隶书“铭曰神术”[109]；他的铠甲，名为“金银细镂铠，金为綖以缥之”[110]。他“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玕、奇宝、珍怪饰之”[111]。为了显示唯我独尊的气派，他命令把石虎安

置在邺城宫室中的铜驼、铜马、飞帘、翁仲悉数运到长安。即使是护卫近侍，亦经精心挑选，非独武艺高强，还得身材出众，起了左镇郎、右镇郎和拂盖郎等一些古怪的官名：“苻坚以乞活夏点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奄人申香为拂盖郎。点等身长一丈八尺，并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112]

上行下效，达官贵人亦复如此。其兄子苻朗食不厌精，成为名震一时的美食家，即使是东晋的达官贵人也望尘莫及：“会稽王司马道子为朗设盛馔，极江左精毅。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其日常生活，已绝非骄奢豪华四字可以形容：“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既唾而含出，顷复如之。”这还是被封建史家称为“有若素士”[113]的一个人，其他贵戚勋臣当然可想而知了。

与骄侈之心急剧膨胀同时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变化。苻坚曰：“今天下既无丞相，或政教沦替。”可见在王猛死后，前秦政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114]昔日制定的法制已遭到破坏，后来苻坚更是“惰于政治”，赵整实在看不过去，特意歌谏曰：

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苻坚不得不承认“是朕也”[115]。这就表明，破坏前秦法制和较好政治生态的始作俑者，恰恰是苻坚本人。

苻坚急剧膨胀的骄侈之心和政策的转变，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一反昔日偃旗息鼓、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继灭燕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征服战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破坏了安定的生产环境，严重地摧残了经济。

从苻坚即位到淝水之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自永兴元年（357）到建元元年（365），在这七八年间，除讨伐张平、征服匈奴曹毂和刘卫辰部外，基本上没有战争，是关陇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黄金年代。二是自建元元年（365）到建元六年（370）灭燕，在这五六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有五次，动用兵力最大的一次是灭燕，名义上是十六万，实际只是六万。前秦的经济不仅承受得了，还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三是自建元七年（371）到建元十一年（375）这四五年间，史籍所

见的大大小小内外战争便达五次，平均一年发生一次，虽然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此时王猛尚在，动用的兵力尚有节制，最多只有七万（击灭仇池），战争的时间也都相当短，一般几个月就结束了，因而它的危害还不显著。四是自建元十二年（376）到建元十九年（383）淝水之战前夕，这七年间，史籍所见苻坚发动的内外战争高达九次，平均不到一年就发生一次，战争的频率高了，其中用兵七万以上的就达六次，十三万以上的有三次，最高时动用兵力竟达三十万之多，也就是说动用兵力已经失去了节制，而且往往是一地战火未灭，一地战火又起；战争的周期也延长了，有的持续经年，有的则长达三年。恩格斯说："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116]。更何况在此期间前秦境内又灾害频发呢。建元十五年（379），秦国大饥。建元十八年（382），蝗灾几乎遍及关东全境，"经秋冬不灭"[117]。就连亲近如苻融这样的人也认为苻坚推行了一条穷兵黩武的政策，它对经济的破坏殃及全部统治区，刚显示一些生气的关陇地区也陷入奄奄一息的危境，政局稍有变动，就举国惊慌，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不断发生，关陇地区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何关东地区的经济恢复？这一阶段，军民厌战情绪激增，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时刻窥度形势，图谋复国的慕容权贵早在建元十二年（376）末就做出了这样的估计。

> 秦恃其强大，务胜不休，北戍云中，南守蜀、汉，转运万里，道殣相望，兵疲于外，民困于内，危亡
>
> 近矣。[118]

正是这种情况，才使前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在建元十四年（378）到十八年（382）这五年中，爆发了以宗室亲贵为首的三次较大规模的叛乱。而建元十五年（379）苻洛的叛乱恰恰是利用了"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以及襄阳攻坚战相持经年、淮南失利的这一形势。

总之，淝水之战前夕，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前秦都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当苻坚授命吕光西征时，负责全局的苻融才会以"虚耗中国"的理由坚决反对。但被好大喜功、骄侈之心冲昏了头脑的苻坚此时已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一意孤行，非但西征，还断然决定发动淝水之战。苻融被迫发出了"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穷兵极武，未有不亡"的严重警告。这正是绝大部分朝臣的共同心声，所以苻坚也不得不用"止为济难铨才，不欲穷兵极武"来替自己辩解。上自太子，下至后宫

嫔妃，都为即将到来的失败忧心忡忡，即便地处边缘的乞伏国仁也预感到了苻坚必然失败的前景。

> 苻氏往因赵石之乱，遂妄窃名号，穷兵极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宁，宜绥以德，方虚广威声，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弊中国，违天怒人，将何以济！且物穷则亏，祸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难以
>
> 免矣。[119]

只有苻坚一人沉醉于一统天下之主的幻景之中。

淝水之战，用兵百万，为支撑百万大军的后勤供给所征发的夫役，更数倍于此。如此举国而动，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可想而知。《太平御览》卷882引《晋阳秋》曰："苻坚未败，长安市鬼夜哭一月止。"《晋书·列女·苻坚妾张氏传》载，苻坚发动灭晋之役后，"秋冬以来，每夜群犬大嗥，众鸡夜鸣，伏闻厩马警逸，武库兵器有声……"野蛮残酷的大征发造成举国上下人心惶惶。

苻坚不败，更待何时！

最后就军事上的一些因素做些说明。

往日苻坚战无不胜，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集中使用氐族的兵力。淝水之战中，前述在军事殖民中提及的几个军政方面的要人，除石越外，均未露面，也就是说分镇各地的氐户大都没有参战。苻坚的百万大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七月征兵，八月便开始行动，根本就不存在训练的余地，号曰百万，充其量只是一群虚张声势的乌合之众。即便他的御林军，也是由一群"不闲军旅"的好事之徒组成。在缺少身经百战、富有战阵经验的氐族军队的情况下，对这支军队管束已是不易，焉可用于战阵。他们被迫从戎，不胜凄楚，现今又是和他们寄予希望的东晋对垒，更为于心不甘。晋军训练有素，久经战阵，部伍严整，求战心切。两军相较，晋方已胜一筹。

苻融所统前锋，当是前秦百万大军的精华。号称三十万众，可是决战时刻，投入的兵力绝不可能是三十万。首先，秦军进至颍口（安徽颍上）便兵分两路，《资治通鉴》卷104载："诸军皆溃，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晋书·慕容垂载记》却说他所统一军是"数万"，伸缩性相当大。即便以《资治通鉴》所说的数字为准，这三万人马也是慕容垂屯驻漳口（湖北当阳）时的兵力。慕容垂是慕容暐率部到达郧城（湖北安

陆）后才移师漳口的，慕容暐的地位高于慕容垂，所部人马也不会太少。再说苻融这一部署是为了威逼荆州，牵制扬州，荆州据东晋甲兵之半，要收到战役效用，慕容垂及慕容暐两部兵力太少了也不成。因此西线秦军超过三万当可论断。其次，洛涧之战，梁成所部五万损失惨重，这支部队基本上已失去了战斗力。张蚝一军又被紧紧吸引在淝南。再次，寿阳（安徽寿县）一带历来为东晋边防重地，秦军深入，后勤殊为可虑，沿线布防，确保后勤供给当在情理之中。在战争全过程中，不见地位十分显要的抚军大将军苻方的踪迹，估计是承担这一任务去了，所需兵马，亦不会太少。总之，双方决战时刻，苻融的兵力虽然多于晋军，但绝不可能是4：1或3：1，应该远远低于此数。[120]秦军箕张于数百里战线上，晋军八万除刘牢之所统五千，谢石统率一部分缠住张蚝外，其余都参加了。《太平御览》卷122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晋遣都督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豫州刺史桓伊水陆七万败坚于淝水。"这应该是晋方投入决战的兵力。也就是说，晋军集中了可以集中的力量，捏成一个拳头，直捣敌方要害。在兵力使用上，晋方又胜一筹。

战前，秦军厌战情绪严重，洛涧惨败，苻坚尚且草木皆兵，遑论他人。晋军士气高昂，皆作拼死斗争。晋方又胜一筹。

战前，苻坚狂傲至极，与灭燕时的周密部署判若两人。他自恃绝对优势，行军布阵，皆掉以轻心。放弃大军，率轻骑八千奔赴寿阳；决战时刻，又拒绝苻融及将领们的合理意见，临阵调动诸部等都是大弊之举。谢石、谢玄则谋定而动。晋方又胜一筹。

苻融马倒被杀，可谓偶然。混乱时刻，主帅身死，对战局的影响相当巨大。

总之，淝水之战中秦军不战自溃，顷刻间百万大军烟消云散，苻坚落得单骑匹马、落荒而逃的下场，绝非偶然。

[1] 《读史方舆纪要》卷79。

[2] 《资治通鉴》卷104。

[3] 《晋书》卷73《庾翼传》。

[4] 《元和郡县图志》卷21。

[5]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6] 《资治通鉴》卷104。

[7] 《晋书》卷115《苻丕载记》。

[8] 《晋书》卷115《苻丕载记》。

[9]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0]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1] 《资治通鉴》卷104。

[12] 此据《苻坚载记》。《通鉴》卷104“后禁”作“右禁”。

[13] 《读史方舆纪要》卷29。

[14] 《晋书》卷79《谢玄传》。

[15] 《读史方舆纪要》卷3。

[16] 《资治通鉴》卷101。

[17] 《资治通鉴》卷101。

[18] 《资治通鉴》卷101。

[19] 《读史方舆纪要》卷58。

[20] 《元和郡县图志》卷12。

[21] 《读史方舆纪要》卷48。

[22] 《资治通鉴》卷101。

[23]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24] 《太平御览》卷436引《十六国春秋》。

[25]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26] 此据《资治通鉴》卷104。《晋书·苻坚载记》平规作“平颜”。

[27] 《资治通鉴》卷104。

[28]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29] 《资治通鉴》卷104。

[30] 《资治通鉴》卷104。

[31]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275页。

[32] 参见黄烈《关于前秦政权的民族性质及其对东晋战争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33] 《廿二史札记》卷2。

[34] 《资治通鉴》卷104胡注曰："垣，氐姓也，后随宋武（帝）南归，遂为累世将家。"

[35]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36] 《资治通鉴》卷104。

[37] 《资治通鉴》卷104。

[38] 《资治通鉴》卷101。

[39]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40]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本节引文，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出于此卷。

[41]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42] 括号中文字据《资治通鉴》卷104补。

[43]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融传》。

[44]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融传》。

[45] 《晋书》卷96《列女·苻坚妾张氏传》。

[46] 《晋书》卷96《列女·苻坚妾张氏传》。

[47] 《太平御览》卷122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括号内文字据同书卷322补。

[48] 《资治通鉴》卷104。

[49] 《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50] 《世说新语》卷中《识鉴》。

[51] 《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七万"。

[52] 《晋书》卷84《刘牢之传》。

[53] 《晋书》卷79《谢玄传》。

[54] 《世说新语》卷中《识鉴》。

[55] 《晋书》卷79《谢琰传》。

[56] 《晋书》卷81《桓伊传》。

[57] 《晋书》卷84《刘牢之传》。

[58] 《晋书》卷74《桓冲传》。

[59] 《资治通鉴》卷104。

[60] 《太平御览》卷309引《晋中兴书》。

[61] 《晋书》卷81《朱序传》。

[62] 《资治通鉴》卷105。

[63] 《晋书》卷79《谢玄传》。括号内文字据《资治通鉴》卷104补。

[64] 《晋书》卷79《谢玄传》。

[65] 《太平御览》卷309引《晋中兴书》。

[66] 《晋书》卷79《谢玄传》。括号中文字据《资治通鉴》卷104补。

[67] 参见1979年以来黄烈、徐扬杰、赵文润、曹永年、周增义诸先生有关淝水之战的论文。

[68] 参见田余庆、孙祚民、简修伟、钱宗范诸先生及笔者1979年以来有关淝水之战的论文。

[69] 参见田余庆《前秦民族关系和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70] 参见拙作《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斗争及其实质》，《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

[71]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72] 《资治通鉴》卷104。

[73] 《宋书》卷74《臧质传》。

[74]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75] 《资治通鉴》卷118。

[76] 《晋书》卷28《五行志》。

[77]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第二节。

[7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0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

[80] 《魏书》卷35《崔浩传》。

[81] 上述统计数字据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附表而作。

[82] 《资治通鉴》卷102。

[83] 《资治通鉴》卷103。

[84]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85] 《资治通鉴》卷102。

[86] 《资治通鉴》卷102。

[87]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88]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附《皇甫真传》。

[89] 《晋书》卷118《姚兴载记》附《尹纬传》。

[90] 拙作《淝水之战前夕北方的形势及淝水之战的性质》（《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中，误把邓羌当作氐人，特此纠正。

[91]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92]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93] 《晋书》卷115《苻丕载记》。

[94] 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95] 参见拙作《论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历史论丛》第3辑，齐鲁书社，1983。

[96] 《宋书》卷54《孔季恭传》等传论。

[97] 参见田余庆《论东晋门阀统治》，《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98] 《晋书》卷79《谢安传》。

[99] 《晋书》卷79《谢安传》。

[100] 《晋书》卷79《谢安传》。

[101] 《晋书》卷79《谢万传》。

[102] 《晋书》卷79《谢玄传》。

[103] 度田收租始于330年，是为维持军国开支而设的一种额外税。有一种意见认为是正常租税，名义上是十分收一的分成制，实际是亩收三升的定额租，是南方人民的一大负担。

[104] 《世说新语》上卷《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

[105] 《资治通鉴》卷101。

[106] 《资治通鉴》卷103。

[107] 《太平御览》卷577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108] 《资治通鉴》卷104。

[109] 《太平御览》卷346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110] 《太平御览》卷355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111]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12] 《太平御览》卷850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113]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朗传》。

[114] 《资治通鉴》卷104。

[115] 《高僧传》卷1《赵整传》。

[1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8页。

[117] 《资治通鉴》卷104。

[118] 《资治通鉴》卷104。

[119] 《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

[120] 参见邱久荣《淝水之战双方兵力略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邱氏认为秦方兵力十万左右，估计低了。因无其他资料佐证，难以估计出较符合实际的数字，但邱氏认为低于二十五万是可信的。

〖第六章〗 前秦败亡

第一节 淝水之战后北方的形势

一、东晋北进

淝水大捷，东晋举国欢腾，大量战俘被押至京口氐父山（江苏镇江金山）。形势对东晋十分有利，晋军在东起淮、泗，西迄荆、襄延绵千余里间的攻势陆续展开。西线战事主要由桓冲及桓石民指挥，东线则由谢安和谢玄负责。

建元二十年（384，东晋太元九年）正月，桓冲命上庸（郡治今湖北竹山西南）太守郭宝攻拔魏兴（郡治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新城（郡治今湖北房县）三郡，命竟陵（郡治今湖北钟祥）太守赵统进攻襄阳（湖北襄阳）。四月，赵统在继任荆州刺史桓石民（时桓冲已死）的支援下，击败秦荆州刺史都贵。都贵退屯鲁阳（河南鲁山），襄阳又为东晋所有。同时，晋广威将军、河南太守杨佺期又进据成固（今属陕西），击败秦梁州刺史潘猛。杨佺期乘胜推进，又败秦将窦冲等部。五月，秦洛州刺史张五虎据丰阳（陕西山阳）降晋。七月，桓石民命将军刘春推进鲁阳。都贵不战自走，退回长安。

同年五月，晋梁州刺史杨亮对巴蜀一带展开了进攻。他率军五万，以巴西太守费统率领水陆三万为前锋，进逼成都。秦益州刺史王广遣巴西太守康回等领兵拒敌。七月，康回败归成都，梓橦太守垒袭据涪城（四川绵阳东北）降晋。十二月，秦梁州刺史潘猛擅弃汉中（郡治今陕西汉中东），退奔长安。困守成都的秦军成了被截断退路的孤军。次年二月，王广以蜀人李丕为益州刺史，镇成都，自领所部，裹胁蜀人三万奔窜陇西（郡治今甘肃陇西南），成都守军更难支撑。四月，晋蜀郡太守任权终于攻拔成都，斩杀李丕，梁、益二州为东晋所有。至此，西线晋军的攻势大体终止，只有杨佺期一军还游弋于关、洛之间，但不久也退回了。

东线方面，刘牢之曾乘淝水大捷进占了谯城（安徽亳州），但真正较有部署的进攻直到建元二十年（384，东晋太元九年）八月才开始。此时，晋廷发布谢安为扬、江、司、荆等十五州都督，节制北伐事宜。谢玄为前锋都督，统军推进。

谢玄受命后，即率领北府兵及冠军将军桓石虔等经略河、洛和冀州。当晋军进抵下邳（江苏睢宁西北）时，秦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江苏徐州）而走，谢玄轻易地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随即兵分两路：刘牢之兵进兖州（州治今山东鄄城北），高素扑向青州（州治今山东益都西北）。

九月，刘牢之兵临鄄城（山东鄄城北），“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1]。秦兖州刺史张崇弃城投奔了建国不久的后燕，青州一路则因漕运困难而进展甚缓。督护闻人奭建议堰遏吕梁水，沿河立埭，解决水源，谢玄接受，沿吕梁水立了七埭。水源解决，晋军立刻推进，抵达琅邪（山东青岛），秦兖州刺史苻朗据州降晋。

夺取兖、青二州后，谢玄又调整了部署。刘牢之进击碻磝（山东茌平古黄河渡口）；济阳太守郭满进击滑台（河南滑县东南）。这两地攻克后，晋将颜肱和刘袭又率军于滑台渡河而北。

苻丕命大将桑据屯驻黎阳（河南浚县东北）阻击晋军，夜遭晋军偷袭，军溃而走，黎阳为晋军所占。建元二十一年（385，东晋太元十年），刘牢之兵达枋头（河南浚县西南），一度曾进入邺城（河北临漳西南）。但他骄傲轻敌，为慕容垂所败。晋军东线的攻势也于此告终。

东晋完全可以继续推进，东西两线的攻势之所以终止，关键在于随着外来威胁的解除，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又表面化了。

淝水大捷，谢安声望激增，皇室和各大士族的猜忌接踵而至。会稽王、录尚书事司马道子千方百计在孝武帝前诋毁谢安，主相之间矛盾加剧。淝水之战前，桓冲从大局出发，支持谢安，但对谢安独收全功愤愤不平，于次年郁愤而死，东晋权势最大的桓谢两族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谢安有心北伐，处此境遇，只有暂缓，更何况他事先也无必胜的把握，所以毫无北伐的筹措。在任命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桓石虔为江州刺史，表示他无意染指桓氏的势力范围，桓氏的情绪稍许平息之后，筹措北伐才提上日程。从晋廷来说，在建元二十年（384，东晋太元九年）

发布谢安统筹北伐，进驻广陵（江苏扬州），并非真想北伐，不过是把谢安排挤出权力中心的措施。正因如此，谢安心灰意冷，身在广陵，放形山水，归隐田园的意念油然而生。统帅如此，晋军岂能全力推进。东晋权势人物也不愿北伐成功，形成北伐将领功高难制的局面。因此，刘牢之稍一受挫，鸣金收兵的命令就下来了。时隔不久，这次北进所得相继失陷，益州也为谯纵占有。但导致前秦败亡的不是东晋，而是其内部的分裂。

二、前秦分裂

慕容垂和慕容暐部没有参加淝水决战。淝水溃败的信息传来，慕容暐弃军而逃，所部溃散。慕容垂治军有方，所部完好。苻坚在千余骑残兵败将的簇拥下，狼狈奔赴漳口（湖北当阳），慕容垂虔心相迎，苻坚终于有了一点依托。西返途中，苻坚收集离散，众达十余万，军容初备。十一月，苻坚到达洛阳，勉力支撑，进行了一些防御部署：石越领精兵三千加强邺城守卫；张蚝领御林军五千进戍并州（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毛当统步骑四千戍守洛阳。十二月，苻坚回到长安，哭祭苻融，告罪太庙，大赦天下，百官位增一级，随征将士死亡者，其家属世代免除赋役。下令厉兵课农，存恤孤老。但在人心惶急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已于事无补。

淝水惨败，使昔日潜藏的矛盾一下全暴露了出来。

第一，“王师新败，民心未安，负罪亡匿之徒，思乱者众”[2]。关中地区游钦聚众数千，保据频阳（陕西眉县西），待时而动；关东，特别是河北地区更加混乱不堪。

第二，早就图谋自立的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认定割地称雄的时机已经到来，首先发难的是苑川（甘肃榆中东北）一带的乞伏国仁。他征讨不服，兼并诸部，拥众十万，声势甚壮。不过，乞伏国仁地处边隅，对中原没有号召力，此时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反秦，因此对前秦的威胁并不算大。真正威胁前秦生存的是慕容权贵们的复国活动。

前燕灭亡后，慕容权贵矢志复国，前燕旧臣以天象或占卜奔走呼号。他们认定，只有慕容垂才是希望所在，前燕灭亡的第一天，随从慕容垂奔秦的高弼立刻献上了如何图谋复国的计谋。

天启嘉会，灵命暂迁，此乃鸿渐之始，龙变之初，深愿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怀遗俗之规，方当网漏吞舟，以弘苞养之义，收纳旧臣之胄，以成为山之功。[3]

鼓励慕容垂把前燕的灭亡当作自己开创大业的契机，希望他切勿追究前燕旧臣的过失，哪怕罪大恶极亦应愿宥，千方百计地结交和慰抚前燕旧臣，把他们及其子孙作为复国的骨干力量。慕容垂欣然接受了。慕容权贵也不隐瞒自己复国的欲望。前燕宜都王慕容桓的儿子慕容凤倾身结交鲜卑及丁零中有才干者，图谋不轨，为权翼察觉。权翼严厉警告他："儿方以才望自显，勿效尔父不识天命！"慕容凤公然不惧，厉声反驳："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节！君侯之言，岂奖劝将来之义乎！"[4]慕容权贵的复国阴谋尽人皆知，因而"鱼羊田升当灭秦"[5]，"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6]之类的歌谣不胫而走，传遍长安全城。鱼羊者，合起来是鲜卑的鲜字；虏者，指慕容鲜卑，又称白虏。甚至有人在明光殿中高声大呼："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7]亲贵大臣们也都以慕容权贵为忧，屡屡进言剪除。在淝水之战前夕的大争论中，此类呼声尤为强烈，却始终没有引起苻坚的重视。慕容权贵的复国活动在苻坚的宽容下愈益猖獗。

淝水惨败为慕容权贵的复国活动提供了大好时机。当苻坚率千余骑到达漳口后，慕容宝（慕容垂的世子）及慕容德（慕容皝之子）力主贼杀苻坚，竖起燕的旗号，鼓行而西，夺取关中，最低限度是不能交出这三万人马。老谋深算的慕容垂没有这样做，他要"以义取天下"："如使秦运必穷，历数归我者，投首之便，何虑无之。关西之地，会非吾有，自当有扰之者，吾可端拱而定关东。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且可观之。"[8]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他要再观察一下形势，力求一旦举事，便立于不败之地；二是荆州不是过去慕容鲜卑的势力范围，关中亦非理想之地，只有回到关东，特别是河北，才能一呼百应，坐取天下；三是交出兵权，对苻坚仁至义尽，从而可以利用这一封建伦理道德的优势号召人心，与苻坚角逐，否则人心一失，人才难以笼络，复国也将成为泡影。

慕容垂深知，一旦入关，东返必难。因此他护送苻坚到达渑池（河南渑池西）后，便借口河北骚动，请命安抚河北，乘便祭扫先人陵墓。尚未从惨败的慌乱中清醒过来的苻坚同意了。权翼及时提醒："垂爪牙名将，今之韩、白，且世豪东夏，志不为人下。顷避祸归诚，非慕义也，而恐冠军之号不饱其志，列地百里未满其心。且垂犹鹰也，饥则附人，

饱便高飏，遇风尘之会，必有凌霄之志。”[9]但是遭到淝水之败沉重打击的苻坚，与昔日已是判若两人。如果说过去的苻坚尚有与天命思想做些抗争的勇气的话，此时此刻，已完全受天命思想和宿命论的支配，曰：“若天命有废兴，固非智力所能移也！”[10]加上受到所谓“天子无戏言”思想的束缚，苻坚依然命令将军李蛮、闵亮和尹固等领军三千，护送慕容垂去邺城。权翼无可奈何，向天哀叹：“陛下重小信而轻忽社稷，臣见其往，不见其还，关东之变，垂其首乎！”[11]权翼毕竟于心不甘，连夜密遣壮士埋伏于河桥，命令他们不顾一切袭杀慕容垂。

慕容垂工于心计，既怕苻坚反悔，又怕权翼等智能之士暗中下手，此行如若落空，一切皆成幻梦。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蒙眬之中做了一个梦：“梦行路，路穷，顾见孔子墓，傍坟有八。觉而心恶之，召占梦者占之，曰：‘行路穷，道尽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12]以防万一，慕容垂命典军程同穿上自己的衣服，乘坐自己的战马，带领仪仗随从向河桥（河南孟州西南）进发，自己偷偷前往距白马津（河南滑县东北、古黄河渡口）西二十来里的凉马台结好草筏，偷渡黄河，权翼的计划落空了。

慕容垂东来，苻丕惊疑不定，又无恰当借口，只好以礼相待，把慕容垂软禁于邺城西。慕容垂岂甘寂寞，暗中与前燕旧臣联络，紧锣密鼓地商讨复国大计。

机会来了，位居卫军从事中郎的丁零翟斌在新安（今属河南）起兵反秦，登高一呼，旬日间聚众数千，前燕旧臣及慕容凤等纷纷率领部曲家将投奔而来，势力大增。新安城下一战，歼灭秦军一万有余，阵斩镇军将军毛当，谋攻洛阳。

新安洛阳，近在咫尺，毛当阵亡，豫州牧平原公苻晖惶恐万分，向苻丕告急。昏头昏脑的苻丕诏令慕容垂前往讨伐，石越坚决反对，进言苻丕：“慕容垂，燕之宿望，有兴复旧业之心，今复资之以兵，此为虎傅翼也。”[13]可是苻丕害怕慕容垂久居邺城，变生肘腋，他考虑，如若派慕容垂前往，必可导致两虎相争，他可坐收渔利。但毕竟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只配给慕容垂羸兵两千，又令苻飞龙率氐骑一千随军出动，名为副手，实为监视。可惜所托非人，苻飞龙少不更事，根本就不是慕容垂的对手。慕容垂对此种安排，亦早已成竹在胸。

慕容垂计划在行前一会前燕旧臣，向苻丕提出拜别前燕太庙的请

求，苻丕拒绝。慕容垂易服而入，怒斩亭吏，留其子侄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于邺城，以安苻丕之心，率部急奔安阳（河南安阳西南）而去。

反形已露，石越建议借机发作，尽除慕容氏。苻丕犹豫不决，石越悲叹：

> 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终当为人禽耳。[14]

慕容垂行至安阳附近的汤地，和盘托出苻丕和苻飞龙剪除异己的密谋，激起众怒。随即借口兵少，停驻河内（河南武陟西南）。招兵买马，旬日之间，聚众八千。他利用苻晖催促其进兵的命令，知会苻飞龙召集氐骑，五人为伍，昼止夜行，出其不意，突袭翟斌。苻飞龙毫无猜疑，照计行事。夜色浓重，氐骑摸黑而行，突然四周鼓声大作，慕容宝等伏兵群起围攻，分割聚歼，顷刻之间，一千氐骑被消灭殆尽。慕容垂部迅速扩展到三万，渡过黄河后焚毁河桥，命人潜入邺城，密告慕容农等起兵响应。

慕容农等早有安排，得讯后，慕容绍统部分随从先期出城，在蒲池（河北临漳西）偷盗苻丕骏骑百余匹，入暮，与慕容农等潜逃列人（河北肥乡东北），在其旧日将领乌丸鲁利和张骧的协助下，驱迫列人居民为兵，屠各毕聪、卜胜、张延、李白、郭超，东夷余和、敕勃及乌丸刘大等各统本族数千来投。没过多久，慕容农步骑云集，众至数万，被推为使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在赵秋的建议下，他不断封官许愿，厚赏投奔前来者。他“随才部署，上下肃然”[15]，号令严整，军无私掠，在列人站住了脚，势力扩大到上党（山西长治东北）、东阿、汝阳（河南商水西北）、顿丘（郡治河南清丰西南）等地。

此时此刻，苻丕还蒙在鼓里，做着两虎相争的迷梦。建元二十年（384）正月，他大宴宾客，发觉少了慕容农等三人，派人四处寻找。三天以后，才知道慕容农等已在列人起兵了。

翟斌自度单凭丁零的力量难以和前秦较量，在前燕旧臣及慕容凤等劝说下，决定推慕容垂为盟主。一来翟斌诚意如何，慕容垂不摸底；二来慕容垂还想借讨伐翟斌的幌子，赚开洛阳城门，占有中原的政治中心，所以没有答应。苻晖知苻飞龙已被袭杀，严密防守，拒绝慕容垂入城。后者既然难成，恰值翟斌又派使者联络，二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建元二十年（384）正月，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正式打起了复国的旗号，建元燕元（是为后燕始年），承制封拜，以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范阳王，慕容楷为征西大将军、太原王，翟斌为建义大将军、河南王，其余人物皆有封赏。他考虑洛阳虽为故都，交通便利，但北阻大河，四面受敌，此时的关东，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都要首推邺城，他又决心以河北为根据地。既然一时敲不开洛阳城门，不如干脆弃之不顾为好。谋定以后，慕容垂率众二十万，在荥阳（河南荥阳东北）石门搭起浮桥，渡过黄河，直扑邺城。

南有慕容垂，北有慕容农，苻丕两面受敌，权衡利弊，决定先向弱者下手，石越受命统步骑万余讨伐慕容农。慕容农一眼识破了对方的意图："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军而来此，是畏王（慕容垂）而陵我也；必不设备，可以计取之。"他拒绝诸将凭城坚守的建议，激励将士曰："善用兵者，结士以心，不以异物。今起义兵，唯敌是求，当以山河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16]石越布阵列人城西，慕容农令赵秋及綦毋滕驱军抗击，挫败石越前锋。淝水惨败，秦军士气丧尽，现在对抗斩桑榆为兵、裂襜裳为旗的慕容农，也是不堪一击。前锋失利，石越即命立栅自固，怯意顿露。慕容农部士气激增，请战者众。慕容农胆气甚豪，颇有军事头脑，虑事较为细密。他看到秦军甲杖精良，军容尚整，自己装备不全，两军对阵，万一部下为对方精甲健马所慑，后果不堪设想。乃严令诸部戒备以待，不得轻动。入暮，慕容农亲自统军出动，列阵城西，精选四百壮士由牙门将军刘木带领，翻越木栅，冲入石越大营，自己驱众跟进，逢人便杀。秦军挡者披靡，乱成一团。慕容农督众猛攻，大败秦军，阵斩石越，送首慕容垂。随即移师，与慕容垂会合，围攻邺城。

毛当和石越都号称智勇双全之将，一辅苻晖，一辅苻丕，被苻坚视作镇守关东的悍将。孰料未及一月，双双毙命，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关东战事并起，已不堪收拾。奉慕容垂之命在河内募兵的可足浑谭此时集兵两万，顺便攻拔野王（河南沁阳），赶赴邺城。平幼及其弟平规等也聚众数万余，席卷辽东，杀向邺城。不久，慕容垂攻破外城，苻丕退守中城。关东诸州郡县降附后燕者日益增多。

邺城有三台之固，墙高城坚，资储颇丰。慕容垂飞梯地道，昼夜猛攻，总难得手。乃于肥乡（今属河北）筑新兴城，安置辎重老弱，对邺城做长围之计，力图困死苻丕。

时苻定镇信都（河北冀州），苻绍镇高城（河北盐山北），苻亮、苻谟镇常山（河北正定西），苻鉴镇中山（河北定县），都还有相当的实力。苻丕遣阳平太守邵兴统骑兵一千赴上述诸地求援，企图集中力量击败慕容垂，邵兴才出城，慕容垂便令将军张崇统部追击。襄国（河北邢台）一战，邵兴被俘，慕容垂立刻分兵前将军慕容温及抚军大将军慕容麟等，攻略上述诸城。仅仅三个月，苻定、苻绍等相继投降了后燕。

苻丕向据有并州的骠骑将军张蚝和并州刺史王腾呼救。可是这二人有勇无谋，自顾不暇，只有眼瞧着苻丕受困。

秦幽州刺史王永（王猛子）、平州刺史苻冲统部两万驰救邺城，又在后燕宁朔将军平规的拦击下连连败北，最后弃地败奔并州，和张蚝会合。

慕容垂起兵，靠的是昔日前燕旧臣及乌桓、屠各等少数民族的支持，初时声势甚大，但他并没有及时采取足以号召民心的措施，而是复仇心切，“凶暴”异常，“所过灭户夷烟，毁发丘墓，毒遍存亡，痛缠幽显”[17]。只有慕容绍在馆陶（今属河北）一带“绥之以德”，“巡抚民夷，示以大义”；慕容农在清河（山东临清东）、平原（山东平原西南）等地“明立约束，均适有无，军令严整，无所侵暴”[18]。虽然这两地的郡县积极支持慕容垂围攻邺城，但其余郡县因害怕慕容垂的抢掠而大多抱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颇多反复。后燕初起时咄咄逼人的气势渐渐消失了，但是苻丕并无应变之能、治国之才，也提不出足以号召民心的措施。虽然有时形势对他有利，他也不会见机而作。这样，双方就只剩下了对阵厮杀、互相耗下去这条路可走了。

邺城久攻不下，慕容垂丧心病狂，堰漳水灌城。苻丕“粮竭，马无草，削松木而食之”[19]，困境加剧，就是死也不离开这一足以号召关东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影响所及，居然引起了翟斌和慕容垂的火并。翟斌被杀，其兄子翟真北奔邯郸（今属河北），与苻丕联合，共同对付后燕，大败后燕军。至此，慕容垂只好撤围，北讨翟真，并企图借此诱使苻丕西还，主动撤离邺城。尽管此时关中祸乱亦在加剧，但因关山阻隔，苻丕毫无所知；没有苻坚的命令，他不敢擅离此地。

当慕容垂与苻丕相持于邺城之时，东晋的军队也已逼近河北。关东成了前秦、后燕、东晋和丁零翟氏四股势力角逐的场所，形势更趋复杂。

慕容垂围邺，慕容权贵欣喜过望，慕容泓和慕容冲也即刻起兵。

慕容泓是慕容暐之弟，前燕亡后，任前秦北地（陕西耀州）长史。建元二十年（384）三月亡奔关东，收集鲜卑数千起兵了。他考虑到前燕灭亡后大多慕容鲜卑被逼迁关中，乃进屯华阴（陕西华阴东南），企图借此号召关中鲜卑。困居长安的慕容暐立刻密遣兄弟子侄及家人四处联系，被逼迁的鲜卑人纷纷来归。慕容泓势力转强，击败秦将强永，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是为西燕始年），推慕容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祸乱由关东发展到了关中。

慕容冲亦是慕容暐之弟，前燕时爵封中山王。其姐清河公主国色天香，燕亡后为苻坚所纳，宠冠后宫。慕容冲酷类其姐，俊俏可人，亦有龙阳之美。姐弟二人把苻坚搞得神魂颠倒，其他宫人休想亲近半分。达官贵人生怕二人出乱子，一再谏阻，最后由王猛出面，苦苦谏诤，苻坚万不得已，才将慕容冲送出长安，后任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太守。建元二十年（384）三月，慕容冲亦在平阳起兵，聚众两万，进逼蒲坂（山西永济蒲州镇）。河东亦遭受慕容氏的威胁。

此时此刻，苻坚终于醒悟过来了，颇悔当年没有接受王猛及群臣的建议。他估计关东已经难保，决定收缩力量，先保关陇，再图后计。为此，他命令广平公苻熙为使持节、都督雍州杂夷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调雍州牧苻睿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骧将军姚苌为司马，配兵五万，讨伐慕容泓。苻睿命窦冲征讨慕容冲，自己专力对付慕容泓。四月，窦冲大败慕容冲。慕容冲率骑兵八千，与慕容泓会合。

慕容泓本无久占关中之心，他进驻华阴，无非是召集昔日被逼迁关中的慕容鲜卑，听说秦军杀来，便计划撤向关东。驱逐此敌，对苻睿来说本非难事，不料他求功心切，勇而无谋，又骄傲轻敌，不恤士众，居然挥兵驰冲，截断慕容泓的归路。姚苌指出，鲜卑为谋东归，才聚集为乱，只要衔尾鸣鼓，佯作攻击，他们必然奔走出关。断其归路，势必狗急跳墙，返身拼命，万一失利，后果难以预料。苻睿断然拒绝，与慕容泓战于华泽（华阴境内），兵败被杀。秦军闻风溃退。

苻睿死讯传来，苻坚暴跳如雷，杀死姚苌报讯使者。姚苌估计情况不妙，带领亲信，逃奔渭（河）北的官牧场，纠集羌族豪酋，树起了反

秦自立的旗帜。

天水（甘肃天水）大族尹纬“少有大志”，每以宰相自况。其族人尹赤昔日曾任姚襄司马，为姚襄出谋划策。姚襄败亡，苻坚恨尹氏入骨，下令禁锢天水诸尹。苻坚后期，乱象已现，尹纬喜不自胜，“向天再拜”，喜极而泪，声称“天时如此，正是霸王龙飞之秋，吾徒杖策之日”[20]。他唯恐祸乱来得太晚，不能亲见前秦败亡。他深知这一带是羌族的势力范围，若无足以号召羌族的权贵出场，亦难圆其好梦。姚苌奔渭北，对尹纬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立刻和族人尹详、密友庞演等四处煽动，纠集西州豪族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羌、汉等五万余户共推姚苌为盟主。

姚苌本是姚弋仲诸子中以“聪哲、多权略”著称的一个，早就伺机自立。过去曾不断散布各类神话迷惑人众，诸如：其兄姚襄曾梦见他龙袍在身，各部酋长肃然侍立；伐蜀时他昼寝水旁，上有神光焕然；进军梓潼（四川绵阳东）时，他又梦见一个天神叫他早日回乡，代秦为主；淝水之战前夕，苻坚以龙骧将军号相授，实属天意；等等。有此机遇，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尹纬又进言：“今百六之数既臻，秦亡之兆已见，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故豪杰驱驰，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从议，以副群望，不可坐观沉溺而不拯救之。”[21]至此，姚苌乃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元白雀（是为后秦始年）；以尹详、庞演为左、右长史，姚晃、尹纬为左、右司马，王钦卢、姚方成、王破虏、杨难、尹嵩等为将帅。关陇地区的祸乱进一步发展。

淝水之战后的一年，庞大的前秦帝国就四分五裂了。

第二节 前秦败亡

一、苻坚之死

姚苌建立后秦，得到北地（陕西耀州）、华阴（陕西华阴东南）、新平（陕西彬州）和安定（甘肃泾川北）等地十余万户羌胡的支持，实力大增。他通好慕容泓，合力夹攻苻坚。

苻坚深知，慕容氏目前对关中兴趣不会太大，姚苌这条地头蛇才是他真正的心腹大患。建元二十年（384）五月，姚苌推进北地郡，扎营杨渠川。北地北据高原，弥近长安，历来为长安之肩背，此地一失，长安立刻受威胁。苻坚再也坐不住了，被迫统步骑两万御驾亲征，扎营赵氏坞（北地境内）。苻坚用兵颇为周密，他派遣护军将军杨璧以骑兵三千横截姚苌归路，命右将军徐成、左将军窦冲、镇军将军毛当等轮番冲击，频频进攻。后秦屡屡败北，为前秦军所困。苻坚又于同官水（陕西铜川一带）上筑堰，截断姚苌水源。高地难以挖井，后秦军干渴异常。盘踞频阳（陕西富平东北）的游钦千方百计运送粮、水给姚苌，一一为杨璧截获。姚苌无奈，命其弟姚尹买统领精锐两万，拼死一搏，企图挖堰放水，结果损兵一万三千余，姚尹买为窦冲阵斩。为时未及一月，后秦军渴死者已是不少，士气低落，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不料喜雨天降，后秦营中水涨三尺，营外只有细雨霏霏。苻坚正在用膳，见此悲从中来，撤案而叹："天其无心，何故降泽贼营！"[22]这一偶然事件，使双方将士认为苻坚确实气数已尽，姚苌则是天命所归。前秦将士士气一落千丈，后秦士气大振。六月，姚苌命其弟姚绪扼守大营，亲统七万大军全力反击，一举摧败苻坚，俘获杨璧、毛盛、徐成、齐午等高级将领数十人。诸将要求乘胜追击，直逼咸阳（陕西咸阳东北），夺取长安。姚苌毕竟高人一筹，他知道苻坚还有相应的实力，没有牢固的根据地，冒险一掷，难免失误。他也知道慕容泓已进逼长安，正好作壁上观，乃晓谕诸将曰："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23]为使这一方略得以实现，他非但停止追击，还礼遣全部被俘前秦将领，部署留守事宜后，亲统大军略地新平（治今陕西彬州）。

慕容泓在击杀苻睿后，势力激增，拥众十万有余，遣使苻坚，声明

只要苻坚放弃关东，礼送慕容暐及前燕宗室功臣，他就护卫慕容暐回归邺城，“与秦以武牢为界，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但是苻坚企图以慕容暐为人质，胁迫慕容垂和慕容泓就范。他虽然怒斥慕容暐，却又慰抚有加，待慕容暐一如既往，令慕容暐致书慕容泓等息兵归降。苻坚此举可谓不识大体，异想天开。此时此刻，慕容暐反而比苻坚聪明得多，他自问必死，毫无顾惜，懂得复国远比个人性命重要，密遣亲信送书慕容泓曰：

> 今秦数已终，长安怪异特甚，当不复能久立。吾既笼中之人，必无还理。昔不能保守宗庙，致令倾丧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复顾吾之存亡。社稷不轻，勉建大业，以兴复为务。可以吴王为相国，中山王为太宰、领大司马，汝可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便即尊位。[24]

慕容权贵虽然都想复国，但内部权势之争十分激烈，慕容泓估计，如若接出慕容暐，就能迫使慕容垂就范，九五之尊非己莫属，否则慕容垂决不会俯首听命。所以他在建元燕兴后，便挥师进逼长安。

慕容泓的威望远不如慕容冲，且持法苛峻，引起部下不满。建元二十年（384）六月，西燕内讧，谋臣高盖及宿勤崇等杀泓，立慕容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七月，西燕大军推进到距长安二百来里处。苻坚不得不集中力量来对付这个肘腋之敌了。

前秦毕竟还有相当的实力，长安告急，各地勤王之师纷至沓来。苻晖放弃洛阳，统洛阳和陕城（河南三门峡）之众七万赶赴长安，益州刺史王广亦遣将军王蚝率蜀地之师前来赴难。苻坚重做部署，命抚军大将军苻方戍卫骊山，拜苻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统兵五万对付慕容冲。

两军相会于郑（陕西华县）西。慕容冲诡计多端，事先命妇女们各缝一囊，盛满尘土，各骑牛马，身穿彩衣，揭竿为旗，名曰“班队”，藏匿阵后。凌晨薄雾，慕容冲挥军攻击，双方才交手，慕容冲高喝：“班队何在！”[25]班队蜂拥而进，摇旗扬尘，灰雾满天。秦军不知对方到底来了多少人马，一时惊慌失措，大败而退。苻坚少子苻琳，号称有“文武才艺，引弓五百斤，射洞犁耳”[26]之能，受命与前将军姜宇领军三万扼守灞上（陕西西安东），又为慕容冲所败。姜宇被阵斩，苻琳身中流矢而死。慕容冲进占了阿房城（秦始皇阿房宫遗址）。九月，慕容冲逼近长安，胁迫苻坚放出慕容暐。声势之壮，苻坚为之心惊胆战。

此时的苻坚，穷急无计，更加迷信天命和佛、道。他视道安为神灵，并于是年（384）十一月请来了隐居在倒兽山（陕西新丰境内）的王嘉。

王嘉是洛阳人，大概是原始道教的传人之一，善会装神弄鬼，受业弟子多达数百人，名震关陇，时称“神人”。过去苻坚屡屡礼请，均为所拒；姚苌和慕容冲起兵后，亦想礼请。不料这年十月，苻坚竟把他请到了长安。大肆宣扬，一时间，哄传苻坚得到了神人的帮助，必然后福无穷，三辅堡壁及四山氐、羌风闻来投者竟达四万余人。苻坚的声势又有了点起色，更把道安和王嘉视为至宝，安置于外殿，动辄请示方略。

此时，长安城中数千鲜卑人在慕容暐的策划下已集结在一起。十二月，慕容暐借口儿子新婚，恭请苻坚御驾亲临，计划席中发难。苻坚为了利用这个人质，居然同意，只因天降大雨，没有去成。慕容暐机密泄露，苻坚才知道这样的人质也利用不得，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下令凡是鲜卑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只有个别人逃出了长安。

苻坚开了头，臣下竞相仿效。次年初，西燕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南城，部分冲进城内者为窦冲和李辩歼灭，八百余人均为秦军分而食之。不久，领军将军杨定一度击败慕容冲，俘虏鲜卑万余人，全部坑杀。

慕容暐一死，建元二十一年（385）正月，慕容冲便在阿房城称帝，改元更始。他反正不想在关中久待，以杀报杀，纵兵抢掠，四处破坏。一场民族仇杀又在关中展开，史称“冲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27]。关中人民不堪慕容冲的屠杀抢掠，纷纷筑壁自保，由坐视前秦、西燕混战转向支持苻坚。关中“堡壁三十余所，推平远将军赵敖为主，相与结盟，冒难遣兵粮助坚，多为西燕所杀”[28]。在最危急的关头，“冯翊（郡治陕西大荔）诸堡壁犹有负粮冒难而至者，多为贼所杀”[29]。三辅一带，凡受西燕荼毒者都想报仇，不断派人密告苻坚，要偷袭西燕营寨，作为内应，苻坚一再劝阻，仍有七百余骑奋勇前往。不料他们在西燕营寨放火后，风势反卷，幸免者仅十之二三。

自建元二十年（384）九月至次年五月，双方对峙于长安城下达九个月之久，各有胜负。苻坚一度攻至阿房城，诸将力请乘胜入城，苻坚为稳重起见，没有接受。慕容冲在白渠（陕西礼泉东北至下邽镇）一度大败秦军，包围了苻坚。赖殿中将军邓迈力战，苻坚才得幸免。双方在

骊山激战数次，苻方及左将军苟池均为西燕击杀。苻晖与西燕数战数败，受到苻坚怒斥："汝，吾之才子也，拥大众与白虏小儿战，而屡败，何用生为！"[30]苻坚本意在于刺激苻晖拼死战斗，不料苻晖竟愤而自杀。苻坚手下的战将几乎损失殆尽。

总体来看，西燕在军事上占有优势，长安在其久困之下"大饥，人相食，诸将归而吐肉以饴妻、子"[31]。战斗最激烈时，慕容冲亲自率众冒险登城，苻坚亦顶盔披甲，站在城头督战，"飞矢满身，血流被体"[32]。

建元二十一年（385）五月，长安城西一战，卫将军杨定为慕容冲大将高盖生擒。杨定，仇池氐人，尚公主，果勇善战，是此刻苻坚手下所剩最亲近、最有战斗力的骁将。苻方、苟池遇难后，他曾在骊山以两千五百精骑大败西燕军，俘虏鲜卑万余人，为前秦报了一箭之仇。又于灞水和浐水间大败西燕右仆射慕容宪。在与西燕的战争中，前秦将领们败多胜少，独有杨定屡战屡胜。慕容冲好勇斗狠，单单惧怕杨定，在御营周围特挖陷马坑防御杨定的突然冲击。杨定被俘，苻坚心胆俱裂，惶惶不可终日，竟在谶书中寻求救命妙方。恰好一本叫《古符传贾录》的谶书中有一句"帝出五将久长得"的话，城中又盛传"坚入五将山长得"，便认为这是苍天的启示，对太子苻宏曰："脱如此言，天或导予。今留汝兼总戎政，勿与贼争利，朕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天其或者正训予也。"[33]他遣使遍告诸州郡，命令他们孟冬勤王长安，在数百骑的护卫下，带着张夫人、中山公苻诜及三个女儿出奔五将山而去（《元和郡县图志》曰五将山在岐山县西北。《读史方舆纪要》曰在礼泉县北）。

苻宏并无军国才用，危亡关头，更是一筹莫展。苻坚甩袖而去，他也于是年六月在数千骑护卫下，带着母后、妻室、宗亲西奔下辨（甘肃成县西北）。屯驻韭园（长安附近）的李辩率部投奔了西燕，苻坚的心腹谋士权翼则带领百官投奔了故主姚苌。前秦王朝鸟兽散了，慕容冲终于得到了长安，大肆烧杀抢掠，繁华的长安城成了一片瓦砾。

姚苌移兵新平（陕西彬州）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顺当。新平太守苟辅率众拼死抵抗。土山地道，姚苌各种手段都用尽了，苟辅针锋相对，或战山上，或战地下，后秦损兵折将两万有余，一无所得。建元二十一年（385）正月，姚苌留兵围城，自率大军略地九嵕山以北。安定一仗，生擒前秦安西将军苻珍，岭北各地闻风归降，姚苌再次围攻新平。此时城中粮草已尽，外援不至，苟辅已难支撑。姚苌允许苟辅带领下属撤回长安，他绝不留难。苟辅上当，一万五千余人刚出城，姚苌便

围而坑之，无一幸免。他听说苻坚出奔五将山，即遣骁骑将军吴忠统骑兵追击。七月，吴忠包围五将山，秦军散走，苻坚被俘，押至新平。苻坚自度难免一死，他怒斥姚苌，手杀两个女儿后求死，被姚苌缢死于新平佛寺中，终年48岁，在位29年。张夫人及苻诜自杀。苻丕即位后，追谥苻坚为世祖宣昭皇帝。

盛极一时的前秦，淝水惨败，顷刻之间冰消雪化，长安失陷，苻坚身死，何以如此？历代史家多有所评说。司马光在反对别人的观点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苌故也。臣独以为不然。许劭谓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坚治国无失其道，则垂、苌皆秦之能臣也，乌能为乱哉！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34]此说与修撰《晋书》的唐初诸公的评说颇为类似："愎谏违谋，轻敌怒邻，穷兵黩武。怼三正之末叶，耻五运之犹乖，倾率土之师，起滔天之寇，负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谓战必胜，攻必取，便欲鸣銮禹穴，驻跸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筑馆以须归命。曾弗知人道助顺，神理害盈，虽矜涿野之强，终致昆阳之败。遂使凶渠侯隙，狡寇伺间，步摇（慕容鲜卑之外号）启其祸先，烧当（姚氏属烧当羌）乘其乱极，宗社迁于他族，身首罄于贼臣，贻戒将来，取笑天下，岂不哀哉！岂不谬哉！"[35]这些评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如叶适的评论深刻：

> 独坚雅有并包之度，绥怀之略，虽暮年一败，亦古今常有，而遂纷披摧折，鱼烂土崩，不可救止者，盖坚所取者广而所守者狭，其所以并包绥怀者，乃其所以失之也。……君臣豪俊俱无坚凝之策，此正后世取天下之深忌，宜其一跌而不能以免身也。[36]

"无坚凝之策"可谓道中了苻坚失败的要害。前秦只是一个不巩固的、暂时的军事行政联合体，所占地盘越大、征服的民族越多，其内部的矛盾也就越复杂，和罗马帝国一样，前秦对其统治区"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37]。可是叶适的评说又未免有些过头。苻坚和王猛未曾不想"坚凝"，他们确实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对十六国后期诸少数民族政权，甚至魏孝文帝的改革都有影响。只是此时内迁少数民族多而复杂，民族融合还处在起步阶段，"坚凝"需要时日，也必多反复。我们不能要求苻坚超出他所处的时代，超出当时的历史条件，毕竟苻坚和王猛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也因此，苻坚才能在那种纷乱复杂的矛盾中统一北方，对民族融合、对北方特别是关陇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苻坚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假"坚

凝”以时日。因而苻坚虽然失败了，却仍是当时内迁诸少数民族统治者中的佼佼者。他前期的治绩也足以和我国历史上的明君圣主相媲美。历来基本肯定苻坚，给予较高的评价，甚至称为“贤主”，绝非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词。

二、苻丕败亡

建元二十一年（385）八月，苻坚庶长子苻丕，字永叙[38]（？-386）在王永等人的劝进下，在晋阳（山西太原南）即皇帝位，改元太安，以张蚝为司空、侍中，王永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王腾为中军大将军、司隶校尉等。

建元二十年（384）末，慕容垂在屡败丁零翟氏，初步解决心腹之患后再度围邺（河北临漳西南）。在此期间，苻丕因进退无路、外援不至、粮食罄尽而向东晋求援，表示决心西返，万一不成，亦可为东晋守邺。此举一度引起内部的权势之争，幸发觉及时，才未造成大乱。谢玄虽不相信苻丕之言，但权衡利弊，还是令刘牢之领兵两万救邺，并送米两千斛给苻丕，一度出现秦、晋联合对付后燕的态势。但杯水车薪，难以持久。建元二十一年（385）四月，刘牢之在邺下大败慕容垂，迫使慕容垂撤围。苻丕乘机率部就谷枋头（河南浚县西南）。刘牢之企图独邀全功，错估了慕容垂的实力，轻易追击，为慕容垂所败，幸赖苻丕救援，才退守邺城。不久，晋廷决定后撤，苻丕又回到了邺城。此时，关中祸乱已不可收拾，邺城也被破坏无遗，再坚持下去已毫无意义。七月，苻丕决定统邺城六万余口，撤向并州。慕容垂终于夺到了邺城。

苻丕和慕容垂相持将及一年，河北地区再次遭受严重的破坏：“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39]邺城也成了一片瓦砾。后燕士卒饿死者极众，更何况手无寸铁的居民。为救时急，慕容垂下令严禁养蚕，以桑葚为粮，结局是农桑俱废，景象更惨。只有慕容温在中山（河北定县）“抚旧招新，劝课农桑”，“仓库充溢”[40]，成为流民奔赴的所在和慕容垂的经济支柱。以后不久，中山也终于成了后燕的都城。

苻丕在张蚝和王腾的接应下到达晋阳后，才知道前秦全部状况。他虽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面临的局势却已严峻异常。

首先，有苻坚在，昔日被苻坚视作心膂的族人国戚尚不敢明目张胆地独树一帜。苻坚一死，他们或作鸟兽散，或萌据地自雄之志。

杨璧，尚苻坚女顺阳公主，位居南秦州刺史、护军将军，屯驻下辨，尚有一定的实力。苻宏以为族人至亲，足可托庇。不料杨璧意欲自雄，拒绝他入城。苻宏无奈，改投武都（甘肃成县西）氐豪强熙。不久，假道武都投降了东晋，被安置于江州（治今江西南昌）。后来成了桓玄夺取东晋帝位的积极支持者，兵败而死。

杨定在太安元年（385）十月乘西燕高盖兵败之机亡奔陇右，收拾余众，退保仇池。不久略地天水（甘肃天水）和略阳（郡治今甘肃天水东北），称藩于东晋，自称秦州刺史、陇西王，重建了仇池国。

当时，力量最大的是坐镇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的后族梁熙，他拥兵十万，坐视关中祸乱和长安危困，“藉秦氏兵乱，规有全凉之地，外不抚百姓，内多聚敛”[41]。有人建议他西拒吕光，东守关隘，据地自保，他觉得太露骨，装作拒绝。有人建议他推出勇冠三军、富有才略、被流放在西海郡的苻洛为盟主，联合河州刺史毛兴、秦州刺史王统、南秦州刺史杨璧，合四州之力勤王，他装聋作哑。但这条建议却提醒了他，苻洛必是心腹大患，立刻密遣武士杀了苻洛。由此表明他的心迹是据地自雄，不过时机未到，暂作观望而已。所以，太安元年（385）九月，当吕光统西征之师东返宜禾（甘肃安西），即将进入凉州腹地时，梁熙就再也坐不住了。他亲统大军驻防玉门关（甘肃敦煌境内），移檄吕光，责备他未奉王命，擅自班师。命令其子梁胤等率众五万布防酒泉（今属甘肃），拒绝吕光入境。吕光反唇相讥，发布檄文，指责梁熙无赴难之志，有阻挡他归国勤王之意。其实两人都是一个心愿：据有凉州自雄。一场血战，梁熙兵败。吕光据有凉州，再无顾忌，次年（386）十二月，就自称使持节、中外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以姑臧（甘肃武威）为都城，俨然自成一国。不过，直到公元389年，吕光才称王，建元麟嘉，史称“后凉”。

其次，过去抱观望态度的少数民族豪酋，现在再无顾忌，纷纷据地自立了。

太安元年（385）十月，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建元建义，正式打出了西秦的旗号。

代国灭亡后，拓跋贵族的复国活动也在进行。太安二年（386）正月，什翼犍孙拓跋珪大会诸部于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国，雁代一带也摆脱了前秦。

在关东地区，苻丕离开邺城后，慕容垂扩地辽东，并“创立法制，事从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课农桑”[42]，后燕在河北、辽东的统治逐步稳定下来。

关中地区是西燕和后秦角逐的场所。太安元年（385）十月，双方在新平一场激战，西燕尚书令高盖所领五万余众，为姚苌击败，高盖投降了后秦。不过慕容冲据有长安后，考虑到关东已是慕容垂的天下，东返对他个人来说有弊无利，乃改变初衷，作久据长安之计，所部鲜卑大为不满。太安二年（386）二月，内讧爆发，慕容冲被杀，其将军段随被推为燕王，改元昌平。三月，段随又被慕容桓及慕容永袭杀，二人立慕容𫖮为燕王，改元建明。至此，西燕才决策东归。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弃长安东归途中，又爆发内讧，经过一系列的杀戮，最后是慕容泓之子慕容忠成为西燕主，停驻闻喜（山西闻喜东北）。六月，西燕内讧再起，慕容永被推为大单于、大将军，称藩于后燕。

西燕一走，姚苌立刻进军长安，击败零星敌对势力后，终于在太安二年（386）四月据有这秦汉以来的古都，随即称帝，建国号大秦，改元建初，略地关陇。他“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费，以救时弊，闾阎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显异之”[43]。后秦在关中的统治渐趋稳定。

因此，苻丕即位，其号令所及，仅止于并州及陇右两地。这两个地区还因西燕和后秦的阻隔，被远远地分割开了。不过，苻丕即位毕竟是给前秦残余势力打了一支强心针，昔日投降后燕的苻定、苻绍、苻谟、苻亮等又背燕归秦，作祟河北。天水姜延，冯翊寇明，河东王昭，新平张晏，京兆杜敏，扶风马朗、王敏等各拥众数万，起而响应，与后秦为敌。可惜好景不长，太安二年（386）六月，苻定等先后为后燕击灭，陇右地区又爆发了益州刺史王广联合秦州刺史王统攻击河州刺史毛兴的内讧。王广兵败，奔窜途中为陇西鲜卑所执，押送给了后秦；王统则据州投降了后秦。毛兴虽胜，可属下诸氐厌苦战乱，群起而攻之，杀了毛兴，推卫平为河州牧，苻丕在陇右的势力大为削弱。

并州氐族的势力相当小，又有后燕的逼近，对于苻丕来说，最理想的方案还是打回关中，重整旗鼓。太安二年（386）八月，苻丕留王腾守晋阳，杨辅戍壶关（山西黎城东北），自率四万余众，经河东向关中进发，途次平阳（山西临汾西南），与西燕东归之师相遇，慕容永遣使借道，苻丕岂能同意。襄陵（山西临汾东南）一战，苻丕大败，右丞相王永、卫大将军俱石子等尽皆阵亡，王公百官均为西燕所俘。苻丕统残

兵败将南窜东垣（河南新安），谋袭洛阳，又遭东晋扬威将军冯该邀击。苻丕身死，太子苻宁被俘，余众随其太尉苻纂及苻师奴奔退杏城（陕西黄陵西南）。苻登为帝后，追谥苻丕为哀平皇帝。

三、苻登败亡

太安二年（386）十一月，苻登继苻丕在南安（治今甘肃陇西渭水东岸）为帝，改元太初，署置百官。

苻登（343-394），字文高，苻坚族曾孙。其父苻敞，苻健时历任太尉司马、陇东太守、建节将军，为苻生所杀，兄苻同成，苻坚军事殖民时为河州（州治今甘肃临夏）牧毛兴长史，随镇枹罕（甘肃临夏东北）。苻坚在位时，苻登历任殿上将军、羽林监、扬武将军、长安令等，坐事贬狄道（甘肃临洮）长。关中祸乱，他去县投奔了毛兴。苻登对事态的剖析，往往为同僚们叹服。毛兴虽然不予重用，但对其才干亦颇为重视。

毛兴被杀，卫平因宗族强盛而暂为河州牧，他年老昏庸，难以服众，群议纷纭。太安二年（386）七月，氐酋啖青设计，置酒高会诸将，席间抽剑逼迫卫平让出大权，共推苻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抚军大将军、雍河二州牧、略阳公，请命于苻丕。苻丕又加苻登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安王。

姚苌起兵时，其弟姚硕德自称征西将军，聚集羌族响应，据有陇城（甘肃秦安东北）及南安赤亭（甘肃陇西西）等地，进逼上邽（甘肃天水），与王统争夺秦州。在姚苌的增援下，天水地区的屠各及略阳的羌胡等两万余户响应姚硕德。王统投降后，姚硕德又进逼枹罕（甘肃临夏）。时陇右一带大旱，饥荒严重，道殣相望。苻登接掌河州后，便统兵五万，东下陇城，每战有胜，便以姚硕德部属为食，名为“熟食”。对其士兵曰：“汝等朝战，暮便饱肉，何忧于饥！”民族仇恨驱使着他的士兵，个个勇不可当。姚苌闻讯，急召姚硕德：“汝不来，必为苻登所食尽。”[44]姚硕德只有放弃陇城，退屯南安（甘肃陇西渭水东岸）。苻登步步追逼，又克南安，夷夏归之者达三万余户。双方为争夺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鏖战不已。为确保关陇喉舌上邽，姚苌被逼亲自驰救。胡奴阜（今甘肃天水西）一战，后秦伤亡两万有余，姚苌亦被啖青射成重伤，龟缩上邽。此战使苻登威望骤增。

是年十一月，苻丕子渤海王苻懿、济北王苻昶自杏城来奔，苻登才知道苻丕已死。以皇统而论，苻登可谓疏而又疏，本无即位之望。因苻懿、苻昶皆年幼，大家以为“国乱而立长君，《春秋》之义也。三虏（后燕、西燕、后秦）跨僭，寇旅殷强，豺狼枭境，举目而是，自古厄运之极，莫甚于斯。大王挺剑西州，凤翔秦陇，偏师暂接，姚苌奔溃，一战之功，可谓光格天地。宜龙骧武奋，拯拔旧京，以社稷宗庙为先”[45]，苻登被拥立为帝。此时关东已丧失殆尽，关陇大部分为后秦占有，凉州已是吕光的天下，南秦州（治今甘肃清水西北）则处于半独立状态，苻登号令所及，仅河州及秦州的局部地区，此外还有关中杏城（陕西黄陵西南）一角。苻登的势力被后秦分割在两地各自为战。西线枹罕在苻登主持下，坚持了九年之久，东线杏城仅仅一年便被后秦歼灭。

现在先谈东线。

苻登为帝后，拜据有杏城的苻纂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鲁王。由于姚苌新败，加上苻登的支持，苻纂势力一度有所扩张。一时间卢水胡彭沛谷、屠各董成和张世龙、新平羌酋雷恶地等纷纷归附。苻纂拥众达十余万。太初二年（387）四月，苻纂联合南秦州刺史杨定在泾阳（今属陕西）大败姚硕德，当姚苌亲自出动后，苻纂才退屯敷陆（陕西富县），彭沛谷退守杏城。双方僵持到八月。此时，拥众两万、屯于杏城东南的前秦冯翊太守兰犊约会苻纂，合攻长安。苻登得报，统军前来配合。就在形势稍见好转的时刻，苻纂弟苻师奴为争权而发难，杀死苻纂，自立为秦公。姚苌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对付东线。九月，泥阳（陕西耀州南）一战，苻师奴大败，逃奔鲜卑，所部投降了后秦。不久，兰犊又为后秦灭。苻登的势力大受削弱。

西线是前秦灭亡前夕与后秦争夺关陇的最主要的战场。为挽救危局，苻登尽力团结前秦残余势力窦冲、杨定、杨壁等，许以高官厚禄。其中有些人虽欲自立，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暂时和苻登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后秦。即使是乞伏国仁，苻登也极力笼络，遂其所愿，晋封为王，由此促使乞伏国仁及其后继者乞伏乾归长期不与苻登为敌。

苻登爱护士卒，颇得士众拥护。他又懂阵法，每战必以长矟钩刃为方圆大阵，自己居中指挥，随时调度，将士便无后顾之忧，各自为战，奋勇冲杀。

苻登深知哀兵必胜的道理。为激起众怒，他在军中特设四面有屏蔽的辎辑车一辆，中供苻坚神主，羽葆青盖，黄旗引导，精选三百武贲保卫。每次战前，他必领众将向神主祷告：“维曾孙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灵恭践宝位。昔五将之难，贼羌肆害于圣躬，实登之罪也。今合义旅，众余五万，精甲劲兵，足以立功，年谷丰穰，足以资赡。即日星言电迈，直造贼庭，奋不顾命，陨越为期，庶上报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灵，降监厥诚。”[46]随即又将下一步行动详细呈告，痛哭流涕，哀感三军。将士人人悲恸，自觉地在头盔和铠甲上刻书“死”“休”二字，表达他们为了复仇虽死无憾的决心。

苻登每战必胜。太初二年（387）九月，苻登推进到了胡空堡（陕西彬州西南），戎夏归之者十余万，威势颇盛。姚苌在击灭苻师奴后赶回徐嵩垒（胡空堡附近）与苻登对峙时，又屡屡败北。他怨愤难消，认定是苻坚阴魂作祟，便在胡空堡和徐嵩垒之间挖开苻坚坟墓，裸剥鞭尸，裹以荆棘，坎土埋之，想借此压压苻坚的阴魂，发泄一下胸中的怨气。孰料此举使苻登上下更加义愤填膺，作战更为勇猛。

双方在新平和安定（陕西镇原东南）一带相持一年有余。苻登因兵力有限，难以攻破姚苌的防线；姚苌以优势之众亦难击退苻登，对苻登将士个个拼死相搏更感无可奈何。关西的坞堡主们见后秦久战无功，对姚苌的信心开始动摇。河东人杨政、杨楷等各自招集流民数万，与苻登遥相呼应，形势对姚苌日趋不利。

太初四年（389）初，姚苌终于侦察到了苻登将士奋不顾身的奥秘，他照猫画虎，也在军中设立了苻坚的神主，撰写了一篇祷告词：“往年新平之祸，非苌之罪。臣兄襄从陕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暂见乡里。陛下与苻眉要路距击，不遂而没。襄敕臣行杀，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复仇，臣为兄报耻，于情理何负！昔陛下假臣龙骧之号，谓臣曰：‘朕以龙骧建业，卿其勉之！’明诏昭然，言犹在耳。陛下虽过世为神，岂假手于苻登而图臣，忘前征时言邪！今为陛下立神象，可归休于此，勿计臣过，听臣至诚。”[47]这正是东施效颦，自挫锐气。姚苌亲自请来了苻坚的阴魂，搞得将士们寝食不安，人人自恐，军中每夜无故自惊，战则大都失利。

苻登讥笑姚苌：“自古及今，安有杀君而反立神象请福，望有益乎！”他大呼挑战：“杀君贼姚苌出来，吾与汝决之，何为枉害无辜！”[48]安丘（安定界内）一战，姚苌又损兵二万五千余。连连败北使

姚苌醒悟过来了，一怒之下，他捣毁了苻坚神主，决定凭自己的智谋和胆略与苻登一搏。

苻登屡战有胜，日渐骄傲。他锐于挑战，却疏于防范。他在大界（安定与新平之间）立营，安置男女老幼及辎重，时时亲统军马四出攻掠，把镇守的重任交给了年幼的儿子苻尚以及虽有武勇却无统军之能的皇后毛氏。姚苌曾偷袭过大界，并没有引起苻登的重视。太初四年（389）八月，姚苌再钻苻登这个空子，乘苻登进逼安定的时机，命尚书令姚旻缠住苻登，亲提精骑三万，夜袭大界。前秦守营将士犹在酣梦之中，姚苌部属已经破寨而入，苻尚被杀，数十名将领在睡梦中成了俘虏。毛后警觉，统壮士数百力战。姚苌挥军围攻，亲自督战，见毛后貌美，下令活捉，意欲收为嫔妃。孰料毛后武艺出众，勇冠三军，尤善骑射，后秦将士七百余人在其枪挑箭射下白白送掉了性命。终因寡不敌众，毛后力尽被擒，不屈而死。前秦大营虽失，将士们犹奋战不已。后秦诸将要求全线出击，毕其功于一役，消灭苻登。历史上骄将击怒兵，先胜后败的实例不少，姚苌怕诸将骤胜而骄，为苻登所乘，乃晓谕全军："登众虽乱，怒气犹盛，未可轻也。"[49]勒兵罢战，不失为高明之举。苻登收拾残余，退屯胡空堡（陕西彬州西南）。

是役，苻登辎重尽失，五万余众被俘。这是他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如果说过去苻登认为凭其武勇可以击败姚苌，收复关陇的话，经此一役，他的信心动摇了。因此，大界之役实际上是苻登和姚苌争夺关陇的转折点。自此以后，苻登颓势频现，将其立足点由胡空堡移到了平凉（甘肃平凉西北），被迫进一步依赖据有南秦州的窦冲，据有仇池和略阳的杨定以及屯据河西的杨政和湖、陕之间的杨楷。为此，他拜窦冲为大司马、都督陇东诸军事、雍州牧，杨定为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秦梁二州牧，杨政为监河西诸军事、并州刺史，杨楷为都督河东诸军事、冀州刺史，请他们集兵支持，会攻长安。

苻登颓象虽现，但在太初五年（390）至太初六年（391）间，曾有两次转机。

太初五年初，苻登在杨定、杨璧的支持下，以窦冲为前锋大都督，倾巢而出，直逼长安。沿途势如破竹，前锋次于新丰（陕西临潼东北），距长安只有六十来里。四月，其镇东将军魏褐飞自称冲天王，统氐、胡数万攻打杏城，后秦镇东将军雷恶地起而响应，攻打李润堡（陕西大荔北）。南北夹击，颇有声势。后秦诸将都以近在咫尺的苻登为劲

敌，只有姚苌深以魏褐飞和雷恶地为忧，决定乘二人立足未稳之时，给以致命的打击。乃亲统一千六百精骑，潜行东北。群臣不解：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原来数年交战后，姚苌摸透了苻登迟重少决的特点，估计他不会轻易推进，因此对群臣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飞，东结董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时陕东北一带少数民族豪酋纷纷起兵支持魏褐飞和雷恶地，前来会师者络绎不绝。姚苌欣喜万分。人问其故，他仿照昔日曹操兵取关中时的话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胜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余也。"[50]双方相持近一年，姚苌不断游军袭击，杀敌一人，在营中植树一棵以旌战功，累计植树三万有余。魏褐飞等见姚苌并不加兵，决心尽众一击。姚苌示之以弱，固垒不战，密遣其子姚崇统骑数百，潜入敌后，突然冲杀。魏褐飞阵后大乱，姚苌乘势纵兵杀出，魏褐飞授首，万余众被歼。雷恶地请降，姚苌待之如初。

雷恶地猛毅清肃，富于智计，颇善用兵，声震岭北。他诚心归服姚苌，所起影响甚大。后秦在岭北的统治日渐稳定下来。

这年七月，郭质起兵广乡（陕西华阴境内），发布檄文，响应苻登。三辅一带支持者甚多，只有郑县（陕西华阳）人苟曜聚众数千附于后秦。其实苟曜心持两端，不过是想和郭质一争首功而已。当他在后秦的支持下击灭郭质，聚众一万，势力增长后，便在次年四月密结苻登，许为内应。苻登即刻移师繁川（陕西长安境内），威胁长安。马头原（长安东）一战，苻登阵斩后秦右将军吴忠。姚苌估计苻登突然由杜陵移师长安东郊，可能是苟曜作祟，只有立刻解决，方能防患于未然。为此，他整军再战，迫使苻登退屯郿县（陕西眉县东）。果然，苟曜不敢轻动了，不久，为姚苌计除。至此，尽管在日后的几次恶战中，苻登还打了几个胜仗，但总的趋势是节节后退，败局已无可挽回。

太初八年（393），苻登行将灭亡，内部矛盾爆发，右丞相窦冲求封天水王后，自称秦王，与后秦联和。苻登统率镇压，姚苌抓住时机命太子姚兴佯攻胡空堡（陕西彬州西南），亲统兵马突袭平凉（甘肃平凉西北），将苻登辎重掳掠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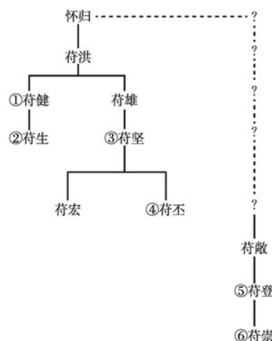
苻登已不堪一击了，但还做了最后的挣扎。太初九年（394）春，他乘姚苌新死、姚兴即位之机，留太子苻崇防守胡空堡，次子安成王苻广留守雍城（陕西凤翔南），尽众而东，求侥幸于一掷。四月，废桥

（陕西兴平东北）一战，苻登全军覆灭，单骑奔窜雍城，岂料苻崇、苻广得讯后早已弃城而走。苻登退无所归，收拾余众，进入马毛山（平凉最险要地段），凭险挣扎。七月，苻登被姚兴俘杀，时年52岁。

苻崇逃到湟中（宁夏西宁西南），登上帝位，改元延初（394），追谥苻登为高皇帝。十月，苻崇为乞伏乾归击杀。前秦亡，传六帝，立国凡44年。

苻登好勇斗狠，善养死士，可以说把氐族“勇戆抵冒”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他在位九年，几乎无月不战，但他绝非一个军事家。每次大战，差不多都给敌手留下许多可钻的空子。在机智谋略上，他远不如姚苌，为此惊呼：“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51]他也不会用人，九年之中，单枪匹马东冲西杀，部下居然没有一个谋略出众的人才，甚至勇冠三军的战将也极也少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苻登之所以能支撑九年，关键还在于苻坚的余荫。乱世之秋，关陇各族人民难免追忆昔日苻坚在位时的和平岁月，促使他们起而支持苻登。但苻登一味贾勇好战，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任何建设性措施。人民失望了，苻登失败了！

附：前秦世系表



说明：

1.实线表明直接世系，虚线表明辈分。

2.数字表明为帝的先后。

[1] 《晋书》卷84《刘牢之传》。

[2] 《资治通鉴》卷105。

[3] 《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

[4] 《资治通鉴》卷102。

[5] 《晋书》卷28《五行志》。

[6]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7] 《资治通鉴》卷103。

[8] 《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

[9] 《太平御览》卷125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10] 《资治通鉴》卷105。

[11] 《太平御览》卷125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12] 《太平御览》卷400引《续晋阳秋》。

[13] 《资治通鉴》卷105。

[14] 《资治通鉴》卷105。

[15] 《资治通鉴》卷105。

[16] 《资治通鉴》卷105。

[17] 《晋书》卷115《苻丕载记》。

[18] 《资治通鉴》卷105。

[19]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20] 《晋书》卷118《姚兴载记》附《尹纬传》。

[21] 《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22]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23] 《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24]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25] 《太平御览》卷37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26] 《太平御览》卷744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27]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28] 《资治通鉴》卷106。《晋书·苻坚载记》曰：“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赵敖为盟主……”此处以《资治通鉴》记载为是。

[29]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30] 《资治通鉴》卷106。

[31]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32]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33]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34] 《资治通鉴》卷106。

[35] 《晋书》卷115史臣曰。

[36] 《习学纪言序目》卷30。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38] 此据《十六国春秋·前秦录》《魏书·苻健传》等。《晋书·苻丕载记》“叙”作“叔”。

[39] 《资治通鉴》卷106。

[40] 《资治通鉴》卷106。

[41] 《晋书》卷87《李士业传》。

[42] 《资治通鉴》卷106。

[43] 《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44]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45]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46]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47]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48]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49] 《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50] 《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51]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第七章〗 前秦的文化

第一节 经学、玄学和文学

一、经学和玄学

前秦的文化在苻坚统治时期达于鼎盛。

魏晋之际，特别是晋末永嘉之乱之后，迭经战乱，儒生罕存，儒家的经典大都散佚殆尽。当时的情况恰如博士王寔所言：“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1]苻坚和王猛务实而鄙薄玄学，对读经相当重视，当世著名的通儒习凿齿、苏通、刘祥、郭瑀、公孙永、王欢和胡辩者流，均蒙礼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物被聘到了长安和洛阳。苻坚对搜罗和整理各种儒家的经典给予了较大的关注，经常到太学去“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2]。他得知苏通和刘祥精于《礼记》和《仪礼》后，特设两个祭酒，任苏通为《礼记》祭酒，置于东庠，刘祥为《仪礼》祭酒，置于西序。“每月朔旦率百僚亲临讲论。”[3]《周官》失传已久，博士卢壶奏称：“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苻坚立刻在韦逞家设立讲堂，特置生员120人，让他们“隔绛纱幔而受业”；封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10人。《周官》由此复行于世。在苻坚的关注下，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正经粗集”[4]。

前秦经学之盛，在十六国屈指可数。由于其统治的时间短暂，经学虽未见有多大的发展，甚至亦难谈恢复，但前秦对经学的保存和传播还是有所贡献的。

在王猛的要求下，苻坚禁读“老庄”，但玄学作为当时的统治思想，所提出的各种命题已成了哲学家们热衷探求的内容，挥麈清谈又是上层统治集团及文人的时尚，这就绝非一纸命令所可禁绝的了。随着苻氏集

团文化水准的提高，王公权贵亦染清谈之风，如苻融，“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5]。最著名的人物当首推苻朗。他“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将至”，在玄学上的造诣，连东晋清谈老手亦叹为观止：“既至扬州，风流迈于一时，超然自得，志陵万物，所与悟言，不过一二人而已。”[6]他著有《苻子》数十篇（一说十余篇），《晋书》本传曰：“亦老庄之流也。”在隋唐时还颇有影响。现已失传，难窥其堂奥了。

二、文学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流行，王嘉的《拾遗记》是其中较有价值的一种。

《拾遗记》何人所作，历来颇有争论。一曰王嘉，一曰萧绮，偶或亦有认为是虞义者，但以前两人之间的争论为多。齐治平先生指出，所谓萧绮或虞义者都是孤证。由文笔辞彩来看，萧绮所作与《拾遗记》颇为不同。《拾遗记》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也和贵家出身的萧绮颇有异趣。因此，齐治平先生推断为王嘉所作。笔者从齐治平先生之说。[7]

《拾遗记》今存共十卷，前九卷上起“庖牺”，下讫东晋，名曰叙史，实为荒诞不经的神话或道听途说的传闻。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只能作为饭余茶后的谈资。第十卷则是对昆仑等九座道教仙山的描绘。

《拾遗记》文笔质朴，但亦不乏靡丽之处。书中有不少谣、谚、诗歌，有的可能是王嘉采录，有的可能是王嘉自作。其中《皇娥歌》《帝子歌》《淋池歌》等，情致幽深，辞彩可观，可以说是当时诗歌中的佳作。《拾遗记》中既有流传甚广的神话传说，亦有一些科幻性的传闻。许多篇章有头有尾，叙述跌宕起伏，情节复杂，铺叙有致，在当时的志怪小说中堪称上品佳作，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拾遗记》作为志怪小说，大多充斥迷信思想，但作者有时亦通过某些人物的活动，鞭挞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醉生梦死，寄托了一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苻坚好诗，吉享嘉会，登高凭吊，必有诗歌酬唱，并亲自评判。在他的倡导下，前秦诗歌较盛，似可断言，但流传至今者极少。在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可断为前秦诗歌的有三十余首。其

中民歌十三首，其余为文人作品。这些诗歌大多为断章散句，完整者不足二分之一。

今存民歌、谣、谚大多以讽喻时政为主，语言朴实，直抒胸臆。其中最著名的是《苻坚时关陇人歌》，歌颂了苻坚统治前期关陇地区政治清明、经济文化恢复发展的情状。前已引述，此处不赘。

文人以赵整和苏蕙较著名。

赵整，字文业，一曰洛阳清水人，一曰济阴（山东定陶西北）人。他"情度敏达，学兼内外，性好讥谏，无所回避"[8]，历官著作郎、黄门侍郎、武威太守。他信佛佞佛，道安译经班子中著名的经师昙廖难提便是由他请来的。他协助道安的译经工作，参加了《增一阿含经》的翻译。苻坚死后，赵整落发为僧，取名道整，遁迹商洛山，死于襄阳，终年60余岁。

今存赵整诗歌五首，全是讽谏诗，均较完整。其中最著名的是《琴歌》，前已引述。昔日文人的讽谏诗大都是"劝百谏一"，赵整的讽谏诗具有犯颜直谏的特征，寥寥数语，切中时弊，流传甚广，确实是"无所回避"，堪称讽谏诗中的佳作。

苏蕙，字若兰，一曰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人，一曰始平（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智识精明，仪容妙丽"[9]，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她16岁时嫁给窦滔，夫妻感情甚笃。窦滔文武全才，颇得苻坚赏识，官至秦州刺史。后窦滔纳赵阳台为妾。阳台能歌善舞，妙解人意，极得窦滔宠爱。苏蕙怨怒难平，借机发作，毒打赵阳台，由此夫妻反目。窦滔受命出镇襄阳时，只带赵阳台赴任，断绝了和苏蕙的关系。苏蕙悔恨自伤，织锦为《旋图诗》（又名《璇玑图诗》），计840字，命人送达襄阳。窦滔读后，深受感动，送赵阳台回关中，接苏蕙到任所，夫妻恩爱，甚于往昔。

《旋图诗》回文而就，苏氏自称，不得个中关窍，常人莫能解之。若能破解，循环婉转读来，便成200余首情致缠绵凄婉的妙诗，一度曾盛传于世。所以武则天评曰"纵横反复，皆为文章"，"才情之妙，超今迈古。"[10]

据传，苏蕙有诗文5000余言，《晋书》本传亦称她"善属文"，但"文多不录"。大体上经隋末战乱后，苏氏所作，已散佚殆尽。《诗类

苑》收录的《璇玑图诗》，武则天认为是苏蕙所作，真伪如何？限于功力，难以置辩，于此存疑。

第二节 宗教

一、道教

魏晋之际，是原始道教向御用道教转化的关键时期，流传既广，势力也颇大。前秦受其影响，当无例外。前秦境内，丹鼎派的著名人物有张忠和王嘉，符箓派的著名人物则为孟钦。

张忠，字巨和，中山（河北定县）人，生年不详，约死于苻坚统治初期。《晋书》本传载，自永嘉之乱后，张忠“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冬则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他修建道坛，每日礼拜，穴居求仙，练气服食，认为“天不言而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自称“东岳道士”，门下徒众甚多，是北方地区影响颇大的一个道教人物。

王嘉，字子年，洛阳人[11]。生年不详，死于后秦初年。《晋书》本传记载，他“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初隐东阳谷，后隐终南山，门徒常有数百，穴居，练气服食，是影响较大的道教人物，名动王公贵族，苻坚、姚苌及慕容冲等都殷勤礼聘。著有《牵三歌谶》一卷，《拾遗记》（又名《拾遗录》）十卷。前者为谶纬之类的书籍，多隐语预言未来之事。《拾遗记》亦多神仙道家之言，但其文学价值高于宗教价值，已在文学中略加介绍。

孟钦，洛阳人，生卒年不详。《太平御览》卷9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中又名盖钦。比较他们的事迹，当是同一人，“孟”“盖”二字，当是传抄之误，以何字为准，缺少佐证，现以《晋书》为凭，故书作孟钦。《晋书》本传说他“有左慈、刘根之术，百姓惑而赴之”，在人民中间有较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当是符箓派的传人。

由张忠宣扬“至道虚无为宗”来看，前秦境内的丹鼎派和时代的趋向一样，走着道玄合流的道路。王嘉和道安是密友，两人经常探讨谈道，这又和佛教借助道教传播，道教吸收佛教经义的风尚相吻合。

丹鼎派追求练气服食，长生不老，白日飞升，成仙得道，此外还有满足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多种法门，完全是御用宗教；符箓派则具

有一些原始道教的性质。因此，苻坚对他们的态度也就完全不同。张忠死后，苻坚特意追谥他为“道安先生”，命令黄门侍郎韦华持节策吊，祀以太牢，褒赐命服，仪式极为隆重。对于王嘉，苻坚则视作神圣，前已叙述，不再重复。对符箓派，苻坚采取的完全是高压手段，力图禁止。他把孟钦诱请到长安后，便立刻命令以“惑众”的罪名格杀。

二、佛教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自汉朝传入中国后，始则借助神仙方术，继则依附于玄学，这固然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开端，同时也说明它的流传极为艰难。汉魏之际，佛教已逐步在民间传播，但影响还小。它的盛行，开始于东晋六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乱、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统治阶级朝不保夕的处境、广大人民死中求生、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佛教流传的极好的土壤。汉族统治阶级由排斥佛教转向利用佛教巩固统治。统治阶级态度的转变，为佛教的流传打开了方便之门。南北比较，南方还有相对安定的环境，北方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北方人民的苦难更甚于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佛教的依赖和提倡，也远过于南方。因而佛道在北方的流传远比南方为盛。

十六国时期，内迁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凭借武力在中原建立政权，称王称帝，但过去长期被奴役的屈从地位，使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卑感，特别是面对“正朔相承”的封建正统观念，心理上更为怯懦，急于寻找一种理论为其入主中原辩护。佛教对巩固封建统治固然十分有利，它所宣扬的理论又无华夏之别和正朔相承之类的观念，尤其是神不灭、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等学说，对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华夏更有辩解的作用，由此成为他们力图利用和提倡的精神武器。借助佛教为其入主华夏打强心针的，语言之直率，无过于后赵的统治者石虎了：“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12]苻坚在接受汉文化和提倡儒学方面，在内迁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堪称一个佼佼者，可是儒学中夷夏之别十分严格，正统思想是其脊髓，这对于力图做一个一统天下之主的苻坚来说，显然是美中不足的。他反对王猛和苻融等人正朔有别的说法，却同样要以封建正统自居，说明正统思想是他摆脱不了并想据为己有的思想藩篱。因此，他相信图谶，同时又竭力罗致高僧，借助佛教。当时，在佛教界中享有盛誉的高僧首推释道安、鸠摩罗什和竺僧朗三人。道安

是内地佛教界的首领，鸠摩罗什是西域佛教界的首领，僧朗的声望仅次于这二人，于此三人，苻坚都想罗致。《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载：“苻坚建元十三年（377），岁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于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太平御览》卷122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中，更把“大德智人”四字改为“圣人”，并在“入辅中国”之后又加上了“得之者昌”。大德智人也罢，圣人也罢，在苻坚的心目中，首先把这类崇高的称号甚至国家的兴衰存亡和高僧联系在一起，不难想见他罗致高僧的迫切心理。当释道安还在襄阳的时候，苻坚就特意遣使送去“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13]。他夺取襄阳，得到释道安后，“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14]道安随时可以参加前秦的军国大事，苻坚对他尊崇异常，言听计从，特意下令：“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所以，京师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15]道安在前秦的地位，王公权贵及儒学名流们莫与为比。他可以和苻坚同辇出游，苻坚的心腹宠臣权翼看不过去，强调皇帝至高无上：“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清道而行，进止有度。三代末主，或亏大伦，适一时之情，书恶来世。故班姬辞辇，垂美无穷。道安毁形贱士，不宜参秽神舆。”言辞之激烈，在群臣对苻坚的谏诤中可谓独一无二。孰料一向以至高无上自诩的苻坚居然大怒，斥责权翼，说出了一番令群臣惊诧不已的话：“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之显也。”强令权翼扶道安上辇，并安慰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谒虞陵于疑岭，瞻禹穴于会稽，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16]苻坚借助佛教提高自己声望的意图，于此昭然若揭。

《广弘明集》保留了一篇苻坚给竺僧朗的书信，其用词之谦卑，对僧朗的推崇，与这位雄姿英发、以一统天下之主自居的皇帝可谓判若两人：“皇帝敬问太山朗和尚：大圣膺期，灵权超逸，荫盖十方，化融无外，若山海之养群生，等天地之育万物……朕以虚薄，生与圣会，而隔万机，不获辇驾。今遣使人安车相请，庶冀灵光回盖京邑。今并送紫金数斤，供镀形象；绢绫三十匹，奴子三人，可备洒扫。至人无违，幸望纳受。想必玄鉴见朕意。”

此类情状，是儒学名流们根本不能企及的。对于鸠摩罗什，苻坚也始终念念不忘，特意授命吕光：“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

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17]《高僧传》把苻坚发兵襄阳说成了夺取道安；吕光西征是为了礼聘鸠摩罗什，特别是后者，《晋书》《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太平御览》更是众口一词，虽然言之过偏，但这确实也是吕光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时，各地寺院建筑兴盛，举世闻名的东方文化宝库敦煌莫高窟就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今存武周圣历元年（698）李怀化《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驾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18]于今乐僔所开之窟遗址难觅，莫高窟究竟创建于何时，亦稍有争议，但此举毕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一提。

与此相应的是僧尼数字的急剧增加。早在后赵时，僧尼之多已危及封建政府的赋税收益，石虎的诏令已显露了此类忧虑：“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后，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19]前秦僧尼数字史籍无据，我们只知道仅长安城中便有僧侣数千，外地怎样，难以引述。《晋书·苻丕载记》载，苻丕败后，“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佺期以为洛阳令”。这无疑是僧侣们编造的一段神话窜进了正史，但于此亦可见到在苻坚的倡导下，佛教流传甚广的情况。僧尼数字超过后赵大概没有什么疑问，苻坚下令“沙汰众僧”[20]，应该亦包含赋役收入的问题在内。后秦统治时，“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21]。这类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姚兴崇佛、佞佛有关，与苻坚统治时为佛教的传播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也密不可分。

前述三人中，鸠摩罗什在吕光西征中被罗致，进抵河西走廊，前秦崩溃，留居姑臧（甘肃武威）多年，后秦时才来到长安。罗什与苻坚并未谋面，其主要活动是在后秦，因此这里介绍僧朗和道安两人。

僧朗，京兆（陕西西安）人。曾师从佛图澄，与道安共为佛图澄的高足。前秦皇始元年（351）卜居泰山，在金舆谷建造房舍数十区，传播佛教，徒众常有百余人。他佛学修养高，活动能力亦强，名动王公。他号召佛教徒与道安互通声气，曾召集过金舆谷大会，金舆谷一度成为河济间佛教重镇，后人称之为“朗公谷”。

前秦时声望最隆、影响最大，并在我国佛教史及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是释道安。

道安（321-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衡水西南）人。出生儒学世家，幼丧父母，少为外兄孔氏所养。他12岁出家，因形貌欠佳，不得其师欢心，在田间驱使服役达三年之久。道安矢志精研佛学，勤奋好学，悟性超人，记忆力尤佳。史称他“启师求经，师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已暗诵。’师虽异之，而未信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经覆之，不差一字”[22]。其师叹服，亲为剃度受戒，任其游学。道安24岁时到达邺中寺，师从佛图澄。佛图澄是备受石勒和石虎宠信，后赵君臣都称之为“大和尚”的著名僧侣，佛学修为甚高，尤精禅定。道安极蒙佛图澄青睐，佛图澄对众僧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佛图澄讲法，道安复述，并解答僧众疑难，语惊四邻，游刃有余，故时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佛图澄死后，后赵大乱，道安先后避难河北、山西，颠沛流离中，对佛学仍然孜孜追求。他53岁时到达襄阳，在南方佛教重义理的影响下，又精研般若学。建元十五年（379），道安到达长安，终葬五级寺。

道安的一生是精研佛学的一生，也是传播佛教的一生，他对佛教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培养徒众，组织僧侣传教；制定僧侣戒规；整理和翻译佛经；创立般若学中本无宗学派。现依次介绍。

1.培养徒众，组织僧侣传教

道安在河北时，声名已著。他在恒山创建寺塔，集徒众数百。在襄阳（湖北襄樊），他先住白马寺，后建檀溪寺，该寺规模宏伟，拥有房舍四百余间，所集徒众更多。到达长安后，长安一度成了我国的佛教中心，聚集僧侣数千之众。道安讲经说法，传播佛教并培养了大批僧侣。其门徒足迹几乎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东晋著名僧侣中，慧远、慧永、慧持、法迁、法和、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法汰等均出自道安之门，或受惠于道安。其中，有的继他成了佛教界的领袖（慧远），有的则是般若学中幻化宗（道一）、本无异宗（竺法汰）的开山祖。

道安组织僧侣到处传教的活动主要有两次。苻坚建元元年

（365），道安等避难南下，行次新野（今属河南），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得到徒众及同行僧侣的支持。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力图依赖政治势力（如佛图澄之流）弘扬佛法，但明确提出者，道安可谓首批人物。建元十四年（378），在苻丕攻克襄阳前夕，道安又“分张徒众，各随所之”[23]。

道安的上述活动是我国佛教史上的大事，佛教之后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流行，与此密切相关。过去益州的佛教势力极为薄弱，自道安门徒法和、昙翼相继到达后，佛教徒众渐增。东晋一代，益州的著名僧侣几乎都是道安的徒党。慧远被派遣到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后，创建了东林寺，成为荆州佛教重镇。昙翼在上明（湖北随县东北）所建东西二寺，到唐代时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寺院。法汰到达建康（江苏南京）后，上自皇帝，下至庶民，许多人都成了他的信徒。

过去，僧侣们以师为姓，故姓名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日后不久译出的《增一阿含经》中，果有此等意思：“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的倡议为僧侣们接受了。自此，僧侣皆以“释”为姓。魏晋时代，重视姓氏门第，道安此举，无疑有抬高佛教徒的地位、统一佛教徒众、进一步传播佛教的作用。

2.制定僧侣戒规

佛教传入中国后，如何约束僧众是佛教能否昌盛发达的重要课题。此时，印度佛教戒律还没有传入中国，我国佛教谈不上什么戒规，针对这种状况，道安制定了一些清规戒律，其条目有：“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可见，道安制定的清规戒律甚为细微。习凿齿曰，道安主持的檀溪寺“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结果是“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之后道安又广求并翻译出了许多佛教的戒规，在佛教界广为流传。直到鸠摩罗什来到长安，译出律藏后，道安制定的清规戒律才被取代。

3.整理和翻译佛经

汉魏以来，随着佛教的逐渐流传，汉译佛经逐渐增多，但直到道安以前，并无一本有关佛经目录学的书籍。道安在襄阳时，广泛收集整

理，考定译经的时间及译者，评判译文的优劣，编纂了《综理众经目录》（此为后人提名，道安原著早已散佚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佛经总目，不但有利于佛教在我国的流传，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道安被苻坚礼聘到长安后，主要的精力用于组织和主持佛经的翻译，他礼聘著名经师竺佛念、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和佛图罗刹等译经，在赵整的协助下译出佛经187卷、百万余言。

佛经是宣传佛教的依据，佛经的翻译和诠释又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过去汉译佛经虽多，但由于较早来华的胡僧梵客一般不带经本，只凭默记口诵传授，他们一般不懂汉语中文，参与翻译的汉人佛学修为甚差，文化程度及文字表达能力参差不齐，梵文的文句章法和中文又大不相同，而早期佛经翻译步骤又极繁杂，往往经过梵僧口诵，梵僧用梵文笔录，照笔录本用汉语宣读，汉人用汉文笔录整理等过程，西来僧众汉语修为略高者，译经过程虽可简化，但既然只凭记忆，就难免谬误，而且大多为断章零品，文句艰涩，实难品读。有道高僧往往要收集众多译本，寻文比句，花费大量精力，才能窥其堂奥于一二。道安主持的翻译队伍，通晓梵语中文，精研佛经，均为当时高手。其中如竺佛念，“有通敏之鉴，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苍雅诂训，尤所明达。少好游方，备观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解，故义学之誉虽阙，洽闻之声甚著”，被时人称为“译人之宗”[24]。僧伽提婆“学通三藏，尤善《阿毗昙心》，洞其纤旨”[25]。昙摩难提“研讽经典，以专精致业，遍观三藏，暗诵《增一阿含经》，博识洽闻，靡所不综，是以国内远近，咸共推服”[26]。僧伽跋澄“毅然有渊懿之量，历寻名师，备习三藏，博览众典，特善数经，暗诵《阿毗昙毗婆沙》，贯其妙旨……至长安，咸称法匠焉”[27]。佛图罗刹“德业纯粹，该览经典，久游中土，善闲汉言，其宣译梵文，见重苻（秦）世”[28]。道安不懂梵文，但其佛学修为在当时堪称首屈一指，书法、诗歌、经学和玄学的造诣备受时人赞颂。习凿齿说他“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他在主持译经之余，亲自参加诠定文字，探求文意，并为所译经文作序。他深知翻译之艰难，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经验。所谓“五失本”，主要是指翻译中若出现下列五种情况，便可能使译本不符合佛经原意。其一，按梵文句法译成中文。其二，以为文字重复而删掉佛经中反复咏叹或再三叮咛的文句。其三，梵文质朴，译成中文，需加辞藻修饰或借用中国固有的哲学术语。其四，删节梵文经

本中各个段落重复解释的文句。其五，精简佛经中重复的事例。因此他主张直译，句法遣词应符合中文的结构并进行必要和适当的文字修饰。“三不易”是指在翻译佛经时不容易做到的三种情况：其一，既要忠实于佛经，又要使平常人能读懂。其二，古代的习俗，翻译时不易译成适合于现时的状况；其三，佛学修为较浅者不容易译出佛经中深奥的含义。在这些经验的指导下，道安主持翻译的佛经，质量之高，堪称当时之冠。至于他总结的经验，对日后翻译外来文化也有相当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是以前翻译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标志着翻译工作新时期的来临，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4.创立般若学中本无宗学派

当时在内地流传的佛教，既有小乘教派，又有大乘教派；南北两地佛教的差异也相当大，北方重禅学，南方重义理（般若学）。道安兼容并包，是当时佛学的集大成者。道安对禅学练习甚勤，他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往生兜率（佛教宣扬的弥勒净土）。但禅学往往借助幻术传教，佛图澄便是其中荦荦者。和佛图澄不同，道安重禅学，却不热衷于幻术，所以和他交往颇深的习凿齿说他“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道安更偏重通过宣扬和钻研佛教的义理招揽徒众，麻醉人民。他晚年对般若学的钻研尤为勤恳，道安的著述极丰，约略统计，有60余种，流传至今的达20余种。其著作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探讨般若学的。就道安的宗教唯心主义观念来说，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本无义应是道安前期宗教活动所创立的一个学派。

在佛教大乘教派的经典中，传入中国较早的是《般若经》。这是一部丛书，主旨在宣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虚幻不实。此时，玄学亦在探讨“有”“无”“本”“末”“一”“多”之类的命题。《般若经》的传入，与玄学探讨的命题有吻合之处，由此成了大家钻研的对象。由于《般若经》的译本大多是节译本，或为断章零品，翻译的质量颇差，译师们又往往用玄学中的概念名词来比附该经中的概念名词。这样，《般若经》所宣扬的“空”和“无”等宗教概念便有了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诠释，般若学的“六家七宗”出现了。道安所创的“本无宗”，是“六家七宗”中势力最大的，一度被视作正宗。

和当时其他各派般若学一样，道安对般若经的理解和诠释，亦深受玄学的影响，他同样是用玄学的概念宣扬《般若经》的。

《名僧传抄·昙济传》概要地介绍了“本无宗”的基本概念：

> 如来兴世，以“本无”弘教，故《方等》深经，皆备明五阴“本无”。“本无”之论，由来尚矣。何者？夫冥造之前，廓然而已；至于元气陶化，则群象禀形。形虽资化，权化之本，则出于自然。自然自尔，岂有造之者哉！由此而言，“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非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也。夫人之所滞，滞在“未有”，宅心本无，则斯累豁矣。夫崇本可以息末者，盖此之谓也。

大意是在“冥造之前”，什么都没有，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并没有一个造物主在主宰。但是在万事万物自然生成之前，却有一个精神主体，即“无”和“空”存在着，这才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因此，人们修习佛学，求生净土，关键是要“宅心本无”。这个理论显然要比宣称有造物主存在更彻底、更巧妙、更能迷惑人。否定现实世界，是要人们产生厌世思想，投入佛教的怀抱，去追索虚幻的彼岸世界。追索的途径首先是要做到“无欲”“无为”“宅心本无”。道安宣称，人们之所以敌对，完全是由怨憾造成的，如果具有不分彼此的平等心，敌对也就消失了。实质上这既是要求人民放弃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又要求人民放弃为反抗剥削阶级剥夺他们幸福所进行的斗争。如此理论，对封建统治当然十分有利。道安禅法、义理并重，既在理论上麻醉人们，又在日常行动上束缚和愚弄人们。道安之所以深受南北统治者的青睐，不是没有原因的。

道安后期宗教唯心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更接近于印度大乘教中空宗的观点，他把“宅心本无”也贬为“有为之域”，而去追求“据真如，游法性”[29]的境界了。

道安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批创立学派的佛教学者，对日后般若学的流行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无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佛教已脱离了生吞活剥的阶段，创建中国自身的佛教虽然仍然需要走漫长的道路，但毕竟开始了。[30]

[1]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2] 《晋书》卷96《列女·韦逞母宋氏传》。

[3] 《太平御览》卷236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4] 《晋书》卷96《列女·韦逞母宋氏传》。

[5]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融传》。

[6]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朗传》。

[7] 参见齐治平先生校注《拾遗记·前言》，中华书局，1981。

[8] 《高僧传》卷1《赵整传》。

[9] 《诗类苑》卷96。

[10] 《诗类苑》卷96。

[11] 此据《高僧传》卷5《道安传》。《晋书》本传曰“陇西安阳人”，查陇西并无安阳县。

[12] 《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

[13]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14]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15]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16]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17]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18] 碑文中“状有千佛”后残缺，括号内文字据《莫高窟记》补。

[19] 《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

[20] 《高僧传》卷5《竺僧朗传》。

[21]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22]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以下凡关于道安事迹不注出处者皆出此卷。

[23]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24] 《高僧传》卷1《竺佛念传》。

[25] 《高僧传》卷1《僧伽提婆传》。

[26] 《高僧传》卷1《昙摩难提传》。

[27] 《高僧传》卷1《僧伽跋澄传》。

[28] 《高僧传》卷1《佛图罗刹传》。

[29] 《出三藏记集》卷7《道行经序》。

[30]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王仲荦《魏晋

南北朝史》；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等等。

〖附录〗 前秦大事年纪

太兴三年（**320**）

赵封苻洪为氐王，迁苻氏于高陆。

咸和八年（**333**）

赵封苻洪为护氐校尉、流民都督，迁苻氏氐于枋头。

永和五年（**349**）

八月，苻洪反赵，称臣于晋。

永和六年（**350**）

正月，苻洪背晋，称大单于、三秦王。

三月，麻秋毒死苻洪。其子苻健继领其众，称臣于晋。

八月，苻健尽众入关。十月占有长安。

皇始元年（**351**）

正月，苻健称天王，国号秦，都长安，前秦建国。

四月，前秦击退晋梁州刺史司马勋来犯。

五月，前秦击退后赵残余势力王擢（后降前凉）在前凉支持下的来犯。

皇始二年（**352**）

正月，苻健称帝。

是年，前燕击灭冉闵，推进中原。

皇始三年（353）

关中豪杰孔特、刘珍等起兵反秦。

皇始四年（354）

二月，桓温兵进关中，四月峣关之战，秦败。桓温深入，屯兵灞上。

六月，桓温败退。

皇始五年（355）

六月，苻菁政变失败。苻健死，子苻生即位，改元寿光。

寿光二年（356）

二月，前凉在前秦胁迫下称藩。

寿光三年（357）

四月，姚襄入关，被击灭。

五月，苻黄眉政变失败。

六月，苻坚政变成功，杀苻生，自称天王。

永兴元年（357）

七月，盘踞并州的张平叛乱。

永兴二年（358）

二月，苻坚亲征张平，次年消灭张平，自政变成功起即任用王猛，制定偃旗息鼓、与境内休息国策，加强中央集权，前秦走向大治。

建元二年（366）

王猛统兵观衅汉阳。

前凉与前秦绝交。略阳羌酋敛岐叛乱，投奔李俨。

建元三年（367）

二月，王猛讨平敛岐，击败前凉，擒李俨，据有枹罕。前秦西戎主簿郭辩入邺城刺探前燕虚实。

十月，晋公苻柳等四公叛乱。

建元四年（368）

四公叛乱失败。

建元五年（369）

桓温兵击前燕，苟池及邓羌奉命援燕。慕容垂击败桓温。

十一月，慕容垂奔秦。

建元六年（370）

正月，王猛夺取了洛阳。

六月，王猛领兵六万伐燕。

十月，潞川之役，王猛歼燕兵十五万。

十一月，秦军攻克邺城，前燕亡。

建元七年（371）

秦、晋争夺寿春，为桓温所败。

三月，苻雅击灭前仇池国。吐谷浑降秦。之后，王统击降鲜卑乞伏部。

建元九年（373）

秦据有东晋梁、益二州。

建元十二年（376）

八月，苟苌击灭前凉。

十月，苻坚、苻洛发动灭代之役，在十二月灭代。前秦统一了北方。

建元十四年（378）

二月，苻丕进攻襄阳。八月彭超进攻淮南。

九月，凉州刺史梁熙遣使西域。十月，西域十余国使臣到达长安。

建元十五年（379）

二月，苻丕攻克襄阳。五月，彭超在淮南全军覆没。

建元十六年（380）

三月，苻洛叛乱，在五月被镇压。七月，苻坚推行军事殖民措施。

建元十七年（381）

西域及海东六十余国使臣来到长安。

建元十九年（383）

正月，吕光西征。

五月，晋将桓冲争夺襄阳，未果。

七月，苻坚发布伐晋总动员令。

十一月，淝水之战，苻坚惨败。

十二月，丁零翟斌自立；慕容垂自立。两人联合，围攻邺城。

建元二十年（384）

正月，慕容垂建后燕。

三月，慕容泓起兵关东，慕容冲起兵平阳。

四月，慕容泓建立西燕。姚苌建立后秦。

五月，东晋进攻梁、益二州。

八月，谢安主持北伐。

建元二十一年（**385**）

五月，苻坚出奔五将山。

六月，慕容冲占有长安。

七月，苻坚被后秦俘杀。苻丕撤向晋阳。

八月，苻丕即位。

太安元年（**385**）

九月，吕光据有凉州。

太安二年（**386**）

正月，拓跋珪复国，国号魏。

八月，苻丕为西燕击溃，在东垣为晋将军冯该俘杀。

十一月，苻登即位。

太初二年（**387**）

姚苌在杏城歼灭了苻师奴。

太初四年（**389**）

二月，吕光建立后凉。

八月，姚苌偷袭大界，苻登大势已去。

十月，乞伏国仁建立西秦。

太初八年（**393**）

苻登内部分裂，势力更衰。

太初九年（**394**）

七月，姚兴俘杀苻登。苻崇即位。

延初元年（395）

十月，西秦乞伏乾归击杀苻崇，前秦亡。

索引

A

阿贵 012，015，016，019

B

巴蛮 025

白纯 200，201，206，211，212

白犊 048

白虏 089，102，297，312

白马氏 003，004，006

白起 113

白项 015

白震 212

百顷 007，015，157，161

班勇 209

逼迁 004，007，011，016，017，019～021，026，029，030，035，036，089，090，101，156，157，236，240，259，266，275，276，283，304，305

帛纯 200，203，210，211

卜靖 160

卜胜 241，300

C

蔡珪 058

蔡敏 058

曹操 003，005，007，008，015～017，019～021，101，157，174，196，236，327

曹毂 147，192，193，286

曹丕 021

曹祛 174

曹爽 021，023

曹永年 256

车敬 070

车频 071，199

陈安 028，172

陈平 097，124

陈庆之 278

陈珍 172

成汉 027，051，158～160，167，177

程肱 047，057，073，078

程宽 127

程朴 041，074

程同 298

程宪 108

程延 073

毗卢那胡 164

敕勃 241，300

仇池 005，007，016，024，027，031，120，157～161，163，164，169，170，173，177，181，233，270，272，273，286，312，317，326，354

出连高胡 164

褚裒 051，055

崔毖 136

崔宏 109

崔鸿 034，155

崔掖 092

崔悦 092

D

大单于 013，031，043，048，049，074，079，082，090，306，318，319，352

大秦 048，181，205，247，319

戴逯 222，223

戴熙 249

单于台 025，026，028，030，031，074，079，090

单徵 013，025，026

啖青 321

啖铁 056，272，273

党项 011

宕昌羌 011，012

道安 083，095，110，246，310，333，335，337～341，343～350

道立 344

道一 344

道愿 344

道整 335

邓艾 022～024，130，169

邓定 167

邓迈 312

邓羌 057，063，067，103，111～113，147～149，151～156，171，189，190，192，227，229，267，270～274，354

狄广 306

氐 001～036，038，040～043，046，048，059，073～075，079，094，095，102～105，114，119～121，134，157，158，161，172，175，198，206，211，232～238，240，242，259～263，266，270，271，273，274，282，288，289，292，299，300，310，312，317，320，321，326，328，352

氐道 004，005，006，007

氐人 002～015，017，019～032，034，035，042，157，270，273，274，312

氐王 009，012，015，017，018，020，034，035，041，157，352

氐族 001～003，006，010～015，017，019，020，022～025，030，031，034～036，040，046，048，059，075，079，094，095，103～105，114，120，158，206，211，234～236，240，242，259～263，266，270，271，273，288，289，320，328

甸氐道 004，006

丁妃 127

丁穆 122，244

丁彦远 122

东海王 064，066，153，231

东胡 097，241

董成 322，326

董方 209

董荣 057，061，079

都贵 221，231，272，292

都颜 224

窦冲 083，231，292，305，307，311，323，326，328

窦苟 210

窦滔 272，335，336

杜洪 045～049

杜进 208，209

杜敏 319

杜佑 010

杜郁 047

杜预 216

杜周 182，190

段纯 046，048，072，073

段龛 038

段勤 038

段随 319

段业 212

段灼 023

F

法和 344，345，346

法良 342

法汰 344，345

法迁 344

樊世 104，105

氾胜之 129，130

范贲 167

范俱难 057

方立天 350

枋头 032，034，036～039，041～044，046，057，075，090，091，095，104，122，148，151，165，168，269，294，316，352

房默 109

费统 292

冯君实 074

佛图罗刹 346，347

夫差 245

苻安 060

苻产 062

苻苌 049，052，053，056，060，074

苻袒 322

苻敞 320，329

苻成 025

苻冲 272，303

苻崇 093，328，329，356

苻道 063

苻登 083，093，096，320，321，322，323，324，325，326，327，328，329，355，356

苻定 272，302，303，319

苻法 050，066，071，083，226

苻方 248，289，309，312

苻飞 061，160，235，299～301

苻飞龙 235，299～301

苻广 328

苻宏 116，156，246，249，312，313，317，329

苻洪 009，010，012，013，018，032，034～045，061，063，

074，079，090，094，095，260，261，329，352

苻黄眉 061，063，064，078，353

苻晖 233，235～237，239，271，272，299～302，309，312

苻坚 055～057，059，063～068，070～072，074～076，078，079，082～085，088，090～135，140，141，147～157，160，161，163～171，178～183，189～201，203～208，210，211，213，214，216～222，224～232，234，236～249，252～276，278～281，283～290，295～298，302，304～315，317，320，323～325，329，332，333，335～344，346，353～355

苻建 034

苻鉴 302

苻菁 047～050，052，058，062，064，353

苻朗 095，096，271，272，284，285，294，333

苻良 229

苻亮 302，319

苻琳 095，310

苻柳 060，067，125，141，226，227，229，237，271，272，354

苻洛 189，190，197，198，225，226，229～232，237，238，270～272，287，317，318，354

苻谟 302，319

苻丕 083，093，095，112，216，218～221，229，233，236，237，239，270～272，275，294，298～304，314～322，329，342，344～355

苻融 095～097，100，101，109，112，121，133，156，193，

205，217，220，230，231，236，244 ~ 246，248，249，251 ~ 254，261，267，269，271，272，286，287，289，290，295，333，339

苻睿 222，233，236，271，272，305，308

苻尚 325

苻绍 302，303，319

苻诜 313

苻生 045，047，052，057，060 ~ 073，075 ~ 079，082，092，101，140，146，148，199，225，226，258，320，329，353

苻师奴 320，322 ~ 324，355

苻双 018，125，141，226 ~ 229，237，271，272

苻硕 052

苻腾 125，226

苻同成 237，320

苻武 125，141，226 ~ 229，272

苻熙 272，305

苻铣 246

苻雄 040，041，047 ~ 050，052 ~ 054，056，062 ~ 065，071，083，095，329

苻雅 057，157，160，229，270 ~ 272，354

苻抑 272

苻懿 322

苻幼 125，226，237

苻廋 060，125，141，226～229，237，272

苻愿 049

苻珍 313

苻重 229～232，237，238，272

苻篡 320，322

G

盖钦 337

高昌 049，061，084，147，176，202，203，208，209

高盖 309，311，312，317，319

高句丽 136，140，156，230

高衡 250

高素 293

高泰 101，110，150，151，269

公孙述 010

公孙永 117，332

苟苌 152，180～182，218，219，220，270，354

苟池 148，149，181，218，219，272，273，312，354

苟辅 088，313

苟兴 228

苟曜 327

故氐道 005

光祚 125

郭褒 251，255

郭宝 160，292

郭抱 209

郭辩 147，149，269，353

郭超 241，300

郭奋 265

郭淮 019，021，023

郭黄 265

郭将 228

郭敬 051，058

郭满 294

郭庆 154，156，190，265，266，271，272

郭权 029

郭铨 222

郭韶 265

郭汜 008，019

郭倖 265

郭瑀 117，118，332

郭质 327

H

韩焯 109

韩夫人 219

韩疋 265

韩遂 007，015，016，020

韩瓮 106

韩胤 108，233，236，237

汉安帝 003

汉成帝 129

汉光武帝 096

汉国 025，026，028，030～032，035，073，074，090，126，158，185，191，193，239，257，259，266，276

汉文帝 013，070，139，267

汉武帝 002～004，010，012，014，030，083，091，092，096，118，176，207

汉献帝 083，157

郝晷 149

郝略 109

何谦之 223，224，250

盍雅 006，010

贺循 093

洪亮吉 084，085

后赵 025，028，029，030，032，035～046，048～051，058，059，061，065，067，082，090，092，099，140，160，164，

172，173，177，191，193，239，259，260，283，284，339，342～344，352

呼韩邪 164

呼延毒 050，055

胡 006，010，011，013，015，022，023，025～027，030，031，038，041，043，047，050，055，057，062，070，074，079，082，089，090，097，107，118，120，126，130，131，134，137，152，157，158，161，164，175，191～193，200，203，206，209，211～213，222，224，235，238，241，249，251，252，258～262，265，273，275，278，284，307，321，322，324～326，328，332，346

胡辩 118，332

胡彬 222，249，251，252

胡进 041

胡三省 013，025，070，126，130，131，209，238，265

胡文 043，047，057

胡阳赤 050，055

护磨那 284

怀归 013，034，329

桓冲 052，053，170，183，219，221，222，243，248，251，281，292，294，355

桓豁 165，170，183，280

桓石民 221，292，294

桓石虔 053，166，170，171，221，293，294

桓石秀 183

桓温 048，050～056，059，060，062，063，077，099，100，116，122，148～151，165～170，217，247，249，262，279，280，353，354

桓玄 317

桓伊 166，183，249，250，254，290

皇甫覆 272，273

皇甫杰 231

皇甫真 147～150，228，269

黄惠贤 130

黄烈 002，008，232，256

黄忠 016

惠生 212

惠武帝 044

慧持 344

慧永 344

慧远 344，345

J

姬澹 186

吉挹 122，221，244

吉贞 230，231

吉祖冲 122

贾摹 174

贾虔 209

贾思勰 129，131

贾玄硕 046，072，074

贾雍 085，087，096，194

湔氐道 004，007

简修伟 256

江统 005，019，022

姜伯周 048

姜飞 208

姜抚 149

姜衡 179

姜维 019，021，169

姜延 319

姜宇 272，273，310

蒋英 035

羯 025～028，031，076，077，090，137，211，236，239，246，259，267

羯族 076，077，137，239

金石生 265

金树 265

金熙 123

晋成帝 060，064，160，176

晋怀帝 060，185

晋惠帝 025，136，157，158，171，184

晋愍帝 018，158，188

晋明帝 099，172

晋穆帝 034，036，172

晋武帝 034，069，136，158，216

晋孝武帝 216，248

晋元 044，174，244

晋元帝 044，174，244

晋中宗 243，244

靳准 026

鸠摩罗什 200，201，203，206，211～213，339～342，346

沮道 021

沮渠蒙逊 213

巨虎 156

句践 245

句渠知 027

俱难 057，189，190，222～224，272

K

康回 293

康权 066，073

康盛 208

轲比能 136

可足浑氏 143，144，147，149

可足浑谭 240，302

孔明 066，099，113，246

孔特 050，051，353

寇明 319

猃胡 211

L

兰犊 322，323

郎坦 173

乐嵩 148

乐僔 342

雷定 021

雷恶地 322，326，327

雷弱儿 043，048，053，073，076，083

垒袭 293

李（牧） 112

李白 169，241，300

李辩 272～274，311，313

李伯护 220，221

李凤 148

李高 168

李广利 209

李琀 159

李弘 167，168

李怀化 341

李绩 144

李金根 167

李傕 007，019

李历 049，062，147

李蛮 298

李丕 272～274，293

李綦 100

李柔 057，190，197，220

李势 167

李寿 167

李特 024，025

李威 057，065，070，103，156，226

李雄 159，168

李偃 178～180，272，273，353

李运 159

李稚 159

李重 128

廉颇 112

敛岐 178，179，353

梁安 046，073，076

梁昶 265

梁琛 103，114，115，116，150

梁成 151，152，220，230，248，251，252，266，271～273，289

梁说 057，095，113，233，234，236，237，271～273

梁犊 032，037～039，042，043，258

梁后 076

梁济 182

梁楞 043，048，073

梁平老 057，065，066，079，103，110，112，194，271，273

梁式王 160

梁殊 061，078，181，182

梁他 253

梁悌 253

梁熙 095，112，181～183，204，213，217，220，242，271～273，317，318，354

梁勋 027

梁胤 318

梁云 252

刘备 016，020，074，099

刘表 181

刘波 183，219，221

刘粲 078

刘禅 017，246

刘春 292

刘聪 013，025，026，028，030，187

刘大 241，300

刘度 146

刘根 337

刘轨 250

刘贵 143

刘国 038

刘焕 045

刘晃 050

刘浑 173

刘靖 151

刘库仁 189，194，197

刘琨 185，187，195

刘兰 129，154

刘牢之 224，249，250，252，253，290，293～295，316

刘敏 143

刘木 302

刘仁之 131

刘卫辰 096，192～194，196，197，286

刘熙 029

刘袭 252，294

刘咸 029

刘祥 332

刘向 097

刘玄德 066

刘曜 026～029，031，032，035，078，159，172

刘胤 029

刘裕 093，255，262，278

刘渊 013，025，030，031，185，239

刘珍 050，051，353

刘知几 069，070

柳浑 224

娄敬 114

卢壶 332

卢水胡沮渠部 175，206

鲁僖公 101

陆机 111

陆抗 059

陆逐延 013

鹿嵩 265

逯钦立 335

路松多 026

掠徙 019，020，026，028，030，031，090，134，137，183，219，221，257，274，275

吕光 010，013，067，095，096，133，199，200，203，205～214，228，231，232，242，271，273，274，287，317，318，322，341，342，355，356

吕婆楼 048，057，060，065～067，079，095，099，103，110，272，273

吕思勉 076

M

麻秋 042～045，172，173，352

麻思 106

马超 007，015，016，020，021，157

马晖 182，190

马岌 172，178

马建 182

马朗 319

马腾 015

马援 010，015

马长寿 002，005，088，090

毛安之 224

毛当 169，170，218，219，222，224，272，273，295，299，302，307

毛贵 043，048，073，074，076

毛虎生 170，221，223

毛球 170

毛盛 181，192，222，224，272，273，308

毛氏 325

毛受 048

毛嵩 227，228

毛兴 233，234，236，237，271～274，317，320，321

毛璪之 223

孟高 166

孟钦 337，338

弥 013，097，113，125，153，200，201，210，211，232，236，242，307，340，348

弥寘 200，201，210

闵亮 298

慕容暐 103，116，121，122，132，139～151，153，154，156，217，218，248，251，269，271，289，295，304，305，308，310，311，319

慕容宝 297，300

慕容冲 121，240，275，304，305，309～313，319，337，355

慕容垂 111，121～126，143，144，148～150，165，217，218，222，228，235，240，247，248，251，271，283，289，294～304，308，309，314，316～319，354，355

慕容德 109，121，138，141，149，165，271，297，301

慕容凤 296，299，301

慕容翰 137

慕容恒 319

慕容泓 121，240，275，304，305，307～309，319，355

慕容桓 155，156，296

慕容皝 122，134，137～139，143，297

慕容儁 043，139，140，141，142，143，144

慕容楷 122，123，299，301

慕容恪 122，140～144，146，147，155，192

慕容麟 303

慕容令 122，123，124

慕容农 241，299～303

慕容评 120，121，141～144，147～151，153～156，228

慕容屈氏 253

慕容绍 299，300，303

慕容涉归 161，162

慕容廆 030，136～139，154，161

慕容温 303，316

慕容鲜卑 030，031，161，240，297，304，305，314

慕容宪 312

慕容永 319，320，342

慕容渊 156

慕容臧 123，142，152，156

慕容忠 319

慕容筑 151，152

慕容庄 153

慕舆根 143

慕舆长卿 147

N

南单于 085，164

南匈奴 031，184，193

牛双 306

牛夷 043，046，057

P

潘猛 272，273，292，293

庞演 306

裴元略 084，115，217

彭豹 265

彭超 222～224，272，354

彭晁 208

彭沛谷 322

彭越 057，179，180，272

平规 230，231，302，303

平睿 121，241

平幼 302

蒲光 035

蒲洪 013，034，039，040，126

蒲突 035

Q

齐桓公

齐万年 023，024，158

齐午 233，236，308

齐宣王 101

齐治平 334

綦毋滕 302

乞伏纥干（注：原文中无乞伏二字）

乞伏国仁 085，087，163，164，271，288，295，296，318，323，356

乞伏轲遥 164

乞伏傉大寒 164

乞伏祁遥 086

乞伏乾归 323，328，356

乞伏述延 164

乞伏司繁 086，164，165，271

乞伏鲜卑 089

乞伏祐邻 163，164

乞活夏点 284

乞没军邪 199

前仇池国 024，157~161，354

前凉 029，049，052，059，061，078，079，090，100，108，161，164，171~183，191，194，196，199，202，204，210，227，352~354

前秦 014，018，026，029，033，034，040，041，043，044，048~075，077，078，081~085，087~098，100，101，103，104，106~109，112，115，116，118~121，125，126，130，132~134，136，140，141，146~152，156，157，160，161，163~171，177~183，190~197，199~207，209~211，213，217~221，225~228，231，232，237，238，240，242，245，248，249，255~264，266，269，270，273，274，276，279~291，295，296，301，304，306~315，317~319，322，323，325，328，329，331~333，335~338，340~343，351~354，356

前赵 026~029，031，032，041，147，159，161，164，172，

239，265

钱凤 167

钱宗范 256

羌 002～007，009～013，015～029，031，032，035，036，038，043，046，048，057，061～063，067，073，077，084，085，089，090，103，111～113，122，125，134，147～149，151～156，158，159，162，171，172，175，178，179，189，190，192，198，200，201，206，227，229，236，238，240，242，246，248，260～262，267，270～275，306，307，310，314，321～323，328，353，354

强德 100，104

强端 018

强平 048，057，073，076

强汪 057，065，066，079，103，110

强熙 317

强永 304

乔秉 050

乔景 050，056

谯纵 295

秦天王 067

丘准 224

邱久荣 290

麴丞明 265

麴佩 174

麹儒 174

权翼 063～065，097，110，111，114，243，245，296～298，313，340，341

R

冉駹 002，003，004

冉闵 037～046，061，062，082，140，192，239，258，283，353

任权 293

戎狄 013，019，022，074，121，122，126，182，208，261

阮种 021

S

桑据 294

僧富 344

僧伽跋澄 346，347

僧伽提婆 346，347

沙漠汗 186～188

烧当羌 275，314

邵保 222～224，272～274

邵羌 179

邵兴 303

申绍 109，132，134，140，233，235

申香 284

沈充 167

沈劲 141

沈约 277，278

石苞 042，045

石斌 029

石虎 029，031，032，035~041，044，045，065，078，108，126，132，173，180，284，339，342，343

石季龙 028，038，040，041，042，046

石鉴 037，038，041，046

石琨 038，046

石朗 029，036

石勒 013，028，029，031，032，035，036，059，076，077，107，126，164，172，187，258，343

石宁 048，173

石生 029，036，265

石世 037，039

石邃 037

石宣 037

石越 028，149，150，218，219，222，231，233，236，237，243，244，245，246，271~273，288，295，299，301，302

石祇 038，044，046，061

石遵 037~039，045

时连珍 265

史暠 265

史桓豁 165，170

史桓伊 183，290

世健 034，044

释道安 083，110，339，340，343

司马保 026，027，159

司马昌明 247

司马道子 285，294

司马光 073，121，124，237，238，314

司马伦 023

司马遂 168

司马休 277

司马勋 045，049，052 ~ 054，056，168，352

司马奕 168

司马懿 017，018

司马昱 168

丝绸之路 176，200 ~ 205，207，210，212，213

斯引乌泥 164

汜援 174

宋澄 178

宋混 178

宋配 174

宋氏 332，333

宋泰 173

宋文帝 133

宋孝武帝 133

宋修 049

宋云 212

苏霸 265

苏蕙 335，336

苏峻 279，280

苏通 332

苏则 005

碎奚 163

孙恩 277，278

孙皓 217，245

孙无终 250

孙秀 024

孙祚民 256

索泮 112

T

昙济 349

昙戒 344

昙廖难提 335

昙翼 344，345

檀石槐 136

汤用彤 350

唐长孺 197

陶隐 249

田泓 223

田洛 224，250

田崧 027，159

田勰 108

田余庆 256，279

秃发树机能 023

秃发乌孤 265

屠各 026，089，240，241，300，303，321，322

屠各毕聪 241，300

吐谷浑 159，161，162，163，354

吐雷 085，164

托铎莫何 163

拓跋珪 197，198，318，355

拓跋宏 119

拓跋诘汾 184

拓跋斤 197

拓跋窟咄

拓跋力微 184

拓跋邻 184

拓跋禄官 184

拓跋毛 184

拓跋什翼犍 111，119，188，269

拓跋寔君 197

拓跋焘 261

拓跋推寅 184

拓跋猗卢 185，195

拓跋猗㐌 185

W

王粲 095

王雕 101，102，259，261

王敦 167，279

王堕 043，048，073，083

王飞 057

王抚 179

王广 272～274，293，309，320

王国宝 281

王蚝 309

王欢 117，332

王嘉 310，333，334，336 ~ 338

王翦 032

王鉴 166，168，228，229，266，272，273

王景略 102，111，112，154，246

王朗 045

王亮 061

王琳 231

王洛 115

王莽 003

王猛 055，056，066，079，083，098 ~ 115，122 ~ 126，132，136，147 ~ 157，165，170，179，180，208，225，227 ~ 229，240，242 ~ 244，259，261，265 ~ 274，283 ~ 286，303，305，315，332，333，339，353，354

王敏 319

王佩 102

王皮 104，209

王破虏 307

王羌 029

王钦卢 062，306，307

王施 220

王寔 332

王太 251

王昙之 224

王腾 233，234，236，237，271 ~ 273，303，316，317，320

王统 085，160，164，169，170，181，182，272，273，317，320，321，354

王先 232，251

王显 218，224，253，272，273

王宪 143

王晏 241

王飏 057

王永 083，272，273，275，303，316，320

王泳 253

王鱼 047，057，075

王蕴 230，231

王昭 319

王忠 265

王仲荦 051，164，232，262，350

王擢 029，049，052，056，352

韦逞 332，333

韦干 233，235

韦华 220，338

韦钟 218，221，265，266，272，273

隗文 025，167

卫操 185～187

卫瓘 187

卫平 091，320，321

卫雄 187

卫殷 265

魏敷 231

魏曷飞 198

魏褐飞 326，327

魏太武帝 261

魏孝文帝 119，120，235，263，264，315

魏延 244

闻人爽 293

乌丸 003，015，025，084，156，186，187，196，201，230，233，240，300

乌丸鲁利 300

吴起 114

吴忠 313，327

吴仲 221

武则天 336

西戎 003，005～007，009～012，015～017，034，084，124，147，161，162，201，204，205，210，353

郗超 281

悉罗腾 121

习凿齿 110，111，332，340，345，347，348

夏侯显 050

夏侯渊 008，016，017，020

鲜卑 003，013，015，023，025，026，030，031，036，084～086，089，090，097，111，112，122，125，136，140，152，156，161～163，165，175，183，184，190，193，194，196，201，206，230，231，233，236，238，240～242，246，248，259，267，275，296，297，304，305，310～312，314，319，320，323，354

鲜卑勃寒 165

项籍 114，124

萧绮 334

孝武帝 133，216，248，294

谢艾 173，178

谢安 093，224，243，248～251，279～281，292～294，355

谢尚 050，062

谢石 224，249，251，252，254，280，290

谢万 281

谢玄 166，223，224，249～254，281，290，292～294，316

谢琰 249，250，252，254

辛劲 116

辛牢 043，046，073

辛冉 024

辛恕 035

辛章 118

匈奴 025，030，031，062，084，085，096，097，112，137，147，158，162，175，182，184，186，187，192～194，205，206，233，239，240，265，286

熊邈 284

休密驮 200，201，210

宿勤崇 309

徐斌 085

徐成 153，155，160，169，266，272，273，307，308

徐磋 048

徐晃 020

徐库彭 027

徐盛 057

徐天喜 254

徐统 065，099

徐扬杰 256

徐义 342

徐元喜 251

许谦 188

轩辕 247

薛辨 108

薛翘 265

薛瓒 064，065，110，111，114

薛珍 052，054

Y

阎负 061，078，181，182

阎振 221

颜斐 021

颜肱 294

颜师古 004

羊祜 059，216

羊昙 251

阳平公 101，125，245

阳鹜 139

阳瑶 108

杨安 152，153，160，161，165，169～171，179，192，218，227，229，271～273

杨璧 105，272，273，307，308，317，318

杨成世 227，228

杨初 160

杨纂 160，161，163

杨定 311，312，317，322，323，326

杨飞龙 158

杨阜 005，015～017

杨光 170，171

杨广 224

杨轨 265

杨国 160

杨坚 027，159

杨坚头 027，159

杨驹 157

杨俊 160

杨楷 324，326

杨亮 160，168，169，221，292

杨曼 027

杨茂搜 009，016，024，027，157～159

杨猛 152

杨难 009，027，031，158～160，307

杨难敌 009，027，031，158～160

杨仆 017

杨千万 016，157，158

杨佺期 195，292，293，342

杨群 038

杨世 160，272，273

杨蜀 094

杨他 160

杨韬 027

杨统 160，161，265，272，273

杨武 009，159，160，165

杨宣 176，202

杨衒之 069，078，079

杨毅姑 160

杨膺 233，236

杨颖 209

杨贞 265

杨政 324，326

姚苌 062，063，111，120，126，134，160，165，170，171，179，181，182，218，222，247～249，270～272，275，283，305～308，310，313，314，319，321～328，337，355，356

姚崇 327

姚方成 307

姚晃 307

姚旻 325

姚硕德 321，322

姚眺 226

姚襄 043，060～067，077，078，111，120，270，275，306，353

姚兴 111，118，195，262，270，306，328，342，356

姚绪 308

姚弋仲 032，035～038，042，043，046，061，078，090，179，306

姚尹买 307

叶适 314，315

伊（尹） 114

阴充 174

阴澹 174

阴训 265

殷浩 042，050，051，055，062，076

尹车 027

尹赤 270，306

尹固 298

尹嵩 307

尹万 171

尹纬 111，269，270，306，307

尹详 306

游钦 295，307

游子远 027

余和 241，300

余蔚 156

鱼遵 047，048，057，066，073

虞义者 334

庾翼 054，217

垣敞 233，235

袁瑾 165，166

袁真 165，166

原绍 246

悦绾 107，145，146

Z

臧质 261

翟斌 156，235，241，299～301，304，355

翟真 304

张宾 107

张豺 038，039

张袒 265

张崇 222，272，273，293，303

张甸 198

张夫人 246，255，313

张纲 093

张瓘 178

张光 009，158，159

张轨 117，171，172，174，175，177

张蚝 067，111，152，153，155，166，168，189，190，197，222，227，248，254，272，289，290，295，303，316，317

张贺度 046

张弘 049

张既 008，017

张靖 059

张琚 029，045，048，049，173

张举 039

张骏 031，036，172，174，175，177，202，203

张鲁 003，005，008，016，020

张茂 031，172，173，174

张平 049，062，063，067，068，147，271，286，353

张乾 306

张悛 173

张沈 038

张寔 172，173

张世龙 322

张天锡 178～183，206，249，254

张威 159

张尉 018

张五虎 272，292

张郃 016，020

张先 047，048

张骧 241，300

张玄 061，178，179，250

张玄靓 061，178，179

张延 241，300

张晏 319

张耀灵 178

张嶷 018

张邕 178

张育 170，171

张遇 049，050

张越 174

张忠 336～338

张重 044，049，052，056，171，173，176，177

张重华 044，049，052，056，173，176，177

张祚 177，178

掌握 182

赵敖 311

赵宝 220

赵晁 265

赵充哲 182

赵掇 127

赵诲 060，079

赵俱 043，046

赵琨 049

赵迁 190，272～274，293

赵秋 241，300，302

赵泉 070

赵韶 060，079

赵盛 248

赵统 037，292

赵文润 256

赵阳台 336

赵曜 306

赵逸 069

赵翼 234

赵赞 230，231

赵长 170

赵振 265

赵整 095，115，236，242，261，285，335，346

徵 013，025，026，220

智通 063

中绍 150

钟会 169

周楚 167，168，169

周抚 167，168

周俊 058

周伟洲 161，265

周虓 121，122，169，170，208，209，244

周亚夫 267，268

周增义 256

周仲孙 167，170

朱绰 129，221

朱辅 165，166

朱肜 095，096，114，118，119，125，160，169，170，189，190，243

朱序 168，183，218～221，249，252，254

朱嶷 156

诸葛侃 250，252

诸葛孔明 066

诸葛亮 017，021，099

竺法汰 344

竺佛念 346，347

竺僧朗 339，341，342

竺瑶 170，171

邹瓮 127

祖逖 054，059

祖约 279，280

左慈 3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秦史/蒋福亚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8

（十六国史新编）

ISBN 978-7-5201-6282-1

I.①前… II.①蒋… III.①中国历史-前秦 IV.①K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9850号

·十六国史新编·

前秦史

著者/蒋福亚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高振华

文稿编辑/杨木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1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2.125 字数：273千字

版次/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282-1

定价/7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十六国史新编

【汉赵国史】 周伟洲 著
【五凉史】 赵向群 著
【前秦史】 蒋福亚 著
【后秦史】 尹波涛 著
【南凉与西秦】 周伟洲 著
【成汉国史】 高 然 范双双 著
【后赵史】 李 圳 著
【五燕史】 赵红梅 著
【赫连夏国史】 吴洪琳 著

装帧设计 Telephone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氐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建立前仇池国、前秦、后凉、后仇池国等政权，后来逐渐与汉族融合。前秦的建立及统一北方，无疑是氐族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

本书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既深入探索了少数民族建国史的一般规律，又准确把握了前秦兴衰的特征。全面论述了前秦政权兴衰的全过程，弥补了十六国史研究的多处空白。

《前秦史》在王仲荦等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重大的突破，从而将十六国史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的阶段，这在学术界当然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

——朱大渭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世间之盐品牌微信



定价：78.00元



十六国史新编

丛书主编／周伟洲



成汉国史

高然　范双双　著

李氏家族　李特入蜀　流民起义　巫觋文化　板楯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高　然

吉林省吉林市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中国古代史。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唐史论丛》《西北民族论丛》等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各类项目多项。

范双双

吉林省白城市人，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发表学术论文数篇，主持、参与各级各类项目多项。



丛书主编／周伟洲

成汉国史

高然 范双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成都金堂出土成汉墓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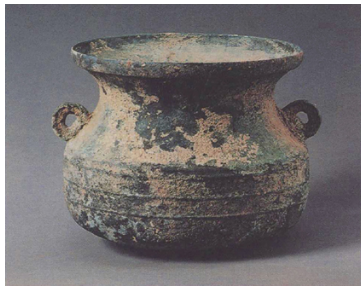
成都浆洗街桓侯巷出土成汉陶俑



成都金堂成汉墓出土铜“军司马印”



汉兴钱



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出土铜釜（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群》，《考古》2007年第10期）



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出土铜锅（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群》，《考古》2007年第10期）

总序

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316～439）[1]，虽然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就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如在唐代魏徵等撰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列遗存的“霸史”共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中，就有二十六部十六国国别史。其中，最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可惜以上诸书均先后散佚，只是在唐宋时期编纂的各种类书及其他史书中，有上述霸史的一些辑文。[2]

由于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五胡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隋唐以后的历代史家，认为十六国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十六国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中国历史，对十六国也着墨不多。加之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及隋以前有关十六国的史书，均先后散佚，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极为困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创了中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更加深入，十六国史论著也不断问世。加之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古籍，重新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十六国的国别史。

我们这套“十六国史新编”丛书，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或正在撰写的一批十六国国别史中，选出其中学术水平较高、大致符合国别史体例的著作编辑而成。主要包括下列著作：

1.《成汉国史》，高然、范双双著；2.《汉赵国史》，周伟洲著；3.《后赵史》，李圳著；4.《五燕史》，赵红梅著；5.《前秦史》，蒋福亚著；6.

《后秦史》，尹波涛著；7.《赫连夏国史》，吴洪琳著；8.《南凉与西秦》，周伟洲著；9.《五凉史》，赵向群著。

以上九部著作大致涵盖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十六个国家（政权）。之所以称之为“新编”，则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以上九部著作均在尽可能收集整理有关史料及参考古今有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完全摈弃了过去封建史家的正统论及民族歧视和不平等等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评述十六国历史。

第二，从前封建史家所撰十六国史，仅注重该国的政治事件、军事及与邻近各族所建政权的关系，而“十六国史新编”还加强了对十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包括宗教信仰）及民族的认同、迁徙及融合等方面的论述。

第三，“十六国史新编”还特别注意吸取文物考古的新资料，以及中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四，“十六国史新编”采取现代通行的专著体例和形式，用章节目的体例撰写并详加引文注释，最后附有大事年表、索引等。

由于“十六国史新编”有的撰写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如《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前秦史》），距今已过去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国内外有关五胡十六国史的研究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众多的新成果问世。如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三崎良章撰《五胡十六国的基础研究》（汲古书院，2006）及氏撰《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东方书店，2015年第三版）、五胡之会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等等。中国学者赵丕承编著《五胡史纲》（艺轩图书出版社，2000）、刘学铫撰《五胡史纲》（南天书局，2001）、陈勇撰《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贾小军撰《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及氏撰《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陈琳国撰《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商务印书馆，2010）及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咸阳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郭永利撰《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民族出版社，2012）等。而这些研究成果，上述十六国国别史则已不能参考引用，只能保持其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成果及特征

了。

其次，新编的九部十六国国别史，是由近十位作者撰写的，因此各书在体例、文字、着重点上，均与各个作者的专业、学养、经历等有关，故各书体例、内容的取舍、文字等各方面不尽相同，各具特色。

再次，有关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近二十余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一些与“十六国史新编”相左，甚至有相反的观点。[3]这应是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正常现象。我们保留“十六国史新编”中的观点和结论，以期引起中外学者的讨论和争鸣。

最后，感谢“十六国史新编”的各位作者，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欣然决定出版此套丛书。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2019年1月30日

[1] 大致相当于西晋灭亡至北魏灭北凉，统一整个北方的时期，即公元316年至439年。

[2] 参见〔日〕五胡之会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

[3] 比如仅关于最基本的“五胡”“屠各”“羯胡”“拓跋”“护军制”“汉化”“胡化”等概念，学界均有不同的解析。

- 绪论
- 〖第一章〗 李氏族属与早期发展
    - 一 李氏族属
    - 二 李氏的早期发展
- 〖第二章〗 流民入蜀与李氏建国
    - 一 流民入蜀
    - 二 李氏与赵廞的分合
    - 三 李氏集团与罗尚的争斗
    - 四 建号改年后的发展
    - 五 李流领导下的六郡流民
- 〖第三章〗 大成政权兴衰
    - 一 李雄建国
    - 二 大成政权的发展与鼎盛
    - 三 李班、李期的短暂更迭与大成政权的衰落
- 〖第四章〗 汉政权的兴衰
    - 一 由成到汉与李寿治国
    - 二 汉政权的衰亡
- 〖第五章〗 成汉政治
    - 一 政治制度
    - 二 疆域与政区
    - 三 成汉国家认同构建
- 〖第六章〗 成汉社会经济、文化与民族
    - 一 成汉经济
    - 二 成汉文化教育
    - 三 成汉民族问题
- 〖第七章〗 成汉政权兴亡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 一 兴亡原因
    - 二 成汉国家特点与历史影响
- 附录
    - 一 成汉大事年表
    - 二 李氏家族世系、婚姻表
    - 三 成汉人物、出身、职官表
- 主要参考文献
- 索引
- 后记

绪论

成汉（304～347）为两晋十六国时期流民李氏集团在巴蜀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也是这一时期第一个少数民族割据势力。成、汉虽为两个国名，但均为李氏家族所建，且在制度、疆域、经济、文化各方面前后相承，故多一并视之。

成汉史研究历来为治西南历史，尤其是巴蜀区域历史者所重，但因其资料稀少和较为零散，故成果总量并不多。总的来看，对成汉政权及李氏集团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目前已有专著1部、论文40余篇。其中杨伟立《成汉史略》一书是最为系统的成汉国别史著作，但一如书名所示，全书以叙为主，且叙述较为简略——字数不足8万字，整体分析深度不足。杨伟立更早的《賨人建国史略》一文也是如此。[1]而在魏晋南北朝断代史、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专著中也都会涉及李氏流民集团与成汉历史，但也多以一般描述为主。[2]

专门的成汉研究则主要有流民起义及成汉政权性质问题，李氏族属与成汉治理问题，汉化与成汉兴亡、特点问题，宗教、文化问题，以及对成汉相关考古发现的简报及研究等。[3]总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70年中，成汉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目前的研究集中在道教与李氏、成汉关系问题，李氏与成汉发展、汉化问题，成汉政权的区域开发问题，以及早期研究中的李氏流民起义与成汉政权性质四个方面，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很少有成果将成汉政权放回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大历史背景中做全面的、有深度的分析。成汉作为较早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其内外交织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如流民与政府矛盾，社会、民族、文化矛盾，外来群体与巴蜀地方豪强矛盾，巴蜀地区新旧“移民”矛盾，巴蜀区域与全局关系矛盾等。在这种矛盾交织的复杂环境中，李氏集团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了各方面的调整，这些措施既有符合两晋十六国整体社会特征的共性一面，也有适应西南区域独特性的一面，这就需要将成汉

历史放在时代大背景中加以深度解读。

二是目前的成果中单一性研究较多，综合比较分析较少，这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将成汉与同时代其他“相似”“相异”政权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的较少；第二，将成汉政权内部各利益集团、各民族、文化群体之间加以综合比较分析的较少；第三，将成汉发展中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加以综合分析的较少。

三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相对单一也是目前成汉研究难以突破的影响因素之一。以往大多从历史学角度对成汉政权加以“传统研究”，[4]而要在传统文献史料[5]基础上寻求突破，就需要借助多学科——如与历史学关系较为密切的考古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多视角的解读，为成汉历史研究打开出路。

本书即基于以上对于成汉历史研究情况的认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重新书写一部较为完备的成汉国史，以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1] 杨伟立：《成汉史略》，重庆出版社，1983；《賨人建国史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80年第3期。

[2] 此类专著较多，如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等，在此不再赘举。

[3] 相关研究可参见范双双、高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成汉史研究述评》，《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4] 这一点在大陆以外学者的研究中也存在，相关研究可参见台湾学者黄繁光《成汉的兴亡》（《史学汇刊》第6卷），日本学者狩野直祯《五胡时代の豪族——巴蜀の豪族と成汉国》（《历史教育》1966年14-5）、船木胜马《魏书賨李雄传杂考》（《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1992年37）等。

[5] 因成汉政权存续时间较短，故相关考古资料并不多，可在成汉历史研究中有突破影响的就更为稀少了。

〖第一章〗 李氏族属与早期发展

李氏为出身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的少数民族。在成汉建国前，李氏集团自汉至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其群体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对李氏入蜀、建国，以及其后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李氏族属

李氏一族的族源、族属多部史书均有记载，但其内容略有不同。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载：

> 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氐”。[1]

《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记曰：

>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其人，口岁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迁略阳……所在号为巴人。[2]

《魏书·賨李雄传》与《太平御览》所引基本相同：

> 賨李雄，字仲俊，盖廪君之苗裔也。其先居于巴西宕渠。秦并天下，为黔中郡，薄赋其民，口出钱三十，巴人谓赋为“賨”，因为名焉。[3]

《晋书·李特载记》记为：

>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4]

从以上说法来看，李氏族属大致有巴（巴氐）、賨、廪君蛮三种。现对其分别加以分析。

首先是巴人（巴氐）。从涉及巴人的《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晋书》几段记载来看，这里谈李氏为“巴”并非谈其族属，更多的是指地域概念——巴地、巴西之人。《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以李氏等人自巴西宕渠迁到略阳，故“所在号为巴人”，明显以所来之地加以称呼；《晋书》所记同理，只是记其自巴西宕渠迁入汉中杨车坂，即被称为“杨车巴”，是李氏等到了汉中等地以后，被冠以旧籍贯以与本地人或其他地区迁入者相区分，并非谈其族属。

而史籍中的“巴氐”这一称谓比较奇特，目前学术界有据此持李氏为

氏人观点者[5]，也有以“巴氏”为一新群体者[6]，另有以“巴氏”为巴、氏混称者[7]。其实“巴氏”一词的使用有两种情况，一是前引李氏一族被称为“巴氏”；二是李氏军事集团被称为“巴氏”，如《华阳国志·大同志》中提到谯登、文石、张罗等人对李氏集团构筑起军事防线以后，有“巴氏那得前”之语。这两种使用情况应该分别加以探讨，但以上各家都没有针对这两种不同使用情况分别展开论证。张泽洪则对“巴氏”有较为全面的辨析，在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史籍中出现的“巴氏”一词后认为，史籍中巴人和氏人并称是很普遍的，“《华阳国志·大同志》中之‘巴氏’，本是巴人和氏人的并称，但由于成汉政权系巴人李氏建立，后世史家误以为‘巴氏’即指‘巴人’，故《魏书·李崇传》，《晋书》之《李特载记》《刘曜载记》述及巴人活动时皆误作‘巴氏’。将‘巴人’记作‘巴氏’，纯系史书误笔”[8]。指出了“巴氏”本来是巴、氏并称的一种惯例，但在此后史书传抄过程中存在将“巴人”写为“巴氏”的疏误，最终以讹传讹，给后来的认定带来麻烦。张泽洪对“巴氏”史料搜集较为完备、辨析清楚，应可采信。[9]

此处在张泽洪论证的基础上再略做申论。其一是李氏族属的“巴氏”。《十六国春秋·蜀录》资料来自常璩《蜀书》，与《华阳国志》同源。而《十六国春秋》中此处作“巴人”而不作“巴氏”，实与《华阳国志》旧刻各本[10]相同。就此来看，《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中旧刻“巴人”应该是对的，任乃强依据《华阳国志·大同志》不同语境记载中出现的“巴氏”，以及更晚的《晋书》中的“巴氏”而将此处直接改为“巴氏”是比较牵强的。其二是李氏军事集团的“巴氏”。从时间点来看，《华阳国志·大同志》中“巴氏”称呼的出现正好承接魏晋氏人迁徙、分布到“陇右的天水（即汉阳）、南安、广魏（即略阳）三郡”[11]，李氏等巴人迁徙进入略阳等地，二者混居之前并无“巴氏”的说法。且从李氏军事集团构成来看，其中也包括了大量氏人。以“巴氏”来称呼李氏军事集团，应是将首领之巴人李氏和集团中大量氏人并列的说法，而非突然出现之新族。就“巴氏”将李氏认定为巴人氏化则显得证据不足。[12]

综上，《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出现的“巴人”其实不误，各书对李氏族属的描述中应该只称其为“巴人”，故《华阳国志》中有“复号”字样，即针对其旧号“巴人”而来，《晋书》的记载实为史书误笔。其他各处出现的“巴氏”则为巴人、氏人群体合称，指代李氏军事集团，是带有蔑称性质的，而非单指李氏。

其次是賨人。賨也并非专门的少数民族族称，而是对某一与中原王

朝关系特殊群体的描述，是在黔中郡地区缴纳赋口岁四十钱的人群，因巴人称“赋”为“賨”而被称为賨人。而缴纳賨税的并非只是单一少数民族，应是包括这一地区的众多族群；缴纳賨税的人群也绝非全部被称为賨人，如江玉祥即指出缴纳賨赋之人并非尽谓賨人，盘瓠之裔的武陵蛮（五溪蛮）虽纳賨赋却不称賨人。[13]因此，賨也并非族称，而是指缴纳賨赋人群中居于黔中郡的一部分。

最后是廪君苗裔。廪君苗裔的说法较为普遍，也是对李氏族属的直接描述。而廪君蛮的来源，较为清晰的记载最早见于《世本》：

> 巴郡南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
> 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14]

巴郡南蛮亦写作巴郡南郡蛮或巴蛮，即以巴郡为中心，以巴、樊、瞫、相、郑五姓为主的蛮族，崇拜始祖廪君，故也被称为廪君蛮；在此之前则出于“巫诞”。对于巫诞，徐中舒认为：“巫是地名，诞是族名，诞今作蜑，蜑就是水居民族。他们习惯居住在大水两岸，所以《后汉书·板楯蛮传》说：‘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15]从廪君集团以乘土船决定首领人选，并且乘船从夷水到盐阳（今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境内），占据夷城发展壮大等情况来看，其为依托大水的水居民族“蜑”的说法较为准确。但同时古籍的记载又带来另一问题，即廪君蛮与紧邻的板楯蛮关系。对此问题认识产生了诸多分歧。[16]

关于板楯蛮，《华阳国志》较早地记载了其情况，《华阳国志·巴志》曰：

>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煞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

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

> 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侯。故世谓"三秦亡，范三侯"也。目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17]

从这段记载来看，板楯蛮因缴纳賨赋而称賨民，世号白虎复夷。文化上有长于射虎、擅长"巴渝舞"等特色，这也是较为符合李氏长于射猎等特征的。姚薇元认为賨民"即汉世之板楯蛮夷也"。[18]任乃强即指出賨与板楯为一个民族，不过巴郡、巴东人称之为板楯，巴西人称之为賨耳。[19]而在各段记载中，廪君蛮并无缴纳賨赋的说法，其承担的义务记载为：

>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20]

可知李氏族属记载中同时出现的廪君蛮和賨人板楯蛮实为两个不同的群体，这一情况导致学者在认定廪君蛮与賨人板楯蛮关系之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认为两者同族的，如陈寅恪认为巴族依杜君卿《通典》，即南蛮中廪君一种。杜氏用《后汉书》文，除其神话一节。《后汉书》中巴郡、南郡蛮事、神话采自《世本》。《通典》唯"巴梁间诸巴皆是也"一语为《后汉书》所无，乃杜氏依其民族姓氏及地域之名考证所得之结论，宜可信从也，也可与《晋书·李特载记》《魏书·賨李雄传》参证。晋、魏二书之文当俱源出《十六国春秋》，《十六国春秋》已失传，但崔鸿、魏收之书俱北朝著述，其作者之环境及资料既同，书中巴族之定义自无差别。若复取《通典》论断之语相参校，益信君卿所说为不谬也。[21]章冠英认为"廪君蛮、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僰人、巴氏，都是一个民族的不同称呼。按该族传说中的始祖，则称为廪君蛮；……按使用的武器，则称之为板楯蛮"。[22]任乃强认为二者为同源异流者。在巴国已经建成，或其已就灭亡之后，有巴族率五姓民东逾武落钟离山，入居于夷水

地区。其道向东，渐远巴地，流向在楚，与奠居巴境而北徙之賨民为背驰异趣之巴民两支。廩君之后徙居荆湘，被称为“蛮”；賨民之北徙者多在关陇六郡，被称为巴氐。[23]

江玉祥认为否认廩君蛮、板楯蛮同为一族的论据主要有三：第一，发源地不同，一在清江（夷水），一在嘉陵江（渝水）；第二，姓氏不同，巴有五姓，板楯蛮有七姓；第三，传说信仰不同，一为拜虎，一为射虎。但江氏考证姓氏之间的差别，认为巴族的姓是大姓的姓，代表一种部落组织，每一个大姓就是一个部落。巴氏统治其余四姓，不过是一种部落联盟形式。秦汉以后姓氏合一，秦汉以后的姓即先秦的氏，秦汉板楯蛮七姓实际是七个世袭大家族。两者时代不同，秦汉板循蛮七姓与巴族五姓不能比较，更不能作为賨人（板楯蛮）的族属特征。关于巴人崇拜白虎问题，白虎可能是原始巴人氏族的图腾崇拜，进入春秋战国后的巴国时代，这种“以人祠焉”的白虎崇拜就消失了，仅从铜器上的虎纹和铜虎雕塑看，想象猜测那或许是远古白虎崇拜的孑遗。而秦汉时期的板楯蛮“以射白虎为业”，则是一种射猎生产方式。这种射猎生产方式同于僚人，《说文》犬部曰：“獠，猎也。”故晋至隋唐一些文献上賨人（板楯蛮）又有僚称。而主张巴族（廩君种）和賨（板楯蛮）是两种民族者又常引两条史料。《三国志·武帝纪》：“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文选》卷44“陈琳”：“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以上二者并列，应为两族。但此说亦可解释，《资治通鉴》卷67“建安二十年”条胡三省注：“杜濩，賨邑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据板楯蛮渠帅有……七姓，不输租赋，此所谓七姓夷王也。其余户岁入賨钱，口四十，故有賨侯。”所谓巴夷，就是巴七姓夷王的部曲，而賨民即賨侯下属“岁入賨钱”的賨人，只是板楯蛮内部的阶层不同，并非两个民族。[24]此类观点在学术界较为通行。

另有学者认为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如童恩正认为从古至今不少研究者将巴族（廩君种）和板楯蛮（賨）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这两种民族发源地不同，一在清江（夷水），一在嘉陵江（渝水）；姓氏不同，巴族有五姓，板楯蛮有七姓；传说信仰不同。且廩君的记载最早见于《世本》，但《世本》中并无“板楯蛮”的痕迹。以后在《后汉书》中虽然既有“廩君”又有“板楯蛮”，但二者是分段记载的，从全文体例看明显是指两种不同的民族。正式将二者混为一谈的，是北齐时撰的《魏书·李雄传》和唐初的《晋书·李特载记》。以后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书又沿袭了这个错误，以讹传讹，影响于今。[25]杨伟

立又指出在东汉末年，巴与賨的区别还是清楚的。賨人于秦时称夷，汉后以赋而称賨。[26]陈连庆又提出二者对政府租税负担不同，说明彼此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晋书》之所以混淆，是因为至西晋时期二者已经逐渐融合，且板楯蛮北上、南下，与廪君蛮、氐族之间不易划清界限。[27]类似观点还有程刚等的研究。[28]

任乃强认为其间的误解在于，所谓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即秦昭王时为害四郡之白虎，“廪君之裔，即鄂西施南盆地之古‘夷族’。自称其是白虎后裔者，或即以白虎为图腾。其人本巴王之支族，于巴国亡后，曾屡图复国，叛于黔中，侵扰巴、汉、蜀郡。卒为忠顺于秦之賨民合力击败，乃遁走入楚，为‘巴郡南郡蛮’。巴人不能详传其故事，但喻为射杀白虎。若其如此，则‘白虎复夷’与‘白虎夷’恰为对立之两种民族。白虎复夷为板楯，为賨民。白虎夷，则巴族遗裔之称也”[29]。

此外又有鲁西奇对整个“蛮”族系统的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也认为廪君、板楯蛮即便有某种联系，也绝不可能同属一族。[30]

关于这一问题，最早的《世本》仅见廪君蛮，且无早期发展的准确时代。此后的《水经注》《后汉书》《通典》等均采用这一说法。而其与内地的联系是到了《后汉书》中才有所记载，为秦并巴中以后廪君蛮与秦建立了臣属关系。板楯蛮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对于其祖先的记述始于秦昭王，因为秦解决虎患而得以与秦订立盟约，秦汉以后因赋税而被称为賨人[31]，因常用板楯而被称为板楯蛮。另从史籍年代来看，最早《后汉书》中确是分列二者，除将二者同列于《南蛮传》中之外，并未直言二者联系为何。而此处并二者为蛮，更应该是如其文中所引《礼记》“南方曰蛮”这类将南方少数民族统称为“蛮”的一种模糊民族认识，绝非有细致的考证。[32]将两者混为一谈的，最早见《太平寰宇记》引《晋中兴书》：

> 流江县，……本汉宕渠地，……故賨国城，在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晋中兴书云：“賨者，廪君之苗裔也。巴氏之子务相乘土船而浮，众异之，立为廪君，子孙布列于巴中。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其赋税，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后佐高祖平定天下。善歌舞，所谓巴渝舞也。”[33]

即将两段史料简化后捏合为一段。此后在崔鸿《十六国春秋》和魏收《魏书》中均与此相类，而二书均是北朝著作，前书成于北魏末，后书成于北齐，时间相去不远，且文字写法一模一样，可知其当有共同的

史料来源。此后《晋书》则先书廪君蛮完整传说，但省略与中原建立联系之事，又省略板楯蛮早期射虎之事，直接接续賨人得名、“巴渝舞”等内容，实为《晋中兴书》所记内容的“扩编版”，更将二者为同族的认识确定下来。因此，对于其同源同族的认识更多来自各史籍对不同史料的捏合并用。

总之，如果从地域来加以确认，李氏出自巴西宕渠是较为确定的，板楯蛮居地以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市）为中心，廪君蛮居地则以黔中郡盐阳为中心，在地理上李氏与板楯蛮相近。从时间线索上看，廪君蛮与板楯蛮事前后相继，除《后汉书》记载廪君蛮时有“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一句之外，二者并没有时间交叉，賨人板楯蛮所处时代明显与李氏出现更近。此外，板楯蛮与廪君蛮在对中原王朝负担的责任义务、本身的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记载也截然不同，李氏文化特质则更接近板楯蛮的长于射猎、骁勇善战，而没有清晰的水生民族属性。以此来看，李氏更应出自賨人板楯蛮系统。但廪君蛮与板楯蛮之间究竟渊源如何，观南北朝时期之人的认识即已混乱不堪，可知目前是难以得出确定结论的。

除了以上所论之外，对于賨人族属，另有王尧考证认为“賨”的发音在藏语中有贸易、商务、交换等意思，故可理解为賨人以土特产缴纳赋税，并进行生活交换，由于他们称这种交换为“賨”而被称为賨人。实际上，这部分少数民族就应该是原来居住在四川境内北部和东北部的藏族。青海亦有“賨”的踪迹，古代“賨”人后裔又分布到滇西北，和四川境内藏族同出一祖先、同一来源。賨人就是居住在川北、川东北一带的古藏人，而賨王就是藏王。[34]但仅凭一个“賨”的发音和内涵相似——且是以藏语发音来对应现代汉语发音——就判断其为古藏人似乎过于牵强。而且賨人见于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川北、川东北分布的更可能是氐羌，双方地域接近，故可能有所交往，但双方为不同民族群体则是较为明确的，不宜混为一谈。

二 李氏的早期发展

李氏祖居巴西宕渠，东汉末年张鲁据汉中（今陕西汉中市东），带来李氏第一次迁移。张鲁本为五斗米道首领，以其母沟通益州牧刘焉而得到刘焉信任。东汉兴平元年（194）刘璋代立后，与张鲁决裂，张鲁以部曲多在巴地，就势袭取巴郡，开始在汉中建立割据势力。张鲁在汉中地区以五斗米道行教化，辖区形势较为稳定，故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乱局中吸引了大量人口逃往汉中避祸。又因张鲁为道教领袖，賨人信奉巫术，故也吸引了賨人流入汉中依附张鲁，其中即有李氏一族。其地当汉中杨车坂，賨人于此地抄掠百姓、行旅，被称为“杨车巴”。

张鲁在汉中统治近三十年，随着南北形势的发展，也开始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官渡、赤壁之战后，曹操开始主要经营北方，为了进一步巩固后方，必须统一关陇，进而夺取汉中、进击巴蜀。而此时关中各方力量名义上仍为汉臣，曹操就势以讨伐张鲁、夺取汉中为名兵进关中，此举引来关中割据力量反抗。到了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基本平定了关陇地区，进兵汉中也就提上了日程。此时刘备也取得了益州，汉中作为南北枢纽的地缘价值更为凸显，成为曹、刘争夺的焦点。为了防止刘备先取汉中、威胁关中，曹操此年即遣十万大军进攻张鲁。张鲁退往賨人聚居的巴中，但賨人酋长朴胡、杜濩等相率归附曹操，导致张鲁于十一月被迫投降曹操。刘备以曹操威胁益州，随即派遣黄权出兵三巴，击平巴东太守朴胡、巴西太守杜濩、巴郡太守任约。曹操又派遣张郃进军宕渠，但被张飞所破，退回南郑（今陕西南郑东），曹操留夏侯渊驻防汉中，自己回归邺城。汉中对于刘备十分重要，“若无汉中，则无蜀矣”[35]，故曹操退走的第二年（建安二十二年）冬，刘备即出兵汉中。到了建安二十四年正月黄忠击杀夏侯渊以后，曹操即将汉中军队全部撤出，退回长安。

就在曹操平定汉中后不久，李虎即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五百余家归附曹操，被封为将军[36]，并迁徙到略阳（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东北）居住，被称为“巴氐”，这五百余家的规模应该是此后李氏集团活动的核心。李氏等大量賨人被迁往关陇，主要是曹操为了消弭、降低张鲁在汉中的影响——这种区域影响力从賨人以宗教原因投附张鲁，张鲁在无路可去之时投靠賨人酋长等行为可见一斑。李虎受封何种将军职不详，根据其子职官来看应该也是少数民族武职。与李氏集团

一同迁徙到陇右、三辅、弘农等地的有一万余家，这些人成为此后流入巴蜀地区支持李氏建国的流民主体。李氏在陇右发展的具体情况不明，但其作为賨人领袖的地位应没有太大变化，甚至影响力更为膨胀。李虎之子李慕为东羌猎将，此职为东羌校尉属官，为领兵武职，其出任猎将应与賨人（板楯蛮）尤善弩射的特征有一定关系。而此处提到东羌应为羌人分化之东部群体，“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37]。东羌校尉即掌管居于雍、秦、梁等州羌族事务，李氏所居略阳以地理来看，即在东、西羌之间，是魏晋统治者以李氏集团出身少数民族，又骁勇善射，故将之作为控制东羌的工具。

到了李氏第三代，李慕有五子，李辅、李特、李庠、李流、李骧，史载李慕诸子“皆有材武，善骑射，性任侠，州党多附之”[38]。其中尤其以李特最为突出，“少仕州郡，见异当时，身长八尺，雄武善骑射，沈毅有大度”[39]。李特仕州郡何职不详，但以其三弟李庠“仕郡督邮、主簿，皆有当官之称。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后以善骑射，举良将，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举秀异，固以疾辞。州郡不听，以其名上闻，中护军切征，不得已而应之，拜中军骑督。……以洛阳方乱，称疾去官”[40]，四弟李流“东羌校尉何攀称流有贲育之勇，举为东羌督”[41]等情况来看，应该也与此督邮、主簿、东羌督，乃至其父东羌猎将等类似，主要为地方下级文武职。

此后李氏一族在关陇地区生活了近百年，其与巴西宕渠的联系逐渐淡漠，而与关陇各郡中下层士人地主的文化、心理更为贴近，这为李氏后来一系列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483页。（以下所用除特殊标明之外，均为任乃强校注本，故只注为《华阳国志》）

[2]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特》，上海书店，1985。

[3] （北齐）魏收：《魏书》卷96《賨李雄》，中华书局，1974，第2110页。

[4]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中华书局，1974，第3021～3022页。

[5] 如刘扬《浅析成汉的汉化》（《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直接以成汉为氐族政权。

[6] 如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323页）、程刚《巴氐人的起源与成汉政权的建立》（《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等直接把巴氐作为一族称。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缪钺全集》第一卷（上）《冰茧庵读史存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321页〕、周伟洲《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等以“巴氐”为巴人而氐化者。

[7] 如姚薇元认为李氏为巴西賨民，“载记所谓杨车巴及巴氐者，乃李氏徙居汉中及略阳时，他族所加之号，非其本名”，以李特属氐族为误〔《北朝胡姓考》（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第379页〕，认定李氏为巴人，而巴氐的出现是其他人对李氏所加他称。周一良也赞同姚薇元的观点，认为“巴人为确，《晋书》作巴氐者误，后世史家更有径目李氏为氐族者，更不妥矣”，“所谓巴氐，盖是魏时习用之混称，亦可能是巴人之误，因上洛乃巴人聚居之地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李氏称巴氐”条，中华书局，2007，第116页。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时观点同于周一良前一说法，认为巴氐“谓与氐族杂居之巴人”。（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第361页【三】。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中认为所谓巴氐，是关中动乱之时，“此辈流民子孙又复流还蜀地，则已不称賨民而称‘巴氐’。《大同志》‘巴氐那得前’，是蜀人称流民军为巴氐也”，也认定巴氐为后出之他称，但同时又认为《晋书·李特载记》所称“巴氐”即应来自《华阳国志》。由此认定旧刻《华阳国志》中的“巴人”当是巴氐之伪。《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5页注①。按：任乃强又认为流民中则包括“六郡大姓”和“氐叟”，而所谓六郡大姓“皆巴氐也”，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这又与周一良所提出的巴氐为巴人之误正相反。

[8] 张泽洪：《“巴氐”辨疑》，《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

[9] 如杨铭《氐族史》书中即用其说。《氐族史》，商务印书馆，2014，第37～38页。

[10] 参见《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5页注①。

[11]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3页。

[12] 李氏文化特征、李氏军事集团构成及其与氐族关系见后论。

[13] 江玉祥：《賨人与賨国——宕渠历史文化散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4] 分见（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王谟辑本，第16页；张澍稡集补注本，第79页。

[15] 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载氏著《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第1037页。

[16] 如王万隽即总结道：“廪君蛮、板楯蛮和賨人等究竟是同一民族还是不同族，又或是同一族的不同支系，则在学界之中各有各说，争论不休。”《秦汉魏晋安南北朝

时期的蛮族研究综述》，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中华书局，2011，第224页。

[17] 《华阳国志》卷1《巴志》，第14页。

[18]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第380页。

[19]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5页注①。

[20]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2，第2841页。

[21] 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一、2009年版二，第80~81页。

[22] 章冠英：《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变动中的廪君蛮》，《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23]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6页注①。

[24] 江玉祥：《賨人与賨国——宕渠历史文化散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5]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第45~46页。

[26] 杨伟立：《成汉史略》，重庆出版社，1983，第1~4页。

[27]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209页。

[28] 程刚：《巴氐人的起源与成汉政权的建立》，《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

[29] 任乃强：《华阳国志》卷1《巴志》，第15页注④。

[30] 鲁西奇：《释“蛮”》，《文史》第三辑，中华书局，2008。

[31] 此处具体得名时间各书记载不同，《后汉书》记为汉高祖定三秦以后征收賨钱，《通典》同于《后汉书》；《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魏书》则记为秦并天下以后即征收賨钱，《晋书》《太平寰宇记》等同于《十六国春秋》。以各书来看，《后汉书》成书于五世纪中叶左右，《十六国春秋》成书于六世纪初，《后汉书》成书在前，且范晔为南朝刘宋人，崔鸿则为北魏人，巴蜀地入刘宋，故范晔记巴蜀之事应更准确。

[32] 鲁西奇：《释“蛮”》，《文史》第三辑，中华书局，2008，文中有较为细致的辨析，可参看。

[33] 《太平寰宇记》卷138《山南西道六·渠州》，中华书局，2007，第2694~2695页。

[34] 王尧：《賨王封号考》，《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

[35]（晋）陈寿：《三国志》卷41《杨洪传》，中华书局，1959，第1013页。

[36] 与李氏同迁关陇者，《华阳国志》记为“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第483页），《资治通鉴》记为“李氏将五百余家归之”，《华阳国志》所列众人应为这五百余家的首领人物。《太平御览》记为“内徙者亦万余家，散居陇右诸郡及三辅、弘农”，应指灭张鲁以后整个迁移人口行为，不限于李氏众人。

[3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2，中华书局，1956，第1689页。马长寿对于东、西羌渊源有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到东汉安、顺二帝时（二世纪前叶），出现了‘西羌’和‘东羌’的区分。……‘东羌’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西汉时随匈奴而来的‘羌胡’之羌；又一部分是东汉时从金城、陇西迁来的西羌。此外，东汉在三辅之内也有不少羌民，……大致言之，三辅的羌民，论地区分布，应是‘东羌’，但他们是在东汉时多次从金城郡的黄河、湟水、洮河流域迁来的，还有一部分则自陇西、北地、安定诸郡内徙的。简言之，三辅的羌民绝大多数是来自西羌，同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四郡的‘东羌’有所区别，即‘羌胡’之羌占绝对的少数”。《氐与羌》，第94页。

[3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2，第2621页。

[39]（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2页。

[40]（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流载记附李庠》，第3031页。

[41]（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流载记》，第3029页。

〖第二章〗 流民入蜀与李氏建国

一 流民入蜀

李氏流民集团入蜀源起于西晋末年的氐人齐万年起义。西晋统一全国后，政治迅速走向腐朽，各地各族民众受压迫严重，其中关陇一带自惠帝永熙元年（290）起即由于水利不修而连年荒旱。到了元康四年（294）五月，匈奴郝散叛乱，攻杀上党（今山西潞城东北）官吏。到八月，郝散投降，为冯翊都尉所杀，又引发关陇少数民族群体不满。元康六年（296）夏，郝散的弟弟郝度元联合冯翊（今陕西渭南市大荔县）、北地（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东）马兰羌、卢水胡叛乱，攻杀北地太守张损，击败冯翊太守欧阳建。八月，西晋雍州刺史解系又为郝度元所败，秦、雍两州氐、羌纷纷起兵响应，拥立氐帅齐万年为帝，包围泾阳（今甘肃平凉市西北）。十一月，西晋以周处为建威将军，与振威将军卢播隶属安西将军夏侯骏，讨伐齐万年。以贵戚非将帅之才的梁王司马肜、夏侯骏辖制周处，给此次出征埋下了隐患。元康七年正月，西晋军与齐万年战于六陌（今陕西咸阳市乾县东），周处战死。到了元康八年，张华等推荐孟观讨伐齐万年，西晋军才开始连续取得胜利。第二年正月，孟观在中亭（今陕西咸阳市武功县西北）俘获齐万年，持续数年的氐羌大起义失败。

关陇地区在氐羌大起义过程中大乱，连年爆发饥荒，导致天水（今甘肃天水市）、略阳、扶风（今陕西咸阳市泾阳县西北）、始平（今陕西兴平市东南）、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成县西）、阴平（今甘肃陇南市文县西）六郡百姓流移就谷于各地。其中流徙进入巴蜀地区的有数万家，李氏即在这部分六郡流民之中。李氏一族在略阳之时即为“州党多附之”的乡里领袖，故在迁徙过程中对于同行六郡民有疾病穷乏者，多行“营护振救”，也更加笼络了流民人心。[1]而史书也记载了李特在迁徙入巴蜀过程中曾经展现出的“雄心”。各书记载大致相同，以《晋书·李特载记》最为详尽：“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眄险阻

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同移者阎式[2]、赵肃、李远、任回等咸叹异之。”[3]

流民进入汉中（今陕西汉中市东）以后，欣羡巴蜀之地的经济富庶、政局稳定，上书请求寄食于巴蜀。但西晋在齐万年起义之时曾发梁、益两州兵、粮助雍州讨伐氐羌起义，导致巴蜀地区较为空虚，因此对于十余万流民迁入巴蜀十分顾忌，想把流民限制在汉中一地以便于控制，于是下诏不许，并派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流民，但更主要的目的是加以监视，不让流民通过剑阁（今四川广元市剑阁县东北剑门镇剑门关）。李苾到达汉中之后，明了流民入蜀实为不得不行之策[4]，于是转而向朝廷上表曰：“流人十万余口[5]，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6]李苾上表打动了西晋朝廷，同时西晋也对过于压制流民可能激起的民变有所顾忌，于是六郡流民得以通过剑阁，由此散布到了巴蜀益、梁二州各地“不可禁止”，给后来李氏集团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二 李氏与赵廞的分合

永康元年（300）[7]，西晋诏征益州刺史赵廞入朝为大长秋，改以成都内史耿滕（一作胜）[8]代替赵廞出任益州刺史。赵廞于元康六年（296）自扬烈将军出任益州刺史，至此为时尚短，且西晋此时正经历“八王之乱”，贾南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朝中有诏尚书收捕贾后亲党，赵廞正是贾南风姻亲，此时见朝廷征召自己入朝十分恐惧，害怕被赵王伦以贾后亲党连坐。同时，赵廞曾以西晋政治衰落而“赵星黄”加以占卜，得到“星黄者王”的说法，于是认为“蜀土四塞，可以自安”[9]，暗中有仿“刘氏割据之志”。从巴蜀地区此时的力量构成来看，益州西夷校尉手握兵权，益州有以刺史兼西夷校尉者，但此时益州刺史与西夷校尉为二人分领。同时，成都内史治少城，也与赵廞近在咫尺。赵廞急需寻找依托力量来帮助自己，便把目光放在了六郡流民身上。一方面，六郡流民在巴蜀地区缺乏根基，需要依附于巴蜀地方势力求存；另一方面，李特兄弟武勇，且其同党均为巴西人，赵廞与之有“同郡之谊”。[10]这些成为两者联合的纽带。故赵廞开始拉拢流民，对于其领袖人物李特兄弟则引为爪牙，放纵其所为。[11]

李氏兄弟率领流民集团入蜀之后，本就有发展自己力量的野心，此时赵廞所为正中其下怀，于是在赵廞回护之下聚集了一批流民武装，在巴蜀地区横行为盗，“蜀人患之”，引发巴蜀土著不满。[12]面对巴蜀动荡的局面，成都内史耿滕数次向朝廷秘密上表，指出了巴蜀地区所面临的困境：“流民刚剽，蜀人愞弱，主不能制客，必为乱阶，宜使还本居。若留之险地，恐秦、雍之祸更移于梁、益矣。”[13]且巴蜀“仓库虚竭，无以应锋镝之急。必益圣朝西顾之忧”[14]。耿滕的密表使赵廞十分不满，一者耿滕以成都内史越过益州刺史秘密上表，使赵廞深感忧虑；二者一旦朝廷迁六郡流民出巴蜀，也会打乱赵廞据巴蜀自立的野心，这为赵廞、耿滕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西晋调动二人的诏书到达益州之后，益州刺史府即派遣一千余名文武官员前往迎接耿滕，观望耿滕动向。益州刺史、成都内史分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太城、少城，耿滕未敢贸然出郡。赵廞便招募李庠党羽罗安、王利等前往劫持耿滕，杀死传诏者，但为耿滕大败于宣化亭。耿滕随即准备进入太城，但赵廞在太城治所并未离开。耿滕功曹陈恂觉察到双方矛盾所在，对耿滕指出州郡已有矛盾，如果贸然进入太城必然

遭遇不测，不如留在少城观望形势，并传檄成都诸县各村聚保以防备六郡流民，等待西夷校尉陈总到来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否则不如退保犍为（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东），西渡江源县（今四川崇州市东南），以防备赵廞。但耿滕并未听从这一建议，十二月即率众进入州治太城，登上西门，赵廞又派遣亲信代茂刺杀耿滕，但代茂反而将此事告知耿滕而去。赵廞见刺杀失败，又派兵迎击耿滕，双方战于西门，耿滕败死，随身郡吏均逃散，仅陈恂面缚请求为耿滕从礼安葬，赵廞为平衡蜀地关系，答应了陈恂的请求。此次冲突之后，赵廞控制了成都州、郡治所，进而派兵迎击西夷校尉陈总。此时陈总已经引兵至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听闻赵廞与耿滕冲突，西夷校尉主簿赵模劝告陈总迅速进兵，以镇服形势，打击赵廞。但陈总并未听从，反而减慢速度“缘道停留”，观望形势变化。到达南安鱼涪津（今四川乐山市）时即遇到赵廞军，主簿赵模再次给陈总出谋划策，认为此时应该将随身财物拿出来招募士兵与赵廞对战，如果能够取胜，则可顺势进入成都；如果不利，则能顺流而退保全自己。陈总则认为赵廞与耿滕的冲突是双方个人恩怨，且赵廞与自己并没有矛盾，不用过于紧张。赵模再次劝说陈总，认为赵廞的目的是要据益州起事自立，绝不仅是与耿滕之间的私人恩怨，因此一定会杀掉益梁地区的实力大员，一方面为自己自立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借此立威，对于掌兵的西夷校尉陈总来说即使退让不战也没有益处。陈总始终没有听从，其手下也在与赵廞对战中迅速溃散，陈总被迫在草丛中躲避。赵模见状换上陈总官服出战，被赵廞兵所杀。赵廞又在草丛中搜得陈总，杀之。

在掌握巴蜀大局以后，赵廞开始为下一步独立做准备。一方面，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自我设置僚属，改换益州各地方官，以武阳令蜀郡杜淑、别驾张粲、巴西张龟、西夷司马袭尼、江原令犍为费远等为左、右长史，司马，参军。召临邛令涪陵许弇为牙门将。又以广汉太守张微（一作徵）[15]、汶山太守杨邠、成都令费立为军祭酒。原本西晋所置地方官均被迫听从调换。

另一方面，赵廞开始整合益州军事力量，强化守备以防备西晋可能的征伐行动，除了自身拥有的益州军队之外，六郡流民成为其依仗的重要军事力量。原本李氏六郡流民集团即已在赵廞庇护下多行不法，李庠又已出任犍为太守[16]，此时赵廞开始控制益州，更是双方合作的良机。李庠，字玄序，为李慕第三子，自幼以气魄闻名，又与赵廞早有交往：流民入蜀之时，赵廞即因李庠“弓马便捷，膂力过人”而深为器重，

又曾与李庠谈论兵法，对于李庠的见解十分赞赏，因此对其有“李玄序盖亦一时之关、张也”[17]的评价。李庠当时正率领李特、李流兄弟，妹婿李含，天水人任回、上官晶（一作上官惇）[18]，扶风人李攀、始平人费他（一作佗），氐人苻成、隗伯等四千骑兵屯兵北门。故赵廞加李庠部曲督，让李庠自六郡流民中招募壮勇一万余人，负责防备关中入蜀的北道。随即又加封威寇将军，假赤幢曲盖、封阳泉亭侯，又赐钱百万、马五十匹。

李庠本为东羌名将，其用兵之法有特别之处：行军打仗不用旗帜锣鼓，而是以矛为指挥，训练军队时先斩部下不听命令者三人，由此军队听从命令、战斗力很强。但李庠六郡势力在赵廞支持下的膨胀又逐渐使赵廞感到不安，尤其是李庠一部军纪松懈，但又战斗力强悍，更是使赵廞顾忌，只是一时没有好的借口。永宁元年（301）正月，长史杜淑、司马张粲，以“五大不在边”，赵廞起兵之时即使李庠率领强兵居于要地，是一种隐藏的军事威胁；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将军权交予外人，要有所准备等言进谏。这些建议正中赵廞下怀，恰巧此时李庠求见赵廞，想试探赵廞的政治企图，提出：当今中原大乱，纲纪不存，西晋已经无法振兴，益州牧如果想成“汤、武之事”，正在于此，应该“应天时、顺人心”，拯救天下百姓，则天下可定，而不仅仅在巴蜀之地。李庠本意在试探赵廞的想法，而且“中国大乱，无复纲维，晋室当不可复兴”[19]一语应该也是李庠对于当时政治形势走向的一种看法，隐含着李氏流民集团对于自身发展的思考，在此时提出却给了赵廞话柄。赵廞佯装大怒，以“此岂人臣所宜言”为借口，将李庠交予杜淑、张粲等论罪，杜淑等以李庠为大逆不道，就地杀李庠，并诛其亲从在门者十余人（一作三十余人）[20]。

赵廞又以李苾为犍为太守，并出兵攻杀汶山太守（治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北）霍固[21]，基本控制了巴蜀局势。

此事直接导致了李氏集团与赵廞的决裂。虽然赵廞处死李庠后顾虑李特、李流等兄弟仍统兵在外，且其兄弟在六郡流民中威望甚高，惧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为了安抚李特等人而派人将此事原委说成“庠非所宜言，罪应至死，不及兄弟”[22]；又将李庠尸体归还李特以成其丧，并仍以李特兄弟出任督将掌军等，以此安抚李氏，但李特、李流怨怼赵廞，率兵归于绵竹（今四川德阳市北）。赵廞又派遣故阴平令张衡、费恕前往慰抚，皆为李特所杀，双方正式走向决裂，李氏集团也开始了自

立发展的征途。而李庠素来为六郡流民所喜爱，“被诛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23]，李庠的死使六郡流民与赵廞离心离德。可以说李庠之死也决定了赵廞与六郡流民彻底分途。

赵廞集团在经历李特军事力量的分离之后，内部又连续发生动荡。赵廞手下牙门将许弇请求出任巴东监军，但被杜淑、张粲二人坚决制止，导致许弇攻杀二人于赵廞阁下；杜淑、张粲左右又杀死许弇。而这三个人都是赵廞的心腹力量，这场内乱直接导致赵廞统治集团的彻底崩溃。

在经历一系列变动之后，赵廞为了防备西晋讨伐自己，派遣长史费远、蜀郡太守李苾[24]、督护常俊等率领万余人阻断关中进入巴蜀的北道，屯兵于绵竹石亭（今四川广元市北），以填补李庠死后出现的防线空缺，且对绵竹地区的李特等加以威慑。但绵竹地区正是李特等退守之地，赵廞军的到来必然使其深感不安，于是收合军队七百余人[25]趁夜偷袭费远等军，费远军大败。李特又纵火焚烧，费远军死伤十之八九。李特趁势进攻成都。赵廞听闻李特兵至，惊惧不知所措，费远、李苾、军咨祭酒张微、中郎常美等皆趁夜斩关逃走，文武官员逃散殆尽，赵廞无计可施之，与妻子乘坐小船逃走，到广都（今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东）时被从人朱竺所杀。此时成都无人固守，李特顺利攻入成都，纵兵大掠[26]，杀西夷护军姜发、成都令袁洽（一作治）[27]，以及赵廞所置官员。与此同时，李特又派遣牙门王角、李基前往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向西晋政府陈述赵廞罪状，以明确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一行为可以了解，到此时李特集团仍然没有自立于巴蜀的想法，仍然在寻求尊崇西晋的发展道路。

三 李氏集团与罗尚的争斗

益州刺史赵廞被杀使巴蜀地区出现暂时的权力真空，西晋下诏拜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假节、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又给卫节兵一千人、梁州兵两千人，配上庸都尉义部一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入蜀控制局势。又迁梓潼太守乐陵徐俭为蜀郡太守、扬烈将军陇西辛冉为广汉太守辅助罗尚。早在赵廞谋反自立之时，罗尚即上表指出赵廞并无雄才，且不为蜀人所附，败亡指日可待。这种“卓见”以及梁、益二州切近是西晋加封其为益州刺史的重要原因。此外，罗尚又表请牙门将王敦兵七千余人助阵。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罗尚率领牙门将王敦、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上庸都尉义部等入蜀，这给了李特等人很大的压力，被迫派遣李骧迎接于道路，并贡献珍宝贿赂罗尚。[28]罗尚对此十分满意，认为能够控制流民集团，于是仍以李骧为骑督。罗尚到达绵竹后，李特、李流再次以牛酒犒劳。但王敦、辛冉等人对李特并不放心，认为李特等流民专为盗贼，应借此机会除掉，否则必然成为后患，但罗尚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辛冉为陇西人，与李特本为旧识，在会面之时提到“故人相逢，不吉当凶”之语，透露了双方矛盾，引起李特暗自猜忌。[29]

三月，罗尚等到达成都，正式履行益州刺史职能。此时西晋下诏秦、雍二州，以齐万年起义平复，使二州召还流民入蜀者，又派遣御使冯该、张昌加以监督。李特长兄李辅也自略阳老家托言迎接家眷来到蜀地，但李辅并无意引家族回归，反而告诫李特中原大乱，“不足复还”，李特由此确定了留在巴蜀的想法，其对策也开始发生转变。

为了缓解流民面临被逼短期迁回秦、雍的困境，李特先是派遣天水人阎式前去罗尚处请求暂缓六郡流民北归；后又贿赂罗尚、冯该等，由此获得暂缓北归的许可。此时西晋讨论平定赵廞之功，以李氏一马当先攻灭赵廞，封拜李特为宣威将军、长乐乡侯，李流为奋威将军、武阳侯。玺书到达益州后，又令州郡条列六郡流民参与平定赵廞有功之人，并加以封赏。但广汉太守辛冉想将平定赵廞之功据为己有，于是压下了封拜李特、李流的诏书，又不按实情上奏六郡流民有功者，导致六郡流民十分不满。此时罗尚又派遣从事监督流民北归，限定七月必须上路，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六郡流民寓居巴蜀地区，为求生计多为人佣耕，经过数年时间早已逐步落地生根，听到限期上路的消息本不情愿，而且此

时尚未秋收，流民缺乏路费，正赶上雨水丰沛，北返无异于死路一条，于是多归附于李特以寻求帮助。李特等作为流民领袖再次派遣阎式向罗尚请求延期至冬天，以获取行资。广汉太守辛冉与蜀郡太守李苾等进言罗尚否决李特请求。阎式又向罗尚新举的秀才、别驾杜弢陈说逼迫流民迁徙的弊端，杜弢之父曾任略阳护军，更为了解流民情况，故也认可其说法，向罗尚建议宽限流民一年时间，以缓和矛盾。但罗尚仍听从辛冉等的建议没有同意。杜弢见所言不被采用，预感罗尚必然搅乱益州，于是退还秀才板。当时又出现白虹天相，头在井里、尾在东山，拖于益州太城之上。治中从事巴西马休就此询问阎式，阎式趁机将此事占卜为有万尸之气，而逼近于城绝非好事，为天降罪孽不可违，但只要平西将军（罗尚）能够宽限流民，则灾异天相必然消失。这种说法仍没有打动罗尚。反而辛冉见罗尚已坚定逼迫六郡流民北归之心，更知流民首领在攻破成都时曾大肆掠夺，故想除掉流民首领以夺取其资财，于是又与李苾向罗尚进言，应趁流民北归之机夺取其在赵廞之乱中所剽掠的财物。于是罗尚在七月命令梓潼太守张演在各个北归要路设立关卡，搜罗流民随身财物。到九月，又派遣军队到达绵竹，名义上要种麦，其实目的在于防备流民逃逸。双方矛盾一触即发。

同时，李特又派遣阎式前往罗尚处请求宽缓期限上路，阎式见罗尚、辛冉营寨内“营栅冲要”，以图谋掩击流民，感到罗尚行为必然激发流民民乱，又知辛冉、李苾等图财之意坚决，于是向罗尚请辞。罗尚则仍然假意哄骗阎式说同意宽限行期，让阎式告知流民。阎式对于罗尚意图十分清楚，指出罗尚听从了奸人之计，宽限日期恐怕只是说辞，百姓虽弱但绝不可轻视，如果对其压迫太紧，恐怕众怒难犯、为祸不浅！罗尚仍搪塞阎式，对于宽缓期限一事信誓旦旦地加以保证。阎式返回绵竹后对李特提到罗尚处的形势，指出罗尚虽然不断强调要宽缓期限，但并不值得相信；且罗尚自身“威刑不立”，辛冉等人各拥强兵，一旦辛冉等发动变乱，罗尚完全没有能力加以控制，李氏集团应早做准备以防不测。李特于是“缮甲厉兵”，戒严以备非常。李特见流民在罗尚压力下大量归于自己，于是在绵竹建立大营加以安置，又派人向辛冉请求宽限日期。辛冉因李特回护流民、断绝了自己的财路而大怒，派人在主要道路上贴出告示，悬赏捉拿李特兄弟。李特见状将所有告示取回，将文字改为“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30]，使辛冉的矛头转向全部流民酋长以激化双方矛盾。流民本身即受到辛冉的盘剥，此时见到告示皆信以为真，更多的人逃到李特处寻求庇护，短时间内李特即聚集流民两万余人，李流处也聚集数千人。李特

将流民分为两营，李特居北、李流居东，以防备辛冉。

另一边，辛冉、李苾则认为罗尚虽然贪婪，但并没有决断，如果拖延日久会使流民最终得以在巴蜀落地生根。且李特等均为雄才大略之人，如果等其成势，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目前应该果断采取措施消灭李特等流民，而不能再通过罗尚。二人商议以后，即派遣护军曾元进攻李特，但为李特所杀。罗尚又派遣督护田佐、牙门刘并等助兵辛冉，也为李特所败。[31]罗尚以此埋怨辛冉妄自用兵，导致李特趁势而起不可复制。经过此事以后，李特等流民集团与罗尚一方彻底决裂，双方在巴蜀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李特与罗尚的直接冲突标志着六郡流民集团开始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六郡流民共同推举李特为主，李特指示六郡出身的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阎式、谏议大夫李攀、陈仓令李武、阴平令李远、将兵都尉杨褒等上书朝廷，请求在巴蜀依“梁统奉窦融故事”。同时，在六郡流民的拥戴下，李特行镇北将军事，承制封拜属官，加封李流行镇东将军，号东督护[32]，随即进兵广汉（今四川遂宁市射洪市南）攻打辛冉。罗尚派遣李苾、费远率兵救援辛冉，但二人十分畏惧李特，不敢进兵。辛冉孤立无援，又与李特连战失败，于是将罪责归咎于绵竹令南郡人岐苍，杀之而突围逃往德阳（今四川遂宁市东南）。李特攻入广汉，以李超为广汉太守，再率军进攻成都。罗尚给阎式发信，责备流民攻城略地，阎式回信曰：

> 辛冉倾巧，曾元小竖，李叔平非将帅之才。式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留、徙之宜。人怀桑梓，孰不愿之！但往日初至，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秋潦，乞须冬熟。而终不见听。绳之太过，穷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颈受刀，以致为变。即听式言，宽使治严，不过去九月尽集，十月进道，令达乡里，何有如此也！[33]

罗尚见到书信，知道李特等不可复制，于是固守成都，并求救于梁、宁二州。

李特见进兵顺利，于是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一依窦融在河西故事。封李辅为骠骑将军，李骧为骁骑将军，李始为武威将军，李荡为镇军将军，李雄为前将军，李含为西夷校尉，以李含子国、离[34]、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费他等为将帅，任臧、上官惇、杨褒、杨发、杨珪、王达、麴歆等为爪牙，李远、李博、夕斌、严柽、上官琦、李涛、王怀等为僚属，阎式为谋主，何世、赵肃为腹

心，其余皆有官号。六郡流民正式形成较为完备的统治集团。

为了进一步拉拢巴蜀百姓，分化罗尚的统治基础，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并“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35]，与罗尚的贪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晋书·罗尚传》记：“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36]在这种情况下，罗尚连续败于李特，于是阻长围，缘郫水结营，自都安（今四川都江堰市东南）到犍为七百里，形成与李特相拒的阵营，以阻止李特。同时又向梁州、南夷校尉求援。

太安元年（302）春，罗尚又遣牙门夏匡进攻李特于立石，再次失利。五月，西晋河间王司马颙派遣督护衙博西征讨伐李特，驻军梓潼（今四川绵阳市梓潼县），又加封张微为广汉太守，驻军德阳；罗尚派遣督护张龟率四十牙门驻军繁城（今四川彭州市西北），南夷校尉李毅也派兵五千助战。此时衙博对李特尚存有幻想，派遣参军蒙绍加以诱降。罗尚送书信给衙博称：以往李流曾有书信，有意归降，但仍不断为贼寇。此时听说李特又有投降的想法，然而李流、李骧七八千人指日而到，其中奸计难测，不能轻视之。但衙博没有听从这一建议。李特果然先派镇军将军李荡、前将军李雄等袭击衙博，自己亲自击破张龟。李荡击败衙博于阳沔（今四川绵阳市梓潼县东北），衙博军死伤过半，梓潼太守张演弃城逃走。取得胜利后的李荡趁势追击衙博至汉德（今四川广元市剑阁县东北），衙博败走葭萌（今四川广元市西南）。李荡又进攻巴西郡（今四川阆中市），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一作班）[37]以郡降于李荡。李荡对投降郡县加以抚恤，安定百姓之心，随即进攻葭萌，衙博于走投无路之下远遁，其所部均降于李荡。河间王司马颙改以许雄为梁州刺史，准备再次讨伐李特。

同时，李特又进攻犍为，获太守李恢，以李溥为犍为太守。

四 建号改年后的发展

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之后，李特更自称益州牧、大将军、大都督、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

太安元年八月，李特开始进攻广汉太守张微，张微利用较高、较险要的地势与李特相持。前已提及，李特集团分为李特、李流两营，李特独自进攻张微兵力较弱，因此被张微发现了其后方营地的空虚，派遣步兵绕过山路攻击李特后方。李特后方面临攻击，前方又面对险要山地难以进取，忧虑不知所为。罗准、任道等均劝李特先引兵撤退，以待更好时机，但李特坚信李荡必能及时赶到救援，因此坚持不退。另一面，李荡虽然率兵前来救援，但因为地形太过险要，增援、阻援军队拥挤在仅能一两个人同行的狭窄山道之中，前进受阻。面对这种危急形势，李荡对其司马王辛说：现在父亲深陷敌人重围，这正是我以死明志之时。于是身穿几层铠甲，手持长矛，大呼直冲，连杀十余人。张微又派军队前来增援，也被李荡军击溃，李特得以转危为安。

李特经过此战后感到进取不易，于是想放弃攻打张微，退回涪（今四川绵阳市东）再做考虑。李荡与王辛等劝告李特说：虽然此前张微依靠地势取得一定胜利，但如今经过连续作战，其军队士卒已经大多伤残且缺乏补给，正应该趁机一举擒获张微；否则如果给张微较为宽缓的时间和环境，受伤的将士得以恢复，逃散的士兵得以聚合，再想攻取广汉则难上加难了。李特于是马上整军进攻张微，张微果然无法抵抗，突围逃走。李荡从水、陆两面追击，击杀张微，生擒张微子张存，以张微尸体交予张存，加以安抚。

取胜之后，一方面，李特以手下将领蹇硕为德阳太守，镇守德阳。蹇硕向外掠地到巴郡之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另一方面，李特在征伐张微时，也派遣李骧与李攀、任回、李恭等屯兵毗桥（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南），以防备罗尚。罗尚果然派遣军队进攻李骧等，但为李骧所败。罗尚又派遣数千人出战，也被李骧击破，李骧因此夺取大量武器装备，并攻烧成都城门。李流一支则进兵成都之北。罗尚又派遣手下将领张兴诈降于李骧，以观察李骧虚实。此时李骧军不过两千余人，势力较为单弱。张兴于是将这一消息乘夜告知罗尚，罗尚大喜，认为可以凭借优势兵力一举解决李骧，于是选拔精锐叟族勇士一万余人跟随张兴夜袭

李骧大营。面对罗尚大军的偷袭，李攀力战而死，李骧及大批将士逃往李流营寨。李流与李骧合兵之后马上反攻，罗尚军则因刚刚取得胜利较为懈怠，措手不及之下大乱，能够逃回成都者仅十之一二。同时，梁州刺史许雄也多次派遣军队进攻李特，因李特据险自保而始终无法取胜，反而导致李特声势越来越大。同时，李特大赦境内，改元建初[38]。这对于李氏流民集团来说意义重大，标志着其已经拥有了完全独立的旗号，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南夷校尉李毅也派遣叟兵助战罗尚。但此时南中内部不稳，建宁（今云南曲靖市西北）大姓李叡、毛诜驱逐建宁太守徐俊，朱提（今云南昭通市）大姓李猛驱逐朱提太守雍约以响应李特，都有数万之众，使南中震动。南夷校尉李毅派兵讨伐，击斩毛诜，李猛虽然请降，但言辞不逊，也被李毅诱斩，南中重归稳定。同年十一月，西晋置宁州，以李毅为宁州刺史，但在局势动荡下，对巴蜀的支持始终有限。

太安二年（303）正月，李特暗中自盘底渡江、旁军从赤水（今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渡江进击罗尚，郫水水军溃散，蜀郡太守徐俭以少城投降李特，李特即以李瑾为蜀郡太守安抚百姓。李特进入成都少城后，仅取城中马匹以供军用，其余并无抄掠的行为。这与此前与赵廞对战时在成都大肆抄掠的行为大相径庭，可见李氏流民集团已经开始从带有流寇属性的军事集团转变为割据建国的政治集团了。

李特进入少城不久，李流也进兵屯于郫水之西，罗尚仅余太城自保，于是派遣使者向李特请和。此时罗尚与李特冲突的天平已经开始倒向李特一方，蜀地百姓观望形势，皆相聚为坞堡自保，并向李特示好，李特也派遣使者加以安抚。对内，则以六郡流民“分口入城”，壮勇则督领坞堡。又因为军中存粮较少，于是将六郡流民分别安排在各个坞堡中就食。李流对李特的安排感觉十分不安，提醒李特，如今各个坞堡刚刚投附，究竟意图如何并不确定，应该将其中大姓子弟作为人质送往广汉，安置到大营之中，以挟制诸坞堡力量；同时不能分兵四出，而应该将精锐军队聚集在一起，以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李流又给李特司马上官惇书信，再次提到坞堡受降绝不能轻易视之，希望上官惇也能向李特进言。李特之子前将军李雄也向李特陈说此事。但李特认为此时罗尚已经困守太城，大事已定，应该想办法安民而不能多加猜忌，以免百姓离叛，因此没有采纳李流等的建议。

与此同时，面对罗尚的困局，西晋又派遣荆州刺史宗岱（一作宋

岱）[39]、建平太守孙阜率领水军三万人救援罗尚。宗岱以孙阜为前锋，进军逼近德阳，李特派遣李荡及蜀郡太守李璜[40]、德阳太守任臧抵御。此时因宗岱等人军势甚盛，益州坞堡再次倒向罗尚。益州兵曹从事任叡（一作任明、任锐）[41]向罗尚建议，应趁李特将六郡流民散往坞堡就食，整体防备虚弱懈怠之时，秘密与益州诸坞堡潜伏将领约定日期，内外夹击李特，则李特必然能破。罗尚于是乘夜将任叡秘密送出城，任叡赶往各个坞堡，约定二月十日一起进攻李特，暗号“在彼扬水”。又前往李特处诈降，观察局势。李特向任叡探问成都太城虚实，任叡欺骗李特说城中粮储将尽，只有一些金帛财物，使李特更为松懈。任叡又假意向李特请求外出探望家眷，趁机将消息报告罗尚。到了约定日期，罗尚派遣大兵进攻李特大营，益州坞堡皆起兵响应。双方大战两天，李特寡不敌众，大败，收罗残余士卒退往新繁（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西北）。罗尚引兵而还，李特见状转而追击罗尚，双方转战三十余里，罗尚派出大军全力击败李特，李特、李辅、李远三人被斩，罗尚将三人焚尸，并传首洛阳告捷。

五 李流领导下的六郡流民

李特等的战死使六郡流民集团受到深重打击，加之蜀人叛归罗尚，与之联合打击流民，引发了流民的极大恐慌，李氏集团的形势十分严峻。面对不利形势，李雄以李离为梓潼太守，李流与李荡、李雄等则收集残余力量还保赤祖（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东北），仍分东营、北营，李流居东营，李荡、李雄居北营。李流，字玄通，为李慕第四子，自幼好学，弓马娴熟，颇有武勇，因此时李辅、李特、李庠等兄长均已死去，故李流复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此时宗岱军则声势大振，孙阜攻破德阳，俘虏守将蹇硕，德阳太守任臧等进兵涪城。

太安二年三月，罗尚又派遣督护张龟、何冲、牙门左氾、黄訇（一作訚）[42]等驻守繁城，迫降绵竹，攻李流于北大营。派遣督护常深屯兵毗桥，防备李流、李骧。常深击败李骧，击斩李攀，李攀弟李恭复领攀众。涪陵药绅、杜阿也趁机于蜀地起兵进攻李流。李流与李骧抵抗常深，李荡、李雄抵抗药绅。何冲见此时北大营空虚，于是出兵进攻北营，氐人苻成、隗伯、石定在营中叛降，形势十分严峻。李荡母罗氏见状亲自身穿甲胄迎战，隗伯手刃伤其目，罗氏气势反而更为高涨，迎击叛乱者。当营寨即将被攻破之时，所幸李流等击败常深、药绅，及时引兵回援北营，大败何冲军。苻成、隗伯等率其党羽逃奔罗尚。李流等趁势追击，直达成都城下，罗尚被迫闭城坚守。此役李荡因追击途中不慎中矛而死，李氏集团再次损失一个主力将领，罗氏、李雄秘不发丧，以安定人心。

面对李氏集团在益州地区长期为乱，西晋再次派遣侍中刘沈假节统领罗尚、许雄的益、梁二州兵，以更好地协调调动，讨伐李流。但刘沈到达长安以后，即被河间王司马颙留作军师，改派席薳代之。

另一边，李流见李特、李荡相继战死，宗岱、孙阜大兵压境，形势极为不利，感到十分恐惧，正巧此时李含劝李流投降罗尚，李流就势答应，准备投降。李骧、李雄认为不妥，反复加以劝谏，但李流主意已定，并不听从二人的建议，于五月派遣其子李世与李含之子李胡前往孙阜处做人质，推进投降事宜。李胡兄长李离为梓潼太守，听说此事之后急忙自梓潼驰还李流大营，想劝谏李流收回成命，但也为时已晚。李离于是转而与李雄商议如何解决目前的危机，提出了偷袭孙阜的建议，并

约定“若功成事济，约与君三年迭为主”。李雄认为可行，但指出李流、李含一心投降，必然不会同意，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李雄实际上是将难题抛给李离：因为李流是李雄叔父、李离舅父，李含是李雄姑父、李离父亲，从各种关系来看李含与二人关系更为密切，李离的态度是否坚决就成为此事成败的关键，故李雄以此观望李离态度。李离坚决地说：如果李流二人不从，便可以劫持，如果不成则可“行大事”，李流、李含虽然与我们亲近，但势不得已也无法顾及了。李雄在得到李离的肯定答复后大喜，与李离一起向流民说道：“吾属前已残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为鱼肉，惟有同心袭阜以取富贵耳！”[43]获得六郡流民的响应。于是，李雄、李离率军突袭孙阜，大破孙阜军。恰巧此时宗岱卒于垫江，荆州军退走，流民的危机随即解除。经过此事以后，李流对于自身犹豫投降的想法十分愧疚，也对李雄的才能有了新的认识，史书记载此后李流将“军事悉以任之（李雄）”。但此事又绝非表面上说得那么简单。李雄、李离起兵进攻孙阜是越过李流的，行事之时是否如二人商议那样劫持了李流，史书没有记载，但此一事件的推动，李雄是得到了六郡流民的全力支持的，从这一点来看李雄实际上已经在军事层面架空了李流。而且李离、李雄二人曾经约定“若功成事济，约与君三年迭为主”，实际上也是要在此一行动之后取李流而代之的。李雄没有直接取李流而代之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李流已经完全失势则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由是奇雄才，军事悉以任之”，仅仅是为李雄讳饰而已。[44]

李流在益州的日渐强势迫使西晋政府调动更多的军队来加以镇压，其中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紧邻的荆州地区。但荆州征发讨伐李流的“壬午兵”并不愿远行从征，在各级州县长官的催逼之下到处屯聚为盗，多投奔义阳蛮张昌叛军，使其势力渐强。荆州地区因益州李流的动乱而导致了自身社会的动荡，使其无法顺利出兵镇压李流，最终使李流在东方的压力逐渐减轻。

李雄掌军之后，数次击破罗尚，罗尚被迫退保成都。太安二年六月李氏集团自帛羊颓渡河，攻杀汶山太守陈图，七月夺取郫城（今四川成都市郫都区），李流也将大营向郫城迁移，兵屯郫城。此时李流与罗尚鏖战日久，蜀地百姓多结成坞堡自保，或者南下逃入宁州，或者东下进入荆州，益州地区城邑皆空，田野荒无人烟，流民一时无法获得物资补给，逐渐陷入饥乏的境地。此时有涪陵民一千余家在范长生带领下聚集在青城山自保，实力雄厚。罗尚手下平西参军徐轝本身为涪陵人，对范长生的影响力较为了解，因此劝说罗尚出自己为汶山太守，以联合范长

生与罗尚形成犄角之势打击李流。罗尚较为短视，不采纳徐轝的建议。徐轝大怒，又请求出使江西[45]，就势出降于李流，被封为安西将军。徐轝又替李流往说范长生，让范长生资助李流军粮，范长生听从了这一建议，使流民军度过危机，声势复振。范长生集团与李氏流民集团在各自利益需求以及宗教因素的连接下携起手来，开始了长期的合作过程。[46]

九月，李流病重，对诸将领说道：骁骑将军李骧高明仁爱，见识决断多有奇异之处，足以成就大事；但前将军李雄英明神武，为天所相，大家可以共同拥戴李雄，成就成都王大业。此时六郡流民集团的军事领导权早已在李雄手里，因此李流死前将李骧、李雄二人所做对比，也不过是在既成事实之下进一步凸显李雄即位的合理性而已。李流死后，众人拥立李雄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郫城。李氏流民集团开始走上正式建国发展之路。

[1] 如史载李庠“性在任侠，好济人之难，州党争附之。与六郡流人避难梁益，道路有饥病者，庠常营护隐恤，振施穷乏，大收众心”。《晋书》卷120《李流载记附李庠》，第3031页。

[2] 按：“阎式”《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特》作“阎彧”，“式”“彧”二字形近易讹，而《太平御览》引书年代较早，不详究竟二者孰是。

[3]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2页。

[4] 此事各书均记为李苾收受流民贿赂，转而为其说项，但经任乃强辨析应为蜀中士大夫因流民入蜀成灾而痛恨李苾，对其诽诬之语，放流民入蜀实为势在必行之举。具体分析参见《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48页注释③。

[5] 此前史载六郡流民南下数万家，以每家五口人计，十万余口当二万家到三万家。

[6]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3页。

[7] 按：《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特》系此事于元康九年（299），此处从《资治通鉴》。

[8] 《华阳国志·大同志》《晋书·李特载记》《资治通鉴》作“滕”，《太平御览·偏霸部七·蜀李特》《晋书·惠帝纪》作“胜”。

[9] 《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45页。

[10] 赵廞为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北）人。任乃强考证认为赵廞虽祖世安汉人，但“随张鲁内移”。张鲁内移在建安二十年（215），距元康元年（291）已七十七

年（原文误为八十五年）矣。然则廞非生于巴西，乃赵人也。李特亦非生于巴西，乃略阳人也。同郡之说，盖唐宋史家妄揣之辞耳。参见《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49页注⑧。所论较为准确。

[11] 从史籍记载来看，李特兄弟并没有在赵廞之下出任职务，应该是赵廞将李氏兄弟作为豢养的隐藏力量以备不时之需，故对李氏兄弟此后的不法行为多有放纵。另，史籍记载赵廞为拉拢流民，乃厚抚流民，开仓赈济。任乃强分析认为，赵廞开仓赈济流民应该在两年前流民初入蜀之时，即已遵朝旨为之，并非此时为谋乱而为，史书记载应为史家对一切宽容流民措施的嫌恶和丑诬。《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49页注⑧所论即已指出其时间前后差异及其缘由，此处从之。

[12] 任乃强认为此处史籍所载应是蜀中被压迫阶层与佣力流民相互帮助，反抗地主压迫、剥削，从而导致地主阶层憎恶，诬蔑流民劫盗。李庠则可能庇护流民，导致同样受到诬蔑。参见《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49页注⑨所论。从此后流民集团与巴蜀土著直接的巨大矛盾冲突来看，任乃强的分析亦有其道理，可备一说。

[1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3，第2647页。

[14] 《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45页。

[15] 《晋书·李特载记》作“张徵”，《华阳国志·大同志》《资治通鉴》卷84作“张微”。

[16] 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49页注⒆所考。

[17]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流载记附李庠》，第3031页。

[18] 《晋书·李特载记》作“上官惇”，《华阳国志·大同志》《资治通鉴》卷83作“上官晶”。

[19]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4页。

[20] 参见《资治通鉴》卷84考异，第2653页。

[21] 此处各书记载多有不同。此处参考《资治通鉴》卷83考异；《晋书·惠帝纪》校勘记[10]；任乃强《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49页注⒅所论。

[22]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4页。

[23]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流载记附李庠》，第3031页。

[24] 按：《资治通鉴》卷84（第2654页）记为“长史犍为费远、蜀郡太守李苾”，《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特》《晋书·李特载记》均记为“长史费远、犍为太守李苾”，但此前又有赵廞攻杀犍为太守李苾，不应有同职同名先后出现，故应该从《资治通鉴》所载。

[25] 考证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52页注(24)。

[26] 任乃强考证认为李特入成都不至于纵兵大掠。参见《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54～455页注①。

[27] 《华阳国志·大同志》作“袁洽”，《晋书·李特载记》作“袁治”。袁洽职官考证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54～455页注①。

[28] 任乃强认为李特不当有以珍宝贿赂罗尚之举。见《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55页注③。但李特等流民实依仗益州地方官以求发展，对新任的益州刺史罗尚行贿打通关系也不足为奇。

[29] 任乃强立意与此不同，可参看。见《华阳国志》卷8 《大同志》，第455页注④。

[30]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5页。

[31] 此处文字依《华阳国志·大同志》（第454页），与《晋书》所载颇多不同，考证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457页注⒁。

[32] 《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特》此处作“特行镇北将军，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镇东将军”，《晋书·李特载记》作“特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镇东将军”，《资治通鉴》卷84作“特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镇东大将军”。以此后职官的发展来看，《太平御览》等所记应较为合理。而《华阳国志·大同志》将此事系于辛冉等袭击李特之前，但当时李特仍在以延期北返之事拖延时间，尚未与罗尚完全决裂，不太可能即有自主称制之事，故不取。

[3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4，第2667页。

[34] 《资治通鉴》卷84、《华阳国志·大同志》断句为“含子国、离”，《晋书·李特载记》国离不断。

[35] 按：杨伟立《论李特起兵及其所建政权的性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一文对李特“约法三章”的研究认为，其内容即为后面提到的“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三点。其中“礼贤拔滞”为核心，即地主阶级掌权；在不离开这个核心的原则下，对贫民“施舍赈贷”是可以的。“军政肃然”表面上对任何人都有好处，但因为贫民已无“侵掠”，故维护的仍是富人利益。因此“约法三章”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为地主阶级服务。虽然杨伟立所论李特行为目的在于获得益州地主为核心的巴蜀百姓的支持这一观点较为准确，但所指“约法三章”内容即为此后三事的观点则值得商榷。所谓“法三章”，以其最初出现于汉高祖刘邦与关中父老约定来看，应为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明确为简化、理顺当时混乱、繁复的司法体系而出现，并无经济生活、人才选拔内容。李特此处亦应如此，为针对罗尚贪残乱法而来，与此后三事应为并列关系，共同构成李特在各个层面（司法简化、经济救助、人才选拔、军队纪律等）发展的指导政策。

[36] （唐）房玄龄：《晋书》，第1552页。

[37] 《晋书·李特载记》作“襄珍”，《华阳国志·大同志》作“襄班”。

[38] 改元一事各书记载有异，《资治通鉴》卷85考异辨析曰："考异曰：帝纪：'太安元年五月，特自号大将军。'载记：'太安元年，特称大将军，改元。'后魏书李雄传云：'昭帝七年，特称大将军，号年建初。'昭帝七年，太安元年也。祖孝征修文殿御览云：'太安二年，特大赦，改年建初元年。特见杀。'三十国、晋春秋云：'太安二年正月，特僭位改年。'今从御览等书。"（第2677页）任乃强考证"号年建初"应在太安元年八月破张微后，今从之。参见《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62页注⑨。

[39] 《晋书·李特载记》《惠帝纪》等作"宋岱"，《晋书·罗尚传》《晋书·郭舒传》《晋书·孙旂传》《资治通鉴》等作"宗岱"。

[40] 按：此前有李特以李瑾为蜀郡太守，此处又见蜀郡太守李璜，"瑾""璜"二字形近，应有讹误。

[41] 《晋书·李特载记》作"任明"，同书《罗尚传》作"任锐"，《华阳国志·大同志》《资治通鉴》作"任叡"。关于此人名考证，可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62～463页注⑾。

[42] 《晋书·李特载记附李流传》作"黄訇"，《华阳国志·大同志》作"黄訚"。

[4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5，第2679页。

[44] 任乃强认为李雄袭击孙阜为李流所知，并在其支持下得以实施，非李雄、李离两人私自为之；李雄、李离之约定为封建士大夫推想之说，与本书立意不同。参见《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67页注⑨⑩。

[45] 此江西方位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69页注⒃考证。

[46] 按：关于范长生与李氏流民集团的关系，学术界探讨较多。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一，2009年版二，第39页）认为"巴賨为笃信天师道之民族，范长生本为天师道之教主，故其拯李氏于几亡之时，又劝其称帝者，实有宗教之背景"。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一文对二者的结合及范长生作用研究认为，涪陵人徐轝、范长生自身即为徙蜀而世掌部曲的大姓。而范长生很可能即出自賨人部落，涪陵徐氏亦有出于巴蛮的可能，与李氏颇有同族的可能。范长生的宗教首领地位及其在蜀中的势力，证明李雄要推范长生为君不仅是报恩，范长生确有称帝的力量。范长生既拥有不少信徒，归附李氏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同时天师道又是范长生与巴氐结合的桥梁，巴氐崇奉天师道由来已久。范长生所以独受特殊尊重，即因他不单是有功于李氏，而且还是一个宗教领袖。从这一点来说，他的地位高于李雄，所以李雄要执板相见，行下僚参谒之礼，而且要让位给他。范长生便是担任沟通主客统治者以取得妥协的角色。他是拥有部曲的地主武装首领，又是宗教首领，通过他与巴氐李氏种族上、宗教上的特殊关系，主客统治者接近了。他和徐轝与李雄的合作构成了以后联合统治的条件。童超《论李特兄弟领导的武装斗争及成汉政权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文中指出，流民与范长生的结合，是因为西晋地方政权被摧毁，"土著地主阶级需要重建一个封建性的地方政权，作为统治农民阶级的暴力工具。土著地主虽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们只能把重建封建政

权的希望寄托在手握重兵的流民地主豪强的身上”。从流民军来看，在夺取了益州地区统治权之后，就要利用政权的力量，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地主经济，“如果流民地主豪强要想在巴蜀地区扎下根，就必须和盘根错节的土著地主豪强携起手来，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一个依靠力量”。段玉明《范长生与巴氏据蜀关系再探》（《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亦指出范长生在和巴氏集团发生联系时，宗教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乃至非常重要的因素。李氏所率六郡流民其先世多为川东一带蛮族，以賨人为主。但李氏与范长生结合因地域不同和时间推移，宗族原因不是主要的。而魏晋时期蜀中道教受到压制，五斗米道首领渴望一个能够使之合法化，使其飞速发展的地方政权出现，“范长生是一个五斗米道徒，且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宗教领袖，李氏父子所率賨人又特别笃信五斗米道，以这样的基础建立一个政权，正是像范长生这样的五斗米道首领所理想的。这就是范长生所以支持李氏的核心所在”。

国外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如索安《早期道教救世主义中的真君形象》认为：“成汉的李雄、刘宋的刘裕、北魏的拓跋焘和唐朝的李渊，很可能都曾根据道教的理论把自己作为救世真君的化身，以此象征天命在己。”祁泰履《大成：一个中国千年王国的宗教与种族》一文论证“李氏家族利用种族和宗教的力量来强化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使大成政权得以维持40多年”，〔以上两文均转引自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8期，但刘屹也认为：“只有范长生和李雄的关系确实体现出道教背景，祁泰履现在把从李特到李势共8个君主都与道教扯上关系，证据不足。”〕等等，从各个角度论证了范长生领导的道教集团与李氏集团结合的根源，以及其对于李氏建国、成汉发展等起到的积极作用。

此外，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认为賨人李氏被迁略阳以后，到李特、李雄已是第三、四代，可他们非但没有忘记故国家乡，放弃先辈的宗教信仰，反而向往着卷土重来割据称王，并且将这种企图化为日甚一日的努力。从谯周谶言反映出来的当时实际是，大约在晋武帝太始年间，李特兄弟南下串联，已经在绵竹赤祖一带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李特以郪中细子自命，是想强调他是“李家道”的及门弟子。原被分化而处于关陇和巴蜀的天师道五斗米之徒，已经在李家道的名义下重新统一起来了。范长生支持成汉建国，实际上是这个统一之花结出来的血缘性果实。李特自太始以来的串联之所以能步步深入，是因为碰上了机会。惠帝太安二年（303）七月以前巴賨李氏集团的活动在巴蜀和关陇交叉进行，藕断丝连三十余年，既定的宗教传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构成了范长生支持李雄的先决条件——这就是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刘九生文将李氏建国相关鼓动、运作活动推前太久，以此来附和谣谶的内容，有一定的推测成分，论断较为武断。

〖第三章〗 大成政权兴衰

大成政权自304年李雄建国，到338年李寿改国号为汉，历35年三主，是成汉国家的发展、鼎盛以及由盛转衰的主要时期。

一 李雄建国

大成国由李氏六郡流民集团中的第二代李雄所建。前文已经对李流末年军事权力从李流转移到李雄的情况有所分析，在李流死后，李雄即顺理成章地成为六郡流民集团的领导者。

李雄，字仲儁，是李特第三子，身长八尺三寸，容貌俊美。其母即此前曾经在北营保卫战中骁勇异常的罗氏。史载李雄出生颇有神异，罗氏曾梦到两条彩虹从自家门前升天，其中一条中断，不久生下李荡；此后又曾经在汲水之时突然睡着，梦到大虹（一作大蛇）[1]绕其身，于是怀孕，历经十四个月而生李雄。罗氏经常对人说，自己两个儿子如果有一人早死，另一个必然大富大贵，以对应双虹升天的征兆。此外，有相工称赞李雄面相应位过三公，另有道术士刘化，预言关陇之民都将南下，李氏诸子只有李雄“天资奇异，终为人主”，等等。这些本为帝王自我神化的常辞，因賨人尤信巫觋，故在成汉国家显得尤为重要。经过这些神异内容的塑造，李雄建国自立从各个方面造好了声势。

李雄被流民推立之后，即派武都人朴泰前往罗尚处诈降，称李骧与李雄因困守孤城、粮草供应不济而归咎于对方，每天争斗不止，李骧准备带领民众往江西（郫水之西）就食，这正是平定李氏的好机会，以此劝说罗尚进攻郫城（今四川成都市郫都区），自己则做内应，举火为信号。罗尚信以为真，以珍宝金银赏赐朴泰，朴泰以事成之后再领赏赐不晚为由拒绝，又请求罗尚派人随自己进一步侦查，这些行为更加坚定了罗尚的信任。于是派遣隗伯率兵攻城，李骧伏兵伪装叛军，引诱隗伯攻城，朴泰则将登城长梯放于城外。[2]隗伯军见信号火起，争相登上长梯攻城，李骧伏兵四起，大破隗伯军。又趁势追击直达成都城下，装作已经攻取郫城，大呼万岁。罗尚没有防备，将李骧追兵放入少城才发觉上当，于是退入太城自保。李骧又转攻犍为（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东），俘斩犍为太守龚恢，以李溥为犍为太守，切断了罗尚的运输通道。隗伯身受重伤，被李雄生擒，但李雄念隗伯伤重，且为大将梁双岳父，为安抚梁双而赦免了隗伯。

太安二年（303）闰十二月，李雄发兵急攻罗尚。罗尚军中缺乏补给，陷入饥乏境地，无奈之下留牙门将张罗守城，自己趁夜由牛鞞水（今沱江）东走。张罗守城一夜，亦逃走，李雄顺利进入成都，随即因

军粮不继，转而率军前往郪县（今四川绵阳市三台县南）发掘野芋充饥。梁州刺史许雄则因讨伐李氏流民集团不利，被征还朝服罪，而以护军张殷、汉中太守杜孟治、都战帅赵汶、巴西太守张燕、梓潼荆子等守汉中。

永兴元年（304）正月，罗尚逃到江阳（今四川泸州市），遣使上书朝廷告知事情经过。西晋下诏使罗尚暂时统领巴东、巴郡、涪陵三郡以供给军赋。二年，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又运米三万斛资助罗尚。

另一边，李雄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逐渐恢复了元气，开始考虑建国之事。李氏流民集团自太安二年七月以后即受到范长生的资助，而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在蜀地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李雄想推范长生为君主，自己则为臣辅佐。范长生坚决不同意，并提出：“推步太元，五行大会甲子，祚钟于李，非吾节也。”[3]从这一过程中的博弈可见双方在据巴蜀建国一事上均有所顾虑。对于李雄来说，统领六郡流民经历数年征战，其最终目的就是占有巴蜀之地，建立“流民国家”，而此时又已占有蜀地，正是成就大业之时，自立建国不可避免。但流民长期接受范长生资助，范长生既是巴蜀地方实力派，又是宗教领袖，立足巴蜀必须获得范长生的支持，因此有让位范长生的举动，这是对范长生影响力的承认，可能也有试探范长生意图的考虑。对于范长生来说，李氏六郡流民集团人数达到十余万，对于人口大量流失的巴蜀地区来说有绝对力量优势，自身虽然为巴蜀实力派，且有蜀人拥护，但也无法控制六郡流民，更难以与之直接抗衡，而且自己此前逢乱世之时即主要考虑在青城山隐居，也不想因谁为君主一事卷入巴蜀的军事冲突。因此从各个方面因素考虑，李雄表现出让位的姿态，范长生也力推李雄为主，并凭借自身道教领袖的身份给出了天命的预言。[4]

最终，当李雄平衡了内外各方关系以后，正式建国即提上了日程。永兴元年十月，杨褒、杨珪等诸将共同尊请李雄称王，李雄于是即成都王位于南郊，大赦境内，改元建兴。[5]废除西晋法律，与蜀人约法七章。以李骧为太傅，李始为太保，折冲将军李离为太尉，建威将军李云为司徒，翊军将军李璜为司空，材官将军李国为太宰，阎式为尚书令，杨褒为仆射，杨发为侍中，杨珪为尚书，李溥为益州刺史[6]，徐舉为镇南将军，王达为军师。尊母罗氏为王太后。追尊曾祖李虎为巴郡桓公，祖父李慕为陇西襄王，父李特为成都景王。追谥李辅为齐烈王，李庠为梁武王，李流为秦文王，李荡为广汉壮文公。李氏大成国政权正式建

立。

李雄即位之初仍谦抑不敢决断，事事请决于李国、李离。这应该也是因为李雄与李离在此前夺取兵权之时曾有“约与君三年迭为主”的约定，这是李雄称王建国仍然要平衡的一个内部关系。而面对李雄已经确立的绝对领导地位，李国、李离等也十分清楚此前的约定早已成为具文，二人侍奉李雄日益谨慎，大成国政治开始走上正轨。

建国后的大成国经过了一年多较为平静的时期，除了建兴元年（304）十一月，罗尚屯兵巴郡，派遣军队向蜀中劫掠，斩李雄从祖李冉，俘获李骧妻子昝氏、儿子李寿，十二月，大成国太尉李离攻汉中，杀都战帅赵汶，二年八月，李雄遣李骧进攻汉安（今四川内江市西）等事外，史籍不见有其他记载，推测李雄新取得成都建国以后，主要面临国内的建设问题而无暇顾及其他。西晋也忙于应对匈奴各族在中原的崛起，对于大成国一时无力大举讨伐，因此没有对大成国的详细记载。

到了建兴三年（306），李雄开始向南、北有所扩张。向南开始介入宁州，因南夷校尉、宁州刺史李毅坚守，李雄鼓动宁州夷人叛乱，围攻州城（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东北）。李毅病死后，其女李秀被众人推举领宁州事，对抗夷人叛乱。[7]向北则于十二月遣别帅李离寇西晋梁州。晏平二年（307）春，罗尚开始设立关戍直到汉安、僰道（今四川宜宾市，一说今宜宾市西），并侨置郡县以安置巴蜀流民，又在诸村坞堡设置参军以强化防御。

三月，关中流民邓定、訇氐等占据城固，并劫掠汉中，西晋巴西太守张燕率牙门武肇、汉中郡丞宣定围攻邓定，邓定被迫向李雄求援。五月，李雄派遣李离、李云、李璜、李凤等入汉中救援邓定。杜孟治听闻李雄出兵，命张燕撤兵回保梁州城。但张燕以邓定降而复叛，急于消灭邓定而不听杜孟治命令。李离兵到后先攻破武肇营寨，又立即攻破邓定军。张燕见状不敢对战，率百余骑兵逃走，李离大破梁州兵。牙门蔡松劝告杜孟治城不可守，但护军想据城固守。杜孟治认为李雄必欲取得汉中，虽然城池坚固，但士兵、民众已经“破胆”，无法据守。于是开城逃走，护军则北归中原。李离等在汉中屯兵十余日而归，并迁徙汉中民于成都，以弥补蜀地人口不足的问题。[8]汉中民句方、白洛等还汉中为李氏据守。

建兴三年三月，范长生自青城山来到成都，李雄亲自到城门迎接，

即拜范长生为丞相，尊称为“范贤”。又因李流之子李置没有陪同迎接，特诛杀之以显示对范长生的尊重。范长生即劝李雄称帝，六月，李雄在成都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晏平，定国号为“大成”。[9]追尊李特为景皇帝，庙号始祖；王太后罗氏为皇太后。尊范长生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长生部曲不用缴纳赋税徭役，所得租税皆入长生之家。[10]

大成政权建立以后，其国家草创，制度很不完备，各种礼法欠缺，导致将领各自以功高宠隆，争执班位。对此，尚书令阎式上书曰：

> 夫为国制法，勋尚仍旧。汉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马执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论道之职，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今国业初建，凡百未备，诸公大将班位有差，降而竞请施置，不与典故相应，宜立制度以为楷式。[11]

李雄听从了这一建议，大成政权的制度体系开始走向完备。

二 大成政权的发展与鼎盛

大成政权建国以后，从外部局势来说，匈奴汉赵、石羯后赵等在中原逐步崛起建国，西晋陷入各少数民族纷纷起兵反叛的汪洋大海之中，对北方中原地区逐渐失去控制力。北方草原和辽西地区鲜卑纷纷崛起，河西则有张氏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西晋宗室、大族开始逐渐向江南、河西、辽西迁徙。各方在北方征战不休，给了偏居西南的大成政权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晏平三年（308）十二月，大成尚书令杨褒卒。杨褒是大成国直言之臣，曾劝谏李雄卖官、酗酒、轻出等事，深为李雄器重。

另一边，大成平寇将军李凤屯兵晋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频繁北上袭扰汉中，导致汉中百姓流散到荆沔地区，梁州基本不守。西晋为了控制梁州局势，以顺阳内史（治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江夏张光为梁州刺史，修治新城。又以荆州地区寇盗不断，派遣刘璠为顺阳内史，以稳定荆州局势。

晏平四年十月，李离部将罗羕、訇琦、张金苟[12]等于梓潼（今四川绵阳市梓潼县）攻杀太尉李离，尚书令阎式时在李离处，故一同遇害。罗羕等以梓潼投降罗尚[13]，十二月，訇琦等将李离母子送于罗尚，罗尚斩之，并以李离妻女奴婢分赐将士。李雄派遣太傅李骧、司徒李云、司空李璜等进攻梓潼，但未能攻克，李云、李璜反而战死。罗尚又遣平西参军向奋屯兵安汉（今四川南充市北）之宜福，张罗屯兵平无（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东北）以压迫李雄，李雄率兵进攻向奋，未能取胜。梓潼的丢失给了周边各种力量以机会。此前谯周之子居于巴西（今四川阆中市），被大成国巴西太守马脱所杀，其子谯登前往镇南将军刘弘处请求军队以复仇。刘弘于是上表请封谯登为扬烈将军、梓潼内史，使其招募巴蜀流民为兵。谯登招募士兵两千余人后即西进，到达巴郡（今四川南充市北）后向罗尚请求增加兵力，但被罗尚拒绝。谯登于是猛攻宕渠（今四川达州市渠县东北），斩巴西太守马脱，食马脱之肝复仇。此时正逢罗羕等以梓潼投降，谯登于是进入涪城（今四川绵阳市东），李雄进攻谯登，反被谯登所败。又有西晋折冲将军张罗进据犍为合水，使大成国在东面受到的压力进一步增大。晏平五年二月，大成国在东面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李国部将文硕（一作文石）[14]杀太宰李国

于巴西，以巴西归降罗尚。梓潼、巴西均为西晋所控制。

东北方向一些重镇的不断丢失使大成国东北边疆几乎门户大开。四月，李雄因部将张宝之弟在訇琦营中，对张宝提到如果其能够重新夺回梓潼，即以此前梓潼守将李离的官职——太尉封赏张宝。张宝于是先杀人犯法，假意亡命逃奔梓潼。訇琦等对张宝十分信任，将其作为心腹之人。恰巧此时罗尚使者来到梓潼慰劳訇琦等人，訇琦等出城迎接，张宝于是在城中关闭城门据守，訇琦等无奈之下逃奔巴西，李雄由此重新夺回梓潼，随即按照此前的约定加封张宝为太尉。七月，与李氏集团争斗数年之久的罗尚卒于巴郡，西晋另以长沙太守皮素代之。

此时李雄亲自率兵进攻向奋，向奋抵挡不住退走。十一月，太傅李骧进攻谯登的涪城。恰巧皮素到达巴东（今重庆奉节县东），便派平西将张顺、杨显救援谯登。罗尚之子罗宇及其手下素来嫌恶谯登，见谯登陷入重围而不给其补充军粮。益州刺史皮素大怒，准备对罗宇治罪，双方产生矛盾。十二月，皮素到达巴郡，罗宇即趁夜派降人天水赵攀、阎兰等刺杀了皮素，建平都尉暴重又杀死罗宇，巴郡大乱，再无力援助谯登。李骧得知谯登食尽援绝，于是加紧攻击涪城。涪城内军民缺乏粮食，只能捉老鼠吃，饿死人数甚众，但仍没有一人叛离。李骧之子李寿本在谯登处，谯登最初想以李寿引诱李骧，但此时被攻紧急，救援不至，便将李寿放归李骧。另一边，为了稳定巴郡形势，平西将军府、益州刺史府、西戎校尉府等属官上表请巴东监军、冠军将军韩松为益州刺史，治巴东。大成国东部的形势有所好转。

在南边，大成政权不断袭扰宁州，宁州内部又不断爆发夷人叛乱，城邑多变为废墟。晏平五年，西晋宁州刺史王逊到达宁州，上表请李钊为朱提（今云南昭通市）太守以防御李雄。王逊在内节衣缩食，勤政不倦，在外招集逃散人口，诛杀不遵法纪的豪右，打击叛乱蛮夷，最终使宁州形势好转，也使大成政权南下受阻。

玉衡元年（311）正月十七日，李骧攻拔涪城，俘获梓潼太守谯登。太保李始督李凤攻拔巴西，杀太守文硕。连续的胜利使李雄大喜，于是大赦境内，改元玉衡。谯登被押解到成都之后，李雄本想加以宽宥，但谯登言辞坚定不屈，李雄无奈，杀之。随即李雄又聚众进攻僰道，击走犍为太守魏纪，击杀江阳太守姚袭。二月，原本投降罗尚的氐人苻成、隗文[15]反叛，从宜都（今湖北宜昌市东南）逃往巴东，建平都尉暴重讨伐苻成等，就势击杀益州刺史韩松，自领三府事。到了三

月，益州官员同谋击杀暴重，并上表请巴郡太守张罗掌三府事。大约在此时，张罗又招募李雄姨弟任小刺杀李雄，几乎成功。

张罗继任后亲自讨伐隗文，迫使其投降。但不久隗文再次叛乱，劫持巴郡太守黄龛。张罗随即遣军讨伐隗文，但军败身死。隗文等人见荆州不宜立足，于是驱赶吏民西向投降李雄。任回追获西晋犍为太守魏纪。三府文武又上表请平西司马王异行三府事，领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张光复归汉中。玉衡二年，龙骧将军、江阳太守张启又与广汉罗琦杀王异，张启行三府事、罗琦为巴郡太守，三府文武又推涪陵太守向沈为西夷校尉。八月，西晋阴平都尉董冲驱逐太守王鉴，以阴平郡投降李雄。大成国东边的益州残余力量连续爆发内部动乱，西晋政府无力加以支援和控制，给大成国的进一步东进扩张埋下了伏笔。

玉衡三年三月，西晋西夷校尉向沈卒，部属推举汶山太守兰维为西夷校尉。兰维以守城艰难，率领吏民北走，准备前往巴东，途中为大成将军李恭、费黑俘虏，巴蜀盆地与李氏流民集团、成汉政权持续对抗的地主豪门被消灭殆尽。

玉衡四年正月，在梁州发动叛乱的杨虎难以立足，劫掠汉中吏民奔于大成国。扶风人邓定也率领流民数千家入蜀。梁州人张咸等起兵驱逐占据梁州的氐王杨难敌，杨难敌退走后，张咸等即以其地归降大成。大成国获得汉嘉（今四川雅安市芦山县，一说雅安市名山区北）、涪陵（今重庆涪陵区）、汉中之地，益、梁、宁三州多入大成国，李雄于是以李凤为征北大将军、梁州刺史，任回为镇南大将军、南夷校尉、宁州刺史，李恭为征东大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但此时除益、梁二州外，宁州、荆州多为虚封。同时，武都氐王杨难敌等为刘曜击破，逃奔葭萌（今四川广元市西南），并以子为质于大成。随着大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又有天水陈安向李雄称臣，西晋湘州刺史杜弢向大成求援，西晋凉州刺史张骏遣使通好，汉嘉夷王冲[16]遣子为质，朱提雷炤率民归降，梁水太守爨量（一作重）[17]、益州太守李遏投诚示好等举动，大成政权一时在西部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决定力量。

与外部形势逐步好转相对应，大成国内部也开始走上高速繁荣的发展道路。李雄、李骧于内政上勤恤百姓，李凤、李回、李恭招纳流民于外，成果显著。在用人方面，李雄能够随才授任，而且很包容，善于纳谏。如氐人苻成、隗文等对李雄反复叛离，甚至刀伤其母，李雄对苻成等人并不怪罪，反而厚待二人，仍以之为将。又有杨褒劝谏李雄三事，

史载：

> 雄意在招致远方，国用不足，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杨褒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当网罗四海，何有以官买金邪！"雄逊辞谢之。后雄尝酒醉而推中书令，杖太官令，褒进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为酗也！"雄即舍之。雄无事小出，褒于后持矛驰马过雄。雄怪问之，对曰："夫统天下之重，如臣乘恶马而持矛也，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是以马驰而不制也。"雄寤，即还。[18]

此外，李雄母亲罗氏病卒，李雄信巫觋之言，乃至准备不葬，被司空赵肃劝止。李雄又想服丧三年，经过李骧、上官惇、任回等的反复劝谏，最终除服亲政。在司法方面，李雄也宽松以治，"刑政宽简，狱无滞囚""刑不滥及"。李雄积极听取意见，以及较为宽容的政刑态度给了大成国宽松的政治环境。

在恢复社会经济方面，李雄确定赋税为每年丁男谷三斛，丁女一斛五斗，疾病者减半，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事少役稀，民多富实"。而对新投附的百姓，李雄皆免除其赋役，以安定之。这些措施使大成国社会经济恢复很快，乃至达到"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的状态。在文化教育方面，李雄兴办学校，设置学官。经过李雄等人的不断努力，大成政权"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归附大成国者日月相继。故大成国内部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平稳，此后内政上仅有玉衡五年正月，李雄立妻子任氏为皇后，玉衡八年四月，丞相范长生卒，李雄以范长生之子侍中范贲为丞相几事。

在外部，大成国向北、向南均有扩张。玉衡六年五月，因西晋宁州刺史王逊严厉且喜欢诛杀，平夷太守雷炤、平乐太守董霸、流民阴贡攻破牂柯（今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东北）、平夷（今贵州毕节市）、南广（今四川宜宾市筠连县西南），率三千余家叛归大成。玉衡七年正月，李雄派李恭、罗寅寇巴东。

李雄侄子李稚本来屯兵晋寿，而大成梁州刺史李凤常年在北方作战，功勋卓著，李稚对此十分忌惮，李凤也深感危机。玉衡八年十二月，李凤感觉无法自立，以巴西叛。李雄派遣太尉李骧讨伐李凤，但李骧久驻梓潼不进军。李雄于是亲自前往涪城督战，李骧不得已进军，击斩李凤，改以李寿为梁州刺史、督巴西郡，总理北方之事。

玉衡十年，此前投奔大成的杨难敌、杨坚头等人，因贿赂晋寿守将

李稚而没有被送到成都，反而被放回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成县西）。杨难敌返回武都后即叛离大成国，转而依靠险要地势多行不法，如玉衡十年杨氏攻走大成阴平太守罗演，夺取阴平郡（今甘肃陇南市文县西）地，使李稚自悔失策，转向李雄建议讨伐杨难敌。李雄听从建议，但群臣对此多不赞成，李雄一意孤行，派遣侍中、中领军李琀，将军乐次、费他、李乾等由白水桥进攻下辩（今甘肃陇南市成县西北），征东将军李寿统李玝进攻阴平，两路进攻杨难敌。杨难敌先遣军抵御李寿、李玝，使二人进退不得。另一边的李琀、李稚则长驱直入到达武街（今甘肃陇南市成县西北），又被杨难敌遣兵切断退路，李寿一支被拖住救援不至，导致李稚等陷入重围，李稚、李琀被俘皆死，士兵死者数千人（一作千余人）[19]。李琀、李稚为李荡之子，有“名望志尚”，两人之死使李雄十分惋惜自责。玉衡十二年五月，李雄将张龙进攻巴东，为东晋建平太守柳纯击败。此后数年，大成国没有再向北发动军事行动。

解决北方动荡之后，李雄开始向宁州进军。玉衡十三年正月，李骧、任回进攻台登（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南），东晋将军司马玖战死。李骧率军讨伐越嶲（一作巂）（今四川西昌市东南）。作战不利之下，东晋越嶲太守、西夷校尉李钊，汉嘉太守王载均以郡降于李骧。同年五月，李骧进兵，由小会进攻宁州刺史王逊，王逊遣姚岳抵御。李骧于堂狼（今云南安亭市富民县境）作战不利，又遇大雨，于是引军退还成都，在渡过泸水之时死伤惨重。李钊到达成都后，李雄对其十分尊崇，将“朝迁仪式，丧纪之礼”均交由李钊决断。十四年十二月，东晋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遏以兴古郡降于成。大成政权开始控制宁州部分地区。此后越嶲少数民族斯叟进攻守将任回、越嶲太守李谦，李雄派遣征南将军费黑助兵讨伐，陷入旷日持久的对斯叟作战。

李雄在军事之外的外交活动中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气度，前凉张骏曾派遣参军傅颖、治中从事张淳向李雄送信，劝说李雄去尊号向晋称臣。李雄对此回信说：

> 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在暗室，有何已已。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于斯莫大。[20]

此言得到张骏的看重。张骏又曾派遣傅颖向李雄借道，以向东晋通使，李雄不准。此后张骏派遣张淳向大成国称藩，借此通使于东晋，李

雄大喜，与张淳的一段对话表达了李雄对于晋室的矛盾心理：

> （李雄）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自称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众人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之。"[21]

又曾有巴郡以有晋兵而告急，李雄对此指出："吾常虑石勒跋扈，侵逼琅琊，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军，使人欣然。"[22]

从这几段文字可以看到，李雄一方面自立称雄，但对于"天下归心"的晋室仍心存顾忌，于是频繁试探前凉张骏，想从忠诚于东晋的前凉那里得到更多自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李雄想通过晋室的影响力来平衡自己与周边各个政权、割据力量之间的关系，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因此才有如此摇摆不定的态度。而最终李雄也仍然采用一种摇摆的态度，回旋于各方力量之间。

三 李班、李期的短暂更迭与大成政权的衰落

玉衡十二年（322）[23]正月，大成国陷入了一次有关继承人问题的争论，这次的选择成为此后大成国内乱的根源。李雄皇后任氏无子，只有庶子十余人，此外又以兄长李荡之子李班为养子，令其拜任皇后为母。此时恰逢群臣请求为国立太子，李雄即准备立养子李班为太子，维持自李特以来的嫡长子继承制，并提到自己起兵之初并没有建立帝王之业的野心，只是恰巧赶上天下大乱，被大家推举得以居帝王之位，但开创事业的功劳在先帝李特。兄长李荡本为李特嫡长子，有雄才大功，可惜功败垂成，所幸李荡子李班仁孝好学，一定能够继承先人事业。群臣十分紧张，都劝谏李雄要立亲生之子，太尉李骧、司徒王达说道："先王树冢嫡者，所以防篡夺之萌，不可不慎。吴子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专诸之祸；宋宣不立与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变。犹子之言，岂若子也？深愿陛下思之。"[24]明白指出了弊端。但李雄一意孤行，坚持立李班为太子。李骧等皆预感到这一事件必然为祸乱之始。李班为人谦恭下士、遵循礼法，十分得李雄之心，立为太子之后，李雄每有重大朝政商议，都让李班参与，为其未来施政做铺垫。

玉衡十五年十二月，东晋荆州刺史陶侃上表以零陵太守尹奉为宁州刺史。尹奉到任后，重金招募夷人刺杀投附大成国的梁水太守爨量，又招降益州太守李逷，使宁州重新由东晋统治，使大成国在南方发展不利。玉衡十六年六月，大成击破越嶲斯叟。九月，李雄遣张龙进攻涪陵，俘获太守谢俊。第二年，越嶲太守李谦将郡民迁往蜀地，以回避当地少数民族的袭扰。同时，东晋宁州秀才庞遗起兵攻成将任回、李谦等，李雄派遣罗恒、费黑前往救援。尹奉遣裨将姚岳、朱提太守杨术增援庞遗，双方战于台登（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南），杨术战死，暂时化解了南方的危局。十六年九月，大成将领张龙寇涪陵，俘获太守谢俊。十八年十月，再次派遣张龙寇涪陵，俘获太守赵弼。

玉衡十八年冬，大成国太尉、汉王李骧卒，追赠相国，谥号汉献王。李骧子征东将军李寿自晋寿返回成都奔丧。李雄改以李玝为征北将军、梁州刺史，代李寿镇守晋寿。李玝到任后即修整晋寿军屯加强军备。玉衡二十年十月，李雄加封李寿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中护军、西夷校尉、侍中、录尚书事，封扶风公，统领如李骧，并命李寿督征南将军费黑、征东将军任邵等攻拔巴东，东晋巴东太守杨谦、监军毌

丘奥退走，杨谦退保建平（今重庆市巫山县），毌丘奥退保宜都（今湖北宜昌市东南），李寿再遣费黑进攻建平。此时又有梓潼、建平、汉固三郡蛮巴叛降于石勒，可能即与大成国在此的攻伐有关。[25]玉衡二十一年春，李寿自建平返回，以任邵屯兵巴东。李雄以子李越为车骑将军，驻军广汉（今四川遂宁市射洪市南）。七月，李寿再次率兵讨伐阴平、武都，迫降杨难敌。冬，李雄修筑涪县城，进一步加强防御。玉衡二十二年，李寿大举出兵进攻宁州，以征南将军费黑[26]为司马，与邵攀等为前锋，出广汉，自南广入，又派遣镇南将军任回（一作任回子调）[27]由越嶲（今四川西昌市东南）进军，征讨木落，分化宁州兵力。十月，李寿、费黑兵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坚守。宁州刺史尹奉派遣建宁太守霍彪、夷人大姓爨深等助兵董炳。此时李寿已经围城，见霍彪援军到来，准备收兵先抵御霍彪。费黑认为朱提城中粮食短缺，霍彪等援军也没有太多随军粮食，应该将霍彪等放入朱提城，这样就能快速消耗城中存粮，利于后续的攻城作战。但霍彪等援军入城后，李寿一时仍然无法快速攻下城池，于是准备全力猛攻。费黑又建议："南中道险，俗好反乱，宜必待其诈勇已困。但当日月制之，全军取胜，以求有馀。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28]李寿没有听从建议，全力攻城之下果然失利，由此十分钦佩费黑计谋，将军事谋划之权完全委托给费黑。到了第二年正月，经过长时间的围城战之后，朱提城终于不守，董炳、霍彪出城投降，李寿名声大振。三月，宁州刺史尹奉在内外交困之下也举州投降，李寿将尹奉送入成都，李雄以李寿为宁州刺史，大赦境内。宁州除牂柯外均被大成国所控制。[29]

至此，大成国政权以益州为核心，北控梁州，南取宁州，东进荆州，在西部地区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势力范围，实力达到极盛。李寿也因一系列的战功成为大成国军政方面的头号人物，为其后来的建国埋下了伏笔。

宁州平定以后，大成国军队最初在南中管理严格，并不扰民，此后逐渐松懈，开始欺凌劫掠百姓，导致大成国南中统治发生动荡。玉衡二十三年秋，建宁百姓毛衍、罗屯等叛乱，杀死太守邵攀；牂柯太守谢恕以郡投降东晋，但被李寿击破。李雄又遣李班率军讨平宁州夷人，加李班抚军将军。玉衡二十四年三月，为了更好地控制南中地区，李雄分宁州置交州，以霍彪为宁州刺史，爨深为交州刺史，封李寿为建宁王。宁州、交州的南中之地实际掌控在爨、霍两个地方大姓手中。[30]

六月，李雄患病，头上生疡，往年作战所负伤口均流脓溃烂。李雄诸子见状皆嫌恶而远之，只有太子李班日夜侍奉，衣不解带，并亲自吮脓、尝药，使李雄深感自己选人不误。为稳定权力的交接，李雄将大将军、建宁王李寿召回，下诏令李寿辅政。后六日李雄死，卒年六十一岁，谥号武皇帝，庙号太宗。李班即皇帝位。十月[31]，葬李雄于成都安都陵。李雄既是大成国政权的实际建立者，也是推动大成国走向鼎盛的皇帝，但其在位时期也为大成国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隐患，继承人的选择就是其一。古代史臣对此即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 仲儁天挺英姿，见称奇伟，摧锋累载，克隆霸业。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阳之故地，薄赋而绥弊俗，约法而悦新邦，拟于其伦，实孙权之亚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训，继体承基，前修茂范。而雄暗经国之远图，蹈匹夫之小节，传大统于犹子，讬强兵于厥胤。遗骸莫敛，寻戈之衅已深；星纪未周，倾巢之衅便及。虽云天道，抑亦人谋。[32]

即指出了继承人的选择和军事力量的分配是李雄得失的关键。

李班，字世文，作为李雄养子，从个人德行等方面来看，具有较高素质。史载李班好学爱士，“谦虚博纳，敬爱儒贤”。以名士王嘏、天水人文夔、陇西人董融等为师友，又以司徒何点、李钊等为名臣，皆待以师礼，“进止周旋，勤于咨问”。而且性格仁爱、行为举动符合法度。当时李氏子弟大多崇尚奢靡，李班经常严厉训诫诸人。曾发表议论曰：

> 吾见周灵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惭色，何古人之难及乎！[33]

又曾对当时大成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提出意见：

> 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34]

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李班对汉文化修养的追求，以及对当时基层社会困境的了解。但他又有性格较为轻浮急躁、酷爱田猎等不足。而从此后的行事来看，对礼制法度的过度遵循、对政治局势认识的不足也成为李班失败的重要原因。

李班即位后，即以建宁王李寿录尚书事，与司徒何点、尚书令王瓌等参决政事，自己则居中行丧礼，对外界的政治形势走向一无干预，为政变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李雄之子车骑将军李越、安东将军李期等因李班本非李雄亲生之子，如今却继承大位一事十分不满。李越原本屯兵江阳，因奔李雄之丧赶到成都，于是与李期共同谋划叛乱。李班之弟李玝也自梁州返回成都奔丧，见状感到事情不妙，便劝说李班命令李越返回江阳，并任命李期为梁州刺史，代替自己出镇葭萌，以解决燃眉之急。李班以葬礼尚未完成，不忍心将二人发放外出，甚至为了消除二人的疑虑，将李玝外派屯兵于涪城。此时又有两道白气通天，太史令韩豹（一作约）[35]以“宫中有阴谋兵气，戒在亲戚”的观气之法劝告李班，也不被李班采纳。李期见事情紧急，于是与李越商定之后，即于玉衡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乘李班夜间哭灵之机，在殡宫杀李班。又杀李班兄长领军将军李都，并李班子李幽、李颙等人。又伪造太后任氏命令，下诏罗列李班之罪而废之。[36]李班之弟李玝与其将焦哙、罗凯等投降东晋。

李班死后，众人准备推举李越为主，但李越以李期为任氏养大，又多才艺，于是让位于李期。二十四日，李期即皇帝位，改元玉恒，上李班谥号戾太子[37]。李期，字世运，为李雄第四子，因生母冉氏身份微贱，被李雄皇后任氏养大。李期本身聪明好学多才艺，名声很好。李雄曾经命令诸子及宗室子弟招募部曲，以测试各人的能力和声名威信，诸子招集多的也不过数百人，只有李期招纳千余人，表现出了出色的个人能力。此外，李期在用人上也多有建树，所推荐的人李雄多加以任命，因此长史等各级官署多出自李期推荐。而李期在基层官员中的影响力也是其能最终得以政变成功、继承皇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期虽然即位，但其帝位得自政变，故并不为众人认可。李始即向李寿提议，准备一起进攻李期，李寿不敢发动。李始见状大怒，转而向李期进谗言，污蔑李寿。但因李玝此时率兵在外叛乱，李期准备借重李寿的军事能力讨伐李玝，于是派遣李寿率兵前往涪城讨伐李玝。李寿并未直接发兵，而是以书信告知李玝去留之间的利害关系，迫使李玝弃城投奔东晋。此后，李玝在东晋历任巴郡、襄阳、宜都太守，所在仍不离荆益之地，最终死于永和三年（347）。解决李玝问题后，李期即以李寿为梁州刺史、东羌校尉，统领北边事务。

玉恒元年（335）正月，李期大赦境内，改元玉恒，并立妻子阎氏为皇后。

在内部，李期对大成国职官体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玉衡二十四年十月，以李越为相国、大将军、建宁王，与李寿共同录尚书事；加封李

寿大都督、中护军，改封汉王，食梁州五郡；以李霸为中领军、镇南大将军，李保为镇西大将军、西夷校尉、汶山太守，李始为征东大将军，代李越镇江阳。玉恒元年正月，李期又以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瓌为司徒。[38]秋，又以司隶校尉景骞为尚书令，征南将军费黑为司隶校尉，戾太子李班之舅罗演为仆射。

九月，罗演与汉王（李寿）相上官澹谋杀李期，另立李班之子李幽。但事情被李期发觉，李期杀罗演、上官澹及李班之母罗氏、李琀之子、李稚之妻昝氏等人。

李期见内外形势逐渐稳定，于是自以为得志，对李雄旧臣十分轻视，只信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中常侍许涪等亲近之人，国家政治、司法均交由几人决断，而不再通过其他公卿人物，大成国由此纲纪紊乱，鼎盛形势开始衰落。但李期并没有停止在内部的诛杀，反而对各旧臣猜忌日甚。玉恒二年（336）十月，李期因顾忌侄子尚书仆射、武陵公李载才能出色，于是污蔑李载谋反，下狱杀之。此外，李雄之子李霸、李保也因病暴毙，均被怀疑是李期所为。李期的一系列诛杀行为导致大臣各个心怀疑惧，骨肉亲情均无法顾及。

相对于内部频繁的调整，李期朝在对外发展上并无太多建树。仅见有玉恒二年十一月，因东晋建威将军司马勋屯兵汉中，李期派遣汉王李寿北上攻陷汉中，并置汉中守宰，在南郑屯兵戍守。同年十月，东晋广州刺史邓岳派遣督护王随击夜郎、新昌太守陶协击兴古，自大成国夺取二郡。

李期虽然缺乏向外扩展的野心，但在内则日益骄奢淫逸，又对大臣多有诛杀，借此将死者财物、妇女纳入后宫。有进谏者则降罪处罚，导致内外大臣人人自危，道路以目。当时又有“天雨大鱼于宫中，其色黄。又宫中豕犬交”的异象，可知形势动荡不稳、人心思变之势。在李期恐怖统治中最为紧张的就是李寿。李寿作为李雄遗诏的辅政大臣，身份尊贵，并且威名远播，尤其为李期、建宁王李越、景骞等忌惮。李寿见李期、李越等兄弟十余人均值壮年，多手握强兵，李期又在内部对旧臣多有诛杀，于是深感忧虑。本来李寿屯兵于涪城，依制度每年应入朝朝觐，但李寿害怕入朝为李期所害，于是每次当入朝之时，便伪造汉中守将张才的告急文书，声称有外寇入侵，以此为托词避免前往成都。

为了寻找出路，李寿又四处寻找有名谋士以获取安身立命之法。巴

西处士龚壮父亲和叔父均死于李特之乱，龚壮时刻准备复仇，数年不除丧服。李寿听闻龚壮有才略，于是数次以礼征辟，龚壮不准备跟从李寿，但又害怕激怒李寿，于是多次前往李寿处为其出谋划策。当时正巧有“岷山崩，江水竭”的现象，李寿对此十分嫌恶，暗中询问龚壮如何能够自安。龚壮也准备借李寿之手报仇，于是给李寿谋划曰：

> 立事何如舍小从大，以危易安。开国裂土，长为诸侯。名高桓文，勋流百代矣。[39]

> 巴、蜀之民本皆晋臣，节下若能发兵西取成都，称藩于晋，谁不争为节下奋臂前驱者！如此则福流子孙，名垂不朽，岂徒脱今日之祸而已！[40]

指出李寿应该自立，甚至寻求东晋的帮助。龚壮的目的在于诱导李寿与李期冲突，甚至两败俱伤，借此复仇。李寿则对此计策深为满意，于是暗中又与长史罗恒、解思明谋划进攻成都、向晋称藩。

但李寿的行动逐渐被李期听闻，李期与李越、景骞、田褒、姚华等谋划袭击李寿，先发制人，数次派遣许涪前往李寿处探听动静，又鸩杀李寿之弟安北将军李攸[41]，双方矛盾日渐激化。李寿伪造妹夫任调书信，声称李期要取李寿，李寿部众信以为真，反对李期的士气高涨。李寿于是率领步骑兵万余人，以李奕为前锋从涪城进袭成都，又声言诛杀奸臣李越、景骞，并答应部众在破城之时可以劫掠城中财物，以激励士气。

李期对于李寿起兵还没有充分的准备，而且李寿之子翊军校尉李势正在成都，开城门接纳李寿军，李寿因此不战而得成都，屯兵于宫门。李越请求李期拿出宫中财物招募百姓与李寿作战，但李期仍对李寿有所幻想，认为李寿不会刻薄自己，没有采纳李越的意见，反而遣侍中犒劳李寿。李寿上奏相国、建宁王李越，尚书令、河南公景骞，尚书田褒（一作田衮）[42]、姚华，中常侍许涪，征西将军李遐，将军李西等奸臣乱政，请将诸人收而杀之。另一边，李寿又假造太后任氏诏令，废李期为邛都县公，幽禁于别宫。李期无奈叹息曰“天下主乃当为小县公，不如死也”，于五月自杀。李寿又杀李期、李始等兄弟十余人，以绝后患，至此李雄之子均为李寿所杀。李寿另上李期谥号为幽公，并以王礼安葬，又追改戾太子李班谥号为哀皇帝。同时李寿也话复前言，放纵手下士兵掳掠，乃至有士兵奸掠至李雄之女、李氏诸妇女，而且多所残害，成都内乱数天才定下来。

政变成功后，李寿开始面对如何自处及大成未来走向等问题，罗恒、解思明、李奕、王利等人均劝李寿依照此前谋划，降号改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以龚壮为长史，称藩于东晋，送邛都公李期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另一边，任调、司马蔡兴、侍中李艳以及张烈等则劝李寿称帝。李寿想称帝，但又犹豫，于是命人以卜筮来决定。占者算出李寿能够当数年天子，任调大喜说："一日尚为足，而况数年乎！"解思明仍坚持己见，认为当数年天子怎么能和当"百世诸侯"相比，双方争执不休。李寿本意已经倾向于称帝了，此时即以任调之言为上策，于南郊即皇帝位，以自己出身汉王而改国号为汉[43]，改元汉兴。又以董皎为相国，罗恒、马当为股肱，李奕、任调、李闳为爪牙，解思明为谋主。以安车束帛聘龚壮为太师，龚壮拒绝不仕，对李寿所赠财物一无所取，李寿特别允许龚壮缟巾素带居师友之位。

大成国自李雄于304年称成都王，306年称帝建立大成国，历两代三任君主三十余年，至此国号变异，开始了成汉国家发展的新阶段。

[1] 《太平御览·偏霸部七·李雄》作"大虹"，《晋书·李雄载记》作"大蛇"。

[2] 此处依任乃强《华阳国志》卷8 《大同志》，第469页注⒅考证。

[3]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雄》。

[4] 学术界相关探讨参见前注所引。任乃强认为范长生实劝李雄自立而非自王，盖亦劝雄与其众耕垦自给，奉行"太平道"之治术，非即劝雄自立为封建王国之首领。此其与李雄诸人思想意识根本分歧处。然李雄个人，思想上实受其影响。参见《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6～487页注⑥。

[5] 此事各书记载出入较多，此处依任乃强考证。见《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8～489页注⑩。

[6] 考证见任乃强《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7～488页注⑥。

[7] 此事各书记载有异，《资治通鉴》卷86考异曰："怀帝纪：'永嘉元年五月，建宁郡夷攻陷宁州，死者三千余人。'李雄载记曰：'南夷李毅固守不降，雄诱建宁夷使讨之。毅病卒，城陷，杀壮士三千余人，送妇女千口于成都。'王逊传云：'李毅卒，城中奉毅女固守经年。'华阳国志有毅卒年月及女秀守城事，今从之。"（第2719页）

[8] 《晋书·李雄载记》记李雄派李国、李云率众两万进攻汉中，梁州刺史张殷逃往长安，李国攻陷南郑，并将汉中民迁往成都之事，但无时间，以内容来看应与此为一事。

[9] 《晋书》卷4《惠帝纪》记李雄国号"蜀"，并系于永兴二年（305）（第105

页）。靳润成据此认为“蜀又称汉、成，这些国号均与蜀国号有密切联系，是从蜀国号派生出来的”，是“继承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包括政区名称）”。（《十六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但论证较为单薄。胡阿祥认为李雄起自成都，故取“成都”之成，定国号为成（《吾国与吾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126页）。祁泰履《传统中国的民族身份与道教身份认同》（《正一道教研究》第五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则认为“大成”之号取自一本道经里的一段预言，但没有详细举证。综合各说，胡阿祥所论较为确切，“成”当出自“成都”。

[10] 此事《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雄》系于十月，但李雄六月称帝，至十月才加封范长生极不合理，故不取。

[11]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6页。

[12] 此处《华阳国志·大同志》作“天水訇琦、张金苟，略阳罗羕”，《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作“罗羕、訇琦”，《晋书·李雄载记》作“罗羕、张金苟”，《资治通鉴》卷87作“天水人訇琦”。

[13] 《晋书》卷5《怀帝纪》系于九月（第119页）。

[14]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晋书·李雄载记》均作“文硕”，《华阳国志·大同志》《资治通鉴》卷87作“文石”。

[15] 《华阳国志·大同志》注中对此二人有所考证，参见该书第477页注③。

[16] 考证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0页注(25)。

[17]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作“爨量”，《资治通鉴》卷89作“爨畺”。

[18]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40页。

[19]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作“千余人”，《晋书·李雄载记》作“数千人”。

[20]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9页。

[21]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9页。

[22]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2页。《资治通鉴》卷89作“吾常忧琅邪微弱，遂为石勒所灭”（第2811页）。

[23] 时间考证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4～495页注⑨。

[24]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8～3039页。

[25]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记此事于石勒营建邺城之后，推测应大约在此时（第2748页）。

[26] 此费黑《资治通鉴》卷95记为“征东将军”（第2984页），但以前后文看应

为“征南将军”之误，故改。

[27]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作“任回子调”，《资治通鉴》卷95作“任回”。

[28]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2页。

[29] 按：对于南中地区与李氏成汉国家的互动关系，姚乐野、段玉明《论李氏据蜀与南中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认为南中毛诜、李睿、李猛等人起兵反晋，使南中晋军不敢贸然抽调重兵北上助剿李氏流民集团。杜俊、雍约激怨南中大姓显然比梓潼、繁城战事更早，也使李毅不敢抽调重兵北上。李流、李雄采取近联三蜀、远结南中的正确政策对割据起了决定作用。李氏在取得范长生支持后，继续稳定南中，遣使南中，公开支持大姓夷帅起兵反晋。永嘉元年（307）于陵承攻陷宁州，在南中行动牵制，进而重创了南中晋军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李氏兄弟所率流民集团扭转败局，其行动实际上已成为李氏割据巴蜀不可分割的部分。故在李氏割据过程中，南中大姓夷帅的反晋行动自始至终是颇具影响的。南中大姓夷帅反晋与西晋泰始六年（270）以后改变政策，转而开始扼制大姓夷帅有关。地方官多改流官，仕进特权丧失几尽，经济上的剥夺等使其向李氏靠拢。南中对于成汉割据的意义如《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纪要》指出“盖定南方然后可以固巴蜀”，大成欲长久割据巴蜀，南中势在必得，此其一。其二，南中地区自汉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对巴蜀割据已举足轻重。大成平定南中较为顺利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南中大姓夷帅对西晋政府的不满；第二，大成政权对蜀汉政策的继承。在南中治理方面，大成统治时期南中地方官主要以当地大姓夷帅任之，除军事需要外，即使遣官南中也多以南中旧任充之。平定南中对于大成的意义在于，以疆域论，平定南中使大成国所辖区域达到顶峰，在地理形势上为大成割据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政治上保证了大成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的实施。此后李寿领宁州，“后转凌掠民”，对南中大姓夷帅的态度已有不恭，激起反叛。李寿即位后改变李雄重用南中大姓夷帅的策略是极有可能的，导致了南中大姓夷帅相继叛汉，李氏割据政权也就最终在桓温大军压境下俯首称臣了。相关研究还有《宁州大姓联合成汉反对晋王朝民族压迫的斗争（公元265至420年）》，《思想战线》1976年第4期；赵晨韵《论南中大姓夷帅对成汉政权的影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年第4期；等等。

[30] 参见杨德华《论两晋时期宁州的设置及变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肖迎《成汉统治期间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

[31] 《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雄》系于“十月”，《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系于“十二月丙寅”。

[32]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李班李期李寿李势载记·史臣曰》，第3049页。

[33]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7页。

[34]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班载记》，第3041页。

[35]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作“韩约”，《晋书·李班载记》作“韩豹”。

[36] 李班葬地不详，20世纪80年代成都浆洗街桓侯巷出土一成汉墓，围绕墓主产生很多争论。如最早在四川省博物馆的《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第355页］中认为此墓为李雄墓。王毅、罗伟先《成汉墓考古记》（《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认为只能推断为一大人物尸身葬，具体身份不详。吴怡《成汉墓小考》（《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成都市博物馆编《“玉衡二十四年亲诏书立”与成汉墓主人》（《文物考古研究》，成都出版社，1993，第243～250页）认为从时间和地理位置来看，这座成汉墓不是李雄的安都陵，因雄墓在成都市北七里，李期则被废为邛都小县公后自缢，已于当年下葬邛都境内，且葬如王礼，显然也不可能是李期墓地。从该墓规模、形制来看都不可能是李寿安昌陵，李势则葬建康。此墓也不应是李班的，一是迁葬、平反昭雪李班等一系列措施皆于汉兴元年李寿上台初实施，不会等到汉兴四年或更晚才予以改葬。二是墓砖中有不少年号砖，其中“玉衡二十四年□诏书立”不应释为“亲”，而应为“辛未”连写。故“诏书立”应为设立、设置之意，即玉衡二十四年辛未皇帝下诏以烧制这种墓砖，而不是立李班为“嗣皇帝”的意思。该墓出土众多年号砖，很可能是沿用剩余的旧砖而已。墓主也不应为成汉皇室，因按当时规定、礼仪，成汉皇帝陵墓应比此墓更大和更豪华。另从该墓形制来看，此墓与同时期墓葬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随葬品量大，且发现一烧制有“邑侯王大吉祥”的字砖，可见非一般小官僚墓葬，应是成汉賨人上层及其家属合葬墓。林集友《成都外南成汉墓主试探》（《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成都外南成汉墓主再探》（《四川文物》1997年第1期）两文则与吴怡有颇多争论，坚定认为应是李班墓。一是墓中年号砖证明安葬时间应在李寿汉兴年间或稍后。从规模和形制来看肯定是成汉贵族墓，其等级超过曹魏诸侯王墓，又远比刘备惠陵低得多，应属于帝陵，但不像正规帝王陵墓。成汉又因袭晋制，尽管是賨人政权，按制度其正规帝王陵墓绝不会如此低小。综合史书、葬地、出土实物、特制砖来看，此墓应为李班之墓。李班夜间被杀，应草葬于成都附近，李寿追谥李班为哀皇帝，必要为班改葬，故所用墓砖止于汉兴，墓地自然在成都附近。且班袭位仅四个月，既未改元，又未预政，实际并未君临天下，加之李寿进成都时“许赏城中资财”，导致汉兴初国库空虚，故李班虽为嗣皇帝，但墓冢比一般帝王陵墓在规模、形制方面相形见绌。而为了给李班昭雪，特别烧制了“玉衡二十四年亲诏书立”的墓砖。而且墓砖上的“亲”字十分清晰，为古代“親”字省文。解释为“辛未”有一定问题，一是皇帝没有必要下诏烧制墓砖；二是古代干支纪日必系以年月，墓中砖上干支错误应是由于民间砖工所作，“汉兴二年岁在甲子造”砖倒可能沿用过去剩余旧砖，“玉衡二十四年亲诏书立”砖是成汉皇室特别砖，不应发生没有干支纪日的疏误。此砖为李寿改葬李班时特别烧制，以此为李班昭雪，暴露李期阴谋篡位、弑君自立、矫诏诬陷李班的罪恶，表明李寿起兵讨伐李期是诛乱臣贼子。而“亲诏书立”李班为嗣皇帝有其必要性，是李雄担心自己死后李班不能顺利继位，或者以后帝位不稳。此外，賨邑侯是百年前曹魏时事，流民入蜀及起义未见有賨邑侯参加的情况，六郡大姓首领此时已被排除殆尽，成都诸李也几乎被斩尽杀绝，故也只能是李班墓。

[37] 林集友《成都外南成汉墓主试探》（《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认为李期上李班谥号“戾太子”是别有用心。一是想向朝野表明李班并未袭位，不是“嗣皇帝”，仅是个“太子”，二是诬蔑李班对李雄心怀叵测，虽是太子，李雄不可能要他承袭帝

位，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说明李班得罪先帝，杀之有理，另一方面说明自己承继大统名正言顺）。

[38] 此处各人官职各书标点有异，《晋书·李期载记》标点为："以其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瓌为司徒。"（第3042页）《资治通鉴》卷95则标点为："以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瓌为司徒。"（第3000页）从此前各人官职情况来看，王瓌确实出任尚书令，但无骠骑将军等军职经历；尹奉以卫将军出任右丞相、骠骑将军也更为合理。

[39]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0页。

[4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6，第3016～3017页。

[41] 《资治通鉴》卷96、《晋书·李寿载记》均记为李期鸩杀李攸，《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则记为李攸从成都病还涪城，不幸死于道中，李寿谎称李攸为李越用药毒杀。

[42] 《资治通鉴》卷96、《晋书·李期载记》均作"田褒"，《太平御览·偏霸七·李期》则作"田衮"。

[43] 胡阿祥认为李寿改用汉国号，直接原因当是沿袭他本来的汉王封号，从而显得渊源有自。当然，成国的规模与刘备的汉相仿佛，以及李寿为汉王时有汉中郡地，也与李寿定国号为汉有关，李寿新定的年号"汉兴"也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盖国号为汉、年号汉兴，与刘备的汉乃至刘邦的汉攀上了关系，从而使自己实质得自篡夺的政权，蒙上了一层"正统"色彩。《吾国与吾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126页。

〖第四章〗 汉政权的兴衰

李氏的汉国由李寿建立，仅有二主和数年国运，其实质仍是大成国的延续，是李氏成汉国家发展的最后阶段。

一 由成到汉与李寿治国

汉国建立者李寿字武考，为李骧之子。其人自幼聪明好学，气量豁达，而且崇尚礼法，与其他李氏子弟有所不同，因此为李雄看重。称帝后，李寿为强化自身帝位、国家的神圣性，改立宗庙，追尊父亲李骧为献皇帝，母亲昝氏为皇太后，汉王妃阎氏为皇后，世子李势为皇太子。以李骧为汉始祖庙，李特、李雄旧庙改为大成庙，下书与李期、李越别族，并对大成国各种制度多有变更。在用人上，除董皎外，李寿以罗恒为尚书令，解思明为广汉太守，任调为镇北将军、东羌校尉、梁州刺史，总领北方事务，李奕为镇西将军、西夷校尉；省交州入宁州，以李权为宁州刺史；等等。史称经过一系列调整后“成都诸李子弟无复秉兵马形势者，雄时旧臣及六郡人皆斥废也”[1]，“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在权力结构中完成了从六郡流民集团向李寿梁州府属系统的过渡。

汉兴元年（338）七月，因前广汉太守李乾与诸大臣谋废李寿[2]，李寿使儿子李广与诸大臣于前殿结盟，约为兄弟，又将李乾改任汉嘉太守。另以李闳为征东将军、荆州刺史，镇守巴郡（今四川南充市北）。这一阶段蜀地又出现暴风雨，到了八月，宫殿端门受损，禾苗损伤导致百姓饥疫困苦，等等。这些天灾使李寿十分忧惧，于是命大臣上奏得失。龚壮趁机上奏道：

> 臣闻阴德必有阳报。故于公理狱，高门待封。伏惟献皇帝宽仁厚惠，宥罪甚众。灵德洪洽，诞钟陛下。陛下天性忠笃，受遗建节，志齐周、霍，诚贯神明。而志绪违理，颠覆顾命。管蔡既兴，谗谀滋蔓。大义灭亲，拨乱济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众，举国称藩。天应人悦，白鱼登舟，霆震助威，烈风顺义。神诚允畅，日月光明。而论者未喻，权时定制。淫雨氾渍，垂向百日，禾稼伤损。加之饥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监示陛下。又前日之举，止以救祸。陛下至心，本无大图。而今久不变，天下之人，谁复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宫之谶难知，而盟誓顾违，一旦疆场有急，内外骚动。不可不深思长久之策，永为子孙之计也。愚谓宜遵前盟誓，结援吴会，以亲天子。彼必崇重，封国历世。虽降阶一等，永为灵德。宗庙相承，福祉无穷。君臣铭勋于上，生民宁息于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义，垂拱南面，歌诗兴礼，上与彭、韦争美，下与齐、晋抗德，岂不休哉！论者或言：“二州人附晋必荣，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公孙述时，流民康济。及汉征蜀，残民太半。钟邓之役，放兵大掠，谁复别楚、蜀者乎！论者或不达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鲁皆然。及汉，藩王亦有丞相。今义归彼，但当崇重，岂当减削？

昔刘氏郡守令长方仕州郡者，国亡主易故也。今日义举，主荣臣赖，宁可同日而论也？论者又谓，臣当为法正。陛下覆臣如天，养臣如地，恣臣所安。至于名荣，汉、晋不处，臣复何为当侔法正？论者或言：晋家必责质任，及征兵伐胡，何以应之？案晋不烦尺兵，一国来附，威卷四海，广地万里，何任之责？胡之在北，亦此之忧。今平居有东北之虞，纵令征兵，但援汉川，犹差二门耳。臣托附深重，忘疲病之秽。实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补明时。常惧殒殁，不写愚心，辜负恩顾。谨进悾悾，伏愿罪戮。[3]

龚壮上书仍是以附晋为说辞，将不好的天象归结于此，想推动李寿话复前言尊崇晋室，这也代表了汉国政权内部很大一部分人的主张。李寿自然不肯同意，对龚壮之言十分不悦，但此前有让大臣极言进谏而不加罪的承诺，龚壮又有较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没有进一步深究，只将龚壮上奏密藏不宣。

九月，仆射任颜谋反被杀，任颜为李雄任太后之弟。李寿于是将李雄子李豹等悉数杀死，以杜绝诸大臣以李雄诸子为谋反借口的可能。

汉兴二年二月，东晋进兵攻打巴郡。荆州刺史李闳最初曾与李寿约定，将牛鞞（今四川简阳市西北）以东土地分予李闳，但李寿内部罗恒、解思明等人[4]认为不可行，于是没有遵守约定。此时东晋进兵，李寿便想借东晋之手除掉李闳，并没有出兵救援，李闳因此被俘，这一事件导致李闳之弟李艳与朝中大臣产生矛盾。三月，李寿改以李奕为镇东将军，代替李闳。东晋广州刺史邓岳又率兵进攻汉国宁州，建宁太守孟彦执宁州刺史霍彪投降，李寿遣右将军李位都率兵讨伐。汉国在东部、南部均开始受到东晋打击，疆域陷入收缩的境地。同年秋，因尚书李摅祖李毅曾为晋宁州刺史，在南中人中较有恩信，于是以李摅为御史，入南中安抚人心。九月，李寿生病，罗恒、解思明等再次劝说李寿尊奉晋室。但巴郡刚刚被破，李寿认为此时依附东晋，东晋必然会就势进兵，于局势不利，因此没有听从。李演又自越嶲（今四川西昌市东南）上书，劝说李寿降号称王，李寿大怒，诛杀李演，以此来威慑主张降晋一派的龚壮、罗恒、解思明等人。到十二月，李奕率兵进攻巴东，击斩守将劳杨。

李寿称帝后逐渐改变了以往谦恭的姿态，自比汉武帝、魏明帝，而对父兄等当年的流民所为深感耻辱，命令上书之人不得提及先世所作所为，认为自己早已超迈先辈。舍人杜袭作诗十篇[5]，托言为曹魏应璩所写，献于李寿加以讽谏。但李寿十分不屑，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贤哲之话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6]

汉兴三年三月，李位都等人入宁州攻拔丹川（今云南曲靖市附近），守将孟彦、刘齐、李秋战死。又遣李奕征牂柯，因太守谢恕保城据守，一时无法攻克，最终粮尽退兵。[7]

另一边，李闳自东晋逃往后赵，李寿听闻后即派遣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出使后赵，向石虎讨要李闳。[8]但李寿书信中称石虎为“赵王石君”，贬低石虎身份，使石虎大怒，将此事交由群臣商议对策。中书监王波提议：让李闳发死誓，回到成都会纠结宗族，归顺后赵，这样可以不用劳动军队而平定益、梁二州；即使李闳不守誓言，也不过少了一个亡命之人而已；对于与李寿的交往，因为李寿已经称帝，如果对其下诏书，李寿也一定会以诏书往返，不如仍以书信与之。此时又有挹娄国向后赵献楛矢石砮，王波又建议将楛矢石砮一起送到汉国，使李寿了解后赵威服远方之功。石虎听从了王波的建议，遣送李闳回归成都。[9]李寿见到后赵所送楛矢石砮，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将其称为“羯使来庭，贡其楛矢”，石虎听闻大怒，但又无计可施，只能罢黜王波。李寿见后赵书信提到想与汉国连兵进攻东晋、平分天下，于是下书宣称：“吴会遗烬，久逋天诛，今将大兴百万，躬行天罚。”[10]命令境内大修战船，兵士戒严，修缮甲胄，准备粮草，以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假节钺，营建东阅兵场，阅兵七万余人，命士兵乘船沿江而上通过成都，李寿登城观望检阅，准备讨伐东晋。但大臣均加以劝解，认为汉国国家弱小、百姓稀少，而且东晋险远，难以取得胜利。解思明等近臣又不断加以劝谏，李寿无奈之下命令群臣讨论此事的利弊。龚壮进谏曰：

> 陛下与胡通，孰如与晋通？胡，豺狼国也。晋既灭，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势异。此虞虢之成范，已然之明戒，愿陛下熟虑之。[11]

大臣均附和龚壮的意见，李寿只得同意。

十月，李寿宴礼于太学，并将举明经者加封为好学侯。

汉兴四年十二月，李寿以太子李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掌朝政，逐渐将国家权力交给太子。

而自从李闳、王嘏等从后赵返回后，李寿得到了几人对后赵国势强盛、宫殿美丽、邺城丰实的描述，又听闻石虎用刑酷虐、王逊以杀伐控制下属，两人都能严控国家等事情，对此十分向往，逐渐改变了李雄以来宽俭治国的政策，转而以威刑统治，属下有较小过错则杀之以立威。

又感觉成都附近城邑空虚，于是迁徙周边郡县户三丁以上家庭以充实成都；为充实工匠器械，又兴建尚方御府，并将州郡有工巧之人征发充实尚方。又大肆修建宫殿，扩大太学规模，建宴殿，引水入城，所作所为都务求奢靡。汉国本为区域小国，在如此穷奢极欲之下迅速陷入困境，百姓疲于应对赋役，图谋作乱者十之八九。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均因直言劝谏被杀。汉国开始走上加速衰落的道路。

汉兴六年，李寿将宁州兴古（今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南）、永昌（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境）、云南（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朱提（今云南昭通市）、越巂、河阳（今云南大理市北）六郡分为汉州，以强化在南中的统治。四月，李寿病重，不断看见李期、蔡兴等已死之人为祟。此时东晋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出兵击败汉将李恒，攻占江阳。八月，李寿卒，谥号昭文，庙号中宗，葬于成都安昌陵。李势即位，大赦境内。

二 汉政权的衰亡

李势是成汉国家的最后一任君主，其未即位之时有着较好的声望，但在执政期间未见有太多作为。这应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李势生逢末世，已无力扶大厦于将倾；二是经过李寿的政治洗牌之后，汉国统治集团已经由六郡流民变为李寿梁州府属，而梁州府属集团与李寿之间是以旧君臣关系为核心纽带的，远不如六郡流民依靠血缘、亲缘、乡里、君臣等复杂的、多重的关系凝结起来的状态稳固，当李寿在世时尚且能够平衡这一关系，李势则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即位后必然事事掣肘，从政治形势走向来说也难以有大的作为；三是李势即位后施政转变，开始走向骄奢淫逸之路。

李势，字子仁，为李寿长子。其母李氏为李凤之女，李骧杀李凤后即以凤女妻李寿。李势容貌出众，身长七尺九寸，腰带十四围，因此深为李期喜爱，拜翊军将军，封汉王世子。李势其人善于待人接物，周围人对其深为奇异，这成为其继位的资本。

334年初，李势即位，改元太和。正月，尊阎氏为皇太后，妻子李氏为皇后。四月，太史令韩皓上奏“荧惑守心”天象，并将之解释为宗庙不修的征兆。李势命群臣商议对策，相国董皎、侍中王嘏等认为景武帝李特、成武帝李雄开创帝业，献皇帝李骧、文皇帝李寿继承基业，二者为至亲关系，不应该疏远隔绝。李势于是命祭祀大成国始祖李特、太宗李雄宗庙，并皆改为汉祀。但李势在生活上骄奢淫逸，爱财好色，经常杀人娶其妻子；在政事上不理国政，长居禁中不接待公卿大臣，对于父亲、祖父时期的臣僚疏远顾忌，只信任左右近臣小人，导致政事经于小人之手。又在司法上刑罚酷滥，加之性格多猜忌，多有诛杀，使大臣人人自危，内外离心。史官多次以灾异劝谏，史书载其各种诡异之事，如：“涪陵民乐氏妇头上生角，长二寸，凡三截之。又有民马氏妇，妊身，而胁下生，其母无恙，儿亦长育。有马生驹一头，二身相著，六耳，一牡一牝。又有天雨血于江南，数亩许。李汉家舂米，自臼中跳出。遽敛于箕中，又跳出。写于篁中，又跳出。有猿居鸟巢，至城下。地仍震，又连生毛。”[12]李势也并没有收敛行迹，反而加相国董皎为太师，以贵臣分担灾异。太和元年（344）九月，东晋巴东太守杨谦击走李势将申阳，俘获乐高。二年十二月，汉将爨頠投奔东晋。汉国开始在外部陷入日益不利的境地。与此同时，其内部也出现了问题。

太和二年八月，大将军李广见李势无子，于是请求李势封自己为皇太弟，李势不许。马当、解思明等劝说李势答应，因为李势本身兄弟不多，如果不答应此事而引发冲突，最终会导致李势人单势孤。李势见状转而怀疑马当、解思明等与李广暗中有阴谋，于是收斩马当、解思明，并诛杀三族。又派太保李奕率兵进攻李广于涪城（今四川绵阳市东），并贬李广为临邛侯，李广被迫自杀。马当、解思明二人在汉国颇有人望，解思明深有智谋，敢于诤谏，马当很得人心，二人之死使士民百姓深为哀伤，也导致汉国此后再无遵循纲纪、敢于诤谏之臣了。一如解思明死前感叹："国之不亡，以我数人在也，今其殆矣！"[13]太和三年冬，太保李奕自晋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起兵反叛，蜀中之人多追随李奕，使其兵力达到数万人，并逼近成都。李势登城亲自督战，李奕率兵攻城，单骑突门，被守门者射杀，兵众溃散。李势平息李奕之乱后，即大赦境内，改元嘉宁。

内外动荡使汉国对国家的控制力减弱，四面山中的僚人大量散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14]僚人肆意行动成为巴蜀百姓的祸患，又赶上连年饥荒，汉国境内陷入萧条。

太和三年冬，东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准备出兵伐汉，将佐僚属均认为不可。只有江夏相袁乔赞同曰：

> 夫经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胸中，不必待众言皆合也。今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势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远，不修战备。宜以精卒万人轻赍疾趋，比其觉之，我已出其险要，可一战擒也。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觎，此似是而非。胡闻我万里远征，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有侵轶，缘江诸军足以拒守，必无忧也。[15]

从袁乔所言可以看到，东晋对汉国的内部形势十分了解，故能指出其"李势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远，不修战备"等问题所在。桓温对袁乔的判断十分满意，而且急需胜利来提高威望。此外，益州地区对东晋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益州号称"天府之国"，得之能巩固东晋北伐的后方，又能增强国力。伐蜀也是桓温实施后来北伐战略的必要步骤，是其北伐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16]在这些因素推动下，这年十一月，桓温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讨伐汉国，加周抚都督梁州四郡诸军事，并以袁乔率兵两千为前锋。

太和四年二月，桓温兵到青衣（今四川乐山市）[17]，李势征发大兵，派遣右卫将军李福、镇南将军李权、前将军昝坚等率军自山阳（今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东南）前往合水（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东北）。诸将认为桓温应从步道而上，在江南设伏兵以待晋军，昝坚不从，于是引兵自江北鸳鸯碕渡江向犍为（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东）进军。三月，桓温兵到彭模（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东北），众人商议想分兵两路，以此分解汉国兵势。袁乔则建议：如今孤军深入数万里，如果胜则大功告成，如果不胜则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现在应该合并兵力，争取一战全胜，如果兵分两路，只要其中一支失败，则必然大势去矣，目前不如全军前进，丢弃各种辎重，只带三天粮食，以坚定破釜沉舟之心，一定能够取胜。桓温听从了袁乔建议，命参军孙盛、周楚率领老弱看守辎重，亲自率领步兵直奔成都。汉右卫将军李福进攻彭模，但被孙盛击退。桓温进军与李权军相遇，桓温三战三捷，汉散兵逃归成都，镇军将军李位都投降东晋，桓温顺势进兵直驱成都。昝坚兵到犍为才发现桓温已经改换道路，于是急忙带兵自沙头津（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北）渡江返回，将至成都之时桓温军已到达成都十里陌（今四川成都市南），昝坚部众不战自溃。

三月，李势全军出城与桓温战于笮桥，桓温前锋作战不利，参军龚护战死，飞矢射向桓温马头，形势一时对东晋军不利，众人惊惧欲退，但此时负责击鼓的鼓吏误击进军鼓，袁乔趁机拔剑督战，使东晋军反败为胜。桓温乘胜进军到达成都城下，纵火烧成都城门，使城中人心惶惶，无有斗志。汉国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劝李势出降，李势以此询问侍中冯孚，冯孚提到当年吴汉征伐蜀地、杀尽公孙氏之事，又提到如今东晋下书称只有李氏一族不赦，因此即便请降也一定不得善终。李势只好趁夜开东门，与昝坚等出逃至晋寿，最终在走投无路之下派散骑常侍王幼向桓温献降文，其文曰：

> 伪嘉宁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阳李势叩头死罪。伏惟大将军节下，先人播流，恃险因衅，窃自汶蜀。势以暗弱，复统末绪，偷安荏苒，未能改图。猥烦朱轩，践冒险阻。将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惭俯愧，精魂飞散，甘受斧锧，以衅军鼓。伏惟大晋，天网恢弘，泽及四海，恩过阳日。逼迫仓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谨遣私署散骑常侍王幼奉笺以闻，并敕州郡投戈释杖。穷池之鱼，待命漏刻。[18]

自己则面缚舆榇至桓温军门投降。桓温将李势、李福、李权等李氏亲族十余人送于建康，东晋封李势为归义侯。此后，李势于东晋升平五

年（361）卒于建康。面对蜀中形势，桓温引汉国司空谯献之等为参佐，并拔举贤良，表彰仁善，以安抚蜀人。

虽然李氏成汉政权至此结束，但此后蜀地仍有动荡。如桓温刚刚平定汉国，即有汉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军隗文等举兵叛乱，每人聚兵众万余人。桓温亲自率兵讨伐邓定，命令袁乔率兵讨伐隗文，均击破之。又命益州刺史周抚镇守彭模，讨斩王誓、王润。桓温在成都停留三十天后，还兵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同年四月，邓定、隗文再次率兵入据成都，征虏将军杨谦弃涪城，退保德阳（今四川遂宁市东南）。七月，隗文、邓定等立范长生之子范贲为帝，又尊奉范长生，以道术招徕民众，蜀人多追随之。但其政权发展情况不明，应该只局限于成都周边地区而已。到东晋永和五年（349）四月，范贲为东晋益州刺史周抚等人击斩，益州暂时平复。[19]

[1]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0页。

[2] 按：《资治通鉴》卷96作“汉李奕从兄广汉太守乾告大臣谋废立”（第3023页），《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晋书·李寿载记》则作李乾与大臣合谋废李寿。此处依任乃强注《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5页注⑩考证。

[3]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1页。另，全文注解可参见任乃强同书第505～506页注⑾。

[4] 据任乃强《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6页注⒂考证。

[5] 《资治通鉴》卷96作“舍人杜袭作诗十篇”（第3035页），《晋书·李寿载记》作“（龚）壮作诗七篇”（第3046页）。

[6]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寿载记》，第3046页。

[7] 此事时间据任乃强《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8页注(22)考证。

[8] 任乃强考证认为李寿与石虎两方之连横关系在咸康五年（339）夏秋之交即已建立。参见《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7页注(20)。

[9]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记大约此时有“李寿以建宁、上庸、汉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龙”（第2776页）一事，推测可能即为此事，为两国史官“各为其主”的言说而已。

[10]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李寿》。

[11]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寿载记》，第3045页。

[12]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16页。

[13]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9页。

[14] 巴蜀地区僚人较为复杂，相关研究可参见高然、杨鑫《建国以来的巴蜀僚人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7，第3073页。

[16] 桓温北伐动机参见金仁义《桓温伐成汉考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7] 任乃强对此地名有所考证，可参看《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12～513页注⑥。

[18]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势载记》，第3048页。

[19] 此后益州又多有叛乱，其中不乏援引成汉李氏旗号者。而巴蜀动荡，终晋之世不曾宁息。参见任乃强注《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15～516页注⒀。

〖第五章〗 成汉政治

李氏成汉政权虽然有成、汉两国，但其制度体系、政治发展一脉相承，故可一并加以叙述。

一 政治制度

1.中央行政职官系统

成汉政治制度从纵向上看分为两个阶段，即建国前的地方军事职官体系和建国后的魏晋中原王朝职官体系。虽然分为两个不同的体系，但只是在层级复杂程度上有所区别，从整体上来看都属于魏晋中原王朝职官系统。[1]

李氏兄弟作为六郡流民集团的首领，最初职官接受自赵廞、罗尚，以及西晋中央政府，如李庠最初自赵廞处获得部曲督的职位，但此为私兵首领性质。此后赵廞自立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以李庠为威寇将军，封阳泉亭侯。其中，威寇将军为曹魏所置四十号将军之一，第五品，亭侯亦为第五品。[2]李庠死后，赵廞仍以李特、李流为督将，此督将具体情况不明。罗尚出掌益州后，以李骧为骑督，骑督为督骑兵之职，西晋时位居牙门将之下，也是第五品。[3]此后，西晋加李特为宣威将军、长乐乡侯，李流为奋武将军、武阳侯。其中，宣威将军为曹魏置杂号将军，第五品，乡侯为第四品；奋武将军为第四品武官，武阳为县侯，第三品。[4]属官则见有李特击败赵廞之后派遣牙门王角、李基往洛阳送信，此牙门应是李特护卫军队。[5]在此一阶段，李氏集团职官均为中下级武官，封爵也与其品级相对应。

六郡流民起兵后，推举李特为镇北将军，李流为镇东将军、东督护。此后，李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以李辅为骠骑将军、李骧为骁骑将军、李始为武威将军、李荡为镇军将军、李雄为前将军、李含为西夷校尉，虽然各人在品级上有所提升，但均仍属武官系统。直到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大都督，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并建号建初，这时在军职之外才开始构建了行政职官体系。但一方面自封职官仍为地方官建置，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较为混乱的情况[6]，说明流民集团对自身未来发展的认知不清。此后这一系列官职为李流、李雄相继继承。

建兴元年（304）李雄称帝以后，成汉国家中央职官系统基本依照中原王朝职官体系构建，以下对其略做梳理。

四时八节天地太师 李雄时期有范长生。太师 李势时期有董皎。“晋

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讳师，故置太宰，以代太师之名。”[7]范长生四时八节天地太师一职与普通太师有所不同，更突显其尊贵地位。

太宰 太傅 太保 太宰 李雄时期有李国。太傅 李雄时期有李骧。太保 李雄时期有李始，李势时期有李奕。“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8]

太尉 司徒 司空 太尉 李雄时期有李离、张宝。司徒 李雄时期有李云、王达，李班时期有何点，李期时期有王瓌。司空 李雄时期有李璜、赵肃、上官惇，李势时期有谯献之。“太尉、司徒、司空，并古官也。自汉历魏，置以为三公。及晋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9]

丞相 相国 右丞相 丞相 李雄时期有杨褒、范长生、范贲。相国 李期时期有李越，李寿时期有董皎。“丞相、相国，并秦官也。晋受魏禅，并不置，自惠帝之后，省置无恒。”[10]右丞相 李期时期有尹奉。左、右丞相自先秦以来即或置或省，大成国时期仅见右丞相。

录尚书事 李雄、李班、李期时期均为李寿，李寿时期为李势。“录尚书……后汉章帝以太傅赵憙、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尚书有录名，盖自憙、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犹唐虞大麓之职也。……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11]

尚书令 李雄时期有阎式，李班时期有王瓌，李期时期有景骞，李寿时期有罗恒、马当。“尚书令，秩千石，假铜印墨绶，冠进贤两梁冠，纳言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则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12]

仆射 李雄时期有杨褒，李期时期有罗演，李寿时期有任颜。尚书仆射 李期时期有李载，李势时期有王誓。左仆射、右仆射 李寿时期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仆射，服秩印绶与令同。案汉本置一人，至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郃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盖自此始。经魏至晋，迄于江左，省置无恒，置二，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若左右并阙，则置尚书仆射以主左事。”[13]

尚书 李雄时期有杨珪，李期时期有姚华、田褒，李寿时期有李摅。此不详具体为令、仆射、列曹尚书、丞、郎何职。

中书监 李势时期有王嘏。“中书监及令，案汉武帝游宴后庭，始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罢仆射。汉东京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官谒者令，非其职也。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置监、令，……监、令盖自此始也。及晋因之，并置员一人。”[14]

侍中 李雄时期有杨发、李寿、李琀、范贲，李期时期有李艳，李势时期有冯孚、王嘏。“侍中，案黄帝时风后为侍中，于周为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汉因之。秦汉俱无定员……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者则非数。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15]

中常侍 散骑常侍 中常侍 李期时期有许涪，李寿时期有王广。散骑常侍 李寿时期有王嘏，李势时期有王幼、常璩。“散骑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亦以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为中常侍，后遂止。常为显职。”[16]

廷尉 《华阳国志·后贤志·侯馥传》载李恭“生虏馥，送雄，雄下廷尉”[17]，知成汉有廷尉设置。“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18]

御史 李寿时期有李摅。此不详具体为何职御史。

太史令 李班时期有韩豹（一作约），李势时期有韩皓。此外，常璩亦曾出任史官。“太史令，一人，丞一人。掌三辰时日祥瑞妖灾，岁终则奏新历。太史，三代旧官，周世掌建邦之六典，正岁年，以序事颁朔于邦国。又有冯相氏，掌天文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今之太史，则并周之太史、冯相、保章三职也。汉西京曰太史令。汉东京有二丞，其一在灵台。”[19]

太子宾友（师友） 李班时期有文夔、董融、王嘏。“晋元康元年，愍怀太子始之东宫，惠帝诏曰：‘遹幼蒙，今出止东宫，虽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长益者。……其令五人更往来与太子

习数，备宾友也。’其时虽非官，而谓之东宫宾客，皆选文义之士，以侍储皇。”[20]

王 建宁王、汉王李寿，建宁王李越，汉王李广。

公 河南公景骞、武陵公李载。

侯 西山侯范长生。

王国相 李期时期有汉王李寿相上官澹。

长史、司马、舍人 李寿有舍人杜袭，长史罗恒、解思明，司马蔡兴。此处几职于王国、将军府等均有，不详其为王国、将军何府官。

此外，李寿为征东将军时有宾客谯秀，应为幕僚性质，非官员。

而其各职官职能、班序、考课、升转等最初也多有问题。史载：

> 雄时建国草创，素无法式，诸将恃恩，各争班位。其尚书令阎式上疏曰：“夫为国制法，勋尚仍旧。汉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马执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论道之职，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今国业初建，凡百未备，诸公大将班位有差，降而竞请施置，不与典故相应，宜立制度以为楷式。”雄从之。[21]

可见其职官体系在李雄称帝后才得以理顺，而其具体的制度体系应该也是遵从魏晋以来的模式，只是细节失于记载。然而听从阎式建议加以理顺的职官体系究竟到何种程度仍颇可疑，因为此后又有“职署委积，班序无别”的提法，可知成汉国家的职官体系始终较为混乱。

此外，成汉官员没有俸禄的相关记载，也说明其职官管理体系的不完备，这也必然会导致吏治和社会的混乱。

成汉国的选官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只在李雄时期有提及相关的一些信息。史载李雄建国之后，因为大力“招致远方”，导致国家经济紧张、用度不足，故此有将领以进献金银珍宝而得官，是因为建国之初有卖官的情况。杨褒曾对此曾有劝谏，李雄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后的选官情况仍不明晰。又有记载曰：“雄虚己好贤，随才授任，命太傅骧养民于内，李凤等招怀于外。”[22]知李雄大量招徕人才，按照其才能加以任免。史书又有李雄一朝“爵位滥溢”的说法，也表现出随意性和泛滥的状况。到了汉国李寿时期，曾有“举明经者封好学侯”[23]之事，但这只是针

对特殊才能者的特殊封爵，也不可能作为惯常的职官选拔制度。

总之，成汉国至少在李雄一朝的选官并无一定之规，而是随统治者喜好加以封赏，导致受爵者过多。其他各朝不见明确记载，应该与此相差不远。而从官员人选来看，选官的准则一是才能（已见上述），二是亲戚、功勋之人，尤其以六郡流民集团上层为主，到李寿时期则变为其梁州旧僚属，具有较为突出的排外属性，具体可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兴亡原因”所论及附录表。[24]

2.军事制度

成汉国家的军事职官体系也来自魏晋中原王朝传统，所见军职如下所列。

军师 李雄时期有王达。应为李雄成都王所属军师。

都督中外诸军事 李雄时期有李寿。大都督 李雄、李期时期均为李寿。六军都督 李寿时期有马当。“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明帝太和四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公正元二年，晋文帝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25]成汉国家并不见持节。

大将军 李雄时期有李寿，李期时期有李越，李寿时期有李势，李势时期有李广。“大将军，古官也。汉武帝置，冠以大司马名，为崇重之职。及汉东京，大将军不常置，为之者皆擅朝权。……及晋受命，犹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后复旧，在三司上。”[26]

中领军 领军将军 中领军 李雄时期有李玝、李期时期有李霸。领军将军 李班时有李都。“中领军将军，魏官也。汉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汉中，以曹休为中领军。文帝践阼，始置领军将军，以曹休为之，主五校、中垒、武卫等三营。武帝初省，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卫等营，即领军之任也。怀帝永嘉中，改中军曰中领军。永昌元年，改曰北军中候，寻复为领军。成帝世，复为中候，寻复为领军。”[27]

中护军 李雄、李期时期均为李寿。“护军将军，案本秦护军都尉官也。汉因之，……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置长史、司马。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复置领、护，各领营兵。”[28]

右卫将军 李势时期有李福。“左右卫将军，案文帝初置中卫及卫，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卫。”[29]成汉国家不见左卫将军。

翊军校尉 李期时期有李势。太康元年（280）“六月丁丑，初置翊军校尉官”。[30]应与屯骑等五校尉相似。

骠骑将军 李期时期有尹奉。“汉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光武中兴，以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数年后罢。魏、晋、齐并有之。”[31]

车骑将军 李雄、李班时期为李越。李寿时期有王韬。“汉文帝元年，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魏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晋宋车骑、卫不复为四征所督。”[32]

卫将军 李班时期有尹奉。“汉文帝始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凡骠骑、车骑、卫三将军，皆金印紫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晋以陆晔为卫将军，兼仪同三司，加千兵百骑。东晋以后，尤为要重。”[33]

征东大将军 李期时期有李始。四征将军 李雄时期有征东将军李寿、任邵，征北将军李凤、李玝，征南将军李恭、费黑。李班时期有征南将军费黑。李期时期有征西将军李遐。李寿时期有征东将军李闳。“四征将军皆汉魏以来置，加大者始曰方面。征东将军，汉献帝初平三年，以马腾为之，或云以张辽为。征西将军，汉光武建武中，以冯异为大将军。征南将军，汉光武建武二年置，以冯异为之，亦以岑彭为大将军。征北将军，魏明帝太和中置，刘靖为之，许允亦为之。各一人。魏黄初中，位次三公。”[34]

镇西大将军 李期时期有李保。镇南大将军 李期时期有李霸。四镇将军 李雄时期有镇南将军徐轝、任回。李寿时期有镇北将军任调。李寿

时期有镇西将军李奕、镇东将军李奕、镇南将军李权。李势时期有镇东将军邓定、镇南将军李权。“镇东将军，后汉末，魏武帝为之。镇南将军，后汉末，刘表为之。魏张鲁、晋当阳侯杜元凯并为之。镇西将军，后汉刘表为之，魏钟会、邓艾并为之。镇北将军，魏明帝太和中置。刘靖、许允并为之。各一人。宋时四镇与中军为杂号。后魏加大，次尚书令。”[35]

四安将军 李雄时期有安北将军李稚，李期时期有安北将军李攸，李班时期有安东将军李期。“安东将军，后汉陶谦、曹休并为之。安南将军，光武元年，以岑彭为之。晋范阳王虓亦为之。安西将军，后汉末段煨、魏钟会、石鉴并为之。安北将军，晋以郗鉴为之。各一人。后魏亦有。”[36]

平南将军 李势时期有王润。“平南将军，……并汉魏间置。后魏亦有。”[37]

右将军、前将军 李寿时期有右将军李位都，李势时期有前将军昝坚。“左右前后军将军，案魏明帝时有左军，则左军魏官也，至晋不改。武帝初又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38]

镇军（一作东）将军 李势时期有李位都。“镇军大将军，魏置，文帝以陈群为之。晋则杨骏、胡奋并领镇军将军。”[39]

建威将军 李班时期有李期。

抚军将军 李雄时期有李班。并汉魏以来杂号将军。

平寇将军 李雄时期有李凤。三国时期始置领兵武职。

南蛮校尉 李雄时期有李恭。“南蛮校尉，晋武帝置，治襄阳。”[40]大成国所见为荆州刺史领，镇巴郡（今四川南充市北）。

南夷校尉 李雄时期有任回，李寿时期有李权。“南夷校尉，晋武帝置，治宁州。”[41]成汉南夷校尉亦镇宁州（治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东北）。

西夷校尉 李雄时期有李寿，李期时期有李保，李寿时期有李奕。太康“三年……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吴军司张收为校尉，持节统兵”[42]。李保西夷校尉镇汶山（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北），

其他各人驻地不详。

东羌校尉 李期时期有李寿，李寿时期有任调。曹魏置护东羌校尉，掌居于秦、雍、梁等州羌人，领兵。西晋称东羌校尉。成汉东羌校尉同为梁州刺史，驻晋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

将军 李雄时期有张宝、乐次、费他、李乾，李期时期有李西，李势时期有隗文，李期时期有李寿将李奕。均不详具体将军号。

参军 司马 参军 李寿时期有以车骑将军王韬为参军。司马 李寿出征宁州时以征南将军费黑为司马。两职具体情况不详。

从军事管理体系来说，成汉国也表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史载其国“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伍。其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故纲纪莫称”[43]。这种情况应该是来自其军事集团保留下来的早期的流寇作战属性，史载李庠行军打仗即“不用麾帜，举矛为行伍，斩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阵肃然”[44]，这应该是六郡流民军的共同军事属性。此后成汉国的军事管理体系应该即来源于此。

成汉兵源应该主要来自六郡流民，其核心则应该来自李特等最初起兵所聚兵众，此后兵源应该有所扩展，军队规模也随着国家发展而不断得到扩充。史书记载赵廞曾命令李庠招集六郡壮勇万余人，也有记载李庠等以四千骑归赵廞，具体数字不详。此后李庠被杀，赵廞仍以李特为督将，以安抚其兵众。西晋永宁元年（301），赵廞派费远、李苾、常俊等屯兵绵竹石亭之时，李特暗中收合兵众七千余人击破之。此七千兵众应该是在原本四千骑兵的基础上再聚集而来的。罗尚入蜀以后，李特在绵竹立大营聚集流民，聚众超过两万人，李流聚众数千人，但其中应该包括老弱病残等非战斗人员。大成国晏平元年（306），李雄出兵攻打汉中时，派出的军队曾达到两万人。汉国汉兴三年（340），李寿曾大阅兵众，准备讨伐东晋，人数有七万余人。这应该是成汉发展以来在国都所能聚集的最高兵力。而史书记载李寿进兵攻打成都之时，率领步骑兵一万，因此大成国在梁州重镇驻兵应该超过一万人。以此推算成汉全国兵力应该超过十万。

在兵役方面，史书记载李雄时期对新依附的人口均给予“复除”的优待，以恢复社会发展，又曾对范长生部曲也给予“复除”，“军征不预”，等等。从这些记载可以了解，大成国至少在李雄朝对六郡流民之外的巴

蜀地区普通百姓有一定的兵役征发，但对其细节没有详细的记载。[45]

3.礼制司法

成汉国的礼制体系最初并不完备，如最初“（李）雄时建国草创，素无法式，诸将恃恩，各争班位。其尚书令阎式上疏曰：‘夫为国制法，勋尚仍旧。汉、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马执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论道之职，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今国业初建，凡百未备，诸公大将班位有差，降而兢请施置，不与典故相应，宜立制度以为楷式’”[46]。由此“考汉、晋故事，立百官制度”[47]。晋越嶲太守李钊投降后，李雄又“待遇甚厚，朝廷仪式，丧纪之礼，皆决于钊”[48]，应该是依靠李钊对大成国朝廷礼制体系做了一定的构建。李钊为李毅之子，史载李毅“年二十余，乃诣郡文学受业，通《诗》、《礼》、训诂。为学主事”，“毅子钊，世秉儒学，有格望”[49]。因此，李雄应是依靠李钊家传《诗》《礼》修养来完备大成国的礼制体系的。但其后的发展仍值得怀疑，随后又有“为国威仪无则，官无秩禄，职署委积，班序无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货贿公行，惩劝不明。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伍。其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故纲纪莫称”[50]的记载，可知其制度层面的建设一直是不健全的。因此，李雄也应是有事有疑则请教李钊决之，并对相应部分的礼制有所构建，其他则多任其缺失了。究其原因，应该是李氏家族在统治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平衡李氏家族与六郡大族等的关系而不断调整、妥协，但又缺乏足够的回旋空间。

到了汉国时期，史书记载李寿“凡诸制度，皆有改易”，此事上承李寿改立宗庙，与李期、李越别族之事，因此其所改易制度应该主要指宗庙、丧纪之礼，但汉国礼制的具体细节也不得而知。

在继承制度上，流民集团在李氏家族带领下进入蜀地，最初以第三代的李庠为核心，此后为李特、李流兄弟相继，此后又转回李特一系，由李特第三子李雄继任。这一时期的继承法则明显是十分混乱的，如李离曾对李雄说：“若功成事济，约与君三年迭为主。”[51]李离为李庠妹婿李含之子，应出身六郡大姓李氏，在此居然可以和李雄以交替担任首领谈条件，可知当时的权力继承制度是十分不完善的，始终留有政治变乱的隐患。又如李流死前提出将统治权交给李雄，其理由是“骁骑高明仁爱，识量多奇，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军，以为成都王也”[52]，由此改变了原来兄终弟及的继承模式，但又没

有确立一种制度化的继承模式。其理由则明显带有赍人“敬信巫觋”的色彩，以及对现实权力归属的承认，必然也带来统治权力传承的不确定性。

李雄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众多庶子，转而将帝位传给兄长李荡的儿子李班，对此提出的说法是“本之基业，功由先帝。吾兄嫡统，丕祚所归，恢懿明睿，殆天所命，大事垂克，薨于戎战。班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53]。但李班在李氏众人把持军政大权的情况下缺乏平衡各方力量的能力，由此导致李氏集团出现第一次较大的政治动荡，权力重新回到李雄一系的李期手中，李荡一系则遭到大规模杀戮。李期即位之时，又曾有“欲立越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养，又多才艺，乃让位于期”[54]之事。

而在李期时期，李氏集团内部又发生了第一次较大分裂。“（李）期自以谋大事既果，轻诸旧臣，……国之刑政，希复关之卿相，庆赏威刑，皆决数人而已，于是纲维紊矣。……期多所诛夷，籍没妇女资财以实后庭，内外凶凶，道路以目，谏者获罪，人怀苟免”[55]，实际上破坏了李氏家族与六郡大姓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此后很快又再次经历政变，权力核心转到一直不突出的李骧一系手中，李雄一系又为李寿所杀。

李寿以后，李氏集团才真正开始摆脱六郡大姓对其政治的影响，并理顺嫡长子继承的制度。[56]

成汉国的司法体系也十分不明确，或者其本身就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司法程序。最初在流民阶段，有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但不载其具体内容，推测可能与汉高祖刘邦所行之约法三章相似。此后到李雄建国，也有“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57]的记载，应该较李特的约法三章有所丰富，但应较魏晋的司法体系简约许多，只是不清楚具体情况如何。此外，史书中有李雄朝廷尉存在的记载，知成国应有较为完备的司法机构存在，与魏晋中原王朝大致相似，但其运作细节不详。而且史籍中基本只见有成汉臣僚谋反伏诛的记载，推测成汉国家法律在保持了最根本的维护皇权统治的部分之外，其他则较为简略和随意，多是随事而断。只看其一方面依靠李雄较为清明的管理，而有“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又有“货贿公行，惩劝不明”的记载，即足见其混乱。李寿建汉以后，最初“承雄宽俭”，但此后因“闻季龙虐用刑法，王逊亦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域，寿心欣慕，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58]，是其刑罚从宽松转向严酷。李势时期则将国事交给亲近小人处

理，更加导致“刑罚苛滥”。关于此，应是成汉国家缺乏系统构建司法系统的时间和空间所致。亦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流民统治集团还保留着若干朴质的作风，可备一说。[59]

总之，成汉时期政治制度上较为混乱、施政上较为宽和，应有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李氏集团自身层次较低，多为六郡基层官吏和中小地主，最终也没有富于统治经验的大族加入，因此对国家政治的系统构建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导致各方面制度混乱。二是成汉统治集团构成复杂，其权力归属也有前后变化（参见第七章第一节“兴亡原因”部分所论），这就需要反复照顾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张炜认为李雄在位时期宽和性施政内容是要尽量不去触动将他扶持上宝座的大族的利益，以维持现有局面为安，最终在面对桓温大军时，所依仗的只是昝坚（李寿妻族）、李权（李势从兄）、李福（李寿之弟）三人统帅军队[60]，导致了职官设置和封赏的混乱。三是外部环境复杂，两晋十六国之际征战不断，也使成汉国家没有时间细致经营。

此外，曾维加从统治思想入手，认为李氏政权以道教作为其统治思想纲要，李雄将治理国家大权交到范长生手上，范长生凭借以“道”为本的自然主义方式治理国家。一是治理蜀地时减役宽政，二是治理的国家“为国威仪无则，官无秩禄，职署委积，班序无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废除封建王朝繁文缛节的朝仪和森严的等级，保持了平等质朴的作风，为老子民本思想的运用。范长生潜心研究《易》，是为了有所作为，以易治世。[61]其文对李氏国家朴素一面来源于道家思想的说法较为有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此说成范长生治国则有夸大之嫌。因李氏本身为道教信徒，故质朴一面应为下层流民属性与宗教属性双重作用。而范长生在成汉政权中的实际作用值得怀疑，具体将在第七章有所申论，在此不赘。

二 疆域与政区

成汉国家疆域与政区均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之中，变化较为频繁，而因为史书记载的简略，其大多数政区设置情况不得而知。近年有魏俊杰对成汉疆域、政区做了较为细致的考证研究，可供借鉴。以下结合历史记载和魏俊杰等学者研究将成汉疆域与政区情况分列于此。

1.司隶部（**306～347**）（益州**302～306**）

见有益州刺史李洪、严柽，司隶校尉景骞、费黑。

李特于西晋太安元年（302）始称益州牧，领有广汉、梓潼、巴西、德阳四郡。太安二年，蜀、汶山、犍为三郡自西晋属成汉，德阳郡入西晋。大成建兴元年（304），李雄称成都王，益州治成都，分巴西郡置宕渠郡。建兴三年，汉嘉郡自西晋归属成汉，分汉嘉、蜀郡立沈黎、汉原二郡。或于此时改蜀郡为成都尹，改益州为司隶部。以梓潼、巴西、宕渠、广汉四郡别属梁州，司隶部领成都尹、犍为、汶山、汉嘉、汉原、沈黎郡。大成玉衡二十四年（334），越嶲郡自宁州改属益州。汉国汉兴元年（338），越嶲郡改属安州。汉兴五年，越嶲郡还署司隶部。汉兴六年，越嶲郡别属汉州。

成都尹（**306～347**），前身为蜀郡（303～306），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青羊区）。见有蜀郡太守李瑾。大成晏平元年（306）改司隶后，蜀郡太守应变为成都尹。领成都、广都、繁、江原、临邛、郫六县。晏平元年，江原、临邛县别属汉原郡。

犍为郡（**303～347**），治武阳（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东）。见有犍为太守李溥。领武阳、南安、资中、牛鞞四县。玉衡元年（311）以后增僰道县。

汶山郡（**303～347**），治汶山（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北）。见有汶山太守李保。领汶山、升迁、都安、广阳、兴乐、平康、蚕陵、广柔八县。

汉嘉郡（**306～347**），治汉嘉（今四川雅安市名山区北）。见有太守李乾。领汉嘉、徙阳、严道、牦牛四县。后牦牛县改属沈黎郡。

汉原郡（**306～347**），治汉原（今四川崇州市西北）。晏平元年分蜀郡立，改江原县为汉原县。领汉原、临邛等县。

沈黎郡（**306～347**），治地不详。晏平元年分汉嘉郡立。领牦牛等县。[62]

越巂郡（**323～347**），治邛都（今四川西昌市东南）。玉衡十三年（323）置。领邛都、会无、卑水、定筰、台登、三缝县。

2.梁州（**306～347**）

先治晋寿（306～309，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区南），后治所不详（309～311），后治涪城（311～347，今四川绵阳市游仙区）

刺史见有李凤、李寿、李玝、任调。

建兴三年（306），置梁州，治晋寿。领有梓潼、巴西、宕渠、广汉四郡。晏平四年（309），梓潼入于晋，治所不可考。晏平五年，巴西郡入于西晋。玉衡元年（311），梓潼、巴西两郡归属大成，治于涪城。玉衡二年，阴平、德阳二郡自西晋归属大成。玉衡四年，汉中自仇池归属大成。玉衡十年，阴平入于仇池，梁州领有梓潼、巴西、宕渠、广汉、德阳、汉中六郡。又曾置汉固、上庸、巴徼三郡，或属于梁州。

梓潼郡（**302～309**、**311～347**），治晋寿、涪城。见有太守李离。领涪城、梓潼、汉德、晋寿、白水五县。晏平四年，梓潼郡入西晋，改治涪城；玉衡元年，梓潼郡复归属大成。

巴西郡（**302～310**、**311～347**），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市）。见有太守马脱。领阆中、西充国、南充国、安汉、平州、宕渠、汉昌七县。晏平五年，巴西郡入西晋，玉衡元年，自西晋再归属大成。建兴元年，宕渠、汉昌二县制属宕渠郡。

宕渠郡（**304～347**），治宕渠（今四川南充市营山县黄渡镇宕渠故城）。领宕渠、汉昌、宣汉三县。

广汉郡（**301～347**），治雒（今四川广汉市北）。见有太守李超、解思明、李乾。领雒、绵竹、什邡、新都、五城、郪、广汉七县。

德阳郡（**302～303**、**312～347**），治德阳（今四川遂宁市船山区

东南）。见有太守任臧、骞硕。西晋太安元年（302），李特置德阳郡，领德阳县。李特建初元年（303），德阳郡入西晋。玉衡二年，又自西晋归属大成。

汉中郡（**314～347**），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玉衡四年置汉中郡，领南郑、蒲池、褒中、沔阳、成固、西乡六县。

汉固郡，上庸郡，巴徵郡，此三郡治所不可考。[63]

阴平郡（**312～320**），治阴平（今甘肃陇南市文县西北）。玉衡二年置阴平郡，领阴平、平武、甸氐、刚氐四县。

3.荆州（**311～347**）

先治江阳（311～338，今四川泸州市江阳区），后治江州（338～347，今重庆市渝中区）

刺史见有李恭、李闳。

玉衡元年，大成置荆州，治江阳，领江阳郡。二年，巴郡自西晋归属大成。四年，涪陵自西晋归属大成，后涪陵又入东晋。十六年，涪陵自东晋归属大成。二十年，巴东、建平郡自东晋归属大成，不久复失。二十四年，改治江州，南广、平夷郡自宁州、交州归属荆州。汉国汉兴二年，巴东郡自东晋归属汉国，后又入东晋。

江阳郡（**311～347**），治江阳。玉衡元年置江阳郡。领江阳、符、汉安、新乐四县。

巴郡（**312～347**），治江州。见有太守李玝。玉衡二年置巴郡。领江州、垫江、临江、枳四县。

涪陵郡（**314～？，？～326～？，328～347**），治涪陵（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玉衡四年置涪陵郡。领涪陵、汉复、汉平、汉葭、万宁五县。后涪陵郡入东晋。十六年，涪陵郡再次归属大成，后又入东晋。十八年，又自东晋归属大成。

巴东郡（**330～？，？～339～？**），治鱼复（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玉衡二十年置巴东郡。领鱼复、朐䏰、南浦、汉丰四县。后巴东郡入东晋。汉国汉兴二年，又自东晋归属于汉，后又入于东晋。

建平郡（**330～？**），治巫（今重庆市巫山县）。玉衡二十年，置建平郡。领巫、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八县。

4.宁州（**316～347**）

治地先不可考（316～333），后治味（333～347，今云南曲靖市麒麟区西）

刺史见有任回、李寿、李权、霍彪。

玉衡二十三年，李雄得宁州，治味。领建宁、晋宁、建都、朱提、牂柯、越巂、平夷、南广、夜郎、云南、兴宁、河阳、西河、兴古、梁水、西平、永昌十七郡。同年又置平乐郡，属宁州。二十四年，分宁州置交州，越巂郡别属司隶部，与东晋交州相近的牂柯、夜郎、平夷、兴古、梁水、西平六郡有可能改属交州，而建宁、晋宁、朱提、南广、云南、河阳、西河、平乐、建都、兴宁、永昌十一郡属宁州。汉国汉兴元年省交州，兴古、梁水、西平三郡还属宁州，南广、平夷郡别属荆州，牂柯、夜郎、朱提等郡别属安州。二年，建宁、牂柯二郡入东晋。三年，建宁郡自东晋归属汉国。五年，罢安州，朱提、夜郎郡还属宁州。六年，兴古、永昌、云南、朱提、河阳、越巂六郡别属汉州。此后到亡国之前领建宁、晋宁、建都、平乐、兴宁、梁水、西平、夜郎八郡。

建宁郡（**333～339**、**340～347**），治味。见有太守邵攀、孟彦。玉衡二十三年，置建宁郡。领味、昆泽、存䣕、谈稾、母单、同濑、漏江、牧麻、修云、冷丘十县。汉兴二年入东晋，三年复归属汉国。

晋宁郡（**333～347**），治滇池（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东）。玉衡二十三年，置晋宁郡。领滇池、建伶、连然、秦臧、俞元、谷昌、双柏七县。

建都郡（**333～347**），或治新安（地不可考）。玉衡二十三年，置建都郡。领新安、经云、永丰、临江、麻应、遂安六县。

平乐郡（**333～347**），或治新定（地不可考）。见有太守李壮。玉衡二十三年，置平乐郡。领新定、兴迁、平乐、三沮四县。

朱提郡（**333～347**），治朱提（今云南昭通市昭阳区）。玉衡二十三年，置朱提郡。领朱提、汉阳、南秦、堂狼四县。

南广郡（**316～347**），治南广（今四川宜宾市筠连县、云南昭通市盐津县一带）。见有太守李播。玉衡六年，置南广郡。领南广、临利、常迁、新兴四县。

云南郡（**333～347**），治云南（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东南）。玉衡二十三年，置云南郡。领云南、云平、楪榆、遂久、永宁五县。

兴宁郡（**333～343**），或治梇栋（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北）。玉衡二十三年，置兴宁郡。领梇栋、青蛉二县。

西河郡（**333～347**），或治比苏（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一带）。玉衡二十三年，置西河郡。领比苏、成昌、建安三县。

河阳郡（**333～343**），或治河阳（地不可考）。玉衡二十三年，置河阳郡。领河阳、姑复、邪龙三县。

永昌郡（**333～347**），治永寿（今云南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附近）。玉衡二十三年，置永昌郡。领永寿、不韦、雍乡、南里、嶲唐、哀牢、博南七县。

5.交州（**334～336**）

治地不可考。

见有刺史爨深。

玉衡二十四年，分宁州置交州。疑领牂柯、夜郎、平夷、兴古、梁水、西平六郡。[64]大成玉恒二年（336），兴古、夜郎二郡入东晋。四年，复取二郡。同年省交州，兴古、梁水、西平还属宁州，牂柯、夜郎别属安州，平夷别属荆州。

牂柯郡（**333～339**），治万寿（今贵州黔南市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一带）。见有太守谢恕。玉衡二十三年，置牂柯郡。领万寿、且兰、广谈、毋敛四县。

夜郎郡（**333～336**、**338～347**），治夜郎（今贵州西部）。玉衡二十三年，置夜郎郡。领夜郎、谈指二县。

平夷郡（**316～347**），治平夷（今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东）。玉衡六年，置平夷郡。领平夷、鳖二县。

兴古郡（**333～336**、**338～347**），治宛温（今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北）。玉衡二十三年，置兴古郡。领宛温、律高、镡封、句町、汉兴、胜休、都唐七县。

梁水郡（**333～347**），治梁水（地不可考）。玉衡二十三年，置梁水郡。领梁水、贲古、西随三县。

西平郡（**333～347**），或治盘江（地不可考）。玉衡二十三年，置西平郡。领盘江、来如、南零三县。

6.安州（**338～342**），治地不可考

玉恒四年，分宁州牂柯、夜郎、朱提、越嶲四郡置安州。汉兴二年，牂柯入东晋。五年，罢安州，夜郎、朱提二郡还属宁州，越嶲郡还属司隶部。

7.汉州（**343～347**），治地不可考[65]

关于汉州设置情况，“《晋志上》载：‘咸康四年，分牂柯、夜郎、朱提、越嶲四郡，置安州。’晋咸康八年（汉汉兴五年，342）又置安州。《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载：‘（汉兴）六年，分宁州兴古、永昌、云南、朱提、越嶲、河阳六郡为汉州。’李寿当是收复了兴古、夜郎二郡后置安州，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辖。后又废安州，置汉州”[66]。

三 成汉国家认同构建

成汉虽然建立了独立政权，并且称帝，与东晋、匈奴汉国、二赵等并列，其自我国家认知却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史书中曾记载：

> 张骏遣使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于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在暗室，有何已已。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于斯莫大。"骏重其言，使聘相继。巴郡尝告急，云有东军。雄曰："吾尝虑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谭，多如此类。[67]

以此观之，李雄对晋室应十分崇敬，但同时史籍中又有记载：

> 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张骏领秦梁，先是，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托以假道。雄大悦，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自称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众人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之。"淳还，通表京师，天子嘉之。[68]

则李雄又表现出了寻求自立的野心，只是被前凉使臣较为高明的外交辞令所打动而已。李雄"左右为难"的国家归属感的根源应该在于其出身及早期发展经历：早期的六郡流民集团更多是想返回原籍，所求不得之下才图谋在蜀地自保，直到得知中原大乱返回无望之时才有了立足巴蜀的想法，所以其行为和思想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而最终李雄能够建国也主要是得到了范长生集团的大力支持，故此，一方面，李氏集团对于自身少数民族建国的身份不太自信（如在与后赵、前凉的交往中反复抬高自身的地位，以与东晋和北方霸主"并驾齐驱"，即表明了这种心理上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国家实力上也多有顾虑。最后，国家统治集团内部也难以达成共识。此后，到了汉国时期，这些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李寿夺权即以尊奉晋室为说辞以聚拢人心，成事后也对去向有过反复争论。虽然最后李寿仍然称帝建国，但反对的意见始终没有消失，如龚壮、罗恒、解思明、李演等不断上书请求恢复旧议、降号尊晋，甚至导致李寿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对于李寿时期国家去向的争论，李磊认

为，李寿文化面貌与众不同，汉政权建立后，统治阶层彻底更换，需要意识形态的更张以做配合。在此意义上，李寿聘龚壮为太师，标志汉政权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时是蜀中“附晋”势力在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而龚壮等人更在文化上有意识地用夏变夷。[69]从龚壮等人的行动来看，确实有明确的向晋意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成汉国家走向认识的变化。但说龚壮等人在文化上有意识地“用夏变夷”则不准确，因李氏集团与巴蜀土著更明显是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离合，而较少文化色彩，且李氏集团中绝非“附晋”一种声音占据主导，不好就此说是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70]

故此在成汉国家认同层面始终没能建立起统一的认识，从李氏来说是摇摆于尊晋与自立之间[71]；从其他统治集团人物来说，则泾渭分明地分成两派。但其均是从李氏集团发展稳定的现实需要出发做出的不同判断而已。

而李雄又“置史官”，实已开始对自身流民集团、成汉国家历史书写有所觉悟，如其史官常璩即曾逐渐撰成《汉之书》十卷（《蜀汉书》）[72]、《蜀记》、《巴汉记》《南中志》、《益部士女总赞》等。常璩入晋以后因被晋人轻视而增删旧作，写成《华阳国志》。但其主旨在于夸耀巴蜀文化、人物，又经删改，故其于成汉立国时期所著具体如何秉持李氏意志，构建其集团、国家历史，强化国家认同等已难知晓。[73]

另外，东晋始终对李氏成汉国家心存芥蒂，如庾翼即“以灭胡取蜀为己任”，将成汉与北方后赵政权相提并论，可知东晋始终将成汉国家以少数民族异类视之。

在此，对成汉国号也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蒋福亚曾对匈奴和慕容鲜卑的“汉”“晋”旗号加以分析，认为“这个时候，少数族的统治者所以要打出‘汉’旗号或者‘晋’旗号，根本原因在于：1.他们都想乘晋室内乱，尤其是流民起义大大削弱了西晋王朝的机会，建立自己的统治政权，2.由于他们自身实力较小，因此想借助上述旗号蛊惑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族流民，求取他们的支持，3.上述旗号的出现绝非偶然，‘汉’旗号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晋’旗号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因此，由‘汉’旗号到‘晋’旗号的变化，正是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74]。因此，十六国时期旗号、国号的选择有其特殊政治心理意义。从国号选择上来看，首先是李雄的“大成”国号。李雄于建兴元年（304）十月称“成都王”之前，李特、李流、李雄均为益州牧、都督益

梁二州诸军事，明显带有西晋地方官色彩。而自立的“成都王”则明显是以所统核心地域——成都为号，亦为大多数割据政权的国号选择方式。晏平元年（306）六月李雄称帝，国号“大成”，“大成”应该是“大成都国”的省称，源自此前的“成都王”。因此时其政权控制区仅为以成都为中心的益州地区，北方的梁州、南方的宁州基本不在控制范围内，故有此名。从时间上看，大成国号的选定时间与匈奴汉国建立时间几乎同时[75]，但其间并无政治心理上的相似性，由此可见大成国名号的选择应与社会阶级矛盾之间并无太多关联。此后有李寿改国号为“汉”，则主要是李寿与李雄同宗异支，为李骧之子，要与李雄一系区别开来。同时，其即尊位前为大成国汉王，故有改号“汉”国的情况，亦为古代权臣篡位以自身王号为国号的常见做法，就此来看也与匈奴汉国的国号选择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没有尊晋的意味。[76]

由此可知，“成”“汉”两国号与当时阶级、民族矛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建国前的李氏集团在巴蜀社会中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冲突，但主要为流民集团与巴蜀土著之间的冲突，源自流民对巴蜀地区的掠夺，与此相伴的就是民族矛盾的冒头，如赵廞集团讨论李氏之时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但从整体上看这种表述也仅此一见，且表现得并不特别鲜明，远不如中原表现得剧烈。[77]更多的仍是基于流民集团对益州的杀掠而出现的双方利益冲突，并非民族矛盾，也非阶级矛盾。而且随着流民集团策略的改变，情况明显发生变化。史书记载“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78]，可见李氏统治下的社会阶级矛盾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两种矛盾在成汉建国后则表现得更少，就阶级矛盾来看，一方面，成汉国家在政治、军事领域排挤了巴蜀土著集团[79]，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部分地缓解了当时益州的经济负担[80]，故其阶级矛盾表现得并不明显。就民族矛盾来看，李氏集团虽然出身少数民族，但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经历了一定的文化转变[81]，成汉国家统治期间也没有突出的民族矛盾问题。

[1] 如〔日〕三崎良章提到：“成汉引入了包括设置丞相以下的百官、采用郡县制（在郡以下设置县的地方行政制度）等汉族的统治体制。”《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商务印书馆，2019，第66页。

[2]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39《百官志上》，第1227页，卷40《百官志

下》，中华书局，1974，第1262页。

[3] （唐）杜佑：《通典》卷37《职官十九》，中华书局，1988，第1004页。

[4]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39《百官志上》，第1226、1227页，卷40《百官志下》，第1261、1262页。

[5] 牙门有牙门将简称、护卫军队等含义，但牙门将为魏晋第五品武官，李特本身仅为不知品级的督将，故此牙门为其护卫军队的可能性较大。

[6] 如大将军为第一品，持节都督为第二品，刺史州牧为第四品。

[7] （唐）杜佑：《通典》卷20《职官二》，第509页。

[8]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24页。

[9]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25页。

[10]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24页。

[11]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29～730页。

[12]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0页。

[13]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0页。

[14]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4页。

[15]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2～733页。

[16]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3页。

[17] 《华阳国志·后贤志·侯馥传》，第663页。

[18] （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7页。

[19]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39《百官志上》，第1229页。

[20] （唐）杜佑：《通典》卷30《职官十二》，第822页。

[21]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6页。

[2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9，第2810页。

[23]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李寿》。

[24] 刘扬《浅析成汉的汉化》（《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一文认为成汉官吏来源前期即李雄时期以賨人为主，后期以汉人为主。随着更多汉人入仕，更多传统政治思想、制度被介绍引进，体现在用人制度上，选拔标准从最初的武功发展为名望和学识。职官设置上，官名古今汇集、杂乱无章，且缺乏监督机制，对官吏没有考

课制度，官吏权力没有受到限制，有官、职不一致，虚实不分，文武不分等特征。所论在职官设置、监督机制、职务等方面与本书大致相同，但其所说官吏来源前期以賨人为主则与本书有所差异，参见后文所论。另可参见刘永兴《氐族汉化窥探——以成汉为中心》（《亚太教育》2016年第26期）。

[25]（南朝·梁）沈约：《宋书》卷39《百官志上》，第1225页。

[26]（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25页。

[27]（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40页。

[28]（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40页。

[29]（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40页。

[30]（唐）房玄龄：《晋书》卷3《武帝纪》，第72页。

[31]（唐）杜佑：《通典》卷34《职官十六》，第939页。

[32]（唐）杜佑：《通典》卷29《职官十一》，第800～801页。

[33]（唐）杜佑：《通典》卷29《职官十一》，第801页。

[34]（唐）杜佑：《通典》卷29《职官十一》，第802页。

[35]（唐）杜佑：《通典》卷29《职官十一》，第802页。

[36]（唐）杜佑：《通典》卷29《职官十一》，第802～803页。

[37]（唐）杜佑：《通典》卷29《职官十一》，第803页。

[38]（唐）房玄龄：《晋书》卷24《职官志》，第740～741页。

[39]（唐）杜佑：《通典》卷34《职官十六》，第940页。

[40]（南朝·梁）沈约：《宋书》卷40《百官志下》，第1255页。

[41]（南朝·梁）沈约：《宋书》卷40《百官志下》，第1255页。

[42]《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40页。

[43]《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5页。

[44]（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3页。

[45] 成汉文武职官亦可参见任艺《成汉国史初探》，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8。

[46]（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6页。

[4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6，第2721页。

[48]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8页。

[49] 《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第653、654页。

[50]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5页。

[51]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流载记》，第3030页。

[52]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流》。

[53]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8页。

[54]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期载记》，第3042页。

[55]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期载记》，第3042～3043页。

[56] 刘扬《浅析成汉的汉化》（《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一文认为成汉皇子继承制度上经历了由养子到嫡长子继承的转变，这是成汉政治汉化的表现，与本书观点有较大差异。另可参见刘永兴《氐族汉化窥探——以成汉为中心》（《亚太教育》2016年第26期）。

[57]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40页。

[58]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寿载记》，第3045页。

[59] 参见漆泽邦《试论李特起义和成汉政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60] 张炜：《试论成汉政权灭亡的内部原因》，《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3期。

[61] 曾维加：《賨族与道教及大成国的关系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62] 肖迎《成汉统治期间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依汉晋以来汉嘉郡所领县情况认为沈黎郡领城阳（郡治）、兰、牦牛等县；依东晋晋原郡为汉原郡所改，认为汉原郡领江原、临邛、徙阳、汉嘉、晋乐五县。但其中属县多依靠前后其他政权属县推测，成汉是否有所变动不详。

[63] 此三郡仅见于《晋书·石勒载记下》“蜀梓潼、建平、汉固三郡蛮巴降于勒”（第2748页），《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李寿以建宁、上庸、汉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龙”（第2776页）。

[64] 肖迎《成汉统治期间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认为成汉设置交州是为了进一步夺取被东晋控制的交州，与东晋交州相毗邻的宁州所属郡有梁水、兴古、西平、永昌四郡，可以认为成汉交州所辖应为梁水、兴古、

西平、永昌四郡。但未对夜郎加以解释。

[65] 肖迎《成汉统治期间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认为成汉应不曾设置汉州。

[66] 此考证参见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140页。以上成汉政权疆域、政区情况参考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143～167页），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134～159页）列出。另可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8～509页注(24)；任艺《成汉国史初探》，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8。

[67]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9页。

[68]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9页。

[69] 李磊：《〈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中的“晋朝认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

[70] 参见后成汉文化教育、兴亡原因部分讨论。

[71] 〔日〕三崎良章从“南蛮校尉”这一异民族统御官、对晋的称呼、统治中国意识的构建等方面认为，成汉与居于中原地区的后赵、前燕、前秦等不同，表明其并没有把东晋视为统治中国的障碍。《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商务印书馆，2019，第217～229页。王安泰则从封爵角度考察认为：成汉建国之初就将封国安置于益州以外的地区，遍布于西晋疆域之内，显示李雄当时已有成为天下主的志向。《皇帝的天下与单于的天下——十六国时期天下体系的构筑》，载童岭主编《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中西书局，2014，第82～98页。二人所论均比较新颖，但论证上仍显得较为薄弱，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72] （唐）魏征：《隋书》卷33《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第963页。

[73] 常璩与《华阳国志》相关问题可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

[74] 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和慕容廆的“晋”旗号》，《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75] 刘渊于304年十一月称“汉王”，308年正式称帝，国号仍为“汉”。

[76] 另可参见胡阿祥《吾国与吾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126页。胡阿祥又提出：“李寿改用汉国号除早起封号外，成国的规模与刘备的汉相仿佛，以及李寿为汉王时有汉中郡地，也与李寿定国号为汉有关，李寿新定的年号‘汉兴’也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消息，盖国号为汉、年号汉兴，与刘备的汉乃至刘邦的汉攀上了关系，从而使得自己实质得自篡夺的政权，蒙上了一层‘正统’色彩。”

[77] 按：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成汉民族问题”中的相关讨论。

[78]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7页。

[79] 按：详后第七章第一节“兴亡原因”部分讨论。

[80] 按：详后第六章第一节“成汉经济”部分讨论。

[81] 按：详后第六章第二节“成汉文化教育”部分讨论。

〖第六章〗 成汉社会经济、文化与民族

成汉的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原本分为李氏自身带有的少数民族属性部分以及成汉国家层面两种。但从整体来看，李氏自身包含的各种少数民族元素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得很微弱，这与其早期发展情况有关。以下即对李氏与成汉国家所涉及的经济、文化、民族情况分别加以分析。

一 成汉经济

成汉经济相关记载较少，从李氏最早在巴西宕渠（今四川达州市渠县东北）之时开始，有记载其群体被秦收服后口出钱四十，又以巴人将赋称为賨，故被称为賨人之事，“口出钱四十”是其最早的经济负担。此后李氏等迁徙到略阳（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东北），经济情况不得而知。但从李氏一族在河陇基层任职可以略做分析，其中第一代李虎为将军，第二代李慕为东羌猎将，第三代的李特少仕州郡，李流为东羌督，李庠为郡督邮、主簿，被察孝廉、举良将、举秀异，并为中护军下属中军骑督等，基本为下级武官，这应与其早期为賨人小酋长擅长骑射有关。其交往的人也多为六郡下层官僚，如后来李氏集团中的西晋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阎式、陈仓令李武、阴平令李远等。就此来看，李氏一族在河陇地区应该主要以世代为官，以及由此带来的附属利益为家族生计。

流民入蜀以后，因其流动属性而就谷各地，并无定居，故基本只能依靠为巴蜀土著佣耕为生。史载：

> 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1]

阎式给罗尚的书信中也提到：

> 但往日初至，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秋潦，乞须冬熟，而终不见听。[2]

是知流民为了更好地生存，而随谷所在为人佣耕，甚至“一室五分”，形成一种特殊的群体形态。

而李特等所领导的流民军在赵廞的支持下主要以劫掠为生，“专为寇盗，蜀人患之”。此后还有对成都的大规模劫掠等，甚至导致西晋广汉太守辛冉有“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3]情况的出现，足见流民上层劫掠财富之丰厚。这是建国前李氏与流民集团自身的经济情况。

李雄建国以后，最初因经济情况不好，曾纵容将领进献金银珍宝买官，以此来补贴国家经济。此后，李雄对巴蜀地区人口有了较为清晰明

确的赋税规定，根据记载可将其赋役情况列表如下（见表6-1）。

表6-1 成汉时期巴蜀地区赋役情况

类型	田租	户调
男丁	三斛	绢数丈、绵数两
女丁	一斛五斗	
疾病	七斗半	

从表6-1可以看到，大成国的田租是税人的，只以成年年龄为限，划分较为简单。但也可以此推断成国已经有较为系统的编户体系，下层民众与土地的重新结合也应表现出较好状态，但在此基础上的徭役和兵役情况不详，只有“事少役稀”的记载。

以此与魏晋时期的赋役情况加以对比，结果如表6-2所示。

表6-2 魏晋时期赋役情况

政权	田租	户调
曹魏	亩四升	绢二匹、绵二斤
西晋	丁男五十亩收租四斛（合亩八升）	丁男户绢三匹、绵三斤
	丁女二十亩一斛六斗	丁女、次丁男户半输
	次丁男十亩八斗	边郡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
	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賨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一丈

可知成汉国家的田租负担表面上看是高于曹魏而低于西晋的。但问题在于成汉的田租并没有给出承担标准，丁男所交三斛是基于多少田地制定的标准并不明确，因此还不能妄下定论，推测应该与西晋五十亩的丁男课田标准相差不远。而在户调负担层面则明显减轻许多，针对魏晋来看，几乎只相当于两代的十分之一。因此，成汉国家的赋税负担整体上是减轻了的。

此外，史籍中对赋役承担者没有具体的交代，虽记载有大成国对新依附的人口给予“复除”的待遇，但具体“复除”的年限没有记录。另外，对范长生部曲也均给予“复除”的优待，“租税皆入贤家”，表示对范长生集团特殊地位的照顾。从这两段来看，李氏集团对一些特殊人群给予了“复除”待遇，以此推断六郡流民集团作为李氏建国的核心基础应该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只是没有具体记载。进一步来说，大成国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应该仍是以巴蜀本地百姓为主。

经过李雄时期的发展，大成国经济恢复得很快，巴蜀地区民多富实，“年谷屡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好转，大成国也开始走上了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道路。李班曾对李雄建议：“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4]李雄接纳了这一建议，但此后的情况不明。而大成国在驻军之地应该有军屯的设置，如史籍中见有李玝为梁州刺史，修晋寿军屯的记载，而其具体细节也不得而知。此后的汉国应该与大成情况基本一致。

成汉农业生产情况也可以从一些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如成汉墓葬考古中常见铁质锄、斧、镰等生产工具随葬，即可知成汉国内农业地位较高。

在家庭养殖业方面，成汉相关墓葬里面也曾经出土陶制动物，且以狗、猪、鸡、鹅等为主，数量较多，并有鸡圈出土，可知成汉国家的家畜、家禽养殖业较发达。

农业之外，其他经济门类的情况不见详细记载，但蜀地自身有着长年积累的物产和经济门类，如史载巴地物产：

> 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蕟。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5]

蜀地物产：

> 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井狼垂耀，江、汉遵流。……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毡、毦，丹、黄、空青之饶，滇、獠、賨、僰，僮仆六百之富。……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百谷蕃庑，四节代熟。桑、漆、麻、纻靡不有焉。[6]

汉中地区物产：

> 其地东接南郡，南接于巴，西接武都，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7]

南中地区物产则有：

> 晋宁郡……土大平敞，原田。多长松皋，有鹦鹉、孔雀、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
>
> 建宁郡……升麻县……山出好升麻。……双柏县……出银。……俞元县……怀山出铜。
>
> 朱提郡……朱提县……山出好银。……堂螂县……出银、铅、白铜、铜、杂药。
>
> 南广郡……南广县……有盐官。……临利县……有土盐。
>
> 永昌郡……土地沃腴，宜五谷。出铜、锡、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又有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
>
> 云南郡……土地有稻田、蓄牧，但不蚕桑。
>
> 梁水郡……梁水县……有振山，出铜。……贲古县……山出银、铜、铅、锡。[8]

知南中地区虽然基本农业生产略滞后于益、梁二州，但其一些手工业、经济产业发达，以及珍奇物产十分丰富，与益、梁二州各擅胜场。

从以上记载的内容可见成汉国家所具有的自然物产资源之丰厚、经济门类之多样。且《华阳国志》一书作者常璩即为汉国散骑常侍官，世居巴蜀，故书中所记应有其亲身经历成分，信息较为准确。成汉时期虽然经历了西晋末年蜀人的大量流失，但其经济门类也应与此相去不远。而其户调征收绢、绵，也说明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应如蜀汉时期一样较为兴盛，且成汉墓葬中出土有陶制纺轮，亦可知纺织业在成汉国内影响较大。

在其他制造业方面，记载见有李寿曾经扩大尚方御府，将州郡工巧之人征发来充实其中，但职能应该主要是供应皇室享用的奢侈品。在基层手工业方面，从考古资料来看，成汉墓葬出土有陶制罐、碗、钵、釜、甑、杯、灯，青瓷碗，铁质剪刀、釜、杈、刀、剑，铜釜、锅、环、镜、圆帽钉、带钩、扣、环，玛瑙珠，银手镯等生产生活物品，说明成汉国家的制陶、制瓷、金属冶炼、宝石加工等产业仍然兴盛。[9]

在货币发展层面，李寿时期曾铸“汉兴钱”，为我国历史上第一种年号钱。但其钱规格不一，所见即有钱径16.5mm、17mm、17.2mm、

17.5mm，穿径6mm、7mm，外郭厚0.8mm、1mm，重0.6～1.1g、1.3g、1.4g、1.55g、1.6g、1.8g等不同形制、重量。钱文隶书体，有直书、横书“汉兴”两种情况，多素背，也有极为罕见的面背均有“汉兴”二字者。汉兴钱在形制上与蜀汉减重直百钱有一定承袭关系，本身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差异主要反映在重量上：初期钱重可达1.8g，中期钱重在1～1.4g，晚期多不足1g，最轻者仅有0.6g。汉兴钱整体轻薄，用铜不精，且大多字迹模糊、铸造质量差。其出现和特点有社会历史原因：一是成汉李寿时期逐渐施以暴政，经济上走向奢靡，被迫只能采取铸造小型钱币的办法来保证剥削；二是战乱导致冶金劳动力匮乏，铸币材料的短缺也使铸币与其币面重量标准相差得越来越远，迫使其放弃以往以重量命名货币的传统办法；三是魏晋十六国以来各政权多铸造自己的货币，币制混乱，铸造年号钱可以与其他国家的铸币明显区别，有利于成汉国内货币管理，保护成汉经济；四是汉兴钱颁行于李寿即位改国号同时，面对自身以下克上、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这也是证明自己的正统性、提高合法地位的一种宣传手段。[10]

二 成汉文化教育

成汉文化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原始的李氏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成汉文化教育。

李氏作为巴西宕渠少数民族，最初的文化为賨人文化，“俗性剽勇，又善歌舞”，尤其“敬信巫觋”。此后，到成汉时期也不断能看到“敬信巫觋”的影子。如李雄母罗氏死后，李雄即信“巫觋者之言，多有忌讳，至欲不葬”，应该是賨人信奉巫术的遗存。而李雄建立大成国后身边竟然多有巫觋者，且为李雄所敬信，也说明巫术在大成国的影响力之大。[11]

此外，成汉墓葬虽然分布在成都、西昌各地，但其出土人俑均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如头竖三角、高鼻、眼外凸出，口吐长舌直达胸前等。刘弘考证这些应该并非賨人体质特征，一是关于賨人的史料中均无賨人在体质特征上异于同时代其他民族的记载，二是国内各时代陶俑、铜俑唯一与其相似者仅有三星堆遗址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因此，成汉墓葬出土镇墓俑只能与賨人宗教信仰有一定联系。汉晋时期蜀地完全笼罩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天师道产生和活动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浓厚的古蜀巫觋文化色彩。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及面具制作精美、数量大、种类多，它们代表了古蜀巫觋文化的全盛期。成汉俑简略的造型却反映了这种文化到汉晋时期的衰落，已是古蜀巫觋文化的孑遗了。[12]但索德浩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结论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古蜀巫觋文化一直从三星堆文化延续到成汉，但为何中间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均未发现；二是这些人像中除镇墓俑外还有吹笛俑、侍从俑等，其形象应与精神信仰关系不大，为何也会与三星堆人像相似？但如此高的相似度又绝非历史偶然性可以解释，二者应该存在密切联系。索德浩认为成汉俑族属确实并非賨人形象，而有可能是以氐人为主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形象。成汉时期蜀地为六郡流民所据，而流民又以氐羌之族为主，故成汉墓葬应主要为氐羌二族所遗留或受氐羌葬俗影响，与三星堆器物坑族属有着共同的来源地——川西北、甘青地区氐羌传统居住地。随葬陶俑之俗应是流民进入蜀地后新吸收的葬俗，但在陶俑形象上保持了氐羌自己的民族风格。[13]但索德浩的推论也有无法解答的问题：一是巴蜀地区的氐族绝不仅是到李氏流民集团入蜀才带入的，其在川西北、川北地区生活时间久远，且与巴蜀汉人互动也较早、较多，故索德浩的判断并不能解释为何从三星堆文化时代到成汉之间进

入蜀地的氐人并未能带来类似的俑人；二是氐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关陇、河西地区影响很大，与这些地区的汉人等各族杂居，并建立数个氐族政权，但在这些地区的氐人政权中又为何没有出现成汉俑，这也是难以回答的。因此，目前的资料情况还不能对三星堆俑、成汉俑具体的文化归属做出确定无疑的判断，尚有待更多类似俑人的出现。[14]

另外，成汉时期也多见占梦，如李雄之母罗氏曾以胎梦推断两子的前途；观天象，如李班时期太史令韩豹以异常天象来警示内乱；等等。而成汉国家也多见占卜的情况，如李寿在纠结称帝之时，即加以卜筮，得到能够当“数年天子”的卦象后坚定了称帝的意念。这些有可能是李氏原始信仰与中原方术传统结合的产物。

因为对巫术的喜爱，賨人对道教也有所接受。张鲁据汉中之时，賨人即因张鲁以鬼道教人与其信仰相近而投奔张鲁，此后李氏的信仰程度不得而知。如陈侃理即认为六郡豪族大姓在迁徙与融合过程中虽然依然保持着天师道信仰，但已被儒家思想同化，更以汉晋之制为基础建立成汉统治秩序。[15]但六郡大姓应该本身即为儒家思想为主的群体，李氏则是在自汉中转到六郡以后即已逐步发生文化转变（详见后论）。而成汉国家尊奉范长生，范长生为道教领袖，因此，道教在成汉国家内部享有极大自由和较高地位应没有问题。唐长孺即认为道教即李氏与范长生联合的一个基础，“当巴氐李氏统治期间天师道在巴蜀一定更有发展”[16]。甚至有学者认为成汉政权就是巴人一手缔造的道教王国。[17]“但有评论者提出，只有范长生和李雄的关系确实体现出道教背景”，不宜将李特到李势8个君主都与道教扯上关系[18]，是比较正确的。

李氏在迁徙到略阳生活以后，应该对其文化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李氏家族人物成为兼具少数民族骁勇善战和中原汉人文化修养的二元文化体，这从李特兄弟及其下一代的文化变化中可以看到。

仅就李氏家族文化特征变化来看，迁徙的第一代为李虎，为将军；第二代李慕，为东羌猎将。二人具体情况不明。而明确在六郡出生、成长的是李特兄弟几人。史载李特（？～303）“少仕州郡，见异当时，身长八尺，雄武善骑射，沈毅有大度”[19]。李流（248～303）“少好学，便弓马，东羌校尉何攀称流有贲育之勇，举为东羌督”[20]。可见二人仍以勇武为地方所用。而李庠相关记载更为细致，史载李庠（247～301）“少以烈气闻。仕郡督邮、主簿，皆有当官之称。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后以善骑射，举良将，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举秀异，

固以疾辞。州郡不听，以其名上闻，中护军切征，不得已而应之，拜中军骑督。弓马便捷，膂力过人，时论方之文鸯”[21]，可以明确感受到李庠有着较为深厚的汉文化功底，兼有勇武的一面，故在兄弟中十分突出，与上两代人突出的武将气质尤为不同。下一代的李荡（李特子，？～303）也是“好学，有容观”[22]，其弟李雄也有“手不释卷”的赞誉。以李雄（274～334）生卒年来看，其兄李荡也应成长于略阳地区。这种情况只能是来自关陇地区汉人大族的影响，双方在长达百年的接触交往中进行婚姻、文化往来，已经结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此后李氏家族人物在文化特征方面的转变更为明显，如李寿（李骧之子，300～343）“有干局，爱尚学义，志度少殊于诸子”[23]，或曰“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异于李氏诸子”[24]。再下一代者，如李班（李荡四子，297～334）“谦虚博纳，敬爱儒贤，自何点、李钊，班皆师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陇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为宾友。每谓融等曰：‘观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惭色。何古贤之高朗，后人之莫逮也！’为性泛爱，动修轨度。时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厉之”[25]。李期（李雄四子，314～338）“聪惠好学，弱冠能属文”[26]，“少攻学问，有容观”[27]等。再下一代则有李期从子李载“多才艺”，为李期忌而杀之等，已经完全接受汉文化了。

在自身汉文化发展的同时，李氏在成汉国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李雄之时曾“兴文教，立学官”，应该是按照中原传统的官学系统建立的。李寿时期也曾“广太学，起宴殿”，并“宴礼于太学，举明经者封好学侯”[28]。李氏所为一方面来自自身逐渐提高的汉文化修养，这促使李氏在汉文化教育方面始终向中原传统教育体系看齐；另一方面，巴蜀地区秦汉以来兴旺发达的巴蜀文化、儒学教育传统[29]给了成汉国家发展官学教育以可能。

此外，成汉也设有史官，见有太史令韩豹、韩皓等，史官常璩，并已修成多部史书，其内容多入《华阳国志》。[30]而对成汉时期整体史学情况，邹绍荣等认为成汉政权李雄统治时期是人文环境比较好的时期。当时巴蜀史学的基本状况是私强官弱，即主要以私人撰述为主，官方史学明显衰微，成绩非常有限。而官史不彰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需求的弱化，二是制度设置的缺失。巴蜀地区史学在公元3～6世纪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是艰难的，也是缓慢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长时

间的动乱与文化上的“内争”所造成的史学环境的恶化。第二，经学的强势地位在当时的巴蜀地区依然存在，史学的附庸色彩仍然比较浓厚。第三，优秀史家的外流。公元3～6世纪的巴蜀史学有着非常鲜明的区域特色，即高度的本土化，表现在：第一，史家群体的本土化；第二，史学意识的本土化，即强烈的记述本土历史、彰显本土人物的意识与冲动；第三，史著内容的本土化。[31]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賨人与成汉国家另一值得探讨的是其“巴渝舞”文化。史载“巴渝舞”：

> 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龠。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识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32]

“巴渝舞”本为古代嘉陵江、渠江流域賨人集体战舞，后被统治者吸收改造为宫廷武舞。[33]虽然“巴渝舞”在成汉国家的具体情况不明，但賨人作为这一舞蹈的原始创造者，且此舞被吸收进入中原宫廷，成汉又对中原魏晋的礼制文化有所学习，故此舞也极有可能存在于成汉宫廷之中。

三 成汉民族问题

成汉国家民族问题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李氏賨人集团自身的民族文化问题，二是作为成汉国家核心的六郡流民内部存在的民族问题，三是成汉国内的其他民族问题。其中，李氏賨人自身少数民族文化已经蜕变为汉文化，这源于关陇地区近百年与汉人混居[34]，故以下主要对其他两个方面的问题分别加以分析。

首先，在六郡流民集团内部，除了六郡编户民之外，还有部分氐羌民众随迁，这些人同样成为李氏发展建国的重要部分，与他们的关系也成为成汉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部分。从记载来看，表现最为突出的主要是氐人。李特等归附赵廞之时，所带除了六郡豪强任回、上官惇、费他等之外，即有氐人苻成、隗伯等共四千骑兵，可见其集团军事组成是有氐人成分的。而李氏一族虽然自身为賨人，此时却已经明显表现为汉人豪强，如李特与李骧改辛冉的悬赏，其内容称："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35]则是将"李"列于六郡之豪，而与氐、叟侯王并称，这种写法并没有被六郡豪强和氐、叟少数民族首领所质疑，可见这已经是当时公认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李氏在略阳长期发展，作为基层官员参与地方行政而推动其自身汉化的结果。虽然赵廞集团曾有"非我族类"之言，但这应该是上言"李庠握强兵于外"，下言"倒戈授人"，主要针对流民集团作为外来人控制军事指挥权而言，更多的不是指民族问题。[36]

但李氏与氐族酋豪之间关系较为奇特，前面提到其有合作的一面，但此后双方关系似乎并不融洽。在罗尚进攻李流之时，李流与李骧出兵抵御涪陵民药绅，罗尚督护何冲趁机进攻北营，在此关键时刻，氐人苻成、隗伯在营中突然叛变响应罗尚军，给李氏后方带来致命的威胁。此时多亏李荡母罗氏亲自贯甲作战，保证了北营的稳定，并坚持到了李流军队的回援，迫使苻成、隗伯率领党羽逃奔罗尚。苻成、隗伯的叛变十分突然，此前并没有见到李氏集团与氐人之间的冲突。此后李雄用计调动罗尚出击，罗尚又派遣隗伯进攻郫城（今四川郫都区）。罗尚派遣降将进行重要战役这一情况也比较特殊，至少说明罗尚认为李氏集团与氐人之间的矛盾很深，是不会轻易背叛自己的。隗伯果然作战勇敢，身负重伤被俘。随后李雄对氐酋苻成、隗伯等的态度也较为奇特，对因叛乱险些葬送流民集团的苻成，甚至曾经在叛乱中砍伤自己母亲眼睛的隗伯

等均表现出了宽宏大度的一面：苻成反复降叛、隗伯身负重伤，李雄均加以原谅，并且“厚加待纳”。此后，又有东晋益州隗文等杀益州将吏所推长官张罗，驱吏民投降大成，也为李雄接纳之事。此隗文史籍又记为与苻成反复降叛、手伤李雄母罗氏者，但从前后记载来看，此处应该是隗伯之误，则隗文的出现较为突兀。从其姓氏来看，可能为苻成、隗伯叛投罗尚之时的党羽。氐人的反复叛离、李雄的一系列宽容接纳行为可以从一些信息中做一推断理解。梳理此后成汉统治集团所见任官情况，其中几乎没有所谓氐羌酋豪，所见仅有汉末时期出现的将军隗文。这就说明氐人集团虽然在最初即参与了李氏军事团队，但其并没能进入李氏集团及成汉国家的真正统治核心，这很可能造成了氐人首领的不满，其叛离应该一方面有对不公正待遇的不满，另一方面很有可能也是对流民集团领导权的一次争夺。李雄等对其的宽容应该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层面应该是虽然苻成、隗伯等氐人首领带领党羽叛逃，但六郡流民集团中仍有大批的氐羌人存在，且巴蜀南中旧有大批氐羌人口，故李雄仍需借重其人来安抚众多氐人的情绪，以保障政权的稳定。史籍中即在记录李雄宽厚对待苻成等之后，同时记载其结果是“夷夏安之”，可见这应是李雄等的主要目的所在。在汉国政权灭亡后，不久即有旧臣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军隗文等再次叛乱，均被击破。随后又有邓定、隗文等入据成都，推举范长生之子范贲为帝，直到永和五年（349）四月范贲被益州刺史周抚等击斩，益州被彻底平复。在数年的益州之乱中，隗文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可知六郡氐人势力在益州地区应有其重要影响。另外，李雄极有可能也是借助对隗伯等“罪大恶极”之人的宽容，招徕周边各族民众的投附，其结果能导致“威震四土”即指此。

其次，对于成汉国内各族问题，从记载来看，主要有南中地区夷人和后来出现于益州的僚人两个群体。[37]南中地区史载：

>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38]

>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39]

南中地区历来为夷帅、大姓所控制，成汉时期也是如此。最初，李雄为了攻占宁州，曾诱使建宁夷人讨伐南夷校尉李毅。而在大成政权发展兴旺的时期，也曾有“汉嘉夷王冲归遣子入质……建宁爨量蒙险委诚。其余附者日月而至”[40]情况出现，这给东晋政府带来很多麻烦，直接导致东晋宁州刺史无力抵御，改以零陵太守尹奉代之。尹奉到任后改行“以夷制夷”的对策，以重金招募徼外夷刺杀了爨量，才使宁州地区趋于稳定。可见大成国统治者很早就与南中夷人有所联系，但此时双方仍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李氏借夷人之手祸乱南中，给自己南下创造条件，夷人则借大成国名号执行自立的企图，如叛乱的爨量原即为东晋梁水太守。

大成政权在玉衡二十三年（333）彻底占据牂柯之外的南中之地，又派遣李班讨平宁州不顺从的夷人。但大成在南中的统治并不稳固，这应该与其政策有关。史载“南中初平，威禁甚肃。后转凌掠民。秋，建宁民毛衍、罗屯等反，杀太守邵攀。牂柯太守谢恕举郡为晋。寿讨破之”[41]。而随后即有分宁州置交州，以霍彪为宁州刺史、爨深为交州刺史之举，其中霍彪原为东晋建宁太守，爨深为南中夷人大姓。此后又曾分宁州置汉州、安州。由此可以推断，大成最初应该在南中地区派驻了自己的军队和地方官员，这些人对南中地区采取了较为严酷的掠夺政策，直接导致叛乱的发生，迫使大成转变对策：一方面，分解宁州，以便于管理；另一方面，改以宁州大姓、夷帅出掌地方，以安南中人心。这也可以从南中地区地方官吏的人选看出，南中地区在成汉时期有宁州、交州、汉州、安州等，但最主要为宁州，所见历任宁州刺史为任回、李寿、李权、霍彪，其中任回、李寿出任宁州刺史之时大成国尚未取得南中之地，故仅为虚授。李权、霍彪则是实际控制宁州，霍彪即原为宁州地方官。而宁州州治建宁郡，历任建宁太守为邵攀、孟彦，邵攀为大成国将领，但被建宁民所杀，后任孟彦则为南中大姓。此外，在南中地区分化出的交州、汉州、安州，交州刺史即为南中夷帅，其他两州不见具体刺史人选。可见成汉在南中的管理仍然与蜀汉时期相似，即基本承认大姓、夷帅的统治权，自己仅获取其顺服。

总的来看，成汉南中地区还是比较安定的，仅有玉衡十三年（323）越嶲斯叟叛乱出现，到玉衡十六年被平定后即基本稳定，尤其是在更换地方官吏以后。

成汉国内另一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群体是僚人。史书对其记为“蜀土无獠，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加以

饥馑，境内萧条”[42]。其人数有十余万落，势力很大。对于巴蜀地区原本是否有僚人，南方北上的僚人数量、路径、分布等问题，学术界颇多争论，在此不再赘述。[43]这里要探讨的是，僚人在成汉时期应该已经长期隐伏于山中，到汉国末年，随着国家衰落，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且缺乏劳动力，僚人于是自山中涌出并遍布巴蜀各地，造成巴蜀地区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其间历代均不断有僚人参与的巴蜀地方叛乱出现，是知成汉政权实为这一长期民族问题的肇始者。[44]

此外，成汉境内应还分布着其他众多少数民族，但基本不见于史籍记载，应与魏晋以来的情况变化不大，不再赘述。

而成汉整体民族关系相较于其他十六国政权来说是比较好的。记载中并不见压迫性的民族政策，以及此时期常见的“胡汉分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族矛盾并不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巴蜀南中地区的整体民族分布格局、关系结构较魏晋没有大的变化，李氏集团沿袭魏晋以来的地区统治，并不需要特别的民族政策调整。直到末年各种原因导致僚人大量涌入巴蜀腹地，才导致民族矛盾尖锐化。[45]

[1]（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5页。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4，第2667页。

[3]（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5页。

[4]（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班载记》，第3041页。

[5]《华阳国志》卷1《巴志》，第5页。

[6]《华阳国志》卷3《蜀志》，第113页。

[7]《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第61页。

[8]《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第267、272～273、278、279、284～286、295、302页。

[9]成汉墓葬出土相关器物可参见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王毅、罗伟先《成汉墓考古记》，《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刘世旭、刘弘《西昌市西郊乡发现成汉墓》，《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群》，《考古》2007年第10期；等等。

[10] 关于汉兴钱出土及研究情况，可参见曾咏霞《成都小南街遗址出土的直书汉兴钱》，《中国钱币》2002年第2期；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群》，《考古》2007年第10期；袁克林《我国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初探》，《收藏界》2011年第11期；房鑫、李怡然《历史上第一枚年号钱“汉兴钱”的产生考》，《学理论》2015年第6期；等等。

[11] 林富士即认为李雄“应该是一名巫者的信徒”。《巫者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80页。陈辉甚至认为：“五斗米道对巴蜀李雄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李雄的信仰还应当沿袭賨人的传统，即巫觋信仰，也就是巴蜀地区民间流行的鬼道。”《民间信仰的新发展：论汉晋鬼道》，《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2] 关于成汉墓葬陶俑的文化属性，参见刘弘《成汉俑新说》，《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13] 索德浩：《成汉俑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载《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263～276页。

[14] 出土陶俑情况可参见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四川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第355页；金勋琪《旧传桓侯巷的张飞衣冠坟发掘确系成汉晚期墓葬》，《成都晚报》1986年6月25日；王毅、罗伟先《成汉墓考古记》，《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刘世旭、刘弘《西昌市西郊乡发现成汉墓》，《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群》，《考古》2007年第10期；《成都金堂出土20多座成汉时期墓葬，凸眼陶俑神似三星堆铜人》，《成都商报》2018年5月8日；《迄今发现最大规模成汉墓金堂出土成汉陶俑“撞脸”三星堆人像》，《成都晚报》2018年5月8日。

[15] 陈侃理：《赵李据蜀与天师道在曹魏西晋时期的发展》，载《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 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氏据蜀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17] 祁泰履：《传统中国的民族身份与道教身份认同》，载《正一道教研究》第五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18] 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8期。

[19]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2页。

[20]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流载记》，第3029页。

[21]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流载记附李庠》，第3031页。

[22]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3页。

[23]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0页。

[24]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寿载记》，第3043页。

[25]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班载记》，第3041页。

[26]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期》。

[27]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7页。

[28]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寿》。

[29] 巴蜀文教发展可见《汉书》卷89《循吏·文翁传》所载：“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中华书局，1962，第3625～3627页。

[30] 常璩著述情况可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

[31] 邹绍荣、李小树：《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史学的发展》，《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32] （唐）房玄龄：《晋书》卷22《乐志上》，第693～694页。

[33] 参见江玉祥《賨人与賨国——宕渠历史文化散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4] 按：相关情况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成汉文化教育”相关探讨。

[35]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5页。

[36] 对此学术界也多有涉及，如有从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墓葬形制和物质文化变化认为到西汉末期巴人已完全与汉人一样，巴人物质文化形制已经没剩多少了。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第89页；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第237页。另有从西昌成汉墓入手，认为西汉末巴人逐渐汉化的历史趋势已经开始。《西昌首次发现成汉墓》，《中国文物报》1990年8月9日，第1版。童超《论李特兄弟领导的武装斗争及成汉政权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一文也提到巴氐、叟人已经汉化，经济、文化生活与汉人无别。

[37] 肖迎《成汉统治期间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认为成汉是一个多民族地方政权，尤其是在南部宁州境内，有賨人、僚、濮、羌、僰、叟、昆明、靡沙、鸠僚、闽濮、獽、蜑、板楯蛮、蟾夷。但这些民族，尤其是在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在成汉国家产生过多影响，故在此不更多加以讨论。

[38] 《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第229页。

[39] （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991页。

[40]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85页。

[41]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2页。

[42]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10页。

[43] 参见高然、杨鑫《建国以来的巴蜀僚人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44] 参见高然、杨鑫《晋唐巴蜀僚人与区域政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45] 成汉民族关系问题另可参见王晴晴《论成汉政权及其民族关系》，《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任艺《成汉国史初探》，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8。任艺文中认为成汉也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但所举为李期“多所诛夷”，以此“夷”为“夷人”，有误，此处明显应为杀、灭之意。

〖第七章〗 成汉政权兴亡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成汉国家以外来流民集团崛起建国，于巴蜀之地立足数十年，其间虽无大的拓展，但也一度在西部政局中举足轻重，而且经营巴蜀数十年，对区域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兴亡原因、特点与历史影响等均值得深入分析。

一 兴亡原因

1.成汉国家兴起原因

对于李氏在巴蜀地区的兴起，吕思勉认为：“巴氐之乱，原因有四：关西丧乱，不能绥抚，听其流移，一也。流人刚剽，蜀人软弱，主不制客，二也。一统未久，人有好乱之心，三也。兵力不足，指挥不一，四也。”[1]但仍有可论之处，以下再进一步加以分析。

（1）外部因素

李氏所领导的流民集团能够割据建国，首先得益于西晋末年的整体环境因素。

其一是西晋西北地区有秃发树机能叛乱，自西晋泰始六年（270）延续到西晋咸宁五年（279）十二月斩秃发树机能，河西、陇右各族均被卷入，历十年之久，给西北局势混乱埋下了伏笔。此后仅过了十余年，到西晋元康四年（294）又爆发匈奴人郝散在谷远（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的起义。郝散死后两年，郝散弟弟郝度元又于元康六年组织羌胡起兵，推氐帅齐万年为帝。元康七年正月，齐万年击杀大将周处，关中守将逃窜。七月，秦、雍二州即爆发旱灾、疾疫。叛乱直到元康九年正月才被西晋平定。这一系列的少数民族起义搅乱了西北的局势，尤其是齐万年起义，直接促使六郡流民南下入蜀。而面对恶劣的形势，六郡流民在入蜀过程中以乡里为基础被迫团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即为乡里豪强的李氏兄弟脱颖而出，以其“好济人之难，州党争附之。与六郡流人避难梁、益，道路有饥病者，庠常营护隐恤，振施穷乏，大收众心”[2]，奠定了成汉国家的统治基础。

其二是紧随齐万年起义而来的八王之乱全面激化，导致西晋统治集团爆发内乱。西晋永康元年（300），贾后废杀太子司马遹，赵王司马伦又杀贾后，从而引发八王之乱走向全面激化。各方镇宗王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而相互征战，引边郡少数民族参战，随之而来的胡羯在北方搅动政局，导致局势日趋失控。一方面，西晋核心力量集中于中原争霸，无暇顾及巴蜀边陲的动荡；另一方面，西晋对各地的控制力减弱，尤其在西南地区的调度力量不足。如李氏流民集团攻杀赵廞后，罗尚以益州刺史身份入蜀之时率兵七千余人，此后直到退出益州的几年间，从西晋

获得的军事支持较为有限。从整个形势来看，军事支持主要来自三个方向。一是梁州的军事力量，罗尚曾求援于梁州，此后新任梁州刺史许雄曾派兵进攻李特，但遭遇失败，坐“讨贼不进”，征即罪。可知梁州军事力量并没有过多地投入益州。二是荆州的军事力量，西晋朝廷曾派遣荆州刺史宗岱等率水军三万人救援罗尚，力量较为强大，但此后因宗岱死，荆州军退，又逢荆州义阳蛮张昌、流民叛乱，荆州再无力支持益州。三是宁州的军事力量，罗尚曾求救于南夷校尉，南夷校尉遣兵五千帮助罗尚，但并未见到这支军队发挥太多作用。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军事力量支援外，尚有来自河间王司马颙的支援。司马颙曾派遣督护衙博讨伐李特，但被击败，此后不见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上即为西晋在益州动荡过程中的全部外部军事支援，其没能更大规模地组织军事力量应该是受到了自身矛盾激化的影响，这些给了李氏集团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其三是东晋初年连续的政治动荡，如王敦、苏峻、祖约等的叛乱争权，使荆扬地区始终较为混乱，也牵制了东晋的精力。

其四是巴蜀地区自身环境较为封闭，易守难攻、物资丰富，也给了进入巴蜀地区的庞大流民集团以机会。史载“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银铜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涂，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也”[3]。最初流民集团入蜀时，西晋朝廷即曾有不令其入剑阁的考虑，可知因巴蜀险要，西晋也对大批流民涌入蜀地可能带来的危险有所顾忌。而流民集团得以进入蜀地之时，又有“（李）特至剑阁，顾盼险阻，曰：‘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4]的感叹，可见益州地区地理条件之优越。西晋没能够组织有效的军事力量入蜀打击流民集团，除了前述的内乱影响之外，益州自身这种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也应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后北方的割据力量、南方的东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对成汉有大规模的讨伐举动，也与其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有关。

其五是自赵廞在益州地区发动内乱，益州地区征战不休，导致巴蜀地区人口外流。如李流时曾有“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5]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直接导致巴蜀地区自身实力减弱，对流民集团的抵御能力降低。当面对流民集团凝聚在一

起的强大军事压力之时，只能依靠益州地方官所具有的军事力量与之对抗，自身除了少部分人能够据险结坞堡自保之外，根本无法组织起能与之对抗的力量，这也是六郡流民集团能够在益州发展、壮大、建国，并控制蜀人的原因之一。

其六是巴蜀地方土著地主多谋求自保，故在各方力量对决中往往并没有很强的西晋国家观念，而是倾向于对自身有利的一方，导致李氏流民集团能够有回旋的余地。如李特占据上风时，即有“蜀民相聚为坞者，皆送款于特，特遣使就抚之；以军中粮少，乃分六郡流民于诸坞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6]，是知蜀地坞堡摇摆不定的情况，以及李氏集团对其的认识。此后西晋调遣荆州水军三万进入益州救援罗尚，因荆州“军势甚盛”，诸坞堡“皆有贰志”，改与罗尚一方相约，在此后罗尚进攻李特之时，果然“诸坞皆应之”。此后李流势大，又有“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而坞堡组织中最为著名的是范长生一支，其与流民集团的结合亦有机缘巧合的意味，史载其过程：

> 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尚参军涪陵徐轝求为汶山太守，欲要结长生等，与尚掎角讨流。尚不许，轝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流军复振。[7]

范长生的支持是流民集团发展的重要转折，而其之所以在此关键时刻支持李流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当时形势来看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李流虽然一时处于劣势，但流民集团对策转变以后相对于盘剥地方的罗尚来说要好得多，同时，六郡流民作为外来人势力集团，于巴蜀立足对本地大族豪强更为依赖，故从各方面考虑，六郡流民集团更为符合巴蜀土著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范长生与李氏賨人有着乡里、宗教上的联结纽带，这也赋予了双方天然的合作基础。[8]

其七是益州地方官吏内部的不团结。益州乱局最初起自赵廞火并成都内史耿滕、西夷校尉陈总，此后流民集团与赵廞的决裂其实也是益州地方官署内部的分裂。罗尚进入益州后，其集团内部意见也多不统一。先有王敦、辛冉等在对待李特兄弟态度上与罗尚出现分歧，此后李苾、辛冉又有“罗侯贪而无断……宜为决计，不足复问之”[9]的看法，可见益州州、郡长官在事情决断上的矛盾。罗尚作为益州最高长官并无绝对权威，这就直接导致其在很多时候调度不灵，难以发挥最大的力量打击流民集团。

其八是西晋一方在一些关键决策上的失误，这既包括西晋中央政府的，也包括益州地方军政长官的。从中央政府来看，最初朝廷坚决不许六郡流民入蜀，但当侍御史李苾受流民贿赂以后，即转而说服朝廷纵流民入蜀，结果导致流民“不可禁止”。此后赵廞为了借重六郡流民而纵容李特等人逐渐坐大，但随即又因李庠骁勇而杀之，导致李特集团与之决裂，带来杀身之祸。而罗尚入蜀时对李特等的威胁极大，李特等人十分恐惧罗尚，这本来是一个一举解决流民首领从而消除流民隐患的好机会，但罗尚对他人建议没有听从。此后六郡流民在朝廷命令下准备迁回河陇地区，结果因为辛冉等与流民发生矛盾、贪图流民财物等而对流民逼迫太急，最终导致六郡流民被迫集中在李氏一族周围。因此，从上到下的一系列决策失误是六郡流民日趋独立并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2）内部因素

在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影响的同时，流民集团内部的一些有益因素也是其成功的关键。

其一是自身军事力量的强大。六郡流民入蜀有十余万口，从其构成来看应该包括六郡编户民与河陇氐羌民，但最初应多是普通农民，并无太多军事素养。此后李特等在流民中招募大批军队，并在数年间经历大小数十战。因李氏所领导军队主体只能来自六郡流民，故这一军事集团在不断的战争中得到反复历练，其军事素养应该随之不断提升。另外，流民军也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作为流徙到巴蜀地区的外来人，流民军与巴蜀土著大族豪强、益州地方官均有所不同，既不如益州土著有其地方利益，且能为各方所借重，也不如益州上层官吏可以“进退自如”，反而要在各方压力下随时面临生死存亡，由此导致其更为团结紧密、作战勇敢。军事力量的出色是六郡流民集团能够在与巴蜀地方军政官员的斗争中获取有利局面的保障。

其二是流民集团在一些关键性的政策抉择上判断准确，给了自身发展较好的导向。流民集团在发展建国过程中对巴蜀地域、巴蜀社会的态度，施行的政策，以及自身去向的抉择均不断地发生变化。最初来到巴蜀地区的流民集团仅仅将这里作为一个临时渡过难关的地点，迫于生计而为巴蜀土著佣耕，当河陇局势缓解、政府要求流民回归故里的时候，流民也只是以没有行资为由请求延期到秋收以后，可知其去意比较坚决。同时，李特兄弟也是如此。其聚众对巴蜀民众进行劫掠，以及攻陷成都以后的大规模劫掠等行为直接导致了其与巴蜀民众矛盾尖锐，明显

是在以一种流寇的心态看待巴蜀社会，而不是准备长居于此。此后，当李辅从略阳老家带来中原大乱、无法安居的消息之后，李特马上转而寻求立足巴蜀，一方面将六郡流民完全聚集在自己周围，另一方面也开始改善与巴蜀民众的关系，“约法三章”，为自己奠定好统治基础，明显是从流寇心态转变为统治者的心态来看待巴蜀社会了。此后，又有李流、李雄在关键时刻选择与巴蜀最具影响力的范长生集团合作，李雄对范长生极为推崇以安巴蜀人心等行为。

建国后，李氏也实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措施。一方面，轻徭薄赋、招徕流民，对投附的人口多行复除，在恢复和发展巴蜀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李雄等发展文化教育，也使其能够拉近与巴蜀士族的文化距离。另外，他在对外交往上也利用当时各政权不同的利益需求所在，为自身谋得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其三是李氏家族个体因素。李氏家族拥有各方面优秀能力。首先，李氏家族中的李特兄弟五人均为骁勇善战之人，这是其在乱世能够立足的基本条件，为其在此后的一系列战争中走向强大提供了保障。其次，其家族具有较好的管理能力和谋略。李氏家族人物在早期的河陇发展时期即多出任基层官员，虽然多以自身勇武而出任军事职官，但几代人的基层任官经历必然能够培养家族人物的管理能力，并且使其能够亲近基层民众，获取其拥护，如李庠即有“州党争附之”的情况。此后，这种乡里责任在流民迁徙过程中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李氏家族即因为对六郡流民的济危救困行为而“大收人心”，从而与六郡流民构建了更稳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如李氏家族为流民的迁徙问题不断地向罗尚请求延期，又伪造辛冉悬赏内容以渲染流民与罗尚的矛盾，迫使流民归附自己，使其统治基础日趋稳固。此后的一些策略选择、诸多战役的胜利也充分表现出了李氏家族自身的管理能力以及战争谋略[10]，这些是其长久发展的保障。最后，李氏家族自身的文化素质为其发展提供了帮助。一者，李氏家族人物的汉文化水平较高，这使其能够与巴蜀士族及周边政权对话，而忽略其少数民族属性。二者，李氏家族身上的道教文化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与范长生集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2.成汉国家衰亡原因

（1）自身地域限制与外部环境变化

成汉国家虽然地势险要，并且物产丰富，但终究疆域狭小，在一定条件下守则有余、攻则不足，而当内外条件转化之时即难以再保证国家安全。且成汉虽然名义上统益、梁、宁等州，但实际上控制最为稳定的核心区域仅为益州一地。梁州主要作为抵御东、北方向进攻的前沿要地，军事用途更为明显。宁州所在南中地区则更为特殊，虽然李氏在其地设官置守，但从人员上看主要为南中地区夷帅、大姓，故基本是承认了其在宁州地区的实际控制以换取其臣服而已，与此前蜀汉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成汉所能调动的各种资源其实极为有限。加之蜀地居民在战争中大量外流，虽然成汉君主大力招徕流民，努力恢复经济，但在当时动荡局势中的实际效果也难以尽善尽美。故此，成汉国家很多时候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当外界长期征战之时，各方均无暇顾及，或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之时，各方多需要借助成汉袭扰、打击对方，成汉便能够利用南北局势来为自身谋利，并借以努力发展自己。如最初西晋内乱即无暇顾及巴蜀局势，此后大量流民南迁、东晋在艰难中建国，北方胡羯忙于平定中原，均给了成汉发展的机遇。但当南北格局逐步稳定，东晋在各方面走上正轨之后，便开始寻求攻取上游益州之地。再加上李寿即位后对南中地区大姓夷帅压迫加剧，导致其相继叛离成汉，偏安于益州狭小区域内的成汉便无力抵御外部的征伐了。[11]

（2）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合理

李氏作为一个具有一定“蛮夷”特征的“外来集团”，如何平衡巴蜀区域内各方关系并构建其政权是成汉国家兴亡的关键。学术界多认为李氏与巴蜀土著地主是联合关系。[12]但近年亦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张晓莲认为成汉统治者为了缓和与巴蜀士族的矛盾，以范长生号召蜀人。但李氏政权核心是以李氏为首的六郡大姓，巴蜀士族不可能获得应有的位置。大多数巴蜀士族与这个政权是不合作的。成汉时期巴蜀士族落势，发展受到限制。[13]张炜《试论成汉政权灭亡的内部原因》一文即认为成汉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李雄之后的几任统治者都未能处理好皇权和大族的关系，随李寿起事的一群僚佐占据了其中的重要位置，其中又以李寿的亲戚为主。失去了六郡大族的支持，又得不到巴蜀土著的认可，人心不附，东晋大军一到，这个政权也就迅速瓦解了。[14]杨诗奇认为六郡豪酋与巴蜀大族间的斗争贯穿始终，但总体由对立向合作演变。流民入蜀初期，是侨旧矛盾最为外显、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巴蜀土著在侨旧争斗中无力与流民抗衡，流离于外者甚多。流民在此期间逐渐联合，形成秦雍六郡流民集团。李雄统治成汉时，政权核心被六郡流

民大姓掌握。为稳定局势，李雄对土著采取了“尽力笼络、不予重用”的政策，侨旧关系有所缓和。李雄死后，流民集团经过李班、李期统治时的内部混乱，实力大不如前，土著乘此而起，地位逐渐上升。至李寿联合土著杀李期而僭位，成汉终变为侨旧联合统治的政权。此时期不仅仕于成汉的土著增多，还不乏受李寿信赖的实权人物。侨旧关系虽大体按此趋势演变，斗争与联合却始终交织存在。在侨旧矛盾尤为突出的流民入蜀初期，李特等曾与以赵廞为代表的巴蜀大姓集团合作，但因侨旧矛盾导致合作破裂。李寿统治时期，侨旧合作虽已成为主流，但双方在是否对晋称藩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因此成汉朝中分为主张自立与决意称藩两派，争斗不休。在成汉存续期间，侨旧矛盾并未消弭。流民侵占土著故土，掠夺劳力，剥夺了巴蜀大姓原有的政治权利。流民为稳固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对巴蜀土著多有防备。这些无法调和的矛盾，致使侨旧合作关系极为脆弱，李寿以称藩于晋作为许诺，才得巴蜀大姓相助。至桓温来袭，土著更积极劝降投晋，成汉亦因此灭亡。[15]

张、杨二人对于六郡流民与巴蜀土著之间矛盾关系的说法是较为正确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有可论之处。在此就李氏家族婚姻网络与成汉权力归属、流民集团与蜀人关系、李氏集团自身稳定性等三方面进一步探讨成汉国家权力构成对其灭亡的影响问题。

a.李氏家族婚姻网络与成汉权力归属

对于李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史籍记载不多，从附录二中的梳理情况可以看到，李特、李特子李荡妻均出自罗氏，李雄妻任氏，李荡子李稚妻昝氏，李雄子李期妻阎氏，李骧妻昝氏，李骧子李寿妻阎氏（后娶李凤女），李寿子李势妻李氏，李特妹夫为李含，李寿妹夫为任调，婚姻对象集中在罗、任、昝、阎、李五姓，这五大姓氏的出身是有迹可循的。《华阳国志》中提到有“六郡大姓阎、赵、任、杨、李、上官及氐叟梁、窦、符（苻）、隗、董、费等”[16]，而在《资治通鉴》胡注中又提到“板楯蛮渠帅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17]，则以上几姓全包括在其中，可知其均应出自与李氏同迁到六郡的賨人豪酋或原本居于六郡的大姓。从这可以看到，李氏家族在婚姻网络中实际将蜀地大族排斥在外了。

进一步来说，附录三所列成汉政权出任各种职务诸人——尤其是较为核心职位者以两种情况居多：一是李氏家族人物，此不必赘言；二是前面提到的賨人豪酋诸姓及六郡大姓。[18]故此，成汉政权的实际权力是

严格控制在李氏家族及六郡流民集团手中的，这又使巴蜀大族在政治权力构成中基本被排除在外了。[19]

李氏集团这种在婚姻网络和政治权力分配上较为封闭的状态与其发展经历有关。李氏家族虽然出身于巴西宕渠（今四川达州市渠县东北），但在入蜀之前经历了数次迁徙：第一次为汉末张鲁据汉中（今陕西汉中市东），李氏家族自巴西迁入此地，时间大约在2世纪末；曹操攻取汉中（215）以后，李氏家族又被迁移到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市东北），在此生活近一个世纪；到了西晋末年齐万年起义之时，李氏家族开始第三次迁徙（298），由此进入巴蜀地区，走上建国之路。从这个过程来看，李氏家族在略阳地区生存时间最长——将近一个世纪，因此关陇地区的经历对其影响最大。其各种文化特征的变化可参见本书第六章“成汉社会经济、文化与民族”相关论述，在此不赘。总之，李氏家族在经历关陇地区近百年的发展之后，原本的巴西郡籍贯特征已经淡漠，自身賨人少数民族文化特征也在减弱，与之相伴的是与六郡大姓日趋紧密的联系[20]，这也是李氏婚姻网络与成汉政权集中于此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杨诗奇研究中提到成汉后期六郡豪酋与巴蜀大族之间关系变化，认为李寿举兵政变，巴蜀大姓成为支持李寿的力量，作为回报，李寿自然厚待其人。而成汉宗室内耗导致人才缺失，以及李寿对李雄旧臣的猜忌，也为巴蜀大姓地位上升提供了条件。李寿、李势时期，成汉已转变为侨旧联合执政的政权。[21]但对于李寿时期开始的双方合作，似乎更应该解释如下：虽然李寿时期巴蜀土著开始进入统治核心，但这其实源自李寿将自身的府属官僚系统直接移植于成汉中央。成汉政权在早期六郡人把控中央、地方核心军政大权的同时，府属参佐、下层官吏等则用本地人，一方面借其基层影响力稳定统治，另一方面也是魏晋以来地方官吏任用传统。李寿利用了自身府属系统中的巴蜀人士，以获取叛乱的资本，但此后仍能看到双方理念上的根本分歧。李寿以后的巴蜀土著表面上似乎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李寿等也逐渐看到了巴蜀地主与自己的距离，对其采用了忽视、屠杀等方式加以打击，巴蜀土著并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故二者绝非关系对等的合作统治，不能顺应李寿意图的巴蜀土著终究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位置。

b.流民集团与蜀人关系

李氏集团在事实上排挤了蜀地大族，但作为一个外来流民集团，这

种行为是有极大弊端的，李氏集团这么做必然有其不得已的理由。杨诗奇认为六郡流民集团与巴蜀土著之间的矛盾斗争，原因在于：一是双方存在经济上的矛盾；二是六郡之人与巴蜀大姓性质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双方斗争不歇。李氏为僭逆之臣，六郡大姓附逆作乱，如若归晋，便受制于人甚至性命不保。巴蜀大姓则不然，迫于无奈依附成汉，归晋更有劝降之功。此外，双方在晋之地位亦不同，六郡流民首领虽称大姓，但在晋不为重视，为官多品级低下官吏，巴蜀大姓则为一方之望。[22]而从相关记载来看，流人集团对蜀地、蜀人长期摧残的经历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李氏流民集团进入蜀地，西晋地方官归结了其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少数民族属性，如赵廞长史杜淑、司马张粲曾说李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3]；二是强调其流寇属性，如王敦、辛冉对罗尚说李氏“专为盗贼”[24]。而李氏作为一个外来的、带有一定“少数民族属性”的流民集团，给蜀地、蜀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李氏最初并不安于留在巴蜀是比较清楚的，故在最初多行抄掠、杀戮。如永康元年（300）李特等被赵廞拉拢为爪牙，“（李）特等凭恃廞势，专聚众为盗，蜀人患之”[25]。永宁元年（301）正月，李特等与赵廞决战，“特至成都，纵兵大掠，害西夷护军姜发，杀廞长史袁洽及廞所置守长”[26]等，其流寇属性是比较明显的。这一行为导致了“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27]，其中仅向东流亡到荆州的就有“十余万户”[28]，这样必然导致李氏集团与巴蜀各阶层结怨。周蜀蓉即指出，数十万巴蜀之民向外流徙，是由秦雍六郡流民与巴蜀民众之间的尖锐矛盾引起的。[29]

直到永宁元年（301）九月，“（李）特兄辅素留乡里，托言迎家，既至蜀，谓特曰：‘中国方乱，不足复还。’特以为然，乃有雄据巴蜀之意”[30]。此事才是李氏从“打家劫舍”的流寇转而准备割据一方的转折点。紧接着，十月，李特即“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31]，使“蜀民大悦”。从表面上看，李特集团已经重获蜀人之心，但应是溢美之词居多，其中更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如太安二年（303）正月，李特势力大涨，才有“蜀郡太守徐俭以少城降，特入据之，惟取马以供军，余无侵掠……蜀民相聚为坞者，皆送款于特，特遣使就抚之”[32]，可以看到李特策略的转向是有一个较长过程的。但蜀人此时仍多为观望状态，紧接

着就发生“（宗）岱、（孙）阜军势甚盛，诸坞皆有贰志。……二月，尚遣兵掩袭特营，诸坞皆应之，特兵大败”[33]之事。而在李流准备投降之时，李离、李雄等说服流民之时又提到：“吾属前已残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为鱼肉，惟有同心袭阜以取富贵耳！”[34]以此获得流民的支持。可知流民与蜀人的矛盾是尽人皆知的，并不是简单的、短时期内所能弥合的。直到获得范长生支持，李雄称帝实行惠民政策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好转。[35]当时已经是“三蜀民流迸，南入、东下，野无烟火，卤掠无处，亦寻饥饿。唯涪陵民千余家在江西，依青城山处士范贤自守”[36]的危急形势了。

此后一段时间形势较为稳定，但李寿发动政变，攻克成都以后又纵兵大掠，“数日乃定”，虽然首当其冲者为李期集团的六郡流民大姓，但客观上仍难免波及巴蜀土著，是在不断加深李氏集团与蜀人的矛盾。对此，李寿集团曾有谋求改变的企图，最为明显的就是在自立称帝和尊晋之间的抉择。如龚壮在给李寿的建议中提到：“巴、蜀之民本皆晋臣，节下若能发兵西取成都，称藩于晋，谁不争为节下奋臂前驱者！”[37]甚至在李寿称帝问题上，其核心班底内部发生了分裂。长史罗恒、解思明，部将李奕等主张降号为王，称藩于晋；妹夫任调、司马蔡兴、侍中李艳主张自立称帝。从身份上看，这些人都是李寿汉王时期的核心僚属，但其考虑则有不同的倾向缘由。任调等人的自立主张上承李雄等早已称帝数十年的基业，没有太多问题，罗恒等人的观点则更为可论：从当时形势来看，李氏集团始终受到东晋、后赵等的压力，内部则需要弥合李氏集团与蜀人的长期矛盾，依靠东晋的号召力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38]而且如此前提到杨诗奇所论双方经济矛盾、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彭丰文又指出巴蜀大姓反对成汉是其正统观使然。由于中原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密切，故巴蜀大姓的政治立场更为倾向于奉晋正朔[39]，等等，均与李氏集团无法闭合，也都使这场争论不可能向巴蜀土著所主张的方向发展。此后解思明、罗恒等人又多次提出这一主张，可惜不为李寿采纳，使李氏集团谋求转变的努力化为泡影。

另外，就以李寿集团中的主持归晋的重要核心人物龚壮来说，其人并非李寿汉王府属班底，而是后加入的巴蜀大族成员。龚壮本与李氏集团为世仇，其父亲、叔父均为李氏流民所杀，已立志复仇，但因为害怕被李寿杀害而成为李寿的智囊。可以说倾覆李氏政权是其重要目的之一，故有激发成汉内争、举地归晋的主张。李寿成功后以龚壮为太师，为龚壮拒绝，并对李寿赠遗一无所受，只居师友身份，实际表明了不食

李氏俸禄的心理。而就龚壮也可见到了成汉中后期，虽然巴蜀土著与流民集团间表面上没有直接的冲突，但双方的积怨和分歧难以弥合，在巴蜀土著中如龚壮这种情况的人亦应不少，可以推知双方仇恨之深。

此外，到李奕起兵反对李势的时候，又有“蜀人多从之，众至数万”[40]的情况出现。更为突出的是永和三年（347）成汉灭国以后，“隗文、邓定等立故国师范长生之子贲为帝而奉之，以妖异惑众，蜀人多归之”[41]。此时成汉刚刚灭国，隗文等起兵并未打出李氏旗号，而是选择范长生之子范贲为帝，并获得蜀人拥护，可见范长生父子在蜀人心中的影响力远大于李氏家族，李氏家族数十年的经营并没能弥合六郡流民与蜀人之间的矛盾。而此后虽然有托名李势、李雄子叛乱者，但其时已在汉灭数十年后，是巴蜀土著地主与东晋政府矛盾上升，开始转而追思成汉李氏了，与此又有所不同。

总之，六郡流民与蜀人之间半个世纪的持续冲突，导致了相互间长期仇视与不信任，李氏集团由此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始终无法将蜀地大族很好地融合进自身统治集团之中。[42]

c.李氏集团自身稳定性问题

李氏集团长期存在无法融合蜀地大族的问题，但更为致命的是其内部也存在不稳定因素。首先就是领导权继承原则的不确定。相关李氏流民集团、成汉国家继承制度不确定的讨论可见本书第五章“成汉政治”，在此不赘。

此外李寿“下书言与期、越别族，凡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时旧臣及六郡士人，皆见废黜”[43]，“于是成都诸李子弟，无复秉兵马形势者”[44]。而李寿以自身僚属为核心，大力排斥六郡大姓的行为也给其统治带来危害。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李寿并没能寻找到更为广阔的统治基础，其僚属的忠诚度又颇为可疑——尤其是在李寿违背初衷，没有尊晋而是选择自立称帝以后。如此前力主李寿降号尊晋的李奕，咸康四年（338）七月有“李奕从兄乾，与大臣合谋，欲废寿。寿惧，使子广与大臣盟要，为兄弟”[45]，背后很难说没有李奕的影响。而李乾等人以谋废立的罪行却丝毫没有受到追究，可知李寿为了巩固僚属班底而投鼠忌器的心态。更为奇特的是，李寿让儿子李广和众人盟誓、约为兄弟，则更表明李寿集团缺乏一个政权应有的严格规范化、制度化特征。此外，李寿甚至曾“许自牛鞞（今四川简阳市西北）以东土断与

闳”[46]，要与功臣分土而治，被大臣劝阻。这导致李寿此后又在与东晋的战争中故意不增援李闳，使其覆没，借以解决分土的矛盾，造成了与李闳弟弟李艳等大臣之间的矛盾。以上各事表明李氏集团流寇作战时代的“平等”观念、依靠拟血缘关系维系统治的情况仍然存在，李氏家族与六郡大姓之间的关系缺乏严格的等级化、制度化规范。此后，李寿以各种原因诛杀亲旧僚属，使本就不稳定的统治集团关系更加分裂，是对其内部统治集团的一种自我瓦解。[47]

而严格来说，在制度体系的规范化方面，李氏集团也努力尝试过多次，但最终仍因缺乏实施的内外环境而收效有限。[48]

总之，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长期不稳定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统治核心不断遭到冲击，最终使统治集团四分五裂。

综上，亦如许倬云提到统治核心“如果以为自我凝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保障自己团体成员的利益，以至于关闭门户，以这种方式自求永续，反而是自讨灭亡”[49]，李氏家族在经历长期的关陇生活之后，与六郡大姓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利益集团。与此同时，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争，李氏集团与巴蜀大族成为对立面，相互之间的仇视和不信任使巴蜀大姓基本被排斥在统治核心之外。但李氏家族内部、李氏家族与六郡大姓的利益集团内部并不总是表现为稳定有力的状态。自身继承法则的缺失和谋求改变的失败使各种力量都在觊觎最高统治权，最终导致成汉政权立国根本——李氏家族与六郡大姓的利益共同体——的破碎。当统治者自身走向腐败奢靡的时候，成汉政权也就迅速衰败灭亡了。

（3）统治者的腐化

李氏集团最初以励精图治崛起，当局势走向稳定之时，自身出现了腐败的情况。最早即有李雄卖官问题的出现，但这时国家正处于上升期，李雄闻过则改，没有带来过多的威胁。此后李期又志得意满，将国家刑法、政事交给宠臣，导致国家“纪纲隳紊”，并且对大臣多有诛杀，贪图其财物、妇女，已经显现出末世之象。后来李寿夺权，最初多遵循李雄宽俭之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虽然表面上让臣僚上书进谏朝政得失，但多不听从，对制度也多有改换。在了解后赵石虎所为之后，又多有效仿：

> 会李闳、王嘏从邺还，盛称季龙威强，宫观美丽，邺中殷实。寿又闻季龙虐用刑法，王逊亦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域，寿心欣慕，人有小过，辄

> 杀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又广太学，起宴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其左仆射蔡兴切谏，寿以为诽谤，诛之。右仆射李嶷数以直言忤旨，寿积忿非一，托以他罪，下狱杀之。[50]

这一系列行为既失蜀人之心，也脱离六郡流民，最终导致内外矛盾激化。

此后，李势在即位后即诛杀最具才能的大臣解思明、马当等人，又骄奢淫逸、不理国政，“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旧臣，信任左右，谗谄并进，刑罚苛滥，由是中外离心”。最终，成汉在桓温大军压境之时迅速土崩瓦解了。[51]

二 成汉国家特点与历史影响

成汉国家存在于两晋十六国政权林立的时代，但又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对此，翁家烈总结成汉国家有六个特点。①建立时间最早。②南部唯一的地方政权。③其他政权之间大多相互争战、兼并，而成汉政权除与晋王朝及其州郡官兵长期进行争战，以及应对前秦的进犯外，未主动对其他地方政权发动兼并战争。④成汉政权尽管实行武装割据，但并未断绝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李雄对东晋的言行在当时所有自称帝王之中是绝无仅有的。⑤关注社会稳定。李雄朝稳定平和的社会现象，就当时各地方政权攻杀连年、赋役频添的全国局势而论，十分难能可贵。⑥大规模移民。促进成都人口剧增、工商繁荣、城市建设的巨大发展，使成都日后历代一直居西南各城市的规模和地位之冠。当然大规模移民也造成一定弊端，埋下成汉政权走向衰亡的祸因。此外，移民政策还牵动僚人北移。[52]而日本学者三崎良章认为“李氏中的很多人成为州郡的属官，……李特集团及其发展的过程与当时活动于华北各地的地方豪族以及强势的地方官集团发动的叛乱更为相似”，“直到灭亡之际，这一政权始终没有摆脱作为豪族反叛集团或位于益州的一个流寓政权的性质”。[53]

但翁家烈所论很多并非成汉特有，如其中第三点对外战争问题，实为成汉不得已而为之，是其面对内部不稳定、外部强大国家压力的自保之道。第四点也并非成汉特有，十六国时期称王而又尊晋的也有很多，成汉称帝后几次表达与晋之间的关系，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如与前凉之间是一种外交辞令，当然也有世为晋臣的情感。这在李寿时期也有种种争论，可见更多的是出自自身利益的现实考虑。而第五、六两点也是当时割据政权普遍存在的，各政权只要有条件即发展经济、向都城移民，均为乱世自保之计。

基于此，可以将成汉国家特点再次总结于下。

第一，建国时间最早。

第二，是南部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

第三，发展区域较为封闭，与北方很多政权能够扩张、拓展较大疆域，不断相互吞并不同，其基本局限于益州地区，基本受自身力量、区

域地理环境影响。

第四，对外施加影响的手段较为多样。分别采取了军事行动、外交往来，以及利用动荡局面中各区域流民、少数民族人群来影响周边地区的局势等，这是当时各国中少见的。

第五，国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使用两个国号，这种情况只见于匈奴汉赵政权，是在内政摇摆中支系宗室入掌大统造成的。

第六，带有流寓政权属性。

成汉国家于巴蜀地区发展建国历半个世纪，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下分别对其加以分析。

外部影响。成汉居巴蜀南中之地，虽然偏安一隅，但其地为制衡西部的一个重要区域，即关陇、河西的侧后方，是其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又居荆、扬上游，也是东晋沿江一线安危的关键环节，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从全局来看，成汉国家对两晋政局发挥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成为南北制衡的一个边缘环节。

从两晋十六国各方的利益纠葛来看，北方的石氏后赵对成汉较为重视，主要目的在于促使其在西部牵制东晋。而成汉也因与东晋接壤较多，且最初即从西晋地方官手中夺取的益州控制权，故对其多有不恭，尤其在梁州、荆州、宁州地区与东晋争夺最多。南方的东晋虽然与成汉不断交流往来，但更多的仍是针对成汉的军事行动，这主要是因为成汉居于荆、扬上流，威胁较大，而且自立为帝，对东晋颇不恭敬。此外，北方的前凉与成汉虽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双方外交往来较多。对于前凉来说，主要是借助成汉的地理优势来完成自身与东晋的交通往来，成汉则更多是想获得前凉的政治认可，以强化自身独立建国的自信。仇池政权与成汉的交往原因更为直接，成汉从地理方位来说是仇池政权的地理后方，故此有杨氏在仇池无法立足之时会选择南投成汉情况的出现，但回归仇池之后又对成汉没有更多顾忌，则主要是因为成汉自身能力有限，仇池地区险要，故仇池面对成汉能够守则有余。成汉则想借助仇池杨氏向北扩展疆土。因此，在两晋十六国时期以上各方的利益博弈之中，成汉均发挥了其影响。

此外，成汉政权也在客观上对周边政权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流民集团在巴蜀作战时导致本地百姓外流，其中一方面即东边的荆州地区，流

入人口众多，另有流入南中地区者，导致南中户口增长九倍，这些人在荆州、南中与两晋地方官产生矛盾、发动起义，影响了两晋荆州、南中的政局。其中还包括成汉内部政治斗争失败者，他们逃往周边国家，如往东晋、后赵，也都对该国，以及成汉与该国关系产生了影响。

而从成汉国家内部来说，因其近五十年的割据统治，其对国家所在区域的各个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在区域社会稳定上。李氏流民集团最初怀有流寇心态，行流寇所为，对巴蜀地区大为残害，导致了巴蜀社会的动荡。此后随着发展建国，其政策有所改变，为巴蜀社会的重归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体现出了积极的一面。李雄时有“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54]的说法，虽然可能有所夸张，但也可见大成政权社会环境的良好。但其末年统治阶层腐败，并放纵僚人北上等行为再次导致了巴蜀社会的紊乱。

其次，在区域政区方面。成汉政权在益、宁等州对西晋行政区划做了有针对性地调整，如李雄招徕流民曾侨置汉原、沈黎两郡等，以便于统治。

再次，在区域经济方面。李氏在益州的建国过程导致巴蜀民大量外流，给区域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此后，基于外部各政权尤其是两晋一时无暇顾及巴蜀，以及益州地区自身险阻、富饶的地理优势，李氏开始招徕流民，补充了巴蜀地区的劳动力，降低赋税给了经济复苏的空间，对区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均有所贡献。但同时出现了兼并加剧的情况。而南中地区则因流民的到来而户口激增，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南中的开发。

从次，在区域文化方面。李雄等统治者在巴蜀地区兴学重教，对中原传统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保留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六郡流民在益州反复争战也导致士人外逃、书籍流散，对两汉以来的文化繁荣局面是一个打击。

最后，在区域民族关系方面。如在推动僚人入蜀问题上，僚人入蜀后引发了区域民族矛盾的上升，因此成汉在此一方面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从长期影响来看，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李氏一族在入蜀后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发展，自身已经慢慢融合于汉人之中。随其进入益州

的氐羌少数民族人群也在发展过程中加快融入汉人。其引入僚人等的行为虽然短期内扰乱了巴蜀社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僚人等的民族融合进程。而对南中地区政策的调整，也为缓和地区民族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55]

[1]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75页。

[2]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附李庠》，第3031页。

[3] （东汉）刘珍等：《东观汉记校注》卷21《公孙述载记》，中华书局，2008，第910～911页。

[4]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偏霸部七·蜀李特》。

[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5，第2682页。

[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5，第2677页。

[7]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流载记》，第3030页。

[8] 按：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成汉文化教育”中的相关讨论。

[9]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6页。

[10] 按：参见本书第二、三、四章成汉国家发展史相关内容。

[11] 南中与成汉灭亡关系参见赵晨韵《论南中大姓夷帅对成汉政权的影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年第4期。

[12] 郑欣《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第114～115页）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土著地主加入成汉统治集团，成汉政权逐渐蜕变为流民中的大姓与四川土著地主联合专政的封建割据性质的政权。李绍先《成汉古巴蜀开发历史略论稿》（《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成汉中央政权组成除以李氏为代表的六郡势力外，还有以范长生为代表的益州门阀，这两大集团的合作才是成汉政权核心所在。

[13] 张晓莲：《试论魏晋时期的巴蜀士族》，《川东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14] 张炜：《试论成汉政权灭亡的内部原因》，《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3期。

[15] 杨诗奇：《成汉政权侨旧关系演进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8。

[16] 《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53页。

[1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7，第2139页。

[18] 按：其中有很多未记载籍贯的情况，但多属于前引两书记载各姓，因此出身为賨人豪酋诸姓及六郡大姓的可能性很大。

[19] 按：最为有名的蜀地大族范长生虽然在成汉政权中职位尊崇，但从史籍记载中是看不到其实际施政行为的，可知范长生更多应是一种“象征性”存在，有地位无实权。此后到李寿时期巴蜀士人更多进入汉权力核心，但实际情况较为特殊，详见后论。

[20] 相关研究可参见本书第六章“成汉社会经济、文化与民族”中所论。又如，赵廞拉拢李特流民之时，《晋书》《资治通鉴》记载其根源之一为巴西（治今四川阆中）同郡人——“特之党类皆巴西人，与廞同郡，率多勇壮，廞厚遇之”，强调了籍贯因素。但《华阳国志》中记为“以李特弟庠为六郡人，勇壮，厚恤遇之”，明确指出赵廞利用李氏的原因是能掌控六郡流人、勇武善战，明显更为贴近当时的情况，可见前论。此外，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2007）“徙民与流民”条中亦指出六郡流民实为李氏割据益州的依靠力量（第112页）。其他学者研究亦多持此论，可参看。

[21] 参见杨诗奇《浅论成汉后期的侨旧斗争》《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年第1期；《成汉政权侨旧关系演进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8。

[22] 杨诗奇：《浅论成汉后期的侨旧斗争》，《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年第1期。

[23]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3页。

[24]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5页。

[2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3，第2647页。

[26]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4页。

[2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5，第2682页。

[2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5，第2695页。

[29] 周蜀蓉：《成汉前期巴蜀之民外流及其影响》，《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0]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5页。

[31] （唐）房玄龄：《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7页。

[3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5，第2677页。

[3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5，第2678页。

[3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5，第2679页。

[35] 关于范长生与李氏关系，可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成汉文化教育”中所论，及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刘九生《巴建賨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段玉明《范长生与巴氐据蜀关系再探》，《云南教育学院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1989年第3期；曾维加《賨族与道教及大成国的关系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等等。

[36]《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第465页。

[3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6，第3016～3017页。

[38]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成汉国家认同构建”中相关讨论。此外十六国初期的旗号选择，可参见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和慕容廆的“晋”旗号》，《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39] 彭丰文：《从〈华阳国志〉看两晋巴蜀士人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载《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六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第8～16页。

[4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7，第3072页。

[4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7，第3077页。

[42] 杨伟立《论李特起兵及其所建政权的性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一文也认为巴蜀地主在李氏入蜀后主要持首鼠两端的态度，而蜀中人民并不依附流民军，流入荆湘数万家。

[43]（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寿载记》，第3046页。

[44]《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0页。

[45]《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0～501页。

[46]《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1页。

[47] 按：李寿时期又有颁行“汉兴钱”的举动，房鑫、李怡然等以为：“李寿为了证明自己的即位正统性，确定已登帝位这一既定事实，并且取代废帝李期的影响，从而颁行“汉兴”年号钱的举措就是应此情势而产生的。年号钱颁行成汉全国以后，李寿的影响力随着年号钱的流传而增加。或许在长久之后，李寿可以借汉兴钱的流传将他的篡夺之举被世人淡忘，并确立他在成汉国内的正统地位。”《历史上第一枚年号钱“汉兴钱”的产生考》，《学理论》2015年第6期。

[48] 按：参见本书第五章“成汉政治”相关内容。

[49] 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衰》，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第10页。

[50]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寿载记》，第3045～3046页。

[51] 关于成汉政权兴衰原因，另可参见杨伟立《成汉史略》，重庆出版社，1983，第76～96页；赵俪生《“宗人”与“賨人”》，《历史教学》1954年第4期。

[52] 翁家烈：《成汉政权及其族属》，《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53] 〔日〕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商务印书馆，2019，第63、66页。

[54] （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40页。

[55] 相关研究可参见李绍先《成汉古巴蜀开发历史略论稿》，《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周蜀蓉《成汉前期巴蜀之民外流及其影响》，《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附录

一 成汉大事年表

东汉兴平元年（194）

张鲁据汉中，賨人多流入汉中依附张鲁，被称为“杨车巴”。

建安二十年（215）

曹操击平张鲁，李虎与杜濩等五百余家迁徙略阳。

西晋元康六年至九年（296～299）

氐人齐万年起义，天水等六郡流民入蜀。李氏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流民核心。

永康元年（300）

益州刺史赵廞为割据巴蜀，引李特兄弟为爪牙。

十二月，赵廞杀成都内史耿滕、西夷校尉陈总等，控制巴蜀。李庠等归于赵廞，加部曲督。又以破叛羌功加封威寇将军，假赤幢曲盖、封阳泉亭侯，赐钱百万、马五十匹。

永宁元年（301）

正月，赵廞杀李庠，李氏集团与赵廞决裂。李特等平赵廞之乱，入掠成都；遣使至洛阳陈述赵廞罪状。朝廷以讨赵廞功拜李特为宣威将军、封长乐乡侯，李流为奋威将军、武阳侯。

三月，新任益州刺史罗尚到达成都。西晋下诏秦、雍，使召还流民入蜀者。李辅自略阳入蜀，告诫李特中原不足复还，李特开始有安于巴蜀的想法。

六月，罗尚限流民七月上道。流民请延期，不许。

七月，罗尚移书梓潼在各要路设立关卡，搜罗流民财物。

九月，罗尚遣军于绵竹，防备流民逃逸。辛冉悬赏李特兄弟，李特改其告示。

十月，李特结大营于绵竹东北之赤祖。李特行镇北将军事，承制封拜属官，加李流行镇东将军，号东督护。李特取广汉，以李超为广汉太守。进迫成都。李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流民集团各有封拜，流民统治集团建立。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罗尚因连续败于李特，建郫江防线。

太安元年（302）

五月，西晋三路进攻流民军，为李特所败。李特自称益州牧、大将军、大都督、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

八月，李特攻杀广汉太守张微，以蹇硕守德阳。蹇硕掠地到达巴郡之垫江。

秋，南中大姓毛诜、李叡逐建宁太守徐俊，朱提大姓李猛逐朱提太守雍约，起兵响应李特。

十一月，西晋复置宁州，以李毅为刺史。

太安二年（303），李特建初元年

正月，李特攻破罗尚郫县防线，西晋蜀郡太守降，李特以李瑾为蜀郡太守。李特入据少城，改元建初。李特分六郡流民于各坞堡。荆州援益州水军三万至德阳，罗尚派人勾结诸坞堡攻击李特。

二月，罗尚遣兵掩袭李特，诸村坞堡同时俱发，李特败死。李流、李雄合余众还保赤祖。李流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孙阜攻破德阳，获蹇硕。

三月，罗尚又遣张龟、常深等攻李流，涪城药绅等响应罗尚，氐人苻成、隗伯等叛李流，李流击败各军，但李荡战死。

五月，李流准备向罗尚投降。李雄、李离等反击孙阜取胜。荆州军

退出益州。李雄统军。

七月，李雄占领郫城。流民军饥乏，获得范长生支持。

九月，李流病卒。流民推李雄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郫城。李雄进攻成都，入少城。李骧攻犍为，俘犍为太守，切断罗尚粮道。隗伯被李雄生擒。

闰十二月，李雄击走罗尚，流民军占领成都。流民就食于郪。

永兴元年（304），成都王李雄建兴元年

正月，罗尚逃至江阳。西晋诏罗尚统巴东、巴郡、涪陵以供军赋。

十月，李雄即成都王位于南郊，大赦境内，建元建兴，具置百官，废除西晋旧法，约法七章。

十一月，罗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俘李骧妻、子。

十二月，李雄太尉李离伐汉中，杀都战帅赵汶。

永兴二年（305），建兴二年

八月，李雄遣李骧进攻汉安。

光熙元年（306），建兴三年、大成晏平元年

三月，李雄鼓动宁州夷人叛乱，围攻宁州城。宁州刺史李毅死，宁州将吏推毅女李秀领州事，闭城自守。范长生从青城山来到成都，李雄拜其为丞相、尊为“范贤”，范长生劝李雄称帝。

六月，成都王雄即帝位，国号大成，改元晏平。追尊李特为景皇帝，庙号始祖。尊范长生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西山侯。

十二月，李雄遣别帅李离寇掠梁州。

永嘉元年（307），晏平二年

三月，关中流民邓定、訇氐等掠汉中。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围之，訇氐求救于李雄。

五月，李雄遣李离、李云、李璜、李凤率军入汉中救邓定，大败梁州兵，并迁汉中民于成都。

永嘉二年（308），晏平三年

十二月，成尚书令杨褒卒。平寇将军李凤屯晋寿，屡攻汉中，汉中民东走荆沔。

永嘉三年（309），晏平四年

十月，天水人訇琦等杀成太尉李离、尚书令阎式，以梓潼降罗尚。

十二月，訇琦等将李离母、子送于罗尚，罗尚斩之，并以李离妻女分赐将士。李雄遣李骧、李云、李璜攻梓潼，不克，李云、李璜战死。谯登攻克宕渠，杀成巴西太守马脱，又入据涪城。

永嘉四年（310），晏平五年

二月，成太尉李国镇巴西，部下文硕杀李国，以巴西降罗尚。

四月，成收复梓潼，以张宝为太尉。

七月，罗尚卒于巴郡，西晋以皮素为益州刺史。

十一月，汉太傅李骧攻谯登于涪城。

十二月，皮素至巴郡，为罗尚子罗宇派人刺杀。巴东监军韩松为益州刺史、西夷校尉，治巴东。

是岁，宁州刺史王逊到达宁州。

永嘉五年（311），大成玉衡元年

正月，李骧攻拔涪城、李始攻拔巴西。李雄大赦，改元玉衡。成军攻僰道，击走犍为太守魏纪，杀江阳太守姚袭。

二月，成叛将苻成、隗文叛于宜都，逃往巴东。建平都尉暴重讨之未下。暴重杀韩松，自领三府事。

三月，益州官员共杀暴重，上表巴郡太守张罗行三府事，治枳。张罗自讨隗文，败死。隗文等略吏民西上投降李雄。成将任回获西晋犍为

太守魏纪。三府文武表请平西司马王异行三府事、领巴郡太守。

永嘉六年（312），玉衡二年

八月，西晋阴平都尉董冲逐太守王鉴，以郡降于成。西晋龙骧将军、江阳太守张启与罗琦杀王异，张启行三府事，罗琦为巴郡太守。启病亡，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率吏民南入涪陵。

建兴元年（313），玉衡三年

三月，向沈卒，部属等共推汶山太守兰维为西夷校尉。兰维等想东下巴东，为李雄将李恭、费黑所获。

建兴二年（314），玉衡四年

正月，杨虎率汉中吏民奔成；扶风人邓定率流民数千家入蜀；梁州人张咸等逐杨难敌，以梁州归成。李雄以李凤为征北大将军、梁州刺史，任回为镇南大将军、南夷校尉、宁州刺史，李恭为征东大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武都氐王杨难敌以子为质于大成，天水陈安向李雄称臣，西晋湘州刺史杜弢向大成遣使通好，汉嘉夷王冲归遣子为质于成，朱提雷炤率民归降大成，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逷等向大成投诚示好。李雄兴学校，置史官，减轻赋、调。

建兴三年（315），玉衡五年

正月，李雄立任氏为皇后。

建兴三年（316），玉衡六年

五月，平夷太守雷炤、流民阴贡、平乐太守董霸帅三千余家降于成。

东晋建武元年（317），玉衡七年

正月，李雄遣李恭、罗演攻巴东。

太兴元年（318），玉衡八年

四月，成丞相范长生卒。李雄以其子范贲为丞相。

十二月，成梁州刺史李凤以巴西叛，李骧讨斩之；以李寿为梁州刺史、督巴西郡，总理北方。

太兴二年（319），玉衡九年

成李骧伐越嶲，又分伐朱提。

太兴三年（320），玉衡十年

七月，前赵攻仇池，杨难敌与弟坚头奔汉中，又奔晋寿，降于成。赵兵退走后，杨难敌还武都叛。李雄发兵讨之，不利，李稚、李琀战死。

永昌元年（322），玉衡十二年

五月，李雄将张龙寇巴东，为东晋建平太守柳纯所败。

太宁元年（323），玉衡十三年

正月，成李骧、任回攻台登，东晋将军司马玖战死。李骧率军讨伐越嶲，分兵讨朱提。越嶲太守、西夷校尉李钊、汉嘉太守王载降于李骧。李雄以李钊决断朝廷礼仪。

五月，李骧等攻宁州，东晋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姚岳御之，战于堂狼，大破李骧。越嶲斯臾反，围攻大成任回及太守李谦，李雄遣征南将军费黑救之。

太宁二年（324），玉衡十四年

正月，李雄立兄子李班为太子。

十二月，东晋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逷以兴古郡降于成。

太宁三年（325），玉衡十五年

十二月，东晋宁州刺史尹奉到任，重金募徼外夷人刺杀爨量，招降益州太守李逷。

咸和元年（326），玉衡十六年

六月，成破越嶲斯叟。

九月，成将张龙攻涪陵，执太守谢俊。

咸和二年（327），玉衡十七年

正月，宁州秀才庞遗起兵攻成将任回、李谦等，李雄遣罗恒、费黑救之。东晋宁州刺史尹奉遣裨将姚岳、朱提太守杨术援遗，战于台登，东晋兵败，杨术战死。李谦移越嶲郡民于蜀。

咸和三年（328），玉衡十八年

十月，成将张龙攻涪陵，俘太守赵弼。

冬，成太傅、汉王李骧卒，子李寿以丧自晋寿还。拜李玝为征北将军、梁州刺史，代寿，修晋寿军屯。

咸和五年（330），玉衡二十年

十月，成拜李寿为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中护军、西夷校尉、侍中、录尚书事，封扶风公。李寿率征南将军费黑、征东将军任邵攻巴东，至建平。

咸和六年（331），玉衡二十一年

春，成大将李寿还成都。任邵屯巴东。李雄以子李越为车骑将军，屯广汉。

七月，李寿伐阴平、武都，迫降杨难敌。

冬，李雄修筑涪城。

咸和七年（332），玉衡二十二年

秋，李寿南征宁州。

十月，李寿、费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守。东晋宁州刺史尹奉遣建宁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董炳。

咸和八年（333），玉衡二十三年

正月，成兵围朱提百日，东晋太守霍彪、董炳出降。

三月，东晋宁州刺史尹奉举州投降李寿，李寿送尹奉于蜀。李雄以李寿为宁州刺史。

秋，建宁民毛衍、罗屯等反，杀成太守邵攀。牂柯太守谢恕举郡投降东晋，李寿破之。李雄遣李班讨平宁州夷人，以班为抚军将军。

咸和九年（334），玉衡二十四年

三月，成分宁州置交州，以霍彪为宁州刺史，爨深为交州刺史。封李寿为建宁王。张骏遣使遗李雄书，劝雄去尊号称藩于晋。此后，成、凉使聘相继。

六月，李雄病卒，年61岁，谥号武皇帝，庙号太宗。李寿还成都，受遗诏辅政。太子班即位，以建宁王寿录尚书事。

十月，葬李雄于成都安都陵。李雄子车骑将军李越杀李班，上李班谥号戾太子。李班之弟李玝与其将焦哙、罗凯等投降东晋。李期即皇帝位，改元玉恒。以李越为相国、大将军、建宁王，与李寿并录尚书事。进李寿大都督、中护军，改封汉王。

咸康元年（335），李期玉恒元年

正月，李期以尹奉为右丞相，王瓌为司徒。

秋，李班以景骞为尚书令，费黑为司隶校尉，罗演为仆射。

九月，李班之舅罗演与汉王（李寿）相上官澹谋杀李期，立李班子李幽。事觉，李期杀演、澹及班母等。

咸康二年（336），玉恒二年

十月，李期诬成尚书仆射、武陵公李载谋反，杀之。东晋广州刺史邓岳派遣督护王随击夜郎、新昌太守陶协击兴古，自成国夺取两地。

十一月，东晋遣建威将军司马勋屯兵汉中，为成李寿所败，李寿遂置汉中守宰，戍南郑而还。

咸康四年（338），汉李寿汉兴元年

四月，李寿自涪率精骑一万赴成都，废李期自立，改国号汉，建元

汉兴。以董皎为相国，罗恒为尚书令，解思明为广汉太守，任调为镇北将军、东羌校尉、梁州刺史，李奕为镇西将军、西夷校尉，李权为宁州刺史。卿佐皆用旧僚佐，成都诸李子弟无复秉兵马形势者，李雄时旧臣及六郡人皆被斥废。废李期为邛都县公。

五月，李期自杀，李寿上李期谥号幽公，以王礼安葬。追改戾太子李班为哀皇帝。

七月，广汉太守李乾与大臣合谋废李寿，寿使子李广与诸大臣结盟，约为兄弟。以李乾为汉嘉太守，李闳为征东将军、荆州刺史，移镇巴郡。

八月，蜀地暴风雨镇坏宫殿端门，禾苗损伤导致百姓饥疫，李寿命大臣上奏得失，龚壮建议归晋。

九月，汉仆射任颜谋反被诛。李寿尽诛李雄诸子。

咸康五年（**339**），汉兴二年

二月，东晋伐巴东，俘获汉镇将李闳。

三月，李寿拜李奕为镇东将军。

夏，东晋广州刺史邓岳将兵攻宁州，汉建宁太守孟彦缚刺史霍彪以郡降晋。李寿右将军李位都率兵讨伐。

秋，汉以李摅为御史，入南中安抚人心。

九月，李寿病，罗恒、解思明劝说李寿降号尊晋，李演也自越嶲上书劝李寿降号称王。李寿怒杀李演。

十二月，汉李奕击巴东，东晋守将劳杨败死。

咸康六年（**340**），汉兴三年

三月，汉将李位都入宁州攻拔丹川，东晋守将战死。

九月，先，后赵石虎遗李寿书，欲与联兵攻东晋，中分江南。是月，汉以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集士卒七万余人，大阅兵于成都，为群臣劝止。

十月，李寿宴礼于太学，举明经者为好学侯。

是岁，李闳自后赵返成都。

咸康七年（341），汉兴四年

十二月，李寿以太子李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自李闳从邺还，盛称邺中繁富，宫殿壮丽，且言赵王石虎以刑杀御下。李寿慕之，徙傍郡民三丁以上家庭充实成都，大修宫室、扩大太学，扩充尚方府。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皆坐直谏死。

建元元年（343），汉兴六年

李寿分宁州六郡为汉州。

四月，李寿病重，见李期等为祟。

八月，李寿卒。谥号昭文，庙号中宗，葬于成都安昌陵。李势即位。

建元二年（344），李势太和元年

正月，李势改元太和，尊母阎氏为皇太后，妻李氏为皇后。

四月，太史令韩皓上奏“荧惑守心”天象，李势命祭祀李特、李雄宗庙，并改为汉祀。

八月，李势弟李广见势无子，求立为皇太弟，马当、解思明劝之，李势怀疑双方有阴谋，收马当、解思明杀之，并迫使李广自杀。

九月，东晋巴东太守杨谦击走汉将申阳。

永和元年（345），太和二年

十二月，汉将爨頠投奔东晋。

永和二年（346），太和三年、嘉宁元年

十月，汉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蜀人多从，众数万，攻成都，李奕战死。李势改元嘉宁。

十一月，东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率师伐汉。

永和三年（347），嘉宁二年

二月，桓温兵到青衣，李势发大兵迎战。

三月，桓温兵到彭模，留老弱看守辎重，率步兵直驱成都。李势作战不利，逃往晋寿。

三月十七日，李势送降文于桓温。汉亡。李势被送往建康，封为归义侯。故汉国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军隗文等叛，为桓温击破。

四月，邓定、隗文入据成都。

七月，邓定、隗文立范长生子范贲为帝，以道术招徕蜀人。

永和五年（349）

四月，范贲为东晋益州刺史周抚等击斩。蜀地平。

升平五年（361）

李势卒于建康。

二 李氏家族世系、婚姻表

<table>
<tr><th>第一代</th><th>第二代</th><th>第三代</th><th>第四代</th><th>第五代</th><th>第六代</th></tr>
<tr><td rowspan="11">李虎</td><td rowspan="11">李慕</td><td>李辅</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10">李特
？～303
罗氏</td><td>李始</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6">李荡
？～303
罗氏</td><td>李琀？～318</td><td>李礶</td></tr>
<tr><td>李都？～334</td><td></td></tr>
<tr><td>李稚？～318
昝氏</td><td>有子335年
为李期所杀</td></tr>
<tr><td rowspan="2">李班
297～334[1]</td><td>李幽</td></tr>
<tr><td>李颙</td></tr>
<tr><td>李玝？～347</td><td>334降晋</td></tr>
<tr><td rowspan="3">李雄
274～334
任氏
冉氏</td><td>李越</td><td></td></tr>
<tr><td>李霸？～336</td><td></td></tr>
<tr><td>李期
314～338
阎氏</td><td></td></tr>
</table>

1 关于李班生年，任乃强注本《华阳国志》已有较详细考证，参见该书第498页注释①。

李氏家族世系、婚姻表-续表

<table>
<tr><th>第一代</th><th>第二代</th><th>第三代</th><th>第四代</th><th>第五代</th><th>第六代</th></tr>
<tr><td rowspan="17">李虎</td><td rowspan="17">李慕</td><td rowspan="2">李特
？～303
罗氏</td><td rowspan="2">李雄
274～334
任氏
冉氏</td><td>李保？～336</td><td></td></tr>
<tr><td>李豹？～338</td><td></td></tr>
<tr><td>？</td><td>？</td><td>？</td><td>李载
（？～336
李期从子）</td></tr>
<tr><td>李特妹
婿李含</td><td></td><td></td><td></td></tr>
<tr><td>李庠
247～301</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3">李流
248～303</td><td>李龙</td><td></td><td></td></tr>
<tr><td>李世</td><td></td><td></td></tr>
<tr><td>李置</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6">李骧
？～328
昝氏</td><td rowspan="4">李寿㈠
300～343
阎氏
李凤女</td><td>李势㈡
李氏</td><td></td></tr>
<tr><td>李广</td><td></td></tr>
<tr><td>李福</td><td></td></tr>
<tr><td>李势妹</td><td></td></tr>
<tr><td>李寿妹
婿任调</td><td></td><td></td></tr>
<tr><td>李攸（养子）
？～338</td><td></td><td></td></tr>
<tr><td></td><td>李云
（李雄从弟）</td><td></td><td></td></tr>
<tr><td></td><td>李璜
（李雄从弟）</td><td></td><td></td></tr>
<tr><td></td><td></td><td>李权
（势从兄）</td><td></td></tr>
</table>

三 成汉人物、出身、职官表

李特时期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王角 李基	牙门 牙门	六郡流人 六郡流人	击败赵廞后两人被遣往洛阳，此时李特所部均为六郡流人，故两人也应为六郡籍贯
李流 248~303	镇东将军、东都护	李特弟	
李辅 ？~303	骠骑将军	李特兄	
李骧	骁骑将军	李特弟	
李始	武威将军	李特子	
李荡 ？~303	镇军将军	李特子	
李超	广汉太守		
李雄	前将军	李特子	
李含	六郡人部曲督；西夷校尉	李特妹婿	
上官惇	将帅（爪牙、参佐）、司马	天水人	
李武		六郡豪酋、故晋陈仓令	陈仓属扶风，故李武应出身六郡
任臧	将帅（爪牙、参佐）；德阳太守	天水人	晋上邽令

成汉人物、出身、职官表 李特时期-续表1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阎式	僚佐（宾从）	天水人、故晋始昌令	始昌属天水郡
李远 ？~303	僚佐（参佐）	阴平人	故晋阴平令
杨褒	将帅（爪牙、参佐）、将兵都尉	天水人	
杨发	参佐	天水人	
李攀 ？~302	将帅、谏议大夫	扶风人	
王辛	李特司马		
骞（蹇）硕	德阳太守（一说守德阳）		
李璜	蜀郡太守		
李国	将帅	李含子	
李离	将帅	李含子	
任回	将帅	天水人	
李恭	将帅	李攀弟	
上官晶	将帅	天水人	
费他（佗）	将帅	始平人	
杨珪	爪牙（参佐）	天水人	

成汉人物、出身、职官表 李特时期-续表2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王达	爪牙（参佐）	天水人	
麹歆	爪牙（参佐）	天水人	
李博	僚属（参佐）	武都人	
夕斌	僚属（参佐）	略阳人	
严柽	僚属		
上官琦	僚属		
李涛	僚属		
王怀	僚属		
何世（巨）	腹心（宾从）	六郡豪酋	何世为李特同移入蜀者，具体籍贯不详
赵肃	腹心（宾从）	六郡豪酋	赵肃为李特同移入蜀者，具体籍贯不详

李流时期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李含	太守		
李离	梓潼太守	李含子	
徐轝	安西将军	故晋平西将军、涪陵人	

李雄时期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李溥	犍为太守、益州刺史		
李骧 ?~328	太傅	李雄叔	
李始	太保	李雄兄	
李离 ?~309	折冲将军；太尉	李含子	
李云 ?~309	建威将军；司徒	李国从弟、李雄从弟	
李璜 ?~309	翊军将军；司空	李国从弟、李雄从弟	
李国 ?~310	材官将军；太宰	李含子	
阎式 ?~309	尚书令	天水人	
杨褒 ?~308	仆射；丞相	天水人	
杨发	侍中	天水人	
杨珪	尚书	天水人	
徐轝	镇南将军	故晋平西将军、涪陵人	
王达	军师；司徒	天水人	
范长生 约 218~318	丞相；天地太师、西山侯	涪陵丹兴人	
李寿	前将军、梁州刺史；征东将军；扶风公；都督中外诸军事、大都督、大将军、中护军、西夷校尉、录尚书事、侍中、宁州刺史、建宁王	李骧子	

成汉人物、出身、职官表 李雄时期-续表1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李凤 ?~318	平寇将军；征北将军、梁州刺史		
张宝	雄将；太尉		
任回	镇南将军、南夷校尉、宁州刺史	天水人	
李恭	征南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李攀弟	
李稚 ?~318	安北将军	李荡子	
李琀 ?~318	侍中、中领军	李荡子	
赵肃	司空	六郡豪酋	
上官惇	司空	天水人	
乐次	将军		
费他	将军	始平人	
李乾	将军		
费黑	征南将军；李寿司马		
范贲	侍中；丞相	范长生子	
李谦	越嶲太守		
李玝	征北将军、梁州刺史	李荡子	
李班	平南将军、抚军将军	李荡子	
任邵 （石巳）	征东将军		
李越	车骑将军	李雄子	
邵（卬）攀	建宁太守		

成汉人物、出身、职官表 李雄时期-续表2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谢恕	牂柯太守		
马脱 ?~309	巴西太守		
霍彪	宁州刺史	故晋建宁太守	
爨深	交州刺史	宁州夷帅	
严柽	蜀郡太守、益州刺史		
李壮	平乐太守	朱提人	
李播	南广太守	朱提人	
张龙	将	不详	
罗恒	将	略阳人	
任小	巴郡太守	李雄姨弟	

李班时期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李寿	录尚书事	李骧子	
何点	司徒		
王瓌	尚书令		
文夔	师友（宾友）	天水人	
董融	师友（宾友）	陇西人	
王嘏	宾友		名士
李越	车骑将军	李雄子	
李期	建威将军；安东将军	李雄子	
李都	领军将军	李班兄（一作弟）	

成汉人物、出身、职官表 李班时期-续表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韩豹（约）	太史令		
尹奉	卫将军	故晋宁州刺史	
景骞	司隶		
费黑	征南将军		
焦哙	李玝将	不详	
罗凯	李玝将	不详	

李期时期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李越 ?~338	相国、大将军、建宁王、录尚书事	李期兄	
李寿	大都督、梁州刺史、东羌校尉、中护军、录尚书事、汉王	李骧子	
李霸 ?~336	中领军、镇南大将军	李期兄	
李保 ?~336	镇西大将军、西夷校尉、汶山太守	李期弟	
李始	征东大将军	李期从父	
尹奉	右丞相、骠骑将军	故晋宁州刺史	
王瓌	司徒		
景骞 ?~338	尚书令、河南公		
费黑	司隶		

成汉人物、出身、职官表 李期时期-续表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罗演 ?~335	仆射	李班舅	
上官澹 ?~335	汉王相	天水人	
姚华 ?~338	尚书		
田褒 ?~338	尚书		
许涪 ?~338	中常侍		
李载 ?~336	尚书仆射、武陵公	李期从子	
谯秀	汉王宾客	巴西人	
罗恒	汉王长史	略阳人	
解思明	汉王长史	巴西人	
李攸 ?~338	安北将军	李寿养弟	
李奕	寿将		
李势	翊军校尉	李寿子	
李遐 ?~338	征西将军		
李西 ?~338	将军		
蔡兴	汉王司马		
李艳	汉王侍中	李闳弟	

李寿时期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董皎	相国		
罗恒 ?~345	尚书令、股肱	略阳人	
解思明 ?~345	广汉太守、谋主	巴西人	
任调	镇北将军、梁州刺史、东羌校尉、爪牙	李寿妹夫	
李奕	西夷校尉、镇西将军、爪牙；镇东大将军		
李权	宁州刺史、镇南将军、南夷校尉	李寿从子	
马当	股肱；尚书令、六军都督		
李闳	征东将军、荆州刺史、爪牙	李龚子	
李乾	广汉太守、汉嘉太守	李奕从兄	
任颜 ?~338	仆射	任太后弟	
霍彪	宁州刺史	故晋建宁太守	
孟彦	建宁太守	宁州大姓	
李位都	右将军		
李摅	尚书；御史	广汉人	祖李毅，晋故宁州刺史
杜袭	舍人		一说龚壮
王韬	车骑将军；参军		
王嘏	散骑常侍		名士
王广	中常侍		
李势	大将军、录尚书事	李寿子	
蔡兴 ?~341	左仆射		
李嶷 ?~341	右仆射		

李势时期

人物	职官	出身	备注
韩皓	太史令		
李广 ?~345	大将军、汉王	李势弟	
李奕 ?~346	太保		
董皎	相国、太师		
李福	右卫将军	李势弟（叔）	
李权	镇南将军	李势从兄	
昝坚	前将军		
李位都	镇军（东）将军		
王幼	散骑常侍		
谯献之	司空	巴西人	
王嘏	侍中、中书监		名士
常璩	散骑常侍	蜀成都人	
冯孚	侍中		
王誓	尚书仆射		
邓定	镇东将军	扶风人	
王润	平南将军		
隗文	将军	氐族	
申阳	将	不详	
乐高	将	不详	
爨頠	将	宁州大姓	

主要参考文献

古籍文献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魏书》

《宋书》

《东观汉记》

《华阳国志》

《世说新语》

《资治通鉴》

《水经注》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十六国疆域志》

《路史》

《太平御览》

《通典》

《伪成将相大臣年表》

今人专著

杨伟立：《成汉史略》，重庆出版社，1983。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民族出版社，2005。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

马长寿：《氏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2007。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杨铭：《氏族史》，商务印书馆，2014。

林富士：《巫者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胡阿祥：《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日〕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商

务印书馆，2019。

期刊、报纸、论文集

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氏据蜀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章冠英：《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变动中的廪君蛮》，《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简修炜：《试论西晋末年李特、李流领导的流民暴动的性质》，《史学月刊》1964年第12期。

漆泽邦：《试论李特起义和成汉政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童超：《论李特兄弟领导的武装斗争及成汉政权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

杨伟立：《賨人建国史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80年第3期。

杨伟立：《论李特起兵及其所建政权的性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

王毅、罗伟先：《成汉墓考古记》，《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

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靳润成：《十六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5

期。

邓代昆：《成汉“玉衡九年行中阎月十日始”砖铭考释》，《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林集友：《成都外南成汉墓主试探》，《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

林集友：《成都外南成汉墓主再探》，《四川文物》1997年第1期。

段玉明：《范长生与巴氐据蜀关系再探》，《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张泽洪：《“巴氐”辨疑》，《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

刘世旭、刘弘：《西昌市西郊乡发现成汉墓》，《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

沧洲：《十六国时成国的梁州先治于晋寿，后移于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

杨德华：《论两晋时期宁州的设置及变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吴怡：《成汉墓小考》，《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

吴怡：《“玉衡二十四年亲诏书立”与成汉墓主人》，《文物考古研究》，成都出版社，1993。

刘弘：《成汉俑新说》，《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肖迎：《成汉统治期间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

王尧：《賨王封号考》，《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

陈德福、周尔太：《成都文物古迹大量被毁急待抢救》，《中国文物报》1995年2月19日，第2版。

张雄：《魏晋十六国以来巴人的迁徙与汉化趋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张晓莲：《试论魏晋时期的巴蜀士族》，《川东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李绍先：《成汉古巴蜀开发历史略论稿》，《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曾咏霞：《成都小南街遗址出土的直书汉兴钱》，《中国钱币》2002年第2期。

姚乐野、段玉明：《论李氏据蜀与南中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周蜀蓉：《成汉前期巴蜀之民外流及其影响》，《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8期。

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缪钺全集》第一卷（上）《冰茧庵读史存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程刚：《巴氐人的起源与成汉政权的建立》，《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

翁家烈：《成汉政权及其族属》，《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刘扬：《浅析成汉的汉化》，《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群》，《考古》2007年第10期。

金仁义：《桓温伐成汉考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曾维加：《賨族与道教及大成国的关系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陈侃理：《赵李据蜀与天师道在曹魏西晋时期的发展》，《北大史学》2008年第13期。

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9。

郑欣：《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张炜：《试论成汉政权灭亡的内部原因》，《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3期。

邹绍荣、李小树：《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史学的发展》，《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卢升弟：《成汉吹箫陶俑：1700年前的天外来客？》，《中国文化报》2011年1月19日，第6版。

袁克林：《我国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初探》，《收藏界》2011年第11期。

王万隽：《秦汉魏晋安南北朝时期的蛮族研究综述》，《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

彭丰文：《从〈华阳国志〉看两晋巴蜀士人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

江玉祥：《賨人与賨国——宕渠历史文化散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王安泰：《皇帝的天下与单于的天下——十六国时期天下体系的构筑》，《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中西书局，2014。

房鑫、李怡然：《历史上第一枚年号钱“汉兴钱”的产生考》，《学理论》2015年第6期。

陈辉：《民间信仰的新发展：论汉晋鬼道》，《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刘永兴：《氐族汉化窥探——以成汉为中心》，《亚太教育》2016年第26期。

王晴晴：《论成汉政权及其民族关系》，《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周伟洲：《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美〕祁泰履：《传统中国的民族身份与道教身份认同》，《正一道教研究》2016年第五辑。

索德浩：《成汉俑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载《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杨诗奇：《浅论成汉后期的侨旧斗争》，《安徽史学》（下半月）2017年第1期。

李磊：《〈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中的“晋朝认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

赵晨韵：《论南中大姓夷帅对成汉政权的影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年第4期。

学位论文

杨诗奇：《成汉政权侨旧关系演进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8。

任艺：《成汉国史初探》，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8。

索引

A

哀皇帝 113，121

哀牢 181

安昌陵 113，133

安都陵 109，112

安汉 041，089，176

安亭 099

安州 173，179，181，182，183，224

盎底 065

B

巴 002，004，005，008，009，010，011，012，013，014，015，016，017，018，019，020，021，022，023，024，025，026，027，028，030，031，032，034，037，038，039，040，041，042，044，045，047，048，049，050，052，053，056，059，061，063，064，073，074，075，081，082，083，084，085，089，090，091，092，093，094，097，099，101，104，105，106，107，115，118，119，125，128，129，131，136，137，142，161，164，173，175，176，177，178，184，185，187，188，191，192，194，195，196，197，198，200，201，202，205，206，208，210，213，214，215，216，218，220，222，225，226，228，230，231，232，233，235，237，238，240，241，242，243，244，246，247，248，249，250，251，

252，253，254，255，256，259，264，266，267，268

巴氏 010，011，012，013，014，015，021，022，025，032，073，074，210，218，228，252

巴东 020，031，048，081，091，092，093，097，099，104，105，129，136，177，178

巴东监军 048，091

巴东郡 177，178

巴东太守 031，104，136

巴郡 016，017，020，021，025，028，030，031，063，081，083，084，090，091，093，101，115，125，128，129，161，177，184，232

巴郡桓公 083

巴郡南郡蛮 017，021，025

巴郡太守 031，093

巴蛮 017，073

巴人 009，010，011，012，013，014，015，022，025，194，210，218

巴蜀 002，004，005，011，017，024，026，030，032，037，038，039，040，041，042，044，047，048，049，050，052，053，056，059，064，074，075，081，082，085，089，094，106，107，137，142，164，185，187，188，191，192，195，196，197，198，202，206，208，210，213，214，215，218，220，222，225，226，228，230，231，232，233，235，237，238，240，241，242，243，244，246，247，248，249，250，251，253，254，255，256，259，264，266，267，268

巴蜀地区 002，004，032，037，038，040，041，042，050，053，056，074，082，137，164，191，196，197，198，206，

208，213，214，215，225，228，231，233，237，244，247，264，266，267

巴西郡 060，061，097，173，175，176，247

巴西郡丞 061

巴西太守 031，081，085，089，090

巴夷 023

巴渝帅 215

巴渝舞 019，027，028，215，216

巴徵郡 176

巴中 020，026，027，031

巴族 020，021，022，023，024，025

白虎复夷 019，025

白洛 086

白马 222

白水 098，141，175

白水桥 098

板楯蛮 017，018，019，020，021，022，023，024，025，026，028，032，221，245

褒中 176

暴重 091，092，093

卑水 174

北地 033，036，208，229

北地太守 036

北井 178

北军中候 157

贲古 182，202

比苏 180

毕节 097，182

裨将 103

鷩 182

别驾 044，053

宾川 133

宾客 152

兵曹从事 066

帛羊颓 072

博南 181

僰道县 173

僰人 021

薄昭 158

不更 020，221

不韦 181

部曲督 046，056，145

C

蔡松 085

蔡兴 121，133，149，152，253，261

参军 045，060，072，085，089，100，140，162，234

蚕陵 174

曹操 030，031，032，246

曹据 133

曹休 157，160

曹真 156

岑彭 159，160

长安 019，031，069，086

长乐乡侯 052，145

长沙太守 091

常伯 150

常俊 049，163

常美 049

常迁 180

常璩 009，012，014，140，150，151，188，202，214

常深 068，069

陈安 094

陈仓令 056，195

陈群 161

陈图 072

陈恂 043

陈总 043，044，235

丞相 086，087，095，097，116，127，144，147，148，153，157，165

成昌 180

成帝 149，157

成都 012，040，042，043，044，045，049，050，052，054，057，058，063，065，067，069，072，075，079，080，083，084，085，086，092，098，099，104，106，109，111，112，113，114，118，119，120，121，122，125，130，131，133，137，139，140，142，155，164，167，173，189，190，196，203，205，206，208，213，221，235，238，250，251，253，257，260，262，268

成都景王 083

成都令 045，050

成都内史 040，042，043，235

成都王 075，083，121，122，155，167，173，189

成都尹 173

成固 176

成县 037，098

城固 085

赤水 065

赤幢曲盖 046

赤祖 068，075

崇州 043，174

楚 013，022，024，025，054，083，100，127，140，169，180，184，250

川北 029，208

川东北 029

川西北 207，208

从事 053，066，100，184

賨 002，003，005，008，009，010，012，015，016，018，019，020，021，022，023，024，025，026，027，028，029，030，031，032，073，074，075，079，113，114，126，155，167，172，179，194，195，197，201，205，206，207，209，215，216，217，221，235，245，246，247，252，261

賨赋 015，016，019，020

賨国 016，023，027，216

賨侯 023

賨民 008，012，019，020，022，023，025

賨钱 019，023，026

賨人 002，003，010，015，016，018，020，022，023，024，026，028，029，030，031，032，073，074，075，079，113，155，167，194，195，197，205，206，207，209，215，216，217，221，235，245，246，247，261

賨王 029

賨邑侯 023，114

爨量 095，099，103，222，223

爨深 105，108，181，223

爨頠 136

崔鸿 009，021，026，027

D

大长秋 040

大都督 044，058，061，068，076，116，145，146，155，156

大将军 044，057，058，061，064，068，076，087，094，104，108，116，132，136，141，145，146，153，156，158，159，161，165

大理 133，180

代茂 043

丹川 130

当阳侯 160

宕渠 008，009，010，011，016，023，027，028，030，031，034，090，173，175，176，194，205，216，246

宕渠郡 173，176

道教 003，030，074，075，082，086，171，172，209，210，240，252

德阳郡 173，176

德阳太守 063，066，068

德阳县 176

邓艾 160

邓定 085，094，142，160，220，221，255

邓岳 117，129

氐羌 029，037，038，207，217，220，237，268

氐人 011，013，014，015，025，036，046，068，092，095，207，208，217，219，220，221

氐王 094

氐族 011，012，013，015，025，155，169，208，218

滇 029，179，201，221，222

滇池 179

滇西北 029

甸氐 177

垫江 063，070，177

定笮 174

东督护 057，146

东平王 158

东羌 032，033，034，046，115，125，162，195，210，211

东羌督 034，195，211

东羌猎将 032，034，195，210

东羌校尉 032，033，034，115，125，162，211

董霸 097

董炳 105，106

董冲 093

董皎 122，124，135，136，147，148

董猛 151

董融 110，151，212

都安 060，109，133，174

都督荆州诸军事 081

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 061，146

都督梁州四郡诸军事 139

都督中外诸军事 104，155，156

都江堰 060

都唐 182

都战帅 081，084

窦融 056，058

督护 049，056，057，060，068，117，146，219，231

督将 048，145，146，163

督邮 034，195，211

杜阿 068

杜濩 023，031，032

杜景文 057

杜君卿 020

杜孟治 081，085

杜淑 044，046，047，049，250

杜弢 053，094

杜袭 129，152

杜佑 024，145，147，152，158，159，160，161

杜元凯 160

段煨 160

F

繁 005，059，060，067，068，088，095，101，106，117，138，171，172，173，262，268

繁城 060，068，106

范贲 097，142，148，150，221，255

范长生 072，073，074，075，081，082，086，087，097，106，142，147，148，152，164，171，172，185，198，209，210，221，234，235，238，240，242，246，252，255

范目 019

范贤 086，253

范阳王 160

范因 215

费黑 093，099，103，104，105，106，116，159，162，172

费立 045

费恕 048

费他 046，058，098，162，217

费远 045，049，057，163

奋威将军 052

风后 150

冯孚 140，150

冯该 052

冯异 159

冯翊 036

冯翊都尉 036

冯翊太守 036

奉节 091，178

扶风 037，046，094，104

扶风公 104

苻成 046，068，069，092，093，095，217，219，220

涪 044，045，062，068，072，073，081，090，091，092，093，094，097，103，104，105，112，115，117，118，119，120，135，136，142，150，175，177，178，200，219，234，253

涪城 068，090，091，092，097，112，115，118，120，136，142，175

涪陵 045，068，072，073，081，093，094，103，104，135，177，178，219，234，253

涪陵郡 177，178

涪陵太守 093

涪县 105

抚军将军 108，161

傅颖 100，184

富民 099

腹心 058

G

甘青地区 207

甘肃 032，037，098，177，194，246

刚氏 177

高贵公 156

高祖 018，019，026，027，059，169，215

耿马 133，181

耿滕 040，042，043，044，235

公孙述 127，232

功曹 043

龚护 140

龚恢 080

龚壮 118，119，121，122，125，128，129，132，186，187，253，254，255

姑复 181

谷昌 179

谷远 229

股肱 122

关东 019

关陇 022，030，031，032，034，036，037，075，079，208，212，217，247，259，264

关中 012，030，031，046，049，059，085，229

冠军将军 092

毌丘奥 104

广都 050，173

广汉 045，051，053，057，060，061，062，065，083，093，105，124，125，173，175，176，196

广汉郡 176

广汉太守 045，051，053，057，060，061，124，125，196

广汉壮文公 083

广柔 174

广谈 182

广魏 014

广阳 174

广元 039，049，060，088，094，137，162，175

广州刺史 117，129

归义侯 141

贵州 097，106，181，182，262

郭夏 216

H

韩豹 112，151，209，214

韩皓 135，151，214

韩松 092，093

汉安 033，084，085，177

汉昌 176

汉德 060，175

汉丰 178

汉复 177

汉高帝 019

汉固郡 176

汉光武 159

汉葭 177

汉嘉 094，099，125，173，174，222

汉嘉郡 173，174

汉嘉太守 099，125

汉嘉夷 094，222

汉平 177

汉王 019，104，116，117，122，124，134，152，190，253，254

汉王妃 124

汉文帝 158

汉武帝 129，149，156，158

汉献帝 149，159

汉献王 104

汉兴 003，018，028，030，113，114，122，125，128，130，

132，133，164，173，177，178，179，182，183，190，204，205，258

汉兴钱 204，205，258

汉阳 014，033，180

汉原郡 173，174

汉赵 088，264

汉中郡 085，122，176，190

汉中郡丞 085

汉中太守 081

汉州 133，173，179，182，183，224

好学侯 132，154，213

郝度元 036，229

郝散 036，229

合川 063

合水 090，139

何冲 068，069，219

何点 110，111，147，212

何攀 034，211

何世 058

河间王 060，061，069，231

河陇 194，195，236，237，239

河南 050，120，152

河南公 120，152

河西 058，088，208，229，264

河西地区 208

河阳 133，178，179，180，181，183

河阳郡 180，181

訇氏 085

訇琦 089，090，091

弘农 032

侯馥 151

后赵 088，130，131，132，145，185，187，188，236，254，260，265，266

胡奋 161

湖北 017，088，092，104，142

护东羌校尉 162

护军 034，050，053，056，081，085，104，116，157，195，211，250

护军都尉 157

护军将军 157

护西夷校尉 050

怀帝 089，157

桓温 107，137，138，139，140，141，142，171，244，261

皇后 097，102，115，116，124，135

皇太弟 136

皇太后 087，124，135

黄帝 150

黄訇 068

黄龛 093

黄龙溪 065

黄权 031

黄忠 031

会无 174

惠帝 036，040，047，066，075，086，148，150，151

霍彪 105，106，108，129，178，223，224

霍固 047

霍去病 158

J

葭萌 060，061，094，111

嘉陵江 022，024，216

贾南风 040

假节 050，069，131，156

监军 049，092，104

犍为 043，045，047，049，060，061，080，090，092，093，137，139，140，173，225

犍为郡 173

犍为太守 045，047，049，061，080，092，093，173

简阳 128，257

建安 023，030，031，041，149，156，157，180

建都 178，179

建都郡 179

建康 113，121，141，142

建伶 179

建宁郡 085，179，201，224

建宁太守 064，105，129，223，224

建宁王 108，111，116，118，120，152

建平 066，091，092，099，104，105，176，177，178

建平都尉 091，092

建平郡 177，178

建平太守 066，099

建始 178

建威将军 037，083，117，161

剑阁 038，039，060，232

剑门关 039

剑门镇 039

谏议大夫 056

江陵 142

江南 088，135，139

江苏 086，121，122，190

江西 072，079，234，253

江夏 088，137

江夏相 137

江阳 043，081，092，093，111，116，133，177

江阳太守 092，093

江原 045，173，174

江原令 045

江源县 043

江州 177

姜发 050，250

将兵都尉 056

交州 108，125，177，178，179，181，223，224

交州刺史 108，223，224

焦哙 114

解思明 119，121，122，124，128，129，132，136，152，176，186，253，254，261

解系 036

金城 033

晋穆帝 184

晋宁郡 179，201

晋寿 088，097，098，104，137，141，162，175，199

晋文帝 156

靳强 028

泾阳 037

经云 179

荆沔 088

荆湘 022，256

荆州 039，066，070，071，072，081，088，093，094，103，107，125，128，137，142，161，177，179，181，231，233，234，250，251，265，266

荆州刺史 066，094，103，125，128，137，161，231

荆子 081

景丹 158

景皇帝 086

景骞 116，117，118，119，120，148，152，172

句方 086

句町 182，221

军祭酒 045

军谋祭酒 215

军师 069，083，155

军咨祭酒 049

筠连 097，180

骞硕 176

K

昆明 084，162，179，221，222

昆泽 179

L

来如 182

兰维 093

阆中 017，019，028，061，089，175，215，247

老河口 088

乐次 098，162

乐高 136

乐陵 051

乐山 044，139

雷炤 095，097

冷丘 179

李霸 116，117，156，159

李班 102，103，108，109，110，111，112，113，114，116，117，121，147，148，151，156，158，159，160，161，167，168，199，209，212，223，243

李保 116，117，159，162，174

李豹 128

李苾 038，039，047，049，053，054，056，057，163，235，236

李播 180

李博 058

李荡 058，060，061，062，066，068，069，078，083，098，102，146，167，168，211，212，219，245

李都 112，156

李凤 085，088，092，094，095，097，134，154，159，161，175，245

李福 139，140，141，157，171

李辅 033，052，058，067，068，083，146，238

李恭 058，063，068，093，094，095，097，151，159，161，177

李管 215

李广 125，136，152，156，257

李国 083，086，090，147

李含 045，056，058，069，070，146，167，245

李琀 098，116，150，156

李黑 031，032

李恒 133

李闳 122，125，128，130，131，132，159，177，258，260

李胡 069

李虎 031，032，083，195，210

李璜 066，083，085，089，147

李恢 061

李基 050，146

李瑾 065，066，173

李离 068，069，070，071，083，084，085，086，089，090，147，167，175，252

李流 033，034，038，045，048，051，052，053，055，057，060，061，063，065，066，067，068，069，070，071，072，073，076，078，083，086，106，145，146，164，166，167，189，195，211，219，233，234，238，252

李猛 064，106

李慕 032，033，045，068，083，195，210

李攀 046，056，058，063，068

李溥 061，080，083，173

李期 102，109，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4，133，134，147，148，149，150，152，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6，168，212，213，226，243，245，253，258，260

李谦 099，103

李乾 098，125，162，174，176，257

李秋 130

李权 125，139，140，141，159，160，161，171，178，224

李冉 084

李叡 064

李始 058，083，092，115，116，121，146，147，159

李氏 002，003，004，007，008，010，011，012，013，014，015，016，020，028，030，032，033，034，035，036，037，

039，041，045，047，048，050，052，055，064，065，067，069，072，073，074，075，076，078，079，081，082，083，086，091，094，106，107，110，121，124，134，135，141，142，144，145，146，166，167，168，170，171，172，185，187，188，191，192，194，195，196，198，205，208，209，210，212，213，217，218，219，220，223，226，228，229，230，231，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2，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8，259，260，262，266，267，268

李世 069

李势 075，109，113，120，124，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7，148，149，150，151，156，157，159，160，161，162，170，171，210，245，247，255，256，261

李寿 078，084，091，097，098，104，105，106，107，108，109，111，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4，125，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48，149，150，151，152，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4，166，168，170，171，175，176，178，183，186，190，203，204，205，209，212，213，224，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3，254，255，256，257，258，260，261，263

李叔平 057

李摅 129，149，151

李涛 058

李特 008，009，010，012，013，014，015，020，021，022，024，033，034，038，039，040，041，045，046，047，048，049，050，051，052，053，054，055，056，057，058，059，060，061，062，063，064，065，066，067，068，069，073，075，078，082，083，086，089，090，094，095，098，101，102，105，106，109，110，112，118，119，120，124，125，

127，128，130，135，136，137，139，142，145，146，163，164，166，169，170，173，176，183，189，191，195，196，210，211，212，213，217，218，223，225，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4，245，247，248，250，251，252，256，257，262

李遏 095，099，103

李位都 129，130，140，160，161

李武 056，195

李玝 098，104，111，112，115，159，175，177，199

李西 120，162

李遐 120，159

李骧 033，051，058，060，063，068，069，073，076，079，080，083，084，089，091，092，095，096，097，099，102，103，104，124，134，135，145，146，147，168，190，212，217，219，245

李庠 033，034，038，042，043，045，046，047，048，049，068，083，145，163，166，167，195，211，218，230，236，239

李雄 005，009，010，021，024，058，060，064，066，068，069，070，071，072，073，074，075，076，078，079，080，081，082，083，084，085，086，087，088，089，090，091，092，093，094，095，096，097，098，0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4，115，117，118，121，122，124，128，132，135，146，147，148，149，150，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4，165，166，167，168，169，171，173，178，184，185，187，189，190，196，198，199，205，206，209，210，211，212，213，214，219，220，221，222，238，242，243，245，247，252，253，256，260，262，266，267

李秀 084

李玄序 045

李艳 121，128，150，253，258

李嶷 133，149，261

李奕 120，121，122，125，128，129，130，136，137，147，159，162，253，255，257

李毅 060，064，084，085，106，129，165，222

李颙 112

李攸 120，160

李幽 112，116

李远 038，056，058，067，195

李越 105，111，112，114，116，118，119，120，124，148，152，156，158，166

李云 083，085，086，089，147

李载 117，148，152，213

李钊 092，099，110，165，166，212

李稚 097，098，116，160，245

李置 086

立石 060

戾太子 114，116，121

连然 179

良将 034，195，211

凉州刺史 094

梁双 080

梁水郡 182，202

梁水太守 095，099，103，223

梁水县 202

梁统 056

梁王 037

梁武王 083

梁州 050，060，061，063，081，084，085，086，088，093，094，097，104，107，111，115，116，125，134，139，155，162，164，173，175，190，199，230，240，265

梁州刺史 050，061，063，081，086，088，093，094，097，104，111，115，125，162，199，230

辽西 088

僚人 023，137，221，225，226，262，267，268

僚属 044，058，137，155，253，257，258

临江 177，179

临利 180，202

临利县 202

临邛 045，136，173，174

临邛侯 136

临邛令 045

临渭 008，246

廪君 009，010，016，017，018，020，021，022，023，024，

025，026，027，028

廪君蛮 010，016，017，018，020，021，022，025，026，028

零陵太守 103，223

领军将军 112，156，157

刘备 031，113，122，190

刘表 160

刘并 056

刘禅 038，232

刘璠 088

刘弘 081，089，203，206，207，208

刘化 079

刘靖 159，160

刘齐 130

刘沈 069

刘焉 030

刘曜 013，094

刘璋 030

流江县 027

流民 002，003，004，012，032，035，036，037，038，039，040，041，042，043，045，046，047，048，051，052，053，054，055，056，057，058，064，065，067，070，071，072，073，074，076，078，079，081，082，085，089，094，095，097，106，114，125，127，129，134，145，146，154，163，

164，166，169，170，172，185，187，189，191，195，196，198，207，208，217，218，219，220，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1，242，243，244，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61，264，266，267，268

柳纯 099

六军都督 131，155

六陌 037

龙骧将军 093

陇西 033，051，083，110，212

陇西襄王 083

陇右 014，032，229

梼栋 180

漏江 179

卢播 037

卢水胡 036

芦山 094

泸州 043，081，177

陆晔 158

录尚书事 104，111，116，132，148

律高 182

略阳 008，009，010，011，012，014，032，033，037，041，052，053，075，089，141，194，210，212，218，238，246，247

略阳护军 053

罗安 043

罗恒 103，119，121，122，124，128，129，148，152，186，253，254

罗凯 114

罗琦 093

罗尚 050，051，052，053，054，055，056，057，058，059，060，063，064，065，066，067，068，069，072，079，080，081，084，085，089，090，091，092，145，164，191，195，219，220，230，231，234，235，236，239，250，251

罗氏 068，069，078，079，083，087，096，116，205，209，219，245

罗屯 089，108，223

罗演 098，116，148

罗羕 089，090

罗寅 097

罗宇 091

罗准 062

雒 176

M

麻应 179

马当 052，122，131，136，148，155，261

马端临 024

马兰羌 036

马腾 159

马脱 089，090，175

马休 053

蛮巴 104，176

毛诜 064，106

毛衍 108，223

毛植 061

牦牛 174

牦牛县 174

茂县 047，162，174

眉山 043，080，089，139，140，173

蒙绍 060

孟观 037

孟彦 129，130，179，224

弥勒 133

靡莫 222

秘书令 149

绵阳 060，062，080，089，090，136，175

绵竹 048，049，051，054，055，057，068，075，163，164，176

绵竹令 057

沔阳 176

冕宁 099，104

愍怀太子 151

名山 094，174

明帝 129，156，157，158，159，160

牟融 148

谋主 058，122

母单 179

木落 105

牧麻 179

慕容鲜卑 188

N

内江 084

南安 014，044，099，173

南充 041，089，090，125，161，175，176

南充国 175

南广郡 180，202

南广县 202

南京 121

南郡 017，021，025，028，057，139，180，201，202

南郡太守 028，139

南里 181

南零 182

南蛮 016，017，020，021，026，094，161，187

南蛮校尉 094，161，187

南浦 178

南秦 180

南夷校尉 060，064，084，094，161，222，231

南郑 031，086，117，176

南中 064，106，107，108，129，133，188，201，202，220，221，222，223，224，226，240，241，264，266，267，268

宁州 064，072，084，085，092，094，097，099，103，105，106，107，108，125，129，130，133，161，162，173，177，178，179，181，182，183，190，221，222，223，224，231，233，240，250，265

宁州刺史 064，084，092，094，097，099，103，105，106，108，125，129，223，224

牛鞞 173，257

O

欧阳建 036

P

盘瓠 015

盘江 182

庞遗 103，104

彭模 139，140，142

彭山 043，080，089，139，140，173

彭州 060

皮素 091

毗桥 063，068

郫 060，065，072，075，076，079，080，128，173，219

郫城 072，076，079，080，219

郫水 060，065，079，080

平康 174

平乐 097，178，179，180

平乐郡 178，180

平乐太守 097

平无 089

平武 177

平西参军 072，089

平西将 050，054，091

平西司马 093

平夷 097，177，178，179，181，182

平夷郡 177，179，182

平夷太守 097

平州 176

仆射 083，116，117，128，133，142，148，149，220，261

蒲池 176

濮 221

朴胡 023，031，032

朴泰 079，080

Q

郪 080，176

郪县 080

齐烈王 083

齐万年 036，037，038，052，229，230，246

岐苍 057

骑督 034，051，145，195，211

前将军 058，060，066，075，139，146，160

黔中郡 009，010，015，016，027，028

羌人 033，162，220

羌族 033，047，162，174

谯登 012，089，090，091，092

谯王 139

谯献之 142，147

谯周 075，089

且兰 182

秦惠王 020

秦文王 083

秦臧 179

秦昭王 025，026

秦昭襄王 018

沁源 229

青城山 072，082，086，234，253

青海 029

青蛉 180

青衣 139

邛都 112，121，174，222

邛都县公 121

酋长 031，032，055，195

曲靖 064，130，178

麹歆 058

朐忍廖仲 018

朐䏰 178

渠江 216

渠帅 023，245

R

冄駹 222

冉氏 114

任道 062

任调 120，121，122，124，159，162，175，245，253

任回 038，045，058，063，093，094，096，099，103，105，159，161，178，217，224

任明 066

任锐 066

任叡 066，067

任卲 104，105，159

任氏 097，102，112，114，115，120，168，245

任小 093

任颜 128，148

任臧 056，058，066，068，176，195

荣卲 149

S

三巴 031

三缝县 174

三辅 032，033

三沮 180

三司 156，158，159

三台 080

散骑 130，140，141，150，202

散骑常侍 130，140，141，150，202

沙渠 178

沙头津 140

山西 036，229

山阳 139

陕西 030，031，036，037，038，075，107，176，246，252

上党 036

上官澹 116，152

上官惇 046，058，066，096，147，217

上官晶 046，058

上官琦 058

上邽令 056，195

上郡 033

上庸 051，131，175，176

上庸都尉 051

上庸郡 176

尚方 133，203，260

尚书 040，083，087，088，089，104，111，116，117，120，124，129，131，132，142，148，149，152，160，165，216，220

尚书令 083，087，088，089，111，116，117，120，124，131，148，152，160，165

尚书仆射 117，142，148，149，220

舍人 129，152

射洪 057，105

射虎秦精 018

申阳 136

沈黎 173，174，267

沈黎郡 173，174

升麻县 201

升迁 174

胜休 182

师友 110，122，151，255

十里陌 140

什邡 176，203，205，208

石定 068

石虎 130，131，132，260

石鉴 160

石勒 101，104，176，184

石亭 049，163

使持节 058，146，156

始昌令 056，195

始平 037，046

始祖 017，021，086，124，135

世子 124，134

侍御史 038，236

侍中 069，083，097，098，104，120，121，135，140，150，253

蜀 002，004，005，008，009，011，012，014，017，018，019，024，025，026，030，031，032，035，036，037，038，039，040，041，042，043，044，045，046，047，048，049，050，051，052，053，056，057，059，065，066，067，068，070，072，073，074，075，081，082，083，084，085，086，087，089，094，103，106，107，109，114，119，125，126，127，137，138，140，141，142，156，162，164，166，167，169，171，173，174，176，184，185，186，187，188，191，192，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6，207，208，209，210，212，213，214，215，218，220，222，224，225，226，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9，261，264，266，267，268

蜀郡 025，044，049，051，053，065，066，173，174，213，251

蜀郡太守 049，051，053，065，066，173，251

双柏 179，201

双流 050，065，139

顺阳内史 088

司空 083，087，089，096，127，142，147，153，165

司隶部 172，173，178，182

司隶校尉 116，172

司马 021，033，037，040，042，045，046，058，060，061，062，066，069，070，087，093，099，105，117，119，121，138，139，152，153，154，156，157，162，165，196，222，230，231，233，245，250，251，252，253，255

司马玖 099

司马伦 040，230

司马肜 037

司马无忌 139

司马勋 117

司马颙 060，061，069，231

司马遹 230

司徒 083，087，089，102，110，111，116，127，147，153，165

斯叟 099，103，224

四川 003，008，024，028，029，039，041，043，044，047，048，049，050，057，060，061，062，063，065，067，068，072，079，080，081，084，085，088，089，090，094，097，099，104，105，112，113，114，125，128，129，136，137，139，140，142，161，162，173，174，175，176，177，180，194，203，205，207，208，218，219，242，246，247，257

四时八节天地太师 087，147

宋昌 158

宋岱 066

宋识 216

叟 012，055，063，064，099，103，218，221，224，245

苏峻 231

遂安 179

遂久 180

遂宁 057，105，142，176

孙登 110，212

孙皋 066，068，069，070，071

孙权 109，156

孙盛 140

台登 099，104

台凳 174

太保 083，087，092，136，137，147，153，165

太傅 083，087，089，091，147，148，153，154，165

太官令 095

太师 087，122，136，147，186，255

太史令 112，135，151，209，214

太尉 083，084，087，089，090，091，097，102，104，147，148，153，165

太宰 083，090，147

太子 102，103，108，110，114，116，121，124，132，151，152，212，230

太子宾友 151

T

镡封 182

泰昌 178

谈稾 179

谈指 182

堂狼 099，180

陶侃 103

陶谦 160

陶协 117

田褒 117，119，120，149

田衮 120

田佐 056

廷尉 151，169

同濑 179

桐师 221

秃发树机能 229

沱江 080

中文

四劃

天水 014，032，037，045，052，089，091，094，110，194，212，246

W

宛温 182

万宁 177

万寿 181，182

王波 130，131

王粲 215

王冲 094，222

王达 058，083，102，147，155

王敦 051，231，235，250

王嘏 110，130，132，135，140，149，150，151，212，260

王广 130，150

王瓌 111，116，147，148

王怀 058

王鉴 093

王角 050，145

王利 043，121

王润 142，160，220

王誓 142，149，220

王随 117

王太后 083，086

王韬 158，162

王辛 062

王逊 085，092，097，099，132，170，260

王异 093

王幼 141，150

王载 099

威寇将军 046，145

隗伯 046，068，069，080，217，219，220，221

隗文 092，093，095，142，162，219，220，221，255

卫将军 116，139，140，157，158

味 178，179

魏纪 092，093

魏明帝 129，159，160

魏收 010，021，027

魏王 149

魏文帝 150，156

魏武帝 010，149，156，160

文夔 110，151，212

文石 012，090

文硕 090，092

文县 037，098，177

汶山 045，047，072，093，116，162，173，174，234

汶山郡 174

汶山太守 045，047，072，093，116，174，234

瓮安 097，181

巫 008，017，030，079，096，104，167，178，205，206，207，209

巫诞 017

巫山 104，178

毋敛 182

吴汉 140

五城 176

五斗米道 030，074，206

五官 061

五溪蛮 015

坞堡 065，066，067，072，085，233，234

武都 037，079，094，098，105，201

武街 098

武陵公 117，152

武陵蛮 015

武落钟离山 016，021

武王 019，083

武威将军 058，146

武阳 044，052，145，173

武阳侯 052，145

武阳令 044

武肇 085

务相 016，027

X

巂 099，221，222，224

夕斌 058

西昌 099，105，129，174，203，206，208，218

西充国 175

西河 033，178，179，180

西河郡 180

西平 178，179，181，182

西平郡 182

西羌 033

西戎校尉 091

西山侯 087，152

西随 182

西乡 176

西阳太守 133

西夷护军 050，250

西夷司马 045

西夷校尉 040，043，044，050，058，093，099，104，116，125，146，162，235

郗鉴 160

巂唐 181

席薳 069

袭尼 045

徙 012，014，019，022，032，033，037，038，053，057，073，086，088，133，144，174，187，194，209，210，222，237，239，246，248，251，260，263

徙阳 174

下辩 098

夏侯骏 037

夏侯渊 031

夏匡 060

鲜卑 088，188

相 002，003，004，005，009，011，012，014，016，017，021，027，028，029，031，038，042，052，053，054，055，060，061，065，069，073，075，079，080，082，086，087，095，097，104，107，113，116，117，120，121，122，126，127，135，136，137，140，144，146，147，148，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63，165，166，167，168，169，178，181，184，188，190，191，194，198，199，203，204，206，207，209，211，217，222，223，224，226，230，233，234，235，240，241，244，247，249，251，252，254，256，258，259，262，264，267，268

相国 104，116，120，122，135，136，147，148

湘州刺史 094

襄阳 115，161

襄珍 061

祥云 180

向奋 089，091

向沈 093

小会 099

孝廉 034，195，211

邪龙 181

谢俊 103，104

谢恕 108，130，181，223

辛冉 051，053，054，055，056，057，196，217，235，236，239，250

新安 179

新昌太守 117

新定 122，180，190

新都 063，067，176

新繁 067

新乐 177

新兴 180

信陵 178

兴古 099，117，133，178，179，181，182，183

兴古郡 099，182

兴乐 174

兴宁 178，179，180

兴宁郡 180

兴平 030，037

兴迁 180

兴山 178

匈奴 033，036，084，088，183，188，190，229，264

修云 179

秀才 053，103

秀异 034，195，211

徐俭 051，065，251

徐俊 064

徐舋 072，073，083，159，234

许涪 117，119，120，150

许雄 061，063，069，081，230

许弇 045，048，049

许允 159，160

宣定 085

宣汉 176

宣化亭 043

宣威将军 052，145

荀勖 216

Y

牙门 045，048，050，051，056，060，068，080，085，145，146

牙门将 045，048，051，080，145，146

衙博 060，061，231

严柽 058，172

严道 174

盐官 202

盐津 180

盐阳 016，017，028

阎兰 091

阎式 038，052，053，054，055，056，057，058，083，087，089，148，152，153，165，195

砚山 182

扬烈将军 040，051，089

羊祜 157

阳沔 060

阳泉亭侯 046，145

杨褒 056，058，082，083，088，095，147，148，154

杨邠 045

杨车 010，011，012，030，031，032

杨发 058，083，150

杨虎 094

杨坚头 098

杨骏 161

杨难敌 094，098，105

杨谦 104，136，142

杨术 103，104

杨显 091

姚安 180

姚华 117，119，120，149

姚袭 092

姚岳 099，103

药何 018

药绅 068，069，219

叶榆 221

邺城 031，104，132

夜郎 117，178，179，181，182，183，221，222

夜郎郡 179，182

楪榆 180，222

夷人 018，084，092，103，105，108，221，222，223，226

夷水 016，017，022，024

夷王 023，094，222

宜昌 092，104

宜都 092，104，115

宜都太守 115

宜福 089

义阳蛮 071，231

挹娄 131

益州 030，031，039，040，042，043，044，045，047，050，051，052，053，059，061，066，067，068，069，071，072，074，076，083，091，092，093，095，099，103，107，121，133，138，139，142，145，146，172，173，187，189，190，191，192，219，221，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40，241，242，248，263，264，265，267，268

益州刺史 039，040，042，043，050，051，052，083，091，092，093，133，139，142，172，221，230

益州牧 030，044，047，061，068，076，121，145，146，173，189

益州太守 095，099，103

翊军将军 083，134

翊军校尉 120，157，158

阴贡 097

阴平 037，048，056，093，098，105，175，177，195

阴平都尉 093

阴平郡 093，098，177

阴平令 048，056，195

阴平太守 098

尹奉 103，105，106，116，148，158，223

应璩 129

营山 176

雍乡 181

雍约 064，106

雍州 036，038

雍州刺史 036

永昌 133，157，178，179，181，183，202

永昌郡 181，202

永丰 179

永宁 046，163，180，250，251

永寿 181

右长史 045

右丞相 116，147，148

右将军 129，160

右仆射 133，149，261

右卫将军 139，140，157

渝水 017，019，022，024，215

鱼涪津 044

鱼复 178，200

俞元 179，201

庾翼 188

御史 038，129，151，156，236

御使 052

鸳鸯碕 139

袁洽 050，250

袁乔 137，138，139，140，142

袁约 031，032

越嶲郡 173，174，178，182

云龙 180

云南 064，074，084，092，099，108，130，133，162，178，179，180，181，182，183，202，252

云南郡 180，202

云平 180

Z

藏王 029

藏族 029，047，162，174

长史 045，046，049，115，119，121，152，157，250，253

昝坚 139，140，141，160，171

昝氏 084，116，124，245

牂柯 097，106，108，130，178，179，181，182，183，223

笮桥 140

曾元 056，057

张宝 090，091，147，162

张才 118

张粲 044，046，047，049，250

张昌 052，071，231

张淳 100，184

张存 063

张飞 031，208

张光 088，093

张龟 045，060，068

张郃 031

张衡 048

张华 037

张金苟 089

张骏 094，100，101，184

张辽 159

张烈 121

张龙 099，103，104

张鲁 030，031，032，041，160，209，246

张罗 013，080，089，090，093，219

张启 093

张收 162

张顺 091

张损 036

张微 045，049，060，061，062，063，064

张咸 094

张兴 063

张演 054，060

张燕 081，085

张殷 081，086

昭通 064，092，133，180

赵弼 104

赵模 043，044

赵攀 091

赵肃 038，058，096，147

赵王 040，130，230

赵汶 081，084

赵憙 148

赵廞 039，040，041，042，043，044，045，046，047，048，049，050，051，052，053，054，065，145，163，191，196，217，218，230，232，235，236，244，247，248，250

振山 202

执金吾 149

枳 177

治中从事 053，100，184

中宗 133

钟会 160

种玉 215

重庆 003，024，063，091，094，104，177，178，206，215，261

周楚 140

周处 037，229

周抚 133，139，142，221

周灵王 110

纣 019

朱提郡 180，201

朱提太守 064，103，105

朱提县 201

朱竺 050

主簿 034，043，044，195，211

爪牙 041，058，122，250

资中 173

秭归 178

梓潼 051，054，060，068，069，081，089，090，091，092，097，104，106，131，137，173，175，176，225

梓潼郡 175

梓潼太守 051，054，060，068，069，092

宗岱 066，068，069，070，231

祖约 231

筰都 222

左汜 068

左仆射 133，149，261

左卫将军 157

后记

本书的写作最初源起于作者获得2016年四川省人文社科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汉建国中的文化、群体、国家认同构建研究”（QYYJC1609）立项。初期形成了《成汉权力构成及其灭亡原因新论》一文，并参加了2016年在西南民族大学举办的“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九次学术年会”讨论，获得与会专家学者的指点，并有幸收入《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发展——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九次学术年会论文选集》（民族出版社，2018）。在此基础上，又获得2016年西华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研究团队项目（CXTD2016-7）、2017年西华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资助专项（17D020）的支持，开始了《成汉国史》的写作。因学校教学、事务性工作等原因，写作断断续续持续到了2018年中才完成书的主体，但又面临出版的难题。幸运的是，此时我的博士导师周伟洲老师正在筹划十六国史新编的编辑出版工作，听到我们完成此书，即将我们的《成汉国史》列入其中。2019年初，本书定稿之后，又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后期项目（QYYJH1901）资助。定稿以后，我的研究生陆倩同学帮忙校对了全书文字和引文。总之，这本小书的出版得到了众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言不尽意，在此只能一并笼统致以谢意。

因本人能力不足，且巴蜀历史并非所长，故此书实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勉力为之，实望抛砖引玉，能为后来良史进一步升华研究铺路。

作者

2019年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汉国史/高然，范双双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

（十六国史新编）

ISBN 978-7-5201-6275-3

I.①成… II.①高…②范… III.①四川-地方史 IV.①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8628号

·十六国史新编·

成汉国史

著者/高然 范双双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高振华

文稿编辑/程彩彩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1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1.5 插页：0.25 字数：164千字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275-3

定价/7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十六国史新编

【汉赵国史】周伟洲 著

【五凉史】赵向群 著

【前秦史】蒋福亚 著

【后秦史】尹波涛 著

【南凉与西秦】周伟洲 著

【成汉国史】高然 范双双 著

【后赵史】李圳 著

【五燕史】赵红梅 著

【赫连夏国史】吴洪琳 著

装帧设计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Telephone 010-59367109

本书将巴蜀成汉政权放入两晋十六国时代背景下，对流民与政府关系，社会、民族、文化的发展，外来群体与巴蜀地方豪强的斗争，巴蜀地区新旧『移民』的矛盾，巫觋文化，天师道信仰等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突破史学研究的单一视角，借助考古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成汉政权的历史进行多视角的解读。

成汉国史





出版社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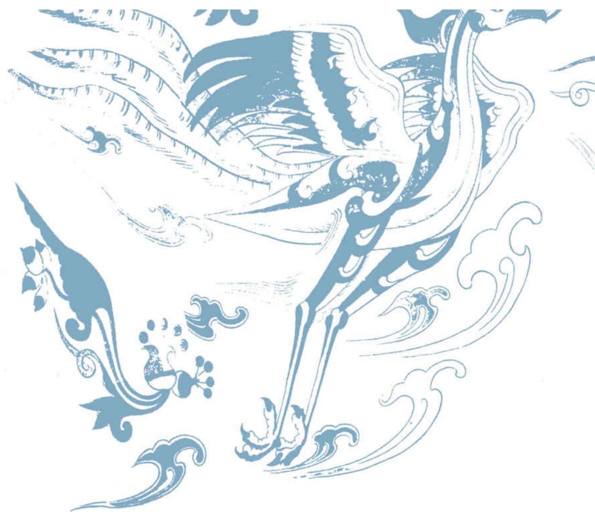
www.ssap.com.cn



世间之盐品牌微信


ISBN 978-7-5201-6275-3
9 787520 162753 >

定价：78.00元





十六国史新编

丛书主编／周伟洲

五凉史

赵向群 著
贾小军 修订

河西走廊 玉门关 丝绸之路 酒泉 高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SAP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赵向群

1942~2014，山西平遥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五凉史》《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参编《甘肃古代史》《河西开发史研究》《西北开发史研究》等。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史、魏晋南北朝史、五凉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贾小军

1979年生，甘肃秦安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河西史地、美术考古、丝绸之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五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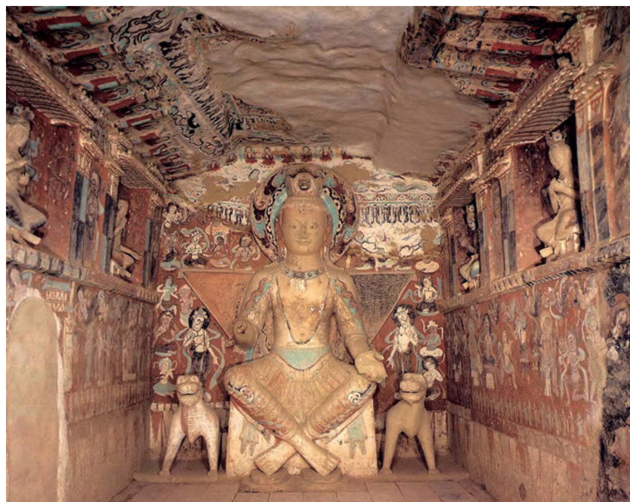
赵向群 著
贾小军 修订



十六国史新编

丛书主编／周伟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凉佛像 敦煌二七五窟内景



出行图 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壁画



舞乐 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



扬场 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



西王母 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



武威罗什寺塔 始建于北凉时期



十六国“凉造新泉”铜钱



北凉神玺二年仓曹贷粮文书 吐鲁番出土

总序

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316～439）[1]，虽然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就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如在唐代魏徵等撰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列遗存的“霸史”共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中，就有二十六部十六国国别史。其中，最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可惜以上诸书均先后散佚，只是在唐宋时期编纂的各种类书及其他史书中，有上述霸史的一些辑文。[2]

由于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五胡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隋唐以后的历代史家，认为十六国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十六国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中国历史，对十六国也着墨不多。加之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及隋以前有关十六国的史书，均先后散佚，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极为困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创了中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更加深入，十六国史论著也不断问世。加之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古籍，重新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十六国的国别史。

我们这套“十六国史新编”丛书，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或正在撰写的一批十六国国别史中，选出其中学术水平较高、大致符合国别史体例的著作编辑而成。主要包括下列著作：

1.《成汉国史》，高然、范双双著；2.《汉赵国史》，周伟洲著；3.《后赵史》，李圳著；4.《五燕史》，赵红梅著；5.《前秦史》，蒋福亚著；6.

《后秦史》，尹波涛著；7.《赫连夏国史》，吴洪琳著；8.《南凉与西秦》，周伟洲著；9.《五凉史》，赵向群著。

以上九部著作大致涵盖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十六个国家（政权）。之所以称之为“新编”，则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以上九部著作均是在尽可能收集整理有关史料及参考古今有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完全摈弃了过去封建史家的正统论及民族歧视和不平等等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评述十六国历史。

第二，从前封建史家所撰十六国史，仅注重该国的政治、军事及与邻近各族所建政权的关系史，而“十六国史新编”还加强了对五胡所建十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包括宗教信仰）及民族的认同、迁徙及融合等方面的论述。

第三，“十六国史新编”还特别注意吸取文物考古的新资料，以及中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四，“十六国史新编”采取现代通行的专著体例和形式，用章节目的体例撰写并详加引文注释，最后附有大事年表、索引等。

由于“十六国史新编”有的撰写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如《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前秦史》），距今已过去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国内外有关五胡十六国史的研究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众多的新成果问世。如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三崎良章撰《五胡十六国的基础研究》（汲古书院，2006）及氏撰《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东方书店，2015年第三版）、日本学者编纂的《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等等。中国学者赵丕承编著《五胡史纲》（芸轩图书出版社，2000）、刘学铫撰《五胡史纲》（南天书局，2001）、陈勇撰《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贾小军撰《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及氏撰《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陈琳国撰《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商务印书馆，2010）及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咸阳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郭永利撰《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民族出版社，2012）等。而这些研究成果，上述十六国国别史则已不能参考引用，只能保持其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成果及特征

了。

其次，新编的九部十六国国别史，是由近十位作者撰写的，因此各书在体例、文字、着重点上，均与各个作者的专业、学养、经历等有关，故各书体例、内容的取舍、文字等各方面不尽相同，各具特色。

再次，有关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近二十余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一些与“十六国史新编”相左，甚至有相反的观点。[3]这应是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正常现象。我们保留“十六国史新编”中的观点和结论，以期引起中外学者的讨论和争鸣。

最后，感谢“十六国史新编”的各位作者，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欣然决定出版此套丛书。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2019年1月30日

[1] 大致相当于西晋灭亡至北魏灭北凉，统一整个北方的时期，即公元316年至439年。

[2] 参见[日]五胡之会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

[3] 比如仅关于最基本的“五胡”“屠各”“羯胡”“拓跋”“护军制”“汉化”“胡化”等概念，学界均有不同的解析。

- 前言
- 序言
- 引言
- 〖卷一〗 绪论篇
  - 第一节 河西经济区的崛起
    - 一 早期的畜牧业经济基础
    - 二 农业的产生及农牧结合经济格局的确立
    - 三 丝路贸易的兴起和主要城镇的形成
  - 第二节 凉州封建政治格局的奠定
    - 一 封建行政体制的建立
    - 二 最早的割据政权——窦融政权
  - 第三节 汉晋之际的河西民族问题
    - 一 汉代“羌胡”问题
    - 二 魏晋时期的民族态势
- 〖卷二〗 前凉篇
  - 第一节 前凉肇基
    - 一 张轨出任凉州刺史
    - 二 张轨的政治
  - 第二节 割据局面的演成
  - 第三节 前凉的强盛
    - 一 张骏的政治
    - 二 张重华的政治
  - 第四节 前凉衰亡
    - 一 政治的衰落
    - 二 统治集团的内讧
    - 三 前秦灭前凉
- 〖卷三〗 后凉篇
  - 第一节 后凉立国
    - 一 吕光征西域
    - 二 后凉的建立
  - 第二节 前期政治
    - 一 尖锐的民族矛盾
    - 二 氐族本位政治
  - 第三节 后期政治
    - 一 吕纂和吕隆的腐朽统治
    - 二 诸吕相残
  - 第四节 后凉灭亡
- 〖卷四〗 南凉篇
  - 第一节 南凉立国
    - 一 秃发乌孤的早期战略
    - 二 南凉的建立
  - 第二节 秃发利鹿孤的政治
    - 一 修结邻好

    - 二 兴理内政
  - 第三节 秃发傉檀的政治
    - 一 入主姑臧
    - 二 姑臧时期的外患内忧
  - 第四节 南凉灭亡
    - 一 “韦宗观衅”与“东苑之诛”
    - 二 穷兵黩武以至于亡
- 〖卷五〗 西凉篇
  - 第一节 西凉立国
  - 第二节 李暠的政治
    - 一 著姓政治
    - 二 “东伐”战略
  - 第三节 李歆的政治
  - 第四节 西凉灭亡
- 〖卷六〗 北凉篇
  - 第一节 北凉立国
    - 一 沮渠蒙逊起义和段业初立
    - 二 沮渠蒙逊夺权和北凉立国
  - 第二节 沮渠蒙逊时期的政治
    - 一 审时度势，示外以弱
    - 二 安定民生，注重经济
    - 三 搜求谠言，招礼英贤
    - 四 整肃纪纲，厉行法治
    - 五 驱逐南凉，迁都姑臧
    - 六 摧毁西凉，廓清走廊
    - 七 通使宋魏，期应一统
  - 第三节 北魏灭凉
  - 第四节 北凉绪余
- 〖卷七〗 民族篇
  -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
    - 一 羌
    - 二 匈奴
    - 三 汉
  - 第二节 鲜卑事迹
    - 一 “秃发氏”的由来
    - 二 “凉州之乱”
  - 第三节 卢水胡事迹
  - 第四节 民族融合趋势
- 〖卷八〗 经济篇
  - 第一节 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
    - 一 河西经济区的形成
    - 二 汉魏之际河西经济区的曲折发展
    - 三 五凉时期河西经济区的繁荣
  - 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

            - 一 人口资源的剧增
            - 二 自给程度的提高
    - 第三节 前凉农商并举的政策
        - 一 劝课农桑
        - 二 恢复货币流通，发展商业贸易
        - 三 张轨铸钱说质疑
        - 四 注重民生，发展经济
    - 第三节 诸凉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举措
        - 一 利用人力物力资源，扩大区域开发
        - 二 发展屯垦，广田积谷
        - 三 开发牧场，增加畜牧业产出
    - 第四节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西域经济战略
- 〖卷九〗 著姓篇
    - 第一节 门第与特权
    - 第二节 著姓之优势
    - 第三节 著姓之功能
- 〖卷十〗 文教篇
    - 第一节 五凉政权的“文教兼设”
    - 第二节 文化与学术的昌盛
        - 一 经学和玄学
        - 二 史学
        - 三 文学
        - 四 佛学
        - 五 艺术
    - 第三节 五凉时期河西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 第四节 五凉文化的历史影响
- 〖附录〗
    - 一 五凉世系表
    - 二 《五凉史探》再版前言
    - 三 《五凉史探》后记
    - 四 《五凉史探》再版后记
- 索引

前言

2018年上半年，我接到著名民族史学家周伟洲先生的电话，周先生说他准备编写一套“十六国史新编”，其中有几部邀请中青年学者执笔新撰，有几部则选用学界已有成果，业师赵向群先生的《五凉史探》被纳入，将以《五凉史》为名重新出版。因赵先生已去世数年，联系出版等事，周伟洲先生委托我来做。我欣然领命，并很快得到赵先生哲嗣晓东、晓林先生的支持，剩下重新编排《五凉史》内容的任务就由我完成。

《五凉史》是赵先生长期研习五凉史的成果，写作历时绵长，如果从甘肃省教委1994年立项算起，到1996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仅用了两年时间，但若从赵先生1983年在《西北师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前凉政权的兴替》一文算起，则先后历时十余年之久。2005年，该书被收入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史研究丛书”重新印刷，2007年再版，先后印行3000册。此次由周伟洲先生选入“十六国史新编”并以“五凉史”为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已是该书的第三版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该书的学术价值。

五凉政权先后立国河西，但毕竟不是同一个政权，写《五凉史》如何安排体例颇费周章。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可惜久已失传，存世者仅为后人辑本；在魏收《魏书》中，五凉史事见于列传（卷95《略阳氐吕光传》，卷99《私署凉州牧张寔、鲜卑秃发乌孤、私署凉王李暠、卢水胡沮渠蒙逊传》）；南朝宋沈约《宋书》卷98《氐胡传》叙述北凉沮渠蒙逊事；唐房玄龄等修《晋书》，以“载记”记述少数民族建立十六国史事，汉族人张氏建立的前凉、李氏建立的西凉则归“列传”；宋人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五凉史事贯穿其中，前凉自不必说，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并列叙述，读者借此乃可一览诸凉历史脉络。近世史家如吕思勉先生著《两晋南北朝史》、王仲荦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史》，则以章节体架构全书，吕著第三章《西晋乱亡》设“张氏据河西”一节以记前凉创业史事，第六章《东晋中叶形势下》，设“秦平凉

州仇池”“秦凉分裂”两节记前凉张茂至张天锡及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兴亡史事，第十六章至第二十四章分别论述四裔、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等；王著第四章《十六国》分节叙述十六国兴亡史，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则论边境各族、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哲学思想与宗教、经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上述史籍为后人修撰五凉史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很好的参照。

赵先生《五凉史》之体例，即是在充分吸收前述诸种五凉基本史料并充分把握五凉历史基本特点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本书主要内容分十卷，卷一先以“绪论篇”总叙五凉历史演成的历史背景，对五凉政权得以出现的经济、政治、民族等因素进行系统梳理，尤其对汉代以来凉州的行政建置、职官设置等做了交代。清代大史家钱大昕云：“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1]本书“绪论篇”相关内容，加上卷九“著姓篇”，这样的安排与钱氏所论暗合，更显出本书乃赵先生的深思熟虑之作。次则卷二至卷六“前凉篇”“后凉篇”“南凉篇”“西凉篇”“北凉篇”，依次叙述五凉史事。复次为卷七至卷十“民族篇”“经济篇”“著姓篇”“文教篇”，略与正史之“少数民族列传”及“食货志”“氏族志”“艺文志”同，并以“文教篇”之“五凉文化的历史影响”一节作结，彰显五凉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总体看来，这部《五凉史》在形式和内容上继承与创新兼顾，既适应了近世以来史书撰述章节体的潮流，又在内容上与传统史书一脉相承。

本次出版，较前几次出版、印行有如下改动：一是以卷一至卷十不同篇目架构全书。当年跟赵先生聊天时曾经说起《五凉史》的体例问题，先生认为以并列的篇目叙述五凉史事，辅之以“民族篇”“经济篇”“著姓篇”“文教篇”等，庶几可与传统正史体例相媲美，有关这一点，赵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他在山东大学跟随王仲荦先生进修学习时曾受到王先生指点。周伟洲先生的大作《南凉与西秦》[2]也采用同样的体例，可谓行家所见略同。至于用卷一至卷十之编排，则为显示“五凉史”是由本书各篇目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并非由互不相干的若干部分组成。二是根据目前学界通行的注释规则，每一处注释均注明著者姓名、书名或篇名、出版社及出版年、引文页码等信息，唯引文标点或有不同。三是订正了此前正文及注释中文字、标点存在的讹误。四是将2005年重印时增补的“补论篇”相关论文安排到“民族”“经济”“文教”等篇目的适当位置，删除了与卷八第三节第二目“恢复货币流通，发展商业贸易”内容重复的

《张轨恢复河西货币经济的举措及其影响》一文，同时将《河西著姓社会探赜》一文单独列出，形成卷九“著姓篇”，以彰显河西五凉之世族社会，如此更显《五凉史》体例的完整与成熟。五是将笔者当年为《五凉史探》撰写的“序言”略作改动并予以保留，将此前赵先生写的“再版前言”“后记”“再版后记”分别改为“《五凉史探》再版前言”“《五凉史探》后记”“《五凉史探》再版后记”，整体置于“附录”当中，以明本书前后几次出版、印行的始末。这些更动，赵先生若泉下有知，以他的豁达心性，定会首肯。

本书此次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著名民族史学家周伟洲先生将本书选入“十六国史新编”丛书，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首先对周先生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表示崇高的敬意！浙江大学冯培红先生、读者出版集团原彦平先生为本书相关内容的调整与改动提供了很好的建议；负责联系丛书出版事宜的陕西师范大学尹波涛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高振华先生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赵向群先生哲嗣晓东、晓林先生的大力支持，则是本书顺利出版的重要保证，谨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校对过程中，虽然我已尽力减少讹误，但仍难免有所疏漏，责任在我，诚恳希望学界同仁多多指正。

贾小军谨识

2019年4月

[1] 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卷40《北史三》“外戚传”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646页。

[2]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序言

赵向群先生《五凉史》作为一部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历史的专著，首次出版于1996年。出版以来，因其独特的视角、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翔实的考证而受到多方肯定。出版当年，施光明先生就在《北朝研究》上发表长达万余言的书评[1]，对其进行了精到的评价。《五凉史》此前我虽已读过数遍，但至今仍觉未能完全领会深旨。本次增补，我有幸能为先生校对书稿，从而有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拜读先生大作，从而也对书的学术内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增补本付梓前，先生嘱我为书写一篇序言。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深感学识浅薄，既不敢领此大任，又觉得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勉力而为之。与其说是《序言》，不如说是读书心得。

一

研究历史当能够上溯，下延倒在其次。追本溯源，揭示历史发展变化中的突出问题，找出其间的规律性则是最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治学理念是很重要的。《五凉史》从汉代河西经济讲起，先生说这是在“解嘲”，但依我看，却是他这种治学理念的体现。这一点可以从先生对汉晋之际河西经济的有关论述中反映出来。

众所周知，秦汉以前河西地区尚较落后，但西汉开设河西四郡，给河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从此河西乃至西域逐步纳入中原政治版图，河西经济也逐步缩小和中原地区的差距，到汉魏之际，河西经济区崛起。《五凉史》出版以前，学界对河西经济区的认识并不很清晰。《五凉史·绪论篇》以《河西经济区的崛起》一节开始，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也表现了先生对五凉政权存在基础透视方面的慧眼。同时，提出“河西经济区”的概念，并加以解释，又弥补了学界对历史上西部问题研究方面的不足。“河西经济区在汉魏之际兴起”之说的提出，是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又一发现。卷八“经济篇”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观点，既可与这篇论文相呼应，使这个发现和观点得到更充分的解

释，又可弥补前述《河西经济区的崛起》一节内容的不足。

先生也很注重学术研究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这可以从他对秦汉之际河西著姓社会的关注以及有关民族问题的考证中得到说明。本书卷九《著姓篇》，先生远追秦汉以论河西著姓，探微和钩沉并重，阐发极富功力。卷七《民族篇》之《鲜卑事迹》以及《卢水胡事迹》两节更是如此。先生分《秃发氏的由来》和《凉州之乱》两部分，对河西鲜卑历史进行缜密翔实的论述，解决了此前史学界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而论及“卢水胡”事迹，先生更是大量征引相关史料，并得出精当的结论。尤其在对卢水胡诸部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的探究中，征引东汉以及魏晋南北朝史料，比较“湟中说”“安定说”以及“张掖说”，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 在魏晋时期的卢水胡诸部中，临松卢水胡是源，而湟中、安定、北地等地的卢水胡是流。他们民族的“根”是汉代的“秦胡”。

这个结论澄清了学界过去在魏晋时期卢水胡源流问题上的歧异。

可以说，先生在他所有的论著当中，都贯穿了他学术体系上的特点。再读《五凉史》及先生的有关论文，都能让人如桃源探胜，有幽趣横生与眼前一亮之感。

二

《五凉史》一书也表现出先生治史的宏阔视野。这个视野就是在汉唐历史变迁和魏晋南北朝史风云际会的大背景之下探讨五凉历史。不论是谈经济问题，还是民族问题，或者政治文化，读者都能从《五凉史》中窥见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要线索和时代特点。如论及西凉政治，先生将西州谣谚“李尹王敦煌”和东晋谣谚“王与马、共天下”做对照，指出西凉政治与东晋政治同样都具有“著姓政治色彩”；论及北方统一趋势，他将北凉统一河西与北魏统一北方联系起来，指出：

> 从411年起，北凉政权的政治外交活动已远远超过了河西走廊的范围，成为黄河流域重归统一历史活动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五凉史》对这个大背景也做了充分透视，不仅在论及诸凉史事时注意到这一点，还专列《民族篇》进行论述。尤其是《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和《民族融合趋势》两节，从多民族角度和各个民族都是历史主角

这一观点出发，对古代河西民族进行评价，并提出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羌化趋势”之说，视角独到，见解深刻。而且，先生还对民族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做出深刻的论述，比如他在论及后凉吕光政治时，上追前秦以论“氐族本位政治”：

> 前秦氐族本位政治的落后性，一是移植氐族居民到被征服地区，借以突出氐族的政治地位和对其他民族实行同化的能力；二是以氐族贵族为核心，建立军事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政治体制，用以对被征服区进行强制性管理；三是迁徙被征服区其他民族豪望到京畿地区，以便进行有效的控制。

先生指出，后凉政治带着前秦政治的“某些烙印”。这就对秦凉历史表现出同样的悲剧做了新的诠释。

对于经济政治的地域化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五凉史》也进行了解释。《绪论篇》和《经济篇》中都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其中《北魏太武时期的西域经济战略》一节，将河西与西域作为一个“西部板块”研究，论证了北魏灭北凉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认为北魏灭北凉，经济方面的需要是首要动因。这一观点也很独到。

三

治史，要尊重传统的国学路子，重史料，讲实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所阐发。在我随先生学习的过程中，常听到研究历史，必须从经济史开始之类的教导。先生治学，对此也是身体力行的。如《西晋课田法新议》[2]一文，首先因先生对魏晋社会的经济形态有深入了解，在探讨经济制度时才能做到不因循他人成说，并能提出独到的见解。曹文柱先生据此指出，赵向群先生对西晋田制的论述自成一家。[3]本书《经济篇》第三节专设《张轨铸钱说质疑》一目，从货币理论的高度出发，论述了张轨时代河西货币经济环境以及张轨时期凉州为西晋地方政权的事实，从而为张轨无须铸钱和不可能铸钱做出了合理解释。并对“考古发现的‘凉造新泉’不是张轨所铸”一论进行深入细致的论析，对此前学界流行的“凉造新泉”为张轨所铸说提出怀疑和驳证。最后指出：

> 张轨无须铸币，因为张轨时期的河西存在着相当的货币经济环境。

同时，先生又持存疑的态度，对“凉造新泉”的铸造者作了指认，说：

> “凉造新泉”极有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

先生作为一名良师，每每要求学生凡发议论，都要言之有据。从《五凉史》中我们看到了先生的这种治学作风，有幸能跟先生学习，并为先生的力作写“序”，实在是幸运。

四

另外说些与本书无关的事。我随赵向群先生学习三年，深感先生淡泊名利，性格宽厚。对待学生，态度平易近人，有问必答，从不摆学者架子。他不厌其烦地修改学生的论文，指出其中的长短。尤其在论文的视角和撰写方法方面，给予学生详尽的指点和教导。凡经先生之手的学生论文，无论原先多么稚嫩，后来都会成熟和稳妥许多。

每与先生在一起，我们最喜欢听先生对做人或作文的看法。他说，人品和文品既是一个整体，又互为表里。有人说“文如其人”就是讲这个。先生的名言是“不慕通显，惟求真实”，用言简意赅的八个字概括人生的要义，真是启迪至深，回味悠长。而且，先生在实际生活和教研生涯中，常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如有一次跟随先生去成都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几位博士师兄在列车上围坐品茶，听先生纵论魏晋南北朝史事，先生对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及北魏迁洛后为何很快分裂的论述堪称精辟。先生认为，北魏孝文帝推行全盘汉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拓跋鲜卑精神的背叛，民族性格、母语文化以及传统习俗的丧失，等于拓跋鲜卑自己折断了自己的脊梁骨。因此，对一个民族而言，既要追求进步，又要不丢掉自己的民族性，这一点至关重要。

真的，与其说这是一篇《序言》，还不如说是一篇学习上的心得体会，一篇学习先生治学和为人风格的心得体会。

贾小军

2004年12月31日于西北师大

[1] 施光明：《追寻五凉历史，再现五凉风貌》，《北朝研究》1996年第4期。

[2] 载《西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3] 曹文柱、李传军：《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引言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国家曾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相交替是历史的基本特点之一。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一个典型的分裂时期。

所谓“五凉”，是指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中存在于河西地区的五个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凉”，是因为东汉至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属于凉州刺史部。

“五凉”所存在的具体历史年代是公元301年至439年。其间，前秦统治河西近十年（376～384）。这近十年时间将五凉时期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是前凉时期，后一段是后、南、西、北诸凉时期。

古代河西，依其地域而言，包括今天甘肃省兰州市以西的整个河西走廊及今青海省的湟水流域。但在五凉政权的极盛时期，它所管辖的范围东至今甘肃甘谷、天水，西及今新疆境内的天山南北。从这一点上讲，五凉历史是古代西北边疆历史的一部分。

五凉政权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其中，前凉和西凉分别为汉族张氏和李氏所建，后凉由氐族吕氏所建，南凉由鲜卑族秃发氏所建，而北凉则由匈奴族沮渠氏所建。这样多的古代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在同一地域的政治舞台上，并表现出他们的进取精神，展示出他们的历史地位，在共同参与北方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相互联系和彼此交流，这对促进北方民族融合，对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五凉史也是古代民族史的一部分。

河西地区，东西绵亘千余里。这里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自西汉中期古代河西经济区崛起以后，历经东汉、曹魏、西晋诸朝的陆续开发，到北魏统一北方时，这里已成为民殷物丰之地。而五凉政权则利用它们在河西走廊建制的政治优势，担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在促进河西与西域的交通贸易方面，在发展河西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方面，在发

挥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城市的商业作用方面，尤其在弘扬敦煌文化方面，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五凉史又是中西关系史和敦煌文化学术史的一部分。

当然，五凉政权毕竟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处西北的五个割据性政权，它们的存在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随着国家统一形势的出现，它们一个个都会走向覆灭。正因为它们都是割据政权，所以它们存在的时期中，河西域内战争多、灾荒多，而且其政治有时表现得既腐败又黑暗。正是这些原因决定了它们不会长久。

作者本人长期在甘肃工作，生于斯，长于斯，对甘肃古代历史情有独钟。近年来，颇耽于五凉史的研究，并略有所得。但古人云："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却说出了一个道理，就是要知道魏晋历史，先须知道汉代历史。就此而论，本人并非五凉史的内行。本书《绪论》从汉代讲起，亦有解嘲之意。另外，假如古人说得对，魏晋时期便不足为论，魏晋时期既不足为论，那么，五凉时期就更写不出什么大文章了。因此，本书名为《五凉史》，实在是雕虫之作。但本人也寄望这雕虫之作，能引起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对甘肃的更多关注。

作者于西北师大

2004年12月10日

〖卷一〗 绪论篇

第一节 河西经济区的崛起

一 早期的畜牧业经济基础

社会经济是社会生活的载体，是社会人文发展的动力源泉。五凉政权正是依托河西地域经济而存在的。

汉魏之际，河西经济区兴起。它一兴起，便与同期关中、中原、河北、关东等经济区形成并峙之势。

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强盛，推动了汉民族文化圈向边地的扩展。边远地区经济也由此得以进一步发展。秦汉政府向边疆移民，则是汉族文化圈扩展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因；早在秦灭六国后，已在河套地区进行屯戍，延至西汉中期，则将屯戍活动扩大到河西地域。

>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

这就是说，汉武帝将西汉政府的军事和行政权由原先的陇西一隅推延至河西地区，是河西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起点，也是河西经济区形成的开端。

关于西汉河西军事与行政权建立的年代，史料记载中歧异甚多。一种记载是：

> （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2]

> （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3]

据此，武威、酒泉二郡置于元狩二年（前121），张掖、敦煌二郡置于元鼎六年（前111）。

另一种记载是：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

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4]

据此，酒泉、张掖二郡置于太初元年（前104），武威郡置于太初四年（前101），敦煌郡置于后元元年（前88）。综合上述记载，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88年，是河西经济区进入开发的重要时期。

汉武帝开发河西之前，河西已是众多民族蕃息之地。月氏、乌孙是最早的两支。大约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那里居住，并过着游牧经济生活。近年来，在天祝、古浪、永昌、张掖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发掘出铜石共存文化，称为“沙井文化”。出土的石器、陶器质地钝厚，制作粗糙，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属于月氏文化遗存。[5]月氏的活动区域，史书记载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6]后人进而指出：“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7]这就是说，月氏活动区域很广，几遍于整个河西走廊。月氏人的生活是“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8]。他们的畜牧业主要是养羊，羊的品种很好。有记载说：“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9]“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即羬羊也。”[10]乌孙的活动区域较月氏稍西。近年来，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酒泉、玉门一带发现的骟马类型文化，经分析可能是乌孙遗留的历史痕迹。[11]乌孙人的生活也是“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12]。畜牧业以养马著称，马的存栏数很多，所谓“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13]。

在月氏和乌孙之外，古老的羌族与河西走廊也有关系。羌族在商周时期已见诸史料记载，过的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的生活。[14]战国初期，居住于河湟一带的羌人懂得了农耕技术，开始了农牧结合的经济生活。这推动了羌族社会的进步。秦汉之交，羌人析其部落，一部分向今川西北岷江上游流移，一部分留居河湟故地。留居河湟的一支在其首领忍和他的弟弟舞统率下，繁育人口，发展部族，“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15]

以上说明，早在匈奴人居河西之前，河西已生活着以月氏、乌孙和

羌人为主的畜牧业民族，他们是河西早期的居民，他们繁盛的畜牧业经济为河西经济区的起步创立了基础。所谓“河西畜牧为天下饶”，当始于他们。

西汉前期，匈奴势力扩展到河西。汉文帝在位时，匈奴最终击败月氏，迫使月氏放弃河西故地，西迁到伊犁河流域。月氏迁徙时留下部分老弱南撤，“保南山羌，号小月氏”[16]。此前，乌孙曾因受月氏侵逼而投靠匈奴。月氏西迁时，其首领昆莫带领昔日“亡走匈奴”的部众也向西迁移，并打击月氏，迫使月氏再离伊犁河向西，最终“遂都妫水（今阿姆河）北，为王庭”[17]。这样，伊犁河流域为乌孙占据，而匈奴则独霸了河西走廊。

匈奴独霸河西走廊时，其奴隶制国家已经形成，国家机构的逐渐完备以及军事力量的迅速扩张，需要充足的物质财富作为支撑。对于河西走廊的占领，带给匈奴奴隶制国家的利益是多方面的。首先，河西走廊水草丰盛，冬温夏凉，宜于畜牧。尤其是绵亘千里的祁连山，更是理想的天然牧场。

> 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羊，乳酪农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又有仙人树，行人山中饥渴者，辄食之饱，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见。[18]

这为畜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其次是河西走廊地当东西要冲，是联结西域与秦陇的桥梁和咽喉。占据河西走廊，可挟制西域诸国，并“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9]。作为匈奴的既定政策，在公元前176年已得以实现。此前，匈奴不仅击败月氏，而且“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20]。而后，在西域诸国设置“僮仆都尉”，进行控制与搜刮，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另外，河西走廊地势险要，地域辽阔，可供匈奴骑兵任意驰骋；有时也可挟制和联络羌人，武力威胁西汉边境，掳其边民，掠其资财，获得大量人口及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并且迫使汉王朝为宁边而做出让步。这在老上单于时期特别突出。老上单于尤“乐汉物”，他用“和亲”与军事威胁相结合的政策，对汉王朝施加压力，索取汉朝资财。“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21]匈奴对“汉物”的掳掠与索取，成为匈奴奴隶制国家物质财富供给的重要来源。

总之，在汉武帝经营河西之前，单一的畜牧业经济是河西社会的基本经济格局。同时，羌族的农耕经济，汉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影响也逐渐渗入河西早期畜牧社会。特别是汉族经济产品的渗入和吸引，也给匈奴这个古老畜牧民族带来了社会人文方面的一些变化。自老上单于开始的所谓“变俗”是变化的表现。这种变化虽然微小，不足以引起经济生活方式上的根本变化，但反响却非同一般，以至匈奴内部也有人疑虑“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22]这是以后河西经济区内人文与产业格局必然变化的历史信息。

河西走廊早期畜牧业丰厚的经济资源虽非汉武帝经营河西的决策性依据，但也是诱因之一。因为大宛的汗血马、西域的奇物都要经河西方能获致。实际上，在西汉政府驱逐了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河西畜牧业也给汉王朝带来极大的利益。这从“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民谚从此流传，一些优良的畜牧业产品源源不断输入关中、中原可见一斑。特别是良种马的输入，大大提高了西汉王朝的军事水平，增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有记载说，元狩三年（前120），“得神马渥洼水中”，司马相如作《太一之歌》以咏其事，称此马为“天马”，讴歌它“沾赤汗，沫流赭”，说它堪与龙为匹。[23]鉴于河西畜牧业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两汉政府以及后世各代，都在河西设立牧苑。永元五年（93），东汉政府为减轻河西地区负担，“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24]

河西早期畜牧业经济奠定的基础，也为汉以后河西域内割据政权的存在和“自成战国”准备了物质方面的条件。而五凉各政权之所以都拥有强劲的骑兵，也是这方面的原因。

二 农业的产生及农牧结合经济格局的确立

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是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政策的产物。

匈奴独霸河西走廊，不断地侵扰西汉西北边地，造成西汉初期严重的边患。鉴于国力有限，为求得安宁，西汉初期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作用不大，史载汉武帝初年事说：

> 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25]

汉武帝即位，鉴于汉初“休养生息”已见成效，国力也已充实，便决

定对匈奴用兵。建元三年（前138）和元狩四年（前119），通过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汉武帝了解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和物产情况，掌握了河西走廊的地理交通和生态环境，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反击匈奴的决心。从元朔二年（前127）拉开反击匈奴的战争序幕，中经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统军出征河西，到元狩四年（前119），终于将匈奴势力驱逐到大漠以北。此后，“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26]。

接着，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建郡设县，立亭障，置烽隧，并开始大规模向那里徙民。

>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27]

> 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28]

在元狩三年（前120）到元鼎六年（前111）的短短十年时间里，沉睡的河西农业社会苏醒了。汉政府利用屯田方式，集中劳力和技术，开垦处女地，建设“官田”，筑起从河套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的兵农合一、边屯边守的军事、经济壁垒，一次次加大包括河西在内的屯田的投入。而军屯的投入更显示出空前的力度：

>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9]

在大兴屯田之时，水利建设也在上马。

> 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30]

河西走廊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祁连山终年积雪，夏日消融，给农田灌溉提供了条件。走廊内河道纵横，著名的氐置水（今敦煌党河）、籍端水（今安西、敦煌间疏勒河）、呼蚕水（今酒泉北大河）、羌谷水（今张掖黑河）、谷水（今武威、民勤间石羊河）等五条河流交错回流，加上走廊地势平坦，引水灌溉方便，元封以后，西汉朝廷上下兴起一股水利热，这都推动了河西水利灌溉事业的勃兴：

> 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31]

为了保证河西水利灌溉设施与屯田配套，政府做出相应规划，尽量将屯田区建设在河水流域，并将屯田都尉站所置于重要的水口处，如北

部都尉设于酒泉郡内的会水偃泉障，渔泽都尉治设于敦煌渔泽等。

在开“官田”为国有农业搭起框架之时，“假民公田”又为民生农业创立规模。对于迁徙到河西的中原贫民，由国家供给他们衣食，度过一段适应性生活以后，“数岁，假予公田”，分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组织他们自垦自种，自给自足。由组织民生农业而形成的农业社会洋溢出古朴敦睦的村社风情，正所谓：

> 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32]

农业生产技术上，不但中原的先进成果在河西推广，而且一些新的耕植方法相继在河西得到应用。如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和相庸挽犁法的应用。由于代田法可增强作物抗风抗旱能力，并且相庸挽犁法能大大提高耕垦效率，很适合河西地区特点，经关中、中原实验后，实施于河西，“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33]，促进了河西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代河西农产品甚为丰富。见于记载的作物品名不下二十种，主要有胡麻、粱米、黄谷、土麦、白米、穬麦、黍米、黄米、白粟、胡豆、秫、糜、荞、茭、秫、谷、菽、麦、米、姜等。[34]

从汉武帝时期奠定河西农业经济基础直到后来的一百多年时间中，河西农业社会经过了一个相对平稳和顺利发展阶段。首先，阶级结构相对平稳。当时的关中及中原、河北、关东地区，地主制封建社会早已确立。激烈的土地兼并及由此引起的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立尖锐的问题，使那里的农业社会常处于动荡不宁之中。而河西走廊内，虽然因农业经济的起步及西汉行政权的延伸，封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在形成和发展，但土地兼并似很少见。相反，地广民稀、土地亟待垦发仍是基本现象。其次，西汉政府为安定民生，对迁到河西的百姓实行优待，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谓“此政宽厚”、“吏不苛”，以及“有和气之应”等是这方面的具体反映。河西百姓较少遭受封建政府及其官吏“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侵扰，自然安居乐业。此外，河西“僻远”的地理位置和险塞的地理环境，也使其不易受外部战乱及灾害的波及和影响。如汉武帝后期，关中、关东屡屡发生“群盗并起”[35]“水旱连年”之类的问题，而河西却少有此类景象。相反，西汉政府常在关中、中原社会问题严重时，将河西作为安置流民、减轻压力的目标和出

路。如元封六年（前105），因天灾人祸所致，关东流民多达二百万口，而“无名数者”多达四十万口，朝廷被如此严重的流民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商讨对策，“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36]公卿心目中的“边”，自然包括河西走廊。另外，中原发生的战乱与政治纷扰，也导致河西人口增长，王莽代汉过程中，就有不少中原人口流入河西。

河西农业经济的兴起，并没有造成畜牧业经济的窒息。国家牧苑的设置和农业人口兼营畜牧业，使农业和畜牧业形成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的趋势，这带给河西人文方面的变化甚为显著。在民风的敦厚淳朴之外，天长日久，移居河西的关东人在习俗上也与原先大不相同，即“习俗颇殊”。[37]而农牧结合、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形成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使河西区域经济朝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互补，既提高了自然经济的产值，也带动了手工业的起步，并使手工业更具区域特色。西汉以后，以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而兴起的手工业，如织造麻布、毛褐，进行皮革、毡裘加工，以及冶炼金属，制取食盐等，大大提高了河西社会的自给自足能力。河西区域政治的存在，正是以此经济潜力为基础的。

三 丝路贸易的兴起和主要城镇的形成

西汉昭帝和宣帝时期，河西经济区有了拓展。此前，从酒泉到令居之间的屯田网业已构成，但自令居到湟中的广大区域仍是一片空白，而这里正是羌人活动的区域。元鼎五年（前112），先零羌在匈奴策反下，起兵进攻令居、安故，围困枹罕，西汉政府征发陇西、天水、安定三郡骑兵及河南、河内二郡步兵10万，由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领，击败羌人的进攻，设置护羌校尉，管理河湟一带的羌人事务。汉武帝末年，匈、羌之间仍不时联合，共谋夺取走廊。可见，要确保河西走廊的安宁，必须扼制羌人北上；要扼制羌人北上，则必须在令居与湟中之间设置屯戍，并在通往河西与湟中的交通要冲建立行政和军事机构，这在汉昭帝时形成决策。昭帝始元六年（前81），西汉政府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中各分出二县，设立了金城郡。宣帝即位后，进一步强化对湟中羌人的控制，不使其北渡湟水。神爵元年（前61），汉宣帝接受赵充国建策，设置湟中屯田，调拨一万兵士开发临羌（今青海湟源）到浩亹之间的羌人“故田”和荒田共2000余顷。除军队经营外，还招募淮南、汝南等地百姓前往屯垦。这样一来，不仅西起酒泉，东至令居，南起湟中，北到朔方、上郡的西汉屯田区连片成网，更重要的是使金城郡

至武威郡之间的经济条件进一步改善，金城郡的防卫能力也大大提高，这对维护河西走廊的交通是至关重要的。而河西走廊正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桥梁，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道。因此，河西经济区的形成，使丝绸之路的经济作用更加突出，而丝路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又促进了河西经济区的进一步开发。

丝路贸易的兴起使河西经济区对外开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获取的交通资料是经济区开放的先导条件，西汉政府驱逐匈奴势力，控制河西走廊及今新疆地区，则是丝路开通的基础。

在丝路开通之前，中原与西域各国只存在民间贸易，丝路开通之后，官方贸易关系转趋活跃。此后，中原的丝和丝绸制品，以及包括漆器、铜器、陶器在内的手工业品、手工业技术源源不断输往西域，而西域的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原。特别是农牧产品，如葡萄、苜蓿、胡桃、胡麻、胡豆、胡瓜、石榴、良马、毡毯等成为与中原进行交换的大宗商品。作为奇珍的玉、玛瑙、翡翠、琉璃等更是受到汉族官僚的青睐。由于河西走廊是东西商贾必经之地，也是东西贸易的中转地和商品的集散地，作为招商的重要区域，它备受西汉官方的重视。政府在敦煌、酒泉等郡县治地设置客驿以“重致远人”，同时贮备充足的物资，进行供应，“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38]

在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河西四郡设置后，河西政治行政性城市便逐步兴起。在屯田和民生农业形成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四郡及其属县人口也在增长。西汉末年，总计河西区域内编户居民，约有户109740，人口429859。[39]四郡中居民最多的是张掖郡，有户24352，人口88731。其次是武威郡，有户17581，人口76419。[40]而酒泉、敦煌二郡居民也都在万户以上。后起的金城郡发展更快，西汉末年有户38470，人口149648。[41]在丝路开通及丝路贸易兴起后，途经走廊的过往人群络绎不绝，作为官方的使团，通常是“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每年“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42]，而通贸行商的东西客人，更是此进彼出，相望于道，这又大大增加了河西的流动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原来作为政治行政中心的城镇，带有了日益明显的经济色彩。特别是敦煌和武威，经济色彩更为浓重。敦煌作为走廊的西端咽喉，从建郡起，便是“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43]，一直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44]。武威郡治所在的姑臧城，是走廊东端重

镇，从匈奴时期就在经营，被称为盖臧城；丝路贸易兴起后，又获新的发展，从西汉到东汉，人们称之为“富邑”，说它“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45]。“合市”的税收，是官吏们暴发的财源。“合市”规模之大，从东汉元和元年（84）与北匈奴的一次交易活动得见梗概：

> 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46]

虽然北匈奴用作交易的牛马因在上郡遭南匈奴抢掠，使这次合市未能全部实现，但姑臧汇通东西南北各路商贸的经济作用却由此体现。

东汉中后期，河西经济区的发展一度出现曲折，原因是战事再起。汉安帝以后，北匈奴势力卷土重来，进犯河西，一度造成敦煌等河西郡县“城门昼闭”[47]，使丝路贸易中断。继而先零、沈氐等羌部进攻金城、张掖等郡县，战争旷日持久，达数十年，战火绵延到北地和并州境内。战争带来的徭役负担以及随战事而来的严重灾荒，使“并、凉二州遂至虚耗”[48]。为此，在建武十一年（35）和永初四年（110），东汉朝廷中有两次“弃凉”之议。第一次“弃凉”之议因陇西太守马援极谏而作罢。马援先是给朝廷上书，反复陈述他在军旅之次所见金城郡情况，力陈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城池坚牢等优势，主张招怀“客民”，恢复城郭里邑。朝廷根据上书派马援到金城一线去“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49]，后来，金城重现“郡中乐业”气象。第二次“弃凉”之议因郎中令虞诩劝阻而搁浅。虞诩力陈西汉开拓河西“履事勤苦”，指出“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50]。“弃凉”虽然未果，但东汉政府对河西经济区经营乏力，使丝路贸易与河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受到限制。

曹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强化治理河西，选用有行政及经济管理能力的官员张既、徐邈、皇甫隆、苏则、仓慈等人担任州郡长吏，在他们各自任职时，大力恢复经济，安定民生，改善民族关系，扩大商业贸易，使河西经济区再次获得振兴机遇。以徐邈为例，他在魏明帝太和中出任凉州刺史，为解决吃粮问题，他发展制盐业，用武威、酒泉出产的食盐与羌民交换粮食。同时扩大水田，招民佃耕，提高粮食收成。几年时间，使武威一带“家家丰足，仓库盈溢”[51]。当旧日的武威农村和城镇重现生机后，他又调拨军费以外的闲散资金发展中西贸易，使丝绸之路

的商贸重新启动。再如仓慈，他与徐邈同期，任敦煌太守。他在整顿和治理敦煌的过程中，将保护西域商贾、鼓励他们来华贸易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对到敦煌的商贾，热情接待，“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52]。此后，敦煌城又发挥出经济城镇与陆上商埠的作用。

自东汉至曹魏，河西经济区发展速度有所放慢，但其总体经济实力与再生能力却得到检验，证明了依靠农牧结合、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加上区域手工业的存在，河西社会可获得足够的经济自给；依托丝路贸易的驱动与城镇在商业流通中的转输作用，河西社会可获得较大的经济补充。

总之，与其他较早形成的经济区相比，汉魏之际形成的河西经济区具备着独特的优势。这种独特的优势又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河西政治、军事、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汉魏之际出现的河西割据政权以及本书论及的五凉政权，正是受河西经济区的负载及特殊地理形势影响而产生的历史结果之一。

第二节 凉州封建政治格局的奠定

一 封建行政体制的建立

西汉政府在河西建郡置县，对走廊实行行政与军事管理，奠定了河西封建政治结构的基础。

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提高中央对地方的控摄能力，按地域区划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十三州部。每州部设置刺史一名，委命定期巡行郡国，旨在考核地方行政官员的行政与执法情况。征和四年（前89），又在近畿（三河、三辅、弘农）七郡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近畿郡县。十三州部刺史加司隶校尉，共十四部。十三州部的名称是：冀州刺史部、兖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荆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益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交趾刺史部、朔方刺史部。[53]

东汉的凉州刺史部管辖十二郡国，含九十八县、道、候官。十二郡国是：陇西郡、汉阳郡、武都郡、金城郡、安定郡、北地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54]其中的属国都尉是汉武帝时设置的军事行政机构，“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55]，其务在“主蛮夷降者……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56]

汉魏之际，凉州区划有了一些微小变化。汉献帝在位时，以“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于是乃别以为雍州”[57]；魏文帝时，进而“分河西为凉州，分陇右为秦州”，制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58]。这样，凉州地域被确定为金城郡及其以西地区，行政权及于天山南北。

西晋统一全国之后，重划行政，定凉州统辖八郡，而领戊己校尉如故。这八郡是敦煌、酒泉、张掖、武威、西海、西平、西郡、金城。八郡下辖四十六县，领户三万零七百。其中：

金城郡，辖五县，即榆中、允街、金城、白土、浩亹。领户二千。

西平郡，辖四县，即西都、临羌、长宁、安夷。领户四千。

武威郡，辖七县，即姑臧、宣威、揖次、仓松、显美、骊靬、番

禾。领户五千九百。

张掖郡，辖三县，即永平、临泽、屋兰。领户三千七百。

西郡，辖五县，即日勒、删丹、仙提、万岁、兰池。领户一千九百。

酒泉郡，辖九县，即福禄、会水、安弥、骍马、乐涫、表氏、延寿、玉门、沙头。领户四千四百。

敦煌郡，辖十二县，即昌蒲、敦煌、龙勒、阳关、效谷、广至、宜禾、冥安、深泉、伊吾、新乡、乾齐。领户六千三百。

西海郡，统一县，即居延。领户二千五百。[59]

于是，凉州刺史管辖的范围，包括了东起金城，西到西域，延至西海（今青海西宁）的广大地域。

晋惠帝元康五年（295）：

> 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60]

这是前凉肇基之前汉族中央政府对河西行政区作的最后一次划分。五六年后，张轨任凉州刺史，鉴于涌入河西的中原人口日多，上表请曰：

> 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61]

这是在原区划基础上，根据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要求，对汉以来行政区划进行的局部改动。张轨之后，前凉张寔、张茂、张骏和后凉吕光等，都进行过一些改动，但总体结构无大变化。汉代州郡官员的设置情况是：州一级，刺史为最高长官，两汉有时称州牧。“成帝绥和元年（前8），以为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更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哀帝建平二年（前5）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前1）复为牧。后汉光武建武十八年（42）复为刺史。”[62]另外，两汉时期，刺史只是奉诏“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断理冤狱，

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也。[63]

除巡行中按“六条”所定内容对郡国官员和地方势力实行监察与处理外，西汉刺史并不主持行政，也不管理民事，且无固定治所。这种状况到东汉才改变：

中兴所治，有定处。旧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不得自诣京师。虽父母之丧，不得去职，或谓州府为外台。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时天下方乱，豪杰各欲据有州郡。而刘焉、刘虞并自九卿出领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64]

从东汉建立州刺史有固定治所之制，到建武十一年（35），刺史不再赴京奏事[65]，刺史的行政地位才被肯定下来。东汉灵帝以后，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刺史改称州牧，除掌握州行政权力之外，又掌握了地方军事权。原先刺史“位次九卿”，而此时九卿出领州牧。一直到魏晋时期，才恢复“刺史”称谓，但奉诏领兵之权在一些地区依然如故。

魏晋为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皆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领兵者武冠。而晋罢司隶校尉，置司州。江左则扬州刺史。自魏以来，庶姓为州而无将军者，谓之单车刺史。凡单车刺史，加督进一品，都督进二品，不论持节、假节。晋制：刺史三年一入奏。[66]

州一级的属官即所谓“外台”佐吏，东汉时规定“皆有从事史”，“员职略与司隶同”，“凉州部十二”[67]。这十二员职大略是治中（司隶部为功曹）、别驾、主簿、簿曹等。他们各自的职司是：“功曹从事（即州之治中从事）主州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其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主兵事。其余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68]在从事史之下，置书佐、孝经师、月令师、律令史等。汉魏之际，州级吏职中，又增了祭酒文学从事，西晋时再增武猛从事，在边远险要之州，还置弓马从事。自魏晋以后，因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开府者则置府僚司马，为军府之官，理军事”，这使州刺史属下有了州官、府官之分，“州官理民，别驾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长史、司马等官是”。[69]

郡一级长吏，自秦设立，称郡守，汉称太守。其佐吏有郡丞、郡

尉。郡丞佐助太守处理行政，郡尉负责一郡军事。不同处是“秦置郡丞，其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掌兵马，汉因而不改。其后长史遂为军府官”。此外也有郡主簿、司仓、司户、司兵、司士、司法、经学博士等掾属。魏晋时期还有郡中正。

县一级长吏，秦汉称令，其佐吏有县丞、县尉，另有曹掾，分管具体公务。

以上这些，凉州郡县略同。

上述行政组合中，关键是州一级组合。而凉州刺史部自两汉至魏晋行政区划以及事权的变化说明了一点，就是封建政治结构奠定并日渐细密。与此同时，刺史的职权也越来越重，顾炎武论刺史说：“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70]具体到东汉以后的凉州，这种“大小相制和内外相维”的封建政治结构又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特殊的风习而显出一些具体的特点和功能。一方面，因它能凝聚河西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而为中原王朝所用，故成为中原王朝在西北的坚强后盾。正如虞诩论及凉州时所说：

> 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71]

另一方面，由于它培植了一批有政治谋略和军事才干的地方封建人才，一旦国家分裂趋势加大，他们便会将上述政治结构改造为集结地域政治势力以实行划疆分治和凭险自保的工具。如窦融“抚结雄杰”[72]建立幕府便是一例。

汉晋之际，行政权与军事权相结合乃是惯常之事。政治结构也是军事结构的基础。早在汉武帝时，已设置了护羌校尉，职司为“主西羌”[73]。以后定制护羌校尉置凉州部内，属官为拥节长史一名，司马二名。东汉沿袭旧制，建武九年（33），复设护羌校尉，“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74]。魏晋不变。西晋元康中（291～299年），去护羌校尉，将职司归于凉州刺史，但不久又恢复。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75]。作为“州官理民”“府官理戎”制度的沿袭，也是“胡汉分治”政策的运用，进一步表明了河西封建政治的特殊性以及凉州在全国政治局势中具有的重要地位。此外，从西汉

中叶到北朝之前五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以凉州刺史部为摇篮，以河西经济为载体，孕育和培植出一大批封建官僚及其子弟姻亲，加上一些官僚家族连续数代在河西为官，甚至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他们的掾属又“多以本郡人为之”[76]，又造成其宾客部曲门生故吏盘根错节之势。这些世代在河西为官的家族加上他们的门生故吏，聚合成一支以政治关系、姻亲关系、地域关系扭结在一起的强大地方势力，不论在任何时期，也不论形势如何变化，这股势力都稳稳操持地方局面，他们是封建政治的中坚。在国家统一时期，中央政府须妥善料理他们，甚至不惜通过利益倾斜举措来结好他们，免得他们滋事，造成区域不宁而使朝廷陷入西顾之忧。如在东汉永初四年（110）的“弃凉之议”中，虞诩之所以持反对态度，就是出自对凉州地方势力的考虑：

> 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77]

虞诩还指出，正因为凉州局势一发千钧，才应格外优待和妥为措置凉州地方势力：

> 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78]

当国家处于分裂，河西道路断绝之后，任何要在凉州占据一席之地或实行割据的力量，都要首先笼络凉州地方势力，依靠他们支持自己和治理地方。这同时也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个占据者或割据者的出身与凉州地域有一定联系。两汉之际的窦融和前凉奠基人张轨，正因把握了上述封建政治原理才得以在河西立足，并控制局势，实现其割据分治的。

二 最早的割据政权——窦融政权

河西出现的第一个封建割据性政权是窦融政权。它是两汉之交统一国家政治动乱的产物，也是后来五凉政权的先导。前凉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便是“阴图保据河西，追窦融故事”[79]。而沮渠蒙逊、李暠等人也都自云在“追踪窦融”。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家族中辈辈都有人担任河西地方官吏，如高祖父是西汉张掖太守，

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80]。

王莽居摄中（6～8），窦融在西汉强弩将军王俊麾下任司马。时值王莽代汉之际，形势扰攘，人心浮动，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声讨王莽，“移檄郡国”，“众十余万”[81]。窦融因追随大司空王邑镇压翟义有功，受封为建武男。绿林起义爆发后，再随王邑镇压绿林军，被绿林军大败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城下。后来他受王邑推荐，任波水将军，屯兵新丰。地皇四年（23）九月，新莽政权在农民起义频频打击下摇摇欲坠，行将覆灭，窦融审时度势，及时倒戈，投降了绿林军建立的更始政权。他才干卓著，受到更始大司马赵萌器重，由校尉转升钜鹿太守。当此之时，中原、河北、关东一带兵戈未宁，窦融深知出任钜鹿的艰危，而“图出河西”[82]。他通过赵萌辞去太守之职，并说动更始帝，求得张掖属国都尉一职，携带家眷迁居河西。

窦融“图出河西”的原因中，首要一条是他深知河西政治与全国形势既相联系又有差别的道理，再就是他对河西社会状况有深刻了解，特别是对经济、军事、地理优势等有深刻了解。他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83]

到河西后，窦融以西汉河西地方政府的政治班底为基础，聚合汉族和少数民族地方势力，赢得了他们的拥戴。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84]。窦融依靠的原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人，既是原先河西政治势力集团中的成员，又大都为关陇和河西籍人。如库钧原籍羌中[85]，史苞原籍茂陵[86]。辛、梁二人分别为陇西和定安大姓，窦融“皆与为厚善”[87]。

政治基础确定后，窦融进一步确定割据策略。首先是集中权力，协同力量，守土保境，在“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勠力，则不能自守”[88]的政治思想指导下，设立了大将军府，窦融受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其次是安定民生，稳定秩序。“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89]军事方面，则“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90]。针对北匈奴对河西的进扰，强化攻防能力，采取正确战术，“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91]。

窦融政权对发展河西经济十分着力。东汉建立之后，他奉东汉正朔[92]，贯彻东汉政府的社会经济法令，重视农业生产。居延汉简中有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其中记载着“令田”“田吏”等，有专家解释说：“‘令田’为官名，‘田吏’为农官的泛称。”[93]这表明窦融时期对河西屯田经济管理仍很重视。另外，窦融政权也颁布农事法令，如“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令[94]，使河西农牧结合的经济优势得以进一步保持和发展。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积蓄经济力量，建武四年（28）五月，还颁布东汉政府有关“毋得屠杀牛马”和“吏三百石、庶民嫁取毋过万五千。关内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聘娶各如令”[95]的指令。由于重视经济，窦融期间，河西“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96]，诱使关陇地区人口，纷纷携家西上，“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97]，使河西人口再次增长。而河西特产如马匹等，则成为窦融给东汉政府的大宗贡物。建武五年（29）夏，派长史刘钧“奉书献马”[98]。东汉平定陇蜀后，窦融承诏与五郡太守赴洛阳奏事，“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99]，再次向中原展示了河西畜牧业的优势。

遥奉东汉正朔是窦融政治策略的基本部分。幕府初建时，天下形势四分五裂，在中原有刘秀政权，而邻近河西的陇西由隗嚣割据，巴蜀则由公孙述割据，所谓“称帝者数人”[100]。窦融“心欲向东，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101]。当此之时，隗嚣派辩士张玄游说河西，让窦融“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102]。窦融“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103]。这样，便不能不向刘秀和隗嚣亮明态度。窦融遣刘钧奉书献马，接受刘秀委任是态度之一，而作书责让隗嚣是之二。之一是鉴于：

> 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104]

之二是鉴于：

> 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自起兵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105]

概言之，上述两种不同态度，是窦融割据策略的具体运用。其中贯穿的精神，是远交近攻，择强而附。但它是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所做的合乎历史发展潮流的选择，因此窦融并没有与隗嚣、公孙述等同流合污，而其割据政权最终也没有遭到军事性打击，而是以和平合并的方

式被东汉政权所接收。窦融未成六国、尉佗之谋，最终却得到“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的殊荣。[106]

对汉晋之际河西封建政治结构的角度而言，窦融政权的存在，既为它注入了新内容，也为它增添了新的格局。而窦融在河西诸方面策略的成功及其表现的政治原理，又为五凉政权提供了借鉴的模式和经验。

第三节 汉晋之际的河西民族问题

一 汉代“羌胡”问题

西汉人说：“河西斗绝，在羌胡中。”[107]西汉以后，所谓的“羌胡”问题也构成河西区域突出的社会问题，它之突出首先是因河西民族构成复杂，其次是因中原汉王朝往往将河西作为“制边”政策推行的重点地区。汉武帝反击匈奴，控制走廊，切断羌人与匈奴联系等，开了这方面的先河。

汉代“制边”政策的要点，无非是将一些强悍的边疆民族拒之塞外实行隔离。如晋初郭钦所说的那样，乃是“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108]。隔离的最终目的是使“华戎不杂”，以免因他们的力量蔓延对汉族封建统治造成威胁。隔离的方式通常有二：一是将一些民族的主体力量驱逐出去，如对匈奴便是这样；二是将一些民族的主体力量封闭在“荒遐”地域，如对羌人便是这样。

就羌人和匈奴而言，在西汉政府推行上述政策时，他们的民族也正处在重要的发展阶段。如羌人，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在西汉中期已明显变化，虽然畜牧业仍然是主要方面，但农业的比重显然在增加。赵充国屯田，“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109]，确切表明了这点。农业经济比重的增加，必然会造成畜牧业失掉部分牧场，促使牧民向新的地域游牧；而根据农业生产条件的要求，农耕者也会追逐更肥沃的易垦土地。于是汉王朝的隔离性措施因阻碍了羌人经济发展之路势必使羌人忿悒不平，并采取一定方式表达其情绪和要求。如汉宣帝初即位，先零羌就要求政府许其北渡湟水，“逐民所不田处畜牧”[110]，这种和平的方式受到政府拒绝后，羌人便攻城邑，杀长吏，强行占据土地，使用战争的方式达到目的。但在西汉时期，这后一种方式常遭失败。再如匈奴，西汉初年，正值其奴隶制国家步入强盛时期，连续遭到西汉政府的军事打击，被逐出走廊阻绝于塞北，这首先使匈奴丧失了河西肥沃的牧场，其次是丧失了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大量供给，最终造成其奴隶制国家力量的衰落。匈奴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111]从其“悲愤”之情可知其受挫伤程度。受挫之余，又促使其民族为重返故地厉兵秣马，准备战争。由于西汉国力正盛，而河西防御体系的作用也充分发挥，“边郡烽火

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112]，事实上卷土重来已无可能。

但是，只要中原王朝对待“羌胡”的基本国策不变，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汉代，由于羌人与匈奴之间在民族利害方面存在着一致性，羌胡在与汉政府的冲突中，也往往采取联合行动。如后元元年（前88）：

> 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113]

而且，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哪怕政府方面的一点点措置不当，也会引起矛盾与冲突的发展，造成事态扩大。王莽时期对待匈奴的政策便是这样。本来，汉宣帝时已与匈奴有约：“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王莽废除了这个协约，单方面做出规定：凡汉族、乌孙、西域、乌桓有降入匈奴者，匈奴皆不能受。而且改“匈奴单于”之号为“降奴服于”，无端对匈奴进行种族压迫和歧视，从而激起匈奴不满，“入塞寇盗”，“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114]。汉宣帝时，对羌族也曾这样措置，由于政府得知匈奴使者到羌中，和居于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狼何部派人到匈奴去借兵，又得知原有内隙的先零、罕幵二羌部“解仇作约”，便怀疑羌人将在秋马肥壮时发动进攻，于是宣帝派义渠安国巡使诸羌，而义渠安国却召集先零羌豪四十余人，将其斩杀。又纵兵杀羌人一千多。“于是诸羌怨怒，遂寇金城。”[115]

西汉的上述民族政策给东汉留下了传统，而业已形成的“羌胡”问题也给东汉留下了一系列隐患。从东汉初年起，北匈奴“钞暴日盛”，“州郡不能禁”[116]。到建武二十三年（47），由于呼韩邪单于率南匈奴附汉，加之蒙古草原的连年旱蝗和南匈奴、乌桓及鲜卑的攻击，北匈奴终于在漠南无法立足而退往漠北，“钞暴”程度有所减轻。此后，北匈奴一方面惧怕东汉政府乘其疲惫兴兵北伐，另一方面也希望与东汉重开互市而取得补给，于是，在建武二十七年（51）派使节到武威，请求与汉和亲。而光武帝竟因众臣争言北匈奴此举在“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117]，担心接受后会造成南匈奴附汉之志动摇和乌桓等族离心为辞，“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118]。第二年，北匈奴再度遣使到洛阳，贡马匹裘皮，并求和亲和互市，东汉政府同样不予接受。到永平七年（64），虽答应北匈奴通使互市，但却又在匈奴南北二部之间置度辽将军营，屯兵五原曼柏（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

北），并派骑都尉秦彭率兵驻扎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于是，本来可以延缓的战争又因这一措置提前了。从永平八年（65）起，北匈奴发动对河西诸郡的进攻，“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119]。永平十五年（72），东汉以窦固为奉车都尉统军，与骑都尉耿忠、驸马都尉耿秉“并出屯凉州”[120]。第二年二月，东汉军队分兵四路：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张掖居延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万一千骑出平城塞，伐北匈奴。出酒泉的汉军在天山（今新疆哈密北哈尔里克山）取得胜利，进占伊吾卢（今哈密西北）。为堵塞匈奴入河西的门户，东汉政府设宜禾都尉，置兵于伊吾卢进行屯戍。此后在章和二年（88）十月、永元元年（89）五月、永元三年（91）二月，东汉政府又多次打击匈奴，直到北匈奴退出漠北。

假如说西汉政府对北匈奴的隔离政策以及东汉政府以凉州为基地与北匈奴进行的战争，尚带有维护西域及凉州安宁的用意，那么对羌人的隔离则具有很大程度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性质。因此，羌人反抗东汉的战争具有正义性，它拉开了河西域内各民族联合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序幕。

事实上，早在汉宣帝之前，已有部分羌人被政府迁到内地为汉“守塞”。如汉景帝时，研种羌豪留何请求政府批准率众人守陇西塞。政府接受其请，徙其种落于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安故（今临洮县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县北）。而宣帝神爵二年（前60），赵充国将降羌部众迁到破羌（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东）、允街（今甘肃永登县南）等地。此后，羌人入居塞内者更多，“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121]。东汉初，马援为陇西太守，击败先零羌，徙其部众数千人置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由于不断内徙，羌人也有了东、西之分。所谓：

> 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122]

所以，汉宣帝时羌人要求内徙到湟水以北逐荒畜牧，本是无可厚非之事，在遭到政府拒绝后内心怨恨也很正常。延及东汉，就是内徙的羌人也因常受到郡县小吏及汉族恶势力的欺凌而义愤填膺。羌人的处境和

心情是：

> 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123]

他们的反抗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 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124]

> 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125]

所以，安帝永初元年（107），内徙羌人首先在酒泉郡发动起义，继而驱兵东向，转入陇西、汉阳、北地，战火绵延到西河、河东、河内、汉中诸郡，所谓“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126]。至元初元年（114）才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这次战争带来的影响是：

> 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货，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127]

此后，在永和五年（140）至永嘉元年（145），延熹二年（159）至延熹六年（163），东羌与西羌相联合，又先后两次发动起义，两次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两次费用消耗八十余亿，人口死者不可胜数。

汉代河西的“羌胡”问题既表明了河西民族关系的敏感程度，也表明河西民族问题不光是决定河西政局稳定与否的关键所在，也是关系整个北方政局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另外它还说明，在两汉之际，以“羌胡”为代表，河西少数民族参与北方社会生活的意识正在提高，由当初只追求农牧业资源提高到反抗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由单纯参与河西经济生活而上升到参与河西政治生活的态势表明，一旦历史为他们提供机遇，他们必然会通过种种活动将自己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显现出来。

二 魏晋时期的民族态势

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及“羌事”结束后，汉王朝也处于崩溃前夜。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政府自顾不暇，边陲之事更无遑论及。当此之时，周边民族的内徙不再鲜见。“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128]内徙诸族中，仅匈奴就有屠各等十九种，加上鲜卑以及本已散居关陇的羌、氐，

使“西北诸郡，皆为戎居”[129]。河西域内，内徙诸族也表现出一种活跃态势，他们参与北方事务的意识更逐步高涨。以湟中羌为例，当黄巾起义爆发后，他们也遥为呼应，于中平元年（184）十月在“义从胡”北宫伯玉率领下，与北地先零羌联合，进攻金城。当然，他们有时也被汉族豪强所利用。如北宫后被韩遂、马腾利用，形成关西军阀割据势力的基础。而后来陇西军阀董卓也组织“羌中”军队镇压黄巾起义并参加军阀混战。

在河西走廊，一些民族种落也因显示力量开始见于记载，“赀虏”和卢水胡是其中两支。汉简中的卢水“秦胡”就是指他们。史载：

> 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俾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亡奴婢故也。[130]

确切地说，“赀虏”是匈奴奴隶制国家留给河西走廊的一支民族力量，是一个以匈奴为主体而混合了羌、丁零、西域等民族成分在内的羌胡群体。他们在河西活动之久，种落人口之众，活动区域之广，都令人瞩目。其外是卢水胡，他们世居黑河流域。东汉明帝时，窦固击匈奴，所率河西甲卒中就有该部二千骑。[131]曹魏时期，河西一度出现动乱：

> 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132]

卢水胡也聚集力量，在伊健妓妾与治元多率领下，在武威起兵，造成“河西大扰”。

但就总体而言，曹魏时期河西民族问题呈现的是平缓态势，不见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发生。所以有人总结说：“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者鲜有桀悍侵渔之患。”[133]其原因除“边守遂怠，障塞不设”[134]，即制边政策发生明显变化外，重要的是地方官吏善于措置，不但避免了民族矛盾激化，还做到胡汉互补。譬如苏则，在担任金城太守时，“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135]。徐邈，他任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时，“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136]。

曹魏时期制边政策的松弛和对待内徙民族问题的宽柔，招诱着周边民族进一步向内地迁徙，这又使河西“羌胡”群体中增加了新的种族力

量。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河西鲜卑”。

所谓“河西鲜卑”，是指魏晋时期活动于河西区域内的众多鲜卑部落，以秃发部为代表，此外还有乙弗、折掘、意云、车盖等部。后来入居陇西的陇西鲜卑乞伏部也曾为河西鲜卑秃发部所统。[137]有关秃发部入徙河西的记载称：

>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138]

他们的入徙，使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的民族构成更为复杂，社会生活更丰富多彩。同时河西的民族问题，其态势也就有所变化。

对河西鲜卑秃发部迁入河西的具体时间，史学界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东汉中叶是它从塞北南迁的开始[139]。更多的人则认为它迁到河西是曹魏时期，但没有进一步考证。

我们知道，秃发部是拓跋部的后裔，“因事分姓”[140]。而拓跋部是在檀石槐建立部落联盟时才由诘汾带领从原居地大泽（今呼伦湖）迁到漠南，并“始居匈奴之故地”[141]。檀石槐建立部落联盟是在东汉后期，因此，秃发部入徙河西不会早于东汉后期。诘汾二子，次子力微，即北魏尊称的神元皇帝。长子是匹孤，有记载说：“圣武帝诘汾长子匹孤，神元时率其部众徙河西。”[142]力微时期，“与魏和亲”[143]，这正是所谓“边守遂怠，障塞不设”时期，匹孤率部南迁，适逢其时。力微活了104岁，做拓跋部首领58年。其在位的第29年，“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144]。此时正是曹魏嘉平元年。嘉平中（249～251），司马师辅政，接受邓艾羁縻建策，对边疆民族实行分化离间，通过“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的策略造成“羌虏失统，合散无主”[145]。到西晋泰始四年（268），西北民族问题渐趋严重时，傅玄反思历史，对嘉平边策的“失误”进行指责说：

> 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146]

《通鉴》载晋武帝泰始五年（269）事称：

> 先是，邓艾纳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朝廷恐其久而为患，以（胡）烈素著名于西方，故使镇抚之。[147]

翻拣史书，在嘉平中，也就是力微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雍凉二州界内已有鲜卑，他们或被称为鲜卑，或仍被混称为“羌胡”，抑或称“羌夷”“羌虏”。大抵活动于河西、陇西一带的强部有三支，一支是秃发，一支是乞伏，一支是鹿结。鹿结部随即为抢夺陇西地盘而与乞伏部“迭相攻击”，结果被吃掉。实际上势力最强的只有秃发与乞伏二部，而乞伏部本为秃发部所统，其见诸记载晚在西晋泰始初。所以，傅玄批评邓艾放任的鲜卑很可能指河西鲜卑秃发部。况且，傅玄的指责是有的放矢的，它针对着正在酝酿中的“凉州之乱”，而“凉州之乱”正是以秃发部为首的河西鲜卑的反晋活动。

可见，秃发部与拓跋部“因事分姓”的时间不应早于曹魏时期，秃发部入徙河西是“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的内容之一。再具体些讲，根据邓艾边策的时间以及傅玄对边策的指责，可估计秃发部入徙河西是在嘉平间或略早于此，即曹魏中后期。以拓跋部正处在强盛时期，部众越来越多，因为经济生活的需要而“分姓”，并循着“居匈奴故地”的历史，追踪昔日匈奴足迹，向土地辽阔和牧草肥美的河西发展，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为证明这个论断，可以通过秃发世系做进一步推算。匹孤率部迁入河西后不久死去，接替其酋长之位的是儿子寿阗。“寿阗卒，孙树机能立。”[148]从匹孤到树机能，名为四世，实则三世。三世中，匹孤在河西享世无几，以其死于嘉平中算，到泰始六年（270）树机能发动“凉州之乱”，其间约二十年时间，足够寿阗享位了。因为事实上秃发部后来的首领享位均无超过二十年的。秃发傉檀最久，也仅十三年。秃发乌孤与秃发利鹿孤都仅享位三年。[149]据此论定河西鲜卑秃发部内迁河西的具体时间是曹魏中后期，当不致有大错。

秃发部内迁后，分散在地跨河西及陇西的辽阔区域内从事游牧。“其地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西北）、牵屯（今宁夏固原），西至湿罗（地望不详，有说在今青海湖东），南至浇河，北接大漠（腾格里沙漠）。”[150]作为“人人习战”的游牧部族，这样大范围、大幅度的活动，必然要造成袭扰。同时，由于上述活动区域又与赀虏、羌人及其他鲜卑种落的活动区域或相重合，或相邻接，这就必然产生民族间的接触。或受到原土著民族的接纳形成新的民族群体，沿着从聚合到融合的前途发展；或受到原土著民族的排斥，按照从抗拒到冲突的方向演化。于是又有熙熙攘攘与喧喧嚣嚣的场面发生。特别是因为上述区域与汉族聚居区犬牙交错，鲜卑的游牧经济与汉族的农耕经济纵横穿插，势必又要带来新的“羌胡”问题，引起朝廷关注。西晋建立后，这一点便清楚地反映了

出来。傅玄对邓艾的指责只是一例。早在此前的嘉平初年，李熹任曹魏凉州刺史并领护羌校尉时，已接触到新的“制边”问题。

> 羌虏犯塞，熹因其隙会，不及启闻，辄以便宜，出军深入，遂大克获。[151]

在泰始四年、五年（268、269），又是李熹，他任西晋仆射时，再次为“凉州虏寇边”问题而操劳：

> 凉州虏寇边，熹唱义遣军讨之。朝士谓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竟不从之。后虏果大纵逸，凉州覆没，朝廷深悔焉。[152]

其实无论李熹认为的“犯塞”问题还是所谓的“寇边”问题，都与昔日匈奴的活动有别，一无“大钞掠”，二无阻断西域通路事。有关记载也只有“犯塞”“寇边”等字眼，不见有内徙民族侵害土著民族的材料，也看不到与政府对立的现象。而朝士众口一词地称“虏未足为患”，也不是信口开河，乃是前鉴魏世“夷虏内附者，鲜有桀悍侵渔之患”，近观拓跋鲜卑所为做出的结论。拓跋鲜卑与魏晋交好，这个方针是始祖力微规定的。魏甘露三年（258），拓跋部迁于定襄之盛乐，力微乃告诸大人曰：

> “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153]

到沙漠汗时期，

> 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始祖与邻国交接，笃信推诚，不为倚伏以要一时之利，宽恕任真，而遐迩归仰。魏晋禅代，和好仍密。[154]

终晋之世，上述方针不变。虽说秃发部与拓跋部在力微时“因事分姓”，但在与魏晋关系上，总不至于南辕北辙和大相径庭。傅玄、李熹等的态度只能说明西晋建国后，朝廷对待内徙民族的态度又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江统《徙戎论》中有露骨的反映。而这种变化又会导致不恰当的措置方式。泰始五年（269）二月，西晋政府“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155]，在河西与陇右之间树立军事屏障。一方面借以阻断河西“羌胡”东进之路，另一方面也为措置河西民族问题进行准备。秦州刺史部设置后，任命“素有恩信于西方”的胡烈为秦州刺史，“专御边之宜”；调任负责长江下游防务的原扬州刺史牵弘为凉州刺史，拟实行秦凉合围战略。为防范措置过程中“羌胡”逸散和呼应，又议置郡于高平川。这些如临大敌的措置方式只能招致以河西鲜卑为首

的“羌虏”结屯聚众和严阵以待，终于在泰始六年（270）引发了“凉州之乱”：

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击叛虏于万斛堆（今甘肃靖远县界），力战，死之。[156]

（胡）烈为秦州刺史，及凉州叛，烈屯于万斛堆，为虏所围，无援，遇害。[157]

寿阗卒，孙树机能立，壮果多谋略。泰始中，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158]

“败凉州刺史苏愉”句，《通鉴考异》作“斩凉州刺史牵弘”，“金山”《通鉴》作“青山”（今甘肃环县西）。[159]

自曹魏中后期到西晋初期，民族问题的上述演化态势表明，西晋时期北方各民族的反晋活动在河西来得最早，也来得最烈。为这一特点所决定，河西政治形式也将比其他区域更早地发生变化。当内徙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在整个北方大地激荡起反晋旋涡，一步步将西晋推向灭亡，并一步步建立起区域性政权，从而将历史导入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时，河西会成为率先割据的区域之一。而永宁初，张轨“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据河西，追窦融故事”[160]，则是率先成为割据区域的开端。所以，魏晋间河西“羌胡”问题的一步步演化，也是五凉历史一步步形成的序幕。

[1] 《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第1439页。

[2] 《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176～177页。

[3] 《汉书》卷6《武帝纪》，第189页。

[4] 《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12、1613、1614页。

[5] 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第89～90页。

[6]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2页。

[7]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第3157页。

[8]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9] 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异物志》转引《太平御览》，王晶波校点《二酉堂

史地丛书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第126页。

[10] 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异物志》引郭璞《山海经注》，王晶波校点《二酉堂史地丛书六种》，第126页。

[11] 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132页。

[12]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13]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1页。

[1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第2869页。

[15]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页。

[16]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2页。

[17]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2页。

[18] 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记》引《西河旧事》，王晶波校点《二酉堂史地丛书六种》，第113页。

[19] 《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72页。

[20]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6页。

[21]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引中行说语，第2901页。

[22] 《汉书》卷94《匈奴传上》引中行说语，第3759页。

[23] 《汉书》卷22《礼乐志》，第1060页。

[24] 《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75页。

[25] 《汉书》卷94《匈奴传上》，第3765页。

[26]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7页。

[27] 《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44~1645页。

[28]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25页。

[29]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9页。

[30]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0页。

[31] 《汉书》卷29《沟洫志》，第1684页。

[32] 《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45页。

[33] 《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39页。

[34] 何双全：《汉简所见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35] 《汉书》卷78《萧望之传》，第3278页。

[36] 《史记》卷103《万石君传》，第2768页。

[37] 《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45页。

[38] 《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93页。

[39] 《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12～1614页。

[40] 《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12～1613页。

[41] 《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10页。

[42] 《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4页。

[43] 《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31页。

[44] 《后汉书》志23《郡国志五》，第3521页。

[45] 《后汉书》卷31《孔奋传》，第1098页。

[46]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50页。

[47] 《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09页。

[48]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1页。

[49] 《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36页。

[50] 《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66页。

[51]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中华书局，1959，第740页。

[52]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53] 《汉书》卷28《地理志序》，第1543页。

[54] 《后汉书》志23《郡国志五》，第3516～3521页。

[55] 《后汉书》志28《百官志五》，第3619页。

[56] 《后汉书》志28《百官志五》，第3621页。

[57] 《晋书》卷14《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4，第433页。

[58]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3页。

[59]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3～434页。

[60]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61]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62] 《通典》卷32《职官·州牧刺史》，中华书局，1984，典183下。

[63]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师古注，第742页。

[64] 《通典》卷32《职官·州牧刺史》，典183下至典184上。

[65] 《通典》卷32《职官·州牧刺史》，典184上。

[66] 《通典》卷32《职官·州牧刺史》，典184上。

[67] 《后汉书》志28《百官志五》，第3619页。

[68] 《后汉书》志27《百官志四》，第3614页。

[69] 《通典》卷32《职官·州牧刺史》，典184下。

[70] 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9《部刺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第511～512页。

[71] 《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66页。

[72]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73] 《后汉书》志28《百官志五》，第3626页。

[7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

[75]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76] 《通典》卷33《职官·总论县佐》，典191上。

[77] 《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66页。

[78] 《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66页。

[79]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中华书局，1985，第481页。

[80]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81] 《汉书》卷99《王莽传上》，第4087页。

[82]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83]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84]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85] 《后汉书》卷23《窦融传》注引《前书音义》，第797页。

[86] 《后汉书》卷23《窦融传》注引《三辅决录注》，第797页。

[87]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88]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89]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90]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91]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92] 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171页。

[9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第119～121页。

[9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第119～121页。

[95] 薛英群：《新获居延汉简所见窦融》，《甘肃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96]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9页。

[97]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98]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8页。

[99]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807页。

[100]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8页。

[101]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8页。

[102]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8页。

[103]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8页。

[104]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8页。

[105]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801～802页。

[106]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808页。

[107]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108] 《晋书》卷97《匈奴传》，第2549页。

[109]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86页。

[110]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2页。

[111]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引《西河故事》，第2909页。

[112]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84页。

[113]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114]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24页。

[115]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7页。

[116]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2页。

[117] 《后汉书》卷36《郑兴传附子众传》，第1224页。

[118]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46页。

[119]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49页。

[120] 《后汉书》卷23《窦融传附窦固传》，第810页。

[121] 《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35页。

[122] 《资治通鉴》卷52顺帝永和六年正月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第1689页。

[12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6页。

[12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

[125]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126] 王符：《潜夫论·救边第二十二》，上海书店，1986，第107页。

[127]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1页。

[128] 《晋书》卷52《阮种传》，第1445页。

[129] 《晋书》卷97《四夷·北狄·匈奴传》，第2549页。

[130]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第859页。

[13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第119～121页。

[132] 《三国志》卷15《魏书·张既传》，第474页。

[133] 《晋书》卷52《阮种传》，第1445页。

[134] 《晋书》卷52《阮种传》，第1445页。

[135] 《三国志》卷16《魏书·苏则传》，第491页。

[136]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40页。

[137]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中，乌孤曾言“（乞伏）乾归，本我所部，终必归服”（第3143页）。由此可知，乞伏部早期与河西鲜卑有关系。

[138]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39]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三章《西晋乱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82页。

[140] 《魏书》卷41《源贺传》，中华书局，1974，第919页。

[141] 《魏书》卷1《序纪》，第2页。

[142] 《元和姓纂》卷10《秃发》，金陵书局校刊，嘉庆七年刊版。

[143] 《魏书》卷1《序纪》，第3～4页。

[144] 《魏书》卷1《序纪》，第3页。

[145] 《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第776页。

[146] 《晋书》卷47《傅玄传》，第1322页。

[147] 《资治通鉴》卷79晋武帝泰始五年二月条，第2509页。

[148]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49]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9《南凉录》，第615、618页。

[150]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51] 《晋书》卷41《李熹传》，第1189页。

[152] 《晋书》卷41《李熹传》，第1190页。

[153] 《魏书》卷1《序纪》，第3～4页。

[154] 《魏书》卷1《序纪》，第4页。

[155] 《晋书》卷3《武帝纪》，第58页。

[156] 《晋书》卷3《武帝纪》，第59页。

[157] 《晋书》卷57《胡奋传弟烈附传》，第1557页。

[158]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59] 《资治通鉴》卷79晋武帝泰始六年四月条胡注，第2515页。

[16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9《前凉录》，第481页。

〖卷二〗 前凉篇

第一节 前凉肇基

一 张轨出任凉州刺史

前凉由张轨创始。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张轨受命出任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前凉由此肇基。[1]

张轨，字士彦，安定郡乌氏县（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人。史载其为西汉常山景王张耳的十七世孙。父张温为西晋太官令。太官令是光禄卿属官，主膳。[2]因此，张轨堪称是贵胄后裔和“当涂子弟”，其家族也颇具门望，“家世孝廉，以儒学显”[3]，算得上魏晋之世的关陇著姓。此外，张轨与挚虞同为安定名士皇甫谧的门生。皇甫谧是东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4]，还精通医学，晋初隐居于宜阳（今河南洛阳市西南）。张轨与之“友善”，并从学于女几山；“轨少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5]，受到西晋名臣张华的赏识。泰始初，西晋征聘名士及胄子，与皇甫谧友善的“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6]，张轨也因其叔父恩荫得“赐官五品”。按照九品官人法，这“五品”当属“中中”。而张华认为这是安定中正品状不实，“蔽善抑才”，于是“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后卫将军杨珧辟轨为掾属，张轨由此步入仕途，又从太子舍人一步步做到散骑常侍、征西军司。[7]九品官人法无“上上”，“二品之精”当是最高品状。杨珧是晋太傅杨骏的胞弟，“得幸于武帝，时望在骏前”[8]。太子即司马遹。张轨初入仕，便受如此恩荣，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以上述家世、学问、仕途经历，在朝廷中拥有重望也是必然的。所以，当他“阴图据河西”和“求为凉州”的设想和要求一袒露，便得到朝廷的批准。当此之时，“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9]。“才堪御远”是根据咸宁初（275），张轨任参军司马之职时随司马骏镇关中，在措置“凉州之乱”中得力而得到的评价。

所以，弭平“凉州之乱”才是中央同意张轨出任凉州的原因。也就是说，以河西鲜卑为主力的“羌胡”在秃发树机能率领下起兵反晋并导致西晋政府对河西失驭，这是前凉肇基的契机。

应当说明，《晋书》在叙述张轨出任河西长吏的动机时，特为著笔说：“（轨）筮之，遇泰之观。乃投荚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10]在西晋初期，作为一个受儒家名教思想熏陶甚深，而且“姿仪典则”的官僚，张轨很可能像窦融一样，对河西的物产、形胜、民俗等各方面情况都很了解，也带着生逢乱世的炎凉心理而抛别京华及多事之秋的中原到河西寻找“遗种处”，但他是否存在“霸者”的念头，这是需要讨论的。看张轨到凉州后的作为，也难说明他要为霸。《晋书》如此着笔，只能使张轨尚未到任就先蒙上割据嫌疑。难怪有人讥评《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11]。《通鉴》对张轨比较公允，只讲“轨以时方多难，阴有保据河西之志”[12]。

所谓“时方多难”，指的是晋惠帝即位后，在首都洛阳发生的“八王之乱”。这场发自西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而波及整个中原的乱事，以争权夺利为实质，以血腥残暴为手段，其间充满了阴暗和无耻。

我们知道，西晋是司马氏家族以门阀士族阶层作为政治基础，用发动宫廷政变颠覆曹魏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极端的腐败与内部矛盾重重是它的鲜明特点。此外，便是政治制度的落后。晋武帝“惩魏孤立而亡”，分封宗室，允许王国置军，是政治制度落后的具体反映。“八王之乱”正是集腐败、矛盾、落后等种种弊病而出现的动乱。从晋惠帝初即位的永熙元年（290），皇后贾南风为独揽朝纲而指使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诛戮惠帝外祖父、太傅杨骏，并株连包括杨珧在内的数千名朝臣贵戚起，到永康元年（300），再杀惠帝太子遹，贾后的滥杀引起了官僚怨愤。于是赵王司马伦起兵杀掉贾后并株连大臣张华、裴頠等。短短几年间将一场宫闱之变演成八王争夺皇权的大规模战争，使数十万中原百姓惨遭屠戮。适如史家所慨叹的那样：“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杨骏被诛，母后废黜。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而有免官之谣。民不见德，惟乱是闻，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世利，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纲解纽。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13]

王公贵戚和朝臣名士在“八王之乱”中死的死，逃的逃，使一些“恋

栈”者心怀“颠坠戮辱”的忧悸，不求富贵有望，只图身家性命可保，纷纷自谋远祸之计。而张轨，他作为张华、杨珧、愍怀太子遹等人的门生故吏，又怎能不从他们的悲惨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命运呢？在忧惧和感愤中去国徙官，求任遐域，正是情势使然，情理使然。

可见，“八王之乱”及其引起的西晋政局的变化，是张轨要求出仕凉州的根本原因，它与西晋政府为弭平“凉州之乱”而需要去凉州，同是前凉政权产生的背景。

二 张轨的政治

唐朝人对十六国政权进行评价时指出：“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14]

张轨是以西晋封疆大吏的身份到达河西的，故肇基时期的前凉政权仍是西晋国家的一个地方政权，在晋愍帝建兴四年（316）西晋亡国前，一直如此。张轨无所谓“假名窃号”问题，他“杖顺为基”[15]，到死念念不忘效忠西晋王室。

张轨所遵循的政治方针是“尊晋攘夷”和“保宁域内”。他临终时遗令说：

> 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16]

确定这样的方针是符合当时河西社会环境的要求的。

自东汉中期以后，伴随河西区域内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升级，凉州行政名存实亡。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竞起，东汉政府已完全失去驾驭凉州地方的能力。

> 献帝时，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于是乃别以为雍州。[17]

喧喧嚣嚣的“弃凉之议”这时终成事实。河西五郡也成为汉族豪强势力和地方民族势力盘踞纵横之地。直到曹魏统一黄河流域，重将凉州从雍州中划分出来，并对瘫痪散乱状态进行整顿时，凉州社会动荡的余波仍未止息。如金城郡，“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其余各郡，乱事迭起：

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毋丘兴告急于（苏）则。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18]

边远郡县，散乱问题更为严重。如敦煌郡，“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19]。在魏明帝任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护羌校尉后，徐邈花费了很大气力才初步治理出一个头绪。

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20]

进入西晋，先是“凉州之乱”，使武威、金城一域又受到破坏。接着地方豪强又乘衅闹事，如“燉煌太守尹璩卒，州以燉煌令梁澄领太守事。议郎令狐丰废澄自领郡事。丰死，弟宏代之”[21]。直到咸宁二年（276），凉州刺史杨欣才平定了令狐家族的割据活动，将令狐宏“传首洛阳”。其他郡县也有类似问题发生。在张轨到凉州后，河西区域仍很不安宁。

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22]

在河西暂时安定后，张轨在“尊晋攘夷”的方针和“保宁域内”的原则指导下，开始了一系列施政，其具体举措有以下几点。

举措之一是重整凉州政治。

“拔贤才”是张轨政治举措的首务。张轨将“拔贤才”的立足点牢牢放在河西著姓一边，他“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23]。“宋配，字仲业，敦煌人。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华竞。”[24]开始，张轨委任他为司马，后擢为西平太守。自宋配起，宋氏一门在前凉政府中累世为官，如宋纤、宋矩、宋混、宋澄等都很显赫。氾瑗、阴充、阴澹也都是敦煌籍的河西大族，氾瑗任张轨中督护，阴澹后为敦煌太守。阴氏一门气势甚盛，有记载说：“（张）轨保凉州，阴澹之力。”受张轨辟召的阴氏子弟很多，名见经传者有阴监、阴浚等。此外，自汉以来，“累世官族”的令狐家族和羌族酋豪北宫也受到张轨的隆遇。令狐亚任凉州别驾，令狐浏任治中，北宫纯为凉州的长史（后降前赵）。

张轨深知，河西的稳定，非仰仗河西著姓不可。因此，不惜用高官厚禄和崇礼卑辞罗致其中的代表人物，甚至屈驾枉顾，受拒于柴扉而不悔。如氾腾（一作氾胜），字无忌，敦煌人，举孝廉，除郎中。值天下兵乱，去官还乡里。“柴门灌园，琴书自适”，张轨征之为府司马，他谢绝说：“门一杜，其可开乎？”[25]

受张轨征聘者中，以敦煌籍官僚居多。因此可以说前凉的肇基是安定官僚和敦煌官僚缔结政治联盟的结果。进入前凉政权的敦煌官僚视张氏为晋室的象征，对张氏家族竭尽忠诚。宋氏家族从宋配到宋矩，再到宋混，历仕前凉早、中、晚三个时期。屡挽张氏政治于危难之中，不惜身家性命。如宋混及其弟宋澄，当永和十年（354）张祚“僭称帝位”时，率其部曲聚众讨逆。粉碎张祚势力后，又与另一个篡逆者张瓘争，“瓘兄弟强盛，负其勋力，有篡立之谋。辅国宋混与弟澄共讨瓘，尽夷其属”[26]。最后，宋混等终因受到嫉恨而被“树党专权”的张邕灭族。

张轨依靠河西著姓势力，也不拒绝流徙河西的中原冠带。自永熙到永嘉，中州兵乱，秦陇倒悬，饱经忧患的西晋显贵和黎民百姓都将河西看作躲避战乱的好地方。如洛阳的太常卿挚虞对其友人讲：“今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其唯凉土乎？”[27]为逃避战乱，许多官僚携家渡陇，投靠张轨。“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28]。张轨妥善安置他们，举其贤者，委以重任。如陈留江琼，原任晋冯翊太守，“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29]；另如杜骥，“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地河西，因任张氏”[30]。这样一来，西州官僚势力又与中州官僚势力结合起来，前凉的政治基础也因此更加坚实。需要指出的是，像杜预这样的家族，无论其族姓阀阅的高贵，还是官爵势力的显赫，抑或文韬武略的成就，在西晋朝野都属一流。杜骥一门在前凉任职者有杜勋等，整个家族在前凉灭亡后才重返关中故里。在凉州共历四世，而四世为官。如杜骥兄杜坦自谓：“本中华高族，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业相承，不殒其旧。”[31]像杜氏这样的家族投靠张轨，使前凉政权更有代表性和号召力。而且由于这些家族都有学术根基，也壮大了河西的士林队伍。所以，胡三省注《通鉴》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32]

张轨时期的选举沿袭了魏晋旧制，即实行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制。刺史部初建，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并下令：

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临危

殉义，杀身为君；忠谏而婴祸，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谄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33]

“有司”系指各郡县行政部门，“具状”即具其“品状”。在选举原则上，除重门第和官历外，根据名实两方面的要求，分志、才、忠、孝、节、义、雄、勇等项计资定品，尤重视“忠”“义”“节”传统。

初，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太守以叛，郡人冯忠赴尸号哭，呕血而死。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后为太尉庞参掾，参、贤相诬，罪应死，各引咏为证，咏计理无两直，遂自刎而死，参、贤惭悔，自相和释。轨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孙。[34]

张轨“以儒学显”，深受儒家思想教育，在讲求名教治国上与西晋如出一辙，当西晋乱亡时，他强调忠、义、节，并贯穿于选举，从眼前看，能召唤更多亡官失职的官僚团结在西晋的旗帜下共赴国难；从长远看，一旦西晋亡国，则可凝聚“晋民”的力量，同仇敌忾，实行保据。另外，遵循传统也符合河西“世笃忠厚”的民风民俗，有助于争取民心。因此“拔贤才”使“州中父老莫不相庆”。[35]

张轨将忠、义、节作为选举标准，对前凉政治的顺利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一方面，张轨以其对晋室的忠诚而备受中央信任，获得专制一方的权力。他遣主簿令狐亚觐见南阳王司马模，“模甚悦，遗轨以帝所赐剑，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36]这等于为前凉划定了疆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大姓势力预谋颠覆张轨而搞的政变活动，也因忠臣义士节烈者纷纷挺身而出与仗义执言，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如永嘉三年（309），张轨患风痹，其子张茂摄领州事后发生的几次颠覆事件，都因颠覆者失道寡助而化解。第一件事是张镇之变。

酒泉太守张镇潜引秦州刺史贾龛以代轨，密使诣京师，请尚书侍郎曹祛为西平太守，图为辅车之势。轨别驾麴晁欲专威福，又遣使诣长安，告南阳王模，称轨废疾，以请贾龛。而龛将受之。其兄让龛曰：“张凉州一时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龛乃止。更以侍中爰瑜为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驰诣长安，割耳盘上，诉轨之被诬，模乃表停之。[37]

第二件事是张越之变。

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谶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越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阴图代轨，乃遣兄镇及曹祛、麴佩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表越为刺史。[38]

这次事变闹得沸沸扬扬，连张轨都难以自持，派主簿尉髦入长安请求朝廷准许自己去官而归老宜阳。在此情势下，群僚纷纷劝谏：

长史王融、参军孟畅蹹折镇檄，排阎入谏曰：“晋室多故，人神涂炭，实赖明公抚宁西夏。张镇兄弟敢肆凶逆，宜声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轨嘿然。融等出而戒严。武威太守张琠遣子坦驰诣京，表曰：“魏尚安边而获戾，充国尽忠而被谴，皆前史之所讥，今日之明鉴也。”[39]

有些话言真情切：

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于赤子，百姓之爱臣轨，若旱苗之得膏雨。伏闻信惑流言，当有迁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摇动一方。[40]

在张琠等支持下，张轨以子张寔为中督护，率兵讨镇。又派遣张镇的外甥令狐亚晓谕张镇说：“主公西河著德，兵马如云”，“今数万之军已临近境，今唯全老亲，存门户，输诚归官，必保万全之福”[41]。张镇流涕痛哭，悔恨不已，于是，诿罪功曹鲁连，将其斩首谢罪于张寔。王融、孟畅、张琠、令狐亚反对政变，支持张轨，一方面说明凉州士民不愿再看到凉州出现动乱，另一方面也说明张轨实行的政策颇得人心。

举措之二是弭平河西鲜卑的反晋军事活动，并选择姑臧为政治、军事中心。

永宁元年后的凉州，“凉州之乱”的大规模战事已经结束。早在咸宁五年（279），树机能领导的河西鲜卑主力部队已被马隆击垮，树机能本人也被马隆杀掉。但“凉州之乱”的余波并未完全平息，是张轨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永兴中（304～306），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42]

弭平河西乱事后，张轨吸取以往胡烈、牵弘等对“羌胡”民族“不善抚驭”的教训，收编鲜卑余部，组织成驰名天下的凉州“胡骑”，用于勤王护驾和南征北讨。

为了利用河西走廊的地理优势和实现控摄长远的战略意图，在驱逐了占据姑臧的鲜卑势力后，张轨立即进驻姑臧。姑臧，西汉前期是匈奴休屠王领地。

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43]

匈奴称此城为“盖藏城”。河西四郡设置后，姑臧成为河西走廊东部咽喉。它北临大漠（腾格里沙漠），南接南山（祁连山），东有洪池岭（乌鞘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之物产丰富，人文繁殷，在凉州刺史部设置后，这里一直是河西走廊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曹魏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多年兴治，“立学明训”，文教也发展起来。嘉平中（249～254），武威郡学正式在姑臧设立，“郡官果起学馆，筑双阙于泉上，与东门正相望矣”[44]。张轨进驻姑臧，不仅掌握了河西走廊锁钥，而且尽拢了凉州地利人文条件，为后来前凉保据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张轨之后，姑臧城几经扩建。张茂永元元年（320）至永元三年（322），根据“王公设险、武夫重闭”的政治和战略原理，“大城姑臧”[45]。又筑灵钧台，张骏时再修谦光殿。[46]姑臧城和谦光殿除作为前凉政府中枢所在之外，也是后来后凉、南凉、北凉的军政重地。张骏时期，随着政治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姑臧城内已是楼台殿阁鳞次栉比，论道有闲豫堂，迎宾有宾遐观，飞檐斗拱，雄伟壮丽。加上佛寺塔庙，学馆书屋以及稠密如织的店肆、军营、民宅，成为真正的军政要镇和名城大都。而这一切，都肇自张轨。

举措之三是尊奖西晋王室。

尊奖西晋王室是张轨确立的一项基本政治原则。从张轨起，它由一系列举措体现出来，并持之以恒，影响到后世。特别是晋怀帝永嘉（307～313）年间，由匈奴人刘渊和羯人石勒发动的北方民族反晋军事活动步步高涨，西晋王朝将要被摧毁之际，张轨更对晋室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忠诚。永嘉元年，“王弥起兵反，寇青、徐二州”，而“并州诸郡皆为刘元海所陷，刘琨独保晋阳”；二年，“石勒寇常山”，“刘元海侵汲郡，略有顿丘、河内之地；王弥寇青、徐、兖、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许昌，诸郡守皆奔走。五月甲子，弥遂寇洛阳”，“冬十月甲戌，刘元海僭帝号于平阳，仍称汉”。[47]截至永嘉四年前，刘聪、王弥、石勒的军队横扫中原和关东大地，西晋诸镇望风披靡。永嘉四年（310），石勒大军进抵洛阳。“京师饥，东海王越羽檄征天下兵。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时莫有至者。”[48]此时，唯有凉州张轨在为晋怀帝效命。永嘉二年，王弥围攻洛阳，张轨出兵勤王：

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濬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帝嘉其忠，进封西平郡公，不受。[49]

到永嘉四年，西晋危在旦夕，“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朝廷嘉之，屡降玺书慰劳”[50]。这时洛阳城中因物资极端匮乏而陷入绝境，如史所载，“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51]当着西晋王公大臣死散流离而晋怀帝嗷嗷待哺时，张轨仍恪尽职守。

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52]

在洛阳被刘曜攻破后，张斐、郭敷等都为晋室殉难。直到晋怀帝被刘曜俘获押解到平阳（今山西临汾），张轨与其臣僚仍执忠不已，冀望以一州之师保全西晋。史称“太府主簿马鲂言于轨曰：‘四海倾覆，乘舆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必当万里风披，有征无战。未审何惮不为此举？’轨曰：‘是孤心也。’”[53]实际上，西晋在中原的统治已入尾声，大厦将倾，孤木难支。

永嘉七年（313），晋武帝之孙秦王司马邺在雍州贾疋及凉州麹允拥戴下，在长安建立流亡政府。张轨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立即做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反应：

又闻秦王入关，乃驰檄关中曰：“主上遘危，迁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丧气。秦王天挺圣德，神武应期，世祖之孙，王今为长。凡我晋人，食土之类，龟筮克从，幽明同款。宜简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舆，折冲左右。西中郎（张）寔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琠胡骑二万，骆驿继发，仲秋中旬会于临晋。”

俄而秦王为皇太子，遣使拜张轨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固辞。[54]

这次凉州拟派步骑七万匡扶晋室，声势之大可想而知。后来宋配所率军队因秦州刺史裴苞与东羌校尉贯兴“拒险断使”，不得不中途用于对裴、贯作战，后继部队也因此不能成行。虽然如此，也给初即位的晋愍帝以很大安慰。下诏琅琊王司马睿，指令他借“凉州刺史张轨乃心王室，边旗万里，已到汧陇”[55]的声势，传檄扬、雍、梁诸州遣军入辅。当此

之时，张轨已病入膏肓。晋怀帝以张轨年老功高，在建兴元年（313）再遣使封拜张轨为镇西大将军、西平郡公，进位司空，张轨仍“固让”不受。第二年，晋愍帝再遣大鸿胪陇西望族辛攀“拜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56]。

张轨病逝前，除留下“弘尽忠规”的遗令外，还遗嘱其子孙府佐俭为善后：

> 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逊，以听朝旨。[57]

张轨死后两年，西晋长安政权被刘曜摧毁。从此，从河西出陇右的道路被前赵切断，加之巴蜀由成汉李雄割据，当建武元年（317）东晋在江南立国时，前凉已难以和东晋取得政治联系，张轨确立的“尊奖晋室”原则，也逐渐变为一种政治象征。

张轨以尊奖西晋王室为基本政治原则和举措，这适应西晋末年北方政治总体形势发展的要求。因为当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时，垂危中的西晋政府便成了“晋民”所能寄托民族凝聚力的唯一偶像，即所谓的“正朔所在”。这使它统治的腐朽性、垂死性因蒙上民族战争的血光而呈现某种光泽，有了一定感召力和激励性。“尊奖晋室”也因此而产生唤起汉族民众的作用。如张寔叔父张肃所说，这叫“狐死首丘，心不忘本”[58]。有这样的道理在内，纵然后来“尊奖晋室”已徒具其仪，成为外交策略，但张氏仍对它锲而不舍。如张寔，在西晋覆亡前夕还派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并按诏示“率众以援京城”[59]。另外，当驻在陇右的南阳王司马保谋称尊号时，张寔非但不受假命，反派蔡忠奉表去江南向司马睿劝进。

张轨的政治举措之四是平定分裂割据活动和抑制地方豪强。

当永兴二年张轨受晋惠帝晋封为安西将军后，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州藩镇，他有权力为西晋“戡乱伐叛”和对“图谋不轨”者兴师问罪。而张轨也夙夜匪懈，从西晋王室和地方利益两方面着眼，平定了一次次在陇右和河西发生的分裂割据活动。

首先是平定秦州之乱，发生在任安西将军的当年。是年五月，西晋以张辅为秦州刺史。张辅到秦州后，“杀天水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陇西太守韩稚。稚子朴勒兵击辅，辅军败，死”[60]。由张辅擅杀而引起的韩稚造反，使陇右政局动荡，并将演成分裂割据。在此形势下，少府

司马杨胤建议张轨兴兵讨韩。杨胤指出："今稚逆命，擅杀张辅。明公杖钺一方，宜惩不悛，此春秋之义。"张轨按照杨胤建议，"遣中督护氾瑗率众二万讨之"[61]。出兵之前，先作书对韩稚晓以大义，指出：

> 今王纲纷扰，牧守宜勠力勤王。适得雍州檄，云卿称兵内侮。吾董任一方，义在伐叛，武旅三万，骆驿继发。伐木之感，心岂可言！古之行师，全国为上，卿若单马军门者，当与卿共平世难也。[62]

韩稚见书后归降，使陇右避免了分裂和兵刃。

其次是平定发生在永嘉四年的湟中之乱。此前，张越、张镇兄弟颠覆张轨的图谋因令狐亚的规劝而作罢。事后，西晋命令张轨诛除割据西平的曹祛，消灭叛乱势力。曹祛惊恐，逃出西平。张轨命张寔率尹员和宋配带步骑三万追歼，并部署从事田迥和王丰带八百轻骑从姑臧西南绕道而出，先占据长宁（今青海西宁市北），以截断曹祛退路。曹祛使部下麴晁与田、王拒战，自己则率部向东突围。这时张寔所率凉军主力已暗中绕过浩亹并在破羌一举击溃曹祛，"斩祛及牙门田嚣"[63]。湟中局势暂时稳定。

张轨还平定了胡瑁、裴苞、麴儒等的分裂割据活动。

当司马邺播迁长安时，金城太守胡瑁反叛。张轨遣都护宗毅、治中令狐浏讨伐。据说渡河时有白鱼跃入船中。"浏曰：'鱼，鳞物。虏必解甲归我矣。'瑁果请降，轨宥之。"[64]此前，张轨派往长安"翼卫乘舆"的宋配也受阻于秦州刺史裴苞和东羌校尉贯兴。而曹祛余党麴儒等再次生事，强迫前福禄县（治今甘肃酒泉市）令麴恪为首，劫持酒泉太守赵彝，响应秦州裴苞，试图与裴苞等东西呼应，实现割据。为解除来自东、西两翼的威胁，张轨下令宋配、阴预等讨伐裴、贯，另命张寔由湟中回师，讨伐麴儒。宋配、阴预击溃裴苞，而张寔也平定了麴儒，将"元恶"六百家徙离故地。

张轨死后，因张寔和张茂兄弟名威尚轻，河西域内地方豪强势力颠覆张氏和武断乡曲的事屡有发生。张寔兄弟贯彻其父"抚宁域内"的方针，在镇压分裂割据活动之外，对豪强大姓势力的反抗活动也雷厉风行地进行镇压。如张寔六年（318）镇压了发生在姑臧的阎沙之乱，张寔亦因之而死。

> 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

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沙、仰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65]

张茂有鉴于"亡兄怛然，失身于物"，在加强姑臧城防之外，对一些有野心的豪强势力则加大力度予以打击。杀贾摹便是其中一例：

凉州大姓贾摹，（张）寔之妻弟也，势倾西土。先是，谣曰："手莫头，图凉州。"茂以为信，诱而杀之。于是豪右屏迹，威行凉域。[66]

张轨对由一些地方官僚和豪强势力发动的分裂割据活动所采取的镇压措施，有的是为维护西晋统治的"一统性"，有的是为了强化自己家族在凉州的政治地位和威望，但客观效果是积极的，因为它有助于实现政治稳定和区域的安宁，也有助于防微杜渐，使整个河西在后来数十年中保持完整统一。

张轨的政治举措之五是振兴文教和倡导教化。

前凉从西晋派生出来，而西晋是以"名教治国"的。另外，张轨及其支持者又大都为儒学名流，深知儒家思想对维系封建政治所起的作用。因此，从一开始，张轨便视振兴教育与倡导教化为其治理凉州的根本。他"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67]。崇文祭酒相当于文学祭酒、儒林祭酒等，是州级学官。在国学则称国子祭酒或博士祭酒。"百官表注曰：博士祭酒一人，掌国子学"[68]，"齐职仪曰：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生"[69]。张骏时，"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70]；张祚时，曾"以安车束帛征（郭荷）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还，祚许之，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71]当晋末大乱，学校制度已陷废弛之际，张轨在凉州设立学馆，延师明训，又立制崇文祭酒"位视别驾"，享受"从刺史行部，别乘传车"[72]的殊荣，这表示了他文教兴邦的壮志和移风易俗的决心。他深知下述道理：

古之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将以节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习与性成也。是以忠孝笃焉，信义成焉，礼让行焉。尊教宗学，其致一也。[73]

虽然，张轨将教育和培养士族子弟列为学馆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征聘名士入馆执教，无疑也会对弘扬学术文化起到促进作用，有助于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域的传播，有助于保存中原文化和提高河西区域文明程

度。

张轨不仅立学，而且劝学。“行乡射之礼”是劝学的方式。汉代太学行此礼：“后汉质帝本初元年，诏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春秋辄于乡射月一会，有劝勉进用之端。于是游学者增至三万余生。”[74]

张轨振兴教育和倡导教化的举措，为其后世及其余诸凉的兴文理学树立了典范。由于张轨将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将“文治兴邦”和“教化齐俗”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加上察举和征辟以忠、节、义为选格，从而将文教与前凉初期的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既培养了大批封建人才，也使河西一步步走向安定，河西文化也繁荣起来。所以，北魏时期有人称赞张轨尊教崇学的功劳和遗惠说：

> 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75]

张轨的政治举措之六是设置侨郡县，接纳和安置中原流民。

自晋惠帝永宁元年中原陷于战乱，到晋怀帝永嘉中匈奴和羯人起兵，黄河中下游成为军阀军队和民族酋豪的骑兵纵横驰骋的疆场，广大汉族和内徙民族的平民百姓横遭屠杀，惨遭蹂躏。在锋镝之余，大量百姓辗转流离，过着国非国而家非家的生活。在中原人口纷纷为躲避战乱向淮南、江南、巴汉、辽东等区域迁徙时，张轨坐镇的凉州也成为中原流民瞩目的地方。特别是官僚和士人，他们带着对自己身家性命的忧虑，希望找到一块“遗种”之地。因为河西远离乱源，再加上张轨倡名教与兴政治的活动，中原人对河西更加向慕。

> 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76]

因此，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中，“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77]。

为了安置避难者，张轨到凉州不久便上表西晋政府：

> 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78]

张轨设立侨郡县之举，比后来东晋政府在淮南、江南采取的同样举措要早十多年。中原流民大量迁徙到河西，对河西经济的开发，对前凉

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张轨死于晋愍帝建兴二年（314），死时六十岁。他治理凉州十三年，是前凉封建割据政治的奠基人，也是五凉政权的开创者，他的活动卓有成效，受到史家赞誉。

第二节 割据局面的演成

张轨死后，子张寔及其弟张茂先后摄理州事。

张寔及其弟张茂摄理凉州政务时期，前凉政权的封建割据政治局面逐步演成。封建割据局面演成有两个方面的历史原因，一是中原政治形势的变化，即由北方少数民族反晋军事活动而导致的西晋王朝覆亡；二是河西政治形势的变化，即张寔、张茂继续强化张氏家族对河西的保据，以陇为界，形成与前赵政权的对峙。

张寔，字安逊，张轨长子，他“学尚明察，敬贤爱士”[79]，因自幼随父亲生活在洛阳，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政治影响。他早年以察举入仕，自秀才为尚书郎。“永嘉之乱”发生后受西晋政府委任为骁骑将军。正当中原饱罹战乱，士民百姓纷纷避乱外逃之际，张寔也力辞骁骑之任，请求追随父亲到凉州任职。西晋政府批准他的请求，将他“改授议郎”[80]。到凉州后，他受命镇压内乱，诛曹祛，“徙元恶六百余家”[81]，因功受晋怀帝分封，为建武亭侯。不久，转为西中郎将、福禄县侯。永嘉五年（311）后，其父张轨患风痹病不能主政，由他代理凉州政务。摄政期间，惧有人滋事，隐密其父病情，“闭绝音问，莫能知者”[82]。在晋愍帝即位长安后，他受任为西中郎将，领护羌校尉，第二年（314），张轨病故，他以世子名分被凉州官僚推尊摄理凉州政务，继而正式受晋愍帝册封，为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郡公。建兴二年，成为张轨政治的合法继承人，在位前后五年（314～319）。

张茂，字成逊，张寔母弟，他“虚靖好学，不以世利婴心”[83]。晋愍帝即位，南阳王司马保征辟他为从事中郎，继而推荐他担任黄门散骑侍郎和中垒将军等职，均被他推辞。建兴二年，晋愍帝征他为侍中，接着又策任他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命他主持雍州军政，而他以父亲年迈久病为由，一并拒而不受。当大兴三年（320）张寔被阎沙等谋杀后，“左司马阴充等，以寔子骏冲幼，宜立长君。州人乃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但受使持节平西将军、行都督凉州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84]。在位共五年（320～324）。

张寔以张轨世子嗣位，这是州府政治转为家族政治的开端。

张寔嗣位时，西晋政权已处在崩溃前夕。建兴二年，刘曜军队连续对关中实行游击战术，使西晋守军鞍马劳顿，疲于奔命。“六月，刘曜、赵冉寇新丰诸县，安东将军索琳讨破之”，“秋七月，曜、冉等又逼京都，领军将军麴允讨破之”。[85]到建兴三年六月，刘曜军队盗挖西汉霸、杜二陵；十月，攻占冯翊。

面对西晋将亡的形势，张氏兄弟必须在“报国”与“宁家”中进行选择。张茂借口父亲老病，不应晋愍帝征召到秦雍去为官，便是一种选择。而张寔作为张轨的继承人，其选择的难度就更大些。首先，他不能不遵从父亲遗命，继续“弘尽忠规”。这一点，他是做到了。有两件事可以说明。第一件是送玉玺事。

> 张寔元年（314），兰池长赵爽上言：军士张冰于青涧水中得一玉玺，钳钮，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群僚上贺称德。定曰：“孤常忿袁本初拟肘，诸君何忽有此言！”乃送之于京师。[86]

胡三省为此事作注说：“晋诸征、镇能知君臣之分者，张氏父子而已。”[87]第二件是派王该勤王和入贡事。建兴四年（316），“寔遣将军王该帅步骑五千入援长安，且送诸郡贡计”[88]。后王该所率凉州军队与镇军将军胡崧合兵，在长安城西担任防御，直到城破。鉴于张氏父子执忠不贰，晋愍帝在投降刘曜的前夜，下诏张寔寄以重托说：

> 君世笃忠亮，勋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凭赖。今进君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琊王（指司马睿）宗室亲贤，远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悬，朕以诏王，时摄大位。君其挟赞琅琊，共济艰运。若不忘主，宗庙有赖。明便出降，故夜见公卿，属以后事，密遣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赍诏假授。临出寄命，公其勉之！[89]

当然，在“弘尽忠规”之外，鉴于西晋亡国而琅琊王司马睿又“远在江表”的形势，张寔还必须做出自己的打算，即积蓄力量准备对付刘曜的西侵。这决定了张寔不能不对政治方略做出某些改变，使其更带有凉州本位性和家族利益性。从主观上说，张氏的割据倾向就从这里滋生。西晋亡国时张寔的政治、军事决策也在朝这个倾向发展。这同样有几件事可以说明。

第一件事是“竞自尊树”。在给晋室送玉玺的次年，即嗣位的第二年初，张寔下令：

> 忝绍前踪，庶几刑政不为百姓之患，而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窃慕

箴诵之言，以补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陈孤过者，答以筐篚；谤言于市者，报以羊米。[90]

贼曹佐高昌隗瑾进言说：

圣王将举大事，必崇三讯之法，朝置谏官以匡大理，疑承辅弼以补阙拾遗。今事无巨细，尽决圣虑，兴军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谬阙，则下无分谤。窃谓宜偃聪塞智，开纳群言，政刑大小，与众共之。若恒内断圣心，则群僚畏威而面从矣。善恶专归于上，虽赏千金，终无言也。[91]

张寔以“增位三等，赐帛四十匹”褒奖了隗瑾。此事反映出三层含义，一是张寔罪己，意在邀取令名。罪己缘由，他自陈是为“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实则表明他要将“尊晋攘夷”转移到内修政理方面。二是张寔已按“建邦命氏”的程序和礼仪处理“国事”，高昌隗瑾“圣王将举大事”揭示了这一点。三是张寔时，州府权力已完全集中在张氏家族手中，“兴军布令，朝中不知”，“群僚畏威而面从”。[92]

第二件事是保存实力，并强化陇右防务。史载：

建威将军、西海太守张肃，寔叔父也，以京师危逼，请为先锋击刘曜。寔以肃年老，弗许。肃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钟仪在晋，楚弁南音。肃受晋宠，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倾覆，肃宴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寔曰：“门户受重恩，自当阖宗效死，忠卫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气力衰竭，军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闻京师陷没，肃悲愤而卒。[93]

张寔不许张肃为晋赴难，而当长安使臣史淑等抵达姑臧后，又借口天子蒙尘，不拜晋使；得知晋愍帝已被刘曜俘往平阳，大临三日延稽岁月，才派遣太府司马韩璞和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阆、前锋督护阴预等率步骑一万，会同陇西兵马同赴国难，但又戒令韩璞“督五将兵事当如一体”，不得有违机信，不得有乖异之闻。与此同时，张寔又传信给南阳王司马保，陈述自己的苦衷，说“孤州远域，首尾多难”，又说此前派贾骞等带军增援，而军未渡陇闻朝廷倾覆，并表白说：“为忠不达于主，遣兵不及于难，痛慨之深，死有余责。今更遣韩璞等，唯公命是从。”[94]另外，他放出风声说韩璞在南安与断路的羌人相持百余日，粮尽矢尽，杀驾牛饷军后，兵士奋力战斗，直到张阆率领金城军队赶到才打败羌人。如此云云，无非是造成一种不是不出兵赴难，只因鞭长难及的舆论。至于羌人为何挡道，张阆为何在受命出军百余日后才率领金城军队抵达南安，还有为何戒令韩璞统军不能有所“乖异”等，这一切都是

机密，故语焉不详，难以为外人道。但稍加分析，便知其中隐情。其实，不许张肃出兵，一是因张肃为张氏宗室，且年老偏执，只知“为人臣”之道，而不懂“全门户”之理。许其出兵，定然是有去无还，损兵折将。分析张寔所说“户门受重恩，自当阖宗效死”的话语，肯定是受到张肃有关指责后，在为自己申辩。说完了事，并不见诸行动。另外，派韩璞统率陇西兵马向东，旨在集结军队，形成陇右防线，以备东境不虞，主要是为防御司马保西进和刘曜西侵。向司马保解释“兵不及难”的原因，正在于掩人耳目，免招疑惑，此所谓“兵者，诡道耳”。

总之，在西晋亡国之际，张寔已在推行“保据”策略，故对“勤王”表现得非常消极。这一态度给鹄企西望的长安士民带来极大失望和悲凉。刘曜军队的杀戮，加上陇右又有焦崧、陈安聚众进行骚扰，“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95]，失望之余，长安百姓作民谣说：“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96]到西晋亡国时，张寔政治上的转变最终得到了印证。

第三件事是遥尊司马睿与近拒司马保。张寔四年（317），焦崧、陈安的军队进攻上邽，南阳王司马保派使者向张寔求救。张寔以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率领威远将军宋毅以及和苞、张阆、宋辑、辛韬、张选、董广等人，率步骑二万前往支援。行军到新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接到愍帝在平阳被杀的消息。张寔因愍帝有“挟赞琅琊”的遗诏，加上张诜等又说南阳王司马保有“谋称尊号”的野心，建议他从速上表江南，劝司马睿即位，于是，张寔派牙门将蔡忠为使节，往建康献表。第二年，司马睿即位，是为东晋元帝，改元大兴，而“寔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改也”[97]。在愍帝被杀后，司马保也在上邽称晋王，并署张寔为征西大将军。但不久，司马保被陈安逐出上邽逃往祁山（今甘肃西和县西北）。继而韩璞驱逐陈安，迎司马保重返上邽。如此反复，司马保先后两次向张寔乞师，张寔两次派兵相助。第二年刘曜发兵攻陇右，司马保无力抵挡。准备投奔河西时，张寔却“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动物情，遣其将阴监逆保。声言翼卫，实御之也”[98]。未几，司马保被其将张春、杨次所杀。死后，其部众一万余人逃到凉州投奔张寔。

张寔奉表劝司马睿即帝位，但又不尊用东晋大兴年号而仍称“建兴”，这一方面表明他仍做西晋遗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对“尊奖晋室”的原则和举措已有所修改。表面上帮助司马保，实际上拒纳南阳王司马保入河西，是担心司马保会取代自己家族的地位，给保据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对待司马家族各支势力的不同态度和措置，表现了敬而远之

的策略，这个策略在后来的割据政治中还有发挥和使用。

客观形势是西晋灭亡后，凉州孤悬于西陲，并与前赵刘曜政权形成对峙。从张寔主观上说，司马保死后，除“遥尊东晋”，与东晋建康政权保持名分关系之外，很难说在政治上还有什么宗藩之别。

为上述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所决定，张寔时期，前凉政权已步入政治割据时期，史家所谓“寔自恃险远，颇自骄恣”[99]，正是对其政权性质发生变化的点睛之笔。而崔鸿撰《十六国春秋》，所录政权依据的标准是所谓：“自晋永宁以来，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100]张寔时期，在“竞自尊树”与“建邦命氏”上，是完全够格的。应当说，张寔是前凉割据政治的实际缔造者，从张寔起，前凉跻身于十六国之列。

张茂嗣位后，进一步发展家族政治，发展割据事业。他安内与攘外并举。对内，严厉镇压叛乱颠覆势力，诛杀阎沙及其党羽数百人，又诱杀凉州大姓贾摹。对外，进一步强化东线防务，抵抗前赵进攻，而与东晋基本上无什么政治联系。

张寔被刺在大兴二年（319）六月。在此前的二月，刘曜已称皇帝，并定都长安，继而改国号为赵，是为前赵。同年十一月，石勒在襄国称赵王，是为后赵。黄河流域已成分裂之势。刘曜即位于长安后，前赵军队开始对长安以西地区发动扫荡。时南阳王司马保驻上邽，他集结关陇兵力，并联结秦陇氐羌和屠各胡，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一线与赵军对垒。但不久即遭焦崧和陈安的进攻而失败，接着，自己也被张春、杨次刺杀。

所以，张茂主政的前三年（320～322），前凉东部形势并不严峻。当时，陈安占据着上邽，刘曜则忙于兴理内政和抵抗石勒，也附带经略仇池。并且陈安和刘曜之间也时有战事。张茂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占据了原由司马保控制的陇西、南安两郡，将防御前线放在韩璞军队驻扎的冀城（今甘肃甘谷县南）。及至其主政的第四年（323）六月，刘曜攻破陈安占领的陇上诸县并发兵向凉州推进时，由陇西、南安、冀城构成的三角形防线已能发挥有力的牵制和防御作用。

张茂保据和防御政策的初步成功，证明前凉“自成战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只是还需要进一步整顿内务以扩充实力。为此，他又运用权变策

略麻痹刘曜，向刘曜“遣使称藩，献马、牛、珍宝不可胜纪”[101]，而刘曜拜张茂太师、凉王。这样，“遥尊晋室”的虚伪性暴露无遗，而前凉割据的真实性却昭然若揭。

第三节 前凉的强盛

一 张骏的政治

张骏及其子张重华在位时期（324～353），是前凉政权的强盛时期。

张骏，字公庭。他“幼而奇伟。建兴四年，封霸城侯，十岁能属文，卓越不羁，而淫纵过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国中化之”[102]。公元324年张茂死，他以张寔世子名分嗣位，时年十八岁。

张骏嗣位前，天下局面已是四分五裂。北方，除前凉占有河西和陇西以外，关陇以东辽阔的黄河流域为前赵和后赵所瓜分；南方，成汉割据巴蜀，而东晋建号江南。总的形势是南北对峙和相邻政权间互相对抗，民族矛盾与政治矛盾交织在一起，纷纷扰扰，兵戈不息。就张骏而言，受命于乱世，君临于弱国，年轻气盛，涉世不深。采取怎样的策略处理好内外关系，使家族利益兴盛不衰，使前凉霸业兴旺发达，这将是一个严峻考验。当然，这也是令张茂难以瞑目的事。张茂临死，曾拉着张骏的手哭嘱说：“吾先人以孝友见称。自汉初以来，世执忠顺。今虽华夏大乱，皇舆播迁，汝当谨守人臣之节，无或失坠。”[103]这点，张骏能否做到呢？后事证明，张骏并没有辜负乃祖乃父，他以非凡的韬略和魄力将前凉政权一步步导向兴旺强盛，写出了前凉霸史中最为雄宏的一章。

张骏的政治活动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展谋略外交，积极推进王权政治。

他鉴于叔父张茂生前“官非王命，位由私议”[104]，以致死后只能以平民礼仪入葬，想到这样下去将群臣不服，而等待东晋给自己册封，向东的道路又被前赵阻断，那么，怎么办呢？于是，他想到了利用早先晋愍帝派来的使臣史淑，指示氾祎和马谟暗示史淑“封拜”自己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105]按西晋制度，使持节对郡太守以下官吏有生杀之权，大都督得都督中外诸军，大将军位列三公之上。同时，“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106]。通过史淑做戏，张骏既为自己正了名分，又取得了专制一方和辟署官吏的权力。

接着，他下令“赦其境内，置左右前后四率官，缮南宫”[107]。“四率官”即四卫率府官员，是皇权规模。“晋武帝建东宫，置卫率，初曰中卫率。泰始五年，分为左、右卫率，各领一军。惠帝时，愍怀太子在东宫，又加前后二卫率”，“凡太子出，前卫率导在前黄麾，左、右二率从，使导舆车，后卫率从，在乌皮外，并带戟执刀”[108]。这些事说明，张骏借“事晋”为名，以史淑为道具，导演的却是王权化的政治剧目。

与此同时，为了赢得兴理内政的时间，张骏对前赵也卑辞修好，并对成汉实行睦邻外交。初嗣位，即接受刘曜给他的“大将军、凉州牧、凉王”等虚号。接着，在326年派使者到成都，“使聘于李雄，修邻好”[109]。同是一个执顺修好，但策略意图却不尽相同。对成汉，带有连纵的用意，即劝说李雄事晋，以结成东晋、成汉、前凉三者间的军事同盟，共同对付前、后二赵。这恰合李雄之意。史载，当张骏写信给李雄，劝李雄去掉尊号称藩于晋时，李雄复书说：“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在暗室，有何已已。”[110]“骏重其言，使聘相继”[111]。但对刘曜，不过是虚与委蛇，执顺的背后，则在紧锣密鼓部署防务。他在表示接受刘曜封号的同时，又指派宋辑和魏纂带领军队到陇西和南安，将居住在两郡界内的两千多户人家搬迁到姑臧，将两郡地带完全变作军事防区，准备对前赵军队作战。当然，对刘曜表面上的执顺还有另一番用意，那就是缓和矛盾，赢得时日，以便偃文修武，待机而动。对此，史书记载甚为明确。

> 遣参军王骘聘于刘曜。曜谓之曰：“贵州必欲追踪窦融，款诚和好，卿能保之乎？”骘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来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骘曰：“齐桓贯泽之盟，忧心兢兢，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会，骄而矜诞，叛者九国。赵国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迟，尚未能察迩者之变。况鄙州乎！”曜顾谓左右曰：“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礼而遣之。[112]

王骘说了实话，执顺无非是暂时伏爪以待，不能保证日后不奋戈一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骏嗣位时前赵国力正盛，对付强大的后赵也游刃有余，对付前凉就更不在话下。刘曜考虑到后赵的威胁，才决定对张骏实行安抚。张骏当然无必要招惹刘曜以自取战祸。说到底，张骏与刘曜都在行缓兵之计。就张骏而言，一旦疆场形势对前赵不利，他会立刻转变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如325年夏，后赵出动步骑四万，由石虎统率进攻前赵的中原地区，并在洛阳城北的石梁戍重创前赵军队，迫使

刘曜一步步撤退到关中。石梁之战，石虎俘虏了前赵中山王刘岳及其将佐八十余人及氐、羌三千余人，后在襄国坑杀前赵士卒数千。“遂攻王腾于并州，执腾，杀之，坑其士卒七千余人。曜还长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愤恚成疾”[113]。张骏闻刘曜军为石勒所败，便去其官爵，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114]

通权达变，是张骏的性格特点。他颇识时务，能及时地调整和修改对外政策，使它更适应前凉霸业的需要。因此，最初他的谋略性外交和积极推进王权政治的活动，只是他将家族利益与政权利益统筹考虑而采取的一个步骤，也是将前凉割据政治导向兴盛的开端。

二是审时度势，实行稳固防守的保据战略。

在推进王权政治的同时，张骏也静观形势，创造条件以图进取。前赵石梁之败后，他做了一次东进的尝试。327年，派出由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领的四部兵马数万，与冀城韩璞合兵，“攻讨秦州诸郡”[115]。前赵则由刘胤率领步骑兵四万迎战。刘胤抢先占据狄道（今甘肃临洮县），给前凉洮水一线造成一定压力。洮水流域的河南地区，张骏之前曾为割据者辛晏盘踞。张骏嗣位后，招降了辛晏，委任其为枹罕护军。至此，辛晏向张骏告急，张骏调韩璞、辛岩二军援救。刘胤虽先发制人，占据了优势，但总兵力少于前凉军，只要速战，前凉军定会获胜。但韩璞却说：“夏末以来，日星数有变，不可轻动。且曜与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与我相守也。”[116]结果，前凉军与赵军夹洮水相持七十余日，反造成自己军粮不继。入冬以后，韩璞派辛晏分兵去金城调运粮食，又给了刘胤一个有利机会。刘胤派冠军将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断绝辛晏运道，自己则率骑兵三千在沃干岭（今兰州市南之阿干岭）突袭并击溃辛晏军，接着进逼韩璞。

> 璞众大溃。胤乘胜追奔，济河，攻拔令居，斩首二万级，进据振武，河西大骇。张阆、辛晏帅其众数万降赵，骏遂失河南之地。[117]

本来，这是一次带有“攻讨”和“攻掠”性质的进攻，有壮大前凉声势的意图，最终却因主帅贻误战机而损失惨重。它教训了前凉君臣，使之认识到前凉力量有限，不可能逾越陇西防线去逐鹿中原。想霸业有成，只能效法窦融，立足河西，扩充势力，图谋发展。当张骏明白了这点后，自此再不向东用兵。直到前赵灭亡时，他才乘机收复了河南地区，

然后：

> 置武卫、石门、候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与（石）勒分境。[118]

此举将南安、陇西与湟中联结起来，构成一道沿洮水向西联结甘松（今白龙江北）、西强山（今西倾山），连通西平郡的弧形防线，带山河以为固，稳步推行保据河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

三是休众息役，兴理刑政。

对前赵的防御及河南之役，前凉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河南之役的失败，不仅劳民伤财，也引起了臣僚的非议。有人批评张骏不顾民生，导致“顷年频出，戎马生郊，外有饥羸，内资虚耗”[119]。当时的姑臧一带确实常闹饥荒，这种形势使张骏不得不考虑休众息役。

公元329年，外部形势暂时出现了对前凉有利的变化。由于中原战场上前赵对后赵作战接连失败，刘曜不得不抽调长安守军用于中原战场。张骏虚张声势，“大搜讲武，将袭秦雍”[120]，但本意是借此观察一下内外动静。果然，左右都不赞同出兵。理曹郎中索询还指出，再动刀动枪只能重蹈失败的覆辙，是违背民心的。这话得到张骏首肯。

> 骏曰：“每患忠言不献，面从背违，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尽辞规谏，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礼之。[121]

自此，张骏用不着再考虑因是否尽心东晋“王室”而招非议，他专心致志地经营起前凉霸业了。从329年开始，他在政治、经济、外交、文教等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轻刑纳谏，勤修庶政。公元329年，西域诸国向张骏朝贡，“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122]。自前凉肇基以来，西域通贡这是第一次。然而，西域长史李柏却造谣说戊己校尉赵贞谋叛，要张骏准他平叛。这样一来，赵贞果然叛变，并切断了西域道路。群僚认为这是措置不当所致，又“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123]。张骏借口霸业初展，正是用人之秋，赦免了李柏，并用秦穆公和孟明的故事开导群臣，“竟以减死论，群心咸悦”[124]。以此为开端，下令轻刑，命令说：“昔鲧殛而禹兴，芮诛而缺进，唐帝所以殄洪灾，晋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亲不得在朝。今尽听之，唯不宜内参宿卫耳。”[125]原来，汉魏旧律有父母犯死罪子女“禁锢”之条，晋初

定律令已省去“禁锢”[126]，但因凉州僻远，又乱事较多，并未照晋令执行。张骏借李柏事予以改定，除带有“轻刑”用意外，还表明前凉也在推进法治。由于这个改定对官僚及其亲属有好处，而休众息役也有益于民生，故张骏时期有“刑清国富”之称。

张骏虽性严猛，但善于纳谏，他多次命群僚极言得失。334年，当霸业已成时，他召集群僚在闲豫堂议政，又讨论严刑峻制问题，参军黄斌说：“臣未见其可。”张骏问其故。黄斌回答：“夫法制所以经纶邦国，笃俗齐物，既立必行，不可洼隆也。若尊者犯令，则法不行矣。”[127]意思是说法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上行下效。当政者和其亲属如不遵守法令，法令再严也无用。张骏认为黄斌批评得很对，拔擢他为敦煌太守以示褒奖。史称：

> 骏有计略，于是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128]

张骏勤修庶政的措施之一是安定民生，减轻百姓负担。330年，河西境内再次发生饥荒，谷价踊贵。围绕如何赈饥问题，群臣展开讨论。市长谭详主张将仓谷贷与百姓，秋后三倍征还。从事阴据不同意这样做，他说：

> 昔西门豹宰邺，积之于人；解扁莅东封之邑，计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赏，扁有功而可罚。今详欲因人之饥，以要三倍，反裘伤皮，未足喻之。[129]

张骏采纳了阴据的意见。当然，采纳阴据意见不是贷粮不收利息[130]，但肯定会减轻一些百姓负担。

措施之二是正名统与立储君。324年，经过近十年苦心经营，张骏建邦命氏的时机已经成熟。333年，群僚劝张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131]。张骏虽推辞了这次劝进，“然境内皆称之为王”[132]。接着，群僚又请张骏立世子。中坚将军宋辑对张骏说：

> 礼急储君者，盖重宗庙之故。……建兴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统，况今社稷弥崇，圣躬介立，大业遂殷，继贰缺然哉！臣窃以为国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为安踰泰山，非所谓也。[133]

张骏按宋辑意见立子重华为世子。

其二，派遣使者，通表东晋。324年张骏即位时，东晋在江南立国已逾七年。但张骏按父祖遗规，不尊东晋正朔，仍用西晋建兴年号。324年（东晋明帝太宁二年）即建兴十二年，时晋元帝司马睿已死去一年，由于河西通江南之路间阻，直到建兴十三年春张骏才得到死讯。当时手下人报告说有黄龙见于揖次（今甘肃古浪县北）之嘉泉，右长史氾祎乘机提议改年号，对张骏说："案建兴之年，是少帝（晋愍帝）始起之号。帝以凶终，理应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问隔绝，宜因龙改号，以章休征。"[134]张骏虽未采纳改元"龙兴"的建议，但他也并不恪守为臣之道。当时姑臧流传的一首谣谚说："鸿从南来雀不惊，谁谓孤雏尾翅生，高举六翮凤皇鸣。"[135]意思是纵然传来东晋的王音，但张骏却不诚惶诚恐。谁说他是一只羽翼未丰的雏鸟，他是一只正翻飞于云际、冲腾于九霄、放声鸣叫的凤凰。

张骏时期，前凉对东晋的政策早由此前的政治和军事大势所规定。在"尊崇晋室"的历史传统和"合纵"御侮的策略并行不悖的情况下，张骏也高举"尊晋"的旗号，以掩盖彼此平等的合纵关系。他深知，完全或不完全遵守传统，都会对自己的建霸活动带来影响。在这种传统与现实既统一又矛盾的情况下，他只能对东晋朝廷采取若即若离的外交策略。他通表东晋却不用东晋正朔，正表明了这点。通表东晋，先要打开南下的通路。当此之时，出陇右经关中南下的路早被后赵阻断，向石勒借道无异与虎谋皮。可行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取道汉中。这需要求告成汉主李雄，向其假道；由于张骏嗣位的第二年已与李雄"修邻好"，李雄也表示愿称藩东晋，假道应当顺理成章，但事实上却不然。在333年前张骏派傅颖等到成都谈判此事，李雄都不同意。多次碰壁之后，张骏在333年再派治中从事张淳去成都，"称藩于蜀，托以假道焉"[136]。张淳富有辩才，他利用李雄与仇池国主杨初的矛盾，游说李雄道：

> 南氐无状，屡为边害，宜先讨（杨）百顷，次平上邽。二国并势，席卷三秦，东清许洛，扫氛燕赵，拯二帝（指西晋怀帝和愍帝）梓宫于平阳，反皇舆于洛邑，此英霸之举，千载一时。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险通诚，不远万里者，以陛下义声远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图之。[137]

不料，李雄对这"二国并势"之语十分反感，他表面答应借道，暗中命人将张淳抛入东峡（今成都岷江）淹死。幸得蜀人桥赞及时相告，张淳揭穿李雄阴谋才免于一死。事后，李雄问张淳："贵主英名盖世，土险

兵盛，何不称帝自娱一方？”张淳回答：“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众庶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娱邪！”李雄面带惭色说：“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都，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州者，亦当率众辅之。”[138]

这样，前凉终于开通了凉州通江南之路，还进一步增强了与成汉的联盟关系。张淳从成都返回河西后，“募兵通表，后皆达京师”[139]。

此前，东晋也在设法与前凉取得联系，派出耿访为正使、陇西人贾陵等十二人为副使的使团出使河西。耿访原为张寔时期的敦煌计吏，建兴二年张寔使王该向长安送诸州贡计时，耿访随行，在从长安返凉途中，因道路被前赵军队切断，耿访逃往汉中，“因东渡江，以太兴二年至京都，屡上书，以本州未知中兴，宜遣大使，乞为乡导。时连有内难，许而未行”[140]。直到晋成帝司马衍以耿访为使，耿访才得以偿夙愿。他到梁州后，驿道又中断，在襄阳一停就是七年。后东晋召他回建康，他将东晋朝廷加封张骏的诏书交给贾陵。贾陵装扮成商人，先到长安，然后辗转西行，到东晋咸和八年（333）抵达姑臧。这时，张淳招募南下的使节刚出发。

凉晋双方历尽曲折，总算实现了彼此的政治往来。但对张骏来说，这种往来只是幌子。因此，当贾陵向张骏传达东晋朝廷的诏命后，“骏受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并遣陵归，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141]。此后，东晋在334年再派耿访到河西封张骏为大将军，“自是每岁使命不绝”[142]。但这种往来已纯属一种礼仪性活动了。在张骏方面，对东晋的态度甚至不如对后赵那样恭肃。他在与石勒分境后，“惧勒强，遣使称臣于勒，兼贡方物”[143]。但对东晋，只是“往来”而已。尽管如此，以当时大势论，通表东晋十分必要，因为它召唤起汉族士民的民族心理，使更多的人“注心于大凉”，实现了强敌压境时的同仇敌忾。从战略上讲，还能实现东西呼应，与东晋互为犄角，一旦受到后赵威胁时，可借助东晋牵制敌人，减少正面压力，同时还可给成汉政权造成一定压力，使其在凉赵之间保持中立。尤为重要的是，张骏虽以保据河西为基本国策，但他并不忘向东扩展势力，虽然客观形势不允许他做这种选择，然一旦时机到来，他转守为攻时，与东晋配合行动，就可连旌万里，水陆并进，长驱中原。对最后这一点，张骏抱有莫大期望。如他在石勒和李雄相继死后的336年，派参军麹护给晋成帝司马衍

上疏述志说：

> （石）勒、（李）雄既死，人怀反正，谓（石）季龙、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继凶逆，鸱目有年。东西辽旷，声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喧哗……
>
> 臣闻少康中兴，由于一旅，光武嗣汉，众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况以荆杨慓悍，臣州突骑，吞噬遗羯，在于掌握哉！愿陛下敷弘臣虑，永念先绩，敕司空（郗）鉴、征西（庾）亮等泛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144]

全篇疏文洋洋千言，既有对司马衍“天挺歧嶷”的赞谀，又有对其“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的批评，还有自己“宵吟荒漠，痛心长路”的慨叹，中心意思是希望东晋政府理解他光复中原的壮心，给予军事的配合和支援，让他能一改“遐域僻陋”的局面，大展“势极秦陇”的宏图。总之，假道于蜀以通表东晋，是张骏割据政治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一点连后赵石虎也清楚。在凉晋“往来”后，石虎下令加强秦陇一带的戍守，盘查行人，缉拿前凉使臣，“自后，骏遣使多为季龙所获，不达”[145]。337年张骏最后一次遣使通表：

> 骏十三年，骏又遣护羌参军陈寓、从事徐虓、华驭等至京师。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言陈寓等冒险远至，宜蒙铨叙，诏除寓西平相，虓等为县令。[146]

此后直到张重华继位第三年（348），才有东晋使节俞归到凉州。

其三，向西拓展，经营西域。

汉魏以来，西域诸国受戊己校尉管辖，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西晋时，戊己校尉寄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终西晋之世，由于凉州乱事频繁，政府实际上无暇顾及西域事务。张轨、张寔及张茂时期，因未受命主理西域，又因忙于凉州内务和东向勤王，使西域隔塞的形势进一步发展。

张骏嗣位后，东线防御获得成功。随着王权政治日渐强大，沟通河西与西域的联系显得越来越有必要。

329年，即张骏嗣位的第六年，西域诸国向前凉通使纳贡一事促使张骏开始注意西域问题。“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147]，张骏拟击赵贞，指使西域长史李柏“造谋”[148]，并准李柏对赵贞用兵。李柏“造谋

致败”后，张骏为掩盖事情真相，对李柏“竟以减死论”，并将西域事暂时搁置。延至331年，张骏终于兵出阳关，对赵贞兴师问罪，并一举将其擒获。当年，张骏在戊己校尉治地高昌壁设立高昌郡。

前凉高昌郡的设置，结束了历代中原王朝只使用军事手段统辖西域的历史，而开了以行政方式管理西域的先河。这一措施实行后，汉族文化圈向西延伸，同时也使边塞西移到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以及西域与中原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高昌郡的设置，也为前凉经营西域准备了前提。345年，张骏“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149]。有记载说，杨宣派出的前锋部队在张植率领下，当年六月到达流沙（今新疆东部沙漠）。由于炎热缺水，士卒口渴难行。“植乃剪发肉袒，徒跣升坛，恸泣请雨。俄而云起西北，雨水成川。植杀所乘马，祭天而去。”[150]当然，这只是传说。

张骏经营西域，结束了晋初以来西域阻绝的局面。第二年，西域诸国朝觐张骏。“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151]从此，西域成为前凉割据政权的管辖区域之一。

抚平西域的当年，张骏重划疆域和行政，将原先仅有凉州一州的行政建置改变为凉、河、沙三州建置。

> 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汉中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张骏假凉州都督，摄三州。[152]
>
> 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153]
>
> 跨据三州，带甲十万，西包昆域，东阻大河。[154]

综上所论，张骏时期所采取的保据策略和行政措施适时有效，这些举措与“境内渐平”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形成前凉步入强盛的主客观条件。作为强盛的标志，则是张氏霸业的真正确立和封建王权体制的奠定。339年，张骏“立辟雍、明堂以行礼。十一月，以世子重华行凉州事”[155]。自345年起，张骏再将建邦命氏的活动一环扣一环地展开，他“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等官，官号皆仿天朝，而微变其

名；车服旌旗拟于王者”[156]。

为了强本固内和保障世袭制实行，张骏除将京畿军政大权交给张重华外，还任命张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并领三署郎从”[157]。又根据《禹贡》所示方位，从酒泉太守马岌所请，在酒泉南山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158]。

至此，张轨、张寔及张茂等在河西的政治经营和割据事业有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二 张重华的政治

张重华，字泰临，是张骏次子，他“宽和懿重，沉毅少言”[159]。张骏死时，他年仅十六岁，由国子祭酒右长史任处等拥戴，称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又“赦其境内。尊其母严氏为太王太后，居永训宫；所生母马氏为王太后，居永寿宫”[160]。从而发展了前凉的王权政治。

张重华以幼冲袭位，君临前凉的强盛局面。他假三州之地，拥十万雄兵。袭位之初，胸怀壮志，思有匡革。他“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161]，在安定民生和发展经济上有所作为。

本来，张骏初期采取过休众息役措施，这对发展生产有积极意义。当“境内渐平”局面出现后，前凉域内理应有政通人和、内外有蓄的殷富景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张骏时期，一方面是士马强盛，另一方面却是“外有饥羸，内资虚耗”[162]。所谓的“刑轻国富”不完全名副其实。导致公私贫困的原因，一方面是自张轨以来“所在征伐，军无宁岁”，另一方面是频繁地兴动劳役，进行大规模营建，还有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也加深了百姓的困苦。

频繁的土木营建是由张茂发端的，他扩大姑臧城，筑灵钧台，诸凡设险重防，无不巍峨险峻，一应宫阙楼台，尽皆雕镂刻饰，既劳民，又伤财，造成府库虚竭，加重了百姓负担，也引起天怒人怨。张茂修灵钧台时，就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 武陵人阎曾夜叩门呼曰：“武公（指张轨）遣我来，曰：‘何故劳百姓而筑台乎？’”……太府主簿马鲂谏曰：“今世难未夷，唯当弘尚道素，不宜劳役崇饰台榭。且比年已来，转觉众务日奢于往，每所经营，轻违雅度，实非士女

所望于明公。”[163]

浩大的工程，有些是为了割据政治的需要，有些则完全是为满足王者奢靡生活之需。如张骏修谦光殿，大事铺张，穷极珍巧，主要为“任所游处”。他修闲豫堂，堂前开闲豫池，池底饰以五龙，日出见形，移时乃灭，波光水色相映，只是为了游玩和显示王者气象。

前凉时期屡有自然灾害发生，这是因为河西寒冷干燥，生态条件不良。称为凉州，因“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164]。故自汉世以来“河右少雨，常苦乏谷”[165]。张寔以后，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如314年前后，“比年饥旱”[166]。319年有地震[167]。324年有风灾，“正月，黄雾四塞”[168]。从张骏嗣位到张骏七年（330），“境内尝大饥”[169]。而326年曾有霜灾，“九月，雨冰，状若丝纩，皆著草”[170]。各种自然灾害的交相侵袭，给前凉政治造成严重影响。

由于人祸天灾不断，自张寔以来一方面前凉的霸业日渐形成，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在日渐萌生。如张寔自己曾说：“忝绍前踪，庶几刑政不为百姓之患，而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171]到张重华袭位时，王权政治的强盛与人民生活的贫困已形成鲜明对照。而且，张重华袭位后，后赵主石虎又频繁调动军队，加大了对前凉的威胁。这种种原因，不能不促使张重华采取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以安定人民生活和拓宽经济来源。

张重华“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的举措，就是上述形势下的产物，它带有缓和域内矛盾及笼络民心来抵御外部进攻的用意。

张重华时期，对外举措主要是抵御后赵。

公元329年，后赵军队占领上邽，杀前赵太子刘熙及诸王公侯与将相卿校以下三千多人，最终摧毁了前赵政权。从此，后赵隔陇山与前凉对峙。开始时，后赵拉拢张骏，派使者孟毅授张骏以官爵，但张骏“耻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172]。330年，后赵发生匈奴休屠部落叛变事件，叛变者被石生击溃后，其部落首领逃奔凉州。张骏害怕后赵借此生事，便释放后赵使臣孟毅，同时派出“长史马诜称臣入贡于赵”[173]。事实上，后赵摧毁前赵之后，并不以前凉为意，而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东晋和前燕。张骏见后赵无西进之意，便渐生倨傲之心。当340年再派马诜入贡时，因“辞颇蹇傲”而惹怒了石虎。石虎要斩杀马诜，但最终仍接

受其侍中石璞劝说，未弄僵与前凉的关系。石璞的话代表了此时后赵的基本战略。他说：

> 为陛下之患者，丹杨也。区区河右，焉能为有无！今斩马诜，必征张骏，则南讨之师势分为二，建邺君臣延其数年之命矣。胜之不为武，弗克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图谢罪，率其臣职者，则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讨之未后也。[174]

石虎以穷兵黩武著称，他对张骏的姑息只有三年。从343年起，他开始对河西用兵。当年派征西将军张伏都（疑为孙伏都）“与麻秋率步骑兵三万长驱济河，且城长最。重华大惧，遣将谢艾逆击，败之，秋退归金城”。[175]次年夏，后赵将领王擢再次统军西进，遭到张瓘阻击，赵军再败于三交城。[176]这两次战役拉开了后赵对前凉大规模进攻的序幕。张重华袭位后，石虎派王擢、麻秋、张伏都等“侵寇不辍”。[177]这种形势，迫使张重华不能不把其主要精力投注在抵御后赵进攻上。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张重华在安定民心的同时，还重用贤臣良将。他首先选拔优秀的年轻将领谢艾为全军统率。

谢艾，官居凉州主簿，他“兼资文武，明识兵略”[178]。346年，由牧府相司马张耽推荐给张重华。这一年，后赵兵分两路进攻前凉河州。一路由王擢率领，直扑河南，攻占武街（今甘肃岷县西南），俘虏护军曹权和胡宣，造成张骏与后赵分界的五屯护军防线崩溃。王擢强迫狄道和武街一带的七千多户凉民徙往雍州。另一路赵军由麻秋与张伏都率领进攻金城，金城太守张冲坚守待援。张重华急派西域校尉张植与奋威将军刘霸率骑兵救援，援军未到，金城失陷，张冲与金城令车济都成为赵军俘虏。车济忠直刚烈，麻秋招降他，软硬兼施，“济辞色不挠，曰：‘吾虽才非庞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杀，志不可移。’乃伏剑而死”[179]。武街和金城的相继失陷，使前凉境内人心震恐。张重华调集全境军队，委任征南将军裴恒为帅御敌。裴恒怯战，将军队驻扎在广武（今甘肃永登县）而不前进。在“强寇在郊、诸将不进”[180]的危殆关头，张耽推荐谢艾。他慷慨陈词，阐述将领的重要性，远引燕王任用乐毅，近以韩信、穰苴、吕蒙、魏延等见拔于行伍为例，主张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他说：

> 盖明王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能，则授以大事。

他担保任用谢艾，“授以斧钺，委以专征，必能折冲御侮，歼殄凶

类”[181]。张重华召见谢艾，问破敌方略，谢艾提出请兵七千，破赵以报。张重华接受其要求，委任他为中坚将军，配给步骑兵五千。果然，由谢艾统领的凉军一出振武（今甘肃永登与兰州之间），便击败麻秋所率赵军，“斩首五千级”[182]。接着，在347年谢艾又两次指挥凉军在河南一线击败麻秋和王擢。谢艾屡破赵军，使后赵主石虎大为伤神，他感慨地说：“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真所谓彼有人焉，未可图也。”[183]后来，北宋苏东坡有感于辽、夏交侵，作《祭常山小猎》诗，引张重华擢拔谢艾之事讽喻朝政说：“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西凉簿”即凉州主簿，指谢艾。“白羽犹能效一挥”指谢艾用兵有诸葛神风。谢艾指挥作战常“乘轺车，冠白韬，鸣鼓而行”。后赵宿将麻秋对此十分生气地说：

> “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矟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伏兵发也，惧不敢进。[184]

用人有气度是张重华的特点。除谢艾外，后来他还不计前嫌，任用被前秦打败而投奔凉州的赵将王擢，对王擢“重华厚宠之，以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假节”，“复授擢兵，使攻秦州，克之”[185]。

在善于用人之外，张重华也颇能体恤将士。351年，他以王擢为将，并派张弘与宗悠带领步骑一万五千与前秦作战。“擢等大败，单骑而还，弘、悠皆没。重华痛之，素服为战亡吏士举哀号恸，各遣吊问其家。”[186]由于上述种种举措，张重华的政治颇得人心，不仅将士死战连破劲敌，而且文臣敢言有所匡正。尽管有时他本人对于谏言纳而不改，但能做到谦礼有加和“优文答谢”。如因他“颇怠政事，希接宾客”，司直索遐以严词批评他“文奏入内，历月不省，废替见务，注情于棋弈之间，缱绻左右小臣之娱，不存将相远大之谋。至使亲臣不言，朝吏杜口”，并用“王室如毁，百姓倒悬”之类的尖刻语言刺激他，而“重华览之大悦”。另外，征事索振批评他“章奏停滞，动经时月，下情不得上达，哀穷困于囹圄，盖非明主之事”，他听后也诺诺称善。

总之，因张重华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都有所成就，前凉强盛的局面继而不衰，以致有资本与东晋王朝分庭抗礼。张重华晚年虽上疏东晋政府，大讲“臣守任西荒”及“瞻云望日”之类的话，但当351年东晋使臣俞归到河西委他以凉州牧和大将军之任时，他又不肯受诏，并指使亲信沈猛向俞归讨价还价说：“我家主公奕世忠于晋室，而不如鲜卑矣。台加慕

容兟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将军，何以加劝有功忠义之臣乎！明台今宜移河右，共劝州主为凉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专之可也。”[187]俞归这时也只能用华夷有别进行搪塞，而不敢擅自做主。

353年，张重华死，时年二十四岁，在位首尾八年。[188]

第四节 前凉衰亡

一 政治的衰落

前凉政权从肇基到最后灭亡共经历七十六年时间（301～376）。七十六年中，共经历九位统治者。张重华前四主：张轨、张寔、张茂、张骏。其后四主：张曜灵、张祚、张玄靓、张天锡。如同所有的封建政权一样，它前期艰辛，中期强盛，后期衰落，最终由衰落走向灭亡。它的发展也符合一个通常的规律，那就是强盛的局面一旦形成，腐败乱亡也就由此开始。

从张重华之子张曜灵起，前凉国是日非，政治江河日下，各种社会矛盾都暴露出来，又演成一连串内乱。而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朝政的荒废，是造成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

统治集团的腐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奢靡无度，二是荒淫残暴。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本性所在，这两个方面从割据局面形成起就在滋生，而张曜灵之后有加无减，形成积重难返之势。

奢靡无度的表现是滥为挥霍物质财富。

前凉政权建立在河西经受长期动乱以后，因百废待兴，一些土木营建逐渐上马，后愈演愈烈，如张轨时修筑姑臧城，带有兴废理乱用意，并且出于设立州府行政的需要；到张茂“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则是为了巩固家族利益，带有了劳民伤财的性质，被人斥为“实非士女所望于明公”，“徒见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系托之本心”。[189]张骏生前修谦光殿，“饰以金玉，穷尽珍巧”，造成前凉“内资虚耗”；死时，又违背张轨“索棺薄葬，勿藏金玉”的遗教，隆坟厚葬，随葬物品，无奇不有，则表现出统治者的腐化。后凉吕篡时，胡人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萧、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190]。

奢靡之外，是荒淫和残暴。史称张骏“淫纵过度”[191]，“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奸乱邑里，少年皆化之”[192]。张祚的秽行更有过于张骏，史载其“淫暴不道，又通重华妻裴氏，自閤内媵妾及骏、重华未嫁子女，无不暴乱，国人相目，咸赋墙茨之诗”[19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张玄

靓时期的权臣张邕，“自以功大，骄矜淫纵，又通马氏（重华母），树党专权，国人患之”[194]。张天锡则另有癖好，他宠信嬖人，引其为股肱，甚至不顾惜国统。

> 天锡荒于声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刘肃并以门胄，总角与天锡友昵。张邕之诛，肃、景有勋，天锡深德之，赐姓张氏，又改其字，以为己子。……废（世子）大怀为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为世子，景、肃等俱参政事。人情怨惧。[195]

统治者的奢靡，必然加重人民负担。史家谓张骏修谦光殿，“其奢僭如此，民以劳怨”[196]。其实，从前凉初建，河西百姓即为繁重的徭役和赋税所困扰。张骏不同意谭详盘剥百姓，自己却“以谷帛付民，岁收倍利，利不充者，簿卖田宅”，[197]重演着汉代“倍称之息”迫使农民“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丑剧和悲剧，使“反裘伤皮”之喻成为现实，而“积贤君”的美称却名实有违。张骏以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处在极度的不协调中，一面讲“刑清国富”，一面是赋役不时；一面在奢靡无度，一面是啼饥号寒。张轨、张茂所定的“务安百姓”及“完保百姓”的国策无影无踪，而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多。张重华采取“轻赋敛”和“省园囿以恤贫穷”的措施正是为了改善上述不协调的关系，缓和一下社会问题的困扰。

论及荒淫，历代封建统治集团中人只有小巫大巫之别，但前凉统治集团却独具特点，这一特点很像西晋，就是荒淫往往与残暴共生，又与国家政治相联系。如果说张骏“淫纵过度”败坏了社会风俗的话，那么张祚等则不仅是宣淫内宫，而且借助于后妃谋逆乱政，制造政变和同室操戈。史称张祚“淫暴不道”，正是指此而言。

前凉的张祚之乱和张邕之乱，都与淫暴有直接关系。

353年，张耀灵十岁袭位。因年幼无知，不能主政，由其伯父长宁侯张祚辅政。张祚串通张重华的宠臣赵长和尉缉，策划发动政变。他唆使赵、尉制造“时难未夷，宜立长君”的舆论。[198]又凭借与他私通的张骏妻马氏进行篡权的活动。“祚先烝重华母马氏，马氏遂从缉议，命废耀灵为凉宁侯而立祚。祚寻使杨秋胡害耀灵于东苑，埋之于沙坑。”[199]杨秋胡害耀灵使用的是“拉其腰而杀之”的“拉杀”酷刑。除张祚凭奸得遂夺位之愿外，张邕“树党专权”及制造动乱，也有马氏从中支持。前凉后期，这种淫乱与残暴互为表里，形成的恶性政治事件非止一端。

前凉政治衰落的原因还有张氏统治集团的荒怠政务。

张骏在位时，前凉进入强盛时期。与此同时，张氏统治集团的奋厉之气也在消退，他们或沉湎于声色，或注情于弈棋，不再以国事为念。张骏开了这方面的先河。他不仅立“宾遐观”金屋藏娇，而且经常夜出邑里寻花问柳。谦光殿初建成时，他还能依四时而居，及至晚年，则“任所游处”，极尽园池游宴之乐。张重华继位后，初期励精图治，尚贤任能，并取得防御战争的重大胜利。但不久便生骄情，“自以连破勍敌，颇怠政事，希接宾客”。从此不再听朝议政，不再处理国家大事，如索遐批评的那样，“去贼投诚者应即抚慰，而弥日不接。国老朝贤，当虚己引纳，询访政事，比多经旬积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内，历月不省，废替见务”，“至使亲臣不言，朝吏杜口”[200]。这种苟且怠惰的习气到张天锡时变本加厉，达到顶点。张天锡本人骄恣淫昏，不体察民情，终日与嬖幸作乐，“数宴园池，政事颇废”[201]。“自天锡之嗣事也，连年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化为松，火生泥中。而天锡荒于声色，不恤政事”[202]。有人向他进谏，他不但听不进去，反用自我标榜来解嘲，说什么：

>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飙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203]

仿佛张天锡的纵情山光水色，真像处身于庙堂之上那样。事实上，他并非旷达清高君子，而是残暴自私小人。他不以国家和百姓为念，却耿耿于他的私情。他宠爱阎妃和薛妃，“二姬国色，并不知何许人也”。“天锡寝疾，谓之曰：‘汝二人何以报我？我死之后，岂可更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讳，妾请效死于前，供洒扫于地下，誓无他志。’及其疾笃，二姬皆自刎。”[204]阎、薛二妃以血腥的爱情填了张天锡死后的欲壑。

张重华死后，前凉统治力的下降与张氏统治者的荒怠政务有密切关系。由于荒怠政务，中央政府对政治与军事的控制能力下降，以致权臣窃命，后妃干政，地方军阀势力坐大等种种弊端丛生，酿成后期一连串的动乱和变故。由于荒怠政务，国计民生无人主理，使灾荒不断，农事不修，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演化为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荒怠政务，边备松懈，攻防失措，以致面对前秦进攻，自保乏力。

而且，前凉后期的怠政并非只有张氏子孙如此。当时，居官者多无上进之心，在职者鲜有勤勉之意。敦煌索孚因劝张骏勿治石田被贬为宜禾都尉，他借射箭针砭时势，讽喻怠政官吏。有一次，别人问他为什么

射箭十发九中，其中有无秘诀。他回答说：

> 射之为法，犹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强弱，矢有铢两。弓不合度，矢不端直，虽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称官，万物荒怠，虽有尧舜之君，亦无以为治也。[205]

可见，前凉国力的衰落与后期统治集团的苟且偷安及因循怠惰的风习有直接关系。

二 统治集团的内讧

自张耀灵起，前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纷至沓来。斗争尖锐时，不惜大动干戈，肆行屠戮。所有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及由此酿成的动乱，都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前凉统治元气大损，统治能力削弱，并且河西社会陷入纷扰和不宁。

张祚之乱开了内讧和动乱的先河。

张祚，字太伯，是张骏的庶长子，他“博学雄武，有政事之才”[206]。张骏时，他任延兴太守，受封长宁侯。张耀灵袭位后，他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和抚军大将军名义辅政。

353年，张祚串通赵长、尉缉，又勾结张重华母马氏，废杀张曜灵，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第二年，又经赵、尉等人拥戴，“僭即王位（一作僭越称帝位）于谦光殿，立宗庙，舞八佾，置百官”[207]。并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从而成为前凉历史上第一个行天子之礼，改元建号的统治者。[208]

张祚的“淫暴不道”和废杀自恣，加之他僭即王位后，“凶虐愈甚”[209]，招致前凉朝臣的不满。又加上当时风灾、霜灾的不断侵袭，一般百姓也对他十分愤恨。于是尚书马岌和郎中丁琪向他进谏，引述张氏子弟“累执忠节，远宗吴会，持盈守谦，五十余载”的勋绩，指出“苍生所以鹄企西望”和“四海所以注心大凉”，都是因为前凉“尊崇晋室”和恪守仁义。[210]而张祚却认为马、丁二人忤逆自己，罢免了马岌，诛杀了丁琪。

张祚虽有政治之才，但因他一即位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所以猜忌心很重。他既怕东晋派兵讨伐自己，又怕兵将起来造反。354年东晋

桓温北伐，本来矛头指向前秦，但他接到秦州刺史王擢从陇西传递的情报，听说桓温已进入武关，忧虑“温善用兵，势在难测”[211]，内心很恐慌。又担心王擢会倒戈“反噬”自己。于是，他重新起用马岌，商量对策，并按马岌的主意，派人刺杀王擢，结果被王擢察觉。这样一来，他更加紧张，赶忙调集军队，“声言东征，实欲西保敦煌”[212]。恰在此时，桓温从关中撤走了军队。他闻讯后放弃了西保敦煌的计划，却委任刘霸为秦州刺史，派他与司兵张芳带领三千人讨伐王擢，这样一来，又迫使王擢投降了前秦。王擢受猜忌和降秦一事，搞得前凉将领人人自危，结果激起了张瓘兄弟的反抗。

张瓘自张骏分州以来，一直位居方面，统领重兵。张祚时，任征东将军、河州刺史，坐镇枹罕（今甘肃临夏市）。“祚恶其强，遣其将易揣、张玲率步骑万三千以袭之。”[213]当时有张掖人王鸾假托神道之言，劝张祚不要对张瓘用兵，并揭露张祚“三不道”，[214]竟被张祚以妖言沮众之罪灭族。王鸾临死大呼：“我死不二十日，军必败。”[215]张祚一边派兵东出，一边部署张掖太守索孚接替张瓘。结果，索孚被张瓘杀掉，而张玲的军队未渡黄河也被击溃，易揣则单骑逃回姑臧。接着，张瓘传檄域内废除张祚，要他“以侯还第，复立曜灵”[216]。张祚闻讯后，逮捕张瓘弟张琚及其子张嵩，并急命杨秋胡将耀灵杀掉。张祚还怀疑与自己有嫌隙的骁骑将军宋混及其弟宋澄与张瓘合谋，迫使宋混弟兄出姑臧西逃，接着“招合夷晋，聚众至万余人以应瓘，还向姑臧”[217]。这样，一场内战爆发了。

张祚和平二年（355）九月，宋混军队兵临城下，被张祚逮捕尚未处死的张琚、张嵩乘机招募数百市民在城内发难，“扬言：‘张祚无道，我兄大军已至城东，敢举手者诛三族！’遂开西门纳混兵”[218]。张祚慌忙逃上飞鸾观（一作神雀观），“张琚、张嵩杀祚守卒，死者四百余人”[219]。赵长等惧罪，入后宫，“呼张重华母马氏出殿，立凉武侯玄靓为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长等，杀之。祚按剑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战。祚素失众心，莫肯为之斗者，遂为兵人所杀”[220]。随后，张瓘率军进入姑臧，拥立七岁的张玄靓为凉王，复称建兴四十三年。

张祚之乱历时三年（353～355），由张祚夺位开始，至张祚被诛结束。乱政和战乱是事件的形式，权力之争是事件的实质。张祚夺位后亲小人，重佞臣，妄杀忠良，遭他杀害的除丁琪、王鸾外，还有前凉著名军事家、学者谢艾[221]以及张重华妃裴氏等。他下令废止河西境内祭祀

诸神，对于宗教的传播及文化的发展起了反作用。他下令禁四品以下官员衣缯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车马，造成官僚怨愤。他“又广征兵三十余道，入击南山诸种夷”[222]，“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223]，激化了少数民族与前凉政权的矛盾。

正是张祚的倒行逆施使他人心丧尽。所以当宋混兄弟“招合夷晋”讨伐张祚时，很快便聚合起万人大军。而张琚、张嵩在姑臧城内发难时，也获得市民的支持。张祚被枭首暴尸时，“国内咸称万岁”。[224]在一定意义上，正义在反张祚一方。

由于张祚乱政问题是通过军事方式解决的，因而给河西造成了一定纷扰。战争在姑臧发生，死伤数百人，致使人心震骇，市井骚动。更重要是在平定张祚之乱后，各“中兴”勋臣屯军于城内城外，他们人人虎视京华，彼此存有戒心，从此使前凉王畿不得安宁。

所以，张祚之乱甫平，张宋内讧又接踵而起。

张玄靓从被捧上国主之位起，便是个傀儡。由于他只有七岁，只能受张瓘挟制。张瓘以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又以尚书令、凉州牧辅政。他统兵万余，权倾朝野。他在宫中安插亲信，在朝中“改易僚属”[225]。张玄靓只能唯命是从。

此时，前凉割据局面已危机四伏，首先是东线防务崩溃。本来，陇右由王擢镇守，王擢降秦后，陇右失防。陇西本是前凉的重要防线，但在讨伐张祚时，这里的主力部队被张瓘调往姑臧。这样一来，一些豪族势力有机可乘。张玄靓即位未几，陇右便出现了失控形势。“有陇西人李俨，诛大姓彭姚，自立于陇右，奉中兴年号，百姓悦之。”[226]张瓘派牛霸去讨伐，兵刚派出，西平郡（治今青海西宁市）又发生了卫綝的反叛，西平大族中的田旋游说酒泉太守马基支持卫綝，从而使张瓘陷入东西交困的境地。张瓘兄弟花费很大气力，才将卫綝、马基镇压下去，但陇右却因牛霸失败，形势依旧严重。

在镇压卫、马后，张瓘兄弟更加跋扈，“负其勋力，有篡立之谋”[227]。而且张瓘“猜忌苛虐，专以爱憎为赏罚”。他说：“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须人教也。”史家云：“由是人情不附。”[228]于是，他与宋氏家族的矛盾又激化起来。

此时，宋氏家族也在积极培植势力，酝酿发动政变，诛杀张瓘兄

弟。内讧一触即发。

359年（建兴四十七年，东晋升平三年），是张玄靓即位第五年。这一年，埋葬张耀灵的东苑大坟发生塌陷，“地燃，广表数丈”[229]。张瓘让人言其征兆，执法御史杜逸却提出用“移之他族”的办法来禳灾，暗示张瓘拿宋氏家族开刀。于是，张瓘“征兵数万，集于姑臧，谋讨宋氏”[230]。宋氏家族则先发制人，宋混及其弟宋澄聚合壮士杨和等四十余人，骑马奔入姑臧南城，“申令诸营曰：‘张瓘谋逆，被太后诏诛之。’俄而众至二千”[231]。张瓘急急带兵出战，被宋混击败，手下兵将四散逃亡。他知大势已去，于是自杀身亡。宋混则株连张氏的家族及部下，“尽夷其属”[232]。

诛除张瓘势力后，宋混任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假节辅佐朝政，“兄弟擅权，玄靓虚坐而已”[233]。361年，宋混死，其弟宋澄继续掌权。

张宋内讧之时，凉州境内暴雨成灾。张玄靓四年（358），“六月，大风、震雷、晦冥。宫中雨水深四尺”。过后又久无雨水，“五年六月，大旱，令诸祈雨之官皆咏云汉诗”[234]。凉州百姓生活的疾苦更一步步加深。

早在张瓘专权时，宋氏家族中也有人在为非作歹。如右将军宋熙，他强占姑臧天龟观，改为私宅。[235]但宋混本人清介忠正，他死前，张玄靓及其祖母马氏去探望，他提出不让自己的儿子宋林宗继掌国政。认为即使宋澄掌权，也当“策励而使之”。他还一再告诫宋澄及宋氏子弟，“无恃势位以骄人”[236]。

宋澄的政治才能远不及其兄，他为人“儒缓，机事不称”[237]，掌权后不知防范以右司马张邕为首的反对派官僚，结果仅以领军将军辅政五个月便被张邕推翻。“右司马张邕，恶澄专擅，杀之，遂灭宋氏。”[238]

自宋配起，宋氏家族历仕前凉，竭尽股肱之力，多次拯前凉于危难。宋混死时，“行路为之挥涕”[239]。至此，宗族惨遭张邕的夷灭，族人因这场前凉内讧而凋零殆尽。

张天锡诛除张邕并杀张玄靓，是前凉灭亡前的最后一次内讧。

张邕消灭宋氏势力后，与张玄靓的叔父张天锡共掌兵权，张邕为中

护军，天锡为中领军。

> 邕自以功大，骄矜淫纵，又通马氏，树党专权，国人患之。[240]

张天锡与他的矛盾又随之上升。张天锡的嬖人郭增、刘肃，“并年十八九”[241]，一次就寝中与天锡论及国事，谈到虽然张瓘死于前，宋澄亡于后，但朝中之事并未因此平静。张天锡问他们是什么缘故？郭、刘回答说张邕进出宫门，仿佛当年的张祚。张天锡又问他们该如何对付？郭、刘回答说应当尽速铲除。“天锡曰：‘安得其人？’肃曰：‘肃即是也。’天锡曰：‘汝年少，更求可与谋者。’肃曰：‘赵白驹及肃二人足以办之矣。’”[242]

张天锡大计已定，要诛除张邕。随后他带领从兵四百人，邀请张邕一同入朝，让刘肃、赵白驹簇拥于左右。走到宫门口时，刘肃突然持刀扑向张邕，“肃斫之不中，白驹继之，又不克，二人与天锡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余人反攻宫门”[243]。张天锡登上宫殿屋顶，对张邕的部众大声说：“张邕凶逆无道，既灭宋氏，又欲倾复我家。汝将士世为凉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张邕耳，他无所问！”[244]顷刻之间，张邕军队瓦解散尽。张邕自杀，其宗族随后也被张天锡夷灭。

诛除张邕势力后，张天锡以使持节、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而辅政，时为361年。这一年是建兴四十九年，被他改成升平五年。从此，前凉开始尊奉东晋正朔。

张天锡辅政，仍玩弄张玄靓于股掌之上。363年（东晋兴宁元年）张骏之妻马氏死，张天锡立玄靓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与大臣张钦等密谋铲除张天锡，“事泄，钦等伏法”[245]。张玄靓恐惧，让位于张天锡，张天锡不受。数日后，张玄靓被刘肃等人刺杀，对外却宣布是“暴薨”。

从张祚之乱到张宋内讧，再到张天锡诛除张邕和杀掉张玄靓，这反反复复的内乱长达十年时间（353～363）。此间，前凉朝廷内外除血腥外，毫无文治武功可言。在血腥的杀戮中，张氏宗室及以宋混、谢艾为代表的良臣接连丧命。由于国事无人问津，造成陇右地区因李俨割据而失控；因忙于你争我夺，导致水旱灾害连年肆虐。于是，前凉政权就在这人祸天灾的交互侵袭下走向没落。

三 前秦灭前凉

当前凉政权因一次次内乱国力急剧衰落时，中原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对前凉不利。

本来，由于354年东晋将领桓温率军北伐前秦并挺进关中，前凉曾获得一个向东扩展的机会。当时，秦州刺史王擢主动统兵东进，接应桓温，并攻破陈仓（今宝鸡），杀前秦扶风内史毛难。[246]但是，因为张祚怀疑桓温“势在难测”和顾虑王擢将会“反噬”，派牛霸等发动内战，进攻王擢，从而失掉了这一东进良机。接着，王擢投降了前秦，陇右失防，继而又出现李俨的割据。这等于前凉东部国门已为前秦打开。只是在张玄靓时，前秦因忙于对付东晋和前燕，对前凉一直采取羁縻政策，暂不作进攻。

356年，即张玄靓即位的第二年。前秦派阎负和梁殊出使姑臧。时张瓘用事，他问阎、梁使凉之意，阎、梁回答说是为“修好”，并说：“今大秦威德方盛，凉王若欲自帝河右，则非秦之敌。”张瓘又问，既然前秦很强，为何不先取江南？阎、梁回答说：“主上以为江南必须兵服，河右可以义怀，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达天命，则江南得延数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247]这等于告诉张瓘，前秦早晚要进攻河西，只是眼下还不是时候。张瓘还算知趣，派了使者称藩于秦。

357年，秦王苻坚即位。他任用王猛，大力革新政治，行富国强兵之策。史称：

>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248]

前秦国力上升后，苻坚开始了统一北方的进程。370年，苻坚灭掉前燕；371年，对陇南用兵，灭仇池；373年，攻取东晋梁、益二州。至此，兵锋渐及前凉。

363年，张天锡杀张玄靓自立前，已感受到来自前秦的压力。他在改奉东晋年号的当年，遣使到建康请求东晋朝廷委命，同时护送早在347年（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已到凉州的东晋使者俞归南返，以此结好东晋。同时又与前秦修好，于次年接受苻坚封拜的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官职和爵位。

鉴于日益增大的前秦压力，张天锡虽荒怠政务，却也不得不抽出时

间整顿东线防务。

当时，割据陇右的李俨已投降前秦。张天锡整顿东线防务，先要对李俨用兵。

367年，张天锡兵分四路，讨伐李俨。一路由杨遹统率出金城（今兰州市），一路由掌据统率向左南（今甘肃夏河县境），一路由张统率领趋白土（今甘肃临洮县境），另一路由自己亲自统率，屯驻仓松（今甘肃武威市南）。开始进兵顺利，很快攻下李俨占据的大夏和武始二郡；逼李俨退守枹罕，派侄子李纯向前秦求救。在凉军出师前，陇右发生了一件事：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四千余家羌民在首领廉岐[249]带领下背叛前秦，投靠了李俨。前秦为追回羌人部落，也决定对陇右用兵，并且在凉军未出前，已由王猛、姚苌等统兵七万攻占了略阳。廉岐所带羌部原为姚苌父亲姚弋仲部下，听说姚苌到了略阳，纷纷背叛李俨归属姚苌。廉岐只身逃往武都，投靠了白马氐部。王猛接到李俨的求救信后，带着军队从略阳赶往枹罕，在枹罕东郊与杨遹遭遇。杨部不堪一击，“猛大破之，俘斩万七千级”[250]。接着，王猛布开阵势，与凉军相持于枹罕城下，并且送信给张天锡。信中说，秦军之出本为李俨，不是为和前凉作战。如果两家相持下去，旷日持久，两败俱伤，不是上策。“若将军退舍，吾执俨而东；将军徙民西旋，不亦可乎！”[251]张天锡出兵，本来也不是为和前秦作战，接信后便下令军队西撤。这样，王猛的军队占领了枹罕，李俨也被秦军押送长安。

枹罕遭遇战虽不是前秦进攻前凉的战争，但这次遭遇战使凉军损失惨重，“死者十二三”[252]。重要的是这次遭遇战拉开了前秦灭凉的序幕。枹罕被秦军占领，等于前秦军事势力已深入陇西和河南一带，而前凉东部防线退缩到洮水和黄河口岸。此后，两家在这一带经常交兵，“时苻坚强盛，每攻之，兵无宁岁”[253]。

到371年左右，前凉已危在旦夕。张天锡虽然内心恐惧，但依旧不改恶习。他“荒于声色，不恤政事”[254]，在与嬖人梁景、刘肃等寻欢作乐的同时，又寄希望于东晋，派韩博、康妙奉表于晋，并送盟文给东晋大司马桓温，“克期年夏，誓同大举，都会上邽”[255]。另外，又加大对百姓的征敛，搞得怨声载道，大失民心。少府长史纪端上疏议论时政，谴责张天锡只顾竭泽而渔，而不问鱼之有无。疏文说：

臣闻东野善驭而败其驾，秦氏富强而覆其国。马力已尽，求之弗休；人

既劳竭，役之无已故也。造父之御，不尽其马；虞舜之治，不穷其人。故造父无失御，虞舜无失人。[256]

376年夏，前秦正式对前凉用兵。苟苌、毛盛、梁熙、姚苌等共统领步兵和骑兵十三万，浩浩荡荡向河西进发。有人认为前秦这次出兵规模之大是“戎狄以来，未之有也”[257]。前军刚出，苻坚又派出苟池、李辩、王统带秦、河、凉三州军队为后继。

在出军的同时，苻坚派阎负、梁殊为使者，随同枹罕之役被俘的阴据先期到凉州晓谕张天锡到长安投诚自首。张天锡与臣僚计议何去何从，禁中录事席仂认为应行屈伸之术以缓秦军，建议张天锡以爱子为质，赂以重宝，以退秦师。而多数臣僚认为这是席仂“老怯”之谈，如照办将辜负祖宗，招来奇耻大辱。还有人说“河西天险，百年无虞”，主张倾全境之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抗秦。张天锡采纳后一种意见，下令用乱箭射死阎负和梁殊。事情传至后宫，其母严氏哭着说：

秦主以一州之地，横制天下，东平鲜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犹可延数年之命。今以蕞尔一域，抗衡大国，又杀其使者，亡无日矣！[258]

消息传到前线，前秦兵士人人激愤，加快了进攻步伐。

八月，梁熙、姚苌、王统、李辩等率领的秦军相继渡过黄河，进攻河会城（今兰州市区与永登县之间），前凉骁烈将军梁济降秦。接着，苟苌所率秦军也取道金城渡河，与马建所率前凉主力相遇。马建出身行伍，勇而无谋，张天锡任他为主帅时，西平相赵疑已指出此人“必不为用”。[259]果然，他与苟苌接战便溃退，接着降秦。

当秦军势如破竹进入河西时，掌据所统三万凉军驻守于洪池岭（今乌鞘岭），张天锡所统五万军队驻扎于金昌（今甘肃永昌县北）。掌据想主动迎敌，但迟迟得不到张天锡命令。等待之中，苟苌已率军到达洪池岭。掌据所部被动挨打，很快溃败。掌据不愿只身逃跑，伏剑自杀，老将席仂也力战而死。苟苌挥军翻越洪池岭，前凉将军赵充哲和中卫将军史景等殊死抵抗，又相继战死，姑臧外围部队三万多人也丧失殆尽。当此之时，张天锡再无将可遣，当他自己带兵与秦军交战时，姑臧城内又发生了叛变。在进退失据的形势下，他只得向苟苌请降。“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锡素车白马，面缚舆榇，降于军门”，“凉州郡县悉降于秦”[260]，前凉政权至此灭亡。

自轨为凉州，至天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261]

亡国后，张天锡被苻坚迁往长安。“（苻）坚封天锡重光县之东宁乡二百户，号归义侯。初，（苟）苌等将征天锡，坚为其立第于长安，至是而居之。”[262]张天锡之外，前秦还迁徙凉州豪右七千余家到关中。

383年，前秦南征东晋，张天锡以征南司马之职随苻融出征。前秦军队在淝水战败，他乘机逃往江南，被东晋任为散骑常侍、左员外，并复爵西平郡公。

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及归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国破身虏，多共毁之。会稽王（司马）道子尝问其西土所出，天锡应声曰：“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后形神昏丧，虽处列位，不复被齿遇。隆安中，会稽世子元显用事，常延致之，以为戏弄。以其家贫，拜庐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时，欲招怀四远，乃用天锡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寻卒，年六十一。追赠金紫光禄大夫。[263]

先前，张天锡所立世子张大豫已乘前秦衰亡之际，由长安逃归河西，并招集旧部，图谋复辟，事具《后凉篇》。

[1] 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护羌校尉的时间，《晋书》卷86《张轨传》记作“永宁初”（第2221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第481页）同。而《通鉴》系此事于晋惠帝永宁元年正月（301年），此从《通鉴》（第2650页）。

[2] 《通典》卷25《职官七·光禄卿》：“晋太官令有饧官，果官吏各二人。”（典149上）

[3]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4] 《晋书》卷51《皇甫谧传》，第1409页。

[5]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6] 《晋书》卷51《皇甫谧传》，第1411页。

[7]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8] 《晋书》卷40《杨骏传弟珧附传》，第1180页。

[9]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10]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1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7“晋书二”，中华书局，1984，第152页。

[12] 《资治通鉴》卷84晋惠帝永宁元年正月条，第2650页。

[13] 《晋书》卷5《孝愍帝纪》，第133～134页。按，干宝《晋纪总论》与此略同："武皇既崩，山陵未干，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却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而有免官之谣，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于是轻薄干纪之士，役奸智以投之，如夜虫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纲解纽，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文选》，《艺文类聚》十一，又见《群书治要》二十九，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五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1308页）

[14] 《隋书》卷33《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第964页。

[15]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53页。

[16]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17] 《晋书》卷14《地理志》，第432～433页。

[18] 《三国志》卷16《魏书·苏则传》，第491～492页。

[19]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20]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39～740页。

[21] 《晋书》卷3《武帝纪》，第66页。

[22]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23]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2222页。

[2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第481页。

[25] 《晋书》卷94《隐逸传》，第2438页。

[26]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9页。

[27] 《晋书》卷51《挚虞传》，第1427页。

[28]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29] 《魏书》卷91《术艺传》，第1960页。

[30] 《宋书》卷65《杜骥传》，第1720页。

[31] 《资治通鉴》卷124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七月条，第3927页。

[32]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第3877页。

[33]《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4～2225页。

[34]《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35]《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36]《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3页。

[37]《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3页。

[38]《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3页。

[39]《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4页。

[40]《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4页。

[41]《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4页。

[42]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第482页。按：《前凉录》云永兴二年张轨平鲜卑“大破姑臧”（第482页），若如此，则从永宁元年（301）至永兴二年（305），其间四年时间张轨行政是在金城进行的，张轨在金城祭阳成远之墓事可为旁证。《晋书》卷86《张轨传》记为“大城姑臧”（第2224页）。

[43]《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44]《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45]《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22页。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7引《艺文类聚》云：“王隐《晋书》作‘南北七十里，东西三十里’。按，两‘十’字盖衍。”《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十六国疆域志》，中华书局，1955，第86页（总第4168页）。

[46]《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

[47]《晋书》卷5《怀帝纪》，第116、118页。

[48]《晋书》卷5《怀帝纪》，第121页。

[49]《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3页。

[50]《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3页。

[51]《晋书》卷5《怀帝纪》，第122页。

[52]《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4～2225页。

[53]《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54]《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55]《晋书》卷5《愍帝纪》，第127页。

[56]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57]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58]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8页。

[59]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7页。

[60] 《资治通鉴》卷86晋惠帝永嘉二年六月条，第2708页。而《晋书》卷86《张轨传》载："永嘉初，会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第2222页）

[61]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62]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63]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4页。

[6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引《太平御览》卷935，第485页。

[65]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30页。

[66]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2页。

[67]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68] 《艺文类聚》卷46《职官部二·祭酒》，第829页。

[69] 《艺文类聚》卷46《职官部二·祭酒》，第830页。

[7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0《前凉录》，第502页。

[71] 《晋书》卷94《隐逸·郭荷传》，第2454页。

[72] 《通典》卷32《职官·总论州佐》，典185上。

[73] 《南齐书》卷9《礼志》引曹思文《上东昏侯止废学表》，中华书局，1972，第144页。

[74] 《通典》卷53《礼·大学》，典301下。

[75] 《魏书》卷52《胡叟传》，第1150页。

[76]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77]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78] 《晋书》卷14《地理志》，第434页。

[79]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6页。

[8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8《前凉录》，第487页。

[81]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82] 《魏书》卷99《私署凉州牧张寔传》，第2193页。

[83]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0页。

[8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8《前凉录》，第491页。《晋书》卷86《张寔传》："子骏，年幼，弟茂摄事。"（第2230页）《晋书》卷86《张茂传》："太兴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但受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牧。"（第2231页）

[85] 《晋书》卷5《愍帝纪》，第128页。

[86]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8《前凉录》，第488页。又《晋书》卷86《张寔传》略同（第2227页）。另《晋书·愍帝纪》记永兴三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张寔送皇帝行玺一纽"。（第129页）

[87]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三年十月条，第2826页。

[88]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四年四月条，第2831页。

[89]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8页。

[90]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7页。

[91]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7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8《前凉录》（第488页）同。

[92]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7页。

[93]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8页。

[94]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9页。

[95]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9页。

[96]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9页。

[97]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8《前凉录》，第490页。又《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0页）略同。

[9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8《前凉录》，第490～491页。又《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0页）略同。

[99]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30页。

[100] 《魏书》卷67《崔光传附从子鸿传》，第1503页。

[101] 《资治通鉴》卷92晋明帝太宁元年八月条，第2915页。

[102]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3页。

[103]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2页。

[104]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3页。

[105]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3页。

[106] 《南齐书》卷16《百官志》，第328页。

[107]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3页。

[108] 《通典》卷30《职官·左右卫率府》，典175上。又《晋书》卷24《职官志》（第743页）略同。

[109]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8页。

[110]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9页。

[111]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9页。《通鉴通治》卷93晋成帝咸和元年十二月条："自是聘使相继。"（第2944页）

[112]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3～2234页。又《通鉴通治》卷93晋明帝太宁二年十二月条（第2931页）略同。

[113] 《资治通鉴》卷93晋明帝太宁三年六月条，第2936页。

[114] 《通鉴通治》卷93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条，第2944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9《前凉录》（第496页）略同。

[115]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4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9《前凉录》（第496页）略同。

[116] 《资治通鉴》卷93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条，第2944页。又《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4页）略同。

[117] 《资治通鉴》卷93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条，第2945页。又《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4页）与《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700页）略同。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9《前凉录》谓韩璞部众"死者三万余人"（第497页）。

[118]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8页。另《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和五年五月条胡注（第2976页）。

[119]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20]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21]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22]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23]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24]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25]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26] 《晋书》卷30《刑法志》，第927页。

[127]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0《前凉录》（第500页）同。

[128]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0《前凉录》（第501页）同。

[129]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8页。

[130] 《魏书》卷99《张骏传》谓骏“性又贪啉”，第2195页。

[131]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32]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33]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34]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4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9《前凉录》（第496页）同。

[135]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4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9《前凉录》（第496页）同。

[136]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6页。

[137]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6页。

[138]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又《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39页）略同。

[139]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

[140]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8页。

[141]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9页。

[142]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9页。

[143]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8页。

[144]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9～2240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0《前凉录》（第502页）同。

[145]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40页。

[146]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0《前凉录》，第502页。《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40页）略同。

[147]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8页。

[148]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49]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

[15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0《前凉录》引《太平御览》卷11，第501页。

[151]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

[152] 《晋书》卷14《地理志》，第434页。

[153]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

[154]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引张瓘语，第2874页。

[155] 《资治通鉴》卷96晋成帝咸康五年九月、十一月条，第3036页。

[156] 《资治通鉴》卷97晋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条，第3068页。

[157] 《通典》卷29《职官·中郎将》，典169上。

[158]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40页。

[159]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0页。

[160]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0页。

[161]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0页。

[162]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163]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1页。

[164] 《晋书》卷14《地理志》，第432页。

[165]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39页。

[166]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7页。

[167]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8《前凉录》，第490页。

[16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8《前凉录》，第493页。

[169]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8页。

[17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9《前凉录》引《太平御览》卷877，第496页。

[171]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7页。

[172] 《资治通鉴》卷94晋成帝咸和五年六月条，第2976页。

[173] 《资治通鉴》卷94晋成帝咸和五年九月条，第2978页。

[174]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第2771页。

[175]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第2781页。

[176] 三交城位置不详。《通鉴》卷97晋康帝建元二年四月条胡注谓“三交城在朔方之西”（第3059页）。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谓在陕西宝鸡市西（史为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58页）。二说皆不可信。依后来王擢等的进攻路线看，当在今陇西与兰州之间。

[177]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0页。

[178]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1页。

[179] 《晋书》卷89《忠义传·车济》，第2320页。

[180]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1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1《前凉录》（第505页）略同。

[181]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1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1《前凉录》（第506页）略同。

[182]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1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1《前凉录》（第506页）略同。

[183]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2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1《前凉录》（第507页）略同。

[184]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2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1《前凉录》（第507页）略同。

[185]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4页。

[186]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4页。

[187]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4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1《前凉录》（第510页）略同。

[188] 《晋书》卷86《张重华传》误记张重华之死为“时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第2245页）此据《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辑补》改。

[189]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1、2232页。

[190]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7页。

[191]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3页。

[192] 《魏书》卷99《张骏传》，第2195页。

[193]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6页。

[194]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9页。

[195]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1页。

[196] 《魏书》卷99《张骏传》，第2194页。

[197] 《魏书》卷99《张骏传》，第2195页。

[198] 《晋书》卷86《张耀灵传》，第2245页。按，汤球《十六国春辑补》卷71《前凉录》作张灵曜。

[199] 《晋书》卷86《张耀灵传》，第2245～2246页。

[200]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3页。

[201]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0页。

[202]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1页。

[203]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0页。

[20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3《前凉录》，第522页。又《晋书》卷96《列女传·张天锡二妾阎氏薛氏》（第2522页）略同。

[20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5页。

[206]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6页。

[207]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3页。

[208] “建兴”年号系张轨起至张曜灵止前凉各代沿袭崇奉的年号，张祚为始改元者。张祚被杀，张玄靓即位，“复称建兴四十三年”。张天锡专制国政，从建兴四十九年（公元361年，东晋升平五年）始改奉东晋“升平”年号，此事《晋书》记载甚确。侯灿对此有考证。可参见侯灿《前凉年号新考辩》，《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209]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6页。

[210]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7页。

[211]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7页。

[212]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7页。

[213]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7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4页）略同。

[214] 《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永和十一年七月条，第3148页。

[215]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7页。又《资治通签》卷100晋穆帝永和十一年七月条："鸾临刑曰：'我死，军败于外，王死于内，必矣！'"（第3148页）

[216]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5页。

[217]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5页。

[218] 《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八月条，第3149页。

[219]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5页。

[220] 《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八月条，第3149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谓："祚以（赵）长败贼，下观劳之。""（长）遂奋槊刺祚中额。（易）揣等率众人入殿，收长杀之。祚奔入万秋阁，为厨士徐黑（一作里）所杀。"（第515页）又《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张玄靓"作"张玄靖"。

[221] 《隋书》卷35《经籍志四》所著书目中有《谢艾集》七卷（第1067页），书今不存。

[222]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4页。《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永和十一年七月条谓张祚"使（张）瓘讨叛胡"（第3149页）。

[223]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7页。

[224] 《晋书》卷86《张祚传》，第2248页。

[225]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8页。

[226]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8页。

[227]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9页。

[228] 《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升平三年六月条，第3175页。

[229]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7页。

[23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7页。

[23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7页。

[232]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9页。

[233]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引《太平御览》卷876，第517页。

[23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7页。

[23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6页。

[236] 《资治通鉴》卷101晋穆帝升平五年四月条，第3185页。

[237] 《资治通鉴》卷101晋穆帝升平五年四月条，第3185页。

[238]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9页。另，张邕“遂灭宋氏”之载不确。因西凉时仍有宋氏后裔宋繇为官，可参见《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魏书》卷52《宋繇传》。

[239] 《资治通鉴》卷101晋穆帝升平五年四月条，第3185页。

[240]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9页。

[241]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9页。

[242]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9页。

[243] 《资治通鉴》卷101晋穆帝升平五年十月条，第3187页。又《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9页）及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第518页）略同。

[244] 《资治通鉴》卷101晋穆帝升平五年十月条，第3187页。

[245]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50页。

[246] 《资治通鉴》卷99晋穆帝永和十年三月至五月条，第3139～3141页。

[247] 《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条，第3153～3154页。

[248]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32页。

[249] 廉岐又作“敛岐”。参《晋书》卷86《张天锡传》“校勘记”之一五，第2254～2255页。

[250] 《资治通鉴》卷101晋海西公太和二年四月条，第3204页。

[251] 《资治通鉴》卷101晋海西公太和二年四月条，第3204～3205页。

[252]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1页。

[253]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1页。

[254]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1页。

[25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3《前凉录》，第520～521页。《晋书》卷86《张天锡传》作“六年夏誓同大举”，第2251页。

[256]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3《前凉录》引《太平御览》卷623，第521页。

[257] 《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五月条引周虓语，第3274页。

[258] 《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七月条，第3274～3275页。

[259] 《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八月条，第3275页。又“马建”《晋书》卷86《张天锡传》作“马达”，第2251页。

[260] 《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八月条，第3276页。

[261]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2页。

[262]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8页。

[263]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2页。

〖卷三〗 后凉篇

第一节 后凉立国

一 吕光征西域

后凉是吕光建立的。如同前凉从西晋派生那样，后凉是由前秦派生的。它的建立与吕光征西域有关。

吕光，字世明，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氐人。史书有关其先世的记载是："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父婆楼，佐命苻坚，官至太尉。"[1]吕文和事迹无从考证，恐属附会，但吕婆楼佐命苻坚，史载甚确："婆楼，字广平，佐命前秦苻坚。"[2]苻生即前秦帝位，婆楼为侍中、左大将军。苻坚时，婆楼先为司隶校尉，后至太尉。"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皆有王佐之才，坚并倾身礼之，以为股肱羽翼。"[3]在辅佐苻坚的过程中，婆楼协同王猛，改良前秦政治，加强中央集权，打击氐族贵族保守势力，为前秦政权的强大做出过重大贡献。

据载，吕光生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这是因为333年后赵石虎曾迁徙关中豪杰到关东，吕氏家族与苻氏家族同在被迁之列，后又趁后赵衰乱，随苻洪返回关中。在枋头时，吕光出生。

依上述经历而言，吕光不仅为氐族贵族家庭出身，也是前秦勋望之后。他自幼受封建政治影响，具有谋略和才干。史称吕光：

> 年十岁，与诸童儿游戏邑里，为战阵之法，俦类咸推为主，部分详平，群童叹服。不乐读书，唯好鹰马。及长，身长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宽简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时人莫之识也，惟王猛甚异之。[4]

由于王猛推荐，吕光自察举贤良入仕。在任美阳（今陕西武功县西

南）令期间，宽严相济，颇存惠声，“民夷惮爱，邻境肃清。迁鹰扬将军，以功赐爵关内侯”[5]。

357年九月，原后赵降秦将领张平发动叛乱：

> 据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壁垒三百余，夷、夏十余万户，拜置征镇，欲与燕、秦为敌国。[6]

前秦甘露元年（358）二月，苻坚亲率军队讨张平，吕光从征。张平用全部兵力抵御秦军。铜壁之役，张平养子张蚝骁勇善战，锐不可当，“出入秦阵者四五，坚募人生致之。鹰扬将军吕光刺蚝，中之。邓羌擒蚝以献，平众大溃。平惧，请降”[7]。从此以后，吕光威名大震。

367年，苻坚母弟秦州刺史苻双叛变，占据上邽，割据陇右。时吕光为宁朔将军，奉命与武卫将军王鉴率兵三万前往讨伐。在平定苻双叛乱中，吕光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展示。他看到敌方前锋苟兴来势凶猛，提出“持重以待其弊”的策略。在苟兴因粮竭退兵时，他又提出从速进师，以至于大获全胜，再立功劳。

370年，吕光随王猛讨慕容暐，在灭前燕后，受封都亭侯，继而被任为豫州长史。378年，豫州刺史苻重以洛阳为基地造反，长安大震。有人怀疑吕光会与苻重同谋，而苻坚却深信吕光，他说：“长史吕光忠正，必不与之同。”[8]下令吕光逮捕苻重。吕光按命令将苻重收押并槛车送长安。此后，吕光被调入京城，任“太子右率，甚见敬重”[9]。

从358年到380年，吕光数次为前秦靖难，并屡建奇功。从张平之乱到苻双、苻重、李焉、苻洛之乱，这一次次叛乱的平定，都使他显名于朝，地位节节上升，并决定了他将会出人头地。在平山东后，苻坚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建元十八年（382），他任命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出征：

> （光）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以陇西董方、冯翊郭抱、武威贾虔、弘农杨颖为四府佐将。[10]

吕光受命征西域，成为后凉立国的开端。

本来，从376年秦军灭前凉时起，前秦已接管了西域。但因秦师并未占领西域，前秦对西域实际不具备控摄能力。另外，在灭前凉的最初一段时间，所任凉州刺史梁熙忙于修整内务，无暇顾及西域，而“西障

氐、羌”也不臣服于秦，西域道路并不通畅，政令也难及于西域。378年，苻坚决定改变这种状况，他下诏梁熙，让他派使者到西域“扬秦威德”[11]。结果只有大宛使者到河西向苻坚献大宛马，而其余诸国仍无使者入贡。到了382年秋，车师前部王弥寘和鄯善王休密驮入朝时，言及西域事，二人“请为向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12]。于是，有了苻坚派吕光统师西行之举。吕光出师前，前秦也开始计议进攻东晋。

383年初，吕光兵出长安。六月，苻坚下诏进攻东晋。当苻坚下令攻晋时，吕光已率师进抵高昌，他想停下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而部将杜进对他说：

> 节下受任金方，赴机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

在杜进的敦促下，吕光乃进及流沙，“三百余里无水，将士失色”[13]，幸而骤降暴雨，得用雨水消渴，进兵至焉耆。焉耆王泥流惧吕光讨伐，带领一些西域小国请降。十二月，兵至龟兹，龟兹王帛纯凭险拒守，不降吕光。于是：

> 光军其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上。帛纯驱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婴城自守。[14]

双方相持到第二年六月，帛纯援引狯胡、温宿、尉头等国王及诸国兵共七十余万，试图解龟兹之困，被吕光军队击破。八月，帛纯收其珍宝逃走，受龟兹控制的西域三十余国尽降吕光。

> 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咸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

> （苻）坚闻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15]

在吕光与帛纯两军相持时，杜进曾谶言吕光有“人君利见之象”。据说当时吕光左臂内侧血管隆起，隐然成“巨霸”字样，接着有黑龙降于营外，鳞甲昭然。议者附会吕光“道合灵和”，吕光听后很高兴。在平龟兹后，因东归道远，吕光迷恋龟兹城和帛纯宫室的辉煌壮丽，产生了羁留西域的念头。天竺高僧鸠摩罗什劝他东返，告诉他“此凶亡之地，不可掩留”，并说“中路自有福地可居”。[16]

385年春，吕光大飨将士，并讨论留返问题。“众咸请还，光从之。”[17]三月，正式从龟兹出发，率军东归。东返时“以驼二万余头致外

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18]。

吕光带领的“总兵七万，铁骑五千”，加上从西域掳掠的无数珍宝和骏马，成为他建立后凉的军事及物质基础。

二 后凉的建立

吕光率军入西域时，前秦已在淝水之战中失败。苻坚部下慕容垂、姚苌、乞伏国仁等纷纷叛秦。因前秦战败，关东、陇西等区域的形势也变得对前秦不利。从384年六月到385年六月，慕容冲包围前秦国都长安城整整一年，他“纵兵大掠”，以致“长安大饥，人相食，诸将归而吐肉以饴妻子”[19]，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20]。苻坚留太子苻宏坚守长安，自率数百骑，携其家口逃往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七月，姚苌派骑兵包围五将山，活捉苻坚，继而将其勒死于新平（郡治漆，今陕西彬县）佛寺中。吕光对上述这些事略无所知，而凉州官吏却多有知者。所以，吕光回师的消息传到河西后，高昌太守杨翰建议凉州刺史梁熙拒纳吕光入境，他说：

> 吕光新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坐制。如以为远，伊吾关亦可拒也。度此二厄，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21]

另外，张统也建议梁熙奉以前贬徙西海的苻洛为盟主，使吕光不敢有异心，再向东兼并河州刺史毛兴，联合秦州刺史王统和南秦州刺史杨璧，合四州之众，“为桓文之举”。但梁熙“文雅有余，机鉴不足”，对杨、张的建议不感兴趣。而吕光却加紧进军步伐，原前秦河西守宰望风而降。吕军到玉门时，梁熙才感到不妙，发檄谴责吕光“擅命还师”，派其子梁胤和振威将军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拒守酒泉。这时，吕光已招降高昌太守杨翰、敦煌太守姚静和晋昌太守李纯。他反檄姑臧，谴责梁熙在国难当头时无赴难之志，反而阻遏“归国之师”。又派遣彭晃、杜进、姜飞为前锋，带兵急进，在安弥（今甘肃酒泉市东）击败并活捉了梁胤。“于是四山胡、夷皆附于光。武威太守彭济执（梁）熙以降，光杀之”[22]。

385年十月，吕光进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又以杜进为辅国将军、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余封拜各有差”。[23]后凉进入了立国时期。至此，凉州各郡县都已归降吕光，仅酒泉太守宋皓和西郡太

守宋泮坚守城池。吕光派兵攻克二城，诛杀二宋。

吕光入姑臧前，前秦国主苻坚已被羌族首领姚苌杀害，其庶长子苻丕在晋阳继位称帝，改元太安。到386年秋，吕光闻知苻坚被杀，下令凉州全城上下举哀。十一月，奉太安年号。这时，群僚向他劝进，他表示只“进位元台”，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24]。这一大堆名号表明，他已割据河西。389年，吕光改元麟嘉，即三河王位于姑臧南郊，置官司，大宴群臣，后凉政权正式建立。

吕光建国时，即位于晋阳的前秦皇帝苻丕已被慕容永军队杀掉。苻丕死后，割据陇西的苻登继称前秦皇帝。394年，姚苌之子、后秦国主姚兴杀苻登于平凉。苻登子苻崇在逃向湟中时，被陇西鲜卑首领、西秦国主乞伏乾归逐杀。至此，前秦亡国。吕光的后凉、姚兴的后秦、慕容垂的后燕、乞伏乾归的西秦并立于北方大地，并与江南东晋相对峙。396年，吕光去三河王号，改元龙飞，称大凉天王，确立起封建王权统治。

综上所述，后凉政权之兴，发端于前秦苻坚派遣吕光经营西域。而苻坚败于淝水及北方出现再分裂的形势，给后凉立国提供了条件。在这一点上，它与前凉政权在形成背景上有相似之处。

第二节 前期政治

一 尖锐的民族矛盾

吕光不同于张轨，他是以关陇氐族酋豪的身份割据河西的，这决定了他不会受到河西著姓社会的承认和拥戴。后凉政权是吕光依靠氐族的军事力量，通过对河西的占领建立起来的，这必然会遭到汉族及河西其他民族的反抗。

从吕光入主姑臧起，民族矛盾就在上升，吕光屠杀姚皓等名士以及夷夏百姓，是其端倪。

> 光主簿尉祐，奸佞倾薄人也，见弃前朝，与彭济同谋执梁熙，光深见宠任，乃谮诛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余人，远近颇以此离贰。[25]

尉祐谮杀姚、尹后，出任金城太守，在允吾叛变吕光，“扇动百姓，夷夏多从之”[26]。

以张大豫为首，由河西汉族政治势力发动的前凉复国活动，反映了后凉初期民族矛盾带给吕光的困扰。

张大豫是张天锡的嬖子，于373年被张天锡立为世子。376年，前凉为前秦所灭，大豫随张天锡被俘往长安。383年苻坚败于淝水，随苻坚南征的张天锡乘败乱逃到江南，投奔了东晋。张大豫惧罪，藏匿于前秦长水校尉王穆家中。后随王穆潜逃，重返河西，被河西鲜卑秃发部收容。在秃发部首领树机能玄孙秃发思复鞬的帮助和汉族豪望的支持下，开始了复辟前凉的活动。

386年十一月，魏安（今甘肃古浪县东）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起兵数千奉迎大豫，攻下后凉昌松郡（治今甘肃古浪县西），击败吕光派去镇压的杜进所部。接着，张大豫指挥军队进攻姑臧。当时，王穆等人得知姑臧城防牢固，城内粮储丰富，吕光的军队士气又盛，认为不如向吕光防守薄弱的地方进军，先取岭西（今甘肃张掖境内祁连山岭以西），厉兵秣马，积蓄军粮，待力量充足后再东争姑臧，实现坐定河西的宏图。但张大豫急功心切，听不进王穆的劝告，坚持要攻取姑臧。他自号抚军将军、凉州牧，改元凤凰，任王穆为长史，派他去联络建康（郡治今甘肃酒泉）太守李隰和祁连都尉严纯，让他们率兵东进，合河

西鲜卑军队共三万余，从南面攻打姑臧，而自己从城西进攻。他试图从西、南两个方向夹击，驱逐吕光出姑臧。然而当王穆与思复鞬等到达城南时，吕光突然兵出南门，打得王穆措手不及，并杀鲜卑部帅奚于及其部下两万多人。姑臧城南战役失败后，张大豫的复国梦成为泡影。他带兵撤离姑臧，掠凉州百姓千余户，退往临洮（今甘肃岷县）。后凉将领彭晃、徐灵等带兵追击。387年春，彭、徐进攻临洮，张大豫败逃广武（治今甘肃永登县南），王穆逃往建康。八月，张大豫被广武郡人押送姑臧，接着被吕光处死。王穆在袭据酒泉后，自称大将军、凉州牧。

> 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处士郭瑀，瑀叹曰："今民将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与同郡索嘏起兵应穆，运粟三万石以饷之。[27]

郭瑀、索嘏及河西鲜卑能支持张大豫，说明河西汉族士民和"胡夷"百姓对后凉政权所持的敌对态度。

王穆刚愎自用，喜听谗言。在郭、索起兵后，他委任郭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以索嘏为敦煌太守。但不久便因相信谗言和忌妒索嘏的名气，带兵进攻索嘏。

> （郭）瑀谏不听，出城大哭，举手谢城曰："吾不复见汝矣！"还而引被覆面，不与人言，不食而卒。[28]

吕光乘王穆进攻索嘏之际，发兵二万攻酒泉，迫使王穆向东溃退。中途部众逃散，本人也被骍马（今酒泉东）县令郭文杀掉。

除河西士民支持张大豫起兵复国之外，作为后凉初期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郭黁之变。

郭黁任吕光的散骑常侍、太常卿，他"明天文，善占候"，曾预言"凉之分野，将有大兵"，鼓动仆射王详并联络田胡部族和东西二苑禁军起兵反吕。397年，他推田胡王乞基为帅，以略阳氐人杨轨为谋主，与凉人张捷和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于休屠城。

> 黁之叛也，得（吕）光孙八人于东苑。及军败，恚甚，悉投之于锋刃之上，枝分节解，饮血盟众；众皆掩目不忍视之，黁悠然自若。[29]

郭黁之变，利用了汉、胡各族对吕光的不满，但却极其残酷地屠杀吕氏子孙，这注定了他不会成功。

除汉族联合"胡夷"民族反吕外，"胡夷"民族单独反抗后凉统治的活

动也层出不穷。387年冬，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杀湟河太守强禧以叛。397年，沮渠蒙逊率卢水胡部在张掖起兵，其从兄沮渠男成遥为呼应，“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30]。同年，秃发乌孤率河西鲜卑占据湟中，与后凉对峙。

后凉初期，民族矛盾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动摇着后凉统治。因此，后凉从建立起就缺乏稳定性。适如胡三省所说：

> 吕光新得河西，党叛于内，敌攻于外，虽数战数胜，而根本不固，宜不足以贻子孙也。[31]

二 氐族本位政治

吕光出身于氐族贵族家庭，后凉政权本于前秦，这必然使后凉深深打上前秦政治的某些烙印。

我们知道，前秦一度出现强盛，是苻坚任用汉族士人王猛和推行政治改革的结果。其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通过抑制氐族贵族集团内部的落后保守势力来强化封建中央集权。但因改革未能彻底消除前秦社会的民族矛盾，故而不可能完全改造前秦落后的氐族本位政治。前秦氐族本位政治的落后性，一是移植氐族居民到被征服地区，借以突出氐族的政治地位和对其他民族实行同化的能力；二是以氐族贵族为核心，建立军事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统治体制，用以对被征服区进行强制性管理；三是迁徙被征服区其他民族的豪望到京畿地区，以便进行有效的控制。

苻坚时期为推行上述政策，凡分散移置被征服区的氐族种姓共十五万户之多，而被分封和委派到各地区的苻氏子弟及氐族勋贵也多达数十人。当然，派吕光征服西域也是此种本位政治的产物。另外，苻坚在灭前燕之后，“徙关东诸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内有鲜卑四万余户，徙于长安），处乌丸杂类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北地（今陕西铜川市南），丁零翟斌于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32]，以至“鲜卑、羌、羯，布满畿甸”[33]。这不但激化了被征服地区原有民族与氐族间的矛盾，而且也分散削弱了氐族自己的力量，将自己置于其他民族的重重包围之中。

后凉建立后，吕光也基本仿照前秦上述办法统治河西，但他手下的氐族官僚数量有限，在推行氐族本位政治上，不能不权宜行事。在389

年即三河王位后，他设置官司，建立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既要用氐族人担任中央官吏，又要使他们去管理地方，在难以措置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自丞郎已下犹摄州县事”[34]的办法，让中央官员兼职地方军政，以解决氐族官员不足的问题。

吕光还迅速集结吕氏家族势力，使他们分别承担军国重任，“光妻石氏、子绍、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东”[35]。吕光将氐族贵族中的吕、石二姓一直作为后凉政权的中坚。这吕、石二姓既支撑着后凉政权，也为争夺政权骨肉相残。诸吕子弟中的吕纂、吕他、吕绍、吕方、吕宝、吕延、吕弘、吕超、吕纬、吕隆等，以及外戚石氏中的石聪、石元良等，均位居将军、郡守之职。396年，吕光改称大凉天王，大封宗室，“立世子绍为太子，诸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36]，为后来的政治埋下了祸根。

以氐族为本位对其他民族实行统治，并不表示后凉政权对外族一概实行排斥。事实上，后凉初期也有非氐族人士参政。如吕光称三河王时，以“中书令王详为尚书左仆射，段业等五人为尚书”[37]。只是外族一般都任偏裨之职，偶或有居要职者，也极易因谗获罪。如杜进，最初支持吕光最坚决，吕光定河西，杜进出过大力，受任为辅国将军、武威太守。史称杜进：

> 既居都尹，权高一时，出入羽仪，与光相亚。光甥石聪至自关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聪曰：“止知有杜进耳，实不闻有舅。”光默然，因此诛进。[38]

另外，吕光也用重刑对付敢于反对他的外族官吏。在诛杜进后的一次饮宴中，酒酣语及政事，担任参军的汉族士人段业说，“严刑重宪，非明王之义”。吕光责问段业：“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诸侯。吴起之术无亲而荆蛮以霸，何也？”段业回答，严刑峻法要看如何使用，河西本是“道义神州”，“欲以商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岂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吕光听后，小有领悟，“于是下令责躬，乃崇宽简之政”[39]。虽说如此，吕光事事偏袒氐族贵族，借故诿罪其他民族官吏的事并不鲜见，如他诛杀卢水胡官吏沮渠罗仇和沮渠麹粥一事，便是狭隘民族心理恶性发作的结果。事情发生在龙飞二年（397）。此前，陇西鲜卑建立的西秦入占金城，与后凉不断摩擦。从393年开始，吕光屡次派兵进攻，均被西秦主乞伏乾归击败，连吕宝和吕延也因此丧命。每次对西秦用兵，吕光都征发卢水胡部军队。397年，后凉军队终于攻入金城，但却中了乞伏乾归

的计谋。乾归放风说将率部逃向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诱吕光追击，使其中伏失败。“光荒耄信谗，杀尚书沮渠罗仇、三河太守沮渠麹粥。”[40]

在氐族本位政治之下，其他民族的头面人物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他们得不到重用，心中怀有怨愤。如段业，最初只担任著作郎，“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41]。而一些欲谋亲幸的氐、汉家族，则不惜通过进谗和婚宦来取得吕氏家族的欢心和重用。如尉祐以进谗为手段，在唆使吕光诛杀姚、尹等名士后得任金城太守，杨桓等则凭借与吕氏的通婚，位至通显。杨桓以女嫁于吕纂，自己得任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凉都尹，封金城侯。在诸吕相残中，吕超杀吕纂。但杨桓之女还算有些气节：

> 杨氏国色也，超将妻之，谓其父桓曰：“后若自杀，祸及卿宗！”桓以言告杨氏。杨氏曰：“大人本卖女与氐，以图富贵，一之已甚，可复使女辱于二氐乎？”桓不能强，乃自杀。[42]

吕光初征西域，所率军队不过七万五千人，后凉建立后，他不可能依照苻坚的做法，将其中的氐族健卒分派到河西各郡县去作镇抚之用，只能以其作为“六军”的中坚力量，用于镇压民族反抗活动。如392年他率这支军队征伐南羌彭奚念部，396年亲征乞伏乾归，398年征郭麐，都靠这支亲军。399年吕光临终，念念不忘的还是这支军队。他在立太子吕绍为天王而自号太上皇后，又以吕纂为太尉，以吕弘为司徒，反复叮嘱吕绍：“使纂统六军，弘管朝政，汝恭己无为，委重二兄，庶可以济。”[43]

吕光也仿照前秦，将一些边远地带的居民移置便于控制的区域，如他将西海郡（治居延泽西）人迁徙到内地各郡，使河西域内纷纷扰扰。西海人怨恨吕光，作歌谣说：“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44]被徙者“遂相扇动”，试图摆脱后凉的控制。最终，吕光在394年将他们“徙之于西河乐都”[45]。

另外，对一些关隘要冲，如高昌郡，吕光派宗室子弟前往镇守。史载：

> 群议以高昌虽在西垂，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镇之。光以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46]

吕光推行氐族本位政治，说明后凉是一个民族政权。虽然氐族是一个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后凉的政治也有继承前凉的地方，但靠有限的氐族势力去统治民族十分复杂的河西，又不主动吸收其他民族参政，这样的政治行为必然将后凉政治拖入落后与被动，不可能持久有为。吕光及其氐族统治集团也势必因其他民族的一致反对，陷入民族征服活动的泥淖中难以自拔，并导致内政不修和经济失调等许多问题。

因此，吕光刚立国，统治危机便暴露出来。387年，姑臧发生严重饥荒，“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47]。而此时，后凉“中仓积粟，数百千万”[48]，却不见赈济措施。在这种形势下，吕光仍连年征讨，赋税、徭役及兵役征发无已，人民生活越来越痛苦。到397年左右，吕光的统治已是内外交困，如史所载：“吕氏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连城。瓦解之势，昭然在目。百姓嗷然，无所宗附。”[49]这时，河西鲜卑秃发乌孤起兵于湟中，卢水胡沮渠蒙逊起兵于张掖，他们分别从姑臧以南和以西打击吕氏势力，分割和蚕食后凉领土，使后凉政权所控制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小。“吕光初据姑臧，前凉旧址，宛然如昨也。乃未几而纷纭割裂。迨凉之亡，姑臧而外唯余苍松、番和二郡而已。”[50]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后凉政权从它初建时起便举步维艰。

第三节 后期政治

一 吕纂和吕隆的腐朽统治

龙飞四年（399）年十二月，吕光病死。从太安元年（386）他入姑臧“进位元台”计，共在位十六年。死前，已立太子吕绍为大凉天王，自己称太上皇。

吕绍，字永业，为吕光嫡子。他“才非拨乱，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51]。军政大权实际由其庶兄吕纂和吕弘把持。

吕纂，字永绪，吕光长庶子。他生性“凶武”，“少便弓马，好鹰犬。苻坚时入太学，不好读书，唯以交结公侯声乐为务”。[52]吕光临死前，嘱他与吕弘辅佐吕绍，“执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为吾忧。善辅永业，勿听谗言！’”[53]吕光死后，吕绍秘不发丧，“（吕）纂排阁入哭，尽哀而出”[54]。这使吕绍心里恐惧，提出让位给吕纂。然而，不等吕绍让位，吕纂便串通吕弘发动政变，迫使吕绍自杀，自己登上了大凉天王王位。即位后，改龙飞四年（399）为咸宁元年，任命吕弘为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封番禾郡公。

吕纂生性暴戾，不能容其手足，即位后便和吕弘发生矛盾。“吕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55]吕弘先发制人，胁迫陇右著姓中的尹文、杨桓为谋主，又拉拢河西名士宗燮，从姑臧东苑起兵，讨伐吕纂。吕纂早有防范，“遣其将焦辨击弘，弘众溃，出奔广武”[56]。打垮吕弘后，吕纂“纵兵大掠，以东苑妇女赏军。弘之妻子亦为士卒所辱”[57]。当此之时，吕纂笑着问群臣：“今日之战如何？”侍中房晷回答：

> 天祸凉室，衅起戚藩。……虽弘自取夷灭，亦由陛下无棠棣之义。宜考己责躬，以谢百姓，而反纵兵大掠，幽辱士女。衅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妇也；弘女，陛下之侄女也，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天地神明，岂忍见此！[58]

吕纂穷兵黩武，在杀掉吕弘后，又谋划对秃发利鹿孤用兵。中书令杨颖劝说他先缮甲养锐，劝课农殖，以待可乘之机。并说后凉“比年多事，公私罄竭”，实难与敌作战。但吕纂根本不听，还选择盛夏出兵，

使“百姓废农”，民不安业。

吕纂“游田无度，荒耽酒色”。他继位后，很少料理国政，沉溺于杯觞犬马，常“饮酒过度，出入无恒。宴安游盘之乐，沉湎樽酒之间，不以寇仇为虑”。每当正直的大臣苦苦劝谏，他都承认不对，但过后却顽性照旧，“昏虐自任，终不能改，常与左右因醉驰猎于坑涧之间”。

吕纂在位期间，后凉“疆域未辟，崎岖于二岭之内”[59]。所能控制的领土，只有东起今乌鞘岭，西至今武威的方圆百里之地，其余土地已被北凉和南凉所瓜分。

由于吕纂的腐败，他在位仅三年（399～401）便被吕隆取代。

吕隆，字永基，是吕光弟吕宝之子。他“美姿貌，善骑射”。401年，其弟吕超发动政变，推翻并杀死吕纂，然后让位于他。即位后，因番禾境内（今甘肃永昌县境）发现小鼎，故改元“神鼎”。

吕隆好色荒淫，即位后即逼吕绍之妾张氏嫁给自己。

> 张氏年十四，为沙门，清辩有姿色，吕隆见而悦之，欲秽其行。遣中书郎裴敏设之。张氏善言明理，敏为之屈。隆亲逼之，张氏曰：“钦乐至法，故投身道门，誓不受辱！且一辱于人，誓不毁节。今逼如此，岂非命也！”遂开门楼，自投于地。二胫俱折，口颂佛经，俄然而卒。[60]

比之吕纂，吕隆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残虐成性，“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61]。他在位时，魏安人焦朗派人送信给后秦将领姚硕德，请率秦军乘后凉衰乱之机进攻河西。焦朗在信中说，吕隆“德刑不恤，残暴是先”，境内“饥馑流亡，死者太半”[62]。

吕隆时期，外有强敌，内有叛离。史称：

> 连兵积岁，资储内尽。强寇外逼，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假使张（良）、陈（平）、韩（信）、白（起），亦无如之何。[63]

402年，姑臧饥荒达到空前程度：

> 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城门昼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隆惧沮动人情，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64]

统治者变得如此腐败懦弱和残暴，这在五凉中是独一无二的。

二 诸吕相残

落后的氐族本位政治使吕氏子弟个个兵权在握，人人觊觎王位。诸吕都凶残成性，毫无亲情手足之念，这使后凉统治集团内讧不断，骨肉相残接连发生。

吕光死前，预料到国祚将因其子弟生性“粗武”而难以守成。他遗言吕绍，要他委重吕纂与吕弘，以免“内相猜贰，衅起萧墙”，又叮嘱吕纂要做到“兄弟缉穆”；还警告说“若内自相图，则祸不旋踵”。[65]后凉的一些臣僚，也预见到吕氏家族在吕光死后必自相残杀。郭麐起兵前曾对王详说：“主上（吕光）老病。太子（吕绍）冲暗，纂等凶武。一旦不讳，必有难作。”[66]后来一切都如预见的那样演出了。

首先是吕纂废杀吕绍。当时吕光尸骨未寒。

吕绍幼年即位，因“惧为纂所害”，提出要将王位让给吕纂，而吕纂不受。但吕纂专擅朝政，吕绍处处受到挟制，又引起吕氏家族中其他成员的不满。于是吕超等撺掇吕绍除掉吕纂。吕超对吕绍说：“纂统戎积年，威震内外，临丧不哀，步高视远。观其举止乱常，恐成大变。宜早除之，以安社稷。”[67]但吕绍优柔寡断，“宁坐而死”。

吕弘也嫉恨吕绍，“初，光欲立弘为世子，会闻绍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绍”[68]。

于是，吕纂与吕弘勾结起来对付吕绍。

当吕纂得知吕超与吕绍策划要除掉自己，“于是夜率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弘率东苑之众，斫洪范门”，闯入宫杀吕绍。[69]吕绍遣武贲中郎将吕开率禁兵接战于端门，而吕超带两千兵士助守官门。因卫士们早就对吕纂怀有恐惧，因此“悉皆溃散”。吕绍登紫阁自杀，吕超逃往广武（治今甘肃永登县南）。“纂惮弘兵强，劝弘即位”[70]，吕弘不敢受。推让之后，吕纂终于登上王位。

吕纂即位不久，吕弘发动东苑之变，谋杀吕纂，结果反被吕纂所杀。

401年，吕超再度发动政变，终于杀掉吕纂。事情的经过如下。

吕超原为吕绍出谋诛吕纂，吕绍失败自杀后，他逃往广武。后被赦免，任为番禾（治今甘肃永昌县西）太守。401年初，他因擅伐鲜卑思盘部，被思盘控告给吕纂，吕纂命他入朝述职。“超至姑臧，大惧，自结于殿中监杜尚。纂见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当斩卿，然后天下可定！’超顿首不敢。”[71]后吕纂与群臣宴于内殿，吕隆频频劝酒，将纂灌醉。吕纂于昏醉之际，乘步輓车与吕隆等共游宫内。至琨华堂东閤，吕超取剑击纂，洞穿其胸。纂忍痛逃向宣德堂。纂妻杨氏命令禁兵讨伐吕超，但为杜尚约束而不敢动。“将军魏益多入，斩纂首以徇。”魏又历数吕纂之罪说：“纂违先帝之命，杀害太子；荒耽酒猎，昵近小人；轻害忠良，以百姓为草芥。”[72]当时，吕氏家族中的吕他和吕纬正在北城，吕纂部将姜纪和焦辨在南城，杨桓和田诚在东苑，闻知祸起萧墙，多坐观成败。而吕纬甚而相信吕超会立他为王，与吕超结盟“单马入城”，被超“执而杀之”[73]。

吕超刺杀吕纂后，拥吕隆继位。吕隆的残暴引起朝野怨恨，魏安人焦朗引后秦将领姚硕德进攻姑臧。另外，魏益多等也鼓动倒吕，使事态越发严重。

至此，吕氏集团再无余力自相残杀，因为后秦、北凉、南凉等外敌已近逼国门，包围了姑臧。

从吕纂废杀吕绍开始的“迭相篡弑”，既将后凉的统治力量消耗殆尽，也使吕氏贵族集团人心丧尽。

第四节 后凉灭亡

后凉基础不稳，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腐败，吕氏子弟同室操戈，使它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另外，来自南凉与北凉的外部压力以及后秦军队的进攻，又加速着它的灭亡。

首先是南凉的进攻。

401年，南凉主秃发利鹿孤称河西王，加快了与吕氏争夺姑臧的步伐。同年，因吕隆杀吕纂，吕纂妻杨氏的父亲杨桓避祸外逃，投向秃发利鹿孤。四月，杨桓引南凉军队攻姑臧，吕隆出城迎战不力，被利鹿孤掳掠姑臧居民二千户撤往湟中。这次战役，南凉摧毁了后凉外围的防卫能力。

其次是后秦的进攻。

401年六月，吕隆在姑臧城内大杀豪望，企图借此树立威名和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结果适得其反。焦朗派人到陇右游说后秦陇西公姚硕德，请他乘诸吕篡杀之际发兵攻凉，自己在城内接应。姚亲率三千军队昼夜兼程，赶到姑臧，另有七万大军及西秦七千骑兵随后。吕隆命令吕超出城迎战，大败而回。吕隆不敢再战，紧闭城门，婴城固守。此时姑臧城内，士无斗志，民有叛离。特别是先前随吕光远征而滞留河西的“东人”，欲保全身家性命，多谋外叛。魏益多借此鼓动氐人造反，结果有三百多户人家因涉嫌遭吕隆杀害。

当此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之际，后凉王公大臣纷纷要求吕隆向后秦主姚兴请降，以解秦军围城之困。其中，吕超的言辞最为恳切。他说：

> 通塞有时，艰泰相袭。孙权屈身于魏，谯周劝主迎降，岂非大丈夫哉？势屈故也。天锡承七世之资，树恩百载，武旅十万，谋士盈朝，秦师临境，识者导以见机，而愎谏自专，社稷为墟。前鉴不远，我之元龟也！何惜尺书单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辞以退敌，然后内修德政，废兴由人，未损大略。[74]

吕超还指出，如眼前形势，即使张良、韩信等在世，也无可奈何。他要吕隆从保全宗族考虑，从速做出抉择。

吕隆迫不得已接受了吕超的建议，派人给姚硕德送上降书。硕德作

表给姚兴，请委任吕隆为后秦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吕隆“于是遣母弟爱子文武旧臣慕容筑、杨颖、史难、阎松等五十余家质于长安，硕德乃还”[75]。吕隆以请降纳质为条件，使后凉得以苟延残喘。

秦军撤退后，吕隆并不内修德政，而是继续耀兵扬武。他派吕超进攻在晏然（今甘肃武威市西北）的姜纪。姜纪原是后凉将领，秃发利鹿孤攻姑臧时，投降了南凉，在焦朗引姚硕德攻姑臧时他转而投秦，被姚硕德举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驻晏然。吕超攻姜纪，只以伐叛泄恨为目的，结果反被姜纪打败。失败后仍不甘心，又掉头进攻占据魏安（今甘肃武威东南）的焦朗。焦朗遣其弟子焦嵩为质于河西王利鹿孤求援，“利鹿孤遣车骑将军傉檀赴之”[76]。吕超闻焦朗引南凉为援，不敢再攻，便退回姑臧。傉檀再次深入武威郡，“曜兵姑臧，壁于胡坑（今武威西）”[77]。吕超知傉檀已在胡坑扎营，拟夜袭，而傉檀早有预料，“畜火以待之”。当夜，吕超中垒将军王集率精兵二千袭击南凉军营，“集入垒中，内外皆举火，光照如昼。（傉檀）纵兵击之，斩集及甲首三百余级”[78]。吕隆不敢再与秃发傉檀交锋，便使用起阴谋诡计。他“伪与傉檀通好，请于苑内结盟”[79]，谋在苑内伏杀傉檀。傉檀派大臣俱延前往。俱延不走苑门，毁苑墙而入，险些丧命。秃发傉檀一怒之下，率兵进攻后凉昌松郡（治今甘肃永昌县东），俘虏昌松太守孟祎，吕隆派的救兵也“惮傉檀之强，遁还”[80]。

吕隆一味耀兵扬武、不顾内政，加上连续遭受围困和打击，到402年初，后凉统治一蹶不振。而且又遇饥荒侵逼，姑臧实际上已近于一座空城。

此时，沮渠蒙逊引兵对姑臧作试探性进攻。吕隆为抵御进攻，求助于秃发傉檀。蒙逊撤兵时，为瓦解姑臧人心，“留谷万余斛以振饥人”[81]。北凉撤兵后，秃发傉檀却趁火打劫，“乃徙凉泽（今武威东古休屠泽）段家民五百余户而还”[82]。

在北凉与南凉围攻姑臧时，后秦也在计议攻取姑臧。姚兴的谋臣对姚兴说：

> （吕）隆藉伯父余资，制命河外。今虽饥窘，尚能自支。若将来丰赡，终非国有。凉州险绝，世难先违，道清后顺。不如因其饥弊而取之。[83]

403年秋，南凉和北凉对后凉的进攻更加频繁和猛烈。吕隆受二凉

逼迫已走投无路。此时，后秦派使者到姑臧“征吕超入侍”[84]。吕隆所仰仗也只有吕超一人，姚兴名义上召吕超入侍，实际上是要吕隆放杖投降。“隆念姑臧终无以自存，乃因超请迎于秦”[85]，“遣超率骑二百，多赍珍宝，请迎于姚兴”[86]。姚兴派齐难等统率步骑四万，于九月抵达姑臧，“隆素车白马迎于道旁”[87]。继而后秦徙吕隆宗族、僚属及民万户于长安，后凉政权至此灭亡。时为吕隆神鼎三年（403）。[88]不久，吕隆因涉嫌参与姚兴少子姚弼谋反被姚兴杀掉。

从吕光入居姑臧形成割据起，到吕隆投降后秦止，后凉政权共存在十七年（386~403），历四主。

[1]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3页。

[2]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录》，第565页。

[3]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3《前秦录》引《太平御览》卷474，第254页。

[4]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3页。

[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录》，第565页。

[6] 《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升平元年九月条，第3166页。

[7] 《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升平二年三月条，第3168页。

[8] 《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十月条，第3287页。

[9]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4页。

[10]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4页。

[11] 《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三年九月条，第3287页。

[12] 《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条，第3300页。

[13]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4页。

[14]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4页。

[15]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5~3056页。

[16]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录》，第567页。

[17]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18]《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19]《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25页。

[20]《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27页。

[21]《资治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九月条，第3352页。

[22]《资治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九月条，第3353页。

[23]《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24]《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25]《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26]《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27]《资治通鉴》卷107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十二月条，第3381页。

[28]《资治通鉴》卷107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十二月条，第3381页。

[29]《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2页。

[30]《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1页。

[31]《资治通鉴》卷107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十二月条胡注，第3382页。

[3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276～277页。

[33]《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十月条，第3303页。

[3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录》，第573页。

[35]《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9页。

[36]《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37]《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38]《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8页。

[39]《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8页。

[40]《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1页。

[41]《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9页。

[42]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录》，第583页。《晋书》卷96《列

女传》（第2526页）略同。

[43]《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3页。

[44]《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45]《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46]《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47]《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4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录》，第577页。

[49]《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1页。

[5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中华书局，2005，第138页。

[51]《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3页。

[52]《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4页。

[53]《资治通鉴》卷111晋安帝隆安三年十二月条，第3504页。

[54]《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4页。

[55]《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5页。

[56]《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6页。

[57]《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6页。

[58]《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6页。

[59]《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7页。

[6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3《后凉录》引《太平御览》卷439，第585页。

[61]《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69页。

[62]《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69页。

[63]《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0页。

[64]《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65]《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4页。

[66]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2页。

[67]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4页。

[68]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4页。

[69]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5页。

[70]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5页。

[71]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8页。

[72]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8页。

[73]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8～3069页。

[74]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0页。

[75]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0页。

[76]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二月条，第3530页。

[77]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二月条，第3531页。

[78]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二月条，第3531页。

[79]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二月条，第3531页。

[80]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二月条，第3531页。

[81]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82]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元兴元年二月条，第3536页。

[83]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0～3071页。

[84] 《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二年七月条，第3550页。

[85] 《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二年七月条，第3550页。

[86]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87]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88]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云吕隆降秦事在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误。《资治通鉴》卷113（第3550页）云在元兴二年（403），此从《通鉴》。

〖卷四〗 南凉篇

第一节 南凉立国

一 秃发乌孤的早期战略

南凉是秃发乌孤所建。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1]秃发乌孤是秃发树机能玄孙思复鞬之子。思复鞬时，秃发部在河西生活已历八世。[2]他死后，乌孤继承酋长之位，“务农桑，修邻好”[3]，逐步进入农耕生活和建立国家时期。389年，吕光自称三河王，但由于实行氐族本位政治，对其他民族进行排斥和压抑，故激起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反抗。“乌孤雄勇有大志”[4]，他看准这个时机，开始了反抗后凉的活动，并打算与吕光争夺凉州。他与大将纷陁计议此事，纷陁为他策划说：“公必欲得凉州，宜先务农讲武，礼俊贤，修政刑，然后可也。”[5]意思是要乌孤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军事素质，广集治国用兵的人才，推进和增强中央集权政治等几个方面入手，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纷陁的建策成为南凉的建国大纲。

394年春，南凉进入立国时期。后凉主吕光为缓冲来自秃发部方面的压力，派人到湟中，册封乌孤为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乌孤很清楚这是吕光在羁縻自己，他问部下：“吕氏远来假授，当可受不？”部下回答：“吾士众不少，何故属人？”只有部将石真若留回答说：“今本根未固，理宜随时。（吕）光德刑修明，境内无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敌，后虽悔之，无所及也。不如受而遵养之，以待其衅耳！”[6]此意见与纷陁建策大体相同。乌孤采纳了这一意见，接受吕光的委署，但同时又进一步加紧强兵立国的活动。

乌孤首先兼并邻近鲜卑部落，并选取廉川（今青海民和县西北）作为政治军事据点，“讨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将石亦干筑廉川堡

以都之”[7]。与此同时，他广招英才，“广武赵振，少好奇略，闻乌孤在廉川，弃家从之。乌孤喜曰：‘吾得赵生，大事济矣！’拜左司马”[8]。

乌孤之前，河西鲜卑部落联盟曾出现过两次强盛时期。一次在树机能时，树机能在泰始初年举兵反晋，有过“尽有凉州之地”的辉煌。另一次在思复鞬时，“思复鞬立，部众稍盛”[9]。及至乌孤，因后凉建立，一些原河西鲜卑部落联盟的成员受到羁縻，纷纷脱离联盟而独立，形成“诸部离叛”问题。建都廉川后，乌孤根据苻浑等建议，振旅誓师，讨伐这些叛部，使其他鲜卑部落重新归服自己。还收编了活动于金城以南的“河西鲜卑”吐秣等十二部，获得了地域及军事力量方面的基础。

时至397年，乌孤部落联盟重新崛起，并控制了东起洮水，西到西平，北达洪池岭的一片不大不小的地盘。这片地盘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当乌孤经营湟中时，后凉主吕光已感觉到日益增大的政治威胁，为了诱使乌孤向南发展，吕光改署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但乌孤识破了吕光的政治用心。当后凉使者到廉川后，受到乌孤的冷遇。

> 乌孤谓使者曰：“吕王昔以专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远，惠安黎庶。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吾安可违天下之心，受不义之爵！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仪，谢其使而遣之。[10]

乌孤从此宣告了自己政治上的独立。

二 南凉的建立

397年春，乌孤建元太初，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表明南凉行将立国。接着他对后凉发动进攻。他以弟利鹿孤为骠骑将军，傉檀为车骑将军，耀兵广武，攻克金城。吕光则遣将军窦苟应战，战于街亭（今永登县南），后凉兵大败。

从397年起，乌孤开始执行他的第二步政治战略，与后凉争夺湟中各郡。

397年，段业与沮渠蒙逊在张掖起兵反抗后凉，姑臧城内又发生郭黁之变。乘此机会，乌孤谋取湟中各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郭黁的谋主杨轨也驻屯廉川，拥有夷夏军队万余。398年，杨轨的部将

河西鲜卑人王乞基向杨轨建议说：秃发氏才高而兵盛。当年是乞基之主，应当归附他。杨轨从其议，遣使向乌孤请降。不料，羌酋梁饥也谋吞并杨部，对杨轨用兵，迫其率部逃奔西海（今青海湖），后袭乙弗鲜卑而据其地。接着，梁饥又转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逮捕太守郭倖，与梁饥对抗，又遣子为质于乌孤，求乌孤救援。乌孤部下“惮饥兵强，多以为疑”[11]，唯左司马赵振和平西将军浑屯认为当救。赵振给乌孤分析形势说：

> 杨轨新败，吕氏方强，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岭南五郡（广武、西平、乐都、浇河、湟河），庶几可取。大王若无开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经营四方，此机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华、夷震动，非我之利也。[12]

赵振的想法与乌孤不谋而合。于是先攻西平，一举而克，梁饥败退浇河（今青海贵德县西）。这一战，俘斩羌兵数万，逼使后凉湟河太守张稠、浇河太守王稚不战而降。“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光将杨轨、王乞基率户数千来奔。”[13]在占领后凉的西平、湟河、浇河三郡后，乌孤改称武威王。

399年，乌孤徙治乐都（今青海乐都），授官任能，正式建立了南凉政权。

> 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今西宁市东）；傉檀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镇西平（今乐都）。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俊；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14]

一个小朝廷，汇集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头面人物，既包括河西著姓中的阴、郭、麴、杨等家族，也包括氐族中的杨姓、匈奴中的金姓等家族，更多的则是侨居河西的中原冠带和士人，可谓人物荟萃，英才济济。靠着他们的赞襄，南凉的文治武功逐步展开。建制之后，乌孤与部下进一步分析河西形势，商讨政治决策。他从容问其部下说：

> 陇右区区数郡地耳！因其兵乱，分裂遂至十余。（乞伏）乾归擅命河南，段业阻兵张掖。虐氏假息，偷据姑臧。吾藉父兄遗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15]

杨统认为乞伏乾归和段业都不足虑，吕光是真正的敌人。他说吕光衰老，王位继承人年幼驽钝，另外两个儿子吕纂和吕隆虽颇有文韬武

略，却内相猜忌，难成气候，应当先结好乾归和段业，联合他们打击后凉。杨统还说：

> 宜遣车骑（指傉檀）镇浩亹，镇北（指洛回）据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误之。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吕）纂疲于奔命，人不得安其农业。兼弱攻昧，于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16]

南凉立国初期的外交、政治、军事方略就这样确定了。

事实上，乌孤只建立起南凉政权，并未来得及实施“坐定姑臧”的政治宏图。因为太初三年（399）八月，他因酒醉坠马而死。南凉割据事业由利鹿孤和傉檀继承和实现。

第二节 秃发利鹿孤的政治

一 修结邻好

南凉实行兄终弟及制。利鹿孤是乌孤之弟，乌孤死后，他即武威王之位，改元建和，将都城再由乐都迁到西平（今青海西宁），开始实行乌孤所确立的内政外交方略。

首先是与北凉结盟。利鹿孤即位之初，便派麹梁明出使张掖。时段业已即北凉王位，他问麹梁明，乌孤有子叫羌奴，为什么不立子而立弟呢？麹回答是因羌奴年幼之故。段业又问，为何不效法汉昭帝八岁即位，由金日磾和霍光辅佐以成其政的故事呢？麹回答：

> 宋宣能以国让，《春秋》美之；孙伯符委事仲谋，终开有吴之业。且兄终弟及，殷汤之制也，亦圣人之格言，万代之通式。何必胤己为是，绍兄为非。[17]

意思是说成霸王之业不在于如何传位。

但利鹿孤的外交并不成功，因为他结好北凉的同时却得罪了西秦。早在乌孤太初年间，南凉已与西秦“修邻好”。南凉以宗室女嫁西秦主乞伏乾归，约定两国诚信相托，互为唇齿。但利鹿孤一即位，这种唇齿关系就出现了裂缝，原因是南凉不以义为重。原来，在建和元年（400），后秦主姚兴派姚硕德率兵五万，自陇西入南安峡攻西秦，并击败西秦主力，迫使乞伏乾归步步向西败退，从金城渡黄河退保允吾（今甘肃皋兰县境）。此时，利鹿孤仍遵守盟约，派人保护乾归，并迎至晋兴（治今青海省民和县西）。而宗室大臣俱延却对利鹿孤说：

> 乾归本我之属国，妄自尊立，理穷归命，非有款诚。若奔东秦，必引师西侵，非我利也。宜徙于乙弗之间，防其越逸之路。[18]

他要利鹿孤落井下石，利鹿孤虽不从其议，但却部署其弟吐雷屯军于扪天岭（今甘肃永登县东南），以防乾归逃奔南羌。此事使乾归既惧又忿，他对儿子炽磐说：

> 利鹿孤义兼姻好，翼存唇齿之援。方乃忘义背亲，谋人父子，忌吾威名，势不全立。[19]

利鹿孤在处理与西秦关系上的失策，给南凉后期政治带来严重后果。乞伏炽磐时，西秦连年蚕食南凉，构成南凉的肘腋之患，并最终使南凉陷入灭顶之灾。

二 兴理内政

在处理外交的同时，利鹿孤也兴理内政。即位就下令："二千石长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关内侯。"[20]这一时期，南凉由单纯以武兴邦开始向文武兼修过渡。

南凉立国初期，政治生活方面残留着许多军事游牧生活的遗风。反映在如何兴邦治国的问题上，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僚之间分歧很大。鲜卑贵族主张不设国都，不置府库，兵农分离，胡汉分治，专征为务。如鍮勿崘说：

> 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21]

依照鍮勿崘的意见，南凉政治始终要与部落制度结合在一起，并依靠掳掠汉族人口来维持经济存在。

开始时，利鹿孤接受了鍮勿崘的建议。他乘吕光死后后凉变乱屡起，对后凉发动了频繁的袭击，并一次次地迁徙人口。如400年，他在吕纂攻北凉之际乘虚出兵，进攻姑臧，"耀兵于青阳门，虏八千余户而归"[22]。401年，再攻姑臧，"与凉王（吕）隆战，大破之，徙二千余户而归"[23]。402年，攻克显美，俘后凉昌松太守孟祎，"徙显美、丽靬二千余户而归"，又"徙凉泽、段冢五百余家而归"[24]。

为频繁的军事活动所局限，利鹿孤即位之初，兴理内政成效并不显著。因此，建和二年（401）他下令臣僚检讨政治得失。

> 谓其群下曰："吾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虽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车屡驾，无辟境之功；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25]

针对秃发贵族落后保守的治国思想，以祠部郎中史暠为代表的官僚建议利鹿孤实行文治，并提出从稳固民心、改革选举、振兴教育等方面入手，破除旧俗，增强国力。史暠说：

> 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国次之。拯溺救焚，东征西怨。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26]

根据史暠的建议，利鹿孤开始兴办教育。他"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27]。同时，注意珍惜人才。如杨桓，原是后凉右仆射，401年被俘；孟祎，原为吕隆昌松太守，402年被俘。二人同时受到利鹿孤礼遇，杨桓任为左司马，孟祎恩释归姑臧。时利鹿孤虽称制，但仍称臣于姚兴。杨桓兄（杨）经佐命姚苌，早死。姚兴闻杨桓有德望，征之入长安。利鹿孤饯桓于城东。临别之际，依依不舍，"为之流涕"[28]。

利鹿孤志在争夺姑臧，也不放弃掠民，这使他难以克服部落军事习气，也难将文治持之以恒。这一点也影响到傉檀。傉檀入姑臧后，随着北凉和后秦对姑臧围攻的加紧，南凉就完全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所谓的文治活动也因此荡然无存。

402年春，利鹿孤病死。死前，遗令传位秃发傉檀。

第三节 秃发傉檀的政治

一 入主姑臧

秃发傉檀是秃发利鹿孤之弟。他“少机警，有才略”[29]。利鹿孤时期，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凉州牧、录尚书事，“军国大事皆以委之”[30]。袭位后，改元弘昌，称凉王。又将都城从西平迁回乐都，并在弘昌二年（403）“大城乐都”[31]。

傉檀即位时，河西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四国并立的局面业已形成；另一方面，后秦重兵压境，后凉政权危在旦夕。此时，南凉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后凉吕隆，而变为北凉主沮渠蒙逊。同时，因为此前利鹿孤得罪了西秦主乞伏乾归，已建国于苑川（今甘肃榆中县）的乞伏炽磐也将报仇。傉檀要在河西立足，要实现“坐定姑臧”，就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复杂多变的各种关系中进行周旋，于是他将结好后秦，争取西秦，抗衡北凉作为基本对策。

弘昌元年，后秦遣使封拜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傉檀受而不拒；同年，傉檀派人将原扣押的乞伏炽磐妻子送还苑川，目的在于稳住后秦和西秦。

傉檀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其坐定姑臧的政治战略，因为这时南、北二凉围绕姑臧进行的角逐正在逐步升级。情况是每逢北凉出兵，南凉也随之出兵。总之，谁都想得到姑臧，谁都不想让对方得到姑臧。如傉檀就曾对婆衍崘说：

> 姑臧今虽虚弊，地居形胜。河西一都之会，不可使蒙逊据之。[32]

又如姜纪对姚硕德所说：

> 今秃发在南，兵强国富。若兼姑臧而据之，威势益盛，沮渠蒙逊、李暠不能抗也，必将归之。如此，则为国家之大敌矣。[33]

403年秋，后凉亡国与后秦的强盛使秃发傉檀和沮渠蒙逊以武力争夺姑臧的图谋化为泡影。但双方都知道，即使姑臧为后秦所得，后秦也不会长期占据。将姑臧交给谁，这取决于后秦主姚兴。于是双方都极力与后秦搞好关系，以防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后秦并灭后凉后，委派王尚为凉州刺史。王尚派宗敞为使节，到乐都见秃发傉檀。宗敞名重凉州，其父宗燮与傉檀为故交，早年曾将宗敞兄弟托付给傉檀。宗敞的到来，给了傉檀一个启示，就是设法从后秦手里讨得姑臧。

但要讨取姑臧，谈何容易。首先得对后秦表示臣服，承认后秦是自己的宗主国。傉檀在这点上做得很及时。当年，他“密图姑臧，乃去其年号，罢尚书丞郎官”[34]。用政治上例降一等的办法，初步解除姚兴的猜疑后，又派遣参军关尚到长安朝觐。当时，姚兴针对“大城乐都”一事责问关尚：“车骑（指傉檀）投诚献款，为国藩屏，擅兴兵众，辄造大城，为臣之道固若是乎？”关尚答：“王侯设险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卫众，预备不虞。车骑僻在遐藩，密迩勍寇，南则逆羌未宾，西则蒙逊跋扈，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姚兴笑了。[35]使后秦主姚兴完全放心后，傉檀于当年上表，请求姚兴委任自己为凉州刺史。姚兴虽未准其请，但“加傉檀散骑常侍，增邑二千户”[36]。

405年，傉檀采用贿赂手段，“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37]，于是，“秦王兴以为忠”[38]。接着委任傉檀为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姑臧”[39]，征王尚还长安。凉州吏民得知此消息后，纷纷挽留王尚。申屠英等选派主簿胡威奔赴长安求见姚兴，转达凉州吏民的请求。胡威流着眼泪对姚兴说：

> 臣州奉戴王化，于兹五年。土宇僻远，威灵不接，士民尝胆抆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圣德，俯杖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曰。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口；贱人贵畜，无乃不可！若军国须马，直须尚书一符，臣州三千余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力，开拓河西，以断匈奴右臂。今陛下无故弃五郡之地忠良华族，以资暴虏，岂惟臣州士民坠于涂炭，恐方为圣朝旰食之忧！[40]

姚兴听后有些反悔。而此时，傉檀与其镇南将军文支已率步骑三万到达了五涧（今甘肃武威市南），原凉州刺史王尚也已进行了权力的交割。“（王）尚出自清阳门，镇南文支入自凉风门。”[41]时间是406年七月。这样，秃发傉檀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河西重镇姑臧城，开始了南凉政治的新时代。

二 姑臧时期的外患内忧

史家云：“秃发累叶酋豪，擅强边服，控弦玉塞，跃马金山，候满月

而窥兵，乘折胶而纵镝。”[42]这说明秃发部是个英武善战的部族，习于马上生活。因此，除少数首领外，一般成员汉化程度不深，不熟悉政治。王位的兄终弟及，都城的一迁再迁，频繁地进行征战，不断地掳掠人口，都说明南凉政权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在利鹿孤时期，史暠等官僚已指出一些落后性，并力图进行匡革，并提出一些文治主张。但长期形成的部族意识和生活习惯，不可能通过一两项建议和举措便得到扭转。好在利鹿孤和傉檀等都愿意接受汉族的政治经验，并且喜听谠言，这有助于南凉政权沿着封建化轨道发展。在入主姑臧后，秃发部又与汉族发达的封建人文环境结合了起来。假如能把握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学习汉族的政治经验，克服自己部族的弱点，那么，南凉的割据局面定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并保持得长久些。

对求得长治久安的道理，南凉的君臣是懂得的。傉檀进入姑臧后，宴群臣于宣德堂，谈到创业与守业的关系，“仰视而叹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43]前昌松太守孟祎乘机向他讲述政治兴衰与宣德堂的关系。他从张骏构筑宣德堂时的全盛光景讲到前凉亡于前秦，又从梁熙拥十万强兵讲到他败死吕光之手，再从吕氏以排山之势称王建霸讲到衔璧秦雍，投降后秦，最后告诫傉檀说：

> 此堂之建，年垂百载，十有二主。唯信顺可以久安，仁义可以永固，愿大王勉之！[44]

就是说，要傉檀行仁德之政以保持基业长久。

孟祎借人事言兴废，讲出了一般性政治道理，而宗敞则具体地向傉檀献策。此前，傉檀能入居姑臧，宗敞功不可没。因此，傉檀对宗敞感激备至。姚兴征王尚返长安，宗敞以别驾相从，临行，傉檀说：“吾得凉州三千余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45]他请教宗敞，用什么样的“怀远安迩之略”才能治理好凉州。宗敞先向他“荐本州名士十余人”[46]，再建议他从使用人才和刷新政治做起，并说：

> 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陇之冠冕；裴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杨（雄）、班（固）；梁崧、赵昌，武同（张）飞、（关）羽。以大王之神略，抚之以威信，农战并修，文教兼设，可以纵横于天下，河右岂足定乎？[47]

对孟祎讲的道理和宗敞提的建策，傉檀虽喜闻乐受，但就姑臧时期

的政治而言，产生的作用并不很大。究其原因，传统政治生活方式的影响是一方面，外部环境的限制也是一方面。所谓外部环境的限制是指敌国的军事包围，它使傉檀很难得到喘息的机会，更不用说有兴理文治的时间了。

406年底，南凉迁都姑臧。此前，傉檀已“车服礼章一如王者”[48]。这等于否定了后秦是宗主国，也必然要激怒姚兴。另外，他为防备北凉与后秦等对姑臧的进攻，借巡游为名，行掳掠人口之实，大量集结军队，屯扎于姑臧周围。

> 袭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治今武威西北）、番禾（治今永昌西）、武威（治今甘肃武威）、昌松（治今古浪西）四郡。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49]

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这些活动，反而加速了敌人的进攻并引起百姓的骚动。不久，外患内忧迭至，使他遭受到一次次挫折。

首先是阳武之败，这是南凉建国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挫折之一。

定都姑臧后，南、北二凉的关系更加紧张。从407年始，要么傉檀以攻为守，进攻北凉；要么沮渠蒙逊先发制人，围攻姑臧。张掖到姑臧之间，战争越来越频繁。但多数情况下，都是北凉占上风。如407年南凉有均石（今张掖东）之败，既而失掉西郡（治今山丹县东南）。

当傉檀因北凉攻击无暇顾及其他时，新崛起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境）的夏主赫连勃勃趁火打劫。他先向傉檀提出联姻，又以傉檀不许为口实，带兵二万攻姑臧，在从杨非（今庄浪西）到支阳（今会宁县）三百余里的地面上处处打击南凉军，使南凉死伤万余人，被掳居民二万七千余口，被掳牛、马、羊等四十余万头。赫连勃勃撤兵时，诱傉檀率兵追击，而其在阳武下峡（今兰州东黄河峡口）凿冰埋车，部署伏兵。傉檀中伏后，被夏兵一直追奔八十里到南山（今兰州南山）上，“杀伤万计，名臣勇将死者十六七”[50]。赫连勃勃得胜后，将杀死的南凉将士尸首堆积起来，“号曰髑髅台”[51]。

阳武峡的惨败，使南凉朝野极为震动。傉檀在心有余悸之外，还感受到政治上的压力。他“责躬悔过”[52]，表示不再恃勇轻出，却反过来实行堡垒政策，“傉檀惧东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国中骇怨”[53]。结果，乘姑臧及其周围百姓受到骚扰，屠各胡人成七儿率其部

民三百余人据北城起义，一时响应者数千人。

在阳武之败和成七儿事件的影响下，南凉朝廷中的一些官僚更对傉檀不满。汉族官僚借机滋事，“军咨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等七人谋反，傉檀悉诛之”[54]。史称“边梁之乱”。

边梁之乱发生在南凉统治上层，属于高级官僚反对傉檀的政治活动，又因它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综合反映，故对南凉政权造成的震动十分强烈。

内忧外患加在一起，使傉檀入居姑臧的本意未能实现，也使南凉统治更加艰难。如胡三省分析的那样：“自是之后，秃发氏之势日以衰矣。”[55]

第四节 南凉灭亡

一 “韦宗观衅”与“东苑之诛”

姑臧时期的南凉政权是十分脆弱的。因为这种脆弱，周围列强蜂拥而至，又使南凉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列强中首先虎视南凉的是后秦。这与傉檀妄自尊立和与后秦为敌有关。他入姑臧前讨好后秦，入姑臧后马上对后秦翻脸。不但如此，还派使者游说乞伏炽磐与后秦绝交，被炽磐将使者斩首报告姚兴。在阳武之败和边梁之乱发生后，后秦主姚兴认为教训傉檀的时机成熟，便于408年派尚书郎韦宗到姑臧“观衅”，实则为侦察虚实。韦宗到姑臧后见到傉檀，坐而论道：

> 傉檀与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磾岂足为多也。”[56]

韦宗返长安后向姚兴汇报情况，对姚兴说：“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57]认为河西有山河之固，傉檀有惊世之才，主张不对南凉用兵。但姚兴不听他的，说赫连勃勃能击败傉檀，自己也定能征服河西。他派姚弼和敛成等率步骑三万为前锋，另派姚显等为后继进攻南凉。为了麻痹南凉群臣，还事先送信给傉檀，佯称出兵是此前已在讨伐赫连勃勃，因“惧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58]。傉檀信以为真，不再做防御准备。因此秦军很快进到漠口（今甘肃古浪县境），并杀昌松太守苏霸。又很快到达姑臧城下，屯驻于西苑。

当此之时，姑臧城内骚乱再起。州人王钟、宋钟、王娥等谋应秦军。事情泄露后，傉檀欲诛王钟等以儆效尤，而前军将军伊力延侯认为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刑，“今强敌在外，内有奸竖，兵交势蹙，祸难不轻，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傉檀从之，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59]。这就是“东苑之诛”。

东苑之诛发生后，姑臧城内人心惶惶。因此，当411年沮渠蒙逊进围姑臧时，“百姓惩东苑之戮，悉皆惊散。叠掘、麦田、车盖诸部尽降于蒙逊”[60]。这使傉檀的堡垒政策失去防御效能，而傉檀也不得不以司隶

校尉敬归及其子佗为人质，向北凉请和。

二 穷兵黩武以至于亡

从阳武之败到边梁之乱，再到东苑之诛，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了姑臧时期南凉所面临的困难和危机，也反映了南凉统治者在处理内部矛盾时表现出的残忍与暴虐，它与孟祎当初讲的仁德为政的道理大相径庭，也与宗敞所献的“文教兼设”策略背道而驰。于是，南凉政权只能沿着秃发部族“礼容弗被，声教斯阻”和“穷兵黩武，丧国颓声”[61]的方向滑下去，最终还得将姑臧拱手让人，并滑向穷途末路。

如前所论，南凉政治有许多落后性，一味征伐弱小部族和暴力掠民两点是最突出的。从乌孤立国时起，专征和掠民就作为一种传统性国家职能而存在。专征的结果，使南凉徒具国家形式而实则仍是以秃发氏为核心的军事联合体，它内部松散，基础极不稳固。大量掠民虽使南凉获得兵源、劳力和物资方面的补给，但却造成种种积怨，导致秃发部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尖锐对立，这是形成众叛和内乱的根源。在强敌压境时，种种矛盾都会在内部起作用，这又最终造成南凉的崩溃。

傉檀时期，对弱小部族的武力征伐仍在不断进行。如405年，“遣其将文支讨南羌、西虏，大破之”[62]；406年迁都姑臧前袭击西平、湟河羌部，徙其民于武兴诸郡；414年灭亡前夕，远袭乙弗部，掠其牲畜。诸如此类的活动屡见不鲜。关于徙民，更是利鹿孤惯常性的活动。所以史称其“唯以徙户为务”[63]。

嘉平三年（410），南、北二凉在武威以西和张掖以东地带拉锯作战，你攻掠过来，我攻掠过去，但总的形势对南凉十分不利。临松本是沮渠蒙逊老家，410年南凉掠徙临松人之后，“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于显美方亭，破车盖鲜卑而还”[64]。接着，南凉反报复，派俱延再攻北凉，又大败而归。傉檀还不甘心，坚持要率军亲征。当赵晁及太史令景保谏止时，他对赵、景说：“蒙逊往年无状，入我封畿，掠我边疆，残我禾稼。吾畜力待时，将报东门之耻。”[65]景保坚持说军不可动，动必无利，傉檀十分生气，锁保而行，曰：“有功当杀汝以徇，无功封汝百户侯。”[66]结果又败于穷泉（今张掖东），所带五万骑兵丧失殆尽，而自己单马逃回。北凉军队乘胜追击，包围了姑臧。姑臧城内，各族百姓怕再有像东苑之诛那样的事发生，纷纷逃散，包括叠掘、麦田、车盖诸部鲜卑在内的“夷、夏万余户降于蒙逊”[67]。傉檀无计可施，在将司隶校尉

敬归与其子佗作为人质向蒙逊请和时，敬归又半路逃回。蒙逊一怒之下，掳走姑臧居民八千余户。

到410年左右，南凉已无能力进行拉锯战，也无力再镇守姑臧。可是变乱并不停止，“右卫将军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今武威西南）以叛”[68]。傉檀既怕姑臧被北凉攻陷后自己国破家亡，又怕折掘奇镇攻占洪池岭以南自己失去退路。于是，他决定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自己率群臣撤向乐都。君臣刚离姑臧，城内又发生民变，焦谌与王侯聚城民三千余家推焦朗为首，占领了南城。

411年春，沮渠蒙逊攻入姑臧，派其弟沮渠挐为秦州刺史镇姑臧，自己则率军入湟中攻乐都。傉檀乘北凉军队来伐，“遣其安北（将军）段苟、左将军云连乘虚出番禾以袭其后，徙三千余家于西平”[69]。

沮渠蒙逊在包围乐都一月后，派使者传信城中，提出要傉檀以子为质换取退兵，遭傉檀拒绝后，“蒙逊怒，筑室返耕，为持久之计”[70]。在群臣苦求下，傉檀才答应派子安周为质，蒙逊也撤围而去。但北凉刚撤军，吐谷浑树洛干又率军来攻，大败傉檀太子武台。

从姑臧到乐都，南凉接连失利。所以，胡三省评论说：

> 傉檀自据姑臧之后，与四邻交兵，所遇辄败，不惟失姑臧，亦不能保乐都矣！《诗》曰：“毋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正谓此也。[71]

亡国在即，傉檀仍不思养兵蓄民，而一味穷兵黩武。以质子换得北凉撤兵后，他再谋雪耻。孟恺等一班臣僚阻止他，劝他固守伺隙，不要妄动，但他听不进去。既而“五道俱进，至番禾、苕藋，掠五千余户”[72]。小胜后，鲜卑将领屈右与伊力延又各执一词，屈右主张退兵，伊力延主张进兵。

> 其将屈右进曰：“陛下转战千里，前无完阵，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师，早度峻险。蒙逊善于用兵，士众习战。若轻军卒至，出吾虑表，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之道也。”卫尉伊力延曰：“我军势方盛，将士勇气自倍，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旋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73]

傉檀竟不用屈右之言，以致屈右含愤告其诸弟说：“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74]果然，蒙逊乘风雨晦暗挥军进击，大破傉檀

军，再次追奔到乐都城下，迫使傉檀又以子染干为质。

在南凉与北凉兵连祸结，南凉屡告失利之时，西秦火中取栗。411年秋天，乞伏乾归派他的两个儿子炽磐与审虔进攻南凉。八月，秦军渡过黄河，傉檀子武台在洪池岭南阻击秦军失利，被掳走牛马十余万头。

412年春，傉檀再向蒙逊寻衅，遣安西将军纪勃耀兵于西境。蒙逊则用突袭西平和掠其牛马进行报复。

在穷兵黩武的同时，一些南凉重臣则纵情享乐而不思报国。如湟河太守文支，他“荒酒愎谏，不恤政事”[75]。另外，汉族官僚内部也闹内讧。邯川人卫章等谋杀孟恺，以应西秦，被郭越密告，“恺诱章等饮酒，杀四十余人”[76]。这时，南凉在经济上也捉襟见肘，致使举国上下人心惶惶。于是当乞伏炽磐耀兵至邯川（今西宁南黄河北岸），沮渠蒙逊再攻南凉时，湟河太守文支举郡投降了北凉，城内五千余户百姓被徙往姑臧。傉檀不得已又送太尉俱延入北凉为人质。

北凉为了最终攻克乐都，从412年起一直采用袭扰和围困战术削弱南凉。南凉虽一次次用送宗室成员作人质的方式换得北凉姑息，但无法克服因受围困造成的困难，也无法组织农业生产。到414年时，乐都已“不种多年，内外俱窘”，“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百姓骚动，民不安业”，经济境况越来越不佳，粮食和一应物资的匮乏，对政治形成沉重压力。这时，孟恺等主张通过“结盟炽磐，通籴济难，慰喻杂部，以广军资”的途径度过危难，然后再“畜力缮兵，相时而动”[77]，而傉檀则要用掠夺其他部族来补充给养，最后竟决定远袭乙弗。乙弗又称乙弗敌，在吐谷浑之北，“众有万余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谷，唯食鱼与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风俗亦同。”[78]远袭乙弗的原因一是乙弗、契翰都背叛了南凉，二是两部都盛产牲畜。出军时，傉檀对太子武台说：“蒙逊近去，不能猝来；旦夕所虑，唯在炽磐。然炽磐兵少易御。汝谨守乐都，吾不过一月必还矣。”[79]但他万万没料到，他这次远征乙弗却招致了亡国，而亡其国的正是乞伏氏。

在傉檀率七千骑兵西出后，乞伏炽磐率兵而至。武台与抚军从事中郎尉肃等商讨守城之计。尉肃提议聚“国人”（指秃发部人）于内城，由自己带“晋人”（指汉族人）拒战于城外。武台则认为西秦军队旦夕可退，不足为虑，他忧虑的是城中汉人。“武台惧晋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谋者闭之于内。”[80]孟恺哭着对武台说，汉族大臣世受国恩，人思

自效，并且明白一旦城破，必作俘虏及必遭迁徙的命运。他希望武台丢掉民族成见，动员一切力量，众志成城。武台不听，结果，“一旬而城溃”[81]。

乐都被西秦军队攻陷后，驻在西平的安西将军、乌孤之子樊尼赶往乙弗向傉檀报告消息。时傉檀已破乙弗部，“获牛马羊四十余万”[82]。得知乐都陷落，谋“藉乙弗之资，取契汗（即契翰）以赎妻子”。[83]又挟众西攻契翰部。途中，部众多数逃返湟中，去追逃亡者的镇北将军段苟也一去不返，“将士皆散，唯中军纥勃、后军洛肱、安西樊尼、散骑侍郎阴利鹿在焉”[84]。

傉檀自知无路可走，痛悔万分。他对樊尼等说：

> 与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一万。蒙逊方招怀遐迩，存亡继绝，汝其西也。纥勃、洛肱亦与尼俱。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85]

傉檀投降西秦时，身边只有阴利鹿。他问阴利鹿，为什么在众叛亲离时他却跟随？阴利鹿回答说：在国破家亡时，虽不能效申包胥哭秦廷乞北凉出兵，“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愿开弘远猷，审进止之算”。傉檀感叹说：“知人固未易。”[86]阴利鹿说出了南凉亡国的要害，即只图武功而不知进止。

嘉平七年（414）六月，秃发傉檀到西平投降了乞伏炽磐。至此，南凉灭亡。一年后，傉檀被鸩杀。

南凉政权共存在十八年（397～414）。其中，傉檀在位十三年（402～414）。

[1]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2]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3]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4] 《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正月条，第3412页。

[5] 《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正月条，第3412页。

[6]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3142页。

[7]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又《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七月条胡注谓："乙弗、折掘二部，皆在秃发氏之西。廉川在湟中。"（第3422页）

[8] 《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七月条，第3422页。

[9]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0]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

[11] 《资治通鉴》卷110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条，第3480页。

[12] 《资治通鉴》卷110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条，第3480页。

[13]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

[1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9《南凉录》，第614～615页。

[15]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

[16]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

[17]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4页。

[1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9《南凉录》，第616页。

[19]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第3120页。

[20]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4页。

[21]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

[22]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4页。

[23] 《资治通签》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三月条，第3521页。

[24]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7页。

[25]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3146页。

[26]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6页。

[27]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6页。

[28]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6页。

[29]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7页。

[30]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8页。

[31]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8页。

[32]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7页。

[33]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八月条，第3526页。

[34]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8页。

[35]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8～3149页。

[3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37]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0《南凉录》（第622页）同。另《资治通鉴》卷114系此事于406年（第3590页）。

[38]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条，第3590页。

[39]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条，第3590页。

[40]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条，第3590页。

[41]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42]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史臣语，第3158页。

[43]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44]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另“十有二主”《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0《南凉录》作“十有三主”（第623页）。

[45]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46]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条，第3591页。

[47]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按，中华书局点校本将“文齐”视作人名，误，今据其后“武同飞羽”改。

[48]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49]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50]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三年十一月条，第3603页。

[51]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三年十一月条，第3603页。

[52]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

[53]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3151页。

[54]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

[55]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三年十一月条胡注，第3603～3604页。

[5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0《南凉录》（第624页）同。

[57]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

[58]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

[59]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2页。

[60]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3页。

[61]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史臣语，第3158页。

[62]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63]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6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9《南凉录》（第617页）同。

[64]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2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27页）同。

[65]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2～3153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27页）同。

[6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3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27页）同。

[67] 《资治通鉴》卷115晋安帝义熙六年三月条，第3630页。

[68] 《资治通鉴》卷115晋安帝义熙六年三月条，第3630页。

[69]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70]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71] 《资治通鉴》卷115晋安帝义熙六年三月条胡注，第3630页。

[72]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73]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74]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75]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7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5页。

[77]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5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29页）同。

[78] 《通典》卷190《边防六·西戎二》，典1022上。

[79] 《资治通鉴》卷116晋安帝义熙十年五月条，第3666页。

[80]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6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30页）同。

[81]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6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30页）同。

[82]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5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30页）同。

[83]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6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30页）同。

[84]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6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30页）同。

[85]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6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30页）同。

[8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6~3157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31页）同。

〖卷五〗 西凉篇

第一节 西凉立国

西凉是李暠所建。

李暠，字玄盛，小字长生，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为西汉李广的第十六世孙。

> 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甘肃今临洮县），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1]

自汉及晋，李暠家族累世簪缨。西晋时，他的高祖父李雍任东莞太守，曾祖父李柔任北地太守。祖父李弇仕张轨，官至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父李昶，初有令名，任前凉世子侍讲，早卒。李暠是李昶的遗腹子。

李暠好学，幼时受到良好教育。他“通涉经史，尤善文义”，“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2]又喜结交名士，与郭黁、宋繇志同道合。郭黁是西平人，精通易学，明习占侯，尤擅长于卜吉凶，测未来。言诸事，多所应验。吕光时任太史令，“光比之京（房）、管（辂），常参帏幄密谋”[3]。他后来起兵反吕，“百姓闻黁起兵，咸以圣人起事，事无不成，故相率从之如不及”[4]。宋繇，敦煌人，宋配之后，是李暠异父同母兄弟，二人常共起居。他“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5]，是著名的敦煌学者。

吕光末年，后凉失政。段业、沮渠蒙逊及秃发乌孤等纷纷起兵反对吕光，李暠、郭黁、宋繇等响应段业。龙飞二年（397），段业自称凉州牧及建康公后，以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拜李暠为效谷（今敦煌市西）令。不到一年，孟敏卒，敦煌护军冯翊人郭谦等劝暠自领郡太守：

推（暠）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玄盛初难之，会宋繇仕于（段）业，告归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郭黁之言耶？白额驹今已生矣。"玄盛乃从之。[6]

原来，段业起兵前，郭黁已预料到后凉将败，曾对宋繇说：

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騧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7]

398年，李暠进号冠军将军，称藩于段业。受段业委署，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西凉进入建国时期。

399年春，段业称凉王，其右卫将军索嗣在段业面前构陷李暠，谋取而代之为敦煌太守。而段业也怀疑李暠有异志，便同意索嗣代替李暠。于是，索嗣率五百骑兵，从张掖赶往敦煌。在离城二十里处传语李暠迎接自己。李暠拟将出城迎接时，被效谷令张邈和宋繇劝止。张邈对他说：

吕氏政衰，段业暗弱，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将军处一国成资，奈何束手于人！索嗣自以本邦，谓人情附己，不虞将军卒能距之，可一战而擒矣。[8]

宋繇也说：

大丈夫已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于（索）嗣，岂不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杰，有雄霸之风。张王之业不足继也！[9]

意思是要他当机立断，与段业决裂，效法张轨，自成霸业。

李暠虽出身于陇西士族并素著人望，但与索嗣相比，他毕竟不是敦煌籍人。当时的敦煌不仅地理位置特殊，而且文化发达，人物荟萃，具有不同于一般地区的人文环境条件。李暠也曾说：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10]

他深知自己不具备乡党与婚姻缔结成的社会基础，难以在敦煌地域政治中立足。他所谓的社会基础，是指索、宋、阴、张等敦煌著姓家族。而索嗣敢于取代李暠，正是因为具备"自以本邦，为人情附己"的条件。虽然"玄盛素与嗣善，结为刎颈交"[11]，但李暠不属于敦煌著姓家族，因此在坐镇敦煌这一点上，索嗣是当仁不让的。而李暠也正是惧于敦煌著姓豪门不支持自己，在受索嗣构陷后虽"深恨之"，但也只能听命

于段业，坐等索嗣来取代自己。张邈、宋繇作为敦煌著姓和士人领袖，提出拒索嗣于敦煌城外，无疑给李暠增添了信心，至少使他了解了敦煌著姓豪门的态度。他说：

> 吾少无风云之志，因官至此。不图此郡士人忽尔见推！向言出迎（索嗣）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12]

这道出了他的心曲，也说明西凉政权的产生，是陇西和敦煌两大右姓集团实现政治联合的结果。

按照张、宋的主张，李暠遣子李歆、李让与张邈、宋繇及司马尹建兴等率兵拒战索嗣。索嗣兵败逃回张掖后，李暠又上书给段业，历数索嗣罪状。而北凉权臣沮渠男成一方面与索嗣有芥蒂，另一方面早就图谋剪除段业羽翼，于是怂恿段业，使其杀掉索嗣，并“遣使谢玄盛”[13]。接着，段业“分敦煌之凉兴（治今敦煌东、瓜州西）、乌泽（治今瓜州东）、晋昌之宜禾（治今瓜州县）三县为凉兴郡，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14]。西凉的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400年底，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段业而支持李暠，还传檄敦煌、酒泉、晋昌、凉兴、建康等张掖以西各郡，推举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内，建年为庚子。追尊祖弇曰凉景公，父昶凉简公”，[15]并大事册封勋望。这标志着西凉正式立国。

第二节 李暠的政治

一 著姓政治

五凉中，只有前凉和西凉是汉族官僚建立的割据政权，故政治上两者有相似之处。此外，李暠时期的政治更带有封建特点和著姓政治色彩。

首先，李暠选用清一色的河陇著姓担任政府要职，敦煌大族和名门之后居其大半。

在庚子元年（400）李暠册封的官吏中，宋、索、氾、阴、令狐、张氏等家族人数最多。计有索氏五人：索仙为长史，索承明为牧府右司马，索训为威远将军、西平太守，索慈为广武太守，索术为武兴大守；张氏六人：张邈为右长史，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张林为太府主簿，张谡为牧府右司马加扬武将军，张靖为折冲将军；令狐氏二人：令狐溢为右长史，令狐赫为武威太守；氾氏一人：氾德瑜为宁远将军、西郡太守；阴氏一人：阴亮为西安太守。关陇人士中，天水著姓中的尹建兴为左司马。尹建兴是李暠妻尹氏的胞兄，西州谣谚有“李尹王敦煌”之说[16]，这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谣谚意思相仿。另外，受册封者还有赵开，其郡望不明，疑与北凉赵柔同宗，为金城著姓，受任为骍马护军、大夏太守。

李暠用清一色的豪门著姓人物作为西凉统治集团核心，这在同时期的后凉、南凉、北凉等诸凉政权中独树一帜。其政治目的如李暠自己所说，在借此“以招怀东夏”[17]，即换取汉族上层社会的支持来与其他民族建立的诸凉政权相对抗。

被李暠罗致西凉政府中的著姓豪门大都是前凉名士和贵胄的后裔。如宋繇是宋配之后，索仙等是索袭和索紞之后，氾德瑜是氾瑗之后，阴亮是阴澹之后。他们的祖先在为前凉竭尽股肱之力的同时，也沉淀起门户，成为河西地方政治势力的代表。此外，令狐氏家族中的令狐亚和令狐敏也曾居前凉要职，张氏家族在前凉做官的人数更多，张谘、张质、张植、张穆是其中几个。与索、宋、氾、阴等家族相比，令狐氏与张氏的门第更古老，堪称河西旧姓。有记载说令狐氏源于西周王室，原封地在太原（今宁夏固原北）。王莽代汉，令狐迈起兵讨莽，兵败身死。三

个儿子避难“皆奔敦煌”。后来，长、次二子相率入西域，幼子令狐称“为故吏所匿，遂居效谷”。[18]也有记载说从令狐迈起，令狐家族已定居敦煌。[19]要紧的不是落户敦煌的早晚，而是门资和宦历。如令狐迈官居西汉建威将军，为兴复汉室而死，属忠义节烈之流。这决定了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决定了其家族在河西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张轨时，“晋昌大族”张镇、张越兄弟谋逆，担任太府主簿的令狐亚用几句话就令其放杖，就是明证。河西著姓家家门宗强盛，这是他们能左右地方政治的原因。晋昌（今甘肃瓜州县东）张氏是一个例子。前凉时期，张氏已显示过门宗势力。张镇与张越自不必说，即如张邕，他“树党专权”，几使宋氏灭族。张氏门宗的强盛情况由张士度的事迹可见点滴。西晋初，张士度游学洛阳，遇到瘟疫，在洛的“乡人宗族”一下子死掉十多人。[20]侨居他乡尚且如此，在本乡本土，他们家族的枝繁叶茂是可想而知的。张氏的门宗势力是从曹魏时期开始沉淀的。曹魏初，张奂官居执金吾，是京城洛阳的最高警备长官。执金吾一职，秦时称中尉，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执金吾。平时司京城治安，遇到皇帝出巡，负责先导和防范意外。此时，“缇骑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生满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刘秀贫微时，瞻仰执金吾仪卫规模，感叹说：“仕宦当为执金吾！”[21]张奂正由此显贵。他是“敦煌渊泉人”[22]，渊泉县，故城在今瓜州县东。与晋昌是同一地域，故晋昌张氏和渊泉张氏实为同宗。曹魏时，敦煌郡内，“大姓雄张，遂为风俗”，历任守宰“循故而已，无所匡革”[23]，正为有张氏这样的家族之故。李暠深知对这样的家族只能“尽礼承敬”，不能有丝毫冒犯。所以，他见到前凉金城太守张质之子张显时，立即擢为酒泉太守，“引为功曹，甚器异之。尝称曰：‘吾之臧子原也！’”[24]

李暠用人颇有气量，“至于朝为寇雠，夕委心膂”[25]。他能恰当运用策略，消弭著姓社会内部的矛盾。他自己曾说，敦煌历史悠久，实是名邦，乡党和婚亲关系复杂，家族和门宗盘根错节，因此事事都须小心谨慎。“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以此来做到“无负于新旧”。[26]他对索氏家族的态度就是这样。按理，索嗣是他的政敌，索氏子弟理应受到黜斥，但他没有这样做，对索仙、索承明、索慈等照样重用。

李暠依靠著姓的政策确实起到了“招怀东夏”的作用。402年，北凉西郡太守梁中庸来奔。梁中庸与沮渠蒙逊私交甚深，蒙逊得知他投奔西凉的事后，无可奈何地说：

吾与中庸义深一体，而不信我，但自负耳。[27]

这说明“招怀东夏”起到了瓦解敌人营垒的作用。由于重用著姓豪门，只有一郡之地的西凉政权不仅能迅速壮大，而且群臣和洽，内部稳定，很少发生内乱。

二 “东伐”战略

西凉立国于敦煌。名为一郡，最初实则仅有今甘肃敦煌和瓜州两县之地。因为“地狭民稀”，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缺乏实力。为了改变这种形势，创造与北凉抗衡的条件，李暠积极偃文修武，积蓄物资，扩充地盘；在立国当年，他派宋繇等向东、西两翼进取，“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28]。在拥有东起凉兴（治今敦煌东、瓜州南），西至玉门关和阳关之间的土地后，他蓄养兵力，在玉门关和阳关一带兴办屯田，“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29]。

“东伐”是李暠的基本发展战略，也是他个人的政治志向。其主旨是继承前凉，追踪窦融，坐镇河西。405年，李暠改元建初，正月，派遣舍人黄始与梁兴间行赴建康，给晋安帝司马德宗上表。表章洋洋数千言，从汉末讲到三国，再讲到西晋统一和分裂，陈述了前凉以来的河西形势和自己在“五胡僭袭”艰难世事中的心境，他希望东晋朝廷理解自己“依窦融故事”成“桓文之业”的苦衷。表章字字诚挚，句句慷慨，字里行间浸透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感情。其中谈道，“至如此州，世笃忠义”，“江凉虽辽，义诚密迩。风云苟通，实如唇齿”[30]。这篇表章可以说是李暠的政治宣言，宣告他要依托东晋，保据河西，即“冀杖宠灵，全制一方”[31]。为了实现他的志向和完成“东伐”，他积极推进封建政治。

403年，李暠在敦煌南门外党河岸边建筑堂舍，取名靖恭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兼为教化群臣之所。堂成，“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32]。敦煌著名学者刘昞撰写《靖恭堂铭》以志此事。堂成当月，有白雀飞翔于其上，“玄盛观之大悦”[33]。此时，吕光称凉王时被派到于阗购求“六玺”之玉的使者返回敦煌，李暠将玉收入府库，准备作六玺之用。

为了培养人才，并为著姓子弟提供优先受教育的机会，李暠在敦煌兴办了学校。“（庚子）五年（404）正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

人。”[34]为表示奖掖人才和招贤纳士，又“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35]。

李暠重视教育，是要做到让教育为西凉政治服务。他在建初元年（405）写的《诫子书》是他寓政于教的经典作品，也是将儒家修身治国思想同西凉政治相结合的教科书。书中他要求诸子处世要谦恭谨慎，为政要公正廉明。要“杜渐防萌，深识情变”。要“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按，听讼诉”。要“禁御左右，勿作威福”，“广加咨询，无自专用。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探汤”。要“富贵而不骄”，“僚佐邑宿，尽礼承敬，……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413年，李暠又抄《诸葛亮训励》勉励诸子，并针对他们“弱年受任”提出术业上要求：

> 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36]

李暠尊重士人，尊重文化。他重用宋繇，除宋繇与他为同母兄弟以及宋繇在西凉建国中立有殊功之外，还因为宋繇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另外，他对刘昞更是崇礼有加。刘昞，字彦明，敦煌人。出身于儒学世家，又师承郭瑀，任李暠儒林祭酒从事中郎，主管文教和注记。李暠尊重文化，从他对书籍的珍爱和与刘昞的关系中可见一斑。

> 暠雅好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时昞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暠谓之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哉，敢不如此？”[37]

李暠与刘昞是政治与学术相统一的关系。

所以，李暠时期文治之风昌盛，这在五凉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在经过五年左右的内修政理和积蓄国力后，李暠开始实施他的“东伐”战略。

东伐的第一步是迁都酒泉。酒泉原属北凉。401年，酒泉与凉宁二郡叛降于西凉。为了迁都，李暠先委任张体顺为宁远将军和建康（治今高台县南）太守，镇乐涫（今高台县西北）；以宋繇为右将军，领敦煌

护军，协同其子敦煌太守李让镇敦煌。迁都前，他向群僚阐述此举的政治意图。

玄盛谓群僚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竞起。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何尝不忘寝与食，思济黎庶。……今惟蒙逊，鸱跱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38]

意思是招怀东夏已见成效，迁都为的是"渐逼寇穴"[39]，然后待机直捣张掖。对于这点，只有长史张邈一人表示赞同，其余属僚都保持沉默。因为与北凉相比，西凉显然弱小得多，它能用于作战的部队通常不过二三万，"渐逼寇穴"不一定有利。胡三省对此也有评论：

李暠迁酒泉欲以逼沮渠蒙逊，安知反为蒙逊所逼邪！[40]

李暠于405年迁都。迁都以后，西凉与北凉之间的冲突加剧。

李暠推行东伐战略时，蒙逊也在推行西取战略。只是406年以后，秃发傉檀从姚兴手中讨得姑臧，沮渠蒙逊必须将南凉作为主要敌人加以对付，因此不得不暂缓对西凉的进攻。这使李暠的东伐间或也取得一些小胜。如406年，李暠亲自率领骑兵二万，略地到建康。沮渠蒙逊回击，掠建康百姓三千户东返，李暠率骑兵追击，在安弥（今酒泉市东）击败北凉军队，夺回被掠民户。但西凉更多的是失利，如407年，沮渠蒙逊再次率军进攻酒泉，待李暠发觉敌情时，北凉军队已行进到离酒泉城仅六十里的地方。李暠仓促出战，结果失败，"（暠）闭城自守，蒙逊亦引而归"。[41]可见，迁都酒泉后，形势开始对西凉不利。

形势越是不利，李暠越要做出"东伐"的姿态。为此，从406年起，他在酒泉发展生产，积蓄力量。

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42]

另外，他也不轻易消耗国力，"蒙逊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43]。但李暠也为东伐无功而抚剑长叹，正如他在407年上东晋朝廷的表文所说，他进师酒泉虽构成对沮渠蒙逊的威胁，只是"黠虏恣睢，未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窃以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44]。

这一时期，李暠也实行远交近攻。他称藩于后秦，还与南凉通盟。

> 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文既东迁，玄盛从姑梁褒之母养之。其后秃发傉檀假道于北山，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报聘，赠以方物。[45]

他想利用南凉从东面牵制北凉。

李暠虽则经营酒泉，实际仍将敦煌作为“军国之本”大力充实。406年，他进行“土断”，设置侨郡县，安置迁徙到敦煌一带的“东人”，将他们大部分编制于敦煌和晋昌二郡之间。另将一部分人口迁到酒泉。被编制和东迁的侨人约有两万多户，他们分别来自不同地方。有的早在前秦时期已流落河西。

> 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治今瓜州县东南），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三郡均治今敦煌东南）。[46]

为了防范敦煌以北鲜卑和以南羌人部落对敦煌的骚扰，李暠陆续整理敦煌城防，修城筑围。406年，“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413年，“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47]。.

这一切内政外交举措说明，李暠的“东伐”战略实际在借攻为守。经营酒泉和充实敦煌，为的是攻守有据。在和北凉的较量中，他不敢轻举妄动，所谓“但与通和，弗之校也”，“我闭门不与战，待其锐气竭而击之”[48]，都是上述策略的具体化。这样做，并非出自李暠本意，实在是迁都酒泉以后他才真正感受到了形势的压力。他的《述志赋》表述了他内心的苦闷：

> 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沮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49]

赋中讲到张氏以后到吕氏之末：

> 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求欲专而失逾远，寄玄珠于罔象。

> 悠悠凉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会，谅冥契而

来同。跨弱水以建基，蹑昆墟以为墉。

由这里讲到他景仰张良、诸葛亮、周瑜、鲁肃等前世英杰，很想像汉高祖、刘玄德、孙伯符等前世明君那样：

穆穆盛勋，济济隆平，御群龙而奋策，弥万载以飞荣。仰遗尘于绝代，企高山而景行。将建朱旗以启路，驱长毂而迅征。[50]

总之，字里行间充满了壮志难酬的怅惘。

建初十三年（417），李暠病重。向宋繇嘱托后事，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悲怆。他在为自己“不能一同河右”，“所恨志不申耳”，感到痛悔之余，将军国重任交给宋繇，要他辅导李歆，“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51]然后带着深深的遗憾死去，时年六十七岁。死后，群僚上书谥其为武昭王。死前，李暠曾著《槐树赋》以寄情：

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即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52]

李暠在位共十八年（400～417）。死后，子李歆继位。

第三节 李歆的政治

李歆，字士业，是李暠的次子。庚子五年（404），原世子李谭死，他继立为世子。嗣位后，改年号为嘉兴。417年是嘉兴元年。

西凉作为代表著姓利益的政权，李氏家族仍处于制重地位。从李暠的《诫子书》中可以看出，李歆兄弟“皆弱年受任”，置身戎旅，掌握军权。建初三年（407），李暠给东晋的表章也说：“又臣州界迴远，勍寇未除，当须镇副，为行留部分。”为此他请求东晋政府承认他几个儿子的军政权力，提出：

> 辄假臣世子士业监前锋诸军事、抚军将军、护羌校尉，督摄前军，为臣先驱。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自余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臣总督大纲，毕在输力，临机制命，动靖续闻。[53]

因李歆等久在戎旅，不谙政治，李暠才反复训诫他们勤学静思，劝勉他们通晓古今，练达时务，懂君臣之道，识安危之机。但李暠最终并未能将其对诸子的愿望与西凉的政治完美统一起来。李歆嗣位后，倒行逆施，使西凉政权转向了衰落。

首先，李歆穷兵黩武。他不顾国计民生，频繁地劳师动众。李歆嗣位时，河西已成西凉与北凉角逐的形势。当414年南凉亡国后，北凉解除了东顾之忧，可以专力来对付西凉，但李歆似乎不明白这一点。有人对他指出“区域三分，势不久并。并兼之本，实在农战。怀远之略，事归宽简”[54]。但他充耳不闻，总想在军事上以求一逞。他尚未占据张掖，却已命索仙为征虏将军并张掖太守，实际是向北凉寻衅，这导致了417年蓼泉之战的发生。[55]是战，沮渠蒙逊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叫张掖太守沮渠广宗假降西凉。李歆派武卫将军温宜去建康接应广宗，自己率大军继后。中途得知蒙逊已埋伏三万大军于蓼泉（今临泽境），他即撤兵回酒泉。这时蒙逊率兵追击，“歆亲贯甲先登，大败之”，追奔蒙逊百余里，俘斩北凉兵士七千余级。[56]蓼泉之战虽取得胜利，但李歆的轻躁急进和勇而少谋却暴露无遗。蒙逊了解了李歆的鲁莽，在次年又带兵进攻。当李歆又要出战时，被左长史张体顺力劝而止。然而，酒泉城外农田中已成熟的粮食却被北凉军队抢掠一空。

嘉兴四年以后，李歆更是接连出兵与北凉鏖战。七月，他命中外戒

严，谋攻张掖。其母尹太后劝说也无效。

> 宋繇又固谏，士业并不从。繇退而叹曰："大事去矣，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还也！"士业遂率步骑三万东伐。[57]

这样一次次地发动战争，即使"人力凋残，百姓愁悴"[58]，也使兵不卸甲，帑藏虚竭。年复一年，西凉的实力消耗殆尽，最后变得不堪一击。

其次，李歆生性暴戾刚愎，生活奢靡腐化。他"用刑颇严，又缮筑不止"[59]，杜忠拒良，一意孤行。

李歆嗣位后，气候异常，灾害不断。风、涝、沙暴及地震等频繁出现。照儒家天人感应学说讲，这是因政治不修而致"阴阳失序"和"犯伤和气"，故上天垂灾，进行谴责。鉴于李歆"用刑颇严"，又不听劝谏，一般臣僚只能借言天人之际进行迂回委婉的劝诫。如氾称上疏，从东晋咸安之初（371）西平地震、有狐狸入谦光殿讲到前凉灭亡，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姑臧南门坍塌和陨石坠于闲豫堂，讲到梁熙"外不抚百姓，内多聚敛"，以致受戮于吕光。认为举凡地震地裂，日精无光都预示着"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暗喻北凉将灭西凉。在迂回委婉之后，氾称直言时弊，他要李歆做到"亲仁善邻，养威观衅，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虚衿下士，广招英隽。修秦氏之术，以强国富俗"。并警告说，如仍不顾仓库有没有积贮和庭中有没有文武而一味逞强，"臣恐宗庙之危必不出纪"[60]。

像氾称这样从国家安危出发劝谏李歆的旧臣还有张显等，但李歆对他们的忠言一概置若罔闻，"并不纳"[61]。这样，西凉政治步入穷途末路。

第四节 西凉灭亡

西凉亡于北凉。在五凉中，只有它是被同时期的河西政权并灭的。

李歆嗣位的第四年，即嘉兴四年（420），江南的东晋政权也灭亡了。东晋权臣刘裕废掉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立刘宋王朝。当时，宋武帝刘裕招怀四裔，册封李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酒泉公，但这已是西凉灭亡的前夕。因为就在此时，北凉主沮渠蒙逊开始了他统一河西的攻势，攻取酒泉和敦煌二郡，是统一攻势的第一步。

沮渠蒙逊利用李歆的好战和勇而少谋，仍运用诱敌远出进行打击的战术。当年七月，他扬言进攻西秦的浩亹，在虚张声势后，又悄悄将军队带回张掖。

李歆听说沮渠蒙逊东攻西秦的事后，谋乘张掖防守空虚而袭取张掖。宋繇、张体顺等都认为不宜出师，但李歆不听。尹太后也反复劝阻李歆，并对他说：

> 汝新造之国，地狭民希，自守犹惧不足，何暇伐人！先王临终，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宁民，以俟天时。言犹在耳，奈何弃之！蒙逊善用兵，非汝之敌，数年以来，常有兼并之志。汝国虽小，足为善政，修德养民，静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将归汝；若其休明，汝将事之；岂得轻为举动，侥冀非望！以吾观之，非但丧师，殆将亡国！[62]

尹氏，天水冀（今甘谷县南）人，“幼好学，清辩有志节”，为李暠继室。“玄盛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李尹王敦煌。’”[63]李歆不纳尹氏之言，使宋繇深感痛心，他愤而长叹：“今兹大事去矣！”[64]

李歆这次谋袭张掖，倾全国兵力，才步骑三万。他企图与北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这正中蒙逊下怀。因此，这次战役关系到最终鹿死谁手。

沮渠蒙逊得知李歆兵出酒泉的消息，高兴地说：“歆已入吾术中。”[65]他再诈传情报，说自己浩亹之战已经得胜，不日将进攻黄谷，再诱使李歆步步深入。当李歆率军到达都渎涧时，发兵出击，两军“战于

怀城”[66]。李歆遭到痛击。这时身边将领劝他先退回酒泉。但他负气逞强地说：

> 吾违太后明诲，远取败辱。不杀此胡，复何面目以见母也！[67]

勒兵再战中，又败于蓼泉，自己也被北凉军队杀死。

李歆前后在位四年（417～420）。

李歆战死后，北凉军队乘胜追击，迫使李歆诸弟酒泉太守李翻、新城太守李预、羽林右监李密、左将军李姚、右将军李亮等放弃酒泉，逃往敦煌。随后。沮渠蒙逊统领北凉大军占领了酒泉城。据说此前，酒泉通街大树上有乌鹊争巢，鹊为乌所杀。“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炽梦白头公衣帢而谓炽曰：‘南风动，吹长木，胡桐椎，不中毂。’”[68]桐椎是李歆小名。这些传说和谚语表明西凉百姓民心所向。

北凉军队在攻占酒泉后，继续向西挺进。李翻及包括敦煌太守李恂在内的李氏子弟再退出敦煌城，逃上北山。沮渠蒙逊接收敦煌后，委派索嗣之子索元绪行敦煌太守事。

西凉虽将亡国，但敦煌人对李氏家族却深怀眷恋。特别是李恂，他任敦煌太守时，在郡中实行惠政，深受士民拥戴和敬重。而索嗣子索元绪则“粗崄好杀，大失人和”[69]，为士民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敦煌宋氏中的宋承和张氏中的张弘暗中送信给在北山的李恂，请他重返敦煌。李恂得信后，率数十骑返回城中，驱逐了索元绪，受宋承、张弘等推举，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改年号为永建。

为了彻底摧毁西凉残余势力，沮渠蒙逊派其子沮渠德政率兵进攻李恂。李恂紧闭城门，坚守不战。于是，蒙逊亲自率领两万军队，“三面起堤，以水灌城”[70]。而李恂则“遣壮士一千，连版为桥，潜欲决堤”[71]。最终，李恂因孤立无援而难以支持。当蒙逊再勒兵攻打时，宋承等先开城出降。李恂见败局已定，以自杀了事。为了对李恂进行报复，蒙逊在入敦煌之后，实行了屠城。

李恂是李暠第六子，他的称制是西凉政权的尾声。李恂最小的弟弟是李翻，李翻之子李宝即北魏李冲之父。沮渠蒙逊将李宝捕获，并迁徙到姑臧。422年，李宝跟随其舅唐契逃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称臣于柔然（蠕蠕）。“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接礼，甚得众心，皆乐为

用，每希报雪。”[72]直到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北魏扫荡了盘踞敦煌的沮渠无讳，李宝才卷土重来，“无讳捐城遁走。宝至伊吾，率流人及虏骑南袭敦煌，据之。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降于魏。独尹氏及诸女死于伊吾”[73]。后北魏以李宝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西陲诸军事、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承制玉门以西。“宝宽雅有度量，甚著威惠于西土。在敦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师。”[74]这些，仅是西凉政权的绪余。

西凉历二主，存在共二十一年（400～420）。

[1]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7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2《西凉录》谓：“李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狄道人也。”（第633页）

[2]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7页。

[3] 《晋书》卷95《郭麐传》，第2498页。

[4] 《晋书》卷95《郭麐传》，第2498页。

[5] 《魏书》卷52《宋繇传》，第1152页。

[6]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8页。

[7]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7页。

[8]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8页。

[9]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8页。

[10]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2页。

[11]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8页。

[12]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8页。

[13]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8页。

[14]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8页。

[15]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16] 《晋书》卷96《列女传》，第2526页。

[17]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18] 《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五下》，中华书局，1975，第3397页。

[19] 《通志》卷25《氏族略》。

[2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4《前凉录》，第527页。

[21] 《通典》卷28《职官·左右金吾卫》，典165上。

[22] 《后汉书》卷65《张奂传》，第2137页。

[23]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24] 《北史》卷34《张湛传》，中华书局，1974，第1265页。

[25]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2页。

[26]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2～2263页。

[2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页。

[28]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29]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30]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1页。

[31]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1页。

[32]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33]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2《西凉录》，第635页。

[3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2《西凉录》，第635页。

[3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2《西凉录》，第635页。

[36]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4～2265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2《西凉录》（第642～643页）同。

[37]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2《西凉录》，第641页。

[38]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1页。

[39]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1页。

[40]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元年八月条胡注，第3587页。

[4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8页。

[42]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4页。

[43]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4页。

[44]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2264页。

[45]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46]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47]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5页。

[48] 《资治通鉴》卷116晋安帝义熙七年八月条，第3647页。

[49]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5页。

[50]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6～2267页。

[51]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7页。

[52]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7页。

[53]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4页。

[54]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68页。

[55] 《资治通鉴》卷118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三月条胡注引《新唐书·地理志》谓："甘州张掖郡西北九十里有祁连山，山北有建康军，军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第3704～3705页。

[56]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4《西凉录》，第647页。

[57]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70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4《西凉录》（第649页）略同。

[58]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68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4《西凉录》（第647～648页）略同。

[59]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68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4《西凉录》（第647页）略同。

[60]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68～2270页。

[61]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70页。

[62] 《资治通鉴》卷119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条，第3736～3737页。又《晋书》卷96《列女传》（第2526～2527页）略同。

[63] 《晋书》卷96《列女传》，第2526页。

[64] 《资治通鉴》卷119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条，第3737页。

[65] 《资治通鉴》卷119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条，第3737页。

[66] 《资治通鉴》卷119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条，第3737页。

[67]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70页。

[68]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70页。

[69]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71页。

[70]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71页。

[71]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71页。

[72]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4《西凉录》，第650页。

[73]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4《西凉录》，第650页。

[7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2《西凉录》，第650页。

〖卷六〗 北凉篇

第一节 北凉立国

一 沮渠蒙逊起义和段业初立

北凉始于沮渠蒙逊发动的反吕起义。

沮渠蒙逊，临松（在今甘肃张掖市南）卢水胡人。卢水胡为匈奴支裔。因匈奴有左右沮渠之官，蒙逊先世曾任左沮渠，便以官为姓氏。其家族“世居卢水为酋豪”[1]。

蒙逊高祖父晖，曾祖父遮，祖父祁复延，都以雄武著称。父法弘，苻坚时任前秦中田护军，并袭爵北地王（又称狄地王）。法弘死后，“蒙逊代领部曲”[2]，直至后凉建立。史家介绍蒙逊说：

> 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梁熙、吕光皆奇而惮之。[3]

蒙逊出身于卢水胡贵族，汉化程度甚深，又富有才智和韬略，并拥有一支部落军事力量。这些条件决定了他将在群雄竞逐的河西政治环境中崛起。而吕光时期，推行氐族本位政治和排斥其他民族的做法，给了蒙逊集合部落力量，利用民族矛盾崛起的机遇。当吕光时，“使蒙逊自领营人，配厢直，又以蒙逊伯父罗仇为西平太守。罗仇弟麹粥为三河太守”[4]。名义上重用而实际上隔离，使罗仇、麹粥等内心不安。蒙逊则为不引起吕光怀疑，“常游饮自晦”[5]。

后凉龙飞二年（397），吕光征讨乞伏乾归失败，诿罪于罗仇和麹粥，制造民族仇杀，这成为蒙逊起义的导火线。

早在395年，吕光曾发兵十万，进攻西秦。西秦王乞伏乾归接受左辅密贵周和左卫将军莫者段羝等建策，称藩于吕光。送子勃勃为质，换

得吕光退兵。接着乾归反悔，杀掉建策者。后凉龙飞元年（396），吕光即后凉天王位后，即谋讨伐西秦。次年，他兵出枹罕，进攻金城，连下西秦金城、临洮、武始、河关等郡县。但随后，乾归运用羸师之计，诱吕光弟吕延入埋伏，一举击溃吕延统率的后凉兵，并杀吕延，迫使吕光放弃已攻占的金城等郡县，退兵枹罕。

这次战役，罗仇及麹粥率部人从征。败回姑臧后，麹粥知吕光必嫁祸他族。为不做替罪羊，麹粥便劝兄罗仇率部起义。他对罗仇说：

> 主上荒耄骄纵，诸子朋党相倾，谗人侧目。今军败将死，正是智勇见猜之日，可不惧乎！吾兄弟素为所惮，与其经死沟渎，岂若勒众向西平（今青海西宁），出苕藋（在今永昌县界），奋臂大呼，凉州不足定也！[6]

但罗仇愚执，说什么沮渠家族“累世忠孝，为一方所归。宁人负我，无我负人”[7]。结果二人都遭吕光杀害。

吕光擅杀卢水胡酋豪，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激发了卢水胡部族对后凉统治的反抗情绪。罗仇二人入葬时，“宗姻诸部会葬者万余人”[8]。当此之对，沮渠蒙逊哭着对部人说：

> 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吕王昏耄，荒虐无道，岂可不上继先祖安时之志，使二父有恨黄泉！[9]

于是，一场反对后凉民族压迫的起义就这样爆发了。蒙逊和诸部首领订立盟约，共谋推翻吕光。不到十天，部众发展到一万多人，并屯兵于金山（在今山丹县南）。

起义初期，蒙逊小有失利。屯军金山后，遭到吕纂的进攻，“蒙逊败绩，将六七人逃入山中，家户悉散亡”[10]。未几复振，因为驻在晋昌的沮渠男成为配合蒙逊起兵，潜入赀虏部落，鼓动与赀虏有联系的“诸夷”起兵，聚合起数千人的队伍，屯驻于乐涫（今高台县西北）。赀虏部队击败前来讨伐的后凉军队，并杀掉酒泉太守叠滕[11]，从西面支持了蒙逊。这样，蒙逊得以招聚溃散的部曲，再整旗鼓。

接着，沮渠男成进攻建康。他先派使者入建康城，游说吕光的建康太守段业。使者对段业说：

> 吕氏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连城，瓦解之势，昭然在目，百姓嗷然，无所宗附。府君岂可以盖世之才，而立忠于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义，欲屈府君抚临鄙州，使涂炭之余蒙来苏之惠。

[12]

因段业不听，男成包围建康两月。段业等不到吕光的救兵，又因他素日与吕光侍中房晷及仆射王详有矛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郡人高逵、史惠等劝说，答应了男成的拥戴，并在蒙逊与男成推举下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又改吕光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397），并授任蒙逊为镇西将军、张掖太守，授男成为辅国将军、酒泉太守，并“委以军国之任”[13]。这标志着北凉政权的初步形成。

二 沮渠蒙逊夺权和北凉立国

段业，汉族，京兆人（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他“博涉史传，有尺牍之才”，“儒素长者，无他权略”。[14]原为前秦小吏，在吕光部将杜进手下任记事之职，随杜进跟吕光征西域，后转迁吕光参军。吕光入龟兹，赋诗言志，命段业著《龟兹宫赋》。吕光入姑臧，段业任著作郎，郁郁不得志，疗疾于天梯山，作诗讽谏吕光不能激浊扬清。后做建康太守，仍不受重用。被蒙逊等推举改元称制后，“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谶记、巫觋、征祥，故为奸佞所误”[15]。

以段业的政治才干，难以担当推翻吕光的大任。最初，他依靠蒙逊，尚能屡战屡胜。如神玺元年攻西郡，部下都怀疑难以攻克，独蒙逊坚持认为西郡地势险要，势在必取，使段业坚定了信心。后来蒙逊引水灌城，活捉太守吕纯。西郡一攻克，后凉晋昌太守王德及敦煌太守孟敏等都相继投降。克西郡后，段业又派男成和王德进攻张掖，驱逐了后凉的常山公吕弘。而后，段业徙治张掖。

可见，北凉初创时期，段业主要仰仗蒙逊。但徙治张掖后，段业开始疏远蒙逊，以致军事上的失败接踵而至。如吕弘弃张掖东逃，蒙逊谏段业“穷寇弗追”，段业不听，率众追击，为吕弘所败；又如段业筑西安城（今张掖市东南），以臧莫孩为太守。蒙逊深知臧莫孩为人，对段业说：“莫孩勇而无谋，知进忘退，所谓为之筑冢，非筑城也。”[16]段业又不听。未几，臧莫孩也败于吕纂。

在一次次失败之后，段业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更加猜忌蒙逊。蒙逊明白难以与段业为谋，“惧业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17]。

天玺元年（399），段业称凉王，以蒙逊为尚书左丞，以梁中庸为

右丞。此后，蒙逊又多次展现了他的权智雄勇。天玺二年（400），西凉立国，李暠“招怀东夏”，原晋昌太守唐瑶叛归李暠。接着，酒泉太守王德也叛变，自称河州刺史。蒙逊击败王德，逼其奔晋昌与唐瑶合军。蒙逊率兵追击到池头（酒泉郡属县），虏王德妻子和部众而还。蒙逊越是屡建奇功，段业对他猜忌之心越重，“业惮蒙逊雄武，微欲远之”[18]。便改派蒙逊去做临池太守，而以马权代之为张掖太守。马权武略过人，段业想借他挟制蒙逊。而马权也“每轻陵蒙逊，蒙逊亦惮而怨之”[19]。这迫使蒙逊寻找机会除去马权。他利用段业喜听谗言和马权残忍好杀，离间段、马之关系，终使段业杀掉马权。另外，沮渠男成为剪除羽翼，也用同样方法使段业杀掉索嗣。

在翦除段业的羽翼后，蒙逊建议男成起兵取代段业。他对男成说：“段业愚暗，非济乱之才。信谗爱佞，无鉴断之明。所惮唯索嗣、马权，今皆死矣！蒙逊欲除业以奉兄何如？”[20]男成认为段业是羁旅之人，由自己推举，先举后弃未免不义，于是此谋搁置。

天玺三年（401）三月，蒙逊以段业越来越嫉恨自己，为防不测，主动要求去做西安太守。段业深知蒙逊有大志，必不肯久居人下。为防“朝夕之变”，答应了蒙逊的要求。这时，蒙逊已做好了朝夕为变的准备。他利用男成在朝廷中的威望，再次使用计谋，使段业杀男成以激起朝野愤懑。

> 蒙逊期与男成同祭兰门山，密遣司马许咸告业曰：“男成欲谋叛，许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兰门山，臣言验矣。”至期日，果然。业收男成，令自杀。[21]

男成是为何死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男成被杀后，蒙逊集其部下，誓众起义：

> 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见屠害，诸君能为报仇乎？且州土兵乱，似非业所能济。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为陈（胜）、吴（广）耳！而信谗多忌，枉害忠良。岂可安枕卧观，使百姓离于涂炭！”男成素有恩信，众皆愤泣而从之。比至氐池（今张掖市界），众逾一万。[22]

蒙逊这次起事，是他前次起义的继续。前次是反抗吕光，这次是反抗段业。吕、段二人，虽一氐一汉，种族不同，但其所作所为实际上并无差别。首先，他们都持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民族偏见。他们利用卢水胡的雄武善战，却都不信任卢水胡将领，采取压制、排斥，甚至残杀态度。沮渠罗仇、沮渠麹粥与沮渠男成在不同时期的相同命运说明了这一

点。蒙逊虽利用了段业的民族偏见和喜谗多忌制造出男成的不幸，但他自己也常因惧祸而“内不自安”。因此，他对段业的反抗与对吕光的反抗都带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其次，段业与吕光都“信谗多忌”，并且刚愎自用。所不同者，段业无济世之才，而吕光荒耄老病，他们的统治妨碍着河西社会的发展。由于他们都滥杀无辜，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社会的不宁和区域分裂形势的加剧。正因为这样，蒙逊的两次起义都具有正义性。而史家讥评蒙逊“见利忘义，苞祸灭亲”[23]，既缺乏公正，又不足为训。事实上，封建政治多有权诈。蒙逊利用段业杀掉男成，激起公愤，发动起义，这种权诈，也许正是他“英略”和“善权变”之处。男成因“愚忠”受戮，罪在段业。蒙逊反对段业之所以受到胡族如臧莫孩，汉族如“西平诸田”及梁中庸等人响应和支持，并在起兵后能迅速安定张掖一域，对北凉政治造成新的建树，这些都证明蒙逊第二次起事深得人心，正因如此，沮渠蒙逊才成为北凉政权的真正奠基人和建立者。

二次起兵后，军事进展很快。“五月，蒙逊至张掖”，“（段）业左右皆散走”[24]。蒙逊杀掉段业，占据了张掖，夺取了政权。

天玺三年（401）六月，蒙逊受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奉，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设置文武：

> 署从兄伏奴为镇军将军、张掖太守、和平侯，弟挐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镇南将军、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擢任贤才，文武咸悦。[25]

北凉在张掖正式立国。

第二节 沮渠蒙逊时期的政治

一 审时度势，示外以弱

沮渠蒙逊称凉州牧时，河西分裂的局面已经形成。397年，秃发乌孤称西平王，次年定都乐都，割据湟中；400年，李暠称凉公，割据敦煌。而姑臧仍为吕隆所盘踞。另外，西秦将领姚硕德也已兵临姑臧城下。

蒙逊是将推翻吕氏统治作为政治目标的。在推翻段业后，他不改初衷，继续出兵打击吕隆势力。这时，李暠正在“招怀东夏”，他感到来自西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也感到吕隆必将降于后秦，怕姚硕德再率军西进使自己陷于东西临敌的境地。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形势，他用稳妥的外交对付四邻。

首先是结好后秦。称凉州牧后，蒙逊立即派出从事中郎李典到长安去拜见后秦主姚兴，奉表入贡以通和好。吕隆归降姚硕德后，特别是酒泉与凉宁二郡叛归西凉后[26]，他又派弟沮渠挐和牧府长史张潜去姑臧，向姚硕德表示自己愿意率领部众随姚硕德东迁秦雍。这样做，是想阻止近在咫尺的秦军攻张掖。所谓“率郡人东迁”[27]虽是一句虚语，但却叫姚硕德信以为真，连张潜等也未辨其诈。张潜返回张掖后，极力劝说蒙逊兑现诺言，而沮渠挐私下对蒙逊说：

> 姑臧未拔，吕氏犹存，硕德粮尽将还，不能久也，何为自弃土宇，受制于人乎！[28]

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张潜因倾向后秦而被蒙逊处死。

其次是纳质南凉。南凉是反吕光的，在400年秃发利鹿孤称河西王后，南凉国力正盛，又假威于后秦，蒙逊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在反吕的共同目标之下，为了减少与南凉的摩擦，他主动与利鹿孤修好，遣子奚念为质。但利鹿孤知道北凉受制于西凉和后秦的处境，向蒙逊讨价还价，提出奚念年龄太小，要以沮渠挐为人质。为此，蒙逊在401年冬天上疏利鹿孤说：

> 臣前遣奚念具披诚款，而圣旨未昭，复征弟挐。臣窃以为，苟有诚信，则子不为轻；若其不信，则弟不为重。今寇难未夷，不获奉诏，愿陛下亮

之。[29]

利鹿孤见蒙逊不屈服，便采取威慑之法，派俱延和文支率一万骑兵袭北凉，并在万岁临松俘获蒙逊从弟鄯善苟子[30]，虏其民六千余户。蒙逊不想扩大事态，派从叔孔遮朝见利鹿孤，答应送沮渠挐为人质。对方也答应归还掳掠的人口，并召还俱延和文支。北凉和南凉暂时结成联盟。402年，两国联合“共攻凉州”[31]，但却被吕隆击败。

蒙逊的上述外交策略似乎带有妥协性和软弱性，但它是在面对西凉政治上的瓦解为减少矛盾而采取的。通过这一策略，北凉至少获得了三年（401～404）的安宁时间，这对北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利的。

二 安定民生，注重经济

与五凉时期其他割据者相比，沮渠蒙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对民生和经济比较重视。他的权变性特殊外交策略，也在为安定民生和恢复经济创造条件。这一点，在他401年下达的制书中阐述得很明白。制书说：

> 孤以虚薄，猥忝时运。未能弘阐大猷，戡荡群孽，使桃虫鼓翼东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车屡动，干戈未戢，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32]

意思是说起兵以来，东有吕隆，西有李暠，战事不断，兵役与徭役无休，干扰了百姓生活，影响了农业生产。现在要休众息役，专力于恢复和发展农业。劝课农桑是制书的要义。为此。他规定要“明设科条，务尽地利”，即要求郡县长吏制定必要的条例和规定，保证农业生产的最大效益。

蒙逊知道民生状况是决定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而民生好坏又与政治相关。因此，他经常将天灾和人祸相联系，反省和检讨政治，倡导实行惠政。如玄始二年（413），其母车氏病重，他登张掖南景门散钱给百姓为母祈福，并下书说：

> 太后不豫，涉岁弥增。将刑狱枉滥，众有怨乎？赋役繁重，时不堪乎？群望不絜，神所谴乎？内省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33]

又玄始六年（417），时雨不至：

下书曰："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34]

三 搜求谠言，招礼英贤

蒙逊是个明哲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政治道理。将搜求谠言与广开贤路作为改良政治的措施。403年，他下达教令说：

> 养老乞言，晋文纳舆人之诵，所以能招礼英奇，致时邕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经远，而可不思闻谠言以自镜哉！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尧，以匡孤不逮。[35]

虚怀大度和礼贤下士，是沮渠蒙逊的性格特点，也是北凉振兴的基本原因。蒙逊喜闻批评意见，对持不同政见者能一视同仁。在梁中庸和句呼勒乃至汉平问题的处理上就表现出这点。梁中庸在起兵反吕和推翻段业上，曾建有殊勋。作为蒙逊的主要信从者和拥戴者，他被委以西郡（治今山丹县东）太守重任。但他受李暠招怀，402年西凉军队攻入酒泉，在形势对北凉十分不利的关头投降了西凉，使西郡落入南凉之手。当时，臣僚中有人主张加罪其妻儿老小，蒙逊听后一笑了之。他不仅不加罪其妻，反派人将梁中庸的妻子儿女送往酒泉，让其全家团聚。还有句呼勒，他任张掖太守，在410年投降了西凉，后来又从西凉回归，按理当受到罪罚，但蒙逊却不予计较，并"待之如初"[36]。汉平是蒙逊之弟，为湟河太守。415年乞伏炽磐攻湟河将他俘虏，五年后释放回来，"蒙逊执其手曰：'卿，孤之苏武也！'以为高昌太守"。[37]

蒙逊性情豁达，他不邀取时誉，不专擅功劳。410年，北虏大人思盘率其部落三千人归降北凉，张掖郡永安县内又发现连理木，永安县令张披上书称庆说：

> 异枝同干，遐方有齐化之应；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盖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征。[38]

而蒙逊回答说：

> 此皆二千石令长匪躬济时所致，岂吾薄德所能感之！[39]

蒙逊唯贤是举，唯才是用。408年，他从南凉手中夺回西郡，俘虏太守杨统。杨统被称为南凉的文武之秀杰，蒙逊委任为右长史；蒙逊待

他“宠逾内旧”[40]，胜过一般北凉有功旧臣。412年，蒙逊得姑臧，在谦光殿大宴有功将士，论功行赏，“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41]。这先后用人都不拘一格。

四 整肃纪纲，厉行法治

蒙逊重视吏治，严明政教。玄始七年（418），其臣僚上书，提出建立朝纲及整肃吏治的建议。上书中说：

> 设官分职，所以经国济时；恪勤官次，所以缉熙庶政。当官者以匪躬为务，受任者以忘身为效。自皇纲初震，戎马生郊，公私草创，未遑旧式。而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至令黜陟绝于皇朝，驳议寝于圣世，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劝竞之心，苟为度日之事。岂忧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迩宁泰。宜肃振纲维，申修旧则。[42]

蒙逊采纳了这个建议，责成征南将军姚艾与尚书左丞房晷等撰定朝堂之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肃”[43]。

就五凉政权而言，有关撰定朝堂之制的记载仅见于北凉。由上文可知其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对官吏考绩黜陟。所谓“申修旧则”，是说依据传统办法，当沿用则沿用，当修改则修改。其实汉魏晋以来，对什么是传统办法，历代都有讨论，并且莫衷一是。[44]但作为汉魏考绩制度的要义，当如西汉京房和曹魏杜恕所说，是“令百官各试其功”[45]，“明试以功，三考黜陟”[46]。也就是说，考察官吏履行职责的效能和效绩，如是三番以后决定其禄位的升降。从北凉臣僚给蒙逊上书的内容看，所要“申修”的正是这个旧则。所谓“百僚振肃”，是说制度一实行就起到了改进吏治政风的作用。法制是履行行政职能的保证，吏治政风是政治好坏的标志，蒙逊下令撰定朝堂之制，申修官吏考绩和黜陟制度，一方面反映出北凉政治的封建化程度高于其余诸凉政权，另一方面又推动北凉政治进一步发展，使之变得更加昌明，更加有力。

在整肃吏治和厉行法治上，蒙逊是有魄力的。他通晓法不避亲的道理，早在永安四年（404），就严惩了祸国殃民的宗室勋贵沮渠亲信和沮渠孔笃。

> 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临松太守孔笃并骄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逊曰：“乱吾国者，二伯父也，何以纲纪百姓乎！”皆令自杀。[47]

五 驱逐南凉，迁都姑臧

蒙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他在河西的霸业。随着后凉灭亡，他的政治活动转向进取姑臧和统一河西。

当时，与他争夺姑臧的是南凉主秃发傉檀。

403年，姑臧被后秦占领。此前南北二凉在军事上对吕隆采取一致行动。这种一致行动促使吕隆将姑臧拱手交给后秦。“隆以二寇之逼也，遣（吕）超率骑二百，多赍珍宝，请迎于姚兴。”[48]

从404年起，秃发傉檀策划从后秦手中讨取姑臧，到405年七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这样一来，南凉在争夺姑臧的较量中暂时取胜。就在当年秋天，李暠也将西凉国都迁到酒泉。从而使北凉处于南、西二凉的夹击中。

面对复杂的环境，蒙逊一方面称藩于姚兴，避免后秦干涉诸凉的纷争，另一方面加快整修内政的步伐。他息役休众，力农养士，准备与南凉决战。秃发傉檀也明白，一旦北凉养成气候，势必先争夺姑臧。因此，积极拉拢李暠，试图通过与西凉结盟，增加对北凉的压力。406年，南凉和西凉订立了盟约。蒙逊为粉碎此盟约，在第二年向酒泉发动了一次进攻，在安弥（今酒泉东）击败西凉军，迫使李暠闭城自守，不敢东窥。

408年，即永安八年，北凉经过长达七年的内修政理，国力大大增强。出兵东伐，与南凉争夺姑臧的条件已经成熟。对此，北凉君臣取得了共识。史载：

> 太史令刘梁言于蒙逊曰：“辛酉，金也。地动于金，金动刻木。大军东行无前之征。”时张掖城每有光色。蒙逊曰：“王气将成，百战百胜之象也。”[49]

这时，秃发傉檀也谋倾南凉全国之兵，进攻北凉。蒙逊抓住机会，与南凉战于均石（今张掖市东），一举将敌击垮，乘胜夺回西郡（治日勒，即今山丹县东南），俘虏太守杨统，获取军粮四万多石。

409年后，蒙逊每次东伐都有战果。东伐之隙，也作西取，屡创西凉军队。如410年马庙（今酒泉东）之战[50]，大败李歆，俘西凉战将朱元虎，迫使李暠用白银两千斤、黄金两千两将朱赎回，并答应与北凉结

盟。此战缓解了北凉的压力，使蒙逊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南凉。

永安十年（410），蒙逊动员步骑兵共计三万进攻南凉[51]。大军过西郡后，突然遭遇到沙尘暴，“大风从西北来，气有五色，俄而昼昏”[52]。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北凉军队仍攻克了显美（今永昌县东），并徙数千户居民而还。傉檀得知北凉军队徙民西撤，率五万军队追至穷泉（今永昌县界）。蒙逊回军与战，“傉檀大败，单马而还”[53]。接着，蒙逊“乘胜至于姑臧”[54]。他将姑臧城牢牢包围，又有“夷夏降者万数千户”[55]。直到傉檀送人质请和，蒙逊才撤兵。南凉经此重创后一蹶不振，姑臧城内城外变乱迭起，傉檀无法在姑臧立足，只得放弃姑臧，撤往乐都。接着，姑臧为焦朗所据。

411年，沮渠蒙逊再次统兵三万，围攻姑臧。焦朗开城投降。姑臧终为北凉所得。

姑臧之得，表明北凉已拥有了河西走廊一半以上的土地。同时，沮渠蒙逊从此不再有东顾之忧，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对付西凉，并将统一河西作为他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六 摧毁西凉，廓清走廊

412年，沮渠蒙逊将北凉都城由张掖迁到姑臧。是冬，他即河西王位于谦光殿，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缮宫殿，起城门诸观”[56]。从此开始了北凉的封建王权时代。

在占领姑臧后，南凉于412年春天曾分兵五路，向北凉反扑，结果再次受挫。蒙逊乘胜进围乐都，逼秃发傉檀以子染干为质。

蒙逊即河西王位后，又在413年连败南凉军队于若厚坞和若凉两地（两地均在今武威南），并两次进围乐都，还收降南凉湟河太守文支和湟川护军成宜侯。在委署文支为广武太守、成宜侯为湟川太守、王建为湟河太守后，北凉的领土又扩展到湟中。

文支投降后，蒙逊下书，表明他必灭南凉及统一河西之志。书称：

> 古先哲王应期拨乱者，莫不经略八表，然后光阐纯风。孤虽智非靖难，职在济时。而狡虏傉檀鸱峙旧京，毒加夷夏。东苑之戮，酷甚长平；边城之祸，害深猃狁。每念苍生之无辜，是以不遑启处，身疲甲胄，体倦风尘。虽倾其巢穴，傉檀犹未授首。傉檀弟文支追项伯归汉之义，据彼重藩，请为臣

妾。自西平以南，连城继顺。惟傉檀穷兽，守死乐都。四支既落，命岂久全！五纬之会已应，清一之期无赊。方散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远近，咸使闻知。[57]

正当蒙逊做好彻底摧毁南凉的部署时，西秦主乞伏炽磐却于414年乘秃发傉檀西征乙弗的机会，袭取了乐都。灭掉南凉后，炽磐又与北凉争湟河郡。415年，蒙逊之弟湟河太守汉平降炽磐，湟中落入西秦之手。

南凉亡国后，沮渠蒙逊开始集中兵力打击西凉，实现其统一走廊和“散马金山，黎元永逸”的恢宏志向。

416年，他与西秦通和，两国在湟中罢兵并各守已有疆界。次年（417）出巡金山（在今山丹县西南），击乌啼、卑和二羌部。[58]又循西海（在今青海湖）向西，至盐池（今酒泉东），再到酒泉南山祀西王母祠。“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59]这一次出动军队共四万五千，是一次向西凉扬威的活动。但截至418年以前，北凉与西凉争战，北凉并未全立于不败之地。如411年蒙逊攻酒泉，因军粮不继，在撤退时被李歆追杀，主将沮渠百年也被西凉俘去。417年春天，西凉主李暠病逝，李歆嗣位。蒙逊在蓼泉伏兵三万，让沮渠广宗诈降李歆，谋诱李歆出酒泉后进行打击。李歆识破此计，在鲜支涧又打败蒙逊。经过两次挫折，蒙逊知摧毁西凉尚待时日，于是在建康（今高台县南）筑城置戍，深沟高垒。

李歆即位后，西凉政治败坏。由于李歆好治宫室，不断征发徭役，造成民力凋残，农业不修。当西凉经济上捉襟见肘时，蒙逊在418年出动军队，将酒泉城外秋收在望的庄稼全部芟刈。

419年前后，北凉政通人和，兵精粮足，而西凉却已十分衰弱。但李歆仍刚愎自用，继续对北凉用兵，不断消耗国力。形势已如张显向李歆指出的那样：

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礼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臣谓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逊，亦惧蒙逊方为社稷之忧。[60]

420年，蒙逊按照太史令张衍“今岁临泽城西当有破兵”的预言[61]，决定对西凉实行最后一击。他部署世子政德屯兵于姑臧东南的若厚坞后，才向张衍等宣布其战略决策：

吾今年当有所定，但太岁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当南巡，要其归会，主而勿客，以顺天心。计在临机，慎勿露也。[62]

也就是要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诱西凉军队进入国门，然后一举歼灭。果然，李歆听到蒙逊去取西秦浩亹的消息后，便带兵出酒泉，图谋乘虚攻打张掖。蒙逊在虚张一番声势后，将军队埋伏在川岩（今临泽县境），等李歆带领军队进入都渎涧狭谷时，他挥军出击，逼李歆退到怀城将其击溃。接着，在蓼泉又击杀李歆。

玄始九年（420）七月，北凉军队攻占酒泉。入酒泉后，蒙逊“禁侵掠”[63]，“百姓安堵如故，军无私焉”。同时，对西凉旧臣“皆随才擢叙”[64]。

同年十月，北凉出兵敦煌，李歆之弟敦煌太守李恂坚守城池一直到第二年正月。蒙逊见敦煌久攻不下，“乃筑长堤，以水灌城”[65]。数十日后，李恂部下宋承和张弘等开城出降。

玄始十年（421）四月，蒙逊率领北凉军队攻入敦煌，“杀（李）恂而屠其城”[66]，“获其弟子宝，囚于姑臧”[67]。423年，李宝与其舅晋昌太守唐契出逃伊吾（今新疆哈密）。

在攻占敦煌后，“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诣蒙逊称臣贡献”[68]。

至此，沮渠蒙逊终于实现了他摧毁西凉及统一河西走廊的壮志宏图，拥有了东起黄河，西到敦煌的辽阔土地。427年以后，他又在西秦灭亡声中夺得西平和乐都二郡，据有了包括湟水流域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其势力所及，至于天山南北。

七 通使宋魏，期应一统

沮渠蒙逊的政治才能不但造成了北凉的昌盛发达，而且也在北方“分久必合”的大势中得以发挥，从而使这位“胡夷之杰”具有了更高的历史地位。饶有趣味的是，从411年起，北凉政治几乎每十年上一个台阶：411年，蒙逊攻克姑臧，驱逐南凉；421年，蒙逊攻克敦煌，摧毁西凉；430年，北凉归附北魏；439年，北凉并于北魏。实际上，从411年起，北凉政权的政治外交活动已远远超越了河西走廊的范围，成为中国北方重归统一历史活动的一部分。

411年，蒙逊占领姑臧后开始向北魏“频遣使朝贡”[69]。另外，他还与东晋互通使节，在415年东晋益州刺史朱龄石通使姑臧后，他派舍人黄迅报聘益州并向晋安帝上表称臣，表章上说：“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崄，执义不回，倾首朝阳，乃心王室。”“若六军北轸，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戎为晋右翼前驱。”[70]

尽管这些通贡和上表活动有时只是一种姿态，但蒙逊承认东方大国的主权地位，这一点是无疑的。作为区域性割据者，谁也不情愿别的政治势力驾驭自己，何况远在边服的蒙逊。如417年，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到关中，俘虏后秦主姚泓，灭掉后秦，蒙逊对此“怒甚”。恰值门下校书郎刘祥向他言事，他申斥刘祥说：“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一气之下杀了刘祥。[71]但是，无论为时势所迫，还是为其“善权变”的性格所决定，在统一大势到来时，沮渠蒙逊毕竟能识时务并作出合理的选择。当42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魏军进攻关中，灭掉匈奴赫连氏建立的夏政权攻占了长安，而居住在秦、雍一带的氐羌纷纷归附北魏时，沮渠蒙逊也遣使北魏，再次表明“附魏”的态度。

430年是北凉玄始三年，亦即北魏神䴥三年，蒙逊派尚书郎宗舒与左常侍高猛到平城朝贡上表，表文中为“九服纷扰，神旗暂拥，车书未同”而抱憾，并说自己“前后奉表，贡使相望，去者杳然，寂无旋返”，只有侍郎郭祇返回时带来诏书，使“三接之恩始隆，万里之心有赖”，知北魏对自己“诱劝既加，引纳弥笃”，甚得慰藉。郭祇之后，又有商胡带来的北魏公卿书信，“援引历数安危之机，厉以窦融知命之美”。表示要在太武帝“方将振神纲以掩六合，洒玄泽以润八荒”时，“独步知机之首”，作“老臣尽效之会”[72]。知机，是说知道北魏将统一北方；尽效，是说要为统一效力。

义和元年（431）蒙逊送儿子安周赴平城“入侍”。年底，魏太武帝派出的使节李顺到达姑臧，策封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凉州牧、凉王，并加九锡之礼。李顺带来魏太武帝命崔浩撰写的册书，其中要求蒙逊：“盛衰存亡，与魏升降。北尽穷发，南极庸、岷，西被昆岭，东至河曲，王实征之，以夹辅皇室。”[73]

除向北魏称藩纳贡外，在420年宋晋“禅代”后，蒙逊也几次派使者到江南向宋王朝称贡。429年，还向宋文帝求“《周易》及子集诸书”，受到宋文帝刘义隆“诏许”，得到典籍共475卷，另外，还从宋司徒王弘处得到王弘亲手抄写的干宝《搜神记》[74]。

蒙逊上述政策后来也被其子沮渠牧犍所继承。[75]永和元年（433），牧犍遣使请命于魏，并与魏缔结婚姻，送妹兴平公主到平城，受拜为魏右昭仪；而牧犍则娶太武帝妹武威公主，并遣宋繇“表谢”，献马五百匹，黄金五百斤。永和五年（437），牧犍再派镇西将军沮渠旁周诣魏入贡，而北魏则派侍中古弼和尚书李顺到姑臧，向牧犍等班赐官服，并要牧犍送世子封坛入侍。牧犍接受了这一要求。同在永和五年，牧犍也遣使入宋，奉表入贡，献方物及图籍154卷，再向宋文帝求取图书数十种。

蒙逊时期通使魏宋的政治外交活动，固然带有以弱事强，求取自安和延续割据的用意，但从客观效果看，这些外交活动恰与北魏统一河西的战略相吻合，并且也确实起到了减少统一阻力的作用。另外，它符合河西和整个北方士民要求结束分裂和期望消除割据的心理。因此，不能不认为这是北凉政权以及沮渠蒙逊本人对历史发展做出的又一贡献。

综上所述，沮渠蒙逊是个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军事人物。北凉政治由他而兴，河西统一由他完成。他死于义和三年（433），活到六十六岁，在位三十三年（401～433），这三十三年是北凉政权的辉煌时期。但蒙逊毕竟是封建统治者，史载他晚年“忍于刑戮，闺庭之中，略无风礼”[76]。

第三节 北魏灭凉

沮渠蒙逊死后，沮渠牧犍即位。

牧犍是蒙逊第三子，先为酒泉太守，后任敦煌太守。他“聪颖好学，和雅有度量”[77]。即位后改年号为永和，433年即永和元年。

牧犍即位，继续向北魏和刘宋称臣纳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李顺封拜他为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河西王。拜宋繇为河西王右相。牧犍“上表乞安、平一号，优诏不许”[78]。也就是说，他要求北魏加封为安西将军或平西将军，但未得允许。另外，宋文帝刘义隆也下诏封拜牧犍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凉、河、沙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但牧犍既没有他父亲沮渠蒙逊那样的文韬武略，也不像他的兄长沮渠正德和沮渠兴国那样长期从戎受艰苦军旅生活的磨炼。[79]他继承的是国家强盛和王权上升的局面，难免因沾染一些封建割据者夜郎自大和骄奢淫逸的习气，而淡忘了居安思危的道理。

永和三年（435）正月，敦煌太守沮渠唐儿给牧犍上书，称有一老者在敦煌东门留下一封书信书信中写道：“凉王三十年，若七年。”牧犍问奉常张慎其中有什么寓意，张慎回答说：

> 昔虢将亡，神降于莘。深愿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年之庆。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将有大变。[80]

牧犍听后，十分不悦。

这说明，牧犍即位后，一反其父的明哲和英武，开始纵情享乐，沉溺酒色。由于荒怠政务，顿时朝议横生。牧犍也不乐意听取谏言，臣僚有意见，百姓有怨言，只能隐晦地说出来。如永和四年（436）发生过一次剧烈的雷震，震过以后人们发现一块石头，上面用红笔写着一首谣谚。谣谚说：“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带石，乐七年。”[81]带石是姑臧城南一座山的名称。“破带石”是说北凉统治河西三十年时姑臧将有山崩地裂之变，“乐七年”是说快乐的岁月再多也不过七年。

在蒙逊死前，凉魏关系的发展趋势已很明显。时北魏正加紧统一黄河流域的步伐，北凉是被统一的对象。因此，当北魏派到北凉的使者李顺返回平城后，魏太武帝即向他询问北凉政事情况。李顺当时汇报说：

> 蒙逊控制河右，逾三十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绥集荒裔，群下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82]

又说：

> 蒙逊诸子，臣略见之，皆庸才也。如闻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以资圣明也。[83]

魏太武帝对李顺说：

> 朕方有事东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过数年之外，不为晚也！[84]

北魏的“有事东方”是指统一黄河中下游的事业。截至431年前，魏军对割据北方的大夏（都长安）、北燕（都和龙，即今辽宁辽阳）发动强大攻势。大夏自407年赫连勃勃在高平川（今宁夏固原清水河）称天王后，先后据有原属后秦的长安以北及陇右安定（治今泾川县北）、上邽（今天水市）一些郡县。416年，东晋刘裕北伐，在灭掉后秦后不久撤兵南返，勃勃又乘势占领长安，称皇帝。此前，他筑统万城（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其城高峻险固，“坚可以砺刀斧”[85]。大夏的军事力量也十分强盛，这从赫连勃勃对后秦及对南凉的战争可见一斑。北魏从426年起开始对大夏用兵。时赫连勃勃刚死，其子赫连昌即位，局势尚不稳定。北魏的战略意图是通过消灭夏政权，为统一关陇及河西开辟道路，故攻势进展得很快。426年，奚斤所率五万大军占领关中，并攻克长安，赫连昌逃往上邽。427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十万大军攻拔统万城，摧毁了赫连氏的军事根据地。428年，魏军攻克上邽，俘虏了赫连昌。赫连昌之弟赫连定逃奔平凉（今平凉市西北），于431年攻灭西秦。赫连定后图谋西渡黄河消灭北凉并代牧犍割据河西，当大军半渡时，突然遭到吐谷浑军队进攻，赫连定兵败被俘，夏国至此灭亡。当此之时，北魏也正在进攻北燕，迫使北燕主冯弘于436年放弃和龙城逃往高丽。

可见，到436年前后，北魏在东方的战事已落下帷幕，该向河西用兵了。但北凉主沮渠牧犍对此全不在意，仍在北魏和刘宋之间徘徊，同时终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

439年初，魏太武帝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姑臧，“且观虚实”[86]。贺多罗返回平城后，汇报北凉情况说：“牧犍虽称藩致贡，而内多乖悖。”[87]于是，太武帝决定亲征北凉。出兵之时，先令公卿作檄对牧犍进行笔伐，历数牧犍十二条“罪状”，说牧犍：

> 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罪一也。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伪官，取两端之荣，邀不二之宠，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怀远，固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罪四也。扬言西戎，高自骄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托叛虏，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挚为奸，罪七也。承敕过限，辄假征、镇，罪八也。欣敌之全，幸我之败，侮慢王人，供不以礼，罪九也。既婚帝室，宠逾功旧，方恣欲情，蒸淫其嫂，罪十也。既违伉俪之体，不笃婚姻之义，公行酖毒，规害公主，罪十一也。备防王人，候守关要，有如寇仇，罪十二也。为臣如是，其可恕乎！[88]

北魏公卿所数牧犍十二罪中，有的是事实。如“外从正朔，内不舍僭”，据新疆社会科学院侯灿对酒泉文殊山经塔残石刻铭和吐鲁番出土古文书的考证，北凉有“缘禾”年号。“缘禾”年号与北魏的“延和”年号同音。牧犍既使用“缘禾”年号，又在上冠以“凉故大沮渠缘禾”。另外，魏太武帝的延和年号只用了三年（432～434），当改元太延后，沮渠牧犍违而不改，至有“缘禾五年、六年”之谓。[89]当然，牧犍“内不舍僭”的主要问题，可能还在于他对外使用“缘禾”年号，对内使用“义和”年号。另外如罪状第三条：“既荷王爵，又受伪官”，当时北魏视刘宋为僭伪，而牧犍对刘宋也称藩致贡，并接受宋文帝刘义隆的册封。以此为由斥责他政治上首鼠两端也有根据。罪状第十条、第十一条申斥牧犍在对待与北魏婚姻上的无礼和失于检点也符合实情。蒙逊晚年“闺庭之中，略无风礼”。而牧犍则私通其嫂李氏，史载：

> 河西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氏与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医乘传救之，得愈。魏主征李氏，牧犍不遣，厚资给，使居酒泉。[90]

还有第五、第六、第九及第十二条，牧犍都难辞其咎。因为原先北魏每通使西域，都诏令牧犍派兵护送和引导越渡流沙，但当439年使者从西域返回姑臧时，牧犍冷淡不说，还宣扬柔然对北魏作战的胜利。另外，对柔然可汗唆使西域诸国不供魏使的事也听之任之，甚至与柔然联络，共谋抗击魏师。

当然，北魏所数牧犍十二罪中，有些也是牵强附会。如所谓“民籍地

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以及“切税商胡，以断行旅”等，无非是为师出有名寻找口实。出兵的真正原因是此时大夏与北燕都已被消灭，只剩下北凉不遵“王化”。亦如太武帝对与李顺说的那样，“卿往年言取凉州之策，朕以东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龙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91]。本来，应在437年用兵河西，所以推后两年，是李顺用“国家戎事屡动，士马疲劳”劝阻太武帝。李顺这样说，是因他常常出使河西，接受过牧犍的贿赂。从432年开始，李顺来往于姑臧与平城之间，“凡十二返”。接受了北凉不少财宝，常为牧犍父子美言，又隐晦其“骄慢之语”，还买通奚斤与古弼等一般元老重臣制造有关河西的假情报。奚斤对太武帝说：

> 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位以来，职贡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恶未彰，宜加恕宥。国家新征蠕蠕，士马疲弊，未可大举。且闻其土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既至，彼必婴城固守。攻之不拔，野无所掠，此危道也。[92]

古弼也附和说：

> 自温圉水（即媪围水，指甘肃靖远至景泰之间黄河河段）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至丈余。春夏消释，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必乏绝。环城百里之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奚）斤等之议是也！[93]

只有崔浩支持太武帝出兵，并指出李顺等河西水草之语的虚谬。

其实北魏用兵河西，是北方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魏凉之间政治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李顺等人故作危言，还有崔浩对李顺的反驳，乃至所谓十二条罪状，都是一种舆论。北魏对北凉采取军事行动，是要用军事占领来对业已形成的凉魏关系进行肯定。所以，北魏虽动员了庞大的军队，但使用的主要还是招怀河西百姓和分化北凉的方略。其中，源贺起了很大作用。源贺，本名秃发贺，是南凉国君秃发傉檀之子。乐都被西秦军队攻占后，他逃跑出来，投奔了北魏。“世祖（太武帝）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94]源贺给太武帝上“取凉方略”，建议太武帝先招怀河西鲜卑旧部，瓦解北凉外援。他说：

> 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福祸，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95]

另外，北魏公卿奉太武帝之命而作檄书，其意也在对沮渠牧犍晓以大义。檄书给北凉君臣指出“三策”，归根结底是为实现对河西的“义取”或说“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三策”是：

> 若亲帅群臣委贽远迎，谒拜马首，上策也。六军既临，面缚舆榇，其次也。若守迷穷城，不时悛悟，身死族灭，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96]

北魏灭凉也没费许多周折，其简单经过如下。

439年夏，魏太武帝先部署太子拓跋晃监理国政，使长乐王拓跋稽敬和建宁王拓跋崇率兵二万屯驻漠南以防备柔然，继而自己亲率大军自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渡黄河。及秋，至上郡属国城[97]，即今陕西榆林，然后分兵两路，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向西挺进。永昌王拓跋健所率前锋部队一进入河西，即“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98]。沮渠牧犍根本没料到北魏真会对他用兵，得知魏师到姑臧时吃惊地问部下：“何为乃尔？”但又企图负隅顽抗，采用左丞姚定国之计，不出城迎接魏军，还派人向柔然求救。又部署其弟沮渠董来带兵万余拒战于姑臧城南。时源贺已先行“率精骑历（鲜卑）诸部招慰，下三万余落”[99]，从而瓦解了北凉外援。拓跋健专力攻城，沮渠董来所率凉军望风披靡。当北魏常山王拓跋赤坚兵临城下招谕牧犍出降时，牧犍还想等待柔然援兵，结果一直等到九月仍不见柔然动静，而其兄子万年又率其部降魏。在此情势下，牧犍难以坚持，只得率其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可见，对牧犍降魏起主要作用的仍是北魏的分化政策。故史载：“茂虔（牧犍）兄子万年为虏内应，茂虔见执。”[100]其实，鲜卑的附魏和万年的“内应”，都是和平统一的大势所趋。

牧犍降魏标志着北凉灭亡。牧犍在位共七年（433～439），恰应“乐七年”之谚。

魏军攻占姑臧后，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获北凉府库所藏珍宝不可胜计。魏太武帝又使张掖王秃发保周与源贺慰喻凉州杂胡，得降附者十余万落。这样，北魏基本上以和平方式统一了河西。

自沮渠蒙逊立国至牧键降于北魏，北凉共历二主，前后凡三十九年（410～439）。

北凉亡国，也标志着自前秦政权崩溃后历时半世纪之久的北方分裂

局面正式结束。从此，北魏成为黄河流域的唯一政权。

第四节 北凉绪余

北凉亡国后，柔然敕勒可汗发兵攻怀朔镇，并深入到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但被魏军击退。

439年冬，太武帝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于平城。牧犍被东徙后，起初尚受到魏太武帝的厚遇：

> 犹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礼葬焉。又为蒙逊置守墓三十家，改受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101]

但到447年牧犍就被太武帝赐死。北魏加给牧犍的罪名有二：一是盗取凉州府库珍宝，二是“隐窃杀人”并图谋造反。

> 初，官军未入（姑臧）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102]

> 是年（447），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103]

与牧犍一同被处死的还有魏太武帝右昭仪沮渠氏及宗族成员，唯沮渠万年因先行降魏而获免。451年，万年任冀定二州刺史时也以谋叛罪被处死。

在加给沮渠宗族的罪名中，“谋反”是要害。因北凉虽亡，但其残余势力犹存，并一直在西域活动。所谓牧犍与“故臣民交通谋反”之说，反映出北魏政府对牧犍家族的不放心。

北凉亡国前，牧犍曾委派其弟无讳为河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委派另一个弟弟宜得为秦州刺史、都督丹岭（在今山丹县境内）以西诸军事、领张掖太守，而以弟安周为乐都太守。北魏军队占领姑臧后，魏太武帝分派镇南将军奚眷攻张掖，镇北将军封沓攻乐都。宜得在张掖不能守，便焚烧仓库后西奔酒泉，投靠无讳；而安周则南奔吐谷浑（今青海境内）。继而奚眷进攻酒泉，无讳和宜得携带家口逃到晋昌，再由晋昌逃到敦煌，投奔其从弟敦煌太守沮渠唐儿。

在无讳与宜得分别逃离酒泉和张掖后，北魏在这里置将镇守，而永

昌王拓跋健则坐镇姑臧。

无讳和宜得到敦煌后，重整旗鼓，返军复攻酒泉，并重新加以占领，还俘虏了北魏酒泉太守弋阳公元洁。无讳接着攻张掖，因未能克城，撤至临松。他在临松聚合族人四万余户，图谋保据酒泉。

魏太武帝对无讳势力采取了不加征讨而待其自毙的方略。

无讳占据酒泉不久，就因粮食短缺而陷入极度饥饿之中。在迫不得已之下，只能主动向镇守姑臧的拓跋健投降，并答应献酒泉城和送还在俘的魏弋阳公元洁及其部下。

无讳降魏后，受北魏委署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封酒泉王。但太武帝对他终究不放心，怕他一旦保存实力，日后东山再起形成边患，故在441年春派奚眷进兵酒泉。奚眷的威慑使沮渠唐儿背叛了无讳。无讳见酒泉已难保，于是留从弟天周留守，自己与宜得引兵击唐儿。四月，“唐儿败死”。年底，酒泉城中食尽，万余口皆饿死。沮渠天周杀妻以饷战士。未几，奚眷攻克酒泉，俘获天周，移送平城后处死。无讳一来因缺乏粮食，二来因受到魏军逼迫，于是决定西渡流沙入西域。他派遣从吐谷浑返回的弟弟安周率兵先行，进攻鄯善，自己暂守敦煌。当安周到鄯善时，北魏使者也接踵而至，并传达太武帝旨意，晓谕行将投降安周的鄯善王比龙坚守城池。安周围攻鄯善都城抒泥前后几十天，因不能破城，于是保守抒泥东城。442年初，无讳放弃敦煌带领族属万余家，开始向鄯善进发。鄯善王闻知无讳大军将临，带领城民四千余家西奔且末。无讳留安周驻鄯善，自己带领部众再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

无讳放弃敦煌后，李暠的孙子李宝带领部下二千人重返敦煌，“修缮城府，规复先业”[104]。并遣弟李怀达奉表平城，归附了北魏。

在无讳前往高昌时，高昌已被阚爽占据。[105]另外，在432年与外甥李宝一同奔伊吾臣服于柔然的唐契，此时也因受到柔然的逼迫，带领部众向西，图谋从阚爽手中夺取高昌。阚爽为了对付唐契，派使者诈降于无讳。但唐契自己则未来得及进攻高昌，便被柔然军队击杀。

442年秋，无讳到达高昌，阚爽听说唐契已死，便拒绝无讳入城。无讳发兵攻打，攻破城池，逼阚爽逃往柔然。

无讳占领高昌后，派其常侍氾俊奉表前往建康称藩致贡。宋文帝刘义隆特为下诏说：

> 往年狡虏纵逸，侵害凉土。西河王茂虔（牧犍）遂至不守，沦陷寇逆，累世著诚，以为矜悼。次弟无讳克绍遗业，保据方隅。外结邻国，内辑民庶，系心阙庭，践修贡职。宜加朝命，以褒笃勋。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106]

444年，沮渠无讳死于高昌。

无讳死后，安周继位。安周为牧犍第七弟，原任北凉乐都太守，封屋兰县（今山丹县西北）。继兄自立后，也遣使朝宋。宋文帝下诏奖掖他“才略沈到，世笃忠款，统承遗业，民众归怀”[107]，并册封他继为河西王。

安周继立后，适逢西域大饥荒，人相食，饿死者无数。“周敕以三百斛麦以施饥者，别发仓廪以赈贫民”[108]，有惠于西域百姓。

450年，安周进攻车师前部。此前，车师前部大帅车伊洛已附北魏，被北魏册封为平西将军、前部王。沮渠无讳在世时，屡与车伊洛作战。无讳死后，安周夺无讳子乾寿所领部队，引起乾寿不满，在车伊洛游说下，乾寿率部下五百余户投降了北魏。安周以此积怨车伊洛，故乘车伊洛西击焉耆时引柔然兵袭取了车师前部所在的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

459年，即宋孝武帝大明三年，沮渠安周再次遣使向刘宋王朝“奉献方物”[109]。第二年，即460年，被柔然袭杀。

> 柔然攻高昌，杀沮渠安周，灭沮渠氏，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自此始。[110]

自439年至460年，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盘踞西域及高昌达二十年之久。他们的活动是北凉政治在河西以外的延续。

[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3页。按：有关卢水地理位置及卢水胡事迹见本书《民族篇》。

[2]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3页。

[3]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3页。又《资治通鉴》卷109晋安帝隆安元年四月条胡注："三河谓金城河、赐支河、湟河。此郡（指三河郡）当置于汉张掖、金城郡界。"（第3453页）

[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3页。

[6]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8]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9]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1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4页。

[1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作"叠滕"（第654页），而《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1页）《资治通鉴》卷109晋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条（第3454页）均作"垒澄"。

[12]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1页。

[13]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4页。又《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0页）略同。

[1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6页。又《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2页）略同。

[15]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2页。

[16]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0页。

[1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0页。

[18]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1页。

[19]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1页。

[20]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1页。

[21]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1页。

[22]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1页。

[23]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史评，第3199页。

[2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6页。

[25]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2页。

[26] 《魏书》卷106下《地形志下》：“凉宁郡，领县二：园池、贡泽。”第2625页。

[2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2页。

[28]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七月条，第3529页。

[29]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七月条，第3529页。

[30]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七月条，第3529页。胡注云：“《晋书·地理志》，酒泉郡有延寿县，当是后改为万岁。张天锡置临松郡。”（第3529页）

[3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7页。

[32]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页。

[33]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34]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7～3198页。

[35]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页。

[36]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4页。

[3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7页。

[38]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4页。

[39]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4页。

[40]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4页。

[41]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42]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8页。

[43]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8页。

[44] 事见《通典》卷15《选举·考绩》，典八六上至典八六下。

[45] 《汉书》卷75《京房传》，第3160页。

[46] 《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子恕附传》，第500页。

[4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页。

[48]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49]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8页。《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4页）同。

[50] 《资治通鉴》卷115晋安帝义熙六年七月条胡注："古者祭马祖，后世因立庙以祭之，故名其地为马庙。"（第3636页）按：此说待考。

[51] 《资治通鉴》卷115系此次战役于东晋义熙六年，即410年（第3630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系于南凉嘉平三年，亦即410年（第628页）。但《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则系此次战役于北凉永安十一年，即411年（第659页）。此从《通鉴》及《南凉录》。

[52]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53] 《资治通鉴》卷115晋安帝义熙六年三月条，第3630页。

[54]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55]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56]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5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3196页。

[58] 《资治通鉴》卷118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二月条胡注："乌啼虏居张掖删丹县金山之西，卑和羌居西海。"（第3700页）

[59]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7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6《北凉录》（第663页）同。又孙盛《魏氏春秋》谓："青龙三年（235），删丹县金山元川溢涌，宝石负图，立于川西。"

[60] 《资治通鉴》卷118晋恭帝元熙元年四月条，第3728页。

[6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6《北凉录》，第664页。

[62]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8～3199页。

[63] 《资治通鉴》卷119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条，第3737页。

[64]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9页。

[6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65页。

[66]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65页。

[67]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65页。

[6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65页。

[69]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第2204页。

[70]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7页。

[71]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8页。又《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研研”作“妍妍”（第2204页）。

[72] 引号内行文均见《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第2204~2205页。

[73] 《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八年九月条，第3834页。

[74] 《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5页。

[75] 《晋书》《宋书》“牧犍”均作“茂虔”。此据《魏书》《通鉴》。

[76]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第2206页。

[77]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7《北凉录》，第669页。

[78]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子牧犍传》，第2206页。

[79] 沮渠蒙逊原立正德为世子。422年，正德死于与柔然的战争，继而立兴国为世子；429年，兴国在与西秦作战中被俘，蒙逊以谷三十万斛赎兴国，未得西秦同意。

[8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7《北凉录》，第670页。

[8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7《北凉录》，第670页。

[82] 《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九年十二月条，第3844页。

[83] 《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九年十二月条，第3844~3845页。

[84] 《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九年十二月条，第3845页。

[85] 《魏书》卷95《铁弗刘虎附赫连昌传》，第2059页。

[86]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子牧犍传》，第2207页。

[87]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子牧犍传》，第2207页。

[88]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子牧犍传》，第2207页。

[89] 参见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90]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三月条，第3870页。

[91]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十一月条，第3866~3867页。

[92]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三月条，第3871页。

[93]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三月条，第3871~3872页。

[94] 《魏书》卷41《源贺传》，第919页。

[95] 《魏书》卷41《源贺传》，第919页。

[96]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五月条，第3873页。又《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子牧犍传》（第2207页）同。

[97]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七月条胡注："汉置属国于边郡以处降胡，此属国城，汉旧城也。班书《地理志》：上郡龟兹县，属国都尉治。"（第3873页）

[98]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八月条，第3873页。

[99] 《魏书》卷41《源贺传》，第919页。

[100] 《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6页。

[101]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子牧犍传》，第2208页。

[102]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子牧犍传》，第2208页。

[103]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子牧犍传》，第2209页。

[104] 《魏书》卷39《李宝传》，第885页。

[105] 《资治通鉴》卷124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月条："沮渠牧犍之亡也，凉州人阚爽据高昌，自称太守。"第3896页。

[106] 《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7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7《北凉录》（第672~673页）同。

[107] 《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7~2418页。

[108] 《高僧传》卷12《释法进传》，中华书局，1992，第447页。

[109] 《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8页。

[110] 《资治通鉴》卷129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十一月条，第4053页。

〖卷七〗 民族篇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

古代河西是民族杂居之地，羌、匈奴、汉族是其中主要民族。汉魏以降，北方各民族奋起参与政治，介入北方社会事务。适应这一形势，这三个民族也积极探索本民族的命运之路。这种探索活动，也就是他们历史作用的主要方面。

一 羌

首先是羌族。汉代人讲“河西斗绝，在羌胡中”[1]，又讲“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2]，说明它是河西最主要的民族。魏晋以后，河西羌的命运不佳。当关陇羌赫然建立后秦时，它只能在河西割据政权的夹缝中以“分散为附落”的状态生活。五凉之列，无其名字，正史也无它的载记。可是，这种弱小的民族地位也有好处，那就是迫使它更积极地参与生存竞争。竞争的方式则是与其他非羌的部族相依为命。因为它种落多，人口众，又较其他部族进步，故这种相依为命实际表现为它对其他部族的聚合与融合。其历史作用也由此表现出来。河西羌只聚合弱小，似是传统性的民族行为。西汉前期，受匈奴欺凌的月氏在西迁之余，曾通过羌得到生存依托。部族中的“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3]，形成独立而又与羌同俗的小月氏。东汉后期，匈奴衰落西迁，原是匈奴奴婢的“赀虏”总共数万落之众“亡匿”于自金城至张掖的河西地带。对此，羌族也给予了包容，与之和睦相处。史书中说“赀虏”之间“颇有羌杂处”[4]实即指此。

十六国之际，靠河西羌而壮大起来的部族首先是鲜卑秃发部。它作为河西的新部族，能在“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5]的河西地域中居留，而且有的地区是羌部密集地区，只能是羌族接纳的结果。后来秃发树机能率部反晋，河西羌不是其盟友，而是直接参与者，以致西晋政府在讨论对策时羌、鲜卑不分，称“羌虏树机能等

叛”[6]，认为起于地方长吏“失羌戎之和”。[7]“羌虏”“羌戎”之谓表明秃发部是受羌聚合，加入羌族共同体的部族。树机能失败后，秃发部退居河湟，托庇于河曲羌部。而羌部还在战斗，“时南虏成奚每为边患”[8]即指此。数十年后，秃发乌孤重整旗鼓，在与后凉争夺乐都、湟河、浇河三郡时，“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9]，说明了羌族对弱小部族聚合作用的始终如一。

因河西羌有聚合弱小的作用，故河西一直让汉晋统治者忧虑。于是，在汉族统治者那里又有了传统的抑羌政策。自东汉政府始置护羌校尉，西晋复置，到张轨、李暠领其职，是这一政策的说明。汉族统治者的“羌患”心理，反证出羌的民族聚合作用。

与汉族统治者相对，河西的弱小部族，即使其中上升到统治部族地位的，他们不与羌族为敌或不敢与羌族为敌。氐族本位严重的吕光，曾在建制之初自领护羌校尉，但一月之后便改称护匈奴中郎将。其余秃发南凉、沮渠北凉均无“护羌”之设。

可见，羌族及其他河西弱小部族能够形成聚合，是汉族统治者的种族偏见及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他们共同命运之故。

河西羌也扶助邻近地域的危难部族。这是更大范围上的民族聚合行为。后秦攻破西秦，陇西鲜卑乞伏部面临“人众已散，势不得安”的绝境[10]。乞伏乾归拟“西保允吾”，做这样的选择当充分考虑了地理和民族条件。到允吾，可依河为阻；到允吾，也可依托羌部，因为允吾是汉世以来守塞诸羌的聚居地。果然，渡河以后羌部即有反应，“南羌梁弋遣使招之”[11]。

河西羌对东部鲜卑也有关照。

> 初，南燕主备德仕（前）秦为张掖太守，其兄纳与母公孙氏居于张掖。……备德与燕王垂举兵于山东，张掖太守苻昌收纳及备德诸子，皆诛之。公孙氏以老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狱掾呼延平，备德之故吏也，窃以公孙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12]

备德即慕容德，超即慕容超。慕容超生于羌中，在羌中长到十余岁，后随后凉亡臣被后秦迁到长安，又从长安逃到广固，被慕容德立为继嗣，后为后燕国主。应当说他是一个有“羌化”色彩的东部鲜卑贵族。

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特点是诸多部族的“羌化”现象。“羌

化”便是有了羌的特征。“杂胡”之一的卢水胡即一例。这一部曾居湟水流域[13]，早有与羌杂处的历史。积渐成习，后竟出胡入羌，变得亦此亦彼，非此非彼了。故史书载沮渠蒙逊的出生本末，称他是以匈奴沮渠的官位为氏，并说“羌之酋豪曰大”，故姓名前加上“大”字，称“大沮渠蒙逊”[14]。

吐蕃源于羌族，这为史界公认。但羌是如何变成吐蕃的呢？这必须找到羌、蕃之间在民族发展上的联系。史载：

> 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遂改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15]

这段史料因史家行文用了“或曰”的口气，遂成聚讼。其实，秃发部早有“入羌”的历史，樊尼在南凉亡后确也依照傉檀分拨投了北凉。北凉灭亡后，投降北凉而留居姑臧的秃发贵族如保周、破羌等，均被北魏东徙，名单中独无作为傉檀“长兄之子”、承担“宗部所寄”重任的樊尼[16]，那么樊尼的下落呢？他带着“户垂二万”的“余众”“渡黄河、逾积石”是最有可能的。假如他果真成为临松太守，则可能性更大。关于这点，拙文《河西鲜卑事迹钩沉（下）》[17]已有专论，此不赘述。

二 匈奴

匈奴是河西另一古老民族。秦汉之际它曾是走廊的主人。汉武帝时期，它被逐出走廊；东汉以后，则彻底衰落。但衰落并不等于沉寂。因为有为数众多的余部仍在河西遗留，并有活动。大者如“赀虏”中之大胡、卢水胡、屠各胡等。其中，卢水胡最活跃，并曾在黄初二年举兵反魏，声势之猖使“河西大扰”[18]。

西晋至十六国初期，河西匈奴也屡有起兵之事，但总的表现仍不如中原匈奴。在中原匈奴屠各部打击西晋统治，拉开割据序幕时，河西匈奴仍被“羌胡”并称，沦为弱小民族。然而，十六国历史帷幕的降落，却有它的功劳。因为它建立的北凉政权统一了河西，并且又被北魏所统一。它的历史作用，也正是在促进统一的活动中得以实现的。

先是统一河西。

前秦崩溃之后的后凉因其腐败的政治导致了各民族的反抗。随着后

凉的瓦解，参加反抗的匈奴、鲜卑及汉族群雄建邦命氏，瓜分了河西。所谓：

> 及吕隆降于姚兴，其地三分，武昭王为西凉，建号于敦煌。秃发乌孤为南凉，建号于乐都。沮渠蒙逊为北凉，建号于张掖。而分据河西五郡。[19]

以卢水胡为代表的河西匈奴诸部，以弱小而进入五凉之列，这是它发扬民族进取精神的结果。它的首领沮渠蒙逊借吕光滥杀无辜本部贵族罗仇、麴粥并因此激起愤懑之事，集合“宗姻诸部会葬者万余人”[20]，又联络赀虏与“诸夷”，以段业号召汉族，举起各民族联合反抗后凉压迫的起义大旗。因蒙逊活动的正义性，蒙逊也受到史家赞评。

北凉建立后，河西匈奴卢水部成为统治民族，鉴于诸凉割据政权及由此引起的战乱和纷扰，蒙逊回顾先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的业绩，表示要“上继先祖安时之志”[21]，消弭分裂和战乱，实现“清一之期无賒”而“散马金山，黎元永逸”。[22]这就使他的民族担负起更高的历史使命。完成此使命，既符合本民族利益，也符合河西“黎元”的普遍愿望。

当蒙逊展开统一河西的战事时，南凉与西凉均处于矛盾重重、内外交困的状态，政治上极端虚弱，军事上不堪一击，民心皆已丧尽。适如西凉尹太后告诫其子李歆所说：

> 蒙逊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敌。吾观其数年以来，有并兼之志……彼若淫暴，人将归汝……[23]
>
> ……若其休明，汝将事之，岂得轻为举动，侥冀非望！[24]

所以，仅数年的工夫，蒙逊便攻克姑臧、酒泉、敦煌等重镇，完成了统一河西的事业。

统一，是河西历史的大事。首先，它将河西的多元政治导向一元政治，这无疑是对割据纷争局面的一种澄清。封建集权的形成，有利于改变政治、经济上的不平衡。以北凉政权而论，它比南凉、西凉显得进步，它重视人才，注重文教，吸收各民族参政，不搞民族分治，鼓励发展经济，尤重农业生产，很早便实行“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的劝课政策[25]；统一以后，又沟通东西商道，远致胡商到走廊进行贸易。所有这些，对扭转河西历史发展的方向，推动河西社会进步都有重要意义。其次，它适应了北方将统一的形势，为北魏解决河西问题准备了条件。

而后面这一点，恰又是河西匈奴再一次在促进统一方面表现出的作用。

我们说，不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域，它由分裂走向统一，乃是对峙中的各方共同活动导致的结果。统一者的一方也许是历史过程的主角，但被统一者也绝非毫无作用可言。相反，由于统一最终乃是政治上的统一，被统一者的政治态度将是决定统一时间和统一程度的重要因素。当凉魏对峙局面形成时，北魏还在经略中原，故“有事东方，未暇西略”[26]。北凉抓住这个机会，采取追踪前凉以河为阻与赵分境的抵抗战略，北援柔然，南结刘宋，则可能在较长时期内拒魏师于国门之外，继续延长割据的岁月。这便是逆潮流而动。然而，蒙逊不这样做，而是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靠拢北魏的态度，尽管其中包含“缓兵”的意思，但毕竟也反映了一个民族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委质纳款，“遣子安周入侍于魏”[27]，受魏册命，以凉州牧、凉王名号“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28]，承认与北魏的宗藩关系，确定了河西对北魏的归属。蒙逊死后，其子牧犍巩固关系，为魏斥塞，“（魏）每遣使西域，常诏河西王牧犍令护送，至姑臧，牧犍恒发使导路出于流沙”。[29]与魏通婚，遣嫁其妹入魏为右昭仪，而“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30]。当此之时，北魏对河西的统治基本形成，只差军事权了。

统观北方统一的始末，应当说不是军事而是政治因素起了作用，统一也是北凉灭亡前积二十年之久的凉魏关系的最后总结，而这种总结也恰是十六国割据历史的总结。所以，作为被统一者的北凉政权自有它的功劳。河西匈奴卢水胡部是功劳的建立者，是它的政治活动减少了统一的障碍，促进了统一的进程。

三 汉

汉民族不仅是河西的主要民族，也是主体民族。认识河西，开发河西，汉民族有重大的贡献。

继两汉以后，西晋后期是河西汉族人口猛增的时期。这是中原战乱迭起而河西相对安宁的政治形势使然。“八王之乱”后，“中原避乱来者日月相继”。[31]十六国时期，前秦曾向河西徙民，又使河西汉族人口再次增长。“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32]

十六国时期，整个北方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河西却表现出它的特殊性，民族矛盾在发展，但并不激烈。这也许是胡汉杂居久远，羌、匈奴等主要民族汉化程度较深的缘故。而且五凉政权一般都实行胡汉杂糅的政策，即如氐族本位色彩浓重的后凉，也重视汉族，“备置群司”，以“王详为尚书左仆射，段业等五人为尚书”[33]；秃发贵族的南凉，也吸收“西州德望”“中州才令”“秦雍世门”参政，使他们“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34]。因为这些，汉族即使做了被统治民族，其地位与作用也一样重要。因为少数民族的政权，本身就是按魏晋模式设计的。

具体说，十六国时期河西汉族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改良社会政治和弘扬民族文化来表现的。

首先是改良社会政治，它以倡导和推进“文化”为内容。在这方面，前凉、西凉自不必多论。北凉政治修明如上所述。后凉、南凉政治相对落后，有待改良的程度也大。以南凉为例，它由一个“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35]的部族缔造出来，长时期内重武轻文，“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利鹿孤即位后仍是“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36]。这种“礼容弗被”的落后性导致许多恶果，如得地不守，土不加广；不设仓廪，不重农耕；频繁掠民，民怨沸腾。克服落后，鲜卑贵族既无经验，又无能力，必须仰仗汉人。于是，儒家的“王道”理论被史暠等抬出来，具体化为“以绥宁为先”及“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37]。史暠等设计的改良方案，是一个向落后政治肌体输入先进文化和先进统治方式的方案。它奏了效，故史家认为利鹿孤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系因“从史暠之言”[38]，兴理“文治”的结果。以后，西州名士宗敞也给秃发傉檀设计过一个改良方案，其要有二，第一是重用各族豪望，特别是汉族豪望；第二是“农战并修，文教兼设”[39]，将“文治”内容扩展到经济方面。

在五凉的建立者中，秃发部的社会形态相对落后，这使南凉社会政治中一些弱点根深蒂固。但通过汉族士人提倡和推进的“文治”活动，在改良社会政治上成效颇著。所以，当后秦使者韦宗到河西“观衅”之后，结论是华宗夏士之外复有经纶名教者。

> 宗还长安，言于（姚）兴曰：“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40]

其次是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教育与学术。

东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地处荒遐的河西更是如此。恢复教育制度，重振教育事业的使命落在汉族士人身上。由于十六国时期在河西出现的第一个政权是汉族的前凉政权，而当时又有大批中原学者避地河西，并与河西本土学者会合一起，故河西也成为北方率先恢复官学的地域。张轨任凉州刺史不久，便“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41]，在教育方面开了范例。以后诸凉继承传统，都有兴理文教之举。为此它们征名士，延耆老，并鼓励私学，形成汉族学者在教育中各展其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景象。河西社会的文明也因此得以提高，故有人总结说：

> 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42]

教育带动了学术。汉族士人中的教育家也都是学问家，他们在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历算学等领域中多有成就。有些中原已不传的学术，通过他们得以维护，有些是时代和地域文化的结晶，通过他们得以总结和发扬，如刘昞的《敦煌实录》《凉书》，阚骃的《十三州志》。他们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不仅对汉世以来已进入汉族文化圈的河西各民族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刘宋治下的江南、北魏治下的中原，也有重大影响。北凉后期，与刘宋交流典籍，输出的20部共150卷典籍中，经、史、子、集无不具备，绝大部分是河西学者创造的成果。而北魏，因是河西后来的统治者，则更全面地接受了河西的文化遗产。被迁到平城的河西学者对以后北魏“文治”及“文教”的贡献更是不同凡响。

综上所述，作为十六国时期生活于河西地域中的羌、匈、汉等主要民族，尽管他们彼此地位不同，民族活动的方式不同，但都在对历史发生作用。羌族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匈奴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统一，汉族在改良社会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鲜卑事迹

一 “秃发氏”的由来

五凉时期，河西境内分布着许多民族。其中事迹最为丰富的当为河西鲜卑。如本书《绪论篇》所论，它是一个庞大的鲜卑民族群体，包括有许多部族或种落，以秃发氏为最强盛，留下的事迹也最为丰富。其次如乙弗、折掘、麦田、叠掘、车盖、意云等部，均各有其势力和事迹。

以秃发部而论，它不仅一度成为河西域内的统治部族，建立了南凉政权，而且它参与河西政治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五凉时期。因为它在西晋泰始初便已通过所谓的“凉州之乱”表现了它的地位。而且，从前凉肇基到北凉灭亡，在河西民族关系中始终都有它的作用。

关于秃发氏在嘉平中（250～254）入徙河西这点，本书《绪论篇》中已作简要论述。此问题在史学界颇为模糊。如吕思勉先生，他曾根据匹孤到乌孤之间的世系，以一世为三十年计，判断秃发氏入徙河西的时间是东汉中叶。[43]其实，东汉中叶是鲜卑在蒙古高原大聚合的时期。

> 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匈奴，北单于遁走。留者十余万落。鲜卑因此徙居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渐盛。[44]

延至东汉桓帝时，檀石槐才在漠北建立王庭，并分鲜卑为东、中、西三部。这时，拓跋部的历史尚十分朦胧，更遑论秃发氏会在此前入徙河西。另外，无论历史上哪个民族和部落，其转徙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追寻更为良好的经济生活环境，并求取自己民族或部落的发展与兴盛。东汉中叶的河西不具备这种环境条件，一则羌族起义的风暴正席卷河西，二则北匈奴经常进扰，造成“河西大被其害”。况且曹魏之前，在史籍中也见不到秃发氏的踪迹。相对而言，魏晋之际北方民族关系发展中出现“西北诸郡，皆为戎居”[45]，还有曹魏政府民族政策转变造成的“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46]，这些形势和动向以及入晋以后秃发氏首先在北方民族关系中崭露头角，都给我们判断秃发氏入徙河西的时间提供了启示。至于将秃发氏入徙河西的时间具体到嘉平年中，《绪论篇》也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对于秃发氏部落的早期事迹，史书有如下记载：

>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47]

这段记载说明，秃发氏原与北魏的建立者拓跋氏同姓，只是从寿阗起，才改姓秃发。而寿阗正是该部徙入河西后的第一位酋长。关于秃发氏原为拓跋氏这点，也可从魏太武帝对秃发傉檀之子源贺的话中得验证。414年，南凉灭亡，源贺从乐都逃出，投奔了北魏，受到魏太武帝的器重。魏太武帝对源贺说：“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48]这就是说，秃发氏部落在迁入河西前，也是与拓跋氏“因事分姓”前，与北魏先世有过同样的经历，即起源于大兴安岭地区，先南迁到大泽（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带），因这里地势低洼，不利于人畜的繁衍，由当时的部落酋长诘汾统率，继续向西南行进，历经“山谷高深”“九阻八难”的长途跋涉后抵达漠南，“始居匈奴之故地”[49]。

于是，南迁河西一事就是“分姓”之因。

早在诘汾南徙时，拓跋部已因“人众日多”发生“田畜射猎不足给食”的问题，有时得以捕鱼来弥补生活不足。因此，迁到漠南后，划分牧地，分散放牧，已是势在必行。其结果必然导致血缘纽带松弛。而由于众多的鲜卑纷纷云集于漠南，牧地争端由此而兴。诘汾晚年，“西部内侵，国民离散”[50]。诘汾的长子力微投靠了没鹿回部，做了其酋长窦宾的女婿，居留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县境）一带，“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51]或许就在这样的历史变动中，诘汾的长子匹孤未能再归附到原来的部落群体中，永久地与拓跋部分离了。分离之后，匹孤率其部落逐渐向西，沿黄河顺贺兰山南下，最终到达了河西，时为曹魏嘉平中。从此，河西的胡姓系列中有了秃发氏，完成了秃发与拓跋氏间的“因事分姓”。

但迁到河西后，匹孤这一支何来“秃发”姓氏呢？这是河西鲜卑事迹中先要搞清的一个问题。搞清它便于理解民族关系中的许多问题。

对匹孤一支之所以称“秃发”氏，传统的解释有两种。

第一种是“被中”说，即上引《载记》所谓寿阗之生，“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此说来自唐人所修《晋书》，《晋书》所本，又来自《魏书》。所不同者，《魏书》原无“母胡

掖氏”一句，而《晋书》加上此句。在这里，唐人是有眼力的，因为这一句之得说清了事情的症结。

第二种是“音转”说。认为秃发、拓跋是同音异译，并引证《廿二史考异》之论：“古读轻唇如重唇，从发得声，与跋音正相近。”并说这是魏收撰《魏书》有意尊魏抑凉，“别而二之”，以至《晋书》也承袭魏收之说。[52]

对上述两种传统解释，史学界多倾向于后一种，并由此得出前者出自附会的定论。其实，这种观点不一定正确。相反，由于前一种解释是从民俗学角度看问题，反而有些道理。因为在古代民族中，因俗得姓和因俗为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如鲜卑之称鲜卑，是因为原居鲜卑山之故，拓跋鲜卑之被南人称为“索虏”，是因为辫发于头顶之故。尤其是西戎民族，因发饰之俗得姓的民族不止一二，在发饰上做文章的也不止一二。如焉耆，其俗“丈夫并翦发以为首饰”[53]。悦般，“其人清洁于胡，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54]以俗得姓的部族中，柔然最为典型。史载，力微末年，拓跋部的游骑捉到一名奴隶，“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为氏”[55]。

秃发氏，文献中作“秃髮氏”，这显然是在发饰上做的文章。如木骨闾那样，秃发也是首秃之意。但木骨闾是鲜卑语，“秃发”是汉语。因此，“秃髮”姓氏很可能是河西汉族人根据寿阗部落祖姓拓跋，结合他们人河西后发俗改变而给他们的称呼，并得到寿阗部人的认可后才具有的姓氏。其中，“音转”是一个原因，而习俗的变化是根本原因。秃发部与拓跋氏“因事分姓”当是指后一方面而言。

尤可注意者，剪发和秃发之俗多见于西戎和北狄民族，以至焉耆、悦般、柔然、丁零等都是如此。之所以如此，与其受到匈奴习俗迁染有关。如悦般，史称“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56]。鲜卑中，也有受匈奴迁染而断发为俗的，宇文莫槐部即其一。该部“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57]。同是鲜卑，吐谷浑未受匈奴影响，却受到汉族影响，“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58]。与西戎和北狄有别的东胡民族，则多用索发及绳发为俗。东部鲜卑中多数部落以及室韦、乌洛候等部都如此。

秃发部落从匹孤后期起已生活于河西，已成源于东胡而入于西戎的部落。河西向为西戎和北狄民族杂居之地，它不可能不受到西戎和北狄习俗的影响。而曹魏时期，河西大地上正好有一支庞大的西戎和北狄民族群落在游弋，那就是赀虏。有关的记载说：

> 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亡奴婢故也。[59]

这是一个人数众多，势力庞大，活动地域很广的断发民族群体。记载虽没说明其间杂有鲜卑，但依时代而论，正是匹孤到寿阗时期。作为一支刚徙入河西的鲜卑部落，秃发氏不可能不同他们杂处。不光秃发氏部落，这时期徙入河西的任何种族群落都将毫无例外地落入这个由西戎和北狄民族组成的包围圈中，都会无一例外地改变原有习俗。所谓“不与东部鲜卑同也”，正是指包括秃发氏在内的河西鲜卑诸部落而言。按理说，这时秃发氏也应被作为赀虏群体中的一员来认识，但只因寿阗母姓胡掖氏，胡掖氏亦即呼延氏，本为匈奴贵族。[60]在古代，将“鲜卑父胡母”这一血缘关系作为区别鲜卑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因此，秃发民才保留了它鲜卑族属的存在，被称为河西鲜卑秃发氏。

所以，河西鲜卑秃发氏之由来，其实是河西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秃发氏之与众多的西戎和北狄民族接触、聚合，甚至融合，使其习俗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不仅是它与拓跋分姓之由，也是它与其他鲜卑分俗之由。此后，秃发氏虽仍被作为鲜卑而与其他河西民族相区别，但由于它与河西其他民族如羌族、匈奴等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域，又征服了乙弗、折掘、意云等鲜卑部落而形成河西鲜卑部落联盟，因此在魏晋时期的汉族人眼中，他们都属于羌胡系列，被泛称为“凉州虏”。以后秃发树机能发动的反晋军事活动，有时被具体称为“鲜卑叛”，有时被笼统称为“凉州虏寇边”，这从另一方面又反映出河西鲜卑在河西民族关系发展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及所起的重大作用。

二 “凉州之乱”

所谓“凉州之乱”，是西晋政府对河西鲜卑反晋活动的定性。这一事件作为晋初河西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既拉开了北方民族反晋军事活动的序幕，也拉开了五凉历史的序幕。

河西鲜卑的反晋活动，是由秃发树机能领导的。史载：

> 寿阗卒，孙树机能立，壮果多谋略。泰始中，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按：《通鉴考异》作“斩凉州刺史牵弘”）。又杀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后为马隆所败，部下杀之以降。能死，从弟务丸代立；丸死，孙推斤立；斤死，子思复鞬立。乌孤即思复鞬之子也。[61]

从记载看，树机能是寿阗之孙，也是秃发乌孤的从太祖父。他的反晋活动声势浩大，战果辉煌。现据史料对其事迹做如下钩沉。

西晋泰始元年（265），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为了做好灭吴准备，积极经营长江上游的巴蜀及其门户秦雍地区，并把对内徙民族的防范作为经营重点。针对此前邓艾纳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的问题[62]，又将鲜卑视为重点防范对象。泰始五年（269），晋政府从雍、凉、梁三州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金城、阴平等七郡，另立秦州，并抽调负责荆扬江防的著名将领胡烈、牵弘分别担任秦州和凉州刺史。这样部署以后，朝廷内还有人担心安定至武威间空隙太大，建议复置高平郡（西汉置，东汉末废。治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切断鲜卑奔逸和回旋之路。西晋政府的上述用意是将以秃发部为核心的河西鲜卑和以乞伏部为核心的陇西鲜卑进行隔离，以此来制约鲜卑。故虽选择胡、牵二人为秦、凉刺史，但朝廷中仍有人忧虑二人无“绥边”才干，担心会因他们“强于自用”而弄巧成拙。

果然，胡烈任秦州刺史后，下马伊始，便屯重兵于高平。接着，又对金城以北的鲜卑部落发动攻击。当时，树机能正驻部于万斛堆（今靖远县西），他率部众奋勇抵抗，打响了河西鲜卑反晋的战争。从此，金城到武威间战争乌云笼罩，兵连祸结三十余年。这就是所谓的“凉州之乱”。

树机能领导的反晋战争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泰始六年（270）到泰始十年（274），即晋军高平之败到鲜卑二十部弭兵并遣子入质；第二阶段从泰始十年到咸宁四年（278），即鲜卑军队攻占凉州到西晋军队收复凉州；第三阶段从太康元年（280）到永兴元年（304），即轲成泥进攻西平到张轨遣宋配击降鲜卑。

各阶段的战事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战争主要在武威以东进行。树机能与胡烈在万斛堆接战，杀胡烈，挫晋军锐气。接着，鲜卑军队向东北推进，占领高平。消息传到洛阳，西晋朝廷大受震动，晋武帝为此寝食不安，将都督关中诸军事的汝南王司马亮免官，而任尚书石鉴为安西将军，调杜预为秦州刺史。杜预素有“武库”之称，他认为鲜卑的优势在于骑兵迅捷，建议石鉴先行筹粮，待到来春牧草不继时发动进攻。石鉴轻躁刚愎，不以杜预建策为是，反诬杜预贻误战机，将杜预交廷尉论罪。而石鉴与树机能作战，不但毫无战果，还虚报功劳，以此受到朝廷纠劾。史载：

> 司隶校尉石鉴以宿憾奏预，免职。时虏寇陇右，以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属虏兵强盛，石鉴时为安西将军，使预出兵击之。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擅饰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63]

鲜卑杀了西晋封疆大吏，鼓舞了其他民族的反晋斗志。北地（治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羌胡”谋与鲜卑互为犄角，进攻金城。牵弘轻敌悬师远征。泰始七年（271）七月，树机能屯兵青山（今庆阳市西北），击毙牵弘，再败晋军。是战之后，秦、凉二州之间西晋防务被彻底摧毁。鲜卑铁骑东西驰骋，再无阻挡。

河西鲜卑连战连捷，靠强劲的骑兵，更靠部落联盟内部“鞭一样”牢固的血亲凝聚力，这种内聚力把二十多个部落扭在一起，结成机动灵活而又刚健有力的战斗整体，在运动中将晋军分割包围，使其不敢出州郡城池一步。一旦晋军出城作战，即刻陷入困境，损兵折将，铸成败局。这就是树机能对晋作战的制胜战略。

连续几年的战争严重影响了经济，致使汉族百姓无法尽力地亩，而鲜卑的畜牧业也难以维持。不久，秦、凉二州闹起严重饥馑，村落荒毁，人口死散。由于树机能可以获取的粮资越来越少，迫使他铤而走险攻略城市。此时晋军也更加注意城防，形势开始发生对鲜卑不利的变化。在金城郊外，鲜卑军队遭到汝阳王司马骏的打击，部帅乞文泥战死，损兵三千多。攻城不克，粮资匮乏，迫使树机能把注意力转向凉州各屯田点。但老谋深算的司马骏早有防备，他用精兵饱卒增援屯田兵士，使树机能难以掠到粮谷。泰始十年（274），树机能为饥饿所迫，向司马骏投降：

> 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64]

协同作战的金城“诸胡”首领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人也一同降晋。

第二阶段，战争主要在武威附近展开。树机能不得已降晋，事出权宜。在此之际，散居在敦煌以西的“西部鲜卑”东还，与晋戊己校尉（治高昌，即今新疆吐鲁番）马循统率的戍军发生接触。另外，晋武帝正部署攻吴，暂时放松了河西军务。树机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再次起兵，兵锋直指武威。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晋政府只得将攻吴大事暂且搁置，抽调在秦、雍二州集结待命的军队渡河向西。这一支军队在平虏护军文俶的指挥下，于咸宁三年（277）抵达凉州。树机能久攻武威不下，又有晋师大军压境，于是再次诈降。晋廷旋召文俶回师，只留七千名军士防守凉州。次年六月，树机能又重整旗鼓，与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激战，杀杨欣，占武威，“尽有凉州之地”。

攻陷凉州，标志着树机能领导的反晋斗争达到高潮。对此，晋武帝深感忧虑。史载：

> 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65]

后来，职卑位微的司马督马隆毛遂自荐，经晋武帝允许，选募三千军士“鼓行而西”。马隆渡过媪围水，运用诸葛亮阵法，制作“偏箱车”，且战且前。又备磁石，使身着铁铠的鲜卑兵行动困难。咸宁四年底，马隆转战到武威城下，先击败猝跋韩和且万能两部鲜卑，又驱督“善戎”没骨能部与秃发部作战。由于戎、晋部队的夹击，树机能失败，被叛部杀死。西晋军队收复了凉州。

第三阶段，战争主要在武威以南展开。树机能战死后，秃发部被晋军驱赶到大通河与湟水流域。从此，河西鲜卑与其他民族结成的反晋联盟宣告瓦解，秃发部的反晋活动也进入尾声。虽然战争时断时续，但规模越来越小。

太康元年（280），轲成泥部东山再起，南攻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北攻浩亹（今永登西南大通河东岸），“杀（晋）督将以下三百余人”[66]。晋武帝调马隆作西平太守，“又给牙门一军”，再次遏制了秃发部的发展。但是，当290年西晋调马隆到秦陇任东羌校尉以后，树机能的部将若罗拔能又以十万部众控制了凉州地区。这时，洛阳附近爆发了宗室争夺皇位的“八王之乱”，晋王朝实在再无力顾及河西。此后，“鲜卑

反叛，寇盗纵横”之势不可抑制。

永宁元年（301），时任西晋镇西将军司马的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他对河西鲜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因“斩首万余级”而“威著西州”[67]。两年后，宋配击杀若罗拔能，鲜卑十余万口成了张轨的俘虏。

树机能领导的反晋战争，爆发早，历时长，规模大，声势与东汉的“羌患”相仿佛，它打击了西晋统治，几乎使河西“非复晋有”。当它接近尾声时，中原地区各民族的反晋战争才刚刚兴起。可以说，所谓“凉州之乱”是西晋时期民族斗争的先声。所谓“凉州之乱”，有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性质。由于它表现为河西鲜卑与其他民族部落的联合行动，也有助于促进河西各民族间的融合。西晋屡对河西用兵及鲜卑在战争中攻城略地，对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也有一定破坏作用。

为什么说“凉州之乱”有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性质呢？

周边民族的内徙，有时会伴随偶发性的民族冲突。在“华夷之防”甚为严峻的古代社会，这种冲突往往是统治者欲拒内徙民族于国门之外而引起的。如李憙任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时，“羌虏犯塞，憙因其隙会，不及启闻，辄以便宜出军深入，遂大克获”[68]。时当嘉平初年[69]，可能与秃发鲜卑事有关。“犯塞”，也就是入塞。除李憙之外，终魏之世，看不到“羌虏”与魏对抗的迹象。所以有人说：“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70]

延至晋世，形势有了变化。同是李憙，在泰始四年、五年任仆射时，接触了凉州内徙民族“寇边”的问题。史载：

> 凉州虏寇边，憙唱义遣军讨之。朝士谓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竟不从之。后虏果大纵逸，凉州覆没，朝廷深悔焉。[71]

这一次“寇边”，便是“凉州之乱”的前兆。

为什么在魏世显得平静的河西，入晋后民族冲突来得如此剧烈？答案要从魏晋之际民族政策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地方官吏措置不当等方面寻找。

魏晋之际的民族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由于魏晋时期突出的民族问题是周边民族内徙并和汉族接触更加广

泛，那么，作为汉族统治者，对这个问题抱什么态度，采取什么措施，便决定着民族政策的内容。诚然，在“华夷之防”仍很严格的魏晋时期，不能期望汉族统治者对内徙民族给予优待，但只要不是极力排斥和压抑，那便算是明智的了。曹魏后期，邓艾所倡议的“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的政策，本质上虽然仍为分化周边民族，削弱它们以便统治，但其中也含有拉拢利用的成分。这种拉拢利用，在以羌胡健儿为灭蜀前驱的事情中得到说明。

曹魏政府在进攻蜀汉前，曾给西北州郡下达《己未诏书》，要求召募羌胡从征，但不许强迫他们。申令“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这与对汉族“差简丁强”[72]的政策有所区别。可以看出，曹魏政府在对待边族内徙和内徙边族的态度及措施上是比较宽柔的。而魏初的西北地方官吏，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如苏则，“为金城太守”，“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73]。仓慈，太和中任敦煌太守，对通贡的“西域杂胡”“为封过所”，“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74]之所以说魏世内附边族“鲜有桀悍侵渔之患”，是魏世宽柔的民族政策产生的效力。

魏晋交替，司马氏掌权后，民族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同时，随着汉族封建王权上升，对“羌胡”的利用政策也转而被隔离政策所取代。一时之间，各种各样的排胡、徙胡理论与主张纷纷出笼。叫得最响的是江统和郭钦，他们一个主张“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75]。一个主张将内徙者“申谕发遣，还其本域”，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76]。地方官吏也亦步亦趋，“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77]。这些理论主张与行为，必然会进一步将西晋政府的民族政策推向极端，造成以排斥代替安抚，以压抑代替宽柔的后果。西晋初期这方面的例子甚多。如刘渊曾以“文学武事”见知于某些洛阳权贵，有人推荐任他以平吴之事，晋武帝虽以为是，但终究相信孔恂、杨珧之流，将“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的讹言当真，不敢任用刘渊。[78]“凉州之乱”发生后，又有人建议“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孔恂也说：“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使武帝不敢任用刘渊和匈奴军队。[79]司马氏讲“名教治天下”，孔、杨之流排斥和压抑刘渊及匈奴之众的言论，正是儒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理论的翻版。这或许就是其民族政策变化的思想理论根源。

具体到河西，西晋政府在伐蜀得胜后，对从征的羌胡健儿封赏极不公平，像段灼说的那样，在募取凉州“羌胡”健儿前，曾许以重报，因此羌胡健儿，勇敢出征，而结果却是有功不录：

> 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以逼江由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80]

在后来补充封授时，又以中央军队与地方军队有区别为名，搞民族歧视，甚而变本加厉，对羌胡健儿进行压制。规定：

> 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81]

这种民族政策怎能不使河西鲜卑心怀怨结，又怎能不让他们奋起反抗呢？所以，“凉州之乱”的发生，是西晋民族歧视政策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凉州之乱”是以河西鲜卑秃发氏为首，联合匈奴、羌族等河西民族，共同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一次起义。它和其后巴氐少数民族在李特领导下发动的反晋起义具有同样的性质。“凉州之乱”虽对河西社会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而造成“河西荒废”的局面[82]，但其主要责任应由西晋政府来负。秃发树机能是杰出的河西民族领袖，对他应予以历史的肯定。

第三节 卢水胡事迹

卢水胡是魏晋时期活跃于北方的另一个羌胡部族，其中的沮渠氏是北凉政权的建立者。史载：

>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83]

现在一般认为，卢水胡是匈奴中的“杂胡”之一种。但翻拣史籍，它并不在魏晋之际入塞的十九种杂胡之列。[84]于是，对于它的由来就有了种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它起自湟中，还有一种说法是它起自北地或安定，还有一种说法是它起自张掖。其所以形成种种说法，是因魏晋时期上述地区内都有卢水胡居住和活动，并且在其境内都有称为“卢水”的河流。

事实上，一个民族或部族不可能有两个以上渊源地域，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活动地域。如果同一时期数处都有它的踪迹的话，那其中必存在源流关系。卢水胡也是如此。以上湟中、北地、河西三个地域，应当只有一个是卢水胡部族最初的发源地，而其余两个当是卢水胡的侨居或散居地。要搞清其中的源流关系，必须找到可靠的依据。

先看湟中说。其说依据的主要是东汉时期的材料。

材料之一：

> 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85]

材料之二：

> （窦）固与（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

又：

> 湟水东经临羌故城北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即其地也。[86]

两条材料中提到的临羌县在今青海西宁市西，魏晋时期属西平郡，

处湟中地区。卢溪水即卢川，也就是卢水。此说本于郦道元《水经·河水注》。

依据这两条材料可推得这样的结论，临羌既有卢水胡，又有名为卢水的河流。因此，这里是卢水胡的源起之地。

但是，这样推得的结论却无法解释另一个问题，即卢水胡既为胡，必是匈奴的一支，那么临羌境内的这支匈奴又是哪里来的？

我们知道，湟中历来是羌族的聚居地。汉武帝开河西四郡的目的，就是切断匈奴与羌人之间的联系。因此，西汉之世，匈奴部落不可能迁徙到这里。东汉建武中，“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87]留在河西域内的只有匈奴的余部“赀虏”一支。赀虏的活动范围在金城、武威、酒泉、黑水一带，并未到达湟中。东汉中叶以后，北匈奴骚扰河西，使敦煌等郡县城门昼闭，其势力也未深入湟中。那么，湟中是不可能有匈奴的。因此，只能说临羌出现的这支卢水胡，是从卢水胡源起地游移过去的。比铜钳为其所击，说明它到达临羌未几，在生存空间上与羌部发生了冲突。在古代民族之间，这样的事情原本是很多的。

所以，说卢水胡起自湟中是缺乏根据的。至于临羌有卢溪水，这只能认为是一种巧合。是否卢水胡游移到这里之后，当地人依据部族名而给河流命名，这一点是应考虑的。郦道元书出于南北朝时期，其中或有附会，这也难说。

再看北地安定说。其说依据的主要是南北朝时期的材料。

其一，“安定卢永刘超等聚党万余以叛”[88]。唐长孺先生认为材料中“安定卢永”系“安定卢水”之误。[89]

其二，“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90]。又“北地盖吴，起众秦川，华戎响赴”[91]。据《魏书·地形志》，太和十五年（491）后北华州治杏城，而北地郡属雍州。

其三，北魏文成帝时，尉拨出任杏城镇将。拨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徒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92]。

其四，献文帝时，“杏城民盖平定聚众为逆”。[93]

根据这些材料，北魏时安定和北地两郡是卢水胡的主要活动区域。特别是北地郡的杏城境内，生活着很多卢水胡人。而盖姓卢水胡最有代表性，并留下很多事迹。但刘超、盖吴、盖平定等，原籍究竟是否在安定或北地，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很难就此做出结论，说刘超、盖吴等就是起源于安定、北地的卢水胡人。

在引述湟中说和安定、北地说的材料时，我们还需注意一点，那就是人们有时将这两个地域活动的卢水胡混淆在一起。如窦固率领出酒泉的卢水胡，李贤注《窦固传》，说它是湟中卢水胡，而王先谦为《窦固传》作集解，却引惠栋之说，谓“卢水，北地胡也”。

在安定、北地两个地域中，以时代而论，有关安定卢水胡的记载更早些。西晋时：

> （贾疋）迁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绰，贪横失百姓心，乃谮疋于南阳王模。模以军司谢班伐之。疋奔泸水，与胡彭荡仲及氐窦首结为兄弟。[94]

记载中的彭氏有些来历，因《隋书·地理志》载：“后魏置平凉郡，开皇初郡废，有卢水。”彭荡仲是胡人，又生活于安定卢水，无疑被当作卢水胡。但西晋雍州界内或者后魏平凉郡的卢水具体位置在哪里，这一点仍很不明确。

从有关安定、北地卢水胡的记载中还可看出，西晋以后，这里的卢水胡人已有了刘、彭、盖等单字姓氏，并不像河西卢水胡沮渠氏那样，仍保持着以匈奴官氏为姓氏的状态，这为我们透露出源流关系方面的信息。需要问一句：安定、北地的卢水胡是否是从湟中或河西迁徙过去的？因为事实上，魏晋以前关于安定、北地卢水胡的记载是很少的，而湟中和河西卢水胡却在东汉中期已见诸史籍了。

北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卢水胡，最早见于曹魏初期。史载：

> （建安）二十二年，太祖拔汉中。诸军还到长安，因留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使屯池阳，以备卢水。[95]

池阳即今陕西三原县。如果这里的卢水胡不是从河西或湟中一带迁入的，那么它就应该是魏晋时期入塞的。但上面说过，魏晋时期入塞的十九种“杂胡”中，并没有卢水胡，因此它只能是从河西或湟中迁入。而湟中又不是卢水胡的真正起源地，那么，张掖一说就最接近历史实际了。

为什么说卢水胡的源起之地在张掖最接近历史实际呢？

从西汉以来，临松就是卢水胡的居地。沮渠蒙逊曾说：“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96]史书讲沮渠氏“世居卢水为酋豪”[97]。显然，在有关湟中卢水胡、安定或北地卢水胡的记载中，张掖这一支是最早的。临松郡原为张天锡所置，在张掖郡南，境内有临松山。“临松山，一名青松山，又名马蹄山，又云丹岭山，在（张掖）县南一百二十八里。”[98]临松和张掖二郡界内，同样也有称为“卢水”的河流。《明史》上说：

> （甘州）东北有居延海，西有弱水出西南山谷中，下流入焉。又有张掖河流合弱水，其支流曰黑水河，仍合于张掖河；又东南有卢水，亦曰沮渠川。[99]

今张掖黑河由祁连山发源，蜿蜒向西北流向张掖，然后再流向弱水汇入居延泽。这说明卢水本是黑河的上游。卢水又名“沮渠川”，正是卢水胡沮渠氏世居这里之故。

汉武帝时，经营西域，驱走河西走廊内的匈奴，列置四郡以切断羌人与匈奴的联系。另在张掖、居延设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100]。河西走廊的“蛮夷降者”主要是匈奴，其次是羌人。当窦融以张掖属国都尉名义保据河西时，“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101]，其中的“羌虏”即指这部分降胡降羌，史书中有时称他们为“属国羌胡”。将窦融对他们实行“怀辑”，“得其欢心”，与沮渠蒙逊“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之语相印证，说明临松卢水胡源于属国羌胡，是汉武帝时降胡的后裔，而东汉时又直称为“属国卢水胡”。

东汉时，属国卢水胡留下许多活动事迹。一是他们随窦固出酒泉塞，击北匈奴，著有勋劳。如袁宏所说：

> 安丰侯窦融，怀集羌胡，开其欢心，子孙至今，乐闻窦氏。大鸿胪窦固前击白山，卢水胡闻固至，三日而兵合，卒克白山，（卢水）固之力也。[102]

二是他们曾与羌族呼应，反抗东汉政府，事在章帝建初二年（77）。史称：

> （建初）二年夏，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103]

曹魏时，卢水胡在河西已呈散居形势。临松之外，显美（今永昌县东）到武威之间，也有其部人活动。黄初二年（221），“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104]。魏文帝派张既前往镇压。卢水胡集结七千骑兵，拒张既于鹯阴口（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黄湾村）。张既用声东击西战术，扬言从鹯阴口入，暗中却将军队调动到武威，迫使卢水胡退回显美。

从东汉到曹魏时期的情况看，一是卢水胡在逐渐向东移动，这使武威、湟中一带都有了卢水胡。二是卢水胡与羌人关系密切，往往一致行动，反抗政府。而东汉中期以后，羌族起义席卷了河西、陇右，蔓延到并州。安定和北地一带的卢水胡会不会是在羌人起义过程中迁徙去的，这可以研究。因为魏晋时期，在关陇一带，常有卢水胡与羌人联袂并趾的活动现象。晋惠帝元康六年（296）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105]，这只是其中一例。

据上可以认定，卢水胡的真正源起之地在张掖卢水（今黑河）。汉武帝时降汉的匈奴人是卢水胡最早的先祖。于是，我们又可循此为卢水胡寻根。

近年来，甘肃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居延汉简中有三枚与卢水及“属国胡”有关的材料。材料产生的时代是东汉初年。现转引如下。

其一：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府书曰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兵起以来□□

其二：

匿之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不遣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敢言之

其三：

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

与这三枚简文相关的还有一条：

□甲渠鄣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

□困愁苦多流亡在郡县吏……[106]

研究者认为，这些简文构成了一件完整的官方文书，是甲渠候官接到由居延属国都尉转发河西大将军幕府“关于追察民间擅自役使张掖属国各族为劳役”的公文后，向上呈递的调察报告。[107]

简文所标建武六年（30），正是窦融受河西豪杰推戴，行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上距汉武帝反击匈奴百余年。其中提到的“秦胡”便是降汉的匈奴人。因汉武帝时也是西汉最早对河西行使主权之时，在汉族官吏眼中，这些胡人是秦时的匈奴遗民，相当于“匈奴旧部”，故被称为“秦胡”。他们世居卢水，与居住卢水的汉族士民同受河西大将军府及居延属国都尉管辖。有关这部分“秦胡”降汉的时间和情况，史籍记载甚明。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击匈奴，“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108]。汉武帝对霍去病收降匈奴一事深表满意，称：

> 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觻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109]

从居延到祁连山，正是弱水流域，也是后来张掖郡及属国都尉辖地范围。

汉武帝所说降汉匈奴中有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这些官职在魏晋史籍中也有记载。如《晋书》载匈奴“有左日逐、右日逐，世为辅相”，“有左沮渠、右沮渠”，“有左当户，右当户”，“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车阳、沮渠、余地诸杂号，犹中国百官也”。[110]沮渠蒙逊的先世担任的是左沮渠，犹如中国的左将军之职。作为降汉的“秦胡”之一部，可能是受汉军追逼，在祁连山下降汉的。这里正是后来的临松郡界，也是黑河源头卢水发源地。他们被西汉政府安置下来后，累世在这里为酋豪。当时同被安置在这一带的“秦胡”，亦即东汉时所谓的“属国卢水胡”，其中有些后来东迁，只有这一支安居故地。作为卢水胡的唯一土著部族，它一直到北凉灭亡，才被迫离开张掖，一部分被北魏迁入中原，一部分则流入西域。这点，本书前面已经提到。

综上所论，在魏晋时期诸卢水胡部中，临松卢水胡是源，而湟中、安定、北地等地的卢水胡是流。他们民族的“根”是汉代的“秦胡”，最早居住在张掖黑河流域。“秦胡”后来离散，迁往湟中、安定、北地。在侨寓中，他们并未忘记他们是卢水胡的后裔，而史家也根据他们的族源与现居地分别他们，如胡三省所说：“卢水胡分居安定、张掖，史各以其所

居郡系之。”[111]这才有了湟中卢水胡、安定卢水胡、北地卢水胡。[112]但这不等于安定等地就是卢水胡的源起之地。相反，卢水胡的真正源起地只有一个，那就是沮渠蒙逊所在的张掖临松山一带。

第四节 民族融合趋势

魏晋时期是古代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周边民族的内徙及内徙后形成的各民族的杂相错居，是大融合发生的先导性条件。具体到一定地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情况，特别因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民族融合的趋势也就有了地域性特点。虽然，内徙民族的汉化是个总趋势，但作为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各地却不同，以至有时出现如鲜卑化、匈奴化、羌化等种种趋势。河西地域便属于这一类型。魏晋时期，河西民族大融合的主要趋势是羌化。其中，如河西鲜卑，它先期有匈奴化倾向，后期却步入羌化圈中。

所谓“羌化”趋势，是指一些原本弱小和落后的内徙民族或部落在河西特定的地域条件下，受羌族影响，其社会心理方面逐渐趋同于羌族，其社会行为方面靠拢羌族。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依共存，形成地域性的“类聚”特征。魏晋时期，活动在河西地域的民族除汉、羌两族之外，主要是匈奴和鲜卑，这两个民族都在其民族活动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上述特征。形成这种特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羌族在河西地域中的主体优势和它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是最根本的。

羌族是河西最古老的民族，散布极广却又有自己民族的聚居区。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因羌氐同源之故，往往羌氐并称，如“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113]。汉代被称为“南山”的祁连山区都有羌部存在，称“南山羌”。而且汉代早有河西民族羌化并类聚，小月氏或称湟中月氏胡即其中一支。史载：

>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114]

令居，即汉武帝时所置令居塞，在今永登县西北，湟中即今青海境内湟水与黄河交汇处，汉时属金城郡和护羌校尉统辖，古称为赐支（析支）河曲，这里是羌族源起之地。所谓：

河关（今临夏县）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青海积石山麓），绵地千里。[115]

总之，从西汉时起，自湟中到祁连山，再到酒泉和张掖，处处都有羌人聚居或散居。任何迁到河西地域的民族或部族，都不能不和羌族发生接触和联系。如秦汉之际匈奴人居河西，虽“灭夷月氏”，但却不能不与羌族共享河西，造成“河西斗绝，在羌胡中”的形势。而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接触与联系，都会造成彼此间的影响和迁染。从小月氏羌化的过程看，羌族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力总是远远超出其他民族对羌族的影响力。称小月氏为“月氏胡”，是因为它本为匈奴属国，习俗与匈奴同，但最终还是被羌族同化，形成了二元共同体的民族现象。这说明，正是羌族在河西地域内的主体民族地位，赋予它某种自然性和社会性素质，使任何与之发生关系的弱小民族或部族都会在民族习性方面自觉接受它的征服。

魏晋时期，活动在河西地域内的匈奴和鲜卑等，他们实现民族融合的轨迹，正与汉代小月氏相同。

以匈奴而言，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域活动的主要有两支，一支是赀虏，另一支是卢水胡。

先说赀虏。史载：

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亡奴婢故也。当汉魏之际，其大人有檀柘，死后，其枝大人南近在广魏、令居界。[116]

赀虏自汉魏初露头角，后在河西民族之林中长期销声匿迹，直到沮渠蒙逊起兵反对后凉时，才重见于记载：

蒙逊从兄男成，先为将军守晋昌。闻蒙逊起兵，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建安。[117]

在公元3世纪初到公元4世纪末近两个世纪中，赀虏何在？应当说晋昌（今瓜州县东）和福禄（今酒泉）是一个下落。男成能逃向他们，证明原在“酒泉北黑水（今张掖黑河）、西河东西”的赀虏已定居下来。而酒泉和张掖原本就是羌民和小月氏居住地域，酒泉还是东汉永元初羌人

起义爆发的地方。赀虏在这里定居，不取得羌人包容是不行的。而要取得羌人的包容，先决条件只能是向羌人靠拢，并走向小月氏那样的羌化道路。好在赀虏中本来就有“杂处”的羌族人口，这一点是不难实现的。

除晋昌与福禄一带的赀虏有羌化趋势外，金城西部的赀虏在汉魏之际已定居在广魏一带（今永登县南），这一带正在令居至湟中的羌族聚居区。那么，檀柘这一支也一定是受到羌族包容，甚而是被羌族收编了。

羌族在河西民族中的主体优势及其影响力之大，是由其民族部种的繁盛及人口的众多造就的。

黄河河关西南的湟中，是羌族源起之地。据载，秦厉公时期（前476～前443），羌族首领无弋爰剑与劓女相遇，“俱亡入三河间”。[118]从此羌族有了以父名母号为称谓的血缘种落。秦献公拓地西戎，湟中羌人逼于秦人兵势，析族远徙，或东迁，或南下，形成后来越俊、白马、广汉、武都诸种。唯爰剑曾孙忍及弟舞留在湟中，广为繁殖，“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119]两汉间，湟中诸羌势力最盛的有研种、先零种、烧当种、发羌种等，其余支种如卑湳、烧何、封养、当煎、当阗等，数不胜数。其人口之多，不下数十万。仅汉武帝时，先零羌带头发动的一次起义，就有十万人参加。[120]两汉之际，湟中羌众纷纷北渡湟水，再次向河西及陇西散居，如班彪对光武帝所言：

>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121]

东汉中后期从河西爆发的羌人起义，使“五州残破，六州削迹”[122]，东汉“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并、凉二州遂至虚耗”。[123]河西羌族势力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河西羌族纵然在魏晋时期并未称王建号，但任何活动于河西的民族，包括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都要向羌族倾斜。这里举卢水胡为例。

史载：

>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124]

又载：

> 大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125]

卢水胡之为匈奴种裔，这一点是无疑的。蒙逊这一支所居临松，在卢水上游，濒临南山，本来就是“南山羌”居地。另外，其地理位置在西平（现今西宁市）与张掖二郡之间。“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126]在汉族眼里，临松卢水胡早已是羌化的胡族。所以，史书记载沮渠氏之效忠窦融时，将沮渠氏也作为“羌虏”雄杰来看待。“（窦融）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127]称他们为“羌虏”，指出他们与小月氏并居，说明汉族人已视他们为羌族共同体中的又一元。故有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征隗嚣的记载。[128]另外，文献中既说沮渠蒙逊是“胡”，又说“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这等于说沮渠蒙逊也认为自己虽源于胡，而实际已化为羌。这是一种处于民族融合羌化趋势中的心理状态和民族意识，等于说沮渠蒙逊承认自己已羌化了。

基于上述现象，又基于羌氐同源原理，特别是基于汉魏间史书往往将羌氐混称。如对白马部落，《史记》《汉书》称其为氐，而《后汉书》则混称，其中《西南夷传》称其为氐，《西羌传》称其为羌。另外，《华阳国志·蜀志》亦称其为羌。[129]故可以说，《宋书》对河西卢水胡归类时，根据其与氐羌民族的关系，将其与白马氐并立一传称《氐胡传》，也是有道理的。

卢水胡与赀虏同属于魏晋时期羌化中的匈奴部落，在羌化程度上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卢水胡的羌化程度比赀虏更深。其原因除卢水胡居住在羌族种落与人口密集的西平至张掖间，为羌族势力包围和覆盖之外，还在于有些卢水胡部落早就深入河湟地区，加入了羌族营垒，走上了湟中月氏胡那样的道路。上引东汉明帝时的记载，说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西南）“烧何（羌）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130]。卢水胡与烧何羌的冲突，卢水胡是胜利者。但由于它入居的是河湟区域，实际上是将自己的部族置于羌族的汪洋大海。最终，其所具有的匈奴民族性格必将为羌族性格所征服。就像被征服后的小月氏称“湟中月氏胡”那样，这一支卢水胡后来就被称为“湟中卢水胡”了。

羌族之所以有同化其他民族的能力，还与羌族在河西民族中的地位有关。其地位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魏晋时期，河西羌族并未形成建邦命氏的威势，后来的河西“五凉”中，羌族也未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不等于羌族在河西民族中不具备政治地位。如前所述，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后期，羌族为反抗民族压迫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和同仇敌忾为其他民族树立了榜样。而且羌族常联合其他民族一致对敌。如建初元年（76），“安夷（今青海省西宁市东）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131]像这样以羌族为主体有河西其他民族一同进行的反压迫斗争，正是各民族以羌族为政治核心实现民族融合的过程。

另外，羌族也支持其他民族的反压迫斗争，这种支持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如支持河西鲜卑反晋就是一例。

河西鲜卑自曹魏嘉平中迁到河西后，长期与湟中羌人杂居。西晋泰始初，秃发树机能发动起义，“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132]。这个被西晋政府称为“凉州之乱”的事件，史书记载有时作“北地胡寇金城”“群虏内叛”[133]，有时作“凉州虏寇金城诸郡”[134]，有时作“虏轲成泥寇西平、浩亹”[135]，或作“鲜卑叛”，或称投降者为“善戎”，这说明树机能凭借了羌族力量。

南凉政权是秃发乌孤在反抗后凉民族压迫中产生的。一开始，军事政治中心设在西平与乐都之间的羌中地区，这显然得到了羌族支持。而且乌孤首先顺利攻取了后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之所以如此，是因“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136]。事实上，三郡之得是羌族支持的结果。秃发部始终与羌族相依共存，甚至当秃发傉檀迁都姑臧时，也“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137]。这些，已不仅只是河西民族关系中的社会政治现象，而是鲜卑与羌族在长期的民族联合中逐步发生融合的表现。河西鲜卑秃发氏与羌族已在向异源同流的关系迈进，这是河西地域羌族共同体中的又一元。

羌族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匈奴、鲜卑等民族。早在卢水胡、赀虏、河西鲜卑等入居河西前的战国初期，羌族已进入半牧半农生活。秦汉以

后，羌族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他们在今湟源到永登之间开辟了大量农田，据赵充国统计，总数在二千顷以上。曹魏时期，羌人生产的粮食已在向汉族输出。徐邈为凉州刺史，收“虏谷”赈贫乏一事说明了这点。[138]另外，羌族还独得地利和物质资源。有人将这点看作羌族能称雄河西和召唤其他民族种落向自己靠拢的根本原因。如东汉安帝时曹凤所言，先零羌之所以能“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是因为“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139]。为什么赀虏、卢水胡、河西鲜卑都有向湟中方向游移乃至落户湟中的经历，曹凤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魏晋之间，凡移徙和落户湟中的民族部落，他们的社会生活都受羌族影响而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河西鲜卑秃发氏，在徙入河西前，“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140]，而徙入河西后，由“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141]的大范围游牧转到河湟地域生活，在乐都一带定居下来，“务农桑，修邻好”[142]，走上建立封建割据政权的道路。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转变？归根结底，要到羌族共同体中去寻找答案。

魏晋以后，由于羌族在河西民族关系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河西地域多元一体化的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既成历史现象，在各民族社会政治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来。这里不妨用“方以类聚”一词来表达这一现象。作为一种由羌化趋势导致的民族关系新动态，它使地域内各民族间种族意识淡化，单纯的种族排斥和对抗力量削弱。同时，以地域为纽带的政治性联合或分野成为基本关系。也就是说，在政治意识上，河西民族有了明确的地域内外之分。对来自外部民族的欺凌和压迫，他们往往采取一致的反抗态度，像卢水胡与河西鲜卑同时起兵反对氐族吕光统治那样。另外，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所求取的往往是地域内自己民族的政治权益。如沮渠蒙逊与秃发傉檀向后秦讨取公道那样：

> （秦）姚兴遣使人梁斐、张构等，拜蒙逊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时兴亦拜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封广武公。蒙逊闻之，不悦，谓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为侯者，何也？”构对曰：“傉檀轻狡不仁，款诚未著，圣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归善即叙之义耳。将军忠贯白日，勋高一时，当入谐鼎味，匡赞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圣朝爵必称功，官不越德，如尹纬、姚晃，佐命初基；齐难、徐洛，元勋骁将，并位才二品，爵止侯伯，将军何以先之乎？窦融殷勤固让，不欲居旧臣之右。未解将军忽有此问！”蒙逊曰：“朝廷何不即以张掖见封，乃更远封西海邪？”构曰：“张掖，

规画之内，将军已自有之。所以远授西海者，盖欲广大将军之国耳。”蒙逊大悦，乃受拜。[143]

蒙逊与傉檀之间矛盾的出现与加剧，是傉檀抢先占据姑臧导致的，属政治分野，而非卢水胡与河西鲜卑之间的种族分野。

所谓“类聚”关系，还表现在地域内各兄弟民族虽在政治角逐中各有成败，却仍然彼此投靠和慰纳。如南凉灭亡前，秃发氏与沮渠氏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灭亡后，秃发氏却视沮渠氏为归宿。傉檀曾说：

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一万。蒙逊方招怀遐迩，存亡继绝，汝其西也。纥勃、洛肱亦与尼俱。[144]

后来，归附蒙逊者都得到保全，樊尼还被任命为北凉临松太守。而归降西秦的傉檀及其子虎台都被乞伏炽磐杀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凉灭亡后，河西鲜卑一直是卢水胡反对外部敌人的“外援”。如归降北魏的傉檀之子源贺对魏太武帝所说：

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沮渠氏）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福祸，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145]

后来，太武帝就是依靠分化鲜卑与卢水胡之间的唇齿关系才攻克了姑臧。

综上所论，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趋势十分明显。融合造成了河西地域民族关系的多元共同体现象。这个现象的背景是众多部族的羌化趋势。这是“河西斗绝”这一封闭的地域环境和“在羌胡中”这一特殊的民族构成所致。当然，一旦地域的封闭局面被打开，已形成的这个共同体必然会与更广泛的共同体结合起来，从而又形成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后来，北朝以及隋唐的民族大融合便是循此轨迹展示和发展的。

[1]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2]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69页。

[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4] 《三国志》卷30《魏书·西戎传》注引《魏略》，第859页。

[5]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6] 《晋书》卷38《扶风王骏传》，第1125页。

[7] 《晋书》卷57《马隆传》，第1554页。

[8] 《晋书》卷57《马隆传》，第1556页。

[9]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

[10]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第3120页。

[11]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第3120页。

[12]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元年四月条，第3583页。

[13]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河水》："湟水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东北流，注于湟水。"李贤注以为卢溪即卢水。据此可知卢水胡曾居湟水流域。（中华书局，2007，第48页）

[14] 《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2页。

[15]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第5219页。《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第6071页）略同。

[1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6页。

[17] 载《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18] 《三国志》卷15《魏书·张既传》，第474页。

[19]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435页。

[20]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21]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22]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23]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4《西凉录》，第650～651页。

[24] 《资治通鉴》卷119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条，第3737页。

[25]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页。

[26] 《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九年十二月条，第3845页。

[27] 《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八年八月条，第3833页。

[28] 《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八年八月条，第3834页。

[29] 《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0页。

[30]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十一月条，第3866页。

[31]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32]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33]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34]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

[35]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

[36]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6页。

[37]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6页。

[38]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58页。

[39]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40]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

[41]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42] 《魏书》卷52《胡叟传》，第1150页。

[43] 参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三章“西晋乱亡”，第82页。

[44] 《通典》卷196《边防十二·鲜卑》，典1061下。

[45] 《晋书》卷97《四夷·北狄·匈奴传》，第2549页。

[46] 《晋书》卷52《阮种传》，第1445页。

[47]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48] 《魏书》卷41《源贺传》，第919页。

[49] 《魏书》卷1《序纪》，第2页。

[50] 《魏书》卷1《序纪》，第3页。

[51] 《魏书》卷1《序纪》，第3页。

[52] 参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六章“东晋中叶形势下”，第220～221页。

[53] 《魏书》卷102《西域传·焉耆》，第2265页。

[54] 《魏书》卷102《西域传·悦般》，第2268页。

[55] 《魏书》卷103《蠕蠕传》，第2289页。

[56] 《魏书》卷102《西域传·悦般》，第2268页。

[57] 《魏书》卷103《宇文莫槐传》，第2304页。

[58]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40页。

[59]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9页。

[6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前赵录》引《广韵》，第1页。

[6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9《南凉录》，第613页。又《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略同。

[62] 《资治通鉴》卷79晋武帝泰始五年二月条，第2509页。

[63] 《晋书》卷34《杜预传》，第1027页。

[64] 《晋书》卷38《扶风王骏传》，第1125页。

[65] 《晋书》卷57《马隆传》，第1554～1555页。

[66] 《晋书》卷3《武帝纪》，第72页。

[67]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68] 《晋书》卷41《李憙传》，第1189页。

[69] 据《晋书》卷38《宣五王·司马伷传》："琅琊武王伷字子将，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为宁朔将军。"（第1121页）《晋书》卷41《李憙传》："司马伷为宁北将军，镇邺，以憙为军司。顷之，除凉州刺史，加扬威将军、假节，领护羌校尉，绥御华夷，甚有声绩。"（第1189页）知李憙任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在任宁朔将军军司后数年，而司马伷任宁朔将军是曹魏正始中事；后数年恰值嘉平初。按，《晋书·司马伷传》"宁朔将军"《晋书·李憙传》作"宁北将军"。

[70] 《晋书》卷52《阮种传》，第1445页。

[71] 《晋书》卷41《李憙传》，第1190页。

[72] 《晋书》卷48《段灼传》，第1348页。

[73] 《三国志》卷16《魏书·苏则传》，第491页。

[74]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513页。

[75]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第2549页。

[76] 《晋书》卷56《江统传》，第1532页。

[77] 《晋书》卷52《阮种传》，第1445页。

[7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前赵录》，第2页。

[79]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前赵录》，第3页。

[80] 《晋书》卷48《段灼传》，第1340页。

[81] 《晋书》卷48《段灼传》，第1340页。

[82]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83]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84] 《晋书》卷97《四夷传·北狄》载魏晋之际入塞的“杂胡”有屠各、鲜支、寇头、乌谭、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郁鞞、萎莎、秃童、勃蔑、羌渠、贺赖、踵跂、大楼、雍屈、真树、力羯等十九种。第2549～2550页。

[85]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0页。

[86] 《后汉书》卷23《窦融传附弟子固传》及李贤注，第810～811页。

[87]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9页。

[88] 《魏书》卷40《陆俟传》，第903页。

[89]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杂胡考》，中华书局，2011，第397页。

[90] 《魏书》卷4《世祖纪》，第99页。

[91] 《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41页。

[92] 《魏书》卷30《尉拨传》，第729页。

[93] 《魏书》卷43《唐和传附从子玄达传》，第963页。

[94] 《晋书》卷60《贾疋传》，第1652页。

[95] 《三国志》卷15《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第470页。

[96]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97]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3页。又《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2页）同。

[98] 《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三·甘州张掖县》，中华书局，2007，第2942页。

[99] 《明史》卷42《地理志三·甘州左卫》，中华书局，1974，第1014页。

[100] 《后汉书》志23《郡国志·郡国五》，第3521页。

[101]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102]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卷11《孝章皇帝》，天津古藉出版社，1987，第311页。

[10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1页。

[104] 《三国志》卷15《魏书·张既传》，第474页。

[105] 《晋书》卷4《惠帝纪》，第94页。

[106]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所录简文74.E.P.F220：696、42、322、43，第62页。

[107]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第62～63页。

[108] 《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0页。

[109] 《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0页。

[110]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第2550页。

[111] 《资治通鉴》卷109晋安帝隆安元年四月条胡注，第3452页。

[112] 据《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冉駹夷）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第2859页）则汶山（今四川茂县）境内，也有一支卢水胡。

[113] 《诗·商颂·玄乌》郑玄笺注。

[11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115]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69页。

[116]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第859页。

[117]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1页。

[118]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5页。

[119]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页。

[12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页。

[121]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

[122] 王符：《潜夫论·救边第二十二》，第107页。

[12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1页。

[124]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125] 《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2页。

[126]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河水》注引《十三州志》，第48页。

[127]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128]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802～804页。

[129] 参见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90页。

[13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0页。

[131]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1页。

[132]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33] 《晋书》卷3《武帝纪》，第60页。

[134] 《晋书》卷3《武帝纪》，第64页。

[135] 《晋书》卷3《武帝纪》，第72页。

[136]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

[137]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138]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39～740页。

[139]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5页。

[140]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

[141]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42]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43]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3194页。

[144]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6页。

[145] 《魏书》卷41《源贺传》，第919页。

〖卷八〗 经济篇

第一节 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

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出现与汉民族文化圈的扩展，带动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从西汉中期始至西晋灭亡后一段时期，河西作为古代经济区之一，走过了它的形成、曲折发展和初步繁荣的早期变迁道路。其所蕴蓄的潜力及可以发挥的作用、影响也得以初步显示。这些历史引起过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与兴趣，而今天仍存在着探讨的余地。

一 河西经济区的形成

西汉中后期的一个半世纪，古代河西经济区在逐步形成。

“河西斗绝，在羌胡中”[1]。汉代人所持的这种认识，从地理环境及民族构成上说明开发河西的难度。所以，说汉武帝创造出一个“凿空”之举言无不当。因为此举所表现的历史就不仅是驱逐了匈奴在河西的势力，而且是先进的经济文化对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征服。

西汉前期，匈奴驱逐月氏、乌孙、羌人势力并攫夺了“水草丰盛，冬温夏凉，宜于畜牧”的河西走廊，也因此发展了本民族的畜牧业经济。但是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终究难以满足奴隶主贵族多方面的物质需求。于是又有一系列经济补充活动如对被征服民族实行横征暴敛，沿边地带与汉及其他民族开展“互市”，通过“和亲”向汉室进行大量索取，尤其是惯常的军事掳掠等。诸如此类的活动最重要的目的是获得汉族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品。被称为“变俗”时期的老上单于尤“乐汉物”，“和亲”中“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2]。匈奴这样主动地接受汉族经济的渗透，导致怎样的结果？对此，其部内早有人提出答案：“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3]

汉武帝在经略西域中对河西采取的种种措置在客观上顺应了上述征服与被征服的大势。元狩二年霍去病携万骑劲旅出陇西过居延，兵锋直抵祁连山造成浑邪、休屠二王后死前降的声势后，“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4]，等于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在整个河西一朝瓦解和农业经济在整个河西勃兴的序幕骤然拉开。

历史上不乏事件的巧合。汉王朝对河西用兵之际，关东地域遭到大的水灾。政府急欲安置灾民，促成破天荒的劳动力西进，“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5]。从记载看，关西主要指河西，重点是河西走廊，“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6]劳动力大量西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也随同西进，这成为河西经济区起步的巨大动力。

元狩三年到元鼎六年的短短10年之中，河西农业勃兴了。汉政府充分利用屯田形式，集中力量开垦处女地，建设“官田”。其中，尤以军屯搞得有声有色。“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7]。与“官田”有关的水利设施也在上马，“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8]。

在“开官田”萌生出军事农业体系的同时，“假民公田”措施又创造出民生农业体系。所谓“数岁，假予产业”就是给农民租佃土地，准其自耕自食。由民生农业派生出的村社及其朴素风情，被史书记载得颇为具体：

> 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9]

武帝以后，农业成为河西的主要产业，但并未窒息畜牧业。非但如此，由于畜牧业仍在发展，从此开始有了“河西畜牧为天下饶”[10]的民谚。一些优良的牲畜品种如汗血马等被发现。有记载说，元狩三年“得神马握洼水中”，司马相如的《太一之歌》称之为“天马”，形容它“沾赤汗，沫流赭”，堪与龙为匹。[11]为繁育优良马匹，汉政府在后来设置了河西牧苑。当农业经济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后，畜牧业反过来也给予农耕生活者以影响，迁入河西的民户也因此显得与关东人“习俗颇殊”[12]。

农、牧业并行发展，使河西经济区在起步时便具备着雄厚的潜力。

而且两大经济的相互影响和互为补充还带动手工业与商业的活跃，织造麻布、毛褐，制取食盐，进行皮革、毡裘的加工很快成为民间富有特色的生产活动。当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兴起时，经济区已为往来客商准备了一定的商品，也架好了桥梁。西汉后期，政府“重致远人”，“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13]，可见，没有河西经济区的兴起，难有丝绸之路的通畅。

标志着经济区形成的另一事件便是水利灌溉事业的兴旺，它推动河西水浇农业的发展。据载，元封以后朝廷上下掀起一股水利热，作为重点开发区的河西，与这股水利热关系极大，“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14]。说河西与水热关系极大，是因为此前令居一带的官田已搞了穿渠引水。而且当农业在河西境内勃兴时，政府已做出相应的灌溉规划，例证之一便是许多屯田都置于河流两岸，河流的重要出入水口则为屯田都尉治所。如在酒泉郡内的会水堰泉障置北部都尉，东部障置东部都尉，敦煌的渔泽置渔泽都尉，昆仑障置宜禾都尉等。这是元封水利热期间河西农业长足发展的明证。

农业生产的技术也随经济区的兴起而在改进提高。尤其是武帝末年赵过发明的代田法与租庸挽犁法的推广，对增加粮食产量及扩大耕垦面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代田法作为田间管理技术可增强作物抗风抗旱能力，保证亩产超过“缦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15]。租庸挽犁法对缺少畜力的民户是很好的率导和帮助。

建设新经济区，安定的社会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武帝及其后100多年，关中及关东地主制封建社会早已确立，激烈的土地兼并与因此而发生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相当明显。河西却有不同，一是封建关系正在形成但土地兼并活动少有发生，普遍的生态现象仍是“土广民稀”。二是政府对迁徙河西的民户实行优待，所谓“吏不苛取”，“此政宽厚”。三是闭塞的环境限制了外界战乱与灾害的波及，如武帝后期关中和关东有“群盗并起”[16]“比岁不登”[17]“大旱”[18]“郡国颇被水灾”[19]的社会问题，而河西域内竟平安无事。安定的社会条件对穷困无着的中原贫民产生吸引力，也为汉王朝减轻社会问题的压力提供决策依据。当元封六年朝廷为关东多达200万口的流民及40万口“无名数者”搞得焦头烂额时，“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20]，出路中是少不了河西的。

昭、宣时期，河西经济区有所拓展，那就是始元六年金城郡的设置与后来令居到湟水一线新的基地农业的兴起。汉宣帝为防范羌人北上，

也为在击羌战争中减轻从张掖一带出粮出辎招致的“转输并起，百姓烦扰”[21]，委派赵充国统部属垦发临羌至浩亹间羌人“故田”与“公田”2000余顷。新的屯田基地建成后，与原先的令居基地一南一北，夹金城而立，不仅使经济区东端形成“杜绝河津，足以自守”的防卫能力[22]，而且使经济区在后援陇西以及制控河南一带形势中的作用更加明显。

总之，西汉中期始开发而后期已形成的河西经济区，从地域构成讲，包括了当时西起敦煌、东至金城的五郡之地。从经济构成上讲，包括了农、牧、工、商四条脊干，而以农业、畜牧业为主。从经济分布的构成讲，农业脊干又有两个分支，一是基地农业，它从东南的湟中循黄河蜿蜒到金城，再折向西北的令居，伸至居延、酒泉，终于敦煌、阳关、玉门关。一是民生农业，星罗棋布于屯田之间。牧业脊干则是祁连山。另外，还有一个流通中的大动脉，那便是丝绸之路河西段。西汉末年，河西经济区内居民户总计为109740，口为429859，可以说是既殷且富了。

二 汉魏之际河西经济区的曲折发展

河西经济区在东汉和曹魏的两个半世纪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

东汉一代，整个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强烈地影响了河西。首先是国都由长安东迁洛阳，东汉国力又不如西汉那样强盛，这使政府在对河西的继续开发与经营上不再那么得力。其次，河西域内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由简单转入复杂，战乱也时有发生。特别是被统治者称作“羌患”的战争和匈奴势力的卷土重来，给经济区造成的影响极大。当然，由于经济区形成时已具备了巨大潜力，加之地主庄园制经济的兴起，往往显示出破坏之后的恢复比破坏本身更有韧性这一经济发展特点，总体上经济区仍在缓慢地进步。尤其是东汉统一全国前和曹魏统一北方后的两段时间，其进步更加明显。

东汉统一全国前河西有过窦融的保据局面，这种局面暂时使经济与政治处在同元状态，并使政治对当地经济的依赖程度增大，反作用更加直接。窦融选中河西实行保据的依据也是有关潜力的，即“河西殷富”和“足以自守”[23]。

窦融利用王莽失政及中原灾荒频仍的形势，大力招诱人口，使“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24]，同

时大力劝课农桑，依靠正在成长的河西著姓及豪族地主，很快实现了“晏然富殖”和“仓库有蓄”[25]。

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成为窦融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其因是一大批反对王莽的西汉官僚及官僚后裔迁到河西。作为高级难民，主观上他们是带着宗族、宾客、部曲到河西寻找“遗种处”的，其中不乏刘般那样的宗室地主[26]，但在客观上却也将其各方面的经验如生产组织、经营、管理经验，剥削经验，理民经验等带入河西，窦融对他们虚矜礼接的结果，造成他们门第、产业的进一步积淀。由此也使庄园制经济发展开来[27]。

窦融时期封建生产关系的另一点变化是羌族、小月氏等内附并部分转入农耕生活。这与窦融政权推行“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的政策不无关系[28]。转入农耕的羌民散居在金城郡属县内，在民族经济发生进步的同时，也开始遭遇到“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的命运。

窦融附汉后，东汉政府仍在经营河西，其前中期所做的努力史有明载。如建武九年复置护羌校尉；建武十二年针对河西流民较多问题，诏令被掠为奴者向官自讼，“一切免为庶人”[29]；永元五年，为减轻河西人民负担，“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30]，永元十二年后，多次下令赈贷河西诸郡。鉴于赈贷只能奏效一时不能作用永久，殇帝又令“二千石长吏其各实核所伤害，为除田租、刍稿”[31]。在边患又起的形势下，东汉初的河西地方官也实行边备和内政并重的措施，如光武帝时的武威太守任延，针对“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农业”的情况，一方面加强北部警备，抑制豪族地主如田绀等“子弟宾客为人暴害者”，另一方面加紧农田建设，“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32]。上述施政使河西经济处于大动荡前的稳定中，经济呈现着继续发展的势头。有史家做过评论，说东汉初凉州疆域之广在13州中仅次于扬、益；在战乱、灾荒影响下，全国人口明显减少，而凉州各郡减少数最小，敦煌一郡仅减少9195人[33]。这种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说出河西经济区在东汉初、中期算得上安定，因此也算得上在发展的事实。

如果说西汉中期经济区内农业普遍起步是一个特点，那么东汉前中期都会性城市的起步又是一个特点。姑臧与敦煌从此成为天下名城。姑臧曾被匈奴称为盖藏城，西汉时为武威郡治。东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34]。财货在此城大量的聚散，使此城的经济作用明显加重。官僚都愿到这里做官，因为商业

利润和税收可使他们大大中饱私囊，“不盈数月，辄致丰积”[35]。明帝永平七年及章帝元和元年，朝廷两度为北匈奴置“合市”于姑臧。合市盛会，匈奴“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36]。敦煌是两汉西塞所在，因此也是经营的重点。但东汉初期因北匈奴胁迫车师等西域政权进攻河西，一度造成敦煌的“城门昼闭”[37]。永平十二年后，朝廷使窦固、耿秉从酒泉、居延两路出兵，击败北匈奴，在伊吾设校尉，留吏士屯戍，敦煌又获得发展机会。此后，“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38]，而政府为恢复和充实敦煌，在以后20余年中反复诏令减除内地郡国罪囚刑期，连同他们的家属发送敦煌“占著所在”[39]。此前此后，由于佛教的东传、经学的西渐，敦煌在作为外贸边关的同时，也成为河西人文荟萃的城市。这后一点也影响到后来河西经济区的历史。

上面说过，东汉中后期河西经济区在发展中出现较大的曲折，其中战乱带来的破坏是造曲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安帝以后北匈奴屡次进犯使“河西大被其害”；而后是先零、沈氐等羌种对金城、张掖等地的进攻，尤其是金城战事旷日持久达数十年，战火所及过北地，达并州，连洛阳西北都感受到“不暂宁息”。安帝在位的前14年，政府征发240多亿军费用于“羌患”，且多半出自西北。随战争而起的劳役、灾荒使“并、凉二州遂至虚耗”[40]。

除战争的破坏之外，朝廷因无力制远，早在国家初建时已打算改变西汉时积极经营河西的政策。这是经济区发展受到限制以致几乎中衰的基本原因。前前后后，东汉朝廷出现过两次“弃凉”之议。第一次在建武十一年，“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远多寇，议欲弃之”[41]，弃之不成，除形势不准许外，还有陇西太守马援的直言极谏。马援在上书中，反复阐述他军旅之次的所见所闻，如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城池坚牢等，使朝廷改变初衷并下令先收拾金城一带残局，“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反旧邑”[42]。而后马援又采取措施，“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使金城郡再现“郡中乐业”气象。[43]马援在挽救河西经济区上是有功劳的。后来朝廷对经济区东端的经营稍见加强，如和帝时再迁刑徒到金城一带，重修坞壁，“增广屯田，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44]，但加强不到20年时间，到永初中因羌人再次进攻，上述举措又罢休了。第二次“弃凉”之议发生在永初四年，有人据羌人进攻加紧的趋势，建议大将军邓骘“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45]，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

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46]。郎中虞诩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恳切陈述西汉开拓凉州“事履勤苦”，三辅为塞园陵不保，烈士武臣多出凉州等理由，指出河西在全国的举足轻重，“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47]，最后推翻了放弃河西的提议，再次挽救了经济区。但是朝廷的勉力维持也达到极限。灵帝以后，酒泉、金城连续发生地震、泉涌、黄河泛滥，导致经济的衰退。而后黄巾起义爆发，又有边章、韩遂、马腾等军阀的割据，经济区的发展陷于停滞。

由巨大的曲折转入迅速恢复和再度发展是在曹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曹魏平定韩、马割据势力后，强化治理河西，选派有理民及经济建设经验的官吏担任州郡长吏，其中的张既、徐邈、皇甫隆、苏则、仓慈等在安定民生，招抚流亡，改善民族关系，改进生产技术，扩大商业贸易诸方面以认真务实而著称，他们在经济区发展上的政绩有口皆碑。以徐邈为例，他在明帝太和中出任凉州刺史时，面临着州内粮食严重短缺的问题。为此，他在恢复武威、酒泉池盐生产，以食盐交换羌民粮食的同时，大力开辟水田，招徕贫民佃耕。不几年做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48]。徐邈还合理支配军费以外的闲散资金用于与西域的贸易。另如仓慈，他与徐邈同期，任敦煌太守，对战乱造成的弊端做了三方面的整顿。一是抑豪右，恤贫穷，减少“大姓侵小民”事情的发生；二是“随口割赋”，均平负担；三是保护西域商贾，鼓励他们来华贸易，“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49]。通过整顿，敦煌一带出现新的生机。后来皇甫隆继任，进一步改变敦煌农业生产的面貌，推广耧犁和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50]。

东汉至曹魏，河西经济区在曲折中发展速度有所减慢，但它的基础也因此趋于牢固，地主制经济带来的封建化程度的提高，著名城市兴起带来的商品经济活跃及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些都为它的重新崛起准备了条件。

三 五凉时期河西经济区的繁荣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前一个半世纪，河西经济区呈现初步繁荣。具体而言，是前凉及后来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分别统治河西时期创造出的自给自足局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割据政治要求经济给予相应的负载，为此政治又需在政策上提供保障，即使有时是劳民以逞的保障。当

然，最重要的是力求做到地域内相对的安定。在这一点上前凉做得比较突出。

前凉的奠基人张轨有丰富的封建统治经验。他从西晋永宁元年为避“八王之乱”而效法窦融，在担任凉州刺史后便采取一条以稳定求生存的方略，将“保宁河西”作为施政的基本出发点。在具体做法上，其一，先行平定长达20余年的鲜卑反晋及地方武装制命乡曲的活动，代之以王权政治，同时依靠河西著姓地主完善统治体系。其二，他鉴于中原战乱迫使大量人口“日月相继”流入河西的情况，积极做好安置工作，设立侨郡县，拨出无主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其三，减轻域内农民的赋税负担，并开展劝课农桑的活动，增强自给自足的经济实力。通过这些，不仅使他很快“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而且使前凉初建便具有“世既绵远，国亦完富”的基础。[51]

上述保境安民的割据政策被其后五凉的统治者仿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积极安置流民使五凉时期经济区人口密度空前增加。粗略估计，在4至5世纪中期，因中原战乱频繁而“河西独安”，从关中、关东、江汉流域迁徙到河西的人口不下20万，它使经济区内“土广民稀”的生态现象发生了一定改变。尤其是武威、敦煌两郡，由于前凉、西凉两个汉族地主政权曾以它们为统治中心[52]，且具有发达的人文，从前凉时起，其土地和人口的比例明显发生变化。张骏时讨论“徙石造田，运土殖谷”[53]，事实上是讨论增加耕地面积。敦煌是距中原战乱最远的地方，为流人所企慕，又是学术文化和交通发达的地方，因此安置流民也最多。其次，注意完善经济，增强实力的做法表现为比较适时应人的行政措施，如前凉中期的开放苑囿，假民公田，赈恤灾贫，南凉“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54]，西凉在阳关的“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55]；北凉“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56]。

因此，五凉时期河西经济区在可供投入开发的人力资源和开发的组织效能两个方面，比曹魏时期又有进步。反映在农业生产的效能上，一是尽可能提高农田产量。据反对张骏“治石田”的索孚言称，当时武威一带中田亩产可达3石，已与东汉时中原一带的亩产持平[57]。二是水利灌溉及生产技术备受重视。前凉时，仅敦煌郡内便兴修了北府、阳开等渠，姑臧城郊渠水由南向北蜿蜒流过，至北魏用兵河西时，这里仍一片流水潺潺，郁郁葱葱。相传张骏时因政通人和，武威至敦煌间的数百里走廊上发生“天雨麦”事，雨麦粒粒发芽结实。透过传说，不难找到水利

与技术的印记。

就农业经济的结构讲，五凉时期沿袭了西汉创造的模式。不同的是小农经济已成为农业经济的主体。地方行政对其管理也更细致化、制度化。一是上计制度经常化。西晋亡国前，张轨曾多次遣使到洛阳和长安上计簿。二是土地的分配及使用考效也按惯常的封建程序进行。如前凉的开放囿苑与西凉的“分其田畴，资其耕稼”以及各政权都实行的劝课农桑，尤其是赋税征课，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小农农村之外，为适应农战并修，屯田经济仍保持发展的势头。西凉在阳关、玉门关的屯田作为“广田积谷”之举，应该说是在汉代屯田基础上的发展。另外，适应农战要求，及时利用新占领地区的土地资源，建立权宜性的屯田经济，也是五凉发展农业的积极做法，如北凉围困南凉乐都城时，在城外搞“筑室返耕”[58]。农业经济结构中变化最大的是地主经济势力的增长。河西地主阶级从汉代以来，走过了其漫长的发展道路，而到五凉时期充分显示出其雄厚的势力和对割据政权的支持作用。东汉后期，其中坚势力的著姓地主已积累了相当的资产，所谓“大族田地有余”[59]。五凉时期，其经济与政治势力进一步结合起来，不少人家成为割据政权的“股肱谋主”[60]，有的因此“势倾西土”。他们不仅田连阡陌，且门宗甚盛，宾客部曲成群[61]。有的表现出惊人的富有。如前凉时的氾固，一次赈济宗族，“推家财百万与寡弟妇，二百万与孤兄子”[62]。靠着富有他们可以用武装与物质显示政治倾向，如索嘏等就曾“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以配合张氏后裔反对后凉[63]。

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发展，是河西经济区封建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牢固的表现。它们是经济区内长期发生作用的生产力因素。

当然，作为分裂割据时期的五凉，战争与政治的动乱也时有发生，由此又往往带来人口的死亡流徙，转过来影响以至妨碍农业生产。如后凉吕光时，因暴政和战乱破坏了武威一带的经济，导致姑臧严重的饥荒，“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64]。河湟地区也因南、北二凉的战争发生过“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的严重情况。但是，由于战乱多发生在政权更替之际，持续时间不太长，波及范围不很大，除死亡之外，流失的人口也仍在河西境内，因而造不成全局性影响。同时，新政权甫立，又会搞一番应急性的恢复，这就使五凉时期经济再生的频率加快，物质的生产及积蓄总量超过损耗及破坏的总量。

这一时期，经济区的农作物品种见于记载的有大麦、小麦、谷、

瓜、果、蔬等，麦类中的“卢水麦”属优良品种[65]。武威、敦煌的瓜，张掖、酒泉的柰也很著名[66]。

农业之外是畜牧业。有人描述祁连山畜牧业说：

> 山中冬温夏凉，宜收牛，乳酪浓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67]

所以素有“乳酪养性”之说[68]。这一时期，又有新的畜牧民族入居河西，以鲜卑为主。汉晋之间入居河西的鲜卑不下十数支、数十部之众，被统称为“河西鲜卑”。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金城北到湟水南，包括武威一带。鲜卑以外，匈奴余部如“赀虏”[69]和卢水胡等，也散处在金城至酒泉的广大地域内。这些畜牧民族的聚会，不仅给经济区增添了新的生产力，而且随之开辟出武威东北，酒泉、张掖北边的新畜牧基地，形成新的畜牧业生产潜力。关于新畜牧基地内畜牧业繁荣兴旺的景象，后来的北魏统治者印象极深，魏军穿越河套进攻河西，一过黄河进入河西区域，便俘获到马、牛、羊、驼等战利品数十万头。此前追击柔然人，追至张掖水（弱水）后折向北边，沿途马、牛、羊满山遍野，返师时光马就带回100余万匹，杂畜则不可数计[70]，“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71]。这导致北魏畜产品跌价的牲畜，部分是经济区东北和北边新兴牧场所产。

除畜牧民族外，汉族也往往农牧兼营。特别是汉族地主，他们的田庄上牛马成群。如金城麹、游两家，谣谚说他们“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72]。

畜牧业的发达，丰富了经济区内人们的生活，也与农业的发达相辅相成，成为五凉政权存在的基础。尤其是马匹的大量繁殖，对军事有直接的意义。从前凉奠基时起，河西骑兵已扬名海内，被洛阳人称赞为“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五凉时期河西经济区初步繁荣的另一标志是货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它也是张轨对河西历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原来，从西汉末年王莽废五殊钱后，历经东汉，河西钱货不行长达二三百年，民间以谷帛交易，以缣布为交换媒介，既不方便又很浪费。张轨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73]。此后经济区内外的商业贸易出现新的活跃，西域的黄金也大量流入河西，“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74]。珍珠、白玉等奇珍异宝也成为达官贵人珍爱的物

品。

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使姑臧、敦煌等城市的作用更加明显。以姑臧为例，它不仅是前凉、后凉、南凉等政权的都城，也作为河西商业的中心，沟通东西经济联系。西域的火浣布等珍宝被运到这里，中原的丝绸也走私到这里，汇聚之后再由各地商贾转贩他地。而姑臧及其附近又织造印染碧缬布，连同大量农畜产品投入市场。

总之，河西经济区在五凉时期初步繁荣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作为历史发展的成果，它有某种特殊性，即它不是统一局面下的繁荣，反映的也只是个别边远地区在开发中的经济现象。但它却是在统一的国家先期开发基础上的繁荣，并且不久即被统一局面下更大的繁荣所替代。

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

一 人口资源的剧增

五凉所处的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分裂割据时期。以黄河流域而论，政治的动荡及由此引起的战乱频繁与灾荒不断，构成这一时期最基本的历史特点。它给北方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性影响，是使其总体发展速度放慢。就各经济区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战乱和灾荒频繁的程度不同，影响面和破坏性程度不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因此，原本存在于各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虽然依旧存在，但同时又产生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原先开发较早和具有明显经济优势的中原地区，其生产力或经济能力有所回落，而原先开发较晚，经济优势明显不及中原地区的边远经济区，却以其长足的进步而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地位。河西经济区便是获得长足进步的边远经济区之一。

与中原经济区相比，五凉时期的河西经济区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河西经济区在人口资源方面获得了巨大优势。自西晋后期开始，中原地区陷入政治动荡之中，无论战乱的破坏，还是灾荒的侵袭，其程度都是空前的。由此而导致的人口死丧流移，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一个“八王之乱”，被杀百姓动辄万计。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讨伐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在洛阳附近，“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75]。永嘉五年（311），前赵军队在刘曜率领下攻破洛阳，杀王公士民三万余，将洛阳城烧为灰烬后，又进攻关中。时关中久经兵燹，“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76]，而“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77]。史书总结“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十余年间中原人口死丧流移的情况说：

>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78]

遭受如此惨重的劫难，中原究竟有多少人口死在战乱和灾荒之下，史家甚难作详细统计，但如并州“十不存二”[79]，“余户不满二万”[80]，益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81]，“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82]等记载，比比皆是。死亡之外，更多的人口变成了流民。总计其户口，当不下三十

万户，约占西晋盛时全国总户数（377万）的十二分之一强，占秦、雍、并、冀、梁、益、宁七州总户数（约60万户）的二分之一弱。[83]

人口的丧失意味着劳动力的锐减。锐减之外，流民数量剧增，又表明社会消费人口的膨胀。这是造成中原经济区生产力回落的根本原因。

在中原人口大量丧失的同时，一些边远地区的人口却陡然上升。原因是大量躲避战乱的人逃向那里，河西就是这样的边远地区之一。

早在汉魏之际，河西地区也经历过百余年的“荒毁”时期。其间，社会经济遭受过两度严重的战乱冲击。一度是东汉永初以后，由羌民起义和东汉政府血腥镇压起义所造成。史载，羌事发生后，“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84]。加上北匈奴的入侵，常使河西诸郡城门昼闭，敦煌等郡大受其害。除人口大量死丧以外，东汉政府不断征发徭役和兵役，并向河西百姓转嫁军费负担。这一切几乎使西汉中期兴起的河西经济区陷入崩溃。直到曹魏统一北方，经名臣徐邈、仓慈等精心治理，才使战乱造成的疮痍渐次平复，凉州社会经济又重现生机。此后不久，河西经济区再度遭到冲击，这就是西晋泰始初河西鲜卑起兵反晋和西晋政府镇压起义。虽然大规模的战事只有几年，但给武威一带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却相当严重。这两度冲击到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都已成为过去。在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后，河西虽有“鲜卑反叛，寇盗纵横”的战乱余波，但比之中原大规模的战乱与罕见的灾荒来，社会环境毕竟要稳定得多。而且，正因为河西僻远，中原战乱与灾荒不易波及，特别因张轨到凉州后加紧恢复封建秩序，河西局势相对显得稳定和安宁，这些，对饱受战乱与灾荒侵袭之苦的中原士民来说，无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河西成为众望所归的地方，“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85]。在中原流民潮水般涌入河西的同时，西晋秦雍一带的败兵，也大量溃散到河西境内。有记载说，太兴三年（320），刘曜攻陇右，驻在上邽一带的西晋南阳王司马保所部溃败，“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86]。

中原流民向河西的迁徙不仅限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期间。在前秦时期，也有类似事情：

> 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87]

这些移民后来都被西凉接收并妥为安置。粗略地估算，按每户五口计，经两次迁徙，敦煌郡新增人口当不下八九万。

五凉时期，究竟有多少中原及其他地域人口迁徙到河西，史无明载。但从张轨、李暠都有设置侨郡县的举措看，其总数不会下数十万口。另外，加上原先的土著人口，以及如赀虏、卢水胡、河西鲜卑等很难在籍的人口，整个河西区域，总人口不会低于百万。人口剧增的结果，是一些地方竟产生了人口压力。如武威郡，前凉中期出现了土地问题，以致张骏与群僚商讨改造戈壁，增加垦田。

上面提到，河西经济区从东汉中后期至西晋初期，曾遭受过两度冲击，人口的死丧流失定然不少。但像武威郡，冲击发生前，据东汉政府的统计，全郡仅有户10042，总人口为34216。[88]而439年北魏灭北凉时，仅姑臧一城，就收得户口二十余万[89]，远远超过东汉时期全郡户口。显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五凉初来自秦雍的民户。

除姑臧以外，其他郡县的人口也很稠密。如张掖、临松，当440年沮渠无讳卷土重来时，收集宗族，“攻张掖、临松，得四万余户”[90]。

五凉时期的河西诸郡，各民族杂居。除汉族在籍人口外，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也极大。只张轨平定河西鲜卑的反晋活动，一次便“俘十余万口”[91]。另外，北凉灭亡时，北魏“分略诸郡，杂人降者亦数十万”[92]。

有学者据《敦煌资料》所录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对五凉时期的人口进行研究和估算后指出：“五凉时基本保持十万以上军队”，“为了维持十万军队和提供兵源，需要二十万户一百万口的人口。总数一百万左右这一数字，是公元400年前后河西地区人口数量最保守的估计”。“大致在前凉建立至北凉灭亡（317～439）的一百二十余年间，河西地区人口保持在一百万左右”。[93]“最保守的估计”这一结论是有见地的。

在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产业的河西地区，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素。自然经济的运行，农业、畜牧业之间的分工，都要通过人力的投入来实现。特别是在封建割据政治之下，不可避免的军事活动往往驱使社会总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口转向非生产部门，从而使投入生产活动的人口比例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区人口的多寡，就成了决定经济能力的关键因素，成了决定政治、军事、文化发达程度的基本条件。中原人口大量迁徙河西，正说明五凉时期河西经济区的经济优势有很大增长。五凉各政权正是把握住这个优势才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

二 自给程度的提高

河西远离中原，对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依赖程度本来就很大。好在河西地域辽阔，具有良好的农耕和畜牧条件，又有地接西域、为东西交通咽喉的优势，这使河西有着雄厚的经济潜力。从西汉中期经济区开发以来，这一经济方面的潜力，也逐步得到挖掘和发挥，并对社会政治、军事、文化产生着负载性的作用。窦融曾讲“河西殷富，带河为固”，“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94]，正是基于对河西经济潜力的认识而确定的战略决策。

五凉时期，河西与内地的交通基本中断，五凉各政权也只能立足于河西，实行自给自足。

由于人口增加，土地和牧场资源大幅度的利用，五凉时期河西经济上的自给能力也有提高。这从前凉初期张轨父子多次给垂亡的西晋政权“输血打气”可以看出。前凉支援西晋的物资，主要是河西畜牧业产出的精良马匹以及农牧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而产出的毡毯等物品。

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是粮食，五凉时期的粮食生产颇为可观。从前凉到后凉，“中仓积粟，数百千万”[95]。姑臧以外其他地方的粮储也很充足。如金城，是当时著名的军粮贮存地之一，前凉多次东征，都从这里调运粮食。327年，张骏命韩璞等“攻讨秦州诸郡”，“积七十余日，军粮竭，遣辛岩督运于金城”[96]。而前赵主帅刘胤正是切断金城粮道，才使前凉东讨战略流产。另外，敦煌、酒泉、张掖诸郡都是著名的粮仓。特别是敦煌，经曹魏太和（227～233）至嘉平（249～254）近三十年的治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推广，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皇甫隆做太守时，教民使用“耧犁”和“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97]。延至五凉时期，敦煌、酒泉、张掖等郡生产的粮食也广为军国所用。如张大豫起兵，郭瑀、索嘏一次运粮三万石资助大豫。429年，沮渠蒙逊出谷三十万斛向西秦赎取被俘的世子沮渠兴国。这三万石、三十万斛都不是一个小数字。

五凉时，河西粮食品种很丰富。粮食品种有大麦、小麦、谷、豆类等。“卢水麦”是麦类中的优良品种。[98]此外，蔬菜瓜果等产量也很大。武威和敦煌的瓜，敦煌的李广杏，高昌一带的葡萄，张掖和酒泉的柰等优良水果品种，均已闻名于世。[99]

以粮食单产而论，也基本与中原地区持平。西汉时中原地区粮食产量“百亩之收，不过百石”[100]。东汉时有了提高，“通肥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101]。而张骏时议“治石田”，想改造戈壁，扩大农田，改善耕地紧张的状况。动议提出后，朝堂上下各执异辞。以参军索孚为代表，他以“后稷不垦磐石”为理由提出反对：“今欲徙石为田，运土植谷，计所损用，亩盈百石，所收不过三石而已。”[102]索孚的意思是说“治石田”将得不偿失，但他无意中告诉我们，前凉时期河西粮食亩产也接近三石，这相当于东汉时期的中原地区。

五凉时有饥馑，有时还非常严重。如后凉吕隆时，姑臧大饥，“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103]。但这是出于战争方面的原因。当时，惯用的战术是围困城池，因其饥弊而取之。后凉这次饥馑，便是由后秦与北凉围困姑臧引起的。所谓“连兵积岁，资储内尽，强寇外逼，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104]。战争造成饥馑之事在乐都也有。南凉后期，北凉频繁进攻乐都，并“筑室返耕，为持久之计”[105]，以致乐都一带“不种多年”，造成“连年不收，上下饥弊”[106]。有时，战争的目的也在摧毁对方农田。如405年，秃发傉檀率师攻北凉，沮渠蒙逊婴城固守。南凉军队在张掖城外，“芟其禾苗”[107]，耀武扬威之后东返。战争之外，五凉各时期都有天灾。举凡水、旱、霜、风、地震等，都造成局部地区农田受损。同时，每个政权后期都有失政问题，像穷兵黩武、大兴土木、赋敛不时等，也影响到农业生产，有时带来饥馑。如417年沮渠蒙逊下书中所言：

> 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内省所缺，孤之罪也。[108]

五凉时期，每逢风调雨顺，或者勤修庶政，也会现出连续丰收。有记载说，因张骏厉操改节，在334年天降甘霖，落在武威和敦煌土地上的竟是五谷籽种，“种之皆生，因名天麦”[109]。又有记载说，西凉建初中（405～417），敦煌、酒泉一带连年丰收，“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110]。所以，饥馑的发生，只是一时现象。饥馑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正说明割据政治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得不到有效防止和克服的原因，是割据者之间以邻为壑，有意制造粮荒，或各民族之间隔阂犹存，难得互通有无。另外，割据政治和民族矛盾造成的市场狭窄，又使地区间和民族间难以互市通籴。对此，五凉的一些政治家已有认识。如南凉后期，孟恺建议秃发傉檀“结盟（乞伏）炽磐，通籴济难，慰喻杂部，以广军资”[111]，表达了借消除市场壁

垒，实现取丰补歉以克服饥荒的意见。所以，一些地方发生的饥馑，并不表示经济自给能力不足，它反映出缺乏统一的经济指导而使经济不平衡扩大的事实。因缺乏统一指导，当一方陷入饥馑时，其他地方有力援助却不去救助。当然，也有偶或相救之事，如403年，北凉多次围攻后凉姑臧，给姑臧带来严重饥馑，但当双方结盟之后，北凉即“留谷万余斛，以赈饥人”[112]。另外，一方面南凉末年饥困不堪，另一方面乙弗部却蓄有大量马匹和物资。总之，以河西整体经济能力而言，不应当有“人相食”的问题发生。

农业上可以自给，这通过前凉和西凉大量安置中原移民也可说明。一般地讲，在自然经济状态下，无论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人口流徙，都会造成社会物质财富消费量的增大，并对一定地区带来经济压力，首先是粮食问题不好解决。除非这种流徙是由官方统一安排的，如西汉中期政府向河西进行移民那样，移民在数年内由政府供给衣食，通过“仰食县官”再逐步过渡到自耕自食，由消费者转变成生产者。然而，五凉时期，除苻坚建元末的江汉移民与中州移民是前秦政府统一组织的以外，前凉初期“日月相继”避乱流入河西的人口多数都是出于自发。作为一批庞大的“就食者”人口，河西地区接受了他们的到来，当地政府妥善安置了他们的生活，这本身就是对河西经济自给能力的验证，特别是对衣食自给能力的验证。与西汉中期相同，这些流民开始时也必仰食于政府，然后才逐步转变成劳动者，投入河西经济的开发行列。

五凉时期，畜牧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也能为社会提供较多的产品。

以畜牧业而论，在生产的规模和产品的数量上，都已远远超过汉代，其原因是众多畜牧民族，如鲜卑、赀虏等的畜牧业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另外，一些本不属于河西但畜牧业实力相当雄厚的民族如柔然等，有时也游牧到河西域内。还有长期居住在河西的汉族人口，他们有的也兼营畜牧业，形成了与中原豪强大族经营类型不完全相同的经济方式。像金城麴氏和游氏，他们的庄园经济实力主要在畜牧业方面。西州民谣形容说：“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113]

五凉时期，牲畜的存栏数很大，这从每次战争掳获大量驼、马、牛、羊等牲畜可得而知。现举几例如下。

前凉永乐二年（346），谢艾出征：

讨叛虏斯骨真万余落，破之，斩首千余级，俘擒二千八百，获牛羊十余万头。[114]

西秦更始三年（411），乞伏炽磐攻南凉，

济河，败傉檀太子武台（虎台）于岭南，获牛马十余万而还。[115]

南凉嘉平六年（413），北凉攻南凉：

蒙逊侵西平，徙户掠牛马而还。[116]

南凉嘉平七年（414），南凉掠鲜卑小种：

傉檀乃率骑七千袭乙弗，大破之，获牛马羊四十余万。[117]

西秦永康六年（417），河西鲜卑乙弗部降西秦，西秦主乞伏炽磐“税其部中戎马六万匹”[118]。

北魏神䴥二年（429），北魏军队“循弱水西行”，分道搜讨柔然。柔然纥升盖可汗“乃焚穹庐，以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南山。民畜窘集，无人统领”。高车部乘势抄掠柔然，“柔然种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亡虑数百万”[119]。又击高车，“获马牛羊百余万”[120]。“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121]

北魏太延五年（439）八月，北魏用兵河西，刚渡黄河即“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122]。

畜牧业的兴旺，为河西社会提供了充足的肉食及乳酪制品，也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畜毛、皮张、骨角等原料。尤为重要的是，大量良马的蓄养和繁殖，为骑兵提供了精良的装备。所谓“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正得力于畜牧业。

五凉的手工业生产也有较大的潜力。手工业生产的方式是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相结合。

官府手工业门类齐全，产品丰富。制盐、冶铁、铸铜等是传统行业。

河西盐业资源丰富。自西汉中期起，历代政府都在食盐产地设盐

官。武威郡、酒泉郡等是规模较大的制盐业基地。曹魏时，这里出产的池盐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徐邈任凉州刺史时，“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123]。另外，西海盐池自东汉以来，一直在羌族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凉时期，这些盐池保证着河西食盐供给。

冶铁和铸铜业是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两个行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工具由这两个部门提供。军事活动中需要的刀、剑、矛、戈、箭镞、弩机、马具以及铠甲，乃至钱币也需要这两个部门提供。有记载说，河西鲜卑反晋，西晋政府派马隆率兵镇压。鲜卑兵皆穿铁制铠甲，马隆“奇谋间发，出敌不意。或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124]。这说明冶铁及铁器制造在河西少数民族中也发展起来。冶铜业也有记载，北凉玄始中（412～427），“酒泉南有铜驼出，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数万斤”[125]。“凉造新泉”钱币很可能是此后铸造。[126]酒泉南即今祁连山麓，所谓“铜驼”，当是露天铜矿。

民间手工业中，毡毯制造、纺织、建筑、酿酒等，均达到相应水平。

毛毡和毯布是河西独具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因其质地坚实、柔软，有保暖、防潮的特点，故在军事及日常生活中用途极广。用毛毡和毯布可以制作穹庐、帐篷、鞍垫、坐褥，也可作为居室和衣帽的装饰。因此，毡毯产品在魏晋之际既是北方人的时尚，也是五凉时期主要的贡物和礼品。晋怀帝困守洛阳时，挚虞写信给张轨“告京饥匮”，张轨立即献上毯布三万匹。

428年，西秦主乞伏暮末立万载为太子，沮渠蒙逊致贺，派尚书王抒送戎罽千匹，戎罽当是毡毯精品。

河西著名的纺织品是缬布和玲珑细布，它们分别以丝、麻为原料，质地轻柔而华贵。缬布一般染以碧色，称碧缬布。张重华时，东晋使臣喻归到凉州，看到武威一带妇女多穿碧缬布裙，上罩玲珑细布缝制的小袄。风姿绰约潇洒，令南人刮目相看。

五凉的建筑业尤为发达。建筑所需木材伐自南山。从前凉张寔的“大城姑臧”开始，诸凉都在都城修筑宫、观、台榭。346年，张骏在姑臧南城集工所建谦光殿，是五凉建筑方面的登峰造极之作。它在构思、布

局、规模、装饰、雕画等方面都独具匠心。谦光殿之外的灵钧台、闲豫堂、宾遐观、辟雍明堂、敦煌靖恭堂、嘉纳堂等，也都属于著名的建筑。

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产业的各个部门看，五凉时期社会经济有相当的自给能力。它是西汉以来河西经济区不断开发和积累的结果。作为五凉割据政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它同时也为各政权推行其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

第三节 前凉农商并举的政策

一 劝课农桑

五凉时期对河西的经营是由前凉开始的。张轨提出的“务安百姓”，是前凉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指导思想。前凉共存在76年，除后期内乱以及自然灾害对经济发展产生过不良影响外，其社会经济总体上是平稳运行的。史家对张轨及其子孙保宁域内、开发河西的功绩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说他们“内抚遗黎，外攘逋寇，世既绵远，国亦完富”[127]。

“课农桑”是前凉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性措施，也是前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重点。它是由张轨提出并开始实行的，是张轨平定内乱、恢复经济、重建行政三项并列的施政举措之一，也是三者中的首务性措施。如史所载：

> 于时鲜卑反叛，寇盗从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课农桑，拔贤才。[128]

所谓“课”，带有行政督导的含义。“课农桑”是通过政府管理职能作用，强化对农业和农民家庭副业及手工业的组织和督促，以期充分利用人力和土地资源潜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产量。

“课农桑”并不是张轨的独创，它是历代封建政府管理农业社会的传统措施。国家统一时期这样做，分裂时期也这样做。尤其在分裂时期，各政权都雷厉风行地推行这个措施。诚所谓：

> 孙刘裂址，南北更改，以迄于朱梁，或劝课纤悉，形于诏令，或优恤深笃，著于条禁。[129]

> 夫僭窃之国，疆宇尤阻，武功是用，兵食是资，则有劝课、区种、引利沟渎，设官以勉之，严罚以督之。盖亦承天势，取地利，劳来农事，以丰年谷，使国有储待，民无流散，为自固者之计矣。故能抗拒征伐，苟延岁月，良在兹乎！[130]

五凉所处的十六国时期，是典型的分裂割据时期，也是整个北方社会自然经济比重空前加大的时期。由于分裂割据，政治军事对地域经济的依赖更加突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地域内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是政府实行经济调控的基本依据，而自然经济又使具体的经济活动回归到以

一家一户为单位和以男耕女织为方式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设法提高地域内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尽力提高每个农户家庭粮食布帛的产出率，以保证实现物质资料的自给。因此，政府也就必须将经济管理职能的重点放在“课农桑”上。

张轨的“课农桑”举措，符合上述原理与河西资源情况。

实行“课农桑”，需要一系列条件。首先是行政条件，要求“设官以勉之，严罚以督之”。也就是说，先要完备行政组织及行政官员，以便对农事活动进行督导。同时须建立一定的土地、人口、生产管理制度和办法，以便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为此，张轨将“课农桑”与“拔贤才”两方面举措并列实施。

张轨时期，前凉政权仍是西晋的地方政权。经济管理当沿袭西晋。西晋规定，农事管理责权属郡县长吏。如泰始四年庚寅诏书所示：

> 使四海之内，弃末返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先之劳之，在于不倦。每念其经营职事，亦为勤矣。[131]

具体到劝课农桑中官吏的职责，西晋有所谓“州郡农桑殿最之制”，这个制度是主管劝课行政的大司徒石苞在泰始八年提出的。

> 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农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属令史，有所循行。”帝从之。[132]

“掾属令史”是为劝课农桑配套的行政人员，后明确为“散吏”。“郡国及县，农月皆随所领户多少为差，散吏为劝农。”[133]又规定：凡郡，户不满五千者置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置散吏二十一人，万户以上，散吏三十九人。[134]张轨以“弘尽忠规”为志向，他推行的“课农桑”应当也按“殿最之制”来办理。只是他没有建邦命氏，没有“僭号”自立，故不能像南凉那样，设像成公绪那样的大司农官。于是，前凉的“课农桑”也只能由郡县长吏依晋制遵行。张轨的“拔贤才”，当也考虑了管理才能，并根据晋令“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135]这一标准来选拔郡县行政长吏。在河西各社会阶层中最符合此标准的只有河西大族。所以“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136]，不仅在于利用他们的政治才能，也在于利用他们管理经济的才能。河西大族世代生活在本乡本土，了解河西民情土俗及农事规律。另外，因家大业大，能号令一方，便于对百姓进行督导。

张轨时期，河西由战乱冲击造成的“荒废”局面尚未完全得到治理，但“荒废”不等于经济基础坍塌。为自然经济的柔韧性格所决定，也为河西大族在封建经济中所起的组织作用所决定，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活动，都会通过宗法性关系获得再生。而大族庄园正是这种再生的试验场。有了这种试验场，河西经济区是不会坍塌的。张轨以河西著姓作为政治核心，又以河西大族作为经济中坚，从而将前凉初期政治与经济置于同元状态，这有助于政治和经济的同时启动，有助于“课农桑”举措的顺利实施。

西晋时期，为“课农桑”配套的主要制度是占田课田制。它是配置土地与劳力资源的一种措施，其要旨在于做到“人无余力，地无遗利”。

占田课田制规定：

>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137]

通过这一规定，西晋政府将垦荒及耕种两个责任目标依照劳动者的性别及劳力状况进行分解，并落实到生产者那里。这个规定便于政府对农户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效益进行监督和考核。因为政府只依据生产者实际耕种的土地，亦即“课田”来征收租税[138]，政府监督农民耕种同样面积的“课田”，其中也含有用效益诱导力农的意思，这就是“寓劝于课”。因为生产者若勤于农事，收获便多，在交纳租税外自家所得也多；反之，若惰于农事，则自己所得也少。于是，实行占田课田制，使生产者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加牢固，但经济利益方面，生产者又和国家有了统一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构成了“课农桑”的实质。

张轨的“课农桑”，也以两晋占田课田制为依据，这可从后来西凉行政管理的具体办法中找到证明。因为李暠与张轨一样，都奉行尊奖晋室的政治策略。现存西凉户籍残卷中有建初十二年（416）文书，其中记载的十户人家中，有兵三户，太府吏一户，散四户。兵户，即有兵籍之户。太府吏户和散户据陈垣先生之说，前者在太府中任职，后者则是“无常职”者之户。[139]户籍所著录各户均居住在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其中兵户裴晟家有丁男二，次男一，女口一，凡口四。散户阴怀家有丁男一，女口一，凡口二。兵户裴保家有丁男二，次男一，小男一。[140]文书所载丁、次、小，均与西晋占田课田制书面文字相符。

“课农桑”作为张轨振兴经济的基础性措施，之所以合乎河西实际情况，不仅因为它符合自然经济内部运行规律，还因为河西刚从长时间战乱中走出来，社会和生产秩序尚未完全恢复，需要政府组织百姓复业。另外，大量流民正在向河西流动，也需要通过行政措施将他们安置到土地上。尤其是正在恢复和建立中的军事和行政机构急需大量的财政经费供给，它的主要来源是租课收入。因此，只有强化劝课农桑，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以及整个农业社会的运行。

五凉的劝课农桑是由张轨开始实行的，但为它的原理和功能所决定，成为整个五凉时期一贯性的经济措施。

二 恢复货币流通，发展商业贸易

整顿经济环境，恢复货币的重新流通，是前凉的又一重大经济举措，同时也是前凉在发展丝路贸易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自西汉末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141]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衰退，特别是战乱与灾荒的影响，城乡购买力普遍下降，商品经济陷入低谷。其结果，货币流通的规模和数量空前下降。王莽改制，使货币制度更加紊乱，加大了货币信用危机，加速了货币经济的崩溃。东汉永寿（155～158）以后，政府不再铸钱，而董卓又“坏五铢钱”[142]。“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143]。建安中（196～220），货币濒于废弃。到曹魏黄初二年（221），政府终于下令，停止五铢钱的行用。从此，开始了“百姓以谷帛为市”[144]的时代。

在北方，当货币经济出现总崩溃趋势时，河西地区却有些例外。这是因为河西远离中原，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总体背景与中原相同的情况下，也存在着自己地域的一些特殊性。首先，这里地接西域，处在东西方商业贸易的枢纽和咽喉地段，以物易物的低级商品交换形式不适合东西贸易的性质和要求，需要一定的货币充当媒介。其次，这里是多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经济交往频繁。虽然民族间的“合市”也可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但货币的行用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当东汉初期中原地区将进入“货币杂用布、帛、金、粟”[145]时期时，窦融却在河西颁布了有关铸钱的法令。其中有“部吏毋得作钱”，禁“奸酷吏民作使贾客私铸钱薄小不如法度”等规定。[146]此时，河西商品货币经济仍很活跃，吏民婚嫁竞相奢费。为此，窦融又颁布制度，规定“吏三百石、庶民嫁娶毋过

万五千（钱），关内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聘娶各如令”[147]。

延至曹魏，当黄初二年中原货币经济濒于废弃之时，河西却表现出另一种势头。魏明帝时，仓慈任敦煌太守，积极招商，清除地方势力对西域商贾的欺诈活动，使敦煌在引进西域商品和商业资本方面仍发挥着陆港的作用。

> 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阳）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148]

当时，中原因商品经济退缩和货币经济崩溃，军国所需物资普遍匮乏，而凉州却呈现着货币“钱遂大行，人赖其利”的景象。[149]担任凉州刺史的徐邈“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150]。这实际是利用河西地处丝路咽喉的优势，供应中原物资之需，反过来再扩大丝路经贸发展的一种措施。所以，史称魏明帝时“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151]。

河西商品货币经济完全进入萧条是西晋初期的事。泰始以后，民族战事再起。因为鲜卑反晋起义爆发，西晋屡屡对武威至金城一带用兵，鲜卑也屡屡对姑臧等商业城镇发动进攻，并一度“尽有凉州之地”[152]，造成了凉州行政瘫痪，社会秩序混乱，东西商路断绝，经济也因此遭受重大的冲击和破坏。此后，商业退缩，货币随之废弃，河西也进入以谷帛为市的时代。适如313年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谈到货币问题时所言：

> 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153]

上述状况一直延续到建兴元年（313）。时张轨任凉州刺史十多年，河西政治已上轨道，经过推行“课农桑”措施，经济状况和社会秩序初步恢复。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希望通过扩大商业贸易改变供给状况。而政府也需要在租课之外获得商税收入来补给军国之费。于是，整顿凉州经济环境，恢复货币经济，便成为当务之急。索辅作为太府官员，负责主理财赋，首先提出货币问题，也是职守所在。

事实上，由于河西此前商业发达，民间贮藏的货币数量十分庞大。而一些官僚和著姓人家，藏钱往往以数十万计。如敦煌氾氏中的氾腾，他在西晋政治衰乱时弃官返乡，发誓再不出山。张轨征聘他为司马，他

拒而不受。“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154]，过起了悠闲自得的隐居生活。当时，像氾腾这样的退隐官僚和富户人家，在敦煌比比皆是。

河西社会安定、货币贮存量大及五铢钱原先“通易不滞”，是索辅提出货币对策的基本依据。同时，河西金、银、铜的贮藏量也很大，这是张轨恢复货币经济的前提。五凉时期，政府的赏赐和回赎常使用金银。如后凉和北凉都有“班赐金马有差”的记载。410年，西凉将领朱元虎被北凉俘虏，李暠用银三千斤和金两千两将其赎回。另外，428年沮渠蒙逊送银三百斤，祝贺西秦立太子庆典。民间也有以金银为贽礼者。如前凉时敦煌主簿氾昭执法公正，理枉申滞，“人有于夜中报昭以黄金者，昭责而遣之”[155]。376年，前秦攻河西，灭前凉后，“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156]。铜的贮藏量，从沮渠蒙逊在酒泉南山采铜数万斤可知大概。贵金属及五铢钱藏量巨大，表明了河西货币经济的潜力。

另外，西晋覆灭前，张轨保据河西已成定局。此时，武威通向西域的道路重新畅通，而向东的道路却常被阻断。作为前凉统治者，不能不将眼光投向西域，正视西域的富庶及胡商通货的要求，考虑货币经济对保据事业将会带来怎样的利益。这些，都促使张轨及其主管官员注意到货币问题。

总之，在313年前后，通过恢复货币流通来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进一步促进丝路商业贸易走向活跃，已是当务之急。所以，索辅不但提出了货币问题，而且建议张轨说：“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157]建议一经提出，立时形成决策，“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158]。所谓“准布用钱”，指将缣布的购买力折算为五铢钱，用钱代替缣布来执行交换媒介职能。这样。原先散在民间的大量货币重新恢复流通，既大大方便了商业贸易，也减少了缣布的消耗，既有利于社会经济，也有利于民间生活。所以，在立制准布用钱之后，“钱遂大行，人赖其利”[159]。

张轨恢复货币经济一事，是公元4世纪初期北方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张轨没有也不可能铸造和发行新的货币，他没有改变原先的货币政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他“立制准布用钱”的法令迅速推行，并发挥重新启动商品货币经济和方便社会生活的作用。有记载说，货币恢复流通后，河西与西域间的贸易一下通畅，西域商品大量流入河西。而河西对西域贸易所处的顺差地位，也使西域的奇珍异宝、金银货币大量输入河

西。“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160]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张轨是西晋凉州刺史，他没有建号称制，故也不可能发行货币。考古发现的“凉州新泉”不是张轨所铸。对此，下文有专论，此不赘述。

张轨恢复货币经济，使河西市场大门对外打开。据张骏时的记载，此后前凉在各主要商城都设“市长”主管商贸。这使河西诸城的经济地位也日见突出。尤其是姑臧，很快成为西域商人和使者常来常往的地方。西域诸国多次到这里通贡。如328年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是时，西域所产珍珠簏、琉璃榼、白玉樽、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等，都充入前凉王府，甚至被作为随葬品。这些商品，有的产于阿拉伯，有的产于地中海。正因为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河西与西域间经济依赖程度加大，西域使节和西域长史李柏才请求张骏，对阻断交通的戊己校尉赵贞用兵。

335年以后，河西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活跃。这一年，张骏派杨宣经略西域，“西域并降”，从此“骏尽有陇西之地”[161]。而五铢钱作为前凉的法定货币，在东起陇西、西到西域的广大地域内流通，结束了这里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这和陇山以东的关中和中原“钱货无所流通”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货币经济恢复后，河西民间交易也趋活跃。在交易中普遍实行卖券和质券制度。买卖双方往往立有文券作为凭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留有许多这样的文券残篇。其中前凉升平十一年（367）“王念卖驼券”较为完整。此券写道：“升平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王念以兹驼卖与朱越。”“左来右去，二主各了。若还悔者，罚毯十张供献。”[162]王念与朱越的骆驼买卖可能是货币交易。

当然，在注意张轨恢复货币流通对东西贸易及民间交换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还应注意一点，那就是货币流通后，河西经济的总体结构并未彻底改变。由于自然经济比重过大，民间的交易规模十分有限，用于交换的物品也多为与日常生活及与生产直接有关的粮食、牲畜、蚕桑、农具等。故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仍很普通。

但无论怎样说，前凉初期整顿经济环境和恢复货币流通是十六国时期的重大事件，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因此，张轨和索辅二人在河西

开发史上功不可没。

三 张轨铸钱说质疑

——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铸造时代

古代金属钱币的铸造与流通，不仅是为在商品交换中充任媒介，起着通有无的“沟渎”作用。由国家发行或颁定的钱币，往往又是国家和经济主权的象征。因此，也被称为“国之重宝”。在国家统一或王权强盛时期，会设立严格的典刑以匡正货币方面的不轨行为。除非国家明令地方或民间铸钱，否则私自铸钱会被视为“盗铸”，至于凿边去轮使斤两差重，会被视为“巧伪”，都会被明正典刑。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分裂割据时期。其间的十六国时期则政权林立，王者竟自尊树。政治上的混乱带来了经济上的混乱，经济上的混乱不仅造成北方许多地方“钱货无所周流”[163]，也使一些割据者为昭示自己的王者名分而自行铸币，出现了一些区域性钱货。其中，被一些古币专家和史学家认定由张轨铸造标有“凉造新泉”字样的钱币便是其一。这种认定从清光绪年间“凉造新泉”发现时开始，直到今天仍有人沿袭其说。如朱活《古钱新典》在提到1970年发现于西安的“凉造新泉”时，征引了李竹明《古泉汇》所云：“刘青园有三枚，俱得于凉州，断为轨所铸。”[164]这里的凉州指今武威市，轨便是张轨。

笔者既非古钱专家，也不曾见识过“凉造新泉”，但却十分怀疑张轨铸“凉造新泉”的说法，也怀疑迄今为止认为张轨还铸造过“五铢钱”的说法。另外还认为，搞清张轨曾否铸钱，以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代和铸造主体，不仅只是为张轨正名，也有助于为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格局和经济活动补缺拾遗。

（一）张轨不会私铸钱币

这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张轨是什么人，他会不会私铸钱币？

张轨，安定乌氏（今平凉市西北）人。史称其为“拥之而延世”的西晋名臣[165]。他的父亲是西晋太官令张温。早在汉魏时期，张氏家族就是陇东的名门望族，“家世孝廉，以儒学显”[166]。

西晋讲名教治国，儒家伦理中的忠孝被视为治国的根本。晋武帝司马炎就自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167]。凡晋初名臣，大抵都用“忠孝”二字磨砺自己。张轨不仅出身“家世孝廉”，而且他自幼随其同乡皇甫谧学习《孝经》，长成后“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168]，是个动不逾规，行不越矩的人。尤其是他对晋室的忠诚与忠心，为史载所不乏。他于晋惠帝永宁元年（301）自愿请缨，到河西去做凉州刺史。虽然有躲避“八王之乱”的隐衷，但他去的凉州，是当时社会秩序最不安定的地方。他之请缨，当属为君王分忧之举。“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169]为什么说是为君王分忧？因为从晋武帝泰始之初开始的“鲜卑反叛”曾先后杀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等多名西晋封疆大吏，使晋武帝“为之旰食”[170]，诏太官为之“减膳”。[171]张轨在凉州13年，兴学校、课农桑、拔贤才，安置中原流民，政绩卓著，始终以晋臣自居。临死还遣令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逊，以听朝旨。”[172]这时已是匈奴兵破洛阳后的晋怀帝永嘉七年（313）。

有关张轨曾否铸钱的争论就在张轨临死之前形成。

> 愍帝即位，进位司空，固让。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173]

于是，根据这段记载，再加上武威首先发现了“凉造新泉”等古钱币，有人就断言包括“凉造新泉”在内旁及一些“五铢钱”是张轨铸造的。显然这是一种失于偏颇的断言。其实，这段记载中的索辅进言也好，张轨纳言也罢，从头至尾不及一个与“铸造”有关的字。它讲的只是一个在河西恢复不恢复使用钱币以及使用何种钱币的问题。这在那个时候已经够振聋发聩、移风易俗的了。

前文说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许多地区正经历着“钱货无所周流”的时代，这被史家称作“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174]这个时代早从两汉之交就已开始。王莽时期，变汉制，废五铢钱，至汉光武建武十六年（40），“始行五铢钱”，中间的二十多年，一种社会现象露头，那就是“货币杂用布、帛、金、粟”[175]。汉武帝以后，这种现象愈

演愈烈。有人提议干脆封存钱币，国家租税统治以布帛征纳。此后汉桓帝时期“帝竟不铸钱”。[176]东汉末期董卓擅权，“坏五铢钱，更铸小钱”[177]，此后曹操再废小钱，恢复五铢钱的使用，但货币经济在北方并未因此而复苏和活跃起来。整个曹魏时期的食货及其决策情况是：

> 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178]

上面这些钱币与谷帛之间的行与废，争与斗，说明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时代统治者的无奈。在无奈之余，我们还可以窥视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以正统自居的魏晋统治者在恢复钱币流通上的勉为其难和对五铢钱的情有独钟。然而他们恢复钱币流通的办法大都不像王莽、董卓那些被斥之为“僭伪国贼”变更币制，除魏明帝以外，大都也不是再铸五铢或什么新泉，而是都要把社会上贮存和国家府库存在的五铢钱调动起来。到西晋时，史家径称“不闻有所改创”。作为西晋名臣的张轨又怎会去改创呢？笔者认为，索辅身为凉州太府，他清楚地知道凉州府库中有多少五铢钱，他只是依据跟随张轨多年目睹及亲身体验的凉州社会秩序转安、社会经济恢复的实事，向张轨提出的合乎时宜的建议。而张轨则是审时度势，在凉州率先实现了五铢钱的再流通。也就是说，张轨与索辅的举措之所以有振聋发聩、移风易俗的意义，是因为他们首先在河西走廊结束了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张轨没有铸造新钱币，也不会铸造新钱币。这不仅是因为他懂得名教，懂得为臣之道，也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个国家多难的时代。他忠尽刺史之责，一次又一次地向垂于灭亡的西晋王朝呈送计簿，一次又一次地派出义兵，贡献战马、毡毯等战备物资，史料中唯独不见铸币一事，这中间绝不会有古史家的疏忽。

其实，张轨遵照西晋有关钱币的成法，不去做“改创”之事，除尊崇晋室正统之外，还是考虑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的结果，如新币能否行用、铸币需要的一系列铜料来自何处等。主权者的国家不仅不准许“盗铸”，也不准许偷取钱币铜料以作他用。这方面直到东晋时，还有严格的禁令。

> 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

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179]

而僭伪者既然不会理会有关改创不改创的法令，当然也不会在获取铜料上有所禁忌。董卓不仅坏五铢钱，而且又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180]。比张轨恢复五铢钱稍后些，319年，石勒称赵王，称王前针对刘曜对他的封赠说：“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181]他称王后除设置太医、尚方、御府等官署外，“置挈壶署，铸丰货钱”。[182]他不讲正统，也不管所铸钱币有无信用，当然也不管铜料从哪里来。当他发现百姓不乐意使用丰货钱后，借口发现了王莽时的权石和大钱，采取了强制性措施结果弄巧成拙：

因此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勒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183]

在这点上，张轨与石勒一个是“正统”，一个是“僭伪”，身份不同，政治行为也不同。张轨不铸新钱，既无须敛聚铜材，又无须立什么“科条”，搞什么“限令”，他只通过发扬五铢钱久经考验的信用价值，就使百姓感到了便利，也合乎规律地拉动了河西商品经济。

（二）张轨不必新铸钱币

再一个问题是，张轨有无铸造新钱的必要？

石勒所铸丰货之所以难以推行，不光因为人们怀疑新币的信用价值，还因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闲散货币数量本来就很多。即使原本信用价值度很高的钱币，如五铢钱都缺乏购买力。所谓“钱货杂用布、帛、金、粟”就指这种现象。钱币多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是困扰石勒的唯一问题，在铸币之前，襄国一带一直流通着白银等贵金属货币。有记载说，他初占襄国时，襄国连年战乱而造成大饥，“谷二升直银二斤，肉一斤直银一两”。[184]只是他为了表现王者之尊而不去利用已存在的货币环境。张轨则不然，他不铸造新货币，而是按照缣布与五铢钱的比价，“立制准布用钱”，其做法与石勒钱帛折算如出一辙，但原理却大相径庭。在索辅的帮助下，巧妙地利用了河西在货币经济环境上的优势，所以不存在来自通货膨胀方面的困扰，也因此实现了“钱遂大行，人

赖其利”。

河西的货币经济环境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自西汉中叶以来，这里一直是北方通向西域的主要商道。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后，只要河西没有兵乱，就常有西域胡商通过敦煌取道这里到内地进行贸易，所谓“胡商贩客，日款塞下”，任何对河西走廊拥有主权的朝代或地方守宰，都不得不着意维护河西商道的通畅。曹魏时的敦煌太守仓慈和凉州刺史徐邈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仓慈积极招商西域，清除障碍，将敦煌变成国际贸易的陆港：

> 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阳）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185]

徐邈也是如此。故史称“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186]。

仓慈与徐邈的努力，不仅为曹魏的府库增加了许多商税，也补充了朝廷一些物资上的缺口，所谓“乃度支州界年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187]。

河西商道在晋初一度断绝。这是因为泰始以后发生了鲜卑的反晋战事。鲜卑曾一度“尽有凉州之地”[188]。而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讨破”鲜卑，重新恢复了西域的商道。

西域胡商取道河西或入内地或就在凉州交易，不排除以货易货的实物交换，但在获取丝绸等物资时，大多数情况下是采取现钱交易。西域诸国多使用金银钱币，罽宾、安息、大月氏乃至遥远的波斯帝国都如此，[189]而河西也获取了大量西域金银钱币，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要商道畅通，莫不如此。以致北朝末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钱”[190]，这从高昌古城发现波斯银币可得印证。但也不可忽视，要市西域的“金帛犬马”，有时也不能不支付信用为西域诸国认可的中国货币。而自汉以来，为西域诸国认可最具信用的中国货币就是五铢钱。考古工作者在古龟兹（今库车）以及焉耆、和田多地发现的西域小铜钱可印证这点。这些小铜钱仿制原型乃是五铢钱。

张轨恢复五铢钱的流通，就是要适应河西走廊长时期以来在东西贸易与货币交换中所处的优势环境。他不铸新币，也基于五铢钱在这个优势环境中不可取代的优势信用地位。史载，张轨下令使用五铢钱后，马

上有西域胡商到河西来贸易，“西胡致金胡瓶，皆作拂菻奇状，并人高二枚”[191]。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将张轨恢复五铢与西胡致金瓶连缀在一起，意在说明金瓶是西域产生的奇珍异宝类商品，是只有五铢钱才能买到的。

张轨能恢复五铢钱流通的另一个货币经济环境是包括五铢钱在内的河西走廊上多种金属货币的藏量。

汉武帝开始设置河西四郡是在元狩二年（前121），是年秋，匈奴昆邪王杀掉休屠王降汉，汉武帝“以其地为武威郡、酒泉郡”[192]，又《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与此有歧异，兹不论。元鼎六年（前111），又分二郡之地置为张掖郡和敦煌郡。而下令上林三官初铸五铢钱是在元狩五年（前118）。以此而论，河西置郡县的时间恰与开始总一货币为五铢钱的时间相吻合。这个时间与张轨出任凉州之间相隔四个多世纪。这四个多世纪正是五铢钱流通和贮藏两大功能呈现阶段性发挥的时期。史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193]这280亿万余的五铢钱无论流通于诸市和贮藏于公私的数量成什么样的比例，其数量在长时期内都不会发生变化。王莽改币制，“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194]，很显然是在罢黜刘汉的正统地位，而“罢”只是停铸之意，他实行了黄金国有政策，但并没有也做不到二百多亿五铢钱全部收缴销毁。相反，由于他的新币缺乏信用和购买力，五铢钱在民间的贮藏功能将更大。流通也不会停止。王莽颁定新币后，“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贾”[195]。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货币经济衰落，必然使五铢钱的贮藏功能进一步发挥。其间董卓也废过五铢钱，但后来复五铢的议论不绝于耳，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西汉之世，五铢钱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而河西走廊是重要流通地区。其原因不仅在于河西走廊是国际商道，也不在于五铢钱是西域认可的信用货币，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当初汉武帝统一货币的目的一是遏制富商大贾“滞财役贫”，制裁富商大贾在国家有难时“不佐国家之急”的无道行为。二是为增强边备和与匈奴作战的需要，这第二点更为重要。所谓富商大贾“不佐国家”，就是指国家为徙民实边和反击匈奴“费以亿计，县官大空”[196]，而那些富商不为所动，坐视不救。而当时的河西走廊是实边和击胡的重点地区。从四郡开始设置起，西汉政府先将军人，而后将关东贫民等源源不断地迁徙到河西。如《史

记》所记：

>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97]

《居延汉简》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 □迫秋月，有徙民□来关。
>
> 居延移民，以物供□门□□（下缺）。[198]

西汉政府对戍边和实边的兵士、贫民采取的资助措施是“衣食皆仰给于县官”[199]，实际是招募政策。当然，既是招募，受募者都会携带一定数量的货币西进。

另外，无论是击胡还是戍边，西汉政府对将领实行重金赏赐政策，对战士实行军俸政策。如卫青、霍去病第一次率军出征时，获“赏赐五十万金”[200]。后来霍去病入河西击胡，亦当如此。这种赏金和军俸制也会将大量钱币留在河西土地上。

总之，由于河西走廊是西汉重要的军事、边防、商贸地区，西汉所铸五铢钱会大量流向这里。这从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多次发现数量众多的五铢钱可以证明。到魏晋时期，河西政治、军事、商贸重地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五铢钱等货币在河西的总量也不会改变，甚而会有增无减。这点，通过徐邈取凉州军费的多余部分为曹魏国家购置西域商品足以证明。

除汉武帝移民实边外，从西汉末到西晋初，河西移民又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一是王莽代汉时，一些反对王莽的西汉朝官僚为避难而到河西。如晋时成为西州大姓令狐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家。二是张轨时期，因中原战乱，“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201]，这种势头到张轨死后的公元320年尚在延续。史载，当年刘曜攻陇右，上邽一带军民“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202]。这些人中有许多是西晋官僚和中原豪望。他们为避战乱举族迁徙，不可能将其庄园带到河西，而只能将积累起的大量财富带到河西。其中，钱币是主要财产。如氾腾，他为避乱辞官归敦煌故里，带回五十万财产“以施宗族”[203]。当然，这五十万是以五铢钱折算的。

总之，自西汉以来，河西走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货币市场。除潜在的五铢钱外，金银等贵重金属存量也极为丰富，所以当376年前秦攻灭

前凉后，能够一下子“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204]。

处在这样的货币经济环境之中，张轨既不会熟视无睹，也无必要选择铸钱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当他任地方豪族中的索、氾、宋、阴等家族为“股肱谋主”时，他还要照顾到这些家族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家家都“丰于钱货”。由此而论，索辅认为“宜复五铢”和张轨立制恢复五铢后的“钱遂大行，人赖其利”，这里的“人”指的首先是地方豪族。

（三）“凉造新泉”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

那么，究竟是何人在何时铸造了“凉造新泉”？“凉造新泉”的流通情况又如何呢？这是所有古币收藏家、研究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首先，“凉造新泉”是五凉时期的一种钱币，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凉”指的是凉政权，而不是指凉州，因为晋以前的凉州地方政府是无铸币权的。张轨作为西晋凉州刺史当不例外。

诸凉政权出现在十六国时期，它们依次指张轨以后的前凉、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鲜卑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匈奴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和汉人李暠建立的西凉。这五个凉政权中，前凉和北凉是历时最长、完全拥有河西走廊的两个凉政权。而后凉、南凉、西凉都历时短暂，只占有河西局部土地，并且长时间地经历着战争和内乱，它们铸币的可能性不大，史书上也没有关于它们铸币的记载，可以将它们排除在铸造“凉造新泉”者的行列之外。

前凉成为割据政权，是在317年西晋亡国以后。时去张轨病死之时已有四年。它之所以成为割据政权，是因为西晋的灭亡使它原为西晋凉州刺史部的名分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张轨的儿子张寔、张茂等仍称凉州牧，由于“官非王命”，除在《晋书》以外的诸史，都称其为“私署”。既然是“私署”，就有可能铸钱。但张寔初期，在长安的西晋政权虽岌岌可危，却还存在，张寔也为“赴国难”而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张茂时期，关中立国的前赵不断西侵，而地方豪强又伺机捣乱，张茂忙于应付外忧内患。因此寔、茂弟兄也不可能铸钱。

前凉最有可能铸钱的是张骏。张骏时，“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东）晋，而不行中兴之朔，舞六佾，置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焉耆前

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205]。另外，张骏“性又贪惏”[206]，并且平日喜好西域宝货。后凉时期，有胡人安据盗发他的墓葬，“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207]但这些仍不能证明“凉造新泉”是张骏所铸。一是因为他毕竟尚未称王，二是史书中仍不见有他与铸钱有关的蛛丝马迹。有人认为1981年在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的“太元货泉”“殆张骏造”[208]，只是根据197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做出的臆测。是表列出凡以太元为年号的三位统治者，一是吴大帝孙权，二是前凉张骏，三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其中只有张骏未冠以“帝”或“王”字样。既非帝又非王，何来年号。张骏的“太元元年”当是东晋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324）。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死于此前一年。这时张骏仍奉西晋愍帝的建兴为正朔，“太宁元年，骏犹称建兴十二年”[209]，同时又开始建立与东晋的君臣关系。“寻承元帝崩问，骏大临三日”[210]。长史氾祎以黄龙见于揟次嘉泉之兆劝他改年号，被他拒绝。这事在《晋书》《资治通鉴》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唯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中在张骏条太宁二年上为张骏系上一个太元元年，也不知依据何典。仅根据太元元年就说出土于内蒙古的“太元货泉”是张骏所铸，未免有失偏颇。与此相类，说有一种叫“太清丰乐”的钱是前凉最后一个统治者为张天锡所铸，也有望文生义和妄下断语之嫌。

舍去前凉来说，“凉造新泉”极有可能是北凉所铸。

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族属是匈奴卢水胡，他与石勒同属于胡羯，并且都是胡羯中的雄略之主。412年，沮渠蒙逊灭南凉，建都于姑臧，称河西王，改元玄始。玄始十年，他相继攻破酒泉和敦煌，灭掉西凉，统一了河西走廊。共在位33年。比五凉中任何一个统治者在位的时间都长。他在位时北凉政通人和，经济稳定，与西域关系密切。他对外实行睦邻政策，先后称藩于后秦、北魏、刘宋。但却不像前凉是从晋王朝中派生出来的那样，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说他极有可能是“凉造新泉”的铸造者。此前，已有出版物将“凉造新泉”断为北凉沮渠蒙逊永安年间造[211]，但并未论述其根据。笔者同意沮渠蒙逊“凉造新泉”的说法，但对具体年代要略作补充。

关于沮渠蒙逊铸币所需铜料来源，有史载：“先，酒泉南有铜铊出，言卢犯者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数万斤。”[212]其中“铜铊”在《初学记》和《太平御览》中写作“铜驼”。以意忖之，当是如骆驼状的

自然铜。酒泉南大约是指祁连山脉，直到今天，这里仍是矿产资源很丰富的地段。一千五百多年前出现能开采出自然铜，似不应怀疑。

玄始二年，“蒙逊母车氏疾笃，蒙逊升南景门，散钱以赐百姓”。[213]蒙逊散钱，一来是为其母祈福，二来也是为表示他造福于民。他散的钱是否就是新铸造的“凉造新泉”？如果是，“凉造新泉”那它可能成钱于玄始初，即公元412年左右，可能是为车氏祈福所铸，它可能不是实用钱币，而可能是用于厌胜驱邪的钱币。但是已发现的“凉造新泉”有两种币面，一种直径1.8厘米，重1.5克，一种直径2.06厘米，重2.3克。[214]这又不好解释。就这两种钱的重量而言都达不到汉武帝时五铢钱的重量标准，即3.5克。即使它真是用于流通的钱，它的信用程度也不高。流通起来也困难。迄今为止也仅发现了数枚，除西安发现一枚外，其余都出现于古姑臧所在的今武威市。甚至在河西走廊其他地方也没有踪影。当然，这除了说明它发行量小，流通范围不大之外，反过来又说明了它在古币收藏上的价值。

综上所论，可见，此前古钱币专家和一些史学家主张的张轨铸币说多有讹误。将张轨“复五铢”的举措与发现“凉造新泉”古币的被发现联系起来，更毫无根据。张轨时期的凉州，仍是西晋的天下，作为“西晋名臣”，他不可能僭越到自行称“凉”的地步。所以张轨与“凉造新泉”沾不上边。张轨之所以能在河西恢复货币经济，一是他注意到了汉以来五铢钱具有的信用价值，二是他适应了河西走廊潜在的货币经济环境。他的举措仅限于恢复五铢钱流通。这里的“复”是相对于此前的“罢”和“不行”而言。这一“复”既启动了货币市场，又改变了“货滞物流”的现象，同时又避免了石勒那样新的通货膨胀。正是这样，张轨复五铢的举措才对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内外贸易起到了促进作用。

另外，“凉造新泉”很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它发行量不大，流通范围不广，却很有收藏价值。

四 注重民生，发展经济

魏晋以后的河西社会，总体上是地主制封建社会。纵然社会经济有稳步的发展，经济自给能力较强，但广大农民的贫困化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土地占有的不均，赋税、徭役和兵役的赋重，是造成农民普遍贫困的根本原因。另外，战乱与天灾又加重了农民贫困化的程度。

早在两汉之间，河西地主中的大族豪右势力已左右着河西政治和经济。窦融保据时期，抚慰的那批“雄杰”和“州郡英俊”厍钧、史苞、竺曾、辛肜等，他们坐制郡县，“各有宾客”[215]。从光武帝诏他们“无擅离部曲”[216]，可见他们也有军队。至于他们雄厚的经济势力，从窦融与五郡太守赴洛阳奏事时，“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217]的阵容得到显示。

曹魏时期，大族豪右势力利用封建宗族关系及宾客和部曲势力纵横邑里，称雄一方。他们广占良田沃野，一不入王赋，二向贫困民户转嫁调役，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相沿成习。以敦煌郡而论，魏明帝以前，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太和中（227～233），仓慈出任太守，“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218]。大族豪右的势力因此受到一些限制。仓慈的“随口割赋”，即按人口分摊赋税。它解决了大族豪右隐漏人口和向贫苦农民转嫁负担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处境，缓解了土地兼并和社会矛盾。

前凉肇基时，张轨以河西著姓为政治核心，使大族豪右势力再一次上升，也使土地占有关系方面存在的矛盾再度发展，依照西晋占田课田制的规定，农民有权占有和使用一定数量的土地，但在地主势力相当大的情况下，事实上很难办到。而且由于中原人口大量西徙，一些避乱迁入河西的西晋官吏随之加入豪右地主行列，成为新的土地兼并者，又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占有关系方面的矛盾。

张轨时期，军国初创，财政是当务之急。赋税之外，徭役和兵役也都接踵而至，加到一般百姓头上。如果农民的土地问题得不到解决，那赋税、徭役、兵役的征发都将是一句空话。采取强征强发，又只能加大百姓的贫困化程度，导致广大农民的破产流亡。其结果，不但社会经济难以启动和运行，还会搞得怨声载道，社会不宁。

鉴于这种形势，从民生、国计两个方面考虑，张轨及其后继者都必须将土地和赋役问题作为治国的根本问题加以解决。

张轨时期设置侨郡县，这一举措是适应形势，统筹土地和赋税问题的举措。史载他的举措说：

> 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

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219]

简言之，是将流移人口“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220]。这种做法在于缓解侨郡县人口在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冲突，使“中州避乱来者”登记户口，逐步过渡到承担赋税和役徭。或者说，设置侨郡县安置侨民的过程，就是政府划拨原属国家所有的土地或荒田，配给侨人耕垦，将他们由消费者转化为生产者的过程。这样做，也可消除侨姓豪右地主与河西著姓地主两大势力在土地占有方面的矛盾。

张轨也注重民生问题，他死前遗令“务安百姓”，有减轻百姓负担的意思。所以，当张茂劳役百姓筑灵钧台时，有人假借张轨之命，夜叩张茂家门大呼：“武公遣我来，曰：‘何故劳百姓而筑台乎？’”[221]“武公”是张轨谥号“武穆公”简称。

张骏时期，前凉进入强盛期，同时灾荒饥馑也时有发生。由于“顷年频出，戎马生郊，外有饥羸，内资虚耗”[222]，致使为政者格外重视民生问题，张骏也因以此被称为“积贤君”。是时，武威一带人口稠密，耕地严重不足，张骏拟改造沙漠，扩大耕地，于是与群僚讨论“治石田”之事。作为一项由政府组织的造田运动，如能实现，不仅会使可耕地面积扩大，也可改善生态环境。张骏对此决心颇大，但反对者不少。如索孚说：“凡为治者，动不逆天机，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谷，不垦磐石，禹决江河，不逆流势。”[223]以此为理论依据，反对“治石田”。张骏一怒之下，“出孚为伊吾都尉”[224]，令他到今新疆哈密去负责屯戍。另外，张骏在解决耕地不足问题方面，还有一些措施，如西取戊己校尉地，以其地置为高昌郡并移民屯垦；置武卫、石门、侯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列置军民屯垦。

张骏时期有“刑清国富”之称，这是张骏注意民生疾苦的结果。注意到民生疾苦，采取一些优恤措施，也就会缓解社会矛盾，会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从张骏的“勤修庶政”，到他将河西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引向“境内渐平”，其中与张骏推行休众息役政策有很大关系。

张骏时期在安定民生方面也有一些失误。张重华继位后，以此为前车之鉴，进一步施惠于民。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225]。张重华这样做，一则因此前已有二十余年的“刑清国富”局面，即使如有人所说，国家需办理的事还有很多，“遗烬尚广，仓帑虚竭”[226]的情况还很严重，但由于“境内渐平”，军费开支大大减

少，进一步减轻人民赋役负担也有了条件。另外，与赋税徭役繁重有关的统治者的穷奢极侈以及商业关卡林立等问题，也都需要加以解决。

前凉对农业居民征收的赋税主要是租调。租调是根据生产征收的。如前所述，前凉秉承晋法，推行占田课田制。农民占有和耕种的土地名义上由政府授给，称“分田”。另外，农民家庭还从事“蚕绩”。这些可通过西凉的政策得到印证。西凉后期，国力衰落，主簿氾称上疏劝谏李歆，提出“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勤蚕绩”，主张“百姓租税，专拟军国”[227]。

“分田”实际是“课田”，它和“蚕绩”分别是租调的来源。租是田租，调是户调。

依课田法，丁男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但实际征收中，不论农民能否占到规定的土地，却要照数征纳规定的租调。当然，前凉是否完全依照西晋办法，这有待进一步研究。有记载说，前秦灭前凉后，曾“五品税百姓金银”。这“五品税”法，或为前凉遗留办法，即在征收赋税时，将纳税户按贫富分为五等，再“计赀论课”。

前凉政府对一些畜牧民族也有赋税规定，这可以乙弗部受西秦征敛的事为佐证。417年，乙弗鲜卑首领乌地延降秦，乞伏炽磐一次“税其部中戎马六万匹”[228]。前凉必也有戎马之税。另外，大宗毡毯等畜牧业副产品，也税自畜牧民族。

张重华的“轻赋敛”措施无具体记载。但他适当减轻胡汉百姓租税戎马等负担，借以改善民生状况，这个意思是明显的。

前凉的关税制度内容不详。自张骏经营西域取得成功后，中西贸易日渐活跃，同时因河西与西域政治上的一元化格局出现，五铢钱的行用和以敦煌为陆港贯通东西的市场形成，有大量“胡商”来到河西，甚至居留下来，这一切都使关税制度的确立有了必要。有记载说，北魏灭北凉时还有许多粟特（康居）商人留住姑臧，后与凉州豪族一同被徙往平城。外商云集，这说明关税和市税已是前凉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但同时，由于西域已归入前凉版图，西域河西之间的贸易关系已成为内贸关系，关税壁垒也就会妨碍经济发展。张重华的“除关税”举措，不一定是完全废除关税制度，而是为了维护前凉一统政治和减轻胡汉商贾负担。从经济角度讲，它反映了自由通商的新政策，有助于扩大商品货币经济

的规模。由于前凉在河西主要城市征收市税，虽然关税取消，但由于通商的人多了，市税收入也就会相应增大。因此，“除关税”不会影响政府财政，它与北魏统一北方后对商业实行的“不设科禁，买卖任情”[229]的政策相仿。北魏的政策招致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域珍物，充仞王府。同样的政策也会在前凉收到同样的效果。假如不是前凉亡国和河西重陷于分裂状态的话，“卉服毡裘，辐辏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230]的商业景象也会在五凉时期出现。

在张重华“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的举措中，“省园囿”的民生福利性程度最大。

前凉园囿之兴，始于张茂筑灵钧台，终于张骏筑谦光殿。这前后许多“崇饰台榭”的工程，既广占耕地，扩大了土地占有方面的矛盾，又费时费力，加重百姓徭役负担。另外，园囿之兴还使统治者沉湎于酒色园林之娱，荒废军攻要务。“省园囿”的意义在于，它将园囿开放，供民耕垦；它省掉因土木兴建对劳动力的征发，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使民众得以休息；它节约了经费，节省了开支，有利于军国，是禁奢息侈和勤修庶政结合在一起的“强国富俗”措施。纵然张重华自己“颇怠政事”，“好与群小游戏”，使这一措施的实施很有限度，但前凉此后再没有土木兴建。说明“省园囿”措施起了一定的惩前毖后的作用。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第三节 诸凉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举措

一 利用人力物力资源，扩大区域开发

前凉之后，前秦统治河西有十年时间。此间，也采取了安定河西民生，发展河西经济的政策。如建元十三年（377）的优复举措：

> 以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孝悌力田爵二级，孤寡高年谷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231]

这是“劝课农桑”进一步在河西的推广。而前秦凉州刺史梁熙也继续促进西域与中原之间的联系，保证了河西与中原之间交通的通畅，并使西域商品经过河西源源不断转输到长安。有记载说：

> 梁熙遣使西域，称扬（苻）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232]

另外，前秦大力向河西移民。建元之末（383～384）一次迁徙江汉百姓万余户到敦煌，又谪徙中原“有田不辟”和舍本逐末者七千余户到敦煌。这两次徙民，使敦煌郡猛增近十万人口。

前秦在淝水之战崩溃后，河西渐次陷入分裂。由于后凉政治败坏，加之以后南、西、北诸凉各自为政，彼此兼并，战争使劳动力大量死丧流移，为战争服务的人口增加，以及农田受破坏，大量牲畜成为军资等，这一切都对生产力造成破坏，影响到经济的继续发展。在战争消耗人口的同时，灾荒的肆虐以及人为的饥馑，也造成劳动力锐减。这种情况在后凉时期尤为严重。吕光太安二年（387），凉州饥荒。

> 时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233]

吕隆神鼎二年（402）：

> 连兵积岁，资储内尽，强寇外逼，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
>
> 姑臧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城门昼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吕）隆惧沮动人情，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234]

正是因为如此，诸凉分治河西时期，尤为重视物力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时这种开发以掳掠的方式进行，资源的利用也往往带有某种野蛮性和残酷性，但因此也带来河西全局或局部经济投入的增加。

首先看后凉。吕光建立后凉，靠的是“总兵七万，铁骑五千”的强大军事力量及杜进等人的谋划。但吕光从西域掳掠的大量财富，也为后凉初期的政治、军事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增加了河西物力、财力基础。吕光占领的龟兹，在当时富庶无比。“城有三重，广轮与长安城等。城中塔庙千数，帛纯宫室壮丽，焕若神居。”[235]虽说龟兹王帛纯在逃离王宫前，已收其珍宝，但府库所存，何止巨万。另外，“胡人奢侈，厚于养生”[236]，家家都有蒲桃（葡萄）酒营生，“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237]。民间资财也十分丰厚，数以千计的佛寺，庙产香资更难以估量。与龟兹同降的还有三十余国，其王侯“惮光威名，贡款属路”[238]。吕光聚敛了龟兹城的资财与三十余国的贡献，在东返时，将这无数钱财珍宝用二万头骆驼装载，连同西域的奇伎异戏殊禽怪兽，以及骏马万余匹，统统带回姑臧。吕光开发财力物力资源使用了霸道性手段，所掳掠的西域资财也未用于发展生产和改善百姓生活。但河西平添许多财富，多少会使吕光等后凉统治者减少一些对人民的搜刮。

其次看南凉。南凉也大肆进行掳掠，由于鲜卑部男子人人习战，造成农业劳动力奇缺，南凉掳掠的对象主要是人口。这使“专以徙民为务”成为南凉统治的重要特点。掳掠人口的政策是利鹿孤时期鲜卑贵胄鍮勿峇提出的。具体为“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239]。但是，南凉掳掠的人口不尽是“晋人”，也有非汉族人口，如建和三年（402），“徙显美、丽靬二千余户而归”[240]。丽靬是羌戎之一支。又如弘昌五年（406）“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241]。徙民其实是军事性征服之后的劳动力搜刮，它有时搞得“徙户资财，盈溢衢路”[242]，被徙者也“安土重迁，故有离叛”[243]，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方式使百姓遭受重大损失和痛苦，并扰乱了被徙地域的生产。对于劳动力来说，充其量是在河西域内由彼地向此地的转输，整个劳动力资源并不见增加。但是，如同北魏初期徙民那样，它对徙入地区的开发是有利的。另外，将羌戎民族徙置在土地上，也会促使其民族经济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由畜牧转向农耕。

如果说后凉与南凉开发物力人力资源的霸道性方式对社会经济补益

甚微的话，那么西凉李暠建立侨郡县，安置江汉和中原移民，则是劳动力综合开发和利用的重大举措。敦煌、晋昌一带，地处边陲，又是西域与河西的接合部，有组织地安置大量侨民复业，对开发边疆，活跃东西贸易有积极意义。李暠所安置的人口中，有一部分是来自河西人口稠密的武威以东，“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244]。这或许还会减轻武威以东土地不足的压力。江汉人口万余户，中州人口七千余户，加上武威东人口数千户，总计两万余户十万余口的劳动大军汇集于敦煌和瓜州两县，对这里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本来，从西汉开始，这里就是屯田基地。从曹魏到西晋再到前凉，历朝都在这里兴“衍溉”，修水利。光前凉在敦煌就修筑了北府、阳开、阳安等渠道以通灌溉，这十数万劳动大军投放到这里，首先会使这里的水田农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

被安置在敦煌和晋昌的南方和中州移民中，有一部分后来又被分徙和安置到酒泉。

> 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245]

分徙以后，酒泉一带的人口大大增加，使这里的经济文化也繁荣起来。另外，分徙人口也起了使劳动力资源布局趋于均衡和合理的作用。在人口分徙后，敦煌、晋昌仍旧是西凉的战略根据地，仍旧是政府组织经济开发的重点，因为酒泉及其附近地区又发展起来，于是，包括南凉对武威一域的开发及北凉对张掖一域的开发在内，河西走廊又一次出现了总体经济开发的局面。所以，在河西经济区的发展中，李暠是有贡献的。

二 发展屯垦，广田积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都推行屯田政策。国家经营的屯田经济与地主的庄园经济及农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三者并存，是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基本结构。

对国家来说，屯田经济是比较可靠的经济形式和经济来源。首先，土地国有权稳定。国家通过屯田经济总是牢牢地掌握着一部分土地资源。其次，经济效益比较稳定。因为国家可使用军事和行政手段，通过强制使用劳动力，大幅度地提高作物产量。

在分裂时期，因“武力是用，军食是资”的要求，各政权都将“农”与“战”结合起来，实行以农养战。屯田也就成了以农养战最得力的经营形式。正如曹操所说：

>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246]

五凉时期，各个政权都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扩大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积极兴办屯田，组织百姓和军队屯垦。前凉与西凉安置流民的过程，开始时必然也采取组织流民屯垦的办法，就像西汉中期徙民河西所用的方法那样，被徙者开始“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247]。这“数岁假予产业”之谓，就是屯田户在屯垦几年后，政府将所耕地租佃给他们。

南凉与北凉都有徙民活动，徙民的目的在于扩大屯田。如上所述，南凉“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的政策，就是徙民屯垦的政策。上面也讲过，所谓“晋人”，不仅限于汉族人口，还有羌戎人口，他们被列置于屯田之上，会大大提高屯田的产出。如406年从西平等三郡迁徙到武威等四郡的三万余户“诸羌”按每户垦田百亩计，四郡当有三万多顷土地得到开发。按亩产三石计，每年可产出粮食九百万石，也许这四郡屯田，正是武威期间南凉的经济支柱。正因如此，秃发傉檀在退出姑臧时，专门部署大司农成公绪留守。

南凉在湟水流域也有屯田。其基础当是西汉赵充国所创立的湟中屯田区。这一屯田区被西晋和前凉承袭，并发展为从西平到浇川至甘松一线的屯垦基地。西晋时，在这里驻有佃兵，前凉时，在这里置五屯护军。南凉兵力不足，不可能实行军屯，这里的屯田只能通过徙民来维持。当秃发傉檀撤出姑臧，退往乐都时，还从番禾一带向西平和乐都两度回徙人口，一次是“三千余家”，一次是“一千余户”。当然，这里的屯田后来被沮渠蒙逊破坏，造成“不种多年”的状况，导致秃发傉檀国破家亡。

在兴办屯田上，西凉是成功的。庚子元年（400）李暠一即大将军与凉公之位，便积极开拓疆域。“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248]。

诸凉中，北凉沮渠蒙逊时期最重视农业。这决定了沮渠蒙逊最终能统一河西走廊，实现“兼天下”和“定西域”大计。永安元年（401），他

一下达劝课农桑的教令，便要求各级官吏明于督察，增加生产，做到“明设科条，务尽地利”。督察的对象想必也包括屯田人口。同样的命令还见于玄始六年（417）。另外，北凉在统一河西走廊后接受了原属南凉和西凉的屯田土地。在统一的政令和管理体制下，河西屯田经济的实力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为北魏时期从河西获得大量粮食提供了基础。如太和七年（483），北魏政府令薄骨律镇将刁雍在牵屯制造运船，通过黄河，调运河西谷物十万斛[249]，有力支持了六镇防务。太和十二年（488），北魏政府下令，“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250]，河西屯田将会在北凉的基础上，发挥出更有力的经济作用。

三 开发牧场，增加畜牧业产出

汉代以后，“河西畜牧为天下饶”之誉已广为流传，畜牧业经济的优势也广为显示。迄至魏晋，随着赀虏与鲜卑等民族的入徙以及柔然等族不时向河西境内游牧，河西产业结构中，畜牧业的比重明显增加。不论牧畜的存栏，还是牧场的规模与范围，都有新的扩大。五凉时期，除湟中到敦煌的整个祁连山麓的连绵数千里之地仍是主要牧区之外，出于养殖战马的需要，又在今张掖与山丹一带设立官牧场，进行驻牧，同时设置行政机构加以管理和保护。“永兴中，置汉阳县以守牧地，张玄靓改为祁连郡。”[251]“永兴”是晋惠帝年号，相当公元304年至305年。此汉阳县当为张轨所置，县治在今山丹县南。自此以后，到隋唐以至今日，这里都是军马的重要产地之一。像这样的官牧场，在诸凉割据时期当不止一二。如西平，它是南凉的牧业基地。嘉平六年（413），“蒙逊侵西平，徙户掠牛马而还”[252]。

五凉时期，今甘肃武威以东至黄河以西的牧场资源也得到利用。这里是令居塞坐落的地域，是北方牧业民族如赀虏、鲜卑等入徙河西的必经之地。西汉后期羌人曾请求政府准他们北渡湟水逐汉人“所不田处”，也是指这一带。由于早从汉武帝开发河西起，“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253]。因此，这里的生态条件良好。正像439年北魏出兵河西后魏太武帝目睹的那样，这里涌泉潺潺，牧草丰美，估计这一带的水草足供十万大军数年之用。由于北凉在这里放养了大量马、牛、羊、骆驼等，北魏军队刚渡河便“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254]，及时补充了军队给养，特别是弥补了战马的不足。北凉灭亡后，魏太武帝根据他目睹的情景，决定将这里辟为官牧场。“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255]北魏征发一些畜牧民族人

口为牧户、牧子，为政府赈役，经营畜牧业。到孝文帝时期，“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256]年年通过转徙的办法将大量牲畜“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257]。这说明北凉挖掘牧场潜力，积极增加牧业生产的举措也给后世经济决策提供了基础和依据。而且，这还不止于北魏，隋朝统一全国后，也有过关于河西产业结构方面的讨论。有人指出，自陇右到河西，土地辽阔但居民分散，发展农业消耗大而收益小，假如废省原有屯田，实行“以畜牧为事”的经济战略，则将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诸凉时期，河西有许多专事畜牧业的部族。如鲜卑中的折掘、车盖、乙弗等部，他们都在各自世居的地域内选择牧场，逐水草放牧。南凉时，居于敦煌以南至吐谷浑以北的乙弗部，畜牧经济尤为发达。另外，由于河西以外的一些强大畜牧民族，不时游牧到河西境内，使弱水至居延一带的牧场资源也得到合理利用。北凉与柔然关系良好，常准许柔然在弱水一带活动。429年，北魏出兵讨柔然，大军“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258]，柔然纥升盖可汗率百骑逃入南山，魏军掳得柔然部牲畜不计其数。“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259]

由上可知，五凉时期，河西走廊东、西、南、北四隅缘边地区都被开发为畜牧业牧场。之所以这样，与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并峙的局面相关。并峙时期，各自为政，各政权都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规划畜牧业经济，其客观效果是使走廊内农业和畜牧业两大支柱产业的布局更趋协调和合理。

在开发牧场的同时，诸凉也重视腹地郡县的农牧配套，注意利用农田之外的闲散土地养殖家畜，尤其注重饲养马匹。五凉时期高昌等地实行“按赀配生马”制度。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建平年间“按赀配生马帐”。此“建平”年号究系何人所建，有待考证。但根据相关文书，可证明建平年号确系高昌地区所奉行，并与北凉有关。文书反映出这一时期政府以谷物计家庭资产，一斛以上即谓“有赀”。有赀者须按规定购买和畜养生马。[260]这可能是为战事而备。其法类似曹魏初期杜畿所行劝课法。杜畿任河东太守，“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261]。按一斛以上即为有赀论，几乎五凉时期人皆养马。政府又规定有马与无马者都得列上名籍，故文书中又有“无马人名籍”残篇，其中开列了严绪与令狐玩等“十七人无马”。[262]照此办理的话，北凉亡国时北魏收得凉州户口二十万，以每户配养生马一匹计，那么，北凉郡县民户

家庭所蓄养生马总数应在二十万匹以上。

总之，前凉以后诸凉政权高度重视畜牧业，它们挖掘牧场潜力，大力增加畜牧业生产，特别是马匹生产。实行这样的举措，虽出于进行割据战争的需要，但却进一步发展了河西畜牧业经济的优势，推动河西经济区内部结构及布局进一步趋于协调和合理。从历史意义讲，也给后来北朝及隋唐确定西部经济战略提供了依据。

第四节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西域经济战略

——兼论北魏灭北凉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平城是北魏的创业基地。平城时代的北魏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建树颇多。平城诸帝中，太武帝拓跋焘是最值得称颂的人物。他不仅“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263]，统一了北方大地，还通过严法制、明选举、劝农桑、宽赋徭、定考课、颁新字、修国史等举措使北魏国家生活摆脱初期的落后状态而进入统治中原的适应期。他最重大的建树是在经济国策方面，是他完成了统一北方时期的经济战略的转移，将其祖道武、父明元两代君王只依赖军事征服后的移民方式开发京师一线的做法，转变为对所有占领地区普遍进行开发的远略，并着眼于行将占领地区的开发。对此，史家记述道：

> 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264]

这个战略的实施过程给平城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其中最直接的结果是“府藏盈积”[265]。从史书中可以看出，因府藏的盈实，从太武时起，平城每遇自然灾害就遣民四出“就食”的频率大大降低，京师的稳定和巩固程度空前提高；另外，军事上的征讨能力和北方边镇的防务也大为增强。而涉及如西域、河西等一些特殊地区的开发，对北魏国家后来的发展更具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这样的功绩，史家才称赞太武帝“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266]。

本节仅就太武帝上述经济战略在西域和河西的实施及其影响即北魏灭北凉可能性与合理性做一些研讨。

> 既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德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毡裘，辐辏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267]

这几乎是汉以后中原王朝一贯的国策和现象。北魏平城时期也如此：

> 太祖初，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既而西戎之贡不至，有司奏，依汉氏故事，请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268]

但因当时国力不足，太祖（道武帝）搁置了此议。后历太宗（明元帝），西域“奇货”仍可望而不可即。

“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269]随太武帝统一北方事业的进展，自西晋十六国纷乱以来一百多年中原与西域间彼此隔绝的状态有了变化。从太延元年（435）起，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磐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九国陆续遣使朝献，拉开了平城通西域的序幕。效法汉武帝当初的做法，太武帝派出王恩生、许纲等出使西域，结果王等在出流沙时被柔然俘虏。既而再派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270]。这次出使很成功，董、高以其所携锦帛厚赐西域诸国，不仅招来了丰厚的物质回报，而且沟通了平城与西域间的交往，西域“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271]

董琬之行，最大的收获还在于使平城上下第一次知道了西域的辽阔广大，了解到西域资源的丰富以及通商道路的四通八达。这更增强了太武帝开发西域的决心。

当此之时，横亘在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最大路障是柔然和坐制河西的沮渠北凉。这两支势力互为依托，给东西交通和往来制造出许多麻烦。其中，沮渠北凉是最大的障碍。虽然《魏书·西域传》等记载，自太延元年许多西域国家都在遣使朝献，说董琬等招来了十六国贡使，西域贡物岁岁有来，“不间于道”。其实，从太延元年到太延五年的情况看，西域入贡自始至终是有条件的，要么需皇帝率军到河西地界去游弋接应，要么需皇帝遣使到西域去游说招诱。现列举《魏书·世祖纪》所载如下：

太延元年八月，“（帝）遂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献”。

二年“八月丁亥，遣使六辈使西域。帝校猎于河西。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甲辰，高车国遣使朝献”。

三年三月，龟兹、悦般等九国遣使朝贡。是年八月，太武帝又“行幸河西”。十一月，“破洛那、者舌国各遣使朝献，奉汗血马”。

五年“夏四月丁酉，鄯善、龟兹、疏勒、焉耆诸国遣使朝献”，“五月丁丑，治兵于西郊。癸未，遮逸国献汗血马”。“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犍”。

微妙的是，每次这样的“行幸”与“贡献”过后，都有北凉的表演，要么是沮渠牧犍“遣使朝贡”，要么是“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坛来朝”。直到太延五年五月太武帝治兵西郊，六月西讨北凉，情况竟无一例外。这说明，西域诸国对北魏的朝贡视沮渠牧犍的指示而动，而沮渠牧犍对北魏朝贡则视太武帝的军事威慑而动。

至于北凉与柔然之间互相勾结，互为依托，阻断西域道路和煽动西域背魏，也是不争的事实。一次，魏使从西域返回，在姑臧听牧犍左右密告说，牧犍曾与柔然主吴提彼此呼应，制造流言，说北魏去年伐柔然，“士马疫死，大败而还”[272]，还说牧犍听吴提生擒太武长弟乐平王丕的消息后，有如下反应：

> 大喜，宣言国中，又闻吴提遣使者告西域诸国，称：“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恭奉。”西域诸国亦有贰者。[273]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所谓“贡使”，“贡献”，都带有官方政治往来和商贸往来的性质。魏太武帝为纳西域方贡以充仓廪，收西域货物以实府藏，为方便和扩大平城与西域间的双边贸易来往，多次以“田猎”“巡幸”为名，兵临河西地界，其锋芒所向，直接目标是柔然，间接目标是北凉，最终目标则在西域。即驱逐渗透到河西一带的柔然势力和威慑北凉君臣，借以达到两方面目的，一是扫除平城与西域间的交通障碍，二是向西域诸国宣示恩威，诱迫诸国与魏建立双边商贸关系。这与派使者“多赍锦帛”去西域诱说各国“贡献”相辅相成，最终战略目标则在控制西域并获得西域丰富的物质资源利益，其间的扬兵耀武与派人诱说乃是在对西域尚无主权的情况下采取的先期性举措。

灭北凉是北魏北方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太武帝开发西部经济战略的关键环节。之所以推迟到太延五年（439）实施，并非如太武帝自己所言“朕方有事东方，未暇西略”[274]。其实早在431年，他已完成“扫统万，平秦陇”的事业，又将北燕主冯弘从和龙赶往高丽，荡平了“东方”割据者盘踞的最后一个巢穴。另外，在太延五年以前，太武帝也不是“无暇西略”，而是如前文所论，他频繁地西巡西狩，有时追击柔然到“西接张掖水”的地方[275]。他之所以不进占河西，是因北凉统治者不像赫连昌等割据者那样，在政治上敌视北魏。相反，早在始光元年（424），沮渠蒙逊已“遣使内附”，向魏称臣。使太武帝感到还有利用的价值，即利用它长期控引西域和熟悉西域交通，稳住西域诸国，并为魏使出使西域做向导。为此，太武帝给了沮渠氏一个特殊的头衔：都督

凉州及西域羌戎诸军事，行征西大将军。但沮渠父子常阳奉阴违，不仅靠掌握丝绸之路的关钥垄断商税，还阻碍西域胡商的东进和魏使的西出。更甚者，还与柔然主吴提相联结，“事主也颇慢惰”。这些，从太武出兵前令公卿所写的讨凉檄文看得很清楚。讨凉檄文所数沮渠“十二罪”中，“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知朝廷志在怀远，固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扬言西戎，高自骄大”，“欣敌之全，幸我之败，侮慢王人，供不以礼”[276]，条条罪名，都与西域事有关，与西部经济有关。随着太延中西域贡使越来越少，到太延五年，北凉政权就非灭不可了。

太延五年（439），太武帝出兵灭掉北凉，占领了河西走廊。为了实现他彻底开通西域商道的经济战略，而后又入西域追歼沮渠氏流亡势力，并讨平负隅顽抗、制造多年断塞道路事端的鄯善，创造出历经百余年丝绸之路上“行人复通”[277]的恢宏成果。

作为平城时期西部经济战略的起始，丝绸之路的复通，给北魏国家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有力地促进了东西商贸的发展和统一的北方市场的恢复兴起。从平城开始直至后来的洛阳时期，原本为中国达官贵人所喜好的西域宝货如珠玉、犀象、貂裘、名马等源源不断输入中原，使平城及洛阳等中心地区不仅“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278]，而且成了东西商品周流之地。西域商品纷纷进入一些鲜卑贵胄和汉族公卿家中，所谓金瓶银瓮、瓯檠盘盒、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等，“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279]。此时，西域的众多城邦国家都和中原建立起商贸关系，如粟特、大月氏、安西、波斯、大秦、罽宾、天竺、高昌等。有的还将其独特的手工业技术介绍到平城，如大月氏，“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280]

应当指出，在西域商道畅通前后，北方除个别地区如河西走廊使用货币外，在北魏统领的广大地区，货币经济还很萧条。以中国一方而论，与西方交易主要支付丝织物和布帛。这必然会拉动北方丝麻织造业的发展，并形成以丝麻织品为主要商品的北方统一市场。针对这一点，北魏政府对丝麻类织品倍加重视，丝麻织品的库存量也很大。翻检《魏书·食货志》，可以看到，自太武到孝文，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屡见不鲜。如：

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

（和平二年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

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令任服用。……高祖延兴三年秋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检察与同罪。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泰、洛、豫、怀、兖、陕、徐、青、齐、济、南豫、东兖、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皆以麻布充税。[281]

所谓户口错乱、让百官赌库存织物、绢帛丈尺不中度、以绵绢布帛为百官俸禄及课税，都是商品经济下社会生活的反映，可见作为市场主要商品及交换媒介的纺织品给北魏造成的广泛影响。而政府对税区的划分实际上是太武帝经济开发战略的最终落实，也是北方大市场形成的明证。不过到孝文帝时，大市场的中心已转移到了洛阳。

太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对北魏社会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平城和后来的洛阳变成国际性的大都会。因为这条通道不仅联结着今陕、甘、青、宁、新诸省区，而且沟通着葱岭以西、以北和以南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如董琬所述：

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282]

各道商人、使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或经营，或通贡，将包括平城、洛阳在内的一些城市变成五方之民交汇之地。天长日久，许多胡商贩客在城中相地卜宅，娶妻生子，成为永久的居民。正所谓：

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283]

终北魏之世，这些西域来客一直受到政府的优遇。孝文帝时洛阳城内四馆四里中的崦嵫馆和慕义里就为西方来者而专设[284]。正光中

（520～525），各地反魏起义层出不穷，又值水旱频仍，政府下令禁断了百官的例酒，但格外规定："远蕃使客，不在断限。"[285]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域商人来华贸易和居住能繁荣经济，能给政府带来可观的关税、市税收益。

可见，国际性大都会的形成，对促进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以及首都的人殷物丰都具重要意义。

灭北凉，开通西域带来的第三方面影响是大大方便了北魏政府对河西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农业方面，经北凉等诸朝的开发，河西积累起巨大的资源潜力。粮食、桑麻、蔬果等一般都能实现自给有余。北魏充分注意这点，利用黄河水道开漕运，用河西粮食支援六镇。如太平真君七年（446），薄骨律镇将刁雍请求朝廷准其于牵屯山（今宁夏固原）"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286]，并说每船可运谷二千斛。按一年运一次计，便可从河西出谷40万斛。因利益巨大，太武帝准其所请，并下诏说："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287]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河西粮食常年通过黄河水道转输到薄骨律、沃野等州镇，以供边防之用。

在畜牧业方面，北魏受益更多。在灭凉前，太武帝虽多次西幸西略，但未曾亲履河西走廊。他听出使过北凉的李顺说"凉州乏水草"[288]，"自温圉河（今黄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289]奚斤、古弼等一般鲜卑元老重臣也随声附和说河西走廊"其地卤斥，略无水草"[290]。为此，他一次次推迟灭凉的决策。但熟悉史实的崔浩引《汉书·地理志》反问李顺等：

> "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才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数百万顷乎？[291]

及至决策灭凉，用兵河西，北魏军队一渡过黄河即"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292]，而映入太武帝眼帘的河西走廊竟是"姑臧城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293]。而后，太武帝做出经济上的决策："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294]从此，河西走廊成为北魏

畜牧业资源的供应地，直到孝文帝时期，仍连年通过转牧的方式，将大量牧畜“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295]

总之，太武帝时期的西部开发战略表现出这一时期北魏统治者放眼整个北方的积极进取精神。作为这一时期经济战略转移的一个例证，它同时也说明太武帝对北魏历史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北魏国家其后发达的原因。

[1]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2]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1页。

[3]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9页。

[4]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7页。

[5]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25页。

[6]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4～1645页。

[7]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9页。

[8]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1页。

[9]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10]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11] 《汉书》卷22《礼乐志》，第1060页。

[12]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13]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3页。

[14] 《汉书》卷29《沟洫志》，第1684页。

[15]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39页。

[16] 《汉书》卷78《萧望之传》，第3278页。

[17] 《汉书》卷7《昭帝纪》，第221页。

[18] 《汉书》卷8《宣帝纪》，第244页。

[19] 《汉书》卷8《宣帝纪》，第252页。

[20] 《史记》卷103《万石君列传》，第2768页。

[21]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80页。

[22]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23]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24]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25]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7页。

[26] 《后汉书》卷39《刘般传》，第1303～1305页。

[27] 见甘肃省博物馆藏出土砖制庄园模型。

[28]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29]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第59页。

[30] 《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75页。

[31] 《后汉书》卷4《殇帝纪》，第198页。

[32]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任延》，第2463页。

[33] 参见刘仁成《东汉凉州疆域及人口密度》，《西北文化月刊》1947年第9期。

[34] 《后汉书》卷31《孔奋传》，第1098页。

[35] 《后汉书》卷31《孔奋传》，第1098页。

[36]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50页。

[37]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49页。

[38] 《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31页。

[39] 《后汉书》卷3《明帝纪》，第143页。

[4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1页。

[41] 《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35页。

[42] 《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36页。

[43] 《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36页。

[44] 《资治通鉴》卷48汉和帝永元十四年条，第1553页。

[45] 《后汉书》卷51《庞参传》，第1688页。

[46] 《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66页。

[47] 《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66页。

[48]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40页。

[49]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50]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引《魏略》，第513页。

[51]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2226页，第2253页。

[52] 李暠称王，西凉都城迁到酒泉。

[53] 《魏书》卷99《张骏传》，第2194页。

[54]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

[55]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56]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页。

[57]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引《损益篇》："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第1656页。

[58]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59]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60]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61] 赵向群：《河西著姓社会探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62] 《太平御览》卷512《宗亲部·伯叔》引刘昞《敦煌实录》，中华书局，1960，第2334页。

[63]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录》，第570页。

[64]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65]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上册），中华书局，2009，第142页。

[66]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上册），第179、374页。

[67] 《太平御览》卷50引段龟龙《凉州记》，张澍辑，王晶波校点《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第113页。

[68] 《晋书》卷86《张天锡传》引张天锡语，第2252页。

[69]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第859页。

[70]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7页。

[71] 《资治通鉴》卷121宋文帝元嘉六年十月条，第3812页。

[72] 《晋书》卷89《麴允传》，第2307页。

[73]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7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第486页。

[75] 《晋书》卷59《赵王伦传》，第1605页。

[76] 《晋书》卷60《贾疋传》，第1652页。

[77] 《晋书》卷5《愍帝纪》，第130页。

[78]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1页。

[79] 《晋书》卷62《刘琨传》，第1680页。

[80] 《晋书》卷62《刘琨传》，第1681页。

[81] 《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泰安二年七月条，第2682页。

[82] 《晋书》卷100《杜弢传》，第2621页。

[83]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223页，第25～28页。

[8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1页。

[85]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86]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30页。

[87]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88] 《后汉书》志23《郡国志·郡国五》，第3520页。

[89] 《魏书》卷4《世祖纪》，第90页。

[90] 《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7页。

[91]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92] 《魏书》卷4《世祖纪》，第90页。

[93] 刘汉东：《从西凉户籍残卷谈五凉时期的人口》，《史学月刊》1988年第4

期。

[94]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95]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3页。

[96]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4页。

[97]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注引《魏略》，第513页。

[98]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上册），中华书局，2009，第142页。

[99]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上册），第179页，第374页。

[100]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32页。按，此“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当指西汉中期以前的小亩而言。

[101]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第1656页。按，此“亩收三斛”当指西汉中期以后的大亩而言。

[102] 《魏书》卷99《张骏传》，第2194～2195页。

[103]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104]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0页。

[105]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10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5页。

[107]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108]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7～3198页。

[109]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7《前凉录》引《太平御览》卷838，第500页。

[110]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4页。

[111]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5页。

[112]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113] 《晋书》卷89《麴允传》，第2307页。

[114]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3页。

[115]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第3122页。

[11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117]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5页。

[11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7《西秦录》，第605页。

[119] 《资治通鉴》卷121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条，第3811页。

[120] 《资治通鉴》卷121宋文帝元嘉六年八月条，第3812页。

[121] 《资治通鉴》卷121宋文帝元嘉六年十月条，第3812页。

[122] 《资治通签》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八月条，第3873页。

[123]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39～740页。

[124] 《晋书》卷57《马隆传》，第1555页。

[125] 《太平御览》卷12引段龟龙《凉州记》，张澍辑，王晶波校点《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第111～112页。

[126] 参见国家文物局《中国古钱谱》编撰组编《中国古钱谱》，文物出版社，1989，第147页。

[127] 《晋书》卷86《张轨传·史赞》，第2253页。

[12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第481页。

[129] 《册府元龟》卷198《闰位部·务农》，中华书局，1960，第2384页。

[130] 《册府元龟》卷228《僭伪部·务农》，第2715页。

[131]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6页。

[132]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6～787页。

[133] 《晋书》卷24《职官志》，第746页。

[134] 《晋书》卷24《职官志》，第746页。

[135] 《晋书》卷33《石苞传》，第1003页。

[136]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2222页。

[137]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0页。

[138] 《初学记》卷27《绢第九》引《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中华书局，1962，第657页。

[139] 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140] 参见《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第3～7页。

[141]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25～28页。

[142] 《后汉书》卷72《董卓传》，第2325页。又《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第177页）同。

[143] 《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第177页。

[144]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4页。

[145]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第67页。

[146] 参见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170页。

[147] 参见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170页。

[148]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149]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150]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40页。

[151]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40页。

[152]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53]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154] 《晋书》卷94《隐逸传》，第2438页。

[15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4《前凉录》，第526页。

[156]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8页。

[157]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158]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159]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16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第486页。

[161]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

[162] 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第2页。

[163]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63页。

[164] 朱活《古钱新典》，三秦出版社，1991，第228页。

[165]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53页。

[166]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167] 《晋书》卷20《礼志中》，第614页。

[168]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169]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17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南凉录》，第613页。

[171] 《晋书》卷3《武帝纪》，第61页。

[172]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173]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174]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25页。

[175]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第67页。

[176] 《后汉书》卷57《刘陶列传》，第1848页。

[177] 《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第177页。

[178]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4～795页。

[179]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5页。

[180] 《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第2325页。

[181]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29页。

[182]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9页。

[183]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38页。

[184]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23页。

[185]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186]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40页。

[187] 《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40页。

[188]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189] 杜佑：《通典》卷9《食货典·钱币下》，典52上。

[190] 杜佑：《通典》卷9《食货典·钱币下》，典52上。

[19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引《太平御览》，第486页。

[192] 《汉书》卷6《武帝纪》，第177页。又《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与此有歧异，兹不论。

[193]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77页。

[194]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77页。

[195]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79页。

[196]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62页。

[197]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9页。

[198] 分见《居延汉简释文》卷1，第15、40页。转引自郭原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154页。

[199]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62页。

[200]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65页。

[201]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202]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30页。

[203] 《晋书》卷94《隐逸·氾腾传》，第2438页。

[204]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8页。

[205]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

[206] 《魏书》卷99《私署凉州牧张寔传附张骏传》，第2195页。

[207]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7页。

[208] 朱活：《古钱新典》，三秦出版社，1991，第229页。

[209]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4页。

[210]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4页。

[211] 国家文物局《中国古钱谱》编撰组编《中国古钱谱》，第147页。

[212]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2《天部下·雪》，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23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6《北凉录》（第665页）同。

[213]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214] 朱活：《古钱新典》，第228页。

[215]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8页。

[216]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806页。

[217]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807页。

[218]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219]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220]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221]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1页。

[222]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5页。

[223] 《魏书》卷99《张骏传》，第2194页。

[224] 《魏书》卷99《张骏传》，第2195页。

[225]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0页。

[226]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5页。

[227] 《晋书》卷87《李歆传》，第2269～2270页。

[22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7《西秦录》，第605页。

[229] 《魏书》卷60《韩麒麟传附子显宗传》，第1341页。

[230] 《周书》卷49《异域传上》，中华书局，1971，第884页。

[231]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9页。

[232]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900页。

[233]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234]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0～3071页。

[23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录》，第567页。

[236]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5页。

[237]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5页。

[238]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5页。

[239]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

[240]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7页。

[241]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242]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243]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6页。

[244]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245]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246]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3～784页。

[247]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25页。

[248]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249] 《魏书》卷38《刁雍传》，第868页。

[250]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7页。

[251]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252]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1《南凉录》，第629页。

[253] 《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70页。

[254] 《资治通签》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八月条，第3873页。

[255]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7页。

[256]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7页。

[257]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7页。

[258] 《资治通鉴》卷121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条，第3811页。

[259] 《资治通鉴》卷121宋文帝元嘉六年七月条，第3812页。

[260] 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第68页。

[261] 《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第496页。

[262] 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81页。

[263] 《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第109页。

[264]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0页。

[265]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1页。

[266] 《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第109页。

[267] 《周书》卷49《异域传上》，第884页。

[268] 《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59页。

[269]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8页。

[270] 《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0页。

[271] 《北史》卷97《西域传》，第3206页。

[272] 《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0页。

[273] 《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0页。

[274] 《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九年十二月条，第3845页。

[275] 《魏书》卷103《蠕蠕传》，第2293页。

[276] 《魏书》卷99《卢水胡沮渠蒙逊传》，第2207页。

[277] 《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1页。

[278] 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龙华寺》，第120页。

[279] 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开善寺》，第160页。

[280] 《北史》卷97《西域传》，第3226～3227页。

[281] 以上引文均见《魏书》卷110《食货志》。

[282] 《北史》卷97《西域传序》，第3207页；《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1页。

[283] 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龙华寺》，第120页。

[284] 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龙华寺》，第120页。

[285]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61页。

[286] 《魏书》卷38《刁雍传》，第868页。

[287] 《魏书》卷38《刁雍传》，第869页。

[288] 《魏书》卷36《李顺传》，第832页。

[289] 《魏书》卷35《崔浩传》，第822～823页。

[290] 《魏书》卷35《崔浩传》，第822页。

[291] 《魏书》卷35《崔浩传》，第823页。

[292]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七月条，第3873页。

[293]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八月条，第3874页。

[294]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7页。

[295]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7页。

〖卷九〗 著姓篇

著姓，或曰右姓、大姓，是汉魏封建社会中一个特殊阶层。北朝时按分布与地望分列出郡姓、吴姓、虏姓三大体系。其间，似未包括名扬天下的另一个著姓群，即河西著姓群[1]。

河西著姓又被称为“西土著姓”[2]。其主体是凉州域内的高门世族，汉、魏、晋、凉时期，这样的家族略见于史传者不下十数个，在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内，这个社会群曾有过令人瞩目的历史活动。特别是在“五凉”时期，因着特定历史条件所提供的机遇，其社会能量得以较为充分的展示，又因此给我们今天认识其群体特征及行迹提供了一定可能。

第一节 门第与特权

首先，从本质上讲，河西著姓是封建特权阶层中的一支。史书直称他们中某某为“累世官族”[3]“世为冠族”[4]或“世为豪族”[5]。至如后来与北魏皇族联宗，被赐源姓的虏姓首望秃发氏，曾有建邦命氏的历史，当是官族之冠[6]。对这些家族的汉姓家族分析一下，似又可据其做官资历及显名的早晚划出两等人家。一是相当于“魏晋旧门”者，他们早早发迹，在数百年的沧桑巨变中门户经久不衰。曹氏、令狐氏、张氏、氾氏、索氏是这一等。另一是崛起于西晋之末，显名于五凉初期的“凉国旧胤”，他们发迹较晚，自谦是“蒙先朝布衣之眷”[7]，实则执掌当朝权柄，功高位隆，且势焰熏灼。宋氏、阴氏是这一等。

曹氏等家族树立门户与西汉开置河西四郡相先后。史载：

> 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叶分布，所在为雄。[8]

令狐氏家族，有记载说本源于西周王室，原封太原。西东汉之交，令狐迈起兵讨王莽，兵败身死。三个儿子因避祸“皆奔敦煌”。以后，长、次二子相率去西域，幼子令狐称“为故吏所匿，遂居效谷”[9]。另一记载说从令狐迈起已定居敦煌[10]。而最要紧的倒不是落户的早晚，而是家族的门阀。令狐迈官居汉建威将军，又属先朝忠良节烈之流。这一点决定这个家族一直绵延到晋、凉的禄位而成为与曹氏等不相上下、甚而过之的显赫门第。他们都堪称河西著姓的首望与著姓社会的中坚。

宋、阴等族，资历不可与曹、令狐等族相比，门第也逊色多了。但由于他们从被前凉的肇基者张轨引为“股肱谋主”而发达起来，跻身于势族之列。

门第是特权的标志。著姓社会显著的心理趋向是尽力保持门第，不使遭遇艰厄而一朝坠落。当着中原、江左士族阶级发狂似的利用选举、改造选举以达到或追求所谓“世及之荣”时，河西著姓社会也不甘寂寞，充分利用察举征辟制度给予的“权门贵士，请谒繁兴”的方便[11]，利用九品中正制“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的方便[12]，垒筑他们家族的门第和社会的构体。以曹氏而言，第一世曹敏、第二世曹述、第三世曹凤、第四世曹全早在东汉

后期皆已通过“察孝廉”而一世接一世地步入官场，成为“累世官族”。而且他们世世又都做着河西及其邻近地方的长吏，如武威、张掖、金城、北地长吏、都尉、丞、守、令之类[13]。至于令狐氏，其繁殷的子孙后裔，从令狐馨当西晋谏议大夫起，直到北朝终结令狐虬、令狐整仍跻身名臣之列，同样世世霑沐门荫[14]。登为五凉牧守、县令者有令狐亚、令狐敏等，也是世代簪缨。

在追求世及之荣的同时，河西著姓尤向慕衣锦之荣。即使位至公侯者，同样无不渴求获得在家乡做官的机会。北周执政宇文护曾对令狐整说：

> 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一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15]

署其弟休为敦煌太守。由于五凉各政权统统建在河西域内，著姓家族当然地处在衣锦之荣的圈子里，况且五凉政权可以容纳的官僚数量比之任何统一时期河西地方政权可以容纳的官僚数量来，都不知要多出多少。因此可以说五凉存在的一百多年，是河西著姓社会得到极大发展的一百多年。许许多多家族的世及之荣与衣锦之荣交织在一起，形成河西封建政治与官僚社会的特点。举一个例子，曹魏执金吾张奂的后裔张湛、张铣兄弟，他们做着北凉的官，而他们的父祖做着前凉、西凉的官：

> 祖质，仕凉，位金城太守。父显，有远量，武昭王据有西夏，引为功曹，甚器异之。尝称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16]

五凉时期，割据政权千方百计扩大并保障河西著姓社会的种种特权。表现为：

第一，常使著姓享受着政治上的优遇。早在张轨任凉州刺史时就“令有司推详立州以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等“具状以闻”[17]。前、南、西、北诸凉政权，均援引所谓的西州德望，四夷豪俊，文武秀杰，乃至中州才令、秦雍世门“内居显位，外宰郡县”，使他们“官方授才，咸得其所”。[18]著姓风云际会的情况从西凉公布的官谱中可略知一斑[19]，兹表列于后。

西凉官谱

家族	姓名	官职
张	张邈	右长史
	张条	牧府左长史
	张谡	从事中郎、扬武将军
	张体顺	右司马
	张林	太府主簿
	张靖	折冲将军、河湟太守
索	索仙	左长史
	索训	威远将军、西平太守
	索术	武兴太守
	索承明	牧府右司马
	索慈	广武太守
宋	宋繇	从事中郎、折冲将军
令狐	令狐溢	右长史
	令狐赫	武威太守
	令狐迁	武卫将军、晋兴太守
阴	阴亮	西安太守
氾	氾德瑜	宁远将军、西郡太守
唐	唐瑶	征东将军
赵	赵开	骍马护军
尹	尹建兴	左司马
郭	郭谦	军咨祭酒

如表所示，尹、唐是李暠姻亲，郭、赵为秦雍世门，其余全是河西著姓，西凉政权的著姓性质毕见于他们的出身。李暠用人，自称“至于朝为寇雠，夕委心膂”，落落大度、不计前嫌，索氏原与之交厚，但索嗣在李暠自任敦煌太守受命段业时构陷李暠，以此反目为仇。按说索氏子弟应受西凉的贬黜。从上表看出，事实并非这样。这只能通过五凉对著姓社会的特殊政策予以说明。

第二，为著姓子弟尽量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张轨时，“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20]其余诸凉或“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21]，或“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22]。这一措施，使著姓子弟得以早早熟习儒家经典，掌握治国之道，置身于邀取令名，博取声誉的名利圈内。从官立学校中一进一出，即可飞黄腾达。索靖、氾衷、张甝早年得列“敦煌五龙”群中，全仗太学根底。泮宫等虽不可与太学同日而语，在州郡仍是最高学府，学成者同样价重西州。

第三，著姓子弟出入公府，有攀龙附凤的方便。他们有的得充任王侯公卿的门生、宾客，甚而成为执政者的昵友。安定梁景、敦煌刘肃，二人“并以门胄，总角与（张）天锡友昵”，[23]他们朝参机要，晚预枢密，与君王同起同卧，虽不免下流，却得以心腹而享高官厚禄。

所以，透过著姓的门第，能清楚地看到五凉封建割据政权的深刻内涵。它们一概是著姓社会的隆起物，是地方官僚享受特权的政治媒介。

第二节 著姓之优势

河西著姓社会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社会初期豪强地主势力的产生与发展并行不悖的。许多家族本来就被史书写为“豪族”[24]“大姓”[25]“大族”[26]。这说明在官僚特权之外，著姓社会还有一种武断乡曲的特质。早在曹魏时期，有人谈到敦煌一带的社会情况，说“大姓张雄，遂为风俗”，这种情况是地方官无能为力的。于是只能“循故而已，无所匡革”[27]。张氏、麹氏、贾氏、曹氏等家族，从前凉初立便有人出来捣乱。这说明河西向为豪强地主盘踞之地。其张雄跋扈可说是河西著姓社会的又一特征。

五凉时期，由于河西孤悬西陲的程度加大，著姓社会势力增长以及民族关系复杂种种原因，豪强地主骄横自恣有甚于汉魏，他们所具备的各种社会优势更得以展现。

社会优势是社会力量的总和，它首先来自门宗方面。凡著姓家族，都门宗甚盛。作为一种由血缘和依附关系结成的群体网络，在经历汉魏晋那样长期的沉淀与反复交织后，显得更其坚实深厚，盘根错节。以张氏为例，迄北魏入主河西，其枝裔蔓延，光名见史传者不下三四十人。张谘、张植、张穆、张镇、张越、张湛、张琠、张邕及西凉官谱所列诸张是其代表。他们各自的姻亲、子弟、门生、故吏、宾客、部曲又有多少，实难估计。张世度在张氏族中不算佼佼者，依他在游学洛阳时的气派，足见在家乡如何的“势倾西土”。史载，洛阳大疫，他带去的“乡人宗族”死掉十余人[28]。这是汉族著姓的情况。至于胡姓的门宗强盛情况，则另有特点。因习传统的部落生活，他们的宗族又直接称为宗部，动则数百、数千，乃至数万人。如沮渠麹粥等被杀，“宗姻诸部会葬者万余人”[29]。凉初，秃发氏一部即有二十余万人。单个汉族著姓的门宗势力又远远不可与他们匹敌。

门宗势力世代相因。对河西著姓社会各家族来说，它是一种直接保证家族利益并与外部抗衡的力量。我们看到，当着西凉初建时，李暠如何告诫儿子李歆，要他善待“邑宿”，不忘“尽礼承敬”与“广加咨询”。“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30]实则表明政治势力向豪强门宗势力的妥协态度。

其次是经济上的优势。西汉开置四郡，加速了河西的开发。同时也

使豪强地主得以迅速积累家族财富。这方面的活动之一，首先是大量兼并土地。随曹魏时期业已形成的“旧大姓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31]的状况，此前兴起的封建庄园成为著姓社会的经济基础。地租成为这个社会财力的主要来源。活动之二，是利用河西居东西交通要道之便，在东西商业贸易中渔利。汉魏时有一种现象，“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32]前凉再开西域，似这种截断道路、依势强抢、敲诈胡商，并从中侵夺国利之事不会没有。活动之三，是经营畜牧业。汉以后，河西有“畜牧为天下饶”之誉。投资畜牧会很快富甲一方。麴氏和游氏都以此发财，以至民谣唱道：“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33]种种活动加上长年俸禄及搜刮贪赃的结果，许多著姓家族积累起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巨额财富。氾腾在决意隐居时，“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34]；张冲，“散家财巨万，施之乡闾”[35]；氾固，“推家财百万与寡弟妇，二百万与孤兄子”[36]。可见，河西著姓掌握着河西资源与财富。

门宗势力与经济势力的结合，又可养成军事势力。庄园制下的部曲，是半武装的私兵，一旦风云有变，著姓家族莫不聚其部曲，率其宗族，或作壁上之观，或作千里响赴，或自成兵长渠帅，或支持他人攻城夺地。大则像西晋亡国前那样，“凉州大马，横行天下”[37]；小则像张大豫复辟前凉，郭瑀、索嘏等“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38]进行响应。总之，他们总是将军事武装上的优势投注到各种影响地方局势的活动里。

再次，在文化上，著姓社会也同样具有优势。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掌握着学术、文化的领导权，并因积极倡导文治而身任割据政权的各种文职，如儒林祭酒、博士祭酒、教授、助教之类。有的被尊为国师，处于上下皆从其教的位置。还有的在民间开馆授学，著述经史，门下常聚集弟子数百、数千。宋纤的酒泉南山学馆，有弟子三千[39]。郭瑀、索袭、索𬘡，都是名重当世的学者，其门下同样是学子云集。一般地说，汉、晋、凉时期的师生，都恪守“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的纲常礼教，师丧，“遂服斩衰，庐墓三年”属于常规[40]。这种通过宗法关系实现的学术权、政治权的统一，保证了著姓社会始终作为河西地域思想、舆论的主导与割据政权的参佐地位。

最后，是婚姻关系上的优势。一切士族都通过缔结与之门第、地位相适应的婚姻关系来巩固既得利益，增强对外力量。李暠讲“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一语的主旨，也在肯定婚姻的潜在力量。河西著姓的婚姻大致

呈三种状况：一是著姓自成世婚或素对。察张氏与宋氏家族，宋氏与氾氏家族，张氏与氾氏家族，氾氏与令狐氏家族，这一对对家族之间互通姻亲，如宋繇伯父娶张氏女为妻，宋繇姊又嫁与张彦[41]，令狐亚的母亲系张镇姊或妹，故张氏又是令狐氏外家[42]。著姓之间的互为姻亲，其错综复杂，足使著姓社会连为一体。二是著姓与凉世最高统治者家族攀亲。如张寔娶号称“西州大姓”的贾氏女为妻；后凉主吕绍纳张氏女为妃皆属此类。这类婚姻派生出的政治同盟及其作用，用李暠与尹氏之间有“李、尹王敦煌”的佳话可做最好说明[43]。三是著姓与学者名流通婚。如安定胡叟，“元妻敦煌宋氏”[44]；刘昞被郭瑀择为佳婿[45]，属这一类。不论哪种姻亲关系，一经缔结，双方家族都须遵循尊亲明义准则，将彼此维护到底。否则，将视为天理所不容。因此，当宋混兄弟诛杀张瓘时，张瓘发出激烈的斥责：

> 瓘临命语澄曰：“汝荷婚姻，而反为逆，皇天后土，必当照之。我自可死，当令汝剧我矣！”[46]

河西著姓社会集中的各种社会优势，以及这个社会所表现的豪强地主特质，在五凉时期都统统表现了出来。

第三节 著姓之功能

上述种种，是河西著姓社会赖以存在的背景所在。同时，它又决定着河西著姓社会是河西地区当然的支配者。总括河西地区历史的变迁，包括政局的治乱、经济的涨落、军事的盛衰、文化的荣枯，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以它的向背为转移。

具体而言，著姓社会在河西割据政权中的作用可用四种功能予以概括，即再造之功、定策之功、推进之功与破坏之功。具有这些功能是它的又一特征。

其一是再造之功。当西汉政权解体，河西处于纷乱时，著姓再造了窦融政权；而当西晋政权解体，河西再陷纷乱时，又造就了前凉等政权。再造之功集中的体现是著姓选择合适的政治代表，主要条件是看其是否有着著姓的门第及与河西地域的政治联系。以窦融而论，其祖上在西汉受封建为侯，做过二千石长吏，这是其一；他虽系扶风人，属于关中望族，但高祖父当过张掖太守，从祖父当过护羌校尉，从弟当过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世任河西为吏”，这是其二。这两点足以使河西著姓社会对他表示满意。加上窦融到河西后“抚结雄杰”，凡“州郡英俊”，“融皆与之厚善”，对“孤立无党”的前官吏则移檄晓喻令其“解印绶去”，实际一头栽入河西著姓怀抱，于是“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47]。与窦融比，张轨条件稍差些，他虽是安定望族，并是陇西辛氏姻亲，但毕竟与河西没有政治瓜葛。因此在中原大乱中，虽谋“追窦融故事”，“阴图保据河西”，但并无十分把握，只得先求筮问卜，“遇《泰》之《观》”后方“求为凉州”。这很有意思的心理活动正说明他对河西会不会选择他作“霸者”怀有疑虑。到凉州后，他效法窦融依靠著姓社会，“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结果仍未得到全体的满意，很快就遇到张镇、张越兄弟与麴、曹等家族联合发动的政治与武装颠覆运动。后来仍靠张琠、令狐亚等著姓人物在他与张镇之间进行斡旋以及选取非著姓人物鲁连作替罪羊，张轨才在河西立住了足[48]。然而，河西著姓社会反对安定著姓做代理人的动乱直到张茂、张寔时还时有发生。

假如既不具备窦融那样的条件，也不像张轨那样认真衡量自己，而是像吕光那样，贸然君临河西，结果将会很惨。当着吕光率领数千名氐族军队从西域返回时，首先遇到梁熙为首的他方军队的抵抗，而归服他

的只有“西山胡夷”之属。而且他进占姑臧后，又不去做著姓社会的工作，甚至擅杀名士姚皓、尹景等十余人，搞得“远近颇以此离贰”[49]，不仅迅速招来“一州之地，叛者连城，瓦解之势，昭然在目”[50]的灾祸，严重时连粮食也筹不到，“谷价踊贵，斗值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51]，各方面都陷入困境。著姓社会抛弃了吕光的后凉，又选择了李暠、沮渠蒙逊、秃发乌孤，再造了后来的几个凉政权。

其二是定策之功。所谓定策之功是指对认可并支持的割据者，著姓社会甘愿为之效股肱谋主之劳，通过积极的献策，表达自己的主张，裁定政治、经济、军事各项重大问题。如窦融在东汉建立后，面对何去何从的前途抉择，先“召豪杰及诸郡太守计议”，“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小心精详，遂决策向东”。[52]实际上是著姓社会决定着窦融是否附汉。“五凉”时期，像这样事关地区前途与国家安危的大政方略，往往都是由著姓社会中产生。如前凉政权正式形成在河西的割据，是从张寔开始的。而张寔则是根据张诜建策，通过阻断西晋宗室司马模西进称尊的图谋表示出这一政治姿态的。李暠建立西凉，也是按照张邈、宋繇的主张，从拒纳段业王命开始的。至如段业自称“为贵门所推”举兵反对吕光[53]，秃发傉檀向宗敞求“怀远安弥之略”[54]，诸如此类决策，条条都对河西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张轨按照索辅的意见，实行了“准布用钱”之制[55]，使东汉后期即遭破坏的货币经济首先在河西区域内恢复起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便利了人民生活，影响至大。

参预定策中，为驳正失误，也会有人犯颜直谏。如索孚，他有鉴于张骏劳民积怨而仍一意孤行，在“议治石田”时，进行廷争，不惜因此而失禄位。他还以射箭须弓合度、矢端直的道理劝喻张祚等不要荒政乱制[56]。

其三是推进之功。所谓推进之功是指著姓社会在各项活动中对割据政权的发展、巩固做出的实际贡献。对此，只要认识到割据政权是著姓社会的政权，割据事业是著姓社会的事业这两点就足够了。窦融也好，张轨等也好，从他们建邦命氏，到他们走向终结，凡诸内政外交、攻城夺地、赋税钱粮、教化疏导，事无巨细都借力于著姓社会。具体事例无须一一枚举。只看最高统治者对著姓人物的重视与敬仰之心便可见一斑。李暠临终顾命宋繇：

> 吾终之后，嗣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57]

同是宋繇，沮渠蒙逊也对之谦恭备至。克酒泉后对臣下说：

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58]

同样的敬慕之言，在宗敞帮助秃发傉檀兵不血刃坐定姑臧后，傉檀也说过：

吾得凉州三千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59]

上述三方面功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河西著姓对河西政治产生的积极的、有益的作用，是充分发挥内部潜力代替崩溃后的统一王权对局部地域施行统治的功能。

其四，与上述功能呈逆反作用的是某些时候著姓社会又对河西局势产生消极影响，即所谓的破坏功能。这是豪强地主社会的普遍功能，是“武断乡曲”“势倾西土”的本能反应。举张镇之乱为例，它的实质是河西著姓部分家族与非河西著姓的张轨家族在争夺地域统治权，但彼时正值河西经历长期“鲜卑反叛，寇盗纵横”[60]，一片经济残破，民不聊生景象。张轨以“才堪御远”依靠宋、阴等族重整局面，保宁域内，这是符合民意的进步行为。张、曹、麴等家族对张轨进行的颠覆活动带有一定的反动性。它直接导致了曹祛余党在河西域内挑动内战及勾结秦州割据势力裴苞、尉贯与河西对峙的严重后果，使已渐趋安定的河、陇一域又出现纷乱。以后，前凉政权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付这类动乱，如徙麴氏中“元恶”六百家离故地，诱杀谶言“手莫头，图凉州”的贾摹，并大事兴建，强固姑臧城防等，虽做到了使“豪右屏迹”，但也骚扰了民间生活[61]。

在制造地方动乱上，著姓社会中个别家族有着悠久历史，并被视为是传统门风。如说“西平诸田，世有反者”[62]。张氏家族在前凉统治的几十年中，除张镇、张越之外，后期还有张瓘、张邕等人的擅权跋扈及由此引起的张、宋内讧。

一般情况下，著姓社会对局面的破坏作用多表现为滋扰法度、干乱行政等方面。如沮渠蒙逊伯父亲信、孔笃，“并骄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逊曰：乱吾国者，二伯父也，何以纪纲百姓乎！”[63]此前仓慈指出过大姓侵占田地，欺诈胡商等行径也属同类性质。另如积习已久的官场腐败，更是每日每时、潜移默化地腐蚀着封建政治的肌体，导致政治走向衰乱。对此，北凉时有人指出：

> 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进。至于黜陟绝于皇朝，驳议绝于圣世，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劝兢之心，苟为度日之事。[64]

这种腐败，表现出著姓作为士族阶层的腐朽面。

总之，河西著姓社会左右地方局势的各种功能交织在一起反复作用的结果，使包括窦融、“五凉”在内的各割据政权得以建立并维持一定时期的存在，同时也必然潜藏着各种矛盾，如王权弱小，以地方势力为主要势力的国力因素只能使其保据河西一隅而不可能完成跃马秦陇，混一宇内的功业等。

著姓社会过分集中的各种优势，有时也会因内部失衡而导致自身的动荡，严重时会造成个别家族殄宗灭门，如阴氏、宋氏那样，在内部争斗中经历荣枯的考验。正因为这样，个别著姓人物不得不在“贵而能贫，乃可以免”的人生哲学中“衔胆自厉”或隐居起来，在“柴门灌园，琴书自适”中聊度岁月。其中更甚者“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答”[65]，做出种种怪诞行为。当然，这不是著姓社会行为的主流。

河西著姓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历史存在。它由家族的、社会的双重势力凝固而成，具有官僚、豪强上层地主社会的各种特征。

“五凉”时期是河西著姓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它充分发挥作用的时期。其中，以重建封建秩序、安定地方局势的积极作用为主要方面。正是因此，才有“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之类的舆论[66]，才有“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之类的评价[67]。河西著姓社会在北魏灭掉北凉后解体了，其中大多数家族被当作降户、杂户徙入平城，逐渐融入中原社会。

[1] 《北史》卷34《张湛传》，中华书局，1974，第1265页。

[2] 《晋书》卷48《段灼传》，第1336页。

[3] 《晋书》卷60《索靖传》，第1648页。

[4] 《三国志》卷9《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第290页。

[5] 《晋书》卷89《忠义·麴允传》，第2307页。

[6] 《魏书》卷41《源贺传》，第919页。

[7] 《晋书》卷87《李歆传》引氾称语，第2269页。

[8] 张澍辑，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引《郃阳令曹全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第51～52页。

[9] 《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五下》，第3397页。

[10] 《通志》卷25《氏族略》。

[11] 《通典》卷13《选举一》，典75中。

[12] 《新唐书》卷199《儒学中·柳冲传》，第5677页。

[13] 张澍辑，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引《郃阳令曹全碑跋》，第54页。

[14] 《北史》卷67《令狐整传》，第2349页。

[15] 《北史》卷67《令狐整传》，第2354页。

[16] 《北史》卷34《张湛传》，第1265页。

[17]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4～2225页。

[18]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

[19]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20]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21]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22]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6页。

[23]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3《前凉录》，第520页。

[24] 《晋书》卷89《忠义·麴允传》，第2307页。

[25]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26]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3页。

[27]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2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4《前凉录》，第527页。

[29]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30]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2页。

[31]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32] 《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第512页。

[33] 《晋书》卷89《忠义·麴允传》，第2307页。

[34] 《晋书》卷94《隐逸·氾腾传》，第2438页。

[3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1《前凉录》，第505页。

[36] 《太平御览》卷512《宗亲部·伯叔》引刘昞《敦煌实录》，第2334页。

[37]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3页。

[38] 《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第2455页。

[39]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4《前凉录》，第525页。

[40] 《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第2454页。

[41] 《魏书》卷52《宋繇传》，第1152页。

[42]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4页；《续敦煌实录》引《令狐熙碑》，第99～102页。

[43] 见《晋书》卷86《张寔传》、《晋书》卷122《吕纂妻杨氏传附吕绍妻张氏传》、《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传》。

[44] 《魏书》卷52《胡叟传》，第1152页。

[45] 《晋书》卷52《刘昞传》，第1160页。

[46] 释道世：《法苑珠林》卷84引颜之推《冤魂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第307页。

[47]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6页。

[48]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第483～484页。

[49]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50]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1页。

[51]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52] 《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798页。

[53]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2页。

[54]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55]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56] 《魏书》卷99《私署凉州牧张寔传附张骏传》，第2194～2195页。

[57]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3《西凉录》，第645页。

[58] 《魏书》卷52《宋繇传》，第1153页。

[59]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60]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61]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2页。

[62]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6页。

[63]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5《北凉录》，第657页。

[6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6《北凉录》，第664页。

[65]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4《前凉录》，第527页。

[66]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67] 《魏书》卷52《胡叟传》，第1150页。

〖卷十〗 文教篇

第一节 五凉政权的“文教兼设”

秦汉以后，汉族文化圈向周边地区的迅速扩展，使一些原本地处“戎域”的边陲地区进入封建文化的苏醒时期，河西走廊便是这样的地区之一。

河西走廊封建文化的苏醒，是汉武帝经营西域和开置河西四郡的结果。而河西经济区的开发，则是封建文化苏醒的基础。大批中原人口迁徙到河西，将中原数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成果带到河西，又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文化宝库的许多成果通过河西传向中原。这造成一种必然趋势，那就是河西地域文明有一天终会产生出异样光彩，并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作为世界文化瑰宝的敦煌学术迄今为四海所具瞻，便是一个明证。

敦煌学术的地域渊源在敦煌，时代渊源在汉中期以后。其中，公元3至5世纪河西走廊文化的繁荣，是敦煌学术兴起的端倪。因为彼时河西文化的繁荣尤以敦煌地域最令人瞩目。

公元4至5世纪，正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割据河西时期。这一时期文化上繁荣局面的形成与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五凉各政权“文教兼设”的政策。

就整个北方中国而言，从东汉末年直到魏晋以后，乃是一个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的时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和由此导致的战乱频繁抑制了文化的发展。首先，战乱使文化典籍屡遭浩劫，有的佚落散失，有的毁于兵燹。史载：“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1]其次，在政治动荡之际，无数文人名士流亡逃遁，有的“柴门灌园，琴书自适”[2]。有的废业放诞，“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

言”[3]。最后，割据政治下的区域辐裂以及割据者彼此以邻为壑，也严重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窒息了学术成果的创造和积累。史载：

> 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4]

在文化发展受到抑制的同时，学校教育更备尝艰辛。以太学而论，经汉末大乱后，教育已废弃殆尽。有记载说：

>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5]

太学如此，州郡县学更是无可言道。即使有力维持者，也多出自为王纲解纽唱挽歌的意思，并非在于授业传道。像西晋江州刺史华轶，他在匈奴军队围攻洛阳和西晋风雨飘摇之际，为表明“吾为司马氏”而特置“儒林祭酒”，并下教令申告州内士民说：

> 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议，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6]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五凉政权何以能在僻远的凉州推行一系列弘扬文化教育事业的举措呢？对此，陈寅恪先生回答说：

> 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7]

也就是说，在4至5世纪整个北方因战乱而致文化教育事业陷入衰落时，河西却峰回路转地出现了例外。这是因张轨以后，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同时有大批侨寓的中原学者和本土士人传习学业。是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智力环境为五凉政权提供了振兴文教和昌明学术的条件。

事实上，正是中原和河西两大地域学者及名流连同他们拥有的文化成果汇聚河西，造成五凉文教昌明的景象。就中原学者而言，他们中许多人学术底蕴极深，早已饮誉海内。如陈留江式，从其六世祖江琼起，

书法和训诂成为家学，“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8]。到江式时，其家族学术在河西已传延七世，使在中原已将灭绝的古文经学得到保存，以后又经北魏回输到中原。另如常爽，祖籍河内温县，本是曹魏太常卿常林的六世孙，其祖父担任过前秦苻坚时期的南安太守，前秦灭亡时迁居河西。常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9]，是个颇有造诣的学者。他的家族经历了后凉、南凉、西凉及北凉，后来入魏。常爽不应州郡礼命，矢志于学，对河西以及平城的教育事业颇有建树。五凉时期，原籍河西的学者更是璨若群星，特别是“河西著姓”人家，他们不仅是政治上的中坚，许多又是文化学术上的英才。其中，敦煌士林人物更是群龙翘首，如宋繇、刘昞等，都对弘扬河西文教有重要贡献。正是他们的活动，使五凉时期的敦煌成为边陲文明的摇篮。像李暠所说：

>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10]

五凉推行文教兼设政策，并实行了一些昌明学术的举措。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各政权创立者都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对此，陈寅恪先生也曾予论及。他指出：

> 又张轨、李暠皆汉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

> 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此沦替，宗敞之见赏于姚兴，斯又其一例也。[11]

首先是张轨和李暠，他们一个出身于陇右著姓，一个出身于陇西世族，都各有家学底蕴。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12]。与西晋时期在朝在野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皇甫谧、挚虞、张华等以学问相过从，备受张华等赏识：

> 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13]

李暠也“通涉经史，尤善文义”[14]，是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他的父亲李昶曾官居“世子侍讲”，两代人都是学术造诣很深的知识分子。

其次，后凉的建立者吕光、南凉的建立者秃发乌孤、北凉的建立者

沮渠蒙逊，他们虽分别生于氐、鲜卑、匈奴酋豪家庭，擅长于弓马战阵，但由于长期生活在汉族文化圈内，都不同程度地汉化，并且钦慕华风，倾身儒雅。其中，沮渠蒙逊尤为突出，并素著人望。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15]，是一位文武全才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与沮渠蒙逊的才质相比，吕光和秃发傉檀要逊色得多，然而他们也懂得用兴理文教来争正朔的道理，身边常有一批汉族士人为他们经邦论道。傉檀纳史暠之言，“文教兼设”，从宗敞之谋，“农战并修”，代表了他们的思维。因此，纵然后凉和南凉时期学风不盛，但也微波荡漾，重文兴教。所以有人说：“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16]

正因为五凉政权的创立者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知道文化教育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五凉时期积极的文教政策及各项举措才有可能形成和贯彻。

五凉的文教政策及举措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敦崇儒学，振兴教育。

自汉武帝定儒学于独尊并建立太学制度起，封建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和学校教育制度的格局便被确立下来。此后，崇儒读经的风气盛于一时。儒学兴国与读经起家，则成了汉以后的社会风尚和文人追求的重要目标。然而，延至汉魏之际，崇儒读经的风气衰落了。经过汉末魏初的战乱和纷扰，儒学斯文扫地。曹魏正始年间（240～249）的情况是：

> 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17]

到西晋之末，北方陷入分裂，中原一片逐鹿之声，强暴代替儒雅，武功代替文治，学业沉陨的遗祸进一步蔓延。

当北方普遍出现“学业沉陨”的情况时，张轨却将兴教立学作为他治理凉州的第一件大事。永宁初年，他以敦崇儒学为基点，开始振兴河西文化教育。所采取的具体行政措施一是置崇文祭酒，以主理文教，二是“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8]。崇文祭酒又称崇文祭酒从事史，依晋制，这是掌管图籍和文教的佐吏。魏晋时期，文教沦替，制度不备，此职在州级行政中甚少见置。偶有设置，其意也在匡正纲常礼教方面的颓势。也举西晋江州刺史华轶为例，当着前赵军队进攻洛阳，西晋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际时，他

特设“儒林祭酒”，教令州部。

> 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议，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19]

张轨“始置”崇文祭酒，也有表明“吾为司马氏也”之意，但措施落实在征胄子、立学校上，说明它是一项重要的文教行政举措。张轨规定崇文祭酒的职位相当于别驾，享受与刺史同时“乘传行部”的特权和待遇，表明了张轨振兴文教的决心之大。在被中原人看成“戎域”的凉州，学校教育制度首先兴立，这是有特殊意义的。虽然学校只将“九郡胄子”列为培养对象，教育面和受教育面十分有限，但作为首批招收五百人的州级学校，其规模也不小了。

在恢复学校教育制度后，张轨又延聘人才，下令郡县详推那些“高才硕学，著述经史”者，将他们“具状以闻”，以备选拔擢用。这样，又将文化教育学术与察举征辟结合起来，有助于鼓励士人和提倡尚学风气，有助于推动河西文化逐步走向繁荣。而且张轨也博得了“德量不恒”的美称，受到中原和河西各界人士的敬仰。

前凉的学校教育体制在张骏时进一步完备。张骏因其文治武功，被誉为“积贤君”。他在“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20]的建邦活动中，将学校和教育也升了等级。339年，张骏设立国子学，“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21]。这完全仿制了西晋教育体制。史载：

> 惠帝时，裴頠为国子祭酒，奏立国子太学。起讲堂，筑门阙，刻石写经。[22]

魏晋时期的国子祭酒是国子学诸生之师，“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生，师事祭酒，执经，葛巾单衣，终身致敬”[23]。张骏此举，表明前凉太学制度的建立。另外，张骏也遵照名教治国的定义，在张轨行乡射之礼的基础上，完备儒家礼仪教育，“立辟雍明堂以行礼焉”[24]。

自张轨奠定儒学教育基础开始，后来的南凉、西凉、北凉也都各按其国情和政治要求，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南凉在秃发利鹿孤时期延耆老、访政治，纳史暠之言，按照“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的王道成规，“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又“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25]。西凉初建，李暠首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26]。他亲身率导，

敦励学风，虽有政务，手不释卷，并训诫诸子，要孜孜不倦，“退朝之后，念观典籍”。北凉的崇学之风尤甚，沮渠蒙逊专门兴建游林堂，率群臣在这里“谈论经传”，并“图列古贤圣之像”[27]。比较起来，后凉对教育有所疏忽，这主要因为自吕光立国时起，后凉就连续不断发生动乱而无暇顾及。

学校教育制度的恢复和陆续完善，为五凉各时期培养了大批政治人才，有助于各政权文治的开展。同时，由于崇儒重教，推动了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转盛。风气转盛的结果必然是地域文明程度的提高。所以有人说：“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28]

其二是重视人才，优礼士人。

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主要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活动来推进。

执政者重视知识分子，使他们发挥作用，是推动文化教育发展的关键。五凉政权在这一方面有较为开明的政策。对于知识分子，无论他们在朝或在野，也无论他们世居河西还是来自中原，五凉政权对他们采取的基本政策是以礼致之和量才擢用。对深有造诣的知名学者，则给予政治殊荣，并为之创造学术条件。因有这样的政策，士林人物中，除矢志隐逸者外，都甘心为当政者效力和服务。江琼、程骏、常爽、杜骥、裴诜等中原学者及其家族子弟“避地河西”期间，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张轨及其他五凉统治者的礼遇。江琼和常爽两个家族所受礼遇是很高的，已如前述。至如程骏，原籍广平曲安，“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骏少孤贫，……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29]。杜骥，原籍京兆杜陵，高祖是西晋名臣杜预，家族世治春秋经，杜预自称有“左传癖”[30]。杜氏家族中，从杜骥（杜预子）曾祖父杜耽起，“避地河西，因仕张氏”，“世业相承，不殒其旧”。[31]裴诜，原籍河东闻喜，本是西晋太常卿，“因晋乱，避地凉州。苻坚平河西，东归，因居解县。世以文学显，五举秀才，再举孝廉，时人美之”[32]。这些著名的中原学者在丧乱之际能纷纷避地凉州，本身就说明张轨等对中原知识分子持倾身接纳的态度。迁到河西后，又受到张轨及其后继者的信任和重用，这使他们得展平生所学，发挥其学术才干，从而又给河西文化学术增光添彩。胡三省为此盛赞前凉以来对中原士人的优礼政策及社会效果，他说：

> 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

坠，故凉州号为多士。[33]

五凉政权礼遇士人、重视知识的政策在凉州学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凉各政权都将依靠河西著姓作为基本国策。

河西学者中，树名经传者不下十数人。宋繇、张湛、宗钦、段成根、阚骃、刘昞、赵柔、索敞、阴仲达、张斌、祈嘉、索袭、宋纤、郭荷等是士林代表。他们之中，有的在朝，有的在野，但受到的礼遇是相同的。以宋氏家族而论，宋繇西奔李暠，历位通显。

> 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牧犍委托之。[34]

宋繇是治国治学都有所成者。宋氏家族中也有持学者操守，笃志于学，隐迹山林的，比如宋纤。

> 少有远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唯与阴颙、齐好友善。张祚时，太守杨宣画其象于阁上，出入视之。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距而不见。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35]

宋纤后来被张祚强征到姑臧，拜为太子太傅，但未几"不食而卒"。像宋纤这样，虽不应州郡辟命，依旧受到州郡长吏崇仰的名士，在汜氏家族中有汜腾，在索氏家族中有索袭，其事迹不再详述。

在一定程度上，五凉的统治者可称得上是思贤若渴的。如秃发利鹿孤对群下说：

> 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36]

他们招贤纳士的态度有时表露得十分虔诚，得到之后也十分倚重。张轨对宋配，秃发傉檀对宗敞，李暠对刘昞，沮渠蒙逊对宋繇，都有这方面的佳话。

宗敞，金城人，是后凉尚书郎宗燮之子，宗钦的同胞兄弟。父子三

人均以才学蜚声河西。宗敞先任后秦凉州别驾，当后秦凉州刺史王尚被姚兴召返长安，以“藏匿后凉宫人”以及“擅杀逃人”罪名“禁止南台”时，他仗义执言，与治中张穆、主簿边宪和胡威等联名上疏，为王尚理冤。所作疏文理直辞美，连后秦主姚兴也为之叹服。姚兴问吕超：“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谁辈？”吕超答道：“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意思是说宗敞的文才可和陈琳、徐干、潘岳、陆机等魏晋著名文学家相比。姚兴惊讶地说：“凉州小地，宁有此才乎？”[37]秃发傉檀曾与宗燮有旧交，宗敞送王尚返长安前，傉檀入主姑臧。二人分别之际，傉檀依依难舍地对宗敞说：

> 吾得凉州三千余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舍我去乎？[38]

惜才重才的感情，溢于言表。

在礼贤下士方面，李暠和沮渠蒙逊都是表率，他们对敦煌著名学者刘昞都礼敬有加。

刘昞，字延明。师承东汉著名经学家郭整的六世孙郭荷。郭氏家族“自整及荷，世以经学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39]。前凉张祚时，以安车束帛征聘郭荷为博士，荷不受。隐居于张掖，以授学为业。弟子中，郭瑀最为杰出，“尽传其业”[40]。而郭瑀又传业于刘昞。西凉建立后，刘昞被李暠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君臣之间，以学问相推重，昼夜切磋。史载：

> （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时昞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41]

西凉亡后，刘昞又被沮渠蒙逊拜为秘书郎，专管注记。

> 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42]

五凉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给河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造成人才与成果层出不穷的局面。

其三是倡导民间学术文化活动。

东汉后期公立学校制度衰落后，一方面，文化教育与学术陷入了极度的不景气；另一方面，以民间授学与著述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学术活动

却有抬头之势。魏晋之际，敦煌郡士人云集，文化氛围隆重，有“名郡”之誉。其他诸郡的学术风气也很昌盛。这当中，各政权积极的文化政策及振兴文教的举措，无疑对民间的文化学术活动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原先已呈抬头之势的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与正在恢复发展中的官学和官方学术活动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形成了五凉时期河西文化教育多元化的格局。

在推动民间文化学术活动进一步活跃方面，张轨颁布的征辟法令起了有力的作用。因为法令规定将“高才硕学”和“著述经史”列入选格，必然会激励士人追求学问和创造学术成果。前凉政府执行了这个法令，有的学者甚至因此得以封侯。如索绥，他在张骏时开始编修《凉春秋》，至张重华时完成，以功得受封为平乐亭侯。

五凉时期，民间教育家和学者辈出。如隐居于张掖林松东山的郭荷不仅培养出如郭瑀那样高才硕学的学生，而且写出如《春秋墨说》《孝经错纬》之类的名著。刘昞在隐居酒泉期间，身边经常有数百名学生跟随学习。他后来将学术由民间带入朝堂，教授北凉君臣，颇有建树。他的生平与五凉相始终，并且著述极为丰富，总共有经、史、子、集各类十多部。

> 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43]

北魏时期，刘昞的学问和学术成果仍让凉州人引以为荣。又据《魏书·索敞传》，刘昞的学生索敞在北凉时“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入魏后：

> 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44]

五凉时期，在政策准许下，有许多学者隐居乡里，传道授业并兼以著述，他们各有其学术领域，涉及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地理、阴阳之学。如祈嘉，酒泉人，前凉时“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人”[45]。索袭，敦煌人，《晋书·索袭传》说他“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方正、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

十余篇，多所启发”[46]。索紞，敦煌人，《晋书·索紞传》言其“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敦煌太守阴澹召他出来做官，他以“不求闻达”为辞，不应辟命。[47]

在这些民间教育家和学者中，敦煌士人占很大比例。他们是五凉时期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的精英。他们与在朝的士林人物一样，都是推动河西地域文明发展的骨干力量。

河西地接西域，五凉也重视吸收外部文化，以充实地域文化知识宝库。如佛教文化，在五凉时期广为传播，空前活跃。有记载说：

> 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48]

当时，有许多高僧汇聚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原是天竺人，长在龟兹。七岁出家，精通佛教大、小乘，年纪轻轻已誉满西域。吕光出征西域，临行前，苻坚命他寻访罗什并“驰驿送之”。[49]后吕光东返，将罗什迁到姑臧。罗什在姑臧生活了十六年，对河西佛教的传播做出了贡献。401年，后秦占领姑臧，罗什被迁到长安，姚兴尊他为国师，特辟逍遥园，让他翻译佛教。罗什之外，侨居河西的高僧还有昙无谶，他原是中天竺人，出家后先学小乘，后改学大乘。北凉玄始年间（412～420），游学到姑臧，与河西沙门慧嵩、道朗等合作，先后翻译佛经十四部。魏太武帝闻其名，使李顺赴凉征其入朝，沮渠蒙逊留而不遣，最终杀掉昙无谶。这也成为魏太武帝灭凉的理由之一。

在佛教传播的同时，西域艺术中的许多内容也被河西大量吸收。吕光征龟兹，收集西域奇伎异戏带回姑臧。北凉玄始中，西域又贡吞刀、吐火、秘幻奇术。吕光同时还将西域乐舞“龟兹乐”带回河西。

在积极吸收外部文化的同时，在政治环境和交通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五凉政权也重视文化交流。北凉永和五年（437），沮渠牧犍与刘宋通使，在献给刘宋的方物中有大批图书典籍，其目录为：《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邱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畋传》并《甲寅元历》一

卷，《孔子赞》一卷。总计其数为十九部一百五十卷。这些图书典籍大多是河西学者的作品，内容包括经学、史学、文学、数学、天文历法等类，其中有刘昞、阚骃、谢艾等著名学者的著作。另外，早在蒙逊时期，北凉已遣使向刘宋求取《周易》及子集诸书。当时宋司徒王弘还亲自手抄干宝《搜神记》给凉使者。牧犍在向刘宋王朝献书时，又求取晋赵起居注等“诸杂书数十种”[50]。作为西晋乱亡以来南北之间规模最大也是最早的一次图籍交流活动，它对促进江南和河西文化的发展，对保存和传播文化成果，都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节 文化与学术的昌盛

五凉政权重视文化、重视学术、重视知识分子的积极政策和措施，推动了河西文教事业。而河西在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中所处的文化地理位置，再加上大批著名学者的辛勤耕耘和不倦于学，使当时的河西成为同时期整个北方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地区。

一 经学和玄学

首先是经学。五凉时期，经学精英辈出，学术成果累累。郭瑀的《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刘昞的《周易注》是代表之作。张湛、宗钦、段成根以左传卦解易，阚骃注王朗《易传》，使“学者藉以通经”[51]。如江式家族：

> 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

其《古今文字》一书，是当时名著：

> 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52]

既为经学名著，也是书法大观。《古今文字》一书，是江氏家族将中原学术与河西学术融会贯通、珠联璧合的力作。

与经学有关的是玄学。当时，将《老子》《庄子》《周易》合称“三玄”。河西学者多有治易经者。由易学及于玄学，本属必然。河西学者虽未煽起“玄风”，但所取得的成就却填补了魏晋玄学的空白。

刘昞与程骏是当时有名的玄学家。刘昞为刘劭《人物志》作注，陈寅恪就此评价说：

> 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国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53]

《人物志》是魏晋玄学的名作，刘昞通过作注将它介绍给河西，介绍给世人。

程骏与刘昞之间，有一段关于老庄学旨的谈话。

> 骏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若爽性则冲真丧。"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54]

程骏阐发的老庄学旨，关于修身养性的道理，他的认识是抱一与守真。陈寅恪评价说：

> 自晋室南渡以后，过江名士尚能沿述西朝旧说，而中原旧壤久已不闻此论，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朝遗说之一证也。[55]

五凉的统治者中，沮渠蒙逊也是善谈玄理的。他与群臣在游林堂谈论经传时，与刘昞论及才性问题：

> （蒙逊）谓郎中刘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圣人也。"逊曰："圣人者，不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畏于匡，辱于陈，伐树削迹，圣人固若是乎？"昞不能对。蒙逊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内。昔鲁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游于海中，与鲁人一木杖，令闭目乘之，使归告鲁侯，筑城以备寇。鲁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龙也。具以状告，鲁侯不信。俄而又群燕数万，衔土培城。鲁侯信之，大城曲阜，讫而齐寇至，攻鲁不克而还。此其所以称圣也。"[56]

沮渠蒙逊以仲尼和鲁人为例，谈出他对名实关系的看法。而名法思想的活跃，正是玄学产生的思想基础。

魏晋之世，北方社会谈玄之风盛行，玄学中有许多名论产生。如"四本"论，"名教与自然关系"论，"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崇有"与"崇无"论等。西晋灭亡后，谈玄之风与玄学理论都从北方大地上销声匿迹。而河西一隅却因大量中原名士的迁入，将玄学研究中互相辩难的方法及著名理论输入进来。沮渠蒙逊和刘昞的对话，在方法、理论上都承其衣钵。此外，以冲玄自命的名人高士在五凉时期甚多。除刘昞号"玄处先生"外，至如"爰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在山投山，在水投水，处泽露行"[57]之士更不作一二数。他们的才性或异或同，他们的言行或合于自然，或本于名教，他们"或哭或笑"，自哀自乐。总之，他们都是玄学波澜的激荡者。在统治者中，沮渠蒙逊有谈玄之论，前凉张重华及张玄靓和张天锡等，他们的言行也有与玄学迁染的嫌疑。如张天锡，他数宴园池，政务颇废。校书祭酒索商上书劝他勤修国政，而他则故弄玄虚地回答说：

>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飙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58]

张天锡是前凉亡国之君，淝水之战后自前秦投奔东晋。在江南，他的言行举止与东晋玄学界人物颇无二致。司马道子问起他“西土所出”时，他应声回答：“桑椹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再后来，则耽酒废事，“形神昏丧”[59]。

二 史学

五凉时期，史学成就卓著。当时，官私修史之风甚盛。最早建立史官制度的是前凉。张骏时，“命西曹掾集阁内外事付索绥，以著《凉春秋》”[60]。《凉春秋》在张重华时期修成，全书共五十卷。与《凉春秋》同时编修的前凉史书还有刘庆的《凉记》十二卷。私家所修史书中，以阚骃的《十三州志》最为著名。刘昞任沮渠蒙逊秘书郎，专管注记，后修成《凉书》。他另一部史作是《敦煌实录》。

前凉以后，诸凉之间纷争兼并，但每个政权都遵循官修史书的传统。官私修史加在一起，使这一时期各种类型和体例的史书琳琅满目。举凡正史、稗史、实录、起居注、风俗记等层出不穷。它们或记一代之事，或记诸凉之事；或纪传体，或编年体。仅以《凉书》和《凉记》为名的就有数种，如张谘的《凉记》、段龟龙的《凉记》、刘庆的《凉记》、高道让的《凉书》和刘昞的《凉书》等。另外，还有喻归的《西河记》。这些种类繁多和内容各异的史书，成为后来北魏崔鸿撰修《十六国春秋》的底本。

史著以外，刘昞还对《史记》《汉书》《后汉书》进行了会要，“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61]

三 文学

文学方面，流传至今的五凉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见于史籍的书目却不少。以诗歌而论，五凉诗人首推张骏，他擅长写五言诗，有集八卷，作品题材多为咏史和感怀两类。如《薤露行》一诗，仿建安风格，抒发对西晋以来北方民族战乱屡兴的扼腕之情。中有“皇道昧不明，主暗无良臣”，“祸衅萌宫掖，胡马动北垧，三方风尘起，猃狁窃上京”的句

子，表达了诗人对民族和国家的忧心。另外，《东门行》写道："春游诚可乐，感此白日倾。休否有终极，落叶思本茎。"[62]流露出居安思危与心怀故国的凄婉感情。五凉时期著名的诗作还有马岌《题宋纤石壁诗》、宋钦《赠高允诗》、段成根《赠李宝诗》，以及张湛与崔浩的酬唱诗等。值得一提的是女诗人苏蕙的《回文诗》。

苏蕙，字若兰，前秦秦州刺史窦滔之妻。窦滔因忤旨被罚谪戍敦煌，苏蕙随夫西行。379年，前秦攻打襄阳，"梁熙统河西之众，以继中军"[63]，窦滔从征。攻克襄阳后，窦滔被任为安南将军，并爱上另一个女子赵阳台。苏氏闻讯后，拒绝南下，并表示与丈夫断绝关系。在极度哀伤之余，苏氏织锦为回文。在长宽各八寸的锦帕上，织入八百多字，含诗二百余首，借以抒发自己的愤懑及思夫之情。在二百余首诗中，有七言、五言、四言、三言。其夫窦滔读诗后，感到十分羞惭，于是送走赵女，与苏氏重归旧好。后人谈回文诗，一般都以五色来分章次。包括锦字回文诗在内，苏氏共著文词五千余言。这些作品大多数在隋末散佚，而回文诗却一直流传到今天。

民歌是诗歌的一个分支，多为口头传唱之作。五凉时期的民歌以谣谚为主，感情苍凉悲壮，与北歌相同。后凉时期的《朔马谣》是代表作。这首民谣表达了河西各族人民对吕光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和被徙离家园后的悲愤心情。这首民谣产生在吕光麟嘉六年（394）。《晋书·吕光载记》称，吕光曾徙西海郡人于诸郡，"至是，谣曰：'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这一时期的谣谚还有张骏时的《凤凰鸣》，沮渠牧犍时期的《破带石》等，内容都与政治有关。

赋作为汉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形式，同样为五凉文学家们所擅长。李暠的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他的《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客赋》等作品，以表现对兵难繁兴、世道沧桑、时俗喧竞的感伤为内容，文辞绮丽，对仗工整。另外，前凉时的张斌也是著名的赋作家，"作《葡萄酒赋》，文致甚美"[64]。

五凉时期的名士都善著文，他们的散文作品极其丰富，大到子集类，小到表章、疏文、政论、铭文等。李暠的《诫子书》与西凉建初元年《上东晋朝廷表》、刘昞的《靖恭堂铭》等是小中名篇。大部头散文作品如北凉末年献给刘宋王朝的一些文集，在后代犹存书目。

四 佛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五凉对佛教东传起过重要作用。

首先，五凉的统治者多数都崇信佛教，尽管崇信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它足以吸引东来西往的佛教僧侣驻足河西。如吕光，他虽最不给佛教面子，曾强迫鸠摩罗什娶妻。但他仍将罗什当作“深解法相，善闲阴阳”的术士对待[65]，将他留居河西十六年。这期间，罗什尽管“蕴其深解，无所宣化”[66]，却吸引了一批佛学家到河西求师问道，京兆人僧肇即其中之一。

五凉统治者中，沮渠蒙逊是最崇仰佛教的。《魏书·释老志》称他“亦好佛法”[67]，与著名僧人昙无谶关系十分密切。昙无谶精通佛学，“又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68]。后魏太武帝令蒙逊遣昙无谶到平城，但蒙逊宁可得罪太武帝，也不遣其入魏。

释慧皎著《高僧传》收录魏晋时期高僧257人，其中出生在河西的有36人。另外，又列与五凉时期河西地区有关系的50人，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师贤、释惠高等名僧是他们的代表。如果仔细统计，可得到各时期他们的详细名单。在前凉时期有单道开、竺昙猷、僧涉、支施、佛图澄、竺法护、竺法乘。后凉时期有鸠摩罗什、僧肇、佛陀耶舍。南凉时期有昙霍。北凉时期僧众最多，计有昙学、道泰、沮渠京声、智猛、昙纂、竺道嵩、昙无谶、慧嵩、道朗、师贤、昙曜、僧朗、释玄高、法盛、竺法维、僧来、法成、僧印、道法、浮陀跋摩、道龚、法众、道进、道挺、释玄畅、释法颖、法力、释僧侯、释法进、僧遵、释弘充。西凉时期计有道猛、法泉。这些人中，有的是学问僧，有的是职方僧。有少数僧侣还染指政治，如法泉，他曾为西凉充当信使通使东晋。

五凉时期，河西有不少僧侣前往西域求取佛经。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僧表等都有这方面的事迹。另外，中原与江南也有许多僧人经河西前往西域。如东晋法显、智严、法勇、支法等。五凉佛学之盛，得力于这些佛教文化使者。他们带回的大量佛学经典首先落户于河西，然后才传到中原和江南。由道安整理的《综理众经目录》中有《凉土异经录》，其中共搜集流传于凉土而失译的佛经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十六国时期，北方著名的译经中心是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五城中河西居其二。参加译经的人数计有前凉一人，译经四部共六

卷；北凉九人，译经八十二部共三百一十一卷。[69]

北凉时译经之风甚盛，成就卓著。沮渠牧犍聘西域沙门浮陀跋摩于内苑闲豫堂，翻译《阿毗昙毗婆沙论》六十卷。而昙无谶先后所译佛经多达十一部一百零四卷。[70]其中《大般涅槃经》四十卷是中国佛教涅槃宗的根本经典，它阐发的“一阐提人”（不具有信心的人）皆得成佛的理论，对佛教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鸠摩罗什在河西期间虽不曾弘道，但他却学习了汉语，这为他后来到长安为姚兴翻译佛经奠定了语言方面的基础。罗什在长安译出佛经九十八部。所译诸经，讲求文辞优美，在声韵格调上极合绳墨，为便于诵读和文质并茂，他力求做到既能和以笙弦，又不失“西域趣语”。罗什还发下宏愿，如翻译无误，死后焚身时舌当不烂。相传以后果应其言。[71]

五 艺术

五凉时期，河西艺术宝库中瑰宝荟萃，灿烂夺目。

一是石窟寺艺术，它随佛教在河西的盛传而兴起和发展。其中，开凿最早的是武威天梯山石窟，前凉初期，已有人在这里传道。“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72]北凉玄始中，在天梯山正式开窟建寺。窟内安设佛像，有的石雕，有的泥塑，形象生动，仪态各异。由于山势陡耸。窟寺雄伟，膜拜者无不惊心眩目。其次是酒泉文殊山石窟和临松马蹄寺石窟，也都凿于北凉时期。文殊山石窟分前、后山两区，前山区千佛洞和万佛洞两窟，据考是北魏遗留，当与北凉有承袭关系。其造型呈塔柱状，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马蹄寺现存70余窟，呈平面方形，中有四方塔柱。东窟中有跏趺坐弥勒、交脚弥勒、苦修释迦及侍立菩萨等造像，龛顶有一飞天浮歌，作凌空飞舞之势。这些都是北魏早期作品[73]，也应当与北凉有某种承袭关系。

敦煌莫高窟是敦煌文化的象征，创建于五凉时期。唐代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文称：

>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74]

又唐代《莫高窟记》载：

> 古瓜州东南二十五里，三危山西，秦建元之世，有沙门乐僔，仗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凿岩，大造龕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75]

莫高窟创建的建元二年（366）实是前凉张天锡即位的第四年，亦即东晋废帝司马奕太和元年。因此，莫高窟的创始年代应是前凉后期。

在伯希和劫去的乾祐二年（949）写本《河州图经》残卷中有“永和八年癸丑创建窟”的记载[76]。永和是东晋穆帝司马聃年号，永和八年是公元352年，即张重华永乐七年。这又进一步说明莫高窟初创于前凉时期。张重华时，前凉国力正盛。彼时与西域关系密切，佛教徒西来东往，络绎不绝。敦煌地当东西交汇之处，开窟建寺是完全可能的。

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据调查其中有十六国晚期亦即西凉和北凉石窟7个，北魏石窟18个，北周石窟15个。其余为隋代至元代石窟。至于前凉石窟，今已湮没无存。但五凉石窟多少会对前凉有些承袭，这可进一步研究。

所谓石窟寺艺术，是集建筑、雕塑、绘画诸种佛教艺术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莫高窟中第272、275两窟为北凉时期的石窟，其壁画真实地表现了这一时期古朴典雅和凝重含蓄的艺术风格。

与石窟艺术有联系的是墓室壁画。坐落在酒泉市内的西凉古墓，仿石窟造型。墓室顶部呈穹庐形，四壁及顶部有飞天、射猎、采桑饲蚕、农田劳作等绘画。绘画色彩鲜明，生动形象，将天国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场景融为一体。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河西石窟寺艺术有联系。

二是音乐舞蹈。

五凉时期，西域乐舞传入河西，并经加工改造，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和舞蹈艺术形式，被称为“西凉乐”。“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77]西凉乐源于龟兹乐，又起自前秦末年，当是吕光经营西域时从龟兹带回的“奇伎异戏”中的一种。它将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所用乐器多为琵琶、五弦、箜篌、长笛、铜钹等，舞蹈一般是独舞或四人舞。

除西凉乐外，龟兹乐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吕光以后，龟兹乐先在河西流行，以后传到中原。北朝至隋唐间，在中原风靡一时。所用乐器，除笙箫外，主要是鼓类，有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另有铜钹、贝等辅助乐器，约以十五种乐器合为一部。演奏时音调高亢，节奏明快，气势磅礴雄壮。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儿》，舞曲有《小天》《疏勒盐》等。

西凉乐和龟兹乐各有其用。“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78]“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筫、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鎝，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79]其艺术感染力如此强烈，无怪北齐后主高纬酷爱乐舞，以至将能歌善舞之徒擢为开府、仪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齐梨园也尽意改造，刻意求新，将北歌与西凉乐杂奏，使听者极于哀思，莫不陨涕。

与乐舞有联系的是杂技百戏。吕光在西域时，采其剧目，加上西域诸国向前凉、北凉政权所贡，使杂技百戏在河西广为流行，并与河西民间传统的娱乐活动结合起来。所谓吞刀、吐火等奇伎以后又汇入南北朝艺术丛中，与绳技、缘竿、斤斗、角抵等一同构成多姿多彩的魔术与杂技表演形式。

综上所述，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昌盛和教育的发达，以及学术和艺术的繁荣，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黄河流域处于领先的地位。这决定了当时河西也是中国北方文明发达程度甚高的地区。

第三节 五凉时期河西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逶迤千里。它北控居延，南枕祁连。从公元前1世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开置以来，它就与内地一脉相连。自汉及唐，延及宋、元、明、清，无论操戈戍边的将士，还是搜罗宝货的商贾，亦无论经略封疆的帝王，还是潜心求道的僧俗，当他们将厚重的脚印留在丝绸古道上时，河西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就在此发生。而介于汉唐两个盛朝之间的公元4～5世纪，则有许许多多这种交流的佳话。

公元4～5世纪，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多事之秋。彼时，先后有十六个政权在北方及巴蜀裂土分治。十六国中，有五个建立在河西，它们是汉族张氏的前凉，氐族吕氏的后凉，鲜卑秃发氏的南凉，汉族李氏的西凉，匈奴卢水胡的北凉。这五个政权合称“五凉”。当公元301年前凉建立时，关陇以东的中原大地正经历着严重的战争洗劫，先是西晋王族争夺统治权的“八王之乱”在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发生，使数十万无辜百姓死于兵燹；“八王之乱”的战火未息，匈奴、羯、氐、羌各族又拉开反晋战争的序幕，继而演成所谓的“永嘉之乱”，将晋、冀、豫及关中变成戎马驰骋的疆场。北方各族人民在饱罹战乱苦难之余，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南方及边缘地带流徙。由于河西地处西陲，又有山河关塞之隔，未受到中原战乱的波及，加之张轨建立前凉后，课农桑，兴文教，造成一种安定清平的社会景象。一时之间，“中原避乱来者日月相继”[80]避乱流寓河西的人口中，有西晋亡官失守的官吏，有历尽磨难的平民百姓，更有许多内地的著名学者。而张轨对这些官吏和学者的“礼而用之”，使河西成为荟萃东西人才与文化成果的摇篮。

魏晋时期，士族掌权。在朝的官吏与在野的文士除身份与地域所属不同之外，在学问的根底上，并无多大差别，即他们都属于“士”乃至“名士”之流。前凉初期流寓河西的内地官吏与文士，原本出自不同的学术流派。由于汉魏以后学术的地域化以及家族化，这些来自不同地域，出自不同学术流派及学术世家的学者将他们的学业成果与河西文化联珠合璧，更显璀灿与宏丽。以江氏家族为例，这个家族原籍在陈留，从江琼流寓河西到其孙江强，在河西生活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后才被迁往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江琼原受学于魏晋书法大师卫觊，“善虫篆、诂训”[81]，是书法与古文字学专家。从江琼到江强，“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82]，不仅将他们家族的

所专所长根植于河西沃土，而且利用这块沃土积厚成高，最后又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输回中原。到江强的孙子江式时，北魏已迁都洛阳，江式将这份遗产及其家族在河西保存下来的典籍全部献给朝廷，并且受朝廷之命，为洛阳宫殿诸门题写匾额。五凉时期，像江琼、江强这样在河西业其所学，展其所长的学者还有京兆杜氏杜预之后的杜骥。杜预既是西晋名臣，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人称有“左传癖”。杜骥在河西也有传播家学之功。另外，广平程骏是著名的玄学家，河东裴诜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在河西也各有文化学术方面的建树，这些人在河西入魏后也都重返了中原。

中原学者的学术成果在河西能成郁郁葱葱之势，除社会安定这一条件外，还与五凉的统治者重视人才、提倡学术创造的政策有关。特别是张轨与西凉主李暠，他们都出身于关陇士族，一个是“以经学显”的官僚，另一个是以文学知名的雅士。他们都努力罗致人才，奖掖高才硕学和著述经史，是这种政策造成了各方学者云集的“多士”局面。故不仅中原学者，河西学者也感到生逢其时。河西学者中的郭瑀、刘昞、张湛、阚骃、宗钦、段成根等，他们一个个都各得其所，得展平生。师承东汉著名经学家郭整之学的郭瑀，他出于蓝而胜于蓝，所著《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书重振了河西的儒风，使中原籍的学者深受耳濡目染；郭瑀的弟子刘昞学贯经史，旁通哲学，他写的《三国总略》及《周易注》《人物志注》等都广收时誉。另外，阚骃所著《十三州志》为史乘名篇，他为王朗《易传》所作的注释成为“学者藉以通经”的教科蓝本[83]。其余张湛、宗钦、段成根等，或在经学领域，或在哲学领域，都成就斐然。

五凉时期，河西与中原两大地域的著名学者互传其学，互相切磋和互相褒扬蔚然成风。刘昞注刘劭《人物志》，是跨越时空的学术传播活动。正因有他的注释，才使这部魏晋时期诞生在中原的玄学名篇流传于河西和中原。老一辈史学家陈寅恪评论刘昞这件功劳时说：

> 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国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84]

刘昞是敦煌人，他与广平程骏是学术上的忘年之交。他们之间有关玄学的探讨可算是河西的敦煌学者与河西的中原学者之间进行学术切磋的美谈。程骏提出的是当时学界十分重视的老庄学理问题，他对刘昞谈了自己对此问题的认识，在批评了世人皆视老庄之学虚无荒诞不切实要

的观点后说：

> 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若爽性则冲真丧。[85]

刘昞盛赞程骏的观点，说程骏年稚尚幼，却似老成。此后，程骏的观点和名气在文化学术界远远传扬。刘昞生前曾受到北魏名士和汉族官僚领袖崔浩的推崇；死后，由于他在中原文化学术中的贡献与名气使河西人以他为荣。

在北魏统一北方并迁徙河西豪望名流时，侨寓河西的中原学者与河西本土学者大都迁居平城，中原大地从此激荡起河西文化的波澜。河西学者以其严肃的学术态度为北魏的“文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刘昞的弟子兼助教敦煌索敞，他受魏太武帝之命教授“胄子”。这些出身鲜卑权贵子弟顽劣成性，无志于学，而索敞“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宜。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86]。这等于说这批鲜卑贵族子弟能脱胎换骨成为国之栋梁，原本是河西教育方式渗透的结果。

在公元5世纪初历史进入北方北魏与江南刘宋对峙的南北朝时期后，河西不仅与北方有文化学术上的沟通，就是与道路阻隔的南方也有文化学术上的沟通。北凉主沮渠蒙逊向南北两个政府都表示“通好”，他曾几次派使者到江南向刘宋朝廷贡方物，同时搜求刘宋所藏《周易》及子集诸书。宋司徒王弘还亲手抄一部干宝《搜神记》回赠北凉。沮渠蒙逊的儿子牧犍即位后，又求取晋、赵起居注等“诸杂书数十种”[87]。作为文化交流的回报，牧犍贡献给刘宋王朝的是一大批河西学者所著和北凉政府所藏的图书典籍。这些图书典籍包括了经、史、子、集、天文历算等类共十九部一百五十卷，其中包括刘昞的《三国总略》、阚骃的《十三州志》、谢艾的《谢艾记》以及《文检》《四科传》《古今字》等大量江南所不传的工具书。属天文历算方面的有《周髀》与《皇帝王历三合纪》《赵𢾺传》及《甲寅元历》等。这些书的书目至今大部分仍保留在《隋书·经籍志》中。值得一提的是赵𢾺，他是公元4、5世纪之交在河西土地上孕育出的历算学家，他的杰出贡献是改订了闰周，即将传说中以19年为一章含7个闰年的历法改为以600年为一章含221个闰年的新历。赵𢾺以科学的推算为基础做出的这一改订，对古代历算学的发展意义至为重大，并很快得到应用。南朝祖冲之编《大明历》，就参考赵𢾺的成果并加以改进，提出了在391年中设置144个闰月的新闰法，从而使

传统历法更接近科学，也更符合实际。

河西地接西域，因而4至5世纪河西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还包括对西域文化的传输。但这种传输不是原封照搬，而是融会改造后的推陈出新，如佛教文化及乐舞艺术便是这样。佛教的塔寺和造像传到河西后派生出许多的石窟群。这些石窟群多在4至5世纪出现，敦煌莫高窟是其滥觞。据载，莫高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实际是张天锡四年。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北凉玄始年间（412～428），但早在前凉初期已有京兆人刘弘“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88]。刘弘用燃灯标识正大光明，便是佛教与天梯山石窟结缘之始。另外，诸如张掖的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等，都开凿于北凉时期。至于这些石窟与中原佛教以及大同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之间的渊源关系，史书中记载说：

> 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89]

> 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太延五年即439年），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90]

五凉时期，河西有许多高僧住方。他们对佛教文化的发展与东传起过重大作用。如鸠摩罗什，原是西域人，长在龟兹，七岁出家，多年游学于罽宾（今克什米尔）、月氏（今巴基斯坦境内）、疏勒等地。他精通佛教大、小乘，旁通婆罗门哲学。后凉的建立者吕光在385年把他从龟兹带到武威，一住十八年。401年，又被后秦主姚兴迁到长安。罗什运用在武威期间掌握的汉语知识，在长安带领僧肇、僧督、道生、道融等800多名高僧，花费八年时间，前后译出佛经98部，奠定了汉语翻译佛经的基础。他译的佛经既不佶屈聱牙，又不失“西域趣语”，这与他在河西期间语言文学功底的锤炼有直接关系。而且河西原本也有很多致力于佛经翻译和研究的高僧，罗什在长安的成果也是对河西高僧翻译研究成果的集思广益。据统计，4至5世纪北方著名的译经中心有五处，它们是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河西五居其二。五凉各代都有译经成果，前凉、北凉的成就最大，前凉时期译经4部共6卷，北凉译经82部共311卷。[91]

五凉时期活动于河西的高僧都是佛教东传的文化使者。释惠皎著《高僧传》，收录了魏晋名僧257人，其中光出生在河西的就有36人，而与五凉有关系的计有50人。诸如竺发护、佛图澄、昙无谶、师贤、释

惠高等，多有往来于河西与内地的经历。河西的许多高僧为弘扬佛教，还亲往西域求取佛经，以沮渠京生、道泰、宝云、法盛、僧表为代表。河西还接待过前往西域的中原与南方高僧，以东晋法显、智严、法勇、支法为代表。因此，河西实是中国本土佛学和佛教的早期摇篮。

谈到音乐舞蹈艺术，著名的西凉乐和龟兹乐这两种音乐和舞蹈结合而成的杂伎曲种在北朝和隋唐风靡一时，但起源却在4至5世纪的河西。据《隋书·音乐志》记载，西凉乐是西域乐舞在河西再造和加工后的产物。“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土，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西凉乐多用琵琶、五弦、箜篌、长笛、铜钹等乐器相奏和，舞蹈多为独舞或四人舞。乐舞相配，取其委婉婆娑之妙。相比之下，龟兹乐更多保留了西域特色，乐器以鼓类为主，伴以笙箫、钹、贝等，约以十五种器乐合为一部。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多用龟兹乐。”

西凉乐和龟兹乐之所以能流传于河西而风靡于内地，同样是因为河西保存并向内地输送了一大批艺术人才，这批人被称作“乐工”和“伶人”。“晋永嘉之乱，太常乐工多避地河西”，“（魏）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92]。这批乐工和伶人及他们的后裔或集于五凉的庙堂之上，或散在河西的村坞之间，他们承前启后，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活动，为魏周乐舞的复兴和隋唐艺术的发达树立了功勋。

综上所述，4至5世纪即五凉时期河西与内地之间有着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在分裂割据状态下河西与内地仍然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同样也说明，不同地域文化的彼此汇合，正是我国文化宝库不断丰富的源泉。

第四节 五凉文化的历史影响

五凉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时期，也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同时，它上承秦汉，下启北朝隋唐，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继承和创造的一切历史成果，都对后世带来了重大影响，而文化成果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显明和重要。

在论及隋唐文化及典章制度的渊源时，陈寅恪先生指出：

>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
>
> 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93]

陈先生还指出：

>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94]

五凉文化之所以对魏、齐、周、隋、唐诸代形成重大影响，首先基于北魏。因为北魏在439年占领了河西，全盘继承了五凉时期的文化成果。

五凉的文化成果包括两部分主要内容，一是人才，二是成就。

对于凉州著名的学者和文化人才，北魏政府做了最彻底的接收。灭掉北凉后，魏太武帝迁徙凉州豪右三万余户到平城。豪右中既有北凉王族和官吏，也有河西著姓家族。而河西的文化人大多数都跻身于这两大群体，他们无一例外地被迁徙。其中一部分沦入“凉州杂户”行列，后超脱出来一部分，被太武帝“礼而用之”。如阚骃、刘昞，二人官居乐平王从事中郎之职。其余学者中，宋繇因病到达平城后不久死去；张湛被赐爵南浦男，加宁远将军；索敞被任为中书博士；程骏、宗钦、段成根、阴仲达、赵柔均为著作郎；常爽为宣威将军。

对五凉的文化成果，北魏政府也是兼收并蓄，纳入中原文化宝库。以江氏家族的学术为例，北凉刚亡，江式的祖父江强便向北魏政府“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及书法，亦拜中书博士”[95]。程骏的玄学也随程骏到了平城。另外，官私所修史籍，被作为后来修《十六国春秋》的底本。至如佛教，“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96]。其余如佛教石窟寺艺术、音乐舞蹈艺术也都在北魏那里得到了合理归宿。

五凉文化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施光明先生将其概括为三点，即开启儒风，振兴礼乐，完善官制律令。[97]如果笼统地讲，是五凉文化强化了北魏文化的多元格局；具体地讲，是五凉文化带来了北魏文教和政治的新局面。这里，仅就五凉文化成果对北魏文教和政治的影响做一简要总结。

以对文教的影响而言，首先表现于教育方面。河西学者及其学术填补了北魏教育事业的空白，加快了鲜卑贵族走向汉化的进程。

太武时期，北魏正大规模地进行征伐。是时，“戎车屡驾，不遑休息”[98]。“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99]。灭北凉后，这种状况开始转变。因为河西学者不仅将优良的学风带到平城，也将规范的教育方式方法带到平城。原为刘昞助教的索敞受命教授“胄子”，他“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100]。这等于说是索敞将这批鲜卑贵族的后裔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常爽到平城后在温水岸边设置学馆，招收学生七百余人，并立劝罚之科，严格考课，使“京师学业，翕然复兴”，“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励有方”[101]。常爽还在教授之暇写出《六经略注》，其序言中说：“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102]以此策勉和诱导鲜卑贵族学习汉族文化，并振兴北魏冷落的学风。

为弘扬汉文化和激扬社会风气，河西学者还致力于撰述和整理典籍，特别是有关儒学的典籍。常爽的《六经略注》是一部儒学教科书，他自己也说撰写此书目的是“以训门徒焉”。索敞辑诸书中有关丧服礼仪制度方面的内容，完成《丧服要记》一书，填补了西晋以来“礼典无宗”的空白。

上述事例证明，平凉州后“魏之儒风始振”[103]的结论是确切的。儒风不光指崇尚儒学的风气，而且指文化教育以及文治风气。它的振兴，实际是汉族先进文化对鲜卑落后文化的一种征服，是以文化进步推动北魏国家封建化的一场变革。

以五凉文化对北魏政治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作礼仪，二是规立典章。

北魏由鲜卑贵族建立。鲜卑“肇自幽朔，披发左衽”，无礼乐可言。在入主中原后，面临的局面是“神州芜秽，礼坏乐崩”。[104]这使太武帝等北魏统治者只能按照马上取天下和马上治天下的条件因陋就简面南称尊，“至于经国轨仪，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阙遗”[105]，纵有“典礼之用”，不免“多违旧章”。所幸北魏之短正是五凉所长，“晋永嘉之乱，太常乐工多避地河西；夏克长安，获秦雅乐：故二国有其器服工人”[106]。统一河西后，北魏继承了这份遗产，“魏世祖克统万及姑臧，获雅乐器服工人，并存之”[107]。到孝文帝改革时，依靠李暠之孙李宝的后裔李冲、李韶、李延等。对继承来的礼乐资料进行排列修改，建立了属于北魏的乐仪制度。

律令官制的制定过程也大致相同。孝文帝制定律令，依靠的也是李冲和源贺等河西名族的后裔。到宣武时，修改律令，常爽之孙常景又受命参与，并起了骨干作用。

景讨正科条，商榷古今，甚有伦序，见行于世。今律二十篇是也。[108]

另外，常景还参与制定朝令。史载：

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诏景赴京，还修仪注。……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109]

北魏官制的制定，李冲也起了重要作用：

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110]

之所以这些律令、朝仪、官制的制作过程都有河西士人后裔参与，乃是北魏政府充分考虑到李冲、常景等人的家学功底，也考虑到河西是保存魏晋旧制最多的地方。由河西籍士人参与完成的典制，必然融会了五凉时期的文化成果，是蕴其滥觞、集其大成的历史杰作。所以，陈寅

恪先生举刑律为例，认为北魏刑律“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治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111]。其中“河西因子”占有醒目的位置。

当然，除了文教和政治之外，北魏社会的许多领域都留有五凉文化的深深印记。

总之，五凉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化宝库。在北朝至隋唐时期，它曾闪现过晶莹夺目的光芒，给中国古代文明增辉添彩。诚如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巨大成就给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12]。

[1] 《隋书》卷32《经籍志序》，第906页。

[2] 《晋书》卷94《隐逸·氾腾传》，第2438页。

[3] 《晋书》卷94《隐逸·索袭传》，第2449页。

[4] 《隋书》卷49《牛弘传》，第1299页。

[5] 《三国志》卷13《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魏略》，第420～421页。

[6] 《晋书》卷61《华轶传》，第1671页。

[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第26页。

[8] 《魏书》卷91《江式传》，第1960页。

[9] 《魏书》卷84《常爽传》，第1848页。

[10]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2页。

[1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7页。

[12]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13]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页。

[14]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7页。

[15]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1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引韦宗语，第3151页。

[17] 《三国志》卷13《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魏略》，第421页。

[18]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19] 《晋书》卷61《华轶传》，第1671页。

[20]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

[2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0《前凉录》，第502页。

[22] 《艺文类聚》卷38《礼部上·学校》引《晋诸公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692页。

[23] 《艺文类聚》卷46《职官部二·祭酒》引《齐职仪》，第830页。

[24]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0《前凉录》，第502页。

[25]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6页。

[26]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27]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6《北凉录》，第666页。

[28] 《魏书》卷52《胡叟传》引程伯达语，第1150页。

[29] 《魏书》卷60《程骏传》，第1345页。

[30] 《晋书》卷34《杜预传》，第1032页。

[31] 《宋书》卷65《杜骥传》，第1720~1721页。

[32] 《北史》卷38《裴佗传》，第1383页。

[33]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第3877页。

[34] 《魏书》卷52《宋繇传》，第1153页。

[35] 《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第2453页。

[36]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3146页。

[37]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8页。

[38]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39] 《晋书》卷94《隐逸·郭荷传》，第2454页。

[40] 《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第2454页。

[41] 《魏书》卷52《刘昞传》，第1160页。

[42] 《魏书》卷52《刘昞传》，第1160页。

[43] 《魏书》卷52《刘昞传》，第1160页。

[44] 《魏书》卷52《索敞传》，第1162页。

[45] 《晋书》卷94《隐逸·祈嘉传》，第2456页。

[46] 《晋书》卷94《隐逸·索袭传》，第2448～2449页。

[47] 《晋书》卷95《艺术·索紞传》，第2494～2495页。

[48]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49] 《晋书》卷95《艺术·鸠摩罗什传》，第2500页。

[5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7《北凉录》，第671页。《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十一月条（第3866页）同。

[51] 《魏书》卷52《阚骃传》，第1159页。

[52] 《魏书》卷91《术艺·江式传》，第1964页。

[5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39页。

[54] 《魏书》卷60《程骏传》，第1345页。

[5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39页。

[56]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6《北凉录》，第666页。

[57] 《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第2453页。

[58]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0页。

[59] 《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2页。

[60]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第502页。

[61] 《魏书》卷52《刘昞传》，第1160页。

[62] 张骏的《薤露行》《东门行》二诗可见于中华书局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

[63]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901页。

[64] 《太平御览》卷972《果部九·蒲萄》，中华书局，1960，第4308页。

[65] 《高僧传》卷2《译经中·鸠摩罗什》，第50页。

[66] 《高僧传》卷2《译经中·鸠摩罗什》，第51页。

[67]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68]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69]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另，此段材料系由硕士生张晓连提供。

[70] 据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引《开元译经录》，昙无谶所译佛经刊定为19部13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71] 今甘肃省武威市内有罗什塔，相传为葬罗什舌处。

[72]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30页。

[73] 参见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371～372页。

[74] 转引自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348页。

[75] 转引自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349页。

[76] 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349页。

[77] 《隋书》卷15《音乐志下》，第378页。

[78] 《旧唐书》卷29《音乐志》，中华书局，1975，第1068页。

[79] 《通典》卷142《乐志二》，典738下至典739上。

[80]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页。

[81] 《魏书》卷91《江式传》，第1960页。

[82] 《魏书》卷91《江式传》，第1964页。

[83] 《魏书》卷52《阚骃传》，第1159页。

[8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39页。

[85] 《魏书》卷60《程骏传》，第1345页。

[86] 《魏书》卷52《索敞传》，第1162页。

[87] 《宋书》卷98《氐胡传》，第2416页。

[88]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30页。

[89]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0页。

[90]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91] 参见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92] 《魏书》卷109《乐志》，第2828页。

[9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页。

[9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1页。

[95]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第3878页。

[96]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97] 参见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

[98] 《魏书》卷4《世祖纪上》，第79页。

[99] 《魏书》卷84《常爽传》，第1848页。

[100] 《魏书》卷52《索敞传》，第1162页。《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第3877页）略同。

[101] 《魏书》卷84《常爽传》，第1848页。

[102] 《魏书》卷84《常爽传》，第1848页。

[103]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第3877页。

[104] 《魏书》卷108《礼志一》，第2733页。

[105] 《魏书》卷108《礼志一》，第2733页。

[106] 《资治通鉴》卷137齐武帝永明九年十二月条胡注，第4315页。

[107] 《资治通鉴》卷137齐武帝永明九年十二月条，第4315页。

[108] 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永宁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5页。

[109] 《魏书》卷82《常景传》，第1802～1803页。

[110] 《魏书》卷53《李冲传》，第11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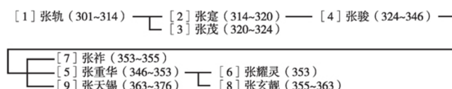
[111]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07页。

[112] 参见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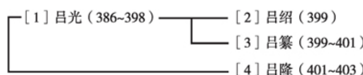
〖附录〗

一 五凉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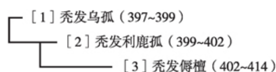
（一）前凉



（二）后凉



（三）南凉



（四）西凉



（五）北凉



二 《五凉史探》再版前言

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历史的一部专著，《五凉史探》献给读者和学界已有些年头。其间，随着相关课题研究工作的推进，书中涉及的一些内容和方面都略显不足。所幸至今尚未见有更系统全面研究同类问题的论著出现，加之一些读者还需要这本书，这就给本书的修订出版提供了机会。

《五凉史探》出版是在1996年6月，出版时获得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学科的经费资助，这次再版又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专门史学科的经费资助。上述两个学科先后荣列甘肃省重点学科名录，获得它们的经费资助是本书的幸运，也是作者的幸运。

这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的成果，集中了作者对西晋十六国历史及北朝历史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与见解。同时，由于第一版付梓草草，校对匆匆，也留下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因此，作者在听到学界一些朋友的佳评之余，也得到他们的指正和建议。新版书有些改动，一是将初版中引用的一些史料另行分段，二是将章后注改为页下注并加上所引文献卷帙，三是对原书中提到但未详论的问题，作《补论篇》补在正文之后。但愿这本书不辜负学界朋友的期望。

这本书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专门史学科编入《西北史研究丛书》中，并与一些杰出中青年学者的有关著述排列在一起。作者对这种厚爱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者

2004年12月

三 《五凉史探》后记

本书虽系雕虫之作，但写作过程中却得到许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杭州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施光明同志对五凉史颇有研究，他是我真挚的朋友。记得数年前在烟台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期间，一次饭后茶余我与他开玩笑说：“足下余杭才子，何至吃我们河西饭？”他答道：“主人不吃，我吃何妨！”意思是“五凉”建在甘肃，甘肃史学家却注意不够。虽然，此话谈过已有十年，但至今记忆犹新。十年中，甘肃学者关于五凉史的研究成果连篇累牍，不一二数。本人也因受到光明同志的启示，开始缱绻于五凉历史，同时产生了写一部研究专著的愿望。后来我与光明同志多次信函往复，请他修订提纲，并谋与他合作。时至今日，合作的事并未能如愿，主要是因为出版经费难筹。当1994年甘肃省教委批准了我的立项申请时，这写书之事只好由我一人来做了。假如没有光明同志的启示和帮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因此，这里我首先要感谢他。

齐陈骏先生是我的老师。先生治学严谨，且诲人不倦，我平日多受指点。他的大作《五凉史略》早已出版，本书效颦，望先生再予赐教。

我也感谢甘肃省教委、西北师大科研处、西北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这些部门都给了我指导和必要的资助。

另外，我名下的几位硕士生，他们在帮助整理资料，订正史实，抄写文稿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费了不少精力。他们是王万盈（已留校任教）、王咏梅、方高峰、张小虎、张晓连、陈英。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95年12月15日

四 《五凉史探》再版后记

在《五凉史探》出版后记中，我已表示过对学界一些朋友的致谢。杭州教育科学研究所施光明先生无论在启示我撰写《五凉史探》方面，还是在提示我对一些有关问题的见解方面，都是我的良师益友。特别是当《五凉史探》出版后，他在《北朝研究》上发表了长达万言的书评。书评在谬奖之余，也使我获得了对一些问题的再认识。此外，我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章义和先生。章先生年富力强，是东南中青年史学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他在《五凉史探》一出版便率先在华师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了书介。我们多次谋面于全国学术会议，他也不止一次地就书中一些问题谈过他的真知灼见，每忆及此，令人感佩。

人不能无为，亦不能无老。老有所为固然可贵，但力不从心却时常有之。这次新版，一些与出版有关的事情都是研究生贾小军、张琳、洪卫中代劳。为此费去了他们大量的时间，特别是贾小军，不仅为本书作序，而且在校对中也花费了大量精力。这里，对几位后生也表示感谢。

作者

2004年12月

索引

A

阿姆河 005

安定 012，013，017，019，029，030，037，050，051，056，057，073，092，101，103，104，110，223，226，244，277，287，289，290～292，294，297，316，318，320，323，324，354，358，359，377，378，381，405，409，414～416，419，421，426～428，456，458

安定郡 019，050

安东将军 076

安故 013，036

安弥 020，138，202，232，417

安西将军 068，136，186，187，192，241，278，279

安夷 020，166，305

媪围水 248，281

B

霸城侯 065，084

白土 020，124

北大河 010

北部都尉 010，316

北地 016，019，030，037～039，144，190，216，269，279，284，287，289，290～292，294，297，305，318，321，406

北地郡 019，290

北地太守 190

北宫伯玉 039

北宫纯 057，065

北魏太武帝 239，241，391

北魏文成帝 290

北匈奴 016，029，035，036，039，271，289，293，320，321，333

比铜钳 288，289，304

边宪 177，180，436

边章 323

表氏 020

别驾 023，024，057，060，071，072，138，177，268，430，431，436

兵曹 023

并州 016，019，064，087，294，321，332，389，402

并州刺史部 019

波水将军 028

帛纯 136，137，383

博士祭酒 071，072，171，413，432

簿曹 023

C

蔡忠 068，081

参军 051，061，065，087，091，097，098，146，174，220，337，353，360

仓慈 017，018，055，197，284，323，324，327，333，337，352，364，365，375，410～412，419

仓松 020，124

曹凤 306，307，406

曹敏 406

曹祛 060，061，069，070，075，419

曹权 105

曹全 405，406

曹述 406

常景 468，469

常山 050，064，106，220，250

常爽 427，433，465，466，467，468

常林 427

长宁 020，069，111，114

长水校尉 140

昌蒲 020

昌松太守 158，170，171，176，181

车济 105

车骑大将军 119，150，166，175

车骑将军 065，157，164，173，241，308

车师前部大帅 254

车伊洛 254，255

陈安 081，083

陈仓 083，123

陈琳 436

陈留 058，427，457

陈寅恪 426，428，443，444，458，459，464，465，469

陈垣 024，350

程骏 433，443，444，457，459，465

成公绪 184，348，387

成七儿 179

成宜侯 234

池头 221

池阳 291

敕勒可汗 251

崇文祭酒 071，072，268，430，431

川西北 005

从事中郎 076，187，200，225，408，437，465

崔浩 240，248，251，401，402，448，459，467

D

大城 021，062，063，074，109，172，174，344，376，445

大且渠 016，303

大司空 028

大司农 184，348，387

大宛 004，005，007，009，135，313，381

大夏 021，074，099，124，195，244，247，376

大夏太守 195

大泽 042，272

道法 450

道龚 450

道进 450

道朗 441，450

道猛 450

道融 462

道生 462

道泰 450，462

道挺 450

邓艾 042，043，045，277，284

邓羌 134

丁绰 290

丁琪 115，117

东莞太守 190

东郡太守 027

东羌校尉 066，068，070，282

东峡 095

单车刺史 023

丹岭 252，277，292

党河 010，199

氐道 036

氐置水 010

刁雍 388，401

叠滕 219

定襄 036，046

狄道 036，088，105，190

董方 135

董广 081

都尉 006，010，019，028，029，035，036，051，113，141，249，292，293，295，296，316，377，406

渎涧 211，237

杜耽 061，434

杜畿 231，391

杜骥 058，433，434，457

杜进 134，135，136，138，141，145，146，220，382

杜陵 058，433

杜恕 231

杜坦 058

杜通 055

杜逸 119

杜预 058，278，279，434，457

段成根 434，442，448，458，465

段龟龙 328，343，447

段业 145，146，165～168，191～194，216，219～224，228，263，267，409，417，428

段懿 177

敦煌 003，004，010，015～020，028，036，055～057，092，095，099，110，113，115，138，141，142，191～201，204，207，210～213，220，224，230，237，238，241～243，252，253，263～266，269，280，284，288，289，315～317，320，321，323，325～328，330，333～335，337，339，344，350，352，354，364，366，369，372，375，379，381，384，385，388，390，405～407，409，410，412～414，424，427，437～441，447，448，451～453，456，459，461，462

敦煌都尉 028

敦煌护军 191，201

敦煌郡 003，019，020，197，207，326，334，335，350，366，375，381，438

敦煌太守 017，057，92，138，142，191，192，201，207，

212，220，237，241～243，252，284，323，352，364，407，409，440

东山 072，253，281，438

董琬 393，394，399

顿丘 064

窦宾 272

窦苟 165

窦固 036，040，290，293，321

窦融 025，027～032，036，048，052，087，089，198，199，218，239，258，263，288，292，293，295，303，308，312，317～319，324，336，352，374，375，415～418，420

窦涛 081，088

窦滔 448

窦宪 270

F

法成 450

法泉 450

法盛 450，462

法显 450，462

法勇 450，462

法众 450

番禾 020，150，152，154，178，184，185，306，384，387

氾称 209，210，378，405

氾德瑜 195，408

氾固 327，412

氾俊 254

氾胜 057

氾腾 057，354，369，412，425

氾祎 085，093，372

氾瑗 056，057，069，195，348，416

氾衷 409

樊尼 187，188，261，262，308，309

枋头 132，133

房晷 150，219，224，230

奉车都尉 036

奋威将军 105

纷阤 162，163

封煎 034

封沓 252

封尚 068

冯弘 244，396

冯忠 059

佛图澄 450，462

佛陀耶舍 450

枹罕 013，021，074，088，106，115，124～217，376

福禄 020，070，075，301

扶风 027，037，123，259，280，405，415

扶风内史 123

抚军从事中郎 187

抚戎将军 080

浮陀跋摩 450，451

苻昌 261

苻重 134

苻崇 139

苻登 139

苻宏 137

苻坚 123～126，128，132～135，137，139，140，143，144，147，150，204，216，266，334，340，354，369，381，427，434，440，448

苻洛 134，138

苻丕 139

苻双 134

傅祗 065

傅玄 042，043，045，046

傅颖 094

驸马都尉 036

辅国司马 179

G

干宝 053，240，442，460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 004

甘松 089，090，377，387

高昌太守 138，229

高道让 447

高明 393

高平川 047，179，244

高纬 455

盖吴 290

盖臧城 016

耿秉 036，321

耿访 095，096

耿夔 270

耿忠 036

功曹 023，062，197，406，407

功曹从事 023

弓马从事 023

公孙述 030，031

苟苌 126～128

苟兴 134

古弼 240，247，401

古浪 004，093，141，178，181

谷水 010

顾炎武 024

关东 002，009，012，013，024，028，064，132，137，144，313～317，325，368

关西 024，034，039，301，313

关中 002，007，011，012，051，058，066，076，087，094，115，122，128，132，133，137，144，145，239，244，278，316，325，331，356，371，415，456

姑臧 016，020，021，062～064，069，070，074，080，086，090，093，096，101，109，116～120，123，127，128，138～141，148～150，153，155～159，165～167，170～184，186，202，205，209，213，217，220，224，225，229，231，232，234，237，238，240，243，245～252，262，264，265，306，308，309，320，326，327，330，334，336，338，340，344，353，356，372，373，376，379，382，383，387，395，401，402，416，418，419，435，436，441，451，462，468

姑臧城 016，063，064，070，101，109，117，128，141，156，165，175，181，183，224，234，243，248，250，309，326，401，402，419

贯兴 066，070

毌丘兴 055

冠军大将军 122，163

冠军将军 089，192，212

关尚 174

广昌 021，074，376

广武 099，105，141，150，154，163～166，173，195，234，308，408

广武太守 195，234，408

广至 020

光禄 050，065，129

妫水 005

郭抱 135

郭奋 166

郭敷 065

郭荷 072，434，437，438

郭黄 166

郭黁 142，143，147，153，165，190，191，204，384

郭谦 191，408

郭钦 032，284

郭韶 166

郭文 142

郭倖 165，166

郭瑀 141，142，200，337，412～414，437，438，442，458

郭越 186

郭整 437，458

国子祭酒 071，072，101，431，432

H

汉景帝 036

汉高祖 205

汉文帝 005，132

汉武帝 002，004，007，008，011～013，018，019，025，032，197，262，289，292～296，299，302，312，313，360，364，366，367，369，373，389，393，424，430

汉阳郡 019

汉宣帝 014，033，034，036，037，317

汉昭帝 013，168

汉族文化圈 002，099，269，424，429

韩博 126

韩疋 166

韩璞 080，081，083，088，089，336

韩遂 039，323

韩信 105，157

韩稚 068，069

罕唐 021，074，376

浩亹 014，020，033，069，167，210，211，237，281，305，317

和苞 081

和昊 117

河北 002，011，028，053，186，426

河东 011，038，040，065，275，281，289，300，301，391，434，457

河东太守 391

河湟 005，013，259，304，307，327，408

河南 013，028，050，088～090，105，106，125，132，144，166，317

河内 013，038，064，427

河套 002，009，328

河西 002～019，021，024～030，032，033，035，036，038～044，046～048，051，052，054～058，060～063，067，068，070～075，082，084，089，090，092，093，095，096，098，100，102，104，107，109，110，114，117，118，123，126，127，129，135，138～150，152，156，157，162～166，172，173，175，181，196，198，199，204，205，207，210，217，223～225，231～235，238，239，241～250，254，255，258～283，285～287，289，291～296，298～302，304～309，312～338，340～346，348，350～360，362～370，372～377，379～392，394～398，400～402，404～407，409～421，424，426～428，430，431，433，434，436，438，440～445，448～452，454～469，474

河西经济区 002，003，005，007，013，014，016～018，312，314，315，317，318，320～322，324，325，327，329，330，331，333～335，344，348，385，391，424

河西王右相 241

河西鲜卑 041，043，044，047，051，062，141～143，149，162～165，248，262，270～273，276～279，281，282，286，298，305～309，328，333～335，342，343

河西鲜卑大都统 163

河西走廊 004～010，012～014，039～041，063，234，238，292，293，313，314，358，362，364，366～370，372～374，385，387，390，397，398，401，402，424，440，455

河州刺史 115，138，221，252

和鸾 040

纥勃 188，308

纥升盖可汗 342，390

赫连勃勃 179，181，244

赫连定 244

赫连昌 244，396

贺多罗 245

黑河 010，040，292，294，297，301

弘农 011，019，135

洪池岭 063，127，164，184，185

候和 089

黄斌 091，092

浑屯 165

桓温 115，122，123，126

湟河太守 143，165，186，229，234，235

湟水 014，033，037，238，261，281，288，299，302，317，328，387，389

湟源 014，304，306

湟中 013，014，039，069，070，089，139，143，149，156，

163～165，184，188，224，234，235，287～292，294，297～299，301，302，304，305，307，317，387，388

湟中羌 014，039，301，302，305

黄华 040，055

黄巾起义 039，323

黄迅 238

皇甫隆 017，323，337

皇甫谧 050，051，359，428

皇甫嵩 050

呼蚕水 010

呼揭 006

胡汉分治 025，169

胡吉轲罗 280

胡烈 047，062，277，278，305，359

胡瑁 069

胡三省 058，077，143，180，184，202，297，434

胡崧 077

胡威 175，436

胡宣 105

呼韩邪单于 035

护羌校尉 013，025，027，041，045，050，055，059，075，076，085，101，128，138，194，207，260，282，283，299，319，415

护乌桓校尉 036

护西胡校尉尉 192

桓温 115，122，123，126

淮南 014，052，073，074

慧嵩 441，450

会水 010，020，316

霍光 168

霍去病 009，296，299，313，368

J

籍端水 010

汲郡 064

祭酒文学从事 023

冀城 083，088

冀州刺史部 019

纪勃 186

嘉泉 093，372

贾龛 060

贾陵 095，096

贾南风 052，331

贾摹 071，083，419

贾虔 135

贾骞 080

贾疋 066，290，291，331

建康太守 219，220

建威将军 079，196，405

建武亭侯 075

谏议大夫 406

江琼 058，427，433，457

江统 046，284，285

江式 427，442，443，457，465

姜飞 134，138

姜纪 155，157，173

浇河 044，165，166，259，271，306，307

浇河太守 165

交趾刺史部 019

焦辨 150，155

焦朗 152，155～157，184，234

焦嵩 081，083

焦嵩 157

焦松 141

校书祭酒 446

诘汾 042，272，273

金城 009，014～017，019，020，028，035，037，039～041，046，055，056，059，062，069，080，081，088，089，099，104，105，124，127，140，146，147，164，168，195，197，217，259，265，275，277～280，284，286，289，299～301，305，313，317，319，321～323，328，329，336，341，353，406，407，436

金城郡 014，015，017，019，020，055，217，299，317，319，322

金城令 105

金城太守 028，041，069，081，088，105，140，147，197，284，286，407

金日磾 168

金山 047，176，218，235，236，264，277，305

金石生 166

金树 166

金紫光禄大夫 129

京房 231

晋昌郡 021

晋昌太守 138，194，220，221，238

晋成帝 086，088，089，096，097，100，103

晋恭帝 210，236

晋惠帝 020，050，052，068，073，294，331，332，359，388

晋怀帝 064，065，067，073，075，094，344，359

晋愍帝 054，066，067，074～077，080，085，093，371

晋武帝 043，047，052，066，085，277，278，280，281，285，359

晋兴 021，074，099，122，168，376，408

晋兴郡 021，074，376

敬归 182，184

经学博士 024

景保 183

荆州刺史部 019

鸠摩罗什 137，440，441，449～451，461

酒泉 002～004，006，010，013～015，017，019～021，028，034，036，038，040，055，060，070，099，100，118，138，139，141，142，194，197，201～206，208，210，211，212，219，221，225，226，228，232，233，235～237，241，246，252，253，264，265，275，288～290，293，299～301，315～317，321，323，325，328，337，339，343，354，366，368，372，373，385，407，413，418，435，438，439，452，454，456

酒泉都尉 028

酒泉郡 002，003，010，019，020，038，221，226，316，343，366，368

酒泉太守 028，060，070，100，118，139，197，212，219，221，241，252，407，435

沮渠德政 212

沮渠董来 250

沮渠罗仇 146，223

沮渠孔笃 231

沮渠广宗 208，236

沮渠京声 450

沮渠蒙逊 027，143，149，158，165，172，173，178，182～184，186，191，198，202，203，205，208，210～213，216，218～231，233～242，245，249，250，251，261，263，264，287，292，293，296，297，300，302～304，307，308，325，337～339，343，344，354，370，372～374，387，396，397，411，416～419，429，432，435～437，441，444，445，447，450，454，460，463

沮渠男成 143，194，218，219，221，223

沮渠亲信 231

沮渠麴粥 146，223，411

沮渠挐 184，225，226

沮渠唐儿 242，252，253

沮渠万年 252

沮渠无讳 213，254，255，334

沮渠兴国 242，337

沮渠正德 242

居延 011，019，020，029，030，036，040，148，292，294～296，313，317，321，368，390，455

俱延 158，168，183，186，226

句呼勒 228

钜鹿太守 028

军谘祭酒

郡丞 024

郡尉 024

郡主簿 024

K

阚伯周 255

阚爽 253，254

阚驷 269，434，442，446，458，460，465

康妙 126

康盛 134

轲成泥 278，281，305

孔恂 285

孔遮 226

会稽 021，128，204，385

昆莫 005

昆阳 028

昆邪王 003，009，314

L

来苗 036

兰池 020，077

兰池长 077

郎中 013，017，057，090，100，115，171，322，435，440，444

郎中令 013，017

老上单于 006，007，313

乐涫 020，201，219

垒澄 219

李柏 091，098，356

李宝 213，238，253，448，468

李辩 126，127

李昶 190，429

李纯 124，138

李冲 213，468，469

李典 225

李翻 212，213

李密 212

李暠 027，173，190～195，197～207，211，213，221，224，227，228，232，233，236，253，260，325，334，349，354，370，384，385，387，409，411，413，414，416～418，428，429，432，435～437，449，458，468

李亮 212

李让 194，201

李柔 190

李顺 240，241，243，247，248，401，441

李特 286

李息 013

李熹 045，046

李憙 282，283

李隰 141

李歆 194，206～213，233，236，237，264，378，405，411，418，435

李贤 261，288，290

李恂 212，213，237

李雄 067，086，094，095，097

李俨 118，122，123，124，125

李焉 134

李弇 190

李姚 212

李雍 190

李预 212

李竹明 358

力微 042，043，046，272，274

骊靬 020，117

理曹郎中 090

廉川 163～165，167

廉岐 124，125

敛成 181

梁昶 166

梁澄 056

梁斐 308

梁饥 165

梁济 127

梁景 110，125，409

梁平老 132

梁统 028

梁熙 126，127，135，138，140，176，209，216，381，416，448

梁裒 179

梁殊 123，126，127

梁崧 177

梁弋 260

梁胤 138

梁中庸 198，221，223，224，228

凉州刺史 017，019～021，024，025，027，041，045，047，050，055，056，060，063，067，075，077，098，128，135，138，157，174，175，212，241，242，254，268，277，281～283，305，306，323，324，333，343，352，353，356，359，364，365，370，381，407，436

凉州刺史部 019，024，025，063，370

蓼泉 208，212，236，237

临池太守 221

临津 021，074，376

临羌 014，020，033，288，289，304，317

临松 183，216，226，231，252，261，262，287，292～294，297，302，303，309，334，452

临洮 036，088，124，141，190，217

临泽 020，208，236，237

临鄣 021，074，376

领军将军 076，120

令狐称 196，405

令狐炽 212

令狐丰 056

令狐赫 195，408

令狐浏 057，069

令狐迈 196，405

令狐敏 196，406

令狐迁 408

令狐亚 057，060，062，069，196，406，413，416

令狐溢 195，408

令狐馨 406

令狐虬 406

令狐整 406，407

令居 010，013，014，089，206，299～301，314，315，317，

389，418

刘霸 105，115

刘昞 199～201，269，327，412，414，427，433，434，436～439，442～445，447，449，458～460，465，466

刘超 289，290

刘聪 064，065

刘弘 070，452，461

刘钧 030，031

刘琨 064，332

刘庆 446，447

刘劭 443，458

刘肃 110，121，122，125，409

刘熙 103

刘祥 239

刘秀 030，031，197

刘玄德 205

刘裕 210，239，244

刘曜 065，067，076～084，086～090，331，333，363，369

刘义隆 240，242，246，254

刘胤 088，089，336

刘渊 064，285

刘元海 064

陇右 019，046，065，067～069，079～082，094，118，122～125，134，139，150，156，166，244，279，292，294，333，369，389，428

陇西 002，013，014，017，019，029，030，036～039，041，043，044，067，068，080，083，084，086，089，095，100，104，115，118，125，135，137，139，146，156，168，190，192，193，260，277，278，302，313，317，322，356，371，405，415，428

陇西郡 019，036

陇西塞 036

陇西太守 017，037，068，322

龙勒 020

楼兰 006

鲁连 062，416

鲁肃 205

陆机 436

鹿嵩 166

洛肱 188，309

洛阳 030，031，035，050，052，056，058，064，065，075，087，134，196，278，282，285，318，321，326，329，331，344，359，363，374，397～400，411，426，430，451，456，457，461，462，468

吕宝 145，146，151

吕超 145，147，152，154～159，436

吕光 021，132，133，134～150，152～154，156，159，162～

165，167，170，176，191，199，209，216～220，222，223，225，234，260，263，267，301，307，327，336，370，382，383，416，417，429，433，440，441，448，449，454，455，462，463

吕弘 145，147，150，151，153，154，220

吕方 145

吕隆 145，149，151～153，155～159，167，171，172，224～227，232，263，338，340，382

吕蒙 105

吕婆楼 132

吕绍 145，147，149，150，152～155，414

吕思勉 042，270，273

吕他 145，155

吕纬 145，155

吕文和 132

吕延 145，146，217

吕纂 109，145，147，149～156，167，170，218，221，371，414

律令史 023

M

马鲂 065，066，102

马辅 177

马基 118

马岌 100，115，435，448

马建 127

马隆 062，259，277，281，282，343

马谟 085

马权 221

马腾 039，323

马诜 103，104

马贤 059

马循 280

马援 017，037，322

麦田 044，182，183，259，270，271，307

曼柏 035

毛难 123

毛盛 126

茂陵 029

美稷 035

美阳令

麦田

门下校书郎 239

孟畅 061，062

孟恺 185，187，339

孟敏 191，220

孟毅 103

孟祎 158，170，171，176～178，182

孟云 016

弥寘 135

秘书监 073

灭寇将军 080

民勤 010

岷江 005，095

冥安 020

缪世征 073

牧府相司马 105

牧府右司马 195，408

牧府长史 225

牧府左长史 195，408

木骨闾 274

慕容超 261

慕容冲 137

慕容垂 137，139

慕容德 261

慕容暐 134

慕容筑 157

N

南道八国 015，315

南羌 009，147，165，169，182，204，259，260，306，314

南秦州刺史 138

南匈奴 016，035，036，321

宁远将军 195，201，408，465

牛霸 118，123

女几山 051

P

潘岳 436

庞参 059，322

裴苞 066，069，070，419

裴恒 105

裴敏 152，177

裴頠 053，432

裴诜 433，434，457

彭和正 440

彭晃 134，138，141

彭济 138，140

彭敏 177

彭奚念 147

彭姚 118

匹孤 041，042，044，162，270，271，273，275

骠骑大将军 066，166

骠骑将军 164，299

平狄 021，074，376

平阳 064~066，080，081，094

平西将军 076，165，241，249，255

冯翊太守 058

婆衍岭 173

破羌 036，069，262，322

Q

骑都尉 035，036，051

祁连都尉 141

祁连山 006，010，033，063，141，208，292，296~299，313，317，328，343，373，388

祈嘉 434，439，440

齐肃 141

乞伏炽磐 169，173，180，186~188，229，235，309，341，342，379

乞伏暮末 344

乞伏乾归 139，146，147，167~169，173，185，217，260，341

乞文泥 280

牵弘 047，062，277，279，359

牵屯 044，259，271，307，388，401

前锋督护 066，080

前军将军 181

羌道 036

羌谷水 010

羌中 029，034，039，261，262，306

乾齐 020

强弩将军 027

强汪 132

漒川 089，377，387

羌族 005，007，034，057，139，258～261，269，271，276，286，289，293，294，298～307，319，343

桥赞 095

秦厉公 301

秦陇 006，058，083，097，156，177，206，282，392，396，420

秦彭 035，036

秦州 019，046，047，060，066，068，070，076，088，107，115，123，134，138，184，252，277，278，305，336，359，419，448

秦州刺史 047，060，066，068，070，076，107，115，123，

134，138，184，252，277，278，305，359，448

青州刺史部 019

轻车将军 081

龟兹 099，136，137，220，249，366，371，382，383，393，394，440，441，454，455，461～463

仇池 083，094，124，145，154，245

屈右 185

麴丞明 166

麴恪 070

麴护 097

麴佩 061

麴儒 069，070

麴演 040，055

麴允 066，076，329，341，404，410，412

R

染干 185，234

穰苴 105

任处 072，101，431

忍 005，122，142，143，151，155，182，200，221，241，301

日勒 020，233

月氏 004～006，034，259，296，298，299～301，303，304，312，319，365，398，462

汝南 014，278

儒林祭酒 071，200，413，426，430，437

若厚坞 234，237

若凉 234

若罗拔能 062，282

S

三辅 011，017，019，025，029，322

三河太守 146，217

散骑常侍 051，076，128，136，147，174，242，254

散骑侍郎 076，188，393

僧督 462

僧来 450

僧朗 450

僧涉 450

僧印 450

僧肇 449，450，462

僧遵 450

沙井文化 004

沙头 020，021

沙州刺史 191，308

删丹 020，235，236

单道开 450

鄯善 099，135，226，238，253，371，393，394，397，399

善无 251

骟马类型文化 004

上郡 002，009，014，016，030，037，133，249，290，314，318，368

尚书 060，075，115，118，145～147，150，172，174，175，180，221，230，239，240，245，267，278，344，433，435，436，439，443，459，466，467

尚书侍郎 060

尚书左丞 221，230

尚书左仆射 145，147，267，467

舍人 051，100，198，238

沈猛 107

盛乐 046

申屠英 175

师贤 450，462

施光明 466，469，474，475

释法进 254，450

释法颖 450

释弘充 450

释惠高 450，462

释慧皎 450

释僧侯 450

释玄畅 450

释玄高 450

史苞 028，029，374

史暠 171，176，267，268，429，432

史景 127

史难 157

史淑 078，080，085，086

石苞 347，348

石聪 145

石虎 087，097，103，104，106，132

石鉴 278，279

石勒 064，083，088，094，096，097，363，364，372，374

石驴山 184

石门 089，377

石璞 103，104

石生 103，166

石羊河 010

石亦干 163

石元良 145

石真若留 163

时连珍 166

市长 092，220，356

侍中 060，067，076，077，087，103，132，139，150，213，219，240

湿罗 044，259，271，307

库钧 028，029，374

寿阗 044，047，271，272，273，274，275，276，277

属国都尉 019，028，249，292，293，295，296

树机能 044，047，051，062，141，162，163，259，276，277～282，285，286，305

疏勒河 010

书佐 023

朔方 002，009，010，014，019，104，313～315，368，389

朔方刺史部 019

丝绸之路 014，017，315，317，396，397，399，424

司兵 024，115

司仓 024

司法 024

司户 024

司监 021，074，376

司马 007，023～025，027，028，042，051～053，056，057，060，062，066～069，076～078，080～083，093，096，097，105，120，126，128，150，163，165，171，180，194，195，

198，210，222，224，277，278，280～285，315，331，333，354，359，361，371，408，417，426，431，446，453，467

司马保 068，076，080，081，082，083，333

司马德文 210

司马骏 051，280

司马亮 278

司马伦 053，331

司马模 060，417

司马睿 067，068，077，078，081～093，371

司马师 042

司马玮 052

司马相如 007，315

司马炎 277，359

司马衍 096，097

司马邺 066，069

司马奕 453

司马遹 051

司马允 052

司土 024

司徒 147，240，251，347，440，442，460

司隶部 023

司隶校尉 019，023，132，182，184，279

祠部郎中 171

思盘 155，229

宋澄 057，116，119～121

宋承 212，213，237

宋皓 139

宋混 057，116，117，119，120，122，414

宋辑 081，086，088，093

宋矩 057

宋泮 139

宋配 056，057，062，066，069，070，120，191，195，278，282，348，416，436

宋纤 057，413，434，435，445，448

宋钦 448

宋生 142

宋文帝 058，059，240，242～244，246～249，253，254，265，266，329，342，389，390，396，402，434，442，465～467

宋武帝 210，211，237，264

宋孝武帝 255

宋繇 120，190～195，198，200，201，206，208，210，211，240，241，387，408，413，417，418，427，434～436，465

宋毅 081

宋钟 181

苏霸 166，181

苏蕙 448

苏武 229

苏愉 047，277，305

苏则 017，041，055，284，323

遂兴 021，074，376

孙伯符 168，205

索承明 195，197，408

索敞 434，439，459，465，466，467

索慈 195，197，408

索孚 113，116，326，337，338，377，417

索辅 353～355，357，360～362，364，370，417

索靖 404，409，453

索琳 076

索术 195，408

索商 446

索嗣 192～194，197，212，221，409

索绥 438，446

索袭 195，413，425，434，436，440

索嘏 142，327，337，412

索仙 195，197，208，408

索询 090

索训 195，408

索元绪 212

索𬘘 195，413，440

T

蹋顿 046

太常 011，058，065，142，427，434，463，468

太傅 051，052，435

太府参军 353，360

太府司马 080

太府主簿 066，102，195，196，408

太官令 050，358

太史令 183，191，232，236

太尉 050，059，067，076，101，132，147，186，239

昙霍 450

昙无谶 441，450，451，462

昙学 450

昙曜 450

昙纂 450

檀石槐 042，271

檀柘 300，301

谭详 092，110

唐契 213，238，253，254

唐瑶 194，221，408

唐长孺 289，357，391

汤球 027，044，048，050，056，062，070，072，075～077，079，081，082，088，089，091～094，097～099，102，105，106，108，111，113，114，116，117，119～121，126，132，133，137，145，147，149，152，166，169，175，181，183，186～188，190，196，199～201，203，208，209，213，216～220，223，226，233，236～238，241～243，254，264，276，277，285，292，327，329，339，342，345，354，355，359，366，372，373，379，383，388，409，411～413，416，419，420，431，432，442，445，446

天水 013，014，036，037，068，140，190，195，211，244，277

天水太守 068，190

天祝 004

田昂 224

田齐 080

田旋 118

田玄冲 171，432

田玄明 165

僮仆都尉 006

统万城 244

秃发保周 250

秃发利鹿孤 044，151，156，157，167～173，183，225，

267，268，307，325，383，384，409，432，436

秃发傉檀 044，158，172～188，202，203，205，232～235，248，262，268，272，306～309，326，338，339，341，342，384，387，417，418，429，436，437

秃发思复鞬 141

秃发乌孤 041，044，047，143，149，162～164，166，167，191，224，259，263，267，271，272，277，305～307，353，365，370，408，416，429

吐雷 169

吐谷浑 184，186，244，252，253，275，390

拓跋赤坚 250

拓跋崇 249

拓跋晃 249

拓跋稽敬 249

拓跋健 249，250，252

拓跋焘 239，241，244，391

W

万斛堆 047，277，278，305

万岁 020，118，226

王德 220，221

王娥 181

王该 068，077，095

王弘 240，442，460

王俊 027

王朗 426，430，442，458

王鸾 116，117

王莽 012，027，028，034，037，196，318，319，329，351，360，361，363，367，369，405

王猛 123，125，132～134，143

王弥 064，065，135

王穆 140～142

王乞基 142，165，166

王融 061，062

王尚 174，175，177，436

王腾 087

王统 126，127，138

王详 142，145，153，219，267

王邑 028

王稚 165

王鸷 087

王钟 181

王忠 166

王擢 104～107，115，118，123

隗瑾 078，079

隗嚣 030，031，303

尉髦 061

魏安 141，152，155，157

魏明帝 017，055，063，352，353，361，375

魏收 002，273，391

魏文帝 019，294，361

魏延 105

魏益多 155，156

尉拨 290

尉缉 111，114

尉佗 030，031

尉祐 140，147

卫翰 138

卫将军 051，118，127，134，184，190，192，208，217，408

卫綝 118

卫尉 185

卫殷 166

卫章 186

尉肃 187

威远将军 081，195，408

韦宗 180，181，268，429

文俶 280

文穆 036

文学祭酒 071

文支 175，182，186，226，234，235

温宜 208

渥洼水 007

舞 005，301，302

吴咏 059

乌地延 379

乌桓 034，035，036

乌氏县 050

乌孙 004～006，034，312，393

乌支 021，074，376

戊己校尉 019，020，091，098，099，280，284，356，377

无弋爰剑 301

屋兰 020，254

五官中郎将 100

五将山 137

五屯护军 089，105，377，387

五原 035

武都郡 019

武猛从事 023

武威 003，009，010，014～017，019，020，027，035，036，040，055，056，061，063，066，088，099，124，135，138，145，151，157，158，166，168，175，177，178，183，184，195，204，234，240，265，266，275，277，278，280，281，289，294，300，306，314，320，322，323，325～328，333，334，337，339，343，344，353，354，358，360，366，373，376，377，384～387，389，406，408，415，451，452，456，461，462

武威公主 240，266

武威郡 003，014，015，019，020，063，157，320，334，343，366

武威太守 016，027，035，055，061，066，088，138，145，157，195，320，322，408，415

武卫 089，134，190，208，377，408

武卫将军 134，190，208，408

武兴 021，074，088，099，169，178，183，195，204，306，376，384，385，408

武兴郡 021，074，376

武兴太守 088，408

X

西都 020

西海 020，079，099，138，148，165，235，265，306，308，343，448

西海郡 020，148，448

西海太守 079

西河 002，006，009，010，033，035，037，038，040，062，

133，148，243，254，275，289，299～301，314，315，368，447

西郡 016，019，020，036，099，139，179，195，198，220，224，228，229，233，408

西郡太守 139，195，198，224，408

西门豹 092

西平 020，021，040，055，057，060，065，067，069，074～076，085，090，098，099，101，118，124，127，128，143，164～166，168，172，178，183，184，186～188，190，195，209，217，218，223，224，235，238，265，278，281，288，303～306，341，376，383，386～388，408，419

西平郡 020，065，067，075，090，118，128，288

西平太守 057，060，143，195，217，281，408

西平相 098，127

西强山 090

西域 004，006～009，014～017，019，020，033～036，039，040，045，070，090，091，098，099，105，127，132，134～139，144，147，148，196，207，220，238，240，241，246，252～255，265，270，274，284，289，292，297，313～316，318，321，323，329，330，336，341，351，352～356，364～367，369，371，372，379，381～384，386，387，391～400，405，407，412，416，419，424，440，441，450～455，461～463

西域校尉 105，136

西域长史 091，098，356

西中郎将 075

奚斤 244，247，401

奚眷 252，253

先零羌 013，033，035，037，039，302，306

仙提 020

显美 020，170，183，233，294，383

襄武 021，074，376

效谷 020，191，192，196，405

效谷令 192

孝经师 023

骁烈将军 127

骁骑将军 075，116

谢艾 104～107，117，122，341，441，442，460

谢正礼 224

骍马 020，142，195，408

辛晁 177

辛机 055

辛韬 081

辛肜 028，374

辛攀 067

辛岩 088，336

辛晏 088，089

新城太守 212

新丰 028，076

新疆 014，036，098，099，114，213，238，246，253，255，280，377

新平 137

新乡 020，021

新郪 021，074，376

骍马护军 195，408

兴平公主 240

休密驮 135

休屠王 003，009，063，314，366

匈奴 003～010，013，014，016，029，032～036，039，040，042，044～047，063，064，073，103，127，139，143，166，175，216，239，242，254，258～263，265，266，269～272，274～276，285～287，289，291～296，298～300，302～304，306，312～314，318，320，321，328，333，359，366～368，370，372，389，426，429，456

许昌 064

徐干 436

徐灵 141

徐邈 017，041，055，056，063，087，102，306，323，333，343，352，353，364，365，369

徐自为 013

徐州刺史部 019

薛翘 166

宣帝 013，014，033～037，316，317

宣威 020，465

Y

牙门将 081

严纯 141

延寿 020，226

晏然 021，029，074，157，318，376

阎沙 070，076，083

阎曾 102

阎负 123，126，127

阎松 157

颜俊 040

兖州刺史部 019

阳成远 059，062

阳关 020，034，098，099，198，317，325，326，387

杨璧 138

杨初 094

杨次 082，083

杨澹 060

杨翰 138

杨轨 142，165，166

杨桓 147，150，155，156，171，172

杨骏 051，053

杨珧 051，053，285

杨欣 056，277，281，286

杨胤 068

杨颖 135，151，157

杨遹 124，125

杨统 166，167，229，233

杨贞 166

扬烈将军 088

扬武将军 195，408

扬州刺史 019，023，047

扬州刺史部 019

姚艾 230

姚弼 159，181

姚苌 125，126，127，137，139，172

姚定国 249

姚皓 138，140，416

姚静 138

姚硕德 152，155～157，168，173，224，225

姚兴 139，156～159，168，171，172，174，175，177，178，180，181，202，225，232，263，308，428，436，441，451，462

叶县 028

宜禾 020，036，113，194，316

伊健妓妾 040，294

伊犁河 005

伊力延 181，185

伊力延侯 181

伊莫訾王 016

伊吾 020，036，138，213，238，253，321，377

伊吾卢 036

揖次 020，093

乙弗 041，163，165，169，183，186，187，235，270，276，340，342，379，390

易揣 116

意云 041，270，276

宜阳 050，061

宜禾都尉 036，113，316

议郎 056，075

义渠安国 035

益州刺史 019，238

益州刺史部 019

阴充 056，057，076，348，416

阴据 092，126

阴澹 056，057，195，348，416，440

阴利鹿 188

阴亮 195，408

阴平 046，277

阴濬 065

阴训 166

阴预 070，080

阴仲达 434，465

尹建兴 194，195，408

尹景 140，416

尹璩 056

尹太后 208，210，264

尹文 150，203

尹员 069

鹰扬将军 133，134

雍州 019，046，055，066，069，076，105，290，291，331，405

幽州刺史部 019

右将军 120，201，212

右司马 120，195，224，408

右长史 072，093，101，195，224，229，408，431

虞诩 017，024～027，322，323

输勿崘 169，170，383

玉门 004，020，099，136，138，148，198，213，317，326，387，399

榆中 020，173

宇文护 407

羽林右监 212

渔泽都尉 010，316

豫州刺史 019，134

豫州刺史部 019

爰瑜 060

元洁 252

元孟 099

源贺 042，248~250，272，309，405，468

月令师 023

允街 020，037

永昌 004，127，152，154，158，178，218，233，249，252，294

永固 021，074，177，376

永平 020，035，036，320，321

右卫将军 184，192

右校尉 270

乐毅 105

苑川 173

袁宏 293

Z

臧莫孩 220，221，223，224

臧子原 197，407

贼曹佐 078

翟义 028

鹳阴口 294

张冰 077

张斌 434，449

张昶 166，177

张淳 094～096

张冲 105，412

张稠 165

张春 082，083

张大豫 129，140～142，337，412

张耽 105

张芳 115

张耳 050

张琠 061，062，066，411，416

张辅 068

张伏都 104，105

张构 308

张瓘 057，100，104，115～121，123，414，419

张轨 021，025，027，048，050～054，056～077，098，100～102，108～110，114，140，190，192，196，260，266，268，278，282，286，324～327，329，333～336，344～350，352～367，369，370，373～377，388，406～410，412，413，415～419，421，426～434，436，438，440，456，458，461

张斐 065

张弘 107，212，237

张华 051，053，428

张奂 196，197，407

张谡 195，408

张既 017，040，262，294，323

张济 141

张靖 195，408

张捷 142

张琚 116，117

张骏 021，063，064，072，084～105，108～111，113，114，116，122，176，206，325，326，334，336～339，344，356，371，372，377～380，417，431，432，438，446～449

张阆 065，080，081，088，089

张良 157，205

张林 195，408

张玲 116

张蚝 133

张茂 021，060，063，070，071，074～076，081～085，098，100～102，108～110，370，371，376，377，380，416，419

张邈 192～195，202，408，417

张穆 177，196，230，236，411，436

张披 229

张潜 225

张平 133，134

张骞 008，014，015

张慎 242

张寔 062，068～070，074～084，095，098，100，102，103，108，333，344，369～371，414，416，417，452，461

张嵩 116，117

张肃 068，079，080

张条 195，408

张显 197，210，236

张统 124，138

张温 050，358

张掖 002～004，006，010，014～016，019，020，027，028，034，036，040，055，059，072，099，116，141，143，149，165，166，168，179，183，192，194，201，202，204，208，210，211，216，217，219～225，227，229，232～235，237，250，252，259，260，261，263，265，287，288，292～297，299，301，303，304，308，317，321，328，329，334，337，338，366，368，384，385，388，396，406，415，437，438，

456，461

张掖都尉 028

张掖郡 003，015，019，020，208，229，292，296，366

张掖居延属国 019

张掖属国 019，028，293，295

张越 061，069，196，411，416，419

张邕 058，109～111，120～122，196，411，419

张诜 081，417

张选 081

张玄 030，057，108～110，114，117～124，388，446

张镇 060～062，069，196，411，413，416，419

张植 099，105，196，411

张骘 224

张重华 084，098，100，101，103～108，110～114，116，117，341，344，378～380，438，446，453

张曜灵 108，109，114

张体顺 195，201，208，210，408

张天锡 108，110，112～114，120～122，124～129，140，226，292，328，372，446，453，461

张铣 407

张玄靓 057，108～110，114，117～124，388，446

张彪 409

张谘 196，411，447

张湛 197，404，407，411，434，442，448，458，465

张质 196，197

张纂 065

张祚 057，072，108，109，111，114~118，121~123，417，435，437

长史 024，025，030，057，061，072，091，093，098，101，103，126，134，141，142，195，202，208，224，225，229，356，372，408，431

掌据 124，127

昭帝 013，014，168，316

赵白驹 121

赵长 111，114，116

赵充国 014，033~036，306，317，387

赵充哲 127

赵诞 171，432

赵昌 177

赵晁 166，183

赵过 011，316

赵开 195，408

赵冉 076

赵柔 195，434，465

赵爽 077

赵仰 070

赵疑 127

赵彝 070

赵萌 028

赵贞 091，098，356

赵振 163，165，166

折冲将军 195，408

折掘奇镇 184

镇北将军 188，252

镇军将军 077，224

镇南将军 175，224，252

振威将军 138

征南将军 058，105，230

征南司马 128

征西将军 104

支法 450，462

支施 450

挚虞 050，058，065，073，344，428

质帝 072

执法御史 119

执金吾 196，197，407

治元多 040，294

治中 023，024，057，060，065，069，082，094，193，196，268，269，306，325，392，436

治中从事 023，094

智猛 450

智严 450，462

中坚将军 093，106

中书令 145，151

中书侍郎 230，236

中田护军 216，231

中尉 197

中卫将军 127

中原 002，007，010～012，014，021，024，028，030，032～034，052～054，058，064，066，072～075，087，089，090，097～099，122，138，166，200，263，265，266，268，269，282，297，316，318，324～326，330～338，340，341，351～353，356，359，369，375，381，384，392～394，397，398，406，415，421，424，427，430，431，433，434，443～445，450，451，454，456～459，461，462，464，465，467，469

周瑜 205

朱活 358，371，373

朱龄石 238

朱元虎 233，354

竺道嵩 450

竺法乘 450

竺法护 450

竺法维 450

竺昙猷 450

竺曾 028，374

赀虏 039，040，044，143，218，219，259，262，263，275，276，289，300，301，304，306，307，328，334，340，388，389

主簿 023，024，060，061，066，102，105，106，140，175，195，196，354，378，406，408，436

著作郎 146，220，465，467

宗敞 174，177，178，182，268，417，418，428，429，436，437

宗钦 434，436，442，458，465

宗燮 150，174，436

宗延 305

宗毅 069

宗悠 107

左将军 184，212，296

左南 021，074，124，376

左司马 076，163，165，171，195，408

左员外 1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凉史/赵向群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

（十六国史新编）

ISBN 978-7-5201-5216-7

I.①五… II.①赵… III.①西北地区-地方史-五胡十六国时代 IV.①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0437号

·十六国史新编·

五凉史

著者/赵向群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李淼

文稿编辑/徐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城市和绿色发展分社（010）593671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7.25 插页：0.25 字数：376千字

版次/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5216-7

定价/8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十六国史新编

【汉赵国史】周伟洲 著
【五凉史】赵向群 著
【前秦史】蒋福亚 著
【后秦史】尹波涛 著
【南凉与西秦】周伟洲 著
【成汉国史】高 然 范双双 著
【后赵史】李 圳 著
【五燕史】赵红梅 著
【赫连夏国史】吴洪琳 著

装帧设计 Telephone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相继出现五个割据政权，分别是汉族张氏的前凉和李氏的西凉，氐族吕氏的后凉，鲜卑秃发氏的南凉，匈奴沮渠氏的北凉。五凉政权管辖的范围东至今甘肃甘谷、天水，西及天山南北，将河西走廊等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包括在内。五凉历史是古代民族史、西北边疆史和古代丝绸之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分为『绪论』『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民族』『经济』『著姓』『文教』十个专题，作者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基础，全面还原五凉政权的兴衰更替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五凉史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世间之盐品牌微信



定价：88.00元



丛书主编 周伟洲



汉赵国史

周伟洲 著

匈奴

八王之乱

大单于

平阳 长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周伟洲

1940年生，广东开平人。196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1965年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67年分配至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3年调到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国民族史的科研和教学工作。1986年破格提升为教授。1992年至1998年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并兼任西北历史研究室主任。2001年7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顾问；被评为『陕西省首届社会科学名家』等。

出版有关魏晋南北朝史著作《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等。

汉赵国史

周伟洲 著





十六国史新编

丛书主编／周伟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京大學

伟洲同志：

前承示及有关卢水胡论，至为感谢，已照尊论补入条目中。大百科魏晋南北朝部分已交稿，由编辑加工中。据说尚有未完成者，如清近现代，中国历史卷争取88年底发排。近又读到大著汉赵国史，不胜钦服。如能再接再厉，写成十六国史新编，于学术界大有裨益，不仅为崔鸿之功臣而已也。专此佈复，並致

敬礼！

周一良

八七，十，三十。

周一良先生致信作者，谈及“十六国史新编”和《汉赵国史》

总序

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316～439）[1]，虽然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就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如在唐代魏徵等撰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列遗存的“霸史”共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中，就有二十六部十六国国别史。其中，最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可惜以上诸书均先后散佚，只是在唐宋时期编纂的各种类书及其他史书中，有上述霸史的一些辑文。[2]

由于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五胡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隋唐以后的历代史家，认为十六国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十六国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中国历史，对十六国也着墨不多。加之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及隋以前有关十六国的史书，均先后散佚，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极为困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创了中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更加深入，十六国史论著也不断问世。加之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古籍，重新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十六国的国别史。

我们这套“十六国史新编”丛书，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或正在撰写的一批十六国国别史中，选出其中学术水平较高、大致符合国别史体例的著作编辑而成。主要包括下列著作：

1.《成汉国史》，高然、范双双著；2.《汉赵国史》，周伟洲著；3.《后赵史》，李圳著；4.《五燕史》，赵红梅著；5.《前秦史》，蒋福亚著；6.

《后秦史》，尹波涛著；7.《赫连夏国史》，吴洪琳著；8.《南凉与西秦》，周伟洲著；9.《五凉史》，赵向群著。

以上九部著作大致涵盖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十六个国家（政权）。之所以称之为“新编”，则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以上九部著作均是在尽可能收集整理有关史料及参考古今有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完全摈弃了过去封建史家的正统论及民族歧视和不平等等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评述十六国历史。

第二，从前封建史家所撰十六国史，仅注重该国的政治、军事及与邻近各族所建政权的关系史，而“十六国史新编”还加强了对五胡所建十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包括宗教信仰）及民族的认同、迁徙及融合等方面的论述。

第三，“十六国史新编”还特别注意吸取文物考古的新资料，以及中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四，“十六国史新编”采取现代通行的专著体例和形式，用章节目的体例撰写并详加引文注释，最后附有大事年表、索引等。

由于“十六国史新编”有的撰写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如《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前秦史》），距今已过去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国内外有关五胡十六国史的研究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众多的新成果问世。如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三崎良章撰《五胡十六国的基础研究》（汲古书院，2006）及氏撰《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东方书店，2015年第三版）、日本学者编纂的《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等等。中国学者赵丕承编著《五胡史纲》（艺轩图书出版社，2000）、刘学铫撰《五胡史纲》（南天书局，2001）、陈勇撰《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贾小军撰《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及氏撰《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陈琳国撰《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商务印书馆，2010）及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咸阳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郭永利撰《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民族出版社，2012）等。而这些研究成果，上述十六国国别史则已不能参考引用，只能保持其在一定历史时

期中的成果及特征了。

其次，新编的九部十六国国别史，是由近十位作者撰写的，因此各书在体例、文字、着重点上，均与各个作者的专业、学养、经历等有关，故各书体例、内容的取舍、文字等各方面不尽相同，各具特色。

再次，有关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近二十余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一些与“十六国史新编”相左，甚至有相反的观点。[3]这应是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正常现象。我们保留“十六国史新编”中的观点和结论，以期引起中外学者的讨论和争鸣。

最后，感谢“十六国史新编”的各位作者，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欣然决定出版此套丛书。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2019年1月30日

[1] 大致相当于西晋灭亡至北魏灭北凉，统一整个北方的时期，即公元316年至439年。

[2] 参见[日]五胡之会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燎原书店，2012。

[3] 比如仅关于最基本的“五胡”“屠各”“羯胡”“拓跋”“护军制”“汉化”“胡化”等概念，学界均有不同的解析。

- 前言
- 〖第一章〗 汉末至晋初匈奴族的内徙及其活动
  - 一 匈奴入居沿边诸郡及汉、魏各朝对他们的统治
  - 二 西晋初匈奴的继续内迁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
  - 三 刘渊的族姓
- 〖第二章〗 晋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及统治阶级的内乱
  - 一 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 二 “八王之乱”——西晋统治阶级的内争
- 〖第三章〗 刘渊的起兵及汉政权的建立
  - 一 晋末各族人民反晋斗争鸟瞰
  - 二 刘渊的起兵及汉政权的建立
- 〖第四章〗 汉政权的发展、兴盛及其与西晋的角逐
  - 一 刘渊的称帝及汉政权的发展
  - 二 刘聪的继立及西晋洛阳的陷落
  - 三 汉政权的兴盛及其与西晋的角逐
- 〖第五章〗 汉国的内乱及前赵的继立
  - 一 西晋的灭亡和汉国的衰弱
  - 二 汉国的内乱和前赵的继立
- 〖第六章〗 前赵的兴衰
  - 一 前赵的巩固及其向西北的扩展
  - 二 前赵的灭亡及其原因
- 〖第七章〗 汉赵国的政治制度
  - 一 承袭汉魏以来的职官制度
  - 二 单于台——汉赵统治其他少数民族的机构
  - 三 关于“胡汉分治”问题
- 〖第八章〗 汉赵国的社会形态
  - 一 汉赵国的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
  - 二 汉赵国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
  - 三 汉赵国的文化
- 〖附录一〗 汉赵职官表
- 〖附录二〗 汉赵国刘氏世系表
- 〖附录三〗 汉赵国大事年表
- 〖附录四〗 十六国官制研究
- 索引
- 后记

前言

十六国时期虽然仅是我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更是如此。所以，几千年来，除了当时有为十六国修史者外，至今还很少有十六国国别史的专书。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但苦于史籍之散佚，资料之缺乏，收效不大。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为了研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特点，以为今天的借鉴，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笔者不揣冒昧，鼓足勇气，写下了这本《汉赵国史》。

汉赵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内迁少数民族匈奴在内地建立的政权，也是十六国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它的存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六年，但在中国历史上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过去的封建史家往往把建立汉赵政权的内迁匈奴作为引起中国历史上十六国分裂混战局面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允的。中国北方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乃是东汉以来国内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及世家大族的发展、王权的衰落等引起的必然结果，不是内迁的少数民族所能左右的。相反，汉赵政权的建立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利用各族人民反抗西晋的斗争，一举推翻了腐朽的西晋王朝，建立新的政权。这个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承袭了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传统，又兼其旧俗；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创造，对以后的封建王朝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当时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汉赵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修建城镇，人口激增又使其京都平阳、长安地区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从汉赵兴衰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匈奴统治者的暴虐和滥用民力，及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它是怎样迅速走向衰弱，最终为后赵所灭亡的。

本书根据现存史籍和文物考古资料，首先论述了东汉末年以来内迁匈奴的活动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叙述了汉赵国兴衰的历史，最后对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作了大胆探讨。书名定为《汉赵国史》，是由前赵史官和苞所撰《汉赵记》而来。

总之，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和撰写，才刚刚开始，抛砖引玉，如此而已。

周伟洲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

〖第一章〗 汉末至晋初匈奴族的内徙及其活动

一 匈奴入居沿边诸郡及汉、魏各朝对他们的统治

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建国的汉赵政权，是由内迁的匈奴刘氏所建立的，因此研究汉赵国历史，首先应了解匈奴族自东汉以来内迁于黄河流域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汉、魏、晋各王朝统治下的历史。关于此，《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太平御览》卷一九引《十六国春秋·前赵录》等均有简约的记载：

> 刘渊字元海，新兴（今山西忻州）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世居北狄，千有余岁，至冒顿袭破东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内侵燕、岱，控弦四十万。汉祖患之，使刘敬奉公主以妻之，约为兄弟，故子孙遂冒姓刘氏。

崔鸿据秦、汉以来史籍（如《史记》《汉书》）极为概括地叙述了匈奴的来源及兴起的历史，并简述其改姓刘氏的由来。匈奴是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大漠南北的一个古代民族，最早根据地在今内蒙古的阴山，时匈奴部落联盟首领冒顿征服蒙古草原周围各部，建立匈奴政权，以后与中原地区的秦、汉等政权发生了密切的关系。[1]匈奴冒顿单于一族原姓挛鞮氏或虚连题氏[2]，后入居黄河流域的南匈奴单于后裔，因其祖先冒顿曾娶西汉公主，且约为兄弟，“故子孙遂冒姓刘氏”。按南匈奴单于一族改姓刘氏，似乎并不始于刘渊一代，中国史籍云刘渊父名刘豹，西晋泰始七年（271）有叛出塞的南匈奴单于一族的刘猛[3]，还有曹魏时的“匈奴王刘靖”[4]等。故南匈奴单于一族有的改姓刘氏，大约始于曹魏时期；当然，也有汉赵政权建立前后，追改为“刘”氏的可能。

前引《晋书·刘元海载记》《前赵录》等还叙述了东汉以来南匈奴入居内地及汉、魏、晋对其统治的情况；因文字过于简约，且有一些错讹之处，故不引证。下面我们根据秦汉以来的史籍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早在两汉时期，匈奴与汉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匈奴族因汉匈之间的友好交往或战争，已有大批投归汉朝，迁入内地居住。[5]如汉武帝、宣帝时，大批匈奴部众因战败而迁入汉朝统治的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驻牧于今甘肃河西的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将众四万余人降汉，汉朝于塞外五郡设“属国”以处之，致使河西匈奴四万余人散处在汉边五郡。[6]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后，匈奴衰弱，统治阶级内部长期处于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先是五个单于争立，后又演变为郅支单于与呼韩邪单于的对立。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降汉，请居光禄塞下（今内蒙古固阳北）。从此，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开创了汉匈两族友好交往的新局面，并为东汉时南匈奴的迁入内地，与汉族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以后，郅支单于西遁，呼韩邪单于势力增强，于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北徙蒙古草原原单于王庭。

到东汉建武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47～48），匈奴内部发生了第二次大的分裂：原呼韩邪单于孙比因不得立为单于，率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投降汉朝，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沿用其祖父的名号，史称此部为南匈奴；而留在漠北的蒲奴单于，史称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49），南匈奴破北匈奴单于帐，却地千里，复遣使到东汉，“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7]。建武二十六年（50），东汉遣中郎将段郴等至南匈奴，立单于庭于五原西部塞（今内蒙古包头）八十里处。同年冬，南匈奴为北匈奴所败，于是汉朝令南单于徙庭于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留中郎将段郴等卫护单于。后东汉“悉复缘边八郡”，允许南匈奴部入居，“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捍戌”。其分布大致是：“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治富平，今宁夏青铜峡南），右贤王屯朔方（治临戎，今内蒙古磴口北），当于骨都侯屯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呼衍骨都侯屯云中（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北），郎氏骨都侯屯定襄（治善无，今山西左云西），左南将军屯雁门（治阴馆，今山西代县西北），栗籍骨都侯屯代郡（治高柳，今山西阳高），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8]这是匈奴部众第一次向汉朝沿边诸郡的大规模迁徙。

东汉之所以采取上述措施，是因为西汉末年以来战乱不断，北边诸郡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为了增加该地区人口和劳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对抗北匈奴势力的南下骚扰，遂同意将南匈奴部众南迁于沿边八郡。与此同时，东汉光武帝还诏令原居于此八郡的汉民还归原土，

从事生产；又调遣一批囚徒徙于边郡，补修城郭等。[9]

东汉的这一措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南匈奴作为东汉北边的屏障，有力地阻止了北匈奴南下的侵扰，而沿边诸郡，由于汉匈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10]在东汉的支持、保护下，南匈奴的经济也得以迅速发展，并不断取得对衰亡的北匈奴战争的胜利，北匈奴部众大多降附，致使南匈奴的人口猛增。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的记载，“是时（永元二年，90年）南部（南匈奴）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这一数字，比南匈奴初附汉时的四五万人，增加了四五倍之多。且“胜兵五万一百七十”的“胜兵”，标志着匈奴原牧民处于士卒分别向军队与生产者转变的时期，是匈奴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11]同时，南匈奴入居沿边诸郡，与汉人杂处，加速了匈奴的汉化过程，有的匈奴部民甚至开始由游牧转向农耕。

至永元六年（94），新降附南匈奴的十五部二十余万匈奴皆叛，胁立前单于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欲返回漠北。在东汉军队与南单于联军的追击下，先后有一部分叛走的匈奴部众复降，分处北边诸郡。直到东汉元初四年（117）逢侯为鲜卑所破，部众分散。次年，逢侯率百余骑诣朔方塞降，东汉徙其于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12]东汉政府不迁逢侯于沿边八郡，是“或恐更相招引，故徙于颍川郡也”[13]。

东汉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内部再次发生变乱，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叛，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为东汉军队所败。同年秋，句龙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攻破京兆虎牙营，掠并、凉、幽、冀四州。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府“乃徙西河治离石（今山西离石），上郡治夏阳（今陕西韩城），朔方治五原（今内蒙古包头）”。[14]或在此前后，南单于王庭也由美稷徙治离石北的左国城。[15]句龙王车纽的变乱，断断续续延续了四年，最后为东汉所平定。这次匈奴变乱的结果，是使大批南匈奴部众由沿边八郡逐渐深入并州诸郡，即今山西汾水流域。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逐渐失去了对南匈奴的控制，而南匈奴内部亦不断发生变乱。东汉中平四年（187），即黄巾起义爆发后三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反汉，率鲜卑攻边郡。东汉灵帝诏发南匈奴兵，出征幽州，南匈奴部众恐单于发兵无已，群起反对。次年（188），南匈奴右部醢落与休屠各胡[16]白马铜等十余万攻杀羌渠单于。其子于扶罗

继立为南匈奴单于，国人不服，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诣阙自讼”，即到洛阳，请求东汉援助。中平六年（189）东汉灵帝死，国内大乱，于扶罗于是率数千骑与黄巾起义中的白波部合兵，攻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诸郡，失利；又欲返故地，国人不受，乃屯军于河东郡的平阳（今山西临汾）。[17]过了两年（191），于扶罗与原并州刺史丁原与假司马张杨合兵依袁绍，屯军于漳水。接着，于扶罗又劫持张杨叛袁绍，屯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董卓以张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18]东汉初平三年至四年（192～193），于扶罗又与黄巾黑山部附于袁术，为曹操破于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等地。[19]兴平二年（195），汉献帝由长安返洛阳，南匈奴右贤王去卑曾与原白波部帅韩暹等击败李傕、郭汜等，护卫献帝。同年南匈奴单于于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立[20]，仍设王庭于平阳[21]。

次年，曹操迁献帝于许（今河南许昌西南），南匈奴呼厨泉降，曹操允其还归平阳。[22]建安七年（202），官渡之战，曹操大败河北袁绍军，绍子尚、甥高幹等与南匈奴单于共攻河东，并与关中马腾等连兵。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等围南单于于平阳，并遣张既说降马腾，高幹及呼厨泉单于均降。[23]建安十一年（206）高幹复以并州反曹操，操击之于壶关（今山西长治北），幹向南匈奴单于求助，单于不受，高幹败亡。[24]

至此，在河东及并州诸郡的南匈奴部众进一步为曹操所控制。故在建安十八年（213）五月献帝策曹操为魏公时曰：“……鲜卑、丁零，重译而至，（单于）[箄于]、白屋，请吏率职，此又君之功也。”[25]所云单于即指南匈奴单于呼厨泉。

从上述黄巾起义爆发至南匈奴最后为曹操所控制，共十八年时间。其间，由于东汉境内农民起义及军阀混战，南匈奴主要的一支留居于并州诸郡，以河东郡的平阳为中心，转战各地。[26]这样，数万南匈奴部众散居于并州五郡（太原、上党、西河、雁门、新兴）及司隶的河东、凉州的安定等郡，与汉民杂处，成为一支较为强大的势力。

掌握了东汉大权的曹操自然对分布于黄河流域诸郡的南匈奴部众很不放心，又“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因此，在建安二十一年（216）七月，乘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及其名王来朝之机，遂留呼厨泉于邺（今河北临漳），令右贤王去卑去平阳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又“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

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27]，还“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即上述并州五郡、河东一郡）”[28]。曹操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不仅使居于并州等地的南匈奴部众得以合法化，而且逐渐成为东汉统治下的“编民”，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这是东汉末年北方战祸不断，土地荒芜，曹操欲以内迁的南匈奴为劳动力和兵士的来源而采取的措施。

魏黄初元年（220），曹丕建魏代汉，《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记：“魏王（曹丕）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同年十一月，魏文帝“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29]。这一切说明魏沿东汉末之旧制，对留于京城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加以笼络，对散居六郡的南匈奴五部的统治依旧。

东汉、曹魏王朝是怎样统治内迁的南匈奴部众的呢？总的说来，在南匈奴部众由沿边八郡逐渐散居并州等六郡的过程中，东汉和曹魏的统治者逐渐加强了对他们的统治，其间又发生过一次较大的变革。

在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降附后，单于只是“奉藩称臣”，献珍宝，求汉朝派使者监护，遣侍子，一如西汉时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的关系。至建武二十六年（50），东汉就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王庭，进行监护。南单于亦遣侍子入洛阳，每年一更。东汉还“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枝，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30]其年冬，因北匈奴的攻击，东汉复令单于徙庭于西河美稷，留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于两河以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31]《后汉书》卷二八《百官志五》亦云：“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

东汉虽然在南匈奴设有使匈奴中郎将等官吏监护南单于，但匈奴的部民仍然直接为南单于所统治，保留了原来匈奴内部的社会组织及行政制度。单于之下，“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

少为高下次第焉……异姓有呼延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延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32]东汉使匈奴中郎将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和保护南匈奴，征发其部众共同抵御北匈奴或鲜卑的骚扰。如熹平六年（177），南单于就随中郎将臧旻出雁门击漠北鲜卑檀石槐，大败而还。[33]

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之后，以上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南匈奴的一支深入东汉并州等地，先后与黄巾起义中的白波、黑山等部联合，参加北方各割据势力的混战。直至建安七年（202）内迁的南匈奴投降曹操为止。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对内迁的南匈奴采取一系列措施，不仅改变了以前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而且使南匈奴内部社会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曹操虽然保留了原来监护南匈奴的护匈奴中郎将的建置，但是分原南匈奴为五部，每部又立匈奴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之。这是因为南匈奴内迁之后，原来的部落组织已经遭到破坏，曹操按地域人为地将其重新划定为五部。而且选汉人为司马，深入每部进行监督。这无疑加强了东汉政府对内迁南匈奴的统治。其五部是：左部统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南）；右部统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统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州）；中部统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34]共计约三万落，一落按七口计，有二十余万人。五部部帅大都由单于子弟担任，已知的如原单于于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兼左部帅。

在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的前后，东汉在并州等地的官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一步将匈奴的豪右与其所统的部民分离，致使“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35]。就是说，曹操通过上述措施，逐渐加强了对内迁匈奴的控制，使南单于及其豪帅对部民直接统治逐渐变为间接的统治，南匈奴的部众逐渐成了东汉政府的“编民”。东汉可以直接征调南匈奴部人为“义从”，守塞保边[36]，参加战争。如建安十七年（212）曹操欲击吴国孙权，以东汉尚书令发布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云：“……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万里肃齐，六师无事。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呼厨泉）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自寿春而南。”[37]

东汉延康元年（220），曹丕建立魏，取代东汉政权。在曹魏政权的统治下，入居并州等地的南匈奴得到进一步发展，很少有反乱之事发生。到魏嘉平三年（251），原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帅刘豹势力增强，并五部为一部。[38]于是有城阳太守邓艾上言：“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39]当时掌握魏政的司马师虽纳艾之言，但事实上并未分割匈奴部众，亦未渐出匈奴之众，使之与汉民分离。直至魏咸熙年间（264～265），曹魏才因南匈奴一部太强，“分为三率”[40]。

二 西晋初匈奴的继续内迁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

曹魏咸熙二年（265），司马氏取魏政权而代之，建立晋，史称西晋。西晋初，塞外的匈奴及其统治下的其他部落，因占有漠北草原的鲜卑势力的压迫及遭大水灾，又大批向内地迁徙。现仅就文献所载，分述如下。

（一）西晋武帝泰始初年，有“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41]。

（二）咸宁三年（277）有“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42]。内附匈奴人数不详。

（三）咸宁五年（279）“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43]。

（四）同年“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44]。

（五）太康五年（284）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45]。

（六）太康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几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46]。

（七）太康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47]。

仅上述匈奴投归西晋的人数，就至少二十余万口，他们与汉魏时的南匈奴一样都是自愿迁徙的，当然也有西晋统治阶级招诱的因素在内。西晋统治者将这些内迁的匈奴安置在何处，不十分清楚。《晋书·北狄匈奴传》记泰始初，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投晋后，接着说：“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平阳、西河、新兴、太原，自东汉末年以来就居住了不少的南匈奴人；上党、乐平属并州，也有不少匈奴居住。又，《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元年（280）记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

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又云：“……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48]由此知匈奴及杂胡几乎遍于西北诸郡，今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均有匈奴的部众；而其势力最大、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还是并州诸郡及河东郡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晋初迁入的所谓“匈奴胡”，并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匈奴部众，也有许多是为匈奴统治的部族。《晋书》的撰者则统称之为“北狄”或“匈奴”；《北狄匈奴传》里记载的入居塞内的部落有十九种之多。即“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作‘乌檀种’）、赤勒种（《寰宇记》作‘赤勤种’）、捍蛭种（《寰宇记》作‘捍蛏种’、《册府元龟》作‘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沙种（《寰宇记》作‘萎莎种’）、秃童种（《寰宇记》作‘秃重种’）、勃蔑种（《寰宇记》作‘勃茂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寰宇记》作‘钟跋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据马长寿先生的研究，内真正属匈奴族的仅有屠各、贺赖，疑为匈奴的有赤沙；赤勤，亦即赤勒，也就是丁零，南北朝时亦称敕勒（高车）；原为匈奴统治的部族有羌渠、力羯，原系羯胡，即十六国时建立后赵的石勒一族。[49]其余诸种因资料缺乏，不可详考。

由此可见，《晋书·北狄匈奴传》所说北狄入塞的十九种中，屠各是泛指匈奴而言，即到魏晋时，内地汉人将内迁的匈奴统称为“屠各”。所谓“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50]，就是指北狄中匈奴（屠各）最豪贵，单于均出此种，统领其余诸种。[51]

晋初统治者基本沿汉魏以来对内迁匈奴部众的政策。泰始年间，西晋统治者将曹魏末年分为三率的匈奴部众，“又增为四”[52]，后又增为五部。此五部匈奴的分布地区，大致同于东汉末曹操掌权的时期所分布的五县之地，仍主要集中在并州，故史籍又称之为“并州之胡”。至晋太康时（280～289），晋朝统治者又改五部帅为“都尉”，各部都尉皆以原南匈奴单于后裔任之，“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即今山西太原汾水之滨）”。[53]晋元康九年（299）晋太子洗马江统所作《徙戎论》说：“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54]江统所论，证明并州匈奴仍为五部，且

人口众多，势力逐渐强大，以致引起晋朝某些官吏的注意，提出徙之出并州的建议。但是，江统之流所提出的“徙戎论”，是建立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偏见之上的，故不可取。事实上，内迁的少数民族（包括匈奴）已逐渐汉化，再企图强迫他们迁徙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们将东汉至晋初以来内迁匈奴社会地位的变化，做进一步的分析。

东汉建武时，南匈奴部众开始大批迁入沿边八郡，与汉人杂处，东汉设护匈奴中郎将于单于王庭，进行监护，匈奴单于以“藩臣”的形式向东汉“称臣纳贡”。但是，在南匈奴内部，单于及以下大臣保存了对部众直接统治的权力，保存了原匈奴政权的社会组织和行政体制。广大的匈奴部民仍直接为匈奴单于及各级大臣、贵族所统治，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上仍是匈奴奴隶制社会中的平民与奴隶。而整个匈奴的社会经济仍以游牧经济为主。

可是，随着南匈奴部众不断向内地迁徙，特别是黄巾起义爆发后，一部分南匈奴部众转战在河东及并州诸郡，与汉族的接触更为频繁。原北方汉族的农业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日益加深，这是匈奴内部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东汉、魏、晋的统治者为了补充劳动力和扩大兵员，逐渐加强了对内迁匈奴的控制。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使南匈奴的统治阶级丧失对匈奴部众直接统治的权力。他们虽然保留着原匈奴行政组织系统的官号，但又接受魏、晋所给予的封号（如部帅、都尉等），对部众只能间接统治了。这种情况，正如刘渊的从祖刘宣所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55]

就是魏、晋所封匈奴王侯的五部帅（都尉），也只是名义上的，无实际权力，故其五部都尉皆家居于晋阳汾、涧之间。匈奴王侯贵族既然已经“降同编户”，那么一般匈奴部民的社会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匈奴部民有的变成魏、晋统治阶级的“义从”“勇力吏兵”，四处为统治者打仗；有的则沦为汉族世家豪门的“部曲”“田客”；还有的甚至沦为汉族豪右的“奴隶”。这样，广大的匈奴部民深受来自本民族统治者和汉族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与魏、晋统治阶级的矛盾，就具有民族和阶级的双重矛盾。此时内迁匈奴的经济，也基本上被纳入了内地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之中。

内迁匈奴社会地位的这种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下面试举东汉建武十一年后任并州刺史的梁习所采取的措施为例，加以说明。《三国志·魏书》卷一五《梁习传》云：

> 梁习字子虞……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后单于入侍，西北无虞，习之绩也。

梁习对并州的“胡狄”（主要指匈奴），首先是采取将匈奴王侯、豪右与其所领部众分立的措施，先“皆礼召其豪右”到幕府任职，然后处置其部众，或“发诸丁强为义从”出征，或因大军争战，使之为“勇力”（士卒）。这样，匈奴王侯、豪右失去了对所领部众的直接统治，部众丁壮则被征发服役，同于编户。其次，在匈奴各部丁壮被调发服兵役后，梁习又将他们的家属从并州诸郡迁至邺城，前后数万人，目的在于进一步控制匈奴部众，以家属为质任，随便驱使。最后，对于不服从上述调动的匈奴部众，则采取武力镇压的方针，即所谓“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结果是“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通过以上三个步骤政策的实施，基本使匈奴单于及王侯、豪右失去了直接统治其部民的权力，势单力薄，恭顺、稽颡；而一般部民“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至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留南单于呼厨泉于邺，以右贤王去卑还平阳监国，分匈奴为五部等。这一措施之所以能顺利实施，与梁习先于并州采取上述分化瓦解匈奴的“三部曲”政策不无关系。曹操的措施，则以法律的形式，更为全面地起到了分化瓦解匈奴部众，改变他们社会地位的作用。

降为编户的匈奴部众是否同魏、晋其他编户一样，向国家缴纳赋税呢？据史籍记载，内迁的其他少数民族如乌丸、鲜卑、氐、羌，有的是要向魏、晋国家缴纳赋税的。如《三国志·魏书》卷二六《牵招传》云：招出为雁门太守，“既教民战阵，又表复乌丸五百余家租调，使备鞍马，远遣侦候”。又，《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亦记：“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又

云："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晋朝是要向少数民族征收户调的，虽然其数目较一般汉民为少。从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还未发现魏、晋王朝向内迁匈奴征收赋税之例。根据以上记载，作为"编民"的部分内迁匈奴部众可能也是要向魏、晋缴纳赋税的。

上述《三国志·魏书》卷十五《梁习传》还提到，习在并州"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这是对州境内所有各族人民而言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内迁的匈奴。即是说，到东汉末年，内迁匈奴部众已有一部分开始从事农业。关于此，我们还可以从匈奴部众有一部分沦为"田客"的记载里得到证明。《晋书》卷九三《王恂传》云：

> 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此段前一部分是说魏时统治者给公卿以下官吏租牛、客户（即部曲、佃客），而原属政府的农民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多投至贵势之家作佃客。后一部分则是说在并州太原诸郡亦有一些内迁匈奴部众沦为"田客"，数目多至数千。说明内迁匈奴有一部分由原匈奴的部落民变成从事农业的"田客"，成为内地汉族封建制度下依附关系较强的"佃客"。

还有的匈奴部众命运更为悲惨，他们沦为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奴隶。《三国志·魏书》卷二二《陈泰传》云：

> 正始中（240～249），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内云京邑贵人寄宝货与陈泰买奴婢，当然主要是指并州的"夷民"奴隶，所谓"夷民"，应是匈奴。陈泰没有买奴婢，而是最后归还宝货，《晋书》撰者特为此事扬泰，正说明除陈泰之外的并州官吏买卖包括内迁匈奴在内的奴婢之风，是很盛行的。这些被买卖的奴婢，可能大部分是因贫困无以为生而沦为奴隶的。另有一种少数民族奴婢（包括匈奴），是统治阶级用武力掠夺而来，然后加以转卖的。羯胡石勒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证。《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云："石勒，字世龙，初名訇，上党武乡羯人也……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瀛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殴辱。"而魏、晋统治者在镇压

匈奴等族人民反抗之后，往往也将俘虏赏赐给有功的将士，这些俘虏也大多沦为奴隶。

三 刘渊的族姓

刘渊是汉赵国的创建者，是内迁匈奴贵族。中国史籍均称其族姓为南匈奴单于后裔。如《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前赵录》、《晋书·刘元海载记》等皆记：南匈奴单于“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也就是说，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刘豹之子，姓虚连题氏，后改刘氏，是史籍所载刘渊一族为内迁南匈奴单于后裔甚明。这本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近代以来中外学者皆以为史籍所叙刘渊出于南单于后裔不确，只是刘渊为了号召匈奴部众而伪托的说法，渊一族应为屠各。[56]他们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史籍多次称刘渊一族为“屠各”。如《晋书》卷六三《李矩传》靳准称刘渊为“屠各小丑”；同书《刘元海载记》云王弥骂刘曜：“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孙盛《晋阳秋》云刘聪（渊子）为“屠各人”；《魏书·卫操传》云“屠各匈奴刘渊”；《晋书》卷六二《刘琨传》卢谌等上表云“屠各乘虚，晋阳沮溃”，此指刘粲（聪子）陷晋阳事；同书《刘曜载记》云石勒灭前赵“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等等。

第二，《魏书》卷一《序纪》云：“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所谓‘别部’‘别种’乃是服属于一个主要部族的其他部族或部落，魏收称刘渊为匈奴别种就说明其非南单于一族。”结合上引《魏书·卫操传》之文，“就可知道与刘渊同时的近邻拓跋族内很清楚刘渊乃是屠各族”。[57]

第三，唐长孺先生还以《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述刘渊世系和事迹有很多疑点，从而认为刘渊称南单于后裔显系伪托。他举出三点。一是《载记》记渊父豹死于秃发树机能反晋之后，即泰始十年（274），而其为左贤王在呼厨泉始立的东汉兴平二年（195），其间有八十余年，假设刘豹以二十岁左右为左贤王，则死时在百岁左右。刘渊生于嘉平中（249～253），则刘豹生他时已超过七十一岁，有点不近情理。二是《载记》称：“会豹卒，以元海代为左部帅”，似乎豹卒于任上，但《晋书》卷三《武帝纪》云泰始八年（272）“左部帅李恪杀（刘）猛而降”。同书《北狄匈奴传》作“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左部督即左部

帅。“假使刘豹卒后即由刘渊继任，试问何时安插这个李恪。”三是刘渊确为新兴人。“但刘渊既是北部人，何以作左部帅，李氏（指李慈铭《晋书札记》）这个问题却提得很有意思。刘豹以左贤王应为左部人，何以父子异部呢……我们知道部落酋长是不能像地方官那样随便调动的，刘渊以北部人统左部，又从左部调回北部是难以理解的。又，《刘元海载记》称成都王颖拜刘渊为北单于，此时早已没有北匈奴，何来北单于，且南单于此时也已虚位，假使刘渊为南单于嫡裔，为什么不叫他当南单于？这些纠纷都由于刘渊本非南单于之族而发生，他实是北部屠各人，领北部都尉，所以任之为北单于。”[58]

以上所列举的证据，看来是十分充分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问题仍然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屠各”这一名称的内涵，到魏晋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是原来意义上的“屠各”了。众所周知，“屠各”一名，文献又作“休屠各”“休屠”“休著屠各”等，“屠各”应为“休屠各”之简称。此名源于秦汉时据今甘肃武威一带的匈奴休屠王之“休屠”。汉武帝元狩二年（140），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数万降，西汉将其分处于边五郡塞外，置属国以处之。以后即称散处于五郡属国的原休屠王后裔及其部众为“休屠”或“屠各”。从汉代以来，史籍所记屠各的姓氏多有王、金、张、卜、李、郭、成等汉族姓氏，且一些著名的屠各豪右，如陇城的王擢一族，汉化很深。[59]而狭义的“屠各”，即指汉代休屠王后裔及其部众，为匈奴的一支，故史籍有时称为“屠各匈奴”。

到魏晋时期，纯粹的所谓“匈奴部族实际上已不存在”[60]。而大体上视原匈奴部众与其他民族融合情况，出现了许多新的部族集团，他们或以新的名称，或以旧的名称出现在中国史籍之中。一般说来，主要有下列几种：一是匈奴（包括南匈奴）主要与汉族融合，魏晋时则沿以前狭义“屠各”的名称，统称为“屠各”。如上述《晋书》《魏书》之称内迁南匈奴单于及部众为“屠各”，就是明证。唐杜佑《通典》卷八七注云：“头曼、冒顿即屠各种也。”即认为原匈奴单于一族也是屠各。此时“屠各”一名，已不仅指原休屠王后裔及部众的狭义的屠各，而且泛指已汉化或正在汉化的匈奴的广义的屠各了。二是匈奴与鲜卑族为主的融合，魏晋时则有“拓跋鲜卑（秃发鲜卑）”“宇文鲜卑”“铁弗匈奴”等。三是匈奴与其他杂胡的融合，则有“卢水胡”“稽胡”。此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原属匈奴统治的其他民族的部落集团，如属羌渠、力羯种的羯胡，原为匈奴牧奴的“费也头”，原为匈奴奴婢的“赀虏”等。[61]

对内迁的二十余万的南匈奴来讲，他们到魏晋时已分化出两支：一支即深入并州诸郡，以于扶罗子刘豹为首的一部，因与汉人杂处，逐渐汉化，故当时人称豹及其子渊一族及所领南匈奴部众为“屠各”；另一支在新兴北，以南匈奴右贤王去卑为首的一部，因与南下的鲜卑族杂处，逐渐融合，故当时人称去卑子孙刘虎等为“铁弗”，意为“胡（匈奴）父鲜卑母”的后代。[62]这两支南匈奴在十六国时期均先后建立过政权，即汉赵国和夏国（赫连夏）。刘渊一族原确系南匈奴单于后裔，史籍称其为“屠各”，系因魏晋时“屠各”已成为匈奴，特别是与汉族融合的匈奴的泛称。《晋书·北狄匈奴传》所列入塞的北狄十九种中，并无匈奴之名，而只有屠各之名，且云“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这恰好证明，魏晋时“屠各”已为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泛称。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上引诸书称刘渊一族为屠各的资料，就会发现诸书不仅称刘渊为屠各，甚至亦称并州五部的匈奴（即内迁南匈奴）为屠各。如《晋书·刘曜载记》云石勒灭刘曜，“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其中“五郡屠各”正是指原五部匈奴。至于《魏书·序纪》称刘渊一族为“匈奴别种”，如按狭义的“屠各”（即休屠王部众）去解释，也是讲不通的，因为屠各本是匈奴的一支，而非“别种”“别部”。依我之见，《魏书》称刘渊为“匈奴别种”的意思，乃是广义的屠各（即汉化的匈奴），如此，说渊为别种倒还说得过去。

另外，从上述南匈奴内迁的历史来看，南匈奴单于率二十余万部众逐渐由沿边八郡迁入并州等地，而建国于并州及河东郡的汉赵国的统治阶级及部众，应主要是南匈奴，这是毫无疑义的。而汉代的屠各（即狭义的屠各），原来居于甘肃河西，后迁于沿边五郡之地。汉代以后，他们主要分布在秦陇和凉州地区，其次在朔方、太行山东麓、渭北等地；而南匈奴聚居的并州等地，真正的汉代屠各是很少的，唐长孺先生等所谓的“并州屠各”，实指刘渊一族及南匈奴部众。匈奴的卜氏、乔氏，文献也称之为“屠各”，但卜氏原系汉代匈奴贵族须卜氏，乔氏是汉代匈奴贵族丘林氏，均非汉代屠各。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魏晋时所称的“屠各”已非原来的屠各，而是泛指匈奴，特别是汉化的匈奴了。

至于《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记世系及事迹的几个疑点，大部分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如关于刘豹生渊时年龄是否超过了七十岁，唐先生是以假设刘豹二十岁左右为左贤王为前提的，这仅是一种假设，匈奴单于子弟在未成年时任左、右贤王，是完全可能的。假设刘豹七八岁任左贤

王，那么他五十余岁生刘渊就合乎情理了。因为文献记载简约，各种假设均有可能，故不能以此否定刘豹为渊父。又如左部帅刘豹死后其子渊继任左部帅，其间为何又出现“左部帅李恪”一事。按，《晋书·北狄匈奴传》等云李恪为刘猛的“左部督”（左部帅），这与刘渊所任匈奴五部帅中的“左部帅”并非一职；其次《晋书》卷五七《胡奋传》记“刘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到底“帐下将”“左部督（帅）”哪一个正确，也很难骤下结论。

再如刘渊父子为新兴（北部）人，为何不为北部帅（都尉），而任左部帅？渊任左部帅，为何后又任北部帅（都尉）、北单于呢？这些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如前所述，魏晋时南匈奴单于、王侯对自己所领部属的关系已由直接统治变为间接统治；魏、晋统治者往往将他们调离本部落，或为幕府，或任其他部帅（都尉），以分而治之。而以南单于及其后裔为首的匈奴贵族、豪右虽有单于、王侯的名号，部帅、都尉的封号，但无实际管理部落的权力。这正如上引刘宣的言论：“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上侯，降同编户。”“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刘渊之任左部帅或北部都尉不过是晋朝所封的虚号，都是由晋朝统治者根据其分化政策的需要而改变的。当然，在晋朝某个时期，为了某种需要，也遣一些部都尉返其所统之部，征集军队或驻防该部。如《水经注》卷六《汾水》云：“汾水之右有左部城，侧临汾水，盖刘渊为晋都尉所筑也。”

日本学者内田吟风在其所著《北亚细亚史研究——匈奴篇》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刘渊一族系出自南匈奴单于一族（虚连题氏），并认为刘渊一族及匈奴乔氏、卜氏、兰氏等皆为屠各种。[63]但是，他忽略了“屠各”即休屠各、休屠的略称，忽略了自汉代以来休屠王后裔及部众也称屠各（即狭义的“屠各”）的事实，笼统地把魏晋时匈奴单于一族及其他匈奴混称为“屠各”，因此遭到国内学者们的反对。[64]但是，他论证刘渊的族姓为南单于后裔，还是可取的。

总之，我们相信史籍确切记载刘渊一族的族姓是南匈奴单于的后裔，原姓虚连题氏，后改为刘氏；至于史籍又称其为“屠各”，是因魏晋时事实上纯粹的匈奴部族已不复存在，屠各一名已变为对匈奴，特别是汉化了的匈奴泛称。

[1] 关于匈奴的族源、人种、语言系属及建立政权经过，与内地政权的关系等，国

内学术界多有论著。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2] 《史记》《汉书》的《匈奴传》云匈奴单于姓“挛鞮氏”，《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曰：“单于姓虚连题。”日本学者内田吟风说，挛鞮氏与虚连题氏系同名异译（见《北亚细亚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第233～234页）。

[3] 《晋书》卷三《武帝纪》等。

[4] 《三国志·魏书》卷二四《孙礼传》。

[5] 见《史记》卷二○《建元年以来侯者年表》；《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等。

[6]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参见王宗维《汉代的属国》，载《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

[7]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8]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9]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10] 《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

[11] 参见《北狄与匈奴》，第82～83页。

[12]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13]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李贤注。

[14]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15] 按，南匈奴王庭由美稷迁离石左国城，诸书不载。据《晋书·刘元海载记》云：“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此将西河美稷与离石左国城相混淆，误。但云南单于王庭在离石左国城是正确的，不过应是由美稷迁至离石，时在东汉永和五年前后。

[16] “休屠各胡”即“屠各”，匈奴之一种，说见后。

[17] 以上见《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又，《晋书·刘元海载记》云：“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军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晋书·刘元海载记》卷五六《江统传》又云：“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于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二书记载均与《后汉书》异，从《后汉书》。

[18] 《三国志·魏书》卷八《张杨传》；《资治通鉴》卷六○，汉献帝初平二年七月条。

[19]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汉献帝初平四年正月条。

[20]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21] 《资治通鉴》卷六一，汉献帝兴平二年条。

[22]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23]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钟繇传》；《三国志·魏书》卷十五《张既传》。

[24]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三国志·魏书》卷六《袁绍传》。

[25]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

[26] 《晋书·江统传》引《徙戎论》亦曰：南匈奴于扶罗“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

[27] 《资治通鉴》卷六七，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七月条；《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等。

[28] 《晋书·江统传》。又，《资治通鉴》卷八三胡注云散居之六郡：“谓并州所统六郡也”，即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六郡。

[29] 《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

[30]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31]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32]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33] 《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等。

[34] 见《晋书·北狄匈奴传》；《晋书·刘元海载记》等。

[35] 《三国志·魏书》卷一五《梁习传》，详细论述见后。

[36] 《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云：青龙元年（233），“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叛……”此明言为“保塞匈奴”。

[37]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八，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8]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邓艾传》云：“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

[39]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邓艾传》。

[40] 《晋书·江统传》。

[41] 《晋书·北狄匈奴传》。

[42] 《晋书》卷三《武帝纪》。

[43] 《晋书》卷三《武帝纪》。

[44] 《晋书》卷三《武帝纪》。

[45] 《晋书》卷九七《北狄传》；《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五年条又云："帝处之塞内河西。"

[46] 《晋书·北狄匈奴传》。

[47] 《晋书·北狄匈奴传》。

[48] 后一段引自《晋书·北狄匈奴传》。

[49] 见《北狄与匈奴》，第92～100页。

[50] 《晋书·北狄匈奴传》。

[51] 《北狄与匈奴》及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皆以为刘渊为屠各族，故最豪贵，得为单于；或云此句仅适用于刘渊起事之后。此说恐不确，详细考证见后。

[52] 《晋书·江统传》云："泰始之初，又增为四。"

[53] 《晋书·刘元海载记》。按，《晋书·北狄匈奴传》云：南匈奴五部"部帅"改"都尉"在"魏末"时，误。详细考证见日本学者内田吟风说，挛鞮氏与虚连题氏系同名异译（见《北亚细亚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第288～289页。

[54] 《晋书·江统传》。

[55] 《晋书·刘元海载记》。

[56]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等等。

[57] 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

[58] 以上均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

[59] 见拙作《甘肃张家川出土北魏"王真保墓志"试析》，《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60] 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

[61] 参见拙文《赀虏与费也头》，载《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1984。

[62]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63] 见该书第280～284页等，原刊于《史林》一九卷2号，1934。

[64] 如上述唐长孺《魏晋杂胡考》内云："……内田吟风氏曾引史籍以证刘渊出于屠各……可是内田意在证成屠各为匈奴王族，所以又引杜佑的话'头曼、冒顿即屠各种也'。我认为屠各决不能与头曼、冒顿相混……"

〖第二章〗 晋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及统治阶级的内乱

一 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于太康元年（280）灭吴，统一了全国。史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事实上，这不过是史家被晋初表面上的“太平”所迷惑而做出的错误判断。晋初，武帝虽然对曹魏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做了一些改革，但基本上仍承汉以来之积弊，且继续恶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首先，晋承汉魏以来的世族制度，豪门世族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发展。他们凭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垄断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占有大量土地，荫庇宗属、宗族和佃客，拥有大批奴隶。他们是西晋封建政权上层的一个特殊阶层。世族豪门地主与庶族地主（包括地方豪强地主、富商巨室、少数民族的豪贵等）就构成了西晋的统治阶级。世族与庶族地主阶级直接压迫和剥削的是佃客、部曲和奴婢，还有大量属于国家控制的自由农民，即所谓的编户农民。佃客、部曲、奴婢及编户农民、小手工业者就构成了西晋封建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前者对后者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后者的反抗，是西晋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西晋建国后，由于自魏以来实行的屯田制已失去了意义，故晋朝颁布了占田课田法，以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巩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永久占领。占田法规定了各级官员依品位占田、荫户的数目，一品官占田五十顷、荫户（佃客）无过五十户，以下依次递减，最低的九品官可占田十顷、荫一户。[1]这是以法律形式承认世族官僚占有土地和荫户的特权。至于一般的编户，占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2]又据《晋书》卷一四《地理志》载：“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

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其总户数，只占东汉冲帝永嘉元年（145）总户九百九十三万的百分之二十五弱。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财务开支、军费都压在这二百多万国家编户之上，所以统治者只有加重对编户的剥削。如晋初，国家对一般编户农民征收的田租比东汉末曹操时增加了一倍，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3]而且徭役、兵役繁重，多误农时。正如泰始初傅玄上疏时所说：“……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4]咸宁初，玄子咸上言亦曰：“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所以，他大声疾呼：“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5]

随着晋朝统治阶级的腐朽，政治的黑暗，一般农民的生活更加悲惨。特别是太熙元年（290）惠帝即位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机构庞大，贿赂公行，对农民加以无休止的压榨，使农民的生活走上了绝境，饥馑遍地。这正如《晋书·食货志》所说：“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盗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因此，到永嘉年间，一般农民大都奔迸流移，或沦为世族豪右的佃客、奴婢，或“更相鬻卖”，成为流民；最后终于揭竿而起，反抗晋朝的残暴统治。他们就构成了晋末各地流民起义的主体。

西晋编户农民尚且如此，那么荫庇在世族豪门的佃客、部曲及奴隶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西晋初，武帝虽几次下令收括荫户，“诏禁募客（佃客）”[6]，而后又颁占田法，限制各官荫户的数目，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效力。佃客、部曲从晋初以来急剧增多。他们有的原为世家豪门的佃农或同一宗族的人，随着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他们身份日益低落，最终变为完全依附于世族豪门的佃客。还有一些编户农民因不堪国家繁重的赋役，投靠贵族豪门，成为荫户佃客，如上引《晋书·王恂传》所云，“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至于“部曲”，原本主要是两汉以来的军事建制；魏晋时，随着战争的频繁，部曲也就变成了武装世家豪门的家兵或佃客，成为且耕且战的耕作者，与佃客没有什么差别了。魏晋时佃客、部曲的地位比一般农民低，由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世族豪门用封建

地租的形式占有了他们全部剩余劳动价值，甚至包括大部分必要劳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采用“超经济的强制”才能达到。这样，佃客、部曲失去了部分自由，不得擅自离开主人，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隶属于主人。

至于奴隶，地位更为低下，被主人视为“私产”[7]，可以任意残杀。如石崇每宴宾客，常令美人（奴婢）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一次，客人不肯饮酒，崇竟杀行酒美人三人。[8]又，王恺命女妓吹笛，妓有小忘，恺即使黄门打杀之。[9]世家大族拥有的奴隶也很多，如王戎“家僮数百”[10]，石崇有“苍头八百余人”[11]。晋朝的法律还规定奴婢逃亡或反抗主人要受到各种严刑，直至处以死刑。[12]

以皇帝为首的西晋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化，政治腐败也是促使西晋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世族豪门集团凭借着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垄断了中央和地方的文武官职；又享有占田法规定的占有土地和佃客、占有众多奴隶的特权，日益腐化、奢侈。如晋世家王戎历任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领吏部等，其“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13]。晋强弩将军庞宗为“西州大姓”，蓝田令张辅曾“夺宗田二百余顷以给贫户”[14]。又麴允，金城人，“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15]还有晋朝著名的豪富石崇，“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及抄阅其家，“有司簿阅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16]。王隐《晋书》云其“百道营生，积财如山”。[17]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逐渐走上末途。

晋武帝即位初，多次下诏大弘俭约，可是平吴之后，日益奢侈腐化，后宫妃妾就近万人。上行下效，贵戚豪门竞相争奇斗富，淫逸腐化。如丞相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18]侍中王济也“性豪侈，丽服王食”，尝以人乳蒸豚，晋武帝食后，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时洛京地甚贵，（王）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19]石崇更是“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20]争奇斗富。《世说新语·汰侈篇》记载说：“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

丽，以饰舆服。”又举一例云：“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是建筑在广大农民、佃客和奴隶的血汗之上的。他们除了食用田租、户税之外，还想尽办法掠夺财富。从晋武帝起，就卖官鬻爵，刘毅曾当武帝之面说其不如东汉桓、灵二帝，因为“桓、灵卖官，钱入官库”，武帝卖官，钱入私门。[21]统治阶级敛聚财富，使“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22]当时南阳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这就不难理解，西晋统治阶级为什么要加重对农民的压榨，而这样做必然导致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

晋初以来，除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日趋尖锐之外，更为突出的还是民族矛盾的激化。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东汉末年内地军阀混战，北方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减少，于是四周的少数民族或出于自愿，或为汉族统治者所诱迫，大量迁入内地。而汉族统治者为了扩大兵员，获得劳动力，也愿意各族内迁。上面我们已经对北方的南匈奴及附属各部内迁的情况作了叙述。除匈奴之外，内迁的民族主要还有氐、羌、乌丸、鲜卑等。氐、羌自秦汉以来，主要居住在陇右、河西（包括今青海），东汉以后即大量迁入陕西关中等地。故江统《徙戎论》云：“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氐羌）、狄（匈奴、卢水胡、羯胡等）居半。”乌丸、鲜卑原属东胡，主要居地在今东北，汉魏以来也大量迁入内地。乌丸主要迁于幽、并二州；鲜卑则在幽、并二州之北，晋初以拓跋鲜卑（在漠南）和慕容鲜卑（在辽东）势力最强。此外，还有相当多的鲜卑内迁到陇右、河西一带。[23]内迁各族的总数，据《晋书》卷二《文帝纪》引魏元帝景元四年（263）诏曰，内迁各族达“八百七十余万口”，约占晋太康元年全国总人口一千六百多万的一半。事实上可能没有那么多，因晋太康元年（280）全国总人数是指编户，其余佃客、部曲、奴婢未统计在内；而内迁各族有的只是表示臣属，不一定真正内迁。无论怎样，以上数字至少说明魏晋以来，内迁各族的人数是很多的。

内迁的氐、羌、乌丸、鲜卑等族，大致与内迁的南匈奴各部一样，大多保留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形式，由魏晋地方官吏或特别设置的校尉统治，如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还有的地区，如关中，魏晋统治者还设置“护军”，统治羌、氐等族。内迁各族的社会地位，也大致与内迁南匈奴一样，发生了变化：有的保留了原部落的形式，有的则解散了原来部落，成为“编户齐民”[24]；还有的变成了世族豪门的佃客、部曲或奴隶。所有内迁各族都要为汉族统治阶级服兵役，经常被征调，四处打仗；有的还要向统治者缴纳租调，遭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是双重的，既有民族的也有阶级的。

对于内迁各族的单于、王侯及酋豪来说，他们与魏晋汉族统治阶级也存在民族矛盾。自内迁后，他们逐渐失去了往日统治本民族人民的权力，“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因此，他们梦寐以求的是恢复和扩张自己的势力，“兴邦复业”，如原南单于后裔刘渊的起兵就是如此。内迁的各族人民与汉族统治阶级的矛盾，则与此有本质的不同，他们之反对晋朝统治阶级，是为了解除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反对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歧视。

由于内迁各族人民受到汉族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故他们比一般汉族人民所受的压榨更为残酷。但是，在晋泰始以前，内迁各族与当地汉族人民相处得还是比较好的，很少发生恃其强悍而侵夺他族或反抗朝廷的事。这说明刚内迁不久的各族人民与魏晋统治阶级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比较缓和，汉族统治阶级对他们的压迫未深。可是，汉族统治阶级对内迁各族人民是歧视的，视之为野蛮人，处处加以防范，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他们一致的看法。早在曹魏嘉平三年（251）邓艾上言中就说：“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然而，正是这个邓艾在主陇右军事之后，为了扩充兵员，竟将数万鲜卑迁入雍、凉间，与汉人杂处。[25]晋泰始四年（268），傅玄上疏中亦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26]内迁各族真如邓艾、傅玄之流所说的那样，是“兽心”，是“必为害之势”吗？《晋书》卷五二《阮种传》记阮种在一次对策中说：

> 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

从阮种的言论，知内迁各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的，邓艾、傅玄之流所谓“胡夷兽心，不与华同”，“必为害之势”一类言论，不过是汉族统治阶级歧视、污蔑少数民族之词。内迁各族之所以要起来反抗汉族统治阶级，是“边吏扰习”，任职边疆的官吏（“受方任者”）“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的结果。当然，阮种在当时不可能了解内迁各族人民深受魏晋汉族统治阶级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而这才是他们不断起来反抗汉族统治阶级的根本原因。可是，他所说的原因至少反映了上述根本原因的一个方面，而且往往是触发内迁各族人民反抗的导火线。

晋初几次震撼晋廷的内迁各族人民的起兵，就是明证。

西晋泰始四年至五年间（268～269），河西一带遭水旱之灾，比年不登，引起当地羌、胡的扰乱。[27]晋朝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于泰始五年分雍、凉、梁三州之地设秦州（治冀城，今甘肃甘谷南），命“勇而无谋，强于自用”的武夫胡烈为刺史。胡上任后，即“妄加讨戮”，“失羌戎之和”，[28]终于次年（泰始六年）激发了以秃发鲜卑首领树机能为首的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胡烈被击杀于万斛堆（今甘肃祖厉河入黄河处）。一时河西、陇右的羌和北地胡等群起响应，势力发展很快；晋朝统治者先后派军镇压，均为起事的军队击败，凉州刺史牵弘、杨欣先后败亡。咸宁五年（279），树机能等攻下凉州（治今武威），武帝为之“忘寝与食”。后武帝任用马隆，才击杀树机能，镇压了这次反晋的各族人民起事。[29]

以树机能为首的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前后持续了十年，其间在泰始七年（271）初，又发生了内迁南匈奴右贤王刘猛叛出塞的事件。[30]刘猛自称单于，并于同年十一月攻并州，为刺史刘钦所败。[31]次年春，晋监军何桢率军击破刘猛，诱猛左部帅李恪杀猛。[32]刘猛反晋的性质与上述秃发树机能反晋不同。郝散的反晋是匈奴贵族要求恢复在部落中的统治，并结合人民解除奴役的要求而发动的。[33]

至晋元康四年（294），惠帝即位后不久，又爆发了内迁匈奴郝散的起事。郝散发难于谷远（今山西沁源），攻上党，杀长史。八月，郝散降，为晋冯翊都尉所杀。[34]史称郝散为匈奴，似为居并州上党一带的南匈奴或杂胡。过了两年，即元康六年，郝散弟度元与冯翊（治临晋，今陕西大荔）、北地（治今陕西铜川）的马兰羌、卢水胡起事，攻北地，杀太守张损，又击败冯翊都尉欧阳建。[35]接着，度元又击败雍

州刺史解系。秦、雍的氐、羌悉举义旗，推氐帅齐万年为皇帝，围泾阳，[36]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各族人民联合反抗晋朝统治阶级的斗争。秦、雍二州氐、羌人口众多，他们在晋朝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怨恨之气毒于骨髓”。[37]而起事的导火线正是当时镇守关中的赵王伦“刑赏失中”，重用亲信孙秀，滥杀羌大酋数十人。[38]起事军于起兵后第二年（元康七年）杀晋大将周处，关中守将郡守望风逃窜，相望于路。[39]直到元康九年（299），晋朝遣孟观才最后镇压了这次起事。

晋初树机能、齐万年领导的两次大的内迁各族人民起兵，具有深远的意义。当起事一发动，内迁各族皆迅速参加，攻占郡县，杀死晋朝官吏，震撼了西晋王朝的统治。起事虽然最后被镇压下去，但充分暴露出内迁各族人民在双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关于此点，在西晋统治集团中，有人也察觉到了。如晋太康元年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40]元康九年，即齐万年起义失败后，晋太子洗马江统又作《徙戎论》，他仍从宜徙内迁各族于边外，以符古代“地在要荒”的理论出发，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即一方面他对内迁各族很不放心，另一面也察觉到晋朝统治阶级对各族的压榨、轻侮是他们反抗的原因。他特别担心关中的氐、羌和并州的匈奴，主张把他们迁徙回原来居住的地方。对于并州的匈奴，江统说：“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泰始之初，又增为四（四部）。于是刘猛内叛，联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41]以后，匈奴刘渊起兵，终于倾覆了西晋的统治，使人们不能不佩服江统的预见。

郭钦、江统的议论，反映了当时西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已经看到内迁各族人民深受双重压迫，成为西晋王朝的最大威胁。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从根本上清除或减轻统治阶级对内迁各族人民的压榨，缓和民族的和阶级的矛盾，而是遵循古代四夷在要荒的传统观点，

主张将内迁各族徙回边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自汉魏以来，陆续内迁的各族长期与当地汉族人民杂处，有的甚至变成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对象（即所谓“编户齐民”）。迁之固然不易，而迁出后更将使汉族统治阶级失去财富的来源。所以，郭钦、江统的建议，没有被西晋统治者采纳，也不可能被采纳。

综上所述，从西晋建国以来，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均日益激化；西晋统治阶级的腐朽、相互争权夺利，最后演变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八王之乱”，内迁各族与汉族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遍及全国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二 “八王之乱”——西晋统治阶级的内争

西晋社会，除了上述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而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也是有其深刻社会根源的。如前所述，汉魏之际，由于世家豪族的急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世族制度。高门世家豪族享有各种封建特权，世代相袭，垄断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篡夺魏政权的司马氏，就是东汉末年以来高门世族的典型代表，而西晋政权本身就是以司马氏为首的各世族豪门的联合统治。世家豪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就需要从古代社会政治思想中找到一种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周代的封建之制。早在曹魏时，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就主张恢复周代五等爵制。[42]“这种政治理想，表面上有似复古的论调，其实是符合当时世家大族，尤其是经过武装过程以后的世家大族的要求的。他们建立起他们的小王国——庄园以后，想用旧的五等封建制作为外衣来披在新的封建制之上，经过名正言顺的法定手续，来承认他们小王国的独立主权，和新的主佃依附关系的合法性。”[43]司马氏作为当时世族的代表，提出这种要求是不足为怪的。

至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五月，相国晋王司马昭“奏复五等爵”[44]，开始实行。司马炎取代魏政权后，当时司马氏及一般世族都认为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是因为汉、魏宗室失位，宗藩力量太弱之故。所以，司马炎即位后，于泰始元年大封宗室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45]据一些学者研究，晋初分封的王国，虽有置军之制，可能并未实行，且诸王直到咸宁三年（277）才令就国，弄得“涕泣而去”。故西晋的分封诸王，“基本上承东汉之旧，君国而不临民”[46]。因此，过去史家所论招致晋代统治阶级内乱的原因是行封建之制，不够妥当。

然而，与西晋封建诸王相关的“宗王出镇”却是致乱的重要原因。早在曹魏末，司马氏就出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豫、雍、凉、冀、青、徐等州；晋武帝时，宗王出任都督者，常有四至六人，大部分是出镇以上战略地位重要的诸州，人数占全国都督名额的一半左右。[47]宗王出镇，拥有对地方的实权，掌握一定数量的精兵；他们“或出拥旄节，莅岳

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48]。当中央皇权衰落之时，他们则乘机而起，争权夺利，所谓“机权失于上，祸乱作于下”者是也。这样，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根本动摇了西晋的统治，与原来“思改覆车，复隆盘石”[49]的愿望恰好相反。

当然，西晋“八王之乱”的酿成，不仅是由上述宗王出镇引起的，它与魏晋以来世族豪门的兴起、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以及西晋统治阶级的腐朽、各族人民的反抗等，均有一定的关系。这一切前面皆有论述，此不赘言。

晋初，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就显露出苗头。泰始三年武帝立其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衷即惠帝，是一个低能儿，当时朝野人士悉知。而武帝其他的儿子又年幼，因此朝中上下希望比较有威望的齐王司马攸继承帝位。齐王司马攸是司马昭次子，后因昭兄司马师无子，过继与师为子。师死，昭继兄执政，故对师子攸特别宠爱，并欲把政权交与攸，以还政于兄。[50]昭临死时，还执攸手以授其子司马炎。由此之故，齐王攸为朝野所重，欲推之继武帝司马炎帝位。时中书监荀勗、侍中冯统等素与齐王有隙，恐攸为嗣对己不利，遂向武帝进谗言，劝武帝遣齐王归国。太康三年（282）武帝令攸归国，都督青州诸军事，攸终于忧愤而卒。[51]这一事件反映了西晋统治集团的裂痕。

太熙元年（290），武帝死的前夕，因司马衷“不慧”，令杨骏辅政。惠帝立后，军国大权落到杨太后（武帝皇后）父杨骏兄弟手中。骏与弟珧、济势倾天下，又以其甥段广、张劭为近侍，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大开封赏，欲以悦众”[52]。外戚杨氏的专权，引起诸王及惠帝皇后贾南风（贾充女）的不满。贾后性酷虐，凶险多权诈，她与楚王玮（司马炎第五子）合谋，于永平元年（291）诛杀杨骏兄弟及党羽一千余人，后又废杨太后，迫其绝食而死。[53]历代史家即以这次宫廷政变为“八王之乱”的开始。

杨骏被诛杀后，贾后等征大司马、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的汝南王亮入朝，拜太宰，录尚书事，与卫瓘共同辅政，贾后仍然没有掌握朝廷大权。同年六月，贾后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的矛盾，让惠帝密诏玮诛杀亮及卫瓘；接着，又矫惠帝诏云楚王玮擅杀国家大臣，杀之。[54]于是贾后擅政，除起用贾氏一族的贾模（后族兄）、贾谧（后内侄）及母舅郭彰为亲党外，还任用了当时的名士张华为司空，与世族王戎（司徒）、裴頠（尚书仆射）、裴楷（中书令）共同辅政。由于张华等人弥

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55]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所缓和，尚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到元康九年（299）底，皇太子（愍怀太子）的废位，演变成了诸王争夺皇位的斗争，即“八王之乱”。所谓“八王”，除上述的楚王玮、汝南王亮外，还有赵王伦（司马懿第九子）、齐王冏（司马攸子）、长沙王乂（司马炎第六子）、成都王颖（司马炎第十六子）、河间王颙（懿弟司马孚孙）、东海王越（懿弟司马馗孙）。皇太子遹是惠帝唯一的儿子，为后宫谢玖所生，与贾谧有隙。贾后及其亲党恐惠帝死后为太子所害，故设计诬太子谋反，废为庶人，杀其母谢氏。次年（永康元年），又杀遹于许昌。[56]此事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当时掌握宿卫禁军的右军将军赵王伦乘机令齐王冏等杀贾后、贾谧及张华、裴頠等人，又杀淮南王允，夷灭者数千人。齐王冏因为废杀贾后有功，转游击将军，此官职卑，意甚不平。伦即将冏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永康二年（301）正月，赵王伦即废惠帝，自立为皇帝，囚惠帝于洛阳金墉城。[57]

赵王伦素庸下，无智策，一切受制于孙秀。秀原为琅邪小史，以谄媚自达，“既执机衡，遂恣其奸谋”，大封亲信，唯竞荣利。[58]而赵王伦称帝后，为巩固皇位，必然采取削弱四方异己势力的策略。其中，主要是拥兵驻守诸镇的司马氏，如出镇许昌的齐王冏，镇邺的成都王颖，镇雍、凉的河间王颙等。出镇诸王对赵王伦篡夺帝位亦内怀不平。因此，齐王冏联合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等，起兵攻洛阳。赵王伦、孙秀闻三王起兵，十分恐惧，遣其将张泓、孙辅、闾和等迎战，败齐王冏军，冏坚垒自守。成都王颖军也遭到伦将孙会、士猗等狙击，先败后胜，遂长驱过黄河。此时，洛阳左卫将军王舆等入宫攻杀孙秀及其党众，囚赵王伦，迎惠帝复位。后齐王、成都王等入洛阳，杀赵王伦。史称“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59]。

惠帝复位后，封齐王冏为大司马，加九锡，辅理朝政；而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虽有封赠，但均愿还镇。冏自辅政后，骄恣日甚，大筑第馆，广树亲党，很快就使朝野人士失望。又，冏立年仅八岁的司马覃（惠帝弟遐子）为皇太子，引起原来有希望立为皇太弟的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的不满。太安元年（302），京师翊军校尉李含因与冏部下有隙，不自安，遂奔长安，诈言受密诏，令河间王颙讨齐王冏。颙乘机起兵，邀成都王颖等讨冏。颙大将张方带兵趋洛阳，至新安，又檄长沙王

乂起兵讨冏。于是，洛阳城内，冏、乂各率军队大战三日，结果冏败被杀，同党死者二千余人。颙、颖不愿离开自己的根据地，相继还镇；长沙王乂则留朝执政，但事无巨细皆就邺咨大将军颖。河间王颙原来企图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自领丞相，专制天下，乂执政，颙自然不满意。于是在太安二年（303）八月，颙、颖联合遣军三十多万攻洛阳，数为乂军所败。双方的战争一直打到次年（304）正月，时在京师的东海王越虑乂不济，执乂，引颙大将张方入洛阳，张方杀乂。接着，成都王颖入洛阳，后又复返邺，惠帝以其为丞相。时领雍州刺史的刘沈等攻长安，颙令张方急返，方遂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三月，河间王颙表请立颖为皇太弟，废皇太子覃为清河王。[60]

颖为人“形美而神昏，不知书”，为皇太弟之后，“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朝野大失所望。[61]东海王越乘机与左卫将军陈眕等挟惠帝从洛阳北征颖，为颖将石超所败，石超劫惠帝返邺。河间王颙原遣张方救邺，方至是复入洛阳。接着，都督幽州的王浚因颖遣使密谋夺其权，故联合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越弟），起兵攻邺。浚引鲜卑，腾招乌丸，破颖将王斌、石超等，遂围邺城。颖等挟惠帝南奔洛阳，为张方所控制。王浚军入邺，“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62]。同年十一月，张方大掠宫室后，挟帝及颖等返长安，颖至长安为颙所废黜，颙另立司马炽（武帝第二十五子）为皇太弟。

永兴二年（305）七月，东海王越在山东起兵，以迎驾为名，联合王浚等进攻长安。次年四月，越军击败颙，王浚将祁弘攻入长安，所部鲜卑大掠，杀二万余人，逼惠帝东还洛阳。后颖、颙相继为越所杀，大权最后落到司空东海王越手中。

从贾后杀杨骏起，至惠帝从长安返回洛阳为止，前后十六年的西晋统治阶级内战，史称“八王之乱”。这十六年间的大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西晋统治集团的混战，相互杀戮，动摇了西晋的封建统治，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覆灭。皇室司马氏一族同室操戈，所余无几；封建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这诚如《晋书》撰者所云：“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63]

其次，人民在八王混战中遭到浩劫，被杀者动辄以万计。北方大部

分地区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到各地就食。这就使原有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为激化。在八王混战的后期，先后爆发了以流民为主的起义（详见后）。

最后，在八王混战期间，诸王及各镇为了战胜自己的对手，夺取权力，纷纷招引、利用少数民族贵族参战，如成都王颖之引匈奴刘渊、并州刺史司马腾之用乌丸、幽州刺史王浚之用辽西鲜卑等。这不仅使原居幽、并以北的乌丸、鲜卑迁徙南下，更重要的是使少数民族贵族乘机发展势力，以便利用各族人民反晋的起义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刘渊所建的汉政权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

[1] 详见《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2]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3]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及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又，《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云：晋泰始三年（267），“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四斛，户绢三匹，绵三斤”。

[4] 《晋书》卷四七《傅玄附子咸传》。

[5] 《晋书》卷四七《傅玄附子咸传》。

[6] 《晋书·王恂传》；《晋书·食货志》等。

[7] 《晋书》卷四六《李重传》引重奏曰：“……至于奴婢私产……”

[8] 《世说新语·汰侈》第三○。

[9] 《世说新语》注引《王丞相德音记》。

[10] 《初学记》卷一八引徐广《晋记》。

[11] 《晋书》卷三三《石苞附崇传》。

[12] 见《晋书》卷三○《刑法志》。

[13] 《晋书》卷四三《王戎传》。

[14] 《晋书》卷六○《张辅传》。

[15] 《晋书》卷八九《麴允传》。

[16] 《晋书·石崇传》。

[17] 《初学记》卷一八注引。

[18] 《晋书》卷三三《何曾附子劭传》。

[19] 《晋书》卷四二《王浑附济传》。

[20] 《晋书·石崇传》。

[21]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22] 《晋书·惠帝纪》。

[23] 见拙文《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24] 如晋初关中各族人民起义首领氐族齐万年，就是一个“编户齐民”，见《文选》卷二○《关中诗一首》李善注。

[25] 《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武帝泰始五年正月条等。

[26] 《晋书·傅玄传》。

[27] 《晋书·傅玄传》。

[28] 《晋书》卷三五《陈骞传》。

[29] 见《晋书》卷五七《马隆传》；《晋书·武帝纪》等。

[30] 《晋书·武帝纪》；《资治通鉴》卷七九等。

[31] 《晋书·武帝纪》；《资治通鉴》卷七九等。

[32] 《晋书·武帝纪》；《资治通鉴》卷七九等。

[33] 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44页。

[34] 《晋书》卷四《惠帝纪》；《资治通鉴》卷八二，晋惠帝元康四年、六年条等。

[35] 《晋书》卷四《惠帝纪》；《资治通鉴》卷八二，晋惠帝元康四年、六年条等。

[36] 《晋书》卷四《惠帝纪》；《资治通鉴》卷八二，晋惠帝元康四年、六年条等。

[37] 《晋书·江统传》。

[38]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文选》卷二○《关中诗一首》李善注引傅畅《晋诸公赞》。

[39] 潘岳：《马汧督诔》，载《文选》卷五七。

[40] 《晋书·北狄匈奴传》；《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元年条。

[41] 《晋书·江统传》。

[42] 《三国志·魏书》卷一五《司马朗传》。

[43] 引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210页。

[44] 《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

[45] 《晋书·地理志》。

[46] 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载《魏晋隋唐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7] 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载《魏晋隋唐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8] 《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序》。

[49] 《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序》。

[50] 《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云："初，攸特为文帝（司马昭）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

[51] 《晋书·齐王攸传》。

[52] 《晋书》卷四十《杨骏传》。

[53] 《晋书》卷四《惠帝纪》等。

[54] 《晋书·惠帝纪》；《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楚王玮传》。

[55] 《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等。

[56] 《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等。

[57]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齐王冏传》等。

[58] 《晋书·赵王伦传》。

[59] 《晋书·赵王伦传》，《晋书·齐王冏传》《晋书·成都王颖传》等。

[60] 以上见《晋书·惠帝纪》，《晋书·齐王冏传》《晋书·成都王颖传》《晋书·河间王颙传》等。

[61] 《晋书·成都王颖传》。

[62] 《晋书》卷三九《王沈附浚传》。

[63] 《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序》。

〖第三章〗 刘渊的起兵及汉政权的建立

一 晋末各族人民反晋斗争鸟瞰

西晋自惠帝继位以后，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的内乱，终于引起了晋末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首先点燃晋末起兵反晋烈火的是雍、凉等州以汉族为主的流民。早在元康七年（297）氐帅齐万年起义时，“关中饥，米斛万钱”[1]。“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2]在灾荒、饥馑的威胁下，秦、雍内六郡（即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的流民无以为生，只有成群结队地向南流徙，“相与入汉川（今陕西汉中地区）者数万家”。[3]流民以汉族为主，也有賨人（巴人）、氐、叟等少数民族。其中賨人，或称巴氐[4]，原居四川，后迁汉中；曹操取汉中，迁巴氐于略阳（今甘肃天水东北）。巴氐首领李特、李庠、李流兄弟因在途中多赈济、营护流民，遂成为这批流民的“行主”。到汉中后，流民队伍越来越壮大，达十万余口，汉中一郡不能赈赡。后经过重重阻碍，大部分流民又南入益州，主要分布在广汉、蜀、犍为三郡之地，逐渐安定下来。[5]

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诛杀张华等大臣，时任益州刺史的赵廞见朝廷内乱，欲割据巴蜀，因而重用李特兄弟为部曲督，以一万多流民为部曲，组织流民武装。同年十二月廞，杀西晋新任命的益州刺史耿滕，于次年一月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后由于赵廞猜忌李氏兄弟，杀李庠及宗族子侄三十余人。李特、李流率流民助西晋平定了赵廞的变乱，西晋朝廷又派罗尚为益州刺史，武装上任。永宁元年（301）三月，罗尚到达成都后，执行西晋遣返六郡流民的政策，限七月上道，并对流民实行分化、镇压和残酷掠夺。这样，在李特兄弟周围聚集了大批流民，结营于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准备反抗西晋统治阶级。西晋益州刺史罗尚也积极准备用武力镇压流民的反抗，强迫他们返回秦雍六郡。

双方对峙着，终于在同年十月爆发了以巴氏李特兄弟为首的益州流民大起事；李特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弟流称大将军，初具政权的规模；他们击败了罗尚的军队，进占广汉郡的洛城，攻围成都。李特还约法三章，施舍赈贷，得到蜀人的拥护，数败罗尚军。太安元年（302）五月，李特所率军队击败了镇雍、凉的河间王颙派来镇压的军队，攻占梓潼（治今四川梓潼）、巴西（治今四川阆中），自称益州牧、大将军。次年元月，李特攻占成都小城，罗尚保大城，遣使求和；特还改元建初，赦其境内。二月，李特为罗尚及诸坞堡武装所击杀。流民军在李流的领导下，继续作战，李流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九月，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军与西晋官军作战。太安二年（303）底，李雄攻下成都，赶走罗尚。永兴元年（304）十月，李雄自称成都王；次年，雄即帝位，国号大成。从此，以李特兄弟为首的流民起事也告结束，开始了李雄父子割据巴蜀的成汉国的历史。[6]

太安二年（303），正当李流、李雄领导的流民起兵在巴蜀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西晋统治者调发荆州（治江陵，今湖北荆州附近）民人到益州进攻李特。民皆不愿行，“而诏书催遣严速，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7]。加之镇荆州的新野王司马歆“为政严急，失蛮夷心”[8]。故民人在义阳（今湖北新野）蛮张昌的领导下，于同年五月掀起了反晋的斗争。张昌先聚众于安陆（今湖北安陆）的石岩山，击败江夏太守弓钦，据江夏（治安陆）；以山都县（治今湖北谷城东南）县吏丘沈为天子，更其姓名为刘尼，伪称汉刘氏之后裔，“圣人”出世。昌自称相国，易名李辰，改元神凤，“郊祀、服色依汉故事”[9]。“旬月之间，众三万”，“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10]。他们破武昌，两攻宛城、襄阳，杀新野王歆；昌别部帅石冰、封云后又破江、扬二州；势“跨带五州（荆、豫、江、扬、徐），树立牧守”[11]。直到永安元年（304）八月，石冰、张昌先后为晋军击杀，起事失败。

巴氏李特兄弟领导的益州流民起兵和义阳蛮张昌领导的荆、扬等地起事，主要发生在离西晋统治中心洛阳较远的地方，对西晋的打击还不是致命的。可是在永安元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临近洛阳的并州内迁匈奴部众掀起了反抗西晋的斗争，但由于内迁匈奴贵族刘氏势力很强，匈奴部众反抗西晋统治阶级双重压迫的斗争一开始就为刘渊等贵族所利用，变成了他们独立割据、建立政权的工具。接着在永兴二年河北又爆发了以汲桑、石勒为首的各族人民反晋起事。其时，成都王颖到长安后被废，颖部将公师藩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有数万。平

原牧苑牧帅汲桑与曾被掠卖为奴的羯胡石勒等十八骑，投公师藩。后藩为晋兖州刺史苟晞所杀，军队归汲桑、石勒率领，转战各地，攻拔邺城，南击兖州。永嘉元年（307），汲桑战死，石勒率部投刘渊。[12]

在河北汲桑、石勒起兵的后一年，即西晋永兴三年，在今山东地区又爆发了刘伯根、王弥领导的反晋起事。此年三月，青州东莱惤县（今山东龙口南）令刘伯根起兵反晋，东莱世家子王弥率家童从之，为伯根长史，袭临淄（今山东临淄东）。后伯根为王浚将击杀，王弥招集亡散，势力复振，进兵泰山、鲁国、谯、梁、陈、汝南、颍川、襄城诸郡，入许昌，所在陷没，有众数万。永嘉元年（307），王弥为苟纯所败，率众降刘渊。[13]

以上是刘渊起兵前后，西晋各族人民反晋斗争中主要的几支。自永嘉元年之后，各地流民及少数民族起事更是风起云涌，几乎遍于全国。从以上简述的几次主要起事中，可以得出晋末各族人民起事的一些特点。

第一，晋末各族人民起事带有分散和地域性的特点。这是魏晋以来世族豪门势力的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封建割据因素加强的结果。如以李特兄弟为首的流民起事，局限在益州，张昌起事在荆、扬，王弥在青州，汲桑、石勒在河北等。他们起事时间虽有先后，但大多集中在刘渊起兵的前后。即便如此，他们是各占一隅，互不相连，各自为战的。

第二，少数民族在反晋起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大量的少数民族内迁，他们深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故最富反抗性。上述四次大的起事中，除王弥起事群众及领袖为汉族外，其余三次领袖皆为少数民族（李特兄弟为賨人，张昌为义阳蛮，石勒为羯胡），起事群众中也杂有大量少数民族。

第三，这些反晋起事军大都利用宗教，或打着复“汉”的旗号进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晋起事军所能借以号召群众的思想武器，就是宗教。如李特兄弟利用道教的一个流派五斗米道组织起事[14]；张昌军中以丘沈为“圣人”，“妄称神圣……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在石岩山中作宫殿，“又于岩上织竹为鸟形，衣以五彩，聚肉于其傍，众鸟群集，诈云凤凰降，又言珠袍、玉玺、铁券、金鼓自然而至”。[15]故晋朝统治者称昌为“妖贼”。这一切显然与民间宗教迷信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起事军在政治上打出了“复汉”或拥护某王的旗号，以反抗西晋统治阶级。如

张昌立丘沈为天子，改名刘尼，称汉后裔，以号召群众，使“百姓从之如归”。[16]汲桑、石勒起兵则是打着拥立被废黜的成都王颖的旗号，号召河北人起来反抗统治阶级。颖死后，汲桑杀东瀛公司马腾，“称为颖报仇，遂出颖棺，载之于军中，每事启灵，以行军令”[17]。

通过对晋末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的简述，我们不仅对刘渊建立汉政权的背景有所了解，而且可以为刘渊建国前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找到合理的解释。

二 刘渊的起兵及汉政权的建立

刘渊，系内迁南匈奴单于后裔，其父豹原为内迁五部匈奴的左部帅，在五部中其势力最强。据《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晋书·刘元海载记》等记载：刘渊生于魏嘉平中（249～253），其母呼延氏[18]，曾到龙门祈子，有一大白鱼，顶有二角，跃至祭所，神巫说此为吉兆。是夜呼延氏梦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云食之必生贵子。至是生渊，因其左手有其名，遂以为名。又说渊“龆龀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这一切可以说是后来汉赵国史官和苞之流编造的神话和溢美之词，目的是抬高刘渊一族的地位。该书还曰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与朱纪、范隆同师事崔游；亦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时屯留（今山西屯留南）崔懿之、襄陵（今山西临汾东南）公师彧等善相人，见渊奇之，“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世家王浑、王济父子对刘渊也十分器重。这些记载，虽有一些溢美之处及编造的神话，但从刘渊建立政权后，曾任崔游、朱纪、范隆、崔懿之、公师彧以官爵之事来看，以上所记之事有的还是可信的。它说明了当时某些内迁的匈奴贵族从小学习中国传统的典籍和文化，且具有较高的水平。

至曹魏咸熙中（264～265），刘渊作为匈奴贵族的侍子在洛阳，时掌权的晋王司马昭对其也深待之。渊还与东莱人王弥[19]深相凭结。西晋泰始年间，王浑父子向晋武帝推荐刘渊，武帝召见后，也认为“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20]。王济于是向武帝建议，任刘渊以东南之事，吴国可平也。武帝表示同意。大臣孔恂、杨珧对武帝说：“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武帝默然，事遂寝。咸宁五年（279），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西北各族人民起事军占领凉州，晋廷大震，武帝无计可施。尚书仆射上党人李熹对武帝说：“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反对说：“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武帝乃止。[21]

以上两事，反映了当时西晋统治阶级对内迁匈奴贵族是不信任的，而匈奴贵族也确实怀有恢复过去匈奴汗国的野心。匈奴贵族与西晋统治阶级之间有着深深的裂痕，存在民族的矛盾。刘渊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在送王弥从洛阳东返时，泣对弥说：“王浑、李熹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后齐王攸见刘渊后，劝武帝杀渊，以免为并州患，为王浑所谏止。[22]

不久，刘豹卒，刘渊代父为左部帅。晋太康八年（287），晋迁渊为北部都尉。[23]到惠帝时，又以渊为离石（今山西吕梁离石）将兵都尉。[24]刘渊先后任内迁五部匈奴的左部帅、北部都尉、离石将兵都尉之职，此并非文献记载有误，而是西晋统治者有意削弱其与部众关系的措施。离石为西河的郡治，也是东汉末年内迁南匈奴单于王庭所在地。将兵都尉一职，不见记载，其在离石，且云“将兵”，很可能是晋朝所派至离石领兵监督匈奴五部的职官。也就是说，此职有一定的实权，掌握一定的军队，非五部都尉的虚衔可比。刘渊也就利用此，在离石暗中扩展势力。这正如《晋书·刘元海载记》所云：渊“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杨骏辅政，又以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卿侯，[25]直接假以统率五部匈奴军事的要职。杨骏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拉拢刘渊，欲借匈奴五部为自己的羽翼。到元康末（299），即贾后专政时期，因匈奴五部有逃亡出塞者，刘渊被免官。可是，也就在此时，成都王颖因与贾谧不和，出镇邺城。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拉拢刘渊，又表其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26]。这无疑使刘渊在颖的庇护下，巩固和加强了其在匈奴五部中的地位。尽管如此，成都王颖对刘渊仍然有戒心，命其居邺，以便控制。

到惠帝太安中（302～303），由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齐王冏和长沙王乂等相互残杀，益州流民起事爆发，各地局势不稳，西晋统治已经动摇。深受双重压迫的并州匈奴五部也酝酿着发动反抗西晋统治者的斗争。这时，以刘渊为首的五部匈奴贵族认为时机已到，积极图谋自立复国。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右贤王[27]刘宣，他与五部匈奴贵族秘密商议，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左贤王（刘渊）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28]今司马氏骨肉

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也。”[29]于是，共推刘渊为大单于，遣其党呼延攸到邺与渊联络。渊遂借口回部会葬，请求返部，成都王颖不许；乃遣呼延攸归，告刘宣等召集五部及杂胡，声言助颖，实为反晋做准备。

永安元年（304）三月，成都王颖、河间王颙攻占洛阳，颖被立为皇太弟，以渊为太弟屯骑校尉。接着，东海王越、陈眕挟惠帝攻邺，颖假渊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结果惠帝被俘，东海王越败走，成都王颖即以刘渊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八月，王浚、司马腾攻成都王颖于邺，刘渊对颖说：“今二镇（指王浚、东瀛公腾）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30]成都王颖怀疑匈奴五部是否能调发，又惧王浚等所率鲜卑、乌丸劲旅，欲挟惠帝奔洛阳。刘渊极力劝止，并大言愿“以二部摧东瀛，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大悦，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31]正因成都王颖需要凭借匈奴五部的势力参加夺取皇权的斗争，由此使刘渊的势力一步一步地增长。

成都王颖欲奔洛阳，刘渊得以北单于的身份返回离石北左国城。[32]刘宣等即上渊以原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大单于”，“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33]。刘宣等上渊“大单于”称号，显然有恢复匈奴旧业的意思。近百年以来，受到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双重压迫的内迁匈奴及杂胡纷纷投附，故二旬之间，刘渊由原来五部两万人就发展到五万，都于原南单于王庭的离石。刘渊以子刘聪为鹿蠡王，并遣左于陆王刘宏帅精骑五千，会成都王颖将王粹以拒东瀛公司马腾，粹为腾所败，刘宏无及而归。[34]

接着，王浚主簿祁宏率鲜卑攻入邺，颖挟惠帝逃至洛阳。此时，并州刺史东瀛公腾惧留于并州等地的匈奴五部，乞师于漠南的拓跋鲜卑首领猗㐌，猗㐌与弟猗卢合兵击刘渊于西河，破其众，然后与腾盟于汾东而还。[35]刘渊闻颖等逃至洛阳后，对部众说：“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于是命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率步骑二万将击鲜卑。刘宣进言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详，逆众

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刘宣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内迁匈奴贵族的心理，他们企图乘西晋衰亡之机，光复过去的匈奴国，“兴我邦族”；故以晋为“仇敌”，以其他北方各族为援，不同意刘渊派兵助成都王颖。刘渊虽然同意刘宣的意见，但其起兵反晋的目的，不仅是“复呼韩邪之业”，还要像汉高祖刘邦一样，统一中国。他说：“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𨻶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36]

同年十月，刘渊从离石迁于左国城，胡、汉（所谓“晋人”）归之者数万。[37]刘宣等上渊帝号，渊说：“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可仰尊高祖（刘邦）法，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听宇宙混一，当更议之。”[38]于是乃为坛南郊，即汉王位，下令述汉代诸帝功绩及其继汉刘氏为汉王之意，内云：“……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尫闇，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又大赦境内，改晋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追尊刘禅（刘备子）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39]又立妻呼延氏为王后[40]，置百官：以右贤王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刘宏为太尉，以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崔懿之及匈奴后部（北部）人陈元达为黄门郎，渊族子刘曜为建武将军。[41]崔游固辞不就。[42]从此，刘渊就正式建立政权，中国史家也以晋永兴元年十月，作为汉赵国正式建立的时间。

从刘渊起兵到汉政权的建立，不过短短一两年时间，而且没有经历大的周折就成功了。其原因何在？首先是由于并州匈奴五部及杂胡，早就深受晋朝统治阶级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故刘渊返回左国城后，振臂一呼，众即至五万。他们响应刘渊的号召，主要是为了反抗晋朝统治阶级的压迫，其性质是正义的。但对以刘渊为首的匈奴上层贵族来说，他们反晋的目的是“复呼韩邪之业”，是欲“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即像汉高祖刘邦一样，统一中国；或像曹操一样，割据称王。无论匈奴部众或匈奴贵族，他们起兵反晋的目的都是一致的，而刘渊正是巧妙地用恢复匈奴旧业为号召，把匈奴、杂胡部众反晋的正义斗争纳入了

他割据称王的轨道。

不仅如此，刘渊还与张昌一样，一开始就打出了复“汉”的旗号，且以汉室兄弟自居，宣扬“兄亡弟绍，不亦可乎”！因而，国号曰“汉”，“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封三国时蜀国最后一个汉宗室皇帝刘禅为孝怀皇帝。而刘渊之改姓刘氏，也有助于他打出复汉的旗号。[43]《金石录》卷三有《汉司徒刘雄碑》，内云：“公讳雄，字元英，高皇帝之胄，孝宣帝玄孙。值王莽篡窃，远遁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累叶相承，家云中，因以为桑梓焉。”按，雄为刘渊弟，此碑文竟径直称雄为汉刘邦之胄，故有的历史学家以为，刘渊建立政权时，就是假此以惑众的。[44]当然，刘渊之所以能打出复汉的旗号，是由于内迁匈奴的汉化，主要目的是号召广大汉族人民及世家大族，无怪乎刘渊由离石迁至左国城，胡、晋（汉）归之者数万。

其次，西晋统治阶级的内争，削弱了自身的力量，甚至根本无暇顾及。更有像成都王颖一类的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刘渊的势力来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不断扶植刘渊等匈奴贵族，几次加官晋爵，最后放虎归山。而刘渊本人也打着支持成都王颖的幌子，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失时机地利用形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刘渊建立的汉政权，一开始就是按照两汉汉族政权的模式建成的。这与他打出复“汉”的旗号完全一致。史籍没有详细记载汉政权的机构建置，仅列举了一些重要的职官。其所任职官中，匈奴刘氏一族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渊从祖刘宣、族子刘曜、宗族刘宏等；也有匈奴平民中的佼佼者，如陈元达；还有汉族名儒学士，如崔游、朱纪、范隆、崔懿之等。其中，刘宣是一个决策人物。《晋书·刘元海载记》后附有《刘宣传》，内云：“刘宣，字士则。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汉末‘东州大儒’），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并州刺史王广言之于武帝，帝召见，嘉其占对……乃以宣为右部都尉……元海即王位，宣之谋。故特荷尊重，勋戚莫二，军国内外，靡不专之。”可知其也为一汉化程度很深、智谋出众的匈奴贵族。还有一个匈奴后部人陈元达，《晋书·刘聪载记》后附有传，云其本姓高，“少而孤贫，常躬耕兼诵书”。刘渊为左贤王时闻其名而招之，元达不答。后渊称汉王后，征其为黄门郎。以后，他在汉赵政权内任显职，对政权的建设和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1] 《晋书·惠帝纪》。

[2] 《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戎、晋”，戎，指少数民族，晋，指汉族。

[3] 按，此六郡中，略阳、天水、武都、阴平，原属秦州，扶风、始平属雍州。因太康三年罢秦州，七年复立，故云秦、雍六郡。

[4] 《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云：“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賨人焉。”巴氐，系因巴人李特等迁于略阳，与当地氐人杂居，故史又称其为“巴氐”。

[5] 《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二，晋惠帝元康八年九月条。参见杨伟立《成汉史略》，重庆出版社，1982，第12~13页等。

[6] 《晋书·李特载记》；《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资治通鉴》卷八三等。

[7] 《晋书》卷一○○《张昌传》。

[8] 《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太安二年三月条。

[9] 《晋书·张昌传》；《太平御览》卷三二五引《晋书》等。

[10] 《晋书·张昌传》；《太平御览》卷三二五引《晋书》等。

[11] 《晋书·张昌传》。

[12] 见《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等。

[13] 《晋书》卷一○○《王弥传》；《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六年十二月条等。

[14] 参见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15] 《晋书·张昌传》。

[16] 《晋书·张昌传》。

[17] 《晋书·成都王颖传》。

[18] 按，呼延氏是匈奴四大贵族姓氏之一，且最为高贵，世为辅相，常与单于通婚，见《晋书·北狄匈奴传》。

[19] 王弥，即前述光熙元年起义于青州的王弥。《晋书》有传。

[20] 《晋书·刘元海载记》。

[21] 《晋书·刘元海载记》。

[22] 均见《晋书·刘元海载记》。

[23] 《文选》卷四九《晋纪总论》注引干宝《晋武帝纪》。《载记》只云“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无具体年代。

[24] 《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引《十六国春秋》；《文选》卷四九《晋纪总论》。

[25] 《晋书·刘元海载记》。又，《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八月条又云：“颖以聪（渊子）为积弩将军。”

[26] 《晋书·刘元海载记》。

[27] 《晋书·刘元海载记》作“左贤王”，《御览》卷一一九引《前赵录》作“右贤王”。按，时刘渊为左贤王，宣应为右贤王，《前赵录》确。

[28] “今吾众虽衰……必不虚此人也”一句，引补自《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八月条。

[29] 《晋书·刘元海载记》。

[30] 《晋书·刘元海载记》。内“众十余万”，原作“众余十万”，据上引《通鉴》卷八五改。

[31] 上引《晋书·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八月条。

[32] 左国城，《资治通鉴》卷八五胡注：“左国城，盖匈奴左部所居城也。据《晋书》载记，光武建武之初，南单于入居西河之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单于所徙庭也。《水经注》曰：左国城在汾水之右，介休县西南。杜佑曰：左国城在石州离石县。宋白曰：离石县东北有离石水，因以为名。”按，胡注所云是自相矛盾的，其结论云左国城为匈奴左部所居城误。所引《水经注》“汾水”条内，非“右国城”，而是“左部城”，此城在汾水右，介休县西南，为五部中左部所居城。而左国城，应如杜佑、宋白所云在离石，原为南单于庭，见《资治通鉴》卷八五胡注引《考异》。

[33] 《晋书·刘元海载记》；《魏书》卷九五《匈奴刘聪传》等。

[34] 《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八月条。

[35] 《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八月条。又，《魏书》卷一《序纪》记此事于渊称汉王后，但又在此后记惠帝返洛，故知此事应在惠帝返洛之前，从《资治通鉴》。

[36] 《晋书·刘元海载记》等。

[37] 按，《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前赵录》记为：“晋人东附者数万”，《晋书·刘元海载记》云“远人归附者数万”，《资治通鉴》卷八五云“胡、晋归之者愈众”。又，《晋书·惠帝纪》云渊称汉王为“十一月”，《十六国春秋》等皆云“十月”，从后者，见《资治通鉴》卷八五胡注引《考异》。

[38] 《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前赵录》。

[39] 《晋书·刘元海载记》等。又，《资治通鉴》卷八五胡注："渊以汉高祖、世祖、昭烈为三祖，太宗、世宗、中宗、显宗、肃宗为五宗。"

[40] 《元和姓纂》三云："前赵大司空雁门公呼延冀女，为刘元海后。"呼延翼为大司空在晋永嘉二年渊称帝时，说见后。

[41] 《晋书·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十月条。

[42] 崔游《晋书》卷九一有传，内云："及刘元海僭位，命为御史大夫，固辞不就。"

[43] 参见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和慕容廆的"晋"旗号》，《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44] 吴士鉴：《晋书斠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253页注。

〖第四章〗 汉政权的发展、兴盛及其与西晋的角逐

一 刘渊的称帝及汉政权的发展

西晋建武元年（304）十月，汉政权建立后，晋朝统治阶级的内战仍在进行。十一月，张方拥惠帝及成都王颖从洛阳迁至长安，大权落入河间王颙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西晋朝廷根本无力遣军对付新建立的汉政权。而只有任并州刺史的东瀛公司马腾对直接威胁他的汉政权采取了行动。十二月，腾遣将军聂玄击刘渊，双方大战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北），玄兵大败而还。刘渊遣刘曜攻太原，取泫氏（今山西高平）、屯留（今山西长治屯留南）、长子（今山西长子）、中都（今山西平遥）；又遣冠军将军乔晞攻西河郡，取介休（今山西介休）。[1]刘渊所取的五地均属并州，泫氏、屯留、长子属上党郡，中都属太原郡，介休属西河郡。乔晞在攻占介休后，杀介休令贾浑，将纳其妻宗氏，宗氏骂曰："屠各奴！岂有害人之夫而欲加无礼，于尔安乎？何不促杀我！"[2]宗氏骂乔晞为"屠各奴"，因为乔晞是匈奴四大姓乔氏一族，从此亦可证魏晋时"屠各"一词已变成汉化匈奴的泛称了。刘渊闻乔晞杀贾浑及其妻宗氏，大怒，遣使追还乔晞，降秩四等，收贾浑尸葬之。[3]从这一事件可知，刘渊初起兵时，比较注意胡汉之间的关系，以便得到更多的汉族地主的支持。

汉元熙二年（305）初，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击刘渊，至于离石汾城。渊遣武牙将军刘钦[4]等六军距瑜等，四战皆胜。[5]六月，刘渊率军攻司马腾，腾又求救于拓跋鲜卑猗㐌，猗㐌率轻骑数千攻刘渊，杀其将綦毋豚。[6]不久，离石发生饥荒，刘渊率百官徙于黎亭（今山西长治南）以就邸阁谷。留太尉刘宏、护军将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济之。[7]

就在此前后，国内整个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一是河北、山东等地各

族人民相继爆发了起义。同年七月，成都王颖被废黜，颖部将公孙藩起兵赵、魏，众数万，又有茌平牧苑（今山东茌平南）牧帅汲桑及羯胡石勒等附之。他们攻占郡县，进攻邺城，后为苟晞所败。汉元熙三年（306）三月，山东刘伯根、王弥又举起反晋的旗帜，后刘伯根被杀，王弥亡入长广山（今山东即墨西南）。另一种情况是，西晋统治阶级的“八王之乱”接近尾声，内部做了一些调整。元熙二年（305）八月，河间王颙闻公师藩起兵，表颖为都督河北诸军事，给兵千人。后东海王越起兵攻颙，内战又起。次年（306）四月，东海王越西进至温县，五月拥越的王浚将祁弘攻入长安，挟惠帝返洛阳。大权落入东海王越手中，惠帝以越为太傅、录尚书事，范阳王虓为司空，镇邺，平昌公司马模为镇东大将军，镇许昌，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领幽州刺史。

至此，“八王之乱”始暂告结束，而各族人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当时国内已形成了两个割据政权，即建都离石的汉政权及都成都的大成政权。[8]同年九月，范阳王虓卒，其长史刘舆杀成都王颖。后刘舆得到东海王越的赏识，为其左长史。舆说越遣弟刘琨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9]又以司马腾为车骑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镇邺。十一月，惠帝食饼中毒而死，太弟司马炽即位，即晋怀帝。

以上两方面的情况，对刚建立的汉政权的发展，是很有利的。因为河北、山东的起兵牵制了西晋王朝，使之不能迅速调兵遣将，围攻汉政权；而“八王之乱”使北方，特别是并、冀、司诸州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纷纷加入起义军，造成各地义军此起彼伏、败而复振的情况。可是，西晋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对汉政权却是一个打击。大约在汉元熙三年九月以后，由于并州饥馑及刘渊势力向北的扩展，原并州刺史司马腾再也无法立足，恰好晋廷任命其为都督邺城诸军事，镇邺。于是腾率州将田甄、田兰兄弟，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及吏民万余人，自井陉（今河北井陉北）东下，就谷冀州，号为“乞活”。[10]并州所余之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11]。刘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的，其在路上表说：“……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当然，琨表中的“胡寇”“群胡”指并州匈奴或杂胡；内所记并州人民的悲惨生活，乃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同年底，刘琨在上党募得千余人，转战到晋阳（并州治所，今山西太原南）。时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豹狼满道”。刘琨则“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抚循劳徕，甚得物情”，恢复生产，流民稍集。[12]当时并州晋阳距汉政权都城离石左国城仅三百里许，刘渊当然不能坐视刘琨盘踞并州，于是遣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击刘琨于板桥（在今山西介休），为琨所败。[13]后刘琨密遣人离间刘渊部内杂胡，降者万余落。[14]这样，刘琨在晋阳站住了脚跟，史称其“在官未朞，流人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15]。而刘渊自进兵受挫后，只好固守并州南部诸郡，向北的扩展受到刘琨的阻拦。

在这种形势下，汉政权侍中刘殷[16]、王育[17]向刘渊建议：“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强楚也。”刘渊回答说：“此孤心也。”[18]于是积极准备向南边的河东、平阳等地扩展。

至汉元熙四年（307），河北、山东起义军势力又相继复起。二月，王弥攻青、徐二州，自称征东大将军。五月，汲桑等破邺城，杀司马腾，南击兖州（治定陶，今山东菏泽定陶）。九月，苟晞击败汲桑，桑与石勒收余众准备投归汉政权，又为冀州刺史丁绍败于赤桥。石勒奔乐平（今山西昔阳），汲桑奔回茌平，后为乞活帅田兰等杀于乐陵（今山东乐陵南）。

石勒逃至乐平后，见上党有胡部大张㔨督、冯莫突等有众数千，往从之，深得张㔨督亲信。部大，系胡人部落之长；从张㔨督的名字与勒小名“㔨勒”相近来推测，他可能也为羯胡或杂胡。石勒得到㔨督等的信任后，劝其投汉刘渊，他说：“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距而不从，岂能独立乎？”“如其不能者，兵马当有所属。今部落皆已被单于赏募，往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宜早为之计。”㔨督素无智谋，惧其部叛，遂与石勒单骑投刘渊。刘渊署张㔨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㔨督部。勒以兄事㔨督，改其姓为石，名会。又有乌丸张伏利度，聚众二千，据于乐平。刘渊屡遣使招抚，均遭拒绝。石勒与刘渊定计，伪获罪于渊，逃至张伏利度处，逐渐取得部众的信任。然后，率伏利度部投渊。渊遂以石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众配之”[19]。

在石勒投刘渊后不久，起兵于青、徐两州的王弥为晋苟晞弟纯所败，起兵于赵、魏的刘灵[20]也为晋王䜣所破，两人均遣使降汉。刘渊原与王弥在洛阳交往甚密，至是拜弥“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封东莱公，以灵为平北将军”[21]。此外，在这一时期降附汉政权的，还有上郡（徙治夏阳，今陕西韩城）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于单征等。[22]这就使汉政权的力量大为增长。

汉元熙五年（308）初，刘渊遣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23]二月，石勒攻常山（治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北），为晋安北将军王浚所败。三月，刘渊南下太行，攻汲郡（治汲县，今河南卫辉东），略顿丘（治顿屯，今河南内黄东南）、河内（治野王，今河南沁阳）之地。[24]王弥也分遣诸将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有众数万，四月，攻占许昌，进逼洛阳，京师大震，晋司徒王衍等率百官拒守。弥屯七里涧，为晋军所败，遂与其部下王桑渡过黄河，投奔刘渊。刘渊大喜，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加署弥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25]，以王桑为散骑常侍[26]。同年七月，刘渊进攻平阳（治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守宋抽弃郡奔洛阳，河东太守路述战死。[27]渊遂进据河东，攻占蒲坂（今山西永济西黄河边），徙都于蒲子（今山西隰县）。

从汉元熙元年十月刘渊称汉王始，至五年十月止，汉政权本身的势力从离石扩展到平阳、河东、上党、乐平等郡。同时，河北、山东等地几支大的反晋起事军纷纷归附，大大增强了汉国的实力，使汉国的势力向东扩张到冀、司、青、徐、兖、豫诸州，向西发展到雍州之东，给西晋王朝以很大的威胁。这一有利的形势，促使刘渊君臣决定进一步加强其政权建设。

同年十月，在刘宣等六十四人的劝进下，刘渊于蒲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凤，以其子卫军将军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曜为龙骧大将军。[28]十一月，汉政权丞相刘宣卒。十二月，渊大封宗室及功臣：以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子刘聪为楚王，族子刘曜为始安王，宗室刘景为汝阴王，刘洋为长乐王，刘俊为上郡王，渊兄刘延年为江都王；皇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29]。后又封其子刘裕为齐王，刘隆为鲁王。[30]刘渊还遣使授平晋王石勒持节、平东大将军，校尉、都督、王

如故。[31]

汉永凤二年（309）正月，汉太史令宣于修之向刘渊进言："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蒲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于是渊迁都平阳，并大肆营建平阳都城。[32]时于汾水得王莽时白玉玺，刘渊以为天授，遂改永凤二年为河瑞元年。[33]

与刘渊称帝的同时，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上党太守刘惇（一作庞惇）攻汉上党壶关，汉镇东将军綦毋达战败亡归[34]，上党落入刘琨之手。可是，汉国却在赵、魏一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石勒与刘灵率众三万攻晋魏郡、汲郡和顿丘，多陷世族豪门的坞壁，假垒主将军、都尉之号，简其丁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35]

汉河瑞元年三月，晋左积弩将军朱诞奔汉[36]，具陈洛阳孤弱情况，劝刘渊攻取洛阳。于是，刘渊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将兵攻克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南下至黄河边的延津，又败晋王堪军，沉男女三万余人于黄河。刘渊闻之大怒，说："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遂黜景为平虏将军。[37]从这一事件也可看出刘渊的识略，他处处争取广大"晋人"的支持，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晋朝统治者。刘渊攻洛阳，却先遣军从魏郡南下，目的是借其在赵、魏的势力，攻取洛阳，结果没有成功。但从此以后，汉国统治者因见西晋洛阳势孤力弱，从而放弃了先取关中长安为根本、后占洛阳的战略方针，转而采取先占洛阳后取关中的策略。

同年四月，汉安东大将军石勒攻冀州的巨鹿、常山，杀二郡守将，破郡县百余壁，众至十余万，集汉族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勒还以赵郡张宾为谋主，并州胡羯多附之。[38]五月，刘渊因刘琨占据了上党，切断了他向东与石勒、王弥联络的通道，故封王弥为侍中，都督青、徐、兖、豫、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牧，使其与楚王刘聪共攻壶关。又令石勒为前锋都督参战。刘琨遣护军黄肃、韩述救壶关，刘聪败韩述于西涧，石勒败黄肃于封田，皆杀之。[39]两晋太傅、东海王越又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率军来战。旷欲长驱渡河而进，施融说："彼乘险间出，我虽有数万之众，犹是一军独受敌也。且当阻水为固以量形势，然后图之。"旷不听，进军至太行，与刘聪相遇，战于长

平（今山西高平北），旷军大败，融、超皆战死。[40]在长平之战中，刘聪中流矢，几为晋军所获。后赖部将前部人李景年以马相授，使聪能继续挥戈前战，大败晋军。[41]刘聪遂乘胜重新攻占了上党屯留、长子，凡斩获万九千级。琨上党太守刘惇以壶关降汉。刘琨急遣都尉张倚领上党太守，据襄垣（今山西襄垣北），又派鹰扬将军赵拟、梁余、都尉李茂与张倚并力，轻行夜袭，败聪军，方阻挡了刘聪的北上。[42]此时，在刘琨北面新兴郡居住的原南迁匈奴右贤王去卑孙刘虎，与白部鲜卑皆附汉。刘琨将兵击刘虎，刘聪闻讯，遣兵袭晋阳，不克。[43]

同年八月，刘渊正式开始向洛阳发动进攻，命楚王刘聪、征东大将军王弥率军向洛阳进逼，刘曜、赵固等为之后继。汉军进攻的路线，是由平阳南下，经河东入弘农，沿洛水而至洛阳。西晋太傅、东海王越遣平北将军曹武、将军宋抽、彭默等迎拒，为聪所败。刘聪遂长驱至弘农郡的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晋平昌公司马模时镇长安，遣将军淳于定、吕毅等自长安来，与聪战于宜阳，败绩。聪恃连胜不设备，诈降的晋弘农太守垣延夜袭聪军，聪军大败而归。[44]与此同时，石勒攻常山，王浚遣鲜卑段务勿尘（一作“段务尘”）破之于飞龙山（今河北元氏县东北）。[45]

同年十月，刘渊复大发卒，遣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以大司空呼延翼率步卒后继，沿前次路线进攻洛阳。汉军占领了弘农郡的宜阳后，沿洛水趋洛阳；晋廷以为汉军刚败还，不意复至，遂败于河南（今河南洛阳）。刘聪进屯洛阳西明门，晋护军贾胤夜袭之，战于大夏门，杀聪将呼延颢，其众溃。聪回军而南，屯于洛水，又进屯宣阳门，刘曜屯上东门，王弥屯广阳门，刘景攻大夏门。时汉大司空呼延翼为部下所杀，其众自大阳溃归。刘渊见颢、翼死，敕刘聪等还师。聪表称晋兵微弱，固请留攻洛阳，渊许之。晋太傅司马越婴城自守，聪亲祈于嵩山，令平晋将军、安阳哀王刘厉、冠军将军呼延朗督军。晋司马越命参军孙询、将军丘光、楼裒等率帐下劲卒三千，自宣阳门击斩呼延朗，刘厉惧聪降罪，赴水而死。王弥对聪说：“今既失利，洛阳犹固，殿下不如还师，徐为后举。下官当于兖、豫之间，收兵积谷，伏听严期。”聪因自请留，不敢还。会乞活帅李恽、薄盛等率众救洛阳，汉太史令宣于修之又言于渊：“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十一月，渊遂遣黄门郎傅询召聪等还平阳。[46]而王弥则出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攻襄城（今河南襄城），河东、平阳、弘农、上党的流民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人，烧城邑，杀晋官

吏，以应王弥。[47]后乞活帅李恽等败王弥于颍川郡的新汲（今河南扶沟西南）。[48]

石勒虽有飞龙山之失败，但不久便势力复振，于十一月攻信都（今河北衡水冀州，冀州治所），杀冀州刺史王斌，王浚遂自领冀州刺史。晋廷又遣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击石勒，勒引兵还。晋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于勒。石勒又攻黎阳，裴宪弃军奔淮南（治寿春，今安徽寿县），王堪退保仓垣（今河南开封北）。刘渊遂署勒“镇东大将军，封汲郡公，持节、都督、王如故”。[49]

同年底，刘渊对内又做了一些调整，以陈留王刘欢乐为太傅，楚王聪为大司徒，江都王刘延年为大司空，长乐王刘洋为大司马；遣都护大将军曲阳王刘贤与征北大将军刘灵、安北将军赵固、北平将军王桑，东屯内黄（今河南内黄西）。[50]后又以刘灵为冀州刺史。王弥表请其左长史曹嶷行安东将军，东徇青州，并迎王弥家属，渊许之。[51]

汉河瑞二年（310）正月，刘渊立氐酋单征女为皇后，以子梁王和为皇太子，封子刘乂（单后所生）为北海王。汉镇东大将军石勒渡过黄河攻取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与王弥三万人会合，攻徐、豫、兖等州。二月，石勒袭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杀晋兖州刺史袁孚，又陷仓垣，杀王堪，渡河攻广宗、清河、平原诸县，民从之者九万余口。[52]四月，王浚将祁弘击杀汉冀州刺史刘灵于广宗（今河北威县东）。[53]七月初，刘聪、刘曜及安北大将军赵固围晋河内太守裴整于怀（今河南武陟西南）；石勒率军来会，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今河南武陟东南），怀帝遣兵救之。河内人执裴整降，渊以裴整为尚书左丞，河内督将郭默收整余部，自为坞主，刘琨以默为河内太守。[54]石勒从武德又攻梁巨于长陵（武德附近），擒而杀之，“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55]。

同年七月，刘渊病重[56]，对政权做了大的改革。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加强中央的机构，以陈留王刘欢乐为太宰，长乐王刘洋为太傅，江都王刘延年为太保，为皇太子刘和即位后的辅政做准备。又以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以齐王刘裕为大司徒，鲁王刘隆为尚书令，北海王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始安王刘曜为征讨大都督、领单于左辅，廷尉乔智明为冠军大将军、领单于右辅，光禄大夫刘殷为左仆射，王育为右仆射，任𫖮为吏部尚书，朱纪为中书监，护军将军马景领左卫将军，永安王刘安国领右卫将军，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

西阳王刘璿皆领武卫将军，分典禁兵。[57]这样，刘渊一族就牢牢掌握了汉的军国大权。二是设置管理“六夷”（胡、羯、鲜卑、氐、羌、巴蛮）[58]等少数民族部落的“单于台”于平阳西，单于台最高长官是“大单于”，以刘聪任之，下设单于左右辅，分别由刘曜、乔智明任之。单于台的设置，是在汉政权发展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六夷部落归附，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均与汉族不同，为了便于管理而建立的。到七月十六日（丁丑）刘渊召太宰刘欢乐、太傅刘洋等入禁中，受遗诏辅政。十八日，渊死，皇太子刘和即位。[59]九月，葬渊于永光陵（在山西洪洞县东八里）。

二 刘聪的继立及西晋洛阳的陷落

刘和，字玄泰，系刘渊嫡子。史称其“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及为储贰，内多猜忌，驭下无恩”[60]。刘渊生前，统掌军权，四处征战，多有战功的主要是其子刘聪和族子刘曜，刘和即位，自然猜忌聪、曜，内不自安。其卫尉西昌王刘锐恨其不预顾命，宗正呼延攸（呼延翼子）怨终身不迁官，侍中刘乘素恶刘聪；三人乃相与密谋，说刘和云：“先帝（渊）不惟轻重之计，而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为寄坐耳。此之祸难，未可测也，愿陛下早为之所。”[61]内所谓的“三王”总强兵于内，《资治通鉴》卷八七胡注云：“三王，谓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璿也；或曰：三王，谓齐王裕、鲁王隆、北海王乂。”从以后事变发生后的情况看，“三王”应指齐王裕、鲁王隆、北海王乂。大司马刘聪时为大单于，在平阳西附近的单于台，统六夷十万落，故有“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之说。

呼延攸系刘和舅，刘和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于是召其领军刘盛及刘钦、马景等密谋除“三王”及刘聪。刘盛不同意，说：“先帝尚在殡宫，四王未有逆节。今忽一旦自相鱼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余。四海未定，大业甫尔，愿陛下以上成先帝鸿基为志，且塞耳勿听此狂简之言也……陛下既不信诸弟，复谁可信哉！”刘锐、呼延攸怒之曰：“今日之议，理无有二，领军是何言乎！”并命左右杀刘盛。刘钦等惧，乃与之相盟于东堂，决定由刘锐率马景攻刘聪于单于台，呼延攸率永安王刘安国攻齐王裕于司徒府，刘乘率安邑王刘钦攻鲁王隆，使尚书田密、武卫将军刘璿攻北海王乂。事发后，田密、刘璿挟刘乂斩关奔归于刘聪，聪知有变，即做了准备。刘锐知聪有备，遂合攸、乘等攻隆、裕，攸、乘疑刘钦、刘安国有异志，杀之，又攻杀隆、裕。刘聪即率军攻克平阳西明门，刘锐等逃入南宫，聪前锋入宫，杀刘和于光极西室，又斩刘锐、呼延攸、刘乘等。[62]至此，刘渊死后，诸子争夺皇位的斗争告一段落，时间不到一个月，因此对汉政权本身影响不大。

刘聪，字玄明，一名载，渊第四子，母曰张夫人。《晋书·刘聪载记》云其生时有神异，“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弱冠游于

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刘聪有文武之才可能是事实，但史书也多有溢美之词。后晋新兴太守郭颐辟聪为主簿，任以郡事，举良将，为骁骑别部司马。齐王冏以为国中尉，出为左部司马，寻迁右部尉。[63]河间王颙又表其为赤沙中郎将。聪因父渊在邺，惧为成都王颖所害，故亡奔邺，成都王颖拜其为右积弩将军，参前锋军事。颖以渊为北单于，渊立聪为右贤王，还右部。汉政权建立后，封刘聪楚王，先后任抚军将军、车骑大将军、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转战各地，多立战功。

刘和即位后，首先发难，结果事败身亡，群臣拥聪即汉国帝位。刘聪因北海王乂为皇后单氏所生，让位于乂。乂固辞，聪云：“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祸难尚殷，贪孤年长故耳。此国家之事，孤敢不祗从。今便欲远遵鲁隐，待乂年长，复子明辟。”遂即帝位，大赦，改元光兴，尊父渊妻单氏为皇太后，母张氏为帝太后；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立妻呼延氏（渊母呼延氏从父妹）为皇后；封其子刘粲为河内王，署使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子刘易为河间王、刘翼彭城王、刘悝高平王。[64]此外，为了笼络势力逐渐强大的石勒，封勒为“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汲郡公，持节、开府、都督、校尉、王如故”[65]。

刘聪即位后，西晋各地流民起义及羯、氐、羌等起兵割据仍不断发生。同年八月，秦州略阳氐酋蒲洪为氐众所推，割据于略阳，刘聪遣使拜洪平远将军，洪不受，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66]九月，晋廷下令遣还在南阳（治宛城，今河南南阳）的雍州流民，因关中荒残，流民皆不愿还。晋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遣兵护送，促期令发。京兆人王如遂结流民，夜袭破晋军，又有冯翊人严嶷、京兆人侯如也聚众杀令长响应，很快就形成四五万之众。王如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称藩于汉。[67]这样，石勒来往、转战于洛阳东北的赵、魏诸郡，王弥、曹嶷活动于洛阳以东的兖、豫、青、徐诸州，洛阳南面有流民王如的起兵，刘聪的汉政权则直接控制了洛阳西北平阳、河东、上党诸郡，逐渐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

十月，刘聪命子刘粲及刘曜、王弥率众四万进攻洛阳，同时令石勒率骑二万与粲等合于大阳（今山西平陆南）。石勒败晋监军裴邈于渑池（今河南洛宁西北），长驱入洛川。刘粲等由大阳、宜阳沿洛水而上，经洛阳城南，出轘辕，转战于梁（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陈（治今

河南开封东）、汝（治今河南息县）、颍（治今河南许昌东）间，“陷垒壁百余”[68]。石勒又出成皋关（今河南汜水东），围晋陈留太守王讚于仓垣，为讚所败，退至文石津（今河南滑县南）。[69]汉将赵固与晋车骑将军王申始（一作王甲始）相拒于延津（今河南卫辉东），固军大败。[70]从这次汉国的军事行动看，进军的目的不是直接进攻洛阳，而是进一步扫清洛阳外围的晋朝势力，为下一步攻夺洛阳做准备。

当时，坐镇在并州北部的刘琨、幽州的王浚，势力最强。刘琨引漠南的拓跋鲜卑猗卢，击走了居于新兴一带的铁弗匈奴刘虎及白部鲜卑，与猗卢结为兄弟，并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71]王浚则依靠辽西段氏鲜卑，以二女嫁段氏鲜卑首领务勿尘、苏恕延。怀帝即位后，以浚为司空，领乌丸校尉，封务勿尘为大单于，又表封务勿尘为辽西郡公，别部帅等皆为亲晋王。[72]刘琨之表猗卢为代公，领代郡，而代郡时属幽州，触犯了王浚的利益。王浚不许，并遣兵击猗卢，为猗卢所败。于是刘琨与王浚始结怨，而最终导致两者的败亡。在刘粲、石勒等攻洛阳周围诸郡时，刘琨上表晋廷，请与猗卢共击刘聪、石勒，东海王越恐镇青州的苟晞和镇豫州的冯嵩为后患，不许。刘琨只好遣还拓跋鲜卑猗卢。[73]铁弗匈奴刘虎自被刘琨、猗卢击败后，收集余众西渡黄河，居朔州肆卢川（今陕北榆林西北），遣使降汉，刘聪封其为楼烦公。[74]

时晋京师洛阳饥困日甚，西晋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太傅司马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入援京师。怀帝对使者说：“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时鲜有至者。[75]仅镇襄阳（今湖北襄阳）的镇南将军山简和荆州刺史王澄曾遣军援京师，山简军进至涅阳（今河南南阳东南）为流民起义军王如所败，王如遂围襄阳。王澄见山简军败，由涤口（今湖北宜城西）散还。[76]洛阳城内，西晋诸臣多有议迁都以避刘聪、石勒者。

石勒自退回文石津后，向北欲攻王浚，后赵固为王申始败于延津，勒即南渡黄河，攻杀晋襄城太守崔旷于繁昌（今河南许昌南）。当时据江淮一带的王如、侯脱、严嶷等惧石勒并己，屯兵一万于襄城，阻石勒南下。石勒击破襄城，尽俘其众，又进屯于宛城（今河南南阳）北山。王如惧，送珍宝车马犒师，与勒结为兄弟，说勒攻素与己不和的侯脱于宛。勒攻克宛城，严嶷率众来救，至则无及，降勒。石勒遂杀侯脱，囚严嶷，送之于平阳，尽并其众。接着，石勒又攻襄阳，攻拔江西垒壁三

十余所，又还至襄城，击攻王如弟王璃，复屯江西。[77]石勒南渡黄河的军事胜利，从南面孤立、威胁了洛阳。

在这种形势下，西晋太傅东海王越以讨石勒为借口，摆脱自身的困境，竟然率甲士四万离开洛阳，以太尉王衍为军司，“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留妃裴氏，世子、镇军将军毗及龙骧将军李恽并何伦等守卫京师。越离京师后，东屯于项（今河南沈丘），自领豫州牧。自越走后，洛阳城内“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枹鼓之音不绝”[78]。时王浚将王申始虽败刘曜、王弥于瓶垒[79]，但并没有改变洛阳的困境。晋怀帝原本寄希望于镇青、徐等州的苟晞，可是原王弥左长史曹嶷，破琅邪（治今山东临沂北），北收齐地，兵势日盛，苟晞自顾不暇，一时不能西援洛阳。

与西晋政权的情况相反，汉政权自刘聪即位后却稳步地发展。同年底，刘聪因越次而立，杀其嫡兄刘恭。汉皇太后单氏卒，聪以母为皇太后。[80]又“以其司空刘景为大司马左光禄、刘殷为大司徒右光禄、王育为大司空”[81]。刘聪还吸取了其父渊败亡的教训，以其子粲总督内外诸军事，直接率军参加争战。

汉光兴二年（311）初，石勒先后攻拔江夏（治安陆，今湖北云梦）、汝南、新蔡，陷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所至皆捷。[82]而西晋统治阶级内部又发生了内讧：原来怀帝素恶司马越专权，而苟晞又与越有矛盾，故怀帝密诏苟晞讨越。越知帝与晞讨己，遂于同年三月忧愤而死。王衍等奉越丧还葬东海。[83]四月，石勒率轻骑追东海王越丧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执太尉王衍及晋宗室、诸王、百官。王衍劝石勒称帝，勒夜排墙杀之。石勒焚越尸，并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84]时汉赵固、王桑又攻杀裴盾于彭城（今江苏徐州）。[85]西晋洛阳的处境更加恶化。

五月，苟晞表请怀帝迁都于仓垣，遣从事中郎刘会迎帝。怀帝欲从，公卿犹豫，遂不果行。时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怀帝欲出河阴（今河南孟津北），令司徒傅祗修理舟楫，后不得进而返。[86]此时，汉国开始调集各路大军向洛阳发动进攻。刘聪以卫尉呼延晏为使持节、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军，配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阳入洛川；又命王弥、刘曜、石勒率军会之。呼延晏军进至河南，晋师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王弥等军未至，晏留辎重于张方故垒，进攻洛

阳，攻克平昌门（南面东第一门），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怀帝遣河南尹刘默率军拒战，为晏败于社门（应为“税门”）。[87]

六月，呼延晏因后继未至，出东阳门，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余人而去。时怀帝欲渡黄河东逃，具船于洛水边，晏尽焚船只，还屯于张方故垒。王弥、刘曜军至，会晏合攻洛阳。弥军至宣阳门，入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怀帝出华林园门，欲奔长安，为汉军所执，囚于端门。刘曜自西明门入武库，杀太子及诸王公大臣等二十余人[88]，士民死者三万余人[89]。又发掘陵墓，焚宫庙、官府，迁怀帝及惠帝羊后、传国六玺于平阳。[90]

洛阳陷落后，石勒率军出轘辕，屯于许昌。在攻陷洛阳时，刘曜禁王弥大掠，并斩其牙门王延以徇，弥怒，与曜相攻，死者千余人。[91]弥长史张嵩谏云：“明公与国家共兴大事，事业甫耳，便相攻讨，何面见主上乎！平洛之功诚在将军，然刘曜皇族，宜小下之……”弥于是诣曜谢罪，和好如初。弥因说曜云：“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营造，可徙平阳都之。”曜不从，焚烧而去。王弥怒曰：“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加之刘曜以弥先入洛，不待己至，恨弥，弥遂从前晋司隶校尉刘暾的劝告，率军还据青州。[92]

汉政权攻陷洛阳后，为什么不采纳王弥的建议迁都洛阳呢？原来刘曜等见洛阳几经战乱，残破不堪，且四面受敌，不可守，故焚之而返。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在河陇有奉西晋为正统的张轨父子的势力；镇守雍州的是西晋南阳王模，其子司马保镇于上邽（今甘肃天水）；并州北部有晋并州刺史刘琨，幽、冀二州有王浚，青、豫等州有苟晞兄弟；特别是在江南，还有晋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军事的琅邪王司马睿，势力更为强大。就是在洛阳的四周，自汉军撤离后，各镇自设“行台”，拥兵自守。如晋司徒傅祗建行台于河阴[93]；司空荀藩与弟组等建行台于密（今河南新密东南），传檄四方，推琅邪王睿为盟主，分授官爵[94]；苟晞也拥立逃到仓垣的豫章王司马端（怀帝子）为皇太子，置行台于蒙城（今河南商丘北）[95]。甚至远在幽州的王浚亦于七月，立皇太子，布告天下，备置百官，以荀藩为太尉、琅邪王睿为大将军，浚自领尚书令。[96]此外，洛阳周围还存在着许多拥晋的世家大族，他们拥兵自守，建立坞壁。如原晋度支校尉魏浚，聚保河阴，后屯于洛北；浚族子魏该聚众据一泉坞（在宜阳）；李矩自为坞主，聚屯于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郭默聚屯于河内等。[97]

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自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势力增长，割据倾向加深，故汉政权虽然攻克了京师洛阳，但各地割据势力仍然很强，汉政权如迁都洛阳，必然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刘曜等的决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了西晋统治阶级之间，在洛阳失陷后，争权夺利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三 汉政权的兴盛及其与西晋的角逐

汉政权自攻陷洛阳后，刘聪大赦境内，改元嘉平，以晋怀帝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平阿公，晋侍中庾珉、王俊为光禄大夫”[98]，等待时机，积极准备西取长安。

嘉平元年（311）七月，驻镇长安的南阳王模使牙门将赵染戍守蒲坂，以防汉政权的进攻。赵染求冯翊太守一职遭拒绝，怒而率众降汉，刘聪即以赵染为平西将军。蒲坂是汉进攻关中的军事要冲，赵染的归降，为汉进攻长安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八月，刘聪遣赵染与安西将军刘雅[99]率骑二万攻长安，命刘粲、刘曜率大军作后继。赵染败司马模军于潼关，然后长驱至下邽（今陕西渭南孝义镇）。时张轨遣至长安的将军北宫纯降汉，汉兵围长安。模仓库虚竭，士卒离散，乃降汉。赵染送模于刘粲。九月，粲杀模及其子，送模臣僚梁芬、鲁繇、壮骜、辛谧及北宫纯等于平阳。[100]刘聪闻粲擅杀模父子，大怒，说：“吾恐汝不免诛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无不报。”[101]汉军虽占领关中，但关中此时饥馑，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刘聪以刘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镇长安；又以王弥为大将军，封齐公。[102]

与刘聪取长安的同时，石勒攻阳夏（今河南太康），擒王瓒，以为从事中郎；又袭破蒙城，执苟晞及豫章王端，署晞为左司马。刘聪授勒征东大将军、幽州牧；固辞将军不受。[103]石勒在兖、豫等州的扩张，必然与王弥发生冲突。原来石勒与王弥先后投归汉政权，两人均怀有割据一方的野心，但表面上却很亲密。王弥自洛阳失陷后，与刘曜发生矛盾，在刘暾的劝说下，企图召引据有青、徐的原部下曹嶷之兵，以并石勒，割据青、徐。刘暾携弥书信，召曹嶷至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时，为勒游骑所获。勒杀刘暾，佯不知王弥谋己之策。石勒擒苟晞后，王弥更恶勒，伪卑辞以贻勒云：“公获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石勒及其谋士张宾皆知王弥图己之意，遂决定用计除弥。勒时与乞活帅陈午相攻于蓬关，弥与晋刘瑞相持，弥求救于勒。张宾劝石勒助弥以图之，石勒遂引兵击杀刘瑞，王弥以为石勒实亲己，遂不设备。同年十月，石勒宴请王弥于营，弥长史张嵩劝弥勿往，弥不听。在酒宴上，石勒手斩王弥而并其众，并表刘聪云弥谋反被诛。[104]刘聪大怒，遣使责勒专害公辅，有无上之心，但也无可奈何。

为了笼络日益强盛的石勒，还得加封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持节征讨，都督、校尉、开府、幽州牧、公如故”[105]。后苟晞及其弟纯、王瓒图谋反勒，为勒所杀。石勒并王弥后，引兵攻豫州（治陈县，今河南淮阳），南至长江，屯军于葛陂（今河南新蔡西北）。[106]上述事实，表明石勒企图据有江淮，割据称雄；他擅杀王弥，引起汉政权对他的不满，说明汉政权事实上已失去了对他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刘聪加封石勒为“并州刺史”，显然是让他北返，合力攻占刘琨所据的并州。

石勒与汉政权的矛盾和事实上的分裂，为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分化汉政权找到了可乘之机。原来石勒为人掠夺时，与母王氏失散，王氏后为刘琨所得。于是，刘琨借送勒母王氏及从子石虎（石季龙）为由，致书石勒说：“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昔赤眉、黄巾横逆宇宙，所以一旦败亡者，正以兵出无名，聚而为乱。将军以天挺之质，威振宇内，择有德而推崇，随时望而归之。勋义堂堂，长享遐贵。背聪则祸除，向主则福至……今相授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大郡，以表殊能，将军其受之，副远近之望也……”刘琨以高官厚禄、甜言蜜语，诱石勒叛汉投晋，石勒知西晋衰亡，回书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又遗琨名马珍宝，谢归而绝之，名义上仍臣属于汉。[107]

汉政权虽然攻取了关中，以刘曜镇守长安，但其统治力量是十分薄弱的。原司马模所委的冯翊太守索、安夷护军金城人麴允、频阳令梁肃等，奔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西南）；原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等仍固守新平（治漆县，今陕西彬县）。时安定太守贾疋与诸氐、羌送任子于汉，遇麴允、索、梁肃等，允、等拥之还临泾，共推贾疋为平南将军[108]，率众五万攻刘曜于长安，扶风太守梁综[109]、麴特、竺恢等亦率众十万会之。刘曜遣刘雅、赵染迎拒，攻新平，不克，索綝救兴平，刘雅等败退。曜又尽率长安锐卒与贾疋等大战于黄丘（今陕西泾阳云阳），大败，中流矢，退保甘泉。贾疋遂袭杀汉梁州刺史卢水胡彭荡仲。麴特及杜人王秃等击破刘粲于新丰，粲还平阳。刘曜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掠万余人归于长安。[110]时晋行豫州刺史事、天水人阎鼎纠集河陇流人数千在密县，欲还乡里。正好晋司空荀藩等拥秦王司马邺（司马炎孙）于密建行台，阎鼎等遂拥秦王邺由武关（今陕西商洛南），经上洛（治陕西商洛）至蓝田。贾疋等遣使迎奉秦王邺，入于雍

城（今陕西凤翔），“关中戎、晋莫不响应”[111]。仅刘曜孤守长安。

汉嘉平二年（312）正月，刘聪皇后呼延氏卒。聪即以司空王育、尚书令任𫖮女为左、右昭仪；中军大将军王彰、中书监范隆、左仆射马景女皆为夫人；右仆射朱纪女为贵妃。[112]又欲以太保刘殷女为妃嫔，皇太弟乂固谏，以为不可。聪问太宰刘延年、太傅刘景，皆云刘殷系周之卿士刘康公之后，与陛下殊源，纳之可也。即是说，刘殷是汉族刘氏，刘聪原是匈奴改姓刘氏，同姓不同源，可以为婚。刘聪大喜，使其大鸿胪李弘拜刘殷二女英、娥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又纳殷女孙四人，皆为贵人，位次贵嫔。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聪贪恋女色，朝政不理，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刘英）决之。[113]这是汉国统治者在攻陷洛阳后，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展的形势下，骄奢淫逸的开始，后竟愈演愈烈，以至造成统治阶级的内乱。

二月，刘聪封晋怀帝为会稽郡公，加仪同三司，并从容对怀帝讲其为豫章王在洛阳时，聪与王武子登门造访，献《盛德颂》一事。怀帝卑躬屈膝地回答说：“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刘聪又问怀帝司马一家为何自相残杀？怀帝说：“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刘聪闻之大悦，乃以小刘贵人（刘殷孙女）妻怀帝，封为会稽国夫人。[114]聪又纳其舅子辅汉将军张寔二女徽光、丽光为贵人，此乃聪母张太后意也。

四月，聪封其子刘敷为勃海王，刘骥为济南王，刘鸾为燕王，刘鸿为楚王，刘劢为齐王，刘权为秦王，刘操为魏王，刘持为赵王。[115]刘聪骄奢日盛，以鱼蟹不供，斩左都水使者襄陵王刘摅；作温明、徽光两殿不成，杀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116]又游猎无度，常晨出晚归，观鱼于汾水，昏夜不归，以烛继昼，中军大将军王彰谏曰：“今大难未夷，余晋假息。陛下不惧白龙鱼服之祸，而昏夜忘归……且愚人系汉之心未专，而思晋之怀犹盛。刘琨去此咫尺之间，狂狷刺客息顷而至。帝王轻出，一夫敌耳。愿陛下改往修来，则亿兆幸甚。”刘聪大怒，命斩王彰。彰女为聪上夫人，叩头哀求，乃囚彰于诏狱。聪母张太后以其刑怒过差，三日不食，弟乂、子粲并舆榇切谏。聪怒云：“吾岂桀、纣、幽、厉乎？而汝等生来哭人！”太宰刘延年等诸公卿百余人均免冠涕泣谏。聪才悔悟，说：“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闻过。”乃赦彰，并进为骠骑将军、定襄郡公。[117]

值得注意的是，王彰所说的“今大难未夷，余晋假息”，“且愚人系汉之心未专，而思晋之怀犹盛”，十分恰当地表述了汉政权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余晋假息”，即西晋洛阳失陷、怀帝被俘后，各地征镇建行台，割据一方，与汉政权争逐；另一方面由于汉政权系匈奴刘氏所建，其统治下的广大汉人对之并不拥护，民族之间的隔阂、矛盾加深。而汉政权既没有力量一下子摧毁西晋的残余势力，也不可能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把广大的汉族人民争取过来。因此，汉政权的统治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刘聪的骄奢淫逸在群臣的劝谏下，暂时有所收敛，但不久又故态复萌，且越演越烈了。

在对外方面，嘉平二年初，刘聪开始对北面的刘琨采取进攻。正月，聪命镇北将军靳冲、平北将军卜珝率军攻并州，围晋阳。二月，拓跋鲜卑猗卢遣兵救晋阳；三月，汉军败退，卜珝之卒先奔，靳冲委罪于珝，擅收珝杀之。刘聪大怒，遣御史中丞浩（一作诸）衍持节斩靳冲。[118]卜珝，《晋书》卷九五《艺术传》中有专传，其字子玉，匈奴后部人，精通《易》，隐居龙门山。刘渊称汉王，征其为大司农、侍中，固以疾辞。后复征为光禄大夫。刘聪即位，征为太常。后为平北将军，攻晋阳，为靳冲所杀。[119]

与靳冲、卜珝攻并州的同时，石勒在葛陂课农造舟，准备进攻建邺，晋琅邪王司马睿集江南诸军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纪瞻为扬威将军督诸军以拒勒。三月，大雨不止，勒军饥疫，死者大半，闻晋军将至，集众将议之。有主张降附司马睿者，有云分道进军寿春者，唯张宾劝勒北上取邺城，并说：“……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石勒同意张宾的建议，擢宾为右长史，加中垒将军，号曰右侯。然后，发自葛陂，遣石虎率骑二千佯攻寿春，为纪瞻所败。瞻追虎军百里遇勒，不敢击而还。[120]汉政权在东面的另一支由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所率的军队，见王弥为石勒所杀，惧勒北返并己，遂谋欲引兵归平阳，军中乏食，士卒相食，乃从硋硗津（今河南滑县东北黄河处）西渡，攻掠郡县。时镇守邺城的是刘琨兄子刘演，赵固、王桑惧刘演邀击，遣长史临深为质于刘琨。琨以赵固为雍州刺史，王桑为豫州刺史。[121]

此时，汉政权在长安的局势恶化，刘曜为贾疋等围于长安数月，连战皆败，终于难以支持，遂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122]贾疋等拥秦王自雍城入据长安。五月，刘聪因曜失长安，贬其为龙骧大将军，

行大司马，令其与刘粲攻据河阴的傅祗于三渚（今河南孟津北）。[123]又遣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怀（今河南武陟西南）。[124]傅祗病卒，城为汉军所攻陷，粲迁祗子孙及其二万余户于平阳，聪追赠傅祗为太保，以祗孙纯、粹为给事中。[125]六月，汉大昌文献公刘殷卒；聪又以“河间王易为车骑将军，彭城王翼为卫将军[126]，并典兵宿卫。高平王悝为征南将军，镇离石；济南王骥为征西将军，筑西平城（在平阳西）以居之；魏王操为征东将军，镇蒲子”[127]。这是刘聪以诸子分典兵马，为加强平阳的防御而采取的措施。

时在并州的刘琨，极奢豪，喜声色，重用懂音律的徐润以为晋阳令，干预琨政。琨奋威护军令狐盛，数以此谏琨，并劝琨除徐润，琨不听。后徐润谮令狐盛于琨，琨不察而杀盛。盛子泥奔于刘聪，尽言刘琨虚实，聪大喜，积极准备进攻并州。七月，刘聪遣刘粲、刘曜率兵攻并州，以令狐泥为向导。刘琨闻之，东出收兵于常山、中山，令其将郝诜、张乔拒粲，又遣使求救于拓跋鲜卑猗卢。粲等击败诜、乔，杀之。粲乘虚袭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以晋阳降。八月，琨还救晋阳不及，奔常山。粲、曜入晋阳，俘琨父母，令狐泥杀之，并送晋尚书卢志、侍中许遐、太子右卫率崔玮于平阳。刘聪复以曜为车骑大将军，以前将军刘丰为并州刺史，镇晋阳。九月，聪以卢志为太弟太师，崔玮为太傅，许遐为太保，高乔、令狐泥皆为武卫将军。[128]

同年十月，刘琨求师于猗卢，猗卢遣长子六修、兄子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等数万为前锋，自统大军二十万为后继，刘琨收散卒数千为向导。六修与刘曜战于汾东，曜败，坠马，中七创，赖讨虏将军傅虎以马相授，才脱险，于是渡汾水，入晋阳，夜与刘粲、刘丰等掠晋阳民，逾蒙山（在晋阳西北）归平阳。十一月，猗卢率军追击，与汉军大战于兰谷（在蒙山东南），汉军大败，斩其将刘儒、刘丰、简令、张平、邢延[129]，伏尸数百里。刘琨请猗卢进军，猗卢以士马疲敝为由，谢绝，遗琨马牛羊各千余匹、车令百乘，留其将箕澹、段繁等戍晋阳。刘琨遂徙居阳曲（今山西阳曲南），招集亡散。卢志子湛，从平阳逃归，附于刘琨[130]。汉政权因傅虎救刘曜之功，追赠其为幽州刺史。[131]

在汉政权进攻洛阳周围晋的残余势力及北攻刘琨的期间，在平阳以东两支名义上臣属于汉的势力也有所发展。一支是以赵固、王桑所率的军队，自伪降刘演后，于六月自怀城求还汉，刘聪遣镇远将军梁伏疵将兵来迎。未至，王桑长史临深、将军牟穆率众一万叛归刘演。赵固即随

梁伏疵向西，王桑引众东奔青州，固遣兵追杀桑于曲梁（今河北曲周），桑将张风率余众降刘演。刘聪以赵固为荆州刺史、领河南太守，镇洛阳。[132]

另一支以石勒为首的势力，自三月南击寿春失败后，于六月自葛陂北行，所过之处，坚壁清野，采掠无所获，军中大饥。行抵东燕（今河南延津东北），闻汲郡向冰聚众数千，屯于枋头（今河南卫辉东北）。七月，石勒从张宾之策，先遣支雄、孔苌等从文石津缚筏潜渡黄河，取向冰船，石勒则自文石津西南之棘津渡河，大破向冰，军复振，长驱至邺城。驻守邺城的刘演保三台以自固，原王桑部临深、牟穆复率众数万降于石勒。时勒诸将均欲攻三台，张宾劝勒说：三台险固，攻之不易，不如舍之去；王浚、刘琨才是大敌，宜先取之。“且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也……邯郸、襄国（今河北邢台），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张宾指出石勒“游行羁旅，人无定志”，说中了石勒近几年转战各地，无固定根据地的弱点，因而建议取邯郸或襄国为根本，再图北并刘、王。

石勒从张宾之策，遂进据襄国。张宾又说石勒：都襄国后，必然引起北方刘琨、王浚的进攻；“闻广平（治今河北平乡南）诸县秋稼大成，可分遣诸将牧掠野谷，遣使平阳，陈宜镇此之意”。即是说，张宾劝勒名义上仍臣属于汉，以便对付北面的刘琨、王浚，并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石勒一面遣将分攻冀州郡县，垒壁大多降附，运粮以输襄国；一面又上表刘聪，聪以勒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冀州牧，进封本国上党郡公，邑五万户，开府、幽州牧、东夷校尉如故”。[133]

同年底，石勒遣支雄等击破王浚假署的广平游纶、张豺于苑乡（今河北任县东北），王浚遣督护王昌率诸军及辽西段氏鲜卑辽西公段疾陆眷（一作就陆眷，务勿尘子）及其弟段匹磾、文鸯，从弟末柸，部众五万攻石勒于襄国。石勒击败鲜卑军，擒末柸，遣使以末柸为质，求和于疾陆眷。疾陆眷许之，以铠马金银赂石勒，且以末柸三弟为质而请还末柸。石勒乃令石虎与疾陆眷盟于渚阳（今河北邢台北），结为兄弟。又以末柸为子，遣还辽西。王昌不能独守，亦还军。石勒还遣参军阎综献捷于刘聪。游纶、张豺亦降石勒。接着，石勒又遣军攻信都（今河北衡

水冀州）杀冀州刺史王象，王浚以邵举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134]从此，段氏鲜卑渐背王浚，浚势日衰。

在关中地区，自刘曜从长安退回平阳之后，九月，贾匹等奉秦王邺为皇太子，建行台于长安，设宗庙社稷；邺加贾疋征西大将军，以阎鼎为太子詹事，总摄百揆，以秦州刺史、南阳王保为大司马，又以刚从汉政权逃回的汉卫尉梁芬为卫将军。命司空荀藩、光禄大夫荀组（藩弟）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共保开封（今河南朱仙镇附近）。十二月，原为贾疋所杀的卢水胡彭仲荡子天护率郡胡攻贾疋，擒而杀之。刘聪即以天护为梁州刺史。贾疋余众推始平太守麹允领雍州刺史。阎鼎又与京兆太守梁综争权，鼎杀综。麹允与抚夷邦军索綝、冯翊太守梁肃合兵攻鼎，鼎出奔雍城为氐酋窦首所杀。[135]刚立足于长安的西晋残余势力，由于争权而自相残杀，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在嘉平二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汉政权内部亦发生了一些变动。十月，刘聪又大封其余诸子为王：以子恒为代王，逞为吴王，朗为颍川王，皋为零陵王，旭为丹阳王，京为蜀王，坦为九江王，晃为临川王。又以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顗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聪又因皇后呼延氏卒，六月，欲立贵嫔刘英为皇后；张太后欲立贵人张徽光，聪不得已，许之。英寻卒，其父刘殷也死。十二月，聪立徽光为皇后，以其父张寔为左光禄大夫。[136]

汉嘉平三年（313）正月，刘聪宴群臣于光极前殿，令怀帝青衣行酒，光禄大夫、晋旧臣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聪恶之。会有人密告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聪遂于二月毒死怀帝，杀珉、儁等晋臣十余人。[137]复以会稽刘夫人为贵人。接着，张太后及皇后徽光先后死去，王彰病卒。

三月，刘聪立右贵嫔刘娥为皇后[138]，为之兴造䳄仪殿于后庭。廷尉陈元达切谏云：“……晋氏闇虐，视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绝其祚，乃眷皇汉。苍生引领息肩，怀更苏之望有日矣……陛下龙兴已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兴殿观四十余所，重之以饥馑疾疫，死亡相属，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139]“今有晋遗类，西据关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刘琨窥窬肘腋；石勒、曹嶷贡禀渐疏；陛下释此不忧，乃更为中宫作殿，岂目前之所急乎……陛下承荒乱之余，所有之地不过太宗之二郡（即指汉河东、西河二郡），战守之备，

非特匈奴、南越而已。而宫室之奢乃至于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140]

陈元达在这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汉政权面临的复杂、困难的局势，揭露出汉政权内部的危机。他所说的刘聪自即位以来，大兴土木，兴建殿观达四十余所，加之连年征战，取洛阳，伐长安，北战刘琨，馈运不济，致使饥馑疾病，人民死亡相继，可见其内部阶级矛盾已日趋尖锐。外部形势对汉政权亦极为不利：晋的残余主要有占领关中的秦王邺和据有江南的琅邪王睿；成汉政权割据巴蜀；王浚、刘琨雄踞幽、并，是心腹大患，而臣属于汉的石勒、曹嶷独立称雄的倾向日益明显。汉政权真正能控制的地区，不过只有汉文帝时的河东、西河二郡而已，可是要对付的敌人（包括潜在的敌人）比汉文帝时的匈奴、南越要多得多。

元达的言论，自然触到刘聪的痛处，使之大怒，说我贵为天子，修一殿，为何还要问你这个鼠子；你敢妄言沮众，不杀你，殿修不成！于是命左右推元达斩之，并其妻子同枭东市，使与群鼠同穴。时聪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先锁腰而入，即以锁锁堂下树，大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也，而陛下杀臣。若死者有知，臣要当上诉陛下于天，下诉陛下于先帝……”左右曳之不能动。大司徒任𫖮，光禄大夫朱纪、范隆，骠骑大将军、河间王刘易等叩头出血，切谏。聪默然。刘皇后闻之，亦密令左右停刑，手疏劝谏曰：“……夫忠臣进谏者固不顾其身也，而人主拒谏者亦不顾其身也。陛下为妾营殿而杀谏臣，使忠良结舌者由妾，远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于妾，妾何以当之……妾诚无面目复奉巾栉，愿赐死此堂，以塞陛下之过！”聪览之色变，方改变主意，引元达上，曰：“外辅如公，内辅如后，朕复何忧！”赐任𫖮等谷帛各有差，更命逍遥园曰纳贤园，李中堂曰愧贤堂。又对元达说：“卿当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141]这实际上是此前刘聪欲杀劝谏的王彰的重演。

同年四月，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皇太子邺即皇帝位，是为晋愍帝，大赦，改元建兴；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麹允为使持节、领军将军、录尚书事，京兆太守索綝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京兆尹。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142]五月，愍帝以江南的司马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以据秦州的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大都督陕西诸军事；诏令司马保率精兵三十万至长安，令司马睿率精兵二十万抵

洛阳。令幽、并两州率军三十万直攻平阳。[143]愍帝的继立，使分散各地的西晋残余势力又有了统一的指挥，对汉政权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刘聪于四月即遣刘曜、司隶校尉乔智明及虎牙将军李景年等攻长安，以平西将军赵染为后继。愍帝遣麹允率军屯于黄白城（今陕西三原东北）抵御。五月，刘曜屯军于蒲坂。[144]

此时，石勒命石虎攻占邺城，刘演奔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三台流民皆降于勒。石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镇邺，不久又以石虎代豹。接着，石勒又攻乞活帅李恽于上白（今河北威县东北），杀之。五月，石勒遣孔苌击定陵（今河南漯河郾城西），杀王浚所署兖州刺史田徽；乞活帅薄盛率所部降勒。刘聪授勒“侍中、征东大将军，余如故。拜其母王氏为上党国太夫人，妻刘氏上党国夫人，章绶首饰一同王妃”[145]。这样，山东（指太行山以东）诸郡县相继为石勒所夺取，王浚之势愈衰。而石勒在这一时期分军攻取山东诸郡县的目的是巩固后防，以便北图王浚、刘琨。

同年六月刚受愍帝拜为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的刘琨与拓跋鲜卑猗卢会于陉北，欲谋攻汉。七月，刘琨进据兰谷，猗卢遣普根屯于北屈（今山西吉县北）。琨先遣监军韩据自西河而南，将攻西平城。刘聪遣大将军刘粲等拒琨，骠骑将军刘易等拒普根，荡晋将军兰阳等助守西平。琨等闻汉国有备，引兵还；聪使诸军仍屯所在，为进取之计。[146]时刘曜、赵染等攻黄白城，数败麹允。愍帝又以索綝为征东大将军，率军助允。十月，赵染对曜说：“麹允率大众在外，长安可袭而取之。得长安，黄白城自服，愿大王以重众守此，染请轻骑袭之。”曜乃承制加染为前锋大都督、安南大将军，以精骑五千攻袭长安。渭阳一战，击杀晋将军王广，夜入长安外城，愍帝奔射雁楼。赵染焚龙尾及诸军营，杀掠千余人，后退至逍遥园（在长安西）。晋将军麹鉴自阿城（今西安西）率众五千救长安。赵染退兵，鉴追击，遇刘曜军于零武（今陕西泾阳北），大败而还。刘曜恃胜不设备，十一月，麹允引兵袭曜，汉军大败，冠军将军乔智明被杀，曜引军入粟邑（今陕西白水西北），遂还平阳。[147]十二月，刘聪遣刘曜攻围洛水北石梁坞的晋河南尹魏浚，晋兖州刺史刘演、河内太守郭默遣军来救，曜伏兵深隐处，大破演、默军于黄河北，尽虏演等骑。魏浚遂夜遁，为曜军所获，杀之。[148]

汉嘉平四年（314）正月，刘聪大定百官，使汉政权的政治制度日趋完善。据《晋书·刘聪载记》所记：

聪以刘易为太尉。初置相国，官上公，有殊勋德者死乃赠之。于是大定百官：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绿𬘘绶，远游冠。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149]，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自司隶以下六官，皆位次仆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亚公。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晋王，食五都（郡）。刘延年录尚书六条事，刘景为太师，王育为太傅，任𫖮为太保，马景为大司徒，朱纪为大司空，刘曜为大司马。

刘聪这次大定百官，应是汉政权兴盛时期政治制度完善的标志。如果上述记载确实，则当时汉政权以国都平阳为中心，分置左、右司隶，平阳以西为左司隶，平阳以东为右司隶；左、右司隶以下每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即是说，汉左、右司隶一共约有人口四十三万户。又，汉政权保留了统六夷部落的单于台，史未载任大单于者为谁，是聪自兼任，还是仍由皇太弟乂继任？后者可能性更大。大单于下设“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如此，时汉政权直接统治的人口数约六十三万户（一落按一户计）。此外，在左、右司隶之外，汉政权还任命了一批“州牧”，其中包括名义上臣属于汉的石勒、曹嶷、赵固、王桑等。汉政权真正能控制的地区，只有原晋时的平阳、河东、西河、上党几郡之地；如果加上石勒、曹嶷、赵固等所控制的地区，则包括了原晋时的司、豫、冀、青、徐等州。在当时北方各个割据势力中，汉政权无疑还应是最为强大的。

[1] 《晋书·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十二月条。

[2] 《晋书》卷九六《列女·贾浑妻宗氏传》。

[3] 《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十二月条。

[4] 按，“武牙将军”应为“虎牙将军”，唐人避讳改。

[5] 《晋书·刘元海载记》。

[6] 见《魏书·序纪》。按，《资治通鉴》卷八六胡注引《考异》云：“《后魏书·桓帝纪》及《刘渊传》皆云‘渊南走蒲子’。按晋《载记》，渊无走蒲子事，下云‘自离石迁黎亭’，盖《后魏书》夸诞妄言耳。”从《考异》。

[7] 《晋书·刘元海载记》。

[8] 同年六月，李雄称帝，改元晏平，国号大成。

[9] 《晋书》卷六二《刘琨传》云，以琨为并州刺史在永嘉元年（307），误；应为光熙元年（306年）九月，详细考证见标点本《晋书》卷六二校勘记［四］，中华书局，1974。

[10] 《晋书·新蔡武哀王腾传》；《资治通鉴》卷八六。

[11] 《晋书·刘琨传》。

[12] 《晋书·刘琨传》。

[13] 《晋书·刘元海载记》。

[14] 《晋书·刘琨传》。

[15] 《晋书·刘琨传》。按，刘琨至晋阳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于恢复当地生产，安辑流民，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刘琨本人的评价以及所谓刘琨领导的"晋阳抗战"的性质，应有正确的认识。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刘琨"是一个抗战的民族英雄"，他领导的"晋阳抗战""是一种正义的战争"（张虎峰：《刘琨的晋阳抗战》，《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从本质上看，刘琨与刘渊的战争是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战争，内中也有民族战争的因素；刘琨不应被看成民族英雄，因为并州残破的责任不在刘渊，而在于西晋统治阶级本身，如果我们不死抱着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

[16] 刘殷，《太平御览》卷八九○引《三十国春秋》有传。

[17] 王育，《晋书》卷八九有传。

[18] 《晋书·刘元海载记》。

[19] 以上均见《晋书·石勒载记上》。

[20] 刘灵，《太平御览》卷三九四引《赵书》曰："刘灵，阳平人也。年二十余常厮役于县走及驰马。"永兴二年公师藩起兵，刘灵自称将军，转战赵、魏。

[21] 《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条。按，《晋书·王弥传》云弥降汉是在攻洛阳之后，不确；详细考证见《通鉴》胡注引《考异》。

[22] 《晋书·刘元海载记》。

[23] 《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二年元月条。

[24] 《晋书》卷五《怀帝纪》。

[25] 《晋书·王弥传》等。

[26] 《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二年四月条。

[27] 《晋书·怀帝纪》等。

[28] 《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二年十月条。

[29] 《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二年十月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一《前赵录》等。

[30] 《资治通鉴》卷八七记此事于永嘉三年（309）五月。

[31] 《晋书·石勒载记上》。

[32] 《晋书·刘元海载记》。《太平寰宇记》卷四三云："临汾县，刘元海城。晋永嘉之乱，元海僭称汉，于此置都，筑平阳城，昼夜兴作，不久则崩，募能城者赏之。先有韩媪者，于野田见巨卵傍有一婴儿，收养之，字曰橛儿。时已四岁，闻元海筑城不就，乃白媪曰：我能城之……橛儿乃变为蛇，令媪持灰随后遗志焉，谓媪曰：凭灰筑城可立。竟如所言……"此是关于渊筑平阳城的传说，附记于此。

[33] 《水经注》卷六《汾水》引《魏土地记》等。

[34] 《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二年十一月条。

[35] 《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元嘉二年十一月。

[36] 按，《晋书·怀帝纪》记此事于永嘉三年四月，从《资治通鉴》卷八七。

[37]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三年三月条。

[38] 《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元嘉之年三月。

[39] 《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七引《十六国春秋》，胡注引《考异》曰："《石勒载记》'肃'作'秀'，'封'作'白'，今从《十六国春秋》及《刘琨集》。"

[40] 《资治通鉴》卷八七引《十六国春秋》，胡注引《考异》云："《十六国春秋》作'王广'，今从《帝纪》。"又，见《晋书·怀帝纪》。

[41] 《太平御览》卷三五一引《前赵录》；又，《太平御览》卷三五一、卷八三三引《前赵录》有李景年小传。

[42] 《晋书·怀帝纪》；《资治通鉴》卷八七及胡注引《考异》中的《十六国春秋》《刘琨集》等。

[43] 《资治通鉴》卷八七及胡注引《考异》等。

[44] 《晋书·刘元海载记》；《晋书·怀帝纪》；《资治通鉴》卷八七等。

[45] 《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三年八月条；《太平御览》卷四五引《前赵录》等。

[46] 《晋书·怀帝纪》；《晋书·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三年十一月条等。

[47] 《晋书·王弥传》。

[48] 《晋书·怀帝纪》。

[49] 《晋书·石勒载记上》。

[50] 《晋书·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三年十二月条。

[51]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三年十二月条。

[52]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正月、二月条；《晋书·石勒载记上》。

[53]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条。又，《晋书·怀帝纪》记其事，内刘灵误作“刘灵曜”。

[54] 《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七月条。

[55] 《晋书·石勒载记上》。

[56] 按，《晋书·刘元海载记》、《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前赵录》均记：渊于八月寝疾并病死；《晋书·怀帝纪》云在六月，《资治通鉴》卷八七云在七月，从《通鉴》卷八七胡注引《考异》。

[57]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七月条；《晋书·刘元海载记》。

[58] 《资治通鉴》卷八九胡注：“六夷，盖胡、羯、鲜卑、氐、羌、巴蛮；或曰乌丸，非巴蛮也。”按，晋时乌丸已成杂胡称号，故巴蛮确。

[59] 《资治通鉴》卷八七胡注引《考异》。

[60] 《晋书·刘元海载记附和传》。

[61] 《晋书·刘元海载记附和传》；《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七月条。

[62] 《晋书·刘元海载记》。

[63] 《魏书》卷九五《刘聪传》。《晋书·刘聪载记》“郭颐”作“郭熙”，误。

[64] 《晋书·刘聪载记》；《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前赵录》等。

[65] 《晋书·石勒载记上》。

[66] 《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前秦录》；《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七月条。

[67] 《晋书》卷一○○《王如传》；《魏书》卷九五《石勒传》等。

[68]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十月条。

[69] 《晋书·石勒载记上》。

[70] 《太平御览》卷八七八引《前赵录》。

[71] 《魏书·序纪》等。

[72] 《晋书》卷三九《王沈附浚传》。

[73] 刘琨：《与丞相笺》，见《资治通鉴》卷八七胡注引《考异》。

[74] 《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十月条。

[75] 《晋书·怀帝纪》。

[76] 《晋书》卷四三《山简传》；《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九月条。

[77] 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上》。

[78] 以上见《晋书·东海王越传》；《晋书·怀帝纪》；《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十月条。

[79] 《晋书·怀帝纪》。

[80]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条。

[81] 《晋书·刘聪载记》。

[82] 见《晋书·石勒载记上》。

[83] 《晋书·东海王越传》；《晋书·王戎附衍传》等。

[84] 《晋书·东海王越传》；《晋书·王戎附衍传》；《晋书·石勒载记》等。

[85]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四月条。

[86] 《晋书·怀帝纪》等。

[87] 吴士鉴《晋书斠注》云："《读史举正》曰：按，洛阳有税门，即青明门，无社门。社盖税之讹。"

[88] 按，《晋书·刘聪载记》云曜"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晋书·王弥传》亦同；《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前赵录》仅云"杀晋太子及诸百官已下二十余人"，而《资治通鉴》卷八七此句作"曜杀太子诠、吴孝王晏、竟陵王楙、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河南尹刘默等，士民死者三万余人"。过去史家多用《晋书》以证刘聪等之残暴，恐不确，应从《通鉴》及《前赵录》。

[89] 按，《晋书·刘聪载记》云曜“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晋书·王弥传》亦同；《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前赵录》仅云“杀晋太子及诸百官已下二十余人”，而《资治通鉴》卷八七此句作“曜杀太子诠、吴孝王晏、竟陵王楙、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河南尹刘默等，士民死者三万余人”。过去史家多用《晋书》以证刘聪等之残暴，恐不确，应从《通鉴》及《前赵录》。

[90] 以上均见《晋书·刘聪载记》；《晋书·怀帝纪》；《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六月条。

[91] 《晋书·王弥传》。

[92] 《晋书·王弥传》。

[93] 《晋书》卷四七《傅玄附傅祗传》。

[94] 《晋书》卷四五《荀勖附藩抟》。

[95] 《晋书》卷六一《苟晞传》。

[96] 《晋书·王浚传》。

[97] 见《晋书》卷六三《李矩、魏浚及该、郭默传》。

[98]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七及胡注引《考异》。

[99] 按，《晋书·刘聪载记》记刘雅为“安平将军”，《资治通鉴》卷八七作“安西将军”，从《通鉴》。

[100] 粲杀模父子，《晋书·怀帝纪》云在“八月”，《资治通鉴》卷八七胡注引《考异》云：“按，刘琨《上丞相笺》曰：‘平昌以九月遇祸，世子时镇陇右，故得无恙。’今以为据。”

[101] 《晋书·刘聪载记》。

[102]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七月条。

[103] 《晋书·石勒载记上》。

[104] 见《晋书·石勒载记上》；《晋书·王弥传》。

[105] 见《晋书·石勒载记上》；《晋书·王弥传》；《晋书·刘聪载记》等。

[106] 《晋书·石勒载记上》。

[107] 《晋书·石勒载记上》。

[108] 《晋书·刘聪载记》。按，《资治通鉴》卷八七作“平西将军”，从《载记》。

[109] 《晋书·索綝传》作“扶风太守”，《晋书》卷八九《麹允传》作“京兆太守”，从《索綝传》。

[110] 以上均见《晋书·刘聪载记》；《晋书·贾疋传》《索綝传》；《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十二月条。

[111] 《晋书》卷六○《阎鼎传》；《晋书·刘元海载记》等。

[112]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正月条。

[113] 《太平御览》卷一四二引《前赵录》；《晋书·刘聪载记》。

[114] 《晋书·刘聪载记》等。

[115]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月条。

[116] 《晋书·刘聪载记》。又，《魏书·刘聪传》云：“……将作大将望都公靳陵以营作迟晚，并斩于东市”，与上书所记微有不同。

[117] 以上见《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月条。

[118]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三月条；《太平御览》卷六四六引《前赵录》。

[119] 见《晋书·艺术卜珝传》等。

[120] 《晋书·石勒载记上》。

[121]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月条。

[122] 《晋书·刘聪载记》等。

[123] 《晋书·刘聪载记》云遣曜攻傅祗，《资治通鉴》卷八八云遣刘粲，可能两人均参加。

[124] 《晋书·刘聪载记》。

[125] 《晋书·刘聪载记》。

[126] 刘翼，《太平御览》卷三九四、三七○引《前赵录》作“刘翌”，且云其“骁干（或作‘骁勇’）过人，能一手举殿柱，跳过平阳门出”。

[127]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八八。

[128] 《晋书·刘琨传》；《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八等。

[129] 按，邢延原为刘琨牙门将，汉嘉平元年据新兴叛琨，招引聪，为猗卢所败。见《魏书·序纪》、《资治通鉴》卷八七等。

[130] 以上均见《晋书·刘聪载记》；《晋书·刘琨传》；《资治通鉴》卷八八；《魏书·序纪》等。

[131]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十月条。

[132]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六月条。

[133] 以上所引均见《晋书·石勒载记上》。

[134] 以上均见《晋书·石勒载记上》；《晋书》卷六三《段匹磾传》。

[135] 《晋书·愍帝纪》；《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十二月条。

[136] 均见《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条。又，《太平御览》卷四二四《前赵录》云："张寔为巨鹿太守，治任威强，路不拾遗。曾欲以寔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辞，身骑瘠马，妻乘败车"。

[137]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正月条。

[138] 《晋书·刘聪载记》云："立左贵嫔刘氏为皇后"，误。按，左贵嫔刘英已亡，此应为右贵嫔刘娥，见《晋书·列女·刘聪妻刘氏传》。

[139] 《晋书·刘聪载记》。

[140]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三月条。

[141] 以上见《晋书·刘聪载记》；《晋书·列女传》；《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三月条等。

[142] 《晋书·愍帝纪》；《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四月条。

[143] 《晋书·愍帝纪》。

[144]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四月、五月条。

[145] 《晋书·石勒载记上》。按，内记"乌丸薄盛执勃海太守刘既，率户五千降于勒"。薄盛亦为乞活帅，见《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惠帝光熙元年条。

[146]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六月条。

[147]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十月、十一月条。

[148] 《晋书》卷六三《魏浚传》；《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条。

[149] 《册府元龟》卷二二九、《通志》卷一八六均作"抚军"。

〖第五章〗 汉国的内乱及前赵的继立

一 西晋的灭亡和汉国的衰弱

汉嘉平四年（314）初，刘聪大定百官后，即积极准备进攻长安，以最后灭亡西晋政权。就在这时，扫清了襄国周围西晋残余势力的石勒，即张开了布下的罗网，向幽州方面的王浚进攻了。原来王浚自嘉平三年年底以来，谋称帝号，滥杀臣僚，所任苛刻小人，贪横尤甚；加之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多有叛入辽东鲜卑慕容廆处。而王浚所恃的段氏鲜卑部、乌丸部相继叛离，连年蝗旱，兵势益弱。石勒以为时机已到，遂用张宾之计，遣王子春使王浚处，卑辞厚币，折节以事之。

四年初，王浚遣使随王子春至襄国，勒匿其精甲、劲卒，以弱师示之。浚送勒麈尾[1]，勒佯不敢执，悬之于壁，朝夕朝拜，云："我不得见王公，见王公所赐如见公也。"浚使还，言石勒势弱，无贰心，王浚更加骄怠，不设备。四年二月，石勒将袭王浚，又惧并州刘琨及段氏鲜卑、乌丸为后患，犹豫未发。张宾劝其致书刘琨，送质请和，使原与浚有矛盾的刘琨按兵不动，然后出兵神速，即可成功。石勒从之，于是率军夜行至柏人（今河北内丘北），遣使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浚以自效。刘琨果然中计，以为石勒降己，遂专力对付刘聪，不以勒为意。三月，石勒率军达易水，浚以为勒来为"奉载"自己，令诸将不准狙击。石勒遂进入蓟城（今北京），执浚，后斩之于襄国，又留故尚书刘翰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还。

石勒返襄国后，遣使向汉献捷，刘聪遣使人柳纯持节署勒"大都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侍中、使持节、开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钲黄钺，前后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辞，受二郡而已"[2]。不久，刘翰叛勒，投段氏鲜卑首领段匹磾（务勿尘子），匹磾据蓟城。尽管如此，石勒破王浚，基本上解除了北面的威胁；而刘琨知石勒无降意，大惧，上表曰："东北八州，勒灭其七[3]；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太行、恒山），朝发夕至，城坞

骇惧，虽怀忠愤，力不从愿耳。”[4]

同年五月，汉政权准备就绪，命刘曜、赵染率军攻长安。六月，刘曜军次渭汭（渭水入黄河处），赵染屯于新丰，索綝率军迎拒。赵染因累胜有轻綝之色，其长史鲁徽劝染勿轻敌，染大言曰：“以司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竖，岂能污吾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后食。”晨，双方战于新丰城西，败绩而还。染悔愧，杀鲁徽，徽临刑谓染曰：“将军愎谏违谋，戆而取败，而复忌前害胜，诛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颜面瞬息世间哉……要当诉将军于黄泉，使将军不得服床枕而死。”刘曜闻之，也说：“蹄涔不容尺鲤，染之谓也。”[5]

接着，曜、染合军与将军殷凯率众数万向长安，[6]先败麹允于冯翊，允夜袭凯营，凯败死。[7]于是刘曜率军东下，攻晋河内太守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列三屯以守之。郭默食尽，送妻子为质，并请籴食，籴毕，又设守。曜大怒，沉默妻子于河，攻之。默最后突围投李矩于新郑（今河南新郑）。会刘琨遣参军张肇率鲜卑五百余骑诣长安，道阻不通，还过李矩营，矩说之击汉兵。汉兵见鲜卑，不战而走。后聪遣使谓曜云：“今长安假息，刘琨游魂，此国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丑，何足以劳公神略？可留征虏将军且丘王翼光守之，公其还也。”于是刘曜回军蒲坂，不久又征其辅政。[8]赵染一军仍在关中，七月，染攻北地郡，麹允迎拒，染中流矢而死。[9]这是愍帝即位长安后，汉政权第二次大规模进攻长安，结果是刘曜败还，赵染身亡。

同年十一月，刘聪以子晋王刘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国。这样，汉军国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刘粲手中，而原领大单于的皇太弟刘乂的权力被剥夺殆尽，从而使以前隐蔽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开始暴露。

嘉平五年（315）初，平阳地震，烈风拔树发屋，灾异屡现。三月，刘聪以太庙新成，大赦境内，改元建元。[10]血雨于汉东宫，皇太弟刘乂恶之，以此访其太师卢志[11]、太傅崔玮、太保许遐，此三人皆原晋臣，于是借此挑起了汉国统治阶级内部隐藏了许久的矛盾。在刘聪即位时，曾让位于弟刘乂，乂固辞；遂以乂为皇太弟、大单于。乂母太后单氏时年轻，姿色绝丽，聪烝（下淫上曰烝）焉，乂屡以说母，单氏惭恚而死。聪悲悼无已，乂之宠始衰。后刘聪有意将政权交与其子刘粲，乂仅留太弟的名义而已。卢志等晋旧臣在回答乂的访问时说：“主上往以殿下为太弟者，盖以安众望也，志在晋王（粲）久矣，王公已下莫

不希旨归之。相国之位，自魏武已来，非复人臣之官，主上本发明诏，置之为赠官，今忽以晋王居之，羽仪威尊逾于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由之，置太宰、大将军及诸王之营以为羽翼，此事势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测之危厄在旦夕，宜早为之所。四卫精兵不减五千，余营诸王皆年齿尚幼，可夺而取之。相国轻佻，正可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指刘敷）无日不出，其营可袭而得也。殿下但当有意，二万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马（刘曜）不虑为异也。”乂不从，乃止。后皇太弟东宫舍人荀裕告卢志劝乂谋反，乂不从等事，刘聪遂收志等三人，借他事杀之。又使冠威将军卜抽监守东宫，禁乂朝贺。乂忧惧不知所为，上表自陈，乞为庶人，并免诸子之封，褒美晋王刘粲，宜登储副。卜抽抑而不报。[12]

自汉皇后刘氏死后，嬖宠竞进，后宫无序。陈元达借灾异警告聪曰：“女宠太盛，亡国之征。”[13]聪不听。至此年（315）三月，刘聪到中护军靳准宅，纳其二女月光、月华为左右贵嫔，皆国色也。后数月，聪立月光为上皇后，刘贵妃为左皇后，月华为右皇后。左司隶陈元达极谏，以为“并立三后，非礼也”。聪不纳，以元达为右光禄大夫，外示优崇，实夺其权。于是太尉范隆、大司马刘丹、大司空呼延晏、尚书令王鉴等抗表逊位，以让元达。刘聪只好以元达为御史大夫、仪同三司。其上皇后靳月光有淫秽之行，元达奏闻，聪不得已废月光，月光羞愧自杀。聪追念月光，深恨元达。[14]

是时，汉青州刺史曹嶷尽得齐、鲁间郡县，自镇临淄（今山东临淄东），有众十余万，临黄河置戍，于是有雄踞全齐之志。石勒以曹嶷于汉有贰心。上表刘聪，请自讨击。刘聪害怕石勒并齐，尾大不掉，弗许。[15]

接着，驻守蒲坂的刘曜由盟津（今河南孟津北黄河），将攻河南，晋将军魏该守一泉坞。曜进攻李矩于荥阳（今河南荥阳西南），矩遣将军李平至成皋（今荥阳西北），为曜击灭。李矩遂送质伪降于曜。[16]四月，刘聪又命曜攻长安，数为晋军所败。曜说：“彼犹强盛，弗可图矣。”引军而归。[17]这是愍帝立后，汉政权第三次进攻长安。六月，曜又进攻上党；八月，败刘琨之众于襄垣。曜欲进攻阳曲，聪遣使谓之曰：“长安擅命，国家之深耻也。公宜以长安为先，阳曲一委骠骑（刘易）。天时人事，其应至矣，公其亟还。”曜回灭郭迈，朝聪于平阳，还蒲坂。[18]

同年九月，汉政权开始向长安发动第四次进攻，统帅汉军的仍是汉大司马、中山王刘曜。这次进攻，刘曜改变了前几次沿渭水而上直接攻长安的路线，改由渭水以北，先扫除长安以北的西晋势力，然后南下包围长安的路线。汉军渡过黄河后，先攻北地郡（治泥阳，今陕西铜川耀州）。愍帝以麹允为大都督、骠骑将军率军防御。十月，又以索綝为尚书仆射、都督宫城诸军事。刘曜进拔冯翊，晋太守梁肃奔万年（今陕西西安栎阳）。曜又转攻上郡（治夏阳，今陕西韩城），麹允众饥，去黄白城，而军于灵武（今陕西咸阳东）[19]，以兵弱，不敢进。[20]时愍帝征兵于镇秦州的丞相司马保，保左右皆说：“蝮蛇螫手，壮士断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断陇道以观其变。”从事中郎裴诜说：“今蛇已螫头，头可断乎？”保乃以镇军将军胡崧行前锋都督，等待诸军会集后再发。麹允劝愍帝西投保，为索綝劝止。于是，自长安以西，不复贡晋廷，百官饥乏，采稆（禾自生曰稆）以自存。[21]

汉建元二年（316）初，西晋在刘曜的进攻下，岌岌可危；而汉政权也因军旅岁起，连年征战，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逐渐衰弱。时汉主刘聪沉湎于酒色，游宴后宫或百日不出。其近臣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中宫仆射郭猗、中黄门陵修等宠幸用事，群臣均向王沈等奏事，多不呈聪。王沈等人则以爱憎决事，故勋旧或不得升叙，奸佞小人有数日迁至二千石者。“军旅无岁不兴，而将士无钱帛之赏，后宫之家赐赉及于童仆，动至数千万。沈等车、服、宅宇皆逾于诸王，子弟、中表布衣为内史令长者二十余人，皆奢僭贪残，贼害良善。靳准合宗内外谄以事之。”[22]

郭猗原与太弟刘乂有隙，因此谄事刘粲，挑拨乂、粲之间的关系。他对粲说：“太弟于主上之世犹怀不逞之志，此则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苍生之重怨也。而主上过垂宽仁，犹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风尘之变，臣窃为殿下寒心……臣昨闻太弟与大将军相见，极有言矣，若事成，许以主上为太上皇，大将军为皇太子。乂又许卫军为大单于，二王已许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举事，事何不成……许以三月上巳因宴作难，事淹变生，宜早为之所……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惇，假之恩顾，通其归善之路以问之，必可知也。”粲信之。猗又密谓王皮、刘惇云：“二王逆状，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皆曰：“无之。”郭猗加以威胁和利诱，并出主意说：“相国必问卿，卿但云有之。若责卿何不先启，卿即答云：‘臣诚负死罪，然仰惟主上圣性宽慈，殿下笃于骨肉，恐言成诖伪故也。’”皮、

惇应诺。刘粲果然先后召见皮、惇二人，所答一致，粲更信不疑。”[23]

与此同时，中护军靳准也向刘粲进谗言，诬害太弟刘乂。原来靳准从妹为乂孺子（妾），淫于侍人，乂怒杀之，而屡以嘲准。于是准深恨乂。他对刘粲说：“东宫万机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领相国，使天下知早有所系望也。”又欲言乃止，粲令其言之。准说：“闻风尘之言，谓大将军、卫将军及左右辅皆谋奉太弟，克季春构变，殿下宜为之备。不然，恐有商臣之祸。”粲问计于准，准说：“主上爱信于太弟，恐卒闻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缓东宫之禁固，勿绝太弟宾客，使轻薄之徒得与交流。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轻薄小人不能无逆意以劝太弟之心……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与太宰拘太弟所与交通者考问之，穷其事原，主上必以无将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归太弟，主上一旦晏驾，恐殿下不得立矣。”靳准抓住刘粲亟欲除掉刘乂，以便继皇位的心理，设下了陷害乂的毒计，“以无将之罪罪之”。刘粲也就言听计从，抽去了监护东宫的卜抽兵，等待时机，以求一逞。[24]

刘聪却自去冬以来，不复受朝贺，军国之事一决于粲，唯发中旨杀生除授，王沈、郭猗之流更是为所欲为。聪又立市于后庭，与宫人宴戏，或三日不醒。汉少府陈休、左卫将军卜崇等素恶王沈等，座不与语，为沈等所忌恨，向聪进谗言，诬害陈休等。二月，刘聪出临上秋阁，命收陈休、卜崇及特进綦毋达，大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大司农朱诞等斩之。侍中卜幹泣谏曰：“……陛下如何忽信左右爱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诏尚在臣间，犹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泽，回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诛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岂帝王三讯之法邪！”因叩头流血。王沈叱之曰：“卜侍中欲距诏乎？”刘聪拂袖而入，免卜幹为庶人。太宰刘易、大将军刘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诣阙谏曰：“……今王沈等乃处常伯之位，握生死与夺于中，势倾海内，爱憎任之，矫弄诏旨，欺诬日月，内谄陛下，外佞相国，威权之重，侔于人主矣。王公见之骇目，卿宰望尘下车，铨衡迫之，选举不复以实，士以属举，政以贿成，多树奸徒，残害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尽节于陛下，惧其奸萌发露，陷之极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诛戮，怨感穹苍，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贤愚伤惧。沈等皆刀锯之余，背恩忘义之类，岂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泽也……今遗晋未殄，巴蜀未宾，石勒潜有跨赵、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齐之心，而复以沈等助乱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请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聪以此表示沈等，并笑曰：“是儿等为元达所引，遂成痴也。”王沈等顿首泣告无

罪，聪反好言安慰，又访与沈通谋的晋王刘粲，粲盛称沈等忠清，忠于王室。聪大悦，封沈等为列侯。

刘易又上疏固谏，聪大怒，手坏其表，易遂忿恚而卒。陈元达哭易之死，曰："'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吾既不复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归而自杀。[25]刘聪亲近、重用王沈等奸佞小人，滥杀大臣，无疑是自毁长城；它反映了汉国统治者的日益腐朽、没落，最终导致了汉国的内乱和衰弱。

与汉国内部情况相反，其对外的战争却进展顺利。七月，刘曜转攻晋北地郡。时北地饥甚，人相食，羌酋大军须运粮以济太守麹昌，为汉刘雅军击败。麹允从灵武率步骑三万来救，去城数十里，曜烧城纵火，行反间之计，云"郡城已陷，焚烧向尽，无及矣"。允信之，众惧而溃。曜追击允军于磻石谷（今陕西铜川北），允奔还灵武，曜遂取北地郡。[26]关中危急，可是晋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等，皆拥兵自守；焦嵩甚至回报麹允告急时说："须允困，当救之。"[27]曜军进至泾水之南，渭北诸城悉溃；俘获晋建威将军鲁允、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刘曜素闻鲁允贤，欲为己用，允自杀。梁纬妻辛氏，有美色，曜欲妻之，辛氏誓死不从，曜知其为烈女，听其自杀，以礼葬之。[28]

八月，曜逼近京师长安；九月，焦嵩、竺恢等皆引兵救长安，散骑常侍华辑监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汉兵强盛，不敢进。时秦州司马保所遣镇军将军胡崧率长安以西诸郡兵，破刘曜于灵台（在长安西），崧虑晋国威复振，麹允、索綝功盛专权，乃退兵槐里（在今陕西咸阳），观望不进。刘曜攻陷长安外城，允、綝退小城固守。是时长安内外断绝，城中饥窘，人相食，死者大半，逃亡不可制；唯河西张轨所遣军队千人死守。太仓有麹数十饼，麹允屑之为粥以供愍帝食，既而亦尽。十一月，愍帝见无法支持，遂遣侍中宗敞送降笺于刘曜。索綝留宗敞，使其子至曜处，云："今城中食犹足支一岁，未易可克也。若许綝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綝子送还，并曰："帝王之师，以义行也。孤将军十五年，未尝以谲诡败人，必穷兵极势，然后取之。今索綝所说如是，天下之恶一也……"后宗敞至曜大营，愍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东门降。曜送愍帝君臣至平阳，西晋灭亡。[29]刘聪以愍帝为光禄大夫、怀安侯，麹允自杀，以索綝不忠，斩于东市。又封曜为假黄钺、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太宰，

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30]

在取得倾覆西晋政权胜利的前后，汉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又进一步激化。同年七月，河东、平阳一带发生蝗灾，人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乘机遣将石越率骑二万屯于并州，以招诱抚叛者。刘聪遣黄门侍郎乔诗责勒，勒不奉命，且潜结曹嶷，规为鼎峙之势。[31]而刘聪昏聩、骄奢更甚，除原有的三个皇后（靳氏姊妹及刘贵妃）外，又立原张后侍婢樊氏为上皇后；三后之外[32]，佩皇后玺绶者七人。“朝廷内外无复纲纪，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军旅在外，饥疫相仍，后宫赏赐动至千万。”大将军刘敷屡泣而谏之，聪不听，怒曰：“尔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来哭人！”敷遂忧忿发疾而死。[33]是时，平阳因蝗灾，饥甚，靳准率部人收蝗埋之，后蝗钻土飞出，复食黍豆。平阳司隶部人在石越的招引下，奔于冀州者达二十万户，相当于汉国所领人户的三分之一。刘聪仍昏虐日盛，毫无戒惧之心。九月，聪宴群臣于光极殿，引见太弟刘乂，乂被弄得容貌憔悴，鬓发苍然，聪亦动容悲恸，乃纵酒极欢，待之如初。[34]

十一月，汉国虽灭西晋，取关中之地，但其国已趋衰弱。中国封建史家仍以自然灾异牵强附会地来预兆汉国的衰亡。如《晋书·刘聪载记》云此年底，“聪东宫四门无故自坏，后内史女人化为丈夫”。又记聪子刘约死，一指犹暖，遂不殡殓。后约苏醒，自言见祖刘渊于不周山，后五天复从至昆仑山，三日复返于不周山，见诸王公卿将相死者悉在，宫室甚壮丽，号曰蒙珠离国。刘渊对他说：“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父后三年当来，来后，国中大乱相杀害，吾家死亡略尽，但可永明（刘曜字）辈十数人在耳。汝且还，后年当来，见汝不久。”约回时，道经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赠皮囊一枚，曰：“为吾遗汉皇帝。”约归置皮囊于机上，苏醒后，令左右于机上取皮囊开之，有一方白玉，题文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也。”约于是呈聪，聪说：“若审如此，吾不惧死也。”后聪死，与此玉并葬云云。此事当然是不可信的，叫约编造此神话的可能是皇太弟或聪子，欲以此警聪，使之幡然改悔；此神话亦可能为赵国史官和苞之流的编造。[35]

《晋书·刘聪载记》还记：“时东宫鬼哭，赤虹经天，南有一歧，三日并照，各有两珥，五色甚鲜；客星历紫宫入于天狱而灭。”汉掌天文历法的官员太史令康相借此自然现象，劝谏刘聪说：“蛇虹见弥天，一歧南

彻；三日并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异，其征不远也。今虹达东西者，许洛以南不可图也。一歧南彻者，李氏当仍跨巴蜀，司马睿终据全吴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为胡王，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紫宫之异，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尽言。石勒鸱视赵魏，曹嶷狼顾东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齐、代、燕、赵皆有将大之气。愿陛下以东夏为虑，勿顾西南。吴蜀之不能北侵，犹大汉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师寡弱，勒众精盛，若尽赵魏之锐，燕之突骑自上党而来，曹嶷率三齐之众以继之，陛下将何以抗之？紫宫之变何必不在此守！愿陛下早为之所，无使兆人生心。陛下诚能发诏，外以远追秦皇、汉武循海之事，内为高祖图楚之计，无不克矣。”刘聪览之不悦。康相事实上是借自然现象，向刘聪分析了西晋亡后的形势，以对之进行劝谏。他指出据巴蜀的李雄、奄有江南的司马睿，加上包括二京的汉国，为天下三分之象。李雄、司马睿不能北侵，而汉国亦不能南下。对汉国威胁最大的应是石勒、曹嶷日益增大的势力。今汉国平阳寡弱，若石勒、曹嶷相继来攻，则汉国灭亡在即。康相的分析完全符合当时的形势和汉国危亡的所在，可是刘聪根本听不进去。

西晋灭亡，汉国衰弱，只有石勒的势力正悄悄地、稳步地扩展开来。正如康相的分析，石勒将成为汉国的最大威胁。石勒自嘉平四年（314）初杀王浚取幽州后，虽然也曾遭到自然灾害的冲击，但是他能团结臣僚，采取封建剥削方式，于九月命州郡阅实户口，户出帛二匹、谷二斛，使其统治地区逐渐安定下来。五年，勒将逯明攻茌平（今山东茌平西南），破东燕、酸枣（今河南原阳），徙降人二万余户于襄国。又遣将葛薄攻陷濮阳，杀太守韩弘。九月，刘聪遣使人范龛持节策命勒，赐以弓矢，加崇为陕东伯，得专征伐，拜封刺史、将军、守宰、列侯。[36]

汉建元二年（316）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刘演于廪丘；段匹磾令弟文鸯率军来救，弗能进，虎遂陷廪丘，俘演弟启而还。七月，勒使石越召汉平阳司隶部人二十余万户于冀州。十一月，汉灭西晋后，石勒也加紧了对并州北部刘琨的进攻，围琨乐平太守韩据于坫城（今山西昔阳沾尚镇），据请救于刘琨。而自年初拓跋鲜卑内乱，代王猗卢为其子六修所杀，其部将军卫雄、箕澹等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归琨，琨由是复振。韩据求救，琨新得猗卢之众，也欲以其锐气击勒，故不听箕澹、卫雄“闭关守险，务农息士”的劝告，悉发其众，命澹领步骑二万为前锋，

自后继之。石勒先据险要，设伏击澹军，大败之，一军皆没，并州震骇。刘琨不能复守，因据蓟城的鲜卑段匹磾数遣人邀之，故率众从飞狐口（今山西灵丘西南）至蓟城，投段匹磾。石勒分徙阳曲、乐平民于襄国，置守宰而还。[37]这样，并州之地几乎全部落入石勒手中，并州与平阳相邻，汉国将会遇到石勒有力的挑战。

二 汉国的内乱和前赵的继立

汉麟嘉二年（317）正月，驻守长安的刘曜遣军击盘踞在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的西晋残余势力，击败晋弘农太守宋哲，哲弃城奔江东。[38]二月，刘聪又遣其从弟刘畅率步骑三万攻荥阳的李矩，矩屯军韩王故垒（在今河南新郑），相距七里。畅遣使招矩，因矩曾伪降刘曜，故先招之。李矩见汉军猝至，未及防备，遂诈降畅。刘畅不设备，部将皆醉。矩欲夜袭畅营，而军士多惧汉军，矩乃遣将郭诵祷于子产祠，使神巫扬言："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于是，军士踊跃争进，夜袭畅营，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39]后郭默又遣弟芝率众助李矩，矩乃与芝马五百匹，分军三道追击汉军，大获而还。[40]

这时，宋哲逃至建康，司马睿等方知长安失陷，愍帝被俘；睿臣僚皆劝其称帝，睿不许，只称"晋王"，始置百官，立宗庙、社稷。在黄河以北所余之西晋旧臣，如刘琨、段匹磾等一百多人联名遣使诣建康，上表劝进。甚至远在辽东的慕容部鲜卑首领慕容廆，为了扩展势力，收买汉族人心，也打起"晋"的旗号，遣长史王济浮海至建康劝进。因此，正如汉太史令康相所分析的那样，西晋政权虽然灭亡，汉国面临局势仍然十分严峻。

可是，汉国统治者对此似乎视而不见，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却越演越烈。同年三月，汉相国刘粲急欲除去争夺帝位的障碍，开始发难，命亲信王平对皇太弟刘乂说："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敕裹甲以备之。"乂信以为真，令宫臣裹甲以居。刘粲急遣人告靳准、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东宫阴备非常，将若之何？"靳准告刘聪，聪大惊曰："岂有此乎！"王沈等同声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聪于是遣粲兵围东宫；粲又使靳准、王沈等收氐、羌酋长十余人，严刑拷问，悬首高格，烧铁灼目。氐、羌酋长原不过是乂任大单于时的部属，受刑不过，乃自诬与乂谋逆。刘聪对沈等说："而今而后，吾知卿等忠于朕也。当念为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于是诛乂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属僚数十人，这些人皆为靳准、王沈等一伙平日怨恨者。废太弟乂为北部王，粲阴使准杀之，又"坑士众万五千人，平阳街巷为之空"。聪闻乂死，大哭说："吾兄弟止余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由于聪、粲滥杀无辜及氐、羌酋长，一时引起氐、羌部众的反抗，众有十余万落，聪以靳准为行车骑大将军率军镇压。

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州大蝗，汉统治地区的平阳、冀、雍尤甚。靳准灭蝗，二子死之。又，黄河、汾水溢，漂千余家。[41]汉政权内部的所谓“东宫之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使刘粲、王沈、靳准等最终掌握了汉国军政大权，而且宗室自相残杀，乂及其亲厚大臣、东宫卫士等死于非命，平阳为之一空，门阁宫殿荡然。更严重的是，滥杀氐、羌酋长等，引起了汉国内少数民族十余万人的反抗；人祸加上天灾，使汉国迅速走上衰亡之路。刘聪只好紧紧地依靠其子粲及靳准、王沈等来维持统治，以粲为皇太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故。[42]

接着，汉国又发生了镇守洛阳的赵固的叛变事件。自汉嘉平二年（312）聪以赵固镇守洛阳后，固与其长史周振不和，振经常向聪密谮固。李矩破刘畅时，从畅帐中获得刘聪与畅书，内令畅破矩后，过洛阳收斩赵固，以周振代守洛阳。八月，赵固袭杀晋卫将军华荟于临颍（今河南临颍北）。李矩遂将所获畅书示固，固见书后，即杀周振父子，率骑一千降，李矩仍令其还守洛阳。[43]这样，汉国东面的一个重要据点又失去了。

同年十一月，刘聪校猎于上林，以愍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行三驱之礼。观者有指愍帝说：“此故长安天子也。”群众聚而观之，有父老悲泣者。刘粲见人心尤思晋，便对聪曰：“今司马氏跨据江东，赵固、李矩同逆相济，兴兵聚众者皆以子邺（愍帝）为名，不如除之，以绝其望。”刘聪云：“吾前杀庾珉辈，而民心犹如是，吾未忍复杀也，且小观之。”十二月，刘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执盖。原晋臣多涕泣，有失声痛哭者。尚书郎陇西辛宾更是抱愍帝大哭，聪命推出斩之。[44]刘聪这样做是为了借此观察原晋臣及晋人的态度。

时赵固与晋河内太守郭默会兵攻汉河东，至绛邑（今山西绛县西北），汉右司隶部民三万余人盗马负妻子奔降之。汉骑兵将军刘勋追击，杀万余人，固、默引归。刘勔于途中邀击，为赵固所败。刘聪命太子粲率将军刘雅[45]等步骑十万屯于小平津（在今河南孟津东），赵固扬言：“要当生缚刘粲以赎天子（愍帝）。”刘粲闻之，上表于聪曰：“子邺若死，民无所望，则不为李矩、赵固之用，不攻自灭矣。”刘聪至是杀愍帝于平阳。刘粲遣刘雅率军攻洛阳，赵固奔阳城山（今河南嵩山东北）。[46]

汉麟嘉三年（318）三月，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在群臣的拥戴下即帝位，改元太兴，史称“东晋”。时赵固求救于李矩，矩使郭默、郭诵救赵固，屯于洛汭（洛水入黄河处），遣耿稚、张皮偷渡黄河，袭刘粲。汉贝丘人王翼光[47]自厘城（今河南花园口附近）觇知，告粲，请为之备。粲以为赵固已败，自保不暇，不敢来袭，遂不设备。是夜，耿稚等袭粲营，粲奔溃，杀伤大半，据其营，获器械军资不可胜数。[48]粲败走阳乡（在今河南获嘉）。及天明，粲见张皮等人少，更与刘雅合兵攻之，刘聪又遣太尉范隆率骑来助，双方苦战二十余日。李矩率军来救，使壮士三千泛舟迎耿稚、张皮等。汉兵距守黄河，作长钩以钩船，连战数日不得渡。后李矩遣部将格增潜渡河入皮垒，杀牛马、焚营，夜突围而出，奔武牢（今河南成皋附近）。刘勋追击，战于河阳（今河南孟州西），击败耿稚军，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余人。[49]

是时，汉平阳螽斯则百堂[50]发生火灾，烧死刘聪子会稽王衷以下二十一人。[51]聪闻之，哀塞气绝，良久乃苏，乃以子骠骑大将军、济南王刘骥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卫大将军、齐王刘劢为大司徒。[52]同年四月，刘聪见中常侍王沈养女（原为沈婢女）有妙色，遂立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等谏曰：“……从麟嘉以来，乱淫于色，纵沈之弟女，刑余小丑（指王沈等宦官）犹不可尘琼寝，汙清庙，况其家婢邪！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异象榱玉箦而对腐木朽楹哉！臣恐无福于国家也。”聪大怒，使宣怀对粲说：“鉴等小子，慢侮国家，狂言自口，无复君臣之礼，其速考竟！”于是送鉴于市，斩之。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驰入将谏，门者弗通。鉴等临刑时，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复能为恶乎！乃公何与汝事？”鉴瞋叱之曰：“竖子！使皇汉灭者，坐汝鼠辈与靳准耳，要当诉于先帝，取汝等于地下。”崔懿之也曰：“靳准枭声镜形，必为国患。汝既食人，人亦当食汝。”皆为聪所杀。刘聪又立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53]

正当刘聪杀戮大臣、自毁长城之时，名义上仍属汉的石勒，势力又有所增长。同年五月，投靠段匹磾的刘琨等，为段匹磾所杀，琨原将佐多投石勒。[54]据青州的曹嶷，则早在麟嘉二年（317）六月就叛离汉国，上表劝司马睿称帝。后又以建康悬远，势援不及，与石勒相结，石勒授其为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邪公。[55]石勒即一面遣军与东晋争夺黄河两岸之地；一面则静观汉国的衰败，以便乘机扩展自己的势

力。

同年七月，刘聪病重，灾异屡现，聪对粲说："吾寝疾惙顿，怪异特甚。往以约（即东平王刘约）之言为妖，比累日见之，此儿必来迎吾也。何图人死定有神灵，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难未夷，非谅闇之日，朝终夕殓，旬日而葬。"又征刘曜为丞相，石勒为大将军，皆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曜、勒知粲、靳准等绝不会容己，固辞不奉诏。聪只好封曜为丞相，领雍州牧；勒为大将军，领幽、冀二州牧，勒辞不受。又以上洛王刘景为太宰，济南王刘骥为大司马，昌国公刘顗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七月十九日（癸亥）刘聪卒，次日刘粲即帝位，尊聪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武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立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改元汉昌。葬聪于宣光陵，谥曰昭武皇帝，庙号烈宗。[56]

刘粲，字士光。史称其"少而俊杰，才兼文武。自为宰相，威福任情。疏远忠贤，昵近奸佞。任性严刻无恩惠，距谏饰非。好兴造宫室，相国之府仿像紫宫，在位无几，作兼昼夜"。观前述刘粲之言行，史不诬也。粲即位后，因原聪后靳氏等均未满二十，有美色，粲晨夜烝淫于内，无复哀戚。

靳准阴有异志，欲借粲之手，除去朝中掌权的诸刘氏，于是向粲进谗言："如闻诸公将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谋先诛太保（呼延晏）及臣，以大司马（刘骥）统万机。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祸之来也，不晨则夕。"粲不纳。准惧其言之不从，谓二靳氏曰："今诸公侯欲废帝，立济南王，恐吾家无复种矣。盍言之于帝。"二靳氏言于粲，粲信之；于是收太宰景、大司马骥、骥母弟车骑大将军吴王刘逞、太师顗、大司徒齐王劢，皆斩之。太傅朱纪、太尉范隆出奔长安，投刘曜。八月，粲治兵于上林，谋讨石勒。以丞相曜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仍镇长安，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至此，刘粲就荒耽酒色，游宴后庭，军国之事，一决于准。靳准又矫旨封其从弟靳明为车骑将军，靳康为卫将军。[57]

靳准在做了上述准备之后，始谋发动变乱，取粲而代之。他因金紫光禄大夫王延耆德时望，而谋之于延。延不从，驰告刘粲，遇靳康，为其所拘。靳准见事即将败露，遂发难，带兵升光极殿，使甲士执刘粲，数而杀之。又将刘氏男女无论少长皆杀于东市。发掘刘渊、刘聪陵，戮渊尸，焚刘氏宗庙。靳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称制，置百官。[58]靳

准一族也系汉化之匈奴（屠各）[59]，其夺匈奴刘氏帝位，杀刘氏一族后，就企图利用广大汉族人心思晋的情绪，投附东晋，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他遣使告晋司州刺史李矩曰："刘元海屠各小丑，因大晋事故之际，作乱幽、并，矫称天命，至令二帝幽没虏庭。辄率众扶侍梓宫，因请上闻。"矩遣使告东晋元帝司马睿，元帝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即怀、愍二帝灵位及尸）。[60]在平阳，汉左光禄刘雅出奔西平城，原晋旧臣、汉尚书北宫纯、胡崧等招集晋人（汉人）保于东宫，靳康攻灭之。靳准欲以王延为左光禄大夫，延骂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杀我，以吾左目置西阳门，观相国（刘曜）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门，观大将军（石勒）之入也。"准怒，杀延。[61]

靳准政变后，刘曜、石勒相继率军赶到平阳平乱。石勒先命张敬率骑五千为前锋，自统精锐五万继之，据襄陵（今山西临汾东南）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落。靳准数挑战，石勒坚壁以挫之。[62]冬十月，刘曜率军抵赤壁（在今山西河津），太保呼延晏自平阳来归，与朱纪、范隆等共上尊号。曜即帝位，大赦境内，唯靳氏一门不在赦例，改元太初；以朱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范隆以下悉复本位；署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进爵赵公"。[63]石勒先攻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巴人及羌、羯降勒者前后十余万落，勒徙之于司州诸县。[64]

刘曜则令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屯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与石勒为掎角之势。时勒与曜皆有招怀靳准的打算，十一月，靳准先遣侍中卜泰奉乘舆、服御向石勒请和，勒乃送卜泰于刘曜，目的是使曜知城内无降其意，以挫曜军势。刘曜获卜泰，对其曰："先帝末年，实乱大伦，群阉挠政，诛灭忠良，诚是义士匡讨之秋。司空（靳准）执心忠烈，行尹、霍之权，拯济涂炭，使朕及此，勋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宁济大艰，终不以非命及君子贤人。司空若执忠诚早迎大驾者，政由靳氏，祭则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刘曜在这里盛赞靳准，不过是诱其降也。然后，曜又送卜泰还平阳，宣谕靳准等速降。石勒疑泰与曜有谋，欲杀泰，诸将劝勒说："今斩卜泰，准必不复降，就令泰宣汉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诛靳准，准必惧而速降矣。"石勒乃从诸将议，遣还之。卜泰还平阳，说靳准降曜，准因杀曜母、兄，沉吟未从。

十二月，汉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等与卜泰杀靳准，推尚书令靳明为主，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于刘曜。石勒大怒，遣令

史羊升使平阳，责明等杀准。靳明斩羊升，石勒遂进军攻之，明出战，为石勒所败，枕尸二里。靳明筑城门坚守，不复出战。石勒又调石虎率幽、冀州兵十余万攻平阳小城。靳明求救于刘曜，曜遣征东大将军刘畅救之，为石勒所败。[65]曜遣刘雅、刘策等迎靳明，明乃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曜即退屯于粟邑。石勒进入平阳，焚宫室，使裴宪、石会修复渊、聪二墓，收粲已下百余尸葬之，徙浑仪、乐器于襄国，置守宰而还。[66]

刘曜下令诛杀靳明，凡靳氏男女无少长皆杀之；又见靳康女有美色，欲妻之，康女不从，号泣请死，曜哀之，免康一子死。[67]曜还遣刘雅迎母胡氏丧于平阳，还葬于粟邑，号曰阳陵，谥曰宣明皇太后，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后。

汉光初二年（319）二月，石勒遣左长史王修等献捷于汉，刘曜也遣其兼司徒郭汜[68]等持节署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拜王修及其副刘茂皆为将军，封列侯。勒舍人曹平乐[69]，从修出使，因留于汉。他对曜说：“大司马遣王修等来，外表至虔，内觇大驾强弱，谋待修之返，将轻袭乘舆。”时刘曜势实残敝，恐王修等返后泄露，遂追还郭汜，停止封授，并斩修于市。三月，副使刘茂逃回襄国，言修死状，石勒大怒说：“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天不助恶，使假手靳准。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故复推崇令主，齐好如初，何图长恶不悛，杀奉诚之使。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遂杀曹平乐三族，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70]这样，刘曜、石勒最后和解的可能已消失，双方遂成敌国。

同年四月，刘曜从粟邑徙都长安，立妃羊氏（即原怀帝羊皇后）为皇后，子熙为皇太子；封子袭为长乐王，阐为太原王，冲为淮南王，敞为齐王，高为鲁王，徽为楚王。征诸宗室皆晋封为郡王，缮宗庙社稷、南北郊。又尊高祖父亮为景皇帝，曾祖父广为献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刘曜又下令曰：“盖王者之兴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刘渊）以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民庶，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刘聪）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御以大单于为太祖，其速议以闻。”于是太保呼延晏等议曰：“今宜承晋尹子传号，以光文本封卢奴中之属城，陛下勋功懋于平洛，终于中山。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宜革称大赵，遵以水行。”曜

从之，于是以冒顿配天，刘渊配上帝。[71]从刘曜君臣的话中，知刘渊建国时用“汉”旗号，是为了借汉朝之名，以号召汉族，把自己打扮成汉朝的继承者。但刘渊一族毕竟原是匈奴冒顿单于的后裔，到曜即位时，西晋灭亡，北方处于各族融合和割据之中，再用“汉”旗号，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刘曜提出“除宗庙，改国号”的问题，呼延晏等大臣以刘渊曾被封为“卢奴伯”，刘曜曾为“中山王”，中山原为赵国地，故建议改国号为“赵”，曜从之。因石勒建政权后，国号亦曰“赵”，故史家称刘曜继汉后所建政权为“前赵”，石勒政权为“后赵”。

[1] 《资治通鉴》卷八九胡注云：“麈，肿庾翻，麋属，尾能生风辟蝇蚋，晋王公贵人多执麈尾，以玉为柄。”

[2] 《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二年三月条。

[3] 《资治通鉴》卷八九胡注云：“勒入邺，杀都督东燕王腾；寇信都，杀冀州刺史王斌；袭鄄城，杀兖州刺史袁孚；攻新蔡，杀豫州刺史新蔡王确；袭蒙城，擒青州都督苟晞；克上白，斩青州刺史李恽；攻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攻定陵，杀兖州刺史田徽；袭幽州，擒王浚；除李恽、田徽、王浚承制所授，是灭其七也。”

[4]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二年三月条。

[5] 《晋书·刘聪载记》；《太平御览》卷四五四引《前赵录》等。

[6] 《太平御览》卷二二六引《前赵录》作“段凯”，且云：“段凯骁勇善射，好读书，为御史中丞，明笔直绳，无所阿避，号曰老虎。”

[7] 《晋书·麹允传》；《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二年六月条。

[8] 以上见《晋书·郭默传》；《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二年六月条；《晋书·刘聪载记》等。

[9] 《晋书·刘聪载记》云：“赵染寇北地，梦鲁徽。大怒，引弓射之，染警悸而寤。旦将攻城，中弩而死。”

[10] 《晋书·刘聪载记》等。又，《资治通鉴》卷八九胡注引《考异》云：“《十六国春秋》，建元元年在晋建兴二年。同编修刘恕言，今晋州临汾县嘉泉村有汉太宰刘雄碑，云‘嘉平五年，岁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则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后也。”从《考异》。

[11] 按，《资治通鉴》卷八八胡注引《考异》曰：“《刘聪载记》：‘志劝太弟乂作乱，被诛。’按，志劝成都王颖起义兵，谏颖攻长沙王乂，忠义敦笃，始终不亏，非劝人作乱者也。今从《卢谌传》。”此乃《考异》作者从卢志过去行为推测出来的结论，不足为据，而《晋书·卢谌传》云谌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阳者，悉为刘聪所害”，未言遇害时间。故从《载记》。

[12] 《晋书·刘聪载记》。

[13]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二年正月条。

[14]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三年三月条。

[15]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三年三月条。

[16] 《晋书·刘聪载记》。

[17] 《晋书·刘聪载记》。按，此事不见他书记载。

[18]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三年八月条。

[19] 《资治通鉴》卷八九胡注此灵武曰："汉北地郡之灵武县也。"按此北地郡治今陕西铜川耀州区，则此灵武县当在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一带。

[20] 见《资治通鉴》卷八九；《晋书·刘聪载记》；《晋书·愍帝纪》等。

[21] 《晋书·愍帝纪》；《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三年九月、十月条；《晋书·索綝传》等。

[22] 《晋书·刘聪载记》等。

[23]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正月条及胡注。

[24] 见《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正月条等。

[25] 以上见《晋书·刘聪载记》；《太平御览》卷四五四引《前赵录》、《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二月、三月条。

[26] 《晋书·麴允传》；《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七月条。

[27]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七月条等。

[28] 《晋书·列女·梁纬妻辛氏传》；《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七月条。

[29] 以上见《晋书·索綝传》；《晋书·刘聪载记》；《通鉴》卷八九等。

[30] 《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十一月条；《晋书·刘聪载记》。

[31] 《晋书·刘聪载记》等。

[32] 《资治通鉴》卷八九胡注云："据《载记》，三后，二靳氏及刘氏，樊氏为四。《考异》曰：《刘聪载记》曰'四后之外'。按，时靳上皇后已死，唯三后耳。"

[33] 《晋书·刘聪载记》。

[34] 《晋书·刘聪载记》。

[35] 此事又见《太平御览》卷三八引《十六国春秋》。按，《晋书》可能据《十六国春秋》，而《十六国春秋》作者崔鸿又据前赵史官和苞所撰《汉赵记》。

[36] 见《晋书·石勒载记上》等。

[37] 《晋书·刘琨传》；《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十一月条等。

[38] 《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建武元年正月条。

[39] 《晋书·李矩传》；《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建武元年二月条。

[40] 《晋书·李矩传》。

[41] 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建武元年三月、七月条等。

[42]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九○等，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条。

[43] 《晋书·李矩传》；《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建武元年八月条。

[44] 《晋书·刘聪载记》；《晋书》卷八九《忠义·辛勉附宾传》等。

[45] 按，《刘聪载记》作“刘雅”，《晋书·李矩传》、《资治通鉴》卷九○作“刘雅生”。从《载记》。

[46]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建武元年十二月条。

[47] 按，《晋书·刘聪载记》几次出现“且丘王翼光”或“征虏将军贝丘王翼光”，1974年中华书局《晋书》标点本，均断为“贝丘王、翼光”，恐不确；贝丘应为其人籍贯，此人姓王名翼光。《资治通鉴》卷九○作“具丘王翼光”。

[48] 《晋书·李矩传》；《太平御览》卷三三六引和苞《汉赵记》等。

[49] 《晋书·李矩传》；《晋书·刘聪载记》等。又，此二书记载有出入，系各自隐去失败处，而扬得胜处，参酌用之。

[50] 《资治通鉴》卷九○胡注：“螽斯则百堂，取螽斯子孙众多；思齐，则百斯男之义。”

[51] 《太平御览》卷一一一九引《前赵录》“衷”作“康”。

[52] 《晋书·刘聪载记》。

[53]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条。

[54] 《晋书·刘琨传》；《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太兴元年五月条；《晋书·石

勒载记上》。

[55] 《晋书·石勒载记上》。

[56] 《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太兴元年七月条。

[57] 《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太兴元年七月条。

[58] 《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

[59] 《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王延骂靳准为“屠各逆奴”，知靳氏为屠各。

[60] 《资治通鉴》卷九○还记：靳准“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嵩不敢受，准怒，杀之”。按，《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云，北宫纯、胡嵩引晋人保东宫，靳康攻灭之。是胡嵩死于东宫，而非靳准交传国玺时所杀。从《晋书》。至于靳准遣使李矩事，则见《晋书·李矩传》。

[61] 《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

[62] 《晋书·石勒载记上》。

[63] 《晋书·石勒载记上》；《晋书·刘曜载记》。

[64] 《晋书·石勒载记上》。又，《资治通鉴》卷九○胡注云：“巴，巴氐也。魏武平汉中，迁巴氐于关中，其后种类滋蔓，河东、平阳皆有之。”

[65] 《晋书·石勒载记上》；《晋书·刘曜载记》。按，《太平御览》卷三三六引和苞《汉赵记》云：“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众十余万人，造攻车、飞梯攻平阳小城，今上（刘曜）遣骑万五千，曳柴扬尘，噎于山谷，寻汾州向平阳，内外击之，勒师溃。”吴士鉴《晋书斠注》云：“按，和苞所记，即是役。苞为刘氏之臣，故云勒溃。《载记》据石氏之史，故云杂户降勒，互相抵牾。证之《刘曜载记》亦云石勒怒甚。增兵攻靳明，明败，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曜命诛明。可知此战确为石氏胜而刘氏败也。和苞之言，殆非实录。”

[66] 《晋书·石勒载记上》。

[67] 《晋书·列女·靳康女传》。

[68] 《太平御览》卷三八二引《前赵录》曰：“郭汜，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为县卒……士纳之，生汜，长不满七尺，丑极。时当朴讷无慧，后为县卒，感愤游学，师事安平赵孔曜。曜见而伟之曰：‘此生有公骨，其当贵达。’”

[69] 《资治通鉴》卷九一云曹平乐为王修舍人。此据《晋书·石勒载记上》。

[70] 《晋书·石勒载记上》。

[71] 《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前赵录》；《晋书·刘曜载记》。

〖第六章〗 前赵的兴衰

一 前赵的巩固及其向西北的扩展

刘曜于光初二年（319）四月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石勒在群臣的劝进之下，也于同年十一月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并依魏王（曹操）在邺故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为赵国，太守皆为内史；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置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监之。从此，石勒正式从汉赵国中分离出来，与刘曜的前赵形成对峙的局面。中国史家称石勒所建政权为“后赵”。

当时整个国内形势仍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主要割据势力大致有：今陕西关中及河南东部的前赵国；平阳以东，今山西、河北及河南北部的后赵政权；今山东一带是曹嶷的势力；今淮水以南是东晋政权；今四川一带是李氏大成政权；今甘肃河西地区是张氏的割据势力；今甘肃东南（秦州）是自称“晋王”的司马保的势力；其南还有氐族杨氏在仇池割据的势力。此外，在石勒后赵的东北，还有割据辽西的段氏鲜卑、割据辽东地区的慕容鲜卑；河套朔方一带还有逐渐兴起的铁弗匈奴刘氏；漠南及今山西北部的拓跋鲜卑的势力也正在崛起。

而前赵政权无论从统治的区域、人口，还是拥有的经济实力等方面看，都算不上当时最强大的政权；何况刘曜刚从已经崩溃的汉政权中分离出来，元气大伤，兵实疲敝，国内仍不安定。同年底，虽有陇右氐族首领蒲洪降于刘曜，曜拜其为率义侯；[1]但是也有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治今陕西眉县东），附于秦州的晋王司马保。[2]按，黄石系地名，大致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黄石屠各”，当为聚居于黄石的屠各匈奴，此屠各应指狭义的屠各，即原汉代休屠王部众。又，据《资治通鉴》卷九一胡注云：“《水经注》：陇山西南，降陇城北，有松多川，盖松多据此，因以为地名。”松多川当距黄石不远，在今甘肃秦川县境内，因路松多据此川，故有松多川之名。松多附司马保

后，保即“以其将杨曼为雍州刺史，王连为扶风太守，据陈仓（今陕西宝鸡东）；以张顗为新平太守，周庸为安定太守，据阴密（今甘肃灵台西）。松多下草壁（阴密东），秦陇氐、羌多归之”[3]。刘曜遣车骑将军刘雅、平西将军刘厚攻杨曼于陈仓，二旬不克；曜自率精锐向陈仓，屯于雍城（今陕西凤翔），太史令弁广明对曜云：“昨夜妖星犯月，师不宜行。”乃止。乃今刘雅等摄围固垒，以待大军。[4]

光初三年（320）正月，刘曜从雍城向陈仓进攻。杨曼、王连相谋曰：“谍者适还，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王自来，其锋恐不可当也。吾粮廪既少，无以支久，若顿军城下，围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灭，不如率见众以一战。如其胜也，关中不待檄而至；如其败也，一等死，早晚无在。”从杨曼等的话中，知这次战争对于刚建立的前赵的生存也是关系重大的。曜大军攻陈仓，曼、连等背城而战，为曜军所败，王连战死，曼逃至南氐（即仇池杨氏）。刘曜下陈仓后，又北上攻草壁，路松多不能守，奔陇城（在今甘肃张家川）；曜连拔草壁、阴密，进陷安定。晋王保惧，迁于桑城（今甘肃岷县东北）[5]，欲投河西张寔，氐、羌悉从之。刘曜遂振旅还长安，署刘雅为大司徒。[6]此役的胜利，使刚建立的前赵，得以立足于关中。而保于桑城的晋王保及其将张春等欲投河西张寔，寔遣其将阴监将兵迎之，声言迎卫，其实惧保至河西危及自己的地位而拒之。[7]

二月，前赵的势力又被迫从河南洛阳一带，撤回到陕县（今河南三门峡）以西之地。自汉麟嘉三年刘粲击走赵固、李矩等的势力后，洛阳地区一直为汉政权所据有。刘曜继立后，以左中郎将宋始、振威将军宋恕、弘农太守伊安及赵慎等镇守洛阳及附近地区。光初三年二月，李矩、郭默等率军攻占洛阳东之金墉城。宋始、宋恕降石勒，勒遣石生率骑五千至洛阳，矩、默退还。后宋恕等四将复叛石勒，降李矩。矩遣郭默率军入洛。石生虏宋始一军，北渡黄河。于是河南之民皆相帅归矩，洛阳遂空。[8]其间，刘曜署其大将军、广平王刘岳为征东大将军，准备镇洛阳，至渑池，三军疫甚；后因宋始等降石勒，刘岳回师镇陕城。[9]

时逃至桑城的司马保为张寔所拒，不得往河西，其将张春、杨次等与别将杨韬不和，劝保杀韬，并遣军击原保将陈安。保不从，五月，张春等囚保，杀之，立宗室子司马瞻为世子，称大将军。原保部众奔散，投河西张寔者达万余人。时踞陇城的原司马保将陈安降前赵，刘曜以陈安为大将军，使率军击司马瞻，杀之，张春奔枹罕（今甘肃临夏）。陈

安执杨次于保柩前斩之。[10]前赵虽然消灭了踞秦州的晋王司马保的势力，但是陈安的势力增强了。陈安以前曾游离于保、大成政权和前赵之间，至此成为前赵向西扩展的主要障碍。

前赵建立的初期，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安定内部、巩固政权之上。同年六月，前赵将解虎、长水校尉尹车反，与巴酋句徐、库彭相结。[11]事发，曜乃杀虎、车，囚句徐、库彭等五十余人于阿房，将杀之。光禄大夫游子远[12]固谏，以为不可多杀。曜大怒，认为子远助“逆”，尽杀库彭等，而囚子远，尸放诸街巷中十日，乃投之于水。于是在关中的巴人群起反抗，推巴酋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句渠知自建政权，国号“大秦”，改元曰平赵；四山氐、羌、巴、羯等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形势十分危急。游子远在狱中又上表谏，曜怒甚，毁其表曰：“大荔奴不忧命在须臾，犹敢如此，嫌死晚邪？”命左右速杀之。刘雅、朱纪、呼延晏等谏曰：“子远幽而尚谏者，所谓忠于社稷，不知死之将至。陛下纵弗能用，奈何杀之！若子远朝诛，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过差之咎。天下之人皆当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复与谁居乎？”曜意解，乃赦子远。

刘曜于是敕内外戒严，将亲自率军击句渠知。子远又谏曰：“陛下诚能纳愚臣之计者，不劳大驾亲动，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试言之。”子远曰：“彼匪有大志，希窃非望也，但逼于陛下峻网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使迭相抚育，听其复业，大赦与之更始。彼生路既开，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愿假臣弱兵五千，以为陛下枭之，不敢劳陛下之将帅也。不尔者，今贼党既众，弥川被谷，虽以天威临之，恐非年岁可除。”曜大悦，以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即日大赦。子远屯军于雍城，降者十余万，遂进军安定，反者皆降。唯句渠知宗党五千余家保于阴密，子远进击，灭之；遂引兵巡陇右，陈安郊迎。[13]

另有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崄不降，其酋大虚除权渠自号秦王。游子远进师至虚除权渠壁下，权渠率众来拒战，五战均败。权渠欲降，其子伊余大言曰：“往刘曜自来，犹无若我何，况此偏师而欲降之。”率劲卒五万，晨压子远营。子远众将皆请出战，子远曰：“吾闻伊余之勇，当今无敌，士马之强，复非其匹；又其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戎剽劲，锋锐不可拟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于是坚壁不战。伊余有骄色，不复设备，子远乘机夜袭，至晨大风雾，大败伊余军，生擒伊余，

悉俘其众。权渠大惧，以羌族风俗披发割面而降。子远请曜以权渠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分徙伊余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在西边的氐、羌等少数民族中，权渠势力最强，至是莫不归附。[14]

刘曜重用游子远，用招抚和镇压的两手，基本上扑灭了关中各地氐、羌等族的反抗，使政权得到巩固。刘曜于是大宴群臣于东堂，语及生平，泫然流涕。原来刘曜系渊族子，字永明，从小失去父母，由刘渊抚养。史称其“幼而聪慧，有奇度”。“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刘聪奇之，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曜年轻时，曾游于京师洛阳，因犯罪当斩，与曹恂奔于刘绥处，绥将其藏于书柜，载送于王忠，忠又将其遣送到朝鲜。后曜在朝鲜饥窘，变易姓名，为县卒。时崔岳为朝鲜令，见曜而异之，问明原委，给予衣食，资供书传，恩顾甚厚。后遇大赦，曜返回，隐居于管涔山（今山西管涔山）。汉赵史臣和苞等记载了曜在管涔山时的一个传说，云：曜尝夜闲居，有二童子入跪，说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曜取剑，以烛视之，光泽非常，赤玉为室，背上有铭曰“神剑御，除众毒”，剑随四时而变为五色云云。[15]显然，这个传说是汉赵史臣和苞为曜等编造的神话，不可信。尽管如此，上述关于刘曜的出身、经历及文武才智的记载，还是可信的。在刘渊、刘聪在位时，刘曜带兵转战各地，几乎成了汉国的主要支柱，即是明证。刘曜即位后，不忘过去患难时对自己有恩的人，即以崔岳为大司徒、曹恂为中书令、王忠为晋阳太守、刘绥为太子洗马等。此次刘曜宴群臣，又想起了过去亡走朝鲜之事，以上诸人虽然已经死去，曜仍追赠崔岳使持节、侍中、大司徒、辽东公，曹恂大司空、南郡公，刘绥左光禄大夫、平昌公，王忠镇军将军、安平侯，并加散骑常侍。[16]

刘曜还“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按，刘曜所设“太学”“小学”系仿汉魏以来的旧制。如《太平御览》卷五三四引《晋诸公赞》曰：“惠帝时，裴頠为国子祭酒，奏立国子太学，起讲堂，筑门阙，刻石写经。”曜还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17]。这一措施，是吸取传统的汉族文化的进步行动，应予以肯定。

与此同时，刘曜大兴土木，命作酆明观及西宫，建陵霄台于滈池，又将于霸陵西南营寿陵。[18]“召构殿巧手三千人，发阳平等十郡车牛五千乘，运土筑建德殿台。”[19]侍中乔豫、和苞谏曰：“臣闻人主之兴作也，必仰准乾象，俯顺人时……奉诏书将营酆明观，市道刍荛咸以非之，曰一观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敕旨复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模琼台而起陵霄，此则费万酆明，功亿前役也。以此功费，亦可以吞吴、蜀，翦齐、魏矣。陛下何为于中兴之日而蹤亡国之事！自古圣王，人谁无过！陛下此役，实为过举，过贵在能改……又伏闻敕旨将营建寿陵，周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铜为棺椁，黄金饰之，恐此功费非国内所能办也。……兴亡奢俭，冏然于前，惟陛下览之。”刘曜大悦，下书说：“‘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闻此言乎……今敕悉停寿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自今政法有不便于时、不利社稷者，其诣阙极言，勿有所讳。’省酆水囿以与贫户。”[20]

前赵光初四年（321）五月，终南山地震，长安有个好事之人刘终，借地震之机，伪造白玉方一尺，说是从地震中获得，白玉上刻有“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咢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靷其尽乎！”刘终将此玉献刘曜，借以邀功请赏。前赵群臣皆贺，以为白玉上的文字是赵王石勒灭亡之征。刘曜自然高兴，遂斋七日而后受之于太庙，大赦境内，以刘终为奉瑞大夫。[21]时中书监、国子祭酒刘均认为：“臣闻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终南，京师之镇，国之所瞻，无故而崩，其凶焉可极言！昔三代之季，其灾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独言非，诚上忤圣旨，下违众议，然臣不达大理，窃所未同。何则？玉之于山石也，犹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坏，象国倾人乱。‘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赵因之而昌。今大赵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赵之地，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此其诫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纵为嘉祥，尚愿陛下夕惕以答之……”曜抚然改容。御史劾刘均狂言瞽说，诬罔祥瑞，请依律治罪。曜曰：“此之灾瑞，诚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意多矣，何罪之有乎！”[22]

总之，刘曜继立以来，能重用游子远，转危为安；立太学、小学，置国子祭酒等，学习传统的汉族先进文化；纳乔豫、和苞之言，停酆明观、西宫之兴作，改寿陵的营制，以省民力；对“祥瑞”的态度，接受群

臣纳谏等。这一切都说明刘曜能听取臣下意见，还是比较有作为的。正因为如此，前赵政权才开始出现兴盛的景象。

可是，刘曜在前赵政权本身的建设上并没有多大的建树。与前赵相邻的后赵石勒反而多有改革，使后赵较快地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光初二年（319）石勒称赵王以后，命法曹令史贯志删简律令，作“辛亥制”五千文；设律学祭酒、经学祭酒、史学祭酒、门臣祭酒，分掌法律、经学、史学、门禁。特别是以张离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对于汉族世族等加以尊重和重用，吸收他们参与政治，扩大了前赵的统治基础和力量。在经济上，石勒还注意发展农业，“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恢复和发展其统治地区的封建经济。“又下书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即革除原胡人较为落后的习俗等。[23]

正因为石勒采取了上述措施，其国力逐渐强盛，东征西战，疆域不断扩展。光初三年（320）石勒攻破晋在北方的最后一个据点厌次（今山东阳信南），擒邵续，败段匹磾。后又擒段匹磾于厌次，“于是冀、并、幽州，辽西、巴西诸屯结皆陷于勒”。在河南，石勒原与东晋北伐的祖逖互守边界，处于对峙状态。光初四年（321）八月祖逖死后，石勒的势力逐渐伸入兖、豫等州。后赵石勒的扩张，对前赵的威胁越来越大了。[24]

光初五年（322）初，前赵政权初步巩固后，刘曜即开始向外扩展。时前赵的东面是日益强盛的后赵石勒，刘曜自知力量有限，向东发展暂时是不可能的；西边是河西张氏政权和仇池氐族杨氏的割据势力以及原司马保部陈安的势力。氐族杨氏和陈安据有的陇右地区，是前赵向西扩张的必经之路，且势力较为弱小，自然成为前赵向西发展最早进攻的目标。

仇池氐族杨氏，自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东汉建安中（196～220），氐族杨腾为部落大帅，其子驹，始徙仇池（今甘肃西和西南）。曹魏时，驹后代千万，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孙子名飞龙，晋武帝假以为“征西将军”（《魏书》作“平西将军”），还居略阳。

飞龙无子，养外甥令狐氏子为子，名戊搜（《魏书》作“茂搜”）。晋元康六年避齐万年起事，率部落四千家还保仇池，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愍帝在长安即位后，以戊搜为骠骑将军、左贤王。戊搜死，子杨

难敌立，与弟坚头分部曲。难敌自号左贤王，屯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25]刘曜破长安，司马保据天水，拜难敌征南将军，坚头为龙骧将军。[26]

光初五年二月，刘曜亲率军西进，击仇池杨难敌，难敌率军迎击，为曜军所败，退保仇池，仇池诸氐、羌多降于曜。原晋王保将杨韬保于南安（今甘肃陇西），闻刘曜军至，与陇西太守梁勋等降于曜，皆封列侯；曜并使侍中乔豫率甲士五千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刘曜复攻仇池。时曜寝疾，兼疠疫甚，议班师回长安，恐杨难敌蹑后击之；及以其尚书郎王犷为光国中郎将使仇池，以说难敌降。难敌于是遣使称藩。刘曜大悦，署难敌为“使持节，侍中，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牧，领护南氐校尉，宁羌中郎将，武都王，子弟为公侯列将二千石者十五人”[27]。

当时，自称秦州刺史、名义上臣属于前赵的陈安，请求朝见刘曜，曜以疾笃不许。陈安怒，以为曜已病死，遂大掠而归。曜病重，乘马舆而还，遣将呼延寔监辎重于后。陈安率精骑击之，寔被围，奔退无路，遂与其长史鲁凭皆为安所俘。安劝呼延寔降，寔骂曰：“狗辈！汝荷人荣宠，处不疑之地，前背司马保，今复如此。汝自视何如主上？忧汝不久枭首上邽通衢，何谓大业！可速杀我，悬我首于上邽东门，观大军之入城也。”按，陈安原为南阳王司马模帐下都尉，西晋建兴三年（315）模败，陈安归模世子保于秦州，宠待甚厚。后为杨春所谮，还陇城，叛保降前赵。故寔骂其“前背司马保，今复如此”。陈安大怒，杀寔，以鲁凭为参军；又遣弟陈集及将军张明等率骑二万追刘曜。[28]曜遣卫军将军呼延瑜逆战，击斩陈集，尽俘其众。陈安惧，驰还上邽（今甘肃天水），曜至南安。

陈安又使其将刘烈、赵罕袭占汧城（今陕西陇县），西州氐、羌悉降安。至此，陈安士马强盛，众十余万，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赵募为相国，领左长史。参军鲁凭对陈安大哭说：“吾不忍见陈安之死也。”安怒，杀鲁凭。刘曜对凭之死十分惋惜，说：“贤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贤人，是塞天下之情……陈安今于招贤采哲之秋，而害君子，绝当时之望，吾知其无能为也。”尽管如此，陈安据陇右，得氐、羌各族的支持，众十余万。这对前赵的西进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恰于此时，原属陈安的休屠王石武[29]以桑城降前赵，刘曜大喜，署王石武为使持节、都督秦州陇上杂夷

诸军事、平西大将军、秦州刺史，封酒泉王。[30]史称王石武为“休屠”，即屠各，原为汉休屠王部众，狭义的屠各，与刘渊一族所称的屠各有区别。

同年四月，刘曜皇后羊氏卒。羊氏，《晋书》卷三一有传，内云：“惠羊皇后讳献容，泰山南城人。”永康元年晋惠帝立为皇后，刘曜攻占洛阳后，俘羊氏。曜即帝位，以其为皇后，有殊宠，“颇与政事”，生子三人：熙、袭、阐。[31]刘曜还于此年颁布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如“始禁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石已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32]，犯者皆死。”刘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等。[33]与此同时，刘曜也大兴土木，干了一些劳民伤财的事。如于此年十二月，曜为葬其父及妻，亲至粟邑规度之。征发劳役，负土为坟，其下周回二里，作者日夜兼作，继以脂烛，怨呼之声盈于道路。游子远谏曰：“……伏惟陛下圣慈幽被，神鉴洞远，每以清俭恤下为先，社稷资储为本。今二陵之费至以亿计，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役夫呼嗟，气塞天地，暴骸原野，哭声盈衢，臣窃谓无益于先皇先后，而徒丧国之储力……陛下缐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竟不纳。[34]从子远的谏辞中，知刘曜此举，动用民夫六万，耗费以亿计。在仅有关中等不大地区的前赵，这的确是丧财伤民、徒损国力之举。更为严重的是，一向纳谏的刘曜，竟开始听不进臣下的劝谏。这一切给前赵政权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刘曜又使刘岳等率骑一万，迎父及弟晖丧于太原。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曜遂葬其父，号永垣陵，葬妻羊氏，号显平陵。大赦境内殊死已下，赐人爵二级，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35]

光初六年（323）六月，陈安围前赵征西将军刘贡于南安，赵酒泉王、休屠王石武从桑城引兵攻上邽，以解南安危。陈安闻之，即急驰归上邽，遇王石武于瓜田（在上邽南），石武以寡不敌众，奔保张春故垒（在上邽附近）。陈安引军追击，扬言：“叛逆胡奴！要当生缚此奴，然后斩刘贡。”石武闭垒坚守。这时，刘贡率军击败陈安后军，俘斩万余。陈安驰还救援，为贡击败；石武又率军至，陈安大溃，收骑八千，奔于陇城（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刘贡欲乘胜追击，石武劝贡说：“穷寇归兵，不可追也。我士卒连胜，皆已怠矣。以骄怠之卒，当致死之众，恐无万全之利。”贡以为乘胜追击，皆一当十，衰沮之众不可挡

也，遂躬先士卒，战辄败之，围陈安于陇城。[36]七月，刘曜亲征陈安，围安于陇城。陈安频出挑战，累为曜所败，死八千余人。[37]安帐下小将刘牙、赵牢、路松多坚戍不下，城内得安死力。[38]刘曜见一时难以攻克，于是遣右军将军刘幹攻克平襄（今甘肃通渭西），陇上诸县悉降。曜又曲赦陇右殊死已下，唯陈安、赵募不在其例，以孤立和瓦解陈安的势力。

陈安遂留杨伯支、姜冲儿等守陇城，自率数百骑突围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众还解陇城之围。当他出围后，方知上邽被围、平襄失守，乃南走陕中（在陇城南）。刘曜遣其将军平先、丘中伯率劲骑追击，多次击败陈安。安与壮士十余骑于陕中与赵军格战，他左手执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战则刀矛俱发，远战则左右驰射，杀敌甚多。前赵将军平先也十分骁勇，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陈安搏战，夺安蛇矛而退。会日暮，大雨，陈安弃马，与左右五六人登逾山岭，藏匿于溪涧，赵军寻索未得。次日，陈安遣将石容出觇赵兵，为赵辅威将军呼延青部下（《载记》作“呼延清”）所获，拷问安所在，容不肯言，赵兵杀之。雨停后，呼延青令搜索山间，发现陈安，遂杀之于涧曲。接着，安将杨伯支斩姜冲儿，以陇城降；别将宋亭斩赵募，以上邽降。刘曜遂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陇右氐、羌各族纷纷降附，并送质任。[39]曜又以南安赤亭羌酋姚弋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40]

陈安，字虎侯，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威戎镇）平庄人，家世农民，少慷慨，东游京师。颇学书字，读《魏书》，见许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永嘉之乱，附司马模、司马保。史称其“骁壮果毅，武干过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贯结，奔及驰马”[41]。又“善于抚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42]。故为赵军所杀，陇右一带有谣曰：

> 陇上健儿曰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𫘧骢骏马戏锻鞍，七尺大刀配齐镮，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弃我𫘧骢攀岩悲，天大降雨迢者休。阿呵呜呼奈子何！阿呵呜呼奈子何！[43]

此歌悲壮、感人，史称刘曜闻此歌而嘉伤，命乐府歌之。[44]

陈安虽出身贫民，观其一生所作所为，不过是作为十六国初据有秦州的一支割据势力，先后反复于晋残余势力和前赵之间，最后为西进的前赵政权所灭。近年来，国内有的论著将陈安誉为秦陇人民反抗前赵武装起义的首领，加以歌颂，还说陈安领导的各族人民起义动摇了刘曜政

权的基础，促使前赵军队瓦解等。[45]无论从陈安起兵反赵的目的还是性质等方面来看，这种说法都是欠妥的。

刘曜灭陈安，取陇右之后，即从陇右向西击河西张氏政权。曜先遣将刘咸攻张氏将韩璞于冀城（今甘肃甘谷东），呼延晏攻张氏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在南安界）。有临洮（今甘肃岷县）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长，以县应曜，河西大震。前赵前锋刘岳也抵达黄河（今兰州一线黄河），与张氏军队相持于河上。时凉州牧张寔已死，其弟张茂继任。刘曜后又从陇上长驱至河，史称曜“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曜扬声欲百道俱渡，直取姑臧（今甘肃武威），张茂临河诸戍望风奔退，凉州大怖，人无固志。张茂内部和战意见不一，参军马岌劝茂亲征，长史氾祎不同意，并云“宜斩岌以安百姓”。马岌曰：“氾公书生糟粕，刺举近才，不惟国家大计。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贼自至，不烦远师，遐迩之情，实系此州，事势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验，以副秦、陇之望。”茂从之，乃出屯于石头（在姑臧东），问计于参军陈珍，珍曰：“曜虽乘威怙众，恩德未结于下，又其关东离贰，内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乌合之众，终不能近舍关东之难，增陇上之戍，旷日持久与我争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请为明公率弊卒数千以擒之。”陈珍能透过刘曜二十八万大军的极盛景象，看到前赵存在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

张茂大悦，以珍为平虏护军，率步骑一千八百救韩璞。刘曜诸将均请渡河取姑臧，曜对自己的弱点也很清楚，他说：“吾军旅虽盛，不逾魏武之东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张氏以吾新平陈安，师徒殷盛，以形声言之，非彼五郡之众所能抗也，必怖而归命，受制称藩，吾复何求！卿等试之，不出中旬，张茂之表不至者，吾为负卿矣。”果然，茂惧，遣使称藩，献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头，羊十万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诸珍宝珠玉、方域美货不可胜计。曜大悦，遣大鸿胪田崧署茂“使持节、假黄钺、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凉州牧、领西域大都护、护氐羌校尉、凉王”[46]。

在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后，刘曜竟自河西遣其将作大匠胡元增其父、妻二陵高九十尺。百姓苦役不堪，甚至传说其陵前石人开口说话，云：“慎。”[47]

刘曜平陈安后，还遣镇西将军刘厚兵临仇池，杨难敌内怀危惧，与弟坚头奔汉中。[48]刘厚追击，获其辎重千余两，士女六千余人，还于仇池。曜以大鸿胪田崧为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镇仇池；以刘岳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进封中山王。[49]难敌遂降李氏大成政权，赵军退回仇池后，李雄安北将军李稚受难敌赂，不送难敌于成都，反遣其返武都。难敌遂据险叛，李稚等率军击之，败还。[50]难敌于是等待时机，准备重据仇池。

综上所述，前赵继汉而立后，对内镇压了关陇巴、氐、羌等族的反抗，于政治、经济多有改革，使政权逐渐巩固。光初六年（323），前赵向西北扩张，灭陈安，取陇右，占领仇池，威震河西，使其西部疆界直达今甘肃兰州黄河一带。可以说前赵进入了它极盛的阶段。然而，由于前赵政权基础较为薄弱，统治者开始滥用民力，战事屡起，加重了各族人民的负担，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渐尖锐。所以，事实上前赵极盛之时，已经埋下了衰败的种子，走向了衰落的道路。

二 前赵的灭亡及其原因

刘曜灭陈安，取陇右、仇池后，时有“黑匿郁鞠部”[51]首领郁鞠送曜子胤还于曜。刘胤字义孙，史称其“美姿貌，善机对”，年十岁，刘聪见而奇之，劝曜立为世子，另封曜子俭（字义真）为临海王。后靳准之乱，胤没于黑匿郁鞠部，陈安败后，胤言于郁鞠。郁鞠大警，资给衣马，遣子送于曜。曜悲喜，以郁鞠忠款，署使持节、散骑常侍、忠义大将军、左贤王。[52]时刘曜已立刘熙为太子，胤虽少遭大难，而风骨俊茂，多力善射，骁捷如风云。刘曜因此特别喜爱胤，大臣们也希望胤能被立为皇太子。曜对群臣曰：“义孙可谓岁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义光（熙）虽先已树立，然冲幼儒谨，恐难乎为今世之储贰也，惧非所以上固社稷，下爱义光。义孙年长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远追周文，近踪光武，使宗庙有太山之安，义光飨无疆之福，于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皆以为改立太子，“为国家无穷之计”，表示赞同。

而左光禄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韩广等进曰：“……窃以诚废太子，非也……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远，信独绝一时，足以拟踪周发；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负圣基，为承平之贤主。何况储宫者，六合人神所系望也，不可轻以废易。陛下诚实尔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诏。”曜默然。刘胤亦泣曰：“慈父之于子也，当务存尸鸠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谬恩乃尔者，臣请死于此，以明赤心……”因嘘唏流涕，悲感朝臣。刘曜也因刘熙为羊后所生，不忍废之，于是乃止。遂追赠前妻、胤生母卜氏为元悼皇后，卜泰，胤之舅，拜上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领太子太傅；封胤为永安王，署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号曰皇子，命熙于胤尽家人之礼。[53]刘曜在处理皇太子废立问题上，听从了大臣及胤的劝告，没有废太子熙，这就避免了以后为争夺皇位而发生的内讧，直到前赵灭亡，其内部未曾重蹈刘渊、刘聪死后争夺皇位之覆辙。

光初七年（324）初，前赵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边，与石勒等争夺河南。

在前赵向西北扩张的时候，东边的后赵石勒也不断向四周扩张。光初五年（322）七月，后赵石虎攻拔泰山（治奉高，今山东泰安东），

执杀晋守将徐龛；晋兖州刺史郗鉴惧，自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退屯合肥。“徐、兖间垒壁多送任请降，皆就拜守宰。”[54]十月，因东晋祖逖已死，石勒屡攻河南，攻拔襄城（今河南襄城）、城父（今安徽亳州南）、围谯（治今安徽亳州），东晋豫州刺史祖约不能御，退屯寿春（今安徽寿县）。后赵遂取陈留郡，“梁、郑之间复骚然矣”[55]。光初六年（323）三月，石勒遣军攻东晋下邳（今江苏邳州南），徐州刺史卞敦等退保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八月，石虎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降，后为勒所杀。[56]七年（324）二月，石勒遣石瞻复攻东晋下邳、彭城（今江苏徐州），取东莞（治今山东沂水北）、东海（治今山东郯城），徐州刺史刘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今泗水入淮河处）。[57]与此同时，后赵石勒养子、司州刺史石生攻杀前赵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克垒壁十余，降掠五千余户而归。石生又攻许昌、颍川，俘获万余，降者二万；后攻晋将郭诵于阳翟（今河南禹县），为诵所击败。石鉴率军来救，败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等。[58]从此，前、后赵始起战端，河东、弘农间百姓无以聊生。[59]

此年三月，刘曜也企图从东南方向来加强对石勒的战争，命其将康平攻东晋魏兴郡（治兴晋，今陕西白河北），达于南阳（今河南南阳）。[60]时刘曜与石勒的势力相当，双方对峙于河东、弘农间；曜自然希望与河西张氏政权保持和好。五月，河西张茂病死，茂兄寔子骏继立，刘曜遣使拜张骏上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十二月，张骏遣参军王骘聘于前赵，曜对之曰：“贵州必欲追踪窦融，款诚和好，卿能保之乎？”骘回答说：“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来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骘曰：“齐桓贯泽之盟，忧心兢兢，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会，骄而矜诞，叛者九国。赵国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迟，尚未能察迩者之变，况鄙州否！”刘曜因骘讲了实话，对左右说：“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礼遣之。[61]

光初八年（325）三月，刘曜立皇后刘氏。时上郡（治夏阳，今陕西韩城）北有北羌王盆句徐，原附前赵，为安国将军。石勒将石他（《资治通鉴》作“石佗”）自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南）出上郡，攻盆句徐，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刘曜大怒，于次日至渭城，遣中山王刘岳追之，自屯于富平（今陕西富平），为岳声援。岳与石他大战于河滨（今内蒙古托克托南），杀石他，后赵兵死者六千余人，振旅而还。[62]

正当前赵与石勒不断争战之时，在武都的氐王杨难敌乘机袭仇池，执前赵镇守仇池的田崧。难敌劝崧降，崧不屈，骂难敌，顾排一人，夺其剑，刺难敌，不中，为难敌所杀。[63]

四月，石勒西夷中郎将王腾[64]袭杀后赵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奋，据并州降前赵。五月，石勒将石生进屯洛阳，攻掠河南，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等屡败，又缺食，于是降附于前赵。刘曜乘机遣中山王刘岳攻石生于洛阳，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从孟津渡黄河；又以镇东将军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自崤（崤山，在今河南三门峡东）、渑池（今河南洛宁西北）而东，欲会李矩、郭默共攻石生。刘岳攻克孟津、石梁（在洛北）二戍，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洛阳北金墉城。

石虎率步骑四万，从成皋关出，与刘岳大战于洛阳西。岳兵败，岳本人中流矢，退保石梁，石虎作堑栅围之。岳众饥甚，杀马而食。石虎又败呼延谟，杀之。刘曜自率大军来援刘岳，石虎率骑三万来拒。曜前军将军刘黑大败石虎将石聪于八特坂（今河南新安东函谷关东坂）。曜屯于金谷（在洛阳），夜军中无故大惊，溃散，乃退至渑池。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败回长安。

六月，石虎并力攻围刘岳于石梁，岳无援被执；虎又攻叛降前赵的并州刺史王腾，执而杀之。于是送岳及其将佐八十余人，氐、羌三千余人于襄国，坑王腾及刘岳士卒共一万六千人。刘曜还长安，素服郊次，七日乃入城。[65]郭默复为石聪所败，逃奔建康。李矩见将士欲降石勒，亦率众南归，死于途中。矩长史崔宣率其余众二千降后赵。于是石勒尽有司、豫、徐、兖之地，以淮河与东晋为界。[66]而前赵与后赵争夺河南洛阳一带地区的斗争最终失败，退回到新安、渑池以西之地。

刘曜返长安后，灾异屡现，曜命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徒刘均举参军台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台产极言其故，曜览之大悦，引见东堂，访以政事。台产流涕嘘唏，以灾变为由，具陈政化之阙，辞旨谅直。刘曜改容礼之，拜产为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其后台产所言皆应验，曜更重之，岁中三迁，历位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金章紫绶，爵关中侯。[67]刘曜又署其子胤为大司马、大单于，进封南阳王，以汉阳诸郡十三为国。置单于台于渭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68]按，单于台之设，在刘渊、刘聪时，至是曜又复置，以刘胤为大单于，实

行“胡、汉分治”。

光初九年（326）十月，刘曜还没有从与石勒战争失败中恢复过来，就又开始发动新的战争。刘曜遣将黄秀、帛成从商洛一带向东晋酂县（今湖北丹江口均县镇东南）进攻，顺阳太守魏该率众奔襄阳（今湖北襄阳）。[69]次年（光初十年，327）五月，前赵又欲夺回仇池，遣武卫将军刘朗率骑三万袭杨难敌于仇池，不克，掠三千余户而归。[70]

而此时河西的张骏，因前赵为石勒所败，乃去前赵官爵，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并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数万，与韩璞会合，攻掠前赵秦州诸郡。前赵南阳王刘胤将兵来击，屯狄道（今甘肃临洮）。张骏枹罕护军辛晏告急，张骏遣韩璞、辛岩[71]来救。璞军进至沃干岭（在狄道西），辛岩主张速战，云：“我握众数万，藉氐、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不可以久，久则变生。”韩璞不同意，说：“自夏末以来，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贯日，皆变之大者，不可以轻动。轻动而不捷，为祸更深。吾将久而毙之。且曜与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矣。”于是夹洮河岸与刘胤相持七十余日。十月，韩璞等军粮竭，遣辛岩运粮于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刘胤闻之，大悦，对其下曰：“韩璞之众十倍于吾，羌胡皆叛，不为之用。吾粮廪将悬，难以持久。今虏分兵运粮，可谓天授吾也。”于是率骑三千，袭辛岩于沃干岭，冠军将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绝其运路，辛岩溃，韩璞败，死者二万余人。胤乘胜追击，渡过黄河，攻陷令居（今甘肃永登东南），入据振武（今甘肃武威东），河西大振。张阆、辛晏率其众数万降前赵，皆拜将军，封列侯，张骏遂失河南（黄河之南）之地。[72]

光初十一年（328）初，刘曜夜梦三人，金面丹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及晨，曜召公卿以下议此梦，朝臣皆贺，以为吉祥。唯太史令任义却借此对刘曜进行劝谏，他说：“三者，历运统之极也。东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为兑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退舍之道也。为之拜者，屈伏于人也。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东井，秦分也；五车，赵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近七百日，其应不远。愿陛下思而防之。”刘曜大惧，于是躬亲二郊，饰缮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租税之半。[73]

此年一至五月，关中长安无雨，旱。七月，后赵石勒遣石虎率众四

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西）西击前赵河东之地，河东应之者五十余县，遂进攻蒲坂。刘曜将发兵拒石虎，又恐西边张骏、仇池杨难敌乘虚攻长安，于是先遣河间王刘述发氐、羌之众屯于秦州。然后，曜亲率内外精锐水陆诸军救蒲坂，自潼关[74]北渡黄河；石虎惧，引师而退。曜追之于高候（今山西闻喜），与石虎激战，大破其军，斩虎将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资仗亿计。石虎奔至朝歌（今河南淇县）。曜由大阳（今山西平陆南）渡过黄河，攻石生于金墉城，决千金堨以灌之；又分遣诸将攻汲郡（治今河南卫辉东）、河内，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降，襄国大震。[75]

冬十一月，石勒欲自率军救洛阳，其左右长史、司马郭敖、程遐等固谏曰："刘曜乘胜雄盛，难与争锋，金墉粮丰，攻之未可卒拔。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不可亲动，动无万全，大业去矣。"石勒怒，叱遐等出，而谋于徐光，光曰："刘曜乘高候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悬军三时，亡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望旌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今此机会，所谓天授，授而弗应，祸之攸集。"时在襄国的著名僧人佛图澄亦劝石勒亲征。石勒遂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率军会荥阳，使石虎进据石门（在荥阳附近），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石勒统步骑四万趣金墉，从大堨渡黄河。时黄河流澌风猛，石勒军至而冰泮清和，舟楫无阂，顺利渡河。石勒以为天助，命名为灵昌津（即延津，在今河南卫辉东黄河处）。[76]石勒对徐光说：刘曜如果盛兵于成皋关迎击，是为上策；阻洛水以防阻大军，为中策；若坐守洛阳，则为下策，必为我所擒获。于是集诸军于成皋，共有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见曜无守军，大喜，以为天助，遂卷甲衔枚，诡道兼程，出于巩（今河南巩义）、訾（东訾城，在巩义西南）。[77]

而刘曜自围金墉后，久不能下，不抚士卒，只知与嬖臣饮博，左右有谏者，皆怒杀之。后闻石虎进据石门，石勒自率大军渡过黄河，才开始议增荥阳戍卫，杜黄马关（在成皋）。俄而戍守洛水一带的斥候与石勒前锋交战，擒一羯族士兵，刘曜问羯兵曰："大胡（指石勒）自来邪，其众大小复如何？"羯兵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刘曜色变，有惧意。于是解金墉之围，而列军于洛阳西，南北十余里。石勒望见，益喜，谓左右曰："可以贺我矣！"于是率步骑四万自宣阳门入洛阳，升故太极前殿，令石虎引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曜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于西阳门。石勒则自率军

出阊阖门，三路夹击前赵军。刘曜自小贪酒，末年尤甚；将出战，饮酒数斗，其常乘赤马无故踢顿，乃改乘小马。及出战，又饮酒斗余，列阵于西阳门外。石堪因而挥军攻击，前赵军大溃，刘曜昏醉奔退，曜体壮，小马不胜载，马遂陷于石渠，坠于冰上，为石堪所擒获。前赵军全线奔溃，石勒追击，斩首五万余级，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获之，其敕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乃班师回襄国。[78]

刘曜见石勒后，说："石王，忆重门之盟不？"[79]石勒避而不答，令徐光答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复云何邪"，遂囚曜于河南丞廨，使医李永为其治伤，同载马舆返襄国。时有北苑市三老孙机求见刘曜，石勒许之。孙机进酒于曜曰："仆谷王[80]，关右称帝皇。常持重，保土疆。轻用兵，败洛阳。祚运穷，天所亡。开大分，持一觞。"曜曰："何以健邪，当为翁饮。"石勒闻此，凄然改容曰："亡国之人，足令老叟数之。"乃将刘曜安置于襄国永丰小城，给其妓妾，严兵围守。又遣原前赵被俘将刘岳、刘震等骑马率随从，衣色鲜丽，以见曜。曜慨然曰："久谓卿等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杀石他，负盟之甚。今日之祸，自其分耳。"于是留宴岳等，终日而去。石勒又命曜寄书其太子熙等，令其速降。曜作书令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其被擒为意。石勒览而恶之，遂杀曜。[81]

刘曜被擒后，在长安的前赵太子熙、大单于胤、刘咸等皆破胆，惧后赵军进军关中，共同商议弃长安，而西保秦州。尚书胡勋曰："今虽丧主，国尚全完，将士情一，未有离叛，可共并力距险，走未晚也。"刘胤不从，怒其沮众，杀之，于是军民涣散，难以收拾。

光初十二年（329）二月，刘熙等率百官奔上邽，关中诸征镇亦皆弃所守而从，一时关中大乱。前赵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降于后赵。石勒遣石生率洛阳之众赴长安，兵不血刃占领了前赵的国都长安。八月，刘胤及刘遵率众数万从上邽攻后赵石生于长安，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诸郡戎（少数民族）、夏（汉族）皆起兵响应胤。刘胤进军至仲桥（今陕西礼泉），石生固守长安。石勒遣石虎率骑二万救石生。九月，石虎大破刘胤军于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胤奔还上邽。石虎乘胜追击，枕尸千里。上邽溃，石虎俘太子刘熙及南阳王胤及诸将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又坑其王公等及

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82]前赵至此灭亡。

匈奴刘氏所建的汉赵政权，从刘渊于西晋永安元年（304）称汉王起，永嘉二年（308）称帝；东晋建武二年（318）刘曜继立后改国号“汉”为“赵”，直至东晋咸和四年（329）为后赵石勒所灭，前后历三主（渊、聪、曜），凡二十六年。史家统称汉、赵为“前赵”，以与石勒所建的后赵相区别。[83]

综观汉赵国三主，开国的刘渊及最后的刘曜，均应为十六国时期较为杰出的人物。《晋书·刘曜载记》后附史臣对两人之评价，对刘渊曰：“况元海人杰，必致青云之上，许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马鸿骞，乘机豹变，五部高啸，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与之争衡者矣……若乃习以华风，温乎雅度，兼其旧俗，则罕规模。”西晋末年，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乱，民不聊生；刘渊利用各族人民反抗西晋腐朽的统治的斗争，集匈奴五部，摧毁了西晋腐朽王朝，首开内迁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政权之风。由于匈奴刘氏汉化已深，故其所建政权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均“习以华风”，“兼其旧俗”，规模宏大，对以后十六国的其他政权影响甚大。《晋书》附史臣所论，基本上是公允的。

可是，历代封建史家又多从大汉族主义思想出发，对匈奴族刘渊的评论也有一些污蔑和失实之处。如《太平御览》卷四九二引王隐《晋书》曰：“刘渊残虐，所在城邑无不倾败，流离死散，殆无孑遗。”刘渊是在与西晋统治阶级生死搏斗中建立政权的，对西晋的宗室及统治阶级成员进行杀戮，史籍记载很多；至于所在城邑无不倾败，对一般人民滥杀，使之“流离死散，殆无孑遗”，显系夸大失实之词。与此相反，前述刘渊对其将乔晞滥杀介休令贾浑一家，就十分愤怒，追还乔晞，降秩四等，收浑尸礼葬之。还有的封建史家把北方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形成归罪于刘渊，说什么“提封天下，十丧其八……抑元海为之祸首云”[84]。此说亦不确，西晋末年形成的割据形势之根本原因，应是东汉末年以来世族制度的形成和自给自足的以宗族乡里为纽带的豪族经济的发展，坞堡的林立形成了封建割据的经济基础。王权的衰落，更助长了封建割据之风的形成和发展。总之，西晋亡后，北方形成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不取决于刘渊个人的行动和意志，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原因。所以，把十六国分裂割据的祸殃推到刘渊身上，是毫无道理的。相反，刘渊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借助各族人民反晋的斗争，推翻腐朽的西

晋王朝，建立政权，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晋书》所附史臣对刘曜的评价，则比刘渊更高一些，内云：“曜则天资虓勇，运偶时艰。用兵则王翦之伦，好杀亦董公之亚。而承基丑类，或有可称。子远纳忠，高旌暂偃；和苞献直，酆明罢观。而师之所处，荆棘生焉。自绝强藩，祸成劲敌。天之所厌，人事以之。骇战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刘曜于汉国危亡之际，平定内乱，再建前赵，定都长安；其为政也，能纳谏改过，安定内部，运偶时艰；修太学、小学，置祭酒，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禁暴虐，注意农业生产，重信义；等等。故史臣亦不得不云其政“或有可称”者。而刘曜本人有军事才干，用兵则有古名将王翦之风，天性虓勇，其政可称。总之，他与石勒、苻坚、慕容廆等一样，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中杰出的人物之一。

刘曜政治较为修明，前赵政权又得人心[85]，何以灭亡如此之速？且刘曜进攻后赵洛阳，先获大胜，如其回军自保，还不至于亡国；所以前赵灭亡是否带有偶然的因素？从历史事实看，刘曜确是轻用兵，进围洛阳，骄兵不设守戍，加之战略战术失误，为石赵所擒；而太子刘熙等又丧胆退却，以致亡国。这一切的确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正因为如此，过去封建史家多以前赵灭亡系天命，即所谓“天之所厌，人事以之”，故和苞、崔鸿及《晋书》撰者多用地震、梦幻、灾荒等现象，来预兆前赵的灭亡。这是封建迷信和唯心史观的表现，不可信据。但是，历史的偶然性是寓于必然性之中的，从当时形势来分析，前、后赵势必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而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实力来讲，后赵都略高一筹。

前赵衰弱的重要因素是刘曜在后期滥用民力和财力，为其父、妻修建陵墓，又频频发动对陇右、河西、仇池及后赵的战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相反，后赵对内进行一系列改革，重用汉族士大夫，用律令，开小学于襄国，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阅实人口，采用封建剥削制度，铸丰货钱，以利商贾；占有较为富庶的幽、并、兖、豫、青、徐等州。前、后赵两个政权虽然均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相应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后赵的改革较为全面和彻底，这是后赵能最后灭亡前赵的根本原因。刘曜进攻洛阳失败以致亡国，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它会为后赵所灭，则是必然的。

[1] 《晋书》卷一一二《苻洪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二年条及胡注引《考异》。

[2] 《晋书·刘曜载记》。

[3] 《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二年条。

[4] 《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一。

[5] 《水经注》卷二《河水》云："洮水又东北流，屈而径索西城（在岷县东）西。洮水又屈而北，径龙桑城西，而西北流……"《资治通鉴》卷九一胡注引此段，"龙桑城"作"桑城"，地当在今岷县东北。

[6] 以上均见《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条。

[7] 《晋书》卷三七《南阳模附保传》。

[8] 《晋书·李矩传》；《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二年二月条。

[9] 《晋书·刘曜载记》。

[10] 《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二年五月条。按，《晋书·司马保传》云保为病死，今从《通鉴》卷九一。

[11] 《晋书·刘曜载记》作"徐库彭"，《资治通鉴》卷九一作"句徐、库彭"，从《通鉴》。

[12] 《太平御览》卷三七九引《前赵录》曰："游子远幼姿貌聪亮，好学，年十五至洛阳，张华见而奇之曰：此儿雅洁洪方，精公才也。"下引《载记》曜骂子远为"大荔奴"，《资治通鉴》卷九一胡注："大荔，戎种落之名；子远盖戎出也。"按，大荔亦地名，春秋时有"大荔戎"，刘曜为匈奴，其称子远为大荔奴，故子远亦有可能为大荔早已汉化之大荔戎。

[13] 《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三年六月条。

[14] 《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三年六月条。

[15] 《晋书·刘曜载记》；《太平御览》卷四五引《前赵录》等。

[16] 《晋书·刘曜载记》。

[17] 《晋书·刘曜载记》。又，《晋书》卷九一《儒林·董景道传》云："曜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持，并固辞，竟以寿终。"此与《载记》异，从《载记》。

[18] 《晋书·刘曜载记》。又，《资治通鉴》卷九一云：以子远为大司徒，录尚书事。

[19] 《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引《赵书》。

[20] 《晋书·刘曜载记》。又，《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前赵录》内和苞等言作寿陵“周回四十”，《晋书·载记》作“周回四里”，《前赵录》确。

[21] 《晋书·刘曜载记》。又，关于类似事迹他书记载甚多，如《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赵书》曰：“刘曜于龙门河水中得玉玺，文云‘克昌’。曜以为天锡神玺，斋而受之。”又，《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前赵录》曰：“光初五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献玉玺。一文曰‘赵盛’。”又，《北堂书钞》卷一三一引《赵书》亦记类似之事。

[22] 《晋书·刘曜载记》等。

[23] 均见《晋书·石勒载记下》；《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二年十一月条。

[24] 见《晋书·石勒载记下》。

[25] 《宋书》卷九八《氐胡传》；《魏书》卷一○一《氐传》等。

[26] 《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

[27] 《晋书·刘曜载记》。

[28] 《晋书·刘曜载记》。又，《资治通鉴》卷九一“二万”作“三万”。

[29] 按，过去史籍及今人均断为“休屠王、石武”，即此人姓石，名武，或虎（应为“虎”，唐人避讳改作“武”）。近年来在甘肃张家川出土一方北魏王真保墓志，内云真保高祖王擢，“赵显美侯石虎之子”，王擢为休屠，内云之石虎即“休屠王石武”。见陈仲安《王真保墓志考释》，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及拙作《甘肃张家川出土的北魏王真保墓志试析》，《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30] 《晋书·刘曜载记》。

[31] 《晋书·刘曜载记》。又，《晋书·羊后传》云其“生曜二子而死”，从《载记》。

[32] 《晋书·刘曜载记》。按，原书掉“非”字，见标点本《晋书》卷一○三校勘记［五］，中华书局，1974。

[33] 《晋书·刘曜载记》。

[34] 《晋书·刘曜载记》；《太平御览》卷八七六引《十六国春秋》等。

[35] 《晋书·刘曜载记》；《太平御览》卷八七六引《十六国春秋》等。

[36] 《太平御览》卷二九九引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内“刘贡”误作“刘贲”。又，见《晋书·刘曜载记》等。

[37] 《晋书·刘曜载记》。

[38] 《太平御览》卷四六五引《赵书》等。

[39] 《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二。按，《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记曜灭陈安在光初七年（324），《晋书·明帝纪》记作太宁元年（323）七月，《资治通鉴》同。《辑补》误也。

[40] 《资治通鉴》卷九二，晋明帝太宁元年七月条。

[41] 《太平御览》卷三六二、三八六引《十六国春秋》。

[42] 《晋书·刘曜载记》。

[43] 按，关于陇上歌陈安之词，《资治通鉴》卷九二又云作“壮士之歌”，胡注亦引有，词大同而小异。又，《北堂书钞》卷一二四引《灵鬼志》、《艺文类聚》卷一九引《赵书》、《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和苞《汉赵记》等均有歌词，亦大同小异。此处引自《太平御览》卷四六五引《赵书》。

[44] 《晋书·刘曜载记》。

[45]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46] 以上见《晋书》卷八六《张轨附茂传》；《晋书·刘曜载记》。按，《张茂传》所记与《载记》有异，云茂遣珍救韩璞，后“募发氐、羌之众，击曜走之，克服南安”。从《载记》《资治通鉴》。

[47] 《晋书·刘曜载记》；《北堂书钞》卷一六○引《前赵录》。

[48] 《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云难敌奔葭萌（今四川广元南）。

[49] 《晋书·刘曜载记》。

[50] 《晋书·李雄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二，晋明帝太宁元年八月条。

[51] 按，黑匿郁鞠部当为匈奴部族之一。详细考证见内田吟风《北亚细亚史研究——匈奴篇》，第340页注（6）。

[52] 《晋书·刘曜载记》。

[53] 《晋书·刘曜载记》。

[54] 《晋书·石勒载记下》。按，内“兖州刺史”原作“刘退”，误，见标点本《晋书》卷一○五校勘记［九］，中华书局，1974。

[55] 《资治通鉴》卷九二，晋元帝永昌元年十月条。

[56] 《晋书·石勒载记下》；《资治通鉴》卷九二，晋明帝太宁元年八月条。

[57]《晋书·石勒载记下》；《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明帝太宁二年正月条。

[58]《晋书·石勒载记下》；《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明帝太宁二年正月条。

[59]《晋书·石勒载记下》。

[60]《晋书》卷六《明帝纪》。

[61]《晋书·张轨附骏传》。

[62]《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明帝太宁三年三月条。

[63]《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明帝太宁三年三月条。

[64]《晋书·石勒载记下》“王腾”作“王胜”，从《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明帝太宁三年四月条。

[65] 以上见《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明帝太宁三年五月、六月条。

[66]《晋书·李矩传》；《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明帝太宁三年六月条。

[67]《晋书》卷九五《艺术·台产传》；《晋书·刘曜载记》。

[68]《晋书·刘曜载记》。

[69]《晋书》卷七《成帝纪》；《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条。

[70] 按，《晋书·刘曜载记》系此事及下述刘胤攻河西事于晋咸和三年（328），《晋书·成帝纪》、《资治通鉴》卷九三均系于成和二年，从后者。

[71]《晋书·刘曜载记》“辛岩”作“辛晏”，误，说见吴士鉴《晋书斠注》。

[72]《晋书·张骏传》；《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条；《太平御览》卷三三二引《十六国春秋》。

[73]《晋书·刘曜载记》。

[74]《晋书·刘曜载记》作“卫关”，《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前赵录》作“潼关”是。

[75]《晋书·刘曜载记》等。

[76]《晋书·石勒载记》；《太平御览》卷六八、卷七一引《异苑》。

[77]《晋书·石勒载记》；《资治通鉴》卷九四，晋成帝咸和三年十一月条。

[78] 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下》；《晋书·刘曜载记》；《太平御览》卷六八引《赵书》等。

[79] 《资治通鉴》卷九四胡注云：“据《水经注》，重门城，在河内共县故城西北二十里。此盟当在怀帝永嘉四年同围河内之时。”

[80] 按，“仆谷”，应即“屠各”之异译。

[81] 《晋书·刘曜载记》等。

[82] 《晋书·刘曜载记》。

[83] 如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已佚，有辑本）就将汉、赵合称为“前赵”。唐刘知几《史通》亦合称之为“前赵”。

[84] 见《晋书·载记·序》。

[85] 如刘胤从上邽攻长安石生，关中陇右诸郡戎夏皆应之，可见前赵还是比较得人心的。

〖第七章〗 汉赵国的政治制度

一 承袭汉魏以来的职官制度

汉赵政权是由内迁的匈奴南单于后裔刘氏所建的，南单于后裔及部众自东汉迁入内地，一直到晋末，经历了二百多年时间，先后处于汉、魏、晋历代王朝的统治之下，其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已逐渐汉化。因此，他们在西晋末年于内地建立政权之际，必然采取原来汉族所建政权的模式，基本承袭汉魏以来的政治制度，而又杂以旧俗。

在刘渊建立政权之前，南迁于并州等地的南匈奴基本保持了原部落的形式，魏晋统治者分其为五部，以匈奴贵族任各部“帅”或“都尉”，其内部也保存了原来南匈奴的官爵名号。关于南匈奴的官爵名号，前已引述。刘渊父刘豹就为南匈奴的左贤王，任左部帅；其从祖刘宣为南匈奴右贤王。渊也曾为左贤王，后又被任为北单于。西晋永安元年（304）刘渊建立政权前夕，据离石，称大单于，以子原右贤王聪为鹿蠡王，还有“左于陆王刘宏、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左、右于陆王，左独鹿王号，不见前引《后汉书·南匈奴传》所记官号。按，匈奴原有于陆王号，见《后汉书》卷四七《班超附勇传》，内云勇曾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此“伊蠡王”，应即于陆王之异译。至魏末晋初，南匈奴部内官号有所变革，据《晋书·北狄匈奴传》记：“其国号有左贤王、右贤王、左奕蠡王（奕蠡王即谷蠡王）、右奕蠡王、左于陆王、右于陆王……左独鹿王、右独鹿王……凡十六等，皆用单于亲子弟也。”刘宏、刘景、刘延年均为刘渊族人，左、右于陆王、独鹿王，在十六等之内。

到刘渊正式建立汉政权后，原来匈奴的官制就逐渐为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一套官制所替代。[1]不久，刘渊又设单于台，统“六夷”部落，单于台的建置，是沿匈奴旧制而来。关于单于台，容后专门研讨，现仅就汉赵承袭汉魏以来的职官做一分析。所谓“职官”，即指汉赵国的政治机构。中国传统的史学，从《后汉书》开始的历代“正史”中，有所谓的“百官志”“职官志”等，就是专门记述历朝官制的。由于有关十六国的史籍大

多散佚，因此，我们已不能窥其官制的全貌。清代学者万斯同曾撰《伪汉将相大臣年表》，对汉赵国的官制做了些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但其年表仅据《晋书》载记，多有阙遗，且按年排列，不易了解其全貌，故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大致言之，汉赵国的官制也是逐渐发展和完善的。汉的前期与后期、汉与前赵都有所差异。汉国的官制到刘聪嘉平四年（314），达到了较为完善的阶段，而刘曜继立的前赵，承汉之制，又小有改革。由于汉赵国共存二十六年，我们只有利用现存史籍，对汉赵国的职官做一详细的探讨。为了叙述的方便，使人一目了然，我们根据汉魏以来职官的特点，将汉赵国的职官分成中枢、军事、地方三大系统加以论述。

（一）中枢之官

自刘渊称汉王，正式建立政权后，即首先采用汉朝的官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及六卿等中枢之官。见于记载的如下。

丞相 此官始置于秦，有时又分为左、右丞相，职“掌丞天子助理万机”[2]。魏、晋沿用不改，有时又称为“相国”。汉赵国任此职者刘宣、刘粲、刘曜等。汉嘉平四年（314），汉王刘聪曾以子粲为相国，总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国。刘粲即位后，也曾以曜为相国，此三人皆为刘渊子孙，因此丞相一职“皆非复寻常人臣之职”也[3]。

太尉 秦、汉均置，主管全国军政，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东汉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晋书·职官志》云：“太尉、司徒、司空，并古官也。自汉历魏，置以为三公。及晋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汉国始建，即以左于陆王刘宏为太尉，后任此职的有范隆、王彰、刘咸、刘易等。

御史大夫 秦汉时官名，其职位次于丞相，掌监察、执法兼掌重要文书图籍。西汉时，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汉国初建，以崔游为御史大夫，崔游固辞不就。后任此职的有呼延翼、陈元达等。

司徒、大司徒 《通典》卷二○《职官二》云：“……周时，司徒为地官，掌邦教。秦置丞相，省司徒，汉初因之。至哀帝元寿二年罢丞相，

置大司徒。后汉大司徒主徒众教以礼义，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魏黄初元年改为司徒。晋司徒与丞相通职，更置迭废，未尝并置。至永嘉元年始，两置焉。”汉国于永凤元年（308）渊称帝后，即置大司徒，仿晋永嘉时与丞相并置。任此职的有刘欢乐、刘聪、马景、刘殷、刘裕、刘乂、任𫖮、刘雅、刘劢、游子远、崔岳（追赠）、刘绥、刘昶、刘述（以上大司徒），刘雄、朱纪（以上司徒），郭汜（兼司徒）等。

司空、大司空 《通典·职官》云：“司空，古官……秦无司空，置御史大夫，汉初因之。至成帝绥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魏初又置司空，冠绶及郊庙之服与太尉同。”汉赵国任此职的有刘延年、呼延晏、朱纪、王育、呼延翼、靳准、曹恂（追赠）、卜泰（以上大司空），呼延晏、马景、刘景、刘均（以上司空）。

太宰、太师 《晋书·职官志》曰：“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钟繇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郑冲为之。晋初以景帝讳故，又采《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秩增三司，与太傅、太保皆为上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汉赵国的太宰、太师任此职者为刘景、刘𫖮、范隆、张茂（以上太师），刘曜、刘欢乐、刘延年、刘易、刘雅、王祥[4]（以上太宰）。

太傅 汉赵国任此职的有朱纪、崔玮、刘景、王育、刘欢乐、刘洋、呼延晏等。

太保 汉赵国任此职的有刘殷、王育、刘延年、许遐、任𫖮、刘昶、呼延晏、傅祗（追赠）。

大司马 《晋书·职官志》曰：“大司马，古官也。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恒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晋受魏禅，因其制……”汉赵沿魏、晋之制，大司马与太尉并置，任此职的有刘景、刘聪、刘洋、刘和、刘曜（行大司马、大司马）、刘雅、刘丹、刘骥、张茂、石勒、刘胤等。

以上所述从丞相至大司马（除御史大夫外），位皆上公。前引《晋书·刘聪载记》记汉嘉平四年，聪“于是大定百官：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绿𫄨绶，远游冠”。此七公是：刘粲丞相、刘景太师、王育太傅、任𫖮太保、马景大司徒、朱纪大司空、刘曜大司

马。吴士鉴《晋书斠注》引《晋略》曰："丞相、太师、太傅、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然其时又有太宰河间王易、太尉范隆，是公不止七也。"按，晋初所谓"八公"，无汉赵所指"七公"中的丞相，太师为太宰，多太尉、大将军二公。汉刘聪时的"七公"即有所指，时虽有太尉、太宰、大将军等，恐无寓于"七公"之列，《晋略》所论似可考虑。

开府仪同三司 《晋书·职官志》曰："开府仪同三司，汉官也。殇帝延平元年，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也。""三司"，即指"三公"，意为非三公而给予三公同等待遇者，往往用于加官。汉赵沿魏、晋之制，任此官者为范隆、陈元达、卜泰、晋怀帝（以上仪同三司），刘曜、游子远、石勒、刘胤（开府仪同三司）等。

特进 《晋书·职官志》曰："特进，汉官也。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太仆羊琇逊位，拜特进，加散骑常侍，无余官，故给吏卒车服。其余加特进者，唯食其禄赐，位其班位而已，不别给特进吏卒车服，后定令。"汉赵国承晋制，置特进，有此号者为王弥、晋怀帝、綦毋达、台产等。

上述丞相以下、诸公及开府等均有属吏，汉赵以上诸公及开府领大将军者之属吏，见于记载的如下。

长史，左、右长史 如鲁徽之为赵染长史，鲁凭为呼延宴长史，刘敏元原为太尉长史，周振为赵国长史，曹嶷原为王弥左长史，张宾为石勒右长史等。

参军 如卢谌曾为刘粲参军，台产原为司空刘均参军等。

司马 如刘惇曾为卫军大将军刘劢司马。

从事中郎 如王皮为大将军从事中郎等。

汉赵国也承袭了魏晋以来于中枢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及御史台的机构，现分叙如下。

尚书省

录尚书事 《晋书·职官志》云："录尚书，按，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尚书有录名，盖自（赵）熹、

（牟）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犹唐、虞大麓之职也……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汉赵国承汉、魏以来之制，设录尚书事一职，任此职的先后有朱纪、刘聪、刘粲、呼延晏、刘骥、靳准、刘殷、游子远、刘咸、刘胤、刘昶、刘顗等。

录尚书六条事 《晋书·刘聪载记》记聪曾以刘延年为“录尚书六条事”。《资治通鉴》卷八九胡注云：“录尚书六条事始见于此。沈约《志》曰：晋康帝世，何充《让录表》云：‘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余按：宋元嘉以后，江夏王义恭、始兴王濬、南谯王义宣皆录尚书六条事……如杜佑之言，则六条盖六曹也。沈约以何充《表》‘各录二条’为‘各录六条’，致有此误。”则录尚书六条事一职，系最早始于汉赵国，六条者，尚书六曹也。

尚书令 《通典·职官四》云：“……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汉赵国任此职的有范隆（守尚书令）、朱纪、刘隆、任顗、王鉴、靳明、刘欢乐等。

尚书左、右仆射 《晋书·职官志》曰：“仆射，服秩印绶与令同。按，汉本置一人，至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部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盖自此始。经魏至晋，迄于江左，省置无恒，置二，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汉赵国同晋，任左仆射的有范隆、刘殷、马景；任右仆射的有朱纪、王育、呼延晏等。

尚书 《晋书·职官志》云：“列曹尚书，按，尚书本汉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主中书，以司马迁为之，中间遂罢其官，以为中书之职。至成帝建始四年，置中书宦者，又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而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各有其任……”汉赵国任此职的有吏部尚书任顗，尚书田密、王琰、田歆、北宫纯、胡崧、王犷、台产、郝述、胡勋等。

左右选曹尚书 《晋书·刘聪载记》云汉嘉平四年“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并典选举。按，《通典》《晋书》《宋书》所记，汉、魏、晋各朝均置各曹尚书，无选曹尚书，东汉吏曹掌选举。故左右选曹尚书，也为汉赵时始置。

尚书左右丞 《晋书·职官志》曰：“左右丞，自汉武帝建始四年置尚书，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减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盖自此始

也。自此至晋不改。晋左丞主台内禁令，宗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急假；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及廪振人租布，刑狱兵器，督录远道文书章表奏事。”汉赵国任此职者，仅见“尚书左丞裴整”。

尚书郎 《通典·职官四》云：“郎官谓之尚书郎，汉置四人，分掌尚书事。”汉赵国任尚书郎者，仅见辛宾一人。

中书省

中书监、令 中书监为中书省最高长官，《晋书·职官志》记：“中书监及令，按，汉武帝游宴后庭，始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魏）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监、令盖自此始也。及晋因之，并置员一人。”汉赵沿魏、晋制，置中书监、令。任中书监的有范隆、朱纪、崔懿之、刘均；任中书令的有曹恂等。

中书侍郎、黄门郎 《晋书·职官志》记：“中书侍郎，魏黄初初，中书既置监、令，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及晋，改曰中书侍郎，员四人。中书侍郎盖自此始也。”按，汉赵国承晋置中书侍郎，亦置黄门郎。见于记载的有黄门郎傅恂、韦謏[5]，中书侍郎刘敏元[6]等。

门下省

侍中 侍中为门下省最高长官，《晋书·职官志》曰：“侍中……秦取古名置侍中，汉因之……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者则非数。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汉赵国任侍中（或加官此号）者有刘殷、王育、王弥、石勒、刘乘、卜幹、卜泰、刘岳、乔豫、和苞、杨难敌、张茂、徐邈、刘胤、刘昶、卜珝（辞不受）、崔岳（追赠）等。

散骑常侍 《宋书》卷四○《百官志下》云：“散骑常侍，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并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并为加官……魏黄初初，置散骑，合于中常侍，谓之散骑常侍，始以孟达补之。”汉赵国散骑常侍、中常侍并置，任散骑常侍的有曹恂、王忠（追赠）、刘绥、郁鞠、董景道等。

中常侍 汉赵国亦置中常侍，以宦者为之。见于记载的有王沈、宣怀、俞容等。

给事中 《晋书·职官志》云：“给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汉赵国任此职的有傅纯、傅粹。

给事黄门侍郎 《宋书·百官志下》云：“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掌门下众事。”汉赵国有黄门侍郎，任职者有陈元达、崔懿之、乔诗、乔度等。[7]

散骑侍郎 《宋书·百官志下》记：“散骑侍郎，四人。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魏、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汉赵国任此职者有董景道、王桑。

汉赵国也承汉魏以来于中枢设“九卿”或“列卿”的职官，见于记载的有如下几种。

太常 《宋书·百官志上》云：“太常，一人……秦改曰奉常，汉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应劭曰：‘欲令国家盛大常存，故称太常。’前汉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后汉不必列侯也。”汉赵国任太常一职的有朱纪、靳冲、梁胥、杨轲（辞不受）。

太史令 《宋书·百官志上》曰：“太史令，一人。丞一人。掌三辰时日祥瑞妖灾，岁终则奏新历。”汉赵任此职者有宣于修之、康相、弁广明、台产、任义等。

国子祭酒、博士 《晋书·职官志》记：“晋初承魏志，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汉赵有国子祭酒刘均、博士张师等。

崇文祭酒 据《晋书·刘曜载记》云：曜“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以董景道为崇文祭酒。

博士祭酒 其职与上述国子、崇文祭酒同，刘曜曾以台产任此职。

光禄大夫（卿），左、右光禄大夫 《后汉书》卷二五《百官志》云：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宫殿门户。又曰：“光禄大夫，比二千石……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

使。凡诸国嗣之丧，则光禄大夫掌吊。”光禄大夫分左右，始于晋初：“光禄大夫银章青绶，其重者加金章紫绶，则谓之金紫光禄大夫。旧秩比二千石。”[8]汉赵国有光禄大夫范隆、朱纪、单冲、庾珉、王俊、卜珝、晋愍帝、游子远、台产、辛勉（辞不受），左光禄大夫刘景、刘雅、张寔、刘绥、卜泰，右光禄大夫陈元达、刘殷，金紫光禄大夫王延，上光禄大夫卜泰等。

左中郎将 此官为光禄勋所统属，《后汉书·百官志二》云：“左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汉赵任此职的有宋始。

大中大夫 《后汉书·百官志二》云：“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无员。”汉赵国有大（太）中大夫公师彧、辛谧（辞不受）。

谏议大夫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胡广曰：“光禄大夫，本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谏大夫为光禄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于古皆为天子之下大夫，视列国之上卿。”汉赵国任谏议大夫的有台产、乔豫、和苞等。

奉瑞大夫 《晋书·刘曜载记》云终南山地震，长安人刘终献白玉方，曜封其为“奉瑞大夫”。

卫尉 《晋书·职官志》云：“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汉赵任此职的有呼延晏、梁芬、刘锐。

廷尉 《晋书·职官志》记：“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汉赵任此职的有陈元达、乔智明。

大鸿胪 《宋书·百官志上》云：“大鸿胪，掌赞导拜授诸王。秦世为典客，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鸿，大也。胪，陈也。”汉赵任此职者有范隆、李弘、田崧。

宗正 《晋书·职官志》云：“宗正，统皇族宗人图谍，又统太医令史，又有司牧掾员。”汉赵宗正仅见史籍记有呼延攸一人。

少府 《宋书·百官志上》曰：“少府，一人。丞一人。掌中服御之物。秦官也，汉因之。掌禁钱以给私养，故曰少府。”汉赵国任此职者有陈休。

大司农 《宋书·百官志》云：“大司农，一人。丞一人。掌九谷六畜之供膳羞者……周则为太府，秦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大司农。”汉赵任此职者有卜豫、朱诞、卜珝等。

将作大匠 《宋书·百官志上》云：“将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土木之役……晋氏以来，有事则置，无则省。”汉赵任此职者有靳陵、胡元。

都水使者 《晋书·职官志》云：“都水使者，汉水衡之职也。汉又有都水长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属太常。”汉赵有都水使者，又有左都水使者，任前者的是支当，后者是刘摅。

左国史 《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曰：“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刘渊）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左国史一职，相当于晋时专修史书的著作郎。《晋书·职官志》云：“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赵以史官名为“左国史”，当从周之“左史”而来。

汉赵国也承魏晋以来“御史台”之制，设有以下官职。

御史中丞 按，《宋书·百官志下》云：“御史中丞，一人。掌奏劾不法。”“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又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主。历汉东京至晋因其制，以中丞为台主。”[9]汉赵任此职者有浩衍（一作诸衍）、殷凯（一作段凯）。

汉魏以来，继承皇位的太子（或太弟）有东宫各官职，汉赵国东宫官属亦承此，见于记载的如下。

太子太傅 《晋书·职官志》记：“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无大小，皆由二傅，并有功曹、主簿、五官。”“及愍怀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讳师，故改太师为太保，通省尚书事，詹事文书关由六傅。”汉赵有太子太傅卜泰、刘胤。

太子少傅 汉赵有太子少傅董景道。

太子太师 汉赵有太子太师卢志。

太子少师 汉赵任此职者为台产。

詹事 此官为东宫太傅属官，《宋书·百官志下》云：“太子詹事一人。丞一人。职比台尚书令、领军将军。詹，省也。”汉赵任此职的有曹光[10]、鲁繇[11]。

太子洗马 《晋书·职官志》云：“洗马八人，职如谒者秘书，掌图籍。释奠讲经则掌其事，出则直者前驱，导威仪。”汉赵任此职者有刘绥。

东宫舍人 《晋书·职官志》云：“舍人十六人，职比散骑、中书等侍郎。”汉赵任此职者为荀裕。

汉赵国承汉制于中宫（即后宫，皇后居处）置各种官员，见于记载的如下。

中宫仆射、中黄门 《后汉书·百官志四》云：“中宫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汉赵所置中宫仆射、中黄门可能即由汉代中宫冗从仆射而来，亦宦者任之。见于记载的有中黄门陵修、中宫仆射郭猗等。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汉赵承魏晋以来实行的封建“五等爵制”，封王极滥。诸王只有食邑，而无实权，只有兼职后方有职有权。汉赵所封诸王侯，绝大部分是匈奴刘氏一族，其余则是割据一方的归降首领或少数民族首领。见于记载的如下。

王 始安王、中山王、秦王刘曜，安邑王刘钦，汝阴王、上洛王刘景，楚王刘聪，梁王刘和，陈留王刘欢乐，江都王刘延年，长乐王刘洋，上郡王刘俊，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北部王刘乂，曲阳王刘贤，永安王刘安国，西阳王刘璿，西昌王刘锐，河内王、晋王刘粲，河间王刘易，彭城王刘翼，高平王刘悝，勃海王刘敷，济南王刘骥，燕王刘鸾，楚王刘鸿，齐王刘劢，秦王刘权，魏王刘操，赵王刘持，襄陵王刘摅，代王刘恒，吴王刘逞，颍川王刘朗，零陵王刘皋，丹阳王刘旭，蜀王刘京，九江王刘坦，临川王刘晃，东平王刘约，会稽王刘康（衷），安定王刘策，中山王、广平王刘岳，中山王刘雅，安阳哀王刘厉，长乐王刘袭，太原王刘阐，淮南王刘冲，齐王刘敞，鲁王刘高，楚王刘徽，永安王、南阳王刘胤，临海王刘俭，河间王刘述，汝南王刘咸等（以上均为匈奴刘氏一族）。

此外，还有亲汉王张訇督、平晋王石勒、武都王杨难敌，屠各王石武为酒泉王，张茂为凉王，羌酋盆句徐为北羌王等。

公 石勒为汲郡公、上党郡公，王弥为东莱公、齐公，呼延翼为雁门郡公，刘虎为楼烦公，晋怀帝为平阿公、会稽郡公，王彰为定襄郡公，曹恂为南郡公，刘顗为昌国公，虚除权渠为西戎公，崔岳辽东公，刘绥为平昌公，姚弋冲为平襄公，刘昶为河南郡公等。

侯 晋愍帝为怀安侯，蒲洪为率义侯，李景年为梁邹侯，王忠为安平侯，台产为关中侯，张闾、辛晏、梁勋、杨韬等皆封列侯等。

伯 石勒曾为陕东伯。

子 乔豫为安昌子，和苞为平舆子。

又，《晋书·刘曜载记》还云：曜葬父、妻后，“大赦境内殊死已下，赐人爵二级……”也就是说，汉赵政权也承秦汉以来民爵之制。《汉书·百官公卿表》列汉承秦民爵二十级，汉赵民爵情况已不可考。

（二）军事之官

汉赵军事之官，除上述汉魏以来“三公”，“八公”中的大司马、太尉外，见于记载的如下。

大将军 《晋书·职官志》曰：“大将军，古官也。汉武帝置，冠以大司马名，为崇重之职。及汉东京，大将军不常置，为之者皆擅朝权……及晋受命，犹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后复置，在三司上。”汉赵承晋制，置大将军，先后任此职的有刘和、刘粲、刘敷、刘约、刘骥、靳准、刘岳、陈安、石勒、杨难敌（以上大将军），张骏（上大将军）等。

骠骑大将军、骠骑将军 《通典》卷三四《职官》云：“汉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光武中兴，以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魏、晋、齐并有之。”汉赵国任此职的有刘易、刘骥、石勒（以上骠骑大将军），王彰、刘述（以上骠骑将军）。

车骑大将军、车骑将军、左右车骑将军 《通典》卷二九《职官》云：“汉文帝元年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后汉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马

防行车骑将军征之……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始赐金紫，次司空……魏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汉赵国任车骑大将军的有刘曜、刘聪、刘逞、游子远、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任车骑将军的有刘雅、靳明、晋愍帝（行车骑将军）等。此外，汉赵还有左、右车骑将军，分由乔泰、王腾担任。

卫大将军、卫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卫将军，一人。汉文帝元年，始用宋昌为卫将军。三号位亚三司。汉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车骑将军班同三司……汉末奋威将军，晋江右伏波、辅国将军，并加大而仪同三司。”汉赵有卫大将军刘胤，卫将军刘翼、靳康。

抚军大将军、抚军将军 《晋书·职官志》云：“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等大将军……开府者皆为位从公。”则晋有抚军大将军，汉赵任此职者为刘乂、刘粲，曾任抚军将军者为刘聪等。

龙骧大将军 见上引《晋书·职官志》。汉赵刘曜曾任此职。

都护大将军 见上引《晋书·职官志》。汉赵刘贤曾任此职。

中军大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中军将军，一人。汉武帝以公孙敖为之，时为杂号。”晋时有中军大将军，开府者位从公。[12]汉赵王彰曾任此职。

冠军大将军、冠军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冠军将军，楚怀王以宋义为卿子冠军。冠军之名，自此始也。”晋有冠军大将军，开府者位从公。[13]汉赵任此职者为乔智明。任冠军将军的有乔晞、呼延朗、呼延那鸡等。

“四征”大将军、“四征”将军 《通典》卷二九《职官》云：“四征将军，皆汉魏以来置。加大者始曰方面，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各一人。魏黄初中，位次三公。”汉赵有征东大将军石勒、王弥、刘岳、刘畅，征北大将军刘灵、刘雅；征东将军刘操，征西将军刘骥、刘厚、虚除权渠、刘贡，征南将军刘悝等。

“四镇”大将军、“四镇”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镇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魏武帝居之。镇南将军，一人。后汉末，刘表居之。镇西

将军，一人，后汉初平三年，韩遂居之。镇北将军，一人。”四征、四镇，加大字，晋代也置，开府者位皆从公。[14]汉赵有镇东大将军石勒、王弥，镇南大将军田崧，镇西大将军韦忠；镇东将军綦毋达、呼延谟，镇北将军靳冲、刘策、刘丰。

“四安”大将军、“四安”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安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陶谦为之。安南将军，一人。安西将军，一人。后汉末段煨为之。安北将军，一人。鱼豢曰：‘镇北、四安，魏黄初、太和中置。’”汉赵有安东大将军石勒、安南大将军赵染、安北大将军赵固，行安东将军曹嶷、安西将军刘雅（一作安平将军）、安北将军赵固。

“四平”大将军、“四平”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四平，魏世置。”汉赵有平东大将军石勒，平西大将军王石武，平北大将军王桑；平西将军赵染、刘厚、姚弋冲，平北将军刘灵、王桑、卜珝。

灭晋大将军 此为汉赵所置，可能与“四平”等大将军同等。任此职的有刘景。

前军大将军、右军将军 《晋书·职官志》云：“左、右前后军将军，按，魏明帝时有左军，则左军魏官也，至晋不改。武帝初又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汉赵曾以呼延晏为前军大将军攻洛阳，刘黑曾任前军将军，刘幹曾为右军将军。

忠义大将军 此为汉赵赐有功的其他民族首领的封号，如郁鞠就有此号。

前将军、右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以下，周末官，秦、汉并因之，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来复置。”汉赵有前将军刘景、刘丰，右将军刘参。

建武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建武将军，魏置。”刘曜最初即任此职。

虎牙将军 《通典》卷二九《职官》云：杂号将军中有“虎牙”，注曰：“后汉光武以盖延为之。”汉赵刘钦、李景年曾为虎牙将军。

武卫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武卫将军，无员。初魏王始置武卫中郎将，文帝践阼，改为卫将军，主禁旅，如今二卫，非其任也。晋

氏不常置。”汉赵任此职的有刘钦、高乔、令狐泥、刘朗、刘璿、刘盛。

平晋将军 此为汉赵所置杂号将军之一，刘厉曾任此职。

左、右卫将军 《晋书·职官志》云：“左、右卫将军，按，文帝初置中卫及卫，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卫，以羊琇为左，赵序为右。”汉赵有左卫将军马景、卜崇，右卫将军刘安国。

护军将军 《晋书·职官志》记：“护军将军，按，本秦护军都尉官也。汉因之，高祖以陈平为护军中尉，武帝复以为护军都尉，属大司马。……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汉赵任此职者为马景。

平虏将军 汉赵杂号将军，刘景、卜休曾任此职。

辅汉将军 汉赵杂号将军，石勒、张寔曾任此职。

卫军将军 任此职的有刘和、呼延瑜。

征虏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征虏将军，汉光武建武中，始以祭遵居之。”汉赵任此职的有呼延颢、邢延、王翼光。

镇远将军 汉赵有镇远将军梁伏疵。

讨虏将军 汉赵任此职者为傅虎。

荡晋将军 汉赵有荡晋将军兰阳。

冠威将军 汉赵任此职者为卜抽。

中护军将军 中护军将军可能指汉赵中宫的护军将军，任此职者为靳准。

骑兵将军 汉赵任此职者为刘勋。

振威将军 《宋书·百官志上》云：“振威将军，后汉初，宋登为之。”汉赵任此职者为宋恕。

镇军将军 汉赵以刘袭、王忠任之。

辅威将军 汉赵以呼延青人任之。

安国将军 汉赵以盆句徐任之。

以上自建武将军以下均为杂号将军。史籍中还记载了汉赵国无名号的将军或将，计有：綦毋豚、吕逸、苏铁、刘五斗、赵慎、呼延寔、平先、黄秀、帛成、蒋英、辛恕、刘儒、简令、张平、康平、刘狱、乔嵩、张阆、辛晏等。

长水校尉 《宋书·百官志下》云：“长水，胡部落名也。胡骑屯宣曲观下。韦曜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厩近长水，故以为名。长水，盖关中小水名也。’”汉赵任此职者为尹车。

平羌校尉 《晋书·职官志》云：“护羌、夷、蛮等校尉，按，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西戎校尉于长安……”汉赵以韦忠为平羌校尉。

护南氐校尉 刘曜曾以杨难敌为护南氐校尉。

校尉、东夷校尉 汉赵曾以石勒为校尉或东夷校尉。

光国中郎将、宁羌中郎将 《通典》卷二九《职官》有“杂中郎将”，如使匈奴中郎将、平越中郎将、武卫中郎将等。汉赵承此置光国中郎将，以王犷任之，置宁羌中郎将，以杨难敌任之。

汉赵也承汉魏以来“持节都督”的制度。《宋书·百官志上》云：“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明帝太和四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汉赵国承晋制，有持节都督。如刘渊曾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击刘琨，以王弥“都督六州诸军事”，以石勒为“持节、平东大将军”；刘聪曾以卫尉呼延晏为“使持节、前锋大都督”，以刘曜为“假黄钺、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以卜珝为“使持节、平北将军”；刘曜曾以崔岳为“使持节、侍中、大司徒、辽东公”，以杨难敌为“使持节，侍中，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诸军事”，以休屠王石武为“使持节、都督秦州陇上杂夷诸军事”，以河西张茂为“使持节，假黄钺，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等。

除上述汉赵军事之官外，《晋书·刘聪载记》云，汉嘉平四年（314），聪大定百官，置七公，又“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又，《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二年（314）云聪“又置辅汉等十六大将军”。若上引《晋书》中，“上军”大将军记载重复的话，那么正好是十六大将军。内辅军（或抚军）、都护、中军、龙骧、冠军、前军等大将军及辅汉、镇军、右军、虎牙等将军，前有叙述外，其余卫京、后军、左军、上军、下军、辅国等大将军任职者，不见记载。

（三）地方之官

汉赵国的地方之官及其疆域，变动较大。大致言之，在汉刘聪嘉平四年（314）以前和刘曜建前赵之后，汉赵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基本上同于魏晋以来的州郡制。嘉平四年刘聪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一直到汉政权灭亡、前赵继立为止。清代学者洪亮吉所撰《十六国疆域志》卷一《前赵》，大致将汉赵的地方行政区划分成刘渊、刘聪和刘曜三个时期，进行论述。这种分法是欠妥的，因为刘聪于嘉平四年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在此之前汉国的地方行政制度与之有很大差别。而刘曜建立前赵，地在平阳之西关陇地区，与汉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又有很大的差别。据此，我们将汉赵国的地方之官分成以下三个时期，加以论述。

1.嘉平四年前（304～314）汉政权的地方之官

司隶校尉 《晋书·王弥传》云：弥降刘渊后，渊封其为“司隶校尉、侍中、特进”。同书《刘聪载记》记：“时愍帝即位长安，聪遣刘曜及司隶乔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长安。”又，《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刘渊临死前，以北海王刘乂“领司隶校尉”。这是关于汉嘉平四年改革前设置司隶校尉的记载。据《晋书·职官志》云：“司隶校尉，按，汉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隶校尉，察三辅（即京兆、冯翊、扶风）、三河（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历汉东京及魏晋，其官不替。”汉嘉平四年前所置司隶校尉系承魏晋而来，以京都平阳为中心，管附近若干郡，具体设置已不可考。

雍州牧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并州”条云：“及永兴元年，

刘元海僭号于平阳，称汉，于是并州之地皆为元海所有。元海乃以雍州刺史镇平阳，幽州刺史镇离石。”《十六国疆域志》卷一引《前赵录》：“嘉平二年，聪雍州刺史赵固。”[15]又，《晋书·刘聪载记》记刘曜于嘉平元年攻陷长安，聪封其为“雍州牧、中山王”。刘曜所任雍州牧，已镇长安，而非平阳了。

幽州牧 上引《晋书·地理志》云刘渊以“幽州刺史镇离石”。《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六年（312）记：聪追赠曾救过刘曜的傅虎为“幽州刺史”。又于汉嘉平元年以石勒为“幽州牧”。

并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312），汉攻陷晋阳，聪“以前将军刘丰为并州刺史，镇晋阳”。后刘丰为猗卢所杀，曜等退回平阳。又，聪还曾封石勒为“并州牧”，此系虚衔，非实指。

冀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云：“夏，四月，王浚将祁弘败汉冀州刺史刘灵于广宗，杀之。”如此，汉赵冀州刺史似治广宗。又，《水经注》卷四“沁水”条曰：“刘聪以詹事鲁繇为冀州（刺史），治此（随氏县）。”则此又为汉冀州另一治所。此外，石勒据襄国后（312），聪以勒为“冀州牧”，此为原冀州之地，故聪以冀州牧授勒。

青州牧、徐州牧 《资治通鉴》卷八六怀帝永嘉元年（307）记：王弥降刘渊后，渊拜其为“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后以其为青州牧。原弥长史曹嶷，后也被封为“青州牧”。

荆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八七怀帝永嘉六年（312）记：“聪以（赵）固为荆州刺史，领河南太守，镇洛阳。”则嘉平四年前，刘聪所置荆州，治洛阳。

梁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八七怀帝永嘉五年（311）记：“（贾）疋遂袭汉梁州刺史彭荡仲，杀之。”胡注：“荡仲，安定卢水胡也，据后荡仲子天护，汉以为凉州刺史，此‘梁’当作‘凉’。”又，同书卷八八永嘉六年有“汉以天护为凉州刺史”一句。按，时凉州为张氏所据，疋活动于关中，荡仲父子应为汉梁州刺史，其地大约在安定，胡注误。

又，《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于刘聪时，列雍州，下云“《前赵录》：嘉平二年，聪雍州刺史赵固”；又列豫州，下云“《前赵录》：嘉平二年，聪豫州刺史王桑”。考《资治通鉴》卷八八“怀帝永嘉六年”条记：赵

固、王桑欲归平阳，惧刘琨兄子刘演邀击，遂降。“琨以固为雍州刺史，桑为豫州刺史”，后固归平阳，聪以其为荆州刺史，镇洛阳。如此，则《疆域志》所引有误，今从《通鉴》，不列豫州。

2.汉嘉平四年至麟嘉三年（**314～318**）的地方之官

司隶校尉、左右司隶 《晋书·刘聪载记》云：嘉平四年，聪“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亚公”。按，刘聪这一措施，乃是对汉魏以来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其所置左右司隶各领二十余万户，以万户为单位，置一内史，共四十三内史，即四十三万户，几乎包括了当时汉国实际控制的地区；以“万户”为行政单位，乃是按秦汉以来北方匈奴等民族以万户为行政单位的旧俗。即是说，此时汉国统治者以汉魏以来地方行政制度的名义（即“司隶校尉”），恢复了其祖先匈奴以万户为单位的地方行政组织，是糅合了汉胡地方行政组织特点的新形式。当时左右司隶能辖四十三万户人口，是汉国不断从四周掠迁而来的，其中主要是“晋人”（汉族）。这种“复旧”的措施，晋人当然是不习惯的，加之汉国统治阶级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一有机会，他们就采取逃亡的形式进行反抗。如《晋书·刘聪载记》云：麟嘉元年，“河东大蝗……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又记麟嘉二年，赵固、郭默攻汉河东，“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

《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云：“聪又分置左右司隶部，则左司隶，盖部司州平阳诸郡；右司隶，盖部荆州河南诸郡地。”按，聪于此时置左右司隶，原设雍、荆等州似已废除。又，左右司隶的机构，近来有学者撰文说，应称为“司隶寺”，主要根据是《晋书·刘聪载记》中有“聪宫中鬼夜哭，三日而声向右司隶寺”[16]。按，同书又记有“司隶部人”，“犬与豕交于相国府门……又交于司隶、御史门”。司隶寺可能为司隶部所属机构，而“司隶部”似乎才是司隶的机构，下又分设左、右司隶部。据文献所记，原任汉国廷尉、黄门郎的陈元达曾任过“左司隶”，其余不见记载。

刘聪置左右司隶部的同时，似乎仍保留了“司隶校尉”一职。《资治通鉴》卷九○晋元帝太兴元年（318）记：聪寝疾，封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此司隶校尉，可能直接领左右司隶，具体情况因史籍阙载，不得而知。

又，据《晋书·地理志》载：“及刘聪攻陷洛阳，置左、右司隶……

又置殷、卫、东梁、西河阳、北兖五州，以怀安新附。”则除左、右司隶之外，聪还设立五州，与前引《载记》还设“州牧”是一致的。

殷州刺史 《十六国疆域志》卷一引《水经注》云：“河内怀县有殷城。”下注云：“《图经》：在今武涉县东南。”“昔刘曜以郭默为殷州刺史，督缘河诸军事，治此。乐史《太平寰宇记》：获嘉县，西晋曾立为殷州。按，此西晋，即指刘聪时。”刘聪时，确曾置殷州，《太平御览》卷五一九引《三十国春秋》记：“前赵殷州刺史杜广初为刘景厩卒……”

卫州刺史 《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云：“按，聪所置卫州，当在朝歌县。”

东梁州刺史 按，刘聪在嘉平四年前曾设梁州，以卢水胡彭荡仲为刺史。后又置东梁州，可能即原梁州。

西河阳州刺史 《晋书》卷九六《列女·王广女传》云：“广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17]《十六国疆域志》卷一曰：“西阳州，疑即西河阳，或《地志》及《列女传》有一误也。”

北兖州刺史 无考。

3.前赵时地方之官（**318～326**）

并州牧 《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前赵录》曰：“光初五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献玉玺一，文曰赵盛。”则前赵置并州，其治所在蒲坂。[18]

秦州牧、凉州牧 《晋书·地理志》云：刘曜徙都长安，“以秦、凉二州牧镇上邽”。则前赵置秦、凉二州，均镇上邽。前赵还曾以休屠王石武为秦州刺史，以杨难敌为益、宁、南秦三州牧，以河西张茂为凉州牧等。杨难敌、张茂所领南秦州、凉州牧，都是名义上的。

益州刺史 《晋书·刘曜载记》云：曜曾以田崧为益州刺史，镇仇池。

朔州牧 《晋书·地理志》云：刘曜以“朔州牧镇高平（今宁夏固原）”。

幽州刺史 《晋书·地理志》云：刘曜以“幽州刺史镇北地”。

殷州刺史 见前述。

以上是汉赵国州一级地方行政设置情况，至于州以下郡一级单位，见于史籍的如下。

平阳大尹 按，《后汉书·百官志》云：“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汉赵承汉制，于京都平阳，置平阳大尹。《晋书·石勒载记上》云：石勒攻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平阳，时为汉国京都，刘聪置左右司隶之后，是否还置“尹”？或为靳准杀刘粲后所置，亦未可知。

弘农太守 《晋书·李矩传》云：“时弘农太守尹安、振威将军宋始等四军并屯洛阳，各相疑阻，莫有同志……”《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三年（320）条记尹安、宋始等四军为“赵将”，即前赵守洛阳四将，则尹安为前赵弘农太守。又，《疆域志》引《前赵录》还记有“弘农太守呼延谟”。

河内太守 《晋书·石勒载记》云：“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明帝太宁二年（324）记此事，唯“河内太守尹平”作“河南太守尹平”。从尹平在新安情况看，《载记》所记较确。

河南太守 见前述，聪曾以赵固为荆州刺史，领河南太守，镇洛阳。

太昌郡（太守） 《太平寰宇记》卷四八引《十六国春秋》曰：“刘元海僭号称汉，初理于蒲子，后徙平阳，又于此置太昌郡，以蒲子属焉。”则汉赵曾设太昌郡，治蒲子。

巨鹿太守 《太平御览》卷四二四引《前赵录》云：“张寔为巨鹿太守，治任威强，路不拾遗，曾欲以寔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辞。”刘聪时石勒据襄国，巨鹿在襄国北，或此时聪遣寔至巨鹿为太守，抑或此巨鹿为侨治郡？不得而知。

晋阳太守 《晋书·刘曜载记》记有“晋阳太守王忠”。

阳平等十郡（太守） 《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引《赵书》云：“刘曜召捕殿巧手三千人，发阳平等十郡车牛五千乘，运土筑建德殿台。”按，阳平郡可能设在关中，因史料阙如，无考。

汉阳等十三郡（太守）《晋书·刘曜载记》曰：曜以子胤为大司马，进封南阳王，“以汉阳诸郡十三为国”。汉阳诸郡十三，内有汉阳郡（治今甘肃天水附近），余十二郡则有安定、北地、略阳、天水、南安、陇西、陇东、武都、新平、金城、阴平、始平郡。事实上此十二郡有的不在前赵的统治下，胤之封不过是名义上的而已。

此外，汉赵在其统治地区内，先后沿魏晋旧例设置郡县甚多。《十六国疆域志》卷一据汉赵攻占地区，还列有：平阳郡（领县十一）、汲郡（领县六）、顿屯郡（领县四）、魏郡（领县八）、太原郡（领县十三）、上党郡（领县十）、西河国（领县四）、乐平郡（领县五）、新兴郡（领县五、护军一）、长乐国（领县一）、齐郡（领县六）、济南郡（领县一）、东莱国（领县六）、东平国（领县七）、河东郡（领县八）、荥阳郡（领县八）、京兆郡（领县九）、冯翊郡（领县八，护军一）、扶风郡（领县八）、上郡（寄治夏阳）等。其中包括汉国所属石勒、王弥、曹嶷等所据有郡县。汉赵是否沿魏晋之旧制，于占领地区内置以上郡县？还不能完全肯定。故以上《疆域志》所列郡县，只可作参考之用。

至于汉赵国在发展过程中疆域的变化，在前面叙述其历史时，已有简约的叙述，此不赘述。唯其最盛时的疆域，正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所述：是“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这只是汉赵最盛时期，即汉建元二年（316）灭西晋，取关中地区之后，至麟嘉三年刘聪死时，所领有的实际统治区域，不包括当时名义上臣属于汉国的石勒、曹嶷所控制的地区。

又，还应指出的是，汉赵国从开始建立起，就采用了汉魏以来使用的年号制度，一共有九个年号，现分叙如下。

元熙，刘渊年号（304年10月～308年9月），凡五年。

永凤，刘渊年号（308年10月～309年元月），凡二年。

河瑞，刘渊年号（309年2月～310年6月），凡二年。

光兴，刘聪年号（310年7月～311年5月），凡二年。

嘉平，刘聪年号（311年6月～315年2月），凡五年。

建元，刘聪年号（315年3月～316年10月），凡二年。

麟嘉，刘聪年号（316年11月～318年6月），凡三年。

汉昌，刘粲年号（318年7月～9月），凡一年。

光初，刘曜年号（318年10月～329年8月），凡十二年。

又，《魏书·刘聪传》云：“曜得黑兔，改年为太和。”时在光初五年左右。按，钟渊映《历代建元考·总论》云：“魏收《魏书》载曜得黑兔，改年太和。然纪年太和者，石高祖勒也。曜号光初，迄年十二，无改太和事。当时同国号赵，又境土相接，传闻缪戾，收因误书尔。”此说是。

通过以上对汉赵国主要职官的分析，可以得出汉赵承袭汉魏以来职官制度的几个特点。

1.从汉赵国建立之始，刘渊称汉王、皇帝，其政权机构从中枢到地方，主要是继承了汉、魏、晋以来内地政权的制度。各个职官的名称、职能，均无多大的变更。在刘渊建立政权初期，由于渊以汉朝刘氏的外甥自居，打着“汉”旗号，以号召广大的汉族，因此在政治制度上相应地恢复了汉朝的制度，最明显的是改国号为“汉”，中枢之官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首，即汉的“三公”，分别由刘宣、刘宏和崔游任之，下设九卿，如以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等。只是到刘渊称帝时，才吸收了魏晋以来的官制，逐渐完善。

2.汉赵国承继汉魏以来的职官制度，较为全面。仅从以上见于记载的各种职官来看，就几乎与西晋等王朝的职官一致。中枢之官，“三公”“七公”之外，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御史台等齐全；军事之官，各种名目的大将军、杂号将军、持节都督等也应有尽有；地方之官，沿汉魏以来所行郡县制及封王制，也十分完备。因此，可以说汉赵政权全面承继了汉魏以来的职官制度，是一个基本上汉化了的封建政权。不仅如此，汉赵政权对原汉魏的职官还有所发展，影响到后世。如前述的“录尚书六条事”“左右选曹尚书”及一些杂号将军等。

3.汉赵政权还曾对汉魏以来的州郡制做了一些改革，即在原来州郡制的名义下，杂以匈奴的旧制。这就是前述刘渊于嘉平四年（314）置左右司隶，以司隶之名以统“万户”，而万户作为地方行政的建置，它带

有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特点。虽然这种改革，到刘曜继立后即废止，但是这种孱杂汉胡行政制度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引人注目的。

4.为了对汉赵国职官制做进一步分析，有必要对任职官员的族属及其他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故列表进行分析，表见附录一。

在所列《汉赵职官表》中，据现存史籍辑出263名汉赵官员，大致可分为五种情况：一是匈奴刘渊一族任职官员44人，二是刘氏宗族任职官员30人，三是其他匈奴族任职官员40人，四是汉族任职官员131人，五是其他少数民族任职官员18人。从以上诸表，可以进一步分析出汉赵职官制度的另一特点，即汉赵政权是由内迁的匈奴贵族所建立的，匈奴族始终是汉赵国的统治民族。这不仅体现在刘渊一族一直是汉赵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王称帝，而且其政权各级官吏中，见于文献的匈奴族共114名，尽管从数量上看比汉族任职官员略少，但其绝大多数担任国家政治、军事的要职，掌握了军国的大权。这还不算下面将要叙述的另一套官制（单于台），其完全由匈奴人掌握。这一特点，乃是十六国时期氐、羌、羯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共有的。因此，十六国时期由内迁匈奴刘氏所建的汉赵国，其统治民族应是内迁的、已经逐渐汉化的匈奴族，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在汉赵政权中，史籍所载汉族官员的人数占了全部官员的一半以上，而且位至“七公”及大将军的占全部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强，这的确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建立政权的内迁匈奴刘氏本身就已经逐渐汉化，他们利用汉魏以来统治各族人民的办法来进行统治，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不得不吸收汉族上层参加政权。二是汉赵国统治的地区主要是汉族人民聚居之地，汉族人口占全国绝大多数。汉赵政权的建立，正是刘渊打着“汉”旗号，号召广大汉族推倒西晋的结果。如果汉赵统治者不笼络、利用汉族士大夫和世族豪门，那么他们的统治是根本无法维持的。所以，汉赵统治者从建立政权开始，就极力网罗汉族士大夫、世族豪门，如一开始就重用范隆、朱纪、崔懿之、崔游等。这种情况，在十六国时，凡是由内迁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均是如此。而因汉赵统治者匈奴刘氏汉化渐深，建立政权之地又是汉族聚居和经济发达的地区，故而显得更为突出。

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称汉赵国或十六国时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是以匈奴或其他少数民族为主体与汉族的联合专政，即所谓的“胡汉联合专

政”[19]。此说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中国很早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综观中国历史，凡是入主中原等汉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包括后来的元、清等政权，都有大量的汉族官员。同样，在汉族建立的政权中，也有少数民族的官员。这是多民族国家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按上述学者的论点，他们都可称为“汉胡联合专政”或“胡汉联合专政”，这是毫无意义的。同时，所谓的“胡汉联合专政”的提法，似乎抹杀了这些国内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界限，抹杀了尖锐的民族矛盾的存在。而如汉赵国等政权，正是因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力衰弱走向灭亡的。

二 单于台——汉赵统治其他少数民族的机构

汉赵国的职官，除了上述一套承袭汉魏以来的职官系统之外，还设有一套专门统治其他民族的官制，即所谓的“单于台”。据《晋书·刘元海载记》的记载，刘渊称帝后六年，即河瑞二年（310），曾以子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此为汉赵国设置单于台之始。聪即位后，以其异母弟刘乂为皇后单氏所生，封“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20]，即是说，聪即位后，单于台的建置仍然存在，此时的大单于由皇太弟刘乂担任。汉嘉平四年（314），聪置左右司隶，又设“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此时刘乂仍为大单于。同年十一月，聪即以子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21]，说明此时刘乂失宠，其所任大单于一职，改由粲继任。至麟嘉二年，刘粲害乂，诬其谋反，“遣（王）沈、（靳）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资治通鉴》卷九○胡注云：“乂（乂）为大单于，氐、羌酋长属焉，故皆服事东宫。”此事亦可证，粲为大单于前，乂一直领大单于之职。七月，聪则正式以粲“为皇太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前”[22]。刘曜继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单于台似已废置，一直到光初九年，史称曜才以子刘胤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23]。

以上就是现存史籍关于汉赵国单于台的记述，仅数条而已。这给我们研究单于台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现仅据此，对单于台制做一简约的分析。

1.汉赵国单于台的设置，并未贯穿于汉赵国的始终，一般说来，是在汉或赵建立，确定了汉魏以来的职官制之后才设置的。因此，我们虽说汉赵国施行的是两套官制，胡汉分治，但实际上以汉魏以来的官制为主，以单于台为辅。

2.汉赵国的单于台一般设置在其国都附近，如刘渊、刘聪时，都平阳，则单于台置于平阳西；前赵都长安，单于台设于长安附近的渭城（今陕西咸阳渭城）。以后，后赵石勒所设单于台，也在其国都襄国。[24]

3.单于台的最高长官为“大单于”，此名系沿袭匈奴旧制而来，一般

由将要继承君位的储主担任。如刘渊时，以子聪为大单于；刘聪在位时，以皇太弟乂、子粲为大单于；刘曜在位时，以子胤为大单于。后赵石勒称帝前，自兼大单于，称帝后，以子石弘为大单于；石虎即立后，以子石宣为大单于等。[25]因此，大单于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掌握着军国大权。《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记，石虎（季龙）曾私谓其子邃曰：“主上（石勒）自都襄国以来，端拱指授，而以吾躬当矢石……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指弘），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从此，亦知大单于地位之重要。

大单于所在地可能仍沿旧俗称“单于庭”，《晋书·石勒载记下》记勒曾“命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之于单于庭”。

大单于之下，汉国置“单于左、右辅”，刘曜曾任单于左辅，陈元达任单于右辅；前赵则改左、右辅为“左、右贤王”。所谓“左、右辅”，即原匈奴旧制大单于之下的“左、右贤王”而稍变其名，到刘曜时则径直称作“左、右贤王”。在左、右贤王以下，汉时则以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此都尉，也系汉国借用魏晋以来内迁匈奴五部，每部设“都尉”这一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单于台所辖的“六夷”，以其原有的部落组织为基本单位，而不像晋人以“户”为单位。到刘曜时，左、右贤王以下，可能废“都尉”之名，仍沿匈奴旧俗，以“万户长”之类的名称代之。万落的长官无论叫都尉，还是其他名称，任职者“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4.单于台统治的人民，是“六夷”，即除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而且主要是以游牧或畜牧业为生的、以部落为组织形式的少数民族或统称为“胡”的民族。六夷中的“胡”，具体指匈奴，主要是那些仍保持着游牧生活、汉化不深的匈奴部落，如上述的黑匿郁鞠部等。至于早已入居内地，汉化既深，且已从事农耕的匈奴，则不在此列。羯，指羯胡，原匈奴统治下的部族，石勒即羯胡，其源于西域胡人。[26]前述石勒投奔的张訇督、冯莫突亦可能是羯胡。鲜卑，汉赵国所统六夷中也有，如刘渊初即位有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附之，即是。氐、羌，乃是汉赵六夷中人数众多的两族，他们分布的地区主要在雍州（关中地区），如前述的氐酋单征及其子单冲，刘渊皇后即征之女；另有氐酋蒲洪，即后前秦苻氏的祖先。又如羌酋虚除权渠、北羌王盆句徐等。巴人，或称巴氐，系曹操平汉中后迁至关中等地，前赵时反抗刘曜的巴酋句徐、库彭等即是。

《晋书·刘曜载记》云，曜滥杀巴酋，引起“巴氏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又云：“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峻不降，酋大虚除权渠自号秦王。”可见汉赵国内氐、羌、巴人之众。

5.汉赵国的单于台系沿匈奴政治制度而来，如其最高首领称“大单于”，下设“左、右辅”（左、右贤王），以“万落”为行政单位，以“落”计户等。因此，按其性质来讲，单于台不仅是军事组织，而且是带有家属、牲畜财产的部落组织，与原来匈奴社会组织基本相同。正因为如此，汉赵的军队大部分出于单于台所统之六夷之中，故大单于基本掌握了汉赵的军队，地位十分重要。

除此而外，在汉赵未置单于台的时期，对一些归附的“六夷”部落首领，也赠以官爵。这些官爵名称，主要是原部落首领的称号或原匈奴官号，或杂以汉魏以来的官号。见于记载的如下。

亲汉王、都督部大 《晋书·石勒载记》云：勒说“胡部大张㔨督、冯莫突”等降渊，渊“署㔨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亲汉王为仿汉魏以来王爵之制，都督部大则为莫突原号“部大”[27]，加“都督”而成。

率义侯 《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二年（319）曜即位长安后，有略阳氐酋蒲洪降附，曜以洪为率义侯。此时，曜未置单于台，率义侯之封也只是名义上的爵位，时蒲洪在陇西略阳，前赵势力还未达于此。

征西将军、西戎公 如前所述，上郡羌酋虚除权渠为游子远击败后，降刘曜，曜以其为征西将军、西戎公。

平西将军、平襄公 《资治通鉴》卷九二，晋明帝太宁元年（323）记曜杀陈安后，陇右氐、羌皆送质任降，曜“以赤亭羌酋姚弋仲为平西将军、平襄公”。时前赵未设单于台，弋仲为以后建后秦的姚氏祖先。

散骑常侍、忠义大将军、左贤王 《晋书·刘曜载记》云：光初六年黑匿郁鞠送曜子还，曜封其首领郁鞠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忠义大将军、左贤王”，其左贤王之号显为原匈奴官号。此时曜还未设单于台，此左贤王非单于台之左贤王，只是一个荣誉称号。

北羌王、安国将军 《晋书·刘曜载记》记有降刘曜的北羌王、安国

将军盆句徐，时矅也未设单于台。

三 关于“胡汉分治”问题

在分别探讨了汉赵国的两套官制及其特点之后，再总观汉赵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比较清楚了。正如过去许多论著中所说，汉赵国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胡汉分治”，即设置胡汉两个系统的官制，分别统治汉族和胡族（六夷）。产生这种“胡汉分治”的原因，不外乎汉赵统治的地区既有人数众多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又有从汉代以来陆续内迁、仍以游牧或畜牧为生的六夷部落；加之汉赵的统治者是内迁汉化之匈奴，他们既有维持匈奴旧习及制度的一面，又有因汉化而接受传统汉族文化和礼仪制度的一面。

因此，面对国内经济、文化及习俗相异的胡汉人民，汉赵统治者设置两个系统的官制，分别统治胡汉人民。这是时代的产物，即在十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这种“胡汉分治”。可是，有的学者却认为：“大凡一个人数少而文化经济上又相对落后于被统治族的统治者，当其建立统治的最初阶段，往往采取武装殖民，以本族部落兵为主要统治力量，对被征服族进行军事统治，于是采取了族的分治，周统治商族实行的‘国’‘野’之分，就表现了这一点。十六国时期的某些政权的统治者，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而实行了胡汉分治。”[28]事实证明，汉赵统治者正式置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不是在初期，而是在其盛时，而且对被统治族（汉族）不是实行“军事统治”。至于说“大单于及单于台的设置，是胡族落后国家机构形式在中原的残留，反映了民族压迫的存在”[29]，或者说这样“一个人为的胡汉分治的落后政策，阻碍民族融合的进程”[30]，那就更值得商榷了。

自战国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所建政权与内地汉族所建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是根据各自民族的特点而形成的。两者各有其特点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当然从社会性质方面看，有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的区别，但在制度本身的形式等方面是各有特色的，那种简单地称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政治机构为“落后国家机构形式”的看法是不够妥当的。同时，用内地汉族那一套制度去管理北方少数民族之不合适，如同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制度去统治内地的汉族之不合适。在汉赵国强盛时，六夷部落归附既众，完全用汉魏以来的统治机构去管理他们，就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汉赵统治采用和改造过去匈奴的旧制，设单于台专门管理“六夷”部众。这应该说是汉赵统治因地制宜

的一种措施，而不应视为“胡族落后国家机构在中原的残留”。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内地汉族政权对于归附的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同样设置“属国”，或各种“都尉”“校尉”“中郎将”，因地制宜地加以管理，且基本保持他们的部落组织形式，以其原部落豪酋为官员。这些措施和制度，其性质基本上与汉赵国的“单于台”制相同。

至于说设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就是“分而治之”，反映和加重了民族压迫，也不够确切。因为由内迁匈奴所建的汉赵政权里，匈奴是统治民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均是被统治民族。因此，汉赵国内民族矛盾，主要是匈奴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置“单于台”，主要是汉赵匈奴统治者为了加强对除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的管理和统治，以区别于对经济、文化和习俗不同的汉族的统治；它的设置与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似无直接的关系。其次，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汉赵所置单于台的情况，就会发现，其实行的“胡汉分治”与南凉那种“署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31]的“胡汉分治”，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混而为一。因为南凉的“我则习战法”的“我”是指“国人”，即秃发鲜卑族，是南凉政权的统治民族，而不包括氐、羌等其他少数民族。故其“胡汉分治”，是指国人秃发鲜卑与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分治，即：一是统治民族，专以征战为事；二是被统治民族，以农耕、牧畜为业，以供军国之用。而汉赵国的“胡汉分治”，是以六夷与汉族分治，与南凉是有本质区别的。

至于说汉赵国的胡汉分治是否阻碍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我们认为，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日益接触，融合自然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汉赵统治者不采取“胡汉分治”的政策，而是用强迫同化的所谓统一的管理政策（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才是真正违背历史发展、阻碍民族融合的。因为，用强迫同化促进民族融合，并不比采取“胡汉分治”以顺应各民族自然融合的趋势更为进步。

总之，对汉赵国置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应作新的评价。我们认为，单于台的设置，乃是汉赵统治者改造匈奴旧制，以适应新的历史时代要求的产物，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上是可为称道的。在十六国民族关系复杂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汉赵的单于台制，为十六国前期许多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所继承，如上述的后赵，即早在称帝前，就“以大单于镇抚百蛮”[32]，后赵建平元年（330）石勒称赵天王后，以子弘为大单于。后燕慕容盛曾“立燕台，统诸部杂夷”[33]，《资治通鉴》卷一一一

胡注云："二赵（前后赵）以来，皆立单于台以统杂夷，盛仍此立之。"至慕容熙即位，径直"改北燕台为大单于台，置左右辅，位次尚书"[34]。还有一些政权，如前秦、后秦、前燕、冉魏、西秦、南凉、北燕、夏国、仇池等，史籍虽未记载他们设置单于台，但是其君主或太子在初期均曾称"大单于"，或有"左右辅""左右贤王"之号，借以号召其他少数民族。尽管如此，因未见史籍记载其设单于台一套机构，故不能说这些政权也实行了这种胡汉分治。

我们很赞同冯君实先生在其《十六国官制初探》一文中所述，不应忽视对十六国官制的研究，历代有关史书，如《通典》之类"不录十六国官制，是由于视这些政权为'僭伪'，这实属偏见"。通过前面对十六国中汉赵政治制度（主要是官制）的初步探讨，更加觉得冯先生的这个见解是完全正确的。汉赵国不仅在承继和发展汉魏以来的官制方面有一定的成绩，而且创造了与汉魏以来官制并行的单于台制，对以后中国封建王朝有一定的影响，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从史籍看，似乎仍保留有匈奴原有的官号。如《晋书·索綝传》云有"呼日逐王呼延谟"等。

[2]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3]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4] 《太平御览》卷四一三引《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太宰王祥字季海，性至孝……"

[5] 见《晋书》卷九○《儒林·韦謏传》。

[6] 《晋书》卷八九《忠义·刘敏元传》。

[7] 《晋书·忠义·辛勉传》。

[8] 《晋书·职官志》。

[9] 《晋书·职官志》。

[10] 见《太平御览》卷三七四引《前赵录》曰："刘聪以谗匿故，诛詹事曹光……"

[11] 见《水经注》卷四《沁水》。

[12] 见《晋书·职官志》。

[13] 见《晋书·职官志》。

[14] 见《晋书·职官志》。

[15] 此说有误，详见下。

[16] 见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17] 此事又见《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引《十六国春秋》。

[18] 见《晋书·地理志》。

[19] 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20] 《晋书·刘聪载记》。

[21] 《资治通鉴》卷八九。

[22]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卷九○。

[23] 《晋书·刘曜载记》。

[24] 见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1～38页。

[25] 林幹《匈奴史》等谓刘聪曾自任大单于，误。前述石勒称帝后，不复兼大单于，而以大单于授其子弘。因此，一般说来，大单于由将要继承君位的储主担任。

[26]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4～426页。

[27] 《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元年条胡注云："胡人一部之长，呼为部大。"

[28] 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29] 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30]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第136页。

[31] 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32] 《晋书·石勒载记》。

[33]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四年十二月条。

[34] 《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熙载记》。

〖第八章〗 汉赵国的社会形态

一 汉赵国的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

如前所述，内迁匈奴最集中的并州五部，其部落组织到晋初只是一种形式，部分匈奴已由原来的游牧转向农耕，有的变为汉族世家豪门的“佃客”“部曲”，有的沦为奴婢。在入居内地漫长的二百多年时间内，内迁匈奴的经济逐渐由牧畜转向农耕，由原来奴隶制形态的部落组织向封建化过渡。这一过程，是他们逐渐汉化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探讨汉赵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性质的前提。

汉赵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基本承袭了汉魏以来的封建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它面临的情况如何，又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西晋末年，特别是经过八王之乱，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社会经济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如赵王伦“自兴兵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镇邺城的成都王颖及齐王冏等与赵王伦大战，颖军败于黄桥，死者八千余人，赵王伦战死的士卒一万四千余人；齐王冏与张泓战于阳翟（今河南禹州），“百姓创痍，饥饿冻馁”[1]。张方攻陷洛阳，“大掠，死者万计”[2]。后成都王颖进兵洛阳，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公私穷踧，米石万钱”[3]。张方退回长安时，“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4]。还有镇守幽州的王浚，助赵王伦攻成都王颖于邺，其将祁弘率鲜卑攻克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5]。至于汉魏以来经济较为发达的关中长安一带，自西晋元康九年（299）以氐帅齐万年为首的各族人民起事以后，饥馑日甚，造成了洛阳、天水等六郡流民的大迁徙。后河间王颙镇长安，连年参加八王争权的战争，又用兵镇压益州流民起义，致使关中经济日益凋敝。正因为如此，自永嘉以来，中原土地荒芜，人民大量流徙，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辗转各地，终于酿成各地流民的大起义。

西晋永安元年（304），刘渊起兵建立政权后，汉国把主要精力用于灭晋及对付拥镇各地的西晋诸王，连年争战，干戈不息，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经济的残破。以洛阳、长安两京地区为例：汉光兴二年（311），刘聪遣曜等攻洛阳，晋军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时城内饥甚，人皆相食，莫有固志”，王弥等入洛阳，“纵兵大掠”[6]，一度使洛阳地空。又，汉嘉平三年（313）晋愍帝即位于长安，“时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7]。总之，晋末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前历史家往往怀有民族偏见，将破坏中原经济的责任完全推到匈奴所建的汉赵政权身上，这是有失公允的。

面对中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势，汉赵统治者将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呢？由于史籍阙载，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只鳞片爪的资料对汉赵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采取的经济措施做一分析。

自东汉末年以来，随着封建割据的形成和发展、世家大族的兴起，许多以族为组织的坞堡出现了，由此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加强，成为所谓的佃客、部曲。到晋末，坞堡的组织已不限于同族，坞堡的生产方式也大致采取了屯垦的形式，成为军事、经济相结合的政治实体。[8]《晋书》卷一○○《苏峻传》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长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同书卷六三《邵续传》亦云：“时天下渐乱，续去县还家，纠合亡命，得数百人……绥怀流散，多归附之。”刘渊起兵前后，由于中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形成了庞大的流民队伍；有的被迫揭竿而起；有的随附晋朝官吏移地就食，号称“乞活”；有的则投归苏峻、邵续之流的坞主，结垒自保。因此，汉政权建立后，不仅要以全力对付西晋朝廷和诸王的势力，而且要与遍布各地的坞堡作战。汉政权每扩展一步，都必须战胜一些坞堡，控制人口和粮食。如《晋书·刘元海载记》就说，渊即位初，曾“进据河东，攻寇蒲坂、平阳，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又，同书《刘聪载记》亦云，聪即位后，曾令王弥、刘曜率军长驱入洛川，“周旋于梁、陈、汝、颖之间，陷垒壁百余”。时属汉的石勒“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陷冀州郡县保壁百余，众至十余万”等。[9]其中所记之“垒壁”“保壁”，就是上述的坞堡。

汉政权对降附的坞堡，一般是封其坞主以将军、都尉之号，以其精壮补充兵员，掠夺坞内粮食，其余则仍在原处进行农业生产，以供军国

之用。如汉永凤元年（308），汉石勒、刘灵攻占汲郡、魏郡、顿丘，“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皆假垒主将军、都尉印绶，简其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10]。对于攻陷的坞堡，则采取任命戍主、坞主，掠夺粮食，简派兵士的政策。如《晋书·刘聪载记》云：“曜还师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列三屯以守之。”郭默实际上是刘琨假署晋朝官职的坞堡主，他与李矩、魏该等联合，一直与汉国对抗。总之，汉赵政权对其所控制的各地坞堡（垒壁），无论是以原坞主为将军、都尉，或另遣官吏进行管理，都基本保持了原坞壁内部的封建生产关系。或屯垦，或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小块土地，定期向汉赵政府缴纳租赋，并服徭役和兵役。

汉赵国建立后，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劳动力的严重缺乏。永嘉以来，中原地区人口大量流徙，如刘琨于永嘉元年（307）为并州刺史，上任时沿途所见，百姓“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时“并土饥荒，百姓随（司马）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11]。汉赵国先后以平阳、长安为国都，为了解决劳动力和兵员的问题，统治者采取了大批掠迁人口的措施。即每攻占一地，先掠夺大量的人口，强迫迁入国都附近易于控制的地区，以增加劳动力和兵员。这种掠迁人口，亦并非始于汉赵国，早在东汉末年各地军阀混战时已经开始，以后三国鼎立、西晋八王之乱时，均有过掠迁人口的事件。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割据政权互相争夺的形势之下，这种掠迁人口的事，几乎成了每一个政权必然采取的措施之一。[12]现据文献所载，将汉赵掠迁人口的情况列表如下。

汉赵掠迁人口统计

编号	时间（公元）	掠迁对象	人数	迁徙地点	资料出处
1	311	呼延晏掠洛阳王公以下子女	二百余人	平阳	《晋书·刘聪载记》
2	311	刘曜掠池阳百姓	万余人	长安	同上
3	312	长安及四周郡县士女	八万余口	平阳	同上;《资治通鉴》卷八八
4	312	怀县士民	二万余户	平阳	同上
5	312	晋阳士民	?	平阳	同上
6	320	上郡氐、羌伊余兄弟及其部落	二十余万口	长安	《晋书·刘曜载记》

汉赵掠迁人口统计-续表

编号	时间（公元）	掠迁对象	人数	迁徙地点	资料出处
7	322	陇右百姓	万余户	长安	同上
8	323	秦州大姓杨、姜诸族	二千余户	长安	同上
9	323	仇池士女	八千余人	仇池*	同上
10	324	仇池民	三千余户	长安	《资治通鉴》卷九三；《晋书·刘曜载记》

*此系前赵镇西将军刘厚追击氐王杨难敌，掠回士女于仇池。

上表所列仅是现存史籍有记载的，未见于记载的一定很多。除了掠迁人口外，还有大量的流民、少数民族部落投归汉赵国，如前所述，汉国都于左国城时，“二旬之间众已五万”，“晋人东附者数万”。因此，到嘉平四年刘聪置左右司隶及单于台时，平阳、河东等地户口达六十三万户，其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有四十三万户。前赵建都长安，关中人口激增，仅上郡氐、羌就有十余万落；赵光初六年（323）刘曜攻河西，军队达二十六万之众。总之，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平阳、长安两都，先后集中了数十万人口，真是不容易的事。

人口的增加，说明汉赵国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大批的劳动力，统治者可能将大量荒地及无主之地分配给从事农业的流民，定期征收赋役，基本上沿袭了魏晋以来的封建剥削方式。《晋书·刘曜载记》曾云：曜“省酆水囿以与贫户”。酆水囿，当为前赵于今西安西沣水所建园苑，刘曜将此地分给贫户耕种，说明前赵还曾将一些荒地、园苑分给农民耕种。汉赵对这些自耕农民或坞堡内的农民（佃客、部曲），也征收租税和调发服役。如属汉的石勒曾在汉嘉平四年（314）“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13]。此时石勒仍属汉国，因其占领幽、冀二州，故依汉国之制开始阅实户口，收取租赋。又，史载前赵刘曜曾“复百姓租税之半”[14]。这一切都证明汉赵国是按魏晋以来的封建方式对从事农业的广大汉族农民征收租税的。广大汉族人民负担的徭役十分繁重，汉赵统治者无限制地调发徭役，滥用民力，致使其国力衰弱。这是汉赵最后为后赵所灭的原因之一。刘聪时，皇太子、相国刘粲“好兴造宫室，相国之府仿像紫宫，在位无几，作兼昼夜，饥困穷叛，死亡相继”。刘曜即位后，为其父、妻营造陵墓，费至亿计，计六万夫，百日作，用六百万功，“役夫呼嗟，气塞天地，暴骸原野，哭声盈衢”[15]。后曜又遣将作大匠胡元增二陵高九十尺。又，曜召构殿巧手三千人，发阳平等十郡车牛五千乘，运土筑建德殿台。[16]

尽管如此，由于汉赵的京都平阳及后来的长安一带，集中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在一个时期内，此两地的农业生产与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原其

他地区相较，还是有所恢复和发展的。特别是刘曜即位以后，还采用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如上述减免百姓租税之半，以及“禁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石已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毕，乃听饮酒，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等。汉赵国还设置了“大司农”“都水使者”等农官；前者主要“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17]，后者“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18]。汉元熙二年（305）离石大饥，刘渊徙至黎亭就谷，使大司农卜豫运粮接济。当然，由于汉赵国连年征战及滥用民力，农业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同时由于人口过于集中，一遇灾害，后果十分严重。最突出的例子是前述平阳左右司隶部，遇蝗灾，“民流殍者什五六”，“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19]。

汉赵国还因政治或军事等原因，而修筑了一些城镇。除了前述刘渊修筑京都平阳城及刘聪修筑平阳西的西平城以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如下城镇。

鹅城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清源县（今山西清徐）下云：“鹅城，在县东南二十二里。《晋阳春秋》曰：‘永嘉元年，洛阳步广里地陷，有二鹅，色黄苍者飞冲天，白者不能飞。苍杂色，故夷之象，刘曜以为己瑞，筑此城以应之。’”[20]疑刘曜为刘渊之误。

大于城 同上书文水县（今山西文水）条云：“大于城，在县西南十一里。本刘元海筑，令兄延年镇之，胡语长兄为大于，因以为名。”

八门城 同上书西河县（今山西汾阳）条云：“八门城，在县北十五里。刘元海遣将乔嵩攻西河，筑营自固，营有八门，因名。”

在汉赵社会中，从事农业、手工业、牧业生产的还有奴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其次是犯罪的官吏、士民被充入奚官者。《晋书·刘曜载记》记：长水校尉尹车与巴酋等谋反，曜杀之，氐、羌、巴人尽叛。游子远谏曰“……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可见汉赵对犯罪者的家属使没入奚官，即为官奴，从事生产。

汉赵国内还有大量从事游牧或畜牧业的“六夷”，最多的是氐、羌、巴、羯，其次是乌丸、鲜卑、卢水胡等。在政治上，因归降或被征服的六夷日益增多，故汉赵统治者设单于台进行管理，单于左、右辅（左、右贤王）以下，均由六夷原首领担任。六夷部落，主要从事游牧、畜牧，其中有一小部分亦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晋书·刘曜载记》记：归

降前赵的北羌王、安国将军盆句徐，为后赵石他所击，“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则盆句徐的部落主要从事畜牧，石他所掠的牲畜达百余万头，可见他们的畜牧业是十分发达的。六夷部落首先要向汉赵统治者送“质任”，如刘曜攻占陇右灭陈安后，“氐、羌悉下，并送质任”。其首领不仅接受汉赵的官爵，而且要到大单于处服役供职；刘聪时，大单于刘乂被诬谋反，粲等收氐、羌酋长严刑拷问，因他们曾在刘乂的东宫服事供职之故。汉赵统治者可能还定期向六夷部落征收贡赋，征发部众参加战争。如乌丸张伏利度随石勒降刘渊后，渊即以伏利度部众配给石勒为军。又，《晋书·刘曜载记》云曜“率中外精锐以赴之，行次雍城”；“中”，当指晋人及汉化之匈奴部队，“外”，则专指“六夷”部落兵。

综上所述，知汉赵国在经济制度等方面基本上也承袭了汉魏以来内地的封建制度；其国内社会经济主要是农业，其次是畜牧业；其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沿袭了汉魏以来内地的生产方式。汉赵国政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政权。

二 汉赵国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

汉赵之社会形态既然属封建社会，其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也就比较容易了解了。汉赵政权系由内迁匈奴所建，匈奴为统治民族，其封建贵族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部分，其次汉族世族豪门及一些其他民族的首领、豪酋，也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而广大的汉族农民（晋人）、各少数民族部民，则成为被统治阶级。汉赵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就是汉赵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可是，由于汉赵国内民族关系复杂，作为统治民族的是内迁的匈奴族，被统治民族主要是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汉、匈之间，匈奴与其他各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存在的。而汉赵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即社会的阶级斗争往往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比如上述平阳、河东蝗灾，司隶部人二十余万逃奔冀州投石勒的事件，司隶部人绝大部分是晋人（汉族），灾荒是促使他们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直接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汉赵匈奴统治者对他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反抗斗争是阶级矛盾同时也是民族矛盾尖锐的反映。又如前赵光初三年，因刘曜滥杀巴酋引起关中四山氐、羌、巴、羯二十余万人起事，这一事件应是汉赵匈奴统治者对这些少数民族施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后在游子远以抚为主的方针之下，氐、羌等起义失败，刘曜又强迁上郡氐、羌首领伊余等部二十余万于长安，以便于控制。

从汉赵政权的历史来看，一般说来，其国内的民族矛盾比之后赵，还是较为缓和的。这可能与其统治者刘氏及整个内迁匈奴汉化程度较深有关。在汉国初期，刘渊打着“汉”旗号，一时还得到汉族人民的拥护，胡汉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可是，在汉国攻占洛阳、长安两京，滥杀晋朝君臣及士民之后，汉胡民族之间的矛盾开始日趋尖锐。加以各地坞堡打着“晋”旗号，拥众自立，与汉赵相对抗，使胡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汉赵统治者对汉族官吏及百姓也处处防范，怀有戒心。汉刘粲即位后，为靳准所杀，“尚书北宫纯、胡崧等招集晋人，保于东宫，靳康攻灭之”[21]。这一事件即反映了汉族官吏和人民在汉国内乱时，聚众自保的情况，说明胡汉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汉赵国内的民族关系，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同一的一面。也就是说，汉赵国的建立，使胡汉两族（甚至更多的其他少数民族）处于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中。这对于内迁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进一步汉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黄烈先生在其《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22]一文中，论述了“五胡政权不能不反过来对本族社会起严重影响，加深本族内部的分化，促进本族与汉族社会发生广泛的联系，从而导致本族共同体的解体”。文内论述的各点，基本上符合五胡政权中汉赵国内的情况，汉赵政权建立的本身，就加速了国内各民族融合。对此，我们参考黄烈先生的论点，做进一步分析。

建立汉赵政权的内迁匈奴，作为一个“族的共同体”，事实上早在晋末已经基本上解体；所谓并州“五部匈奴”，不过是保留了族的共同体的躯壳而已。汉赵政权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作为统治民族的匈奴上层贵族多被封以原汉族政权的官爵名号，与数量众多的汉族官吏共同执掌政权，通过官爵取得俸禄、食邑和赏赐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剥削广大的汉族人民。他们的思想、习尚和学习的典籍逐渐与汉族士大夫、官僚合而为一。久而久之，他们与汉族官僚事实上已没有多大的差别了。试观《晋书》有关刘元海、刘聪、刘曜等载记，出身匈奴的官吏如陈元达、刘乂、卜珝、乔豫等劝谏刘聪、刘曜的言论，无异于汉族士大夫的口吻。从此，就可知当时匈奴贵族汉化之深。[23]

至于一般内迁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部众，则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汉赵虽然专门设置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但是他们与广大汉族同处一国之中，通过各种渠道相互接触日益频繁，加速了相互融合的过程。比如，胡汉人民均要服兵役，汉国初期的军队大多为内迁匈奴及胡羯等少数民族的部落兵，后来汉族人大量被征入伍，改变了汉赵军队的民族成分。刘曜经常率所谓“中外”精锐出征，就说明胡汉军队经常一起参加战争，这有利于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又如，作为统治民族的内迁匈奴，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为巩固政权，将族人分驻各地。刘聪时，先后两次占领长安，匈奴军队（包括鲜卑、氐、羌等军队）随刘曜一起进驻关中，以后又扩大到陇右等地。“这也进一步造成了民族的混杂错居，有利于民族界限的打破。”[24]还有汉赵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是造成民族迁徙，错居杂处，增强各族人民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前所述，汉司隶部人三十余万之向石勒统治的冀、并等州的流徙；刘曜迁关中氐、羌伊余及其部落二十余万于长安；曜平陈安后，迁秦州杨、姜大

姓二千余户于长安等。这就必然改变汉赵国内民族居住地区的布局，大大有利于各族的相互接近和相互融合。

最后，汉赵国灭亡的本身，也就注定了内迁匈奴这个“族的共同体”的最终瓦解。前赵为后赵所灭，刘氏一族及将王公卿校以下三千余人，还有“五郡屠各”五千余人，被后赵坑杀；此外一部分被徙入襄国，其余的匈奴则分散于北方各地，均为后赵所统治。他们有的避入山中，与当地其他各族杂居，成为以后史书所云之“稽胡”（山胡）之类的杂胡，而绝大多数逐渐融合到汉族之中。汉赵国灭亡后，作为内迁匈奴的“族的共同体”在历史上已经消失，史籍中也从此再未见关于内迁匈奴活动的明确记载，更说不上再入主中原重建政权了。

三 汉赵国的文化

汉赵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匈奴统治阶级以汉族传统的文化作为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学习不遗余力，以至使其渗透到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文学、史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汉赵统治者匈奴刘氏一族汉化很深，对汉族传统的文化有较高的修养之上。如前所述，刘渊的从祖刘宣曾师事名儒乐安孙炎，“好《毛诗》《左氏传》”，深得其师的赞赏。渊本人师事上党名儒崔游，对汉族典籍，无不综览，深受汉族儒家学说的影响。渊同游门生范隆、朱纪，自汉国建立起，即为汉大臣，位至三公，对刘氏有较大的影响。渊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另一子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对汉族文学有很深的功底。刘曜亦是“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刘渊父子两代人，大都在西晋的政治中心洛阳生活过一段时间，广泛与汉族名士、官僚往来，洞悉西晋王朝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这样，他们即位后，才能轻而易举地承继汉魏以来的文化制度，大力提倡和推行汉族文化。

至刘渊的第三代，对汉文化的研习仍然不断。《太平御览》卷六一○引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曾记载：刘聪子“汉大将军、东平王约，汉王聪戏之曰：‘汝诵何书，味何句也？’约曰：‘臣诵《孝经》，每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至于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未尝不反复诵之。’聪大悦。”这则记载说明刘氏一族从小研习汉族传统典籍，汉族的伦理道德也逐渐为他们所接受。又，刘曜子刘熙，也是从小受汉族儒学熏陶长大的。刘氏宗族中还有不少汉化很深的人物，如刘渊兄刘延年，史称其“年十五丧二亲，奉叔父孝闻”[25]。

除匈奴刘氏一族外，其他内迁匈奴平民中也有许多著名的汉化知识分子。如陈元达、卜珝等人。元达，《晋书·刘聪载记》后附有传，其原为匈奴后部人，“少而孤贫，常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忻忻如也”；先后任汉赵国黄门郎、廷尉、左司隶、右光禄大夫、御史大夫、仪同三司等。史称其“在位忠謇，屡进谠言，退而削草，虽子弟莫得而知也”。卜珝，《晋书》将其列入《艺术传》中，云其为“匈奴后部人也”，“少好读

《易》”，为当世易学大师，故《晋书》为之立传。

在史学方面，自魏晋以来中国史学日趋发达，官修、私人撰修的史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相当可观的。汉赵立国后，统治者匈奴刘氏一族承继了魏晋的传统，设置专门的史官“左国史”，进行史书修撰。唐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云：“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26]，事止当年，不终曜灭。”《礼记·玉藻》记周朝曾设置史官：“左史”和“右史”，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春秋时晋、楚两国均置左史。后世亦有沿置，然不常置。汉赵所置“左国史”，当由周以来所置“左史”而来。公师彧、和苞所撰汉赵国史书今已佚，仅在现存唐、宋的一些类书，如《太平御览》《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中，还可见到一些片段。汉赵以后，十六国各政权大都设史官，修国史；而史官多为汉族士大夫任之，这样就不断发生国史修成、史官被杀的事件。刘聪因信谗言，恨公师彧所修国史对其父刘渊不敬而杀之。前秦氐族苻坚见《起居注》记其母苟太后与将军李威的关系，而焚史书，“大检史官”，因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27]甚至北魏崔浩之被诛，也与其撰修国史有关。[28]

在仪礼制度、音乐艺术等方面，汉赵国也承袭了汉魏以来的传统。《晋书》卷二三《乐志》云：“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刘”，即指汉赵。故汉赵设“太常”内统太乐、鼓吹等令，又置乐府，行原汉族政府的礼乐制度。《晋书·刘曜载记》曾云曜平陈安后，闻陇上人歌陈安的“壮士之歌”而“嘉伤”，“命乐府歌之”；又赠其大司马刘雅“前后鼓吹各二部”等。

总之，从上述的情况看，汉国的文化基本上是承袭了汉魏以来传统的汉族文化；在语言、文字、文学、史学、艺术、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无不渗透了汉族文化思想，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不仅如此，前赵统治者刘曜还极力在国内推广汉族文化，设置专门机构，教授生徒，并从学生中选拔官吏。《晋书·刘曜载记》云：“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又，汉赵国有“博士张师”“博士祭酒台产”等。国子祭酒、崇文祭

酒、博士、博士祭酒，皆为晋时太常所属国子学官员，专门教授生徒，学习汉文典籍。汉赵承此，亦设有这些官职。前述之董景道，《晋书》撰者将其列入《儒林传》中，云其为弘农人，“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曜聘其为崇文祭酒，以教生徒[29]，可见曜对推广汉族文化的重视。更有甚者，曜还“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也就是从学生中选拔官吏。

仅从上引一些零星的资料来看，过去一些史家一概斥责十六国时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是“乱华”，加之以“破坏文化”，使中国文化陷于停滞不前等论调，是有失公允的。

在汉赵国内，从上至下汉化是一个总的趋势，但同政治、经济方面一样，文化上仍然保存了一些匈奴的旧俗。这正如《晋书·刘曜载记》后附唐代史臣所说：“若乃习以华风，温乎雅度；兼其旧俗，则罕规模。”所云汉赵“兼其旧俗”一点，是言之中肯的。关于在政治、经济方面，汉赵“兼其旧俗”的情况，前已论述。现就匈奴刘氏一族本身略加引述。

《晋书·刘聪载记》云聪即位后，以其后母单氏（氐族）为皇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烝焉”。后聪皇后呼延氏死，纳刘殷及诸大臣女，有“六刘之宠”；最后佩皇后玺绶者七人。又，聪子粲即位后，又烝其后母靳氏、樊氏、宜氏、王氏等。以上的一切，历来被史家斥为“乱伦”“淫乱后宫”“无复纲纪”，等等；就是匈奴出身的陈元达、刘乂等也如此看待而加以切谏。事实上，刘聪之烝单氏、刘粲之烝诸后母，原本是匈奴等西北少数民族的旧俗。《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云：“其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但是，这种习俗，在汉族看来则是大逆不道的乱伦行为。又，匈奴单于、贵族是多妻的，单于妻名阏氏（Yanzhi），每个单于无不阏氏成群。[30]匈奴的阏氏相当于汉族政权的皇后，故聪沿匈奴旧俗，封敕众多的皇后，这又违背了汉族政权皇帝只有一个皇后的封建制度。因此，陈元达等认为刘聪此举乃是“无复纲纪”了。其实，自秦汉以来汉族皇帝的后宫，哪一个不是妃嫔成群的呢？当然，我们这样讲，不是为刘聪之流淫乱后宫、不理国事、误国殃民的行为作辩护，只不过是指出刘聪等人的行为，多少保留了匈奴的旧俗而已。

[1] 《晋书·成都王颖传》。

[2] 《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太安二年九月条。

[3] 《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十一月条。

[4] 《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正月条。

[5] 《晋书·王浚传》。

[6] 《晋书·刘聪载记》。

[7] 《晋书·贾疋传》。

[8] 参见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137～139页。

[9] 《晋书·石勒载记上》。

[10] 《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二年十一月条。

[11] 《晋书·刘琨传》。

[12]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57～160页；关尾史郎《南凉政权与徙民政策》，《史学杂志》第89编第一号，1980。

[13] 《晋书·石勒载记上》。

[14] 《晋书·刘曜载记》。

[15] 《晋书·刘曜载记》。

[16] 《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引《赵书》。

[17] 《后汉书·百官志》。

[18] 《晋书·职官志》。

[19]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七月条；《晋书·刘聪载记》。

[20] 按，《太平寰宇记》卷四“清源县”条《晋阳春秋》作《晋阳秋》，是。又，“故夷之象”作“胡夷之象”，是。

[21] 《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

[22] 文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23] 详细论述见后。

[24] 黄烈《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文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25] 《太平御览》卷四二一引《前赵录》。

[26] 《太平御览》卷四二一引《前赵录》云："按，《隋志》前赵则《汉赵记》十卷，《唐志》作十四卷，和苞撰。"

[27]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28]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

[29] 按，《晋书·董景道传》云曜征其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并固辞，竟以寿终"，与《载记》所云不合，从《载记》。

[30] 见林幹《匈奴史》，第133页。

〖附录一〗 汉赵职官表

（一）匈奴刘渊一族任职官员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	刘雄	匈奴（刘渊弟）	司徒	《金石录》卷三
2	刘宣	匈奴（刘渊从祖）	原为右贤王、北部都尉，后任汉丞相	《晋书·刘元海载记》
3	刘延年	匈奴（刘渊兄）	封江都王，任大司空、太保、太宰、录尚书六条事	《晋书·刘元海载记》；同书《刘聪载记》；《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
4	刘曜	匈奴（刘渊族子）	封始安王、中山王、秦王，先后任建武将军、龙骧大将军、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大司马、太宰、相国、丞相等	《晋书》载记等
5	刘聪	匈奴（刘渊子）	封楚王，先后任抚军将军、车骑大将军、大司徒、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等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6	刘畅	匈奴（刘聪从弟）	征东大将军	《晋书·石勒载记下》
7	刘和	匈奴（刘渊子）	封梁王，皇太子，先后任大将军、卫军将军、大司马	《晋书·刘元海载记附和传》
8	刘裕	匈奴（刘渊子）	封齐王，任大司徒	《晋书·刘元海载记》
9	刘隆	匈奴（刘渊子）	封鲁王，任尚书令	同上
10	刘乂（刘义）	匈奴（刘渊子）	封北海王、北部王、皇太弟，先后任抚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大单于、大司徒等	《晋书·刘元海载记》；同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等

匈奴刘渊一族任职官员-续表1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1	刘粲	匈奴（刘聪子）	封河内王、晋王、皇太子，先后任抚军大将军、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相国等	《晋书·刘元海载记》；同书《刘聪载记附粲传》;《资治通鉴》等
12	刘易	匈奴（刘聪子）	封河间王，先后任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太尉、太宰等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13	刘翼（刘翌）	匈奴（刘聪子）	封彭城王，任卫将军	《晋书·载记》;《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引《前赵录》
14	刘悝	匈奴（刘聪子）	封高平王，任征南将军，镇离石	《资治通鉴》;《晋书》载记等
15	刘恭	匈奴（刘聪嫡兄）	?	《资治通鉴》卷八七
16	刘敷	匈奴（刘聪子）	封勃海王，任大将军	《资治通鉴》卷八八
17	刘持	匈奴（刘聪子）	封赵王	同上
18	刘权	匈奴（刘聪子）	封秦王	同上
19	刘鸿	匈奴（刘聪子）	封楚王	同上
20	刘骞	匈奴（刘聪子）	封燕王	同上
21	刘操	匈奴（刘聪子）	封魏王，任征东将军，镇蒲子	同上
22	刘劢	匈奴（刘聪子）	封齐王，任大司徒	《资治通鉴》卷八八
23	刘骥	匈奴（刘聪子）	封济南王，任征西将军、大将军、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大司马等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24	刘恒	匈奴（刘聪子）	封代王	《资治通鉴》卷八八
25	刘逞	匈奴（刘聪子）	封吴王，任车骑大将军	《资治通鉴》;《晋书》载记
26	刘朗	匈奴（刘聪子）	封颍川王	《资治通鉴》卷八八
27	刘皋	匈奴（刘聪子）	封零陵王	同上
28	刘旭	匈奴（刘聪子）	封丹阳王	同上

匈奴刘渊一族任职官员-续表2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29	刘京	匈奴（刘聪子）	封蜀王	同上
30	刘坦	匈奴（刘聪子）	封九江王	同上
31	刘晃	匈奴（刘聪子）	封临川王	同上
32	刘约	匈奴（刘聪子）	封东平王，任大将军	《太平御览》卷三六引《前赵录》；同书卷六一〇引《三十国春秋》;《晋书·刘聪载记》
33	刘康（刘衷）	匈奴（刘聪子）	封会稽王	《晋书·刘聪载记》等
34	刘元公	匈奴（刘粲子）	立为皇太子	《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
35	刘熙（刘呲）	匈奴（刘曜子）	立为皇太子	《晋书·刘曜载记》
36	刘袭	匈奴（刘曜子）	封长乐王	同上
37	刘阐	匈奴（刘曜子）	封太原王	《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一
38	刘冲	匈奴（刘曜子）	封淮南王	同上
39	刘敞	匈奴（刘曜子）	封齐王	同上
40	刘高	匈奴（刘曜子）	封鲁王	同上
41	刘徽	匈奴（刘曜子）	封楚王	同上
42	刘晖	匈奴（刘曜弟）	?	同上
43	刘俭	匈奴（刘曜长子）	封临海王	同上
44	刘胤	匈奴（刘曜子）	封永安王，任侍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号皇子。后又为大司马、大单于，封南阳王	同上

（二）刘氏宗族任职官员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	刘宏	匈奴（刘氏宗族）	原为左于陆王，后任太尉	《晋书·刘元海载记》
2	刘钦	同上	封安邑王，任虎牙将军，后领武卫将军	同上
3	刘景	同上	封汝阴王、上洛王，先后任大将军、灭晋大将军、平虏将军、司空、大司马、左禄、太傅、太师、太宰等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4	刘欢乐	同上	封陈留王，先后任尚书令、大司徒、太傅、太宰	《晋书》载记等
5	刘洋	同上	封长乐王，任大司马、太傅	《晋书》载纪;《资治通鉴》等
6	刘俊	同上	封上郡王	《太平御览》卷四一六引《十六国春秋》
7	刘厉	同上	封安阳哀王，任平晋将军	《资治通鉴》卷八七
8	刘贤	同上	封曲阳王，任都护大将军	同上
9	刘安国	同上	封永安王，领右卫将军	同上
10	刘盛	同上	封安昌王，领武卫将军	同上
11	刘璇	同上	封西阳王，领武卫将军	同上
12	刘锐	同上	封西昌王，任卫尉	《晋书·刘元海载记附和传》
13	刘乘	同上	侍中	《晋书·刘元海载记附和传》
14	刘虎	铁弗匈奴	封楼烦公	《资治通鉴》卷八七
15	刘丰	匈奴（刘氏宗族）	任前将军、并州刺史、镇北将军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等
16	刘摅	同上	封襄陵王，任左都水使者	《晋书·刘聪载记》
17	刘雅（刘雅生）	同上	任安西将军、左光禄大夫、征北大将军、车骑将军、大司徒、大司马、太宰，后封中山王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刘氏宗族任职官员-续表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8	刘参	同上	右将军	同上
19	刘策	同上	封安定王，任并州牧，镇北将军	《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前赵录》等
20	刘丹	同上	大司马	《晋书·刘聪载记》
21	刘勋	同上	骑兵将军	《资治通鉴》卷九〇;《晋书·刘聪载记》
22	刘颤	同上	封昌国公，任太师、录尚书事	《晋书·刘聪载记》
23	刘颜	同上	?	《资治通鉴》卷九〇
24	刘岳	同上	封广平王、中山王，任征东大将军、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等	《晋书·刘曜载记》
25	刘成	同上	封汝南王，任太尉、录尚书事	同上
26	刘昶	同上	封河南公，任侍中、大司徒、太保、录尚书事	同上
27	刘述	同上	封河间王，任骠骑将军、大司徒	同上
28	刘遵	同上	?	同上
29	刘震	同上	?	同上
30	刘厚	同上	任平西将军、镇西将军	同上

（三）其他匈奴族任职官员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	陈元达	匈奴	先后任黄门郎、廷尉、左司隶、右光禄大夫、御史大大、仪同三司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2	乔晞	匈奴①	冠军将军	《晋书·列女传》;《资治通鉴》等
3	綦毋豚	匈奴②	将	《魏书·刘聪传》等
4	卜豫	匈奴③	大司农	《晋书·刘元海载记》

其他匈奴族任职官员-续表1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5	呼延翼	匈奴④（渊皇后父）	先后任御史大夫、大司空、太傅、太宰，封雁门郡公	《晋书·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等
6	綦毋达	匈奴	特进、镇东将军	同上
7	李景年	匈奴（前部人）	虎牙将军	《太平御览》卷三五一引《前赵录》
8	呼延颢	匈奴	征虏将军	《晋书·刘聪载记》
9	呼延朗	同上	冠军将军	同上
10	乔智明	同上	先后任廷尉、冠军大将军，领单于右辅。后又任司隶校尉	《晋书》载记；同书卷九〇《良吏·乔智明传》
11	呼延攸	同上	宗正	《晋书·刘元海载记附和传》
12	呼延晏	同上	先后任卫尉、前军大将军、右仆射、大司空、太保、录尚书事、司空、太傅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13	靳准	匈奴⑤	先后任中护军、行车骑大将军、大司空、领司隶校尉、大将军、录尚书事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
14	靳冲	同上	镇北将军	《晋书·刘聪载记》
15	卜珝	同上	先后任侍中、光禄大夫、太常、使持节、平北将军	《晋书》卷九五《艺术·卜珝传》
16	靳陵	同上	封望都公，任将作大匠	《晋书·刘聪载记》
17	卜抽	同上	冠威将军	同上
18	卜崇	同上	左卫将军	同上
19	卜干	同上	侍中	同上
20	乔诗	同上	黄门侍郎	同上
21	靳明	同上	车骑将军、尚书令	《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
22	靳康	同上	卫将军	同上
23	卜泰	同上	先后任侍中、左光禄大夫、上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太子太傅、大司空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24	乔泰	同上	左车骑将军	同上
25	乔豫	匈奴	封安昌子，任侍中、谏议大夫	同上

其他匈奴族任职官员-续表2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26	呼延寔	同上	将	《晋书·刘曜载记》
27	呼延瑜	同上	卫军将军	同上
28	呼延青人（呼延青）	匈奴	辅威将军	《晋书·刘曜载记》；《资治通鉴》
29	呼延谟	同上	日逐王、镇东将军、弘农太守	《晋书·李矩传》；同书《载记》等
30	郝述	匈奴⑥	尚书	《晋书·刘曜载记》
31	呼延那鸡	同上	冠军将军	同上
32	乔属	同上	将	《晋书·列女传》
33	乔度	同上	黄门侍郎	《晋书》卷八九《忠义·辛勉传》
34	卜休	同上	平虏将军	《太平寰宇记》卷四三
35	乔嵩	同上	将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
36	王石武	休屠	平西大将军、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晋书·刘曜载记》
37	兰阳	匈奴⑦	荡晋将军	《资治通鉴》卷八八
38	黑匿郁鞠	匈奴	使持节、散骑常侍、忠义大将军、左贤王	《晋书·刘曜载记》
39	乔琮	匈奴	将	《太平寰宇记》卷四五
40	綦毋列	匈奴	同上	同上

注释：

① 按，《晋书·列女·贾浑妻宗氏传》记：宗氏骂乔晞为“屠各奴”，知其为匈奴。又，同书《北狄匈奴传》亦云匈奴四贵姓中有“乔氏”。

②《晋书·北狄匈奴传》云：“其国人有綦毋氏、勒氏……”则綦毋氏为匈奴。

③《晋书·北狄匈奴传》云匈奴四贵姓中有“卜氏”。

④呼延氏亦为匈奴四贵姓之一，而且最贵。(《晋书·北狄匈奴传》)

⑤据《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记：王延骂靳准为“屠各逆奴”，知靳氏为匈奴。

⑥《晋书》卷四《惠帝纪》记永平四年，有“匈奴郝散反”。知匈奴有郝氏，郝述可能亦为匈奴。

⑦《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记：匈奴有“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兰阳，应为匈奴兰氏。

（四）汉族任职官员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	崔游	汉	御史大夫（辞不就）	《晋书·儒林·崔游传》
2	范隆	汉	先后任大鸿胪、中书监、左仆射、光禄大夫、太尉、太守、尚书令、仪同三司、太师	《晋书》载记；同书《儒林·范隆传》;《资治通鉴》等
3	崔懿之	汉	黄门郎、中书监	《资治通鉴》卷八五；《晋书》载记
4	朱纪	汉	先后任太常、中书监、右仆射、尚书令、光禄大夫、大司空、太傅、录尚书事、司徒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5	马景	汉	护军将军、左卫将军、左仆射、司空、大司空	同上
6	刘殷	汉	左仆射、大司徒、右光禄、太保、侍中、录尚书事，封大昌文献公	同上;《太平御览》卷九八〇引《三十国春秋》等
7	王育	汉	先后任侍中、右仆射、大司空、太保、太傅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晋书·忠义·王育传》
8	王弥	汉	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封东莱公。后又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侍中、征东大将军、青州牧、大将军，封齐公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晋书·王弥传》
9	刘灵	汉	平北将军、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10	王桑	汉	散骑侍郎、平北将军	《资治通鉴》;《晋书》载记
11	宣于修之	汉化之丁零①	太史令	《晋书·刘元海载记》
12	朱诞	汉	大司农、前锋都督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书·刘聪载记》

汉族任职官员-续表1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3	刘惇（庞惇）	汉	卫军司马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
14	傅询	汉	黄门郎	《晋书·刘元海载记》
15	赵固	汉	安北将军、安北大将军、荆州刺史、领河南太守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等
16	曹嶷	汉	王弥长史，后为安东将军、青州刺史	同上
17	裴整	汉	尚书左丞	《晋书·刘聪载记》
18	任顗	汉	吏部尚书、尚书令、大司徒、太保	《晋书》载记;《资治通鉴》
19	田密	汉	尚书	《晋书·刘元海载记附和传》
20	吕逸	汉	将	《晋书·索綝传》
21	苏铁	汉	同上	同上
22	刘五斗	汉	同上	同上
23	晋怀帝司马炽	汉	左光禄大夫、平阿公、会稽公	《晋书·刘聪载记》
24	庾珉	汉	光禄大夫	同上
25	王儁	汉	光禄大夫	《晋书·刘聪载记》
26	赵染	汉	平西将军、安南大将军	同上
27	王彰	汉	中军大将军、骠骑将军，封定襄郡公	《晋书·刘聪载记》;《资治通鉴》
28	李弘	汉	大鸿胪	同上
29	傅纯	汉	给事中	同上
30	傅粹	汉	同上	同上
31	浩衍（诸衍）	汉	御史中丞	同上;《太平御览》卷六四六引《前赵录》
32	张寔	汉	辅汉将军、左光禄大夫、巨鹿太守	《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卷四二四引《十六国春秋》

汉族任职官员-续表2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33	卢志	汉	太弟太师	《晋书·刘聪载记》
34	崔玮	汉	太傅	同上
35	许遐	汉	太保	同上
36	高乔	汉	武卫将军	同上
37	狐泥	汉	同上	同上
38	傅虎	汉	讨虏将军，死后追赠幽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八八
39	刑延	汉	征虏将军	《晋书·刘聪载记》
40	梁芬	汉	卫尉	《资治通鉴》卷八八
41	卢谌	汉	刘粲参军	同上
42	刘岳	汉	将	《晋书·石勒载记》
43	张师	汉	博士	《晋书·刘聪载记》
44	鲁徽	汉	赵染长史	同上
45	殷凯（段凯）	汉	将军、御史中丞	《晋书·刘聪载记》；《太平御览》卷二二六引《前赵录》
46	荀裕	汉	东宫舍人	《晋书·刘聪载记》
47	王翼光	汉	征虏将军	同上
48	王鉴	汉	尚书令	同上
49	王沈	汉	中常侍	同上
50	宣怀	汉	同上	同上
51	郭猗	汉	中宫仆射	《晋书·刘聪载记》
52	俞容	汉	中常侍	同上
53	陵修	汉	中黄门	同上
54	王皮	汉	大将军从事中郎	同上
55	陈休	汉	少府	同上
56	公师彧	汉	大中大夫、左国史	同上；《史通》卷一二
57	田歆	汉	尚书	《晋书·刘聪载记》
58	王琰	汉	尚书	同上
59	王延	汉	金紫光禄大夫	同上；《太平御览》卷二七引《前赵录》

汉族任职官员-续表3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60	晋愍帝司马邺	汉	光禄大夫，封怀安侯、行车骑将军	《晋书·刘聪载记》
61	康相	汉化之康居人	太史令	同上
62	王平	汉	刘粲党	同上
63	周振	汉	赵固长史	《晋书·李矩传》
64	辛宾	汉	尚书郎	《晋书·刘聪载记》
65	曹恂	汉	中书令，追赠为大司空、封南郡公，加散骑常侍	《晋书·刘曜载记》
66	北宫纯	汉	尚书	《晋书·刘聪载记附粲传》
67	胡崧	汉	尚书	同上
68	曹光	汉	詹事	《太平御览》卷三七四引《前赵录》
69	周置	汉	平阳大尹	《晋书·石勒载记》
70	王腾	汉	右车骑将军	《晋书·刘曜载记》
71	马忠	汉	?	同上
72	郭汜	汉	兼司徒	同上
73	弁广明	汉	太史令	同上
74	宋恕	汉	振威将军	《晋书·李矩传》
75	安始	汉	左中郎将	同上
76	尹安	汉	弘农太守	同上;《资治通鉴》等
77	赵慎	汉	将	同上
78	陈安	汉	大将军	《晋书·刘曜载记》
79	尹车	汉	长水校尉	同上
80	解虎	汉	将	同上;《资治通鉴》
81	游子远	汉	光禄大夫、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录尚书事	同上;《太平御览》卷三七九引《前赵录》
82	和苞	汉	侍中，封平舆子，领谏议大夫	《晋书·刘曜载记》;《史通》卷一二
83	崔岳	汉	大司徒，追赠为使持节、侍中、大司徒，辽东公	《晋书·刘曜载记》

汉族任职官员-续表4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84	王忠	汉	晋阳太守，追赠为镇军将军，安平侯，加散骑常侍	《晋书·刘曜载记》
85	刘绥	汉	太子洗马、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加散骑常侍、大司徒	同上
86	刘均	汉	中书监，领国子祭酒、司空	同上
87	董景道	汉	散骑常侍、崇文祭酒、太子少傅	同上;《晋书·儒林·董景道传》
88	刘终	汉	奉瑞大夫	《晋书·刘曜载记》
89	梁勋	汉	封列侯	同上
90	杨韬	汉	封列侯	同上
91	王犷	汉	尚书、光国中郎将	同上
92	鲁凭	汉	呼延寔长史	同上
93	胡元	汉	将作大匠	《太平御览》卷一六〇引《前赵录》
94	刘贡	汉	征西将军	《晋书·刘曜载记》
95	刘幹	汉	右军将军	同上
96	平先	汉	将军	同上
97	梁胥	汉	太常	同上
98	丘中伯	汉	将军	同上
99	田崧	汉	大鸿胪、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	同上
100	韩广	汉	太子太保	同上
101	尹平	汉	河内太守	同上
102	徐邈	汉	侍中	《资治通鉴》卷九三
103	刘黑	汉	前军将军	《晋书·刘曜载记》
104	康平	汉化之康居人	将	《资治通鉴》卷九三
105	台产	汉	原为刘均参军，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历位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封关中侯	《晋书·刘曜载记》;同书《艺术·台产传》

汉族任职官员-续表5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06	支当	汉化之月氏人	都水使者	《晋书·刘曜载记》
107	任义	汉	太史令	同上
108	黄秀	汉	将	《资治通鉴》卷九三
109	刘朗	汉（？）	武卫将军	《晋书·刘曜载记》
110	张阆	汉	将军，封列侯	同上
111	辛晏	汉	封列侯	同上
112	胡勋	汉	尚书	同上
113	辛恕	汉	将军	同上
114	蒋英	汉	同上	同上
115	王广	汉	西河阳州刺史	《晋书·列女传》等
116	杜广	汉	殷州刺史	《太平御览》卷五一九引《三十国春秋》
117	鲁繇	汉	詹事、冀州刺史	《水经注》卷四《沁水》
118	柳纯	汉	使者	《晋书·石勒载记》
119	范龛	汉	同上	同上
120	帛成	汉化之龟兹人	将	《晋书·成帝纪》
121	曹平乐	汉	?	《晋书·石勒载记》
122	刘儒	汉	将	《魏书·序纪》
123	简令	汉	将	《魏书·序纪》
124	张平	汉	同上	同上
125	韦忠	汉	镇西大将军、平羌校尉	《晋书·忠义·韦忠传》
126	辛勉	汉	光禄大夫（辞不受）	《晋书·忠义·辛勉传》
127	刘敏元	汉	中书侍郎、太尉长史	《晋书·忠义·刘敏元传》

汉族任职官员-续表6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28	韦谀	汉	黄门郎	《晋书·忠义·辛勉传》
129	辛谧	汉	大中大夫（辞不受）	《晋书·隐逸·辛谧传》
130	杨轲	汉	太常（辞不受）	《晋书·隐逸·杨轲传》
131	张茂	汉	侍中、太师、大司马、凉州牧、凉王等	《晋书·刘曜载记》

注释：

①按，《资治通鉴》卷八七胡注引《考异》曰："《晋春秋》作'鲜于修之'。今从《载记》《十六国春秋》。余按姓氏诸书，有鲜于而无宣于。"鲜于、宣于，为同名异译。鲜于氏，春秋时为白狄姓氏，十六国时为丁零（高车）姓氏。详细考证见拙作《敕勒与柔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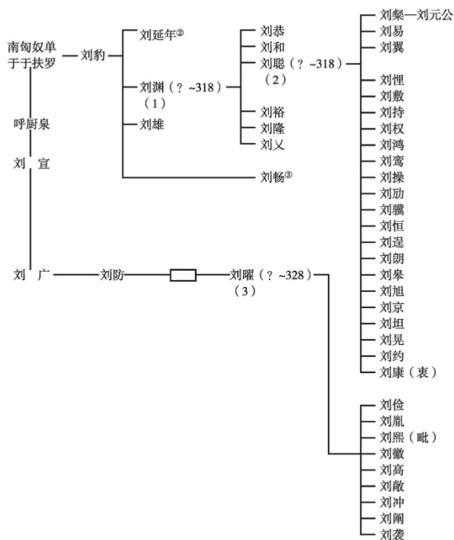
（五）其他少数民族任职官员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	石勒	羯胡	先后任辅汉将军、平晋王、平东大将军、校尉、安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并州牧、汲郡公、征东大将军、幽州牧、冀州牧、赵公等	《晋书·刘元海载记》；同书《刘聪载记》；同书《刘曜载记》；同书《石勒载记》等
2	张㔨督（石会）	羯胡	亲汉王	《晋书·石勒载记》
3	冯莫突	胡	都督部大	同上
4	单征	氐	?	《晋书·刘元海载记》
5	张伏利度	乌丸	?	《晋书·石勒载记》
6	陆逐延	鲜卑	?	《晋书·刘元海载记》
7	单冲	氐	光禄大夫	同上
8	彭荡仲	卢水胡	梁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八八
9	彭天护	卢水胡	梁州刺史	同上
10	蒲洪	氐	率义侯	《资治通鉴》卷九一
11	梁伏疵	羌	镇远将军	《资治通鉴》卷八八
12	虚除权渠	羌	征西将军、西戎公	《晋书·刘曜载记》

其他少数民族任职官员-续表

编号	姓名	族属	所任职官	资料来源
13	杨难敌	氐	假黄钺、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刺史、武都王	同上
14	姚弋仲	羌	平西将军、封平襄公	《资治通鉴》卷九二
15	盆句徐	羌	北羌王、安国将军	《晋书·刘曜载记》
16	句徐	巴	?	同上
17	库彭	巴	?	同上
18	句渠知	巴	归善王	同上

〖附录二〗 汉赵国刘氏世系表



汉赵国刘氏世系①

注释：

①此表系据《晋书》《资治通鉴》《金石录》《元和郡县图志》等制成。表中横线表示世代相承，竖线为兄弟并排，人名下的（1）表示帝位相传序。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大于城”条目：“大于城，在县西南十一里。本刘元海筑，令兄延年镇之，胡语长兄为大于，因以为名。”知延年为刘渊兄。

③《资治通鉴》卷九十云刘畅为聪从弟，故姑且附于此。

〖附录三〗 汉赵国大事年表

公元	汉赵纪年	有关政权纪年	大事
50		东汉建武二十六年	东汉遣使至南匈奴，徙南单于庭于西河美稷。后南匈奴部众入居沿边八郡。
140		东汉永和五年	南匈奴发生变乱，东汉徙南单于庭于离石北左国城。沿边八郡南匈奴继续内迁。
188		东汉中平五年	南匈奴部众恐南单于征兵无已，攻杀南单于羌渠，子于扶罗立，国人不服，另立单于。于扶罗到洛阳诣阙自讼。
189		东汉光熹元年	汉灵帝死，国内大乱。于扶罗与白波军攻河内，失利，欲返故地，国人不受，屯军于平阳。
195		东汉兴平二年	南单于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仍设单于庭于平阳。
196		东汉建安元年	曹操迁汉献帝于许，呼厨泉降曹操，返平阳。
202		东汉建安七年	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呼厨泉与袁绍子尚等攻河东，为曹操军所败，复降。
206		东汉建安十一年	袁绍甥高幹以并州反曹操，求救于呼厨泉，不听；高幹败亡。
216		东汉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留呼厨泉于邺，令右贤王去卑至平阳监国。又分内迁南匈奴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之，并听其部落散居并州五郡、河东郡。
220		魏黄初元年	曹丕受禅，建魏。南匈奴单于参加了受禅仪式。
251		魏嘉平三年	南匈奴五部中左部帅刘豹势强，并五部为一。邓艾上言，建议分其部为二。
264 ~ 265		魏咸熙中	魏以南匈奴一部太强，分为三部。
265		西晋泰始初	有匈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降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又分南匈奴三部为四部。

汉赵国大事年表-续表1

公元	汉赵纪年	有关政权纪年	大事
271		西晋泰始七年	南匈奴右贤王刘猛，叛出塞，自称单于，攻并州，后为晋所败，猛被其下所杀。
277		西晋咸宁三年	有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等内附晋。
279		西晋咸宁五年	有匈奴都督拔奕虚率部落附晋。又有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降晋。
284		西晋太康五年	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附晋，武帝处之河西。
286		西晋太康七年	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率种类十万余口，至雍州降附。
287		西晋太康八年	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众万一千五百口等降晋。晋迁刘豹子渊为北部都尉。
280 ~ 289		西晋太康年间	西晋分并州四部匈奴为五部，改部帅为都尉，以南单于后裔刘氏任之，然皆家居于汾涧之滨。
290		西晋永熙元年	晋惠帝即位，以刘渊为离石将兵都尉。不久，又以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光卿侯。
294		西晋元康四年	内迁匈奴郝散起义于谷远，后降晋，为冯翊都尉所杀。
296		西晋元康六年	郝散弟度元与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起事。秦、雍氐、羌推氐帅齐万年为帝。
299		西晋元康九年	齐万年为首的各族人民起事失败。江统作《徙戎论》，主张将氐、羌、匈奴等徙回原地。内迁匈奴有叛出塞者，刘渊被免官。不久，成都王颖又表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301		西晋永宁元年	以李特兄弟为首的流民起义于益州。
302 ~ 303		西晋太安元年至二年	渊从祖刘宣等密谋兴邦复业，共推刘渊为大单于，遣人到邺城联络，渊求返部，成都王颖不许。渊遣使归，召集五部匈奴及杂胡，作反晋准备。荆州张昌起兵于义阳。

汉赵国大事年表-续表2

公元	汉赵纪年	有关政权纪年	大事
304	汉元熙元年	西晋永安元年、永兴元年	八月，成都王颖以渊为北单于，参丞相事。颖挟惠帝奔洛阳，渊回部，称大单于，都离石，众二万。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引拓跋鲜卑败渊于西河。十月李雄称成都王，国号大成。刘渊迁于左国城，晋人归之者数万，遂称汉王，正式建立政权。十二月，汉国军队击败司马腾军于大陵，取泫氏、屯留、长子、中都，陷介休。
305	汉元熙二年	西晋永兴二年	元月，汉刘钦败晋司马腾军。六月，腾求救于拓跋鲜卑猗㐌，猗㐌杀汉将綦毋豚。不久，离石大饥，渊迁于黎亭就食。汲桑、勒等起兵于赵、魏。
306	汉元熙三年	西晋光熙元年	三月，刘伯根、王弥起兵于山东。九月，晋东海王越以刘琨为并州刺史，琨败汉军于板桥，遂入晋阳。汉侍中刘殷等劝渊南据平阳，西取关中。
307	汉元熙四年	西晋永嘉元年	九月，汲桑死，石勒及胡部大张㔨督军投刘渊。王弥、刘灵及氐酋单征、鲜卑陆逐延等均降汉。
308	汉元熙五年、永凤元年	西晋永嘉二年	元月，渊遣子聪等十将南据太行，石勒等东下赵、魏。三月，渊攻汲郡、顿丘、河内等郡，王弥攻青、徐等四州，进逼洛阳，失败后走归刘渊。七月，刘渊攻占平阳、河东，陷蒲坂，徙都蒲子。十月，刘渊称帝，改元永凤，大封宗室及功臣。
309	汉永凤二年、河瑞元年	西晋永嘉三年	正月，刘渊迁都平阳，并筑平阳都城，改元。刘琨攻占汉上党；石勒、刘灵下魏郡、汲郡、顿丘坞壁，简其丁壮为士卒。三月，刘渊遣刘景攻克黎阳；四月，石勒攻巨鹿、常山等，破郡县百余壁，众十余万。五月，渊遣聪、王弥夺回上党。八月，渊遣聪等向洛阳进攻，败归。十月，复遣聪攻洛阳；十一月败还平阳。

汉赵国大事年表-续表3

公元	汉赵纪年	有关政权纪年	大事
310	汉河瑞二年、光兴元年	西晋永嘉四年	同年初，石勒、王弥攻徐、豫、兖等州。七月，刘聪、刘曜、赵固攻陷河内。刘渊病重，进一步健全中央机构，设单于台，以刘聪为大单于，刘曜、乔智明为单于左、右辅。渊死，太子刘和即立。刘聪杀和，即帝位，改元。 九月，王如等起兵于南阳。十月，刘聪遣子粲、刘曜、王弥等四万攻洛阳，以扫清洛阳外围西晋势力。刘虎降汉，聪封之为楼烦公。
311	汉光兴二年、嘉平元年	西晋永嘉五年	年初，石勒攻陷江夏、汝南、新蔡，占许昌。四月，勒追东海王越丧于宁平城，杀晋臣王衍等。六月，刘曜、王弥等攻陷洛阳，俘怀帝等。聪改元嘉平。八月，汉刘曜等攻陷长安，杀南阳王模。石勒杀王弥，并其众。
312	汉嘉平二年	西晋永嘉六年	正月，刘聪纳刘殷等大臣女，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后聪日益骄奢。聪又命卜珝等攻晋阳，败归。四月，贾疋等围长安，刘曜掠士女八万余口，退回平阳。五月，粲、曜攻三渚，迁二万余户于平阳。七月，汉军攻占晋阳，刘琨求救于拓跋鲜卑猗卢。十月，汉军为猗㐌所击，败还平阳。石勒进据襄国，败段氏鲜卑，与之结好。
313	汉嘉平三年	西晋永嘉七年、建兴元年	二月，刘聪杀晋怀帝等及晋臣十余人，又欲为皇后修鷃仪殿，为陈元达所谏止。四月，愍帝即位于长安，聪遣刘曜、赵染等攻长安；十一月，败还平阳。十二月，刘曜攻洛水北晋河南尹魏该，杀之。
314	汉嘉平四年	西晋建兴二年	正月，刘聪大定百官，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又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三月，石勒攻杀王浚，取幽州。五月，刘曜、赵染攻长安，败归，赵染死。曜又率军东下，攻晋河内太守郭默于怀城，后退回蒲坂。 十一月，聪以子粲为相国、大单于。

汉赵国大事年表-续表4

公元	汉赵纪年	有关政权纪年	大事
315	汉嘉平五年、建元元年	西晋建兴三年	三月，聪纳靳准二女为皇后。四月，刘曜攻长安，败还。六月，曜攻上党。八月，败刘琨于襄垣。九月，刘曜第四次进攻长安，先攻北地等郡，愍帝君臣朝不保夕。
316	汉建元二年、麟嘉元年	西晋建兴四年	年初，汉中常侍王沈、宣怀等专权，与相国刘粲勾结，密谋害乂。二月，聪杀少府陈休等七卿，刘易、陈元达先后忧死。十一月，刘曜攻围长安，愍帝降，迁于平阳。此年七月，河东大蝗、平阳饥甚，司隶部人二十余万投石勒。又，石勒取并州，刘琨投段匹磾。
317	汉麟嘉二年	东晋建武元年	正月，驻守长安的刘曜击败华阴的西晋残余势力。二月，聪遣从弟刘畅攻荥阳李矩．兵败而还。司马睿于建康称王，建东晋。三月，刘粲杀刘乂。接着，汉镇守洛阳的赵固叛降李矩。 十二月，赵固、郭默攻河东，右司隶部三万余人降之。聪杀愍帝于平阳。
318	汉麟嘉三年、汉昌元年，前赵光初元年	东晋太兴元年	三月，司马睿称帝。刘粲与李矩、赵同、郭默等大战于洛汭等地，先败后胜。五月，刘琨为段匹磾所杀，琨将佐多投石勒。七月，聪病重，旋死。子粲即位，改元。八月，靳准杀刘粲，遣使与东晋联系。十月，石勒、刘曜先后至平阳，平乱。十月，刘曜即帝位，改元光初。十二月，靳康等杀靳准，降曜。石勒攻占平阳，刘曜退回关中，杀靳氏一族。
319	赵光初二年	东晋太兴二年	二月，石勒遣使至曜献捷，曜杀其使，双方遂成敌国。四月，曜徙都长安，改国号曰赵。十一月，石勒称赵王。 年底，氐酋蒲洪降前赵，曜封之为率义侯。黄石屠各路松多与秦州晋王司马保，攻前赵，刘曜率军至雍城。

汉赵国大事年表-续表5

公元	汉赵纪年	有关政权纪年	大事
320	赵光初三年	东晋太兴三年	正月，曜进军陈仓，败司马保军，又攻路松多于草壁，松多败走陇城。曜连下阴密、安定，司马保迁于桑城。二月，前赵镇守洛阳四将降李矩，前赵军退守陕城。五月，司马保为部下张春所杀；保原将陈安降曜。六月，关中氐、羌、巴、羯起兵反前赵，曜用游子远镇压，迁上郡氐、羌伊余及其部众二十余万于长安。曜立太学、小学，置国子祭酒等，教授生徒。又欲作酆明观，为乔豫、和苞谏止。
321	赵光初四年	东晋太兴四年	五月，终南山地震。
322	赵光初五年	东晋永昌元年	二月，刘曜率军攻仇池氐酋杨难敌，仇池氐、羌多降，迁陇右万余户于长安。杨难敌降，曜封其为武都王。曜病归，为陈安所袭，击败之。陈安自称凉王，有众十余万。休屠王石武降，曜封之为酒泉王、秦州刺史。十二月，刘曜为父、妻修陵，滥用民力、财力。
323	赵光初六年	东晋太宁元年	六月，陈安围赵将刘贡于南安，王石武攻上邽以解贡危。七月，刘曜亲征陈安，擒而杀之，迁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曜又攻河西，张茂降，曜封其为凉王。杨难敌惧，奔汉中，曜以田崧镇仇池。匈奴黑匿郁鞠部送曜子胤还长安。
324	赵光初七年	东晋太宁二年	三月，曜将康平攻东晋魏兴，达于南阳。五月，河西张茂病死，兄子骏立，曜遣使拜其为凉州牧、凉王。
325	赵光初八年	东晋太宁三年	三月，后赵石他攻前赵北羌王、安国将军盆句除，曜遣刘岳追击，杀石他。杨难敌还据仇池，执杀田崧。四月，后赵王腾杀并州刺史降前赵。五月，后赵石生败李矩等，取洛阳，曜遣刘岳等攻洛阳，为石生所败。曜率军败后赵石聪于八特坂后，败回长安，刘岳被擒。刘曜返长安后，重用台产，以子胤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渭城，设左、右贤王，以下皆以六夷豪杰任之。

汉赵国大事年表-续表6

公元	汉赵纪年	有关政权纪年	大事
326	赵光初九年	东晋咸和元年	十月，刘曜遣将攻占东晋酇县。
327	赵光初十年	东晋咸和二年	五月，前赵遣刘朗攻仇池，不克，掠三千余户而归。河西张骏去前赵官爵，复称大将军、凉州刺史，遣军攻秦州诸郡。前赵刘胤率军大败张骏军，攻陷令居，入据振武。
328	赵光初十一年	东晋咸和三年、后赵太和元年	七月，后赵石虎攻前赵河东之地，曜率军大破石虎，遂围石生于金墉城。 十一月，石勒亲率军来战，曜战败被俘，为石勒所杀。前赵太子刘熙等议弃长安，欲奔上邽。
329	赵光初十二年	东晋咸和四年、后赵太和二年	二月，刘熙、刘胤等奔上邽，关中大乱。原前赵将蒋英等据关中，降后赵。 八月，刘胤等攻后赵石生于长安，各地戎夏起兵响应。石勒遣石虎率军来援，大破刘胤军。胤败还，石虎陷上邽，执太子熙、胤等将相、公卿以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台省文武、关东流人九千余人于襄国。勒又坑杀王公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前赵灭亡。

〖附录四〗 十六国官制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分裂割据时期，其特点是，自汉代以来内迁至黄河流域的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主要是所谓的“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其中，主要有十六国（内包括汉族所建的三国）。这些由五胡建立的政权，统治和管理着人口众多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因此，五胡所建政权怎样统治、管理众多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他们采取什么统治机构（即官制）实施其政令，维持其统治？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和有意思的问题。过去，中外学者多有对十六国中某一个或几个国的官制加以探讨；或从不同的角度，对十六国官制进行研究。[1]本文即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十六国官制作进一步探讨。不妥之处，望读者、专家指正。

一 十六国对魏晋官制的承袭及其特点

十六国时，内迁五胡虽然居地、习俗等有别，且内迁和建立政权时间不同，但无论怎样，他们建立的政权最终还是承袭秦汉魏晋以来汉族政权的形式，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莫不以汉族政权为楷模，其中的官制也不例外。下面为了叙述方便和系统，将十六国官制分为最高统治者名号、中枢（中央）、军事和地方官制四部分，加以考察。

1.十六国最高统治者名号

十六国各政权的官制都有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其最高统治者的名号最终也有所不同：有最后直接称“皇帝”（天子）者，如成汉国李雄，由成都王而称帝；汉赵国刘渊以汉王即帝位，刘聪、刘曜因之；后赵石勒由赵天王称帝，石虎由居摄赵天王称帝；前燕慕容儁以燕王称帝，慕容暐因之；前秦苻健由天王称帝，苻生因之，至苻坚降称大秦天王，未称帝，其后苻丕、苻登称帝；后秦姚兴称帝，后又去帝号称天王；后燕慕容垂以燕王称帝，慕容宝、慕容盛因之，盛后又改称庶民天王；南燕慕容德以燕王称帝，慕容超因之；夏国赫连勃勃由大夏天王即帝位等。[2]

也有一直称天王或王者，如北燕冯跋、冯弘均称天王；南凉秃发傉檀由西平王、河西王，称凉王；西秦乞伏乾归由河南王称秦王，乞伏炽磐因之；后凉吕光由三河王而称天王，吕纂、吕隆因之；北凉沮渠蒙逊称河西王，沮渠牧犍因之。

此外，还有一些汉族所建政权，一直奉晋为正朔，最高统治者不愿名义上称帝称王者。如前凉张氏，张轨、张寔、张骏均未称王，寔、骏称凉州牧、西平公。然而，实际上张骏时，“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3]骏子重华即位后，称西平公、假凉王。至张祚时，曾一度称凉公，进而称帝，但为时很短，其后张玄靓、天锡即位后，仍称凉州牧、西平公。又如西凉李氏，自李嵩（玄盛）至李歆一直称凉公，而不称王。[4]

总之，十六国最高统治者名号，最终或较长时间称帝者，凡九国（成汉、汉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南燕、夏国）；称王或天王者，凡五国（北燕、南凉、西秦、后凉、北凉）；仅称公者，凡

二国（前凉、西凉）。按魏晋之官制，帝国、王国及公国的制度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十六国各国官制因其建号不同，其总的职官设置也有所不同。这是在研究十六国官制时应首先注意到的问题。当然，事实也不尽然，如上述前凉张骏时，虽称西平公，但其建置“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而称王诸国官制无论在职官名还是数量等方面，均与称帝诸国相差无几。

2.中枢之官

丞相、相国 自秦汉至魏晋各朝均置此职，为百官之首，“皆非复寻常人臣之职”。[5]而各朝丞相掌职、权力不尽相同。十六国五胡所建政权（包括鲜卑化汉人冯氏所建北燕，下同）称帝称王者，大多置有此职，且有的分左、右丞相。见于记载的，如成汉国以范长生及其子贲为丞相，李越、董皎曾为相国，尹奉曾为右丞相。汉赵国任丞相者，有刘宣、刘粲、刘曜。后赵国石弘即位后，曾以石虎（季龙）为丞相，“（石）勒文武旧臣皆补左右丞相闲任”，又任郭殷为丞相；石虎称帝后，曾以石斌为丞相；石世即立后，曾以张豺为丞相，石遵、石鉴为左右丞相。前秦国任此职的有雷弱儿、苻雄、王堕、王猛、苻法；至苻登时，以杨宣为左丞相，窦冲为右丞相；苻丕曾以王永为左丞相，窦冲为右丞相。前燕任此职者，有封奕（国相）。后秦国曾以归降之焦纵为相国。夏国任此职的有赫连勃勃长兄右他代。西秦国任此职者，有出连乞都、翟勍、元基（炽磐子）；左相有乙旃音泥、乞伏昙达，右相有屋引出支、辛静、元基。北凉国有相宋繇。[6]

太宰、太傅、太保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钟繇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郑冲为之。晋初以景帝讳故，又采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秩增三司，与太傅、太保皆为上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称帝称王的五胡政权也多置以上职官，见于记载的，如成汉国先后有太傅李骧、太宰李国、太保李始、太师董皎、太保李奕，又以龚壮为太师，辞不受；汉赵国有太师刘景、刘𫖮、范隆、张茂，太宰刘曜、刘欢乐、刘延年、刘易、刘雅、王祥，太保刘殷、王育、刘延年、许遐、任𫖮、刘昶、呼延晏、傅祗（追赠）；后赵国有太保夔安、张豺，太傅条攸；前燕有太宰慕容恪，太傅慕容评、余蔚，太师慕根，太保段崇；前秦有太师鱼遵、苻纂，太傅毛贵；后秦有太宰姚绍；后燕有太师库辱官伟，太保段崇，太宰苻模；西秦有太傅索棱等。

太尉、司徒、司空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并古官也。自汉历魏，置以为三公。及晋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又《通典》卷二○《职宫》记："……周时，司徒为地官，掌邦教。秦置丞相，省司徒，汉初因之。至哀帝元寿二年（前1）罢丞相，置大司徒。后汉大司徒主徒众，教以礼义，凡圃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魏黄初元年（220）改为司徒。晋司徒与丞相通职，更置迭废，未尝并立。至永嘉元年（307）始两置焉。"又记："司空，古官……秦无司空，置御史大夫，汉初因之。至成帝绥和元年（前8）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魏初又置司空，冠绶及郊庙之服与太尉同。"十六国五胡称帝称王诸国多置此三公。如成汉国有太尉李离、张宝，司徒李云、王达、何点、王瓌，司空李璜、赵肃、上官惇、谯献之；汉赵国有司徒或大司徒刘欢乐、刘聪、马景、刘殷、刘裕、刘乂、任颢、刘雅、刘厉、游子远、崔岳（追赠）、刘绥、刘昶、刘述（以上大司徒）、郭汜（兼司徒），有太尉范隆、王彰、刘咸、刘易，有司空呼延晏、马景、刘景、刘均，大司空刘延年、呼延晏、朱纪、王育、呼延翼、靳准、曹恂（追赠）、卜泰；后赵国有太尉石虎、夔安、石韬、张举，司空郭殷、李农，司徒申钟；前燕国有太尉封裕、阳骛、皇甫真，司徒慕容评，司空阳骛；前秦国有太尉雷弱儿、毛贵、鱼遵、苻安、苻菁、苻侯、苻纂、张蚝，司徒王猛、苻融（辞不受）、王永、苻广，司空毛贵、张遇、鱼遵、苻菁、王堕、张蚝、徐义、杨壁；后秦国有太尉姚旻、索棱，司徒尹纬（追赠）；后燕国有太尉库辱官伟，司徒慕容德，司空慕容绍；南燕国有太尉封孚，司徒慕容钟、慕容惠，司空慕容鳞、慕拔、鞠仲；后凉有太尉吕篡，司徒吕弘；南凉有太尉秃发俱延等。

大司马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大司马，古官也。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恒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晋受魏禅，因其制……凡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同时并置，唯无丞相焉。"十六国五胡称帝称王诸国有的也置大司马一职。如汉赵国沿晋制，大司马与太尉并置，任大司马的有刘景、刘聪、刘洋、刘和、刘曜、刘雅、刘丹、刘骥、张茂、石勒、刘胤；后赵有大司马石斌；前秦有大司马苻安、雷弱儿、苻融、苻纂、窦冲；后凉有大司马吕弘；北燕有大司马冯素弗等。

开府仪同三司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开府仪同三司，汉官也。殇帝延平元年（106），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

始自此也。及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也。”“三司”，应即指“三公”；仪同三司，意为非三公而给予三公同等待遇。开府，指开设府署，辟置僚属。开府仪同三司，往往为加官。十六国五胡政权大多沿用汉魏以来的“开府仪同三司”加官职。如汉赵国有范隆、陈元达、卜泰、晋怀帝加仪同三司，刘曜、游子远、石勒、刘胤加开府仪同三司；后赵国石弘曾开府辟召；前秦王猛、张天锡、苻融、杨定，窦冲、王统、毛兴、杨壁、王腾、苻冲、张蚝、苻登、徐嵩（追赠）等曾加开府仪同三司；北燕加冯万泥、孙护开府仪同三司；南燕慕容超曾开府，慕容镇加开府仪同三司等。

特进 此职一般为加官，“汉官也。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特进品秩第二，位次诸公，在开府骠骑上”。[7]十六国五胡政权中，有此加官者不多，见于记载的有：汉赵国加晋怀帝、王弥、綦毋达、台产为特进；前秦有梁平老、强汪、樊世、强德加特进。

左、右光禄大夫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绶。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者，品秩第二，禄赐、班位、冠帻、车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及卒，诸所赠给皆与特进同……光禄大夫假银章青绶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将军下，诸卿上。汉时所置无定员，多以为拜假赗赠之使，及监护丧事。魏氏已来，转复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十六国五胡政权也多置有此职，如汉赵有光禄大夫范隆、朱纪、单冲、庾珉、王俊、卜珝、晋愍帝、游子远、台产、辛勉（辞不受），左光禄大夫刘景、刘雅、张寔、刘绥、卜泰，右光禄大夫陈元达、刘殷，金紫光禄大夫王延，上光禄大夫卜泰；后赵石虎时，曾“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另有光禄大夫郎闿、刘真，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前燕有光禄大夫皇甫真；前秦有光禄大夫赵俱、强汪、王彫（追赠），左光禄大夫强平、苻冲，右光禄大夫徐义、苻侯，金紫光禄大夫程肱、牛夷；后燕有左光禄大夫库辱官伟；北燕有左光禄大夫孙护；南燕有左光禄大夫潘聪；夏国有光禄卿党智隆；西秦有光禄大夫乞伏沃陵。

十六国五胡政权也承袭了魏晋以来中枢置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及御史台的职官，现分述如下。

尚书省

录尚书事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录尚书，案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尚书有录名，盖自

（赵）憙、（牟）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犹唐虞大麓之职也。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十六国五胡政权普遍有尚书省之设，故多有置录尚书事一职。如成汉有李寿、李越、李势任此职；汉赵任此职有朱纪、刘聪、刘粲、呼延晏、刘骥、靳准、刘殷、游子远、刘咸、刘胤、刘昶、刘顗；后赵有石邃、石斌、张豺；前燕有慕容恪；前秦有鱼遵、苻法、苻融、苻叡、苻方、王猛、王永；后燕有慕容宝、慕容隆（为录龙城留台尚书事）；后秦有姚弘；后凉有吕弘、吕超；北燕有冯素弗、孙护；南燕有慕容钟、慕容镇；北凉有沮渠政德；夏国有赫连璝（为录南台尚书事）；南凉有秃发傉檀、秃发武台；西秦有乞伏炽磐、乞伏元基任此职。

与录尚书事一职相当的，还有汉赵国刘聪时刘延年曾任的“录尚书六条事”。《资治通鉴》卷八九胡注云：“录尚书六条事始见于此……如杜佑之言，则六条盖六曹也。”如此，汉赵此职应与录尚书事职相当，后南朝刘宋也沿此职名。

尚书令 《通典》卷二二《职官四》：“秦置尚书令，尚主也，汉因之……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十六国五胡政权尚书台（省）建制较为完备，尚书令一职几乎均有设置。如成汉有杨褒、阎式、王瓌、尹奉、景骞、罗恒、马尚；汉赵有范隆（守尚书令）、朱纪、刘隆、任顗、王鉴、靳明、刘欢乐；后赵有石虎（守尚书令）、夔安（守尚书令）；前燕有阳骛；前秦有梁楞、辛牢、苻柳、姜伯周、王堕、王猛、苻丕、王永、苻纂、徐义、苻冲；后秦有姚晏、姚弼；后燕有慕容德、慕容根；北燕有孙护；南燕有慕容麟、慕容镇、董锐；夏国有若门；西秦有乞伏炽磐、翟勍、昙达、麹景、木弈于等。

尚书仆射、左仆射、右仆射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仆射，服秩印绶与令同。案汉本置一人，至汉献帝建安四年（199），以执金吾荣部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盖自此始。经魏至晋，迄于江左，省置无恒，置二，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五胡政权仆射的设置亦大致如此。如成汉有尚书仆射杨衮、李载、王誓、任颜，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汉赵有左仆射范隆、刘殷、马景，右仆射朱纪、王育、呼延晏；后赵有左仆射郭敖、夔安、韩曦，右仆射程遐、郭殷、张离、张良；前秦有仆射张天锡，左仆射梁安、梁楞、李

威、权翼、王猛、苻冲、俱石子，右仆射董荣、王堕、段纯、赵韶、梁平老、杨辅；前燕有左仆射皇甫真，右仆射张希、悦绾、李绩；后秦有左仆射尹纬、齐难、梁喜，右仆射韦华、梁喜、尹纬；后燕有左仆射慕容楷、张通、慕容盛、慕容麟、慕容根、慕容度，右仆射慕容麟、慕容隆、卫衡、王腾；南燕有左仆射慕拔、封孚、封嵩、段晖，右仆射丁通、慕护、张华；北燕有左仆射冯丕，右仆射张兴；夏国有左仆射叱以鞑，右仆射乙斗；后凉有左仆射王祥、杨桓；南凉有左仆射赵晁，右仆射郭倖；西秦有左仆射边芮、元基、翟绍，右仆射秘宣、出连虔、王松寿等。

列曹尚书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列曹尚书，案尚书本汉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主中书，以司马迁为之，中间遂罢其官，以为中书之职。至成帝建始四年（前29），罢中书宦者，又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而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及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及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而无五兵……"以后列曹均有增减。五胡所建政权凡置有尚书省（台）者，均有列曹尚书，因史籍阙遗甚多，故已无法了解各国所置列曹尚书情况。史籍但云尚书吏部、五兵等为多，不一一列举。但其中有未见于魏晋诸曹尚书名称者，如刘聪曾"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后燕曾置"七兵尚书"，夏国置"都官尚书"等。

尚书左右丞、尚书郎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左右丞，自汉武帝建始四年置尚书，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减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盖自此始也。自此至晋不改。""尚书郎，西汉旧置四人，以分掌尚书……及光武分尚书为六曹之后，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为三十六人。"至魏"凡二十三郎"，晋"置郎二十三人"。十六国五胡政权凡置尚书省者，史籍也见有尚书左右丞、尚书郎设置，但记载不详。

中书省

中书监、中书令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书监及令，案汉武帝游宴后庭，始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罢仆射。汉东京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宫谒者令，非其职也。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220～226）初，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监、令自此始也。及晋因之，并置员一人。"五胡所建

政权多置此职，如成汉有中书监王嘏；汉赵有中书监范隆、朱纪、崔懿之、刘均，中书令曹恂；后赵有中书令徐光、王波、孟准，中书监王波、石宁，中谒者令申扁；前秦有中书监胡文、董荣、王猛、苻融，中书令贾玄硕、王鱼、王猛、梁熙、梁谠；前燕有中书监宋治、阳哲，中书令韩恒；后秦有中书监王周，中书令韦华；后燕有中书令眭邃、常忠；后凉有中书令王祥、杨颖；西秦有中书监姚儁。

中书侍郎、黄门郎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书侍郎，魏黄初初，中书既置监、令，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及晋，改曰中书侍郎，员四人。中书侍郎盖此始也。及江左初，改中书侍郎曰通事郎，寻复为中书侍郎。”五胡政权普遍置此职官，除沿晋称中书侍郎外，也有置黄门郎者。如汉赵有黄门郎傅恂、韦謏，中书侍郎刘敏元；[8]后赵有黄门郎韦謏、严生，中书侍郎乐嵩；前秦有中书侍郎王猛、薛赞；后秦有黄门郎段章，中书侍郎王尚；后凉有中书侍郎杨颖、王儒；北燕有黄门郎常陋，中书侍郎褚匡、李扶（中书郎）；南燕有中书侍郎封逞、韩范；北凉有中书侍郎张穆；夏国有中书侍郎皇甫徽、胡方回；西秦有中书侍郎王恺等。

秘书监、著作郎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秘书监，案汉桓帝延熹二年（159）置秘书监，后省。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丞。及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惠帝永平中，复置秘书监，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省。”“著作郎，周佐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227～233）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晋因之。五胡政权沿置此职官，见于史籍的有：后赵有秘书监徐光，石勒曾“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前燕有秘书监聂熊；前秦有秘书监王飏、朱彤，著作郎梁谠、赵泉、东敬；后凉有著作郎段业；后燕有秘书监郎敷；夏国有秘书监胡义周，著作郎赵逸等。

门下省

侍中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侍中……秦取古名置侍中，汉因之。秦汉俱无定员，以功高者一人为仆射。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者则非数。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此职为门下省最高职官，五胡政权普遍置此。

如成汉有李赍、李成、李艳、董皎、冯孚；汉赵有刘殷、王育、王弥、石勒、刘乘、卜榦、卜泰、刘岳、乔豫、和苞、杨难敌、张茂、徐邈、刘胤、卜珝（辞不受）、崔岳（追赠）；后赵有石虎、石挺、任播、石邃、夔安、申钟、石碟、韦謏、郑系、王谟、石斌、徐统；前秦有吕婆楼、鱼遵、强国、雷弱儿、苻融、苻法、王猛、张蚝、强益耳、梁畅、苻纂、梁谠、王永；前燕有慕容恪、皇甫真、兰伊；后秦有姚弼、段铿、任谦、姚绍；后燕有慕容德、慕容宝、孙勍、悦真；后凉有房晷、吕弘；南燕有慕容超、慕容统、公孙五楼；北燕有冯弘、孙护、王难、阳哲；夏国有胡俨；西秦有方弘、麹景、翟韶、姚绍、元基、出连辅政、乞伏延祚等。

给事黄门侍郎、黄门侍郎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给事黄门侍郎，本秦官也。汉已后并因之，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员。及晋，置员四人。"又《通典》卷二一《职官》也记："门下侍郎，秦官有黄门侍郎，汉因之，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员。郊庙则一人执盖，临轩朝会则一人执麾，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之内，故曰黄门侍郎。初秦汉别有给事黄门之职，后汉并为一官，故有给事黄门侍郎。掌侍从左右，给事中使，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座，无员。"五胡政权中，多有置给事黄门侍郎一职，有时称黄门侍郎。如汉赵有黄门侍郎陈元达、崔懿之、乔诗、乔度；前燕有黄门侍郎申胤、梁琛；前秦有给事黄门侍郎权翼，黄门侍郎李柔、程宪；后秦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尹冲、姚和都，黄门侍郎姚文祖；南燕有黄门侍郎张华；西秦有给事黄门郎郭恒等。

散骑常侍、中常侍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散骑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常侍从乘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亦以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五胡政权多置散骑常侍，也有中常侍一职。如成汉有散骑常侍王嘏、王幼、常璩，中常侍许涪、王广；汉赵有散骑常侍曹恂、王忠（追赠）、刘绥；郁鞠、董景道，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后赵有散骑常侍石宏、石邃，中常侍严震，常侍卢湛、崔豹，在石勒称赵王初，还置有左常侍，董树任之，右常侍，霍皓任之；前秦有散骑常侍张天锡、苻洛、刘兰、休密驮、吕光、王猛、苻晖、王腾、杨定、窦冲、王统、杨壁；后秦有散骑常侍席确、王帛（仅记为散骑）；后凉有散骑常侍郭麐；北燕有散骑常侍孙秀，左常侍桃鲜；南燕有散骑常侍韩谆、

段封之；北凉有左常侍高猛；南凉有中散骑常侍（中常侍）张融；西秦有散骑常侍乞伏务和、郭麐、段晖、沮渠兴国等。

散骑侍郎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散骑侍郎四人，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由于地位较低，史籍所载五胡政权内此职官不多。仅见前燕有散骑侍郎徐蔚，北凉有郭祗，南凉有阴利鹿。

魏晋门下省还置有给事中（仅见北燕有中给事中冯慧懿，南燕有给事中宗正元）、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等职官。史籍载五胡政权中以上职官很少，不具列。

在五胡政权中枢职宫中，还沿魏晋旧制，设置秦汉魏晋中央的"九卿"或称"列卿"，《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记列卿中有"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长秋，皆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员"。现据史籍，将五胡政权各国列卿所置情况大致叙述如下。

太常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又记："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278），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太常及其所属太学诸博士，在五胡政权中的设置，对于加速胡汉融合及文化交流意义重大。见于记载的五胡诸国太常及其所属职官的有：成汉设有"太官令"，应即太常属太史令，掌三辰时日祥瑞妖灾，岁终则奏新历；后又见有太史令韩豹、韩浩。汉赵有太常朱纪、靳冲、梁胥、杨柯（辞不受）；国子祭酒有刘均，博士张师，崇文祭酒董景道，博士祭酒台产，太史令宣于修之、康相、弁广明、台产、任义。后赵石勒时，曾下诏"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又"置大小博士"；至石虎时，"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任国子祭酒有聂熊；又置"女太史"于灵台，有太史令赵揽，有太常条攸、刘奥（追赠）、王修。前秦有国子祭酒王欢，博士王寔，太史令康权、魏延、王彫。前燕慕容皝即燕王位后，曾以"裴开、阳骛、王寓、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真、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并为列卿将帅"。后燕有博士刘详、董谧。后秦有太常权翼、索棱，太史令郭麐、任猗，博士淳于岐，灵台令张泉。后凉有太常郭麐、杨颖。北燕有太常褚睹，太常丞刘轩，太史令闵尚、张穆。南燕有太史令成公绥。北凉有

太史令刘梁、张衍，又曾以刘昞、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世子侍讲。南凉有国子祭酒田玄冲、赵诞，国纪祭酒郭韶，太史令景保。西秦有博士，见于甘肃永靖炳灵寺一六九西秦壁画；夏国有太常姚广都。

又魏晋太常所属还有“都水使者”，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史载汉赵国有左都水使者支当，右都水使者刘摅；后赵有都水使者张渐。

光禄勋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光禄勋，统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冗从仆射、羽林左监、五官左右中郎将、东园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哀帝兴宁二年（364），省光禄勋，并司徒。孝武宁康元年（373）复置。”史籍所载五胡政权设光禄勋及其属官有：汉赵有左中郎将宋始；后赵有光禄勋杜嘏，左中郎将文鸯，右中郎将卫麟；前秦有光禄勋李俨，武贲中郎将张蚝，左中郎将邓绥；前燕有左中郎将慕容筑；后凉有武贲中郎将吕纂、吕开；西秦有光禄勋王松寿等。

卫尉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及渡江，省卫尉。”史籍所载五胡政权任此职者甚少，仅见汉赵有呼延宴、梁芬、刘锐，南凉有伊力延，北燕有冯卖等任卫尉之职。

廷尉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五胡政权中，见于记载任此职者，为汉赵陈元达、乔智明，后赵续咸，前燕廷尉监袁炜等。

大鸿胪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大鸿胪，统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邺玄武苑丞。及江左，有事则权置，无事则省。”五胡政权中，见于记载任此职者，为汉赵范隆、李弘、田崧，后赵鼂赞（追赠），前燕温统，前秦韩胤、郝稚，后秦梁斐等。

宗正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宗正，统皇族宗人图谍，又统太医令史，又有司牧掾员。”五胡政权中，见于记载任宗正一职者，为汉赵呼延攸，前秦苻融，后秦姚绍等。

大司农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大司农，统太仓、籍田、导官三令，襄国都水长，东西南北部护漕掾。”五胡政权中，见于记载任大司农一职者，为汉赵卜豫、朱诞、卜珝，后赵曹莫，后秦袁虔、窦温，

南凉成公绪等。

将作大匠 《通典》卷二七《职官》九将作监条记：“……秦有将作少府，掌治宫室。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更名将作大匠，后汉位次河南尹……章帝建初元年（76）复置，初以任隗为之，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魏晋因之。”五胡政权中，见于记载任将作大匠一职者，为汉赵靳陵、胡元，前燕平熙，夏国叱干阿利等。

少府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五胡政权中任此职者，见于记载的有汉赵少府陈休，后赵任汪及尚方令解飞等。

十六国五胡政权还承袭了魏晋以来中枢御史台及其职官，主要有如下官职。

御史中丞、御史大夫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时，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使丞，其一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汉因之，及成帝绥和元年（前8），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置长史，而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前5），复为御史大夫……历汉东京至晋因其制，以中丞为台主。”五胡政权多置御史台，以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为台主。如汉赵有御史中丞诸衍（一作浩衍）、殷凯（一作段凯），御史大夫崔鸿；后赵有御史中丞李矩；前燕有御史中尉（应即御史中丞）阳约；前秦有御史中丞梁平老、李柔；夏国有御史中丞乌洛孤，御史大夫叱干阿利；西秦有御史大夫梯眷、麹景、段晖。

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治书侍御史，案汉宣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侍侧，后因别置，谓之治书侍御史，盖其始也。及魏，又置治书执法，掌奏劾，而治书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晋，唯置治书侍御史，员四人。”又记：“侍御史，案二汉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日印曹，掌刻印；三日供曹，掌斋祠；四曰尉马曹，掌厩马；五日乘曹，掌护驾。”“殿中侍御史，案魏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其始也。”史籍所见五胡政权中，置以上职官的仅有：后赵石勒时，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后燕有侍御史仇尼归，侍御郎高云；后秦有治书

侍御史唐盛，兰台侍御史姜楞，侍御史廉桃生；后凉有殿中侍御史王回等。

魏晋于太子东宫还设置了一系列辅佑太子之职官，如太子太傅、少傅、太子詹事、中庶子、中舍人、洗马、左右率等。[9]在五胡政权中，史籍也记有上述职官。如汉赵有太子太傅卜泰、刘胤，太子少傅董景道，太子太师卢志，太子少师台产，詹事曹光、[10]鲁繇，[11]太子洗马刘绥，东宫舍人荀裕；后赵有太子詹事孙珍，太子中庶子李颜，石虎时"东宫置左右统军将军，位在四率以上；前秦有太子太傅王猛、苻融，太子詹事王猛、席宝；太子左卫率石越；前燕有中庶子李绩；后秦有太子詹事王周，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勋，太子右卫率姚和都；北凉有世子洗马宗钦，东宫侍讲程骏；西秦有太子太师焦遗，太子詹事赵（一作麴）景，太子司直焦楷。

五胡政权也承袭了汉魏以来中宫（即后宫，皇后居处）一些职官，而微变其名，如汉赵置中宫仆射，由郭猗任之。

此外，五胡政权还承袭汉晋以来掌皇宫黄门之内诸伺应杂事，持兵器宿街密殿的职官——中黄门，此职名义上属少府，曹魏后职稍重。见于记载的五胡政权置此职者，有汉赵陵修，前秦刘晃，后燕赵济生，南燕孙进等。

十六国五胡政权均沿袭了汉魏以来实行的封王及"五等爵制"（有王、公、侯、伯、子、男等级）；封王极滥。诸王只有食邑，而无实权，只有兼职后，方有职有权。一般是称帝建号政权有封王之制，而称王者政权封王较少。由于五胡政权封王之滥举不胜举，故略。而"公、侯、伯、子、男"封爵在五胡政权中也普遍存在，公、侯封爵名目繁多，故不赘举。[12]

3.军事之官

十六国五胡所建政权普遍承袭汉魏以来军事方面的职官，而史籍所载五朝政权中的军事职官最多，占全部职官的70%以上。除上述汉魏以来"三公""八公"中的大司马、太尉等军事职官外，见于记载的主要有如下职官。

大将军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大将军，古官也。汉武帝置，冠以大司马名，为崇重之职。及汉东京，大将军不常置，为之者皆

擅朝权……及晋受命，犹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后复旧，在三司上。”五胡政权普遍设此职，且有上将军或上大将军之号。石勒、姚苌、苻洪、吕光、慕容垂、秃发乌孤、乞伏国仁等，在其建国初，均曾自称大将军。各国建立后，任此职者有：成汉李寿、李越、李广；汉赵刘和、刘粲、刘敷、刘约、刘骥、靳准、刘岳、陈安、石勒、杨难敌（以上大将军）、张骏（上大将军）；后赵李农、石邃、石遵；前秦张平、杨壁、杨定（上大将军）；后秦有姚弼、姚绍；后燕务银挺（上大将军）；夏国赫连力俟提、赫连璜；西秦乞伏乾归（上将军）等。

其次，魏晋开府从公之“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在五胡政权中也多有设置。如：

骠骑大将军、骠骑将军 《通典》卷三四《职官》：“骠骑将军。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始用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大将军等。光武中典；以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三公下……魏晋齐并有之。”五胡政权中任此职者，成汉有骠骑将军尹奉；汉赵有骠骑大将军刘易、刘骥、石勒，骠骑将军王彰、刘述；后赵有骠骑大将军石宏，骠骑将军石虎；前秦有骠骑大将军苻安、张天锡、杨定、王腾，骠骑将军张蚝、窦冲；后燕有骠骑大将军慕容宝、慕容熙，骠骑将军慕容国、慕容农；北燕有骠骑大将军冯万泥、冯弘；南燕有骠骑大将军慕容超；南凉秃发利鹿孤曾先后为骠骑将军、骠骑大将军；西秦有骠骑大将军乞伏谦屯等。

车骑大将军、车骑将军、左右车骑将军 《通典》卷二九《职官》：“车骑将军。汉文帝元年（前179）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后汉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始赐金紫，次司空……魏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五胡政权中，任车骑大将军的有：汉赵刘曜、刘聪、刘逞、游子远、靳准，后赵石宣，前燕刘宁，前秦苻雄、刘宁、苻柳、苻方、张蚝、毛兴、苻冲、窦冲，后凉吕弘，后燕慕容德，北燕冯素弗，南凉秃发傉檀，西秦乞伏木弈于；任车骑将军的有：后赵石虎，后秦没弈于，南燕慕容镇，南凉秃发傉檀；任左车骑将军的有：成汉李越、汉赵乔泰；任右车骑将军的有：汉赵王腾。

此外，卫大将军、卫将军、抚军大将军、抚军将军、都督大将军、

龙骧大将军、龙骧将军、中军大将军、四征（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大将军；四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大将军等，在五胡所建政权中均普遍设置，尤以四征、四镇大将军为多，不赘引。

比以上位低的军事职官，如四平将军（平东、平南、平西、平北），四安将军（安东、安南、安西、安北），中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左右前后军将军，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校尉，左右卫将军，以及骁骑将军等杂号将军，在五胡所建政权中均普遍设置，且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不赘引。[13]

十六国五胡所建政权也承袭了汉魏以来有关军事职官的“持节都督”的制度。《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记：“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明帝太和四年（230），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几乎所有五胡所建政权均有持节都督制，权力最重者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都督”，见于记载的有：成汉大都督李越；汉赵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刘景；后赵都督中外诸军事石宏，使持节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石邃，都督中外军事张豺；前秦都督中外诸军事苻雄、苻菁、苻安、苻法、王猛、苻叡、苻方、苻融、王永、苻纂、杨定；后燕都督中外诸军事慕容德、慕容熙；南燕都督中外诸军事慕容钟等。此外，五胡诸国或置都督某一州军事（多兼任刺史）或数州诸军事，持节或不持节，种类名号甚多，不再列举。

最有意思的是，五胡所建诸国甚至接受了汉魏以来汉族的民族观及民族政策，似乎将自己比为华夏正统，将周围其他民族（甚至南方汉族）视为“蛮夷”，沿袭汉魏以来在少数民族（蛮夷）聚居地区设置护羌、夷、蛮等校尉及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如汉赵置长水校尉，以尹车任之；置平羌校尉，以韦忠任之；置护南氐校尉，以杨难敌任之；置东夷校尉，石勒任之；置宁羌中郎将，杨难敌任之。西秦置有西胡校尉，乞伏是辰任之；置平羌校尉，乞伏信帝任之；置休官大都统，权千成任之；置叠掘都统，叠掘河内任之等。至于五胡其他政权这类职官设置情况及与传统汉族民族观之关系，可参阅日本三崎良章撰《五胡诸国的异民族统御官和东晋——以南

蛮校尉、平吴校尉设置为中心》（《东方学》第82辑，平成三年）、《从异民族统御官看五胡诸国之民族观》（《东洋史研究》第57期，平成七年），不赘。

4.地方之官

五胡所建政权在地方行政体制上，基本上全部承袭秦汉魏晋以来的州、郡、县制，于州置刺史（或曰牧，京畿地则称“内史”），郡置太守（郡守），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关于五胡诸国国内设置州、郡、县的具体情况，清代学者洪亮吉撰《十六国疆域志》有详细记述。其中虽然有一些问题，但基本上反映了十六国五胡诸国地方行政建制及地方职官的情况，不再赘述。[14]

以下，仅对自汉以来于京畿地区设置的司隶校尉，略做进一步探讨。《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记：“司隶校尉，案汉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隶校尉，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历汉东京及魏晋，其官不替。”五胡政权也多在自己的京畿之地置此职，如汉赵有王弥、刘乂；后赵有石韬、张离；前燕慕容皝时，“改司州为中州，置司隶校尉”；前秦有梁楞、赵诲、吕婆楼、苻叡、苻晖、王猛、王腾；后秦有郭抚、姚显；后凉有吕弘、吕超；后燕有慕容德、张显；北燕有姚昭；南燕有慕容达、慕容超；夏国有阿利罗；南凉有敬归等。由此可见司隶校尉一职，在五胡政权中有普遍设置。

在五胡所建政权中，仅夏国置有幽州（治大城，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南）、南台（治长安）；朔州（治三城，今陕西延安东）、秦州（治杏城，今陕西黄陵北）；雍州（治阴密，今甘肃灵台西）、[15]并州（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梁（或作凉）州（治安定，今甘肃镇原南）、北秦州（治陕西武功）、豫州（治李润，今陕西韩城南）、荆州（治陕城），[16]而不置郡、县，以城主统民。

综上所述，十六国五胡所建政权的官制，无论是最高统治者的名号，还是中枢、军事和地方的官制，基本上是承袭汉魏以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主要原因是内迁五胡所建政权的领地，特别是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地区，在原汉族（华夏）聚居的长江、淮水以北（包括今四川），五胡统治者要有效地统治以农耕为主的广大汉族，搬用其原有的游牧民族

或较为简单的政治制度包括官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采取原汉魏以来的官制，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同时，五胡政权也有袭用原魏晋官制可能和条件，那就是五胡大多迁入内地，较早与汉族杂居错处，他们的经济类型及社会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文化习俗也渐受汉族的影响。特别是内迁五胡的统治阶层更是深受汉族传统文化之熏陶。如建立汉赵国的匈奴刘渊，史称其曾师事上党名儒崔游，对汉文典籍无不综览；其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17]前秦苻坚生于枋头（今河南卫辉东北），更是以华复帝王和汉族传统文化继承者而自居。此其一。又五胡政权为了管理广大汉族，而不断吸收汉族士族、儒生参加政权建设，做官为吏。有的统治者以汉族为谋主，著名的如前秦的王猛、汉赵的陈元达、后赵的张宾、后秦之尹纬、夏国的王买德等。这些汉族谋士为五胡政权的发展（包括官制的建立）和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其二。

然而，五胡政权承袭汉魏官制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第一，五胡政权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其官制，使之与魏晋官制更为相近。一般说来，五胡在正式称帝或称王之前，官制多不健全，而且多杂有胡俗胡制（说见后），只是在此之后，逐渐与魏晋官制接近，即基本承袭魏晋官制。

第二，在五胡诸国承袭的魏晋官制中，有关军事的职官最多，也最完善，这与当时分裂割据、相互争战的局势有关。因此，五胡诸国特别重视军事及相关的军事职官，各种名目的杂号将军及新官名出现较多。如后赵石虎时，又“置左右戎昭、曜武将军，位在左右卫上。东宫置左右统将军，位在四率上……置镇卫将军，在车骑将军上”等。

第三，五胡政权中，一般说来，中枢、军事和地方重要职官均由该族（统治民族）帝王子弟及本族人担任，汉族及其他民族大都只能任中下级官吏。因此，有学者认为，五胡政权是种族（民族）政权，也有人认为汉族参政，五胡政权大多是胡汉联合政权。以上看法均欠妥。统治民族占其政权职官的重要地位，是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包括汉魏以来汉族所建政权必然的现象，不足为奇。有的学者对一些五胡所建政权职官民族成分做了统计，据现存史籍所载，汉赵国共有大小官员263名，其中刘渊一族官员44人，匈奴族70人，汉族131人；其他民族18人。[18]其中，汉族官员虽然占了汉赵国官员总数的一半左右，但其中中央、军

事和地方的主要官员仍是匈奴刘氏一族及其他匈奴族人担任，整个国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匈奴刘氏一族手中。又如前秦苻坚即位前，前秦重要将军有22人，其中氐族16人，占72.7%，疑为氐族及汉族者各2人，匈奴、羌族各1人。在氐族22人中，苻氏子弟有13人，占59%，若与略带姻戚身份者2人，合计17人，占总数的77%。[19]又如南凉军事之官共34人，其中王族秃发氏6人，与之联姻者2人，少数民族首领及汉族各8人，后者仅为中下级官吏。西秦情况同样如此，其军事之官约72人，其中乞伏氏王族26人，且为武官之首，与乞伏氏联盟的鲜卑官员18人，则鲜卑族贵族占军事之官总数的59%以上。[20]其他五胡政权情况亦大致相同。

二 十六国的“单于台制”及胡汉分治

十六国除主要承袭魏晋的官制外，还有一些五胡政权在采取魏晋官制的同时并行胡族（主要是匈奴）的官制，实行胡汉分治，即所谓的“单于台制”。这种情况，日本学者内田吟风称之为“胡汉二重体制”，[21]有些中国学者称之为“双轨制”。[22]

据现存史籍记载，并行单于台制的政权，有匈奴刘氏所建之汉赵国，羯胡石氏所建后赵国，鲜卑族所建之后燕国，以及鲜卑化汉人高氏所建之北燕国。

1.汉赵国 据《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等记：刘渊（元海）称汉王后六年（310）临终时，曾以子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此为汉国置单于台之始，也是十六国时设单于台之始。刘聪继立后，因其异母弟刘乂为渊皇后单氏所生，故聪曾说：“今便欲远遵鲁隐，待乂年长，复子明辟”，并以“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即是说，刘聪即位后，单于台的建置仍然存在，此时单于台的最高长官大单于一职，由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太弟刘乂担任。

至汉嘉平四年（314）初，刘聪置左右司隶的同时，又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此时，刘乂仍为大单于。可是，就在同年十一月，聪即以其子刘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刘乂失宠。过了三年（317），刘粲害乂，诬其谋反，“遣（王）沈、（靳）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皋乂同造逆谋”。《资治通鉴》卷九十记此事，胡注云：“义（乂）为大单于，氐、羌酋长属焉，故皆服事东宫。”此亦可证粲之前乂一直任大单于。接着，刘聪即以粲为皇太子，任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故。

刘曜继立后，改国号为赵，迁都长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设单于台。直到赵光初九年（326），曜才以子刘胤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渭城（今陕西咸阳渭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

2.后赵国 西晋太兴二年（319），石勒在群臣的劝进下，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23]“以大单于镇抚百蛮”，[24]大单于之

下设“单于元辅”，由勒从子石虎任之。[25]后赵建平元年（330），石勒灭前赵，正式称帝，以子石弘为太子、“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封秦王”。[26]此后，后赵大单于一职由皇太子弘担任。此事引起石虎的不满，他“自以勋高一时，谓勒即位之后，大单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于是，他私下对其子邃说：“主上自都襄国（今河北邢台）以来，端拱指授，而以吾躬当矢石。二十余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指拓跋部鲜卑），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克殄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27]

果然，石勒死后，石弘即位，为石虎所逼，先拜虎“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邑，总摄百揆”。接着，石虎废弘，自立为帝。至后赵建武五年（339），石虎以太子宣“为大单于”。十四年（348），太子宣因杀石韬，为石虎所杀。至此之后，再不见后赵有大单于之号。[28]

值得注意的是，石虎的养孙冉闵（汉族）起兵反，称帝，史称“冉魏”。冉闵于晋永和六年（350）率步骑十万击襄国的石祇时，曾“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29]也即是说，冉魏继后赵之制，设大单于一职，由皇子担任。

从上述记载看，后赵虽设有大单于或单于元辅等职，以管理百蛮，但并未明言设置了类似前赵单于台的机构。后赵是否置类似单于台之机构呢？据《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记：勒称大单于、赵王后，曾“命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之单于庭”。也就是说，后赵的单于庭类似于汉赵单于台，主要职责同样是“镇抚百蛮”，即管理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3.后燕国 后燕慕容盛曾于长乐二年（400）“立燕台，统诸部杂夷”。[30]此燕台”，据《通鉴》卷一一一胡注：“二赵（前、后赵）以来，皆立单于台以统杂夷，盛仍此立之。”则此时后燕所立之“燕台”，类似前、后赵之单于台（庭）。可是，不见有大单于之号；只是在后燕开国主慕容垂时，才见垂曾令其太子宝“领侍中、大单于、骠骑大将军、幽州牧”的记载。[31]后燕建平元年（398），兰汗杀慕容宝，“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立慕容盛为燕王。[32]慕容盛后设立之燕台的长官是否为大单于，谁任此职？因史籍阙载，不得而知。

至光始元年（401）慕容盛死，慕容熙立，“改北燕台为大单于台，置左右辅，位次尚书”，[33]谁任大单于一职，不明。此时，后燕的大单于台，才基本上与前后赵的单于台性质一致。

4.北燕国 北燕是在后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燕建始元年（407），冯跋杀慕容熙，立高云为燕王，史称北燕。过了两年，高云为部下所杀，冯跋平乱后，称帝。至北燕太平三年（411），冯跋“以其太子永领大单于，置四辅”。[34]从史籍载有北燕“单于前辅万陵”“单于右辅古泥”看，[35]所谓“四辅”，当为单于前辅、单于后辅、单于左辅、单子右辅。[36]由此可见，北燕也曾设有类似前后赵之“单于台制”。

北燕为汉族冯氏所建，为什么会采用与匈奴旧俗相关的单于台制呢？首先，冯跋一族原为长乐信都（今河北衡水冀州）汉族，晋永嘉之乱时，跋祖父和避地上党（治今山西长治潞城西）。父安为西燕慕容永将军。西燕为后燕灭亡后，跋迁于和龙（今辽宁朝阳），与当地鲜卑杂处，[37]所谓“既家昌黎，遂同夷俗”。[38]即是说，冯跋一族已成为鲜卑化之汉人。其次，北燕建国的辽西、辽东是魏晋以来东部鲜卑之旧地，鲜卑人数众多；而冯跋又是在慕容氏鲜卑所建后燕基础上建立北燕国的。因此，北燕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不深受鲜卑族的影响，与十六国中鲜卑所建之诸燕国没有多大差别，北燕设置类似单于台的机构是完全可能的。

除了上述汉赵、后赵、后燕、北燕四国外，十六国中还有一些胡族所建政权，在建立前后，也往往有大单于之号。详细情况见下表。

十六国胡族政权所置大单于号

国名	时间	称号情况	资料出处
前燕	晋永嘉三年（309）	慕容廆自称为鲜卑大单于	《晋书·慕容廆载记》，《资治通鉴》卷八六
	晋建武元年（317）	晋元帝以慕容廆为大单于、昌黎公	《晋书·慕容廆载记》，《资治通鉴》卷九〇
	晋咸和九年（334）	晋成帝拜慕容皝为大单于、辽东公	《晋书·慕容皝载记》
前秦	晋永和六年（350）	蒲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	《晋书·苻洪载记》，《资治通鉴》卷九八
	晋永和八年（352）	苻健即帝位，以大单于授其子苌	《晋书·苻健载记》，《资治通鉴》卷九九
后秦	晋永和十二年（356）	姚襄叛晋，自称大将军、大单于	《晋书·姚襄载记》
	晋太元九年（384）	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	《晋书·姚苌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五
西秦	晋太元十年（385）	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以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	《晋书·乞伏国仁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六
	晋太元十三年（388）	乞伏乾归继立后，众推其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七
	晋太元十七年（392）	乾归犹称大单于、大将军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南凉	晋隆安三年（397）	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九
夏国	晋义熙三年（407）	赫连勃勃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四

*按乞伏国仁称大单于，下有左右辅，似汉赵单于台之建制，但未见记其设单于一类似机构，故将西秦大单于归入只有大单于号一类。

以上六国，在正式建立政权前后，统治者均有大单于之号，他们是否也相应设置了类似单于台的机构呢？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他们均受原匈奴政权的影响，以匈奴最高首领单于为号，是可以肯定的，其目的不外乎是以此号召诸胡。由于他们刚起兵自立，政权尚未完备，待巩固之后，大单于之号再不见于史籍。因此，可以说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前赵国单于台制的影响，后来因各种原因未能正式设置单于台的机构。

单于台（庭）制是十六国时出现的一种新的官制，具有鲜明的“胡汉分治”的特征。据上述汉赵、后赵、后燕、北燕四国单于台设置情况，大致可将此制的特点归纳如下。

1.单于台制首先由匈奴刘氏所建汉赵国创立，以后为一些胡族所建政权所继承，但略有损益。因而，汉赵名之为“单于台”，后赵称之为“单于庭”，后燕名之为“北燕台”（燕台），后改称为“大单于台”。单于台的设置，在汉赵等四国中并没有贯彻于政权的始终。汉赵是在建国后六年

始置，前赵刘曜继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设此台，直到继位后七年才恢复此制。后赵石勒称赵王后，设单于庭，一直到石宣被杀，也不见有大单于之号。至于后燕、北燕的燕台、大单于台的设置，更是在其国的后期。因此，以上四国虽设置两套统治机构，进行胡汉分治，但实际上，应是以继承汉魏官制为主，以单于台制为辅。

2.单于台的职责，史籍记载甚明，是专门管理国内除汉族（“晋人”）之外其他少数民族的。

3.单于台一般设置于国都或其附近。如汉赵刘渊、刘聪都平阳，单于台设于平阳西；刘曜都长安，单于台设于长安附近之渭城。后赵石勒时，单于庭在其国都襄国；石虎迁都于邺，因大单于石宣在邺，故知此时单于庭设在邺。后燕、北燕的情况大致如此。

4.单于台的最高长官，无一例外名为“大单于”，一般是由储主（太子）或有权势的皇子任此职。如汉赵刘渊在位时，以其太子刘聪为大单于；刘聪即位后，先以皇太弟刘乂，后以太子刘粲为大单于；刘曜在位时，以太子胤为大单于。后赵石勒在称帝前，自称大单于，继帝位后，即以太子弘为大单于；石虎继立后，以太子石宣为大单于。后燕慕容垂时，以太子宝为大单于。北燕冯跋以太子永领大单于等。

为什么继帝位后，大单于一职要由太子或皇子担任呢？《资治通鉴》卷九九，晋永和八年（352）正月条记：秦王苻健称帝时，秦丞相苻雄等上言称“单于所以统壹百蛮，非天子所宜领”，以授太子苌。这也许就是天子不领大单于而以太子领此职的原因。

大单于之下，各国所设置辅佐大单于的职官微有不同。汉赵刘聪置“单于左右辅”，刘曜曾任单于左辅，乔智明任单于右辅；[39]刘曜时，前赵大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所谓“左右辅”应即匈奴旧制单于之下的“左右贤王”，而微变其名，刘曜则干脆以原“左右贤王”名之。后赵石勒时，勒自兼大单于，以从子石虎为“单于元辅”，由此知后赵大单于之下，仅设有“单于元辅”一人。后燕慕容熙时的燕台大单于之下，与汉国一样“置左右辅，位次尚书”。北燕冯跋时，大单于之下，置单于四辅（前后左右），辅助大单于者多达四人。

至于单于左右辅（或左右贤王、元辅、四辅）以下，还设置什么职

官和相应的机构，史籍中仅有对汉赵国情况的简约记载。《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云：“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同书卷一○三《刘曜载记》亦记：“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据此知，汉赵国单于台左右辅之下，将六夷的部落按“万落”为单位划分，共有二十万落。左右辅各自管理十万落，而每一万落置一都尉。刘曜时，管理“万落”的都尉，可能也按匈奴旧俗改称为“万户长”，均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都尉一职，是秦汉以来内地政权的职官，匈奴也有在西域所置“僮仆都尉”，可能是汉朝人的译名。汉朝有“属国都尉”一职，曹魏、西晋于内迁匈奴五部，每部置都尉等。汉赵刘聪于万落置一都尉，可能系仿西晋匈奴五部都尉而置。其余设单于台的五胡政权情况是否同汉赵国，因史籍阙载，不得而知。

5.单于台统治的人民，是除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即所谓“六夷”“百蛮”，而且是以游牧为生、以部落为组织的少数民族。由于自东汉末年以来，东北、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淮水、长江以北几乎遍布他们的足迹，其中主要有“六夷”。这也就是十六国单于台之所以能存在的基础。六夷中的“胡”，具体指匈奴及与其相关的诸杂胡（卢水胡、铁弗、独孤、赀虏等），分布很广，大致从今甘肃的河西一直到今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均有，而尤以关中和山西为多。“羯”，指羯胡，其主要成分为西域胡人，石勒一族即羯胡。其人高鼻深目，多须髯，分布地区主要在今陕西渭北、山西上党及河北等地。“鲜卑”，原居地在东北，东汉末年以来大量内迁，人口众多，故十六国时逐鹿中原，建立政权亦最多。其中也有部分仍以部落为社会组织形式。氐、羌是六夷中人口较多的两个民族，分布极广。除以上“五胡”外，巴氐也是六夷之一（一说是乌桓），除了李特兄弟所率一支入今四川建立成汉国外，还有不少巴氐（其实为“巴人”）入居今陕西关中、渭北一带。《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云：曜曾滥杀巴酋，引起关中“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

从上述六夷的情况看，十六国内都存在多种不同的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他们虽然大都与六夷杂居错处，但在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别。这也就是十六国时出现两种官制和胡汉分治的基础。

6.从以上整个单于台制的特点看，这一制度基本上是沿匈奴官制而

来的。因此，按其性质来讲，单于台不仅是一个政治行政组织，而且是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和带家属、财产（主要是牲畜）的部落组织。正因为如此，十六国设置单于台的政权，其军事力量基本上握在单于台的大单于手中。这就是大单于一职一般由继承帝位的太子担任的原因，由此亦可见大单于地位之重要。[40]

总之，十六国时一些政权采取两套官制，实行胡汉分治的原因，不外乎是这些政权统治的地区内既有人数众多、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又有从东汉以来大量内迁的六夷，他们既有保持旧俗的一面，又有因汉化而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一面。因此，五胡所建立的一些政权对国内经济、文化和习俗相异的胡汉人民采取两种不同的官制，加以管理，这是时代的产物。

可是，国内有些学者却认为："大单于及单于台的设置，是胡族落后国家机构在中原的残留，反映了民族压迫的存在。"[41]还有的学者说：单于台制"是一个人为的胡汉分治的落后政策，阻碍了民族融合的进程"；[42]"总的精神是突出民族界限，实行分而治之"。[43]"这是一种制造民族对立而不利于民族融合的落后政策。"[44]这些看法似可商榷。

事实上，十六国时单于台的设置是汉赵等国改造原匈奴的旧制，以适应新的历史时代要求的产物。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造。在当时民族关系复杂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汉赵等政权的单于台制有它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反映了当时各民族尚未完全融合的历史事实，不能简单加以否定。

当然，这一制度所形成的胡汉分治又有极大的局限性，随着内迁六夷与汉族的进一步融合，胡汉逐渐融为一体，差别逐渐缩小，两套官制亦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单于台制也就为历史所淘汰。十六国的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二 十六国地方官制的特点——护军制及其他

十六国政权在地方行政机构及官员设置上，如前所述，皆承袭了汉魏以来的州、郡、县制及相应的州刺史（牧）、郡太守、县令等职官，此外，在京畿及附近设置内史或司隶校尉等职官。大多数五胡政权在承袭上述地方行政体制及职官时也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一般说来，在五胡统治者正式称帝、王之后，即有了较为完善的地方行政体制和职官。例外的除前述夏国在前期只设州而不设郡县之外，就是汉赵国在刘聪即位后的嘉平四年（314）所设置的司隶校尉一职。

据《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记：嘉平四年“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刘聪的这一措施，乃是对汉魏以来地方行政体制中司隶校尉一职的改革。其所置左右司隶，各领二十余万户，即将汉魏以来司隶校尉，分为左右两名，所领户也以万户为单位，置一内史领之，凡四十三内史，几乎包括了当时汉国实际控制的所有地区。以“万户”为行政单位，乃是秦汉以来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以万户为行政单位的旧俗。即是说，此时匈奴汉国刘氏以汉魏以来地方行政之名（即司隶校尉、内史），恢复了其祖先以万户为单位的地方行政组织，是糅合了胡汉地方行政体制特点的新形式。

当时，汉国左右司隶所辖四十三万户，当为其不断从四周掠迁或归附的人口。其中，主要是“晋人”（汉族）。这种“复旧”，晋人自然是不习惯的；加之汉国统治者对他们的压榨、侵侮，一有机会，他们就采取逃亡的形式进行反抗。如汉麟嘉元年（316），“河东大蝗……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冀州（治今河北衡水冀州）二十万户”；次年，赵固、郭默攻汉国河东，“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45]所谓“司隶部”，可能即左右司隶的机构名，下又分左右司隶部，而史载“司隶寺”为司隶部所属之机构。原任汉国廷尉、黄门侍郎的陈元达，曾任过“左司隶”职。[46]左右司隶的万户组织，可能到刘聪死，刘曜即位后即废止。

以上仅是十六国中个别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地方官制的改革，实际上在十六国地方行政机构及职官中，最普遍也最具特色的还是“护军制”。

护军制，源于自秦汉以来中央设置的武职“护军”，或称护军都尉、护军将军、中护军等，为领护军队之官，即所谓“护军前官，武士管龠，

典武选，尽护诸将”是也。[47]又为大司马、大将军或魏晋以后持节都督之高级属僚，系中央禁卫出征或都督诸州而设置。另有三国时形成的杂号将军（护军将军）之一，为纯粹之武官。而护军制之“护军”，则超出了上述三种军事职官之范畴，成为国家地方行政机构及职官名。即是说，成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机构州、郡、县制的一种补充和特有的制度。[48]

护军制形成于曹魏时，《三国志·魏书》卷三○注引《魏略·西戎传》记：东汉建安十九年（214）曹操破马超，仇池氐酋阿贵为夏侯渊攻灭，其部众被曹操“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所谓“今”，当指曹魏之时。安夷、抚夷二护军设置的具体时间，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云阳县条记：“本汉旧县，属左冯翊，魏司马宣王抚慰关中，罢县，置抚夷护军，及赵王伦镇长安，复罢护军。刘、石、苻、姚因之。魏罢护军，更于今理，别置云阳县。隋因之。”抚夷护军治汉云阳县（今陕西泾阳西北三十里），系司马宣王（司马懿）抚慰关中时（231～236）所置。安夷抚军或也置于此时。抚夷护军是“罢县”而置，则其相当于县一级，且是军政合一的行政体制，与上述护军将军职官不同。

安夷、抚夷护军兼理民政，还可以从以下史实得到证明。史载曹魏正元二年（255），魏雍州刺史王经与蜀姜维大战于洮西（今甘肃洮河西），魏军大败。十月，魏诏书称：“洮西之战，至取负败，将士死亡，计以千数……其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二护军各部大吏慰恤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49]可见，安、抚二护军也征调兵民参战，护军所辖民户是有赋役的。

西晋建立后，由于全国统一，军事争战较少，地方动乱也少，军政合一的护军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故护军制没有得到推广和发展。但是，到十六国时，由于分裂割据，战争不断，内迁民族与汉族杂居错处，在这种形势下，十六国统治者，无论是汉族还是五胡，在地方行政体制上，除沿袭汉魏以来的州郡县制外，大多还采用了军政合一的护军制。具体情况如下表。

国名	护军名称	任职官员名	设置和沿革	资料出处
汉赵	抚夷护军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后赵	抚夷护军			同上
前凉	武街护军（今甘肃成县西北）	曹权、胡宜	置于东晋咸和四年（329）	《晋书》卷八六《张骏传》;《资治通鉴》卷九七
	候和护军（今甘肃临潭）		同上	同上
	石门护军（今甘肃迭部北）		同上	同上
	漒川护军（今甘肃洮河中上游地区）		同上	同上
	甘松护军（今甘肃临夏南）		同上	同上
	枹罕护军（今甘肃临夏）	李逵	同上	《晋书》卷八六《张重华传》
	宁羌护军（今甘肃庆阳）	阴鉴		《资治通鉴》卷九二
前秦	抚夷护军	杨佛狗		《宋书》卷八九《氐胡传》;《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中田护军（今甘肃张掖南）	沮渠法弘		《宋书》卷八九《氐胡传》
	冯翊护军（今陕西洛河西）	郑能邈（进）、苟辅		《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口产碑》
	宜君护军（今陕西铜川耀州东北）		置于前秦苻坚时，魏太武帝改为宜君县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

续表1

国名	护军名称	任职官员名	设置和沿革	资料出处
前秦	铜官护军（今陕西铜川）		后魏太武帝改为铜官县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
	三原护军（今陕西泾阳西北）		后魏太武帝神䴥三年（430）罢，改置三原县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云中护军（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贾雍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勇士护军（今甘肃榆中东北）	吐雷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
	甘松护军	仇腾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土门护军（今陕西富平）			《太平寰宇记》卷三一
后秦	抚夷护军		沿前秦置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土门护军		同上	《太平寰宇记》卷三一
	铜官护军		同上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
	三原护军		同上	同上书卷一
	宜君护军		同上	同上书卷三
	安夷护军	姚墨蠡	始置于曹魏，后秦沿之	《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
	安定护军（今甘肃镇原西北）	孙瓒		《北史》卷九二《孙小传》
后凉	中田护军	马邃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宋书》卷九八《氐胡传》作“临松护军”误
	北部护军（今甘肃合黎山北）	吕隆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续表2

国名	护军名称	任职官员名	设置和沿革	资料出处
南凉	邯川护军（今青海化隆一带）	孟恺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西秦	弱水护军（今甘肃张掖南）	吐谷浑觅地	东晋元熙元年（419）置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长城护军（今甘肃平凉西北）	焦亮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苑川护军（今甘肃兰州东苑川）			《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卷九
北凉	中田护军	沮渠亲信		《资治通鉴》卷一一三
西凉	抚夷护军	刘延明		《北史》卷三四《刘延明传》
夏国	长城护军			《资治通鉴》卷一二二
	吐京护军（今山西石楼）			《魏书》卷三《太宗纪》；同书卷三〇《楼伏连传》
仇池国	二十部护军		东晋太元十九年（394）置	《魏书》卷一〇一《氐传》

表内未列明确记有护军与太守、县令并置，或为军事职官方面的护

军。如前凉的大夏护军，[50]西凉的敦煌护军、骍马护军，[51]前凉的平虏护军、宣威护军，[52]前秦的平羌护军，[53]后凉的宁戎护军，[54]前燕的辽东护军等。[55]又由于十六国史籍散佚颇多，上表所列诸国以军统民的护军（即护军制的护军）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因史料的阙如，所记护军个别可能为其他类型之护军（领护、杂号等），这也是必须说明的。

不过，从上表看，十六国中，至少有十一个国实行了护军制，约占十六国的70%，而且它们基本是在西北立国或管辖到西北的政权。其中，以建国于陕西关中的前、后秦设置得较多且较为完备。有相当郡一级和县一级的护军，每一护军有一定的辖地，军政合一，领护氐、羌、匈奴屠各、卢水胡、吐谷浑、鲜卑等族或杂胡，且杂有汉族。即是说，护军多设置于各民族杂居和易发生动乱的地区。

关于护军制的建置，目前所见史籍阙载，仅可从现存的前秦建元三年（367）立《邓太尉祠碑》（原立于陕西蒲城县东北七十里东河川）所记前秦冯翊护军的情况中窥之一二。[56]据碑文记，曾任五年冯翊护军的郑能邀（进）所辖地区，“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鲜卑）、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兼统夏阳（今陕西韩城）治”。[57]至于冯翊护军的机构及属吏，碑文记有“军府吏属一百五十人”之众，有护军司马、军参事（3人）、军门下督（2人）、军主簿（11人）、军功曹（2人）、军录事（5人）、军功曹书佐（1人）、功曹书佐（2）人，以及少数民族部酋、部大等。碑文所列护军军府属吏共26人，肯定是不完全的，只占150人总数的17%左右。也即是说，护军制所设置的机构为军府。如果将护军制军府属吏与《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郡县一级属吏，以及军事职官“护军将军”属吏相比较，则护军制军府与护军将军之属吏更为相近。这说明护军制军府的机构与属吏与护军将军同，而无地方郡县官吏。这正突出了护军制以军治民、军政合一的特点。

护军制一直延续到北魏初，至太安三年（457），北魏才“以诸部护军各为太守”，[58]也即是废除护军制。但其残余直到魏文帝太和年间才彻底废止。[59]

除护军制外，十六国在地方行政官制上，还有一些特点，即十六国后期后秦、夏国实行的“大营”和“以城统民”的军政合一的地方官制。

羌族所建之后秦政权，其首领姚氏原居陇右，后赵石虎时，东迁滠头（今山东临清），石虎封其首领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后“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时姚弋仲领众数万，是军政合一的组织，以都督的名义统领本族（羌）为主的军队和六夷。后赵亡后，氐族苻氏建前秦，羌族姚氏率部先降东晋，后又归降前秦。苻坚淝水之战败后，姚苌起兵关中，杀苻坚，建后秦，与前秦残余陇右的苻登争战不息。据《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载：“苌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唯征虏齐难、冠军徐洛生、辅国刘郭单、冠军弥姐婆触、龙骧赵恶地、镇北梁国儿等守忠不贰，并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身将精卒，随苌征战。时诸营既多，故号苌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军营（诸营）可能形成较早，而大营之号始于姚苌与苻登相持之时。[60]大营、诸营是适应战争需要的以军统民、军政合一的组织；大营自然随姚苌迁徙，诸营则屯驻于军事重地或镇、堡，于是有“堡民”“镇民”的出现。

姚兴即位后，攻灭苻登，“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而“诸营”之名也渐废除。此后，姚兴安定秦陇，大封功臣，其官制也基本沿用汉魏之制。如史载，姚兴子弟或大臣镇守各地，以将军衔领州、郡长官（刺史、太守），或以都督某州（或数州）诸军事，领刺史、太守而已。然而，此时刺史、太守之类的地方职官已有名无实；都督诸州军事、将军等武职所兼地方民户，开始沿用“镇户”“堡户”之名，说明对他们的管理已具有“军管”的性质。到姚兴在位后期，甚至出现了直接用“都督……军事”或将军管辖“镇户”的情况，废止了名义上的州郡职官。如姚兴曾令“（姚）显都督安定、岭北二镇事”；陇东太守郭播曾上言：“岭北（指陕西礼泉九嵕山以北）二州镇户皆数万。”[61]姚兴还以铁弗匈奴勃勃（即赫连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62]因而，这种地方行政体制实际上已具有“军镇”之实，但至今未见军镇之名。[63]

又夏国虽然也沿魏晋制度，设诸州守宰，但此种州在前期不设郡县，不过是统军政的军镇，以城主（军镇主）统民。[64]

总之，无论是后秦以都督诸州军事或将军统民，还是夏国以城主统民，皆是军政合一，以军统民的军管性质，具备了军镇之实，可以说是盛行于北魏的“军镇”之雏形，也是五胡十六国时，各国相互争战，争夺土地和劳动力，徙民治民，加强对地方军事控制的产物。

四 小结

十六国的官制主要应是各国均承袭了汉魏以来的官制，其最高统治者称帝或称王，而按汉魏以来官制，从中央到地方设置相应的职官。而各国承袭汉魏以来的官制一般也有一个过程，大致在正式称帝、王后渐趋完善，且以军事职官最多，多由统治民族王族子弟及本族人担任，汉族贵族也参与政权，分任各种官职的人数也较多。

其次，在一部分五胡所建政权（汉赵、后赵、后燕、北燕）中，在承袭汉魏以来官制的同时，还并行“单于台制”，主管六夷，按匈奴旧制，以“万户”为单位，管理该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单于台一般设在京城或其附近，最高职位的大单于一般由储主担任，下设左右（或前后左右）辅、左右贤王。单于台制应是沿匈奴旧制而来，主要是统治六夷，与广大的晋人（汉族）分治。在十六国时，仅见史籍载有部分国家实行此制，且仅实行一段时间，最后废止。

最后，十六国地方行政官制中，较有特色的是护军制，以及以“大营”、城主统民的军镇制雏形。

如果按官制特点来分类的话，可将十六国官制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前凉、西凉、成汉、北凉、后凉、南燕，特点是基本承袭或全部承袭汉魏以来的官制。前凉、西凉为汉族所建；成汉是生活在内地的巴氐（巴人）所建，他们汉化较深；北凉、后凉系从汉族所建前凉政权中，先后分离建国的；南燕建国时间较晚，故承袭汉魏官制。

第二类：前秦、后秦、前燕、西秦、南凉，特点是在政权建设初期杂有不同程度的胡俗（如称“大单于”之类），到后期才基本上完善了汉魏以来的官制。

第三类：汉赵、后赵、北燕、夏国、后燕，特点是除了承袭汉魏以来官制外，还并行单于台制或杂有浓厚的游牧民族部落制因素（如夏国）。

十六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政治制度中的官制上承魏晋，下启南北朝、隋唐，在中国历史上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

（原载于《文史》2002年第1期）

[1] 早在清代以来就有学者辑录十六国将相大臣、百官，制作年表或表，如万斯同撰《伪汉将相大臣年表》《伪成将相大臣年表》《伪赵将相大臣年表》《伪燕将相大臣年表》《伪秦将相大臣年表》《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练恕撰《西秦百官表》，缪荃孙撰《后凉百官表》《南凉百官表》《西凉百官表》《北凉百官表》《夏百官表》《北燕百官表》，清洪亮吉撰《十六国疆域志》，对十六国地方行政官制有所叙述等。近现代以来，关于十六国官制的研究论著较多，见文后注释所引，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2] 关于十六国五胡政权最高统治者称“天王”的原因和情况，请参见日本学者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319～331页，筑摩书房增补版，1998；雷家骥《前后秦的文化、国体、政策与其兴亡的关系》，载台湾《中正大学学报》1996年第7卷第1期。

[3] 《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4] 以上所引十六国最高统治者名号，见《晋书》有关载记及传等，不一一出注。

[5]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6] 以上所引官名人名，均引自《晋书》有关载记、《魏书》有关传记、《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有关部分，不一一出注，下同此。

[7]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8] 见《晋书》卷九一《韦謏传》、卷八九《刘敏元传》。

[9] 魏晋太子东宫诸职官名及设置情况，见《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等，此不赘引。

[10] 见《太平御览》卷二七四引《前赵录》。

[11] 《水经注》卷四《沁水》。

[12] 可参阅本书第七章，拙作《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此书中有关于南凉、西秦政权封王及官爵的情况。

[13] 可参阅本书第七章、《南凉与西秦》中关于南凉、西秦、汉赵三国军事职官设置的详细情况。

[14] 本书第七章，《南凉与西秦》中对汉赵、南凉、西秦三政权地方行政建置有详细记述，并对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有关部分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可参阅。

[15] 赫连勃勃取长安后，雍州可能改治长安。

[16] 见《晋书》卷一四《地理志》“雍州”条；参见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一

六夏国。

[17] 见《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参见本书第206～207页。

[18] 见本书第202～203页。

[19] 见雷家骥《汉赵时期氐羌的东迁与返还建国》，载台湾《中正大学学报》1996年第七卷第一期。

[20] 见《南凉与西秦》，第85页，第208～209页。

[21] 见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创元社，1953。

[22] 见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

[23] 《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

[24] 《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

[25] 《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

[26] 《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按《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记，勒行帝事后，立世子弘为太子。又“署其子宏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封秦王”。而《石季龙载记上》又说，勒僭号后，以大单于授其子弘。则石宏、石弘似为一人，又或为两人，存疑。

[27] 《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

[28]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及《通鉴》卷九六。

[29] 《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附闵传》。

[30]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四年条。按此条《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失载，《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熙载记》云“燕台”为“北燕台”。

[31] 《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

[32] 《晋书》卷一二四《慕容宝载记》。

[33] 《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熙载记》。

[34] 《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条。

[35] 《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条。

[36]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胡注云：“太子领大单于始于刘汉，时置左右辅而已，跋增置前辅、后辅。”

[37] 《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条。

[38] 见《魏书》卷九七《冯跋传》。

[39] 《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

[40] 以上关于对单于台的论述，笔者参考了前人的论著，不一一列举（可见注释中所引论著）。

[41] 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42]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第13页。

[43] 王俊杰：《西秦史钩沉》，《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44] 高尚志等：《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第262页。

[45] 《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

[46] 《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

[47] 《北堂书钞》卷六四，“护军将军”条。

[48] 详细论述见拙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制》，《燕京学报》1999年第6期。

[49] 《三国志·魏书》卷四《少帝纪》。

[50] 《晋书》卷八六《张重华传》。

[51] 《晋书》卷八七《李玄盛传》。

[52] 《晋书》卷八六《张茂传》；《太平御览》卷三一引《前凉录》。

[53] 《资治通鉴》卷一○○，晋穆帝升平三年条。

[54]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55] 《芒洛四编补遗》录《后魏石育墓志》。

[56] 又现存前秦建元四年立《广武将军□产碑》提到“抚夷护军”，但非碑主□产之职，而是其父“抚夷护军、扶风太守”，碑文记□产属僚有军事和郡县两个系统官吏，故不能作为研究护军制的依据。详细考证见上引拙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制》，载《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57] 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对其辖地及所统各族之分析，中华书局，1985。

[58]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59]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真宁县条记："后魏置泥阳、惠涉二护军，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复置阳周县。"

[60] 关于大营，可参见关尾史郎《"大营"小论——后秦政权（384～417）之军事力和徙民措施》，载《中国古代法与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8。

[61] 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卷一一七、一一八《姚兴载记》。

[62] 《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

[63]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五《后秦》，列有六个军镇名，序言中说："甚者姚苌以马牧起事，故崇镇堡之势，以敌方州。"按其所列后秦军镇名，有的为地名，有的为撰者所加，故不足信。

[64] 参见拙著《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第96页。

索引

A

安定 009，012，015，041，053，094，119，123，132，139，140～142，146，167，169，186，195，198，200，240，259，285，303，307

安夷护军 094，303

B

八门城 223

八王之乱 042，044，046，049，069，070，216，220

巴氏 052，053，055，056，133，207，297，309

拔弈虚 014

白波 007，008，011，254

白波部 007，008

白部鲜卑 078，085

白马铜 007

白屋 008

百顷氐王 148

板桥 071，256

薄盛 071，079，106

北部 012，023，024，027，059，060，064，085，090，124，126，138，185，236，255，278，303

北部都尉 024，027，059，060，236，255

北地 005，015，036，039，040，041，112，115，119，167，198，200，255，258

北宫纯 092，132，178，226，246

北燕台 212，291，294

卞敦 158

弁广明 139，181，246，276

并州之胡 016，017，041

帛成 162，191，248

勃蔑种（勃茂种） 016

卜崇 118，190，241

卜抽 114，118，191，241

卜幹 118，180，241，273

卜珝 097，098，180，182，183，189，192，227，230，241，257，268，273，278

卜豫 069，183，223，240，278

部曲 012，013，018~021，030，032，033，036，037，053，148，216，218，221

C

曹操 008，009，011，012，016，020，031，052，065，138，207，254，300，301

曹超 077

曹光 185，246，280

曹丕 009，010，013，254

曹平乐 134，135，248

曹武 078

曹恂 129，143，144，175，179，180，186，246，266，272，275

曹嶷 080，085，087，092，104，108，114，118，121～123，129，138，158，177，189，195，200，201，244

草壁 139，140，259

朝歌 164，197

车敬 231

车纽 006，007

陈安 141，142，148，149～157，187，209，224，228，231，246，259，281

陈集 149

陈泰 021

陈午 093

陈休 118，183，245，258，278

陈元达 064，066，103，104，114，118，119，174，177，181～183，197，206，227，230，233，240，257，258，267，268，274，277，286，300

陈珍 155

成都王颖 024，046 ~ 048，050，055，057，060 ~ 063，065，066，068 ~ 070，083，113，216，217，255，256

成皋 085，115，128，160，164，165

成皋关 085，160，164

程遐 164，270

赤勒种（赤勤种）

赤沙种 015

仇池 138，140，148，156，160 ~ 163，170，198，212，221，259，260，301，304

楚王玮 045，046

淳于定 078

賨人 052

崔浩 231

崔鸿 002，122，167，169，279，288，289

崔旷 087

崔琨 160

崔玮 099，100，113，175，245

崔宣 161

崔懿 058，064，066，129，179，181，203，243，272，274

崔懿之 058，064，066，129，179，181，203，243，272，274

崔游 058，064，066，174，202，203，229，243，286

崔岳 143，144，175，180，186，192，246，266，273

D

大单于台 212，291，294

大豆得一 014，255

大胡 165

大陵县 012

大楼种 016

大于城 223，252

代郡 005，006，085，086

单于庭 004，062，206，254，290，294，295

单于左右辅 081，108，205，257，289，295，296

单征 073，080，207，249，256

当户 011

当于骨都侯 005

邓艾 013，038，254

丁零 002，008，016，243，249

丁令 013

丁绍 072

丁原 007

定襄 005，097，186，244

东海王越 046，048，049，061，069，070，077，078，086，087，088，256，257

东胡 002，036

东瀛公腾 022，061，062

董景道 144，180，181，184，232，247，275，276，279

董卓 008

都督部大 073，208，249

都尉 016～018，024，027，028，040，059，060，066，076，077，108，149，172，190，205，207，211，219，236，255，257，289，296，300

窦涛 162

独雍 014，255

杜蕤 084

杜佑 025，028，062，178，269

度元 040，255

段郴 004，010

段繁 100

段广 045

段疾陆眷（一作就陆眷）

段匹磾 102，111，124，125，129，147，258

段务勿尘 078

E

鹅城 223

阏氏 010，233

F

樊氏 121，130，233

范班 100

范龛 123，248

范隆 058，064，066，095，103，105，114，128，130～132，174～179，182，183，202，203，229，243，265，266～268，270，272，277

范阳王虓 070

氾祎 154

枋头 101

飞狐口 124

飞龙山 078，079

费也头 025

封云后 055

酆明观 144～146，259

酆水囿 145，221

冯君实 197，204，210，213，288，298

冯莫突 073，207，208，249

冯嵩 086

冯统 045

冯翊 015，040，041，084，091，094，103，112，115，120，194，200，255，301，302，305

佛图澄 164

苻坚 169，231，263，286，287，302，303，306

傅虎 100，191，194，245

傅玄 031，032，038，039，090

傅询 079，244

傅恂 180，272

傅祇 088，090，099，176，265

G

高幹 008，019，254

高乔 099，100，190，245

格增 128

葛薄 123

葛陂 093，098，101

耿滕 053

弓钦 054

公师藩 055，069，073

公师彧 058，118，182，184，230，231，245

公孙藩 069

苟太后 231

苟晞 055，069，072，073，086～088，090～093，111

骨都侯 010，011

官渡之战 008

管涔山 143

贯志 147

光初 134，138～140，145～148，151，153，156，158，159，162，163，166，198，201，205，209，221，225，258，259，260，289

光禄塞 004

光兴 084，088，201，217，257

郭敖 164，270

郭迈 115

郭默 080，091，099，107，112，125，127，128，140，159，160，161，196，197，219，257，258，300

郭钦 015，041，042

郭汜 008，134，175，246，266

郭诵 125，128，159

郭阳 022

郭猗 116～118，245，280

郭颐 083

郭彰 046

H

韩广 157，247

韩弘 123

韩据 106，124

韩璞 154，155，162，163

韩氏骨都侯 005

韩述 077

韩暹 008

汉昌 130，201，258

汉宣帝 004，279

捍蛭种（捍蛏种）

郝散 040，041，242，255

郝诜 099

郝聿 099

浩（一作诸）衍 097

何曾 034

何桢 040

和苞 058，122，128，134，143～146，153，169，180，182，186，230，246，259，273

河间王颙 046～048，053，060，068，069，083，217

河瑞 076，080，201，204，256，257

贺赖种 016

黑狼种 015

黑难 014，015，254

黑匿郁鞠部 156，157，207，259

黑山 008，011

黑山部 008

弘农 015，041，078，079，120，124，140，159，194，199，

232，242，246，285

洪亮吉 193，262，284，285，308

侯如 084

侯脱 087

呼厨泉 008～010，013，020，022，023，254

呼韩邪单于 004，010

呼韩邪单于比 010

呼延颢 078，191，241

呼延朗 079，188，241

呼延那鸡 162，188，242

呼延青 152，153，191，242

呼延寔 149，177，191，242，247

呼延氏 011，057，064，084，095，103，232，242

呼延翼 064，075，078，082，174，175，186，241，266

呼延攸 061，082，083，183，241，278

呼延瑜 149，191，242

呼衍骨都侯 005

胡都大博 014，255

胡奋 027

胡汉分治 205，209，210，211～213，227，288，294，297，298

胡烈 039

胡崧 116，120，132，179，226，246

胡太阿厚 014，255

胡勋 166，179，248

胡元 155，183，222，247，278

壶关 008，076，077

护军 037，069，077，078，081，094，099，114，117，154，155，162，190，191，200，241，243，282，299 ~ 306，309

护羌校尉 036

华荟 127

华辑 120

槐里 120

皇甫阳 119

黄巾起义 007，009，011，017

黄烈 226 ~ 228

黄石屠各 139，258

黄肃 077

黄秀 162，191，248

惠帝 032，035，040，045 ~ 049，052 ~ 054，059 ~ 064，068 ~ 070，089，106，144，150，217，242，255，256，273

浑邪王 004，024

J

箕澹 100，124

稽胡 025，228

汲桑 055～057，069，072，256

棘津 101

纪瞻 098

嘉平 013，023，038，057，091，095，097，100，103，107，110，113，123，126，173，174，176，179，193～197，201，202，205，217，221，222，254，257，258，288，299

贾浑 068，069，168，242

贾谧 046，060

贾模 046

贾南风（贾后）

贾疋 094，095，098，102，218，257

贾胤 078

简令 100，191，248

渐将王 011

建元 003，113，116，124，200，201，258，305

江统 007，009，013，016，017，036，040，041，042，255

姜冲儿 152，153

蒋英 166，191，248，260

焦嵩 119，120

羯胡 016，021，025，036，055，056，069，073，203，207，249，288，296

解虎 141，246

解系 040

介休 062，068，071，168，256

金墉城 047，140，160，164，260

晋武帝司马炎 030

晋阳春秋 223

晋阳秋 022，223

靳冲 097，098，181，189，241，276

靳康 131～134，188，226，241，258

靳陵 096，183，241，278

靳明 131，133，134，178，187，241，270

靳准 022，114，116，117，121，125，126，129，130，131～133，135，157，175，177，187，191，197，199，226，241，242，258，266，269，281，282

京兆 006，015，041，084，094，103，105，120，194，200

井陉 071

句龙王吾斯 006

句渠知 142，207，250，297

句徐 141，159，160，186，191，207，209，224，250

K

康平 159，191，247，259

康相 122，123，125，181，246，276

孔苌 101，106

孔恂 058，059

寇头种 015

库彭 141，207，250

L

兰谷 100，106

兰氏 011，028，242

郎氏骨都侯 005

乐平 009，015，072～124，200

离石 006，007，023，059，060，062，063，065，069～071，074，099，172，194，223，237，254～256

离石将兵都尉 059，255

黎亭 069，223，256

黎阳 008，076，079，256

李含 047

李弘 095，183，244，277

李景年 077，106，186，190，194，241

李矩 022，091，112，115，124～128，132，140，141，159，160，161，199，219，242，246，258，259，279

李傕 008

李恪 023，027，040

李流 052，053，054

李茂 077

李平 115

李特 052～056，255，297

李威 231，270

李熹 059

李庠 052，053

李雄 054，070，104，123，156，256，263

李永 166

李恽 071，079，087，106，111

李稚 156

力羯种 016，025

栗籍骨都侯 005

梁芬 092，102，105，183，245，277

梁伏疵 100，191，249

梁巨 080

梁肃 094，103，115

梁纬 119，120

梁习 012，018，019，020

梁勋 148，186，247

梁余 077

梁综 094，103

临深 098，100，101

灵昌津 164

灵台 120，139，276，285

陵霄台 144

陵修 116，185，245，280

令狐泥 099，100，190

令狐盛 099

刘安国 081，083，185，190，239

刘豹 003，012，013，022，023，025，027，059，172，254，255

刘伯根 055，069，256

刘粲 022，084，085，086，092，095，098～100，106，112～114，116～119，125～128，130，131，140，174，176，177，185，187，188，199，201，205，222，226，233，237，238，245，246，258，265，269，281，289，295

刘操 096，186，188，237

刘禅 064，065

刘阐 186，238

刘敞 238

刘乘 082，083，180，239，273

刘持 096，186，237

刘冲 186，238

刘聪 022，023，062，066，074，075，077，078，080～089，091～108，110～132，135，143，144，156，158，161，173～179，184，185，187，188，192～199，201，205，206，217，

219，220～224，226～233，236～246，249，257，263，266，267，269，271，282，286，288，289，294，295，296，299，300

刘惇 076，077，117，177，244

刘娥 103

刘丰 099，100，189，190，194，239

刘敷 096，114，118，121，186，187，237，281

刘榦 152

刘高 186，238

刘翰 111

刘和 075，081～084，176，185，187，191，229，236，257，267，281

刘黑大 160

刘宏 062，064，066，069，172～174，202，239

刘鸿 096，186，237

刘厚 139，156，188，189，221，240

刘虎 025，078，085，086，186，239，257

刘欢乐 075，080，081，175，178，185，239，265，266，270

刘徽 186，238

刘会 088

刘骥 096，129，130，131，176，177，186，187，188，237，267，269，281

刘俭 186，238

刘颉 127，240

刘景 063，071，075，076，078，088，095，108，130，172，173，175，176，182，185，189～192，197，239，256，265～268，283

刘敬 002

刘靖 003

刘矩 079

刘均 144，146，161，175，177，179，181，232，247，266，272，276

刘俊 075，185，239

刘悝 084，186，189，237

刘琨 022，023，070～072，076～078，080，085，086，090，092～094，096～101，103，104，106，110，111，112，115，124，125，129，192，195，219，220，256，257，258

刘朗 162，186，190，237，248，260

刘厉 079，186，190，239，266

刘烈 149

刘灵 073，076，080，188，189，195，219，243，256

刘隆 075，081，178，185，236，270

刘鸾 096，186，237

刘劢 096，129，175，177，186，237

刘茂 134，135

刘猛 003，027，039，040，041，255

刘敏元 177，180，248，272

刘默 089

刘钦 040，069，081～083，185，190，239，256

刘权 096，186，237

刘儒 100，191，248

刘锐 082，083，183，185，239，277

刘瑞 093

刘盛 081～083，190，239

刘摅 096，183，186，239，277

刘述 163，175，186，187，240，266，281

刘绥 143，144，175，180，182，185，186，247，266，268，275，280

刘暾 090～093

刘熙 157，166，167，169，229，238，260

刘遐 158

刘咸 154，166，174，178，186，266，269

刘雄 065，113，175，236

刘宣 018，027，060～066，075，172，174，202，229，236，255，265

刘璿 081，083，185，190

刘勋 127，128，191，240

刘牙 152

刘雅 092，094，119，127，128，132～134，139，140，142，175，176，182，186～189，231，239，265～268

刘延年 063，075，080，081，095，097，108，172，173，175，176，178，185，230，236，265，266，269

刘演 098，100，101，106，107，124，195

刘洋 075，080，081，176，185，239，267

刘曜 022，023，026，064，066，068，075，078，080～082，085，087，089～092，094，095，098～100，102，106～108，111，112，114～116，119，120，122，124，130～136，138～167，169，170，173～177，181，182，185～188，190，192～194，197～202，205～209，219～232，236，238，240，242，246～250，257～260，263，265，267，282，289，294，295～297，300

刘乂 080，083，113，116，117，121，125，175，185，188，194，204，205，224，227，233，236，258，266，285，288，289，295

刘易 084，105～107，115，118，119，174，175，185，187，237，258，265，266，281

刘毅 035

刘翼 084，099，186，188，237

刘殷 072，081，088，095，096，099，103，175～178，180，182，233，243，256，257，265，266，268～270，273

刘胤 156，157，162，166，167，169，176，177，178，180，184，186，188，205，238，260，267，269，273，279，289

刘英 095，103

刘舆 070

刘裕 075，081，175，185，236，266

刘渊（刘元海） 002，003，016，018，022～028，037，042，050，051，055～066，068～083，097，121，122，131，135，

136，143，144，150，158，161，167～169，172～174，184，192～195，201～204，206，207，217，218，223，224，226，229～231，236，237，252，255～257，263，286～288，294，295

刘约 121，130，186，187，238，281

刘终 145，146，182，247

柳纯 111，248

六修 100，124

六夷 081，082，108，173，205～211，224，257，259，289，296～298，306，309

楼裒 079

卢谌 022，113，177，245

卢水胡 025，036，040，094，102，195，197，224，249，255，296，305

卢志 099，100，113，114，184，245，279

鲁徽 111，112，177，245

鲁凭 149，177，247

鲁繇 092，185，195，248，280

鲁允 119，120

陆逐延 073，207，249，256

录尚书六条事 108，178，202，236，269

逯明 123，268

路述 074

路松多 139，140，152，258，259

挛鞮氏 003

掠迁人口 220，221

罗尚 053，054

闾和 047

吕毅 078

略阳 052，084，148，200，208

M

马岌 154

马景 069，081～083，095，103，108，175，176，178，190，243，266，270

马兰羌 040，255

马隆 039

马腾 008，048，050，057，061，062，068，069，070，072，256

冒顿 002，003，025，028，135，136

美稷 004，006，007，010，062，254

盟津 115

孟津 015，041，088，099，115，127，160

渑池 085，141，159，160，161

愍怀太子 046

末柸 102

牟穆 100，101

慕容廆 065，110，125，169，293

慕容鲜卑 036，138

N

南部 005，012，072

南阳王保 102，105

南阳王模 090，091，257

内田吟风 003，017，028，156，288

聂玄 068

欧阳建 040

P

庞宗 034

裴盾 088

裴楷 046

裴邈 085

裴诜 116

裴頠 046，144

裴宪 079，134

裴整 080，179，244

彭荡仲 095，195，197，249

彭默 078

彭天护 249

蓬关 093

平先 152，191，247

平阳 007～009，015，020，041，072，074，075，078，079，081～083，085，087，089，090，092，095，098～103，106～108，113，115，120～124，126，128，132～134，138，193～196，198～200，204，206，219～223，225，246，254，256，257，258，288，294，300

蒲坂 074，091，106，112，115，163，198，219，256，257，285

蒲洪 084，139，186，207，208，249，258，293

蒲子县 012

普根 100，106

Q

齐万年 037，040，041，052，148，217，255

齐王冏 046～048，060，083，216

祁济 071

祁县 012

綦毋达 076，118，177，189，241，268

綦毋豚 069，191，240，256

乞活 071，072，079，093，106，218

牵弘 039

牵招 020

羌渠 007，016，025，254

羌渠单于 007

羌渠种 016

乔诗 121，181，241，274

乔晞 068，168，188，240，242

乔豫 145，146，148，180，182，186，227，241，259，273

乔智明 081，106，107，183，188，194，241，257，277，295

且渠 011

亲汉王 073，186，208，249

丘光 079

丘林氏 011，026

丘沈（刘尼）

丘中伯 152

麹昌 119

麹鉴 107

麹特 094，095

麹允 034，094，102，103，105～107，112，115，116，119，120

去卑 008，009，013，020，025，078，254

R

任𫖮 081，095，103，105，108，175，176，178，244，265，266，270

任义 163，181，248，276

任祉 071

日逐王 006，007，011，173，242

汝南王亮 044，046，049

阮种 038，039

S

塞泥 014，015，254

桑城 140，141，150，151，259

山简 084，086

上党 009，015，022，040，041，058，059，068，071，073，074，076，077，079，085，102，106，108，115，123，160，186，200，229，256，258，286，292，297

上党武乡 022

上郡 006，015，041，073，075，115，134，142，159，160，185，200，207，208，220，221，226，239，259，305

邵举 102

邵续 147，218

沈约 178

施融 077

石冰 055

石崇 033～035

石聪 160，161，164，165，259

石琮 154，276

石弘 206，265，267，289，290

石虎（石季龙）093

石堪 164，165

石勒 016，021，023，026，055～057，069，072～080，084～090，092～094，098，101，102，104，106，108，110，111，114，115，118，121～124，12～136，138，140，141，146，147，158～167，169，176，177，180，186～189，191，192，194，195，199～201，206～208，212，219，222，224，225，228，236，245，246，248，249，256～258，260，263，267，273，275，276，279，281，284，289，290，294～296

石容 152

石邃 164，269，273，275，281，283

石他 159，160，166，224，259

石鲜 069

石宣 206，282，294，295

石越 121，124，280

石瞻 158，164

尸逐骨都侯 011

使匈奴中郎将 011，192

士猗 047

寿春 079，098，101，158

寿陵 145，146

树机能 023，039，040，041，059

司隶寺 196，197，300

司马保 090，105，116，120，138，139，141，148，149，

153，258，259

司马炽（晋怀帝）

司马模 070，078，092，094，111，149，153

司马睿 090，098，105，122，123，125，128，129，132，258

司马师 013，045

司马覃 047

司马炎 030，043，045，046，095

司马邺 095，246

司马攸 045，046

司马瑜 069

司马瞻 141

司马昭 043，045，058

肆卢川 086

松多川 139

宋抽 074，078

宋辑 162

宋始 140，141，182，199，277

宋恕 140，191，246

宋亭 153

宋哲 124，125

叟 052，166

苏峻 218

苏恕延 086

孙辅 047

孙会 047

孙机 166

孙权 012

孙盛 022

孙秀 040，047，275

孙询 079

索綝 094，095，103，105，107，111，115，116，120，173，244

T

台产 161，177，179，181，182，184，186，232，247，259，268，276，280

太原 009，012，015，017，021，041，058，068，071，099，135，151，186，200，238，290

檀石槐 011

唐长孺 016，022～024，026，028，040，044，056，207，220

桃豹 106，164

田徽 106，111

田客 018，020，021

田兰 071，072

田密 083，178，244

田崧 155，156，160，183，189，198，247，259，277

田歆 118，178，245

田甄 071

铁弗匈奴 025，085，086，138，239，307

头曼 025，028

秃发树机能 023，040，059

秃发鲜卑 025，039，211

屠各种 015，025，028

屯留 058，068，077，256

拓跋鲜卑 025，036，062，069，085，086，097，099，106，124，138，256，257

V

万斛堆 039

万斯同 173，262

W

王斌 048，079，111

王昌 102

王澄 086

王端 092

王奋 160

王广 066，077，107，198，248，275

王犷 148，179，192，247

王浑 035，058，059

王济 034，058，125

王鉴 114，129，178，245，270

王俊 091，182，268，298

王雋 103，244

王恺 033，035，273

王堪 076，079，080

王旷 077

王璃 087

王连 139，140

王弥 022，055，056，058，059，069，072～074，077～080，085，087，089，090，092，093，098，177，180，186，188，189，192，193，195，200，217，219，243，244，256，257，268，273，285

王戎 033，034，046，088

王如 075，079，084～087，257

王桑 074，080，088，098，100，101，108，181，189，195，243

王申始（王甲始）

王沈 049，086，116，118，119，125，126，129，180，245，258，275

王石武 150，151，186，189，192，198，242，259

王腾 071，111，133，160，161，187，246，259，267，270，275，281，282，285

王秃 095

温禺鞮王 011

王象 102，111

王修 134，276

王恂 020，032

王延 090，118，129，131，132，182，242，245，268

王衍 074，087，088，257

王琰 118，178，245

王舆 047

王郁 010

王育 072，081，088，095，103，108，175，176，178，180，243，265，266，270，273

王瓒 093

王彰 095～097，103，105，174，186，187，188，244，266，281

王骘 159

王忠 143，144，180，186，191，199，247，275

王擢 024，150

王子春 110

韦谀

萎沙种（萎莎种、秃童种）

萎莎胡 014，255

卫操 022，023

卫瓘 046

卫雄 100，124

渭汭 111

魏该 091，115，162，219，257

魏郡 015，041，076，079，106，200，219，256，290

魏浚 091，107

魏收 023，201

文石津 085，086，101

文鸯 102，124，277

沃干岭 162

乌桓 006，011，013，036，297

乌谭种（乌檀种）

吴士鉴 089，134，162，176

五郡屠各 023，026，167，228，260

五溪蛮夷 014

五原 004～006，307

武关 095

坞堡 054，168，218，219，221，226

坞主 080，091，218，219

西河 004，006，007，009，010，015，041，059，062，068，104，106，108，132，197，198，200，223，248，254，256

X

西河郡 004，068

郗鉴 158

奚官 142，224，278

徙戎论 009，017，036，041，255

夏阳 006，073，115，159，200，305

鲜支种 015

襄城 055，079，087，094，158

襄国 101，102，110，111，123，124，134，135，161，164～167，170，195，199，206，228，257，260，278，290，295

向冰 101

逍遥园 105，107

萧方 152，229

辛宾 127，179，246

辛亥制 147

辛谧 092，182，249

辛氏 120

辛恕 166，191，248

辛岩 162，163

辛晏 162，163，186，191，248

新兴 002，009，012，015，023，025，027，078，083，085，100，200

新野王司马歆 054

信都 079，102，111，292

邢延 100，191

匈奴右部醢落 007

休屠各（休屠、休著屠各、屠各）

休屠王 004，024～026，028，139，150，151，192，198，259

须卜骨都侯 007

须卜氏 011，026，242

虚除权渠 142，186，189，207，208，249

虚连题氏 003，022，028

徐光 164，166，272，273

徐龛 158

徐润 099

许遐 099，100，113，176，245，265

选曹尚书 108，179，202，271

宣怀 116，129，180，245，258，275

宣于修之 075，079，181，243，276

泫氏 068，256

荀藩 090，091，095，102

荀勗 045

荀裕 114，185，245，280

荀组 102

Y

延津 076，085，087，101，164

严嶷 084，087

阎粹 022

阎鼎 095，102，103

阎综 102

厌次 147

雁门 005，009，011，013，020，064，075，159，186，241

羊升 133

羊皇后 135，150

杨伯支 152，153

杨春 149

杨次 141

杨飞龙 148

杨坚头 148，156

杨驹 148

杨骏 045，046，049，060

杨曼 139，140

杨难敌 148，156，160，162，163，180，186，187，192，198，250，259，273，281，284

杨千万 148

杨太后 045

杨韬 141，148，186，247

杨腾 148

杨戊搜 148

杨像 119

杨欣 039

杨珧 058

姚弋冲 153，186，189

邺城 019，048，055，060，069，070，072，098，101，106，216，217，255

一泉坞 091，115

伊安 140

伊余 143，220，226，228，259

猗卢 062，085，086，097，099，100，106，124，194，257

猗尼渠余国 122

猗㐌 62，69，256，257

宜阳 014，078，085，089，091，254

义从 012，018，019

义阳蛮 055，056

阴监 140

阴密 139，140，142，259，285

荫户 031，032

殷凯 112，184，245，279

尹车 141，191，224，246，284

尹矩 164

尹平 159，199，247

尹周 132，199

颍川郡 006，079

雍屈种 016

永凤 075，076，175，201，219，256

永光陵 081

勇力吏兵 018

游纶 102

游子远 141～144，146，151，175，177，182，187，208，224，226，246，259，266～269，282

右部 007，012，066，083，084

右谷蠡王 010，011

右司隶 108，127，196，197，199，202，205，221，223，257，258，288，299，300

右贤王 005，006，008～011，013，020，025，027，039，060，063，064，078，084，148，161，172，173，205～208，212，224，236，254，255，259，289，295，296，309

于扶罗 007～009，012，022，025，254

俞容 116，180，245，275

宇文鲜卑 025

庾珉 091，103，127，182，244，268

郁鞞种 015

郁鞠 156，157，180，190，207，209，242，259，275

育鞠 014，255

薁鞬日逐王逢侯 006

豫章王司马端 090

元熙 064，069，070，072，074，201，223，256，304

垣延 078

袁孚 080，111

袁绍 007，008，254

袁术 008

月光 114

月华 114

月氏 002

云中 005，065，303

Z

臧曼 011

翟楷 154

占田法 031，032，034

张宾 077，093，098，101，110，177，286

张豺 102，265，269，283

张昌 054～057，065，255

张春 140，141，151，259

张纯 005，007

张方 048，049，068，089，216，217

张风 101

张伏利度 073，224，249

张辅 034

张轨 090，092，120，155，159，263

张泓 047，216，276

张华 046，053，083，141，270，274

张徽光 103

张进 164

张敬 132

张骏 159，162，163，187，260，264，281，302

张阆 162，163，186，191，248

张离 147，270，285

张隆 022

张茂 154，155，159，175，176，180，186，192，198，249，259，265，267，273，304

张明 149

张皮 128

张平 100，191，248，281

张乔 099

张劭 045

张寔 096，103，140，141，154，182，191，199，244，263，268

张嵩 090，093

张损 040

张侚督 073，186，207，208，249，256

张杨 007，008

张倚 077

张𫖮 139

张肇 112

长广山 069

长沙王乂 046，047，048，060，113

长子 068，077，100，238，256

赵固 078，080，085，086，088，098，100，101，108，126～128，140，189，194～196，199，244，246，257，258，300

赵罕 149

赵牢 152

赵募 149，152，153

赵拟 077

赵泉 231，273

赵染 091，092，094，106，107，111，112，177，189，244，245，257

赵慎 140，191，246

赵王伦 040，046，047，053，216，217，301

赵廞 053

真树种 016

支雄 101，102

郅支单于 004

中部 012，305

中都 068，256

钟跂种（钟跂种）016

钟繇 008，175，265

钟渊映 201

周良 069

周振 126，127，177，246

朱诞 076，118，183，243，278

朱纪 058，064，066，081，083，095，103，105，108，130～132，142，175～179，181，182，202，203，229，243，266，268，269，270，272，276

竺恢 094，119，120

竺爽 119

壮鸷 092

兹氏县 012

赀虏 025，296

宗敞 120

宗氏 068，242

宗王出镇 044

祖逖 147，158

祖约 158

左、右于陆王 172，173

左部 006，012，013，023，027，028，040，057，059，062，083，172，254

左部城 028，062

左部督 023，027

左部帅 013，023，027，040，057，059，172，254

左独鹿王 063，172，173

左谷蠡王 011

左国城 007，062～064，065，071，221，254，256

左国史 183，184，230，245

左南将军 005

左司隶 108，114，196，197，230，240，300

左贤王 011，012，022，023，027，060，061，066，148，157，172，173，209，242

后记

本书完稿于1985年初，1986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2000册。至2006年5月，本书又被编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之中，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本书从正式出版至今已三十多年。记得三十多年前，我曾寄送此书一册与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求教，先生赐函鼓励：“盼能再接再厉，写成十六国史新编，于学术界大有裨益，不仅为崔鸿之功臣而已也。”先生的鼓励时在心间，然要完成“十六国史新编”，非一人之力所能及，且诸多条件也未成熟。因此，直到今年初，由笔者发起、主编的这套“十六国史新编”丛书，得到包括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家蒋福亚教授等一批学者的支持，又承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该丛书列入出版规划，即将陆续面世。

于是，这本《汉赵国史》就列入“十六国史新编”丛书之中。此次再版，除了改正一些字句错讹之处外，基本保持原书的观点及内容，按丛书要求增加了索引，并将笔者2002年发表在《文史》上的《十六国官制研究》一文，作为附录，忝列于后。笔者深知，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此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望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周伟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赵国史/周伟洲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6

（十六国史新编）

ISBN 978-7-5201-4520-6

I.①汉… II.①周… III.①中国历史-前赵 IV.①K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9593号

·十六国史新编·

汉赵国史

著者/周伟洲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丁凡 李淼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城市和绿色发展分社（010）593671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0.875 字数：243千字

版次/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4520-6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装帧设计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Telephone 010-59367109

汉赵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内迁少数民族匈奴在内地建立的政权，也是十六国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在西晋末年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汉赵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使其京都平阳、长安地区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本书根据现存史籍和文物考古资料，论述了东汉末年以来内迁匈奴的活动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叙述了汉赵国兴衰的历史，并对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做了大胆探讨。

近又转到大著《汉赵国史》，不胜钦服。盼能再接再厉，写成十六国史新编，于学术界大有裨益，不仅为崔鸿之功臣而已也。

——周一良

汉赵国史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4520-6
9 787520 145206 >

定价：69.00元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合为一家



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

吴洪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合为一家

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



吴洪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周伟洲

副主编 王欣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宏 于志勇 马强 王欣 方铁

尹伟先 石硕 厉声 刘国防 李大龙

李范文 杨圣敏 余太山 张云 苗普生

罗丰 周伟洲 高永久 韩香 樊明方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西部边疆地域广袤，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代丝绸之路贯穿其间，东西方四大文明荟萃于此，故近代以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区域，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学术领域和“热门学科”，诸如藏学、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学、中亚学、丝路学等，代表并引领着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潮流，成为多种学科的活水源头。历史上，西部边疆各族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成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新形势下，西部边疆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焕发了新的活力，边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进。然而，处于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在当今的新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西部边疆地区面临中南亚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西方势力插手中南亚事务的意图越来越强烈，中南亚一些国家内部事务也日趋复杂化，民生问题、毒品问题、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突发事件频发。这也与我国的能源安全、边疆安全息息相关。又如，西部边疆地区大部分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不合理的开发极易造成环境的恶化；而西部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滞后，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西部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总之，无论从边疆学及其他世界热门学科的继承和发展，还是从现实西部边疆面临的复杂局势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来看，西部边疆研究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边疆学是从多学科角度对边疆开展综合研究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在传统边疆史地研究、民族研究的基础上，将边疆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知识和理论，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对边疆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展开多角度考察，以揭示边疆形成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全面科学地认识边疆的现状，更好地服务于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边疆的和谐稳定、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有鉴于此，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组织编写“西部边疆研究丛书”。这套

丛书是在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13年改建为“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创办的“西北民族研究丛书”改版之继续，基本保持原丛书的风貌及宗旨：以编辑出版那些探讨古今（特别是当今现实问题）与西部边疆（主要是新疆、西藏，兼及西部其他边疆地区）相关的学术专著为主，酌情收录有价值的资料汇编、译著等。由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审定选题、书稿及联系出版事宜，并面向全国（包括港台）及世界各国学术界征稿。我们仍然殷切希望本套丛书能一如既往地继续得到中外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批评。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6年11月

- 绪论
- 文本 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认同
    - 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 国号与国人
    - 铁弗匈奴的自我认同
    - 铁弗匈奴的民族心态
    - 吐谷浑的“中国”认同
    - 前秦苻氏的民族认同与史书编纂
    - 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 图像 北魏佛教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 服饰、姓氏与民族认同
    - 官方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 非官方佛教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 造像中民族认同的时空特点
- 参考文献
- 后记

绪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代建构的产物，但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同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再加之，从群体视角看，民族认同是衡量民族关系的一个指标，同时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关系到一个政权或国家的政治稳定与长远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考察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就非常必要。

十六国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之一，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十六国北朝时期也是多元文化激荡的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民族与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这一时期民族认同的具体表现及特点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在这一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混居杂处、冲突融合的现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一历史现象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书以十六国北朝这样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时期的民族认同为研究对象，以下两个方面也是主要考虑因素。

（1）两汉以来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以长城为界线的农牧分界和华戎分界被打破，两种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杂居生活在同样的生活空间里，政权更替和人员迁徙频繁无序，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互相之间的那种来自民族认同的不安全感时时威胁着每一个人。（2）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明在东汉时期的传入，也给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力的冲击，内迁游牧民族积极主动地扶持、崇信此宗教，以此作为与儒家文化抗衡的一个思想武器，使得儒家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认同”一词原本是一个哲学意义的概念，后来被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引用到心理学上：“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1]随着认同研究的深入，“认同”概念开始走出

单一的心理学研究视角，进入广泛的人文和社科领域，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大流行词，并聚焦于民族、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国内外学者对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民族认同”这一词语中的“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通过辨别和取舍，在情感上、意识上、行为上与他人或某一群体连接为一体的一种动态的心理过程。它既包括对本民族的认同，同时也包括对他民族的一种接纳与认可。简单地说，认同就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下，认为自己是属于某一个社会群体的情感表达，主要表现在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成见与歧视等几个方面，基于这样的认识，现将十六国北魏时期有关民族认同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本书的论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文本资料为主探讨十六国时期各个民族的认同状况；二是以图像资料即北魏时期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及题记为主研究北朝时期的民族认同情况。因此对于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认同的研究现状及趋势，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介绍。

1.以文本资料为主的研究情况

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认同，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著作，段锐超的博士学位论文系统分析了北朝时期的民族认同，但他理解的民族认同的含义与本书的民族认同相比略微宽泛了一些。他在文中使用的认同不仅包括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包括了民族文化的认同，而且段锐超的论文只是将时间限定在了北朝时期，并没有涉及十六国时期[2]。彭丰文的《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一书对当时的民族认同有所涉及，但切入点主要是国家认同，而且作者只选取了两晋及十六国时期的个别政权，还有一些政权或民族的情况没有涉及[3]。此外，王明珂先生的几部著作，皆涉及民族认同的许多理论问题[4]。另外许多研究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史的论著或多或少，或隐或显都会论及与本文有关的内容，但都不是专门研究，故在此不一一提及。其他专门探讨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认同的论文也不多见，但是与此相关或虽没有冠以民族认同但实际研究内容可以纳入民族认同的论文还是有一些。这些论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祖源攀附：十六国北朝时期，号称与华夏民族同源共祖是内迁民族的一个普遍现象，这行为和现象从血缘和伦理上认证了民族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研究民族史或断代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论著中多有涉及，何德章[5]、温海清[6]等人非常详尽地罗列、分析了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的具体情况；董文武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

情况分析了祖源攀附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一统、同祖同源观[7]；张军分析了十六国北朝祖源攀附的现象及意义，同时也阐述了祖源攀附与十六国北朝意识形态构建之间的关系[8]；尚永亮、龙成松对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9]；在祖源攀附中，祖先谱系的建构是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一些学者对中古时期的这一现象进行探索，如仇鹿鸣[10]、范兆飞[11]、尹波涛[12]、吴曼玉[13]等，只不过有一些学者论述的重点并不在民族认同。

“夷夏之辨”自古是华夏民族排斥其他民族的一个思想武器，每当民族冲突与民族矛盾激烈的时候，“夷夏之辨”便屡屡被提及，甚至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十六国北朝时期也是如此，而与夷夏之辨关联比较密切的就是政权或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讨论，因此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在讨论正统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一般都会涉及民族认同：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关注了十六国时期汉族的胡族观、胡族的汉族观及正朝正统观念的变化[14]；何德章探讨了北魏国号与正统性问题[15]；罗新从德运变化揭示十六国各政权的正统观[16]；彭丰文专门论述了十六国时期胡人正统观的嬗变[17]；秦永州[18]、邓乐群[19]等人对此问题也多有涉及；张俊飞从年号上分析十六国政权的文化及政治取向[20]。另一些学者则是对十六国北朝时期某个具体政权的正统观进行分析，如赵红梅[21]、李路[22]等对慕容鲜卑正统意识及其演变进行了论述。

十六国时期的中国认同或中国观：由于在古代，“中国”一词含义比较丰富，既有地名、政权名等的含义，同时也是民族即华夏民族的代称，因此分析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观或中国认同也难免会论及民族认同，宋秀英、李大龙从古代疆域形成的角度分析了北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23]；李方则分析了前秦的中国观[24]：马艳辉从各政权自称中国这一现象分析了十六国北朝的中国观[25]；赵红梅则具体分析了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26]；胡阿祥[27]讨论中国古代政权国号时也对十六国时期的中国观略有涉及。

民族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具体反映，有关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心理多为具体的个案研究。孔毅[28]、张国安[29]等人分析了孝文帝迁都之后六镇鲜卑群体心态的演变；陶贤都分析了北朝士人对南朝政权的态度[30]；王永平则具体分析了崔浩的南朝情结[31]；许永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汉族工人与胡族政权的对抗与合作状况进行了展示[32]；张德寿探析了拓跋鲜卑的心态与崔浩国史之狱的原因[33]；等等。

还有一些学者对具体某个人物的民族认同也进行了分析，如罗新曾以个案分析了北齐时期韩长鸾等人的认同问题[34]；北齐口语“汉儿”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认同，学者苏航[35]、杨栋娟[36]等对此问题进行了解析和论述。

2.利用图像资料的研究状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造像之风也非常盛行，出现了以“四大石窟”为代表的众多石窟及民间造像。这些造像非常直观地映射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因此，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对佛教造像进行研究，或从考古学的视角对石窟造像的结构、类型、变化、分期等方面进行研讨；或从艺术史方面研究造像构图、艺术手法等；社会生活史的学者则从造像中人物的服饰、发型等研究当时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民族史的专家也在造像方面用力较多，主要探讨造像中反映出来的民族迁徙、民族关系等，产出了非常重要的成果，总之，以上诸学科领域的成果非常丰富。

但是，对于石窟造像中反映的民族认同这一问题，相关方面的分析与研究成果较少。十六国及北魏时期，佛教在统治阶级倡导下迅速兴盛，进而造像之风渐兴。造像的出资者（供养人），在造像中展示自己、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形象，并标注题记以记录功德、解释供养目的。而造像中的供养人形象、题记，则反映了供养者一定的民族认同倾向。“通过对服饰、发型、物件以及空间结构的描绘，可以清楚地反映供养人的性别、族群系属、亲属关系、职业以及社会地位，这些都是认同建构的核心要素”[37]，而且“造像记里所反映的是一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心态，它有同于大人先生们的地方，也就有异于达官贵人的地方”[38]。因此以佛教造像资料为主研究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在近代以前，一些学者就已经开始利用造像记资料，他们认为造像记可以“证经典之异同，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39]。马长寿先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可说是利用造像记资料进行民族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此书通过造像题记中出现的姓氏等内容，分析与印证中古时期关中各族的族属渊源、姓氏变迁、分布、通婚及融合等相关问题。[40]马先生将碑铭置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还原与解析了碑铭资料中所暗含的民族关系、民族融合。虽然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研究造像中的民族认同，但其着重分析的民族关系

与民族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认同状况。

除此之外，近几年侯旭东利用造像记资料研究中古时期民众佛教信仰、民族关系以及国家认同，成果丰硕。他通过探讨佛教流行于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注意到供养者的阶层性，并将具有不同背景的造像者分类，以讨论造像记中所见的民众信仰以及国家认同等。

国外学者王静芬从供养人造像服饰、站位、排序入手，研究供养人的族群系属、社会地位及认同，他认为在佛教的庇佑下胡、汉民众融合在一起。[41]该文涉及供养人的服饰、站位、排序中的尊卑现象等，研究思路比较新颖。日本学者石松日奈子是国外学者中研究中国石窟造像成绩非常突出的学者，她在研究云冈石窟造像的过程中，也对佛教造像服饰反映的民族问题略有涉及。[42]

综上所述，此前国内外学者对石窟造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民族学、美术学等方面，较少有学者从民族史和图像学的角度，从石窟造像供养人及题记方面着手研究其中所反映的民族认同。因此，本书试图在此方面做一些努力。

[1]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375页。

[2] 段锐超：《北朝民族认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4。

[3] 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

[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

[5] 何德章：《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0。

[6] 温海清：《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现象述论——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中心》，《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7] 董文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一统、同祖同源观》，《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

[8] 张军：《十六国北朝时期祖源攀附现象考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祖源攀附与十六国北朝时期意识形态建构》，《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9] 尚永亮、龙成松：《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文史哲》2016年第4期。

[10] 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1] 范兆飞：《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2] 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13] 吴曼玉：《中古时期代北窦氏的祖先谱系建构与郡望伪冒》，《西北民族论丛》2018年第17辑。

[14] 〔日〕川本芳昭撰《关于五胡十六国北朝时代的“正统”王朝》，邓红、牟发松译，《北朝研究》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15] 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6]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7] 彭丰文：《试论十六国时期胡人正统观的嬗变》，《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

[18] 秦永州：《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文史哲》1998年第1期。

[19] 邓乐群：《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0] 张俊飞：《从年号看十六国政权之文化与政治取向》，《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1] 赵红梅：《“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前燕正统观的发展变化——兼及中原士人出仕前燕心态》，《北方论丛》2011年第6期。

[22] 李路、李德山：《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正统意识的演变》，《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3] 宋秀英、李大龙：《刘渊政权的出现与北疆民族主动认同“中国”的开始——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24] 李方：《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25] 马艳辉：《自称与认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观》，《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26] 赵红梅：《慕容鲜卑“中国”认同观念探讨——以前燕“中国”认同形式多样化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27] 胡阿祥：《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8] 孔毅：《北魏后期六镇鲜卑群体心态的演变》，《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29] 张国安：《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30] 陶贤都：《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分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0期。

[31] 王永平：《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

[32] 许永涛：《十六国时期的“胡族政权”和汉族士人》，硕士学位论文，青海师范大学，2010。

[33] 张德寿：《拓跋鲜卑统治者的心态与崔浩国史之狱》，《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34] 罗新：《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5] 苏航：《“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36] 杨栋娟：《北齐“汉儿”等语境下的华夏认同建构》，《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7] 王静芬撰《族性与认同——南北朝时期作为佛教艺术供养人的北方游牧民》，郑杰译，《西北民族论丛》2014年第10辑。

[38]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页。

[39] 朱剑心：《金石学》，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第4页。

[40]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1] 王静芬：《族性与认同——南北朝时期作为佛教艺术供养人的北方游牧民》，郑杰译，《西北民族论丛》2014年第10辑。

[42]〔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皇帝即如来”·昙曜·云冈石窟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造像》，《紫禁城》2016年第10期；《云冈中期石窟新论——沙门统昙曜的地位丧失和胡服供养人像的出现》，《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

文本 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认同

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是民族频繁互动及融合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两汉以来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利用风云变幻的局势纷纷建立了各自的政权。匈奴刘氏建立的汉、赵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开内迁民族创建政权、称王称帝并统治中原地区之先河。对于汉、赵政权，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而且也比较深入。近年出版的陈勇先生的专题论文集，可以说是研究汉、赵政权的最新成果。[1]尽管有颇丰的成果，但是将汉、赵国号与内迁民族的自我认同联系在一起，目前还未见到有研究成果问世。[2]

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之后，由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区进入中心地带，开始频繁、深入地接触华夏文化，并逐渐选择了汉化，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改变自己的姓氏。改姓既是内迁民族汉化的一个具体实践，同时也是内迁民族认同华夏文化的表现。关于内迁民族改姓所体现的认同情况，可以参阅本书中的相关部分内容，在此故不赘述。不过应该提及的是，关于本书所要涉及的刘渊的族属问题，学界仍有争议。但是，无论刘渊一族是由匈奴单于虚连题氏改姓而来，还是由未知的屠各姓氏改姓而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姓这一行为本身所反映的文化与民族认同状况。而内迁民族除了改姓这一行为之外，十六国时期许多政权国号的取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迁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对华夏民族认同的实际情况。本部分试图主要从汉、赵国号的取舍、确立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一 “汉”国号的确立与民族认同

西晋末期，朝政腐败，宗室内讧，“八王之乱”波及北方大部分地区，许多手握重兵的将领也趁乱拥兵自重，整个北方地区基本上处于各

自为政的混乱割据状态。这种风云变幻的局面为内迁诸民族创建政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正所谓“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3]。而匈奴首领刘渊及其从祖刘宣就是充分利用这种局面并取得成功的出色代表人物。

“八王之乱”时，刘宣在匈奴的集中居住地一面组织力量，积极准备起兵，一面密推当时还在邺城辅佐成都王司马颖的刘渊为大单于（这主要是由于他本人的号召力有限，所以不得不推举刘渊为首领）。刘宣派遣呼延攸到邺城与刘渊联络，刘渊请归，但司马颖未许。永兴元年（304），刘渊以招集旧部兵力辅助司马颖为借口，才得以返回离石以北的左国城，终于举起了创建政权的大旗。趁乱建功立业的想法，刘宣和刘渊二人不约而同，没有任何异议，但在具体的目标设计上，二人之间差异很大。刘宣主要想“兴邦复业”[4]，具体说就是“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5]。“呼韩邪”是南匈奴单于，故而“复呼韩邪之业”即是复兴南匈奴的大业。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试图联合鲜卑、乌丸等民族的力量。可以看出，刘宣的目标就是联合北方各地内迁的少数民族，恢复南匈奴曾经的辉煌。故而刘宣在起事前给刘渊所上称号，是匈奴原最高首领“大单于”的称号。

但是，刘渊的想法与刘宣完全不同，他认为“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6]而彻底否决了刘宣的主张。刘渊所说的汉高即汉高祖刘邦，魏武即魏武帝曹操，他们两人皆可算是汉族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这就说明刘渊起事的目标是有朝一日成为中原地区统一帝国的帝王或者是称雄中原的一方英雄，而不仅仅是成为另一个呼韩邪单于，这一目标的确立完全抛弃了其民族特性。不仅如此，在祖源认同上，刘渊也尽量攀附前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以此来标榜自己继承的是刘氏正统。汉高祖时“以宗女为公主，又妻冒顿，约为兄弟”[7]的史事给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依据，因此，刘渊特别强调自己与汉朝统治者的亲密关系，他称刘邦为“我太祖高皇帝”，又称刘秀为“我世祖光武皇帝”，甚至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为了更彻底、更完全地效法中原皇帝，刘渊在举行国家祭祀时，将“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祭之”[8]，俨然成了刘邦的“嫡系子孙”。在这种情况下，刘渊在其政权国号的选择上，自然也要与刘邦创建的汉朝拉上关系。永兴元年（304）十月，刘宣等人给刘渊上帝号，刘渊拒绝说：“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可仰高祖法，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听宇宙混一，当更议之。”[9]于是筑坛南郊，即“汉王”位，改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刘渊之所以如此作为，原因有二：其

一，因为当时各地汉族势力尚强，西晋皇室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如急于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其二，定国号为汉，以刘邦后裔自居，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便于在各族中尤其是汉族中形成号召力。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刘渊的确要比刘宣高明得多，他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又不至于引起西晋政府和各地割据势力的高度关注，有利于积蓄力量，发展壮大。从刘渊目标的设计及国号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他想成就的事业与刘宣所一心向往的“呼韩邪之业”的政治取向有鲜明的区别[10]。同为内迁民族，刘渊与刘宣的政治取向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刘渊为什么在国号的选择及祖源认同上完全抛开本民族，而高举汉民族的旗帜呢？这应该与刘渊的个人境遇有很大的关系。

刘渊对汉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具有良好的儒家文化修养。史载：“（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11]他还曾在咸熙年间（264～265），作为质子生活在洛阳，身处于儒家文化的中心地区[12]。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他本人出身于匈奴贵族家族，善于骑射是游牧民族的特征，因而文武兼备，获得当时人的好评。如晋武帝就认为“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元海是刘渊的字。王济甚至认为刘渊“文武才干贤于二子（由余、日磾）远矣”[13]。

由于对儒家文化的熟悉，刘渊非常清楚地了解儒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并且有切身体验。比如，早在晋武帝时期，王济向武帝建议任用刘渊平定吴国，但是大臣孔恂、杨珧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4]的理由加以反对。更何况在刘渊生活的年代中原地区一直是汉族统治者活动的政治舞台，从未有过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立足中原的历史事实。因此，儒家正统观念深入人心，所谓“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15]。刘渊饱读儒家经典与史书，且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岂能对这种情况不知？他深知少数民族要想在中原地区立足不易，更何况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了。

面对这种情况，刘渊清醒地认识到，若想在华夏神州建立政权，合法性是其将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能否解决合法性问题，其中汉人的向背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此，如何减少来自汉民族的阻力，争取获得汉族的支持，是他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刘渊起兵之时，虽然“八王之乱”还在继续，但西晋中央政权仍然破而未倒，人心向晋的情况还是比

较普遍。刘渊的臣子宣于修曾指出："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16]因此，承载着诸多内容与意义的政权名号并不能信手拈来，无所用意，而是应该慎重考虑，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有比较大的号召力。距离西晋不远的"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17]，这种情况给刘渊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再加两汉时期汉朝与匈奴多次的通婚关系，也为刘渊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血统谱系，因此他以"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的理由，"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18]。刘渊高举汉的旗帜，意味着他选择了与刘宣复兴"呼韩邪之业"有鲜明区别的政治路线，这样既可以号召汉族百姓和士人，又不会失去本族人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面政治旗帜给刘渊带来非常大的精神上的支持，因此刘渊由离石迁至左国城时，"远人归附者数万"[19]。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刘渊起兵时由于西晋中央政府仍然存在，因此刘渊另立山头的行为，明确表示他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反晋道路，但由于他不是在漠北举兵，而是在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举兵，因此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局面，是刘渊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指出，刘渊举兵建国，意味着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统治的反抗以及争取独立的开始。但是，他的行动绝不是单纯的民族斗争，他们的独立并非像过去的匈奴国家那样立国于塞外，而是把国家建立在中原地区。他要在中原建立国家，必须以与汉民族的共存作为前提条件，必须将汉代统治地域置于本民族的领导之下[20]。上述刘渊的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不急于称帝而称王，就是要淡化反晋的色彩，争取汉族的人心。还有学者评论说："值得注意的是，刘元海对'华夏正统'地位的冲击不是以匈奴人的名义进行的，而是假冒汉朝继承者的身份，对此上引刘元海自立为汉王的'诏书'中已经明确表现了这一点。刘元海假冒汉氏后裔，并将国号称为'汉'，是想以恢复汉氏江山为号召。刘元海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大致有二：一是刘元海如果以匈奴人的身份起兵难以得到广大汉人的认同，故在称汉王时不仅有'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的辩解，而且以'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求得更多人的承认；二是刘氏建立的汉朝统治中国400余年，国富民强，而且和匈奴存在和亲关系，以'汉氏之甥'的身份出现可以得到更多人尤其是汉人的响应。"[21]可见刘渊不愧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

《金石录》卷20收有《伪汉司徒刘雄碑》，额题“汉故使持节、侍中、太宰、司徒公、右部魏成献王之碑”。其碑文曰：“公讳雄，字元英，高皇帝之胄，孝宣帝玄孙。值王莽篡窃，远循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累叶相承，家云中，因以为桑梓焉。”赵明诚在案语中说：“雄，刘元海之弟也。”（据《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刘恕之言，此碑出于晋州临汾县嘉泉村）。尽管《晋书·载记》并无刘雄其人的相关记载，但是从刘雄字元英，刘渊字元海的情况看，他们为亲兄弟还是可信的。从《伪汉司徒刘雄碑》的内容看，匈奴的这一家族自认为其是汉高祖刘邦之胄，并非仅限于刘渊本人，而是其家族的共同理念，甚至是这一部匈奴人的共同理念。该碑立于刘聪时，可见到刘聪之时，刘氏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汉室嫡胄。刘渊之后，“且愚人系汉（刘汉）之心未专，而思晋之怀犹盛，刘琨去此咫尺之间，狂狷刺客息顷而至”[22]，“大难未夷，余晋假息”[23]，故刘渊的这种民族与血缘上的认同，仅延续到刘聪之时。

刘渊创建其政权时的这些举措，主观上看虽然适应当时政治局势和地理环境，为其顺利地创建政权服务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但在客观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刘渊在明知自己属于匈奴民族的情况下，仍然以汉高祖刘邦后裔自居，并以“汉”为国号，以号召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和士人，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在思想上他接受儒家文化，自觉排斥狭隘的民族思想和复兴南匈奴政权的主张，是其长期以来接受汉文化熏陶的结果，加上其主动地与汉族通婚，从而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因此，对刘渊及其所创建的汉国政权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以上学者的这些看法，尽管其观点并不存在明显的错误，却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没有看到我国民族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刘渊创建汉国的举动与石勒创建赵国的行为，就性质而言，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点笔者将在下面详论。

二 刘“赵”与石“赵”

十六国时期有两个政权的国号为“赵”，一个是由刘渊所建汉政权改名而来，一个是羯人石勒所建之赵国。短时期内，北方地区同时出现了两个赵国，而且刘曜改国号为赵时的基本控制区，向东并没超过今山陕间的黄河，与历史上所谓的赵国或赵地没有任何关系，为何仍将国号改为赵？而石勒为什么在刘曜改国号为赵之后，仍将其政权的国号选择为赵？这是非常有意思并值得深究的问题。

太兴元年（318）七月，刘聪死，刘粲即位，八月，外戚靳准叛乱，杀死留在平阳的以刘粲为首的刘氏宗室，自号大将军、汉天王，并遣使向东晋称藩。刘曜得知这一消息，从长安出发攻打平阳。十月，刘曜在长安即帝位，改元“光初”。[24]刘曜登上皇帝宝座后，太兴二年（319）六月，修缮宗庙，祭祀祖先，同时下诏商议改国号之事，曰“吾之先，兴于北方。光文立汉宗庙以从民望。今宜改国号，以单于为祖。亟议以闻”。群臣奏曰：“光文始封庐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赵分也，请改国号为赵。”[25]对此建议，刘曜欣然从之。关于刘曜改国号之事，《太平御览》的记载更为详细[26]，可以参阅。

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刘曜之所以选择“赵”为国号，主要是因为刘渊曾被封为卢奴伯（卢奴，今河北定州，春秋战国时中山国的政治中心），刘曜也曾被刘渊封为中山王；中山，后属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作为汉国建立者刘渊的正统后裔，刘曜即帝位后改国号的原因，诏令中并没有明确谈及，但是字里行间仍旧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从刘曜所下诏书可知，刘曜认为刘渊立汉宗庙的目的是“以从民望”，即顺从与内迁游牧民族交错杂居的汉族之民望。言下之意，现在改宗庙与国号，是因为已经没有“从民望”的必要，那么刘曜即帝位时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自永兴元年（304）刘渊建立汉国，至刘曜改国号，时间过去了15年。在这15年里，情况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风雨飘摇的西晋王朝已于建兴四年（316）灭亡，皇帝成了汉国的阶下囚，作为与晋朝争夺合法性旗帜的汉国号，随着晋王朝的灭亡，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利用价值了；其次，西晋政权灭亡之后，一直以华夏民族正统自居的东晋政权已移居长江以南，偏居于一隅，此时，北方社会中内迁民族与汉族之间、各内迁民族之间的冲撞与整合，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一个内迁民族所建政权来说，其兴亡盛衰的关键不仅取决于它与汉族的关系，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内迁民族之间的关系，甚至后者可能更为重要。因此笼络北方地区内迁之少数民族成为刘曜的当务之急，再加上北方地区割据势力王浚、刘琨等人力量削弱，并在名义上归附汉国，使刘曜认为汉族对其统治已经构不成大威胁。而多年在北方驰骋的石勒力量不断壮大，使黄河以北地区由多方角逐变成刘氏政权与石勒相对抗的舞台，此时“刘曜的主要敌人由司马氏变成同为胡族的石勒”[27]，于是他决定改变刘渊之时用于笼络汉族人士而精心选择的汉国号。由此可见，无论是刘渊的汉还是刘曜的赵，都是时势造成的结果。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刘渊、刘曜分别称‘汉’、‘赵’，前者‘祀汉配本’，‘追尊后主’，后者则

改以‘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汉与前赵国家祭典的变化，取决于二刘建国时不同的政治形势及各自的政治需求”[28]。

在改国号的同时，刘曜还在五德历运的统序上大做文章。自东汉至南北朝，五德终始说是统治者改朝换代合法性论证的基本论述和禅让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代正史所载皇朝更替之际的诏诰章奏中，常见连篇累牍的五德行序论证。刘曜即位之后，对这一学说加以充分利用，他在改国号的同时，遵循五德历运中的行序，决定“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29]。在五德历运的更替上刘曜选择上承晋，也是一个非常有深意的举动。“以水承晋金行”，承金，就是承晋，这样就把自己的法统与西晋联系起来了。说明刘曜承认了西晋王朝在五行运统秩序中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向世人表明自己具有继承西晋王朝的合法身份。刘曜此举还有与长江之南的东晋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作用，当时东晋王朝继续着晋朝的五行帝德，刘曜却“以水承晋金行”，表示东晋所代表的金行已被水行所取代，不再具有合法的正统地位，同时也想以此排斥占据传统的赵地、野心勃勃的石勒。

除改国号为赵之外，刘曜还改变了刘渊、刘聪时冒称刘氏后裔、追尊汉朝宗室刘氏的做法，开始“以冒顿配天，光文配上帝”[30]。明确将匈奴帝国的创建者冒顿及汉国的缔造者刘渊作为祖先加以追尊，刻意突出了本民族的特征。针对这种变化，有学者指出：“刘曜追尊冒顿、刘渊，试图重新建立匈奴五部之众的族群认同，借助故旧关系维系其战斗能力。”[31]不仅如此，这其实也是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表现，在十六国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公然以内迁游牧民族后裔的身份称王称帝于华夏腹地，并与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东晋王朝争夺正统地位，在十六国历史中，刘曜应该是第一人。

刘曜改国号不久，曾依附于汉国的羯族人石勒于太兴二年（319）十一月建都于襄国，自称赵王[32]，史称“后赵”。石勒在永兴二年（305）起兵，永嘉元年（307）九月归附刘渊，刘曜即位后，于太兴元年（318）十月晋其爵为赵公[33]，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34]；319年春二月，石勒因攻破平阳之功，晋爵赵王[35]，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36]。同年十一月，石勒在其部下将佐多次请求下（当然也有可能是石勒的授意之下的行为），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汉昭烈在蜀、魏武在邺故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为赵国”，并“依春秋时列国称元年”[37]。

石勒称王的意图其实早就有的。318年靳氏内乱，靳准被靳明所杀，靳明送国玺于刘曜，结果惹怒了石勒，一怒之下的石勒攻占了平阳，刘曜为了平复石勒的怒气，杀靳明，并授石勒太宰，以河内二十四郡封石勒为赵王。319年三月，因曹平乐的挑拨，刘曜斩石勒左长史王修于市。石勒知此消息后，曰："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38]这些行为都表明石勒也有建国称王的想法，虽说如此，但他同时也知道"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39]，再加上时机不成熟而暂时隐忍下来。

那么，为何在刘曜改名号为赵之后，他也称"赵王"呢？石勒称"赵王"，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汉国政权中的封号，一直与赵有关，如"赵公""赵王"；二是自其起事之后的主要活动基本上是在原赵国的区域内。石勒归附汉国之后，一直转战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先攻灭幽州的王浚，接着将刘琨赶出并州，石勒据有冀州、幽州、并州的全部和青、司、徐等州的大部，最终基本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而石勒的根本所在是襄国及其附近的郡县，这正是所谓的赵地，其都城也是"据赵旧都"[40]。为何选择襄国一带定都，关于这个问题，其幕僚张宾曾明确地指出，所谓"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王业可图矣"[41]。因此，在"物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的情况下，张宾等129人上疏："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清河、钜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国、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42]当然，石勒在刘曜改国号为赵之后，仍称"赵王"，其主要原因，除了其所占之地为赵国故地外，还有便是借"赵王"之称呼来传达一个信号，表示要与刘曜彻底决裂，以争取正统地位，当然也是为了表明与刘曜相抗衡的决心。

咸和三年（328），石勒在洛阳与刘曜决战，杀死刘曜，刘赵政权灭亡。咸和五年（330）二月，石勒称"赵天王"，行皇帝事，九月，正式即皇帝位。咸康三年（337），石勒之从子石虎即位，也如刘曜一样，对五德终始说加以利用，"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43]，在五德运统中将刘氏"汉""赵"排除在外，表明自身的正统合法地位。并"追尊祖𠚱邪为武皇帝，父寇觅为太宗孝皇帝"[44]，成为继刘曜以后，明确以内迁少数民族身份称帝之人。

从刘曜、石勒、石虎等人的行为看，他们不再冒充某位汉族帝王的后裔，而直接以本民族的身份在中原地区称帝，虽然是其民族自我认同的表现，但也反映出其自身对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与刘渊不可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政治上也要比刘渊残暴得多，对汉人所建立晋朝的排斥态度也比刘渊更加坚决。但是其统治的区域毕竟不是广袤的大草原，而是农耕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其治下的臣民也不再是清一色的本民族之人，而是包括了人数众多的汉人，加上其对汉文化虽然了解得还不深，但也毕竟不再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其部下汉人僚佐的建号称帝的意见还是能听得进去的，于是就出现了中原文化色彩颇为浓厚的赵国号。这一现象也证明了自东汉以来内迁的各北方少数民族，一方面在中原华夏之风的熏陶下，尽量地给自己的政权涂上一层中原王朝的正统色彩，另一方面因为民族融合毕竟还没有完成，于是又竭力想保持各自民族的认同。因此，这一历史现象实际上是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尚未完成的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

然而客观地看，刘汉与石赵国号的相继出现，还是为后来的内迁民族建立政权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此后内迁民族再建立政权时，在国号的选择上，多模仿汉、赵，继承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如燕、代、赵、魏、蜀、凉等。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其汉化程度不是很高，对汉晋制度的向往不是很强烈，故他们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时代——殷周的制度，反映出这些统治者对殷周的仰慕、向往以及仿效、模仿古制的愿望”[45]。其实他们把目光投向更古老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其最高统治者的汉化程度并无必然的关系，这些选择实际上更多的是出自其部下汉族士大夫的建议，是由战国、秦汉、魏晋这一历史发展顺序延续下来的，用于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

其实汉、赵两个国号还是有区别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的国号来自西汉时期匈奴与汉朝的姻亲关系，因为和亲，汉族与匈奴的关系成为甥舅关系；而赵的国号，则是来自战国时期之赵国，战国七雄一并为秦国所灭，因此，从法统的统序上来说，赵国号的选择，就将原来汉国号所暗示的汉与内迁匈奴的甥舅关系变成了兄弟关系，甥舅关系意味着长幼有别，而兄弟关系则意味着“平等、合作与对抗”[46]，故而，赵国号显得争正统、争合法性的色彩更为强烈一些。

综上所述，曾经处于华夏边缘地区和附庸地位的北方草原民族迁入中原，深入接触并熟悉汉文化后，在政治上必然日渐“成熟”。为了获得

人数众多的、文化先进的汉族的认可，他们充分利用汉文化传统中的各种政治观念，以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以此来减少中原士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消除自身心理上的卑怯与失落。在建立政权之初，他们不仅在祖源认同上有改姓或攀附华夏民族祖先的行为，而且在政权国号的选择上也多加斟酌，十分谨慎。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在其统治地区选择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以继承之，在政区名称上也充分凸显了汉文化的色彩。但是随着内迁民族的政治势力不断增强，统治地位的巩固，其民族意识也不断复苏和觉醒，因此，他们在祖源认同上就会回归原有的、真实的祖源。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看，这些现象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回潮，因为其毕竟没有排斥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没有排斥中原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礼仪制度，并极力调和所谓的“夷夏”关系，在强调其民族意识和民族特征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保留了中原的主流文化。这就说明其在强化民族自我认同的同时，并没有刻意阻碍民族融合趋势的发展。

[1] 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

[2] 从政权国号的角度对汉、赵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与慕容廆的“晋”旗号》，此文主要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角度研析“汉”与“晋”的不同，刊《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靳润成《十六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一文将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做了详尽的分析与归纳，刊《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宋秀英、李大龙《刘渊政权的出现与北疆民族主动认同“中国”的开始——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二》一文从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视角讨论刘渊政权；罗新《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一文可以说是近几年对汉赵政权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但是他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都是刘渊的族属为屠各，与本书所要论述的视角也有所不同。

[3]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7页。

[4]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7页。

[5]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第2701页。

[7]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8]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同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702页。

[9] 李昉：《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574页。

[10] 刘宣与刘渊目标的差异，罗新也曾指出："呼韩邪之业是南匈奴的事业，不是屠各的事业。刘渊必须确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以保证自己领袖地位的合理与合法，这个目标必须超越南匈奴一族的历史传统。"但他的一些分析是为证明刘渊是屠各而非匈奴单于后裔服务，为此他还特意指出刘渊这样做的目的是"掩饰匈奴汉国的民族性"，即刘渊屠各民族的出身，这种分析与本书的主旨有很大的不同，故不再多述。参见罗新《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5辑，第148～159页。

[11]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12]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6页。

[13]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6页。

[14]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6页。

[15]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15页。

[16]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

[17]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18]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19]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20] 〔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1页。

[21] 宋秀英、李大龙：《刘渊政权的出现与北疆民族主动认同"中国"的开始——中国古代边疆形成理论探讨之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22]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1页。

[23]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1页。

[24] 李昉：《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576页。

[25] 《资治通鉴》卷91"晋元帝太兴二年"，第2870页。

[26] 李昉：《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576页。

[27] 罗新：《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5辑，第148～159页。

[28] 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第15页。

[29]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685页。

[30] 《资治通鉴》卷91“晋元帝太兴二年”，第2870页。

[31] 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第15页。

[32] 《资治通鉴》卷91“晋元帝太兴二年”，第2871页。

[33] 《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太兴元年”，第2863页。

[34]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8页。

[35] 《资治通鉴》卷91“晋元帝太兴二年”，第2866页。

[36]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8页。

[37] 《资治通鉴》卷88“晋怀帝永嘉六年”，第2781页。

[38]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9页。

[39]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

[40]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

[41]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9页。

[42]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30页。

[43]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46页。

[44]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第2765页。

[45] 张俊飞：《从年号看十六国政权之文化与政治取向》，《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6]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第183页。

国号与国人

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是民族频繁互动及融合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两汉以来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利用风云变幻的局势纷纷建立了各自的政权。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即是其中之一，同时它也是十六国中建立比较早的政权，存在时间30余年（319～351）。有关后赵政权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人物等各个方面，而且有些问题论述得也比较深入。但是专门对这一政权国号“赵”的选择原则及其所蕴涵的政治意图，以及石勒、石虎等人的民族认同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还少有人涉及[1]，且学界对他们的“讳胡”及号胡人为“国人”的行为也没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本部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在这几个方面做一些努力。

一 国号“赵”：石勒的政治取向

十六国时期，许多政权的建立者是曾经活动在中国北部大漠南北的民族，两汉三国时期因各种因素陆续内迁，逐渐进入农耕地区，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他们在追随各中原王朝或边臣疆吏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但是农耕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毕竟与草原地区有很大差异，再加上社会发展水平不一的多种民族成分的不断加入，所有即将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内迁民族所要面对的问题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不仅仅要面对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不同且文化多样的复杂民族关系，更为困难的是他们要面对人数众多、文化先进的农耕民族即所谓的华夏民族，因此，在农耕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在没有太多草原政权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农耕地区的政治文化便成为他们的唯一参考坐标。

因此，十六国时期内迁民族所建政权基本上皆采纳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对外关系、表意文字、历法模式等。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政权在建立之初都需要拟定国号。国号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代号或称谓，它更是王朝政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历朝历代在建立政权之时都会在国号的选择上费尽心机、大做文章，北方民族内迁之后建立政权时也必然会顺应这种潮流。而且在国号的选择上同样遵循了中原文化的特点，同时又体现了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即大多数政权国号的确定基本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

与地域有关，即大多与政权建立者的主要活动区域有关[2]；二是直接承继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当然也有出于其他缘故选定国号的，如赫连勃勃“自以为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3]。中原文化色彩浓厚的国号的选择至少在表面上表明内迁民族已经认可、接纳乃至融入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历史系统。

羯人石勒如其他内迁民族一样，在建立政权选择国号时也遵循这两个原则，赵既是他的发迹之地，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赵国所在地。

太兴元年（318）十月，汉政权刘渊之族子刘曜在长安即帝位，改元“光初”[4]。刘曜登上皇帝宝座不到一年，就于太兴二年（319）六月，修缮宗庙，祭祀祖先，下诏商议改国号之事：“吾之先，兴于北方。光文（刘渊）立汉宗庙以从民望。今宜改国号，以单于为祖。亟议以闻。”深谙刘曜意图的群臣上奏建议：“光文始封庐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赵分也，请改国号为赵。”[5]刘曜君臣之间的这两段对话点明了刘渊选择“汉”国号的缘由，同时也表达了刘曜改国号的原因。刘曜议改国号的行为意义深远，完全改变了刘渊时期的立国思路与实践，由“立汉宗庙”到“以单于为祖”，体现了刘曜摆脱刘汉政权汉朝宗室因素影响的企图，以及高扬本民族大旗的决心，有关刘氏的“汉”“赵”两个国号的区别与内涵可参阅本书的相关部分内容。

刘曜改国号不久，曾依附于汉国的羯族人石勒于太兴二年（319）十一月建“赵国”，都城选择在襄国（今河北邢台），自称赵王[6]，史称“后赵”。石勒于永兴二年（305）起兵，永嘉元年（307）九月归附刘渊，刘曜即位后，于太兴元年（318）十月晋其爵为“赵公”[7]；太兴二年（319）春二月，石勒因攻破平阳之功，晋爵赵王[8]。石勒追随刘氏汉政权十余年，获得了非常高的政治地位，但是在晋爵赵王的当年（319）十一月，石勒在襄国“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汉昭烈在蜀、魏武在邺故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为赵国”并“依春秋时列国称元年”[9]，正式自树旗帜。

石勒自建政权的意图其实早已有之。太兴元年（318），靳明送国玺于刘曜，靳明的这一行为惹怒了石勒，气愤之下石勒一举攻占平阳。为了平复石勒的怒气，刘曜不得已杀了靳明，并且授石勒太宰，以河内二十四郡封其为赵王。国玺是皇帝身份的代表，一个国家权力的象征，石勒对靳明奉送国玺予刘曜的怒气表明了他对国玺的觊觎之心，透露出打算建立政权的想法。太兴二年（319）三月，刘曜在曹平乐的挑拨下

斩石勒左长史王修于市。石勒知此消息后说的一段话则更加明确地凸显了欲与刘曜政权分裂、自树旗号的企图："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10]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他"根基既立，便欲相图"的意愿。在石勒看来，何时摆脱刘曜名义上的节制，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只要石勒自己愿意，称赵王也好，做赵帝也罢，根本就不是刘曜所能掌控的，只不过他知道"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11]，因此，在根基未立的时候，自然要隐而不发了。

既然如此，为何在刘曜改"汉"国号为"赵"之后，石勒自树旗帜时却不避重复，一定要建赵国、称赵王呢？石勒称赵王，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汉国政权中的封号，一直与赵有关，如赵公、赵王；二是自其起事之后的主要活动基本上都是在现在的河北地区，也就是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中赵国的区域内。石勒归附汉国之后，一直转战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先攻灭幽州的王浚，接着将刘琨赶出并州，石勒据有冀州、幽州、并州的全部和青、司、徐等州的大部，最终基本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而石勒的根本所在是襄国及其附近的郡县，这正是所谓春秋时期的赵地，不仅如此，石勒选择的都城也是"据赵旧都"[12]。其幕僚张宾曾建议："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王业可图矣。"[13]因此"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清河、钜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国、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14]，称"赵王"[15]。

石勒在刘曜改国号为赵之后，仍选择赵国号，并称"赵王"，除了以上所说的两个原因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即欲借"赵"国号及"赵王"之称呼向外界或刘氏之"赵"政权传达一个信号，表示与刘赵刘曜彻底决裂，以争取正统地位，同时也是为了表明与刘曜相抗衡的决心。

刘曜即位之后不久就将国号由汉改为赵，除了想摆脱汉朝宗室因素的影响，以及表明高扬本民族大旗的决心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借此在声势上压制石勒。石勒虽然名义上依附刘氏汉、赵国，但他基本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而且不断地在华北地区发展自己的力量。石

勒在华北地区势力的增强，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建都在关中地区的刘氏政权，对此刘曜也应该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因当时关中、陇右一带有氐、羌等一些民族，常同西晋残余军事力量联合进攻刘曜，给刘曜政权造成比较严重的威胁，来自西部的威胁使刘曜无法全力对付东部名义上依附于他的石勒，所以在其称帝之后仍旧授石勒太宰、领大将军，以河内二十四郡封其为“赵王”，想以此先稳住石勒，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关、陇地区的敌对势力。但是对于在华北地区不断扩张势力的石勒，刘曜又不可能坐视不管，任由其发展。刘曜在刘聪之时曾被封为“中山王，镇长安”[16]，而“中山，赵分也”，因此，刘曜就利用这个理由，将国号汉改为赵，想在声势上占有先机，以示向石勒宣战、欲将赵地据为己有的意图。赵公、赵王是刘氏政权授予石勒的称号，而赵地又是石勒的主要活动区域，刘曜却要因其曾经是“镇长安”的“中山王”而将国号改为赵，一看便知此理由太过于牵强，很明显是针对一直在赵地活动的石勒而来。

所以清楚了刘曜将汉国号改为赵国号的寓意之后，石勒也公开表示与刘曜政权决裂的意图，选择赵为国号。咸和三年（328），石勒在洛阳与刘曜决战，杀死刘曜，刘氏赵政权灭亡。咸和五年（330）二月，石勒称“赵天王”，行皇帝事，九月，正式即皇帝位。即帝位之后的石勒，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五德终始说为其政权的正统性进行阐述，以后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17]，在五德运统中将刘氏汉、赵排除在外，直接将自己的法统与“金”德的西晋王朝联系起来，更加明确地宣示了自身的正统性及合法性地位。

石勒对国号的选择，表明了他基本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汉族儒家文化影响下，后赵立国之后主要是仿汉晋政治制度进行统治，如拉拢士族，续立九品，下州郡阅实人口，收取赋税等，使后赵成为十六国时期第一个统一黄河流域的政权；赵国号充分体现了石勒的政治文化认同。而且石勒在建立政权之时，“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18]等。于是就出现了中原文化色彩颇为浓厚的赵国号。刘汉、石赵国号的选择也表明自东汉以来内迁的各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华夏之风的熏陶下，尽量地给自己的政权涂上一层中原王朝的正统色彩。

刘汉与石赵国号的相继出现，为后来的内迁民族建立政权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此后内迁民族建立政权时，在国号的选择上，多模仿汉、赵，继承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用于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如燕、

代、赵、魏、蜀、凉等。这些选择虽然更多的可能是出自其部下汉族士大夫的建议，但毕竟是由战国、秦汉、魏晋这一历史发展顺序延续下来的。也许正是因为石勒在国号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顺应迎合，才会被汉臣徐光视为“中国帝王”[19]。

二 “国人”：胡人地位的法制化

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之后，为了提高胡人的地位，于太兴三年（320）“号胡为国人”[20]，这是“胡”人政治地位法律化与制度化的一个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首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人”一词源自先秦时期周代的“国”“野”概念，“一般地讲，周人所说的国和野，是从国中居民的立场出发的。居于国者既把自己的居地视之为国，则居地之外的其他地区，自然便统谓之野”[21]，“所谓国，事实上就是指少数先进的中心，具体而言，在西周，就是指周原旧都、丰镐、洛邑和各诸侯国君的居住地”[22]。而居住在“国”中的人称为“国人”，相对于“野人”来说，这部分人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国人能够纳君、出君、逐君、弑君，能够决定执政的命运，具有议政‘咎公’的自由，每遇大事，国君需询之以定可否，贵族在内部斗争中，也要与国人订盟以求得其支持。这便充分说明国人是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集团，而并不包括全部的国中居民。”[23]

到了战国时期，“野成了国的一部分，反映社会政治差异的国、野之别便不复存在了”[24]，但是“国”与“国人”的概念一直保留下来，虽然到了十六国时期，“国人”的含义与西周时期的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保留了下来，那就是“国人”仍旧有纳君、出君、逐君、弑君等职权，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国人”就是指在某种程度上或范围内可以参政议政的人，也就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力的人。相关十六国时期的史籍中使用非常频繁的“国人”一词的确具有这种含义。

凉武昭王李玄盛“（义熙）十三年（417），薨，时年六十七岁。国人上谥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庙号太祖”[25]；“国人”有给死去的国王上谥号的权利。“中平（184～189）中，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26]；“涉归死，其弟耐篡位，将谋杀廆，廆亡潜以避祸，后国人杀耐，迎廆立之”[27]；“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28]；“国人”有弑君的职权。“国人推戴之，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魏言

制胜也”[29]；“末波自称幽州刺史，屯辽西。末波死，国人立日陆眷弟护辽为主”[30]；这几个事例说明“国人”可以废立国王、首领。由此可知，十六国时期的“国人”仍具有西周时期的含义，即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

当然，十六国时期的“国人”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指某些特定的人，也就是某政权治下之民或某部族之人，“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31]；“国人”应是焉耆人。“（赵王）二年（319）令曰：‘国人不听执嫂在丧婚娶至于烧葬令如本俗’”[32]；“国人”即羯人。“魏主遗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33]；此处“国人”胡三省注曰“谓与拓跋氏同出北荒之子孙也，凡九十九姓”[34]；“国人”特指某类人，上段所引“国人”也可以视作此类情况，但更重要的是，上段所引的“国人”的确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力的人。“国人”特指的例子俯拾皆是，兹不赘举。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石勒“号胡为国人”之“国人”不是指具体的某一族人如羯人等，而应该是指具有一定政治权力的人，否则他的“号胡为国人”没有任何意义，根本用不着他专门去颁布法令。石勒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地下令“号胡为国人”，目的就是提高长久以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贬抑的胡人的社会及政治地位。

两汉以来，大量的北方民族南迁，深入中原地区，至十六国时期，这些民族纷纷立国于中原及关中地区，这种现象虽然已经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畛域，北方民族开始与华夏民族错居杂处，并且也逐渐向华夏文化靠拢，但是他们仍旧无法完全突破“贵诸华贱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夏民族排他主义的藩篱，尤其是在民族矛盾与冲突比较激烈的时期，“夷夏之辨”经常会成为华夏民族用来排斥、歧视其他民族的一种工具。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内迁民族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仍旧受到贬抑。

政治上，内迁民族得不到重用。西晋在讨论谁担起灭吴的重任之时，师事刘渊的王济建议由非常有谋略的刘渊来负责，他认为如果让刘渊指挥东南的战事，一定会马到成功的。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孔恂、杨珧等汉族大臣的反对，理由即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最终司马炎也没有采纳王济的建议。后来，鲜卑族秃发部的首领树机能起兵反抗西晋王

朝，又有人向司马炎建议，授刘渊将军称号，让他率领匈奴五部人马去镇压树机能，仍因孔恂反对而未被采纳。

不仅如此，胡人可以成为人臣建功立业，但不可能成为帝王的思想在当时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甚至在刘渊称“汉王”及“即皇帝位”已经成为事实之后，这种观念仍旧甚嚣尘上：靳准因“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35]，永嘉五年（311）刘琨写给石勒的劝降信中，也罔顾刘渊已经在此时称皇帝的事实，认为“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36]，表明了“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是当时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压迫下，胡人石勒也不得不接受这种看法，哪怕是表面上接受。王子春受石勒之命说服王浚为天子时说：“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37]虽然石勒推崇王浚为天子是为消灭王浚而设置的圈套，但是王子春的这个说法使王浚对石勒深信不疑，也恰恰说明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得到了普遍认同的。

经济上，这些内迁民族如匈奴刘宣所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38]；不仅如此，西晋惠帝末年，石勒与其他胡人还曾被司马腾的军队贩卖至山东师懽处当奴隶：“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殴辱。”[39]身为部落小帅后裔的石勒都被贩卖为奴，一般的胡族平民其地位如何可想而知了。

因此可以说，虽然内迁民族入主中原已经成了事实，胡族统治者的政治地位提高，但是绝大多数内迁民族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大的改观，仍处在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压迫下，身为胡族一员的石勒当政之后，自然会想办法提高胡人的政治及社会地位，并为此专门下诏“号胡为国人”。石勒“号胡为国人”主要是针对当时内迁民族受歧视的状况而制定的一个政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石勒在提高胡人地位，“号胡为国人”的同时，也多次下令约束胡人对待汉族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行为。石勒建立赵之前，转战河北时，就曾将当地汉族“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40]而加以保护和利用；称赵王后，又规定其治下的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群、刘谟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41]石勒不仅约束了胡人对待“衣冠华族”的行为，同时要求“衣冠华族”将胡人视为具有相同政治地位的“国人”，这两种政策的同时进

行，应该主要是针对当时存在的胡、汉矛盾。石勒对胡、汉双方的约束体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勒的民族思想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

需要补充的是石勒号为“国人”的“胡”人不应该只是羯人，而应泛指后赵政权统治下的北方各内迁民族。羯人虽然在当时中国北方活动的地区比较广，但主要分布在上党一带，人数并不是太多，石勒所依靠的力量不可能只是羯人，应该包括其他民族，如鲜卑、匈奴、乌桓等，从石勒的十八骑就能看出，石氏政权的人员组成是非常复杂的。据史家考证，石勒十八骑中张曀仆、张越、王阳为羯人，冀保、吴豫、桃豹疑为羯人，支雄、支屈六为月氏人，夔安为天竺人，刘征、刘宝、刘膺、呼延莫为匈奴人，逯明、孔豚疑为汉人，“郭、赵等氏，不得不并入匈奴，其余不明”[42]，由此可见，石赵政权及军队是杂胡和汉人力量的组合，其政权之内并不是单一的羯人胡族，因此，石勒意欲提高的也应该是他治下所有胡族的地位。

三 “讳胡尤峻”与自名为胡

国号“赵”的选择，既体现了后赵政权与刘氏的汉、赵政权争正统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了石勒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这是一种外显性、可以昭示天下所有人的认同，这种选择与其他十六国政权在国号选择上所遵循的原则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在民族认同上，石氏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与其他内迁民族有很大的差异。

十六国时期，内迁民族时常将自己的祖源与华夏望族联系在一起。如汉刘渊，史书记载其为匈奴“冒顿之后也”，“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43]，刘渊对这种关系也非常认可，而且他在建立政权之时，理直气壮地利用这种关系为自己寻找合理的依据：“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44]永兴元年（304），刘渊即汉王位后，曾下令祭祀汉朝历代皇帝，俨然正宗的刘氏子孙：“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45]更有甚者将其祖源追溯至更远的远古时期，如黄帝或其子孙，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前秦氐族“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46]；

北魏鲜卑拓跋氏“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47]；铁弗匈奴赫连勃勃则标榜自己为“大禹之后，世居幽朔”“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48]；鲜卑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49]。

十六国时期的各个内迁民族通过族源寻根，将本民族的起源追溯到与华夏民族同源异流的炎黄，不仅轻而易举地击碎了大汉族主义的“夷夏之辨”与“夷夏之防”，标榜了新朝承接华夏民族帝系的正统地位，同时也为排除本部族守旧势力的干扰，推进新政权的汉化与封建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宗法保障。

这种族源上的认同，虽然传说和假托的意味多，并不可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祖源追溯具有一定的历史效应和影响，它试图淡化内迁民族与华夏民族之间的界限，而且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它们对当时各内迁民族政权的立国和治国都起到了唤起和聚合人心的作用。

但是，石勒不仅没有利用这种祖源攀附的聚合作用，还非常明确地标明自己的胡族身份：“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石勒和石虎在宗庙祭祀上追尊的都是自己真实的祖先：石勒“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50]，石虎“追尊祖訇邪为武皇帝，父寇觅为太宗孝皇帝”[51]。石氏的这种态度、行为与刘渊建国时的“宗汉立国”的理念有非常大的不同。

不仅如此，石勒还经常在不同的场合自称中国传统中用来指称非华夏民族的“胡”或“夷”、“戎”等。西晋边臣刘琨曾以授石勒官职的条件劝降石勒，却被石勒以“吾自夷，难为效”[52]的理由拒绝；石勒奉表王浚推其为天子时也宣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53]不仅石勒，普通的羯人也不忌讳自己的胡人身份，而且非常欣喜地接受这种称呼。

石勒和刘曜交战，刘曜捉住几个羯人，亲自讯问：“大胡自来耶，其众大小复何如？”羯人回答：“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54]由此可知，“胡”不仅是羯族的一种他称，同时也是羯人的一种自称，表明石勒及其羯人在民族认同上，是认可自己的胡夷身份的。石勒之从子石虎对自己的戎狄身份也不加回避；太兴四年（321），石虎攻段匹磾于厌次（今山东阳信东），匹磾弟段文鸯率壮士数十骑出战，遇马乏，伏不能起。石虎劝降说：“大兄与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违愿，今日相

见，何故复战？请释杖。”[55]石虎不仅在同为戎狄的段氏面前不忌讳其戎狄身份，而且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汉族士大夫面前，石虎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也是非常张扬。

石虎大崇佛教，引起了汉族士大夫的不满，中书著作郎王度上书曾以“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56]为由加以劝谏。王度的上书得到了许多汉族士大夫的支持，面对这种形势，石虎则下书明确告知说：“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举。”[57]进一步明确了“本俗”与“戎神”的关系。无论是反佛还是奉佛，双方的理由都是佛为“外国之神”或“戎神”，从中既可以看到汉族士大夫的偏见，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到石虎对于自己本民族身份的确认。

但是石勒、石虎在高扬“胡”之民族身份的同时，史书中也有他们讳胡的记载，而且石勒“讳胡尤峻”[58]；“崔鸿《后赵录》曰石勒制法甚严，兼讳胡尤峻”[59]；“后赵石勒初僭称赵王，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60]。也有一些具体的事例证明这一点，如石勒叔侄皆有因“讳胡”而将“胡”物改名的行为：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搏炉，石虎改曰麻饼”[61]；《艺文类聚》卷85“豆”条引《邺中记》曰“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麻饼，胡绥曰香绥，胡豆曰国豆”[62]。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了改胡物之名这一具体行为之外，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史料证实石勒“讳胡尤峻”，而且史书中更多的记载说明的情况与此恰恰相反：“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63]宫门执法官称胡人为“醉胡”，石勒不仅没有怪罪，而且自己也将喝醉之人笑称为“胡人”；再看樊坦参军的例子，“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64]。这两个事例说明，石勒其实并不真正忌讳“胡”之称谓，否则真如史书所说“讳胡尤峻”，他不可能对臣下称呼有劫掠行为的羯人为“羯贼”都无动于衷。

既然石勒并不是真正讳胡，且有时还会自称为“胡”或“戎狄”，那么

如何理解石勒、石虎改胡物之名的行为呢？为了了解这个矛盾现象，我们必须搞清楚，在当时的环境下，“胡”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含义。“春秋战国时期，‘胡’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匈奴只是‘胡’之一种。秦汉之际，‘胡’一度成为匈奴的专称。东汉末年至十六国时期，‘胡’再一次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其中包括乌丸（桓）、羯、鲜卑等民族”[65]，尽管东汉末年到十六国时期“胡”有非华夏民族泛称的趋势，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贬低的意思，但相对于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华夏民族来讲，这些内迁民族的确又是文化比较落后的一个群体，虽然在十六国时期，内迁民族纷纷建立政权，成为中原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政治地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思想一直是“内诸夏而外夷狄”“贵中华贱夷狄”，因此这些内迁民族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华夏民族的完全认可，而且各个政权统治下的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时常发生，有时也非常激烈，因此这些泛指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被华夏民族使用时有污名化的倾向，“胡”常与一些具有污蔑性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如“凶胡”[66]“凶胡臭羯”[67]“恶胡”[68]“逆胡”[69]“胡贼”[70]等。

这样一来，“胡”在不同的语境下，在十六国时期就有了两层含义：一是客观事实的陈述或民族身份的指认，即“胡”民族；一是由于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胡”之称谓附加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变成一种有污名化倾向的称呼，时常与“凶”“恶”“逆”等侮辱性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低下及本性“凶”“恶”的代名词，这种污名化的现象在十六国时期非常普遍。因此，民族意识非常强的石勒、石虎，在高扬自己胡族身份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对带有明显污名化含义的“胡”之称谓极力回避，因此才会有石氏那些看起来非常矛盾的行为。

综上所述，曾经活动于华夏边缘地区，处于附庸地位的北方民族羯族迁入中原之后，其代表人物石勒建立政权时，顺应中国传统文化选择“赵”为国号，这既体现了石勒与其他内迁民族相同的政治取向，同时也表明了与刘曜前赵政权决裂并与之争正统的意图与决心；但在民族身份的选择上，石勒等人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与内迁民族大多攀附华夏远祖不同，他们非常高调地自名为“胡”，下令号胡人为具有一定政治权力的“国人”，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胡人的政治地位制度化；与此同时，也重禁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勒对胡、汉双方同时加以约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汉国、后赵等内迁民族建立的政权，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胡人不能为帝王”的藩篱，但内迁胡族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由于“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贬抑

胡人的现象仍旧存在，“胡”经常与一些具有污蔑性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故而石氏对于有污名化倾向的“胡”之称谓又刻意回避，将胡物改名，从而有了史书“讳胡尤峻”的记载。

[1] 从政权国号的角度对后赵政权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靳润成《十六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一文，此文将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名号与地域的关系做了详尽的分析与归纳，刊于《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

[2] 靳润成：《十六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第25页。

[3]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3页。

[4] 李昉：《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576页。

[5] 《资治通鉴》卷91“晋元帝太兴二年”，第2870页。

[6] 《资治通鉴》卷91“晋元帝太兴二年”，第2871页。

[7] 《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太兴元年”，第2863页。

[8] 《资治通鉴》卷91“晋元帝太兴二年”，第2866页。

[9] 《资治通鉴》卷91“晋元帝太兴二年”，第2871页。

[10]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9页。

[11]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

[12]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

[13]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9页。

[14]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30页。

[15]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35页。

[16]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59页。

[17]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47页。

[18]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35页。

[19]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53页。

[20]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35页。

[21] 赵世超：《周代国野关系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第12页。

[22] 赵世超：《周代国野关系研究》，第11页。

[23] 赵世超：《周代国野关系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第52页。

[24] 赵世超：《周代国野关系研究》，第315页。

[25]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7页。

[26]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27]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28] 《魏书》卷101《高昌传》，第2244页。

[29] 《魏书》卷103《蠕蠕传》，第2292页。

[30] 《魏书》卷103《徙何段就六眷传》，第2306页。

[31] 《魏书》卷101《高昌传》，第2244页。

[32] 李昉：《太平御览》卷120《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578页。

[33]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35页。

[34]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卷2735页。

[35]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35页。

[36]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15页。

[37]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

[38]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7页。

[39]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08页。

[40]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11页。

[41]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35页。

[42]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383～384页。

[43]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44]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45]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9～2650页。

[46]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第2867页。

[47] 《魏书》卷1《序纪》，第1页。

[48]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3202页。

[49]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50]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46页。

[51]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第2765页。

[52]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15页。

[53]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

[54]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700页。

[55] 《晋书》卷63《段匹磾传》，第1711页。

[56]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9《神异上》，中华书局，1962，第352页。

[57]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9《神异上》，中华书局，1962，第352页。

[58]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37页。

[59]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497《人事部》，中华书局，1960，第2274页。

[60]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226《僭伪部》，第2694页。

[61] 李昉：《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3819页。

[62]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5《百谷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1543页。

[63]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37页。

[64]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41页。

[65] 吴洪琳：《五胡新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66] 《晋书》卷6《中宗元帝纪》，第144页。

[67] 《晋书》卷63《段匹磾传》，第1712页。

[68] 《晋书》卷47《傅玄传》，第1322页。

[69] 《晋书》卷60《刘琨传》，第1683页。

[70] 《晋书》卷73《庾亮传》，第1935页。

铁弗匈奴的自我认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个民族之间不断分化、整合，形成许多新民族，铁弗匈奴即是其中一支。铁弗匈奴形成之后主要活动于朔方地区，义熙三年（407）建立大夏政权，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蚕食后秦大部分领土，义熙十四年（418）攻入后秦都城长安。强盛时期领有相当于今陕西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内蒙古中部一带地区，衰落之时，仍有力量灭亡西秦政权，并给西进的北魏势力以强有力的阻击。元嘉四年（427）都城统万被北魏攻破，元嘉八年（431）第三个皇帝赫连定被吐谷浑所俘，夏国灭亡。夏政权只延续了25年，但仍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夏国建立者铁弗匈奴，先祖刘猛时将其单于姓氏虚连鞮氏改为汉朝宗室刘氏，刘虎时始以“胡父鲜卑母”之意的“铁弗”为号，勃勃之时建立政权，因史书记载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而以夏为国号，并将刘姓改为胡族特征非常明显的赫连氏。这一系列变化可以说是铁弗匈奴的民族意识及自我认同变迁的具体体现，具有非常突出的个性特点，反映了十六国时期内迁民族在自我认同上的矛盾、挣扎及反复，在此拟就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铁弗匈奴之先祖改姓刘氏

“铁弗”之称始于刘虎，刘虎系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后裔[1]。去卑又是南匈奴最后一个单于呼厨泉的叔父[2]，故刘虎之祖去卑为南匈奴单于一族[3]。

匈奴在两汉时期经过两次大的分裂，陆续有部众南迁，入居内地，与汉人错居杂处，逐渐受到汉文化的浸染，单于宗族将其姓氏虚连鞮氏改为汉姓刘氏，原因是汉高祖时曾“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4]，但具体改姓始于何时、何人，史未明载。从去卑后裔刘虎、刘猛的名字看，作为单于宗族，去卑一支也随之而姓刘。

关于匈奴单于宗族改姓的时间，学界略有争议，但大体不出曹魏时期[5]，去卑后裔改姓刘氏也应该在这一时期，最早见于刘猛（？～

271）[6]。单于一族改姓刘氏与当时的汉匈关系及匈奴的实际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匈奴是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大漠南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冒顿时期征服蒙古草原诸部，建立强大的草原帝国，“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7]，从而使匈奴的“自尊”或民族意识非常强烈，如冒顿单于给汉朝皇帝的书信中，开头就是“天所立匈奴大单于”；高祖死后，冒顿对其后吕氏大肆侮辱：“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8]老上单于宣称自己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9]，孤鹿姑单于曾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10]这都充分表达了强盛时期匈奴民族的自豪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随着内部的纷争及势力的衰弱，匈奴自信心逐渐减弱。东汉初年，南匈奴入附于汉朝，每年接受汉朝的经济支援与军事监护，单于常被汉监护将领逼迫、拘禁，乃至杀害：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车纽叛乱，汉顺帝令单于休利出面劝降，但无果，新任使匈奴中郎将陈龟“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11]；“延熹元年（158），南单于诸部叛，遂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12]；灵帝光和元年（178），单于某死而子呼徵立，翌年“中郎将张修与单于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13]。

建安二十一年（216），匈奴单于呼厨泉投靠曹操。曹操分其众为左、右、南、北、中五部，每部选尊贵者为帅，别令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14]。匈奴部落组织虽被保存，但权力已全部落入曹魏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南匈奴国家政权亡。

总之，东汉以来匈奴单于的权威地位每况愈下，与当年之“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或“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位号权威相去甚远。匈奴首领的“自尊”意识逐渐弱化，至呼韩邪单于继位时，“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15]成了匈奴处理汉匈关系的指导思想，积极认同“汉与匈奴合为一家”[16]，而改汉姓成为匈奴的具体实践之一。

但是，为什么改姓这一行为发生在曹魏时期，却选择了汉朝的“刘”姓呢？

首先，匈奴改刘姓有历史渊源，汉高祖时曾“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但这只是为匈奴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依据，更深层的原因应不止于此。

内迁匈奴改姓时期的中原地区，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三国之间为扩大地盘、掠夺财产，不断进行着战争，曹魏政权为了拉拢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极力笼络内迁民族参与到这场混战之中。经过这场混战的洗礼，内迁民族得到了充分的历练，政治上日趋成熟，他们清楚地知道，割据纷争的局面，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他们毕竟根基太浅、力量太弱，能否做汉高、魏武或者“得志于诸侯”，汉民族的向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此，如何减少来自汉民族的阻力，并争取获得支持，是他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而三国混战的状况，使一切变得不可预知、充满变数，增加了抉择的难度，使他们有点无所适从，故而，在形势未明朗的情况下，魏国的曹姓绝对不是最佳选择。

深谙此理的内迁民族只好另寻出路，而享国400余年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秦王朝所创立的封建制度直至汉代才真正完备，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因此，饱受战乱之苦的西晋人民有着十分深厚的思念故汉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17]，“天下咸思汉德”[18]。故刘渊起兵后，采取“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的策略，以至于“胡晋归之者愈众”[19]。

在匈奴人民的心目中，汉王朝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自匈奴帝国建立以来，无论强与弱，它都一直与汉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双方之间还存在比较亲密的和亲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匈奴民族历史记忆中非常鲜活而且深刻的一个记忆，这一切都使得在匈奴民族考虑如何获取汉族人民的支持时，汉朝都是一个不容忽视、不能忘却的符号。改姓为有历史依据的刘氏，既能迎合汉民族存亡续绝的文化传统和晋末各族人民思念汉代承平岁月的社会心理，又能从民族属性上混融华夷，突破汉人“蛮夷猾夏”的大汉族主义情结和淡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隔离的藩篱，也有助于标榜匈奴王者之师的政治名分，从而为联合各族反晋力量，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刘虎以“铁弗”为号

铁弗匈奴之先祖在刘猛时改姓，到刘虎之时，开始以“铁弗”为号。

铁弗，《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刘虎为刘猛之侄（刘虎之父诰升爰是刘猛之弟），永嘉三年（309），其父诰升爰死后，代领部众，共30余年，而这30余年正是中原地区动荡、剧变的时期。

291～306年，西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发生了“八王之乱”，引发了汉族人民和边疆各族人民不断的反抗行动，这种混乱的状况为觊觎中原已久的边疆各族上层贵族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绝好的机会。

永兴元年（304），刘渊反晋，称汉王，永嘉二年（308）改称皇帝，国号为“汉”。势力迅速向东扩展到冀、司、青、徐、兖、豫诸州，向西发展到雍州以东，以致“郡县莫能自保”[20]，最终导致西晋灭亡。刘渊建立汉国，开创了秦汉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参与华夏正统争夺的新局面，为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树立了榜样。在榜样的示范作用下，作为朔方地区比较强盛的一支力量，刘虎自然不甘落后。但是，有经验的野心家都知道，行动必须有一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为此，刘虎选择了“铁弗”这样一个符号，用以承载他的伟大理想及抱负，同时也可以号召朔方地区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铁弗匈奴先祖在去卑之时曾经深入中原地区，活动在山西南部、河南等地，但西晋泰始七年（271）春正月，刘猛因故逃至塞外之后，这支基本上主要活动在代北地区。当时的代北地区，从“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21]。尽管如此，塞外仍有许多匈奴留居当地，学者统计的西晋初年因故内迁的匈奴“至少不下二十余万口”[22]，这一数字就可以充分说明。

因此，在匈奴故地这一广袤地区，出现未迁徙匈奴与南迁至此的鲜卑混居杂处的情况，这种状况促使匈奴与鲜卑之间的通婚，从史书记载可以推知，匈奴与鲜卑之间的通婚现象在当时比较普遍。尤其是拓跋鲜卑与匈奴的通婚更是如此，《魏书》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有学者就说：拓跋鲜卑“自献帝邻（第二推寅）以后，历代的拓跋氏多跟属于匈奴系统的独孤部、贺赖部等族往来，并互为婚姻。拓跋鲜卑自始至终跟匈奴以及曾经属于匈奴国家的其他部落发生相互融合的关系的。因此南朝的统治阶级和史学家大都认为‘索虏’是匈奴的一种，他们又统治了许多匈奴部落”[23]。

史书记载中，有关于拓跋先祖的一个传说。献帝时，始居匈奴故地。初圣武帝时曾北率数万骑田于山泽，见一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二人于是结合，一年后育有一子，即其始祖[24]。从学者所说拓跋即胡母鲜卑父可以看出，这一传说中的天女，应当即是匈奴女子。

关于去卑后裔及其部众与南下的鲜卑通婚的情况，在刘虎之前未见记载，但是其部首及部众与鲜卑通婚的情况应是普遍存在的，否则不会有意为"胡父鲜卑母"的"铁弗"之称出现。在刘虎以"铁弗"为号之后，两族之间的通婚见于记载的有：东晋大兴元年（318），攻打拓跋代的刘虎被拓跋郁律击败，刘虎之弟路孤，率部逃至拓跋部，拓跋郁律以女妻之；[25]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刘务桓"遣使求和于代"，代王拓跋什翼犍以女妻之；[26]晋穆帝升平四年（360），"卫辰来会葬，因而求婚，许之"[27]。史籍所载两族通婚的例子，也可聊作"铁弗"匈奴为"胡父鲜卑母"之说的注释。

随着南迁鲜卑与留居当地的匈奴混居日久，二者之间通婚日益频繁，"胡父鲜卑母"的后裔也越来越多。因此，如何获得这部分人的支持和认同，是居于此地的刘虎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趋强避弱、趋利避害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时经常遵循的一个原则，大规模匈奴迁徙之后，留居的匈奴可以自号鲜卑[28]，刘虎当然可以以"铁弗"为号。以居于此地的、许多人共有的一种特征"胡父鲜卑母"，即"铁弗"为号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

"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29]，从中可知，"铁弗"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铁弗"即"胡父鲜卑母"；第二，"铁弗"最早是一种他称，而非自称；第三，"铁弗"初始是泛指"胡父鲜卑母"这类人，只是在刘虎以此为号之后，才成为一种专称。

从"铁弗"即"胡父鲜卑母"可以得知，此称号与非汉族有密切的关系，它凸显了某类人的胡族特点，与刘猛、刘豹刻意改汉姓以消除与汉族的差异，获得汉族认同之目的大相径庭。

三 以"夏"为国号

义熙三年（407），勃勃建立政权，自谓夏后氏之苗裔[30]，故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国号"大夏"。

铁弗匈奴建立政权之前，内迁民族在北方地区建立的政权已经有十四个：汉、凉（前凉、南凉、后凉、北凉、西凉）、燕（前燕、后燕、南燕）、秦（前秦、后秦、西秦）、赵（前赵、后赵）等。这些政权的建立，从各个方面为铁弗匈奴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如国号及年号的选择。

夏国建立之前的政权国号大多与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有关，这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当权者无所用意、信手拈来，而是经过审慎的选择，靳润成认为大致说来有两个原则。“首先，在统治中心和统治地域大体一致的前提下，继承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包括政区名称）。依据这一原则而择定的国号，在十六国时期占绝大多数。”如石勒称赵，三燕，五凉（凉国号与中原王朝在此地区设置过的凉州有继承关系），前、后、西秦国号的继承关系更是不言而喻。其次是“尽量与前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攀附关系，即汉、夏”[31]。但是靳润成只分析了各政权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对选择这些国号的用意及原因并没有进行分析。

魏晋时期，北方民族大规模的内迁和相互间的不断融合，为其挑战“华夏正统”提供了基础和前提，西晋的“八王之乱”也为内迁民族建立政权提供了机遇和可能性。因此，在作为秦汉以来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理论依据的五德终始学说和西汉末年以来盛行的图谶的铺垫与配合之下，内迁民族纷纷建立政权，打破了长城以南一直是华夏农耕民族政治舞台的传统，开创了游牧民族建立政权的新局面。

但是，内迁民族在内地建立政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面对边疆民族政权对“华夏正统”的冲击，汉族士大夫的抵触情绪是十分强烈的，江统的《徙戎论》就是一个代表。虽然江统的主张难以实现，但是这一认识真实地反映着汉族对边疆民族政权争夺“华夏正统”的态度，华夏正统观念不但深入汉族人心，而且也左右着内迁民族。

刘琨劝石勒时曾说：“自古以来诚无戎人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建兴元年（313），石勒起事时，因“勒本小胡，出于戎裔”，“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斋珍宝，奉表推崇浚为天子”[32]，当王浚对此行为表示怀疑时，属下王子春说：“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33]。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

的歧视与压迫下，内迁民族统治者对于君临长城以南地区忐忑不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卑怯心理。

刘渊称帝时，一方面否定帝王正统："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另一方面又顾虑"晋人未必同我"，所以不得不抬出"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34]的血缘关系作为称帝的依据。石勒找不到这样有利的依据，迟迟不敢称帝，直到起兵17年之后，才制造出一些祥符，登上皇帝宝座，但仍"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鲜卑慕容氏长期以晋臣自居："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箓宁有分邪。"[35]太兴元年（318），靳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但纠结于"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而欲将攻破洛阳之时所得晋传国玺，托胡嵩带回东晋[36]。

因此，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内迁民族不得不屈服于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下，故刘元海称汉王时，追尊蜀汉刘禅为孝怀皇帝，祭汉高祖等，以汉王朝后继者的身份出现，其他内迁民族建立政权时也仿效刘渊，在历史中寻找依据，国号的选择就是最好的证明。

勃勃建立政权时，已经是十六国后期，内迁民族建立政权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史书中虽有不少汉族士大夫赞美或追随边疆民族政权的记载，但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仍是排斥内迁民族统治的有力武器，"华夷之分"的民族心理也是内迁民族统治的障碍。一个政权成为"华夏正统"并不是自己认为是就可以，必须得到中原汉族（华夏）的承认才成。

在政权建设中，国号承载了太多的含义，因此国号的选择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前人给勃勃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但前人选择国号时所遵循的地域原则对于偏居一隅的铁弗匈奴来说根本无法效仿，勃勃只能另寻出路，而汉族的传统史籍《史记》"模糊、开放"华夏与非华夏边界的记载正好提供了绝好的依据，在这种历史依据的引导下，"夏"成为他的最终选择。

将含义本为"胡父鲜卑母"的铁弗氏归宗于华夏始祖之一的夏后氏名下，便将铁弗匈奴的族属一变而为华夏支脉，为其拥有华夏正统身份找到了血缘和文化上的依据。

四 改姓"赫连"

义熙三年（407），铁弗匈奴建立夏政权，几年的军事征讨，其势力范围向南扩张到杏城（今陕西黄陵）、安定（今甘肃泾川）一线。413年，勃勃始筑都城，并将其汉朝宗室之“刘”姓改为“赫连”[37]。从改姓诏书看，改姓原因是从宗法观念上讲，“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而改姓为“赫连”是因为“赫连”有“徽赫实与天连”之意，目的是希望铁弗匈奴之民族及政权能由此“永享无疆大庆”[38]。对于勃勃改姓一事，姚薇元先生认为：“按《魏书·官氏志》有綦连氏，乃居于祁连山之西部鲜卑，‘祁连’为鲜卑语称‘天’之意，勃勃改译为‘赫连’，从汉语字面释为‘徽赫实与天连’；盖译音而兼译意，藉以夸示其‘系天之尊’也。疑勃勃先世本居于祁连山之西部鲜卑，以役属于匈奴，被号‘铁弗’。迨勃勃称帝，乃复其本姓，而其宗族仍以‘铁伐’为氏，古轻唇读如重唇，‘铁伐’当即‘铁弗’之异译，勃勃曲解为‘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俾掩饰其先世之丑迹耳。”[39]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之“天山”及《霍去病传》中之“祁连山”条皆曰：“匈奴谓天为祁连。”知匈奴谓天为“祁连”。因此，姚先生认为勃勃将取天之意的“祁连”改译为“赫连”，“藉以夸示其‘系天之尊’也”非常有道理[40]，但是，认为勃勃先世有可能是祁连山之西部鲜卑，以役属于匈奴，被号铁弗的看法有点牵强，史书明确记载“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并不是因役属于匈奴而被号铁弗。

在将宗室姓氏由“刘”姓改为“赫连”的同时，勃勃认为帝王“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因此又令“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其意为“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41]。

赫连与铁伐，“玩其文字，赫连与铁伐等姓，视之似汉名，然退而考之，此二名实皆系胡语，而以汉字表示之。赫连之原语为Kulun，即由天之义而音译者，由是以表示‘徽赫与天连’之义。又铁伐之原语，乃音译Mongol语与Turk语铁之义之temur者，由是以表示‘刚锐堪伐人’之意。职是之故，铁伐与铁弗皆同名而异译也”[42]。对于“铁伐”与“铁弗”为同名异译这一观点，许多学者持同样看法。同姓的“铁弗”氏被别而二之，分为正统的赫连氏与支庶的铁伐氏，是“除了企图改观铁弗匈奴的杂类形象外，还含有神化王权、区分嫡庶、维护王室赫连氏在铁弗匈奴中‘正统’地位的目的在内”[43]。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尽全面。

勃勃将铁弗匈奴姓氏分别改为“赫连”“铁伐”二姓，更深层的原因是其民族意识或民族心理。无论学者们如何解释“赫连”“铁伐”之意，没有异议的是这两个姓氏肯定是胡语的汉译。两晋十六国时期，内迁游牧民

族纷纷接受汉族文化，改汉姓、习汉语成为一种风气，而勃勃却逆势而动，放弃沿用已久的汉朝宗室之“刘”姓，使用一个胡族特征比较明显的姓氏，除“企图改观铁弗匈奴的杂类形象”“神化王权、区分嫡庶、维护王室赫连氏在铁弗匈奴中‘正统’地位”之外，应蕴涵着更深刻的含义：表明了铁弗匈奴作为胡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一点在勃勃对“赫连”与“铁伐”的解释分别为“徽赫实与天连”“其非正统”“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44]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和突出。

铁弗匈奴形成之后，在与保留了比较浓重的游牧特性的拓跋鲜卑较量过程中，大多以失利而告终。后为拓跋鲜卑所逼迁居朔方地区，将注意力转移，开始向南扩展，建立政权后，逐渐蚕食后秦领土，在与后秦争夺岭北地区的过程中，铁弗匈奴的游牧特性及所拥有的骑兵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和显现，势力向南推进得比较顺利，基本上实现了先取岭北，再接近长安的目标。在此过程中，铁弗匈奴民族的自信心及自豪感进一步加强，两汉以来“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胡”强心理得以延伸，因此决定在修筑都城的同时，放弃沿用已久的汉朝宗室“刘”姓，而将铁弗匈奴姓氏分别改为胡族特征凸显的“赫连”与“铁伐”氏，这一改变充分体现了以勃勃为代表的铁弗匈奴的民族心态。相关论述可见本书其他部分。

铁弗匈奴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在表明其正统地位及树立其民族意识方面，经过几代人多年的摸索与尝试，至勃勃之时，通过以“夏”为国号及改姓“赫连”两种方式，比较圆满地得以解决。

综上所述，铁弗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内迁浪潮中的一支，在寻找归属感及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反复及痛苦的抉择，相信铁弗匈奴的努力与尝试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内迁民族曾经的共同经历。

[1]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第2054页。

[2] 《北史》卷53《破六韩常传》，第1902页。

[3] 学术界对此有疑问，但因此问题不影响本书的立论，故暂且认可史书关于去卑身份的说法。

[4]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5] 周伟洲先生认为是在曹魏时期，参见《汉赵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页。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认为：“并州强部王长出现刘氏者，其事不始于魏末，而始

见于梁习整治胡部二十余年稍后，即少帝齐王芳正始（240～248）间之并州，匈奴王刘靖部众强盛是也。”参见《试论五胡及其君长的汉化思考》，2003年“汉化、胡化、洋化：中国历史文化质变与多元性格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第36页。黄烈先生认为匈奴改刘姓始于刘豹（？～279），参见《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第193页。

[6] 去卑的兄弟辈及子侄辈中仍有许多胡族之名：如去卑之弟潘六奚，见《北史》卷53《破六韩常传》，第1902页；去卑之子侄辈（即刘猛的平辈）中有诰升爰（诰升爰一名训兜）。

[7] 《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51页。

[8] 《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51页。

[9] 《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54页。

[10] 《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80页。

[11]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60页。

[12]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63页。

[13]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64页。

[14]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第2548页。

[15] 《汉书》卷94《匈奴传下》，第3797页。

[16] 《汉书》卷94《匈奴传下》，第3801页。

[17] 《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第2705页。

[18] 《后汉书》卷12《卢芳传》，第505页。

[19] 《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第2702页。

[20] 《资治通鉴》卷86“晋惠帝光熙元年”，第2724页。

[21] 《三国志》卷30《鲜卑传》，引鱼豢《魏书》，第836页。

[22] 周伟洲：《汉赵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23]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31页。

[24] 《魏书》卷1《序纪》，第2页。

[25] 《魏书》卷1《序纪》，第9页。

[26] 《资治通鉴》卷96“晋成帝咸康七年”，第3046页。

[27] 《魏书》卷1《序纪》，第14页。

[28] 王沈《魏书》云："匈奴及北单于遁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

[29]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第2054页。

[30]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第2789页）《汉书》从之。

[31] 靳润成：《十六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

[32]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

[33]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

[34]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35] 《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第2834页。

[36] 《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太兴元年"，第2861页。

[37] 《资治通鉴》卷116"晋安帝义熙九年"，第3659页。

[38]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6页。

[39]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244页。

[40] 周建奇在《释"赫连"》［《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中认为"赫连"一词的含义为"天"，于史无证。"勃勃只说了'赫连与天连'，并没有说它就是'天'"，而是"山顶"之意。但山顶的含义是高是毫无疑义的。

[41]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6页。

[42] 〔日〕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林幹《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8）》，中华书局，1983，第204页。

[43] 汪福宝：《秃发、拓跋"分姓目的"辨析》，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魏晋南北朝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第254页。

[44]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6页。

铁弗匈奴的民族心态

——以赫连勃勃为例

一 铁弗匈奴的形成

铁弗匈奴是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大漠南北的一个民族，最早的根据地在今内蒙古的阴山一带，当时匈奴部落首领冒顿征服蒙古草原周围各部，建立匈奴政权，此后与中原地区的秦、汉等政权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东汉建武二十三至二十四年（47～48），因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匈奴发生了第二次大的分裂，原呼韩邪单于孙比因不得立为单于，率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投降汉朝，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沿用其祖父的名号，史称此部为南匈奴。留在漠北的蒲奴单于，被称为北匈奴，匈奴正式分为南北两部。建武二十六年（50），南匈奴单于庭徙于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准噶尔旗北），东汉“悉复缘边八郡”，允许南匈奴部众入居，“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治富平，今宁夏青铜峡南），右贤王屯朔方（治临戎，今内蒙古磴口北），当于骨都侯屯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呼衍骨都侯屯云中（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北），郎氏骨都侯定襄（治善无，今山西左云西），左南将军屯雁门（治阴馆，今山西代县西北），栗籍骨都侯屯代郡（治高柳，今山西阳高），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1]，分布范围大致相当于今甘肃东北、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这是匈奴部众第一次大规模地向汉朝沿边诸郡迁徙。

东汉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内部再次发生变乱，东汉政府为了避免南匈奴叛众的侵扰，“乃徙西河治离石（今山西离石），上郡治夏阳（今陕西韩城），朔方治五原（今内蒙古包头）”[2]，因此原来居住在西河北部、上郡、朔方等地的匈奴随之南下，大批南匈奴部众集中到并州的汾水流域一带。

曹魏时期，曹操将降己的匈奴分为五部，每部又立匈奴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之。曹操所分五部的分布是：左部统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南）；右部统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统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

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统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3]。曹操分匈奴为五部的同时，留匈奴单于呼厨泉于邺，本意想瓦解匈奴的团结力量，削弱单于作为匈奴最高统治者的实权，使匈奴失去领导核心以便于控制。这种“单于在内，羌夷失统，合散无主”的状况，虽然使“单于之尊日疏”，达到了削弱单于势力的目的；但同时也使“外土之威日重”，失去统帅的匈奴五部很快又团结在了“部族最强”[4]的左贤王刘豹周围。刘豹将五部匈奴“并为一部”[5]，“而外土之威日重也”[6]。

南匈奴内部力量的聚合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曹魏政权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曹魏政权产生比较大的威胁，引起当时朝中人士的忧虑。嘉平三年（251）时任城阳太守的邓艾因匈奴“刘豹部有叛胡”而建议“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右贤王去卑功显前朝（指护卫汉献帝之事），因此应该加其子以显号，使之居雁门，以达到“离国弱寇”的目的。对此建议，史书记载司马师“皆从之”[7]。

晋泰始七年（271）去卑之子刘猛叛塞被杀，猛之部众则由去卑另一子诰升爰[8]（又名训兜[9]）代领，在今内蒙古凉城、山西右玉一带驻牧。如此一来，在曹魏分割匈奴势力的政策下，已经深入河东平阳一带活动的南匈奴去卑一支迁居到代北一带。

在匈奴南迁的过程中，兴起于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古代东胡民族的一支鲜卑族也开始向西、向南迁徙，到东汉末年迁至匈奴故地。迁居草原中、西部的鲜卑就与留居及重新返回塞外的南匈奴等错居杂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族间接触频繁、交往加深，出现了许多鲜卑与匈奴等族融合的后代，至刘虎之时正式形成的铁弗匈奴即其一。

二 改姓凸显的自豪感

关于铁弗匈奴之“铁弗”一词的来源及含义，史书记载为：“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10]由此可知，“铁弗”一词的含义是“胡父鲜卑母”，马长寿先生进一步解释为“‘Tuba’的对音，其义指两种姓杂交而生的新的种姓，在初时草原部民并无任何卑下之意”[11]，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解释为满洲语“dufe之对音，野合之义也”[12]。

铁弗刘虎系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裔，南匈奴入迁内地以来，其单

于宗族大约从于扶罗单于之子豹开始改姓“刘”[13]。对于南匈奴单于宗族改姓原因，史载汉高祖时曾“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14]。南匈奴右贤王去卑为南匈奴单于一族（去卑为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的叔父）[15]，故其后裔也随之姓“刘”。铁弗匈奴之先祖姓“刘”似乎始于刘猛之时。刘猛之父兄子弟仍然大多取胡族之名，如刘猛父去卑，叔父潘六奚[16]，猛兄弟辈有诰升爰，诰升爰一名训兜，虎一名乌路孤，猛子有副仑等。刘猛改姓“刘”，与其他匈奴改刘姓的目的是相同的，即适应内迁，号召汉人，以使自己合法化。

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勃勃闻后秦姚兴复与北魏相通而怒，叛秦独立，在朔方地区建立夏政权。经过几年的军事征讨，其势力范围向南扩张到杏城（今陕西黄陵）、安定（今甘肃泾川）一线，在此情况下，勃勃以“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为由，于夏凤翔元年（413）意欲改变其所冒汉朝皇室之“刘”姓，因“匈奴谓天为祁连”[17]，故改姓“赫连”。“赫连”之意据勃勃解释为“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

从改姓诏书看，改姓是因为勃勃认为从宗法观念上讲，“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而改姓为“赫连”是因为“赫连”有“徽赫实与天连”之意，希望铁弗匈奴之民族及政权由此能“永享无疆大庆”[18]。

对于赫连勃勃改姓一事，我国学者姚薇元先生认为勃勃冒称姒氏及刘氏皆系“伪托之辞”，“惟改姓赫连，必有所本，按《魏书·官氏志》有綦连氏，乃居于祁连山之西部鲜卑，‘祁连’为鲜卑语称‘天’之意，勃勃改译为‘赫连’，从汉语字面释为‘徽赫实与天连’；盖译音而兼译意，藉以夸示其‘系天之尊’也。疑勃勃先世本居于祁连山之西部鲜卑，以役属于匈奴，被号‘铁弗’。迨勃勃称帝，乃复其本姓，而其宗族仍以‘铁伐’为氏，古轻唇读如重唇，‘铁伐’当即‘铁弗’之异译，勃勃曲解为‘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俾掩饰其先世之丑迹耳”[19]。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之“天山”及《霍去病传》中之“祁连山”条皆曰“匈奴谓天为祁连”，知匈奴谓天为“祁连”。因此，姚先生认为勃勃将取天之意的“祁连”改译为“赫连”，“从汉语字面释为‘徽赫实与天连’；盖译音而兼译意，藉以夸示其‘系天之尊’也”非常有道理。但是，认为勃勃先世有可能是祁连山之西部鲜卑，以役属于匈奴，被号铁弗的看法有点牵强，史书明确记载“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并不是因役属于匈奴而被号铁弗。

在将宗室姓氏由“刘”姓改为“赫连”的同时，勃勃认为帝王“系天之

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因此又令“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其意为“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20]。

对于赫连与铁伐之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玩其文字，赫连与铁伐等姓，视之似汉名，然退而考之，此二名实皆系胡语，而以汉字表示之。赫连之原语为Kulun，即由天之义而音译者，由是以表示‘徽赫与天连’之义。又铁伐之原语，乃音译Mongol语与Turk语铁之义之temur者，由是以表示‘刚锐堪伐人’之意。职是之故，铁伐与铁弗皆同名而异译也。”[21]对于“铁伐”与“铁弗”为同名异译这一观点，许多学者持同样看法。对于同姓的“铁弗”氏被别而二之，分为正统的赫连氏与支庶的铁伐氏，有学者认为是“除了企图改观铁弗匈奴的杂类形象外，还含有神化王权、区分嫡庶、维护王室赫连氏在铁弗匈奴中‘正统’地位的目的在内”[22]。这种分析比较深刻，但似乎还不尽全面。

笔者认为勃勃将铁弗匈奴姓氏分别改为“赫连”“铁伐”二姓，更深层的原因是其民族意识或民族心理。无论学者们如何解释“赫连”“铁伐”之意，没有异议的是这两个姓氏肯定是胡语。两晋十六国时期，内迁游牧民族纷纷接受汉族文化，改汉姓、习汉语成为一种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勃勃逆势而动，放弃沿用已久的汉朝宗室之“刘”姓，使用一个少数民族特征比较明显的姓氏，其改姓除“企图改观铁弗匈奴的杂类形象”“神化王权、区分嫡庶、维护王室赫连氏在铁弗匈奴中‘正统’地位”之外，应蕴含着更深刻的含义。由汉朝宗室“刘”姓改为有胡族特征的“赫连”，有意强调和凸显其民族特征，与此同时，表明了铁弗匈奴作为胡族的高度自信心和自豪感。这种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在勃勃对“铁伐”一词的解释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其非正统”“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23]。

铁弗匈奴正式形成之后，一直在代北地区与保留了比较鲜明的游牧特性的拓跋鲜卑争夺领导权，但大多以失利而告终。后为拓跋鲜卑所逼迁居朔方地区，将注意力转移，开始向南扩展，趁势建立政权，并按原定计划逐渐蚕食后秦领土，在与后秦争夺岭北地区的过程中，铁弗匈奴的游牧特性及所拥有的骑兵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显现，势力向南推进得比较顺利，基本上实现了先取岭北，再接近长安的目标。在与后秦作战的过程中，铁弗匈奴对其所归属民族的自信心及民族自豪感进一步加强，两汉以来“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胡”强心理得以延伸，因此决定在修筑都城的同时，将铁弗匈奴姓氏分别改为“赫连”与“铁伐”氏。

由“铁伐”即“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可以推知，在勃勃看来，铁弗匈奴武力的强大及其部属的勇猛善战是本民族的一个优势，值得自豪和骄傲，应对此加以发扬光大，勃勃试图以这一优势军事力量征服广大的汉人及其地区，以达到他统一天下的目的。对于勃勃将铁弗匈奴的姓氏分别改为“赫连”“铁伐”，有学者分析得比较精当：“铁弗之改姓为赫连，主要还是改正草原诸部族的观感而言的，对于中原的汉人则‘又号其支庶为铁伐氏，云其宗族刚锐如铁，皆堪伐人’。此‘铁伐’正是‘铁弗’的异译，只从字面上看有‘以钢铁伐人’之义罢了”[24]。

一个民族或具体到一个人，民族意识或民族心态的产生及变化应该有一定的背景和根源，其所归属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环境等许多方面都会对此有所影响，勃勃改姓所体现的民族自信心及自豪感，分析说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的原因。自两汉魏晋以来，众多的游牧民族南迁，但是在这些南迁民族之中，匈奴民族是唯一一个建立过草原帝国的民族，而且自秦汉以来，与中原王朝无论是和是战，匈奴都是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匈奴奴隶制国家曾经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大漠南北，东并东胡，西服西域，形成了“长百蛮”抗大汉的强盛局面。西汉时期，匈奴孤鹿姑单于曾经说过：“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25]这就充分表达了在强盛时期匈奴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对于匈奴民族曾经的辉煌历史，铁弗匈奴有所感知，夏国所著《统万城铭》中多有反映：“然纯曜未渝，庆绵万祀，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昆山之外；密网遐张，则东絙沧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余载，虽三统迭制于崤函，五德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无异望于下。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是以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赫斯一奋，平阳挫汉祖之锐。虽霸王继踪，犹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开辟已来，未始闻也。非夫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孰能本枝于千叶，重光于万祀，履寒霜而逾荣，蒙重氛而弥耀者哉？”[26]除匈奴族建立过草原帝国之外，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各支匈奴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如刘汉、夏国、北凉等，如此一来，历史上的荣耀及眼前的辉煌足以使铁弗匈奴作为匈奴一支而感到自豪，“强胡”的

心理进一步强化。

二是其生活环境的因素。南匈奴内迁之后，逐渐深入中原腹地，虽然铁弗匈奴先祖去卑也曾在中原内地一带活动过，但是在曹操的政策干涉下，曹魏嘉平三年（251），已经深入河东平阳一带活动的南匈奴去卑一支迁居到代北一带。这一支匈奴返回代北地区之后，基本上一直是与拓跋部鲜卑争夺代北地区的领导权，一直到义熙十四年（418）攻入当时后秦的都城长安，铁弗匈奴部众才得以再次进入中国腹地。铁弗匈奴的首领勃勃更是自幼生活在草原，北魏登国六年（391），拓跋鲜卑攻破铁弗匈奴世居之代来城，年仅十一二岁的勃勃逃至驻牧在三城一带的鲜卑薛干部，后又被送至镇守高平的没弈于处，这些部族在当时是以游牧业为主。攻入长安的勃勃于次年（419）拒绝了群臣定都长安的建议，重返统万城，夏真兴七年（425），勃勃病死。勃勃一生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草原，因此，长期的北方草原生活使得勃勃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素养必然涂着十分浓厚的游牧部落习俗的色彩”[27]，从而对本民族有一种偏执的热爱和情有独钟。

三 滥杀隐含的自卑心理

军事力量的增强、统辖范围的扩大，使铁弗匈奴民族自信心及自豪感增强，与此同时，南进过程中的铁弗匈奴也更进一步接触、体会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又表现出一种不自信的卑怯心理。

随着游牧民族不断深入农耕地区，农耕文化的优势日益被南迁的游牧民族所感受。出于对农耕文化的向往及政治需要，内迁少数民族不约而同地采取各种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吸收汉文化。在这种趋势的带动下，铁弗匈奴于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六月建立政权之时，也攀附一个华夏族的先祖，自认为乃夏后氏之苗裔[28]，故勃勃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其政权名号“大夏”，改元“龙升”，并仿照中原汉族王朝的政制，设置百官[29]，以期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铁弗匈奴的这些做法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其进攻后秦都城长安的过程中，得到了关中地区人民的支持，夏凤翔六年（418）春，赫连璝进军至渭阳之时，关中民众络绎不绝地归附于赫连璝，“关中民降之者属路”[30]。

但是，铁弗匈奴攻占长安之后，在如何处理与汉族士人的关系上出现失误。赫连勃勃征召隐士京兆人韦祖思[31]，祖思“既至而恭惧过礼”，勃勃于是怒曰：“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

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32]对于勃勃杀害韦祖思一事，学者们大多以勃勃性格的残暴来解释，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稍嫌简单和程式化。

作为人类的适应方式，不同的经济与文化形式在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之内，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特殊优势。游牧文化的生存环境，是“不食之地”的地理与“逐水草迁徙”“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33]的游牧生产方式。而汉文化则是与湿润、半湿润的大陆大河型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系统。各文化系统一旦超出自身生态环境的界限，原来所具有的文化优越性便自然而然地丧失，他系统文化则显示出适应性极强的特殊优势。

魏晋时期，胡汉两种文化的关系正是如此情势。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南迁，打破了“与中国壤断土隔”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进入了与汉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于是胡文化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低势能文化，其与文化环境的不相适应性日趋尖锐地暴露出来。与此反观对照，汉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势能文化，并充分地展现出其优越性，文化学上的所谓“社会距离”由此产生。

对于“社会距离”，美国文化学家罗杰·皮尔逊曾做如下诠释：“当两个不同的亚文化群，甚至两个不同社会的成员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时，习惯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这个距离并非空间测量法，而是指个人或集团之间的隔离感，它产生于文化的不相容性。”[34]这样一种“社会距离”正是文化冲突的心理基础。

胡汉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其实质是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文化形态的冲突，这种冲突产生了胡汉文化质的不相容性。然而，这种不相容性并非不变动，文化冲突中的对立诸面不可避免地会在文化冲突中改变自身原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从对方吸收于己有用的文化质，从而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趋于一体化。对于游牧文化来说，抛弃旧质，以适应新的农业文明的生态环境是其急务。因此，内迁游牧民族都不约而同地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各种措施，如采取农业民族的典章制度、改汉姓、习汉语、服汉服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吸收农业文明，在这种趋势的影响和带动下，铁弗匈奴自然也不能免俗。

但是，无论内迁民族采取何种方式靠拢、接受、吸收汉族文化，对于进入中原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来说，与本民族差别比较大的汉文化形

式毕竟是非常陌生、深奥而又炫目的，北朝乐府名句“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正道出了胡人对汉文化的陌生感，因此，随着与汉族密切接触，深深体会和感受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意识到胡、汉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使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君临汉族地区有一种卑怯心理。

在两晋十六国时期，作为少数民族的匈奴族已不再是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一个统一的强大部族，从人数上看，入塞匈奴相对于汉族而言处于绝对劣势的位置，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也并不占优势，匈奴族社会逐步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族文化，虽然有所进步，但较之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汉族，在当时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把入塞匈奴作为一个整体，情况是这样，从其各个分支来看，更是如此。作为“胡父鲜卑母”后裔的铁弗匈奴，是游牧特性比较显著的一支，进入农耕地区之后，其不足之处日益凸显，出现了由于“各族与汉族相比，社会经济、文化程度的发展都比较低，他们向经济、文化发展比较高的汉族转化，表现在民族心理上更多的是卑怯心理，而不是民族的自傲自大”[35]。

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浓厚、根深蒂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观念，游牧民族——匈奴族原有的“强胡”心理丧失存在的根基。由“强胡”至“卑怯”，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往往使他们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待汉族人士的政策上难免会有许多失当之处，勃勃杀害韦祖思一事当从这方面分析和考虑。

而且，对于勃勃这种心理，从现代心理学中也能找到理论依据。“一个民族当与本民族成员在一起时，所显露的是个体意识，而当与其他民族在一起时，更多显露的则是民族意识。当所从属的民族处于上升时期时，他在其他民族面前表现于外的是民族的自尊意识。当所属民族团体衰落时，所显露于外的则是民族自卑与民族压抑感，更多倾向于怀旧、复古，崇仰民族历史、民族英雄人物，以获得民族意识上的心理平衡。”[36]而且，如果“一个民族长期受到文化上的攻击和迫害，因为他们的文化和民族特征而遭受污辱和歧视，就会使这一民族的成员产生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拒绝的自卑心理，在这一阶段民族成员羞于他们自己本民族的特征与文化，民族同一性失调。在行为上会有意躲避与其他民族接触的情形，或者过分地追求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上被认同的人，……自卑的民族意识只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中体验和表现出来，弱小的、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体验较深，在单独一个少数民族内部则很少有自卑的体

验”[37]。

从史书对勃勃杀害韦祖思一事的记载看，勃勃之所以杀害韦祖思，主要是因为韦祖思表现得过于“恭惧”，这种“恭惧”在勃勃看来是韦祖思把他作为“非类”对待，是一种非平等的状态；姚兴征召时，韦祖思“不拜姚兴”，却前来拜会勃勃，这又让勃勃认为韦祖思“不以我为帝王”，从此可以看出，勃勃所不愿意看到或者可以说比较惧怕的是被汉族视为“非类”，他希望的是汉族士人把他当作同类，而去平等地对待他，绝不是把他当作“非类”。对他毕恭毕敬和畏惧，同时还要让汉族士人把他当作真正的“帝王”，这一切都说明勃勃从心里认为汉族士人把他当作了“非类”，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帝王”，这是一种面对汉族士人时所表现的极度敏感的自卑，正如胡三省所说：“勃勃之杀祖思，虐矣。然祖思之恭惧过甚，勃勃以为薄己而杀之，则勃勃为有见，而祖思为无所守也”[38]。

总之，随着势力的南进，与农业民族联系加深，铁弗匈奴的民族心理表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由于匈奴族曾有的辉煌历史以及铁弗匈奴建立政权以来军事征服的顺利进行，铁弗匈奴民族的自我意识及自豪感增强；另一方面，面对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巨大的落差，铁弗匈奴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面对华夏文化时的卑怯心理。

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两汉曹魏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汉化。在这种趋势下，勃勃却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说是一种不识时务。也正是这种刻意强调其民族特征的意识，决定了铁弗匈奴所建的夏政权在政治、经济以及如何处理与汉族士人关系上的失当，其灭亡就成为一种必然。

[1] 《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45页。

[2] 《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62页。

[3]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第2548页。

[4] 《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三年”，第2391页。

[5] 《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76页。

[6] 《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三年”，第2391页。

[7] 《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三年”，第2392页。

[8] 《北史》卷93《僭伪附庸传》作“诰汁爰”。

[9]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及《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夏录》皆作“训儿”。

[10]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第2054页。

[11]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第102页。

[12] 〔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林幹《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8）》，中华书局，1983，第142页。

[13]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第193页。

[14]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15] 《北史》卷53《破六韩拔陵传》，第1902页。

[16] 《北史》卷53《破六韩拔陵传》，第1903页。

[17] 《汉书》卷6《武帝纪》，第203页；同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第2481页。

[18]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6页。

[19]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244页。

[20]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6页。

[21] 〔日〕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林幹《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8）》，中华书局，1983，第204页。

[22] 汪福宝：《秃发、拓跋“分姓目的”辨析》，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第254页。

[23]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6页。

[24]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第103页。

[25] 《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80页。

[26]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10～3211页。

[27]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6页。

[28] 《史记》及《汉书》皆云匈奴夏后氏苗裔淳维之后，勃勃，匈奴余种，故其所建政权名曰“夏”。

[29]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2页。

[30] 《资治通鉴》卷118“晋安帝义熙十四年”，第3716页。

[31] 李延寿的《北史》卷95“韦祖思”为“韦玄”。

[32]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9页。

[33]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7页。

[34] 罗杰·皮尔逊：《文化与社会》，《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第67页。

[35]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第34页。

[36] 孙玉兰、徐良玉：《民族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第31页。

[37] 张世富：《民族心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第46页。

[38] 《资治通鉴》卷118“晋安帝义熙十四年”，第3725页。

吐谷浑的“中国”认同

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之一。4世纪初，从辽东慕容鲜卑部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古阴山。西晋永嘉末年，从阴山南下，经陇山，到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南、向西发展，统治了今甘南、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族。至吐谷浑首领叶延时（329～351），始建立政权。[1]此后始以吐谷浑之名作姓氏，同时亦作为国号和部族名。其强盛之时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吐谷浑政权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其所统之民也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虽然吐谷浑民族偏居一隅，而且面临着当时中原地区政权林立、无统一政权的局面，但是吐谷浑政权的数代国君深深向往中原地区，无论是从其政权首领名号的选择、使用上，还是从他们的日常言语中，以及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上，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国”认同。关于这一点学术界除彭丰文在其《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一书中略有涉及之外，无人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故本书欲做一尝试。

一 言辞中的中国认同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之前“中国”一词有五种含义：其一，谓京师之意；其二，谓国境之内之意；其三，谓诸夏之领域；其四，中等之国之意；其五，中央之国之意。[2]此后又有华夏民族、华夏民族所建政权或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等含义。本章中“中国”的含义主要是华夏民族所建政权即所谓的正统王朝及中原地区这一地域概念。

吐谷浑之子吐延（317～329年在位），是吐谷浑民族历史上的第二位首领，同时也是吐谷浑历史上第一位明确表示认同“中国”的国君。因为身居僻壤，没有机会到中原建功立业，吐延曾对此深以为憾：“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光之世，与韩、彭、吴、邓并驱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潜窜穷山，隔在殊俗，不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生与麋鹿同群，死作毡裘之鬼，虽偷观日月，独不愧于心乎！”[3]从所引吐延之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中国”应该是一种地域概念，即中原地区之意。吐延的感叹，明确地反映了他对中原地区及其“礼教”的向往及强烈的认同感。

第五代国君视连（376～390年在位）也有与吐延同样的思想感情，他临终之时曾对其子视罴说："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庆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见，当在汝之孙辈耳。"[4]在这里，视连已经将吐谷浑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中国之西藩"，并且预言这种关系到了视连的孙子在位时才能实现。关于此处西藩之含义，有学者认为"'西藩'之说，很明显地表示'中国'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国家概念，而吐谷浑则主动以'中国'的藩属政权自居。这表明到视连已经对'中国'具有了政治意义上的认同"[5]。笔者以为此处将"中国"仍然解释为中原内地也未尝不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此处"中国"一词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国家概念，都说明吐谷浑在视连时期对"中国"有了明确的认同。

到第六代国君视罴（在位时间390～400年）之时，吐谷浑的认同应该更显明确和清晰。当时西秦国主乞伏乾归遣使拜视罴为使持节、都督龙涸已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但视罴不接受这些封号："自晋道不纲，奸雄竞逐，刘、石虐乱，秦、燕跋扈，河南王处形胜之地，宜当纠合义兵，以惩不顺，奈何私相假署，拟僭群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万，方欲扫氛秦陇，清彼沙凉，然后饮马泾渭，戮问鼎之竖，以一丸泥封东关，闭燕赵之路，迎天子于西京，以尽遐藩之节，终不能如季孟、子阳妄自尊大。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勋帝室，策名王府，建当年之功，流芳来叶邪！"[6]观以上视罴之言，他完全站在维护儒家所阐述的传统王道秩序的立场上，对西晋末年以后在北方建立政权者进行严厉谴责，将他们称为奸雄，把他们的行为称为"虐乱""跋扈""拟僭"，不仅如此，他又宣称自己将要替天行道，对这些人"戮问鼎之竖"，然后奉迎天子于西京，以尽"遐藩之节"。根据上下文判断，视罴所迎之天子显然是指东晋王朝的皇帝。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华夏民族所建政权的认同。他以一个"塞表小国"的君主身份，欲效春秋霸王"尊王攘夷"的大业，敢于与中原地区其他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列强争胜，以欲平定中原，统一中国，其心志之高，令人敬佩！

第八代首领树洛干（405～417年在位），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号戊寅可汗。[7]他在对"中国"的认同上与他的父亲毫无二致。他不仅决心提高本国的地位，还要争霸西戎，问鼎中原。他发表誓言说："孤先祖避地于此，暨孤七世，思与群贤共康休绪。今士马桓桓，控弦数万，孤将振威梁益，称霸西戎，观兵三秦，远朝天子！"[8]他要做的一件事是"振威梁益，称霸西戎，观兵三秦，远朝天

子”。此处“远朝天子”之“天子”从其所提到的几个地点如梁、益、三秦等来看应指的是东晋王朝的帝王，由此可知其少年心志如其父一样高大、壮烈！部众对他的行为与决心也是非常支持并积极鼓励：“此盛德之事也，愿大王自勉！”[9]

阿柴（有史书记载为“豺”）可汗（417~426年在位）是吐谷浑的第九代首领，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10]。有一次他登临西强山（位于今青海省东南部河南蒙古自治州境内），观览垫江（今白龙江）源，得知此江东流汇入大海，由此引发一些感慨：“水尚知归，吾虽塞表小国而都无所归乎！”[11]阿柴由白龙江向东流入大海这一自然现象，而感慨其“塞表小国”的归属，但是他的归属所指是什么呢？由阿柴此次游历之后的行为可做一些推测。史书记载，当年游历西强山之后不久，阿柴即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二月，遣使至南朝刘宋，宋少帝“以阿豺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12]，“未及拜受，刘义隆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遣使朝贡”[13]。从此可知，他想归属的应该是代表了正统王朝的刘宋。此一系列行为明显地表示他是把华夏民族所建之东晋、刘宋视为正宗，这种思想与其父、兄是一致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遣使通宋，远朝天子，表达了吐谷浑民族维护统一国家的立场。

正是由于吐谷浑的首领对“中国”的认同，故而赢得传统史家的赞誉。《晋书》评论吐谷浑可汗说：“吐谷浑分绪伪燕，远辞正嫡，率东胡之余众，掩西羌之旧宇，纲疏政暇，地广兵全，廓万里之基，贻一匡之训，弗忘忠义，良可嘉焉！”评论吐延“始遵朝化”，“高节不群，亦殊藩之秀也”[14]。并且赞扬叶延至孝，辟奚深友，视连光奉先之义。《晋书》还将吐谷浑与同出一部的慕容廆比较，认为吐谷浑与慕容廆作为同胞兄弟，都改革本民族习俗而学习华夏文化，具有共同性，但他们的后代忠奸有别，吐谷浑子孙世代忠义，慕容廆子孙则僭越不安分。最终忠训者累代繁荣，奸雄者数世而亡，真是应了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古训：“且浑廆连枝，生自边极，各谋孙而翼子，咸革裔而希华。廆胤奸凶，假凤图而窃号，浑嗣忠谨，距龙涸而归诚。怀奸者数世而亡，资忠者累叶弥劭，积善余庆，斯言信矣！”又说：“谷浑英奋，思矫颓运，克昌其绪，实资忠训。”[15]从这些传统史家的评价可知，当时的吐谷浑历代国主对“中国”有明确而强烈的认同。

从上述几个首领的言语可以看出，吐谷浑政权建立后一直对“中国”有明确的认同，而且呈日趋清晰且强烈的趋势，他们始终站在传统儒

家“大一统”的思想立场上，自觉维护中华民族的一统利益。在动荡分裂、“中国”无主的十六国时期，吐谷浑的可汗们始终以朝尊天子、一统中国为志向，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一统与融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二 政治行为中的中国认同

不仅吐谷浑几位著名首领的言语可以反映吐谷浑民族的“中国”认同，而且从其首领名号的选择、使用及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上，也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史书对于吐谷浑建立政权之时，首领称号没有明确记载，但能从其他记载方面找到一些线索。《资治通鉴》称吐延为河南王[16]，但不知“河南王”是自称还是其他政权给吐延的封号，史书对于此时吐谷浑与其他政权的关系无载，此“河南王”应与其他政权的封号无关，故可推测“河南王”为吐延自封。义熙初年（405），树洛干（405~417年在位）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17]；树洛干死，弟阿柴（豺）立，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18]；慕璝（426~436年在位）时又沿袭了树洛干的名号，称吐谷浑王[19]。

树洛干和其弟阿柴（阿豺）的名号称呼或为“王”，或为“刺史”，这种称号与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首领称号情况比较相近，尤其是其中的“河南王”“吐谷浑王”号。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名号前后有所变化且变化比较频繁，但绝大多数政权基本上使用过“王”的称号，如汉、成汉、后赵、前燕、前凉、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北凉、西燕，而且除了一直以“公”或“牧”为号的西凉之外，在政权首领名号层级顺序中“王”总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吐谷浑除使用过明确表示为地方政权性质的“刺史”名号之外，使用最多的也是“王”号，如吐谷浑王、河南王等。

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商代和西周的首领皆称“王”，但周王有时又称“天子”。春秋时期，“王”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衰退，封建诸侯逐渐脱离中央掌握，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各行其是。进入战国时期，七雄相继称王，“王”这一称号开始失去独尊的地位，甚至一些势力比较强的大国君主已经不再满足于称王，他们开始将“帝”这一称号加到自己头上，如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公元前221年秦国吞并六国，此时能与秦王对峙的统治者皆不复存在，秦王王号与其取得的功业已经不匹配，于是他开始改革称号，号曰“皇帝”[20]，从此，中国

历史上便开始有了皇帝这一尊称，皇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独有的尊号。“王”的称号，虽然在汉代许慎著《说文解字》里仍解释为“天下所归往也”，但是自皇帝制度建立后，先秦时期的王已失去了原有的君主地位而沦为皇帝统治下的臣属，它通常系指皇帝分封给同姓诸王或异姓诸臣的最高爵号，已非商周以来称王的原有意义了，这个王，只不过是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罢了。

那么为什么十六国时期，政权建立之时没有循例使用最高统治者的尊号“皇帝”，反而使用自有皇帝称号以后就已经沦落为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的称号呢？

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名号大多称“王”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们之所以选择“王”作为政权首领名号，应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有关。具体而言，建立政权的刘渊之所以称“汉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晋王朝末期虽然有“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许多灾难，人们怨声载道，但它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统王朝，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十六国政权中，除了刘氏的汉王朝是在西晋灭亡之前建立的，其他大多建立于建兴四年（316）西晋灭亡之后。为什么统一王朝灭亡之后，这些政权还是称“王”而不称帝呢？利鹿孤与张祚的情况可能能说明问题。隆安五年（401）正月，南凉武威王利鹿孤想称帝，其安国将军鍮勿仑劝说他：“吾国自上世以来，被发左衽，无冠带之饰，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室庐，故能雄视沙漠，抗衡中夏。今举大号，诚顺民心。然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敌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此久长之良策也。且虚名无实，徒足为世之质的，将安用之！”[21]因此，利鹿孤放弃称帝，改称河西王。前凉张祚称凉王之后欲称帝，郎中丁琪给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我自武公（张轨）以来，世守臣节，抱忠履谦五十余年，故能以一州之众，抗举世之虏……彼士民所以用命，四远所以归向者，以吾能奉晋室故也。今而自尊，则中外离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强敌乎！”[22]最终张祚保留了“凉王”的称号。鍮勿仑与丁琪的劝说理由应该代表了各个政权建立时对其所处具体情况的准确研判，也是他们称“王”而不称皇帝的原因，即当时整个北方地区政权林立，经济发展不平衡，实力大小也不一，除了前秦统一过北方地区之外，其他政权基本上都是偏居一隅，不具有能号令全国或北方地区的实力，故而在选择政权首领的称号时比较慎重，不敢高调以天下独尊的“皇帝”为号，而选择以吐谷浑王或河南王以及凉王、燕王、秦王等区

域性政权特征比较明显的“王”为名号，以示自己只是类似于春秋霸主的身份，以免成为众矢之的。

除了出于上述所说政权对形势的研判原因之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影响。虽然中国传统夷夏观有开放性的一面，如不以血统、地域而是以文化论夷夏，夷夏可以转化等，但是每当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夷夏观的封闭和保守的一面往往占上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调总是甚嚣尘上，严“夷夏之辨”，在汉族大多数士人的心目中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准则，左右着他们的言行。因此，在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的歧视与防范下，内迁民族统治者对于君临长城以南地区仍忐忑不安，普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卑怯心理。

故而在对当时形势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以及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歧视与防范下，十六国政权首领在建立政权初期，选择首领名号时没有一个敢直接称帝，而是不得不选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沦为一方之主的“王”号，而吐谷浑也不例外。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十六国时期所建政权在首领名号的选择、使用上与吐谷浑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吐谷浑偏居一隅，完全可以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而采用已经成为最高首领称号的“皇帝”，但是吐谷浑民族的各个首领并没有这样选择，而仍旧是选择了代表一方之主的“王”号，这也反映了吐谷浑对于一统的期待。

不仅如此，吐谷浑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也能体现对“中国”的认同。吐谷浑政权建立后，为了在政权林立的局面下保全自己，时常周旋于北方政权与南方东晋或刘宋政权之间，但是对于这两个政权，吐谷浑的态度还是有所差别的。

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最早发生在慕璝擒赫连定之时：“吐谷浑王慕璝遣侍郎谢太宁奉表于魏，请送赫连定。己丑，魏以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23]北魏太延二年（436），吐谷浑慕利延立，次年北魏封其为西平王[24]。与北魏建立关系的第二年，即宋元嘉九年（432），吐谷浑遣司马赵叙向刘宋朝献，并告捷（即擒获赫连定之捷），刘宋加封慕璝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进爵陇西王”[25]，阿柴（豺）死后，其子慕璝又奉表通使刘义隆，义隆授陇西公，后封为陇西王[26]。第十一代国君慕利延死后，树洛干之子拾寅立，接受刘义隆封爵，号河南

王，“（北魏）世祖遣使拜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但拾寅“自恃险远，颇不恭命”，反而“通使于刘彧，献善马、四角羊，彧加之官号”[27]。此后与刘宋的关系也一直延续。吐谷浑这种同时向南北两大政权遣使称臣、接受封号的行动，是地处西北、较为弱小的政权一贯采取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他们处于两大政权之间，为了自身的生存和从两大政权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采取的[28]。不过从拾寅对刘宋与北魏封号的态度上可知，他对代表着“中国”的刘宋政权的认同。

虽然吐谷浑有时同时通使刘宋与北魏或同时接受南北两大政权的封号，但是吐谷浑与刘宋及北魏的关系，还是略有不同。吐谷浑和北魏建立关系以来，通使次数较多，据现有资料统计，吐谷浑向北魏遣使共达六十一次，远远超过西域或邻近北魏的政权向北魏遣使的次数[29]。但有时也会和北魏发生一些战争冲突等不愉快，如宋元嘉二十九年（452），“拾寅东破索虏（南方史书对拓跋鲜卑的称呼），加开府仪同三司”[30]，但是这种冲突与不愉快，从来没有在与南方政权（东晋或刘宋政权）交往过程中发生，这种对交往的两个政权的不同态度也说明了吐谷浑对南方刘宋政权的认同可能更真实。而刘宋政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就代表着“中国”。因此吐谷浑对刘宋政权的认同可以说是对“中国”的认同。

综上所述，在十六国时期，虽然中原内地政权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但偏居一隅的吐谷浑在中原无主时仍旧非常明确地认同“中国”这一地理概念，甚或代表着当时正统王朝的东晋或刘宋。这一点，无论是在其首领的言语中，还是政权名号的使用选择上及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上都有所体现。这些都表明吐谷浑民族在十六国时期有强烈的“中国”及一统认同，是中国历史上向心力比较强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 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5页。

[2] 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71页。

[3] 《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38页。

[4] 《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40页。

[5] 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第129页。

[6] 《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41页。

[7] 《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41页。

[8] 《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41页。

[9] 《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42页。

[10]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4页。

[11] 《北史》卷96，第318页；参见《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5页。

[12] 《宋书》卷4《少帝纪》，第64页。

[13]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5页。

[14] 《晋书》卷97《四夷传》，第2551页。

[15] 《晋书》97《四夷传》，第2551页。

[16] 《资治通鉴》卷94“晋成帝咸和四年”，第2973页。

[17] 《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41页。

[18]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4页。

[19] 《资治通鉴》卷122“晋文帝元嘉八年”，第3836页。

[20]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21] 《资治通鉴》卷112“晋安帝隆安五年”，第3517页；《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

[22] 《资治通鉴》卷99“穆帝永和十年”，第3137页。

[23] 《资治通鉴》卷122“晋文帝元嘉八年”，第3833页。

[24]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7页。

[25]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2页。

[26]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5、2237页。

[27]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7页。

[28] 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56页。

[29] 周伟洲：《吐谷浑史》，第43页。

[30]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3页。

前秦苻氏的民族认同与史书编纂

一 苻氏的民族认同

十六国政权中的前秦是氐族建立的政权。氐人“其自相号盍稚”[1]，氐则是华夏民族或其他民族对其之称号，即氐是一种他称。但是，魏晋以来“氐”也逐渐成为一种自称，仇池氐族杨难敌曾说：“使君初来，大荒之后，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贳也。”[2]

关于氐族的起源，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看法为氐、羌同源而异流，“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疆”[3]，“氐，黎都切，音低，羌也”[4]，当代学者则进而指出，氐族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最终形成单一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至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5]。另一种看法是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民族。氐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故自古氐、羌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6]。

前秦建立者苻氏的祖先，初居于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时人以其家池中生五丈长的蒲草，称之为“蒲家”，因以为姓。[7]曹魏时，由武都迁于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南），世为部落小帅。晋永嘉四年（310），蒲洪被宗人拥推为盟主，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8]。大兴二年（319），刘曜在长安称帝，以苻洪为宁西将军[9]、率义侯[10]，苻氏曾徙居于高陆（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西南），晋氐王。东晋咸和八年（333），降后赵石虎，拜冠军将军、泾阳伯。永和六年（350）春，苻洪遣使至江东，东晋以洪为征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11]，后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永和七年（351）苻健即天王、大单于位，国号大秦，改元皇始，史称“前秦”。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很早就认识到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将民族进行分类，不仅将所认识到的周边各民族按照方位分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同时又将这些民族与华夏民族区分为“夷”与“夏”两大类，并确立了夷夏对立、夷卑夏尊的政治原则，这就

使得中国古代的众多边疆民族都被归入“戎狄”“胡人”即所谓的“夷”的概念范畴中。按照中国这种传统的“夷夏之辨”观点，相对于华夏民族来说，氐人是处于边疆的“夷狄”“胡人”。因此，在历史久远的“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之下，华夏民族的民族观念，通过儒学的传播映射到氐人自身，因此，氐人是“夷狄”“胡人”这样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氐人的主体民族意识。

苻坚8岁时，“请师就家学”，其祖父苻洪曾对苻坚说：“汝夷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12]由此可知，氐族早在苻洪之时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属于非华夏民族的“夷狄”的，在其民族认同上，是认同“夷狄”的。这种民族身份的认同，即使到了前秦快要溃灭的时候仍旧存在。苻坚想发动伐晋战争，苻融劝阻，其主要理由是他认为前秦“国家，戎族也”，相对于地处江南的东晋王朝来说，在人心向背上是不占优势的：“坚既有意荆扬，时慕容垂、姚苌等常说坚以平吴封禅之事，坚谓江东可平，寝不暇旦。融每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13]在建立前秦政权三十多年之后，苻氏一族中还有人将自己的民族归属认定为戎族。不仅苻融如此，苻坚也曾明确地将自己的族属定位为“胡”。淝水之战前秦战败后，苻坚被羌人首领姚苌所俘，姚苌以“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为由向苻坚讨要传国玉玺，但是苻坚坚决拒绝，其理由是“五胡次序，无汝羌名”[14]，无论“五胡次序”是什么含义，但与胡人有关是毫无疑问的，从中可知，在苻坚的心中氐人是属于五胡次序范围之内的，是有资格承受天命的。因此，苻坚在民族身份的认同上也认可自己的胡人身份，亦可见“夷狄”或“胡人”的身份认同在前秦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中是普遍存在的。

而且在祭祀祖先的明堂里，苻坚祭拜的也是自己的真实先祖：“坚起明堂，缮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15]这与刘元海祭祀的祖先有明显的不同，刘元海建立汉政权时，祭祀的是其攀附的先祖，即刘氏先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祭之。”[16]当然这也许与苻坚等氐族对先祖的攀附略远，而详细的谱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

虽然在前秦即将溃灭的时候，氐族在民族属性上仍将自身归于“戎族”，但是到苻坚统治后期，前秦统治集团核心人员的民族意识还是发生了一些悄然的转换。一方面苻坚等氐族豪贵都有过自称为“胡人”或“夷

狄”的事例，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理直气壮地指斥周边其他民族为“胡人”或“夷狄”，似乎自己已经不是“胡人”或“夷狄”了。将自己归为“戎族”的苻融向苻坚上书说：“臣闻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夏，跨有六州，南面称帝。”苻坚回答说：“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17]可见，在民族归属上，苻坚将慕容鲜卑归于“夷狄”，而他自己所代表的前秦则显然被置于夷夏关系的另一端，自认是代表华夏，因而摆出一副“夷狄应和”的高姿态。

对非华夏民族不仅有“胡”和“夷狄”之称，同时也有“虏”“戎”之称。如苻坚称匈奴刘卫辰部为“戎”，“时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并说：“朕方修魏绛和戎之术，不可以小利忘大情。”[18]在此，苻坚明显地将匈奴左贤王刘卫辰置于“戎”族之地。而且史书明确记载“秦人呼鲜卑为白虏”[19]，也有具体事实证实。苻晖屡为冲所败，坚让之曰：“汝，吾之子也，拥大众，屡为白虏小儿所摧，何用生为。”[20]苻坚命吕光征西域时，曾称西域各族为“戎”，吕光发长安，坚送于建章宫，并对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21]这些事例说明，在苻氏的心目中，周围的民族都是“胡”、“戎”、“虏”或“夷狄”。这说明氐族对自身民族属性的认识是有变化的，已经开始自外于其他的非华夏民族，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氐族自身的民族认同在苻坚统治后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总之，在苻坚统治后期，前秦统治集团核心人员虽然仍保留着本民族为“胡人”或“夷狄”的历史记忆，但同时也开始大大方方地以华夏自居，而把“夷狄”“胡”这样的名称送给了周边其他民族和政权。氐族既自外于华夏民族而自认同为“戎”或“胡”，同时又自外于其他非华夏民族，并以“戎”“胡”称之，这种混乱和矛盾反映了苻氏在民族认同上的纠结。这种状况的出现也许与氐人对“胡”“夷”的认识有关。鲜卑、羌等是华夏民族对非华夏民族的认识，非华夏民族之间如何认识彼此，史书中描述得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在华夏民族的文本书写模式之下，也只能以华夏民族思维模式中的“华”“夷”去认识与己不同的其他非华夏民族了。在氐人的观念里，此时的“胡”“夷”等称谓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了不同的含义，与华夏民族观念中的“胡”之含义有所不同。在氐人的观念中，“胡”“戎狄”之类的称谓大致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对民族属性的客观叙述，不具有贬损意义，如前文所引苻洪对苻坚的称谓，以及苻坚所说的“五胡次序”中的“胡”应该属于这一类，否则对“胡”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一种是

与华夏民族相对、带有贬损含义的称谓，如称呼其他非华夏民族的情况。

虽然，在前秦政权统治阶层中，在民族身份的认同上普遍存在与“胡”“夷”联系在一起的状况，但是，前秦统治者氐人又同其内迁民族一样，在祖源追溯上，似乎又力图模糊、淡化自己的胡人身份。为此，苻氏君臣创造了苻氏先人为“有扈氏之苗裔”[22]的传说：“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23]有扈氏，《史记》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我、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24]苻氏君臣制造这个传说，是为了论证苻氏的先人是华夏之苗裔，从祖源、族源上淡化了苻氏家族的氐人身份，在舆论宣传上将苻氏家族族源向华夏先祖族系靠拢，以使在苻氏家族先祖与华夏民族先祖之间建立血缘、族源联系，从而巧妙地模糊了苻氏家族的“胡人”色彩，实现前秦政权统治集团整体民族意识由“夷狄”向华夏的转换。也许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之下，这种祖源追溯的书写方式才成为十六国时期史书编纂的一种普遍现象。

二 前秦的史书编纂

十六国时期，非华夏民族趁中原地区动荡不安之机纷纷建立政权，虽然如此，但是在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影响下，建立政权的非华夏民族的政治权威和话语霸权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中原地区很早以来即是华夏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历史上尽管朝代递嬗、沧桑迭变，但从未在这一地区建立过异族政权。故当十六国胡族政权相继入主中原时，视中原汉族世袭旧王朝为正统、胡族部落政权为僭伪的政治观念，也就在华夏民族中自然生发而成。这一正统观念不仅已深入南北华夏民族人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十六国胡族政权的绝大部分统治者。困扰中国多年之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正统性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诸多非华夏民族。

氐族建立政权之后也同时面临着其政权合法性的解释问题，因为从血统上说，与西晋一脉相承的东晋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同时代的十六国政权也普遍认同东晋的华夏宗主身份。东晋虽然衰弱不堪，但毕竟是汉民族正统王朝，上合天命，下附人心，非轻易可灭。当时在前秦政权中，许多人持有这种观点。淝水之战前苻坚欲亲统百万大

军，征讨东晋，其太子左卫率石越对曰："吴人恃险偏隅，不宾王命，陛下亲御六师，问罪衡越，诚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岁镇星守斗牛，福德在吴，悬象无差，弗可犯也。且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昌明，其孙也，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贰之衅，臣愚以为利用修德，未宜动师。"[25]太子的劝告虽较苻坚之弟融的劝解委婉，但他也清醒地看到了东晋汉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和夷夏之辨的潜在影响，故而力阻苻坚铤而走险、用兵东晋。而且在前秦政权中一直积极协助苻坚的大臣汉人王猛也坚持着这种理念。王猛病重之时，苻坚亲临省病，并询问以后之事，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26]在王猛的心目中，地处江南地区的东晋王朝才是正统之所在。其实在苻坚的心里，东晋王朝也是正统之所在，当姚苌向苻坚讨玉玺时，苻坚拒绝，同时告知姚苌"玺已送晋，不可得也"[27]，言下之意，东晋王朝是有资格得到玉玺的。

因此，面对这种正统性的尴尬，十六国时期的非华夏民族使出了浑身解数。首先在选择政权体制时，基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传统华夏民族的政权或国家体制形式，这种体制形式是"建立和完善一个华夏帝国式政治体的过程，可以称为政治体的华夏化"[28]。其次，一个在传统"夷夏之辨"思想中与华夏相对的非华夏民族要实现对各民族，尤其是对占绝大多数的华夏民族实行统治，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给本朝政权寻找更为有力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强有力的宣传尤为必要，这是与其武功相辅而行的一种文治手段。"在文化领域，政治体首先关注的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论证。袭用汉晋帝国模式的政治体，面对着一套写满华夷秩序符号的政治文化传统，他们要论证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最终不得不牵涉到华夏或非华夏的身份认同问题。"[29]

在中国古代，史学一直肩负着这种政治使命，一方面，统治者以史学为经世致用之学，把历朝的兴衰成败作为经验教训，从以往的历史事件中借鉴为政的得失，汲取治国驭民的方略、争霸称雄的权谋。另一方面，史学又是表述先民的历史、宣传帝王伟业的工具。基于此，史学在中国古代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得到提倡，"而在华夏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修史关系到本政权的历史形象和现实合法性，是一个帝国必须进行的事业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相关周边民族的记载，而有关民族史的撰

述，《史记》在体例上和内容上有开创性的贡献，对后世史书的书写模式与书写内容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史记》写于汉代建国的百年之后，汉帝国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与周边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大一统思想支配下，《史记》对各民族史事的记载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内容生动、丰富的画卷。《史记》不仅记载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而且在列传中还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这与先秦记载只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史记》设置各民族史传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把周边各民族纳入“中国”通史这一大范围的概念之中。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把当时中国境内的许多民族与黄帝子孙联系在一起：“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30]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31]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子孙，昌意之子也。”[32]越王勾践为禹之苗裔：“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33]东越王为勾践之后：“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34]间接地将东越与华夏民族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当时在华夏民族认知范围内中原地区周边的非华夏民族在《史记》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或其子孙联系在一起，虽然这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形势所做的一种民族一统的宣传，但是这种认知方式被后世的史家所继承、沿袭。因此，《汉书》对某些周边非华夏民族的祖源记载与《史记》大同小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35]。

《史记》《汉书》《后汉书》对周边民族的书写方式，“完成了对两汉已知的所有异族的分类，并为其中的绝大部分建构了族源和谱系。此后的纪传体王朝史在撰写夷狄传之时，大多只需将其渊源上溯至两《汉书》记载的某族，即完成了与上古以来诸异族谱系的对接”[36]。“《史记》和两《汉书》奠定的叙述模式，加上此后诸正史对这一叙述模式的继承，不仅在华夏知识世界建立起源远流长，纵横交错的夷狄谱系树，也让非华夏诸族群本身接受了这种分类和谱系，提供了族群凝聚可以借用的认同方向。”[37]在这种状况下，华夏民族的史书编纂传统深深影响了内迁的各个民族。因此，每个内迁民族建立政权之后，都高度重视史书编纂工作。

前秦统治者是与华夏民族同居共处已久的非华夏民族，在与华夏民

族相处过程中，他们早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在心理上、习惯上易于承袭汉族的统治方式，为了巩固统治，效法汉、魏，极需要利用史学为他们制造理论根据，表彰先族；灵活借鉴汉文化的种种思想观念并为之所用，堪称当时少数民族政治家安身立命的当务之急。而且随着非华夏民族汉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些人习诵经史，潜心向学，也出现了一些本民族的史学家，与汉族史家一样秉笔著史。前秦梁熙，氐人，与兄梁傥并有文名，时有“关中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环文琦章”之誉，梁熙曾任史职，参与撰修前秦国史。此外，有关前秦修史的情况，史书也有简单的记载：“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38]

前秦所著史书，恰好又是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前秦史的主要来源：“鸿，字彦鸾……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子、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39]《十六国春秋》又成为《晋书》“载记”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是在修史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史书的书写方式仍是最重要的参考与模仿对象。

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主持撰写的史书，大多将其先祖与华夏民族联系在一起。北魏鲜卑拓跋氏，“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40]。铁弗匈奴赫连勃勃则标榜自己为“大禹之后，世居幽朔”“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41]“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而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42]；鲜卑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43]。

不仅如此，这些史书会有意识地掩饰非华夏民族野蛮落后的一面，对统治者涂抹称颂。在史书写作中，史家运用语言文字时，“讳彼夷音，

变成华语”[44]，“妄益文采，虚加风扬，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45]。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史书叙述的对象是非华夏民族，但是采取的是华夏民族的史书编纂模式与话语体系，因此在这种叙述体系下，非华夏民族在某些方面开始华夏化，祖源的追溯也许即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体现。

前秦苻坚时，“（苻）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46]。前秦统治者也有了史书应该为尊者讳的观念。

前秦政权建立之后，随着政治实力的增强，氐族的代表人物苻坚对本民族的政治定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有了一统天下的观念。苻坚为了统一天下，在晋太元七年（382），召集群臣商议南征之事，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通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铺，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47]当一些大臣认为攻打晋朝时机不成熟时，苻坚又以“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48]为由加以驳斥。后来苻坚南游霸上时，对群臣曰：“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今天下垂平，惟东南未殄。朕忝荷大业，巨责攸归。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每思桓温之寇也，江东不可不灭。今有劲卒百万，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遗晋，若商风之陨秋箨。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实未解所由。晋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吴者，天下何由一轨！吾计决矣，不复与诸卿议也。”[49]希望大臣支持他征讨东晋，完成统一大业。

史书记载，苻坚有比较高的汉化水平，对于这一点唐人也比较认同，“永固（苻坚字）雅量环姿，变夷从夏，叶鱼龙之谣咏，挺草付之休征，克剪奸回，纂承伪历，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50]。这说明，苻坚的汉化程度比较深，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执着于一统观念的非华夏民族首领，在一统观念引导下的司马迁的史书撰写方式正好满足了其需求，也可以为其实现一统服务，故而前秦的史官撰写前秦国史时，自然也将其祖源追溯到了黄帝。考虑到十六国时期的文化大背景，以及前秦统治集团对汉文化情有独钟的实际情况，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推断。

因此，无论从史书撰写本身，还是书写模式、书写内容以及为尊者讳的痼疾等都被前秦统治者所承袭，故而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苻氏在民族归属上的混乱与矛盾状况就顺理成章了。这既是非华夏民族政权的需要，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史书书写模式影响所致。

综上所述，苻氏氐族在中国传统史书编纂体系及话语体系影响下，在编撰史书时将自己的祖源追溯至有扈氏，与汉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其统治阶层，在民族身份的认同上，认同自己是“胡”或“夷狄”仍是一种普遍现象，故而其在民族认同上体现出非常矛盾的一面，由此可见，苻氏的氐族在当时并没有构建起非常清晰或明确的谱系。

[1]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第858页。

[2]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8《大同志》，巴蜀书社，1984，第653页。

[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902页。

[4] 丁度：《集韵》。

[5] 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6] 参见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9～22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第123～126页。

[7]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第2867页。

[8]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1页。

[9] 《魏书》卷95《苻健传》，第2073页。

[10] 《资治通鉴》卷91“晋元帝太兴二年”，第2874页。

[11]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第2868页。

[12]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884页。

[13]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35页。

[14]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28页。

[15]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886页。

[16]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

[17]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896页。

[18]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886页。

[19]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28页。

[20]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26页。

[21]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14页。

[22]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第2867页。

[23] 李昉：《太平御览》卷121《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585页。

[24] 《史记》卷2《夏本纪》，第89页。

[25]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12页。

[26]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33页。

[27]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28页。

[28] 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9] 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0]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7页。

[31] 《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75页。

[32] 《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89页。

[33] 《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第1739页。

[34]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79页。

[35] 《汉书》卷94《匈奴列传》，第3743页。

[36] 胡鸿：《中古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中华书局，2014，第42页。

[37] 胡鸿：《中古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中华书局，2014，第42页。

[38]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33~334页。

[39] 《魏书》卷67《崔光传附鸿传》，第1502页。

[40] 《魏书》卷1《序纪》，第1页。

[41]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3202页。

[42]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10页。

[43]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44] 《史通》卷6《言语》，第139页。

[45] 《史通》卷6《言语》，第139页。

[46]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904页。

[47]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11页。

[48]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14页。

[49]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第2915页。

[50]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第2956页。

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中古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教繁荣发展的时期，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自两汉时期传入的外来宗教——佛教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活动频繁的时期。在文化多元、民族交融的状况下，错居杂处的华夏民族与内迁民族之间为了政治生态及文化资源的竞争，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去寻求民族边界辨识的工具[1]。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其思想和信仰因素对个体、群体的归属感、自我意识、自尊和社会角色地位有深刻的影响，甚至有些宗教对此有直接的规定。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宗教是不同民族之间区分的重要特征之一。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在中古尤其是十六国北朝时期，无论对汉民族还是内迁非汉民族来说，都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新的信仰资源。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观念，使华夏民族本能地对来自异域的佛教产生一种拒斥心理，从而捍卫华夏文化的正统；而入主中原的内迁民族因为其“胡”“夷”之身份对佛教却有一种与华夏民族截然不同的亲近感，并且主动利用佛教进行民族身份的构建。面对同样的宗教资源，一个群体亲近，一个群体拒斥，两个群体的不同表现，使得在中古时期，外来的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及一定范围内，成为内迁民族与华夏民族标识边界的一个重要工具。

但是，对中古时期佛教与民族边界的互动现象，几乎无人关注。有关这一时期佛教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佛教教义、传播状况、经典的翻译及高僧研究等方面。吕建福从理论上对宗教与民族认同、佛教传入对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嬗变等做了阐述[2]，具体把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或族群）认同等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对于这一时期佛教与民族边界的构建和互动等问题，学界更是少有人涉及，故本书尝试在此方面做一些努力。

一 儒、道的排斥：民族身份的辨识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及思想体系，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在许多观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宗教实践方面，皆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相冲突，因此一直受到来自国家层面及儒家、道教之士的批评、排斥。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宗教信仰理念。早在佛教汉代传入中国之时，政府就在地域及民族身份上对佛教的传播及信仰做了限制，规定只允许西域胡人立寺信奉[3]；西晋太康年间（280～289），政府仍明令“禁晋人（与‘胡’相对应的汉人或华夏民族）作沙门”[4]。不准汉人出家为僧的政策经汉代历曹魏、西晋一直延续到后赵。禁令是一回事，实际情况也许是另一回事，当时汉人（为了行文方便，有时也称华夏民族）也有出家之人。但是，汉人的这种行为毕竟属于私度，从政府层面来说是不合法的。所以，“在汉、魏、西晋时期，佛教主要流传于侨居汉地都邑的胡人聚落空间内。而从文献反映的早期汉族僧人材料看，代表人物主要有魏、西晋时期朱士行、支孝龙、刘元真、竺法深等人。由于魏、西晋时期国家仍禁止汉人出家，汉人社会舆论环境也不支持汉人出家，故出家汉僧的生活空间基本上离不开奉佛的侨居胡人生活空间”[5]。

除了国家或政府层面的明确禁止，传统的儒、道之士，也以佛教为“夷狄之术”的理由加以排斥。东汉明帝遣使西行取经，获经像，“所图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经，缄于兰台石室”[6]。但此行为遭到反对：“今陛下道迈义皇，德高尧舜，窃承毕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胡神，所说不参华夏。”[7]反对者非常明确地把佛祖归为“胡神”，并指责佛教教义“不参华夏”，将佛教排除在华夏文化之外。对于佛教信仰，“世人学士多谤毁之”[8]，且信奉之人极少。因而当迦叶摩腾“不惮疲苦，冒涉流沙”来到洛阳时，东汉明帝出于礼节虽以礼相待，并“立精舍以处之”，但时人“未有归信者”[9]。成书于汉末三国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梳理了时人对佛教的困惑及误解，其中记载了许多当时儒者对佛教的非难之事，试举一例：“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10]也是径直将佛教当作“夷狄之术”。这种例子在《理惑论》中非常多，兹不赘举。“胡神”与“夷狄之术”是儒者及道士排斥、反对佛教时经常使用的称呼。

三国时期，儒、释、道之间主要围绕老子化胡、沙门袒服及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等问题发生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儒、道二家从伦理纲常上将佛教置于与“夏”相对的“夷”之地位。十六国时期，后赵的中书著作郎王度因“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反对后赵境内百姓信奉或传播佛教。东晋时期，蔡谟以佛教是“夷狄之俗”劝阻意欲为先帝绘佛像作颂的行为：“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于义有疑焉。”[11]于是此事无成。《广弘明

集》对此事的记载是蔡谟同样明确地将佛与夷人联系在一起："佛者，夷人，惟闻变夷从夏，不闻变夏从夷。"[12]南朝梁时，荀济上表劝谏舍身奉佛的"中华之贵胄"梁武帝抛弃佛教时，把佛教与"姚、石羌胡"联系在一起："陛下以中华之贵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轨躅，窃不取一也。"[13]到了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夷夏之争达到了高潮，同时呈现南北截然不同的差异。南朝主要是围绕《夷夏论》和《三破论》的辩难，是理论上的争论，而北朝则由政府主导，将夷夏之争演变为激烈的灭佛行为。

由于国家政府层面的禁止，以及儒、道之士的排斥，一直到后赵政权正式放开汉人奉佛的禁令之前，汉人大多不奉佛，奉佛者主要为"羌胡之种"："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14]；"寻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国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种"[15]。出家为僧者大多为胡人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由此，是否信奉佛教也成为当时辨识胡人群体与汉人群体的一个重要标志。

基于把外来佛教当作"夷狄之俗"的认识，从东汉至两晋，儒、道之士对佛教的批评、攻击主要以"夷夏之辨"为思想武器。所谓"夷夏之辨"即"夷夏有别"，所以要求"严华夷之防"，严格区分夷、夏。"夷夏之辨"既是一种文化积淀和社会心理，也是一种文化歧视，同时也是民族辨识的一个标准。"夷夏之辨"的主体主要是指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它起初属于民族和地域矛盾，后来则主要体现为文化上的态度。按照"夷夏之辨"的思想精神，佛教因远自天竺，自然便是"夷狄之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儒、道与佛教之间的"夷夏之争"，虽然属于中外文化之争的性质，但同时也具有民族之争的含义。尤其是南朝宋、齐、梁三代，道教与佛教就夷夏问题展开的"辩论"更是如此，在这些论争中，儒、道之士非常明确地将佛教置于"夷"的地位，与"夏"相对。通过儒、道、释之间的"夷夏之辨"，刻意凸显、强调了华夏民族与边缘地区民族或内迁胡族之间民族属性的差异，使"夷""夏"之间的界限由想象的或概念性的，变成具体的、可操作的，二者之间的界限由此也变得更加明晰。

中国传统思想对外来文化既有封闭、排斥的一面，同时又有灵活、变通的一面，它虽然强调夷夏有别，但夷夏之间的边界并不完全固定，可以随着文化上的变迁而变化，正所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6]者也。这种开放的、以文

化不以血统区分夷夏的方式，可以通过文化上的趋同消弭夷、夏之间的民族界限，为内迁胡民族进入华夏民族这一系列提供了理论基础或实际上的可能。

二 石虎的尊崇：胡族身份的凸显

佛教被政府及儒、道之士排斥的情况，自后赵政权建立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佛典翻译、教义的研究以及佛教信仰的普及，都比以前有较大发展。”[17]

十六国时期，许多政权不仅公开支持佛教，而且这些政权的首领对佛教也非常崇信，其中尤以后赵羯人石虎、前秦氐人苻坚、后秦羌人姚兴等为甚。后赵石勒尊崇西域高僧佛图澄，称其为“国之大宝”[18]，让其参与军国要事，甚至把诸幼子送到佛寺中教养。不仅如此，石虎还明令此后汉人可以公开出家，不必私度。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大量的汉人也开始公开信奉佛教，以致僧人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19]。“佛图澄与其弟子建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字。”[20]石赵统治者的崇佛和佛图澄的弘法，形成了“中州胡晋，略皆奉佛”[21]的局面，佛教的势力迅速遍及后赵统治的广大北方地区。

继后赵之后，尊崇佛教的是氐族建立的前秦政权。苻坚笃信佛教，在其攻取东晋军事要地襄阳之后，扬言得了“一人有半”[22]。所谓“一人”就是指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半人”则是指东晋名士习凿齿，将僧人道安摆在如此之高的地位，足见苻坚对僧人及佛教的重视。另外，苻坚派吕光攻打龟兹，迎请鸠摩罗什亦是苻坚崇佛的明确体现。在这些行为的影响下，苻坚在位期间，其统治区域内的佛教事业发展迅速。僧人道安曾主持译经约14部183卷，吸引和培养了许多高僧，编辑了系统的佛经目录，提出了“五失本，三不译”的翻译理论。

后秦统治者姚兴也积极鼓励、支持佛教的发展。他派人把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迎入长安之后，“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倦”[23]，因姚兴“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其都城长安成为当时佛经翻译的重镇，有五千多个僧人会集于此，而且整个后秦的领地也是“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24]，甚至“事佛者十室而九矣”[25]。

经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扶持与大力提倡，佛教在中国的状况比初传入时已有了非常大的改观。据史料记载，到北魏时，其境内佛寺与僧人数量已经分别达到“四十千寺”“二百多万众”[26]。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内迁民族建立的几个政权对佛教的大力扶持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古人有“（佛教）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27]的断言。现代学者也认为“汉魏之后，西北戎狄杂居。西晋倾覆，胡人统治，外来之勤益以风行”[28]，因此，佛教的发展与内迁民族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佛教的发展、兴盛与内迁胡族的密切关系充分体现了内迁民族与佛教之间的契合感及认同感。

后赵时期，石虎大肆崇信佛教的行为，引起了汉族士大夫的不满，中书著作郎王度上书劝谏说：“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29]王度明确地将佛归为“外国之神”，而“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而且认为“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祀，不宜杂错”，担心信仰佛教导致华夏与“戎”的服祀“杂错”，由此可见，其反佛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华夏服祀”，明确华夏民族与内迁胡之族之间的界限。王度的上书得到了许多汉族士大夫的支持，面对这种形势，石虎下诏：“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举。”[30]坚定地表明了石虎扶持佛教的态度，同时也非常清楚地揭示出石虎信奉佛教的理由：“生自边壤”的他，虽然“君临诸夏”，但在“飨祀”上仍主张坚持“兼从本俗”，信奉被华夏民族视为“戎神”的“佛”。把“戎神”之“佛”当成本俗的神，公开宣示了石虎对自己“戎”之民族身份的认同。

无论是王度上书禁佛还是石虎下诏主张奉佛，二人对各自行为解释的出发点却非常一致。王度反对佛教是因为“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而石虎尊崇佛教的原因也正是这一点，即佛教为“戎神”，故“正所应举”。身为华夏民族的王度与胡族出身的石虎不约而同，都把佛教当作标识民族身份的一个工具。

后赵建立者羯人，其体貌特征是“目深”[31]，“高鼻多须”[32]，与中

原地区的民族差异比较大。十六国时期，许多内迁民族将自己的祖源与华夏民族望族或远祖联系在一起：刘元海与西汉宗室刘氏联系在一起[33]，前秦氐族“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34]，赫连勃勃标榜自己为大禹之后[35]。但是，石勒叔侄在祖源认同上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公开宣示自己的“胡”族身份，并时常自称为“胡”[36]。羯人是来自中亚地区的胡人。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多以西域为中转站，且在中原地区传播佛教的僧人也多来自西域诸国。因此，身为中亚胡人的石虎自然对佛教有一种亲近感，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后赵石氏对以佛图澄为代表的佛教大力扶持。石虎以“生自边壤”之胡人身份对来自异域的被华夏民族视为“胡神”佛教的扶持与尊崇，使其“胡”之民族身份与“胡神”之宗教信仰二者紧密契合，后赵石氏顺势将佛教作为构建其（包括后赵境内的其他胡族）民族身份的一种工具。

石虎除了公开宣称“佛是戎神，正所应举”外，还明令“夷赵（‘赵人’即与‘夷’相对应的民族，也即华夏民族）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37]，从此“中州胡、晋略皆奉佛”[38]。石虎的这一政策打破了只有羌、胡之人可以公开信奉佛教、出家为僧的禁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府层面明令汉人可以出家[39]，此后汉人出家为僧便成为一种合法行为。“胡、晋略皆奉佛”的现象使得“胡、晋（即所谓的华夏民族）”之间以佛教为标志的界限模糊化，此后佛教作为民族标志的意义有所减弱。正如学者所说：“佛教在上下各阶层取得信仰的统治地位后，对消除种族隔离，融合民族生活习惯，起过促进作用。”[40]

其实佛教在少数民族中受到追捧，并非始于十六国时期。晋惠帝末年河间王司马颙镇守关中时，秦州刺史张辅将高僧帛远鞭打致死，导致了陇上准备迎接帛远归来的羌、胡精骑五千为之报仇，并分取帛远尸骨，“各起塔庙”[41]。北方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态度与华夏民族截然不同。

由此可见，内迁民族尤其是来自中亚的羯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后，随着其民族意识及自我认同的觉醒与强化，通过尊崇外来的“胡神”佛教，彰显其民族特性及民族认同便成为其可资利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他们以“佛是戎神，正所应应”为名，大力弘扬佛教。因此，十六国时期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同时，“十六国时期，实是中国佛教史上以胡人为信仰主体向以汉人为信仰主体的转变时期。特别是后赵时期，以石氏为代表的‘羯胡’群体的动态，是佛教在华北地区扩散的重要媒介”[42]，以致“在文化层面上出现了佛教在中原地区扩散传播的

局面”[43]。

三 太武帝、周武帝反佛：胡族身份的消弭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受到来自本土文化儒、道的批评与排挤，故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至十六国时期，由于内迁民族对外来佛教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认同感，许多政权如后赵、前后秦等对佛教大力扶持，无论是在教徒、寺院的数量或在佛经的翻译上，佛教发展都有了非常大的突破。但是，到北魏、北周时期，同属内迁民族的太武帝和周武帝（二人皆为鲜卑民族）掀起了两次激烈的反佛运动。

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五年（444）春正月，下令严厉打击佛教：“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44]在诏书中身为鲜卑民族的北魏太武帝明确地把佛教指斥为“西戎虚诞”，认为佛教的传播不利于“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此后不久，太武帝又下了一次更为彻底的诏书：

>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45]

对于太武帝这次灭佛的原因，学者众说纷纭，总的说来不外乎政治、经济或宗教文化等方面。但是，就北魏这个时期而言，由于对外征战频繁，君权相对集中，沙门并不敢像南朝僧人那样“不敬王者”。道武帝时，深受宠信而为道人统的法果曾说：“太祖（即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为自己致拜太祖的行为解释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如此看来，他们还远没有达到“视王者之法，蔑如也”[46]的程度。从经济上看，沙门也只是享受免役租调特权而已，太武帝时期寺院经济还远未形成，所以，沙门在经济上也不像后世那样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单纯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因素，皆

不足以促使太武帝采取灭佛行动，太武帝灭佛的行为应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47]。除此之外，太武帝灭佛也反映了其试图利用反佛这一行为淡化与华夏民族的边界，为北魏政权争正统的心理。

在华夏民族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内诸夏而外夷狄”“贵诸华贱夷狄”思想层出不穷。西晋时期，有汉族知识分子不承认少数民族有迁居内地的权利，建议政府把早已与华夏民族杂居的内迁民族迁徙到边远之地[48]，这种狭隘的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偏见，曾在社会上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内迁胡族已经称帝的情况下，“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49]仍是当时人的普遍认识。因此，当时内迁的胡族在建立政权时必须寻求一种事实或理论上的根据，来论证其政权及统治的合法性。刘元海起兵反晋时，打着刘氏汉家的旗号，自我标榜“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50]；赫连勃勃标榜自己为“大禹之后，世居幽朔”[51]；鲜卑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52]；等等。北魏鲜卑拓跋氏自然也不能免俗：“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53]此外，儒家传统的五德历运也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各个政权用来论证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工具。[54]总之，内迁民族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时机及工具论证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在太武帝时期，虽然拓跋鲜卑还没有采取完全的汉化政策，但是北魏已经成为第一个统一了广大中国北方地区的内迁民族的政权。当时，与之并立的是南方汉人政权，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南方政权因是华夏民族所建政权，因而有与生俱来的优势，是天然的正统所在，而且南方的统治者历来也都以正统自居，在“夷夏”之别中占据“夏”的位置，时常斥当时活动在北方地区的胡族为“虏”，视其所建政权为“僭伪”。

在这种形势下，太武帝对外来的、被华夏民族视为“夷狄之俗”的佛教，自然是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是唯恐避之不及，因与“胡神”佛教亲近而被华夏民族视为胡族，太武帝尊崇华夏正统文化，打击、消灭外来佛教，借以消弭作为统治民族的鲜卑与本土的华夏民族的区隔，争取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认同和支持，以便在与南方诸政权争正统时占据有利地位，对外来胡神佛教的打击也是太武帝试图证明其政权正统性的一次努力。

在两次灭佛诏书中，太武帝以华夏正统的君主自居，斥佛教为邪

伪、鬼道，佛教的神祇是妖鬼、胡神，佛教经典是“胡经”，自古“九州之中”无此教，承天绪的自己，有责任除伪定真，“一切荡除胡神”，复羲农之治，行王法，正天常，等等。太武帝的两次灭佛诏书清楚地表达了其以严厉打击“西戎虚诞”佛教表明民族身份，以及争正统去僭伪的心理。同时也表明内迁胡族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中国传统的夷夏“辨”及“防”的思想和情结。反映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外来“胡”教的怀疑与隔膜。太武帝通过灭佛等一系列活动，试图摆脱原本的鲜卑民族印记，自我认同为“华夏”，最终达到趋同于华夏的目的。

到北周时，武帝又发动了一次反佛运动，诏书中的一些内容也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反佛的部分原因：“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55]周武帝的灭佛诏书中传达出与北魏太武帝同样的心态。只不过在灭佛诏书中体现的民族认同及民族边界的标志上，周武帝的态度更加清晰和明确而已。

周武帝非常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非“五胡”（北方内迁民族的泛称）。他认为佛教是生于西域的“非正教”，被华夏民族视为“胡神”，“五胡乱治”之时，才得以“风化方盛”，因此“非五胡”的他自然不必信奉，而且还应该废止。由此可见，促使周武帝灭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佛教来自外域。我们知道，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入主北方的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便开始或加快了汉化。到北周时，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三个朝代，已将近一个世纪。北周政权的建立者鲜卑族的汉化程度已经比较深，北周也基本上已经是鲜、汉民族共治的国家，周武帝本人更是以华夏正统自居。他不仅要巩固北周政权，而且要东平北齐，甚至还想进而“平突厥，定江南”“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56]，最终统一全中国，成为秦皇汉武那样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帝王，俨然一个华夏民族的帝王形象。

即使如此，周武帝的胡族身份仍旧是他的一个困扰。汉化程度比较高的周武帝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思想的内涵。虽然周武帝及其统治集团自觉地接受汉文化，努力融入华夏民族，当时的胡、汉矛盾正在或已经化解消弭，胡、汉差别也逐渐弱化或泯灭，长期处于内迁民族统治下的华夏民族对胡族所建政权也已经有了很强的认同感，但是，与北周并立的南方汉族所建政权，以及同处北方的北齐政权，仍旧是周

武帝必须面对的客观存在。这些并立的政权都在为争正统而不遗余力，为了不在政权的正统性上给敌人落下口实，周武帝想尽办法避免被其他政权斥为“胡族”而陷入“正统性”的尴尬。佛教为外来的胡教，容易授人以把柄，这也是周武帝取缔佛教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以避因放任“胡教”被视为“胡族”之嫌，有损于自己和北周的华夏正统形象。更何况佛教在这个不适当的时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又暴露了足以致命的窳败现象，给统治者以口实。周武帝并非意识不到佛教的教化作用，但面临“正统论”的挑战，这种作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北方政权其胡族身份所面临的正统性尴尬，导致在对待佛教的方式上与南方政权有很大的不同。南朝时也有三教争论，但多属宗教及文化之争，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虽然有时论争也比较激烈，但采取的方式都比较和缓，即使有时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帝王也会对过分发展的佛教采取某些限制措施，但是其手段一般也比较温和，没发生过灭佛事件。

到了唐武帝时期，又发生了一次反佛事件。但是，唐武帝时期的情况已经与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在唐人心目中，夷夏观仍旧有相当影响，佛教是外来思想和宗教因而被作为夷俗受到攻击，皇帝抑佛，常持“夷夏观”，如唐太宗、玄宗、武宗等；士大夫运用“夷夏观”反佛的亦不少，如狄仁杰、韩愈等。但是，统一的唐王朝不存在政权合法性的困扰，因此，此时期对待佛教的态度所表达的文化意义远大于民族身份标志的意义。

综上所述，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在十六国北朝时期，成为民族边界的一种标志。自两汉至后赵，政府通过法律方式禁止汉人出家为僧，从国家层面画了一条华夏民族与内迁胡族的界线；儒道之士以“夷夏之辨”为思想武器，因佛教为“胡神”“戎神”而加以批评或排斥。通过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的努力，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及一定范围内，成为标识华夏民族与内迁胡族界限的一个工具，即信佛教者皆为胡，反之即是华夏民族。虽然当时也有少数汉人出家为僧，但这属于私度，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些汉僧也大多活动在胡人聚落之中。

随着少数民族实力的不断增强，民族的自我认同逐渐强化，内迁民族统治者试图以尊崇佛教来彰显自己的民族特性，重新构建民族身份；对汉人信奉佛教禁令的放开，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胡、汉民族的界限，同时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但政权的正统性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胡、汉民族的矛盾与冲突仍然存在，“夷夏

之辨”依旧是华夏民族排斥内迁胡族的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政权建立者的胡族身份，仍旧是统治者无法逾越的一个障碍，北魏、北周仍旧面临正统性的困扰。再加之，与其并存的有南方的汉族政权，以及北方地区的其他政权，其中的南方政权因其统治者为汉族而具有天然的正统性优势。为了不给政权对立方留下口实，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对佛教这种“夷狄之教”和佛这个“胡神”避之唯恐不及，为了显示自己亲华夏而非胡的态度与决心，反佛便成为非常合适的一个举措。他们的“反佛”行为也体现了内迁民族试图模糊自己的胡族身份，在民族认同上趋向于华夏民族的意图，这一行为促使佛教的内迁民族与华夏民族民族身份标志作用的最终消解。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反佛以及南方的三教论争，使佛教在这一过程中经受了“夷夏之辨”的考验，基本清除了中国社会士族阶层以“夷夏之辨”反佛的障碍，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梁陈之后，在“三教调和”“三教融通”思想的影响下，佛与儒、道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大为降低，它们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有了加强，而到了唐以后，“夷夏之辨”论战的价值取向是“三教虽异，善归一揆”[57]，即儒、释、道三家融合。此后，佛教作为民族边界的工具性作用随之弱化直至消失。

[1] 关于民族与边界的有关理论可参见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高崇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马成俊《弗雷德里克·巴斯与族群边界理论（代序言）》，《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第170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9。

[2] 吕建福：《宗教与民族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吕建福：《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与中国民族观的嬗变——以儒释道三道论争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06年第4辑。

[3]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62，第352页。

[4] 道世：《法苑珠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中华书局，2003，第869页。

[5] 叶德荣：《汉晋胡汉佛教论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第153页。

[6] 佚名：《汉显宗开佛化法本传》，道宣《广弘明集》卷1《大正藏》卷52，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第98页。

[7] 佚名：《汉显宗开佛化法本传》，道宣《广弘明集》卷1《大正藏》卷52，第99页。

[8] 牟子：《理惑论》，僧佑《弘明集》卷1《大正藏》卷52，第5页。

[9]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62，第1页。

[10] 牟子：《理惑论》，僧佑《弘明集》卷1《大正藏》卷52，第3页。

[11] 《晋书》卷77《蔡谟传》，第2035页。

[12] 佚名：《历代王臣滞惑解》，道宣《广弘明集》卷6《大正藏》卷52，第126页。

[13] 佚名：《历代王臣滞惑解》，道宣《广弘明集》卷7《大正藏》卷52，第129页。

[14] 桓玄：《桓玄与王令书论敬王事》，僧佑《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第81页。

[15] 刘勰：《灭惑论》，僧佑《弘明集》卷8《大正藏》卷52，第51页。

[16]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7页。

[17]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29页。

[18] 《晋书》卷95《佛图澄传》，第2487页。

[19]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62，第352页。

[20]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47页。

[21]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346页。

[22] 《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4页。

[23]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62，第52页。

[24]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240页。

[25]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第2985页。

[26] 道宣：《续高僧传》，道宣《广弘明集》卷8《大正藏》卷50，第640页。

[27] 道林：《周祖巡邺请开佛法事》，道宣《广弘明集》卷10《大正藏》卷52，第154页。

[28]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09页。

[29]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62，第352页。

[30]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352页。

[31]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第2776页。

[32]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第2792页。

[33]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

[34]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第2867页。

[35]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页

[36]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

[37]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62，第352页。

[38]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346页。

[39]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46页。

[40]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1页。

[41] 慧皎：《高僧传》，第27页。

[42] 叶德荣：《汉晋胡汉佛教论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第241页。

[43] 叶德荣：《汉晋胡汉佛教论稿》，第247页。

[44] 《魏书》卷4《世祖纪》，第97页。

[45]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4～3035页。

[46]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4页。

[4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向燕南：《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栾贵川：《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新论》，《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房芸芳：《北魏太武灭佛原因浅析》，《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1期；张箭：《论导致北魏灭佛的直接原因暨罪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李春祥：《北魏太武帝与周武帝灭佛之异同》，《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韩府：《“太武灭佛”新考》，《佛教研究》，2003；刘淑芬：《从民族史的角度看太武灭佛》，《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8] 《晋书》卷56《江统传》，第1532页。

[49]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35页。

[50]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51]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页。

[52]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53] 《魏书》卷1《序纪》，第1页。

[54]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5] 佚名：《历代王臣滞惑解》，道宣《广弘明集》卷6《大正藏》卷52，第126页。

[56] 《周书》卷6《武帝纪》，第106～107页。

[57] 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第86页。

图像 北魏佛教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服饰、姓氏与民族认同

“民族”不仅仅是以血缘、地域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以文化的共同体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巨大的文化差异使人们可以区分“我族”和“他族”。民族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在民族认同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族群成员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感受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可以说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天然边界，是体现民族认同的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民族的认同感总会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上得到表现，留下或隐或显的印记。

民族认同是在一定历史情景当中建构的，它也会随情景变化而变化。影响民族认同的因素既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同时也有心理方面的因素。这种复杂性决定了民族认同研究需要多学科的视角。民族认同的文化联结来自原生性要素的纽带，如习俗、血缘、祖源、语言等的共同性，除此之外，宗教、服饰、建筑等所有外显的文化要素都可以作为人群互相区别的标志。这种认同的因素，在中国古代可能表现得更为直接或明显。

“北魏（386～534）是中国佛造像的黄金时代，许多佛像名品大多出于北魏”[1]，而且“在北魏时代的佛教造像上，非常流行在台座或背面表现胡服（中国北方民族穿着的衣服）供养人像，说明了鲜卑族接受佛教，以造像的形式实践佛教活动。造像主，即供养人留下自身的形象目的是作为‘造像的记录’，以明示自己的发愿及出资，享受造像的功德。供养人像的表现早见于太平真君年间的造像中，在单体金铜佛和石雕像上是通常的做法，在石窟造像中多表现于佛龛台座部分”[2]。

佛教造像中无论是供养人还是佛像，他们的服饰都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人的服饰状况，尤其是中国石窟造像中的供养人形象，大抵都是造像功德主本人形象的状摩。十六国北朝时期大量的造像碑记不断地被

发现，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姓氏、服饰资料，这为进一步探究当时的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提供了方便，同时使研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认同成为一种可能。因此，在这一部分，分析的落点主要放在图像上，即从各种石窟造像或题记中供养人服饰与姓氏的变化上探讨其中所反映的民族认同情况，因此，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何谓胡服，何谓汉服，以及在中国古代姓氏与服饰如何表达民族属性信息，如何反映民族认同等问题。

一 胡服与汉服的形制

“胡”是我国古代尤其是两汉时期至南北朝时期汉文文献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因此，本书中所指胡服主要是指古代非汉民族或非华夏民族服饰。

胡服在汉文史书记载中出现得比较早，战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3]，到南北朝时期，有相关史籍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胡服的具体形制。“（高祖）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4]由此可见，“夹领小袖”为胡服的一种形制。《梁书》载：“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女子披发为辫。”[5]《旧唐书·舆服志》载：“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胯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6]王国维的《胡服考》载：“胡服……其制，冠则惠文，带则具带，履靴。其服，上褶下袴。”[7]此外，“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8]，讲述鲜卑郭落带刻有瑞兽，并认为“鲜卑”族名即其瑞兽之名。但是，由于汉服也有腰带，在雕刻中服饰腰带细节较不明显，故不能以此进行判断。此外，还有从左右衽来区分胡、汉民族，认为汉族的服饰为右衽，胡族的服饰为左衽，即胡族“披发左衽”。由所引史料，可以推知胡服形制应为遮耳长帽、夹领、窄袖、长裤、短靴等，故本书在此后的讨论中主要以是否具有这种特征来判定供养人的服饰是否为胡服。

与胡服相对的即为汉服。《汉书》载：“武帝末……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9]《后汉书》载：“郭太字林宗……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10]《释名疏证补》卷五《释衣服》详细介绍了东汉后期褥、绔、褶、禅衣、裙、袍的汉服形制。《陈书》载：“胡服缦缨，咸为戎俗，高冠厚履，希复华风。”[11]因此，汉服以冠冕、广袖、长袍、厚履为主要形制，故在此后的讨论中以此形制为特征

的“褒衣宽带”服饰均判定为汉服。

关于胡服，有沈从文、周锡保、吕一飞等先生的研究，其中有关北朝胡服的情况，在吕先生的著作中有详细讨论，可参阅。[12]基本上“胡服的上身男女都是交领（衣襟重叠）、窄袖（筒袖。袖口很小，袖子很短）的长上衣，下身穿短裤（与今天的裤子一样分两岔的形式）”[13]。

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服饰便成为必不可少的日用生活品。服饰除用来遮蔽和保护身体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就是社会标志功能。“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14]是中国古代对一个群体的不同认识。通过一个人的服饰，可以大致看出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春秋繁露》载：“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15]《礼记·大传》载：“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16]“中国封建社会中，服饰强烈地反映着等级、名分的差别，社会成员都必须依照自己的等级身份来穿戴，衣、帽、鞋、袜、装饰品等等，无一不在形制、质料、图案花纹及色彩上有严格的区分，不能僭越。皇帝的服饰，自然是唯我独尊，臣民不准僭越。百官的服饰，平头百姓当然也不许穿戴。百官之中，大官与小官的服饰又有区别，不得混杂。就连一般老百姓——士、农、工、商的服饰也各有区别。还有，男尊女卑，其服饰也得有所区别，不能混同。这就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服饰制度，把人们的高低贵贱区分得清清楚楚”[17]。

服饰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文化传承现象，是生活民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同时又受到民族性、阶级性和区域性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折射。

也正因为服饰有如此多的功能，所以在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服饰，每逢改朝换代，首先便要“易服色”，以宣示新朝的建立及正统性，让“服色”的政治意义首先服务于新王朝的合法性，在运用“改正朔、易服色”来说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时对之进行了种种改易，正朔、服色的影响最终仅作为一种仪式性的政治名分而存在。帝王通过“改正朔、易服色、别衣服”，可以使臣民意识到改朝换代，促使其认同的转变，达到取得天下正统的目的。

不仅如此，服饰也时常是民族边界的一个标志。“冕旒衣冠，在现代人看来，也许只是外在装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民族风格，或者在正式场合中作为身份标志，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意义。但在古代东亚来说，冕旒衣冠却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甚至呈现文明与野蛮（文化）。传统儒家学说所形塑出来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世界，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的象征性，无论是政治上的等级，还是家族内的亲疏，都要依靠衣冠服色来确认，就连王朝的合法性与文化的合理性，也得要靠衣冠来建立”[18]。

不只是中国学者对服饰与民族认同有如此阐释，外国学者也认识到在中国古代，服饰与民族认同的密切关系。如日本学者在对云冈石窟造像研究时，认为其11窟“着鲜卑服的供养人像，表现佛教信徒形象的同时，也表示自己是属于推崇跟佛陀同等的皇帝的鲜卑国家的成员”[19]。“他们虽然是从佛教信仰出发，但实际上极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意义、目的和功能。以胡服表现的供养人像意味着他们是鲜卑国家理想的臣民像，具有表示向统治者顺从意志的功能。”[20]“当然，供养人图像的意义、目的和功能随时代、民族和地域不同而有所变化。北魏时期，经服制改革，汉服被定为公服后，汉服供养人像成为理想的臣民像，而胡服逐渐失去了其‘表示服从意志’的功能。相反，胡服也有被视为对统治者‘不信服的表示’的可能性。服装显示该时代的民族性和国家的统治构造，这不仅仅是北魏唯一的时代现象。佛教造像这一宗教活动被利用为向统治者表示意愿的一个‘场所’，供养人像这一图像功能是其表现方法”[21]。

也正因为服饰在中国古代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苏武入匈奴，终不左衽；赵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汉朝称苏武而毁赵他”[22]。在各个新建王朝服制改革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强烈的反对或抵抗等事件，尤其是在非华夏民族建立政权的情况下，反抗行为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激烈，而这种反抗情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民族情感及认同倾向。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清朝的剃发令引起的风波。从清初入关起，满族统治者就强调天下应当“剃发易服”，以表示遵从大清正统，这也说明在满族人的心目中，服饰与发型也是王朝认同的一种标志，当然这种想法也许是他们受到汉族政治观念的影响，才意识到“改正朔，易服色”对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因此“明末清初，清兵杀进中原，汉人为君父而做的抵抗没有多少，但因为剃头和易服却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国土沦亡、君父诛杀、朝代更迭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没有像改穿衣服和剃头这

样的小事能引发百姓心理上的失衡。同样，满清朝廷也在这些看似小事的方面更较真，'留发不留头'，一点通融也没有"[23]。这种现象可以是佛教造像中"（供养人）通过对服饰……的描绘，可以清楚地反映供养人的性别、族群系属……社会地位，这些都是认同建构的核心要素"[24]最好的解释，而且在现代社会，服饰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群体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一首歌的歌词"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仍然是中国心"，将"装"与"心"联系在一起，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服饰的确能体现一个人的民族特征，以及对某一群体的认同与归属。

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服饰作为民族认同、民族界限的标志已经有所弱化，但是，从古代帝王以"改正朔，易服色"的方式试图改变民众的认同，以及自古观念中的胡族"披发左衽"，汉族"褒衣博带"的固有认识，可见在中国古代，服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民族或政权的边界表征，那么对服饰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民族认同。

二 姓氏

除服饰之外，姓氏在古代也是判定族属的重要标准之一。姓氏制度并不单纯是一种名号制度，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家族形态、社会心理、礼俗特征等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在古人看来，"姓所以有百者何？以为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纪其族"，"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25]，"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26]。"姓则表其所由生，氏则记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27]，因此姓氏与宗族、婚姻联系在一起。但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出现不同的阶层，姓氏的意义很快突破"别婚姻"的局限，而被赋予区分社会等级、体现社会成员尊卑贵贱的特殊政治功能。姓氏的尊卑贵贱等级之分，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某些姓氏的起源，与姓氏家族的政治身份及社会地位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二，天子、国姓在姓氏系统中享有神圣的至尊地位；其三，以现实官位权力大小划分姓氏的高低等差"[28]。

由此可知，姓氏在中国古代成为族群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亦成为人们获得合法身份的一种象征符号，另外，姓氏在宗族观念的发展和宗族组织的建构中，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符号，姓氏的改变更表现出人们面对具体社会情境所做出的策略性选择，是人们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巧妙利用。正如陈连庆先生所说，"姓氏对历史研究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

对史实的考证。特别是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历史时期，对政权、战争的民族属性判断，首先是要弄清人物的族属，而姓氏则是判断族属的重要根据……二是有助于民族史的研究，可以由姓的发展变化渊源，推知其族属，探寻出其族的历史变化……三是有助于文化史的研究。我国古代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交流，但有关历史文化的记录多体现在历史人物身上，因此只有从姓氏判断出人物的族属，才能弄清文化的民族渊源"[29]。故自古以来姓氏中本身存在一定的认同因素，而这些姓氏与各民族联系起来时，对姓氏变革，经由姓氏进行的族源追溯，又使得姓氏中的认同展现出民族因素，即体现民族认同现象。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学术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可姓氏在研究民族史上的重要地位。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姓氏一直起着别婚姻、分贵贱、辨亲疏、团结同姓、巩固宗法制大家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姓氏研究也得到了学者的重视，也多有学者从姓氏的变化情况来研究十六国北朝时期内迁民族的汉化，以及汉人胡化的情况。马长寿先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通过造像题记中体现的姓氏等内容，分析与印证中古时期关中各族的族属渊源、姓氏变迁、分布、通婚及融合等问题；周伟洲先生也通过姓氏并结合相关史料研究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史[30]，同时，周先生也利用造像资料探讨氐、羌民族在关中、陇右地区与汉族错居杂处及与汉族融合的状况[31]；何德章先生利用北朝墓志资料所反映的姓氏变迁情况研究拓跋鲜卑等族的汉化[32]。这一切都说明，在中国古代姓氏与民族身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姓氏在判定族属、研究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故本书基于造像中出现的供养人形象以及题记资料，在胡服、汉服、胡姓、汉姓判定的基础上，主要对造像中供养人姓氏、服饰中体现的民族认同进行探讨。

[1]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3页。

[2]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101页。

[3] 《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47页。

[4] 《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第536页。

[5] 《梁书》卷54《河南王传》，第810页。

[6] 《旧唐书》卷45《舆服志》，第1951页。

[7]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2《史林》14《胡服考》，中华书局，1959，第1069页。

[8]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8页。

[9] 《汉书》卷71《隽不疑传》，第3035页。

[10] 《后汉书》卷68《郭太传》，第2225页。

[11] 《陈书》卷1《高祖本纪》，第19页。

[12]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中华书局，1981；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书目文献出版社，2011。

[13]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101页。

[14] 左丘明著，杜预注《左传·襄公十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542页。

[15]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第182页。

[16] 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392页。

[17] 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30页。

[18] 葛兆光：《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9] 〔日〕石松日奈子撰《云冈第11窟太和七年邑义造像和武州山石窟寺的变化》，牛源译，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 〔日〕石松日奈子撰《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牛源译，《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21] 〔日〕石松日奈子撰《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牛源译，《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22] 王充撰，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卷15《谴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297页。

[23] 锐圆：《这样读“资治通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第102页。

[24] 王静芬撰《族性与认同——南北朝时期作为佛教艺术供养人的北方游牧

民》，郑杰译，《西北民族论丛》2014年第10辑，第365～400页。

[25] 陈立著，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9《姓名》，中华书局，1994，第401页。

[26] 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第2页。

[27]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5页。

[28] 黄修明：《中国古代姓氏文化变革中的社会政治因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29]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前言第6页。

[30] 周伟洲：《关于云岗石窟的〈茹茹造像铭记〉——兼谈柔然的名号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周伟洲：《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31] 周伟洲：《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32] 何德章：《鲜卑族的汉化北朝鲜卑族人名的汉化》，《魏晋南北朝隋唐资料》，1996；何德章：《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资料》，2000；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魏晋南北朝隋唐资料》，2003。

官方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支持与鼓励，在中原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北魏建国之初，对佛教知之甚少，国人或未闻佛法，或闻之而不信。太祖拓跋珪在平定中山、经略燕赵过程中，与佛教接触越来越多，虽因战事，无暇专注于佛事，但对佛教寺塔及僧侣颇多礼敬，并曾向泰山僧朗致书赠物。天兴元年（398），北魏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始营建寺塔，剃度僧尼，此为北魏官方奉佛之始。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统一中原北方，尽迁凉州僧尼及工匠至平城，北魏佛教由此大盛。

“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久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1]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复兴代国，不久改国号为“魏”。“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逕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2]，“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3]。

其间虽然曾出现太武帝灭佛一事，但此后北魏诸帝对于佛教多持推崇态度，5世纪中叶以后，北魏佛教达到顶峰，平城和洛阳先后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官方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佛教事务，四方高僧云集国都，译经注疏，授徒讲学盛极一时。据史料记载，其境内佛寺与僧人数量已经分别达到“四十千寺”“二百多万众”[4]，与此同时，佛教造像之风盛行。

上起皇室，下至普通百姓，建塔立寺、开窟造像蔚然成风。在中国佛教造像的台座或背面常看到表现为捧花或持香炉的供养人像，由比丘

或比丘尼为先导。“在中国，从公元5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世俗供养人像，皇帝供养人像到公元6世纪初以后才在龙门石窟宾阳洞和巩县石窟等地出现。可能是中国北魏平城时期有将皇帝视为如来的思想，所以皇帝供养人像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一些。”[5]本书所指的供养人像大多为着世俗服装的在家信徒，造像旁边多刻有“××供养”或“××供养佛时”的榜题。所谓“供养”，是指向佛像献水、饰鲜花、焚香、燃灯、礼拜等宗教行为，也指捐赠布施佛塔或佛像、土地、僧房等的活动，以及精神上的崇敬态度。而进行这种供养的佛教信徒就是供养人。供养人即出资开窟塑像画壁画的功德主，洞窟完成之后，功德主的形象一一被刻画在洞窟里，表现他们对佛陀的恭敬虔诚和藏在心里的善良愿望。他们与石窟的关系是互相依存，没有功德主就没有石窟，没有石窟也就不存在供养人画像。因此，供养人原本是参与各种宗教活动的人物，可是在很多佛像作品中他们的形象被镌刻其上成为佛像作品构成的一部分。“与佛像相比，佛教石窟中的僧侣或信徒、供养人造像，其装束更能直接反映当时各个阶层尤其是皇室官贵等统治阶层成员的衣着情况。”[6]佛教石窟供养人像都是俗人的形象，多数是各石窟所在地人们的生活着装等的真实反映，是研究中国服饰的宝贵史料，同时也反映了供养人一定的身份认同。

除了供养人像之外，也出现了许多造像记，“当时人们刻在各种类型的佛教（含少时道教）造像上的铭文，即造像记，至今仍保存不变，这些造像记就是反映他们心声的珍贵资料”[7]。“造像记之所以珍贵，一是它的直接性。它是造像当事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与真实的吐露，非如文献记载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真实地向后人展示了这一时期人们信仰与思想的某些侧面。”[8]“尽管造像记反映的不是人们信仰与追求的全部，但至少为今人提供了领略民众心灵世界风貌的一个‘窗口’，透过它，多少可以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部分情况。”[9]“造像记记述的是大的时代风尚下个人或群体的信仰与信仰活动，是社会中个人思想活动具体而微的展现，众多造像记则拼合出这一时期民众思想与行为的缩影”[10]。

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是北魏时期由官方主持开凿的两座大型石窟，留存有大量的佛教造像题记、供养人形象，供养人像是北魏时期佛教美术中的常见题材，其目的是记录捐赠造像的事实，同时也显示皇帝臣民和国家成员的自我存在，这些遗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供养人的民族认同，因此，笔者试图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考察，并探查其形成的政治

和社会背景，从而全面阐述云冈石窟造像中所反映的北魏政权上层人士民族认同的基本面貌。

一 云冈石窟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十六国北朝时期受到各政权统治阶者的崇信与扶持，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宗教。随之而来的是开窟造寺之风盛行，石窟寺的开凿起源于古代印度。由于佛教提倡隐修，所以僧侣们一般选择在远离尘世喧嚣的幽静之地开凿石窟。云冈石窟是我国第一所由皇室经营的国家级大型石窟，修凿于和平初年（460）：“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帝后奉以师礼。县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11]故而，云冈石窟大多属于北魏时期建造，虽然曾经在辽金时期进行过少量补修，因此，此石窟可称为北魏王朝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北魏时期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官方石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云冈石窟初期的昙曜五窟中没有出现供养人像，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五窟是在皇帝的认可下由昙曜负责营建的纪念碑性造像。但是到了云冈中期出现了供养人像。供养人像在云冈石窟中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么供养人穿着鲜卑族风俗色彩浓厚的胡服，似乎故意彰显胡族的身份。此外在云冈，佛传图和本生图等，本来应该表现为西方风俗的佛教主题造像中，也出现有胡服。”[12]所以在这部分主要从造像中供养人服饰以及姓氏的变化来探讨其中所反映的供养人的民族认同。

云冈石窟虽然仅存28处题记，但留存大量的供养人造像。这也是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特点，即造像多，题记少。宿白先生根据造像样式、造像内容、石窟形制发展等因素，将云冈石窟造像分为三期。第一期（460～465），包括第16、第17、第18、第19、第20窟；第二期（465～494），包括第1、第2、第3、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第13窟；第三期（494～534），主要位于第20窟以西，第4、第14、第15窟，第4～6窟及第11窟往西的小洞。此外，第一、第二期也有多处第三期补刻的内容。为了行文方便，本书也使用宿白先生的分期，对云冈石窟造像中供养人形象进行归纳与分类。

云冈第一期供养人造像：除第17窟有4处汉服供养人，第19窟有5处汉服供养人，第20窟有1处汉服供养人外，其余皆为胡服供养人。

云冈第二期供养人造像：除第9窟有3处汉服供养人，第11窟有1处胡、汉服混杂供养人之外，其他石窟或无供养人造像，或皆为胡服供养人。

云冈第三期供养人造像：所有供养人造像皆为汉服。

从这些供养人造像中可以看出，在云冈石窟的第一、第二期造像中供养人的服饰以胡服为主，只掺杂较少量的汉服供养人造像，但是在第三期石窟造像中，目前所见的供养人服饰皆为汉服。

云冈石窟虽然存在大量的供养人造像，但其中有题记的造像比较少。在此，将目前收集到的供养人造像以服饰、姓氏为标准分为两类：胡、汉服供养人造像与胡姓供养人造像。

（一）造像中的服饰与民族认同

据笔者统计，云冈石窟中的供养人造像中的服饰主要有三种情况：胡服供养人造像，胡、汉服混杂供养人造像，汉服供养人造像。

1.胡服供养人造像

云冈石窟虽然留存103处胡服供养人造像，但是包含题记的甚少，供养人和题记皆有的则更少。在此，选取其中包含供养人及题记的造像，以便通过题记研究供养人族属，在族属的基础上结合供养人服饰分析其认同。

胡服供养人造像分为三种：胡服汉姓供养人造像、胡服胡姓供养人造像及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

第一类，胡服汉姓供养人造像共1处。

第11窟明窗东侧周氏造像[13]，太和十九年（495）（图1），造像台基左右各两身比丘，两身胡服供养人。左侧男胡服供养人头戴尖顶遮耳长帽，身穿夹领、小袖、短袍、长裤式胡服，脚蹬长靴。右侧女胡服供养人头戴尖顶凹陷式遮耳长帽，身穿夹领、小袖、长褥式胡服（脚部不明显）。

第二类，胡服胡姓供养人造像共1处。

第11窟东壁侯后云造像[14]（具体年代不详）（图2），台基左侧可辨识一身比丘，右侧刻一身比丘，四身胡服女性供养人，她们头戴鲜卑遮耳长帽，穿夹领小袖式上衣与长裙，面朝佛像，双手合十作揖。

此造像中出现的“侯后云”极有可能是鲜卑民族。孝文帝曾将“胡古口引氏，后改为侯氏”[15]。而且云冈石窟所在地平城一带也是拓跋鲜卑的主要活动中心，故此处侯氏应为鲜卑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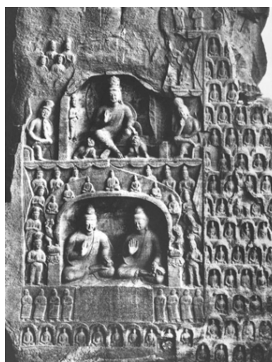


图**1** 周氏造像 太和十九年（**495**）云冈石窟 第**11**窟明窗

图片来源：《云冈石窟》。



图**2** 侯后云造像（具体时间不详）云冈石窟 第**11**窟东壁

图片来源：《云冈石窟》。

第三类，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共3处。

第11窟东壁邑义信士女五十四人造像[16]（图3），太和七年（483），左侧三身比丘带十七身男胡服供养人，右侧三十七身女胡服供养人。第11窟南壁清信女造像[17]（具体时间不详），台基左侧五身

男胡服供养人，右侧五身女胡服供养人。第17窟明窗东侧比丘尼惠定造像[18]，太和十三年（489），台基左右各四身胡服供养人。



图3 邑义信士女五十四人造像龛 太和七年

图片来源：《云冈石窟》。

以上三类造像中，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以及胡服胡姓侯后云造像皆为第二期造像（即建造时间为孝文帝服制改革前），故而，这些造像中出现的人物皆着胡服；周氏造像建造年代为太和十九年（495），虽然建造时孝文帝已经开始其汉化改革，但是规定具体服制时间则是太和二十年（496），故周氏虽为汉人，但也是以胡服来展现自己的形象。

如前所述，侯后云造像中侯氏应为鲜卑姓氏，属于与华夏民族相对应的胡族，因此，造像中供养人身着胡服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一行为表达了鲜卑民族对其民族归属的认同与骄傲，同样，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也传达了同样的含义。但是，在周氏造像中，身为汉人的周氏在供养人造像中也以胡服展现自己的形象，“本应是汉族的供养人像却穿着胡服，这种难以理解的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供养人像不仅代表的是佛教信徒这一宗教性意义，而且也是反映某种社会性意义和功能的图像。进一步说，伴有这种供养人像的佛像，不仅有其宗教性意义，同时也有其现实的社会性意义”[19]。

细究之下，周氏造像中的汉人胡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他身处鲜卑等民族居多的生存环境之中，但是，在一个比较个性表达的造像中他仍以这种形象示人，同时也说明了汉人周氏对鲜卑政权的认同，以及对非华夏民族即胡族的认同：“他们虽然是从佛教信仰出发，但实际上极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意义、目的和功能。以胡服表现的供养人像意味着他们是鲜卑国家理想的臣民像，具有表示向统治者顺从意志的功能。”[20]当然

这种认同也许有迫不得已的因素：“被统治的汉族要想在胡族政权下得以生存，就必须尊重统治者鲜卑族的风俗。同时也表明了在推行汉化政策的480年代以前的时候，北魏还是极力鼓励‘胡’风的，‘被胡俗化的汉文化和佛教文化’很盛行。胡服孝子图、东王公、西王母以及胡服的佛教说法图、维摩像等即是其例。”[21]虽然北魏政权并非如石松日奈子所说，480年以前极力鼓励胡风，但是“胡风国俗，杂相糅乱”[22]也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因此“云冈石窟等的北魏平城时代的供养人像，汉族姓名的供养人也都以胡服像表现。这可能是象征‘统治者是鲜卑，被统治者是汉族’的北魏国家的支配结构”[23]。

2.胡、汉服混杂供养人造像

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邑义信士女五十四人造像龛右下方一造像龛[24]（具体时间不详）（图4），其佛像下侧左右各有十身胡、汉服混杂的供养人。左侧两身比丘，七身男胡服供养人，此外，最后一人服饰是以宽袖、长袍为特征的褒衣博带式汉服。右侧八身比丘，两身女性胡服供养人。



图**4** 胡、汉服混杂造像（具体时间不详）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

图片来源：《云冈石窟》。

此造像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类人物的站位顺序，在比丘与供养人的站位上，比丘在前，世俗供养人在后。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前尊后卑是一种习见的现象，这种安排体现了创作者的时代与阶级背景和对佛教的理解。在信徒的心中，佛教及佛祖是至高无上的，身为佛教出家人的比丘，其地位也是高于一般世俗供养人的，这表达了世俗供养人对佛教以及比丘的尊崇。但是，在胡服供养人与汉服供养人的站位中，左侧供养人前七个皆为胡服供养人，最后一个为汉服供养人，

这种站位顺序也应该有一定的意味，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的尊卑及民族观念。正如一些学者所说，造像供养人“通过对服饰、发型、物件以及空间结构的描绘，可以清楚地反映供养人的性别、族群系属、亲属关系、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综观佛教艺术品中可对游牧族群供养人的可视化表现形式，大量的例子说明了供养人们通过众多元素来构建和推广他们的族性和社会认同，包括：服饰、姓名、等级、社会地位、地理位置以及人们所属的社会和宗教群体（如家庭、支系、虔信群体）”[25]。

不仅前后的方位有尊卑意味，在中国古代，人们也赋予左与右方位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形成了尚左或尚左的观念，成为用以反映社会中人或事物上下、尊卑、高低差别的一种方式，然尚左、尚右，诸家众说纷纭，而且各朝各代时有变化。

清代学者赵翼曾对左右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证：“两汉尊右卑左，久为定制。”[26]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事实却不尽如此。东汉姑且不论，尊右尊左的问题，在西汉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王的更迭，封建王朝中权力的再分配等诸多因素，而有着或‘尊右’或‘尊左’的差异。简言之，西汉二百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朝臣班次的尊卑情况，从时间的前后看，是前期尊右，后期尊左”[27]。“至汉以后改从尚左，则不知始于何时”，“唐时朝制尚左，尤有明证”，“至有元一代之礼，则皆尚右”，“今之尚左，则自汉太祖始”[28]。

由此可知，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当时的习俗也是尚左，而且这种状况在供养人造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云冈石窟供养人造像中，无论胡服供养人还是汉服供养人，男性都在左侧，而女性都在右侧，而在胡汉服混杂的造像中，胡服供养人在左，汉服供养人在右。故自古以来的方位尊卑习俗，使我们从胡、汉服混杂造像中胡前汉后的站位方式中窥视出当时上层社会的尊卑顺序与民族认同倾向。

此造像位于第二期石窟，即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之前。北魏建国后，其政权中的许多鲜卑君臣虽然已经意识到接受汉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在情感上又不愿彻底改变鲜卑族的文化和习俗，故而形成了“胡风国俗，杂相糅乱”[29]的局面，当时鲜卑族以及其他非华夏民族势力比较强，因此，整个社会胡族文化应该处于上风。

那么，在造像中出现的胡前汉后的现象应属当时北魏上层社会尊崇

胡族现象的正常反映，是对尊卑顺序与民族认同中趋向胡人的生动表达。

而且同一窟中，即第11窟东壁最上层的邑义信士女五十四人造像龛保存有太和七年（483）的题记（图5），在题记左右两侧雕有四个比丘像和“邑师法宗”“邑师昙秀”“邑师普明”的榜题，其两侧有四段按男女分别刻出胡服的供养人列像。这些“着鲜卑服的供养人像，表现佛教信徒形象的同时，也表示自己是属于推崇跟佛陀同等的皇帝的鲜卑国家的成员”[30]。说得更明确一点，那就是穿着此服装就意味着你对此服装的民族属性的认同，也就是说它体现了一种民族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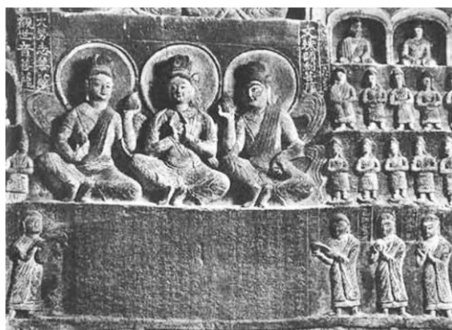


图5 邑义信士女五十四造像人龛题记 太和七年

图片来源：〔日〕石松日奈子：《云冈第11窟太和七年邑义造像和武州山石窟寺的变化》一文，刊于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汉服供养人造像

云冈石窟中汉服供养人造像共71处，主要出现于第三期石窟，以及第三期对第一、第二期石窟的补刻造像中。这些造像题记较少，其中含题记的供养人造像主要分为三类：汉服胡姓供养人造像、汉服汉姓供养人造像及汉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

第一类，汉服胡姓供养人造像共1处：第19窟B窟后壁元三造像，延昌四年（515）（图6），台基左右各有四身供养人，两侧第一身均为比丘，后三身为汉服的供养人。



图6 元三造像[31]延昌四年（515）云冈石窟 第19窟B窟后壁

图片来源：《云冈石窟》。

第二类，汉服汉姓供养人造像共1处：第38窟外壁上部吴氏造像（具体时间不详）（图7）。台基左右各四身供养人。两侧第一身为比丘，左侧三身为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为女性汉服供养人。



图7 吴氏造像（具体时间不详）云冈石窟 第38窟外壁

图片来源：《云冈石窟》。

第三类，汉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共5处。

第35窟门口东侧常主匠造像，延昌四年（515）（图8），台基右侧三身比丘，左侧两身汉服供养人。



图8 常主匠造像 延昌四年（515）云冈石窟第35窟门口

图片来源：《云冈石窟》。

第4窟南壁为亡夫造像[32]，正光年间（520～523），台基左侧一身汉服供养人，右侧两身汉服供养人。

第30窟前室北壁刘大□造像[33]（具体时间不详），台基左右各五身汉服供养人。

第39窟法玉造像[34]（具体时间不详），台基两侧各四身汉服供养人。

第35窟门口东侧王乙造像[35]（具体时间不详），台基刻十二身汉服供养人。

此部分造像按照宿白先生的分期标准来看均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建造，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如佛像的褒衣博带一样，“是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的服制改革相呼应的”[36]。

此时期存在胡姓、汉姓及族属不详汉服供养人，同时还有64处汉服供养人未刻造像记。

从宿白先生的分期上看，在云冈石窟的三期造像中，胡服供养人主要出现于第一、第二期造像中，而在第三期造像中，汉服供养人造像数量迅速增多，即造像在第三期时，出现由胡服向汉服过渡的一个巨大转变。不仅如此，云冈石窟“佛教的服装，在第二期晚期也换上了新型的‘褒衣博带’式的样式”[37]，在这些造像中，无论供养人是汉人还是胡人，在供养造像时均愿意以汉服来表达自己。汉姓供养人在造像中使用汉服展现自己，体现了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胡姓供养人在造像中使

用汉服，既表达了其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支持，同时也表达了其对汉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二）造像中的姓氏与民族认同

云冈石窟佛教供养人造像题记中保留了许多当时的姓氏资料，这些姓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的认同。

云冈石窟的供养人造像中保留有题记的情况主要出现在中期，因此，题记中的姓氏，大多是孝文帝改革之后的单字姓氏，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第11窟贺若步洛敦造像，开凿于太和二十年（496）。其题记载："太和二十年（496）佛弟子贺若步洛敦发心造多宝佛一区"[38]。

史书载："（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魏主下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39]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即当年的正月初三[40]，孝文帝就下诏改革姓氏，但是贺若步洛敦造像中仍出现鲜卑姓氏"贺若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多，一是此造像完成的时间有可能与孝文帝下诏改革姓氏的时间相同，或略前一些，还来不及将"贺若氏"改掉，但是从孝文帝下诏的时间是正月初三看，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二可能是政策执行的滞后性，一般说来政策的颁布到执行，往往需要一定的时日，故题记中仍保留了"贺若"这一胡人复姓；第三个原因，也是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政策的优容性，即如史书明确记载"贺若氏，依旧贺若氏"[41]，也就是说，当时孝文帝进行姓氏改革时，允许贺若氏保留原有的胡族姓氏，但并没有明示依旧保留贺若氏这一胡族姓氏的原因。

《通志》曾对此现象进行解释：贺若氏"代居玄朔，随魏南迁，北俗谓'志正'为'贺若'，因以命氏。孝文时代人咸改单姓，惟贺若氏不改，远祖达罗安乐王"[42]。岑仲勉先生认为"《通志》之'志正'，当'忠贞'之讹"[43]。

不仅保留旧有姓氏，孝文帝在进行汉化改革时，其他的优容现象从史书中也能找到相关的记载："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44]说明当时孝文帝的妥协与让步在许多方面存在。

为了适应北魏当时的政治形势，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胡、汉之间的矛盾，促进了鲜卑的汉化以及鲜、汉民族之间的融合，稳定与巩固了北魏政权的统治。不过从为了表彰贺若氏的忠贞而允许其保留胡姓这一行为可以看出，孝文帝在改革遇阻之时处理问题的灵活以及对鲜卑贵族的迁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鲜卑民族心目中坚持着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对汉化政策的抵制。但是，我们绝不能否认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胡、汉之间的矛盾，促进双方民族认同的作用。

综上所述，云冈石窟供养人造像在服饰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变化。云冈石窟第一、第二期供养人造像主要穿着胡服，在第二期供养人造像中出现了胡、汉服混杂的现象，虽然这一期造像修凿在汉化改革之前，但是在官方造像中出现胡、汉服造像混杂现象，一是因为随着北魏政权的发展，吸纳的汉族人士越来越多，造像是这种现实的反映，二也说明了胡、汉上层之间关系的融洽，由此也可以说明孝文帝汉化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云冈石窟第一、第二期的开凿时间基本都在494年（孝文帝汉化改革开始的时间）之前，但是到了第三期（494～534），供养人造像中胡服基本消失，代之以大量汉服供养人造像。从分期的变化中看到太和十八年（494）基本为一个转折节点，这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时间相吻合，由此可见，不论北魏统治者实行改革的目的和后果如何，他们的这一改革十分明显地影响了佛教造像的风格，孝文帝汉化措施在官方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实施，同时也说明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支配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同。

“龙门石窟所见袒右肩式的佛像样式承袭云冈石窟自无疑义，而龙门石窟大量出现的‘褒衣博带’式的佛像样式，在云冈石窟中也是大量存在的，说明孝文帝的服制改革同时也在旧都平城地区得到贯彻”[45]。

只不过，在第三期造像中，虽然供养人形象都是穿着汉服，但是从姓氏看，这些供养人中不仅有汉姓，同时还存在少量胡姓，这种胡姓的存在表明孝文帝改革是有一些保留余地的，在一定程度上对顽固的改革反对派还是有一些让步的，同时也说明在鲜卑贵族的心目中更认同原本民族特色浓厚的胡姓。

二 龙门石窟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为适应北魏社会发展的需要，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

时也为了与南朝汉族政权相对抗，北魏孝文帝以南下灭齐为名，于太和十七年（493）秋天，率军进驻洛阳，翌年正式宣布迁都，随着都城的迁移，平城失去了原有的优越地位，云冈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就此终结，北魏境内开窟造像的中心转移到新的都城洛阳，从此开始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的营造史。史载龙门石窟“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46]。从北魏太和年间起，中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以及隋、唐、五代、北宋和金，直至清末。1000多年间，封建统治者先后营建了大大小小的窟龛，像蜂窝一样，密布在伊水两岸、东西两山的崖壁上。其中北魏、唐朝时期造像最是繁盛。北魏一朝约开凿了其中的1/3，具体有：古阳洞、宾阳中洞、敬善寺洞、莲花洞、赵客师洞、普泰洞、魏字洞、慈香洞、药方洞、皇甫公洞等。因此，龙门石窟成为北魏迁都之后的官方代表作。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促进和带动了河洛地区佛教艺术的大发展。《洛阳伽蓝记·序》云：“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47]“京师表里，凡有一千余寺。”[48]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及佛教艺术的兴盛和繁荣。

“在龙门石窟琳琅满目的宗教艺术雕刻中，最能直接反映当时世俗社会生活情节的，应属于那些比比皆是连缀于佛像侧旁而富有生动艺术个性的供养人造像。”[49]与云冈石窟供养人造像多、题记少有所不同，龙门石窟刻有大量题记，而这些题记为我们探讨供养人姓氏变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一）造像中的服饰与民族认同

龙门石窟造像以供养人服饰可以分为两类：胡服供养人造像与汉服供养人造像。

1.胡服胡姓供养人造像

龙门石窟仅1处胡服胡姓供养人造像：古阳洞北壁尉迟夫人造像[50]

（图9）。佛像左侧两身男性胡服供养人，右侧一身女性胡服供养人。此造像也有题记："太和十九年（495）十一月，使持节司空公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请工镂石，造此弥勒像一区。"[51]从造像记可以看出此造像是"丘穆陵亮"的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开凿，她希望通过供养造像保佑自己的亡子。



图**9** 尉迟夫人造像 太和十九年（**495**）龙门石窟 古阳洞北壁

图片来源：《古阳洞》。

尉迟夫人造像题记中出现两个胡族姓氏：丘穆陵氏与尉迟氏。这两个姓氏皆位列鲜卑勋臣八姓："太和十九年（495），诏曰：'……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52]其中的穆氏是由丘穆陵氏所改："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53]尉氏则是由尉迟氏所改："西方尉迟氏，后改为尉氏。"[54]即丘穆陵氏与尉迟氏均为鲜卑大族，在造像中使用复姓与胡服较为正常，但是，这种状况是否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有冲突？

首先，从时间上看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尉迟夫人造像时间为"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太和十八年（494），"革衣服之制"[55]，至太和十九年（495）"十有二月……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56]，即太和十九年十二月才给出具体的"冠服"形制。因而，此时在造像中以胡服来表达自己的形象完全可以理解。

其次，孝文帝汉化改革中的姓氏改革开始于太和二十年（496）春，尉迟夫人造像的制作时间早于这一时间，故而造像题记中出现有胡族特征的尉迟氏是正常的。尉迟夫人造像中的胡姓胡服表明了在孝文帝汉化政策实施之前，非华夏民族从个人意愿上还是愿意穿着胡服、使用其原有的带有明显民族特色的姓氏，这显示了尉迟氏对其民族属性的认同。

2.汉服供养人造像

龙门石窟中共有26处汉服供养人造像，其中汉服胡姓供养人造像有7处，汉服汉姓供养人造像有7处，汉服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有1处，汉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共有11处。

第一类，汉服胡姓供养人造像。

汉服胡姓供养人造像有7处，这些造像中出现的姓氏均是简化之后的单姓，供养人服饰也由夹领小袖式胡服转为褒衣宽带式汉服。造像具体如下：

古阳洞元详造像，太和二十二年（498）（图10），台基右侧刻三身比丘造像，后跟四身汉服的女性供养人，四身小型持伞蔓汉服仆从。左侧三身比丘，后跟五身汉服男性供养人。



图**10** 元详造像 太和二十二年（**498**）龙门石窟 古阳洞

图片来源：《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

古阳洞是北魏皇室宗亲在太和到景明年间，以天然溶洞为基础开窟的造像，其后又陆续两次向下挖掘扩大造像。

在古阳洞窟中出现了元氏造像，元氏是由鲜卑拓跋氏改姓而来：太和二十年（496）春正月“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57]。

古阳洞比丘法生造像（图11），景明三年（502），台基左侧刻三

身比丘，一身汉服男性供养人，六身小型执伞蔓汉服供养人。右侧刻三身比丘，两身汉服女性供养人，六身小型执伞蔓汉服供养人。比丘法生就是北海王家所豢养的高僧。北海王元详，为献文帝第七子，其母是献文帝妃高椒房。题记中元氏与元详同属鲜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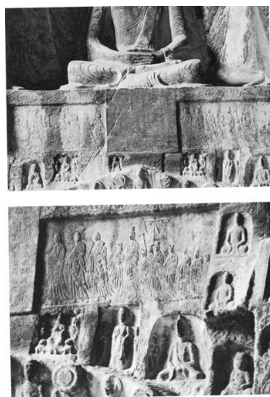


图**11** 比丘法生造像 景明三年（**502**）龙门石窟 古阳洞

图片来源：《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古阳洞杨大眼造像[58]，景明至正始年间（500～508），台基左右各有三身双手合十汉服供养人造像。杨大眼为氐族，“仇池杨氏，氐族大姓”[59]，且“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也。少有胆气，跳走如飞……太和中，起家奉朝请”[60]。

古阳洞史市荣造像[61]，正始五年（508），左侧刻一身汉服供养人。史市荣应为突厥族，史料载“河南史氏，本姓阿史那”[62]。阿史那为突厥姓氏，从阿史那改姓为史氏，又活动于河南地区这一信息，可判断史市荣应为突厥族。，当然也不排除其为粟特的可能。

大佛洞刘洛真造像[63]，延昌元年（512），台基左右各有两身女性汉服供养人造像。刘姓在汉族以及匈奴族、鲜卑族中均有。《魏书》载“独孤氏，后改为刘氏”[64]；匈奴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因汉高祖时曾“以宗女为公主，又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65]。但从“刘洛真”这一名字上，可以推测，其极有可能是鲜卑人，《南齐书》载：“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66]由此可见，“真”是鲜卑人非常喜欢使用的词，故此处刘洛真极有可能属于鲜卑族。

古阳洞齐郡王元佑造像[67]，熙平二年（517），题记右上角刻一身汉服供养人造像。元佑应为鲜卑族无疑。

药房洞路僧妙造像[68]，普泰二年（532），台基左侧有一身比丘，两身汉服供养人，右侧刻一身比丘，一身汉服供养人。路僧妙应为胡族，因路氏是十六国时期屠各常用的姓氏："黄石屠各路松多……聚众数千，附于南阳王保。"[69]当然此后孝文帝改革时，也有鲜卑的没路真氏改为路氏的情况："没路真氏，后改为路氏。"[70]由此可以推测此处路僧妙应为非汉民族。

从以上这些造像题记中可以得知造像中供养人为元详、元宝意、元善意、元伏荣、杨大眼、史市荣、刘洛真、元佑、路僧妙等，这些供养人均为胡族。但是，这些胡姓供养人在供养造像表达自己形象时，均选择褒衣宽带式的汉服，而且从时间上看这几处造像均制作完成于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政策对民间造像的影响。供养人服饰的显著变化应该是在太和二十二年，即498年。

"太和二十二年（498）比丘慧成龛的台基部，在中央香炉的左右各表现两身跪坐合掌的供养人像，可能也是身穿胡服。特别是中夹偏右的一身头戴鲜卑帽。慧成龛的如来和飞天是西方式，胁侍菩萨像却是中国式的着衣，可以说整个佛龛是从西方式向中国式过渡期的作品，不过还没有发现供养人像的中国化。但是，与慧成龛同在北壁，而且是同年供养的北海王元详龛，却在台基部出现了汉服供养人像，因此可以说，从胡服向汉服的转变发生在498年左右"[71]。

"在古阳洞，造像的着衣从西方式转变成中国式，但并不是所有的造像同时发生变化，其顺序为菩萨和供养人像在先，稍晚一点才是飞天和如来。西方式菩萨像以495年的长乐王夫人龛为代表，最晚的是502年高树龛和同一年的比丘惠感龛。另一方面，中国式菩萨像首次出现是498年比丘慧成龛和同一年的北海王元详龛。此外，509年以后出现身穿交领大袖衣的菩萨像。供养人像也是，在495年长乐王夫人龛穿着的还是胡服，而在498年北海王元详龛却成了汉服，变化就在这一时期"[72]。

孝文帝下定决心倡导汉文化，且通过定姓族等措施来促进汉化政策的实施。不仅如此，拓跋鲜卑还将自己的祖源攀附到华夏民族的远祖黄帝："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73]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有利于鲜卑

民族的认同构建，“一个族群需要强调共同的起源，传说中的始祖（如汉族传说中的炎黄），或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大规模的移民或战争），成为一群人重要的集体记忆”[74]。

第二类，汉服汉姓供养人造像。

汉服汉姓供养人造像，共收集到7处。

魏灵藏造像[75]，景明年间（500～503），左右各有三身汉服供养人。对于这一造像有学者进行了分析：“尽管一般佛经故事的情节内容带有强烈的域外宗教文化的特质，但魏灵藏像龛这一经变图画的造像形态从情节布局到题材选择都充满了我国传统世俗文化的情调——图中人物形象及其生活用具的刻划，其实质正是对魏晋以来我国士族阶级典型生活场景的描摹与采摘。而这种生活模式亦恰是北魏晚期积极推行汉化的拓跋统治阶级梦寐追求的境界。换言之，龙门早期维摩变造像的艺术题材，正是来源于拓跋统治阶级倾心汉化者的现实生活”[76]。

张英周造像[77]，正始五年（508），右侧刻两身汉服供养人。

王方等造像[78]，永平三年（510），台基刻三身汉服供养人。

杜永安造像[79]，神龟二年（519），台基刻一身汉服供养人。

张欢□造像[80]，永安二年（529），台基左右各有一身汉服供养人造像。

李长寿造像，永安三年（530）（图12），台基右侧刻六身女供养人，前三身女供养人头发高盘为发髻，身穿宽领宽袖长袍式汉服。后三身女供养人头发盘为两个发髻，身穿宽领宽袖长袍式汉服，其形象较前面供养人小，发髻样式也为明显仆从发型，故认定其为仆从。

樊道德造像[81]，普泰二年（532），台基左右各一身汉服执莲蕾供养人造像。



图12 李长寿造像 永安三年（530）龙门石窟 药方洞

图片来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拓片。

这七处造像中魏灵藏、张英周、杜永安、张欢▫、樊道德等供养者应为汉姓汉人，其均以汉服来展示自己的供养人形象。

在传统中国，一直存有“夷夏之辨”思想，“贵华夏贱夷狄”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虽然在战国时期也有“胡服骑射”，此后也有中原王朝吸收部分胡族文化，但是对非华夏文化的排斥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民族矛盾比较激烈的历史时期，“夷夏之辨”是华夏民族拒斥其他民族的有力思想武器。

北魏时期，因其政权的建立者拓跋氏即是与华夏族相对的胡族，在这个胡族建立的政权中，胡人地位的提高在各个方面都得以体现，因此，在云冈石窟前期造像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均着胡服，但是到北魏后期这一情况又有所改变，这一改变如龙门石窟造像一样，造像中供养人姓氏、服饰均出现汉化迹象，可见此时各个民族的民族属性认同有趋向汉人的苗头。

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造像中供养人姓氏、服饰发生这些变化，且时间上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较为贴近，再一次说明国家政策对官方石窟造像强有力的影响。

第三类，汉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

龙门石窟中现存族属不详汉服供养人造像约11处。

比丘慧成造像[82]，太和二十二年（498），台基左右各有两身汉服供养人；比丘法兴造像[83]，永平四年（511），题记上层刻一身汉服供

养人；比丘惠珍造像[84]，熙平二年（517），台基右侧刻一身汉服供养人；大统寺比丘慧荣造像，正光三年（522），题记左侧刻一身汉服供养人；比丘惠荣造像[85]，正光四年（523），题记左侧刻一身汉服供养人；比丘尼道□造像[86]，正光五年（524），题记左侧刻三身汉服供养人；比丘尼僧□造像[87]，孝昌元年（525），左右各刻一身比丘带一身汉服执莲蕾供养人；比丘尼僧达造像[88]，孝昌元年（525），左右各一身汉服供养人，一身执伞幔汉服仆从；比丘尼道慧法盛造像[89]，普泰元年（531），左右对立各刻一身汉服供养人；比丘静度造像[90]，普泰二年（532），题记右侧刻一身比丘，三身汉服女性供养人；比丘道仙造像[91]，永熙三年（534），题记右侧刻一身汉服执莲蕾供养人。

这些造像呈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基本上为出家者捐赠供养，而且去除原名使用法号，故不太好判断供养人的族属。虽然不能判定其族属，但是其在造像中均使用汉服来展示自己的供养人形象。二是从时间来看，这些造像均处于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使用汉服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

第四类，汉服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

汉服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有1处。

释法陵造像，永平五年（512），台基左侧刻十身汉服供养人，右侧刻八身汉服供养人。题记载："永平五年正月廿日，释法陵为国并父母、师僧、善友、知识、法界众生敬造。张如来……李法道、□敬遵、元□生、李卷成、□法护、孙道□、□伯方……元法郎……元迎男、元法洛、元若仁、李□奴。"[92]题记中的元法郎、元迎男、元法洛、元若仁等元氏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为拓跋鲜卑，从中可以看出，在此造像中，无论何种族属，供养人的形象都是以汉服示人的。

总之，从服饰上，在龙门石窟造像中，无论供养人的族属原本是汉人还是胡人，都是以汉服的形象出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得到了非常好的贯彻的。从造像时间来看，这些汉服供养人造像都是在孝文帝服饰改革之后出现的。在云冈、龙门两个官方石窟中，孝文帝改革后出现的供养人服饰基本上都是汉服，可见孝文帝改革对官方石窟的影响程度。

在龙门石窟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胡、汉多个民族出现在

同一造像中，这在官方造像中出现的原因不应该是何兹全先生所说的“穷”：“在建寺活动中，皇帝建最大的庙，大官大富建大庙，小官小富建中等寺庙或小庙。一般人民群众建不起大庙就建小庙，就造像。不能说达官大富不造像，但从造像所留下的材料看，造像常常是群体活动，许多人造一个像，一村一邑造一个像，几百人、几千人同造一个像。这里面有一代社会风气和宗教的因素，但不能否认这和造像者的经济条件有关系，甚或可以说‘穷’是主要原因。”[93]应该是孝文帝定姓族等一系列汉化政策在缓解胡、汉上层人士矛盾中取得了一定效果。同时也表明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下，非华夏民族也愿意接受汉文化，而且与汉族上层人士相处比较融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胡、汉民族上层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民族认同。

（二）造像题记中的姓氏与民族认同

1.胡姓供养人造像题记

目前所及，龙门石窟中仅存两处胡姓供养人造像：太妃侯造像与尉迟夫人造像（尉迟夫人造像前文有所论述，故此处不赘述）。

太妃侯造像题记载：“景明三年（502）八月十八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侍中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广川王贺兰汗造弥勒像。”[94]其中的贺兰氏为匈奴大姓，贺兰氏即贺赖氏，“贺赖氏通常作贺兰氏”[95]。

太妃侯造像时间为景明三年，距孝文帝的姓氏改革已过去了6年时间，那么为何在距离政治中心非常近的龙门石窟造像中仍然会出现使用胡族复姓的状况？

《元和姓纂》曾对此有所解释：“（贺兰氏）代居元朔，随魏南迁河洛，魏以‘忠贞’为‘贺兰’，因命以氏。孝文帝时代人咸改单姓，唯贺兰氏不改。”[96]但是《魏书》明确记载“北方贺兰，后改为贺氏”[97]，《魏书》只是记载“贺若氏，依旧贺若氏”[98]。

《通志》“贺若氏”条载：“贺若氏，代居玄朔，随魏南迁，北俗谓‘志正’为‘贺若’，因以命氏。孝文时代人咸改单姓，惟贺若氏不改。”[99]此处岑仲勉先生认为“《通志》之‘志正’，当‘忠贞’之讹”[100]。

《元和姓纂》对于贺兰氏不改姓氏的理由与《通志》对“贺若氏，依旧贺若氏”的解释非常相似。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盖南宋初见本犹未

混乱，其后贺兰文佚，遂以贺若蒙贺兰之称也”[101]。故根据《魏书·官氏志》的记载，《元和姓纂》的说法应该有误，贺兰氏在北魏时期应该不属于可以保留胡族姓氏的范围。

不过，无论没有改姓的是贺兰氏还是贺若氏，都说明孝文帝改革姓氏时是存在一些“优容”现象的，其特意允许“贺若氏，依旧贺若氏”，有可能是因为贺若氏“本檀石槐时代鲜卑西部中之一部落”[102]，也有可能如《元和姓纂》所说为了表彰贺若氏的忠贞，孝文帝破例允许其保留原姓。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孝文帝改革并没有完全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和目的。太妃侯造像中胡族姓氏的出现也说明鲜卑民族的上层人士对孝文帝的改革并非完全支持，汉化改革在当时还是存在一些阻力，正如孝文帝自己所说：“北人恋旧，南北纷扰。”[103]因此当时改革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当然这一现象同时也说明了胡族上层人士对本民族的认同，所以贺兰氏与贺若氏才会执着保留具有本民族特征的姓氏，进一步说明了民族认同的顽固性。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习俗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太和十三年云冈石窟中虽然可同时看到褒衣博带和右袒大衣两种装束的佛像，但在孝文帝迁都和实施彻底汉化改革之前，佛像的装束恐怕并未马上就变成以褒衣博带式为主。即便是在迁都和汉化改革之后的十年间，直到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在都城洛阳近郊的龙门石窟中，仍然存在不少袒右肩式佛像，云冈石窟的情形应该相去不远”[104]。

2.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题记

龙门石窟中共收集到8处胡、汉姓夹杂的造像，除前已论述的1处汉服胡、汉姓混杂造像即释法陵造像之外，还有7处胡、汉姓混杂造像。其实此处所述胡、汉姓混杂造像，从严格意义来说应该是汉姓供养人造像了，只不过从有些姓氏看，供养人在改姓之前应该是胡姓而已。

孙秋生造像，景明三年（502），题记载：“……大代太和七年（483）……孙秋生……等敬造石像一区……维那夏侯文德、孙洪龙、王洪哲、孙洪保、夏侯文度、王洛州、张龙凤、董洪路、王丑；维那高伯生、刘念祖、程万宗、卫荣方、樊虎子、王马生、和龙度、边百炽、诸葛愿德……维那吴灵口、刘昙乐、夏侯三郎、王乐祖、刘仲起、高叔齐、寇祖听、浑山国、赵道荣；……维那卫方意、孙天敬、赵光祖、姜龙起、姜清龙、赵天俱、杨荣祖、赵珍佰、诸葛磨尔……维那董光祖、

卫僧显、刘洪庆、高及祖、李虎子、赵丑奴、王龙起、王双、刘洛；维那孙溪伯、孙寿之、孙石、杜万岁、赵祖欢、宋小才、张万度、刘道义、宋俱……景明三年……”[105]

高树造像，景明三年（502），载：“邑主高树……等造石像一区……高买奴、高恶子、王僧宝、夏侯林宗、高留祖、魏洪度、高乞德、高文成、左芝、……司马保、解伯勋、高天保、亲英之、盖定王、张定光、高南征、高昙保、高副、高洛珍、杨洪佰、高思顺、邓通生、高珍保、孙山起、薛文达、高天生。”[106]

马振拜等造像，景明四年（503），载：“邑主马振拜……张引兴、刘苟生、陈野虎、孟游天、陈天起、陈兴族、张伏俱、陈显光、陈神欢、元世标、路天副、路买、吴永洛、马常兴、张天生、张文安、董定贵、董道欢、路平高、罗始龙、马勾郎、董神扶、梁归喜、阳成遵、任买德、陈延达、张欢喜、扬宗胜……”[107]

元燮造像，正始四年（507），载：“……安定王元燮，仰为亡祖亲太妃、亡考太傅静王、亡妣蒋妃，及见存眷属，敬就静窟造释迦之容……正始四年。”[108]

张师伯造像，延昌三年（514），载：“延昌三年八月二日，张师伯、张道夷、李始和、陈天治、□道、延形欢、景卫、车道问、胡道僧、苏景问、鲁国王义、王妃合十四人等，因石窟东崖造弥勒像一区……”[109]

苏胡仁造像，正光六年（525），“正光六年岁次乙巳朔五月十五日，像主苏胡仁合邑十九人等造释迦一区……苏胡仁、刘老、刘罗察、刘欢伯、兰瞰鬼、宋定生、王阿明、刘桃松、张苟仁、秦衰奴、载欢欣、苏罗得、刘贵洛、郭阿兴、乐魏保、郭白虎、阿肆郎……”[110]

刘景珍等造像（具体时间不详），“刘景珍、冯道智、周桃枝、□天顺、郭永寿、俟影晖、吴兴树、王昔洽、马保中、侯光用”[111]。

从以上题记中可以看出，这些供养人造像都是既有汉人又有胡人。如孙秋生造像中的和龙度应为鲜卑族：“素和氏，后改为和氏”[112]，“素和氏出于素和部，为东北境内游牧部落”[113]。《魏书》卷100《勿吉传》云：“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浑山国，史书载北魏神元皇帝时内入诸姓者有谷浑氏，“谷浑氏，后改为浑

氏”[114]。匈奴中亦有浑氏，“浑氏出自匈奴浑邪王，随拓跋氏徙河南，因以为氏”[115]，故此处浑山国应为鲜卑或匈奴，苏胡仁造像中的阿肆郎应属鲜卑族：“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116]刘景珍造像中的俟影晖应属鲜卑族：“俟奴氏，后改为俟氏。”[117]由此可知龙门石窟出现了较多胡、汉姓混杂的供养人造像，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

此类造像中除1处年代不明之外，其他造像的制作时间都是在孝文帝改革之后。之所以出现存在大量的汉姓供养人以及改姓之后的胡人供养人这种状况无疑是改革的结果，但是这么多比较明显的从血统来说是胡人与汉人混杂的造像，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体现了当时的民族关系状况，多民族友好地混居杂处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孝文帝汉化政策使官方石窟中出现了大量的汉服供养人与汉姓供养人造像，其中包括了明显是由胡姓而改的汉姓供养人造像。但是也有两处仍保留胡姓的供养人造像，而且其中太妃侯造像出现在孝文帝改革之后。这说明即使是在官方三令五申推行汉化政策的情况下，仍旧有一些胡族执着于以胡服或胡姓的外在表征凸显自己的形象与民族认同，同时也说明孝文帝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当汉化改革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会进行一系列的特殊处理，而且作为一种奖励，允许“贺若氏，依旧贺若氏”，说明汉化改革措施实行一段时间后，有一些胡族仍旧在内心深处是认同自己的胡族身份的。

不过在云冈石窟曾经大量出现的胡服供养人，随着孝文帝改革的推行与深入，逐渐减少，甚至绝大多数为汉服供养人形象所替代，而龙门石窟中的供养人造像大多制作于孝文帝改革之后，因而其出现的供养人形象更是以汉服、汉姓为主，只不过其中一些供养人的汉姓明显是由胡姓而改，这都说明在孝文帝改革的推动下，原本的胡族与汉人已经能非常平和地混居杂处，这种状态表明即使有一些胡族贵族仍旧顽固地试图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征以及民族认同，但是大多数的胡族已经接受了汉文化，胡、汉之间能够互相认同，胡族的华夏认同趋向具有一定的基础。

[1]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0页。

[2]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0页。

[3]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0页。

[4]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8，中华书局，1962，第640页。

[5] 〔日〕石松日奈子撰《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牛源译，《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6] 张金龙：《北魏政治史（7）》，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第415页。

[7]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4页。

[8]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第9页。

[9]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9页。

[10]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第24页。

[11]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7页。

[12]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101页。

[13]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卷8，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第8页。

[14]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卷8，第11页。

[15]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8页。

[16]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8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第29页。

[17]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8卷，第25页。

[18]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2卷，第10页。

[19] 〔日〕石松日奈子撰《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牛源译，《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20] 〔日〕石松日奈子撰《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牛源译，《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21] 〔日〕石松日奈子撰《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牛源译，《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22] 《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90页。

[23] 〔日〕石松日奈子撰《云冈第11窟太和七年邑义造像和武州风石窟寺的变化》，《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第303页。

[24]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8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第29页。

[25] 王静芬撰《族性与认同——南北朝时期作为佛教艺术供养人的北方游牧民》，郑杰译，《西北民族论丛》2014年第10辑。

[26] 赵翼撰，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21“尚左尚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69页。

[27] 姚国旺：《西汉官制尊或尊左考》，《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8] 赵翼撰，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21“尚左尚右”条，第369页。

[29] 《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90页。

[30] 〔日〕石松日奈子撰《云冈第11窟太和七年邑义造像和武州山石窟寺的变化》，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1]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3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第107页。

[32]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第103页。

[33]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5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第69页。

[34]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5卷，第85页。

[35]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5卷，第73页。

[36]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第79、80页。

[37]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中国石窟寺研究》，第79页。

[38]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云冈金石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第4页。

[39] 《资治通鉴》卷140“齐明帝建武三年”，第4393页。

[40] 王双怀主编《中国日历通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第2283页。

[41]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8页。

[42]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第175页。

[43]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9，中华书局，1994，第1317页。

[44] 《魏书》卷15《元晖传》，第378页。

[45] 张金龙：《北魏政治史（7）》，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第414页。

[46]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3页。

[47]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3，第20～22页。

[48]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23页。

[49] 张乃翥：《从龙门造像遗迹看北魏世俗生活面貌》，《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

[50] 刘景龙：《古阳窟：龙门石窟第1443窟》，科学出版社，2001，第61页。

[51]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座右寶刊行會，1941，第298页。

[52]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4页。

[53]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6页。

[54] 《魏书》卷112《官氏志》，第3012页。

[55] 《魏书》卷7《高祖纪》，第176页。

[56] 《魏书》卷7《高祖纪》，第179页。

[57] 《资治通鉴》卷140“齐明帝建武三年”，第4393页。

[58] 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科学出版社，2001，第67页。

[59]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第292页。

[60] 《魏书》卷73《杨大眼列传》，第633页。

[61]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11页。

[62]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6，中华书局，1994，第822页。

[63]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135x.html.

[64]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7页。

[65]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66] 《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85页。

[67] 龙门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龙门石窟》，文物出版社，1992，第148页。

[68]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62页。

[69] 《晋书》103《刘曜载记》，第2685页。

[70]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0页。

[71]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147页。

[72]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147页。

[73] 《魏书》卷1《序记》，第1页。

[7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1页。

[75] 温玉成：《中国石窟雕塑全集·龙门》，重庆出版社，2001，第19页。

[76] 张乃翥：《从龙门造像遗迹看北魏世俗生活面貌》，《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

[77]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12页。

[78]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33页。

[79]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202x.html.

[80]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339x.html.

[81] 佛教拓片研究小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北魏纪年佛教石刻拓本目录》，永登有限公司，1991，第132页。

[82] 刘景龙：《古阳窟：龙门石窟第1443窟》，科学出版社，2001，第74页。

[83]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112x.html.

[84]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43页。

[85]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245x.html.

[86] http：//rub.ihp.sinica.edu.tw/ ~ buddhism/main01.htm.

[87]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279x.html.

[88]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5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2页。

[89]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354x.html.

[90]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360x.html.

[91]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367x.html.

[92]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座右寶刊行會，1941，第304页。

[93]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序第2页。

[94]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座右寶刊行會，1941，第301页。

[95]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27页。

[96]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注记》卷8，中华书局，1994，第1316页。

[97]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2页。

[98]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4页。

[99]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四》，第175页。

[100]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9，中华书局，1994，第

1317页。

[101]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9，第1317页。

[102]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87页。

[103] 《魏书》卷19《任城王澄传》，第468页。

[104] 张金龙：《北魏政治史（7）》，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第407页。

[105]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座右寶刊行會，1941，第299页。

[106]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第300页。

[107]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第301页。

[108]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第302页。

[109] 刘莉莉：《河洛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4，第89页。

[110] 〔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座右寶刊行會，1941，第275页。

[111] 刘莉莉：《河洛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4，第123页。

[112] 《魏书》卷113《官氏传》，第3008页。

[113]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72页。

[114]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8页。

[115] 《新唐书》卷75《宰相世系表》，第3379页。

[116]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8页。

[117]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2页。

非官方佛教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和兴盛，开窟造像活动相继而起，中下层百姓也“相率造像，以翼佛祐”。“民间的在家信徒以个人目的造像时，就产生了要记录由谁、为什么造像的意识，显示自己的造像行为，也是主张造像功德归属的权利意识。题刻造像记是最简便的方法，但是对于不熟悉汉字的鲜卑人来说，需要用比字更直接的手段来记录自我行为，那就是表现供养人自己的形象。”[1]

在官方石窟中，造像记中的供养人无论是姓氏还是服饰都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与孝文帝改革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政策对官方石窟的影响，那么在民间造像是否也发生相同的变化？在这部分，笔者试图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这几个地区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探讨这一问题。

一 河北地区佛教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河北地区在十六国时期曾为后赵政权所占领，其统治者石勒因佛图澄“每知军行吉凶”[2]，而尊其为大和尚，不但将其诸稚子多养于寺中，而且“有事必咨而后行”。石虎曾称誉澄为“国之大宝”，并言“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3]，此后，汉人崇佛合法化。因此，佛图澄在石赵政权大力支持下，声望远播内外，“身边弟子常有数百，门徒累计达万人之多”，“后赵在短短数十年间，在朝廷和各州郡的资助下，佛图澄与其弟子建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字”[4]，后赵境内高僧辈出，如释道安、竺法雅、僧朗等。因此，河北地区成为当时佛教非常盛行的地区之一，出现了许多佛教造像。

河北地区佛教造像共收集到65处，与本论题相关的造像有17处。这17处造像从服饰上可分为：胡服供养人造像、汉服供养人造像。

（一）造像中的胡服与民族认同

共收集到13处胡服供养人造像，根据收集情况，将其分为两类：胡服汉姓供养人造像，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

1.胡服汉姓供养人造像

胡服汉姓供养人造像共9处。

“石造赵氏一族定光佛立像，太和十三·十九年（489·495）铭”“主尊右侧用浮雕表现合掌的胡服男性供养人像，共三段十一名，旁边有‘佛弟子赵□□’的文字。背面也有赵某的名字，由此可知这是彼此有血缘关系的赵氏一族的造像”[5]。

石造桓氏一族如来立像，无具体纪年，大约为北魏5世纪后半叶。“最下面有两层供养人像，其中下层供养人身着鲜卑服，上层的穿着大袖衣、下摆较长的汉式服装。两侧面也有浮雕，表现坐佛、着大袖衣的供养人像……供养人像的衣服有两种，可以判断本像的制作时间处于从胡服向汉服转变的过渡期，不过也不能否定桓氏一族存在胡、汉两族混合的可能性”[6]。

鲍纂造像[7]（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太平真君三年（442）（图13），“台座正面中央有捧持香炉的地神，其两侧各有狮子，右侧面为女性供养人列像，左侧面为男性供养人列像，背面在纵向框线内刻有十四行铭文。……男女供养人都穿长筒袖上衣，男性穿裤子和长靴，头上戴顶部呈圆形的头巾，女性穿裙子，头巾顶部有凹陷。这样的筒袖上衣和裤子、长靴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胡服）。同时，头后面垂布的头巾形状与文献所记载的‘垂裙覆带’[8]或‘大头长裙帽’[9]等胡帽的形状正好相符[10]，头巾顶部呈圆形的是男性，有凹陷的是女性。……这些供养人像的穿着明显是胡服即鲜卑的服装，把鲜卑的服饰文化带入到佛教造像的世界里了”。

该台座所刻铭文为：“大魏太平真君三年，岁次壬午正月戊寅朔十有八日乙未永昌王常侍定州常山鲍纂单宦在台灭割身□之储为父前邢邢令亡母王造兹石浮图大涅槃经一部愿。”“永昌王应为明元帝的孙子永昌王仁（445年去世），发愿者鲍纂是其常侍。鲍姓是汉族，母亲王氏也是汉族，但供养人像身穿胡服”[11]。

朱业微造像[12]，太平真君五年（444），台基左侧有三身男性胡服供养人，右侧有两身女性胡服供养人。

张永造像[13]，太安元年（455），台基左右各有两身男、女胡服供养人，背面刻六身胡服供养人。

黄□相造坐佛碑像[14]，延兴二年（472），台基左右各有一身比丘，一身男、女胡服供养人。

张泣戴造像[15]，延兴五年（475），台基左右各有一身男胡服供养人。

鞠抚造像[16]，太和六年（482）（图14），台基左侧刻一身胡服供养人，其头戴遮耳长帽，身穿夹领小袖式胡服上衣，脚蹬长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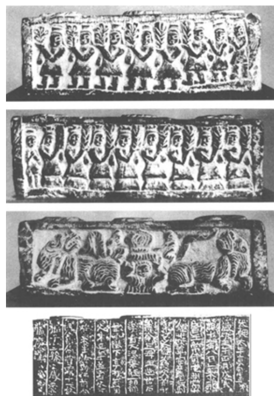


图**13** 鲍纂造像 太平真君三年（**442**）河北

图片来源：《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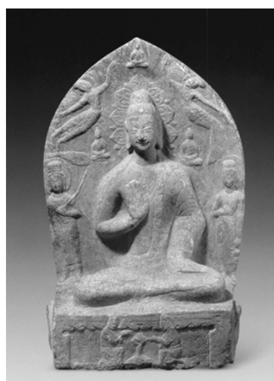


图**14** 鞠抚造像 太和六年（**482**）河北

图片来源：《邯郸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

贾法生兄弟造像[17]，太和十三年（489）（图15），台基左侧有一身男性胡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女性胡服供养人。



图**15** 贾法生兄弟造像 太和十三年（**489**）河北

图片来源：《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从此9处造像中的题记看，鲍纂、朱业微、张永、黄□相、张泣戴、贾法生等极有可能是汉人，但是在供养造像时以胡服来展示自己供养人的形象。“北魏政权下的汉族接受了统治者鲜卑的服装，表明了他们对国家的服从意志。即汉姓的胡服供养人像虽然是汉族，但为了表示对胡族王的服从而将自己表现为胡服形象”[18]。

2.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

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共4处。

弥勒菩萨交脚像[19]（具体时间不详），台基左侧有一身执莲蕾男性胡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执莲蕾女性胡服供养人；金铜二佛并坐像[20]，延兴二年（472），台基左右各有一身执莲蕾男、女胡服供养人；比丘僧造像[21]，太和二十二年（498），台基右侧有一身跪立男性胡服供养人；梁□□造像[22]，正光三年（522），台基左右各有一身女性胡服供养人。

这4处造像因题记所含信息量较少，故不能判断造像中供养人的族属。但是，从造像中所刻画的供养人服饰来看，这些捐赠者均愿意以胡服来表达自己的形象。

在以上两类胡服供养人造像中，除族属不详造像，其余为胡服汉姓供养人造像。同时，这些胡服供养人造像存在于孝文帝改革前后，其并不像官方石窟一样随孝文帝改革出现由胡服向汉服迅速转变的现象。

那么在河北地区为何出现与官方石窟不一致的现象呢？首先，对于

政府的政策、诏令，民间有时会出现上行下不效的情况，因为地处燕赵大地的河北地区是胡、汉混居杂处的地区，十六国混战期间，河北地区在石赵政权统治下，进行过大量的民族迁徙活动。据史念海研究："由茌平、东燕、酸枣徙降人二万余户，由平原徙乌丸等部落三万余户……由许颖徙来俘获及降人三万余……由寿春徙来二万余户，由历阳徙来七万户……"[23]通过长时间的混战和大量的民族迁徙，河北地区居民的民族状况比较复杂，不仅有汉人，还有众多的非汉民族，不同民族在河北地区交错杂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与交往过程中，胡、汉下层民众不断相互熟识、理解，为胡、汉民众形成相同的民族认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较多汉族在供养造像时愿意以胡服形象表达自己；再加上当时的河北地区也是鲜卑化气氛比较浓厚的地区，"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24]，虽然这一史料描述的是北齐时的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河北地区胡风盛行的程度。因此，在河北地区的佛教造像中，无论供养人是胡人还是汉人，均穿着胡服，说明这一地区的百姓愿意以着胡服的形象来展示自己。

其次，河北地区在孝文帝改革前后均出现胡服供养人造像，与官方石窟在改革之后迅速由胡服转为汉服的现象略有不同。河北地区的胡服供养人造像在孝文帝改革之前数量较多，在改革之后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仍有一些胡人服饰造像，这说明汉化改革对河北地区的影响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有可能是因为民间老百姓对政治没有那么敏感，对相关政策的接受速度比较慢。改革内容的实施与贯彻之所以在北魏政权的上层也就是政治中心比较好，是因为孝文帝曾对上层在职官员"班赐冠服"[25]，对上层的政策落实也比较重视，而对下层民众只能是一纸诏书，故而影响略微减弱，且下层民众远离朝堂，故服饰改革在下层民众中贯彻得不是很好。

禁胡服本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在迁都洛阳之前，孝文帝就已安排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蒋少华等人议定衣冠。在迁都的同年，他又下令朝野上下禁穿胡服，但因"国人多不悦"[26]，其中以太子元询为代表，孝文帝"宏制衣冠与之"，但元询"窃毁之，解发为编服左衽"[27]，因此，改革措施推行的效果大打折扣。如元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28]。朝廷议事时，其他大臣都改穿汉服，"朱衣满坐"，唯独元丕"胡服于其间"[29]。在当时这虽是个别现象，但因元丕的特殊身份和极高地位，对这项改革

的冲击力不容低估。太和十九年（495），鲜卑族妇女的服装依然是夹领小袖，并没有彻底改变，气得孝文帝大发雷霆："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30]直到太和二十三年（499）洛阳仍然多"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孝文帝责问"尚书何为不察"[31]，任城王澄则曰："著者犹少。"说明当时的鲜卑贵族及官员对于政策的执行也不是那么严格。

"车驾南伐，留澄居守……帝复幸邺，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而责问"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者犹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丧邦，其斯之谓"[32]。

而且当时孝文帝在改革时就有区别对待的政策："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33]对于孝文帝禁断北语的行为，推行三长制的李冲曾说："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34]由此可见，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阻力来自不同的民族，难免影响其成效。

对于孝文帝改革的效果传统的观点多认为其成效显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北史·王肃传》云："太和十七年，肃自建业来奔……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35]又《南齐书》载太和末，王肃为孝文帝"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36]。《资治通鉴》也载："时魏主（即孝文帝）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37]。

陈寅恪先生指出：王肃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遂"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38]。《王肃传》谓太和十七年王肃入魏之前，"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究其原因，"无居直接中心及知南朝最近发展之人物与资料可以依据"[39]。因此，有学者认为："太和前期的汉化改革，事实上并不彻底。尽管文明太后、孝文帝可以吸收残存的魏晋制度，但是包括服饰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必然也保留了许多拓跋鲜卑的传统风俗，至于'多肃所定'的'威仪文物'，自然也就有服饰方面的内容"[40]。

故而朱大渭先生说："我们据此推测，孝文帝在位乃至其身后的一段时期，胡服并未禁绝，而是形成一种以汉服为主、汉服胡服混用的局

面。”[41]这是研究北魏社会生活史的学者从正史文献中发掘资料讨论孝文帝改革的成效。

这种推断在河北地区的佛教造像中也得到比较充分的证实与体现，研究北魏佛教造像的日本学者石松日奈子曾注意到河北地区佛教造像的一个现象：“在台座和背面等处表现穿带袖上衣或披头巾的胡服供养人像，反映了北魏积极吸纳佛教的状况。不过，这些胡服供养人的姓名多像汉族，其实他们有可能是被征服的汉族民众。在建国初期的北魏领域内，征服者鲜卑族和被征服者汉族是居住在一起的，在人口比例上汉族应该占压倒多数。少数派的鲜卑族穿着自己的衣服，即胡服，然而占多数的汉族穿怎样的衣服却没有见到任何记录。佛教造像中表现出来的穿胡服的汉姓供养人像的存在，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到底是北魏命令被征服的汉族穿胡服呢，还是汉族人主动地穿上了胡服？”[42]

同时她又说：“480年代之前的鲜卑人对自己的胡俗应该较为肯定，但是在孝文帝服制改革日益严峻的490年代以后，胡服象逐渐减少。关于汉族姓的胡服像，是穿了胡服的汉族，还是用汉族姓的胡族，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43]。

（二）汉服供养人造像

与胡服相对应，共收集4处汉服供养人造像，其中汉姓汉服供养人造像共3处，胡姓汉服供养人造像共1处。

1.汉服汉姓供养人造像

汉服汉姓供养人造像3处：阳氏造像[44]，太和元年（477）（图16），右面台基左侧有一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女性汉服供养人；赵明造像[45]，太和四年（480），台基左侧有一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女供养人；刘未造像[46]，景明三年（502），背面左侧有两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女性汉服供养人。

2.汉服胡姓供养人造像

汉服胡姓供养人造像共1处。

邸拔延造像，正光四年（523）（图17），前侧台基刻一身汉服供

养人。“邸，县名，望出中山；一云，当系汉大月氏贵霜翎侯邸就却之后也。”[47]此外，罗新考证“bay即突厥语：

富裕、富人。突厥的拔延即其音译”[48]。故此处将邸拔延判断为非汉族。



图**16** 阳氏造像 太和元年（**477**）河北

图片来源：《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图**17** 邸拔延造像 正光四年（**523**）河北

图片来源：《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在以上汉服供养人造像中阳氏、赵明、刘未为汉人，邸拔延为胡族。

综上，河北地区的造像，从服饰上看，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胡服供养人形象都存在，从中可见民间造像的自主性、随意性。民间造像在不受外在意旨影响的情况下，其展现的民族认同更真实。但是改革之后出现的汉服供养人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这说明民间造像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历史潮流。从姓氏上看，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供养人的姓氏都是汉姓，但是有一些姓氏明显是由胡姓改为汉姓的，而且这些

都是出现在孝文帝改革之后，这也说明孝文帝改革的效果在河北的民间造像上得到了一定的反映。

二 河南地区佛教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河南地区佛教起始较早，东汉“永平求法”后，白马寺落成于洛阳，此即为东汉佛教的发端。魏晋时期高僧支谦、支敏度、康僧会翻译经典佛经，“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二十四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崇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49]。至北魏政权迁都洛阳，统治阶级的崇佛政策使得此地区佛教及造像艺术迅速发展起来。

北魏晚期以洛阳为中心，佛教艺术进入全面繁盛时期，并不断向周边地区及广大中下层民众扩散。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从洛阳龙门、巩义大力山，到周边地区诸多中小型石窟，开窟造像之风此起彼伏，从而带动了各地单体石造像艺术的发展。佛教造像碑资费少，便于移动，受到中下层民众的喜爱。

河南地区佛教造像除龙门石窟外还存在较多的民间造像，笔者共收集到46处，其中胡服供养人共0处，虽不排除确实没有胡服供养人造像的可能，但遗失应为主要原因。从所有造像的年代来看，除4处不确定具体年代的造像，其他均为孝文帝南迁之后建造，可能此时河南地区佛教造像之风始兴。

（一）造像中的服饰与民族认同

就笔者目前收集到的造像资料看，河南地区没有胡服供养人造像，主要是汉服供养人造像，这类造像共16处。

田延和造像[50]（具体时间不详），背面刻六排三十四身汉服供养人，及两身仆从。

一佛二菩萨造像[51]，背面刻七排七十身执莲花汉服供养人。

皇甫德造像，景明二年（501），台基左侧有四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四身女性汉服供养人。

阎勍之造像，景明四年（503），背面刻十排八十身执莲花汉服供

养人。

张难扬造像，景明四年（503），台基左右各有一身汉服供养人。

张村合邑造像，景明四年（503），背面刻十二排一百二十身汉服供养人。

孔惠超造像[52]，熙平二年（517），背面下层刻八排五十四身执莲蕾汉服供养人，上层左右各刻两身较大执莲蕾汉服供养人，及四身执莲蕾汉服仆从。

王毛郎造像，熙平二年（517），台基左右各有三身汉服供养人。



图**18** 扈豚造像 正光二年（**521**）河南

图片来源：《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

一佛二菩萨造像[53]，正光元年（520），台基左侧有三身汉服供养人，右侧有四身汉服供养人，七身供养人均跟一身小型执华盖汉服仆从。

扈豚造像，正光二年（521）（图18），台基左侧有一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女性汉服供养人。

慧荣造像[54]，正光四年（523），下侧刻一身汉服供养人。

刘根等造像[55]，正光五年（524），下侧刻七身广袖长袍式汉服供

养人。

杜文庆造像[56]，正光五年（524），台基左侧有两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四身女性汉服供养人。

荥阳大海寺造像[57]，正光六年（525），台基左右各有三身汉服供养人，背面刻五排八十八身汉服供养人。

骆道明造像[58]，孝昌二年（526），背面左侧有两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两身女性汉服供养人，各跟一身汉服仆从。

赵见憘造像[59]，永熙二年（533），台基左右各有六身汉服供养人。

从以上造像中可以看出，供养人不论姓氏、族属如何，在供养造像时均选择以汉服来表达自己的形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河南本就是一个中原传统文化比较深厚的区域，洛阳在东汉、西晋时期曾担任都城的角色，北魏迁都之后洛阳再次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在传统文化影响波及的地区造像选择汉服形象非常正常，二是从这些造像的时间看，除两处具体时间不详外，其余造像均处于孝文帝改革之后，最早的是孝文帝颁布服饰改革的7年后，大多在孝文帝改革20年之后，当时北魏境内除六镇地区之外，基本上大多受汉文化影响，所以出现了大量的汉服供养人造像。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孝文帝对河南地区汉化改革的重视。

根据史料记载，孝文帝在颁布改革措施之后对改革的成效非常关注，并曾因执行不力责备相关官员：

>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高祖）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60]

不仅如此，孝文帝对于其他地区的改革效果也非常关注。"车驾南伐，留澄居守……帝复幸邺，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而责问"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者犹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丧邦，其斯之谓"[61]。

由此可知，孝文帝改革是为防止“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因“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而责备留京之官，认为“既离寒暑”就不应“违前诏”，即再穿胡服。从路遇妇女“仍为夹领小袖”而责问一事可以看出孝文帝对其实施的汉化改革及其效果的重视，故在其督促下河南地区改革应比其他地区彻底，河南地区造像中供养人形象均为汉服也吻合了这一点，即孝文帝汉化改革，及其对改革效果的督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河南地区民众对汉文化的认同，文化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认同。

迁都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热心于提倡封建文化，结果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62]。仅仅是三四十年的时间，中原的面貌，特别是民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陈庆之从洛阳回到南方后对人说：“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63]。

（二）造像中的姓氏与民族认同

河南地区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共3处。

翟兴祖造像，正光四年（523）。“大魏正光四年岁次……法义卅人等建造石像一区……翟兴祖……俟地拔。邑子翟阿兴、一菩萨主王明洛、师子主邑正徐珍贵、……维那翟兴祖、加叶主沮渠显遵、邑子兰伏奴、邑主阳成文欣、……邑子郭显树、邑子廉兴盛、邑子马清奴、邑子王安平、邑子朱灵珍、……邑子贾昙端、邑子赵武庆、邑子施虎龙、……邑子阿各仁、香花主支僧安、邑子斛斯康德、邑子张天生，邑子阳成羊奴”[64]。

扈豚造像，正光二年（521）：“大魏正光二年……扈豚、张鲁女。”

扈文顒造像，孝昌三年（527）：“孝昌三年四月十五日，清信士佛弟子扈文顒为亡妻张融、亡息扈德、亡女扈妨仁造石像一躯”[65]。

从以上几处造像中，可以明显看出是胡族姓氏的有：沮渠显遵、阿各仁、支僧安、俟地拔等。沮渠显遵应为卢水胡，其先为匈奴族：“胡沮渠蒙逊，本出临松卢水，其先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66]阿各仁为鲜卑族，孝文帝姓氏改革使“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67]；支僧安应为月支胡人：“支氏：后赵司空支雄传云：其先月支胡人也，实西域之国。

晋有高僧支遁，字道林，天竺人。”[68]俟地拔应为鲜卑族，史书记载胡族姓氏中的俟氏有两个来源：“后魏献帝次弟为俟亥氏，改为俟氏。又俟奴氏改为俟氏。”[69]由此可以判断此处俟氏应为胡姓。

在这些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中，一类是胡、汉民众以义邑为单位共同供养造像表达祈愿，一类是以家庭为单位供养造像，但其中明显可以看出家庭成员中既有胡人同时也有汉人。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可见当时胡、汉民众愿意出现在同一造像中来表达祈愿，究其原因有可能如何兹全先生所说是经济状况所限，即“穷”：“在建寺活动中，皇帝建最大的庙，大官大富建大庙，小官小富建中等寺庙或小庙。一般人民群众建不起大庙就建小庙，就造像。不能说达官大富不造像，但从造像所留下的材料看，造像常常是群体活动，许多人造一个像，一村一邑造一个像，几百人、几千人同造一个像。这里面有一代社会风气和宗教的因素，但不能否认这和造像者的经济条件有关系，甚或可以说‘穷’是主要原因。”[70]但这种胡、汉混杂造像的状况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民族关系相对来说比较融洽，各个民族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比较频繁，这种胡、汉混杂出现在同一造像中的现象应该是他们日常生活状况的真实表现，同时也反映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

综上，非官方造像中，河南地区造像受孝文帝汉化改革影响较深。因为河南现有的造像中，其供养人服饰无论姓氏、族属如何，在供养造像时都以汉服表达自己的形象，从题记上，现有的3处民间造像均为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且都完成于孝文帝改革之后，不同姓氏的民族出现在同一造像之中，也说明了孝文帝汉化改革在河南地区的效果。虽然这种混杂现象极有可能如何兹全先生所说是“穷”的原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胡、汉民族之间混居杂处、友好相处的一种日常状态。北魏河南地区已经有胡、汉混杂的民族基础。据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成分较为复杂，主要有匈奴、丁零、羯、乌桓、鲜卑、氐、羌等”[71]。至北魏“原在平城的鲜卑人大多南迁，前后迁洛和南徙的贵族、官僚、军队及民众，总数在一百万左右”[72]。同时，北魏时期河南地区还存在少数民族豪强归附、内迁，胡商，胡僧等[73]。在长期的交往中双方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民族认同。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及督促改革的实施，在民众之间本身也存在一定的民族认同的情况下，河南地区民众在造像中通过姓氏、服饰所展示的认同均趋于汉。

三 山东地区佛教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山东，十六国时期在石赵政权崇佛政策下，山东地区佛教迅速发展，造像逐渐昌隆。至太武帝灭佛，虽然僧众通过窖藏对佛教造像进行庇护，但佛教造像还是受到一些冲击，许多造像外形受到一定程度破坏。

山东地区收集到79处较为完整的佛教造像，其中与本论题相关的造像共8处。在此将这8处造像以服饰、姓氏为标准分为两类：胡、汉服与胡、汉姓供养人造像。

（一）造像中的服饰与民族认同

胡服供养人造像共1处。



图**19** 郭武璘造像太和廿三年（**499**）山东

图片来源：《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

郭武璘造像[74]，太和廿三年（499）（图7），台基左侧刻一身胡服男性供养人；右侧有一身胡服女性供养人。

郭武璘有可能是汉人，但在供养造像表达祈愿时是身着胡服的形象。而且这一处造像在时间上处于孝文帝改革后，可能是孝文帝的服制改革还没有触及民众的社会生活及佛事活动，是改革在民间出现滞后的一种体现。当然郭武璘也有可能是屠各，《资治通鉴》卷105“太元九年正月”条有“屠各郭超”，如果郭武璘也是屠各的话，在造像中身着胡服就更好理解了。

汉服供养人造像共4处。

法坚造像[75]，延昌元年（512），左侧有一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女性汉服供养人。

孙宝憘造像[76]，神龟元年（518）（图20），台基左侧有一身跪立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跪立女性汉服供养人。



图**20** 孙宝憘造像 神龟元年（**518**）山东

图片来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拓片。



图**21** 贾智渊造像 正光六年（**525**）山东

图片来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拓片。

曹望憘造像[77]，正光六年（525），台基左侧刻一身男性汉服供养人，七身汉服仆从，右侧刻一身女性汉服供养人，六身汉服仆从。

贾智渊造像[78]，正光六年（525）（图21），佛像左侧有一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跪立女性汉服供养人。

综上，这4处汉服供养人造像中除法坚造像不能判定族属，其他造像供养人孙宝憘、曹望憘、贾智渊应均为汉姓汉人。汉姓汉人在供养造像、表达祈愿时使用汉服饰，表达了对本民族的认同。

同时，山东地区汉服供养人造像从时间来看均处于孝文帝改革之后，若不存在造像遗失的状况，出现此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受孝文帝改

革的影响。在山东地区胡、汉下层民众存在一定认同的情况下，加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山东地区各民族民众之间的认同朝汉族方向发展。

（二）造像中的姓氏与民族认同

在山东地区，搜集到的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共3处。

程通造像，正光五年（524）：“大魏正光五年……青州高阳郡程通……上为国王下为高老父母……郝仁、卜化、刀宗、程琪。”[79]

法义造像，正光六年（525）：“大魏正光六年……青州齐郡法义等七人造石像一区。清信士佛弟子张凤、张世隆、王道慧、鹿明、鹿国……”[80]

比丘尼明严造像，孝昌三年（527）：“大魏孝昌三年……比丘尼明严仰为亡父母……张女……鹿同……孟本……”[81]

在这三处造像中的供养人中比较明显为胡姓的有：卜化。卜化应为胡姓，“须卜氏，后改为卜氏”[82]，又“（匈奴）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83]。此造像处于孝文帝姓氏改革之后，故卜氏可能为鲜卑姓氏，也可能为匈奴姓氏。鹿明、鹿国、鹿同应为鲜卑族，“阿鹿桓氏，后改为鹿氏”[84]。

从这些造像中我们可以看到胡、汉民众愿意在同一造像中表达祈愿，而且这些造像大多出现在青州地区，其原因可能为多方面的。

首先，十六国时，青州地区为各个政权的必争之地，夺取此地的各个政权都会迁徙各族民众至此，因此许多民族居住在此，如匈奴、羌、鲜卑、氐、羯等。这些民族迁徙活动，使青州地区有了坚实的民族基础，促使胡、汉民众之间的友好相处，以及促进相互之间的民族认同。再加上山东本为孔孟之乡，儒家文化传统比较深厚，因此，在这一地区，即使是胡民族，也会对汉文化有一定的认同。

其次，从造像记中所反映的时间来看，这些胡、汉姓混杂的造像均处于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故二者之间的民族认同可能受官方汉化政策的影响较大。

最后，如“比丘尼明严造像”一样，造像题记显示，在比丘尼明严的

带领下，张、鹿、孟等姓氏的胡、汉民众一起捐赠、供养佛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佛教也是双方形成共同认同的桥梁。但是，不论在民族混杂、官方政策，或者是佛教众生皆平等观念基础上形成的胡、汉下层民众之间的认同，都证明二者之间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与可能。在形成一定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胡、汉民众一起供养造像。

四 山西地区佛教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在十六国的后赵时期，山西地区的佛教已经有所发展，至北魏迅速兴盛。鲜卑政权为巩固统治实行徙民政策，其中山东、河北、河西地区的大量民众被迁徙至平城附近。在这些迁徙的民众中不乏能工巧匠，故平城佛教受其影响并迅速发展。鲜卑为巩固其政权，大力发展佛教，在此期间虽然也出现太武帝灭佛的情况，但崇佛政策的大趋势使山西地区的佛教兴盛起来。

山西地区除了官方石窟云冈之外，也有一些民间佛教造像，只不过数量较少，一共收集到33处造像，其中11处与本论题相关。在这11处造像中，根据服饰、姓氏将其分为两类：胡、汉服供养人造像及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

（一）造像中的服饰与认同

胡服供养人造像共2处。

比丘僧安造像[85]，太和八年（484），台基左右各有一身胡服男性供养人。

吴道兴造像[86]，太和二十二年（498）（图22），背面左右各有两身胡服供养人。



图**22** 吴道兴造像 太和二十二年（**498**）山西

图片来源：《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这两处造像不同于官方石窟造像，其胡服供养人造像的时间跨越孝文帝改革前后，并且并未随孝文帝改革出现迅速趋汉的改变。这种情况，与河北、山东地区类似。

山西地区在民间造像中出现胡服供养人，日本学者认为："在佛教造像中，造像主（施主、供养人）在佛像旁边表现自己的形象，彰显自己的行为。北魏时代，由于造像十分普及，个人或团体的造像非常兴盛，因此，供养人像的表现也司空见惯。所表现的一个个供养人像，旁边附有刻写名字的榜题。在邑义的造像集团里，还可以见到教化僧也就是邑师的名字。北魏时代的供养人像有两种服装即胡服和汉服。胡服是鲜卑族的传统服装，穿着便于骑马、狩猎的窄袖上衣和裤子，并戴着鲜卑帽。女性服装也大致相同，在裤褶的上面穿裙。表现胡族供养人，说明了胡族在积极地表现自身'胡'的部分，证明了鲜卑拓跋部肯定地面对自己的胡族性。关于这一点，在平城时代的墓葬里，我们可以看到墓主人身穿胡服，或在汉族故事里特意表现身穿胡服的人物。还有一些例子证明，胡服供养人中很多使用汉族人的名字，表现北魏的被征服民族汉族，很可能也穿着胡服"[87]。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平城是拓跋族的集居地，同时是保守派的势力范围，北魏从天兴元年（398）道武帝迁都平城，到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近百年间一直作为国都，因此，平城的拓跋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相当牢固。"平城是鲜卑贵族集中的地方。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如元王丕、穆泰等人思想守旧，坚持旧的鲜卑风俗习惯，不愿改变。"[88]"这对于锐意接受汉族先进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习俗的孝文帝来说，无疑是

一种绳索”[89]，“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90]。为了摆脱拓跋旧贵族的羁绊，让拓跋族子孙尽情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沐浴儒家教育，革除拓跋族的落后愚昧陋俗，以达到“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91]的和睦共处目的，使拓跋族亦跻身于文明民族之林，孝文帝决定进行迁都。拓跋贵族对汉化改革的消极甚至积极的抵抗态度自然对下层民众有所影响，因此，在山西境内，虽然官方造像中的云冈石窟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汉服供养人形象，但是在民间造像中的供养人仍旧有一些以胡服的形象出现。

汉服供养人造像共7处：曹天度造像[92]，天安元年（466）（图23），台基刻九身汉服女性供养人；韩原造像[93]，正始元年（504），台基左侧有两身男供养人，右侧有两身女性汉服供养人；河东郡合村邑子造像[94]，永平三年（510），下侧刻较多汉服供养人；石造佛像[95]，熙平三年（518），下侧刻五十二身汉服供养人；吕氏合邑造像碑[96]，神龟三年（520），下侧左右各有一身汉服供养人，各跟一身执伞幔汉服仆从；平遥县乐壁寺造像[97]，正光四年（523）（图24），背面刻六十四身汉服女性供养人；王龙生造像碑[98]（具体时间不详），正面刻三身骑马汉服供养人造像，背面可辨识十三身汉服供养人。



图**23** 曹天度造像[99] 天安元年（**466**）山西

图片来源：《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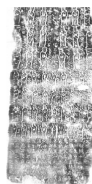


图**24** 平遥县乐壁寺造像正光四年（**523**）山西

图片来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拓片。

以上汉服供养人造像，时间上贯穿孝文帝改革前后，数量上孝文帝改革之后迅速增多。首先，从迅速增长的数量来看，北魏政权的崇佛政策使佛教造像在整体上迅速增加。在造像数量增加的同时，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可能对造像产生一定的影响，故汉服供养人造像数量迅速增加。其次，从题记中可知，造像供养人的姓氏既有胡姓也有汉姓，无论是汉姓供养人，还是胡姓供养人，他们在造像中均以汉服来表达自己的形象。造像中的胡、汉民众皆以汉服表达自己的形象，可见胡、汉下层民众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的民族认同。最后，在孝文帝改革前，官方石窟中没有出现汉服供养人造像，但是在山西地区的民间造像中早在天安元年（466）时曾出现过汉服供养人造像，这说明相对于受国家政策影响比较大的官方石窟造像，下层民众供养人造像可能更注重个性化的表达，对国家政策的关注程度不高，故其受官方政令等因素的影响较小，其也在侧面体现了民众在服饰认同基础上，对汉族的认同倾向。

（二）造像中的姓氏与认同

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共2处。摩崖石刻，永安二年（529）："大魏永安二年……化主张道香、杜勤、张僧光、杨次、李世洛、张双、张周匡、程清奴、张治成、王光仁、段蠡、张僧让、王贵和、董国、程香满、李万长、张思奴、连屠、张湛寻、张果住、洪林、原欢、张宝合世人共敬造……"[100]

郭仁合造像（具体时间不详），载："……郭仁合、王仁……王思遵、王伯□、郝□门……杜魁叔……韩子林、杜衍、荣阿容……苏景邕、李元、韩景弥……霍宝胜……连阿贵、王怀玉、景法迁……杜启、呼延敬仁、段良仁、申屠……"[101]

这两处造像中的连氏、呼延氏应为胡姓。连屠、连阿贵应为鲜卑族，虽然连氏也有可能是汉人，因"连氏，《左传》，齐大夫连称之后"，但"又是连氏改为连，望出上党"[102]，因此此处的连氏应为鲜卑人，呼延敬仁应为匈奴人："（匈奴）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103]。

以上两处造像中不仅有汉姓，而且包含胡姓，此类造像的出现应与山西历史上本就是多民族混居有关，两晋十六国时期，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山胡、稽胡等少数民族。匈奴大规模进入中原，始于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奉藩称臣"。次年，东

汉“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104]。定襄、雁门、代等郡成为南匈奴聚居地。东汉光武帝后，乌桓移居塞内，在代郡、雁门、太原等地与汉族杂居。汉末，鲜卑步度根拥众数万落，据云中、雁门一带，北魏建立后，拓跋鲜卑的发展更为迅速。魏晋之际，羯人主要聚居于上党武乡。氐族建立的前秦一度控制并州地区，不少氐民也因此进入山西。北魏时期拓跋鲜卑控制山西，定都平城，并进行大量迁徙“以实京师”。故山西地区民间存在胡、汉混杂的民族基础，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与交往中，内迁的胡族逐渐接受汉文化，再加上孝文帝改革政策的影响，胡、汉双方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友好相处，一同供养佛像表达祈愿即是这种现实生活的真实体现。

五 陕西地区佛教造像中的民族认同

陕西地区的中心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自汉代以来就与西域往来频繁。在十六国时期，后秦姚兴以国师之礼待鸠摩罗什，鸠氏于长安译佛经、宣佛法，“（姚）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叡、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105]。不仅如此，后秦还创建了较完善的僧官制度来管理僧众，促进了后秦佛教的繁盛，长安城成为当时的一个僧人传教、译经的中心。在此影响下，陕西地区的佛教造像较多，据学者统计陕西地区共收集到146处造像，这些造像在整体形态上保存相对比较完整。但有些造像无法亲见，只在相关学者的论著中看到，而论著并没有提供笔者需要的相关服饰图像资料，故不能断定其服饰类型。如：杜氏家族合邑造像（神龟至正光年间）与庞氏造像（孝昌三年，527）等。

对于关中地区服饰改革的情况，有学者说：“在关中及关陇地区，孝文帝的服饰改革得到了贯彻执行，而在以六镇为中心的北方沿边地区，仍然维持着原有的装束，表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并未深入到这一地域。”[106]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本部分将收集到的造像依服饰、姓氏分类为胡、汉服与胡、汉姓供养人造像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造像中的服饰与民族认同

1.胡服供养人造像

胡服供养人造像共23处。在此以服饰为标准分为三类：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胡姓胡服供养人造像及汉姓胡服供养人造像。

胡服汉姓供养人造像共9处。

扈氏一族造像[107]，太和二十年（496），台基左侧有五身胡服供养人，右侧有六身胡服供养人。

扈天郁造像[108]，太和二十年（496）（图25），台基左侧有四身胡服供养人，右侧有五身胡服供养人。



图**25** 扈天郁造像 太和二十年（**496**）陕西

图片来源：《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张佰安造像[109]，太和二十三年（499），台基左侧刻三身男性胡服供养人，右侧刻四身女性胡服供养人。

何要龙造像[110]，景明至正始年间（502～508），台基刻六身胡服供养人。

郭氏造像[111]，永平年间（508～512），台基刻两身胡服供养人。

郭保畅造像[112]，延昌年间（512～515），台基左侧刻三身男性胡服供养人，右侧刻两身女性胡服供养人。

郭愿造像[113]，延昌二年（513），台基左、右各有三身男、女性胡服供养人。

郭始树造像[114]，神龟元年（518），台基左、右分别刻一身男性胡服供养人及一身女性胡服供养人。



图**26** 仇寄奴造像 延兴元年（**471**）陕西

图片来源：《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王子悦造像[115]，正光元年（520），佛像左侧有一身男性胡服供养人，三身男性胡服仆从，右侧刻一身女性胡服供养人，三身女性胡服仆从。

胡服胡姓供养人造像共1处。

仇寄奴造像[116]，延兴元年（471）（图26），背面左侧有一身男胡服供养人。右侧有两身女性胡服供养人。仇寄奴应为氐族："仇氏为氐族大姓，改汉姓较早……武都、阴平为氐族聚居之地……苻秦以后雍州仇氏为氐族大姓，在晋南北史书中记载甚明。"[117]史籍记载的仇姓氐族非常多："窦冲走汧川，汧川氐仇高执送之"[118]；"妖贼李弘反于贰原，贰原氐仇常起兵应弘"[119]；"是时，初置长蛇镇，真率众筑城，未讫，而氐豪仇傉檀等反叛，氐民咸应，其众甚盛。真平击之，杀四千余人，卒城长蛇而还"[120]；"安西将军邢峦遣建武将军傅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京师，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121]。陕西地区一直是氐、羌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故仇寄奴应为氐族。

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共13处。

交脚弥勒佛坐像（具体时间不详），背面刻九身胡服供养人；赵小川造像[122]（具体时间不详），佛像左右各有一身胡服供养人，台基左右各有四身胡服供养人；刘真孙造像[123]（具体时间不详），台基有五身女性胡服供养人，一身男性胡服供养人；背屏式弥勒菩萨造像，始光

五年（428）（图27），台基刻六身供养人；和平二年（461）释迦造像，背面刻十身胡服供养人；皇兴造像[124]，皇兴五年（471），台基左右各有十身男、女胡服供养人；攒尖顶亭形四面佛塔，太和年间（477～499），台基残存三身胡服供养人；刘天元造像[125]，太和三年（479）（图28），台基左侧刻四身男胡服供养人，右侧刻两身女胡服供养人；追远寺造像[126]，太和七年（483），台基左侧有一身执莲蕾男胡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执莲蕾女胡服供养人；成愿德造像[127]，永平二年（509），台基左侧有三身男胡服供养人，右侧有三身女胡服供养人；刘吏奴造像[128]，延昌年间（512～515），台基左侧有三身男胡服供养人，右侧有三身女胡服供养人；法慧造像[129]，延昌二年（513），下侧有一身胡服供养人；延昌三年（514）造像[130]，台基仅存一处胡服供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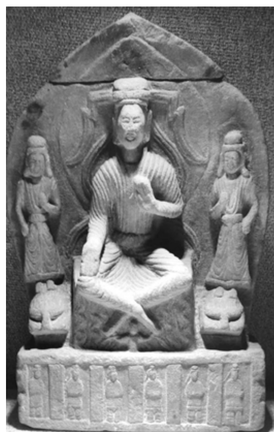


图**27** 背屏式弥勒菩萨造像始光五年（**428**）陕西小雁塔 图片宋莉拍摄

图片来源：《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



图28 刘天元造像 太和三年 （479）陕西 图片宋莉拍摄

图片来源：《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

在收集到的造像中除胡服族属不详供养人造像，不仅有胡服胡姓供养人造像，还有胡服汉姓供养人造像，并且数量较多。

首先，与官方石窟相比，陕西地区民间供养人造像未在孝文帝改革前后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不仅如此，而且胡服供养人造像在绝对数量上呈增加趋势，当然这种数量的增加只是相对的，其原因可能为陕西地区造像整体数量较多，故出现胡服的相对概率较大，其实在整个陕西地区的造像中，供养人造像胡服形象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是太多。

至于汉姓汉人为什么会着胡服来表达自己的形象，这可能与当时陕西地区民族混居的状况有关。混居杂处的各民族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或者是相互的，既有内迁胡族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因素，同时也有汉人受胡族影响的可能。东汉末至西晋初年，原本生活在东北、北方的各胡族大量内徙至西北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胡民族人口猛增。仅以原汉族聚居的关中为例，据元康九年（299）江统撰《徙戎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31]，而“西北诸郡皆为戎居”[132]。自十六国至北魏各个政权也不断迁徙周边各民族的人口于关中。据史念海研究，“灭前燕后，又徙慕容纬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又徙关东乌丸杂类于冯诩、北地……关中氐族聚居于三原、九峻，武功、乡材……（至后秦）由阴密徙来三万户……由河西徙来豪右万余户，由姑臧徙来后凉吕隆及其宗室巨僚等一万户……”[133]从这些迁徙中可以看到当时大量的少数民族迁到关中地区，以致胡、汉民众逐渐混杂在一起。在长期的交往与磨合过程中，胡、汉民众相互之间能很好地接受、容纳对方，而且，汉人民众也有一些胡化的趋势，就有可能以胡服来展现自己的形象。

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的反映：“北魏孝文帝服制改革主要针对的是豪门权贵阶层，对于官僚贵族而言，着褒衣博带者主要是文官和高级武官，至于下级武官和武士则有适合其职业习惯的不同服饰，而平民百姓，限于经济能力及劳动之需，显然不会也不可能着长袍广袖之服，北魏前期的胡服或鲜卑服便成了劳动阶层的日常服饰。”[134]“龙门西山南段竣工于孝昌三年（527年）的皇甫度窟，其南北两壁壁基亦有一组大型的礼佛图造像。这一组礼佛图浮雕，从人物服饰形态上看，与

宾阳中洞前述同类造像属于同一的样式，惟其画面内部若干细微之处的特写内容，颇足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组礼佛者行列中，其相当于王者身份的人物形象的身后，每每见有一位提携主人衣裳下摆的随身侍者。表现此种人际关系的宗教雕刻，巩县石窟寺北魏礼佛图中亦有多例。由宗教雕刻中此类世俗题材写实画面的情节，可以窥见北魏晚期拓跋王朝贵族阶层法服宽博已呈叠叠冗赘之情势，以致当其举足迈步之际，不赖侍者提拎衣摆已达无法行动的程度，魏晋以来士族阶级褒衣博带服饰徒具繁缛之形式，由此足已概见其一斑”[135]。

2.汉服供养人造像

陕西地区汉服供养人造像共收集46处。根据情况，将其分为两类：汉服供养人造像、汉服胡姓供养人造像。

汉服供养人造像共42处。

永兴三年造像，永兴三年（411），台基刻两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及两身女性汉服供养人；魏文朗造像[136]，始光元年（424），碑阳刻七身汉服供养人，碑右刻三身骑马汉服供养人，一身持华盖汉服仆从；刘保生造像[137]，景明年间（500～503）（图29），台基刻两身汉服的供养人；杜供仁造像，景明四年（503），台基左右各有两身汉服供养人；景明四年（503）造像[138]，台基刻十身汉服供养人；刘范可造像[139]，正始年间（504～508），台基刻七身汉服供养人；吴洪标兄弟造像[140]，正始至延昌年间（504～515），下侧刻七身汉服供养人；冯神育造像[141]，正始二年（505），碑阳刻三十身执莲蕾汉服供养人，碑阴刻六十身汉服供养人，碑左刻十八身汉服供养人，碑右刻二十身汉服供养人；[142]弥勒菩萨造像[143]，延昌年间（512～515），台基左侧有一身男性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女性汉服供养人；杨美问造像，延昌元年（512），台基刻八身汉服供养人；刘泓之造像[144]，延昌年间（512～515），台基刻五身汉服供养人；某清信士造像[145]，延昌至正光年间（512～525），台基左侧有一身男汉服供养人，右侧有一身女汉服供养人；郭伏安造像[146]，延昌二年（513），右下侧刻一身汉服供养人；张相造像[147]，延昌二年（513），台基刻两身汉服供养人；郭法造像[148]，延昌三年（514），台基刻两身汉服供养人；张乱国造像[149]，延昌三年（514），下侧刻十身汉服供养人；王市保造像[150]，延昌三年（514）左右，台基刻十身女汉服供养人；合右邑子七十人造像[151]，熙平至武泰年间（516～528），台基刻两层汉服供养人；邑子

六十人造像[152]，熙平二年（517），碑阳刻三十八身汉服供养人，碑阴刻三十身汉服供养人；神龟元年（518）造像[153]，台基刻两身汉服供养人；刘田氏等造像[154]，神龟二年（519），碑阳仅存二十五身汉服供养人，碑阴刻三十五身汉服供养人，碑左存八身汉服供养人，碑右存八身汉服供养人；王守令造像[155]，神龟年间（518～520），下侧刻二十九身女汉服供养人；神龟元年（518）左右造像[156]，台基仅剩一身汉服供养人；锜道憘等造像[157]，正光元年（520），碑阳刻九身汉服供养人，碑阴刻八身汉服供养人，碑左刻两身汉服供养人；锜麻仁造像[158]，正光年间（520～525），碑阳存三十九处汉服供养人，碑阴存四十三处汉服供养人；崔永高造像[159]，正光四年（523），下侧刻五身汉服供养人，五身执伞汉服仆从；师录生造像[160]，正光四年（523年），碑阳刻二十身汉服供养人，碑右刻六身汉服供养人；魏氏造像[161]，正光五年（524），第一层刻六身汉服供养人，五身执伞汉服仆从供养人，下五层刻四十身汉服供养人；郭法洛造像[162]，孝昌二年（526），右侧刻三身汉服供养人；朱辅伯造像[163]，普泰元年（531），台基左侧刻两身汉服供养人，两身执伞汉服仆从供养人，右侧刻三身骑马汉服供养人；普泰元年（531）左右造像[164]，刻一身汉服供养人；怡神达造像，普泰元年（531），台基左右两侧分别刻三身汉服供养人。史书记载："怡峰字景阜，辽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难改焉。"[165]"怡氏。姜姓之后。禹有天下，封怡绍烈山，是为墨台……墨台氏，伯夷叔齐孤竹君之氏也。""案默台即墨台，古默墨同音。《北周书·怡峰传》：怡氏本姓默台，避难改焉。则怡氏与墨台本通。"[166]太昌元年（532）造像，台基刻八身执莲蕾汉服供养人；北魏交脚弥勒造像（具体时间不详），台基左右各有一身男、女汉服供养人；佛造像（具体时间不详），台基左、右各有一身男、女汉服供养人；释迦弥勒造像（具体时间不详），塔基刻十身汉服供养人；昭仁寺北魏造像[167]（具体时间不详），台基刻三层二十五身汉服供养人；田良宽造像（具体时间不详），下侧刻三十一身汉服供养人；田僧敬造像（具体时间不详），台基刻二十身汉服供养人；夏侯僧造像[168]（具体时间不详），两侧刻两身汉服供养人；魏石生造像（具体时间不详），有一身汉服骑马供养人及一些残损汉服供养人；魏雷生造像[169]（具体时间不详），下侧刻四层二十四身汉服供养人。



图**29** 刘保生造像**[170]**景明年间（**500～503**）陕西

图片来源：《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

这些造像均为汉服造像，在时间上贯穿孝文帝改革前后。

汉服胡姓供养人造像共4处。

夫蒙文庆造像[171]，神龟二年（519），可辨识一身汉服供养人。

茹氏合邑一百人造像，正光三年（522）（图30），碑阳刻四十五身汉服供养人，碑阴刻十九身汉服供养人。茹氏应为胡族。因柔然有茹氏，“茹氏：音如。《官氏志》，蠕蠕入中国为茹氏”[172]，但是《魏书》中并无此记载，只有“普陋茹氏，后改为茹氏”[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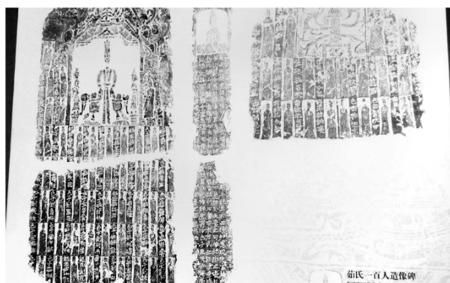


图**30** 茹氏合邑一百人造像 正光三年（**522**）陕西碑林

图片来源：笔者拍摄。

夫蒙氏造像[174]，孝昌年间（525～527），下侧刻汉服供养人。夫蒙武奇、夫蒙米顺、夫蒙伯仁等应为羌族，“夫蒙亦做不蒙”[175]，又“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

族”[176]。

雷汉人造像[177]，永安二年（529），下侧刻五身执莲蕾汉服供养人。雷汉人应属羌族，“雷氏为羌族大姓，望出南安、新平、冯翊等地”[178]，冯翊即位于今陕西地区。

此处收集的胡姓汉服供养人造像仅出现在孝文帝改革之后。这种现象完全契合了孝文帝改革的时间节点。大量的汉服供养人造像出现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可能与孝文帝改革影响有关，当然也不排除造像整体数量增加而造成汉服供养人造像数量增加。

3.胡、汉服混杂供养人造像中的认同

胡、汉服混杂供养人造像共5处。

朱奇兄弟造像，延昌元年（512）（图31），下侧第一层有两身汉服供养人，第二层左侧有一身男汉服供养人，两身胡服执华盖仆从，右侧为两身汉服供养人，一身胡服仆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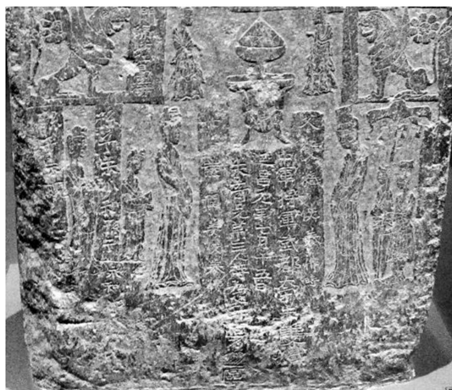


图**31** 朱奇兄弟造像 延昌元年（**512**）陕西碑林

图片来源：笔者拍摄。

雍光里邑子造像，正光元年（520），碑阴刻汉服供养人造像带胡服仆从。

张九娃造像[179]，孝昌三年（527），台基刻一身男性胡服供养人和女性汉服供养人。

朱法耀造像[180]，普泰元年（531），一层左侧刻三身执莲蕾汉服

供养人，三身执伞胡服仆从供养人，一层右侧刻五身执莲蕾汉服供养人，二层刻四身汉服骑马供养人及一身赶车汉服供养人。

郭道疆造像，永熙二年（533）（图32），碑阳台基刻两身汉服供养人，碑左五身汉服供养人，碑右从上往下顺序为一身胡服供养人及四身汉服供养人。



图**32** 郭道疆造像 永熙二年（**533**）陕西小雁塔

图片来源：笔者拍摄。

在这几处胡、汉服混杂造像中，从供养人姓氏来看属于汉姓汉人，但是在造像时既有胡服，也有汉服。在朱奇兄弟造像、雍光里邑子造像、朱法耀造像这三处造像中，均为汉主胡仆造像。张九娃造像则为男胡服、女汉服。郭道疆造像碑侧均有胡服供养人与汉服供养人造像。胡、汉服混杂出现较为复杂的现象，而这些造像的主人均为汉人，他们为什么愿意在自己的造像中展示两种服制？

首先，在朱奇兄弟造像、雍光里邑子造像、朱法耀造像这三处汉主胡仆造像中，汉姓汉服的主人引领自己的胡服仆从供养佛像，可见下层社会并不是如北魏的朝堂一样，胡族处于比较尊崇的地位，在民间胡人也有给汉人当仆从的现象。因这三处造像均是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完成，出现这种汉主胡仆的现象也可能是因为汉化改革使汉人地位得以提升。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下层民众作为被统治阶级，他们之间

的民族界限意识不是太明显，反而财富、身份地位等因素会导致胡、汉民众之间形成主仆关系。

其次，在张九娃造像中，由于笔者未能看到此造像，而记录此造像的作者并没有提供造像图片及造像题记，因此只能通过原文作者的文字描述了解到造像名称、造像年代及造像中为男胡服、女汉服。张九娃为汉族，而这个汉姓汉人却在造像时穿着胡服。与他相对的女子应为其妻子，虽不明族属，但在造像中身穿汉服。从造像时间上看此造像完成于孝文帝改革之后，但是汉姓汉人用胡族服饰来表达自己的形象，可见孝文帝改革在陕西地区民间的影响还有没有波及的地方，当然也有可能如前文分析，因民族混居杂处日久，各民族间的服饰文化互相影响，同时也说明当地胡、汉民族间关系的融洽。

最后，在郭道疆造像中，左右两侧有胡服及汉服供养人。造像左侧上层刻一身汉服比丘，下侧为汉服供养人。造像右侧上层刻一身男性胡服供养人，下侧为汉服供养人。郭道疆作为汉姓汉人，其在造像时却将胡、汉服同时雕刻在造像上。从此造像题记来看，造像是郭道疆为其亡父所造，关中地区郭姓应为汉姓。这又是一种汉姓汉人穿着胡服的情况，同时从造像的布局上来看，胡服供养人位于造像上层，体现了郭氏一族对于胡族在情感上的接受与认同。当然郭氏也有可能是屠各，如“屠各郭超”[181]，如果郭道疆是屠各，那么在造像中以胡服形象出现应该是顺理成章。

同时，此造像中上层胡服供养人造像位于右侧，汉服比丘造像位于左侧，从左尊右卑的顺序来看，这反映了供养人对佛教的尊崇与认同。碑右汉服女供养人位于男胡服供养人下侧，这应表达了男尊女卑的观念。但是，从男胡服、女汉服的表达形式来看，此处造像中展现了郭道疆及其家眷对胡、汉两个民族的认同。

（二）造像中的姓氏与民族认同

陕西地区胡、汉姓混杂供养人共8处。

朱黑奴造像（具体时间不详）：“像主朱黑奴、邑主刘也□……邑主朱奴子……邑子李买……邑子石显珍……邑子郎婆仁……邑子兰显□……”[182]

毛阳造像，景明元年（500）：“毛阳、□安、郭后进、库白、后香，景明元年四月廿六日造。”[183]

彭进佛教造像，延昌四年（515）：“祖樊息□骑将军、祖母武威孟女、父新兴假白土令、弟赤郎……弟毛进、弟黑郎、侄七宝延昌四年太岁在乙未七月□寅朔四日乙巳，彭进□敬造石像一区……”[184]

晏僧定等造像，神龟三年（520）：“神龟三年岁次……晏僧定，同子出家……荔非道酋……像师雍州扶风郡始平县僧□十□师□官赵僧鸾、□□胡僧定、邑师晏僧定……香火车双廻、典坐盖肆玉……邑谓似先会仁……邑谓彭仵龙、录事似先仵明、唯那盖昌贵、典录盖宜郎……香火似先□郎。”[185]

茹小策造像，正光三年（522）：“化主茹以□、化主宣木速、化主茹落周、佛道□茹武落、邑子到载勤、邑老茹百宵、邑子到山□、邑子焦阿□、录生茹白□、清信士茹葛生、录生茹道瞿、录生茹洪戚……邑子茹法落、录生茹道顾、录生茹映世、□□茹戳□、□茹天生、□宣洪朗、□□落仁……邑子剿黑是、邑子到鲁喝、邑子割英秩、邑子宣案喜……邑子张休生、录生刘阳奴、邑子茹也奴、录生刘法胜、邑子张阿定、邑子刘魏奴。”[186]

元氏法义造像，孝昌二年（526）：“大魏孝昌二年……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敬造弥勒像一区……都维冉贾道顺……白舍姬……”[187]

杨缦黑造像，永安二年（529）：“杨缦黑……永安二年……雷阿迷、同蹄龙虎、妻同蹄王宗……伏弟子雷生……竭家珍造石像一区……”[188]

夫蒙氏造像，永熙二年（533）：“……大代永熙二年……造石像一区……清信夫蒙熙□……清信党姬香、清信同缔龙姜……邑子王芳……邑子雷意……邑子刘□……”[189]

以上造像中的一些姓氏明显是由胡姓而改。其中朱黑奴造像中的“郎婆仁”的郎氏应为匈奴人姓氏，“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190]且此前汉姓中未见有郎氏。毛阳造像中的“库白”应为鲜卑族，“库傉官氏改为库氏”[191]。晏僧定等造像中的“荔非道酋”应为羌族，“荔非氏，西羌种类也”[192]。“似先会仁”应为高丽族，“似先氏：本高丽余种也”[193]。杨缦

黑造像中的“杨缦黑”有可能是氐族，“仇池杨氏，氐族大姓，世为酋豪”[194]，北魏时期，杨氏显者有杨大眼，为武都氐杨难当之孙。“同蹄龙虎”“同蹄王宗”以及夫蒙氏造像中的“同蹄龙姜”应为羌族，因为“同蹄氏为羌族大姓”[195]，马长寿先生进一步明确同蹄氏是西羌姓氏：“西羌以同蹄为氏者，正以其族久屯聚于铜鞮山一带之故。”[196]“党姬香”应为羌族，“冯翊党氏为羌族大姓”[197]，“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氏，世宗时复改为王焉”[198]。茹小策造像中的“茹小策”应为鲜卑人，“普陋茹氏，后改为茹氏”[199]。

从以上造像中可以得知北魏时期陕西境内胡、汉民众通过结社，以义邑为单位供养造像、表达祈愿，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胡、汉各个民族共同捐修造像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马长寿先生的记录与分析可能更为详尽[200]。

当然这些造像的出现，有可能如何兹全先生所说是“穷”的缘故[201]，除此之外，各民族之间混居杂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民族的迁徙与混战，使胡、汉民众杂居，下层民众，虽然有时候他们可能被本民族上层裹挟到各民族之间的混战之中，但对于各民族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的矛盾，甚至他们可以非常友好地相处，故而愿意一同出资供养佛像。当然，也许在这些义邑中，佛教的“众生皆平等”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民族属性。

[1]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109页。

[2] 《晋书》卷95《佛图澄传》，第2485页。

[3] 《晋书》卷95《佛图澄传》，第2488页。

[4]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卷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47页。

[5]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176页。

[6]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第177页。

[7]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11页。

[8] 《隋书》卷12《礼仪志》：“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服，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隋书》卷12《礼仪志》，第266页。

[9] 《梁书》卷54《河南王传》：“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女子披发为辫。”《梁书》卷54《河南王传》，第810页。

[10]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中华书局，1981；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11]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47页。

[12] 刘建华：《河北蔚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朱业微石造像》，《考古》1989年第9期。

[13]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2雕塑3）》，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940页。

[14]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34页。

[15]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3雕塑4）》，第1039页。

[16] 衣丽都：《邯郸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何利群：《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城的佛教史迹》，《中原文物》2016年第2期。

[17]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77页。

[18] 〔日〕石松日奈子撰《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朱源译，《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19]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3雕塑4）》，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1277页。

[20]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3雕塑4）》，第1383页。

[21]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0雕塑1）》，第264页。

[22] 马自树：《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第306页。

[23]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上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

[24]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1《教子2》，中华书局，1993，第25页。

[25] 《魏书》卷7《高祖纪》，第179页。

[26] 《资治通鉴》卷139，“齐明帝建武帝元年”，第4370页。

[27] 《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96页。

[28] 《魏书》卷14《元丕传》，第360页。

[29] 《资治通鉴》卷141“齐明帝建武帝四年”，第4408页。

[30] 《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第536页。

[31] 《北史》卷18《任城王澄传》，第657页。

[32] 《北史》卷18《任城王澄传》，第657页。

[33] 《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第536页。

[34] 《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第536页。

[35] 《北史》卷42《王肃传》，第1540页。

[36] 《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98页。

[37] 《资治通鉴》卷138“齐武帝永明十一年”，第4342页。

[3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三联书店，2001，第15页。

[3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第15页。

[40]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366页。

[41]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第366页。

[42]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50页。

[43]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109页。

[44]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42页。

[45]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33页。

[46] 佛教拓片研究小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北魏纪年佛教石刻拓本目录》，永登有限公司，1991，第19页。

[47]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第193页。

[48] 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2007，第50～73页。

[49]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3，第20～21页。

[50]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0雕塑1）》，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345页。

[51]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0雕塑1）》，第63页。

[52] 王景荃：《孔惠超造像及其年代考》，《中原文物》2007年第6期。

[53]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0雕塑1）》，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60页。

[54]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3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41页。

[55]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259x.html.

[56]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3册），第162页。

[57]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3雕塑4）》，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1292页。

[58] 谭淑琴：《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四件造像碑》，《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59]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3雕塑4）》，第1164页。

[60] 《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第536页。

[61] 《北史》卷18《任城王澄传》，第657页。

[62] 《北史》卷81《儒林传》，第2704页。

[63]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条，中华书局，2013，第88页。

[64] 李献奇：《北魏正光四年翟兴祖等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65] 于晓兴：《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像》，《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66] 《魏书》卷21《沮渠蒙逊传》，第2203页。

[67]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7页。

[68]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第75页。

[69]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192页。

[70]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序第2页。

[71] 贾文慧：《魏晋十六国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南科技大学，2013，第14页。

[72] 李克建：《再论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

[73] 朱竞：《北魏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科技大学，2009，第9～13页。

[74]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2雕塑3）》，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977页。

[75] http：//rub.ihp.sinica.edu.tw/～buddhism/main01.htm.

[76]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52页。

[77]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123页。

[78]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272a.html.

[79]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270a.html.

[80]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石刻史料新编》（影印本第3辑第2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第413页。

[81] 〔日〕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国书刊行会，1920，第229页。

[82]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9页。

[83] 《晋书》卷97《匈奴传》，第2550页。

[84]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8页。

[85]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0雕塑1）》，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265页。

[86]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94页。

[87]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201页。

[88] 刘精诚：《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和意义》，《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

[89]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评议》，《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马帮城：《略论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

[90] 《魏书》卷19《任城王澄传》，第464页。

[91] 《魏书》卷7《高祖纪》，第186页。

[92]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22页。

[93]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75页。

[94] 佛教拓片研究小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北魏纪年佛教石刻拓本目录》，台湾：永登有限公司，1991，第41页。

[95]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150页。

[96]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0雕塑1）》，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600页。

[97]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249x.html.

[98]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0雕塑1）》，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287页。

[99]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nan0249x.html.

[100] 刘泽民：《三晋石刻大全·长治》，三晋出版社，2011，第5页。

[101] 刘泽民：《三晋石刻大全·长治》，第6页。

[102]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第133页。

[103] 《晋书》卷97《四夷列传》，第2550页。

[104] 《后汉书》卷《光武帝纪下》，第78页。

[105]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4页。

[106] 张金龙：《北魏政治史（7）》，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第414页。

[107]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89页。

[108]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第17页。

[109]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10]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11]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12]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13]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14]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15] 何效义：《北魏王子悦等造像碑简述》，《东方艺术》2011年第24期。

[116]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29页。

[117]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297~299页。

[118]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第2976页。

[119] 《晋书》卷118《姚兴载记》，第2998页。

[120] 《魏书》卷30《陆真传》，第730页。

[121] 《魏书》卷101《氐传》，第2232页。

[122]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23]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24]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3雕塑4）》，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1270页。

[125] 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博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2011，第53页。

[126]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第56页。

[127] 张燕、赵景普：《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文物》1987年第3期。

[128]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29]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30]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31] 《晋书》卷56《江统传》，第1533页。

[132] 《资治通鉴》卷81“晋武帝太康元年条”，第2575页。

[133]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上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

[134] 张金龙：《北魏政治史（7）》，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第428页。

[135] 张乃翥：《从龙门造像遗迹看北魏世俗生活面貌》，《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

[136] 章用秀：《石雕造像鉴赏》，华龄出版社，2009，第127页。

[137] 林树中：《中国美术全集25雕塑编·魏晋南北朝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第78页。

[138] 林树中：《中国美术全集25雕塑编·魏晋南北朝雕塑》，第76～77页。

[139]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40]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95～100页。

[141] 赵康民：《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文物》1985年第4期。

[142]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13雕塑4）》，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第1269页。

[143] 林树中：《中国美术全集25雕塑编·魏晋南北朝雕塑》，第77页。

[144]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45]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10·云冈石窟雕刻》，文物出版社，1988，第112页。

[146]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47]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0页。

[148]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49] 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等编《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第58页。

[150]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91～94页。

[151]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113～114页。

[152] 裴建平：《碑林藏佛道合刻及道教造像》，《碑林集刊》（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第127页。

[153]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54] 赵康民：《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文物》1985年第4期。

[155] 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等编《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第63～68页。

[156] 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博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2011。

[157]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79页。

[158]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78～79页。

[159]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册），第145页。

[160] 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等编《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第86～91页。

[161]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册），第166页。

[162] 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博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2011。

[163] 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第146页。

[164]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第22页。

[165] 《周书》卷17《怡峰传》，第282页。

[166] 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卷7《世姓篇》，中华书局，2008，第188页。

[167] 张燕、赵景普：《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文物》1987年第3期。

[168]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110～112页。

[169] http：//rub.ihp.sinica.edu.tw/～buddhism/main01.htm.

[170] 林树中：《中国美术全集25雕塑编·魏晋南北朝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第78页。

[171] 李改、张光博：《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第57～59页。

[172]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第147页。

[173]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7页。

[174] 陕西省考古研究员：《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第15页。

[175]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273页。

[176] 《魏书》卷94《王遇传》，第2023页。

[177]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5册），第79页。

[178]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267页。

[179] 李淞：《陕西佛教艺术》，文物出版社，2008，第24页。

[180] 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第147页。

[181] 《资治通鉴》卷105“孝武皇帝九年”，第3321页。

[182] 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第149页。

[183]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184] 西北大学等：《慈善寺与麒溪桥——佛教造像窟龛调查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第164页。

[185] 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第322页。

[186] 施安昌：《北魏茹小策合邑一百人造像碑补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4期。

[187] 李新宇、周海婴：《鲁迅大全集——鲁迅辑较石刻手稿（21）》，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第143页。

[188] 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博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2011，第82页。

[189]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5册），中

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79～182页。

[190] 《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90页。

[191]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第152页。

[192]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275页。

[193]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第183页。

[194]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292页。

[195]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271页。

[196]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9页。

[197]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277页。

[198] 《魏书》卷94《王遇传》，第2023页。

[199] 《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8页。

[200]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

[201]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何兹全序第2页。

造像中民族认同的时空特点

一 时间特点

官方开凿的云冈石窟中既有胡服供养人造像，也有胡、汉服混杂供养人造像以及汉服供养人造像，而且从搜集到的题记资料也可以看出还有一些胡族姓氏供养人造像。按照宿白先生的石窟分期法，云冈石窟供养人造像在服饰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变化。云冈石窟第一、第二期供养人造像无论其族属是汉人还是胡族，他们都身着胡服，在第二期供养人造像中出现了胡、汉服混杂的现象，虽然这一期造像出现在汉化改革之前，但是在官方造像中出现胡服、汉服混杂现象，可能一是因为随着北魏政权的发展以及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政权内吸纳的汉族人士越来越多，胡汉民族同在一个朝堂议事成为习见之事，作为现实政治状况一种直接反映形式，佛教造像自然会有所体现；二也说明了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此时胡、汉民族上层之间的关系，表面上还是比较融洽的。同时也说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状况，顺应了民心。

云冈石窟第一、第二期的开凿时间基本都在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汉化改革开始的时间）之前，第三期主要开凿于孝文帝改革之后即494年到534年之间，在第三期供养人造像中胡服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的汉服供养人造像。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太和十八年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可以说是一个转折节点，这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时间相吻合，由此可见，不论北魏统治者实行改革的目的和后果如何，他们的这一改革十分明显地影响了佛教造像的风格，孝文帝汉化措施在官方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实施，同时也说明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支配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同。

只不过，在第三期造像中，虽然供养人形象都是穿着汉服，但是从姓氏资料上看，这些供养人不仅有汉姓，同时还存在少量的胡姓，这种少量胡姓的存在表明孝文帝改革是有一些保留余地的，在一定程度上对顽固的改革反对派还是有一些让步的，同时也说明鲜卑贵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更倾向于认同其胡族姓氏以及民族身份。

龙门石窟供养人造像的数量相对于云冈石窟来说比较少，但题记的

数量有所增加，这一特点提供给后人更多更明确的信息。龙门石窟造像中仅收集到1处胡服供养人造像，2处明显的胡姓供养人造像，其余造像中的供养人从服饰上看，基本上皆为汉服，而在姓氏上也皆为汉化之后的单姓。

龙门石窟造像，虽然在北魏迁都之前即孝文帝改革之前就开始开凿，但大多数造像是迁都之后制作完成的。因此从供养人服饰上看，无论供养人原本是汉人还是胡人，都是以汉服的形象出现。当然这与洛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有关，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说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洛阳地区得到了非常好的贯彻。从造像时间来看，这些汉服供养人造像都是在孝文帝服饰改革之后出现的。龙门石窟所体现的这种现象表明了孝文帝改革对官方石窟的影响程度。

在龙门石窟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胡、汉多个民族出现在同一造像中，这在官方造像中出现不仅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即是何兹全先生所说的“穷”，应该还有孝文帝定姓族等一系列汉化政策因素，说明孝文帝改革在缓解胡、汉上层人士矛盾上取得了一定效果。多民族合作造像的现象表明在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的推动下，非华夏民族也愿意接受汉文化，而且与汉族的相处应该比较融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胡、汉民族之间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而且胡、汉姓混杂造像题记资料中还存在明显的不同族属之间的通婚现象，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关系。

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的民间造像呈现比较一致的趋势，即这些地区的造像并未随着孝文帝的改革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孝文帝改革前，官方石窟大多为胡服造像，河北、山东等地区的民间造像，在改革前既有胡服供养人造像也有汉服供养人造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官方石窟造像中的供养人服饰大多变为汉服，而河北、山东等地区却依旧保留了胡服供养人造像。且在孝文帝改革前，这些地区供养人造像的服饰情况就比较复杂，存在汉姓汉服，胡姓胡服，胡姓汉服，汉姓胡服，胡、汉服混杂及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在孝文帝改革之后这几种情况依然存在。这说明孝文帝的改革措施在官方造像中反映得比较迅速，而在民间造像中的反映比较迟缓，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反映，政令的下达以及执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且与政治中心的距离越大，政策的影响程度也会越弱。但是，不能由此完全否定孝文帝汉化改革在这些地区的效果，因为孝文帝改革之后，河北等地民间汉服供养人的造像明显增

多，只不过没有出现与官方石窟造像同样的迅速由胡服转向汉服的明显变化而已。

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民间造像略有不同，河南地区的民间造像没有发现胡服供养人。自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河南地区佛教造像的数量急剧增加。但是造像中的供养人均以汉服来表达自己的形象，且造像大多开凿于孝文帝改革之后，再加之，迁都之后，河南成为北魏的一个统治中心区域，故受孝文帝改革的影响比较大。史料记载，孝文帝对河南地区汉化效果非常重视，孝文帝对其改革效果的督责，也促进了河南地区的汉化改革效果，这种效果通过表达供养人意愿的佛教造像充分展现出来。

官方与非官方造像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存在以下异同点。

第一，孝文帝改革前官方与民间造像均存在汉姓胡服、汉姓汉服、胡姓汉服、胡姓胡服供养人造像。孝文帝改革后，民间造像依然存在此类造像，但是官方的胡服或胡姓的供养人造像现象基本消失。从这一不同点可以看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官方造像中供养人形象有比较大的影响，而非官方造像受其影响较小。

第二，孝文帝改革前民间造像存在汉姓汉服、胡姓汉服及胡、汉姓混杂汉服等多种供养人造像，而在官方石窟中，汉服供养人只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出现。明显可以看出民间造像中的汉服供养人造像并非完全是孝文帝改革的结果，其在孝文帝改革前已经存在。山西、河北等地民间造像中的胡、汉姓混杂与胡、汉服混杂供养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胡、汉下层民众之间的和睦相处的状况，而这种混居杂处的局面又为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第三，因鲜卑政权的崇佛政策，佛教迅速发展，官方与非官方的造像数量整体迅速增加。太武帝灭佛期间，北魏境内的造像仅存3处。太武帝之后，北魏政权的各个皇帝基本上对佛教实行的都是推崇政策，因此，境内的佛教造像数量又迅速增加。而且官方与非官方造像中的汉姓汉服、胡姓汉服供养人造像的数量都有所增加。从官方造像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已经得知政令在其发展中起巨大作用，故汉化改革后造像中的服饰基本上都以汉服为主。非官方造像虽然情况较为复杂，但是在总体趋势上汉服供养人造像的数量呈迅速增加趋势。造像数量的不断增加可能因为北魏政权崇佛政策，汉服供养人增多可能是汉化改革对民间造

像产生影响，也可能是造像整体数量的增加造成汉服造像数量的相对增加。但是这些造像在特定的时间点发生的变化也显示出供养者心中的民族趋向与民族认同的变化。

此外，在官方造像中，也有对胡族姓氏如“贺若”保留原状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鲜卑政权的代表人物孝文帝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笼络拓跋贵族，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会采取一些灵活措施。这也表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有不彻底的地方，因此，对于孝文帝推行的改革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夸大。

有如日本学者所说：“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国王们，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胡族身份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然而，大多数胡族在承认自己是胡族的同时，好像也怀有对汉族的对抗意识。鲜卑的拓跋部也许怀有同样的意识，穿着胡族的形象甚至显示出一种自豪感。但是在华北统一后，由于拓跋氏的上层具备汉文化的教养从而士大夫化，到了孝文帝时代胡汉的对立意识薄弱了，相反，却向着被汉族同化的方向前进。太和十年（486），孝文帝实施了服制改革，那时只是以祭祀或朝礼为对象的改革，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命令胡族也要摈弃胡服而穿着汉服。北魏造像的胡服供养人像的表现，是对汉族对抗意识十分旺盛时期的作品，或者是具有强烈意识的阶层或人们施造的形像。但是，仅就实例而言，胡服的表现在迁都洛阳后依然有所遗存，孝文帝改革不过在极少一部分阶层中实施，事实上一般的庶民阶层依然可以穿着自己习惯了的胡服。”[1]

二 空间特点

如官方石窟造像中认同的时间特点所述，云冈、龙门两处官方石窟供养人造像在时间上随孝文帝改革出现迅速变化。北魏政权定都平城时期，在平城附近修建云冈大型石窟，迁都洛阳后，在洛阳修建龙门石窟。在孝文帝迁都后，云冈石窟继续修建，石窟造像不再为大型雕塑，开始出现花、鸟、虫、鱼等石刻，但是石窟中供养人造像还是随孝文帝的改革出现了相应的汉化。

随着汉化改革云冈石窟中的胡服供养人造像销声匿迹，可见在官方石窟中，空间距离对政权的政策指令不存在多大影响，甚至不会有所滞缓。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龙门石窟造像迅速发展，同时，石窟中的供

养人造像服饰基本转变为褒衣博带式汉服，胡族姓氏也转为简化后的单姓。这也展现了官方造像中胡、汉供养人所展现的民族认同因素基本由官方政令决定。

在非官方造像中陕西、河北、山东、山西造像呈现相似的趋势，即未因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迅速发生改变。陕西、河北、山东、山西地区佛教发展存在一定基础，故造像之风兴起后迅速发展。在太武帝灭佛期间，北魏境内仅存3处佛教造像，山东地区为躲避灾难还出现了独特的“窖藏佛像”，故鲜卑政权的崇佛及抑佛政策对造像发展存在一定的作用。但是官方政令对民间造像的影响并不深入，以孝文帝改革为节点，官方石窟供养人造像迅速从胡服变为汉服，而在民间在其改革前后均存在胡服及汉服供养人造像，只是改革后汉服供养人造像在数量上明显增加。

与官方造像中胡、汉姓混杂造像仅存于孝文帝改革之后不同，非官方造像中的胡、汉姓混杂造像，无论是孝文帝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均有。由此反映出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对这两种类型造像的影响程度不同，官方造像受孝文帝改革影响较大，非官方造像受孝文帝改革的影响呈现弱化的现象。并且非官方造像由于受不同的历史、地域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供养人造像及题记反映的胡、汉民众之间的认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非官方造像中，河南地区造像受孝文帝汉化改革影响较深。因为河南现有的造像中，其供养人无论姓氏、族属，在造像中都以汉服表达自己的形象，现有的有题记的三处民间造像均为胡、汉姓混杂供养人造像，且都制作完成于孝文帝改革之后，原属于不同民族的不同姓氏的供养人出现在同一造像之中，也说明了孝文帝汉化改革在河南地区的效果。虽然这种混杂现象极有可能是如同何兹全先生所说“穷”的原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胡、汉民族之间混居杂处、友好相处的一种日常状态。

但是孝文帝改革的影响效果表现在造像上，除河南地区比较明显之外，其他地区相对来说比较不明显。陕西、山西、河北、山东造像中，没有在孝文帝改革前后出现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服饰上都是既有胡服供养人，也有汉服供养人，从姓氏上看也是如此，既有汉姓供养人，也有胡姓供养人，这说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民间的实施与执行有滞后现象，或者说老百姓对国家政策的执行比较随意和自由，同时也是当时民族聚居状况的一种反映，说明这些地区的

民族相处状况比较好。十六国北朝时期各个政权之间的民族迁徙使得整个北方地区各个民族混居杂处，这种状况自然会对这些地区的民间造像有一定的影响。

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及北方胡族一定程度的汉化，对当时在各地区汉服供养人造像数量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孝文帝改革前后均出现胡服汉姓，胡服胡姓，汉服汉姓，汉服胡姓，胡、汉服混杂以及胡、汉姓混杂的供养人造像，表明此一时期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汉化促进了胡、汉民众之间的民族认同，故其在造像时愿意以胡服或者汉服展示自己的形象，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

综上所述，佛教造像随着佛教的传入开始进入中国，因此出现比较早，但是直至北魏时期因统治阶级的支持和鼓励，造像之风才渐兴。北魏太武帝时期的“灭佛”对当时的佛教造像发展造成一定影响，阻碍了佛教造像事业的发展，但是，后期北魏统治阶级再一次推行崇佛政策又推进了佛教造像的迅速发展。

对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学界多认为其大大促进了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融合。现阶段主流观点也是大多肯定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收集的官方与非官方的供养人造像及题记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上、下两个阶层的影响并非一致。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内容来看，其对上层人士的汉化更为关注，故在官方石窟中，随着孝文帝改革措施的发布，造像中供养人的姓氏、服饰均迅速出现汉化现象。不仅北魏后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如此，就是已经远离政治中心的云冈石窟造像也未出现汉化迟滞现象。这说明在官方石窟造像中，汉化政策的推行，很快在造像中反映出来。

但是，在非官方造像中，供养人姓氏、服饰似乎并未受到孝文帝改革太大的影响。在孝文帝改革前后无论是河北、陕西还是山西，石窟造像中出现的供养人形象均存在胡服供养人，汉服供养人，胡、汉服混杂及胡、汉姓混杂等现象，情况比较复杂。当然，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民间汉服供养人造像的数量迅速增多，既可能是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整体造像数量增多而出现汉服供养人相对数量的增加。

民间造像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存在胡服供养人造像，可能因为政策在

民间的实施往往略微滞后于政策的发布。虽说如此，但是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各个地区的民间造像即存在汉服供养人造像，这是民间造像与官方造像不同之处。这说明在民间或下层老百姓之间，胡、汉各个民族的民众之间并没有太大或比较明显的民族区隔，由于他们之间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关系非常融洽，互相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同，故非官方造像存在与官方造像相异的现象。

不仅如此，在造像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北魏时期官方与非官方或上层人士与下层民众的民族认同及变化。官方造像所反映的胡、汉上层人士的认同主要受官方政令的影响比较多，故鲜卑政权的汉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胡、汉上层人士之间的民族认同。也由此可以看到，学术界关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效果评价有过誉之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确实促进北魏境内官方造像的汉化趋势，促使非官方造像中汉服供养人造像数量的迅速增多，但是也不能排除造像整体数量的增加而造成汉服造像相对增加。同时，我们更不能忽略在长期民族混杂基础上，胡、汉下层民众形成的相互间的民族认同。

[1]〔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第201页。

参考文献

古籍类：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

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

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1971

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2。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4。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

赵明诚：《金石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王昶：《金石萃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端方：《陶斋藏石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毕沅：《中州金石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阮元：《山左金石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武树善：《陕西金石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毛凤枝：《关中石刻文字新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顾炎武著，黄汝成点校《月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著作类：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73。

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77。

新文化出版社编《石刻史料新编》，新文化出版社，1977。

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文物出版社，198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

宿白：《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云冈石窟雕刻》，文物出版社，1988。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佛教拓片研究小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北魏纪年佛教石刻拓本目录》，永登有限公司，1991。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91。

龙门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龙门石窟》，文物出版社，1992。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

岑仲勉：《𡸣华山馆——稿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阎文儒：《龙门石窟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观》，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

董国柱：《陕西金石文献汇集——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9。

李改、张光博：《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

夏路、刘永生：《山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华》，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山东美术出版社，1999。

图书馆善本金石组：《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吴元真：《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北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李治国：《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云冈》，重庆出版社，2001。

温玉成：《中国石窟雕塑全集·龙门》，重庆出版社，2001。

丁明夷：《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北方六省》，重庆出版社，2000。

马自树：《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科学出版社，2001。

刘景龙：《莲花窟龙门石窟》，科学出版社，2001。

刘景龙：《龙门石窟造像全集》，文物出版社，2002。

王建琪、王华庆：《青州北朝佛教造像》，北京出版社，2002。

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张继昊：《从拓跋到北魏——北魏王朝创建历史的考察》，稻乡出版社，2003。

〔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孙迪：《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合图目》，外文出版社，2005。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书店，2006。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广西大学出版社，2006。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林树中：《中国美术全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林树中：《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

李振：《龙门石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石刻史料新编影印本》，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李志国：《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

余华青、张廷皓：《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2006。

周伟洲：《汉赵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中华书局，2007。

彭燕凝：《南北朝金铜佛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李淞：《陕西佛教艺术》，文物出版社，2008。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张乃翥：《龙门佛教造像》，文物出版社，2008。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09。

张泽珣：《北魏关中造像记研究》，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9。

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冯骥才：《中国大同雕塑全集云冈石窟雕刻卷》，中华书局，

2010。

李新宇、周海婴：《鲁迅大全集—鲁迅辑较石刻手稿》，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刘泽民：《三晋石刻大全》，三晋出版社，2011。

张乃翥：《龙门区系石刻文萃》，国家图书出版社，201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范兆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李森：《青州龙兴寺历史与窑藏佛教造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日〕石松日奈子撰《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叶德荣：《汉晋胡汉佛教论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佛光文化出版社，2013。

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墓志续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期刊论文：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史树青：《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物》1980年第1期。

河南省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文物》1980年第3期。

阎文儒：《云冈石窟的开创和题材的分析（上、下）》，《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5、6期。

于晓兴：《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像》，《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刘洪石：《孔望山出土北朝造像》，《文物》1981年第7期。

赵超：《〈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像〉释文补正》，《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常叙政、李少南：《山东省博兴县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1983年第7期。

李勇、刘军：《山西省武乡县党城村出土七件北朝铜造像》，《文物》1984年第5期。

孙善德：《青岛市新征集一件北魏石造像》，《文物》1985年第1期。

张秀清：《郑州出土一批北朝铜造像》，《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

李献奇：《北魏正光四年翟兴祖等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赵康：《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文物》1985年第4期。

刘东亚：《近几年来河南征集一批有纪年的铜佛像》，《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张燕、赵景普：《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文物》1987年第3期。

韩伟、阴志毅：《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靳润成：《十六国国号与地域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

张乃翥：《从龙门石窟造像遗迹看北魏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刘建华：《河北蔚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朱业微石造像》，《考古》1989年第9期。

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4期。

刘凤君：《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雷家骥：《后赵文化适应及其两制统治》，《国立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1994年第1期。

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1期。

刘汉东：《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素质与民族大融合——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心理探析之三》，《北朝研究》1995年第1期。

李文生、孙新科：《龙门石窟佛社造像初探佛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3期。

雷家骥：《前后秦的文化、国体、政策及其兴亡的关系》，《国立中正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侯旭东：《论南北朝时期造像风气产生的原因》，《文史哲》1997年第5期。

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钱国旗：《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一一论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侯旭东：《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古正美：《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时代的“天王传统”》，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第7期，1998。

弗里德里克·巴斯撰《族群与边界》，高崇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侯旭东：《造像记与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期。

高艳霞：《河北弥勒造像题记考》，《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

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

陈友冰：《十六国北魏时期的“夷夏之辨”》，《史林》2000年第1期。

黎毓雯：《姚兴政权与佛教》，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2000。

王巧莲、刘友恒：《介绍一件北魏太平真君元年石造像》，《文物春秋》2000年第3期。

侯旭东：《北朝民间佛事活动与民众佛教信仰》，《文史知识》2000年第8期。

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日〕川本芳昭：《关于五胡十六国北朝时代的“正统”王朝》，邓红、牟发松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编《北朝研究》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刘凤君：《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石佛像与“青州风格”》，《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周伯戡：《姚兴与佛教天王》，《台大历史学报》（东正政法与文化）2002年第30期。

赵野春：《鲜卑汉化——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民族关系的调整》，《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施安昌：《北魏茹小策合邑一百人造像碑补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4期。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李雪芹：《试论云冈石窟供养人的服饰特点》，《文物研究》2005年第5期。

刘双智：《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王景荃：《刘碑寺造像碑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

邓乐群：《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李静杰：《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的形成与发展》，《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

邵正坤：《试论北朝家庭的佛教信仰》，《殷都学刊》2007年第2期。

王景荃：《孔惠超造像及其年代考》，《中原文物》2007年第6期。

温海清：《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现象述论——以“拓跋鲜卑

系李陵之后”为中心》，《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陈金凤：《北魏正统化略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

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卢秀文：《敦煌莫高窟早期三窟供养人服饰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

袁剑：《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族群与边疆：另一张隐在的面孔》，《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石松日奈子：《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日〕石松日奈子、筱原典生：《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的汉服贵族供养人像——“主从形式供养人图像”的成立》，《石窟寺研究》2010年第2期。

衣丽都：《邯郸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

金维诺：《青州龙兴寺历史与窖藏佛教造像研究序》，《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

范兆飞：《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胡鸿：《中古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中华书局，2014。

王静芬撰《族性与认同——南北朝时期作为佛教艺术供养人的北方游牧民》，郑杰译，《西北民族论丛》2014年第10辑。

邵正坤：《北朝的村落与权力——以造像记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

张淑敏、贾庆霞：《山东博兴博物馆藏北朝弥勒造像》，《法音》

2014年第8期。

段锐超：《北朝民族认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4。

任旭华：《北魏魏石生佛教造像的命名与断代》，《收藏界》2015年第1期。

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尚永亮，龙成松：《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文史哲》2016年第4期。

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册。

外文文献：

沙畹：《北中国考古图录》，imprimerie nationale（法国国家印刷局），1909。

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日本东京出版，1920。

日本考古学会编《造像铭记》，考古学会，1936。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座右寶刊行會，1941。

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龙吟社，1942。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6。

塚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大东出版社，1974。

学术网站：

典藏台湾：http：//digitalarchives.tw/。

台湾图书馆金石拓片资料库：http：//rarebook.ncl.edu.tw/gold/。

京都大学石刻拓本：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_menu.html。

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http：//rbdl.calis.edu.cn/aopac/indexold.j。

后记

这是本人教育部人文规划基金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当时填写课题申请表时，计划要全面、系统地梳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认同，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按原来的思路进行的话，最早预设的全面、系统的目标也许会达到，但有些问题只能泛泛而谈，不能深入，再加之，由于古代史书传统书写模式及书写宗旨的影响，有些资料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全面的目标或许可以达到，但系统的要求无法达成，因此调整思路，开始将视线转向个案研究，虽然现在呈现的成果主要是个案研究，但是研究内容仍旧可以覆盖十六国北朝时期。

由于某种因素的限制，无论是正史资料还是墓志资料，有关民族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材料较为稀少，因此，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认同的考察就大多只能从其上层精英展开。记录精英阶层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其所代表民族的集体心态的，而图像部分中的一些内容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之处。

虽然此项目的结项成果以个案研究为主，有些问题相对于原先设想的研究思路稍加深入，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个案没有完成，而且个案研究相对于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文中的图像部分，主要是在硕士研究生王晓娜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此特别感谢王晓娜的付出，同时也感谢责编高振华对于拙著出版付出的辛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为一家：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吴洪琳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1-4700-2

I.①合… II.①吴… III.①民族融合-研究-中国-五胡十六国时代 IV.①K280.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8850号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合为一家：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

著者/吴洪琳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高振华

文稿编辑/侯婧怡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城市和绿色发展分社（010）593671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75 字数：195千字

版次/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4700-2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十六国北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多元文化激荡的时期，各民族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混居杂处、冲突融合得到了充分展示。本书分为“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认同”“北魏造像中的民族认同”两大部分，通过详细解读汉赵国号的取舍，赫连勃勃的民族心态，吐谷浑的“中国”认同观，云冈、龙门等石窟造像中所表现出来的胡汉服饰、姓氏、供养人形象的相互渗透等内容，勾勒出十六国北魏时期各民族之间相互认同的进程。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世间之盐品牌微信



定价：69.00 元